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一篇

全一册

水 陆 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2011 年 6 月发布

2011 年 7 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一篇

编写 水陆洲

发表时间：2011.06.22

编辑 红石头

目 录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封 面

概 述-----4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8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9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24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48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63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87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80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181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205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223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273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327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48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349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383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423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435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36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464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476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484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491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499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513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536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547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555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580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589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596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608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620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 扼杀新中国	621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651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674
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678
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689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概述

议论文化大革命，人们往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来由

文化大革命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么一个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运动呢？指导这个运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正确吗？党和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实际情况，认识是正确的吗？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and 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

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从此，一锤定音，在中国就只能发出这一种声音了。

接着上场的是理论精英，按着已经定下的调子吹喇叭：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说：文化大革命的前十年，“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进一步“加深”了王年一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是：“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在这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他们还只把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追溯到一九五六年，

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 1949-1976》说：

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是错误的。是搞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平均主义。

为了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三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是在各条战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这个阶段，首先是要解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三改”（改造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强调仅有经济路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党内整风、反击右派进攻、全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等。

第二个阶段：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是在各条路线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各条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并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公社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这是在各条路线，首先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并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形式加以解决。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后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国际上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的斗争中以及同国际共运中苏联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经过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由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积累的经验不多，对规律性的东西认识不深，具体的体制、方针和政策等等需要逐步完善，对干部的教育没有紧紧跟上实践前进的步伐，特别是在党内高层中存在着“左”和右的倾向的干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过一些错误

和偏差。) 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是正确的。再经过一九七六年至今的实践，从反面证明了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都是在党的有关会议上通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以后才知道，有的人当时内心并不同意，却装出一副衷心拥护的样子。他们却说：这些都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而与他们的“集体领导”是相对立的。党的历史能够如此地任意编造吗？

近三十年的情况恰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等（包括当时的林彪、康生、陈伯达）的支持下，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2006年5月17日初稿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提出过渡时期论，这既有实践的需要——即将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有实践的可能——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国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同时，三年恢复时期，还积累了大量的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这就迫切需要提出党在整个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否则就不能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一、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以前，党的高层在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层中，思想上并不一致。当然，首先应该指出，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大家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应该使他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社会呢？从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以前的大量言论来看，在他的思想中隐含的是前者。而另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则偏向于后者。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就成为直接涉及到各项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问题。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

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

这里有两个问题：

（1）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对私有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建国初期要完成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外，我们所要进行的革命仍然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吗？

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刘少奇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的天津讲话中，到处歌颂资产阶级“剥削有功”。

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与安子文等人谈及他对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等时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幅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这一段话确

实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政策问题：（1）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它们能够截然分开吗？能够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吗？（2）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但是，没有机器工具是不是就根本不能搞互助合作？现在的变工互助为什么就不能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3）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也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既是资本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者？（4）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不是一种“教条主义”？共产党里面能够容许“富农党员”存在吗？如果共产党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党员都是资本家、富农，难道一点也不影响共产党的性质吗？这就难怪当时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谈话纪录后，“不满形于颜色”。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刘少奇在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七月五日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学生讲课的讲稿中又指出：“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诚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同时也还可以指出，农业合作组织为什么就不能如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呢？

二、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初步提出总路线，经过书记处反复讨

论，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才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才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全国进行宣传。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这种情况的要求，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谈到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 32.7%，国营占 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

在以后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7]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指出：“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像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为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

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拟定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这就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在这个讲话中突出了（1）三个五年；（2）社会主义工业化；（3）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时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

这是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这里强调了（1）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时间；（2）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具体说十年或十五年；（3）国家工业化；（4）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党的二中全会就已提出并原则解决。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包括两个“基本上完成”。如果只是一个“基本上完成”那就只能说是部分过渡时期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

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为什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呢？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有制的扩大，就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也就是国家工业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二是，私人所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说，总路线就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很明显，这里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总任务完成了，过渡时期结束了，我国也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中指出：“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这里除了反复强调总路线包括的两个方面的内容，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国、历史的时机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十三日毛泽东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修改中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是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与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中的表述，在文字上略有差别。这里说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部分地区（解放区）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2）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结束；（3）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定要“逐步实现”；（4）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酝酿讨论以及全党的宣传学习，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即（1）“一化三改”，主翼同时并进。（2）“三大改造”，逐步和平过渡。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既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1）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独创了中国的革命转变理论；（2）科学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之后，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是同时并举的；（2）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次单纯地突变过程，而是通过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部分质变最后完成根本质变，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3）这一个过程，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是

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才能完成。

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现实的重大指导作用。当然，无庸讳言，这些观点在实践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

（1）在时间问题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提法是比较谨慎，也比较灵活的。当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这就是他多次强调过的：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虽然这个时间概念固定了一点，但也仍有一定的灵活性。问题在于，在实践过程中这个时间概念，不是向“更长一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加速、提前的方向发展，以至只用了几年时间（到一九五六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过渡时期已经基本结束。

（2）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农业实行了按村组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大部分实行了按行业组成手工业合作社，是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呢？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在私有部门中迅速搭起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搭起架子以后，要建立公有制的新的体制，则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当这个适合的新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已经搭起来的“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空的，而且是非常不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显然过于性急了。

（3）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按照这个要求，过渡时期的结束应当是在“一化三改”实现之后。然而，总路线的规定中又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实现，则可以忽略不计。这又与总任务相矛盾。如果进一步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生产力。“一化三改”的任务必须、也只能同时实现、同时完成。如果社会主义改造真的基本完成了，那必然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还没有实现，那必然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只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就还没有结束。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以后，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又发生了新的争论。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这些论述非常有力的批驳了一些人长期以来散布的种种错误论调：什么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啦，什么以前的社会主义都不懂得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啦，什么毛泽东是民粹主义、离开发展生产力去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啦，等等。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基础、实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所有制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以上的说法，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

首先，关于“经济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指在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都不能算作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单一基础”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所有生产关系都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综合基础”论。所以，强调“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应该有其他的生产关系。

其次，要区别结果和过程。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

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就总路线的目标、结果来说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和结果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基本完成了，并没有全部完成。也就是说，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私有制的残余部分。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区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外，还需要彻底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再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解，很快就明确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可以允许一定范围的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存在，并不要求完全“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就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一九五六年三月，他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

一九五六年，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指出：“在一定的時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他分析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几个条件：（1）社会有需要；（2）生产有原料；（3）国家有困难；（4）内外有资金。只要有这些经济条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即使政策不允许，它也会利用种种不合法的办法在“地下”产生。

其次，他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正如他指出的，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结束得早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根本不容许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可能也是到五十年代，苏联的消费资料仍然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再次，关键是要打破社会主义社会不容许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正如他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益；究竟它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当然，最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非常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容许本国的、华侨的、甚至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在八十年代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相对的独立性；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很不巩固；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当时在政策上不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合法存在，可是，它总是非法的、“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由此可见，说“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是没有根据的、脱离实际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有条件、有

限制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有制经济有适当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利用它们，以便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由于允许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就有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条件。如果允许无限制地发展私有制经济，那么新的资产阶级就会迅猛形成和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而且出现了一大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富翁阶层。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导致了富的越富，贫的越贫。而解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则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问题。至于中国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则成了某些人极力回避的问题。

更荒谬的是有人至今仍然坚持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在新中国继续维持“新民主主义制度”。

辛子陵在他的《毛泽东全传》新版序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姓“新”》中说：“人民最大的遗憾是，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标志，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虽有个别看似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阻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和毁了大批生产力。用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不断地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所谓‘贫穷社会主义’就是这样造成的。邓小平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种错误观点给予了较好的批判。

2011年3月10日修改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1953 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从 1952 年 8 月 1953 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一、高岗对刘少奇的的批评

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始于建国前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种种非常不恰当。加之，同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五月三十一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事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再次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这些更加引起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不满。

关于农村的互助合作问题。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毛泽东 17 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说：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

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认为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

二、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六月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他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

高岗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会上各地方的干部对新税制的批评很多，有人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

七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七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 15 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

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他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 1951 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八月六日，在举行的第 29 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陈云还说：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

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

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支持了高岗在政治上对薄一波提出的批评。

三、高岗四处游说 虽然，高岗当时批评刘少奇、薄一波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夹带了私心，把财经会议看成自己的胜利。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进行积极活动。他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

在杭州，高岗见了林彪。

高岗说：“最近这段时间，北京那边很不平静。刚刚结束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开得狼烟四起，炮声隆隆。会议狠狠整了一下薄一波，薄一波的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虽然毛主席不让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其实不是路线错误是什么！给他留点面子就是了。可是，薄一波的问题却远不是他薄某一个人的问题，牵扯面很广，他有后台……”

林彪问：“后台是哪个？”

高岗说：“刘少奇！”

林彪又问：“可有根据？”

“当然有！”高岗说，“薄一波的思想，来自少奇。少奇的右，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贯如此，屡教不改了。像抗战一结束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呀，像批评东北不该同资产阶级斗争，说有几万‘富农党员’也不怕呀，像批评山西省委不该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呀，像跑到天津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呀，还有，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呀，等等，多啦！少奇也有‘左’的时候，像土改提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但他以右为主。总之，他不稳，他是忽‘左’忽右，歪歪扭扭。他在七大上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你说，他这么个水平，能领导得好吗？”

“我说薄一波的后台是少奇，还有一条根据，”高岗继续说，“他们是一个山头，一个圈圈里的。少奇、彭真、薄一波、林枫、安子文、刘澜涛，他们这些人都是原北方局的，都是搞白区工作的。他们思想上一致，感情上接近，组织上是一条线。所以，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的意思。我这个人你了解，就这个脾气，我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林总啊，党内现在有严重的斗争。我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没弄清。党内对党史有‘二元

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天无二日嘛。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代表白区啦？白区就不是执行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啦？这不是公然***，抬高刘少奇吗？编党史，要对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下定论。白区算什么？不就是在大城市搞搞工运，撒撒传单，贴贴标语，组织组织上街游行和飞行集会吗？靠这个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蒋介石？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林总，你我都是搞军队、搞根据地出身。你说，根据地和白区，拿枪杆子冲锋陷阵和搞地下工作，哪个分量重，哪个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还不是军队嘛，还不是打仗嘛。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说一千道一万，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这个，是事实，不服不行！”

林彪说：“有道理，有道理。”

高岗说：“我看，我们党是一分为二的，有红区的党，有白区的党。红区的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干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红区的干部，有白区的干部。毛主席是代表红区的，刘少奇是代表白区的。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这还了得！所以，党和国家应当彻底改组！”

高岗拿出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给林彪看，并说：“这份名单，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搞的。没有你林总，却有薄一波。”

林彪说：“狗胆包天！他们要干什么？！”

“有没有我林彪无所谓，但谁给他们权力这么瞎搞？看来他们真要篡夺党！”

高岗说：“刘少奇长期搞白区，周恩来也在白区搞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孔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讲名分，要讲正统的话，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周恩来不是搞圈圈摊摊吗，那好，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朱老总也有这么个意思。毛主席，你林总，还有彭总，我高岗，都是这个大圈圈里的，都是这个正统里的。那就和他们较量较量，看看谁斗得过谁，看看谁笑到最后！”

林彪问“毛主席的态度呢？”

高岗说：“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他们已经失去主席的信任了。年初主席私下找我谈过两次话，我看得出来。不是自吹，毛主席真正器重和信任的，还是我高岗。当然喽，林总也是主席的一员爱将嘛。财经会议后，中央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要改变。具体设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形式，

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另外，主席也在酝酿中央分一线、二线，他想退居二线。斯大林逝世对他刺激很大，他看到马林科夫掌权后撑不起来，每次开会就是敬酒。这都是因为斯大林在世时他没有掌权，没有经受锻炼，一下子接班显得吃力。毛主席高明啊。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设想，中央的人事变动可就大啦！”

“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问。高岗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在外国是议会，在我国准备叫全国人大常委会。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政务院总理，政务院有可能改为国务院。而由我来搞政治局。”

高岗又说：“林总，我主张由你来搞政治局，我的水平比你差远了！”林彪轻轻摇头。高岗说：“那，我主张你来搞部长会议。”林彪又轻轻摇头。

高岗说：“林总究竟有何高见呢？”林彪说：“我同意你对形势的分析。无论如何，不能让刘少奇他们掌大权。我对谁都不抱成见，但是非、爱憎还是分明的。彭真、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他们在东北是反对我的。他们背后是刘少奇。”林彪说：“我劝你三点：第一，快刀下面无硬木。既然决定斗，就要下大决心，下狠决心。《红楼梦》上说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调和的余地。第二，好把式难唱独角戏。光你一个人蹦跳不行，要注意团结人，找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是取得毛主席的支持。常言道，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哪！要是毛不支持，你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林彪又说：“一群牛进院子，总有个带头的。老高啊，现在是你带头，我坚决支持你，做你的后盾。财经会议后形势对你有利，得风便扯篷，要抓紧出击。不是要开八大么，八大军队代表团的组成，我会动点脑子的，保证选票攥在咱们自己人手里，这一点请你放心。”高岗说：“军队进中委的人选，请林总也要关注一下。要不，他们又要乱插手了。”林彪说：“你有没有考虑？我看，你先拿个方案，咱们两个再碰一下。”高岗说：“太好了！就照林总说的办。”“有林总的支持，我心里就有底了。我从杭州还要到广州去，一路上我再吹吹风，造造舆论。”林彪说：“枪杆子，嘴巴子，缺一不可。”高岗说：“对！”

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

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说刘少奇不懂经济，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还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

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

还说，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又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

十一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高岗说：“刘少奇的问题，要害是他有个‘摊摊’。这个话我在财经会议时跟有些同志说过。财经会议他支持薄一波，前不久组织工作会议他又死保安子文，就看得更清楚了。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七大’时，刘的‘摊摊’就定了。说刘是白区的代表，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红军的代表，这还像话吗？他要拿白区和苏区分庭抗礼呢！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在虎穴 43 天，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不能工作了，那个时候真是危险。” 彭德怀反问一句：“危险什么？” 高岗说：“刘要篡党啊！你还记得不？毛主席临走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刘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还决定毛主席为中央军委主席，朱老总、刘、周恩来、你彭总为副主席，刘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是大权在握了。一到时候，他就会篡党，取毛而代之。” 彭德怀不同意：“刘对毛是忠诚的。张国焘反毛，王明反毛，刘都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刘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上对毛的称颂、评价甚高，怎么会取代毛呢？” 高岗摆摆手，连连摇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说刘忠于毛，

那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毛主席的意思吗？” 彭德怀承认：“少奇那个讲话，是走了一点火。” 高岗继续反问：“东北富农党员处理，站到富农一边去了，天津讲话，站到资本家一边去了，也是走了一点火吗？” 高岗又接着点燃一支香烟，狠狠连吸几口，然后恨恨地说：“他就是有一摊摊。他把薄一波安排到华北，把饶漱石安排到华东，把林枫安排到东北，把安子文安排到中组部，就是为了到时候篡党！……当然，饶漱石现在已经觉悟了，看出问题来了，和他一刀两断了。” 彭德怀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加以反驳。 十一月，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

据陈云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 1953 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四、饶漱石与高岗紧密配合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 一九五三年二月，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

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

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饶漱石七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这件事提出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

九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开始不久，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说：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五、毛泽东开始察觉高饶的问题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但同时对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活动，毛泽东也已有所觉察。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

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毛泽东还找一些人个别谈话：

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

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

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

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

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

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毛泽东提出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

六、毛泽东建议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

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一月七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高岗得知他的私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高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一月二十五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高岗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

二月三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月五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再次找高岗谈话。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 35 人，候补中央委员 26 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9 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52 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 44 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

朱德批驳了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

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 二月十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七、四中全会后召开的有关高、饶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十五日，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

十六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 15 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

会上有 43 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

十七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开枪自杀（未遂）。

十七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 43 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 1949 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

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周恩来指

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他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在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毛泽东亲笔加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三月一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

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

林枫、罗瑞卿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四月二十四日，会议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

四月二十九日，高岗写了《我的反省》，说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他表示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有不同意见。

五月四日，中央将东北地区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八月十七日，高岗在东交民巷 8 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 26 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 2 月 23 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

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为证了 1953 年 2 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 1953 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八、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高、饶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

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贰、本节简论

近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又成了一个热点。

200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

2007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

《中国老年》2007年6月号发表了卓成华、西川的报导《李力群：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2007年12月，美国之音播送系列深度采访，请高岗的

遗孀李力群讲述往事，请高瑜、宋永毅等人发表看法。

2008 年 7 月，香港出版了高岗当年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当年部下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

史鉴主编的《高岗“反党”真相》（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在这些出版物中，前两种基本上坚持了当年中央的有关决议；后两种则是翻案之作。

翻案者认为：

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但认定高岗“反党”、“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则牵强附会，背离事实。撇开高岗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以及生活劣迹而言，说到底，高岗不过是毛主席为推行“左”倾思想政治路线、维护绝对权威而施展权术策动“党内斗争”的一个打手和牺牲品。这，就是所谓“高岗事件”的历史真相。

当年，毛主席先是向高岗放出口风，表示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倾”的不满，打算利用高敲打甚至替代刘周；后又发现高活动频繁、拉帮结派、野心膨胀，加之观察到陈云、邓小平等核心领导人并不赞同“倒刘换周”，于是权衡利弊，平衡派系势力，决定抛出高岗进行批判，但留有很大余地。

毛主席支持反高岗是一个重大失误；它使得以后刘少奇宗派得以坐大，刘少奇的右倾思想不断膨胀，以至到一九六六年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翻案者是站在反毛的立场上，完全歪曲了斗争的过程和事物的本质。

翻案者也不得不承认：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

毛主席是怎样指导这场斗争的呢？

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在会上不对任何人进行批评。并指示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但是，高岗在会上对自己“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等问题，不作自我批评。

根据这种情况，毛主席决定分别召开两个座谈会，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进

行“公开揭露”。

在座谈会进行过程中，二月十七日，高岗在家中开枪自杀未遂，实际以此表示与党对抗。

根据这种情况，毛主席决定对高岗进行管教，并暂停他的一切职务。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说：

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高岗是自绝于党，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告诉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由以上过程可以看出：

第一，毛主席对高岗有正确全面的评价。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另一方面，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既没有全盘地肯定他，也没有全盘地否

定他。因而，事前，不可能设想由他来接班当第二把手；事后，也没有想要整垮他。

第二，毛主席对党内斗争是坚持原则的。一方面，对党内出现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倾向，要展开批评，进行纠正；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利用党内的正常斗争进行非组织的活动，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利用高岗整刘少奇、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对又抛弃高岗，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三，毛主席对高岗问题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资产阶级的政党根本不同，它实行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允许在党内进行非组织的活动。高岗在党内抱着个人野心，进行派别活动，制造“军党论”，把共产党分成“红区党”和“白区党”，拉拢一些“红区党”的人，打击、排挤一些“白区党”的人，以达到自己获取更高、更大的权力的目的。这种行为，从政治上来说，当然是“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反党行为”？

第四，毛主席对高岗问题的处理是适度的。首先是启发他作自我批评，然后才公开揭露，第一次自杀以后才对他进行管教，并考虑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委派到陕西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只是在他第二次自杀以后，犯了众怒，才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第五，毛主席并没有因高岗的问题而忽视另外一种倾向。1955年批评合作化中右倾思想，1956年批评修正主义思潮，1957年反右派，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先反“左”后反右，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1964年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5年提出党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不能因为以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思想继续发展了，就反过来说批评高岗搞错了。在党内的斗争中，有什么错误就反什么错误，一个时期只能抓住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但不因此就忽视其他的错误倾向。

第六，在开展反高饶斗争过程中有人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一棍子打死。在东北高干会议上林枫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成为了人民公敌。这就把高岗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了。邓小平在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称高岗为“可耻的叛徒”，对高、饶有全盘否定的倾向。

2011 年 3 月 28 日修改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做出了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到一九五三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

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和会中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等谈话。

他在十月十五日的谈话中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来。”“‘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他在十一月四日的谈话中指出：“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

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就有了统属了。”很明显，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邓子恢的思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一九五四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十万个（原计划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个）。

一九五五年六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六十五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五万个），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个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是很多。这些合作社，一般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几百户。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春节，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增加半倍多一点。毛泽东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由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六年十月共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

可是，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

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去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地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问题是：建立这样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究竟能不能巩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

有力量的证据。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从多方面论证了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问题。这是一篇领导中国农村、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这个指示解决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依靠谁的问题。土地改革以后，贫农的数量减少，中农的数量增加，依靠贫农的方针还能执行吗？毛泽东指出：依靠贫农应该包括新老下中农。

三、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第七届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党的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这次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在党内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会议的辩论作了总结：《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这篇讲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

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产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便于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2) 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这次讨论中，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 1， 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
- 2， 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的问题。
- 3，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 4， 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 5， 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
- 6， 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 7， 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
- 8， 所谓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问题。
- 9， 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的问题。
- 10， 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的问题。
- 11， 所谓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问题。
- 12， 应不应当在最近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
- 13， 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的问题。

(3)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要讲全面规划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4) 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就是要思想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

历史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属于右倾的性质，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

还有一些同志老是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

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就嗅不到政治气候。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

(5) 若干其他问题

什么叫“左”右倾？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完全可能。不加强领导，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要过于

膨胀，是必要的。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将来的趋势如何？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到一九五六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 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 87.8%。

不能否认，在批判右倾思想的政治压力下，有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发展，使一些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由于我们党抓住了当时有利的革命时机，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种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健康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错过了这一时机，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经过几年的工作，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私营商业户数的 82.9% 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三大改造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对毛泽东指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叙

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也是肯定的。这与那些全盘否定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极右分子，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这种肯定是有局限的。在内容上，它肯定的仅仅是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在时间上，它肯定的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以前的合作化。

关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它说：“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对于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的注意反“左”的指示，它说：“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对于广大干部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它说：“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关于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总结，它说：“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

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关于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它说：“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些按语，它说：“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

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总的评价，它说：“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

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表面上看来，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只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这种分歧表面上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争论。原文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指导思想的批评，实际上就是站在这种错误路线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反对。他们可以赞成初级合作化，但绝不

赞成高级合作化。（因为初级合作化保留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仅仅是入股分红；而高级合作化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再分红，只实行按劳分配。）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请问，你们说的“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到底是多长呢？是五十年、一百年、还是三、五百年呢？把实现高级合作化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究竟是要不要实现高级合作化的争论，还仅仅是发展速度的争论？

如果有人认为这里的推论是不正确的，但这个推论已经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发生困难时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就曾竭力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坚决顶住，他们的错误主张才没有得逞。一九七八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他们还一再地说，至少三十年不变，三十年以后还要继续延长。二〇〇一年，有一位领导人就在报刊上公开说：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改革：第一次是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农村的税费改革。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一些人公然要在我国历史上全盘否定农业合作化伟大意义和历史成就。

其实，一九七八年以后，一直有人在做这件事。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毛泽东才是中国这场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总是运动加速的动力源。”“高潮从农业开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并不是所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一九五五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给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意思是说，他说高潮已经到来是有根据的，是经过调查的。然而这一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并不是亲历亲为，实地考察，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该书还引用了一段话：“逢先知这样说：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调查，并为我们全党做出了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

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及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加写在各地在 7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毛泽东把亲自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说成是一次社会调查“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由此推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进行的建国后的第二次调查，即毛泽东称之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前后两个多月听取 34 个部委的汇报，就更“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就更“不能说是成功的”了。而实际上他们为了攻击毛泽东而故意歪曲调查的概念，把调查说成是必须“亲历亲为”。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农业合作化，至少是它的“高潮”，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产物。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退回去”，退回到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去了！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之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邓子恢实际也是这个主张。”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长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非常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分歧。”

“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的没有

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的义愤填膺的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条件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的办法。”

所以，辛子陵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

它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工作中产生的若干问题与指导思想的错误，两者不能混同。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问题；指导思想正确而由于经验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百分之百的成绩而没有任何缺点，这样的工作谁能做到？一说工作有缺点，就要扯到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在作怪。

关于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又提出毛泽东说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问题。并且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道说作者真的连目标与过程都分不清吗？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并不等于进行一次革命活动就可以达到的。

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还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撒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导下，八大的报告和发言中才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几个为主几个补充”的思想。怎么能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呢？

它还说：“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这句话把所有制的问题夸大到此程度，不过是为无限发展私有制留下一条后路而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从政治上，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问题恰恰在那个‘大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真的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各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而寻求改革了。这种历史的势差，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一种貌似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而实际上是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各国（南斯拉夫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除外）搞社会主义改造自然要采取苏联的一些基本经验。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以苏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辛子陵说得“彻底”，他说：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化’出了三个结果：第一，国家背了一个大包袱。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从经济上讲，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讲，从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来讲，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一个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错误，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极左思想留下阵地和市场。”

这个辛子陵确实不愧是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把一些不敢说的心里话都公开说出来了。他认为仅仅否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必须否定“三大改造”；在中国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但不再是十五年，可能是上百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2011年3月28日修改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

1,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十一月，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工作中右倾保守思想。十二月，毛泽东又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这次是着重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六年初，在落实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过程中，一些国务院的领导人就急急忙忙地提出了反冒进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工作部门的工作汇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2，《论十大关系》的丰富内容

（1）一个根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方针：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一个根本思想

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样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的

指导思想。可是，现在有人说，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提出来的，恶意地歪曲党的历史。

（3）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报告的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

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4）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有人说，毛泽东忽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邓小平才让全国人民富起来。这样的谬论不值一驳。

毛泽东提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时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

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样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固守苏联的僵化模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也是邓小平才提出来的。他们不可能是无知，只能是恶意地歪曲。现在所谓的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政府代表国家，企业为国家所有，政府和企业怎样能完全分离呢？除了一些人借口政企分离搞私有化以外，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

（5）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后五条，讲的五种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这里已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定要坚持，但党政机构要大力精简。这些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革命委员会，把党政机构砍掉了不止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重新上台，大搞复旧，党政机构急剧膨胀，行政经费惊人上升，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政党结构体制问题，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时就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把它们当做花瓶、摆设，而是承认它们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但是，共产党与这些反对派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邓小平以及他的后人都是不接受的。

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

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3, 《论十大关系》的历史意义

(1) 《论十大关系》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的方针，它不仅总结了我党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党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在一个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

(2) 《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以《论十大关系》为纲来草拟的。

(3) 《论十大关系》对我党的现实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搞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根本违反《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的。

二、一些领导人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一些中央领导人注意，他们仍然沿着过去的脚步，提出了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六月十五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在人代会上关于预算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在李先念的报告中说：“生产的发

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刘少奇指定陆定一主持的中宣传部写的。

七月，周恩来亲自主持“二五”计划的编制，起初，他在他的报告稿中，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后面加上了“又安全”三个字。随后，他在一份书面意见中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斟酌”。最后，他在两个文件的稿子中全部删去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四、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发表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协会的负责同志，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次谈话虽然主要是讲的音乐问题、艺术问题、文化问题，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但是，它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等等各个方面。

可惜，关于这篇讲话的背景材料，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

2，《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的要点

这次谈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

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

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几乎搞掉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推迟了好多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这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

(2)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

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这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

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3) 关于学习外国、学习中国古代与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关系问题。

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理学等等，再来研究中、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一些。

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的原则，也可以用外国的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完全按照外国人的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的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锁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

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好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灵魂》，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灵魂》、《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的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

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就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3,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意义

(1) 这个讲话自始至终贯彻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既要符合一般原理，又要有中国的特点。这与《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一个根本方针是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召开“八大”会议中，总结过去几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提出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始终贯彻地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这个讲话强调的基本指导思想，不仅对开好“八大”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 这个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

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

讲话还提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

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

这个讲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原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观察中国的文化问题的指南。

(3) 这个讲话提出了与外国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讲话反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

讲话还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这个讲话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从思想上对外国开放，大胆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这个讲话也彻底地驳倒了一些人攻击毛泽东保守、思想僵化、闭关自守等等谬论。

五、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政治报告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八大政治报告的内容

政治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

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报告分析了国内的阶级变化：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开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报告提出了现时的任务：“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3，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决议说：“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

决。这时，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个决议，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二十七日作了两次批示，说明当时他也是同意的。

贰、本节简论

八大的政治报告及其决议，遗留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

(1) 怎样理解“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并不等于几千的阶级剥削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结束。台湾还没有解放；香港澳门还没有收回，那些地方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即便在大陆，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刚刚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还拿着定息。这些都说明，阶级剥削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基本结束。

(2) 怎样认识““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更是不符合事实。除了经济上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外，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仍然还有很大的实力，他们还会继续与工人阶级作斗争。

(3) 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既然在国内仍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国际上存在着帝国主义要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不能说已经解决。

(4) 怎样理解““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有时缓和,有时紧张,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不能说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5) 怎样认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的。我们党的历史文献,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来说的。即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了,也仍然存在其他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不可能是什么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些问题需要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当时毛泽东首先发现的是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问题。

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胡乔木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个人去找毛泽东,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后,过了几天,毛泽东就提出:“这句话不妥当。这样讲,决议里就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原因是八大开会的时候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人家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就反映不到我们的头脑里来了”。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没有责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这个问题。也同时对刘少奇讲了这个问题,但没说错了要改要删。

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提出异议的，不只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个提法，而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论断有了新的考虑。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

这里，毛泽东就明显地没有提到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刘少奇读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上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四种不同意见：（1）还未完全消灭经济上的差别的矛盾；（2）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残余间的矛盾；（3）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与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四种提法，大家赞成哪一种？多种经济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地位。新的社会关系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还是存在的，将逐渐缩小，慢慢减弱。“社会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发展的，当然，先进技术基础，是比较而言。社会生产是不断提高的，社会需要也是不断得到满足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其次是正在成长中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旧社会的残余之间的矛盾。后一矛盾现在不定期很激烈，将来逐渐减少，到共产主义时，只有前一种矛盾。生产和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

刘少奇的这段话很清楚，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

到了八十年代，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重新提出这个观点，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

矛盾。

据此，这些年来，一些人热衷于宣传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在党的八大会议中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这种谬论的广泛宣传，欺骗了不少的人。

王光美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说：“少奇在 1949 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 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 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回答：‘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 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 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之二）

按照王光美的说法，我党在八大会上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反对八大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这显然是歪曲！毛泽东说八大关于我国主要（不是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怎么就“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呢？

邓力群在一九九九年《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一）》中，对王光美的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段话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长，对历史的表述，说得客气一点是混乱的。但是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争论的核心，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抑毛扬刘，非常鲜明。通俗地说，就是提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还得从历史的叙述中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我看，用贬低毛泽东的办法来提高刘少奇，其结果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虽然是一个人的文章，但赞成这种意见的、写这样一类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认真对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能够让这

些人篡改我们国家的历史，篡改我们党的历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采用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提出，要以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准备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热打铁，把高潮从改造方面推进到建设方面。”“年初以后，在反保守的空气下，又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引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的重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改变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的准备八大的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的意思很明显，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有两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心；一种是周、陈、刘提出来的以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为中心。结果是后者代替了前者。

《毛泽东传（1949-1076）》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召开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所有的大会报告和发言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在八大会议的进行中，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各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八大会议怎么可能产生并存在另外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路线呢？

但是，《毛泽东传（1949-1076）》又说：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是“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and 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这些人歪曲了社会初始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

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初始矛盾

需要是人们对外界对象、客体，首先是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需要不是主观的产物，更不是任意的想象。人们的需要是由人的生理机能发生、受自然环境影响，并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的需要按需要客体的差别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因此，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社会需要满足的过程是同一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的。从需要为生产提供观念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需要的满足过程是先行过程；从生产为需要提供实在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生产过程是先行过程。因此，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

从矛盾的产生来说，首先是社会需要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与社会需要相一致，否则社会生产就会衰退和灭亡。从矛盾的解决来说，社会生产又决定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生产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要，又促使新的社会需要产生。需要总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往往超过社会实际掌握的满足需要的手段。

因此，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历史阶段的初始矛盾。因为，没有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人们必需生活资料，这是由人类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但是，只有通过生产来满足的需要，才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需要。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但是，人类社会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并且创造出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成为新的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满足需要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生产，不断满足需要，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发展的历史。

社会初始矛盾决定社会基本矛盾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规定、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运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种是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其标志是生产力；一种是人与人的联系，其标志是生产关系。可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表现，没有社会需

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也就不会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的人认为，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表现，这是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制约、影响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本身，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它的存在并不与社会的内在结构直接联系，它的解决也不直接引起社会结构的实质变化。而且，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也不能看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的生产力和消费关系之间的矛盾，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反过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又总是受到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影响、制约和支配。以社会需要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为例，生产为需要提供对象，首先就引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按一定的经济关系把需要的对象加以分配；交换依照个人的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也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消费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其社会经济方面如各种消费关系的矛盾、消费的构成、水平、和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消费的合理组织等，也同社会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进行生产。但是，他们的需要之所以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首先是在于当时生产水平的限制。但主要的还在于少数剥削者占有了生产资料，从而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运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阶级矛盾，其本身则较为隐蔽。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必须进行生产。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首先也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但同时也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关系。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因为人们在公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仍有差别，在劳动的性质、质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在市场交换中所处的地位仍有差别，在分配的方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从而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也仍然存在

相当大的差别。而且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还仍然存在大小不同的部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除了部分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外，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劳动人民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在所有这些阶级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必然会出现一个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总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的群体结构

社会基本矛盾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就表现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资本私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基本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就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中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还包括非社会主义制度的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人与人关系表现出来，既表现为集体劳动者阶级和个体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区别，又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在各个社会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阶级结构，主要包括四个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集体劳动者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反动阶级残余（及其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少量的个体劳动者阶级。

在这四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各种阶级、阶层矛盾：

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反动阶级残余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集体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等等。

在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间必然有一种矛盾成为主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阶级矛盾中，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哪些矛盾是次要矛盾？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上并没有真正统一。毛泽东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地回答了这些理论问题，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当时在表面上举手赞成，实际上坚决反对。

2011年3月29日修改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壹、本节概述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1，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只研究其中关于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的部分。他指出：

(1) 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矛盾的普遍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

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2) 阶级消灭以后，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劳动人民的矛盾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

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通过劳动者来讲，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3) 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

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4）用小民主的方法、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

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篇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理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毛泽东说：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

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2、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

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

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

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2) 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3)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中苏之间的矛盾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

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4)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

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5) 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矛盾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

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6) 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的矛盾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放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

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7) 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矛盾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8) 农业与工业的矛盾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

(9) 党内矛盾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

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

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1)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坏事也可以转变成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

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2)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理论

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3)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

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

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

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

(5)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理论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6)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敌我之间、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

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还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

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和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

能由一部分人民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与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

决不无故闹事。但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理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

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8)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理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9)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艺术、科学领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理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10)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理论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

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开创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违背这个理论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4、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要点是：

(1) 关于我国的社会状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2) 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

从对待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

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坚决反对马克思

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

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3) 关于整风。

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

片面性问题。

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

(4) “放”还是“收”的方针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5) 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

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5. 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的目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份以后，党内的整风运动上已经开始。毛泽东一路南下，沿途作报告。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

西多起来了。

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2）开门整风

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

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指示下达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

五月间党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3）右派乘机猖狂进攻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党的警惕。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

对情绪，这是党本来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

从五月八日到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

座谈会期间，有极少数人乘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攻击说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要为反革命平反；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等等。提出要“轮流坐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会上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把五月十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整风消息，批给其他常委阅读：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五月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二、打退右派的进攻

运动的初期阶段——发动群众围剿右派

从五月十五日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六月十二日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指出：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右派分子”、“右翼分子”，而不是“右倾分子”，指出他们是我们要孤立、打击的对象。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或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扳过来，而且越快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份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

形势，设法团结中间多数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五月十九日，北京有的高等学校开始贴出大字报。中央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迅速展开。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指示说：毛泽东同志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

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这时，在各种会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右派言论有：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五月二十一的会上说：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学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上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民盟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五月二十二日的会上说：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斥。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学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储安平“党天下”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六月一日的会上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个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共产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的基本所在。

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说：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一党治国”话没有说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就是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杨玉清的“下轿下台”

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五月三十一在会上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了的人也不愿放下轿。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歌功颂德不为人所称道。不仅要广开言路，而且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

王德周的“党员有两多两少”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的时候更坏。共产党胜利了为什么今天垮的这样？与其说党脱离群众，不如说群众脱离党，现在党快垮了。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现在党员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应该由民盟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帮助党整风，监视党整风，以取消特权达到整风的最高效果。

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

中华全国工商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

上海公私合营华众织造厂总经理李康年说：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 5% 发付利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所以应该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

叶笃义的“改变高等党校的党委负责制”

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五月七日在会上说：过去党委管得太多，赞成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组织的活动，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需要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加上一种党派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复杂了。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是因为有了党组织。

陈新桂的“历次政治运动副作用太多”

陈新桂说：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这几阵暴风雨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之一。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滋长了唯心主义。人为

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是“靠运动吃饭”，他们“要避免挨打，就要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这时，在各种会议上，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只谈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以至于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只准谈缺点错误，不准提成绩优点。

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当即反驳说：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他与共产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五月二十九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卢郁文与谭惕吾继续展开争论。六月六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宣读了他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扩大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惕吾先生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

五月二十七日，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随后就有人写匿名信骂他是“朋党之恶”。

甚至，还有人写信威胁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六月七日，在复旦大学的全校校教师座谈会上，教授笄移今在发言中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当时，副教授舒宗侨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有几个人也同时拍手叫喊，要阻止笄移今继续发言。会场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这一切说明，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了猖狂的地步！

右派猖狂进攻发展到顶点的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章伯钧召集的“六六六”紧急会议。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于六月六日召集六位教授和其他几个人次开会，分析当前的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对策。

这六位教授是：

曾昭伦，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陶大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

叶笃义，民盟办公厅主任；

史良，民盟副主席；

胡愈之，民盟秘书长；（会议开始即离开）；

闵刚候，民盟中央常委；

金若年，民盟中央常委。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人认为：

当前的局势非常严重：章伯钧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要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评委差不多都是党员，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人说：当前的形势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

共产党所犯的 error 非常严重。章伯钧说：苏共二十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还有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

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局势。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帮助党。民盟现在大有搞头。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还有人说：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当然，不是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同意章伯钧等人的意见。但是，章伯钧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利用当时的所谓时机，与共产党摊牌，要共产党实行让步，从而实现他的“轮流坐庄”政治野心。

从六月七日开始毛泽东着手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六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

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的锻炼，乱子总

有一天要发生。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在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六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打人骂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

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均、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放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3) 毛泽东揭露组织右派进攻的头目——章罗联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起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看了上海文汇报六月十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为人民日报写了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新华社十四日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意见：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间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产

阶级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参考。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强调：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对前者”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因为右派势力进攻是有代表人物、骨干分子的，因此，批判右派政治思潮必须结合具体人物。应该说这是符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的“批判右派，除个别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的精神的。

为了具体指导这场斗争，毛泽东又继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

这篇文章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

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

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二）我党对右派进攻采取的方针。

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

（三）与右派矛盾的性质及我们的政策。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4) 毛泽东具体组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 4000 人，而是有 8000 人。例如北京约有 800 人，上海有 700 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 50 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只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 700 多人，报纸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七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对右派人数比例的估计。

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

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与右派争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三）反右派斗争采取的形式。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

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四）对右派的政策。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

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

（五）整风、反右的政治目标。

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5) 毛泽东系统论述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的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

七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这篇文章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七月二十日稿、七月二十五日稿、七月三十日稿、八月一日稿。七月三十日稿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八月一日在这个会议上印发给党内县委及其他相当县委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当时党内高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七月十一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称：“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个观点显然同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的“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是不一致的。

这篇文章进一步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

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2）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3）整风的政治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4）整风的主题和方法。

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

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5）与右派的矛盾性质、政策和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捕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6）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

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

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

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2，运动的中期阶段——深入挖掘右派分子

1) 八、九月份毛泽东抓紧深入开展反右斗争

八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1）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事实求是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2）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3）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5）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

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5) 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6) 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7) 深入挖掘期间，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 7511 人，已在大小不同范围内重点批判 3529 人，占右派总数 47%。全市有极右分子 1257 人，占右派总数 16.7%。全市已登报的右派分子 135 人，近日又决定增加 55 人。北京各高等学校共发现右派分子 4230 人，占高等学校总人数 1132132 的 3.7%；其中极右分子 1125 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 26.6%。教授中右派分子 192 人（其中极右分子 85 人）占教授总数 1390 人的 13.9%。其中重点批判 108 人，占教授总数的 8%。（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报告说：32 所高等学校，11.3 万余人参加斗争。共发现右派分子 4874 人，占总人数 4.3%，其中极右派 1115 人，占右派总数 23%。已登报批判的极右分子 145 人。）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时指出：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两种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必须避免。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分子龌龊的私人生活。这两种做法，都妨碍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

育，必须加以避免。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

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圆满解决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以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这篇社论于九月十五日发表。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九月十二日，中财发出《关于在农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这篇社论于九月十八日发表。

十月，八届三中全会前统计，全国已划右派分子六万余人。

2) 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三中全会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九月二十日上午一时，毛泽东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

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前一段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报告》指出：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

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报告特别对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关于农村、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少数民族、关于军队、关于党和团等各个方面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思想、政策、要求作了具体论述。

(一) 报告强调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

(二) 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 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 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五) 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 我们同苏联的争论

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

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乎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2）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

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3）整风的任务

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去年，

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未，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

(4) “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

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5) 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方法。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去了。

3) 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在第十三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 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

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

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

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清什么叫

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2) “四大”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

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3) 右派会一分为二

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悔改，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捕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

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

(4) 机关学校要抓紧整改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进一步发挥。此后，毛泽东就很少涉及关于整风，特别是反右派问题了。而实际上，就全国来说，更大面积的县以下的反右派斗争，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

3，运动的后期阶段——反右逐步趋向扩大化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示在船员中不划分右派。

十月十五日，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

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通知还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分裂人民内部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

首分子、主谋分子和分子。(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 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 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 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后，迅速地站到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 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 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个标准尽管仍然十分难于具体操作，总算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防止多划右派分子，可以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 62 人。经中央决定，其中 53 人由原选区人民代表大会撤消其代表资格。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规定：乡（区）级整风，不进行反右派斗

争。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

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双反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

五月，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

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即已告一段落。而此时全国划的右派分子却达到五十五万人，比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六万人几乎多出了十倍。但当时统计上报的只有三十万人，后来又说是四十五万人。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

三、对右派分子分批摘帽

反右派斗争过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给右派分子逐年摘帽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提出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建议：

关于全国 45 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 70% 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 10% 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 45,000 人左右的帽子，即 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约有五万人左右。到一九六四年又有四批约三十万人先后被摘掉帽子。这就已经超过了七年中摘掉 70%（应为 315,000 人）右派分子帽子的估计。其中，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由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错划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这个建议未被中央采纳。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组织反击右派的问题

这些年来，是遭受右派攻击最多的一个问题。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认为是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而变成了欺世盗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如果不说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滔天大祸。”

：“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领袖。”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了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拥护周恩来和拥护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毛泽东正要在中国知识界树立自己的至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

战！”

“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就是辛子陵对反右派运动的攻击和歪曲。

肖冬连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也认为，毛泽东从整风转向反右就错了。它说：

五月十九日以后，“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不再是整顿三风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在党内肃清修正主义的问题了。”

“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到了6月8日，毛泽东抓住‘匿名信事件’这一契机，发动了全民的反右派运动。”

“整风的主题变了，鸣放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党内那些对开门整风方针持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澜，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击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

“当时党内一些高级负责干部就这样地运用“引蛇出洞”的战术，人为地制造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从而为大规模的反击提供了最主要的‘客观’依据。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以肯定和支持。”

“‘引蛇出洞’战术所造成的假象，使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

“从此以后，党的八大所判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就被逐步扭曲，客观上已不是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被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致产生了一连串的逆向发展，终于把我国推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不论是‘章罗同盟’，还是‘章罗联盟’，都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

订立盟约，二是具有根据盟约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如果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所谓的‘章罗联盟’并不存在。”

“‘挖’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章罗联盟’，在当时被看作反右斗争的重大成果，它对于整个反右斗争的战略布署，‘意义’太重大了：不仅确定了反右派的主攻方向，而且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中断整风而转向反击右派的必要性。”

“反右派斗争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怪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理论正确性的证明。”

“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按：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即它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一些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夸大为敌对阶级间的阶级斗争。”

“在青岛会议精神和中央上述指示的引导下，几个月的‘深入挖掘’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首先对右派性质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在质的方面绝对地夸大了同右派斗争的严重性。……

其次，这声运动采用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策略方针对待批判对象，以至于打击面过宽。……

最后，对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处理的份量过严过重。”

《毛泽东传（1949-1976）》与这种攻击毛泽东、全盘否定反右斗争的观点，有根本区别。但是，它对反右斗争的一些分析和评论也是不正确的。

该书说：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作者们凭什么说“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呢？至于“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该书说：“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严重不严重？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严重不严重？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有深刻的感受。特别是身处北京的高等院校环境中的人，更有深刻的感受。当时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如匈牙利事件那样更严重局面，就是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

该书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说“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这完全是书生之见！如果由这样的人去指导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那是要亡党亡国、人头落地的！革命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

该书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

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你活我也活的矛盾。这可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二、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他指出：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 4 千人，后来扩大到 8 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 10 万人，实际上搞了 55 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

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 6 月 8 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应该说，对广大的人民来讲，这个实践，这个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斯大林肃反的扩大化不一样。1957 年的生产发展很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到 1956 年，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 1956 年调整，使 1957 年的生产发展更健康，速度虽然稍降低了一点，但是 1957 年的生产、整个经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反右斗争发生扩大化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1，毛泽东开始提出的某些原则没有坚持

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以后，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

如果坚持一开始反右派斗争时毛泽东提出的：对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不予办罪，是不是可以更有利于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避免斗争的扩大化等后遗症呢？

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从其中划出的右派分子竟占到了百分之十。毛泽东历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中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而运动的结果却达到了他的最高的一种估计。这显然是“过分”了。

2，中央书记处的严重失职。如果说，反右派斗争发生过扩大化，主要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五八年三月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具体工作，是由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整风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具体进行指导的。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失职。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书记

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3，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

4，党内一些官僚主义者乘机整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咎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三、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毛泽东传》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还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它指的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不正确吗？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制的改革完成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反右斗争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中加以阐述、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究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合乎马列主义还是不合乎马列主义？是合乎实际还是不合乎实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讨论、认真研究的。”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

史，只讲我们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国史，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跟“七十年”同样一个腔调，应该有所差别，要把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表述。”

“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我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夏季形势》《三中全会》等文章中选录了 18 段：

1、“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2、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3、“现

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4、“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生生产力。”

5、“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

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7、“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是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8、“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

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9、“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10、“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1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

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12、“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13、“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14、“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

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5、“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

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17、“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18、“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 1956 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究竟是属于

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还是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范围?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种说法：1957年以后“左”了20年。那么这个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扩大化的方面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问题

《毛泽东传》说：“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该书说：“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该书说：“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大一次会议认为生产落后于需要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认

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到底是思想向前发展了，还是向“左”发展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有一个认识过程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提法明确地说明了阶级斗争和两类矛盾的关系：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同民主革命时期比较，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注意！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与敌我矛盾相对而言的，不是与阶级矛盾相对而言的。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说：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不存在了？或者阶级矛盾只表现为敌我矛盾？这两种说法不仅违背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在理论上也根本说不通。

说阶级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由此推论出人民内部矛盾中大量的是阶级矛盾呢？不能。这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外延不能相等。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一部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更包括各种劳动者社会集团之间的非阶级矛盾。这后一种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是大量的。

同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印发《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人员参考，其中第三十问题是：目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几类，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的二十二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第三十问题没有批注。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这个问题考虑仍不成熟，还没有得出结论。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需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

这一段话写得很简要，如果联系他在此前后的思想，应作这样的解释：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斗争）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各种阶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敌我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说：“两者都有，都需要注意”。但是，就

中国今天的现实情况来说，“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中既包含有阶级矛盾，又包含有非阶级矛盾。所以，“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也就是说，既不能把非阶级矛盾夸大为阶级矛盾，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之间矛盾。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也有‘左’有右。”很明显，这里说的“两类矛盾”是指的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第一类矛盾”是指敌我之间矛盾；“第二类矛盾”是指人民内部矛盾。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对敌我之间矛盾的关系时，毛泽东总是用“突出的”、“显著起来了”来形容，而不用“主要的”来形容。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指出：“不能说现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阶级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的矛盾（除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了主要矛盾。刘少奇的这个提法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比较，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观点，仍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

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概括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属性的一种矛盾。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是主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除了少量的敌我之间矛盾以外，大量的、普遍存在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几乎包括了绝大部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究竟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不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毛

泽东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称述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用“主要的”，而用“突出的”、“显著的”，以避免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相混淆。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在讲话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一个讲话提纲中指出：“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这几句话非常简短，但理论意义非常重大。它深刻地说明了各种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把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概括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包括的是人民群众与一部分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如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一部分是非阶级矛盾，即劳动人民内部的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如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

在过渡时期，在两类矛盾包括的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阶级矛盾虽然是主要矛盾，但并不等于是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

如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零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以下几个特征：

(1) 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 这个矛盾斗争的焦点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支配工人阶级；

(3) 这个矛盾斗争的主战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2、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在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国际联系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潜在能量和巨大影响。

3、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劳动人民内部就会产生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

4、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前途和方向，关系到青年一代的前途和方向，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57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乘风破浪》一文（这篇文章是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是对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总结，特摘录如下：“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

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 248 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 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 44% (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 30%左右)，右派只占 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

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过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练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成为具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

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2006 年 6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5 月 30 日修改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根本还是促进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反冒进的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会上一些人甚至认为，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上一些人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明确提出七条意见，这七条意见作为一个妥协方案，是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

其中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到十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的会上，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一致认为一九五六年“冒了”。

陈云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

李富春认为，一九五六年计划冒了，执行也冒了，是冲昏头脑；

李先念说，一九五六年冒了三十亿到三十五亿；

薄一波列举了一九五六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十种表现。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薄一波一九九一年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 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到货，这也促使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后来总结，认为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二十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十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

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能够以此为根据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吗？

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是促进还是促退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

“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三、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矛盾、不断革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只有周恩来，还有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指示：《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可转载，并可广播。”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在反右派中，批判了右派提出的走“白专道路”的思想。但是，有些人又把“白”与“专”划等号，认为“专”就是“白”。随着形势的发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即将转向技术革命，所以，在整改中，要进一步解决红与专，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问题。

首先，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即阶级斗争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阶级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

阶级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另一类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不断革命问题。毛泽东把他的不断革命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这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层次，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这包括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

第三个层次，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反右派斗争。

第四个层次，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

这四个层次的革命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不间断地进行的，但又不是绝然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特别着重说明了，为什么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紧接着进行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这个战略思想非常重要。当时很多“老革命”不理解，一些人掉了队，一些人勉强地跟着走过来。右派夺权以后，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了政治思想上的主流。

四、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明确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提出反冒进之所以是错误的：

第一，从政治上来说，一提反冒进就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第二，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第三，从具体业务工作上来说，“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这些属于业务问题。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具体地分析了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过程及影响。

先是，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一九五六年四月，）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

随后，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

这样批评反冒进就涉及到了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有劲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指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报告（报告记录：“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当时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报告记录：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讲革命朝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上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矛盾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1，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2，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3，在整风中每个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6、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

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从 1958 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风，十分必要。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22、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斗。

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饶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23、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6、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使出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36、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

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的同意。

37、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与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41、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1 《文稿》第 7 册第 24—31 页]1

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

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毛泽东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他还说，1955 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毛泽东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的讲话就说过：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但是，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我不懂，也不知道。这次讲话又说：反右倾保守，并不是要尽唱高调、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是要按实际条件办事，订指标要留有余地。这番话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在一九五九年才说的，而是在大跃进还没有形成之前的一九五八年一月说的。有些人就是不听。出了问题，反过来，还要说是因为毛泽东反右倾、批评反冒进、鼓吹大跃进造成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劲头鼓起来了，现在有了热潮，

第二，都搞社会主义，但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

第三，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要坚持整风，改掉官气。但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二月十九日，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

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实际是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它是总结几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特别是反右倾和反“反冒进”的经验教训的成果。六十条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部分：理论、原则、任务、学习、方法。其中：

关于理论

（1）不断革命。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

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2)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是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

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并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取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要懂得一些。不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

导得比较好些。

(3)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的需要。

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制度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4)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

十个指头的问题。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都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

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

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悟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讲究方法论。

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

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地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关于原则

(1) 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

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2) 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

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3)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管官有多么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人的条件之一。

(4) 要随时准备挨骂。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5) 党的领导原则。

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四个字，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

对不妥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6）第一书记挂帅。

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7）党委要抓军事。

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毛泽东批示“可用”的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中说：

“他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要稳妥可靠些，不要再犯冒进的错误’，”

“这些人不了解，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冒进是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没有根据或没有充分的根据的胡思乱想，主观主义地蛮干。”

“一九五六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有些人却分辨不出九个好指头和一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

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地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超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

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地讨论一些原则性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付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五、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领导人作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陈云发言检查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毛泽东扞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无权参与，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呼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番跑出来的时候，对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我们的同志就会生气，‘噢，你右派把我抓得跟你差不多呀！’果然生了气。表现在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二百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是个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

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贰、本节简论

一些人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通。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胡绳的《七十年》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 1956 年的反冒进以用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毛泽东对 1956 年反冒进的批评是否“不适当”，姑且不论，上述这种说法对它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和推论，确实也大得吓人。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也作大体相似的评论：

从批评的以冒进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维定势，认为无论如何正确的方面总是“九个指头”，错误的方面总是“一个指头”超出这个范围便是“右倾”实际上是过于自信，且听不得别人批评。

如果说，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的批评还只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的，那么到了南宁会议，则把反冒进一下子提高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使会议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

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在讲述辩证法。但是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平衡与不平衡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条件有主观条件，有客观条件。毛泽东只强调主观条件，忽略了客观条件，一味要求不断打破原有定额、指标和计划，

使所谓的“积极平衡始终无法建立起来，相反却演变成了遗笑后人的数字游戏。

南宁会议是履大跃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将本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当作几位领导人的错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随便指名道姓地批评表明毛泽东已经把自己凌架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急剧地发展起来。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除了某些客观原因，如制度不健全等等外，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不可回避。这个主观原因就是过于自信，不再谦虚谨慎。

《毛泽东传》也说：

“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里也把事情的本质歪曲了。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毛泽东认为他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条件，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中国的经济。他太急迫了，又把赶超英美的时间提前再提前。”“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功业心所驱使，毛泽东决心要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不把这些入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于是，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

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全党的推行开辟了道路。”

很明显，这是辛子陵的一贯手法：一个是，蓄意歪曲事实，从毛泽东的动机、人格上污蔑攻击毛泽东；另一个是，拚命地把周恩来拉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以便“证明”毛泽东一个人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

毛泽东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

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

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 1956 年全面冒进了，在 1957 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 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又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 1956 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 1956 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一九五六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

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一九五八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也可以说是得到中央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的确认）。

2011 年 4 月 1 日修改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四点：

第一，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第二，现在好像不要平衡，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 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 15 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 17 万人。1956 年工资冒了 10 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第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四，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通过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坚持普遍真理与发扬独创精神的辩证关系。他的结论是：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攻击最多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

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

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以后提出来的。在中国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个人崇拜；另一种是反对个人迷信。后来，在文章中还是使用了反对个人崇拜这种说法。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两种个人崇拜，其中第二种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其实，就是个人迷信。我们不应该反对个人崇拜，只能反对个人迷信。

有人说，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就是鼓吹个人崇拜。要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分开，我们只能崇拜真理，不能崇拜个人。某个真理总是由某个人提出来的，真理与个人能绝然分开吗？当然，真理与个人也不能绝对等同，不能因某个人提出了某个真理，这个人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其实，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精英们才是真正的个人崇拜主义者。在中国，各种纪念个人的旧居、碑亭、塑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讲话都封为理论、重要思想。成天要人们高举这些旗帜，而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指出了对一九五六年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存在的偏差。这是以后中央领导层产生一系列分歧的基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阐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四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建设速度问题。

关于对立统一观点，

他说：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要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

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

他说：现在仍然存在着四个阶级：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敌我性质。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性质。

第三个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

第四个是农民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集体所有制。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他说：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说已经最后完成。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

关于建设速度

他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了相当完整、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分析为基础，已经开始形成，但尚不完备。能做到自觉拥护的人不多，而出自本能反对的人不少。总路线的灵魂、实质是建设速度问题，但对速度一定要辩证地来看，不能刮风。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中心就是鼓励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树立起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滕代远的信。

指出：“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多

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虽然反复强调要反保守，但同时他又非常冷静，反复教育干部要注意每一个建设项目是否必要和可能。绝不是像有些人攻击污蔑的那样，只是一味的头脑发热，盲目冒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一个批语。

指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消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消灭掉了。” []3

这里提出了“兴无灭资”的口号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会议发言

他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的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确没有这样的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重点是总结反冒进在思想方法上的教训。但同时又强调了另一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

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

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

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

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变成敌人。国民党所做的是、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采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重点还是分析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从这些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阶级关系问题的重视。因为它是党制订政治路线的基础。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理论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贡献有以下几点：

- (1) 提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问题
- (2)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3) 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 (4)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毛泽东的讲话的确十分精彩，十分具有鼓动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能说不正确。问题是，无论毛泽东本人怎么想，客观上，在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压力下，在人们渴望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的支配下，人们就是把科学、把客观规律统统当作教条，当作迷信。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行其道。

毛泽东把个人崇拜与真理崇拜混同起来，主张如果真理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应该崇拜，其含义就是他自己就代表真理，这就明显地表现毛泽东过于自信。尤其当他的意见和中央集体不一致时，他更需要借助党内民主之外的东西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张，是天理与人欲并存。

成都会议，就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而言，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南宁会议。“大跃进”中的各项主要错误，成都会议都已基本存在或初具雏形。

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它的这种攻击可以说没有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但确实代表了党内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心声。

二、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汉口会议，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参加。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九五七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一九五七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内外情况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顾不上开会；我（那时是采取防御的，以后才逐步恢复三个口号。”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地强调了两点：

第一，大跃进要留有余地。

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

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

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

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第二，阶级斗争要注意反复。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

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

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

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过，谁敢贴大字报。

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

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从来都是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虑的。在生产斗争领域，他一方面发动大跃进，另一方面，又时刻提醒干部要保持冷静、留有余地。在阶级斗争领域，他一方面指出在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要冷一冷、放一放，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毛泽东讲话：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问题，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

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毛泽东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我们再看看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对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是怎样评论的:

对于河南和辽宁这两个看起来有点不着边际的计划,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泼一点冷水,好让他们不要头脑过热,也让其他各省不要头脑过热。但是毛泽东此时泼点冷水,局限性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肯定洛河南和辽宁省的计划也是可以实现的。

的，只是要求其它各省不要仿效，以免天下大乱，晚一点也就是一、两年的事，何必着急呢？

什么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是一个典型！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介绍一个合作社》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发展。人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面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许多人包括像胡绳这样的所谓“党的理论家”们的攻击，成了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很难相信，这些人真的是读不懂这段富有革命精神和辩证法思想的话，而只能说，这些人为了达到攻击毛泽东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恶意歪曲罢了。

三、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洛甫同志：

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报告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的热烈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

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号上午三时

（张闻天一九五八年四月中下旬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三个报告，分别是：四月十三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四月二十六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其中最后的这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实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的，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报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惜，他的思想到五九年下半年又发生了反复。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重点是讲我们发展了辩证法，准备对付大灾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说。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这里说得很清楚：跟什么人，主要是跟真理。什么人掌握了真理，就跟什么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胡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

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

就会毁灭来说的。第一,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 也有战争的可能性, 不能睡大觉, 要准备; 第三, 帝国主义一定要打, 就打吧, 打完了再建设; 第四, 打仗要死人, 人类会不会毁灭? 不会。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这些讲话, 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 不抓农民没有政治, 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 就会犯错误; 有了这个同盟军, 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 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发展资本主义, 等待工人多了, 农民觉悟了, 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 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 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 解放后的农民, 精神振奋, 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 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 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 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 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 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 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 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 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 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 无论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 经过大跃进后, 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 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工农兵, 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 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 也是“农民主义”吗? 我和欧洲同志谈: 你们怎样? 欧洲情况, 除了农业工人以外, 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 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 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旬, 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周恩来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 好一些; 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 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 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 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 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 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 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 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 and 建设的积极性。因此, 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 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 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 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 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 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 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

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的脱离党的领导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说：

从工作出发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 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 1956 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的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了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高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首先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便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 1957 年计划的第一本帐，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李先念说：

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 1956 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 1956 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会有多大。

这些发言还是不错的。可惜，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有些人又反悔了。一些“笔杆子”们推波助澜，把这些人说成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委曲。难道说，中央的某些

领导人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 (一) 再讲破除迷信。
- (二) 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 (三) 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 (四) 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
- (五) 讲一个红白喜事。
- (六) 设立对立面。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肯定了“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发热的情绪。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指出：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

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跃进”一词，肯定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是“跃进”。）

四、农村合作化中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合作化以后，合作社的生产发展、经营方向、组织结构等问题，他指出：

“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

“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

“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市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意见》指出：为适应我国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小社合并为大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合并后的乡、社规模，以每一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为宜。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新乡。

《意见》下达后，全国开始进行小社并大社工作。四月间，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由 27 个小社合并成有 9369 户的一个大社。

从一九五七年冬或一九五八年春以后，全国不少地区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合作工厂或者直接过渡为地方国营。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底的不完全统计，转为合作工厂的已有 9300 多个，职工 61.7 万多人，直接转为地方国营工厂的有 3,100 多个，职工 18 万多人。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倡导农村人民公社，其实质在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要按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按照这样的模式来经营，当然就不能称之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然规模就不能太小，有些事必须发挥联合起来的作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倡导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方向、经营模式是正确的。目前，我国农村的一些先进地区，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北京市的窦殿村、河北省的刘庄、江苏省的华西村，以及一大批各地建立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都是按照这一方向发展的。

人民公社化初期，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乡一社，内部分有三级（或四级）：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有的下面还有生产小队）。原来的高级社有的地方划为生产大队，大部分地区划为生产队。当时确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

是管理生产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各农业社并入公社后，要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样就在一个乡的范围内，把占有生产资料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一下子“拉平”了。此外，据十三个省统计，还有 94 个县，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或已经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联社。

这里有两不同的问题必须首先分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问题，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个是在进行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问题。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

“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湎于《三国志》，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推到世界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印度公社是如何被历史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以全国党代会形式通过的总路线，标志着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两年前八大会议制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已经最终确立了。”“这条总路线，基本方面是不正确的。”

“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后来，不断地反‘共产风’，‘共产风’的风源何在？就在人民公社化本身。”“人民公社的‘公’，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字，即绝对平均主义。它是党的领导人在新形势下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套用，反映了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很明显，这些观点就是要全盘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错了，犯了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必须下台。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就这些来看，本来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性，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规定和解释，在什么地方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什么地方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在什么地方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原文没有指出来，看来它也指不出来。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系列基本点，大都发端于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探索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是不是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1.不重视综合平衡。”“2.……忽视物质利益的原则。”“3.……

只突出了多快而未能把把同好省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这里，薄一波实际上就承认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传》也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

另一种说：“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这两种说法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怎么又会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呢？难道说总路线的这些内容中不包含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视和认识成果吗？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矛盾，但为了“保持一致”也只好让它互相矛盾吧。

2, 关于大跃进,

《毛泽东传》在论述中曾经谈到，“跃进”一词，在五十年代，最初是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不久，就提出了“全面大跃进”。

薄一波在《回顾》中说：“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大跃进”难道说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良好的“出发点”吗？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能不能够实现“跃进”、“大跃进”？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还指出：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

大跃进。他的这个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无论从哲学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和“大跃进”这样的战略方针都是不错的。不能因为在大跃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这个方针本身。正如，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提出了“武装暴动”的指导方针，其后，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均告失败。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提出的“武装暴动”的方针错了。

3, 关于人民公社

胡绳的《七十年》说：“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

这个思想本身究竟对还是错？它没有讲。

薄一波的《回顾》虽然也说了人民公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但它仍然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搅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

《毛泽东传》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作了大致的勾勒：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

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样的构想究竟是对还是错？原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构想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随着各地工业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农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出现了并大社的趋向，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随后，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的兴办，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举办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有的地方还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

人民公社的所谓包括工农兵学商、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等等特点，都是建立在初步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以后，高度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与前人提出的“乌托邦”的空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但经过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的整顿之后，人民公社就逐步完善，走上了正轨。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近二十年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人所谓的“大动乱”、“大灾难”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依然屹立，各项事业逐步发展，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全国，现在仍有几千个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冲破重重阻力，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今天的河南“南街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类似这样的“样板”在全国还不少。

实践终究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可以说它还不完善、不具体，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2011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壹、本节概述

一、大跃进和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国家经委提出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625.8 万吨。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国家经委汇总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711 万吨。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800 万吨到 85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冶金部规划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82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 90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 27 岁（一说 25 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

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没有现代工业，哪有现代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

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李先念提出财政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收入 4000 亿，支出 4340 亿，其中基建投资 3050 亿。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薄一波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900 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 1958 年钢产量指标改为 100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1100 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 1070 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

薄一波说：“当时，我对”一〇七〇“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农业部提出《农业大有希望》的报告：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 8500 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 1200 斤。

毛泽东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产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十分注意农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华东地区农业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办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 1000——1500 斤（1958 年，全国每人平均 406 斤）。

随后，西北地区提出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人要突破 3000 斤。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

文章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提出：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

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

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生产大跃进宣传报道中注意事项的通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的谈话：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千斤。有文章说：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一九五八年八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 5 万斤、10 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 8 千斤、7 千斤，提 5 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听说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市

毛泽东说：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该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召开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提出会议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

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

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

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

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

需要重新解释。

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

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

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万劳改犯不算多。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

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

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用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

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 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

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
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

“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下午，薄一波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 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 10 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五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 1070 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帐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 1070，是 1100 多万吨，发表 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展开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广泛的安排。”

刘少奇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 120 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

论，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说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

社论删去了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句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

报导说，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

报导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

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

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

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九月间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四、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迅速纠正五风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

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没有可以交换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换

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药材等。

交换问题，交换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的鄙视交换是不对的。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鄙视交换。鄙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给制部分搞的不要太多了。供给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额，级差不能太小，否则，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减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毛泽东要他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

毛泽东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说，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照本本上宣传，而是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

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毛泽东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人民公社搞的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一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 110 元。）

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 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有好的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哨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

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 400 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 80 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没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了，（×××。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

（×××：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没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经济作物吧！鸡鸭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有不大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没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罗，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

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无条件论，要立条件论。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到专列上去汇报。

毛泽东在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毛泽东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

人大、中、小结合为好。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泽东说，1070 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 4 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毛泽东在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毛泽东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毛泽东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毛泽东还特意对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他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

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关系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

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

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也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

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 （一）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

（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

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

(3) 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关于读书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五、召开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 过渡共产主义。

你们看怎么样？

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

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我们说强大，

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

什么叫比例？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

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 104 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

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

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 150 元到 200 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

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 150 元到 200 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 消灭阶级问题。

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

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

(六) 经济理论问题。

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坏处。问题看有什么坏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

(七) 会不会泼冷水？

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

可能性，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

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毛主席与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 1959 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3000 万减为 1800 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他维持原来的指标。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中央已有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要修 2 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 5 年内才修 2 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其实 1800 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 年）预计炼出的 1000 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 850 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 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 6000 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 500 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 500 亿土方了，要减下来。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

产比虚报好。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

（毛泽东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

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

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讲话（二）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路线问题

他说：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第二，破除迷信问题

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

第三，虚报问题

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

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第四，指标问题

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云南省委报告的批语：《一个教训》：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

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第一，当前的国际形势

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

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例如在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

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

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

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

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

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

第三，两种可能性问题

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体上有几人：

一种确实是性急了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

二种是有顾虑、恐怕跌交子。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

三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東西。

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

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〇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要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六、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

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中央召开省市书记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书记会上的讲话：

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

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第二，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辩证的方法

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

第三，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定要改正

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到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地视察。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与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

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我们国家和社积累 25%，生产费 20%，群众分配 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举行的扩大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成绩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

现象是：在 1958 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本质是：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政策措施。

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

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

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

别。

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

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

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

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

准备应付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攻击。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

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写党内通讯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过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这封信主要是与各省讨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即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原高级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很明显，毛泽东倾向于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不同意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作为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讯

这封信里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

毛泽东说的这些干部，大体上相当于地、县两级。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陶铸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顿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丑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旧账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这次会议产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国民计划的指标也进行了调整对外，钢的计划指标 1800 万吨，但内部提要好钢 1650 万吨。毛泽东认为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

会前，毛泽东谈及自己和彭德怀的关系，对李井泉、柯庆施、黄克诚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我的了，（转脸对柯庆施说，彭德怀是恨死我了，估计也恨死你了）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黄克诚《我的回忆》，柯六六《怀念我的父亲》，李锐《回忆毛泽东》，李井泉《晚年书怀》中均有）黄克诚事后没有对彭德怀说起此事，倒是

告诉了周小舟等人。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

要“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

“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等，”

并指出，“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要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

二、留有余地。

波浪式前进。

四、实事求是。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

六、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

解除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

十二、权要集中。

十三、要解放思想。

十四、关于批评。

十五、集体领导。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等省委关于清算账目等问题的四个文件，据反映，经济手续不清的干部，约占全体干部的 40%左右，贪污多占款额平均每人少的 36 元，多的 120 元。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

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

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及整个工业生产建设问题。会后，财经小组反复研究，确定当年钢材的可靠指标为 900 万吨，钢的生产指标为 1300 万吨。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毛泽东批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

王绍飞反映，农民出勤率提高，干劲不大。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秋后能否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表示怀疑；生产指标脱离实际太远，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紧张，难以支持劳动；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关系尚未理顺。严重的问题是生产计划虚假和粮食问题。

毛泽东批示：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三个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情况的报告。

三个报告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当前农村最严重的问题。

湖北省从旧历年到四月底，闹粮之风此起彼伏，全省有 170 万人的重灾区，春荒相当严重，武汉市曾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的情况。

河北省有 30 多个县缺粮，严重的 10 个县。

广东省夏收前，情况将仍然是紧张的。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饿肿 10930 人，其中已死 134 人。

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对增收幅度估计过高，产量数字水分过大；再加 1958 年秋收没有搞好，以及一度长放开肚皮多吃。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指示规定，实行少扣多分的原则；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当占收入的 60%左右，并且使 90%以上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力求做到工资部分占 60——70%左右，供

给部分占 30——40%左右；无力实行供给的地方，继续按照高级社的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食补助；认真整顿公共食堂。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召集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

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工业也好，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明年的指标切不可定高。今后七个月，主要是搞综合平衡。

周恩来说，我们在工业布局上的毛病是生产资料的指标定高了，把生活资料的指标提高一些，比较有利。

贰、本节简论

（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也到处泛滥。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一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〇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

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举动。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

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由于一九五八年定的钢指标过高，不得不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给生产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农业生产中争相“放卫星”，滋长起来了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滋长起来了共产风。

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主席犯的错误，就是同意了一九五八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 1070 吨。

一九五九年七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 800 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 600 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174 页）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就人民公社化运动来说，毛主席犯的错误就是对“两个过渡”的时间估计还是短促了。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中产生的缺点、错误，首先也是由毛主席发现的。

（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这时，通过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有的人否认人民公社有必要发展商品生产、实行按劳分配。毛主席提倡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继续。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能成功的空想。”

经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对于破除资产阶级式权利的思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强调不能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工资等级等等还不能破。但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上，党内思想仍不统一。决议只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

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 1959 年计划，规定钢产为 1800—2000 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 900—1000 万吨，但仍然太高；粮食产量指标仍为 10500 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

（三）

一九五九年二、三月举行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心就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

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

(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这次会议产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确定钢产量为 1800 万吨，其中好钢为 1650 万吨。毛主席仍嫌偏高，委托陈云继续落实。

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到十三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话，并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

从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泽东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恩来和李富春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2011 年 5 月 16 日修改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阶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经八个月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回到韶山

他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毛泽东《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第一个问题，读书。

“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

第二个问题，形势问题。

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

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

第四个问题，明年任务，

第五个问题，四年任务，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第六个问题，宣传问题。

“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

第七个问题，综合平衡问题。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第八个问题，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第九个问题，工业管理问题。

“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第十个问题，体制问题。

“‘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第十一个问题，协作关系。

“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第十二个问题，公共食堂。

“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

第十三个问题，学会过日子。

“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第十四个问题，三定政策。

“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第十五个问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第十六个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第十七个问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第十八个问题，团结问题。

“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八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

这十八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毛泽东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

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

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笏、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

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

七月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第二阶段——毛泽东回答彭德怀给他的信

彭德怀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彭德怀的信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

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对他触动很大。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

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

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部分同志感

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表情，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查，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

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重复 56 年下半年、57 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 30 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

月底。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 1 / 3 我就满意了。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

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嵯峨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

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

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非常重要：

第一，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

第二，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

第三，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第四，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

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

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

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

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谈话记录 毛泽东：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

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

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
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
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
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
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
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
如此，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
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
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
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韩进（抗战时
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
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
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
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你阶级
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
占70%。一亿五较贫苦，9000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
牵动人可多了。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
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
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
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
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
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
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
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
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
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
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上海会议重心批

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6 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 5 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的命令。）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的大错误，应予处理。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基本话就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 9 个月，批判了 9 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

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

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周恩来：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出 18 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湖南派；你就是说中央闹了乱子，得检讨，郑州会议等不算数。直接向下面写信（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以后还要用此方式。田家英历来比较偏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

你是立场不同，多年的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湖南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 月 23 日讲话）说得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只差 50 米了。李锐动摇，去年 11 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大跃进搞糟了。有过教训，这回又搞这一手。而且这些事都办了；纠正了，批判了 9 个月。为什么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有大批群众集合于你的旗下。船要沉了，老鼠赶快离开船。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另搞一套。大跃进你们没有参与，没有责任？北戴河会议没有反对，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时都赞的。

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

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9 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学我 1927 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 40 天娘；补足 20 天，这次也 40 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大放，《简报》是中字报。今大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查，虽然 60 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

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可以继续申辩。平时不往来，是一种现实现象。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毫无顾虑。那时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鹤寿谈有松劲情绪，也不摸底。这十天，较有底。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是指标越落越好；以信为代表，以及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9 个元帅、10 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

刘少奇：

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

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得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 40 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

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周恩来：

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改与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朱德：

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

林彪：

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

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杠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得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王明。六中全会看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马日事变要来的，统一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本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

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滕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阳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来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一稿。）大跃进与副作用，账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了。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

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个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 彭真：

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帅削弱集体领导。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谁？ 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年12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

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贺龙：

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谈话记录》，虽然不是一个正式材料，但它多少反映了这次会议的进程。从中可以看出与彭德怀的斗争的复杂性，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或在会上的几次发言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剥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如克诚②（②克诚，即黄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中委、候补中委 191 人，到会 147 人，列席 15 人，共 165 人。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

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

是要反右的问题；

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

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

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担忧。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

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

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毛泽东讲话：开了 40 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一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一、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

二、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从 1928 年起，31 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

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

在 1953 年嘛！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

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

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说他们看错了。

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还有强迫命令，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

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九、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提出 18 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 7 月 2 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

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 19 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就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是说 7 月 23 日。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

十二、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准备讲演稿。

十三、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

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 10 天。

十五、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一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

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

十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实。我们的会开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 31 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 年的关系嘛。

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二，反革命杀了 100 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 100 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 45 万嘛。

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二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

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现在，检查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特别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发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阶级关系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早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 4 月 29 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了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他 7 月 20 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 7 月 14 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 7 月 21 日发言，我事先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 23 日讲话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信。

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它部门。”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

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

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

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溲然汗出，霍然病已’。”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

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侧面，主要是彭、黄、张三，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不要把这些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

和决定是：

-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

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五）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定要有班长。俄共政治局只有五个人，他们就说你们太专制了。有些中央委员没有召集开会，忙得很，那些人就说为什么不召集我们开会，就发议论了。列宁说会是没有召集，可是革命胜利了。他说你无非是要你来办，与其你来办，不如我们来办。我们就是五个人，就是这么一件事。在这个问题上有赞成有反对，看是站在什么一个立场，什么一个观点上。现在我们这些人，譬如常委会这几个人，年纪都大了，按照自然规律，总有一天要办交代，这是个长久的问题，没有共产党，这个问题还存在的，党没有了，人类社会要有组织的，不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所以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像恩格斯这样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我们这一派的人这么说的，资产阶级也是赞成的。人类社会通过几个阶段，这成了常识了，为什么又反对这种常识呢？他因为没有一个人破坏，就不能建立我们反对派的那些朋友们登台，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谦虚了，那是危险的。

这一次从彭德怀同志信发出的那天起，16、17、18、19、20、21、22日，这一个礼拜，并没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们常委会几个同志之外），说是辩论这封信的性质，包括几个组长。我们跟他们谈过，可是没有说辩论彭德怀同志这封

信，只说过要他们开放言路，扩大民主，让人家讲话。说你们耳朵是听话的，人家长四是讲话的，无非是放出来的东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着头皮顶住。就是这么讲的。后头向那些人我也是同样讲的。你说我不公平呀！我说你们能够吃下的吃下，你们不愿吃下的硬着头皮顶住。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这位同志他是执行硬着头皮顶住的，硬着头皮顶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昨天他赞成这个决议案了，不晓得真赞成假赞成就是了。（有同志插话：他写了一个承认是反总路线、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东西）暖，你怎么又不顶了呢？

讲到这里为止。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我看这一次会开得好，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这一个来月的集会很有必要，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么 100 多人，我们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集合这么一个时期。当然有一部分，大概有一半人，只经过半个月，有一半是经过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陆陆续续来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从这次会议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教育。谁料到出这样的乱子呀！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欢迎呀！就可以解决呀！所以讲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就如林彪所讲的，避免了两个危害。一个是党的分裂——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经分裂一个时期了，就是一个小集团。以后看他们改不改，无非一个改，一个不改。我们希望他们改，帮助他们。大分裂是避免了。一个是避免了大马鞍形。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条件。

据我看，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

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时候搞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建设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呀！凡是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路线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又建立。去年党代大会是 5 月间嘛，现在庐山闹乱子是 7 月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觉得不行了嘛。现在经过大家一议，又可以了嘛。你说将来没有风了？一点风没有了？我看还会有。你们说从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么今年在庐山开会，才不过隔了一年，所为何来？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

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意志的倾向要占优势，它总要占优势的；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它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之外，是团结一致嘛。要建设得快一点，好一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而奋斗，这是必然性，现在有保证。但是也要估计到；不会是那么风平浪静，要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呢？我就料不到，但有台风要刮，这可以断言的，不会没有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有准备。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它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 160 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

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给诗刊的第二封信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批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判，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

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的同路人在各

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

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年意见的报告。截止 12 月 10 日，湖南全省县以上机关单位共揭发出重点批判对象 4696 人，其是有 1630 人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各类分子，占参加整风干部的 1，96%。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有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求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

中央直属机关的反右整风运动，从 1959 年 8 月中旬开始。两党委所属党员中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 1900 人，占党员总数 61559 人的 3 %；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 2714 人，占 4，4% 。重点批判对象中司局长以上（党中央直属机关 12 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有 287 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 9，3% 。

贰、本节简论

关于庐山会议，已经出版的著作多有评论：

胡绳的《七十年》说：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

“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着追求。他认为一九五八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已经大体解决”。

“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

“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

“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

薄一波的《回顾》中说：

“这表明毛主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原来就不应该反‘左’，而应该反右。这是庐山会议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有什么失误。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

“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毛泽东传》说：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末，庐山会议的斗争是怎样引起的？其性质及影响如何呢？

不妨再分析一下会前会中的情况。

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只突出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而对其他的重要情况，不是不说，就是把它湮没在各种“材料”之中。最典型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关于这本书，据李锐说，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央领导同志即建议作者写出这一段历史，胡在11月19日的信中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之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并“指定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从资料方面给我以帮助。”后来，胡乔木收到这本书以后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胡乔木确实有心计，想问题想得深。诚如他所预料的，李锐的这本书出版以后，成了有关庐山会议的最具权威的说法，几乎占领了整个干部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市场如此看好，因此，在1988年内部出版以后，又于1992—1993年加以增订并公开发行。无庸讳言，既然李锐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写的，在选择材料时，极有可能只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就不选用，或者在材料的处理编排上加以“淡化”，使它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关于前一种情况，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既然不是“党史研究部门”，就不可能垄断占有党史资料，也就不可能提出新的资料去反驳他。但是，邓力群说过：“李锐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但只是把对他有利的发表了，不利的就删掉了。他的书中，资料不全面、不准确。我保存的档案资料里有毛主席历次讲话的记录。”（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

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关于后一种情况，一般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把那些被他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的资料找出来，还它本来的生命和价值。

下面把《实录》提供的情况作一些梳理：

1959，7，1 在专列上，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在一起谈话：

几个人都“对 1958 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 年 6 月第一版，第 12 页，以下简称实录）

几个人都认为：“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变了。”（实录，13 页）

李锐说：“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据李锐说，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实录，158 页）

1959，7，1，在专列上，彭德怀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 40 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实录，96 页）

1958，7，3 中南组开会传达十八个问题。李锐感到“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从根本上纠‘左’”。

李锐与田家英交谈：“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实录，35 页）

1959，7，5 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起铁托左右有几十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此时毛泽东脸色顿时发红。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他自己对某些工作的缺点，倒是敢于说话的，并且还给毛泽东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这次送的广州军区材料。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不愿转弯或回头。有些意见想找他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实录，99 页）

1959，7，3-10 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发言说：

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一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 至 11 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 3 个月。

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实录，98 页）

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实录，119 页）

1959，7，12 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

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

（实录，100 页）

1959，7，12 日上午，周小舟再次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会议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周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充实，就很好了。（实录，99 页）

1959，7，12 日以后，彭德怀的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

告诉张：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并叫张看信。张没有看，怕说搞宗派。（实录，266页）

1959，7，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送到毛泽东处。

1959，7，16，在这天之前，周惠在一次打牌中说：“1958年是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实录，69页）

1959，7，16，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信，并对参会人员重新编组。

1959，7，17下午，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

1959，7，16日之后，李锐、胡乔木、田家英、张闻天等聚谈，李锐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胡乔木马上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实录，122页）

1959，7，21日早，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实录，122页）

1959，7，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作长篇发言。

张闻天把发言提纲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讲得全面，张闻天说“这是支持你的”。（实录，266页）

1969，7，22日前，田家英对李锐说：“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会议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等等。（实录，119页）

1959，7，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

1959，7，23日晚上，李锐去周小舟、周惠住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周惠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斯特朗曾当面称

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李锐说：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说：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实录，141 页）

1959，7，23 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

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彭德怀进来后，周小舟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真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实录，141-142 页）

1959，7，23-29 之间，李锐同周小舟、周惠之间还有来往，田家英也悄悄与李锐联系。

“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实录，169 页）

1959，7，29 日，田家英向李锐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二十三号夜晚的猜疑”。（实录，172 页）

1959，7，30 日，毛泽东与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李锐在毛泽东处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田家英对李锐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

不应当了。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担心总理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实录，173 页）

当晚，李锐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实录，174 页）

1959，8，13 日，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写到李锐与田家英等来往交谈之事，特别是提到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的三条进言（即：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实录，34 页）

后来周小舟在大会上作交待时又重复证实这件事。当场，李锐为了保住田家英就站出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实录，305 页）

以上只是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某些材料。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一、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有根据的。

首先，彭黄张周等人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在他们那个小圈子内部谈话时，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彭德怀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也做了调查，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

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对 1958 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 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说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在新的流行思潮中，他们中一些人，争先恐后地亮明身份，都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其次，他们都宣扬：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张闻天说：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周小舟对黄克诚等人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

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

所谓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是什么意思呢？

在会上，胡乔木对“斯大林晚年”说法，作过一些分析说明：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

(1) 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2) 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 (3) 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 (4) 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 (5) 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 (6) 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 (实录，282 页) 这里，暂时不评论胡乔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以及他讲这番话的真意是什么？但是，他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

李锐在《实录》中也说：“8 月 10 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三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 (277 页) “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一攻破，人们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就感觉到，庐山会议可以结束了。” (284 页)

这说明，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是小圈子中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因而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成为判定“反党集团”的重要根据。二十后，依然是其中的某些人，更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这就说明“很像斯大林晚年”这个口号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始终没有放弃。

再次，他们之间确实有一个小圈子，有一些非组织的活动。人们称之为“湖南集团”、“湖南派”，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正是根据以上几点，1959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实录，196 页)

二、里通外国问题也不是“捕风捉影”。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批彭德怀的重要原因，是他“里通外国”。” “1959年彭德怀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去访问，在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的机会批判我们，内容没有比我们党内自己揭发的错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还有肖华，回国以后，肖华给党中央、给军委作了汇报，彭德怀没有汇报，这可能成为后来所谓里通外国的证据。”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了电报。”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种话可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后来听说，随彭德怀出访中有一个人庐山会议后，编了一些黑材料。直到1962年，毛主席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还一直不放。”

肖华是怎样向中央汇报的？另一个人编了一个什么样的“黑材料”？这些情况只有待将来文件全部解密以后，才能搞清楚。

三、历史旧帐也确有不得不算的理由。

本书原文说：“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历史旧帐”问题是由彭德怀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西北小组会议的发言中说：延安整风时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这里虽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它说明彭德怀对延安整风、对华北座谈会的根本态度。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的娘。”（实录，200页）

罗瑞卿在庐山会议指出：“华北会议你还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因为我们批评你的四大错误：反对洛川会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王明路线；对群众运动鞋泼冷水；闹独立王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么也赖不掉的。”（实录，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常委会上说：“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实录，199页）我与彭“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实录，200页）

“历史旧帐”与现实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彭德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张闻天搞在一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难道没有他的政治根源和思想根源吗？

四、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

本书原文说：“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怎样判断的？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十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实录，190页）“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能管得住你。216页）。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实录，193页）“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实录，195页）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说：“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实录，203页）“元帅心情，不好合作。

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实录，206 页）

1959 年 8 月 3 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说：“我们都提到他的犟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实录，170 页）

正是由于考虑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下决心作出决议的。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或不处在政治高层的人，恐怕很难理解这样的良苦用心。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五、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本书原文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我们再看一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的有关段落：

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毛泽东在第一段话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实质来说的；在第三段中又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

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性质来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为什么说它是阶级斗争，它与阶级斗争是什么关系？毛泽东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里说得很完整、很清楚。

2011 年 5 月 22 日修改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九年冬以后急躁冒进再次抬头，重新刮起“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冬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纠正不彻底，一九五九年冬以后又重新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区则一直没有认真纠正。破坏和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放松或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农业集体所有制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才能与当前阶段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道仍在作艰苦的探索。

此外，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浮夸风也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加之，一九六〇年提出几个大办，更助长了这种风气。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讲话中，就提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又批评有些地方变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在保持基本队有制的情况下，把收入的 50%——60%以上归生产小队分配。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说：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等问题，会议同意以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作为由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条件。据此，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大约要三到五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更长的时间。会议认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生产大队的经济同样要积极发展，保留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也是必要的，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

这次会议以后，急于由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苗头又有所滋长。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

1959年的12月上旬，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从头到尾，都这样划。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

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讨论时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了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

1960年1月17日上海会议结束后，至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在广州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召开的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二、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泽东批转广东、山东报告再次强调存在着重复“一平

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又指出：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加快过渡、想赶先的苗头；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问题上，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 一、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 二、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
- 三、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睬。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〇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比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

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

三、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

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

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

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他说，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

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6月18日，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中共中央举行北戴河工作会议。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满意，满意的只是社干部。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人家没有不同意见，回去就照着这个意见作，不要忘记，不要面从心违。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指出：（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2) 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 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 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代中央草拟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办法。省委不明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全国大好形势，占 2/3 的地区；又有不大好形势，占 1/3 地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 1/3 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经过 5 个月的工作，把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使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争 1962 年的农业大丰收。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批示

甘肃省委在报告中检查说：人民公社化后，全省的“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第八个五年计划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 70%—80% 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

任务重、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估产偏高，谴责以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批示指出：

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是在北戴河决议中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现在更正了。

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改变农村面貌。

四、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说：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讲话

“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

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

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

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

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

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带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发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发出的《紧急批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的“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的、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六、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是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要的大问题。要求讨论并切实调查一下。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

全党同志的信》中规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主要是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内部，各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很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人民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公社、生产大队不能瞎指挥，县、地、省、中央也不能瞎指挥。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方法来领导工业。

他说：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满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马观花只能是辅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五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到会各同志，利用会前时间，对农村的食堂、粮食、供给制等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1）社员普遍不赞成办食堂；（2）供给制这种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

害处很多；（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办法。随后又批转了胡乔木五月八日的报告，邓小平、彭真五月七日的报告，内容大体一致。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同农民谈话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他说，四川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一道，对人力和物力浪费不少。

七、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三月党中央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规定办不办公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等等。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

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本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

八、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提出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果不作这种规定，队的九种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河北这两批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若干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河北人叫做分配大包干）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

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并指出，就大多数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的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农村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关于一九六〇年的计划的讲话，大都是压缩指标的，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〇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一九六〇年一月的上海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氛围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〇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一九六〇年，粮食浪费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这一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毛主席的这些

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〇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一九六一年六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

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

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

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

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但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并未搞清楚。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由此，毛主席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至此，才算把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体制理顺了。

2011年5月31日修改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壹、本节概述

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加强民主集中制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月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并作用了讲话。

1月29日，林彪就军事工作讲了话，他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气了，我很满意。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讲了话。

2月7日，周恩来说经济工作讲了话。

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让讲话：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党内外刮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上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

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

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讲话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议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

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至七月，毛泽东巡视各地听取负责人汇报情况

6月18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

产了十亿斤。

7月初，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

7月初，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立即向刘少奇汇报。

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

接着田家英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刘少奇说，可以。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

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清晨，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由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

经济。

毛泽东提出：“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

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

变。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

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三、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指 1961 年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

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

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

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随时插话。

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

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毛泽东插话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

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批评邓子恢“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插话：

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

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讲：“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毛泽东说：“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

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四、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五日，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九月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翻案风”。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开大会并讲话

他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

到五天。”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走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毛泽东还在会上的插话中说：

“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

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〇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〇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十个文件：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

《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1, 《毛泽东传》说：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主要是没有讲势好转的问题）

这里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说事。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要分清事物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而不是强调它的绝对数量。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曾经作了解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就说过：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这里作者特别强调：“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句话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既然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怎么能说“刘少奇突破了”呢？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是否科学，人们至今没有看到权威的、有根据的解释和说明。而且，刘少奇也说得很巧妙，这句话是某个农民说的，并不是他说的，他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句话。现在，原文的作者说“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那么，对刘少奇来说是不是就非常愉快呢？当时处在第一线工作的难道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吗？这里，作者们扬刘抑毛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

2, 《毛泽东传》说：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

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这种观点，早在胡绳的《七十年》中就提出来了：“林彪在大会的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原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林彪离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第380页）

薄一波的《回顾》重复了上述观点。（《回顾》下册第1045-1046页）

辛子陵在《全卷》中更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的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讲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再放异彩……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刘、周、陈、邓——这些能臣，忠心耿耿，心竭虑，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政权，支撑着毛泽东的‘江山’，免于在‘三面红旗’的破坏中陷于崩溃，他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表扬和勋勉。林彪——这个奸雄，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最离奇的谎言：一个是饿死的百姓两千万，他还硬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不承认‘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严重困难。这两大谎言受到毛泽东的表彰。”（下册第481-482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与辛子陵的说法大体相同，甚至有的词句都雷同，也不知道是谁抄谁。不过这本书更多地摘引了林彪的话，并作了剖析。

那么，看看林彪究竟说了些什么，引起了他们这样大的愤懑：

林彪说：我们党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譬如：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

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说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化、高级工程师化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林彪说：这几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不可逃避的困难，工作中也有些错误。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娘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直很大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要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

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根本任务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第 827-830 页）

如果人们采取对事不对人的立场，谁能从正面指出林彪的这篇讲话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里，关键在于，一些人坚持认为：“三面红旗”错了，党的路线错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错了，从一九五六年以后就开始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当然就会认为林彪是在搞个人崇拜了。

3，《毛泽东传》说：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胡绳的《七十年》是这样说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第 380 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下册，第 1045 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七千人大会……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路线没有错，只是工作中发生了错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这样一来纠错、总结经验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浅层次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速成论和空想论。”“毛泽东的讲话只字不提‘八大’，总是从‘八大’二次会议谈起，这是因为‘八大’二次的路线，推翻了‘八大’的路线。这次纠‘左’，就其实质而言，是回到‘八大’的正确路线。然而，毛泽东坚守‘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不退。在这个前提下，容许刘、周、陈、邓实行调整政策。”“恰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会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与会者迂回曲折，对‘三面红旗’

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在中央领导层，林彪发言对‘三面红旗’的全面肯定与刘少奇的说法有很大差异。刘虽未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他不愿对此作最后定论，甚至说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这使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不是犹豫动摇吗？’”“问题在于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而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当时，除少数人外，广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层都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犯了错误。至于谈到林彪与刘少奇的“很大差异”，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分析：一方面，刘少奇对待“三面红旗”的根本立场，与林彪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因为类似的话，毛泽东早就讲过。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就说过：“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另一方面，假定刘少奇当时对“三面红旗”确实产生了怀疑动摇，因而他不愿明确肯定“三面红旗”，问题在于：这样评价刘少奇是否实事求是？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不是指的这一点说的？更有可能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一些人以及现在的某些人，为了制造毛泽东的二十年一贯的“左”倾错误的神话，放肆地歪曲事实。

4，《毛泽东传》说：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毛泽东传》中除了上面这一段话外，根本就没有论述。下面我们一起重温一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

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我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

“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不会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反复指出对阶级斗争应当警惕、要好好想一想。并不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时才突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有些人之所以感到很突然，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反复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始终听不进去，甚至于认为这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提出了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

5，七千人大会还有人提出关于批判彭德的问题。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是，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这时写信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

三、关于八届十中全会问题

1，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一九六二年六月至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九八〇年以后，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都作了否定的评价。

《历史决议》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要更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这个论点更是武断的和不清醒的。……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第 393 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1962 年下半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的消极影响是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的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下册第 1070 页）“问题出在，毛主席把当时在党内开展的不正常斗争，也说成是反‘复辟’斗争了。”“

《毛泽东传》说：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

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说来说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没有，《毛泽东文集》上也没有。这本传记上作了一些摘录。人们要想看到讲话的全文就很难很难了。

对照讲话的原文，再看看上面那些评价正确吗？

邓力群说：

“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

割的。”

一些人攻击得最多的是公报中的这一句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搞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因为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就完全可以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段话里面说“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说少了而不是说多了。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说过甚至于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现在人们已经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可能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呢？

薄一波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中国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样一来，“问题是，毛主席把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普遍现象了。”（第 1098 页）

理论上的分歧恰恰就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另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只具有特殊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他们所说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说只有中国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或只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中国不存在。而是说这种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人民与反动阶级残余之间，而不存在于人民内部，更不存在于党内。他们之所以认为人民内部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

了，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再也不可能反映到党内来了。问题在于：原来的资产阶级在经济范围内基本上被消灭了，是不是就等于在政治思想范围内也被消灭了呢？原来的资产阶级被在经济上被消灭了，还会有新资产阶级分子或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呢？既然有阶级斗争存在，为什么它就不再反映到共产党内来了呢？

薄一波说：“为了说明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8月5日毛主席说：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类矛盾一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如果把这些也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下册第1099页）

薄一波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话时，断章取义。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又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在这里说了三种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即人民与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即劳动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劳动农民之间的矛盾，即比较贫的阶层与比较富的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三种矛盾不属于阶级矛盾，而是劳动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可能反映社会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的助手。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这样分析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呢？

薄一波说：毛主席把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又一个重要根源。……他在这里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第1100页）

二、关于形势、翻案和单干问题

1, 关于形势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就把这两次会议（指 1962 年 2 月召开的西楼会议和 1962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邓力群说：与毛泽东讲话的原文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毛泽东传》说：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实际情况，与这种说法也相差甚远。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估计当时的形势，又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重大问题。原来，七千人大会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下降的趋势已经到了谷底，此后将逐步好转。然而，七千人大会以后，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及以后，刘少奇反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要怕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也就是说“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文革前十年史》第 816 页）而周恩来虽然也强调当前的形势困难是严重的，但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周恩来的提法“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这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与刘少奇是不同的。现在的一些文章作者们之所以要强调周恩来与刘少奇是一致的，是为了贯彻他们的一贯的策略：敲打林彪，拉拢周恩来，孤立毛泽东。

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下降的趋势到了谷底，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逐步好转，到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调整的任务，并没有要五年、八年或十年。

关于形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形势问题。

肖冬连等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又是一次冒险的陈词。”（下册第 945 页）

《毛泽东传》说：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这里涉及的是有关王稼祥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建议问题。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王稼祥给中央写信和会议上发言，提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主张。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说：“我们应当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他建议：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三，在国际斗争中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要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参见《王稼祥选集》）

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实事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

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 967 页）

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实行了王稼祥的这一套主张，所以，现在的一些出版物对王稼祥当时的主张称赞不已。效果如何究竟如何呢？左派和右派各有不同的评论。过去说当缩头乌龟好，现在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

关于翻案问题

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八月二十二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自找处理。”

这个问题双方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就无须再讨论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的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毛泽东传》说：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本书把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问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上是错误的。

事实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小说《刘志丹》印出送审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八月二十四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九月八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

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九月二十七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这一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作出结论。（参见《回顾》下册第1095-1097页）

事实说明，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个观点用在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身上。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3. 关于单干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可是，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弄错了。第二，片面追求经营管理上的单一模式。……第三，动辄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下册第1089-1090页）

《毛泽东传》说：“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但是，它（指集体经济）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

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他们的这一套所谓“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的说法，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吗？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们说的“包产到户”，就是在土地挂着集体所有的招牌下面的单干，而单干（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七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他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

（以上两段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 1136-1137 页）

邓力群说：“毛主席在 1962 年 8 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

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 1962 年 5 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 1962 年、1963 年两年恢复，1964 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归根到底，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邓力群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他说：“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只讲恢复发展是西楼会议的功劳，应该讲十中全会端正政治方向和调整工作结合在一块，才有 1961 年以后、文革以前的最好形势。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新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 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估价。”

他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意见，供人们参考吧！

2011 年 6 月 4 日修改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专门讲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提出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

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

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最后，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转发，毛泽东审批时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一九六三年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

五月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

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

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

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他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

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五月九日，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毛泽东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

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

五月十二日，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一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杭州会议结束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

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才正式下发，三个月之后，中央就决定起草“后十条”。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并无充分的实践经验作根据，但他为了尊重集体的意见，还是同意起草并下发了“后十条”。

四、一九六四上半年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通知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把“双十条”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

教条主义的危害。”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听说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

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就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明确的回答说：“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有人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到十三日，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

他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一定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

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

毛泽东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五、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露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修改“后十条”。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

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刘少奇和王光美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七月五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桃园经验。七月六日，离开天津到济南。王光美在山东又讲了一次。刘少奇就让王光美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他们将王光美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离开山东，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七月底回到北京。

从济南开始陪同刘少奇的华东局魏文伯打电话给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刘少奇在南京作了两次报告，其中，对当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包括江苏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

第一，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县的领导说没有这么多，这是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

第二，对干部队伍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 95% 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对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

第三，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这个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没有充分时间不行。

第四，后十条要修改。

第五，要追根子。他说：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工厂、机关也一样。处长有严重问题，一定有部长保护。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

第六，各级领导都要蹲点。

从形式上看，刘少奇的一些意见，确实相当“左”。

然而，刘少奇的某些意见遭到江渭清的抵制。

江渭清对刘少奇说：说社教都没有搞好，江苏不是这个情况。

刘少奇说：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

江渭清说：不能这么讲，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大队，百分之六十打了胜仗。江苏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讲的还是三年前的老情况。

江渭清说：我经常下去，对情况还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说：你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

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说：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时，对江渭清说：你昨天讲的那个意见是不对的。

江渭清执意坚持，刘少奇发了脾气。

七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说：不要怕右，半年总结一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刘少奇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关于蹲点，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关于对敌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

他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

‘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全是在反他认为的右倾。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毛泽东修改后十条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刘少奇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王光美也同时作桃园经验报告。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办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

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

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刘少奇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如下：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

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来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笏、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笏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他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

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提出对已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进行夺权斗争，迅速加以解决。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左”的倾向。

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制订“二十三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

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反映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

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

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

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十九日，会议只开了几天，毛泽东没有正式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就宣布会议结束了。

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看《红灯记》。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去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

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显然是，毛泽东是主张运动的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牛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显然，他的主张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他说：不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他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狠嘛！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

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立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

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

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张霖之就是。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

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

部的腰。”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

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出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

（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 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

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

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多的，有少的，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

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

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

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

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同志时的指示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贰、本节简论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进一步具体化，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这个决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得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五个不可忘记”的结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

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这个决定初步地系统地解决了在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对于这个决定，右派们当然是反对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这里，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已经获得了正确认识，他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悲剧呢？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全国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大搞形“左”实右的一套做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的错误。会议首先制定了一个“十七条”，毛泽东仍不满意，又继续开会讨论，制定了“二十三条”。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运动的重点，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

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 and 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四

个问题上；第一，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第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整地富反坏分子？第三，对干部问题的估计是大多数是好的？还是一团漆黑？第四，运动的作法是依靠贫下中农、分期分批进行？还依靠工作队、打歼灭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

二十三条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在坚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发展。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有所增长。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之外，党的领导层的认识似乎是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九八〇年以后，这些人的立场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在他们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关著作，对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采取了基本否定的立场。

胡绳的《七十年》中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 “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执行。”（第 394-396 页）

薄一波的《回顾》与胡绳的《七十年》有所不同的是，它首先肯定了“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目的是为了以防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愿望的。关于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也大都是正确的。”（下册第 1110 页）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难于达到运动的预期的目的。”（下册第 1110 页）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下册第 1128 页）

“不容否认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 1964 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下册第 1135-1136 页）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它认为：

“官僚主义本是一些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偏偏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下册第 1011 页）。

“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下册第 1026 页）

“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合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下册第 1089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说：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于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

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

综合以上的议论，可以看出，他们加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条：

1，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2，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

3，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4，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5，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

6，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 1964 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

7，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分歧，二十三条的一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 1964 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8，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论：官僚主义本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使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

情心。

1999年7月13日，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五)》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

关于前十条，“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对形势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前一种看法是过头了，后一种说法恐怕不是过头了，而是过高了。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当时，我们的政权、党的领导权，难道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吗？中国党当时有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关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和二十三条，23条“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

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邓力群的讲话不仅回答了那些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这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所在，也就是现在左派与右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2011年6月5日修改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一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一九六一年以后，刘少奇、周扬等人实行“放宽”文艺政策，传统剧目的上演大量增多，其中有许多未加整理、格调低下、解放后一直禁演的剧目。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后到各省巡回演出。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发表廖沫沙的评论《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看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发现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向毛泽东报告，提出要批判。

一九六二年八、九月，江青约见文化部长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不以为然。

江青又向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等人提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李慧娘》有政治问题，有鬼魂形象，要批判。

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曲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喧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有解决的措施。

一九六三年四月，张春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讲了写十三年有十大好处。

但周扬等人说，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十六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渐增，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辩护。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由江青提议、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

多年以来，翦伯赞提出并宣传一种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他说：

“（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

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稿子，其中指出：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面，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出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搞俄国革命，列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一分为二，出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出了一个反对派。任何学术领域的队伍在历史发展中，都必然一分为二，产生反对派，产生对立面。”

毛泽东同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反对修正主义。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作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

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三十多人举行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会上讲话。大家都同意毛泽东对文艺界问题的看法。从四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协会进行整风。五月八日，中宣部文艺处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杨献珍宣传：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不可分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研究对立面的统一性的任务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文章，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参加演出的有 19 个省市自治区，28 个剧团、2000 多人。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等剧目 37 个。

这次会演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举行的。这一批京剧现代戏是京剧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京剧改革的成果汇报。当时周来亲自抓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与部分演出人员开座谈会。江青在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演说：

她说：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件事，要坚定，在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辩明方向。

她说：全国的剧团有 3000 个，其中 90 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 多个是文工团，其余 2800 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 90 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评、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上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江青的这次讲话作出批示：讲得好。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报告上又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和“不抓理论工作”。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报》实际上根据江青的意见，发表文章批判影片《北国江南》。

《电影艺术》第 4 期开辟专栏批判《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第 5、6 期合刊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

三、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亲自召集小型会议，批评文化部、中宣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指定陆定一、彭真、周扬、康生、吴冷西等人组成领导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组成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负责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后来，这个小组称为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

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

一九六四年八月，《红旗》杂志第十六期发表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报道指出：杨献珍在这个时候大肆宣传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的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

（接班人五条条件）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问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

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周扬召集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提出写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乱猜、乱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并强调对夏衍、田汉等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政治与学术要分开。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编者按说：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是，这个戏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以后，戏剧评论界的一些人却对它颂扬备至。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予以批判，仍未彻底揭露出它的反动本质。去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最近，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重新展开批判。本报今天发表的齐向群同志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and 批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曾经发表过陶君起、李大珂同志的一篇剧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这篇文章对《李慧娘》是充分肯定、十分赞扬的，说它“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作者认为孟超赋予了李慧娘以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令人鼓舞”；认为改编者在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增加了政治内容，因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认为昆剧《李慧娘》有很

高的艺术性，“全剧中洋溢着诗情”，“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

事实同这些论断相反。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不仅宣传了鬼神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散布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和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剧中加强的所谓政治性，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李慧娘》的艺术性，是为它的反动内容服务的，而且唱词尽是陈词滥调，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对于这样一出坏戏，我们不但没有及时揭露和批判它，而且还错误地发表了赞扬这出戏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通过对《李慧娘》的再评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评论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路线，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一旦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能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上台。他还提出要赶快刹车。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材料的批示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请酌。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的谈话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

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

主席表示同意。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批评“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

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

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全面批判了翦伯赞的错误观点。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红旗杂志的文章指出：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四年、六五年，毛主席不仅提出了教育革命、卫生革命的任务，而且特别提出了关于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问题。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出了两个批示，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是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文艺界，以昆曲《李慧娘》为代表；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公开说：1962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指示中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被后来的《部队文艺工

作谯会纪要》所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传（1949-1976）》说：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他越来越关注文艺领域。过了两个月，十二月十二日，他写了一个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把这方面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看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读了他的这两个批语，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把文艺问题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邓力群经过反复思考以后，他说：“在 4 年多中，我提到的 16 件重要的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部门、思想部门的工作，同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要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能够互相适应，要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说明，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个方面，在一个时期中，抓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注意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任务。就其中一件一件事看，我说，不好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对，不能够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需要解决，不好说提出这样的任务不妥当。从方法讲，也与过去党中央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领导方法一样，提出批评和任务，责成改正。”（《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这说明：右派翻案不得人心！

2006 年 8 月 9 日初稿

2011 年 6 月 7 日修改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 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中共中央内部开会讨论

1、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我党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当时，邓小平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

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三月十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犹如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东欧各国，对当权的领导人，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评论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晚，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一九五四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

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修建十五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 141 个项目，共 156 个项目，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三月十九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第四次，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1949 年 12 月 16 日到达至 1950 年 2 月 17 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七十寿诞，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

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斯大林曾把铁托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那里也不去。这样坚持到一九五〇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条约事宜。所以，周总理 1 月 20 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军事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 100 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

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以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 141 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决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是不是用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四十周年。是不是四十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二）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毛泽东提出撰写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撰写文章，

毛泽东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

还有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搬硬套，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表现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吸取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

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的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原文及要点

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定稿。

这篇文章的要点，参加编写者之一的吴冷西概括如下：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鼓舞了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

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

中获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原来自己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严重错误。

3，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

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展开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的斗争。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复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对夸大领导人物作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的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

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动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以后的反应及工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说：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嚣，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致给予好评。

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九月和十月，毛泽东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谈了我党斯大林的看法。

毛泽东在单独同米高扬谈话时指出：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泽东会见英共主席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泽东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则，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维护大局的。可以说，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历史（包括苏共二十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二、波匈事件，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波匈事件

1，波兰事件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六月间波兰各地不满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穆尔卡时期。（哥穆尔卡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波党总书记，一九四八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一年被监禁，一九五四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穆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种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十一月初召开中央全会，到十月十五日又确定提前在十九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延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于十月十七日决定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拢，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

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通知中国，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中国的意见。

赫鲁晓夫还决定不顾波党不同意接待，匆匆率代表团于十月十九日晨飞往华沙。苏共代表团的座机到达华沙上空后，华沙机场拒绝接收。结果赫鲁晓夫所乘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一到两个小时），最后才被降落。

这时，波兰党正在开中央全会。会议由奥哈布主持。原来的波兰党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逝世。这以后波兰党的工作就由奥哈布主持。奥哈布在会上宣布，现在苏联代表团已到达华沙，问大家是否先开会再同苏方会谈，还是先与苏方会谈然后再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先同苏联代表团会谈再开会，但多数人主张先选出新的政治局后再跟苏联代表团会谈。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先开会选出政治局成员。其中包括哥穆尔卡。

苏共代表团十九日上午到达华沙以后，一直等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然后举行两党会谈。两党代表团在十九日整个上午到下午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首先指责波兰掀起反苏情绪，谴责波兰党对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制止，致使事态迅速恶化。赫鲁晓夫说话非常粗野，态度非常横蛮。会谈很决变成了互相指责。在两党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出波兰方面不会同意苏方不让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也不会采取措施制止所谓反苏浪潮，他在会谈过程中曾同华沙条约国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商量，并与苏籍波兰人、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商量。赫鲁晓夫了解到：目前波兰反苏情绪激昂，华沙正在酝酿示威游行，局面难以控制。波兰军队的情绪也很不稳，很难依靠他们来平息群众示威。于是，他与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后，在会谈过程中就要科涅夫下令驻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向华沙前进。苏联军队的这种行动，很快被波兰方面察觉。哥穆尔卡在谈判中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激动地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苏联代表团那边去，大声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的部队正在向华沙前进，我要求你们马上下命令叫他们停止前进，返回驻地。赫鲁晓夫开始时抵赖，哥穆尔卡走出会议室，很决又返回来说，我证实这是确实的，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立刻返回营房，否则后果由你负责。现在我要求休会，你们考虑一下答复我们。这样，会议休会到晚上再开。

在两党会谈休会时，赫鲁晓夫得知华沙人民准备自卫，阻止苏军入城，大工厂的工人已拿到枪枝，成立工人自卫队，准备巷战。如果苏联军队坚持进城，就

会发生战争。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曾经表示，如果发生战争，他不能保证波兰部队支持苏联部队。这样，赫鲁晓夫的态度才软下来，只好同意波兰的意见，命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

晚上会议的气氛与白天不同。赫鲁晓夫同意波兰党所做的决定，新选出的政治局由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波兰方面欢迎苏联的态度。哥穆尔卡激动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过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并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结束之后，他一定到莫斯科去讨论如何解决波苏关系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二十日早晨（北京时间十九日晚或二十日凌晨）返回莫斯科。

这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的形势已经缓和。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发来关于波兰问题的通知，

毛泽东说：看来苏联要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苏联要动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要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很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晚七时，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毛泽东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

二十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知道了中国的态度。苏共中央打电报给中国，邀请中国方面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建议苏、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

二十二日晚七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联的邀请。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

刘少奇、周恩来都主张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

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

常委会最后决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劝和；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总的是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巩固苏波友谊。方式是分别与波兰或苏联代表团谈，不参加他们双方的会谈。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苏联发表宣言，十一月一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告一段落。

2、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几乎与波兰事件同时发生。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三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要求所谓民主和自由。

一九五六年四月，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下台，原因是匈牙利中央指责他搞资本主义复辟，并把他开除出党。

一九五六年七月，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六年十月，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伊克（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平反；同时为纳吉恢复党籍。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宣布撤换原总理格罗，由纳吉当总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苏联军队应纳吉的邀请进驻布达佩斯。同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布达佩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代替格罗任第一书记。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全国罢工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

布解放。布达斯到处听到枪声。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苏军基本上控制了布达斯的局势。同日，纳吉宣布成立新政府。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匈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以纳吉为首，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这时，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许多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群众被叛乱分子抓住吊死，街头电线杆上、树上到处挂着许多尸体。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而纳吉政府却采取节节退让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达布达斯，他们表示：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中国。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泽东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党和人民。

3，中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教训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

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军重返匈牙利后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也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于是铁托、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西方好多国家的共产党员也批评苏联，带头的是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阵。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坚持两点论。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道路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我们中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我们依靠群众，走群众

路线，是十月革命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二）中共中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政治局常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顾名思义，指向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那么斯大林这个人怎么样呢？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所谓斯大林分子，也应当是三七开，有缺点有错误，但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彻底把它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错误的去掉了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

要再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是说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当然，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符合实际，要有分析。这里用得上中国古人作文章的方法，一个叫“欲抑先扬”，一个叫“欲扬先抑”。就是说，你要批评他时，先肯定他的好的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用这个方法。对斯大林则要采取另一个方法，你要表扬他时，先要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然后再讲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别人看了就容易接受。

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不愿意写。从感情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人家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的“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受到西方舆论的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的重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讨论写文章问题，

毛泽东说：文章的题目可以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

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就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

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

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同志。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铁托同志现在却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他把这些同志称之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亲痛仇快的。在共产党人内部，在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处理，只能采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的说理的办法处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题目，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要怎样影响国际。要晓得，苏联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我们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波苏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

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着重指出，斯大林的著作还是要学，但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别人的情况我们不讲，让人家自己讲。我们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评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没有理由不讲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团结的思想混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毛泽东说：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斯大林犯错误进行分析时，可以讲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国内外情况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强调过分，因为列宁在世时也是没有先例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也可能少犯错误。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又要防止

修正主义倾向。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丢掉了斯大林为把刀子，结果别人捡起来打他，帝国主义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又打他两棍子。这样在全世界刮起了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风潮。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否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铁托是不公平的。他有什么权利攻击各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斯大林分子？他有什么权利对各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南斯拉夫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做得太过分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的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作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过去苏

联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三）文章要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要点

全文共两万字，分为四个部分，外加一个引言和一个结束语。

引言部分：从当前国际上对匈牙利事件的议论说起。

当前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第一种是敌我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营之间，帝国主义同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之间的利害冲突。

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相互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这就是本文的根本立场。

第一部分：从苏联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归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有五条：

（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列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第二部分：论述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就是由于他没有做到这些。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但是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第三部分：是论述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

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的，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同这些人的宣传相反，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第四部分：论述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协商一致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是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者，同时又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

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各国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

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要注意反对大国主义倾向。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必须认真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行为。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联合斗争中，相互支援，共同努力。

结束语部分：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一百年历史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社会主义国家还年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犯过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无论敌人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例如英国和法国，曾经经过多少次反复，其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世界上哪有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和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

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贰、本节简论

关于《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要点的最后一段中使用了个人迷信一词。确实，关于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提法，在文章讨论过程中，是有分歧的。刘少奇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邓小平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不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词的含义确实是有区别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虽然这个时候反复强调，毛泽东没有搞个人崇拜，也一贯地反对搞个人崇拜；但是由于他观点上的模糊不清，他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就又拿起这个武器来攻击毛泽东。这篇文章之所以全篇中都使用个人崇拜一词，这是为了与当时苏联的提法相连接。并不表明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

这篇文章特别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强调提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再论》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经验，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文章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特点及发展的规律：

文章说：

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刻阐述了 了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又说：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阐述的上述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2011年4月26日修改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对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在与赫鲁晓夫谈话中，毛泽东说：

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

（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估计不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很强大，特别是你们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有些恐慌，更不敢。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反对是没有问题的。不怕呢，因为你怕也没有用，你越怕危险就越大，你不怕不见得战争就会打起来。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索性不怕。我们还是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二年，还有八年就够二十年，我们应该争取这八年里面不打仗。你们是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应该争取十年和平，然后再争取十五年，然后再争取更长的时间，总之是力争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这个警惕性不能放松，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针对朱可夫说的，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我们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进攻苏联，苏联要反击。）如果是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苏联准备反击，这是对的，但是还得看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请你们去。战略问题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看还是不要先发制人为好，还是采取防御战略为好。我们不首先打，不首先打原子弹，如果他要打，我们就反击。这就是防御战略，不是先发制人战略。

二、毛泽东在三次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开始，在大会上

毛泽东说：

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而苏联共产党有四十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的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联党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的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

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切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有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有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了、成熟了。他们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

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们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六十八个党大会结束之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一九四五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 21 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 15 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 15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 2000 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 15 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 3000 万吨。那么中国再过 15 年也可能达到 3000 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

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在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 4 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 24 万人。

（哥穆尔卡说，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纸老虎是我一九四六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

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何同它作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地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 27 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 13, 5 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 27 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

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六十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种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语，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不过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一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因为斯大林组织的情报局整了南斯拉夫党，包括铁托同志，所以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西方世界贷款，要美元。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本来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十三个变成十二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字也可以，不要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的宣言上签字的。

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很好，但是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需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我们这次十二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助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斯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就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 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 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 50%的、40%，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十二党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六十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谈谈怎样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十一月，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

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掌握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們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自卫，进而夺取政权。（另外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三、毛泽东在莫斯科告别时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哥穆尔卡率代表团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

（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个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十月二十八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十月十八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关于共同刊物的问题）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

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

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

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它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

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十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一点要自觉，切不可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的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廷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廷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一个党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为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

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我这次来不是专门为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让他告诉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我们一顿。会上有三个人放炮,一个是莫洛托夫,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斯大林。总的意思是说,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毛泽东如果不是一个铁托的话,至少是半个铁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批评我们的。我当时就在鼻子里发笑,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共是民族共产主义,什么半个铁托,等等,我都不申辩。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把条约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当时我们都忍下来了,当时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都按苏方要求办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想改变呢?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我不是半个铁托呢?那是朝鲜战争。原来他们说我是亲美英派,我们抗美援朝了,哪有亲美派同美国打仗呢!一九五〇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当时我们请了斯大林,别人以为他不会来。结果他还是来了。他说他那天夜里没有睡好觉。在招待会上我先致辞感谢苏联,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他想了一想,先是不赞成订条约,后来觉得还可以。当然也要讲公道话,斯大林还有好的一面。抗美援朝一来,他就说我们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了,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了,不是半个铁托了。所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分歧,兄弟党之间的一些分歧,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要准备挨骂。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在启程回国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

这次会议开得好,开会的方法也好。你们愿意跟大家商量,这点我们很高兴。

我们两家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代表团是满意的，相信你们也是满意的。现在宣言是达成协议了。以后是执行的问题。各个党根据宣言中肯定的原则，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执行，可以有这种政策或那种政策，这种方针或那种方针。在执行中会有不同意见，如果发现不同意见，我们希望还是内部谈清楚，不要采取公开批评的方法。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一个党效果都不好。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之后，不要办成互相争论的刊物。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一非常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与各党的交流、协商中，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又具有适当的灵活性。

2011年4月26日修改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提出苏联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请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召见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谈话：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你

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说的话。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

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

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

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表示问候。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四次会谈，七月三十一日，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说：

你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你们要搞什么。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你们大使尤金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他还说到你们的黑海不行，波罗的海没有出路，北海太窄了，海参威也有危险，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很难搞大的远洋舰队。你们要在中国搞共同的核潜艇舰队。我们只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并没有说要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说要搞中苏两国的共同舰队。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中央商量以后，提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第二个方案，共同建设共同舰队，因为不共同建设你们就不援助。第三个方案，我们撤回我们要你们帮助建设海军的请求。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所以我们不建设海军了，不搞舰队了，不要核潜艇了。第四方案，把中国所有的海岸都交给你们。第五个方案，把旅顺大连和其他的港口都交给你们。斯大林过去在旅大这样搞过，你们想扩大，那就扩大吧。你赫鲁晓夫究竟是不是再来搞斯大林那一套？长波电台的问题好办，就是我们建，我们有，你们可以用。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谈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今年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七月底八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谈了一句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那次赫鲁晓夫来，主要是来吵架的，吵什么呢？他提出要搞中苏舰队，我们反对。他就迂回曲折地再三解释，还是想搞。我们臭骂了一顿，顶回去了。当时我向他提出了五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你不帮助我们搞海军，硬要搞共同舰队，那么我们就不搞，索性把我们的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我们一点也不要了。当时我说我去打游击，搞点游击队。赫鲁晓夫说，你为什么要搞游击队呀！现在世界上游击队不行了。我对他说，我的鼻子都让你堵死了，海口统统都交给你了，我不搞游击队还干什么事？没有事做，我只有搞游击队。我是搞游击队出了名的。赫鲁晓夫说，这个不好。后来他就缩回去了。最后才决定发一个联合公报，吓唬帝国主义一下。其实，那次赫鲁晓夫来根本没谈金门的问题，一句话都没有谈。倒是谈了国际形势，谈了中东事件。

赫鲁晓夫回去以后，大概经过他们中央考虑，在十月间来信说，照我们意见办，帮助我们搞海军，帮助我们搞核潜艇，不再搞共同舰队了。但是，他们后来又来信提出，台湾地区比较紧张，苏方考虑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后来又一次提出，要派带有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部队到福建前线去。我们给他复信，表示我们不赞成他们派空军，也不赞成他们派导弹部队。因为他们说他们的导弹部队不能交给我们，由他们自己指挥。我们说，你不交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不要飞机，也不要导弹部队。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沿海，控制福建那个地方，跟美国在台湾驻扎美军一样。那样一来，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像蒋介石有什么动作都要问美国一样。这些我们都不干，我们统统都给他项回去了。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的矛盾加剧。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是苏联党当时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在军事和外交上要求中国服从它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苏联提出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

毛泽东把这个事件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

毛泽东两次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反对苏联侵犯我国主权

谈话的重点是拒绝苏联提出的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

由这个问题进一步涉及到在华的苏联专家问题。

由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

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这件事再次表现了毛泽东维护国家尊严、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决心。

2011年4月26日修改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壹、本节概述

一、苏联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月26日至2月2日）上，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在1958年12月1日、1959年1月不指名名的影射攻击中国）在讲话中指出：

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的报告比二十大有进步。他在报告中讲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是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的。他对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了修补。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社会党问题，基本上还是维持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口径。

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睬，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西藏叛乱集团指挥藏军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解放军开始反击全力平息叛乱。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印边境发生冲突。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责怪中国，偏袒印度。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

二、中苏北京会谈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

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十月二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

毛泽东指出：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

赫鲁晓夫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的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问题，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不该与印度搞坏关系，并且说，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达赖放跑了，你们何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不管，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事情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我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

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

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

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們两党的分歧。”

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毛泽东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

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像日本帝国主义、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来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效果。我们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

与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毛泽东写了一首打油诗：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三、毛泽东谈反修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毛泽东离京，到达杭州后，十一月间接连开了两次小

会议论国际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又对中国党进行影射攻击，并且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 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 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

（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国际形势发表讲话：

第一、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

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始于斯大林。历史上我们跟苏联分歧很多。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共警告我们不要进行自卫战争，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讲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不指明名地攻击我们“抢先”，提出要“对表”。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应该相信他的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如果自己已不能纠正，那么苏联党内会有力量来纠正他。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第三种可能，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第四种可能，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

第三、我们的方针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言论、行动，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就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闹得特别凶的、表现特别积极的、态度特别恶劣的，就是南斯拉夫党，这是不足为怪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我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主的方针，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一万多高级干部的团结。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和讲话，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和讲话，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2011年4月27日修改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壹、本节概述

一、分析赫鲁晓夫的发展前途

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家讨论：赫鲁晓夫的前途怎么样？他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认为，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是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滑下去。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目前看来还不能定论。

第二个可能是有所改变，就是碰了钉子以后，他不得不作些改变。

第三个可能是根本的改变。这个可能看起来也比较小。

第四个可能是赫鲁晓夫完全变成修正主义，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投到美国的怀抱里面去。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

毛泽东着重分析了这种可能性，他说：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帝国主义一方面拿着核武器，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又搞糖衣炮弹。他们采取一硬一软的两面手法，目的都是为了把苏联搞垮。赫鲁晓夫手里也有核武器，是惟一能在战略上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他是有所依恃的，不会轻易向美国俯首称臣。同时，修正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在美国糖衣炮弹面前，又很容易为了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牺牲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可能会变来变去。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现象，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

首先，美国不会照赫鲁晓夫的想法去做。虽然它们都讲不要妨碍赫鲁晓夫，不要损害他的地位，但是要帝国主义完全按照赫鲁晓夫所想的那样让步，那是做不到的。

其次，在苏联内部，因为长期受列宁思想的影响，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十月革命到如今已经 40 多年，要改变这种传统思想是不容易的。

第三个因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党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会完全听任赫鲁晓夫为所欲为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有所顾忌，即使他想同帝

国主义搞某种妥协、让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也是不敢贸然从事或者做得过分的。

第四个因素，是民族独立运动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赫鲁晓夫要削弱这个运动，要被压迫民族不革命，服从他的指挥棒，也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搞妥协，这是很困难的。这也不能不影响赫鲁晓夫的政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赫鲁晓夫不能有所影响，不能不有所制约。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影响就不同于一般的小党。这不是大国主义，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力量。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对他的制约，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些反面教员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些反面教员是不会按照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和他的想法去做的，是不会满足赫鲁晓夫的要求的。赫鲁晓夫在革命力量面前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在反革命面前也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大搞修正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赫鲁晓夫的意志为转移。

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发表了五点系统的意见：

1、这次会议只在一个问题上做决定，就是决定 1960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其他问题，关于国防战略问题，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等等，都是交换意见，都不做决定。

2、大家还是要读书，要组织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学习苏联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哲学原理》。读这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苏联的观点搞清楚，特别要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两本书不能说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还不少，但是也不能说它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

3、国内的形势是好的。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的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现在人家不大相信我们，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才在摸索。我们对人家的意见不能大骂一顿了事，更不能打仗，要靠我们把国内的工作做好。

4、国际形势是好的。世界人民一天天觉悟起来。还有一点应该估计到，就是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现在是打不起来的。在这一

点上，赫鲁晓夫是做了好事的，这是应该肯定的。赫鲁晓夫访美缓和了紧张局势，帝国主义现在不敢打大战，这一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给美国擦粉，给艾逊豪威尔擦粉，这一点是不好的。赫鲁晓夫不是利用好的形势来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是给人家擦粉。当然，帝国主义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也说他的好话。双方都擦粉，但是比较起来，讲原则的还是西方国家，还是艾逊豪威尔他们擦粉是有分寸的，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把艾逊豪威尔捧上天。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控制不行就整我们。他整了我们几下。我们党历史上受过多次整，也习惯了。挨整挨得多了也就不怕了。我们顶了他，结果还是顶住了。我们对苏联，包括对赫鲁晓夫本人，我们的政策还是团结的政策，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要团结。赫鲁晓夫虽然有缺点，但还是应该团结，而且是可以团结的。斯大林不是也整过我们吗？但是还是可以团结的。当然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但可以对赫鲁晓夫做工作。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讲明对南斯拉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还是听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后给他讲，有些事情也可以事先给他讲。赫鲁晓夫很快就要访问印度，他很可能要插手中印边界问题。这对我们不利，对苏联也不利。所以应该通过外交部告诉他们，叫他对尼赫鲁讲，要同中国协商解决问题。中印之间的问题我们不要别人来调停，我们跟印度直接打交道，直接协商解决问题。赫鲁晓夫是不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做结论为好，因为赫鲁晓夫这个人善变。我们要看几年，他也要看我们。他有两怕：一个怕我们搞得他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照顾照顾；再一个怕我们给他戴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机会主义，更不能公开说。其实，我们和他的分歧是一个指头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指头的事情，其他九个指头还是相同的。苏共还是好党，这个大前提现在还是应该肯定的。但不同的一个指头也要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公开说清楚，可以用阐明《莫斯科宣言》的方法，把我们的一些观点明确地讲清楚。原则上我们要鲜明，但具体问题上要策略一些，不要把话讲绝，要留有余地，要谨慎。对有些原则问题、理论问题，我们要讲就公开讲，不要放暗箭。赫鲁晓夫现在不断地放暗箭，他越放越对他不利。应该公开讲清楚帝国主义本性难移，它的策略可以改变，但是它要消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不会变的。它要消灭一切革命力量，对这一本质问题要讲清楚。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在这

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但是我们不赞成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正面讲道理时不要同苏共、赫鲁晓夫公开争论，不点他们的名，不引用他们的讲话，但可以引用南斯拉夫人的讲话，用批评南方的观点的形式讲清道理。

5、面对反华浪潮，我们要坚决顶住，也能够顶住。我们要准备顶它十三年。因为我们离开延安到现在整整十三年，我们再顶它十三年，分三步：第一步顶三年，第二步顶五年，第三步再顶五年。不要有顾虑，要准备出大乱子。大不了再回到延安。这一点我跟民主人士也讲了，大不了再从头来。我就不相信我们革命不成，一定会成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赫鲁晓夫也是能顶的，顶了他就缩回去了。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的方针。我们全国要团结，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同世界坤力量要团结。当然，同赫鲁晓夫也要讲团结，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目的还是要团结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战争终究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后才能够说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个根源没有消灭之前，不能说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不要怕形式上的孤立，这种孤立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的人是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他们的利益。

会议决定，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

会后指定中央宣传部组织起草文章，批评南斯拉夫党的错误观点，正面阐述与当前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若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时发表。

二、赫鲁晓夫提高反华的调门

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泽东，一次是围绕中印边界问题，一次把矛头直接对准毛泽东。

他说，有人要以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形式，内容就是面包、黄油。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一九六〇年三月初，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等问题的文章编成小册

子，并撰写文章，在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时候发表。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会议前两天），毛泽东在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上的指示：《关于反华问题》：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 10%。而有 24 倍 3000 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如同 1949 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农业馆，在所谓的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 350 万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了中苏关系等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起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 90% 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他们反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1946 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的，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理亏，90% 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

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目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 10% 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性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个 20 世纪的后 40 年。如果给我们 40 年的时间的話，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三、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

一九六〇年四月初，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三篇文章初稿，确定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分工。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陆定一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基本内容：

中国人民在纪念列宁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争取世界和平，一个是团结国际友人。争取世界和平就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现阶段，帝国主义还是在继续执行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扩军备战政策。继续维护和平，首先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要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陆定一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基本内容：

列宁的精华就是列宁的革命精神。

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

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们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自己害怕战争，也害怕革命，害怕由革命引起战争。它自己不想革命，也反

对人家革命，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革命，也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

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基本内容：

当前的时代并没有变，虽然新技术的发明、核武器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

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

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理论、关于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的区别的理论，没有过时。

要坚持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文章发表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帝国主义反华有它的间歇性。一个战役和一个战役之间应该有间歇，这是军事学上的一般原理。那么，在政治斗争中也有这个问题，不能老是紧张下去，天天都那么斗，应该有个间歇，波浪式的发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应该停一个时期，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无论是美国的或是苏联的，都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人家反华有间歇性，我们反美反修也要有间歇性。但是，我们要充分准备，准备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打打停停。

贰、本节简论

如果说把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算作是公开在报刊上进行反修斗争的第一波，那么，一九六〇年发表的这三篇文章，就可以算作是公开在报刊上进行反修斗争的第二波。

三篇文章中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问题；

争取世界和平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关系问题；

暴力、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

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的区别问题，等等。

搞清楚这些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1 年 4 月 27 日修改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壹、本节概述

一、四国首脑会议破产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美国 U-2 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苏联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赫鲁晓夫飞抵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但又声明美国必须就入侵事件公开道歉。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七日，艾逊豪威尔断然拒绝赫鲁晓夫的要求，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 120 万人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大会，支持苏联。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到达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

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

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一种是战争，即帝国主义发动大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缓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若和平共处，不是没有纠纷，没有冲突，只是表现为比较缓和的形式。除了这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冷战共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时间是冷战共处，双方剑拔弩张，有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东战争等，但没有打起世界大战。冷战共处的形势也不是一直很紧张，有时高一阵，有时低一阵。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冷战共处也比打大仗好。我们能争取 10 年、15 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有 14 年，这是两次大战中的间歇期，也就是冷战共处时期，这个时期延长的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开戴维营会议后把艾逊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 U-2 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逊豪威尔对抗，实在是因为美国派 U-2 飞机入侵苏联，把赫鲁晓夫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否则对苏联人民交待不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不过去，他要垮台。无论如何，这次他做了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做得好。理应如此，我们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我们的文章有影响，但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很难说影响有多大。对赫鲁晓夫，正面教育可以起点作用，但有限，他至今仍说 1957 年 1 月间总理给他们“上大课”，仍耿耿于怀。对他能起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员，像艾逊豪威尔、阿登纳这样的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好说他在所有问题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下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至于中苏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不好相处。这个人不可信赖。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当然，他做得对的，我们还有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我们绝不天下先。

二、布加勒斯特会议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苏共中央建议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拉我们好办，无非是要我们多支持少批评，我们本来是采取团结为重的方针。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坏处。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代表团应该采取的方针，可以归纳为六句话，即：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的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赫鲁晓夫信口雌黄，破口大骂：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中印冲突完全是你们造成的。我们发表一个声明保持中立，是帮助你们而不是反对你们，现在你们跟印尼关系也搞坏了，责任也在你们。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要估计一下这次会晤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破裂，是不是破裂不可避免。依我看，彼此都不想破裂，我们本来就不想破裂，看来苏共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敢于破裂。上海会议时有同志提出，要赖着跟他团结，不搞破裂。但是，我们也要想到，破裂也不要怕，也要做这个准备。只要你不怕，才可以争取到不破裂。立场是要坚持的，但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要注意方法，态度要诚恳。人家不同意的，我们不强加于人，让历史来裁判。究竟怎么样，要看这几天的发展，要给我们代表团打招呼，要他们准备受围攻，还是临走的时候中央交待的原则，后发制人，留有余地。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晤。一些国家的党攻击中国，一些国家的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不赞成这样开会。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

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在会议公报上签字。代表团请示中央。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我们打的是反包围，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预先布置好了包围圈，是骗我们到布加勒斯特去的。他6月2日的信是他下决心要对我们施加压力。6月7日的信是一个骗局，骗我们说不开正式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会晤”，只对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的内容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撒谎。看来他们的《通知书》早准备好了，临时写是不会这么长篇大论的，一共有五六十页，说明他是准备好对我们实行围攻。这个《通知书》就是对我们发起围攻，拿这个《通知书》来武装跟随他们走的喽罗。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擅自把会议扩大到五十一个党，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一九六〇年七月六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

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拿出来。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估计他还要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新鲜

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惟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的工作搞好。

三、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

现在全世界反华的人最多只有 10%的人，这里面包括反动派、半反动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90%的人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尽管一个时期好像是满天乌云，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好像跟 1947 年 3 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满天乌云。我们不要被这种假象吓倒了。当时如果给吓倒了，那就要站在蒋介石一边去了。现在呢，从去年以来反华表面化了，就是 9 月 9 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垮台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暂时的现象吓倒。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一搁，还是搞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要紧。

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此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

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

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答复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

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

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

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

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美国人曾经说过，在朝鲜打仗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实行错误的战略。现在再来，他要打就打嘛。中国地方大，有西南，有西北，蒋委员长就躲在那个地方，日本就打不到他。我们不相信美国就能打得进来，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应该相信苏联老百姓的90%以上是好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也许有些人暂时被蒙蔽，但是最终是会明白过来的。也应该相信90%的苏联专家是搞国际主义的，是好同志。我们要相信他们，要好好欢送他们。什么叫孤立呢？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

这次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这么迫不及待地撤退所有专家，看起来是有一种什么需要。听说苏联通过一个法律，反对领导要判六至于七年徒刑。我们对右派都没有这样做，看起来他们有些惊慌失措，所以这么着急，这么迫不及待，看来是害怕，是心虚。我们不急，无非是那么几手，要硬着头皮顶它10年，如果太长了，缩短五年也可以。如果五年不行，还要顶，就再顶五年。当然，我们希望时间越短越好，但是要做越来越长的准备，有长期打算，硬着头皮顶着。首先要县一级的干部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让12万个乡一级干部懂得这个道理。听说苏联已在全党都传达了，我们现在只传达到12万干部。这叫留有余地，那么急不必。苏联是急于作决议，中央全会作了决议，急于往下传达。看起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需要，说穿了就是怕。布加勒斯特会议把我们骗去，搞了两天的突然袭击。我们要修改，他不赞成。修改一个字都不行。代表团说要请示中央，他也不赞成。世界上哪有这么蛮干的，还像共产党吗？列宁在搞第三国际的时候，开会开一个月都有的，因为有理不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他害怕辩论急于作决议，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有弱点。我就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长久。

四、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议上的争论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指出：

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我看基本是好的。我不说它是完全好的，只说它基本上是好的。你们想要加强团结是好的。你们提出要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这也是好的。但是，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这个问题要分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赫鲁晓夫早就有分歧。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们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还是赞成采取共产党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内部讨论，不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其实，赫鲁晓夫早就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赫鲁晓夫叫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把这个分歧公开化。中苏不和后果是严重的，所以我们赞成你们劝和，赞成你们当和平使者。

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而且，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还有彭真同志，他们都可以去谈。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话，甚至讲到要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中国来。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那样喜欢斯大林，老讲我丢掉一把刀子，那么，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你们那里去好了。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胡志明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国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胡志明。

胡志明说，苏联方面指责中国从 1958 年起在许多事情上都不给苏联打招呼，不跟苏联商量。比方说，提百花齐放，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还要修成吉思汗陵墓，等等。他们特别抓住成吉思汗这个问题做文章。

毛泽东说：成吉思汗的陵墓是日本人破坏的。蒙古人很尊重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所以把他的陵墓重修了。苏联人不也在列宁格勒重修了彼得大帝的陵墓吗？而且赫鲁晓夫还想在中国的旅顺口把日俄战争时的两位沙皇将军的塑像重新修起来，只因我们不同意才作罢。

赫鲁晓夫说 1958 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

1955 年，双方还好谈，1956 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 1958 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 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对谁错。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都提到这些问题，惟一新的是成吉思汗这一条。赫鲁晓夫 1954 年见阿登纳的时候曾提到成吉思汗，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吉思汗是征服了俄国之后才征服中国的，并不是先在中国称王然后打到欧洲去。我们并没有这样就埋怨俄国人。赫鲁晓夫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很可笑。

胡志明说，他同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苏两党中央见面的事情。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说苏联将尽力而为，但要看中国的态度。他还表示希望起草委员会能够开好，能够为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做好准备。

毛泽东说，会议可能开成，可能有希望，但是我们不能松懈。你们是 12 日到苏联的，14 日他们就给我们两封信，一封信提到两党见面，大家讲团结；另一封信把我们大骂一顿，是回驳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声明的。看了后一封信，我很担心，究竟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会议能不能开好。看来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怎么样答复苏联，我们中央在几天之内再讨论作决定。现在是 8 月 19 日，8 月份还有 12 天，9 月份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出 9 月 29 日或是 30 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看来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半个月左右举行中苏两党会谈。1957 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苏两党开了五天会，这次有半个月，时间比过去长，但是问题很多，究竟是开得好开不好，再看。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两党会谈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

一些意见。大意是：

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至二十二日，莫斯科会议声明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有二十六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 81 党莫斯科会议前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81 党会议有一番恶战，辩论会非常激烈，甚至会发展到破裂边缘，因此我们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是也不一定就会破裂，仍有可能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协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八十一个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举行。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任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初，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这次莫斯科会议结果是好的，是协商一致，保持团结。大家都是共产党，一

定要团结，要和。终究是要和的。先和后吵，吵了又和，又和又吵，又吵又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次 81 党会议之所以开得起来是因为你做了说客。你当说客在先，后来又发起请愿，你当请愿团的团长。你是两重身份，既是说客，又是请愿团团长。

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上一次我在北戴河跟你们两人谈话的时候向你们交了底。我说，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要怕原子弹会落下来。现在我想起我们那次谈话还有点好笑。这次又搞了一个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按这个原则办，不一致的就不写，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商而强加于人。看起来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双方都应该不强加于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苏方达成了君子协定，停止互相攻击。（胡志明说，都不要丢香烟了，即不要争吵）到某个时候还可能要丢呢，我不相信从此就不丢了，可能是丢一阵，递一阵，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

如果他要分裂，我们有什么办法？苏共方面这次是搞的边缘政策，一步紧一步，先撤走专家，再来个经济封锁，破坏团结还不够，还画漫画，指名公开攻击中共。压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物质的，如经济封锁、撕毁协议等等；一条是精神的，就是谩骂。这是搞边缘政策。结果这次走到边缘又回来了。我们也是采取边缘政策，就是斗争到底。你不退让，你不接受我们的原则性意见，不拔掉钉子，我们就不签字。这就是说双方都采取边缘政策，结果双方走到边缘又回来了。也许将来又要走边缘，又回来，我们准备着。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曾经对小平同志讲，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邓小平因为腿摔伤后还没有完全复元，参加会时拿着一根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曾提出这个问题。彭真说，小平同志的棍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邓小平说，我这根棍子挨了两千次骂，有的时候一回骂十几次还不够，再骂第二回，都是指名骂我的。）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我们党的五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都没有出面，都没有指名批评，都留一手，更不要说我这位主席了。我现在不讲话，看他怎么样，也许几年以后我要讲话，到那时候再说。

这是生活中常有的现象。开一次重要会议只能解决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各党保留着。比如，“纸老虎”，现在中苏两党无法达成协议，这并不妨碍两党团结。有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把这些问题保留下来，还是讲团结。我看这种办法还是需要的。这次会议能取得的一致意见，实现和解，比我们过去预想的要早一点。本来我们是准备十年的，现在只争论了一年。以后是不是还有争论？也可能还有争论，我们准备着。这次会议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肯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压服不是列宁的办法，那是对敌人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

比较起来讲，我们中央对国际情况调查研究比较充分，所以了解情况也比较充分，因此决心也比较大。开始，我就不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要搞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中央也急急忙忙地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做决议，而且把决议下达到支部，攻击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当时我曾讲过，他不这样做恐怕是考虑不好办。现在看来，他们也估计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压服的。一个是他不这样做不好办，一个是估计错误，这两个原因可能都有。因而当时赫鲁晓夫对我们非常害怕，对三篇文章非常害怕，因而不能不为维护他的权威而斗争。而我们什么都不怕，他们的文章我们登，而且把他们的文章集中起来出书，公开发行，一共发了十几万本。赫鲁晓夫说我们闹宗派活动，说我们三篇文章和小平同志 11 月 10 日的讲话是纲领。从这方面来看，这三篇文章实在好，别的党也这么讲。三篇文章出来后，赫鲁晓夫就急急忙忙搞了几手，就是搞布加勒斯特会议，搞撤退专家，搞撕毁合同等等，这就搞到国家关系上去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我们压倒。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想的，而是比较合乎我们所想的。我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有研究，比较熟悉，所以能够对付，能够取得胜利。有调查研究，有科学分析，才能情况明了，才能下决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处理国际问题要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更要这样。

81 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当然，这个反华浪潮也有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有来自于民族国家的反动派。印度反华，南斯拉夫也参加反华，有些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参加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领头，在今后还会有反华浪潮，还会有

起伏，不可能根除，因为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

我们现在在党内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在 81 党会议上骂过我们的党，我们也要同它讲团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自己觉悟。共产党人不挨骂就不是共产党人。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不是说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同样，我们讲团结也不是说不要必要的斗争，但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去年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骂了我们一大堆，我们不能不反击，批评了他们一顿。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有什么好反对呢！每一种树都是不一样的，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同样是杨柳，这一棵和那一棵是有差别的。同样是松树，这一棵和那一棵都是有不同的。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2011 年 4 月 27 日修改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壹、本节概述

一、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系统化

一九六一年九月，苏联公开发表苏共二十二大《苏共纲领草案》。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在讨论《苏共纲领草案》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总的估计，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更谈不上改变他的基本立场。他是很顽固地坚持他的立场的。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更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难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所以说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容辞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赫鲁晓夫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就是要欺压，就是要把你压服，压而不服就整你，把兄弟党、兄弟国家当做敌人，搞颠覆，这是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另一个方面，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是怕帝国主义的，他口口声声要搞裁军、搞谈判，实际上是要争取在帝国主义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民族共产主义，说我们单干，其实我们搞的是自力更生。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学苏联的，首先是学列宁，其次是学斯大林，他

们是搞自力更生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他们不单干怎么办？只能单干。我们学的是他们，这有什么罪过？我们并没有要共苏联人的产，我们是自力更生。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上帝，那就是玉皇大帝。他们是什么呢？是东正教，他们有他们的上帝。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当然，去年莫斯科会议也是开得好的，我们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斗争是有成绩的，至少是一段时间内限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我们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撤退专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发塔斯社声明谴责我们，是赫鲁晓夫搞的，是他首先骂我们的。我们并没有挑起争论，而是他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之后，我们迫不得已起而抗争，才发表了三篇文章。不能不发表这三篇文章，我们应该坚持这三篇文章的立场。

现在，赫鲁晓夫又挑战了，我们怎么办？我看，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修堡垒，就是把内部整顿好，做好物资建设，也要做好思想建设。另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斗争，现在要准备可能在“22大”上有一场斗争，也可能围攻我们，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说修堡垒也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封锁起来，不让人民知道赫鲁晓夫这一套东西。我们要发表赫鲁晓夫这个《纲领》，等他们通过以后就发表，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释为什么说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对他的错误观点。

从这个《纲领》上看，现在赫鲁晓夫是违背 81 党声明的。那个声明虽然是妥协的产物，但基本上是好的，应该成为我们手里同赫鲁晓夫、同一切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要批评他们违反 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的 81 党《声明》，这两个文件是我们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武器。我们要高举这两面旗帜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另一方面要坚持团结。

当然，现在他们还没骂我们，他只发表了一个《纲领》，宣传他的观点，所以我们也不好现在就来批评他。去年 81 党会议以后平静了一个时期，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只是他要整阿尔巴尼亚这一点我们是一直是反对的。中苏方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维持 1960 年他撤

退专家、撕毁合同那个状况，没有什么大的改善。现在我们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搞好我们自己的整顿工作，把过去三年的缺点错误改正过来。对中苏关系，我们要尽量使目前这种比较缓和的时间延长，不希望很快又吵起来。虽然现在是不死不活，但是比起公开吵起来还是有利一点。我们要尽量延长这个时间。如果他在“22大”发起进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被迫还击，叫做自卫反击。我们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也叫自卫反击。现在虽然不能把赫鲁晓夫看成国民党，但是现在他背叛马列主义，已经对马列主义发动进攻，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首先对阿尔巴尼亚进攻，这些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但是他还没有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围攻，我们要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尽量延长这个时间，争取时间把我们国内搞好。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苏共举行二十二大。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大搞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

在中国、在苏联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归根到底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动派蒙蔽，但是他们终究会觉悟过来的。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应该坚决相信苏联是个好的国家，无论哪一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学苏联的经验，不学就会犯错误。当然，我们要学的不是学它的修正主义，不是学它错误的东西，而是学正确的东西，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的经验。

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一定采取阿尔巴尼亚那种办法。即使苏联要破裂，我们可以不破裂，我们要求谈判，我们要建议召开 81 党参加那样的国际会议。就是说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现在苏联大反阿尔巴尼亚，有一些党又指名反对我们，苏联也登了很多不指名地反对我们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登反批评的文章，不要和他们争论，让他们骂。现在骂我们的人多着哩。历史上我们就是挨骂的，但我们从来不怕孤立。现在我们的七千人代表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在这里开会，力量更大了，党更大了，还怕什么孤立呢！延安时期开“七大”的时候，解放区只有几千万到一亿人。现在我们新中国比那时的解放区大得多，我们更不怕孤立。

实际上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最终会站在我们一边的。

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不同于修正主义，它只代表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人，我们要有倾向，就是倾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列宁开始建党的时候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党长期是少数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才在苏维埃代表中占百分之五十一，所以才决心发动十月革命。我们不怕孤立，不要怕我们暂时好像是少数，实际上我们代表正确方面，终究是会取得大多数人拥护的。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就是苏共“22 大”，他在大会上搞“四反”（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走下坡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22 大”通过的《纲领》和赫鲁晓夫作的报告。这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破路了。

二、中共中央答复苏共的来信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三、中苏边境事件、中印边境冲突、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以及美苏核对抗危机

1，苏修在新疆搞颠覆活动

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苏共领导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

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

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中央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

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2. 中印边界冲突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

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的意见是：

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

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进犯，动用了十多个旅的兵力，而且出动空军配合，占领了一大片中国的领土。中国边防进行自卫还击，打退了印度军队的进攻，清除了印度军队入侵以来在中印边界中国领土一侧上修建的据点。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行单方面在中印边界停火，并从十二月一日起主动地撤回部队。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阵地前进呢？

3，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

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

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4，苏美核对抗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装配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为此他下令对古巴实行封锁，在离古巴 500 英里的范围内，所有船只都要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正反对美国入侵，也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立场。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建议：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并在撤出时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同意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反对苏联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四、五国党代会上对中国发起新的围剿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到十四日，保加利亚党代会，二十几个党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匈牙利党代会，三十几个党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到八日，捷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五十多个党指名或不

指名攻击我党。朝鲜代表团致辞中不赞成会上对中国党的攻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并修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社论指出：某些兄弟党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对中国党的攻击，根本背离了共产党人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立场，迎合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只服从真理，决不服从任何反马列主义的指挥棒和所谓多数。各国共产党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共同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也公开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写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社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结构改革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等问题上，重申了我党的观点，既批判了陶里亚蒂，也详细阐明了我们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一九六三年一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社论论证了当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否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和国外根源是什么等问题。社论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斗争类似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说：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

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写《满江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他说：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德国党代会，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挥反阿反华，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稿，在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到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也是议题之一。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说：

你们 2 月 21 日来信我今天刚才看完，也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商量了。我们认为你们这封信的态度是好的，欢迎你们这样做。

你们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你们信里的提法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你们言行不符，自相矛盾。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在论战。这个不好，要言行相符。

我们从 2 月 20 日起在报纸上发表你们的文章，已经登了三天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共有 43 个党骂我们，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两个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这是讲主要的，其他的不算。我们也要发表，但不能全部发表，只能发表主要的。今天就发表了法国党、意大利党攻击我们的言论。

兄弟党相互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谈，在内部谈，该批评的批评，批评得不对的也不要紧，但是不要采取公开论战的形式。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可以攻击我们，那我们就有权利答辩。我们从去年 12 月中旬起开始回答你们的攻击。但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是，有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回答，把它发表在报纸上，挂一笔帐，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至于什么时候回答，那要看情况。

彼此骂来骂去，中间总要休息一下。我们赞成你们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暂时停止一下也可以。但要说清楚，首先提出不要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就是在座的周恩来同志在你们苏共“22 大”上，当你们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谴责另一个党，这只能亲痛仇快。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但是你们当时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你们按照这个方针，后来在欧洲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接着在匈牙利、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等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的，不仅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攻击中国党。你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我看这也好，这样就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面前了。当然，我们不主张公开论战，但是，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攻击我们的文章，然后给予回答。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照我们办法，把我们回答你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你们的报纸上，然后你们又加以评论呢？索性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

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照样游。

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现在你们来信说公开论战有很多害处，根本不提你们过去所讲的很有必要。在这封信里，你们说意见的分歧不要人为地把它夸大，不要发展成为深刻的冲突。你们这个意见我也赞成。但是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你们嘛！是你们造了很多谣言嘛！比如我这个人，你们就造了很多谣言嘛，说毛泽东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没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见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们说中国有个人崇拜，崇拜我这个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谁人为夸大呢？是谁引起深刻的冲突呢？这是我发点牢骚。我总的还是欢迎你们这封信，但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稍微发一点牢骚吧。你们过去骂了那么多，那不是人为地夸大吗？有意造成深刻冲突吗？

你们提出中苏两党会谈，为的是筹备兄弟党会议。这个我们也赞成。但是你们在信中说你们早在去年 5 月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比你们来信早一个月，我们去年 4 月 7 日给你们的信里面就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并且提出为开好这个会议，要进行包括中苏两党会谈在内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你们去年 5 月的复信说什么呢？恰恰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或者说是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你们同时也拒绝了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及英国党、瑞典党的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你们这次来信说，现在是面临一个严重的时刻，是关系到今后我们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还是陷入一场沉重斗争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你们信里的这句话我看也不错。的确，我们中苏两党是不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现在倒成了问题了。像你们最近几个月那样搞下去，那我们互相之间就搞不到一起，你们是制造分裂。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跺脚、那样起哄，不让我们代表把致词念完，这叫什么？这叫民主吗？还有你们的赫鲁晓夫同志的两篇讲话，《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公开地攻击我们，这能使我们走在一起吗？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得回答，但什么时候回答，回答哪些，这是我们的事情。最近我们留了一手，没有直接回答你们赫鲁晓夫那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我们只回答了捷克党、德国党、意大利党，还有法国党。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们信里讲，如果我们不克服分歧，子孙后代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这个话也

对。但是我说，不要等待子孙后代饶恕我们了，现在广大群众已经不饶恕我们了。中苏两党、两国有什么仇，为什么这样公开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气和力量，就应该有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勇气和力量。闹那么一阵该休息了。

你们来信讲，这次来信再一次对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加以肯定。这是文过饰非。去年初印度人、新西兰人就提出要开会，我们去年 4 月也赞成他们的建议。可是你们 5 月的信，表面上看似乎赞成，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现在说“再一次肯定”，其实，肯定要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的是这封信，而不是去年 5 月的信。不过，这也好，我们还是欢迎这封信。所以我们一收到你们的来信，就把你这个大使找来。

为了准备会议，我们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认为中苏两党要先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可以在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之前或之后路过北京的时候面谈，如果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请你向赫鲁晓夫报告，有什么决定快点通知我们。如果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就不能像 1959 年那样子到北京来把我们骂一顿，说什么“不要用武力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啦，还说什么“公鸡好斗”啦！请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是母鸡，不好斗？如果真想搞好关系、达成协议、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是欢迎他到这里来的。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说了，他们两个有病，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演讲、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你们，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所以赫鲁晓夫同志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现在不准备去，我还是隔远一点好。与其送到你们那里去挨骂，不如避开一点好。不过，我声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 1949 年也跟斯大林吵过架，1958 年也跟赫鲁晓夫吵过架。

关于筹备兄弟党开会的方式，可以用 1960 年的方式，也可以用 1957 年的方式。1960 年的方式就是两个党先吵，一直吵到开大会，一直吵到大会闭幕的一天才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 1957 年的方式，就是两党先协商，协商一个共同的草案，再同其他党协商，这中间当然还有争论，但是还是比较快的达成协议。据我看，最好还是采取 1957 年的方式。我今天给你谈话，也算是对你们来信的答复，欢迎你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同意开中苏两党会谈。但是，我们党中央正式给你们的复信才算是正式的回答，这

个复信在两个星期内就会交给你们。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

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

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应当研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经验。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赞成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文章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骂我说纸老虎不对，引得世界上许多人都想知道我说的纸老虎是什么意思。现在有 43 个党骂我们，“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怕，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决议、声明、讲话、文章通通发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敢不敢照我们这样办，这是挑战。看来他们不敢，这说明他们理亏。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批驳我们。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他们驳不倒我们。现在倒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瑞士同我们联系，要我们的文章看。看来修正主义不好混，反对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再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一九六三年三月，《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

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

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回答美共一月九日的声明。文章指出，美共的一些人一方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敌我不分，颠倒是非。

一九六三年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

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贰、本节简论

关于新疆事件，毛泽东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次事件说明：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写《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写《满江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

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2011 年 4 月 29 日修改

第四章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

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 3 月 30 日来信时说：没有看完苏方来信。既然大家看了有这个印象，那么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大家研究。赞成我们准备一个对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采取的总路线。可以从当代世界矛盾讲起，一直讲到如何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从重大原则问题，一直到当前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总的答复。我们可以采取答复他们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不要给人觉得似乎我们现在就拒绝他们的来信，那样两党会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

部分讨论。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北京、杭州两地起草的复信时，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先不要提到政治局去讨论。要先在常委范围中搞得比较成熟，然后征求一些兄弟党的意见，比如朝鲜党、越南党、新西兰党、日本党，还有印尼党等东南亚一些党的意见。这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可能会搞得更完备些、更周密些。但是，这不是作为各国左派党的共同文件提出，而是中国党提出的建议，针对苏共 3 月 30 日的来信提出的一个反建议。因为既然苏共可以提，别的党也可以提，但不是作为左派几个党共同建议。人家不说我们搞宗派主义吗？其实这不是宗派主义，但是要避这个嫌。而且，要其他兄弟党完全同意我们的文件也比较困难。大家开会也总是有不同意见，要求完全一致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大的方向能够得到他们的赞成就很好，但是只能作为我们中国党的建议提出来，而不是作为好几个党的共同文件提出来。这一点要十分慎重。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处威尔科克斯谈话时，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 “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

这个文件还要征求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现在的文件（陈伯达稿）还不太成熟，我对总路线的第一部分很不满意，文字太长，而且有些重复，不够简练、鲜明、概括。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整理出复信初稿。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同金日成第一次会谈时，毛泽东说：

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征求你们对我们给苏共复信的意见。这个信已经由秀才们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也看过了，虽然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大部分同志都看这个稿子了。现在请同志们来，请你们提意见，看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这个稿子不行，可以重新写。除了已经征求威尔科克斯同志的意见以外，现在又请你们来，还要请越南同志来。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我们怕犯错误，是想在发表之前搞得正确一点。本来还应该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意见，因为相隔万里，来往不便，只好作罢。越南同志将在你们之后来。印尼党和日本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可惜也不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对这些兄弟党，我们只是征求意见。这封复信不是作为一个共同文件提出来，而是中国党的建议，由我们党负责，错了打我们的屁股。但是，我们想尽量避免犯错误，所以请大家来提意见。因为这封信是同全世界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一把。不论在基本的原则方面，或者是个别观点、文字词句方面，你们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我们中央常委在北京、杭州交换过几次意见，在杭州我参加了，北京的意见也告诉我了。现在又到武汉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

后再加以修改，最后正式提交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再以中国党的名义向苏共发出。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

金日成说：文件总的感到很好。主要的精神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这个文件很有力量，右派是驳不了的。不管有没有这个文件，他们还是照样要攻击我们是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好战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

毛泽东说，我们搞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争取中间派，要使右派驳不倒。至于他们给我们扣上这项帽子、那项帽子，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扣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毛泽东和越南党代表团会谈。毛泽东说：

本来我们是不赞成把内部争论公开于全世界的。

“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复信稿。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复信。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最后定稿时把复信的题目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复信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要点：

导言：

苏共中央在 3 月 30 日来信，特别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系统地提出苏共中央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个总路线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作为我们提交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第一条：

总路线只能根据 1957 年和 1960 年共同签署的《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原则，而不能根据别的其他什么东西。

第二条：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第三条：

各国的共产党人只能根据上述的总路线进行革命斗争，而不能把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样片面概括为“三和”，是违反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

第四条：

当代世界四大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这四大矛盾中，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重要的，但不能只看到这个矛盾而抹杀其他矛盾。其他三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

第五条：

批判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问题上的五种错误观点。这五种错误观点是：

第一，抹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阶级内容；

第二，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其他矛盾；

第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而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需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第四，否认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紧张斗争

的新局面，而认为它们之间可以调和甚至消除它们的矛盾；

第五，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争中自然消失，其他三种矛盾也随着这种矛盾消失而消失，可以出现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世界。

这里提到的五种观点，是苏共理论上的重大错误。

第六条：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阵营负有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任务（七项任务），要保持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关于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性；是不是维护这个团结，成为检验每一个共产党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分裂，是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第七条：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不能不分敌友，把革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于同帝国主义的合作。

第八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革命口号，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

第九条：

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就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能同它划清界限，不要成为它的俘虏。

第十条：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间，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争取同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实行广泛的联合行动。

第十一条：

共产党人是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但是不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准备两手，在准备革命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做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艰苦的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突然袭击和武装进攻的时候给以有力的回击。

第十二条：

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借口牺牲而取消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认为革命必然一帆风顺，或想得到不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以后才进行革命，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第十三条：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十四条：

因为害怕战争而反对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区别是什么样的和平，不区别是什么样的战争，对战争一律加以反对，对和平一律加以赞成，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十五条：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那种认为核武器的出现

就出现了一个新时代、否定人的作用、否定革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十六条：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有一项重大的原则，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不能对和平共处作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不能把它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借以反对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不能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因为还有人民的革命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革命斗争。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第十七条：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于取得政权以前。列宁说过：第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被夺去的天堂；第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力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第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列宁讲的这些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即使苏联也是如此。

第十八条：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很长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所谓全民国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十九条：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谓全民党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十条：

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只能依据列宁提出的三个原则。一、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三、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它实际上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

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更严重的是，他们借口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是搞颠覆活动。

第二十一条：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原则基础上。同时，每一个国家主要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十二条：

兄弟党关系应当遵守四项原则，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

第二十三条：

为了实现各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即 1957 年和 1960 年兄弟党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前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的倾向。在反对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第二十四条：

革命能不能胜利的关键，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马列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

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我们认为，既然公开论战挑起来了，那么各兄弟党之间就应该在平等的、民主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来解决。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地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论战，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来回答他们。

前三条，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信的总纲。

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

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第三条，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

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

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

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

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

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

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

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贰、本节简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也是中苏论战中的一个重要回合。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指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

《建议》提出的基本观点，对现实斗争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2011年4月30日修改

第四章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壹、本节概述

一、中苏两党会谈，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苏美英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中苏两党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日决议，指示他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20大”、“21大”和“22大”的路线行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一九五七年严重，而且比一九六〇也要严重得多。

目前的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对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1960年声明的水平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议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

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

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参加中苏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邓小平为团长。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在讨论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根据会谈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六月十四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苏联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

始。赫鲁晓夫重演联美反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中苏会谈中，康生发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过去吹捧斯大林，从“20大”起又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同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苏匈友协大会上讲话，攻击中国采取独特的路线，搞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声明，指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迎接参加莫斯科会谈回国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

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说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指出：条约旨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中国、法国都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底，在准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八月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如何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1，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2，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3，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4，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

5，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讽刺，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

1、中苏两党的分歧，早在 1956 年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开始了。那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2、我党在斯大林问题上一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观点；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1957 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争论很多，我们并没有公开。

3、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提出“三和”“三无”的修正主义路线；1958 年和 1959 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

4、苏共中央 1960 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袭击。

5、1960 年冬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 6、 1962 年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纲领，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
- 7、 苏共在 20 大以后发动“三反”运动（反马列主义、反国际共运、反华）
- 8、 两党分歧是由于苏共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

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

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

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

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

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要点：

1，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

派别，都发表了种种不相同的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

2，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3，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些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部分地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

4，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我们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十月革命创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國家的光荣历史辩护，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辩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

5，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

6，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用尽了一切恶毒的语言。

7，赫鲁晓夫在过去曾经称赞斯大林。

8，苏共领导反对斯大林，是为他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开辟道路。

《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

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毛泽东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

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

1，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1961年南联邦预算收入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

2，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

3，赫鲁晓夫以南斯拉夫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批驳苏共领导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第一，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第二，由美苏两国合作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支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落后国家；第四，通过联合国来消灭殖民主义。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

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

毛泽东提出，讲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当前美苏是假和平、真备战，主要揭露美国的扩军备战；二要说明我一贯努力执行和平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制止战争、真正维护和平，而且讲究策略。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采取的那样先犯冒险主义，后犯投降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

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

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

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

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文章指出，核迷信和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上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

下一篇和平共处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的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为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

这篇文章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说明两种不同的和平共处。

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

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

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一九六四年一月元旦过后，在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苏共来信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

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的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因为他爱讲话，逞英雄，冲到第一线，说话最多，也最粗野，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

我们要做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10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指出：

讲兄弟党的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的，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

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

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

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文章分三部分：

1、总结 1848 年起到 1919 年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段的历史教训：第一，国际

工人运动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活动。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

2、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从苏共“20大”到苏共“22大”，修正主义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逐步形成最大的分裂主义。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意志”、“破坏国际纪律”、“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谬论，都是错误的。

3、我们要的是真团结，不是假团结。

三、就给苏共复信同兄弟党商量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毛泽东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邓小平率代表团访问河内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征求对复信稿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在北京与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会谈，征求对复信稿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同金日成会谈中，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在去年 11 月 29 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 7 月 14 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从内容上讲，去年 11 月 29 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我们想在这封信里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新举行中苏两党会议，作为 1963 年 7 月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谈的继续。第二，召开 17 国的共产党会议，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会议做准备。第三，召开全世界 81 个或者 100 多个党的代表会议。我们提出这三点积极的建议，请你

们考虑，妥当不妥当。按照我们的设想，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原来想在 7 月举行，现在已是 2 月底，准备来不及，拟改在 10 月。这样，苏联方面可能说太迟。我们想，如果他们觉得太迟，可以提前到 9 月，如果他们觉得还是太迟也可以提前到 8 月，但 7 月不能举行，太仓促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妥当不妥当。因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毫无准备，肯定谈不好。要谈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时间，所以 7 月来不及。过去 1957 年和 1960 年召开的两次兄弟党会议，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我们只在他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一次，我们想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宣言草案。这次要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总要开得比 1960 年 81 党会议要好一点，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们提一个草案，我们也提一个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草案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能够通过协商形成一个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 17 党起草委员会上去，这样最好。如果不行，就把中苏两方的文件一同提到 17 党会议上去。如果 17 党会议达不成协议，那就休会一个时期，再来开第二次会议，反正起草委员会要达成共同的协议以后，才能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这个月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开了中央全会，并作出了决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再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在 2 月 12 日写信给兄弟党。内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对中国党采取所谓“集体措施”。对于这封信，我们在 2 月 20 日曾经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给我们。但是过了两天，2 月 22 日他们来信说，我们的信说“要求”而不是请求他们，他们不给。我们又在 2 月 27 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过去我们说“要求”，你们不给，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你们的说法，我们“请求”你们把这封信给我们。估计他们也可能不给，也可能给，不给的可能性大一些。看来苏共领导现在搞两手：一手是他们开中央全会说要“坚决反击”，给兄弟党的信说要采取“集体措施”。这是采取高压办法，甚至可能采取公开分裂的步骤。另一手是要罗马尼亚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由罗马尼亚出面调停。罗方本来说很决就来的，可是在我们同意他们以后，他们又拖了半个月，将在三月一日动身，2 日到北京，而且还放空气说谈不好不走。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调停，无非是要我们让步。但是，我们怎么好答复他们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苏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我

们

让什么步呢？现在要跟朝鲜同志商量一下，我们对罗马尼亚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估计他们是为调停而来，首先是为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来的。当然，为着照顾罗马尼亚，公开论战稍停一下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要讨论，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金日成说，稍微停一下论战是可以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停止论战以后，如果赫鲁晓夫再攻击中国党，那么罗马尼亚同志要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赫鲁晓夫。）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不知道罗马尼亚同志愿意不愿意。看来赫鲁晓夫现在是搬走石头打自己的脚了。他原先设想公开论战对他有好处，结果公开论战起来了他又怕，怕我们揭他的底，怕我们戳穿他的修正主义面目。但是，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很可能恼羞成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1960年他撤专家，撕毁一切合同、协定，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中：

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只是在这个期间不发表，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

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

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

了。过去很难指名，因为他没有指我们的名。而他们公开发表《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那样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答复他们。现在看起来，我们6月14日讲总路线的那封信，我们的论点是同他们针锋相对的，那样刺绣他一下有好处。他忍不住了，他公开跳出来大骂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解放了，我们也可以公开指名批评他们了。原来他们（指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是要早来的，后来又推迟了半个月。看来他们来华之前要跟苏共方面交换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的复信送交苏共中央。

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四、就停止论战与罗马尼亚党交锋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毛雷尔率罗马尼亚代表团抵达中国。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四、五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与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三次。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说：罗马尼亚党现在和过去相比是有些不同。他们与赫鲁晓夫有矛盾，但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贸易百分之四十要靠苏联，这种情况对罗马尼亚是有影响的，这是根本问题。他们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但他们想说服胡志明，说服你们，还想说服我们。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

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它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

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他们（指我党代表团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

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

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朋友，叫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 25 年，因此我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是不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闹翻的是开始于 1958 年，还不是 1960 年在你们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那个会议。在 1958 年赫鲁晓夫要搞所谓中苏舰队，要占领我们全部海岸线。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到中国来。我对他讲，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由我管，要么就是划一部分给你，这三条随便你选择。赫鲁晓夫说，要是全部交给苏联那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我总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击。他说现代战争中打游击不顶事。我说，那把一部分海岸线交给你，你们再回到旅顺、大连去好不好？他说已经撤了，再回去影响不好。我说，那中国的海岸线还是全部由中国管，苏联帮助我们建立海军。赫鲁晓夫不干，他认为还是搞共同舰队好。我说，不行，要么全部交给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这就闹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国。

在这之后还有 1959 年的事。赫鲁晓夫到美国之前，先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对中国。到了美联社国之后，他又跑到中国来，劝我们放弃台湾，还劝我们释放一批被我们关起来的美国犯罪分子。我说这都不行。他说，他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艾逊豪威尔跟他讲，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那次赫鲁晓夫确是白跑了一趟。你们这回是不是又白跑一趟？

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

针锋相对。赫鲁晓夫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 40 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杀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树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这五条，除了公开论战不杀人这一点以外，后边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他们在去年 11 月 29 日的那个信里面也承认我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多篇文章。他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随他去。火是包不住的。我不相信他不发表。他发表更好。如不发表，那个病毒不发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经说够了呢？反正我们还没有说够，因为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 7 篇，还差 1993 篇。这还不讲其他四十几个党的，只是苏联的就有两千多篇。

我说赫鲁晓夫闯了个大祸，他把妖魔怪统统放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我们中国党算一个，现在不只我们一个，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党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对他，都是他放出来的。我们原先并不想争论，不知道在内部谈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谈了几次，周恩来同志又谈了几次，小平同志谈的更多，劝他们不要搞公开论战，但是他们一定要搞，这一搞，好了，天下大乱。

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搞的就是阳谋。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谈的都是真心话。我们代表团跟你们谈了一个星期。今天我们又谈，我又讲了这么大一篇。我不装和事佬，装着我自己好像还文明一点，没有我们代表团其他同志那样野蛮。我跟我们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样，有时候比他们更不文明一点，这叫做公鸡好斗。赫鲁晓夫说我是公鸡，他自己是母鸡吗？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对齐奥塞斯库说）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因为时间来不及，写不出那么多文章来，要做十年规划。我们现在也只是写文章，就是那些秀才们，一个报纸叫《人民日报》，一个杂志叫《红旗》，由他们写文章来回答。我们中央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地方党委也没有做过决议。而苏联呢，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要讲平等，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讲对等关系，兄弟党之间应该讲平等。

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人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在反帝、反修斗争中，出现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六月十四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另一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中国、法国都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行评论：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给予回复。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毛雷尔率罗马尼亚代表团抵达中国。公开发表评论才暂时停止。

学习这些文章仍有现实意义。

2011年5月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壹、本节概述

一、苏共中央三月七日的信暴露“坚决反击”的预谋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的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中央，这个大概也下了。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 5 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上次在复信中提出了这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苏共 3 月 7 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看，我们不知道你们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 10 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 5 月。来信不是说要在今年 5 月会谈吗，我们就推迟到明年 5 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是从来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两党往来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要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

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

二、用拖的办法推迟分裂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央常委开会，毛泽东说：

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哥穆尔卡 3 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些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的。今年 4 月是赫鲁晓夫的 70 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是完全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七日，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搞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 70 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赫鲁晓夫在 3 月 7 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起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

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有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议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的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总理在“22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是可能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简称“八评”）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

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

三、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苏共中央公布二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

中共中央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六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中放肆攻击中国：中国认为斯大林好，攻击赫本人在苏共“22大”全盘表否定斯大林。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么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吧。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了就够了。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

子就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修改给赫鲁晓夫的贺电稿的意见：

1、这个贺电应争取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的问题，什么公开论战不能停呀，要达成公平的协议才能停呀，等等，这些问题不要多谈。但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东西，而不是讲别的。就是说，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帮你的。要含有这么一个意思，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我在北京说过，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集团里边，还不是最右。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鲁晓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鲁晓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他搞的那一套，我们的估计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在贺电里面要暗含这么一个意思，一旦有事，我们还是能够团结起来对付的。

2、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起，他们就怕，现在是越来越怕。“22大”的时候，他到了顶峰，他发起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论战，从此以后走下坡路，气势一年不如一年。

这次他们发表的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级报纸则要压缩一下，摘其要点，约为十分之一，还要向国外广播。摘要要摘其精彩的。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让国内群众干部都了解赫鲁晓夫究竟放了什么屁。

3、我们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发出这封复信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们那封来信起，一直到我们将要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几次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

4、《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5、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帐，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帐。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帐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

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帐。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八日，赫鲁晓夫在接待波兰代表团的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恶毒地攻击中国，他说：在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潮流占上风，中国党要分裂全世界白种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中国人说，白种人永远不会理解黑种人和黄种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利益是不同的。中国人要我们不要搞经济建设，不要改善人民生活。中国人说我们太胖，要防止资产阶级蜕化，要我们的工业转向生产腰带，以便把裤带勒得更紧一些，要我们向坟墓前进。中国人说我们是资产者，这就是指我们的肚皮。有一条蛀虫，爬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那个地方去了，蛀虫乱爬乱转，于是蛀虫竟以为它是真正指导世界的发展了。中国现在什么也没得吃了，中国人把鸡蛋都吃光了，把鸡都杀光了，也没有鸡来下蛋了。中国经济一片混乱，国内发生了饥荒。中国调整经济是放弃工业化。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贺电经毛泽东修改后定稿，毛泽东说：

贺电发出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

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的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好。

要准备赫鲁晓夫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一切要从坏的方面准备。最坏的准备是他们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不管中苏两党会谈是否达成协议，不管筹备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他硬是秋天召开国际会议，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开除我们，公开分裂。所谓公开分裂就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像过去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那样，像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那样。我们要做这个准备。

如果赫鲁晓夫要召开国际会议，我们要考虑坚决不参加，但同时也要准备另一手，万一需要参加怎么办。我们说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五月，还提出两三

年以后再开国际会议。万一他不顾是否达成协议硬要开，我们要考虑参加会议同他们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准备一个纲领草案，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同他针锋相对。让各国共产党看看，他的纲领是什么纲领，我们的纲领是什么纲领，要货比两家。这样，即使会议破裂，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们要准备两手。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出贺电。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三个文件。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赫鲁晓夫十二篇公开讲话中有关反华部分。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关于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现在步调乱了，指挥棒不灵了，不仅意大利、波兰这些党不赞成开会，还有瑞典、挪威一些西欧、北欧的小党也不赞成开会。现在赞成开会的不到十家。看起来赫鲁晓夫这个国际会议开不成，他可能也看到开会对他不利。对这个国际会议我们要坚决反对开。不开好中苏两党会谈，达不成协议，就不能开十七国筹备会即起草委员会。没有开筹备会，就不能开国际会议。这个立场绝不能动摇。因此这个复信里原来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需要两三年的准备，现在看来两三年不行，要四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毛泽东在复信中加了一段话：“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始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各方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今天分裂吗？”

一九六四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晓以利害。要着重讲明，在目前这种没有充分准备好、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不是导致团结，而是导致分裂。这个道理要反复地讲清楚。要指出：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分裂，苏共领导就不应当急于要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要劝他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因为开起来就要分裂，不开还能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不至于完全破裂，这比公开破裂好。

毛泽东在复信中加了一段话：“如果你们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

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那么，这样做是非法的，是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后果的。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的、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发出复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信。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越南劳动党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社论指出，现代修正主义在准备分裂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谁也无权把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谁也无权在他认为对他有利的时候，就下令公开论战，而在形势对他不利的时候，就停止公开论战。必须在各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无权决定召开这样的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新西兰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国际会议应当综合研究双边会谈，解决有关各党的意见分歧，做出适当准备之后再召开，不允许强行召开或匆促召开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要在最短期间内同兄弟党商定召开筹备会的具体日期；在短期内商定召开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日本共产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用那种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导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的做法来举行国际会议。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提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随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七日，毛泽东说：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毛主席的这些预见，很快为事实所证明。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建立第三线国防工业基地，在改进常规武器的同时，着重加紧研制核武器和导弹，这就是要加强备战；还正式决定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反修防修。也就是说，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

这两大问题是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同时，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反修防修。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要认真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经验教训。《九评》总结苏修的教训时，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搞了五次政变，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贝利亚，接着又搞掉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接着又搞掉朱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一批人，都

被他打下去了。这个教训值得重视。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

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起，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毛泽东说：

在讲到苏共领导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时，还要补充说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和功勋。还要讲到，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是不满赫鲁晓夫为非作歹的，莫洛托夫等人只是反

抗的冰山之巅。必须明确表达我们坚决相信列宁创造的苏联共产党绝大多数和苏联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要讲清楚民主的阶级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消灭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还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明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形成的原因时，着重讲内因，列宁、斯大林领导时，外部情况比赫鲁晓夫时代严峻得多，但都顶住了。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九评》。

毛泽东把《九评》的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毛泽东并亲自改写了十五条中的第二条：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

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包括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由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部分，赫鲁晓夫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第三部分，由于赫鲁晓夫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在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上并不占统治地位，而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苏联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了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第四部分，只要阶级还存在，国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不可能是全民的。如果阶级不存在、全民一致了，国家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消亡了。

第五部分，如果像赫鲁晓夫集团所宣传的那样，苏联党之所以变成为全民党，

是由于苏联党代表全民的利益，是由于苏联全体人民接受了共产主义目标，是由于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是由于苏联党的活动是采取民主的方式、是符合全民性质的。如果这四条理由是正确的，那么，苏联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称为全民党了。可见这些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苏共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全民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第六部分，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

第七部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九评》发表以后又看了一遍。里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里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斗争越来越尖锐，不能像斯大林过去曾经提的那样。而应该看到，这个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时又比较缓和，总之是波浪式的。这一点应该明白。

贰、本节简论

《九评》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

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加以系统地概括和阐述，其要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

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十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2011年5月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壹、本节概述

一、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以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对苏共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提出修改复信稿的意见：

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正在加剧论战，公开论战停不下来。现在正是论战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提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根本不提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求他同我们发表他们的反华文件、文章一样，发表我们的文章。我们已刊登了他们许多反华文章，彼此对等，他也应当发表我们的答辩。只提这个问题。估计他是不会发表的。但是，我们的复信发出后，估计赫鲁晓夫会非常恼火。因为我们发表《九评》，挖了他的老底。现在我们再把复信发出去，估计他会跳起来，赫鲁晓夫个沉不住气的人，一触即跳，很可能他会铤而走险。但是，复信定稿以前，要请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回来开会讨论。关于可否考虑左派各党在一起交换意见？这个问题关系比较大。现在要慎重考虑。因为国际会议开不开，还是未知数。苏共现在把中苏两党会谈同筹备会议、国际会议脱钩了。如果不是为着筹备国际会议，那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干什么呢？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苏两党不会谈，大家到筹备会议里去争论。他们拿出一个纲领草案，我们拿出一个纲领草案，双方对着干，这样的话，估计筹备会议也开不好，也就是说国际会议也开不成。所以这个问题要多考虑考虑，再想想看。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要对反修斗争的形势作通盘考虑。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对于国际会议，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激他开会，激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但是，估计赫鲁晓夫不敢开，至少最近不敢开，也可能只开筹备会，不开国际会议。我们可以用点儿激将法，让他犯错误，犯下去，犯到底。这样他就更加暴露，更加被动，更加遭到反对，会有更多的人反对他。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二、赫鲁晓夫要召开分裂会议遭到许多党拒绝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孤注一掷，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二十八日发出的信，他三十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下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等你们两家（朝鲜和越南）发表声明以后，我们也发表声明，支持你们两家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二十六党筹备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关于把我们拒绝参加分裂会议的立场通报有关的左派党问题，恐怕要政治局正式讨论一下再决定，现在还不忙，等到回北京在政治局会上正式做决定。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苏共定在十二月召开筹备会议，是让它开成好，还是开不成好？有些同志觉得，要使他们开不成，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反对开会。依我看，还是要他们开成好，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么一张王牌，经常用来吓唬我们，那个会议一开，他们手里就没有什么牌了。大概现在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这几个党反对召开国际会议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新西兰，一共有七个党。

还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赞成开会。据说，陶里亚蒂为这件事专门到苏联去。当然他身体也不好，要在苏联克里米亚休养。他先是跟苏共中央的一些同志会谈，是跟苏斯洛夫还是谁，不大清楚。他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后来他说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而且他还准备了一个谈话提纲。这个提纲后来发表时叫做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意大利党的意见是不赞成开会。大概一方面因为这个事情跟苏方吵得很厉害，一方面身体也不大好，陶里亚蒂很快在苏联去世了。现在意大利党还是坚持陶里亚蒂的方针，不赞成开会。这就引起了本区一些党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因为陶里亚蒂在本区的影响比较大。北欧一些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动摇，不那么坚决反对，但是也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团结的会。欧洲党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有利，这可以使赫鲁晓夫在决定是否开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

我的意见还是让赫鲁晓夫召开会议好，那样他最后一张牌就打出来了，再也没有什么牌好打了。因为开会无非是开除中国党，像斯大林主持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那样，这是公开分裂，责任完全由赫鲁晓夫承担。现在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形式上的团结，但实际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距离分裂只隔一层纸。我们的方针就是让赫鲁晓夫自己去戳穿这层纸。

关于何时爆炸一个核装置的问题，主要看准备情况，不要勉强，要一切都准备好，万无一失，然后爆炸。不要抢时间，宁可在国庆节之后，甚至推迟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可以，不要匆促行事。

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一共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千多外国贵宾，来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其中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了代表，一些兄弟党也派了代表。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

毛雷尔说：这次来华时，路过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辩论了五个钟头。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开国际会议，坚持要在十二月开筹备会。到北京以后，跟朝鲜、越南和波兰代表团都谈了话，都谈得不错。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党的谈话比较困难，

德国党同志劝我们参加十二月的二十六党会议，结果吵了起来。

毛泽东说：跟德国党同志可以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谈，跟他们争吵不好。乌布利希处在第一线，对面是西德，东柏林对面就是西柏林，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苏联要跟西德谈判，乌布利希不高兴。我们支持乌布利希。现在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硬要二十六国党代表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报到，这种事情简直是以老子党自居，发号司令了。我们说，你开吧，我们不到，会议是非法的。

毛雷尔说：我们党已经通知苏共，路过莫斯科也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不参加十二月十五日的会议。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软体动物，许多人起来反对他，他会软下来的。几次都是这样子。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就是这样子。他也有这一面，蛮干的一面。比方说，我们劝他不要公开论战，他不听，他说这是列宁的方法，他硬干了，公开论战了。我们不知道劝了他多少次，他不听，还是干，还是公开论战。他认为这样对他有利。你看，适得其反，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这几年来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得越来越远了。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是很凶的，特别是在“22大”上，那时达到顶峰了。他在那次大会上公开攻击你们阿尔巴尼亚，发动了公开论战，这是他的顶点。“22大”以后，他就走下坡路了。虽然现在还有几十个党跟他走，但他们内部不一致，四分五裂。反动的国家、党派和集团，他们内部的矛盾会导致他们垮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比如希特勒，还有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墨索里尼，他们和英、美、法这三个帝国主义之间，是矛盾重重的。他们都大喊大叫反苏，但最后他们先打谁呢？是不是先打苏联呢？当然，希特勒是打了苏联，意大利也跟着打了苏联，但是他们首先打的是英国和法国，日本首先打的是美国。这三个国家在第二世界大战中都垮台了。所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以导致它们之间打仗，可以导致一批帝国主义垮台。依我看，赫鲁晓夫的情况也不妙。他要十二月开筹备会，可能开成，也可能开不成，但是两种可能性对赫鲁晓夫来讲，都是灾难。开不成当然脸上无光，讲了话不算数，这当然是灾难了。如果他开成了，依我看，这个灾难更大一些。十二月会议开成之日，就是赫鲁晓夫走进坟墓之时。我们的方针就是等他开，激

他开，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集体措施”呀，断交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呀，以至出兵呀。让他把所有的法宝都抛出来，那时他就跌到阴沟里去了，垮台了。当然，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但是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一九六二年他就在新疆把我们几万人胁迫到苏联去了。在边境挑起冲突可能不可能呢？那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切我们都准备着，准备他使尽一切法宝，自己一步步走向坟墓。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秘鲁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声明，批评苏共领导拒绝耐心准备世界共产党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印尼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联合声明：反对召开导致分裂的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日本《赤旗报》反对召开分裂会议的社论。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朝鲜劳动党《劳动新闻》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反对召开分裂会议，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社论。

三、赫鲁晓夫下台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根据苏共中央批示通知中共中央：今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个核装置试爆成功。同时，苏联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

贰、本节简论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

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个核装置试爆成功。同时，苏联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壹、本节概述

一、从“一肯二看”到“一推二看”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今后苏共领导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一九五七年。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有七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十一年了。他搞了十一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

第二种，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够坏了，再坏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十二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也比较小。

第三种可能性是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搞修正主义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可以这样估计，但是究竟如何还得看一看。因为从十五日以后陆陆续续收到的西方传出的消息和苏联报纸的反应看，还看不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内情如

何，将来究竟有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静观”两个字，就是说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动，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有些党拥护苏共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有些党说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有些党表示要推迟开国际会议，也有些党提出还是要开国际会议；有些党虽然不那么明确，但是也隐约地表示还是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有些党则要求有所改变。

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活动。按照惯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节，我们虽然也派代表团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团去。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恩来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师跟总理一起去。

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但是这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苏共领导的这批人，还是在赫鲁晓夫当第一把手的时候提拔起来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过去很多决定也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面发展。从大局看，这比较有利。现在是到推的时候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我们主动派代表团去还不够。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十月革命节。

为什么要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考虑去，请越南考虑去，请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

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我们这种友好的姿态，不但我们国家的人民，而且苏联人民，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会高兴的。因为吵架吵了这么久，老吵下去也是人心惶惶。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可以摸摸情况，比方说，问问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打倒，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究竟有那些错误。

关于具体问题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不可能。他不会答应什么东西，主要还是注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如果他们主动提出来推迟召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还是推迟好，但是具体日期不要跟他们敲定，而应提出要征求所有兄弟党的意见，要协商一致。筹备会议的成员也要同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苏联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可以原则同意，但日期另行商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主动提出。因为苏共上一次来信就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且苏共过去提的中苏两党会谈，不是同准备国际会议挂钩。所以我们艰苦既不主动提，也不确定日期。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

方面走。

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做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我们派出总理和贺老总去，就是射出炮火。你们到莫斯科，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总而言之，这次我们不带什么方案去，也不准备在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敲定一个什么方案，中苏两党会谈如此，国际会议也是如此。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我们对苏共领导后退一步，就是暂停公开论战，看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再反华，那我们就有理由再跟他们论战。如果现在继续公开论战，就不得人心。如果现在我们对他们还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我们现在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不得人心的。现在不仅两国人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人民，还有像苏加诺、西哈努克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主张和好。所以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如果他们跟赫鲁晓夫一样反华，那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们公开论战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现在还继续公开论战，这就不策略了。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现在要节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暂时不忙公开论战。

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〇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他还把我看做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跟他是什么时候吵起来的呢？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底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控制中国，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就是想把中国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舰队，所谓中苏共同舰队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舰队，这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跟波兰吵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什么呢？也是批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波兰。后来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又跟艾逊豪威尔搞戴维营会谈，要中国服从他联合美国的外交路线，要中国释放美国罪犯，要中国让台湾独立，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都让我们顶回去了。

那里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求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20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是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20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切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

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就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当然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的同情。

总理这次带代表团去，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希望。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主要是这样的目的。这也就是主动中带有被动，被动中带有主动，这么一个辩证法。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希望他们有所进步，又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了解苏共领导在上面说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不主动提出询问和方案，静以观之。总之，既要积极主动，又谨慎持重。代表团可以根据中央这几次讨论的方针相机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紧急的情况可以打电报回来请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贺电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二、抗议苏修集团的新挑衅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从这个报告（勃的报告）的摘要可以看到，苏共领导是虚弱的，是胆怯的。所以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线，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他只讲必要性成熟，但没有讲要在十二月十五

日召开筹备会，当然也没有讲筹备会议有哪些人参加，也没有讲苏共过去提出的明年年中要开国际会议，也没讲中苏两党会谈，这些都没有讲，含糊过去了。看来，他们扳倒赫鲁晓夫，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满，最后仓促做出决定的，并没有清理赫鲁晓夫一系列错误更不是因为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把他赶下台。

苏共领导现在处于惶惶无主，究竟下一步怎么样做，看来还没有明确的、大家一致赞成的意见，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一个有纲领、有步骤、有方法的意见。

我们过去讨论过究竟这次扳倒赫鲁晓夫的核心人物是谁，现在还搞不清楚，要看代表团在莫斯科现场观察怎么样。当然，人的问题不是唯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主席团这个集体是执行怎么样的路线。看来他们现在惶惶然，六神无主。赫鲁晓夫是拉下马了，那么他们自己当家怎么办呢？还没有一套办法。因此，不可作这样的估计，即苏共新领导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稍有改变，但基本路线不变，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我们要继续看。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晚，在莫斯科的庆祝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贺龙当即气愤地回答说：我们党的情况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根本不会实现的。当时在场的苏联将领崔可夫元帅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了苏方的这一严重挑衅。周恩来当即严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决不能同意。为什么在这种友好的庆祝会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件？勃列日涅夫说：这件事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恩来回答说：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请苏共中央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八日，在常委会上讨论代表团的急电时，毛泽东说：

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代表团现在在莫斯科就采取攻势，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抓住这件事放手进攻，因为理在我们这边，他们公然要干涉我

们内政，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

对了，（颠倒敌我）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对敌我关系怎么处理，对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样，对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这是赫鲁晓夫的根本问题。看来苏联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问题还弄不清楚。他们一心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共领导集团还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说的话正说明他颠倒了敌我关系。以后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可以狠批他们颠倒敌我关系。

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这件事情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们还继续搞赫鲁晓夫的路线，概括地讲，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什么召开兄弟党会议就无从谈起，中苏两党会谈现在更不要提了。公开论战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节一过，代表团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发表论战文章。

三、新的情况新的方针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在常委会讨论中苏代表团第一次会谈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苏共领导集团像法国的拿破仑王朝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厉害的是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二就不行了，拿破仑第三更不行了。

看来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困难。在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过去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原来只有一个罗马尼亚出来反对他，不赞成开会。现在又出来一个哥穆尔卡，他主张开会就要开团结的会，也就是不赞成开过去赫鲁晓夫主张开的那种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会。不仅有哥穆尔卡，还有乌布利希，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对付西德的复仇主义。他话里有话，因为不久前赫鲁晓夫跟西德搞得很热乎，甚至派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西德，乌布利希对此非常不满，所以提出共同对付西德。

这样算起来还有三个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还没有对召开兄弟党会议表态。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劝告苏联不要从匈牙利撤军，应该支持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对这一点，匈牙利同志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说，要反华，要把中国开除出去，估计匈牙利是不会赞成的。这样看来，积极支持苏共领导搞分裂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可能还有蒙古会支持他们，但也不一定，因为蒙古跟我们比较近，中苏关系紧张对蒙古也不利，不会对反华采取积极态度。所以苏领导处境比较孤立。

我们没有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三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赫鲁晓夫就是害怕公开论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坐不稳了。想通过罗马尼亚来骗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想抓救命稻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处境很困难，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但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垮台。我们七月底发表《九评》，八月，九月，十月，只有三个月，他就垮台了。我们不过发表九篇文章嘛！他们连篇累牍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现在证明，三月间我们坚持一下，还是继续批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抵挡不住，倒下来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公开论战这一点绝对不受约束。这当然不是马上就要发表文章，还要看看什么时候发表合适。要抓新的辫子。你不抓新的，老翻赫鲁晓夫的陈帐，那就不行。我们要抓苏共新领导新的反华议论和行动，抓住他们的要害，继续论战，促使他们内部起变化。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是坚持过去那个立场，这在我们八月底的信里讲了。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在中苏最后一次会谈中，苏方表示：苏共二十大至

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

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回到北京。在交谈中，毛泽东说：

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以后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否则别人不会同情。因此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先骂他。但是，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下台时谈及赫鲁晓夫的错误的文章，我们还可以转载。因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事件，发表议论完全应该。何况赫鲁晓夫攻击了这么多兄弟党，人家当然有权回答。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莫斯科已经去过了，也向他们表示友好了，总不能说我们僵化吧。你看，我们派了总理率领这么大的代表团去，又发表了贺电。不仅勃列日夫、柯西金他们上台时我们发了贺电，而且十月革命节也发了贺电，这两个贺电都比较热情，比较友好，是讲团结的。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们已尽到责任。我们这次去，推一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但这不能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至少，我们走这步棋可以得到这么一点收获。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

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中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说：

现在情况很复杂，对苏共新领导的动向还不那么清楚，谁是主要人物也不清楚。西方宣传报道说，现在苏共新领导是三架马车，就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这三架马车。

公开论战可能暂停一下。他们害怕我们不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不受约束，不宣布我们停止公开论战。什么时候需要公开批判他们的错误，就什么时候公开批评，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看来他们所说的“集体措施”就是要在会上做反华决议。

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说连细小的问题都同赫鲁晓夫一致，既然如此，那同他们会谈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中苏两党会谈，苏方原来说五月就开，我们不同意，说改在十月开。现在看来明年五月也太早。究竟要推迟几个月或几年，还要看一看。

亚洲兄弟党已公开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十二月筹备会议，可以到那时看他们怎样动作再说。

阿尔巴尼亚党是决不参加十二月筹备会议的。罗马尼亚党表示，他们也不参加，也不赞成我们参加。这两个党的态度很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是强硬派，我们不怕苏共召开十二月会议。最好他们开，最好他们如期在十二月十五日开，离现在只有一个月。看来到那时他们可能开不起来。

我们的方针也是坚决反对，而且我们已经公开宣布。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说了话不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我们现在不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苏共新领导，这样做不得人心。我们要等苏共新领导发表像一九六三年七月《公开信》那样的文告，或者做出公开反对中国的决议、报告，像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全会那样，我们才给予公开答复。我们现在要偃旗息鼓，像打仗那样，两个战役之间要有一段时间休整。而且他们自己内部也还在争论不休。所以亚洲兄弟党要继续观察，看苏共新领导怎样变化。

现在是不是可以肯定这样几点：

第一，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派了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庆祝十月革命节，表示了友好和团结的愿望。

第二，暂时不发表批评苏共新领导的文章。这是指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至于

其他兄弟党的文章，我们考虑还是要发表，因为还有一批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第三，我们还要看一看苏共新领导的表现，至少在苏共召开十二月会议之前要继续看。

第四，对十二月会议，我们的方针不变，坚决反对他们召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定稿《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并于二十一日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发表，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贰、本节简论

这里借用红旗杂志社论的一段话：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它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覆灭，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同理，其他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必将步其后尘。

2011年5月4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壹、本节概述

一、不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他们规定：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筹备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决定：仍然坚持过去我们对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他们违反协商一致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因此不必答复他们，也不发表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由苏共策动的拉丁美洲九个党（古巴、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组成一个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劝说中国停止公开论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会见拉丁美洲各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世界上那么多党骂了我们，骂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只回答苏共的《公开信》，而且才写了九篇文章。苏共还有许多重要的决议、讲话也都是反华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所以公开论战不能停。过去，你们好些党也跟着苏共骂我们，我们也有权利来回答。你们骂了那么多，那么久，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你们可以自由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呢？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自由辩论的权利呢？

停止公开论战就是不行。我们要答辩，而答辩这么多的指责时，一天不够，一个月也不够，一年也不够，一百年也不够，一千年也不够，索性讲得彻底一点，九千年我们都回答不完，要回答一万年。凡是批评过我们的，我们都要回答，包括你们在座的批评过我们的这些党。我们都要给你们回答。

你们说公开论战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那么我们要问，你们公开批评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我们的公开批评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现在我们来回答你们的批评，你们却说我们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这个道理吗？

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不管开二十六个党会也好，开六十个党的会也好，八十一个党的会也好，我们统统不参加。因为这是苏共片面决定的，没有跟我们商量。苏共新领导决定的东西，跟赫鲁晓夫不同的只是改头换面。召开那样的会议，就是分裂的会议，我们决不参加。我们怀疑你们是受了苏共的委托到中国来做说客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的话我们不能接受。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参加有三百万人参加的集会，抗议美国轰炸越南，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在会见路过北京的柯西金时，毛泽东说：

一九六二年我跟契尔沃年科夫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一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那一天才能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

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公开信》那种论战，也赞成去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作报告和做决议那种论战。不要搞那些不痛不痒的论战，不痛不痒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你们说你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

者”。如果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争论了。对于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都要反，有多少就反多少，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少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争论总是会有的，但是也会讲和的。我们同住在一个地球上，你看吧，不要多少年，我们的关系也可能会改善。说一万年、九千年是讲得凶一点，“教条主义”就会说这些话，而你们是不会说这些话的。

我非常欣赏这个词（指教条主义），这顶帽子戴定了，脱不了了。这是别人给我戴的。其实我冬天出去，到室外都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群众大会，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

你在五日、六日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三月一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开，就应该这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们又说要改在今年三月一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这个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

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三月一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三月一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

起草委员会那个名字也不要改。你们制定纲领也好，不制定也好，你们就去开会吧。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不参加就是了。

你们去年七月三十日的那封信里面就是那么说的，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你们十一月二十四日给我们的要在今年三月一日开会的那封信也是这样写

的。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吗？这两封信不是你们写的吗？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不是赫鲁晓夫干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搞得那么绝，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会都不能开。这个问题只有你们跟阿尔巴尼亚去解决，解决了就可以开会，不解决什么会也不能开，你们要开我们就不参加。我建议你们取消过去对付阿尔巴尼亚那一套。如果你们真的要开会的话，就取消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说这么一句就行了。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开会，你们就得取消前年七月十四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二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那个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

过去你们把赫鲁晓夫说得那么好，说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他这个这样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撤职了呢？这位赫鲁晓夫同志有什么不对的么？

我们现在就发出邀请，邀请赫鲁晓夫到北京来。你们主席团能不能答应让赫鲁晓夫到北京来？我跟赫鲁晓夫辩论，行不行？他不代表你们党吗？他过去代表你们党，做了许多好事情，这都是你们过去说的，你们“20大”这么说，“21大”这么说，“22大”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去开会好了。你们是多数，又很有理由。你们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我们不过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就是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去干什么？而且我们又是“好战分子”。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这些“好战分子”怎么能够去开会，怎么能够团结？你们自己开好了。

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能团结起来，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

这个问题不要一千年，大概十年、十五年以后形势可能紧张起来，世界上没有什么缓和。我们天天说争取缓和国际局势，实际上国际局势天天都在紧张。如果能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就好了。我们双方到十年、十五年以后会团结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

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要是完全分裂，我们还能招待你吗？我们不招待美帝国主义，我也不接见英国的什么贸易大臣、什么英国代办之类，我一概不见。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要真正达到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至五日，苏共召开了“协商会晤”，总共只有十六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三月十日才发表会议公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二、不参加苏共“23大”

一九六六年一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参加将在四月间召开的“23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讲了许多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在召开三月分裂会议之后，他们更是不指名的攻击我们党。这些都表明他们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理直气壮，只是说明他们内部有困难需要这样做。他们那么怕我们，是成不了气候的。我们暂时可以置之不理，把子弹储存起来，对于他们老一套的修正主义的反华言论，我们采取评《公开信》的形式已发表了九篇评论。对苏共其他决议、报告、讲话、文章，我们还没有答复，我们已声明保留答复的权利。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腔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些新东西，才考虑答复。那时不但要答复，而且还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转载。

还有一个月他们才开“23大”，还有时间从容考虑，我们如果不去参加，是不是要通知其他兄弟党，到时候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越南党已答应参加，估计朝鲜党也会去的。如果我们决定不参加，可以通知他们，也可以不通知他们，这个问题还有时间考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23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

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我

们不去参加，无非他们在会上大反华，这正合我们的需要。右派去参加是不成问题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有的是想去的，有的想去又不大愿意，还在犹豫不决。左派兄弟党中，估计越南党是会去的，因为他们需要苏联援助。朝鲜党怎么样？可能去也可能不去，看来他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不参加就行了。此事可以告诉阿尔巴尼亚，也可以告诉朝鲜和越南。对其他兄弟党是否通知，大家可以议一下。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国际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

贰、本节简论

当时的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在反对苏联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当时作为总书记，具体负责领导撰写批修文章的工作，并且多次参加、率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谈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可是，就是这个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居然说：从 1957 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还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那些意识形态的你是非，不过是双方说了一大堆空话。字里行间透出对当年论点中的教条主义的反思。今天视之为空话的那些东西，恰恰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认识。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或者说毛泽

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相互激怒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又有四件大事……在这些事件的分歧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总是纠缠在一起。究竟是由于国家利益的矛盾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分歧恶化了国家利益的矛盾？或许兼而有之。”

这些话说得貌似公允，实质是也是攻击毛泽东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正义性，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开脱罪责。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中共也对其他党，尤其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基于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东欧国家刚刚露出来的改革趋向，对于西欧共产党寻求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道路尝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视之为修正主义。

利用中苏论战问题攻击毛泽东最猖狂的，还是那个辛子陵。他在《全卷》中说：“毛泽东发现，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可以转移全党全国人民对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从积极方面说，树立自己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这场大论战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互争领袖地位的大论战”。（下册，第 458-459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错误论断：

该书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关于这篇文章，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说：“《三评》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做了分析，同时根据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1961 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 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三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现在看来，《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准确，有些提法是过

分了，不过评论中所提出的国家性质和平演变的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吴的这本书完成于一九九九年，离《三评》的发表已经有三十六年了，因此，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在，离《十年论战》的出版又有近六年了，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

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所做分析，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这一点是否正确？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该书对这些论点都是否定的：说它们“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而且认为它们“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但是，今天的历史实践告诉人们什么呢？南斯拉夫联邦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作为一个国家它还存在吗？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和变质，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和平演变，不能不说是两个最根本的原因。实践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

该书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其一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否正确？表面上看，该书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实际上，对这个认识是有保留的，甚至认为是不正确的，这一点，从下面接着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其二是，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样做是否正确？这句话也非常含糊。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毛泽东用这个观点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错误的。另一种解释是：毛泽东用这个观点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正确的；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错误的。实际上，在该书的作者们看来，至少，毛泽东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是错了，因为在中国

内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由此也就根本不存在它的产物——修正主义，由此也就根本用不着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也就不会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当然，应该承认，与现在比较起来，当时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下，国内的资产阶级因素确实是在泛滥和增长。

该书说：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又说：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这里说的“十五条”指的就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一文的最后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共归纳为十五条。该书对这十五条，虽然也承认其中包含有合理因素，说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从整体上对这十五条加以否定。下面具体看一下，它肯定了什么，否定了什么：

第一条，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就不能够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条，它是肯定了的。 第二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

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还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这一条，它是坚决彻底否定的，认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人们希望看到，这些“理论家”们，对上述观点作出具体的批驳，究竟它错在哪里？ 第三条，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这一条，它也是否定的。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这些人为什么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加以反对？ 第四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这一条，它当然也是否定的。他们从来就反对“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条，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已经不存在阶级了，为什么还要强调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呢？！

第六条，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七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这一条，它是肯定的。而且还认为说得不够。 第八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没有强调发展私有经济。 第九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的方针。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这一条，它肯定了前一句话，否定了后一句话。 第十条，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干部是管理者，为什么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形成一种制度？ 第十一条，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不实行高薪制度就是搞平均主义、大锅饭。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这一条，它是肯定的。军队不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个党还怎么执政呢？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这一条，它没有明确肯定。大概也不至于否定吧？ 第十四条，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要三和一少嘛！ 第十五条，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应该始终贯彻反左。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人们对该书作者们的政治立场就更加清楚了。

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以上 15 条是在当时激烈的公开论战中间提出来的。虽然其中某些观点还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总的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观点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特别是他提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谁战胜谁的问题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他还提到，在这中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

平演变。如果我们不注意反修防修，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些观点有着深远意义。”

“他提出的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反修防修，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都是根据苏共“20大”以来，而且不仅是苏共“20大”以来，还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如果说在1956年毛主席根据苏共“20大”、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持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么，可以说这次发表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是1956年以来的反修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第三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包含了前两篇文章的观点，而且加以发展了。特别是跟苏共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赫鲁晓夫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总结怎么样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重大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这篇文章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揭了他的底，在国际上震动很大。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怎么样防修，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防止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些看法，人们很难抗拒。

勿须讳言，吴冷西也说过：“当然，这些观点中，有的是他在谈到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中国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囿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的观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

这只能说明，像吴冷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也难于摆脱历史的局限！

2006年8月18日初稿

2011年5月4日修改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第五章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壹、本节概述

一、艰难决策

一九五〇年四月间，金日成到北京，中国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

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

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

一九五〇年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

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〇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复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

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

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毛泽东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

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了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

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一九五〇年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

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上午，彭德怀从北京饭店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

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 B—29 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

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

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菲里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五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二、五大战役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和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第一次战役：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

志愿军渡江后，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

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

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了敌有利。

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

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结束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

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第二次战役：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

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

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志愿军占领咸兴，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志愿军收复兴南。

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第三次战役：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朝军队进占汉城。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中朝军队收复仁川。

“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

第四次战役：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一日。

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

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

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

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

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四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日。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

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五次战役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三、边打边谈

互相摸底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九五一年十三日，斯大林同高岗、金日成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

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

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公开倡议阶段。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进入会议议程谈判阶段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

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

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的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

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志愿军收复全部失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

（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

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

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在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课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

（这部分内容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

贰、本节简论、

抗美援朝胜利的伟大意义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2011年6月8日修改

第五章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壹、本节概述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也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的筹划准备工作。

一、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朝鲜战争。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共中央军委考虑准备攻打金门，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

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

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出现了美国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

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事态。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

一九五四年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

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

一九五五年二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以后，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派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大到两千六百人，美空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

二、中美大使级会谈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这个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使中国赢得了主动。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也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的意愿。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

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政府，也始终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某种表示。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转达以下口信：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是由国际上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也是一九五四年以来东南沿海斗争的一个成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开始，起初进行得比较顺利。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在第十四次会谈中就两国平民返回本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协议的声明。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国政府公布日内瓦会谈情况，并通过印度向美国表示，如果再不解决问题，中国将另作打算。

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国政府宣布一项重大决定：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向美国十五家新闻机构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记者来华作一个月的访问。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第七十三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通知中方说，他已经调任驻泰国大使，美国政府已经委任他的副手马丁参赞为美方代表。这是美国设置的一个障碍，想通过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级别，使会谈陷于停顿。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中方催促美国政府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方再次催促美国政府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了大使级会谈长期陷于停顿的经过。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

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一日，杜勒斯就中国政府声明发表谈话。他宣布，如果中国同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它的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中国限期指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最后通牒”低头。

三、美国纵容国民党当局向中国大陆和沿海骚扰破坏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将会去防守沿海岛屿；那就是，如果这些岛屿的防守看来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守有关。”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要让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知道，“他们并没有被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利益的政治协议，随着他们进一步获得自由，衷心的欢迎和新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五七年五月，美军公开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声称：“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一九五七年，台湾海峡局势重新紧张起来。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鼓励下，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增加兵力，

四、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铁道兵承建的鹰(潭)厦(门)铁路正式通车，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

一九五八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说：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七月下旬，尽管连降暴雨，空军部队仍然顺利完成了人闽转场任务。国民党军得到情报，立即派飞机频繁骚扰，企图趁我空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人闽空军果断迎击，在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

十四日击落击伤美制国民党军飞机九架，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的事件。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爆发革命。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美国的行径成为众矢之的，在世界舆论中激起一片反对声。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国民党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同时加紧军事演习和空中侦察，摆出反攻大陆的姿态。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到十八日，毛泽东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他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他设想，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的同时或者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

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对炮击金门作战作出部署。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

见见告。”

促使毛泽东推迟炮击金门，有各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事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不能不分出精力，来处理中苏关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他很自然地把这一情况同赫鲁晓夫秘密访华联系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台湾当局宣布，台澎金马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杜勒斯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关于伊拉克新政权，表示“要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一短暂政权的完结”。

美国国务院还向驻外使团发出《关于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要警惕苏中联盟的危险性。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二十二日，美国国务院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台湾海峡局势，作出三项决定：一、增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向台湾提供登陆艇、响尾蛇导弹、火炮和军需。这是“武”的一手。二、通过杜勒斯复函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摩根，向中国施压。这是“文”的一手。三、授权驻台大使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换文加以“澄清”，如中国大举进攻外岛，可以进行报复，但小型攻击不在其列。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凌晨一时，毛泽东看了广州军区十三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写批语给彭德怀：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还说：“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诚、叶飞、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陶勇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作战。

毛泽东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约见叶飞，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

叶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

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

叶说：避免不了。

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指示，就宣布休息。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说：那好，按计划打。并要叶飞在北戴河指挥。

当时调入福建前线参战的陆海空部队，共有四百五十九门大炮、八十多艘舰艇和二百多架飞机。一声令下，各路部队在八月二十一日晚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五、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三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岛上的大批军用设施被摧毁，通信系统被严重破坏。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轮（前一天已被击伤）。

这两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百分之五点五。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三十天。国民党守军情绪低落。

随后几天的炮击，巩固了“万炮轰金门”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炮击金门使美国慌了手脚，急忙调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第六舰队一部前往台湾海峡。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態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起，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其中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外电的关注。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前后，毛泽东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情况，严厉批评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他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

这个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的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不准主

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指示还指出：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一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益，也有有利的一面。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英美侵略军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

第五条，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

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更有利一些。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继续举行。在这次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总理针对四日杜勒斯声明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并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申明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第二,鉴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但是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并未因此减轻。

第三,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晚,赫鲁晓夫让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面见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这使赫鲁晓夫放了心。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受赫鲁晓夫委派来到北京,先后同周恩来、毛泽东会谈,进一步了解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毛泽东会见葛罗米柯时,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总理昨晚向苏达利柯夫谈到的中国方面的立场、策略和做法;同时赫鲁晓夫也准备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提出警告。他还通报了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信的主要内容。葛罗米柯对毛泽东说:周恩来的声明“是一个十分及时和很好的声明。我相信,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和赫鲁晓夫同志致艾森豪威尔的信,都会起到十分重要和应有的效果”。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比较满意。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清早，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要他本日上午约五六个人，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稿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并提出：“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要慎重行事，否则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并且强调：中国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朋友在中国遭到侵略时会随时援助它。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北京举行百万人游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总理的声明。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美国军舰为国民党海军护航，在金门料罗湾港口附近，国民党海军舰只遇到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时，美舰掉头就走，撤离了金门海域。

这时，美蒋在防御外岛问题上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美国人也已经看出蒋介石的意图。美国当局也看到，继续扩大事态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连忙对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做出回应。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十二海里，你到了七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

毛泽东提议把“绞索政策”发表一下。他说：“讲清楚这个问题，对人民有好处，对世界各国也有好处，对美国人也有好处。我说过，美国军队在黎巴嫩、

约旦，早一点退好，还是迟一点退好呢？它把军队退了，一身干净，又是好人了。它不退，还不是侵略者？众矢之的。金门、马祖这十一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回复胡志明八日来电：

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对于炮击金门会不会引发中美战争，毛泽东有清醒的估计。

六、打打停停——炮击金门的实施过程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告诉艾森豪威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国民党军应当撤出金门、马祖，或者作为前哨，仅部署少量人员。他认为，“蒋希望促成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序幕”。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在武昌写信给周恩来、黄克诚，嘱咐说：“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中方的这个方案，应当是一个争取主动并使美国陷入被动的方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中断了九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斗争从福建前线转移到了谈判桌前。会谈地点由日内瓦改为波兰首都华沙。中方的代表没有变，仍然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的代表换为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在会谈第一次的会议上，美方代表没有提出方案。王炳南提出中方的方案，建议双方共同发表声明，保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在台湾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争端，并就以下五点达成协议：

第一，中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

第二，美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第三，中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国政府将不予追击。

第四，中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

第五，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

然而，中方代表过早地提出自己的方案，给美方代表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中国政府急于解放金门、马祖，便想趁机抬高要价，态度再次强硬起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美方正式提出一个“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也提出要尽快“停火”。美国还动员北欧国家和印度等国，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停火”方案。

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安徽合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写信给周恩来，对谈判的指导提出建议。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于当天夜间致信毛泽东：

“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

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

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来信，晨四时，即复信周恩来：“十八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在联大的发言，指出：中国在金门、马祖并未同美国打仗，根本谈不上“停火”。中国惩罚金门、马祖蒋介石军队，属于中国内政，外人不能干涉。解决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是美国撤军。

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做一些国家的工作，劝这些国家不要上美国“停火”建议的当。

福建前线部队再次猛烈炮击金门、马祖，加大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金门作战方针提出建议，特别重申了“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毛泽东当天回复：“你九月二十二日三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

美国人见中国政府态度十分强硬，便又想主动摆脱僵局。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军队驻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些迹象表明，美国开始总结前一段的教训，调整对台政策，企图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从“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脱身”政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在会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

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时说：“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不要轻易让他溜掉！”

这是针对美国当局的“脱身”政策而作出的一个重要决断。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蒋介石在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急忙宣布：九月三十日杜勒斯的讲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早上八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要求福建前线部队暂停炮击，观察两天再说。他写道：“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黄克诚等写了一封信，说：“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

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应当由两国谈判解

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话了？

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一项命令

金门击炮，从本日起，再停止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

兵不厌诈，这就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划得清清楚楚。

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出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

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中国人逐步觉悟起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

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又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民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议。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太不高明。例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

金门海域，美国人不能护航。如果护航，立即开炮。切切令。

毛泽东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后来没有发表。

他写道：“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和谈，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毛泽东告诉他：“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夜，美国军舰又恢复了金门海域的护航行动。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个书面报告。报告说：“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十二时半起广播，连续二次，中外文相同。”“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

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三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

毛泽东当即批复：“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发布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为恢复炮击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命令。四时，人民解放军再次给金门国民党守军以惩罚性炮击。这次恢复炮击，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共产党恢复炮击金门的明显原因是要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明，只要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就能够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苏格兰人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人重新恢复炮轰金门一事表明“他们大概会停停打打。对他们来说，把金门作为一个使蒋和美国人发生纠纷和使台湾问题一直搞得火热的手段，要比金门落入他们手中更为有价值”。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杜勒斯到台湾访问，同蒋介石多次举行会谈。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了美蒋的矛盾。他们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中也承认：“这次磋商是安排在中国共产党人宣布他们要对金门实行停火的两个星期中举行的。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主要考虑那些原可有助于稳定一种实际的非战局面的措施。但是，在磋商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了他们的宣言，恢复了对金门的炮击。鉴于这些事态发展，这些磋商当然着重讨论了局势的军事方面。”杜蒋会谈公报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

美国的脱身计划就此破产。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

他还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

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隔日炮击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又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

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

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少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他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毛泽东对宦乡《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我们手里》的批示

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

问题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说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这部分内容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

贰、本节简论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于 1954 年 12 月 2

日签订，1955年3月3日生效。）显露出美国长期霸占台湾的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希望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以和缓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作出炮击金门决策的，正是毛泽东。这一决策绝非心血来潮，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酝酿和斟酌的。

炮击金门一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毛泽东的决策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美国先是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继而纵容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骚扰破坏，使台湾海峡再次出现紧张局势。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抓住时机决心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按照毛泽东的最初预想，是要通过炮击来封锁金门，最终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达到收复金门的作战目的。这是充分估计到美国插手阻挠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利用美蒋在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不给美国以武力干涉的借口，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

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逼迫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实现“一中一台”的图谋。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作出继续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集团手上、金马台澎最终一起解决的决策，利用美蒋矛盾，挫败了美国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的分析，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手里有三张牌。一张是保卫金马，另一张是搞“两个中国”，第三张是冻结台湾海峡。经过前一段的斗争，美国人收回了第二张牌。对第二张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蒋介石也不接受。至于第三张牌，由于蒋介石的强烈不满，美国人还不会马上打出来。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现根据目前的局势变化，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时不收回，今后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

从“两步走”改变为“一揽子”解决，这是对台湾海峡关系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炮打金门这段历史时，对于这个重大决策是怎样改变的

和为什么要改变，作了很详细很生动的说明：

“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信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并将它们交融于一体的一次重大行动，尽管炮击金门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但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对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适时地改变和调整部署，灵活运用策略方针，迫使美国不能不继续保持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外交对话渠道。事实证明，这场斗争对确保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6月12日修改

第五章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等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

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
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为印发杜勒斯演说重拟的标题，提要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
放心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
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
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
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
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
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
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
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
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
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
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
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
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

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2011 年 6 月 13 日修改

第五章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壹、本节概述

一、越南人民赶走法国侵略者

法国在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多年的殖民战争,越南等国人民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

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还说:“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的信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

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给胡志明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揭露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
周总理阅。你的报告（1）和各党派联合声明（2），均应就此问题（3）加以批评。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越南人民多年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英勇斗争已获得重大的成果。我深信：越南人民在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独立和民主的事业中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事业中越南人民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支持。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

1954年10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由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由于天灾连续发生和敌人长期破坏的影响，部分地区已面临饥荒，要求中国方面迅速救济一万吨大米，同时还要求救济五百万米粗厚布匹，解决今冬一百万人的穿着问题。

毛泽东批示：此件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祝贺越南政府还都河内的电报
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

果。祝越南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在巩固和平，实现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法国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权利；在越南，以北纬十七度为界，越南北方归越南人民共和国管辖。

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

一九五五年，法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美国乘机取代法国，用军事援助扶植亲美势力，特别是积极支持统治越南的吴庭艳集团，残酷迫害前据人员和其他爱国人士。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奠边府作战应注意事项给彭德怀、黄克诚的电报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祝贺胡志明六十五岁寿辰的电报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您的卓越领导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您数十年来所作出的光辉贡献，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也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

谨祝您在争取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黄文欢为胡志明访华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我提议：

为了中越人民亲密的友谊，

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胡志明主席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

为了胡志明主席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黄文欢大使的健康干杯！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十年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争取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进行了英勇和艰苦的斗争，并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不但鼓舞了一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并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敬佩。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祝越南人民在为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祝你们在巩固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与越南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批语

已与彭商定，由彭德怀、陈赓、韦国清三同志组织我方代表团为适宜，不要太多的人参加。粟裕同志有病也可不参加。彭为团长，陈为副团长。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平恢复两年多以来，越南人民又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越南人民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定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诚如大使同志所说，很久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就在兄弟般的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中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和发展。我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亚洲和

世界和平。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

“越南和平恢复以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这一切成就感到极大的高兴。

“越南人民非常渴望祖国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曾经并且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正当愿望一定会得到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一贯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进行着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和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为保卫印度支那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援，亲密合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般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贵同越南人民的友谊，并且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寿辰的电报

欣逢你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越南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致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

数十年来，你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越南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越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你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

我们衷心地祝贺你健康和长寿。祝你在领导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争取越南和平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在 1945 年 8 月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又遭到法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越南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周围，进行了九年英勇抗战，终于打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越南北方的解放。越南人民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

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解放之后，越南北方人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越南北方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8—1960 三年计划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指标而奋斗。我们深信，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一贯维护日内瓦协议，为和平统一自己的祖国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美帝国主义一直控制着越南南方，竭力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但是它的这些罪恶活动正在激起越南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并且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发展同亚非和平中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一切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赞扬和支持。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庆祝光荣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庆祝越南人民在十五年中取得的辉煌的成就。我们衷心地预祝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预祝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三、中国人民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越南南方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

一九六一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

一九六二年，美国成立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加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镇压，并且准备袭击越南北方。

为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十七年来，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展开爱国竞赛运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斗志昂扬地执行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并祝越南人民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履行 1954 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和侵略，已经激起全体越南人民的无比义愤，并且遭到越南南方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我们再次重申，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南越、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四、中国人民支持越南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

中国政府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北部岘港登陆，准备随时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并且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开始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国的政策。（1966年4月10日他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时，重申了这个政策，并说明这几句话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同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

周恩来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决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 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 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做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的批语

外交部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印发的文件《越南南方领导同志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有三件：一、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长山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二、越南南方中央局副书记、中部地区书记武至公一九六五年三月和四月两次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三、武至公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全文（一九六五年六月整理）。这个谈话全文包括十二个问题和两个附件：（一）南方革命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二）人民武装力量情况。最后是记者附注的情况，其中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战斗力和供应情况等。

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阅，退毛存。

记者附注中说：中部中区山区主力部队供应比较困难，山区地广人稀，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不富裕，很少副食品，不种蔬菜，战士们一般没有副食吃，白饭加盐巴（盐每月每人供应半公斤，从平原运盐进山全靠人力背，很困难），有时吃些野菜（因为人多，野生东西也很快吃光了），营养不足。战士们常年露营森林，雨多潮湿，日夜温差大，没有房屋、吊床、雨布过夜，蚊子特别多，许多战士没有蚊帐。由于营养不良，蚊虫猖獗，战士们发疟疾很多，预防和医治的药品又

很少。按规定战士每年供应一套衣服，但有些部队不能保证。这样，使战士们的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

毛泽东阅后批示：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物资去。并要大量地送。

贰、本节简论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和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2006 年 8 月 28 日初稿

2011 年 6 月 21 日修改

第五章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居民越境前往苏联事件

一九六二年初，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

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

“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

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

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二、中印边界问题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

一九六二年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

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

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是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三、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中央军委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

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

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

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

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

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示》说，据判断，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起一次登陆行动，妄图在大陆建立一个反革命根据地；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的这次军事冒险，对我进行试探。《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备战，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阴谋得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

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贰、本节简论

关于这一段历史，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

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 “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本篇根据《毛泽东传》编写）

2011年6月21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二篇

上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二篇目录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册）

目录

概 述	3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0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10
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34
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54
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66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1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 发出“5·16通知”	81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制订“十六条”	100
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36
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 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两个十条	158
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183
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262
第七节 各省区市文革运动开展	298
第八节 部队院校文革运动开展	352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374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374
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410
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60
第四节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72
第五节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79
第六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509
第七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530
第八节 解决陶铸问题	577
第九节 批刘保萧保帅	62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二篇概述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概述

第二篇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一九六五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青年和人民群众愤起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立起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的伟大胜利。

这个回合的斗争，历经四年，打破右倾和极左的各种干扰，其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把一九六四年以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潮，引向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是“罢官”，它攻击的目标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罢了彭德怀等人的官。对吴晗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一九六二年以来党内刮起的右倾翻案复辟风的反击。

与此同时，因安装窃听设备、违反政治纪律撤销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因反对突出政治、违反组织纪律撤销了罗瑞卿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职务。消除了这两个要害领导岗位上的隐患。

彭真、陆定一一九六六年二月抛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若干问题的提纲”，压制左派，保护右派。与此相对立，中共中央批发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中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批判陆定一包庇妻子严某某写匿名信攻击另一个中央领导人及其家人的严重政治错误。

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在县以上各级领导人及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中进行。

第二阶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重要通知，通报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号召全党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种人不仅在党内有，在政府里、军队里、文化界里也有。以这个“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全国正式开展起来了。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学校的师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批评本校领导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通过广播以后，在全国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学校的师生都贴大字报、召开大小会议，批评本校及上级领导人的错误。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在风起云涌的群众浪潮面前，惊慌失措，立即向大专院校以及一些中等学校派遣工作队，力图控制群众起来革命的势头。工作队进驻各单位以后，一方面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单位的领导和教师，把他们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小三家村”；另一方面对准那些给领导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把他们打成“黑手”、“右派”、“反革命”等等。仅北京一地，打成各类分子的就有近万人。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搞白色恐怖，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回到北京，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回工作队，让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进行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接着，召开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批判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执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改选政治局，撤换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日常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十余次接见全国串连到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总数达上千万人。真正起到了广泛支持动员群众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迅速发展。原来在刘少奇时期受到打击压制的人，联合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批判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和各级领导人，要求公开平反道歉、退还“黑材料”。这一派人自称革命派、造反派或革命造反派。这一派人在各单位开始只占少数，又常常被称

为少数派。另外一些人在刘少奇时期曾经跟着本单位的领导、工作队，批斗过本单位的“小三家村”、“黑手”、“右派”，一时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并没有错，都是“听党的话”、“按照领导的布置办事”。与造反的一派人形成对立，这一派人自称左派、革命派，而对方则称之为保守派。这些人都是工人、贫雇农和革命干部子女。其中，在大中城市，有少数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批判走资派的时候，被人视为“黑帮子女”，他们自己也变成保爹保妈派或逍遥派。大多数人站在中间，随着形势的发展，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左右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或坚定的保守派。

随着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运动的兴起，在青年学生的影响下，中央各机关，各省市以及各部队的领导机关、院校、文艺团队的文化大革命也高涨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些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也起来了，一些工人跨单位、跨行业地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打出各种旗号，进行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形势：第一个特点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群众一片批判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派的声浪中，顶不住了，消极逃避，群众要干啥就干啥；第二特点是，在一部分群众中滋长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要钱、要物、要增加福利、要增长工资，临时工要求转正，下乡青年要求回城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发出倡议：从走资派手中把领导权夺回来，建立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与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三结合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山东省等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经中央批准先后成立。史称一月革命风暴。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的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一贯思想保守，对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经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帮助以后，要他到下边去多走走，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七月

在一九六七年初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毛主席曾经预计：文化大革命只要经过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就基本可以完成了。

可是，在中央的另一些领导人看来，当时的形势不是好得狠，而是糟得狠。他们首先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煽动军队干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纵容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祸及他们的家人子女。然后，由林彪亲自出面把江青找到毛家湾，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军委会议上发言抹黑军队，是由江青支持指使的，并声言要到毛主席那里去辩明是非，否则将辞去一切职务。最后是四位元帅和三位副总理，利用在怀仁堂举行中央领导人碰头会的机会，在会议上公开发乱，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中央文革小组搞错了。

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支持各地的军区领导人镇压起来革命造反的群众，较大的事件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内蒙的“二月黑风”事件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事件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事件

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武汉解散“工总”事件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事件

广州解散省革联事件

长春瓦解三大造反组织事件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事件

等等。

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其危害达到顶峰的是武汉七二〇事件。

二月逆流造成的危害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造成的大好形势被破坏了，从二月到七月，除北京市以外，再没有一个省市区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

与二月逆流的斗争，是与彭真、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之后，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重要斗争。

第四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武汉七二〇事件做了恰当地处理，从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大好形势下，有部分人头脑发热，提出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与一小撮军队里的走资派的矛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为此要进行全国再次大串连，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北京大专院校的“五一六”革命造反司令部甚至认为周恩来就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提出要揪出仍然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周恩来。在这股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发生了包围中南海，揪斗刘、邓、陶的事件；进驻外交部，夺取中央的外交大权的事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等等。

这种极左思潮一出来，就受到了党中央的批判，指出这种思潮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把大好的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犯错误的人推到敌人那一边去。党中央迅速地宣布：所谓的“五一六小集团”是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组织。从而使它迅速瓦解。同时，对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犯有错误的成员，及时作了清理。

一九六七年九、十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省市，指出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运动前进的关键在于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群众要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地的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经过党中央艰苦细致地工作，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迅速建立起来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江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省、广东省、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十四个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

第五个阶段：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所谓的“杨傅余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杨成武，傅崇碧和余立金是稍带进去的。杨成武的“问题”在于：杨在毛主席南巡中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杨有意与林彪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与其他军委领导人保持暗中联系。杨在与林彪、江青的关系中，注意两边讨好。一九六八年初，杨成武因他女儿的问题，有意拉拢余立金，压制吴

法宪，而没有报告林彪。从而引起林彪更大的怀疑，担心杨成武成为江青在军队中的代理人。林彪因此向党中央提出杨成武与余立金、吴法宪的关系问题，认为杨成武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秘书长一职。

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反复讨论，在没有搞清林彪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要林彪，舍弃杨成武”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当时的领导人因这件事而讲的杨成武的所谓错误，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而不是事情的真相。

在这件事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国要注意反对“三右一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

当时，在全国仍然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人，还在那里搞武斗，抢夺武器，抢劫军用物资，杀人放火。中央三令五申，有的人就是有令不止。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召见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严厉批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派仍在大搞武斗的行为。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

在中央的有力干预下，各省市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迅速。先后有：安徽省、陕西省、辽宁省、四川省、云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等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全国各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全部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六个阶段：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的叛徒、工贼、内奸问题审查报告》，通过决议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的过程以及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这一届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指政治局）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党的元老，原高级干部中转变立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阶段——斗、批、改阶段的开始。

2012 年 8 月 10 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137 万字

第一章 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江青在上海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吴晗的《海瑞罢官》，一九六〇年底写成剧本，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首次演出。江青看了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多次向毛泽东反映：《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评。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

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想找的人不愿意接受这项风险性很大的任务，因而不能组织起班子，只好到上海去找人。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研究，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从三月初开始动笔，文章写好了，江青送交给毛泽东审阅，并且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前后看了三遍，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毛泽东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对康生等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

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两天后，陆定一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指出：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

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

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当然搞四清好。”

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十月在北京讲的：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二、彭真阻挠姚文元文章传播并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人，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

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

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人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参加。

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文章。

显然，这是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所谓“学术争论”的歧途的错误方针。

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转达的彭真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

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对此极为不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发表戚本禹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人民日报当时发表这篇“简介”，用意仍然是要把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所谓“学术讨论”的范畴。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樵子的文章：《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学术上的缺点，但不是政治上的错误。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仍然是为了贯彻彭真的指导方针。

三、毛泽东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

他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

谈话后，彭真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

还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

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文章认为：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文章认为：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既可以表现它的不偏不倚，又把批判《海瑞罢官》纳入了学术范围。

四、彭真要吴晗搞假检讨继续对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

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

彭真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

彭真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

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

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

《北京日报》急忙发表这篇文章，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二) 《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⑪⑫，“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⑬⑭，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⑪⑫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⑬⑭，“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⑮⑯。他特别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⑮⑯，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⑰⑱，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宣部主持写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编者按：吴晗同志对于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著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哪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应当作怎样的评价，我们希望进一步地展开辩论。

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

首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康生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彭真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

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

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

实际上姚文元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

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

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

陆定一的基本观点，同彭真是一致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

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整关锋提供材料。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

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

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人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

问：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

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本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固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人民日报这个时候还要发表这篇文章，目的还是要贯彻彭真“混战一场”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谢瑶环》，是从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过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万福莲》是反对武则天的，《女巡按》把历史背景改到了唐中宗时期，变成反韦后专政的戏。田汉同志的新改本给武则天翻了案。他自己说，根本上的改动，是“把骂武则天的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做一定批评”（《谢瑶环》：《小序》）。这样，也就完全改变了谢瑶环和武则天的关系——谢瑶环从反对武则天被改成执行武则天反对豪门贵族政策的亲信。

“为民请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一方面颠倒了阶级关系，把封建皇帝武则天描写成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另一方面，又大力歌颂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大力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思想。那末，“为民请命”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田汉同志对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这种歌颂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所有的“为民请命”者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虽然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是属于上述“为民请命”的第三类，即它是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反动的“招抚”政策，也就是剧中人徐有功说的，是对农民起义军实行“釜底抽薪”。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

田汉同志的“为民请命”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深入，资产阶级右派正在酝酿着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暗流的时候，就曾一马当先，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以《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为题，发表了两篇恣意地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文章，恶毒地在戏剧界煽风点火，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鸣锣开道。田汉同志的这种活动，当时曾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反而形成了“忠而见疑”的阴暗心理，耿耿于怀。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人民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的时候，田汉同志长期压积在心头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便按捺不住地一齐迸发出来了。“为民请命，何罪之有？”他借武则天之口说出的这句话，正是田汉自己的话，是他对受到的批评的抗议和反攻。

田汉同志坚持要给谢瑶环安排一个因为“为民请命”而遭杀害的悲剧结局，认为这样的结局“教育意义较为深刻”。那末，这个“教育意义”究竟是对谁说的呢？它的“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是表现在哪里呢？说穿了，他是对党说的，田汉同志是企图用谢瑶环的死来警告党，并且企图向人们暗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干部已经完全腐败，即使上面的政策不错，也没有办法贯彻下去了，因而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就不得不“以死殉之”。

田汉同志不仅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来表示他对党的警告，还通过袁行健这个人物进一步发出了对今天社会的控诉。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而“牺牲”，袁行健则为了谢瑶环的死而出走。一个死了，一个走掉，这里面包含着田汉同志对今天社会现实的多么深刻的愤懑呵！

如果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对因为要求“退田”而被“罢官”的今天的海瑞们表同情，唱颂歌，那末，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

主义制度“残害忠良”。这就无怪乎有些评论者要大加称赞他的“胆识”了。原来他所写的“奸佞”和“忠良”都是实有所指的。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们通过所谓“骂皇帝”，反“权奸”，反“乡官”和歌颂“清官”，歌颂“清官”的“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者，来对党、对社会主义作斗争。而它的形式又是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的。“颂古”、“复古”是这个思潮的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则是这个思潮的内容。如果说《海瑞罢官》是通过对于因为“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海瑞的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抗议”，对被“罢官”者的支持；那末，《谢瑶环》就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死的谢瑶环的强烈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的“控诉”。因此，“为民请命”这个口号，就成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集中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敌对阶级必然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他们不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没有资本来进行这一场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装扮，终究遮盖不了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这篇文章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上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的文章：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听取彭真等人关于二月提纲问题汇报时说：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提要：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这篇文章也是由中宣部主持和组织写的，坚决贯彻鼓真的“政治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意图。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彭真批评上海市委不批评《海瑞上疏》而发表的，也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人民日报为了把政治批判纳入学术讨论轨道而发表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五、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从这时以后，人民日报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和方针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从它以后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 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吴晗同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些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规范以及其他道德观念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因素。道德规范和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不能把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这篇文章批判的内容应该是属于前一阶段的，由于被压制现在才发表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②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③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④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⑩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

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②①

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③。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②④

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

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⑤。

这篇文章是为了弥补戚本禹前一篇文章的不足，把史学问题的批判进一步深化。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这篇文章针对吴晗的自我批评，剥开他的画皮，揭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针对彭真不准涉及《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问题，深入揭露彭真等人散布的种种为吴晗辩护的谬论的重要文章。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刊载的关锋 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一）
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这篇文章通过对吴晗有关海瑞的几篇文章之间的联系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他写这些文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

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从人民日报搞的这个摘编可以看出，在四月份以前，各报刊登了不少揭露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文章，可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而是尽量引导人们去搞所谓的学术讨论。

六、毛泽东指出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说：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这时，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以及北京市委。这就预示着毛泽东的战略布署即将进一步展开。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这篇文章提出了：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问题。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 1961 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 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 1961 年才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 1962 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这种反批评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就是海瑞。

罢彭德怀的官总不是一九六〇年以后的事吧！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批判《海瑞罢官》作为批判中央领导层中的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呢？

我们先来看看右派们是说的。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就是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三面红旗”是表，空想是里。毛泽东不仅捍卫“三面红旗”，而且把一九五八年的空想发展成为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上的空想主张。一九五九年，党内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党内上层对“三面红旗”也有不同看法。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实际上是代表广大群众和党内上层不少人提出的。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

姚文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江青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

他的这些话，除了立场反动、颠倒是非外，大体说来是对的。不过，他竭力否认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官之间的联系。

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海瑞罢官》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吴晗写《海瑞罢官》确实是影射一九五八年批判彭德怀。这正如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三家村”、“燕山夜话”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确实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

这也就证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站在基本上肯定一九五八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立场上，当然认为《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作品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2006年11月19日初稿

2011年6月29日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上海会议背靠背地揭发罗瑞卿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罗瑞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

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说：“去年（指 1964 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晚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罗对杨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 he 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

“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杨成武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 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说：

“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一九六五年五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

叶剑英为了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应该报毛、林后再做。但是罗瑞卿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

叶剑英连同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

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

林彪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 3 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一九六五年八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

林彪主动说，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

叶剑英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或是十一月初，在杭州，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电话通知杨成武，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杨去一下，并派车来接。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杨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问。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杨答。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杨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杨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杨即回疗养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叶剑英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

毛泽东要求林彪汇报罗瑞卿的情况，林彪借口身体不好拒绝了。

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

叶剑英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

×××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

叶剑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几天后，×××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听了总政治部关于即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明年工作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和今年的做法一样。具体有以下五项：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以上五项对各部门都是适用的。除这五项以外，机关有的搞军事训练，有的搞院校工作，有的搞施工生产，有的搞民兵三落实，有的搞军工生产和建设，有的搞国防科学研究，等等。各个部门的业务不同，重点可以不同，可以根据总的

要求有增有减。但是，都必须突出政治，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提高认识，提高自觉。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率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突出了政治，就会出好人好事；不突出政治，就会出坏人坏事。部队的工作，环节很多，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环，就把各种工作都带动起来了。几百万军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突出政治，不把思想工作搞好，不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思想传下去，怎么能搞得更好！做好上述五项，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备。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叶群汇报的内容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毛泽东在听汇报中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师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师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

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叶群。

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周恩来主持小组会。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

她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

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

雷英夫也揭发了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罗瑞卿到达上海，没有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 618 号一个小院子里，实质上是被看管起来了。

陈丕显对罗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

罗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 7 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会上揭发的那些问题，他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军委会上决定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杨成武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刘少奇说：“命令以后再下。”

不久，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会议上，每个与会者都发言。

邓小平对刘亚楼的揭发，说，死无对证。

刘少奇也表示难以置信。

朱德说：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就是不能讲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到了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会议大量的的是表态，也有揭发罗瑞卿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说他揽事太多，锋芒毕露，得罪了一些人。

对于这些背对背的还有点同志式的批评，罗瑞卿都能接受，但他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毛泽东决定休会。

邓小平主持最后的结束会议，说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就宣布散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

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思想不通。

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

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

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的批示

总政治部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

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

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解放军报》社论

其中指出，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二、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会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

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罗瑞卿在会上作检查

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泽东，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

毛泽东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当面向毛主席申诉。周恩来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随即跳楼自杀。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第二阶段的会议，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谢富治说的这些内容，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不能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

一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

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第六、封锁 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

第七、撒谎、造谣、挑拨、抵赖 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

第八、伸手 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

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

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一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三、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 X 月 X 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 XX 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

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 XX 日，即在 XX 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 （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 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 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写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彭真在这次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66〕268号）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贰、本节简论

一、毛泽东对处理罗瑞卿事件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从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对罗瑞卿的错误，毛泽东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且是作为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来处理的。处理的方法是批评教育，并适当地调整工作岗位——免除现任职务，调到一个省去当省长。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里主要是指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

二、罗瑞卿在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他在许多问题上紧跟刘少奇、邓小平的。我们还是来看看右派们是怎么说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又肯定“四个第一”、“突出政治”，说明毛泽东愈来愈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愈加深刻。

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是两条；第一，罗要夺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两项主要内容，前者纯属诬陷，后者却是事实。

这就是说，右派们现在仍然承认，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罗瑞卿这些人是反对政治是第一、政治是统帅、突出政治的。毛泽东批判他们搞折中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

“罗瑞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与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的看法有密切联系。这个时候撤换罗瑞卿，也是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部署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换了总参谋长，就解决了一个兵权的具体实施的问题。

三、一九七六年以后，罗瑞卿复出又紧跟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了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反毛泽东思想一边的。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撤换他的职务是正确的。

2006 年 11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 日修改

第一章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壹、本节概述

一、彭真炮制的《二月提纲》出笼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

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批评许立群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提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

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这个提纲，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政治局常委临开会前，彭真把“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高酌。”

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 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

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

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

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

彭真叫许立群向毛泽东汇报，然后彭真说了一些话。

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

毛泽东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泽东又当面问了彭真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彭真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泽东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当许立群攻击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泽东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根本不理睬毛泽东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泽东审阅，而彭真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二、彭真打着贯彻提纲的旗号歪曲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彭真对上海市委的人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的了，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人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

胡绳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

胡绳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汇报提纲”。

他们根本不传达毛泽东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泽东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泽东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听传达的人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在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红旗》发表尹达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叫许立群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 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穆欣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三月毛泽东三次谈话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基本定稿以后，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杰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杰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

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四、周恩来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向毛泽东表示：“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彭真召集十几个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

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

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

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

先由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然后，彭真表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通知》稿由周恩来等人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接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同时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接来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对文件“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五、四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并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贰、本节简论

彭真搞一个《二月提纲》是为了反对毛主席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布署。这一点当时就很清楚。现在他们也不否认，而且吹嘘是功不是罪。

批判彭真、陆定一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才真正拉开了中央领导层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序幕。

一九八〇年，彭真复出以后，立刻充当了审判江青的前台总指挥，留下了大搞政治报复的不光彩一页！他在某些方面虽然与邓小平有分歧、有区别，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复辟派中的一员大将。

陆定一在复辟后的一系列表演，充分证明此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且致死不肯悔改！

2006 年 10 月 11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5 日修改

第一章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壹、本节概述

一、江青与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座谈文艺工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遭遇到了来自党内当权人物和学术权威两方面的巨大阻力。为了冲破阻力，扩大战果，把文化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文艺理论和文艺路线上，进一步分析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和开展大批判的必要性。为此，毛泽东派江青到部队中去组织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

她的要求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林办”主任叶群出面，电话通知当时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要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参加人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批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参加。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刘志坚等一行 6 人（包括秘书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一名编辑）乘飞机到达上海。

当天下午，江青在其住处丁香花园召见刘志坚，刘志坚即把叶群委托其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转达给江青。

林彪的“几句话”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

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下午 5 时，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场的还有张春桥。

一开始，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

江青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晚上，江青与刘志坚等人一起看电影。

这‘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就是看电影、戏剧。，先后看了 30 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 13 次，指定放映影片 21 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发表谈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晚上，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外国电影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晚，江青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晚，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座谈期间，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二、整理修改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刘志坚当即与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每次谈话后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讨论，由随行的工作人员记录，陈亚丁修改，于晚整理成约 3 0 0 0 字的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送给林彪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以及江青各一份。

江青看了这份汇报提纲很不满意，认为“座谈纪要（指汇报提纲）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求已回到北京的刘志坚派人去上海，由她帮助修改。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与受萧华和刘志坚的委派携带原稿返回上海的陈亚丁一起商量修改问题。

陈伯达谈了预先准备的意见，后来反映在“纪要”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说“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二是他提议“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

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 “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称赞说“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当日，陈亚丁按照江青的要求，把陈伯达的意见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连同自己根据追记补充的内容，全部改写在一份原稿上。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经张春桥与陈亚丁商量又对稿子作了些改动。

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陈亚丁一起对修改稿进行讨论，而后由陈亚丁再修改一遍。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经张春桥、陈亚丁文字加工。

晚上读给江青听，得到江青认可。

这次大修改，对汇报提纲结构未作变动，但在内容上作了很多的增删与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的 3 0 0 0 字增加到 5 5 0 0 字左右。

江青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稿子共作了十多处的修改，其中既提出了一些错谈观点，如“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对“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等。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于是，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5 个人一起从 1 2 日至 1 4 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这次修改，使文字由 5 5 0 0 字增加到 1 0 0 0 0 字左右。

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

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 “此件(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二) “搞掉这条黑线以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四)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左翼的某些领导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

(六)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七) 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八) 文艺批评要“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九) “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而我们要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至十五日，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

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5个人一起从12日至14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

这次修改，使文字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 4 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又请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五人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

三、党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致给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一次批评了学术界、文艺界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中央军委的请示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4月1日，彭真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

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又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

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

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全文 9800 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

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 211 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 5 月 10 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 5 月 10 日前发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 年 4 月 10 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 1966 年 4 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 20 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 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 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 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 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 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 10 条措施。

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座谈进行的过程。

第二部分：集中概括了这次座谈会上“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的十点意见，是“纪要”的核心部份。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

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

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十条措施。

贰、本节简论

很明显，《纪要》是以江青的名义，借助林彪的地位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路线作了一个总的检讨。

《纪要》是毛泽东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批评的深入展开、系统说明和详细注释。

《纪要》指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得再斗争。这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

就当时来说，《纪要》所代表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与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根本对立的，也是对后者的批判、否定。

这个纪要虽经中央领导机关批准，但一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一九八〇年以后，他们就“翻案”了。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第 410 页）

《毛泽东传》说：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大动乱的年代》说：《座谈会纪要》不仅一笔抹杀了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成就，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提出了黑八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日关于文艺工作批示的“左”的发展。它的严重左“倾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个步骤。

它们都抓住《纪要》中的一句话：“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其实这句话不过是把毛泽东说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换成了另外一句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纪要中的这句话，对建国以来的文艺领域中

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评价不高，对此，他还作了自我批评：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在当时看来，即使不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尽管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会觉得这些批评似乎过于严厉了。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多年，看看这三十多年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情况，不能不让人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就深刻地觉察到文艺界存在的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暗流，如果不狠狠地抓，发展下去将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一领域作为突破口的。一九七六年以后，右派全盘否定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的批评，从而为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了绿灯，以致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来说，已经陷入了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泥坑。

2006 年 8 月 30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4 日修改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 通知”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布署进行，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次会议的指导方针，除了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意见外，还有毛泽东在五月五日会见谢胡时指出的防止反革命复辟必须采取“剥笋政策”，把坏人一层一层地剥掉，以及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全国工农兵学商都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这次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五月四日至五月十七日，主要是开小组会，对彭真、陆定一炮制的“二月提纲”进行揭发批判，并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的讲话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

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张春桥作主要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

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 马泽民 阎长贵 周英 滕文生 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我们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也摘编了《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加了按语，请大家加以对照、比较，进行研究。

一、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为被罢了官的户部尚书“李三才”辩护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形势不妙，暂时退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谁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意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

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以及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出工作组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协助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等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

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上述批语的主要内容。）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这个提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

(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

(六) 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 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

(八) 提纲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

(九) 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

(十) 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第二阶段：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主要是开大会，由林彪、周恩来作报告，彭真、陆定一等作检查，并通过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作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

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这个讲话，并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正当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彭真在大会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陆定一在大会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防止反革命复辟、领导和群众、保持晚节的讲话。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对政变的危险，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

(2)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

2, 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主席在 1962 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 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 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3, 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晚节不忠，一笔勾消。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朱德在小范围内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会议通过了彭罗陆杨处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 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三) 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四)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第三阶段：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会议总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一) 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诬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二) 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 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 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 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 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大会上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大会上系统地回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七次指示

在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

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讲到《海瑞罢官》问题要害是罢官。是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有联系的，提出文化学术界必须从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场说，作了调查，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彭真出来后造谣说：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纲，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纲，拿到常委会上，匆匆忙忙的当场发了，叫许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认为是向主席汇报过了，也没有说明是作为文件向全党发出，欺骗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汇报，说常委已通过，欺骗主席，主席问吴晗算不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说不能算。主席没有说话。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说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过几篇杂文，彭要整左派的风，主席说三年以后再说，主席表示很不满意。彭说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赶快发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扩大会议，主席说《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斗，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讲到严慰冰这个反革命，他们是穿的一条裤子。讲彭罗陆杨经常把主席讲的话与自己要讲的话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复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的问题，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讲到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等当过书记处的书记，是不断分化的，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讲到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卫“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来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斗争不斗不倒”。赞成鲁迅的意见，经本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负你，现象是看得见，本质也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讲彭，党内矛盾是正常现象，有矛盾就要斗争，这是辩证法。彭经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就“二月提纲”及彭真等人的问题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这种崭新的思想将培养出崭新的人，它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仇视和谩骂。

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社会。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若干相同之点或相似之处。这不是欧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理想境界，这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原始的集体主义和平等观念在当代的一个变奏曲。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如果说这在以前抗日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则弊端丛生。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时代已经到了六十年代，怎么可以以抗日根据地为理想境界呢？如果说这在军队中或许可以实行的话，那么怎么可以要求全国与军队一律呢？但是毛泽东无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此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他通过《五·七》指示向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也就在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席宣、金春明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对于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无论是“五·七”指示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却一句也没有说。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毛泽东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

这些所谓的“中共党史专家”对毛泽东思想的仇恨，使他们昏了头，已经达到了语无伦次、荒唐可笑的地步。请问：

1，五·七指示在什么地方说了：现在就要消灭商品经济、只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

2，五·七指示在什么地方说了分配问题、说了要建立一个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

3, 五·七指示中说的“以工为主”、“以农为主”、“以学为主”、“学文化”等等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说的“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吗？

显然，这些先生们像唐吉柯德一样是在与风车搏斗。难道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喊着伟大领袖、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伟大业绩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幼稚可笑的人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攻击歪曲毛泽东的话呢？

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的对立，实质上是发动批判资产阶级与反对批判资产阶级的对立，或者说，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当时，毛泽东要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作品的批判，而当时处在一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这种批判，也就是反对毛泽东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这是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的第一次交锋。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提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及其拟定的《二月提纲》，已经成为他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毛泽东要坚持自己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必然要批判《二月提纲》，撤消“文化革命小组”。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统一思想。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他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它还如此描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时的思想：《五一六通知》既是批判彭真的，又是批判中央第一线的。中央第一线的同志当然会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以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大的风浪或许已经过去，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为彭、罗、陆、杨作解脱。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通知。二十年后，右派就公然翻案了。

《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说：“彭真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的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第 411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五一六通知’，

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所谓“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主要是指这个文件的最后的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无非是说：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思想、代表人物，存在不存在？要不要批判？这怎么就混淆了是非？

文件中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含义应该是限定比较严格，专指的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把这样的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怎么就混淆了敌我呢？

至于到具体的人，谁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谁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是很慎重的。不仅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具体指人，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由中央定性作出结论的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在运动中，由一些群众贴几张大字报，

说谁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通通都不是最后由一级党组织作出的正式结论。

2011 年 7 月 6 日修改

第二章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彘、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这篇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 1966 年 5 月 25 日下午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并没有认真贯彻“通知”的精神，而是一味地强调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准开大会、写大字报。捆住群众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而当时，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也是按照党中央在一线领导运动的刘少奇等人的指示进行工作的。这张大字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批评。

大字报贴出以后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反对的人也贴出大字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贴大字报反对党委。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

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北大党委要把这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

最近北京市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去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主席说：群众来了就提提，但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

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向主席请示一下。主席说“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

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提。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

当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由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

首先人民日报改变不了局面，争不得主动，中央同志也着急，总理讲得很气愤。北京日报出问题在于市委。人民日报，把自己放在同北京日报一样的地位了。看版面吧，和北京日报一样，哪里出了问题？中央出了问题？彭真四月初就没管事了。过去他插过手，这两月账算不到彭真身上吧？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的指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

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突出出来。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到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

电台广播、报纸刊登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一事，在群众中特别是高等院校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张贴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祝第七届“上海之春”胜利闭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七百多张大字报批评校长蒋南翔。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声援北大聂元梓的大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一万多张大字报反对批判蒋南翔，提出了保卫蒋校长、保卫校党委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十一个学生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提出要揪党委领导人中的黑帮。

教育、外语、地理、历史等系相继贴出类似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二、刘少奇、邓小平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指示，其中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坏人破坏。

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这些措施首先不是热情地欢迎、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惟恐群众运动“出轨”，搞一些条条框框去加以限制。在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指导下，即将出现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雪峰的这个讲话就是为了贯彻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此后五十多天里，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贯彻了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

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这篇社论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北京邮电学院一些人因工作组保护校党委而赶走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社论指出：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种种残酷斗争，竟长达七个月之久。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同学的讲话

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时，在学生三食堂门前对北大师生说：同学们！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很高兴。有你们这些革命的同学，什么牛鬼蛇神、什么彭真、什么陆定一、什么罗瑞卿、什么陆平、什么彭佩云都统统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反对工作组，提出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

当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陈伯达不同意。

七至九日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

同日，北大一些人到清华大学支持揭露蒋南翔的问题。清华派人把这些人押送出校。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江青等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杭州同胡志明谈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

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文章。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一些人到报社贴大字报，遭到报社和警察的围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学生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工作组认为反工作组的人是右派，批斗这些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少数人不经工作组同意批斗“黑帮”事件。工作组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刘少奇同意在全校大抓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天刘少奇找工作组谈话，指示要批判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工作组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把李贵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整理的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场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运动。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是不可能胜利的。没有党的领导或放弃领导，有党委不领导，都

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你不领导谁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人，不要党的领导。文化革命一定要彻底置于党的领导下，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区别假左派、真左派的重要标志。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不要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不是个别，哪个人随便讲，指挥你，指挥他。党的领导是一个集体，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心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政策。说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他如果这样做了，这是好的领导。工作队如是坏的，就撵；如果是好的，就拥护。一个地方原党委是坏的，由工作队代权；如是好的，就要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领导，工作队不领导怎么办呢？如果党委、工作队确实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提意见，经调查确实，可以撵，确实是大多数群众反对，可以重派，但不能随便讲这是黑帮，那也赶走，不成！

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是到现在为止，以后你们还可以揭发，到现在为止，以后有很多材料再讲。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有错误没有呢？有，有严重错误，认识不够，应当检查，工作上有缺点，有的还要搞。我可能是黑帮保黑帮。陆定一是黑帮，钱信忠就一定是黑帮？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呢！我新来不久，根据事实讲话，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是黑帮，不能预先说他是黑帮，要根据现有的材料。

党委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有权让工作队领导；要党、团组织进行领导。依靠党委，依靠党团组织进行领导。党组织就是我们基层组织，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我们党团员大多数是好人，少数不好的，可以揭发，内部清理，可以解决。个别完全烂掉了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少数有问题，党团组织你能不信任？党团员大多数应是左派，少数坏的应清除。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的，包括我们所有……（不清）……，要加强党团教育，让他们参加运动，少数不好可以清理，不能因一颗老鼠屎，一锅汤全不要了。党的领导要坚决，坚决掌握政权、机密、武器、资料、贵重东西，不能交出去。党团组织不能包括了全部左派，左派有的在党外，应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能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政权要由原党委掌握。我们有的部门发生了问题，夺权！

这个三天，那个三天，又要赶下去，把机密东西搞掉了怎么办？同志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月革命，也有是二月革命。夺权，夺的是文化革命的权、领导权，委员会要群众选举，不好的可以换，不要紧，这些东西拿来拿去危险的很啊！革命委员会有权领导文化革命，不掌握政权，政权要由原来组织掌握，如果烂了，上级来接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一段话：如果工作组不能代表我们的利益，就可以夺工作组的权。

由此，在刘少奇的亲自过问和王光美的指挥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说：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

三、两条不同路线的拉锯战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

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

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编辑部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讲话

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领导，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

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由北京新市委出面因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而撤销工作组组长职务的第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在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仍然指示他们“反右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对外文委正式宣布：

李昌停职反省，杨纯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张彦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外办。

张彦未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 29 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1）张彦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 29 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两条：（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陈毅宣布的这四项决定，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畅游长江时的谈话：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在历史所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三项决定：

第一、郗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第二、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

第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要求撤销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

这一天，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晚，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

七月二十日，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说：

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等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有周恩来、邓小平参加。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时，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

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这说明，虽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撤消工作组仍然不同意，周恩来与他们两人交换意见，仍然没有说服他们。

这也证明：在中央常委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如果说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刘少奇、邓小平就不可能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说存在“个人崇拜”，刘少奇、邓小平就不会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同时，这也说明，周恩来在撤消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五、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到刘少奇处与他谈话。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

周恩来审阅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清华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刘涛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这说明，尽管中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但刘少奇仍然不肯承认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王光美又突然来到清华，

说：“我不能在工作组困难时期放手不管。”“不少同学还是有认识的，还是能肯定工作组成绩的”，

又说：“让蒯大富上台也好，他上了台实行残酷镇压，可以教育大家。”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销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一阶段：八月一日至七日批判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

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的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约王光美、叶林谈话，

提出；王光美应该回去，不要再呆在清华园。

王光美说：“我听那个上级的？让我来参加劳动，是少奇同志要我来的，他也是我的上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邓小平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周恩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及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领导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晚，李雪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工作组把方向搞错了。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肃处理。

（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

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说，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叶剑英谈到对军队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

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

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中央决定撤销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文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书记候补书记名单。

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第二阶段：八月八日至十一日通过文化大革命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发表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阶段：八月十二日改组领导机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经过改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排名是：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会上就组织人事变动等事发表了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

公报说：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关于国内，公报说：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关于国际，公报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公报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他说：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他说：

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七、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贯彻全会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高等院校以及中等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纷纷响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院校领导及各级党委执行的错误路线，由此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

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歪曲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委发动群众揪斗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在一段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都发生贴大字报、批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的现象，称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为“黑帮”、“三反分子”，称一批教师为“牛鬼蛇神”。党委、工作组及其领导下的革委会，把领导干部、教师集中起来交代问题。如清华大学，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

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机关又普遍发生了把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

在这期间，有人说：北京有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另外一种说法：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统计，工作组把 10211 个学生打成右派，把 2591 个教师打成反革命。（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7 年编印的大事记）

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大革命似乎“纳入正轨”了。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后，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

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著作，很少涉及这一事实。然而，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在学校以及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抓右派、三反分子，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胡绳的《七十年》说：六月一日以后，“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老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瘫痪。6 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许多学校的学生发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事先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第 413 页）

《毛泽东传》说：“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

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事实证明，它们这种种说法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

三、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是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

这封信说了这样几层意思：

告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八日这一段时间的行踪；

2，五月十六日至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这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天下大乱”，为什么会“大乱”？并不是无产阶级要乱，共产党要乱，而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也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牛鬼蛇神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呢？这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共产党人对待这种“乱”采取什么态度？首先是不要怕，怕也没有用；其次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步骤，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去争取新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是进行一次就完成了、结束了呢？不可能。经过若干年后，大概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直到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为止。

3，对林彪“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认为不妥；“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4，对林彪在讲话中过分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和意义感到不恰当：“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为什么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

5，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态度：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

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6，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用、意义的估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为什么说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不同于“实战”。为什么说是“演习”而不是“实战”呢？这同毛泽东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判断是有极大关系的。虽然后来说“炮打司令部”，但他并不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真的被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篡夺了；虽然后来说“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并不认为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所以这种“炮打”、“批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演习”罢了。这种“演习”打破了常规、造成了某种混乱，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认为，从这次“演习”中，“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和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普通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怎么也不敢想；中央还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7，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虽然是两句老话，不仅对当时指导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在当今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四、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第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八月四日的的讲话和八月五日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

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第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文件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判别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十六条中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等，但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被遵守。”（第 414 页）

这是一些人惯用的手法。当他们对一篇正确的文件，找不到“缺口”，无法进行歪曲的时候，他们就指责这个文件还没有说什么、实践中未被遵守等等。对付这种手法的最好办法，还是去读原文，并对照实践进行思考。

对《決定》作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它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決定（草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等文件，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所发展。

第一点，关于运动的性质，《決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义革命。

第二点，关于运动的任务，《決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新就新在它所担负的任务与以前不同：“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第三点，关于运动的目的，《決定》指出：“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完成“斗、批、改”。

第四点，关于运动的主力 and 先锋，《決定》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第五点，关于运动的过程，首先是方向，〈决定〉指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其次是阻力，决定指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再次是曲折，决定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

第六点，关于运动的领导和群众，首先是领导，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其次是群众，决定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第七点，关于运动的阶级路线，决定指出：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

这里说的革命左派包括前面说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革命青少年。

这里说的最反动的右派包括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里说的中间派包括党内那些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当权派；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等等。

第八点，关于运动的政策，决定强调：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保护少数；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2，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包括不能把贴大字报的群众，把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的人打成“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不允许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

3，正确对待干部。决定指出：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 好的。

(二) 比较好的。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三) 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 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4，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5，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第九点，关于运动的组织形式，决定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第十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抓好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做好其他各项工作：

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抓革命，促生产。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

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有人说，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

就《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来说，这两点都不能成立。

第一点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的问题，《決定》明确指出：

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这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有严重错误的是少数，这些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是少量的，对这些人，才“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但“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的确，在实际运动中，“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不过，这谈不上什么“都是被冤枉的”，只是在群众运动中被冲击了一下而已，通过这种“冲击”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有的人被关押（实际上是保护起来）、进学习班（所谓关牛棚）、下放劳动（所谓劳动改造），群众并没有把他们当敌人看，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有把这些同志当敌人对待。即便如此，也可以说是运动中的一个缺点、错误，所谓“打倒一切”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第二点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的问题，决定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这里明确指出，群众中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正确的观点，第二种是错误的意见，第三种是混杂在群众中的“牛鬼蛇神”。至于如何分清那些是正确的，那些

是错误的，那些是“牛鬼蛇神”，这些都不能由少数领导人去包办代替，只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在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不少违反政策的事，有的闹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打砸抢抄抓，打派仗，武斗。这些情况只是运动中的支流，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运动的整体、方向。即便如此，这也可以说是运动中的一个缺点、错误，所谓“全面内战”就是指的情况。

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再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牢牢把握革命大方向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说“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这是对的；但说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就不对了。说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都“打倒”了，或“都要打倒”，就更不对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指出：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决定的草稿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教育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特务、叛徒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干部、整知识分子的，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问题，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但是它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

它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

这句话暗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其实，这正好说明，广大群众信赖党和毛泽东同志，党和毛泽东同志也信赖广大群众。相信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也确实是如此。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关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指出：“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

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中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这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一方面，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从下而上的揭露党和政府中的黑暗面，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也让群众在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第三个问题，让广大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

《历史决议》说：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挤。

它说的这段话基本符合事实。问题在于，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去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广大干部。一方面，通过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及其他思想上、工作作风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把各级领导干部推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提高掌握方向、识别是非、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本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领导干部，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被动地接受群众的冲击；而有的领导干部，在受到群众的冲击以后，很快就与群众站在一起，领导群众沿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前进。

如果共产党的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只会“当官”，这与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官僚有什么区别？

第三，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

2011年7月19日修改

第二章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壹、本节概述

一、一些地方动用军队、警察及挑动工农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月二十日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城市，学生们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但是，地方各级的领导干部，思想并没有真正跟上来，少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镇压群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学生到省委门前静坐示威，被一些人打伤数百人。（详情见陕西省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 279 名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造反，发生了挑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

八月二十二日，湖南大专院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批评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受到一些保护省、市委的干部、群众的围攻。

八月二十三日，长沙出现大规模的游行，提出在罢免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官。

八月二十七日，中南局派中南局第二书记到湖南主持工作。

九月一日，长沙市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组省委，罢王延春等人的官。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免去王延春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南局也作出决定：免去长沙市委几名领导干部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高潮开始了。

第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第三，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第四，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

第五，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

第六，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一千多人到地质部要求曾经在该学院任工作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回学院作检查。地质部领导以“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五日，地质学院学生再次到地质部找邹家尤，找不到人就不走。

九月七日，地质部领导招来“西区纠察队”逼迫地院学生撤出，双方发生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这篇评论员文章揭露驳斥了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的种种谬论：“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捣乱”、“你们狂妄，你们幼稚”、“糟透了”。明确地宣布：必须革命，必须造反，必须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国防科委，要求曾经在该院担任工作组长的赵如璋作检查。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的身体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二十二日晚，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学生也撤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北航“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他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

第四，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

第五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在乌鲁木齐串连的红卫兵，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问题，要找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区党委干部禁止他们进入区党委办公大楼，许多人还高呼口号“誓死保卫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南充市发生了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围斗学生的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贵阳市发生压制北京串连学生事件，清晨，一百多人的队伍，手挽着手，向着南下革命串连队的指挥所门前冲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 向工农兵学习》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

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林县县委组织三万多名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围攻安阳地委机关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是到林县要求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回地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前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银川市自这一天起连续发生了以自治区机关干部为主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并且越来越严重。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查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出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高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明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

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派于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有二十四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五类子弟）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在此同时，有三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

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各种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原文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把党内的错误路线定性为“反革命路线”，失之过重。毛泽东审阅时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文章指出：

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从语法上来说，更加合乎规范。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周恩来曾提出疑问。经过毛泽东说明修改的过程以后，周恩来说：我明白了。后来一些人借此宣扬；周恩来反对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周恩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引用了周恩来十月三、九、二十二、三十一日的一些话作为证据。他引证的那些话，完全是断章取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说：

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大会通电指出：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

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三、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

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等等。

第一阶段：十月九日至十五日，以小组会为主，大家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认识。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与各大区领导谈话说：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下午开全体会议，林彪讲话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四日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针对他们要王光美立即到清华大学作检查事指出：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一月，还月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曹狄秋在第三小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在群众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提纲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的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考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少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熊复在第二小组发言：

新华社五百多名记者，二十八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了一百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第二阶段：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睬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继续小组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五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删去了一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就北京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李先念去参加二十日下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要求提供三辆宣传车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讲话录音事批示：“参加大会可以，提供三辆广播车在大街上播送李的录音不可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一事，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如今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如今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编者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丢掉周恩来讲话的前半截，并说：“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说得很含蓄，但他的用心是为了保护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这是歪曲周恩来的一个典型事例，千方百计地把周恩来说成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路货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各组讨论

谢富治在第五组发言说：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

叶剑英在第二组发言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批语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就是他们两人搞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他就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

工作组的形式，便于执行错误路线。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台是少奇；邓的女儿在师大附中，后台是邓；刘的女儿到清华附中，也是有后台的。这里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工作组撤出之后，还是有人在那里操纵的。

有些地方的同志错误路线很适合于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好，习惯以势压人，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有的是盲目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

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十七年

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被陶铸阻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各小组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华东组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

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

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

革命大串联是学生的创举。

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

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现在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

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不能乱，不能干扰。

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不能将各级领导宣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四、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国家经委一些人贴出大字报《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茄为什么要包庇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社论阐述了四个问题：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意义；2，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根本对立；3，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4，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以及犯路线错误的人应有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

（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规定，认真处理。

（四）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即全部集中，当众焚毁。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部长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贰、本节简论

事实证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虽然也作了检讨，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只是企图蒙混过关而已。时机一到，他们就会翻案。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错误路线并不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并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刘少奇在检讨中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但是整个看来是违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讲的。他没有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邓小平的检讨也是违心的。

人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参加革命几十年，他们还有做的哪些事、说的哪些话是违心的？总不会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是违心的吧？！

第二章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前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农村文革运动的部署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

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联。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周恩来就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农村和工矿文革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看了江苏文革小组 9 月 8 日来电和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 9 月 7 日来电，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个方面的通知。现将有关文件送上，提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妥否，请主席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强调了在财贸工作上，应当特别抓好几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给江青的信

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将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批送中央文革小组批阅。二十日的信中说：

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各地已经在实行，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实行。

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

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有的也可以不转，照旧营业。转为国营的，人员要经过甄别清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作安排。小型的合作商店，不转为国营商店，不要停业。小商小贩，现在还起着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

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比较灵活，品种多样，又便利群众需要，目前一般不要改变。

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以及家庭服务人员（例如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以利于安排社会就业和满足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

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侨汇存款的优待利率应适当降低。

七、公债已经归还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很小一部分，应当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

八、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的目前暂不变动。

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和舞台、银幕需要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出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脂粉、香水这类的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粮标准，目前不要提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

批示指出：中央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但是有的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已经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的，可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动，不要动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要再发展红卫兵等组织；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机关、

团体，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也可经过红卫兵等组织群众的酝酿，自动的取消这些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

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城市企业文革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大会的主题是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开会之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工人们曾多次邀请曹荻秋前来参加大会，市委不派一个负责人。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点，这时，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豹来到大会，对工人们说：“我不代表市委，发言没有准备。”工人们决定游行，并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条件要求。十点四十分，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

七千工人冒雨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等候。曹荻秋始终不肯露面！造反的工人们向北站涌去。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这时候，已有人从上海乘汽车赶来车站，围攻工人。六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只到十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他说：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他们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直不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许多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都提出文化革命和生产时间给予适当的规定。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王力说：解放以来历次运动都是这样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和革命群众之间，都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执，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严防宗派主义，不要武斗，不要因为纠纷而妨碍生产，不要停工。

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一切好的组织都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

搞一套脱离群众的机构和物质装备（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工人组织中的人员一般地不要脱离生产（陈伯达同志插话：否则说话就不起作用了）。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要照顾大局，绝对不能放弃生产劳动，成群结队的到外地串联，以免影响本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生产，自己外出串联的，应赶快返回生产，担负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也应这样做。

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在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地的其它厂矿学校单位去参观访问、互相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王力同志插话：以前你们一来，他们就说串联了）。

革命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生代表要去，应该首先同那里的厂矿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十二时，张春桥来到安亭。

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步行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与工人谈判。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

- 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 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派代表——张春桥同志加的）
- 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唐平铸接见各地来京串联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说：现在又有新的发展，运动逐渐在工厂，工人阶级里展开了。由于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展开了，许多工厂起来了，按过去的办法不行了。北京许多工厂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辩论，工人阶级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始结合。工人搞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北京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天搞得轰轰烈烈，以后天津，武汉等地很快就要发展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唐平铸对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时说：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这样做。

社论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任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它地方也有些是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这篇社论不能叫毒草，应该说，对我们当前运动是有指导意义的。至于被坏人利用，钻空子，不光这一篇，还有许多文章，甚至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来作护身符。上次林彪同志的讲话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有些党委公然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来批评我，你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牛鬼蛇神。我们要防止他们来歪曲、利用，如果我们写的不恰当，他们就更可以来利用了，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力威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王力说：

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

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我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戚本禹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有历史以来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都是折衷的，平起平坐的，而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

分期分批是中央的总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搞分期分批？打你“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罗！你先慢慢搞嘛！如有些地区，象××地区它就是慢慢搞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领导人，由北京市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宣告成立，号称有三十万人，公开表明“反对批判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唐平铸等和首都革命职工代表举行了座谈，在会上由王力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三、召开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谷牧就对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提出意见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 1，对工交系统要有正确的估计：
- 2，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
- 3，一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 4，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
- 5，不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
- 6 一定要搞好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会议在陶铸的主持下，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都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沈阳、天津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分期分批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工交欲罢不能。挡不住，不如疏导的方法。当前工交企业运动，现在才是开始，未动的也很快起来。也不要幻想学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就不出来了。不要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不要怕打乱旧秩序。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运动中可能有些毛病，不能要求那么高，运动还要继续发展，有些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要有思想准备，要受得住，准备吃苦，掉磅。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了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 2—3 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周恩来草拟的给四川绵阳县委转有关负责人的电报：对从绵阳分路来京的一千余工人，可派人至广元做工作，务劝他们乘火车回成都，只派代表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四、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工业“十条”定下来了。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指到会者）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深入群众中去搞一个时间，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问题，积累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我们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本质的东西是群众要革命。现在牢骚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抵制毛主席的路线。现在是放的问题，不是堵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林彪主持会议。

十二月四日，谷牧在会上讲了《汇报提纲》，

他说：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1，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3，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

江青说：工交系统的一些领导干部毫无无产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意儿。

张春桥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我也是计委的一个成员，大计委、小计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

十二月四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在上说：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来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过，并陆续有些补充，先搞了八条，后来根据各派的意见，补充成十条。十二条太长了，工人不容易记。根据当前冒出的问题和主席思想，提出这个十条，这十条各派都赞成，不能说是折衷主义，实际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十二月四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康生在会议上说：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

十二月四日，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林彪在会议上说：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后中央开会就不再通知他们参加。）

十二月六日王力在会上说：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

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 20 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 180 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

澄清几点意见。

十二月六日陶铸在会议上讲话：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派，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愿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

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

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係，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係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发[66] 603 号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一切革命串联，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五、传达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贯彻中央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在毛泽东处，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参加工交座谈会和来京的省市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话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涛。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第三个问题：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

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

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一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全，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主席不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查，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查，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必一棍子打死？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查。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社论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

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刊登王力 贾一学 李鑫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六、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就《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中提出：农村除允许成立红卫兵组织外，“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容请示毛泽东：“其他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一句可以考虑不要，因农村中已有贫下中农协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民兵、红卫兵等组织。

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

谭震林在会上就草案说明：这个文件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起草的；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分期分批。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

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文革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

所有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都坚决执行中央的规定，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的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月，中共中央制定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十条》，实际上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整个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陶铸的主持下，参加座谈会的人，大多数对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因此他们全盘否定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意见，自己另外起草了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实质上是反对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十二条》，从工交会议上的各种意见看来，工交战线的领导人实际上不赞成在工交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十二条》。在陶铸的主持下，草拟了相对立的《十五条》。指导思想不同，毛泽东必须要否定《十五条》。毛泽东既已表态，会议就通过了《十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件事是围攻谷牧，江青一马当先，康生、陈伯达、王力紧跟其后。第二件事是对陶铸突然袭击，陶铸迫不得已作了检查。第三件事中林彪的总结发言，它 1，彻底否定工交谏会和《汇报提纲》。2，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大升级。3，要让文化大革命队伍席卷全国。林彪的讲话，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两种思想、两种倾向、两种方针的斗争中，工交座谈会和《汇报提纲》站在正确的方面它们为“左”倾思想所不容，因而遭到否定。陶铸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他无非坚持了《十六》——却因此而获咎。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升级，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受到阻遏归咎于刘少奇、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从表面上看，这是主动，实质上被动应付，后患无穷。

它的这些话应该说是揭示了斗争的事实，不过由于它的右派立场，颠倒是非罢了。

一九六六年八至十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设想是，以党政机关和大专学校及五界为重点，工矿农村则结合四清分期分批进行。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进入了高潮，以上海最为典型。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怎么办？是压制？还是欢迎？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十二条》贯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工人运动的兴起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而陶铸主持搞的《十五条》则对工人运动的兴起采取了压制的态度，继续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两个对立的文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十二条》（后修改为十条），否定了陶铸主持搞的《十五条》。

至于所谓刘邓问题升级的说法，也似是而非。把刘少奇的“五十天”的问题与“二十年”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是早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中就提出来的。就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言，从发言纪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为了说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展开论述了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不仅仅是“五十天”，而且是“二十年”。

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还是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党政机关和大专学校，只搞片面的阶级斗争，这的确是新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所在。毛泽东高瞻远瞩，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新的胜利。

问题在于：右派们歪曲事实的真相，硬要把周恩来拉到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一边去。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为了进一步维护工矿、交通企业的生产，周恩来要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可是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陈伯达的这种做法是蓄意对抗周恩来的意见。它还说：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倡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它用这种断章取义的手法，似乎周恩来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苦海、地狱，在形势压迫下不得不违心地去“入”、去“下”。

《周恩来年谱》说：“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谷牧起草出《十五条规定》。《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周恩来得知后，于二十二日同李富春到毛泽东处将此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林彪、江青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

按照他们的这种说法，《十五条规定》不仅是周恩来的意见，而且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这真真是歪曲历史的典型！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如他们所描述的，那为什么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

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并经过讨论补充为十条，还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呢？

再从中央政治局讨论《十条》的情况，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2007 年 3 月 19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2 日修改

第二章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在此以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的三篇大字报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

六月初，北大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矿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次大会上请江青把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强调了两点：第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第二，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二、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京串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时的讲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国家主要领导人林彪，周恩来，陶铸，刘少奇，李雪峰和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在北京体育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在欢迎大会上，陈伯达，李雪峰，康生，姚文元讲话。

江青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好！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

陈伯达讲话：

李雪峰讲话：

姚文元讲话

康生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

毛泽东在同林彪谈话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

林彪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这次讲话还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第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周恩来的讲话，提出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第一，要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第三，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提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时刻都要注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斗垮敌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王力威本禹对“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你们到北京来，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主要是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靠自己本单位群众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搞革命，才能把革命搞彻底。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康生接见部分来京串联同志时的讲话

北京的工作也有许多缺点。有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不管哪一个学校都没有去煽动工人、农民，利用工农压制学生运动。一般说来，北京的工农，学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团结的，当然个别的也有，人大有两派斗争，有一派去公社找了六百农民，他们受了欺骗。郭影秋在社教时表现还好，保郭影秋的就请社员请来了。这个问题一经发现，我们就制止了，说服了农民，教育了学生。在外省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安、兰州、青岛、哈尔滨都不是偶然的。《人民日报》八月廿二日发表的社论中，号召工农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吴德在工人体育馆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毛泽东在林彪接见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修改中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联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传播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从去年姚文元同志第一篇文章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红卫兵有三个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三个队的说法应调一下，学习队放在前面，本来学习为主，把战斗队放在前面，是为了强调一下。

二、阶级斗争的问题

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另外有些人只要不作非法活动、地下活动就不能说他就是反党集团。彭真就超过了。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公开做的，讲的革命话比我们讲的还好，但背后搞的是另一套。文化革命以来，开始逐步的暴露。彭真也不是一下暴露的，也是逐步暴露的。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长期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这和犯一般方向、路线错误的人要分开。

三、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一个地区、省、市性的领导机关，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设想怎么可能哪！如果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都是黑帮，那怎么解释？总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全国的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十六条指出的当前运动的重点。但不能说统统是黑帮，这也不可能。要一分为二。有是有的，但是，是少数。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象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省市领导，中央各部都是如此。所以，你们炮打时免不了要打空炮，

四、多数少数问题。

革命学生，只要在大前提一致下（1，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2，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3，以十六条指示作为斗争的最高纲领。）不管多数少数，都应该承认是革命的。但不能说百分百都是革命的。不能说多数派是革命，少数派是不革命的，也不能说少数派是革命的，多数派是反革命的。那你们可能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合稀泥，是折衷主义。我是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个观点的，是在党中央得到批准的。

五、今后的斗批改怎么做？

六、民主集中制。

七、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各院校七千余名师生员工的讲话

首先让我向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各校革命左派同志们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提醒了我们！（热烈鼓掌，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今天一些学校的革命左派代表到中宣部去谈，发现两个口号单子的问题。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这是我的官僚主义，我没看过。他们给我打了电话，我说我要见到正式的东西。你们发现两者有很大的政治差别，你们提出后一个口号单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是对的！（热烈鼓掌，口号声）希望在中宣部谈话的同学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审查这件事。当时已经深夜天快亮了，我们正在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口号单子，为了使毛主席顺利接见一百五十万外地的革命师生，当时我责成中宣部审查这个口号单子，今天早晨五点，我才发现有两个口号单，并且确有问題，因此才研究确定这个白底红字的口号单。这个口号单

是拿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是在毛主席跟前决定的。（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应该说通过这个口号单子时，是吸收了你们的意见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个口号就是你们提出来的。（热烈鼓掌欢呼）同志们，我们彻底的革命派在真理面前是无所畏惧的！（热烈鼓掌）这二十二条口号是胜利的口号，革命的口号！你们可以公布，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到任何地方贴。

关于那两个口号单子，我应你们的要求，正责成中宣部进行调查，我负责调查清楚，查清后我还要向中央常委和毛主席汇报，并答复你们。（热烈鼓掌）

这个时期的文革运动一大特点，就是学校中的红卫兵运动兴起，特别是中等学校的青少年由学校走向社会，开展以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怀着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 学习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记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学生徒步来京的电话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关于长征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给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又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召集北京各红卫兵负责同志的讲话
明天要接见外地二百万革命师生，我们现在分别开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
林彪讲话指出：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陶铸 李富春 陈毅接见全国三十个单位同志的讲话。十日下午，发生一些人冲击中南海事件，北门，西门都冲进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和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在首都第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前形势。

第二个问题，谈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大民主。

第五个问题，组织问题。

第六个问题，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联的问题。

第七个问题，到北京来请愿的问题。

第八个问题，还有些问题，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不能够提前答复。

是厂矿的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生怎么跟工人联系？

是农村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县以下的中学问题。

是小学的问题。

是半工半读的学校问题。

是 1965 年第一季度大专学校的学生离开了工作岗位，如何解决问题。

是要求成立红卫兵的国际性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等接见徒步串联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十一月十六日中央的“补充规定”、十二月九日的“城市工业企业等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也是十条，这些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以来的几个重要补充文件。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展的时候，就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其次是党政领导机关。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对学校来说是领导学校的，因此和党政领导机关就是个对立面，所以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斗争矛头就对准学校的当权派，学校的领导机关，然后对准党政领导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这是很自然的。

现在农村的十条也出来了，工厂要起来，公社要起来，县以下中学要起来，甚至高年级的小学生和一部分小学教师要起来。要有准备，要迎接它，而不是阻挡它；应该是支持它，而不是约束它。应该因势利导，关心和支持，欢迎这个运动的发展。

工厂的规章制度也要经过实践。北京工人起来了，提出改变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劳保等。我们有的东西是从苏联修正主义那里学来的，有的保留了以前的旧的东西，工人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正确的。工资制度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还有一些劳保福利制度问题，但是要做思想工作，因为关系到几千万人的生活制度，需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彻底的改变。类似等等问题，我们都要把斗批改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进行革命，不断革命。

我们任何一个革命的洪流，不可避免地总会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社会的发展象长江的洪流一样会把两岸的沃土带下去，灌溉新的土地，同时在这种革命的洪流中，会遇到礁石，有时会有暗流、逆流，这就需要在运动中随时注意。

当然有些把口号提得过激一些。没有调查，不可能提得很恰当。例如：到一个地方，炮轰××省委，火烧××省委，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炮轰、火烧，就是要

考验考验你嘛！如果你有路线错误，承认错误就是嘛！如果没有，学生总是讲理的。

某些地方的武斗没有肃清，个别地方有发展，北京在中学里打人的现象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所谓黑帮，甚至对自己的同学，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打，而且不是一般地打。因此，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严禁抓人、打人、私设拘留所。这次我们对西城、东城区等纠察队几个打人的地方拘留了几个人，在别的地方也拘留了几个人。因为他们不但打人，还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应该用专政的工具拘留他们，对他们专政，由公安机关审问他，要他们承认错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运动进行了半年，但是还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允许的。对这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必须斗争，必须打击。不反对这些人，就要影响我们的斗争，革命发展受到阻力，革命群众受到打击，歪风邪气得到滋长。

斗争方式如果在运动初期不很好地提倡，对打人的现象视而不管，那就会出现一种恐怖气氛，不利于运动。过去压制群众，压制左派，造成了一些恐怖的现象。如果让违法乱纪、打人的现象继续下去，还会造成恐怖气氛。现在范围还不太大，但是很不好。请大家放心，我们拘留他们，主要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因为他们是青年，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三、首都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革命串联的全体出征战士《出征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红卫兵三个称呼，也就是表现他的三个任务：首先是一个战斗队。第二还要作学习队。第三，你们还是一个宣传队。联系起来说，学习既为了宣传，也为了

战斗，宣传也是为了战斗。所以这三个任务是有紧密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不是对立的。

有些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第二个是到新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的人并不是太多，大概没有超过四百人。中央有规定：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市城、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其它地区的问题，你们到西北的人比较少，只有八十人的队伍。向中南去的有三百到四百人（三百五六十人左右）。往西南要经过宝鸡，二百多人，甚至更少一些。东北去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陈毅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南下战士《南下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很大好处。

社论一发表，你们要批判的人都走了，这怎么办？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们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处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们就可能辩不过他。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现在还有市场，有人跟着他走。还有没有？（还有！）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谁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

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

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学生外出串联的紧急口头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电影学院“红旗长征队”出征宣言

北京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外出串连，除了到各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到中央党政机关以及文教卫生等等事业单位进行串连。

对于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连和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右派们也是非常不满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从九月五日起，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这种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为古今中外的奇观。”“这种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而且造成了全国的动乱。”“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所谓”识别无产阶级司令部”云云，完全是生拉硬扯，这个目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

右派们的不满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大串连鼓动了青年学生们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他们说这个目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但是，历史的实践却已经证明：革命师生的大串连活动，确确实实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泛开展。

四、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先后走上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修改名称、改变衣着发型、并揪斗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革命师生发出《革命的倡议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女二中红卫兵通告《大造修正主义之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红卫区东方红理发基层商店（原西城区宣内理发基层商店）全体革命职工《告全国理发行业革命职工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后通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红卫兵在“全聚德”点起了革命烈火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讯：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抗大一附中红缨枪革命造反队（原一中）十万火急通令（关于本届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女十五中的四个红卫兵在破四旧行动中，被一个反动资本家的老婆刺伤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十四中红卫军告全国同胞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东方红二中红卫兵紧急呼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五日报道，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 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认真活学活用党中央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串连小报》记者报道：反修的大示威——北京“反修路”命名大会记实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二十六中）红卫兵（卫旗）发出《破旧立新一百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市第一火炬中学 火炬战斗小组发出倡议书：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高举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业学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分校（原一〇一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之火战斗队发出《勒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发出《通告全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旗路大街 111 号（即交中）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报道：北京市人委坚决支持红卫兵造帝国主义的反，取缔反动修女会 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四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誓做国际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坚决贯彻十六条》

五、北京市红卫兵组织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

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吴德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江青杨成武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首都大专院校成立的第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强调指出：有的学校建议取消定息，这个建议很好，但总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有些红卫兵叫长安街为“长征街”，有的红卫兵叫“东方红街”，这就得商量。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王任重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强调了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红卫兵的组织问题。

1，串连问题：将要派出一部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帮助搞文化大革命，交流经验；还要组织各地学生来京学习，交流经验。

2，名称问题：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十一中全会时有人提出过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主席自己不赞成。用毛泽东思想已习惯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自己也不赞成，强加给他就不好。你们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登报

不登报？不登报就批评；上海就未登，说《人民日报》未登过，中央不表示态度，这是对的。我劝你们讨论一下，是否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别的什么好嘛！

3，组织问题；第一司令部成立时，我派人去参加了。这一次也要派人去参加，支持你们是一视同仁的，如出现第三个组织也给予支持。

第二，关于扫除四旧中的政策问题。

1，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不仅水电，就是有些商品，生产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厂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革命的办法要求他们，他们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产，科研的中间性生产，不应耽搁，尽管里面有黑帮，把他揪出来，但生产的地方我们不要破坏它。

2，关于地、富、反、坏、右，一般在城里已经落户的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已摘掉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

3，对资产阶级，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4，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对一些知名人士超过大字报的范围就要研究。你们从人家家里搜出花名册子，这些小册子无非是通讯地址，就按此追踪。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有地位的人。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象，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搞掉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宋庆龄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你们，因为她年纪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她出来写文章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她还在政府工作。

5，关于小商贩你们建议变国营的问题，几百万小商贩全部包下来，国家负担很大，发工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等，什么都享受，他们是高兴的。

6，关于干部家属，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的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

7，打击流氓的面太宽，如八月十三日审判流氓的会就是错误的，是北京市委批准的。那五个人刺伤了两个人，也不需要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警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以后就有影响。

8，文斗和武斗问题：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铁帽子，这就变成体罚了。

9，搜查问题，确实要搜查的，你们也查出了不少东西，但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然听到一个情况紧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区听说有地下军，去了几千人，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是否要没收他们的金钱、东西？要事先和派出所，卫戍区研究。你们把钱交到银行，把浮财交财政局。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只登记，今后要建立秩序，不然有个别钻进来的坏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机、手表，即使查出来开除他，影响也不好。交了东西要有登记、有收条。发现武器可以没收，但不要只听一个消息，“谁有一把菜刀要报复”，就把他的菜刀也没收了，过几天还是要还给他去做菜。

10，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解放军、公安部门（坏的可以改组），专政工具不能瘫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不要影响他们执行任务。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不能随便乱搞。还有机关重要档案，如机关瘫痪了，由上级机关取走，不能随便去弄乱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修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刚才有的同学发言中批评我们只关心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不关心中学的红卫兵。这个意见我不能完全接受。

有的中学红卫兵说，八月十八日前大学没有红卫兵，是中学闯出来的。这也不全是事实。

不能认为你们提出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不可改动的。八月二十三日，我首先接触的是十五中与警察同志争吵，十五中的同学又提议要改变红绿灯信号，要绿灯停，红灯放行。与各方面一协商，司机同志首先不同意。八月二十三日，有几个中学要组织十万人大会，公开审判五个小流氓，之后，反动资本家砍伤十五中的学生，你们又要组织十万人示威活动。这样一搞，反而倒使这个反动的资本家扬了名，扩大了敌人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一、关于破四旧与斗、批、改的矛盾

斗、批、改就包括在破四旧中了，并不矛盾。

二、关于本校的斗批改与外出进行革命串连的矛盾

这两者并不矛盾。

三、关于斗批改与肃清工作组的影响的矛盾

工作组的影响确实有，因为有 90% 的工作组犯过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错误。这个好办。如果你们认为他们的检讨还不深刻，可以让他们再回去检讨。

四、关于本市红卫兵与外地红卫兵的矛盾问题

有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要人家滚回去！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车站上的纠察队同志很辛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外地来的红卫兵也有些对立情绪，这也不好。有的地方把一列车拦下，查了五个多小时，把一部分人查成黑五类要他们滚回去。这是可能的吗？

还有一个是对黑五类子女的处理问题。总不能把他们全部赶走啊！我们的方针是对那些有血债的暗藏的逃亡地主、现行反革命分子才赶走。有人简单地说一句“送到农村去！”农村那来那么多的土地给他们种啊！

五、关于红卫兵与共青团之间的矛盾

共青团中央是揪出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共青团领导都烂了，不能因此解散共青团组织，不能说两千多万共青团员都烂掉了。

六、关于各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的矛盾

革委会不是红卫兵的直接领导，但关系还是有的。

七、关于八月十八日以前的红卫兵与八月十八日以后的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我不赞成这算个矛盾，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矛盾。

八、关于红卫兵与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只要是大方向一致，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按党的政策办事，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组织起来的一切红色组织都是合法的，都应该被承认，都应该受保护。可以允许几个不同认识的红卫兵组织存在，没有关系，可以进行革命竞赛，在革命斗争中来进行比较，看谁干得好。但是我们相信经过一段革命风浪斗争的锻炼，最后总会万水朝东归大海，总会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里，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统一起来的。

九、关于红卫兵与非红五类青年的矛盾

在当前，这是一个重大矛盾。你们在院校中把家庭出身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惟一标准，这就可能发生偏差。一个人家庭出身他是无权选择的，他可以背叛剥削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真革命，假革命，要长期的看。首先出身好有了一好，表现好，两好才算全面的好，要看革命表现。这话我说过好多次，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你还没出来，你怎么选择？你出来以后就没法选择了。我的家庭出身不是我选择的，革命才是我选择的。第一个不好是客观存在，但是能够改变，背叛了资产阶级，投降了无产阶级，就是好的。你们今天敢闯，再闯也闯不过毛

泽东思想。毛主席作了深刻的社会调查，哪个小将敢说闯过毛泽东思想了，那不是太狂妄了吗！

家庭出身好，现在表现不好，忘了本也不好。我们老革命还要保持晚节呢！你们新革命更要闯风浪，受考验。你们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体、为核心、为基础这是对的，吸收其它劳动人民出身的比例怎么样，你们自己考虑。

对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只要他坚持革命，我们就应当欢迎。对一些职员、小商贩，甚至黑五类的子女，我们总不能全部把他们赶走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从小学到大学，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女，中农的子女，还有资产阶级的子女。就是一般地、富、反、坏、右，只要不是暗藏的；就是历史反革命，只要不是现行的，没有暗藏反革命的东西，老老实实在街道上改造；还有过去国民党、三青团，过去为非作歹，现在改了的。这些人的子女，你们都把他们赶出去，不可能，当然吸收一部分去劳动是可以的（有的到新疆，有的到别的地方）。但是不能全去，尤其在这个过渡中，存在的这些同学，你们能全把他们赶出去吗？那样我们怎能达到团结 95%以上的人的目的吗？据我调查，清华的红五类占 40%，职员、中农占 20%，剥削阶级出身占 40%。如果只要红五类，不管后两种，那么团结 95%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对这些人进行改造，也是红卫兵的一项任务。有的同学非让人家先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然后再去改造他们。骂了他们，还要他们高兴。这要多高的觉悟啊！如果你们光骂我一句“你是混蛋！”这我也不高兴。你们说：“你过去是混蛋，现在改造过来了。”这我可以接受。同学们，那样骂他们一句是痛快一下，但很不利于我们改造他们的工作。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团结了。你们要从团结 95%以上同学出发，即使是最典型的右派，现在也还不处理。这是一个全学校的组织问题，不是属于红卫兵的范围。红卫兵总是少数。学校要有个组织，最好是革命委员会，中农出身的同学也要有他们的代表。

你们提出，学生忙闲不均。你们成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闲得“四脚朝天”。这样搞法他们怎能不闲呢？外出没有红袖章，感到灰溜溜的，他们只好在家看小人书睡大觉了。我们能实现团结大多数吗？十六条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你们要好好研究十六条，不要把很大数目排除在外。你们是少数，但不能孤立。你们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教育争取团结他们。

同学们！要允许别人革命。运动初期，有些问题跟不上来是允许的，免不了伤一些人。但是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运动了。你们天天骂他们，能改造他们吗？有人说：“对资产阶级子弟为什么不可以骂？”骂是达不到改造他们的目的的。

十、关于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正常现象。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委会《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过在辩论当中，你说他是黑帮，他说你是黑帮，还有人说要先骂后辩，这不好。

有人提出炮打周恩来，可以嘛！这是经过主席批准允许的。

还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十万份，这能行吗？

我们对有些大会要过问嘛！如北京公审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就不对。还有师大附中对一个同学杀伤另一个同学要开十万人大会，再有一次要公开审判资本家李文波的老婆大会，还有反修路，要弄几十万人去游行，我们劝说了，后来还是游行了。我们叫部队徒走去保护了。

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北京去的同学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资本家）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发了一个电报去制止了。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街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抄。

有的同学说：“只有武斗，才能文斗。”北京有的同学到上海去说人家是“温斗”，这是讽刺，抄了十万资本家还算少吗？

不要掌握武器。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可以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

经决定了的。在上海，有些红卫兵冲入军医大学，要人家组织红卫兵，人家欢迎他们开大会，但不同意组织红卫兵，这是对的。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设点押人不能搞。

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登报，不能公开，有些公开了的可以，不能公开的不可以。《黑龙江日报》登了斗省委的消息，这是不对的。前北京市委改组了，我们还没有点名字啊！学生斗争不能拍电视，哈尔滨搞啦，我们说服了。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中央是信任的，他去不久嘛！几派同学都去和他谈，谁谈了以后都说潘伯伯你累了，你休息吧！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十几个晚上睡不成觉。后来我们就叫解放军看管起来了。

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不能说是右派，反革命。张承先犯了路线错误，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蒋南翔，我们现在还没有作结论。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就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我是反革命或不革命。你就是十万同学和我争论，我也不能同意。

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

工作组检讨再深，也不能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

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

八月八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

九月十五日天安门接见原计划是七点开会的，毛主席五点钟就去了。他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去了，主席走向群众，我们开道，我很着急，把我的嗓子喊哑了，到现在还没有好，一千多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主席提的，事先没有想到嘛！讲话时没有提到红卫兵是个缺点嘛！主席常常抓到了，可我们没有抓到。八月十八日主席提倡了，红卫兵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到廿号就冲向社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拿清华来说，是这么个形势。因为少数批判了工作组，和他们对立，因此，工作组就是挑起另一部分学生斗争这部分学生。这个错误属于工作组的。因此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拿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来说，几乎很难找到不属于这类型的，也许这里头程度上有深浅，错误的严重有深浅，有多一些，有少一些，有做得恶劣一些，但是，这类错误带着普遍性，不仅北京，甚至于在全国，这种错误也几乎是很少有例外。这个错误，主要的责任应由上边来负，工作组负一般性的责任，工作组长负更多的责任，而主要的责任应由上级，首先是中央在当时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来负。所以提到路线错误、方针错误，应该这样来追。

有的是工作组本身或者主要负责人没有认识了这个情况，没有作深刻的检讨，向给在工作组领导的时候，所压制的、所打击的、所排斥的少数派同学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宣布被错打了的那什么反革命啦，什么非法的啦，什么右倾的啦那些帽子，应该统统的取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据我知道也有一些部门，就是对工作组所派出的部门，没有依照党中央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负责解决这个对于少数派的这种错误政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向的问题。

我可以站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地位来说这样的话：就是凡是你们一直到现在，在过去工作组的时候，加在你们头上的那些错误的帽子、错误的名称、错误的行动、乃至一些恐怖等等，我来代表中央说一句，这些错误的东西，统统应该一扫而光（长时间热烈鼓掌）。就是说，凡是错误的行动、错误的称呼，统统应该取消。那些东西一律无效，然后再把它烧掉。被迫的写出来的那些检讨，统统还给你们。

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就是八月十二号、十三号广播，十四号见报的。它总结了过去的四年，从党的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四年功夫里，毛主席是从继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当时五十多天领导上的错误。

你们这些不管是那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对你们也说是革命的，对他们也说革命的，那么你们要问：你这个是不是合稀泥呀（大笑）！我不承认，我没有合稀泥。我是站在毛主席的思想、党中央的方针上、立场上讲话的。我们要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甚至在发动以前，我们许多大学已经大字报贴出以后，尤其特别是毛主席自己批发了的聂元梓七位同志大字报贴

出来以后，首先是北京的各大院校、中学以至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的革命运动起来了，然后，根据党中央的提议，放你们的假，闹革命。这样的，尤其是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决定宣布以来，那就更加风起云涌的发展，就在这个情况下，我说我们的大专院校、中学校的组织，它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有三个：第一所有的革命组织，青少年的革命组织，都承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第二点，你们都是承认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党的十一中全会，八月八日十六条决定发表后，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你们是承认的。所以这三个大前提，领导、方向、纲领，我跟许多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过。没有那个提出说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既然大前提都相同了，所以不能在中间选一个说：你是革命的，他不是革命的，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承认这个。大家有共同的领导、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纲领，问题是在于行动，在于实际的战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一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二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全国少数派同学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工作组了，还采取其它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

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

凡是这样一种背后操纵的，不是充分酝酿反复讨论的，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同学、广大群众的，总是由背后操纵的，而是利用这个工具继续执行错误路线、镇压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律不算数。

因为当前错误路线还是通过这样一个群众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它是通过他们操纵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这个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要判批它们这些组织的问题的一些错误。我们斗争的锋芒还是要针对那些操纵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不执行正确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但是涉及到批评这些组织的缺点错误。错误路线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对他们提出一些批评，贴他们的大字报，同他们进行辩论，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不能叫做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锋芒是针对那些背后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批判，而不是针对对着这些文革组织里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子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

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对于我们有一些革命同学提出，曾经提出了炮打××省委，他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地委的或者××党委的口号，他们就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就说提出这个口号来是反革命，这样子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够、不允许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不能用这样子的提法来拒绝革命同学对自己的批评，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采用这样的口号）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考验自己，就是好同志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拒绝批评，拒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

也不要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

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我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比如说 1945 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叫革命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界限我们是不赞成的。

我们没有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

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八月四日我在清华就讲了，八月廿二日我又讲了，九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亦如此，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后来被人家搜出来了。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

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语学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

（外院一同学解释了一句）

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当前要看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什么“自来红”，这都是谭立夫在胡说八道。

目前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不能集中杀牛，这都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也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样一来，把国际统战工作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实右。

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首都红卫兵》编辑部《一切权力归左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同学时的讲话

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衷主义吗？不能说是折衷主义。这是群众观点，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关锋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张春桥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也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在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四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这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北京市到处造反，你们红卫兵总是有些方面保。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基本上是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了很多人，数量很大。矿业学院、外语学院都整了。过去你们这方面整人整得也厉害，我不赞成学生斗学生，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不算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不算群众斗群众。我不赞成批判你们。

有一个人，就发展到对立面去了，反对林彪同志，说“这都是林彪搞的。”

你们要顶住，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後，可能会有人说“投降”、“投机”、“叛徒”，我看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真理投降，这不是耻辱，是光荣。

我希望把三万红卫兵带好。现在不是抢东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三万红卫兵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如果将来出现修正主义，就这样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首都红卫兵》记者文章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批判斗争中，被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二十二个问题”）得以昭雪，就因为写这份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同志得以平反。平得好，非平不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关锋王力接见少数派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关锋说：第三司令部不要超出来，要改变其实质，名字改不改不要紧，要顶住，不要垮！井冈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蒯大富要批评。第三司令部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复杂不要紧，发展总是好的嘛！左派千万不要因为一些问题闹意见。有人说，不纯，从十八人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队伍不纯是可能的。资产阶级攻三司，实则攻我们，退出对革命不利。反蒯有两种，蒯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名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锋王力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北京市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时的讲话

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现新的反复，需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把工作总结一下，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整顿队伍、扩大队伍、注意策略。

十月份以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联以后，受到围攻的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味道的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给这些同志扣帽子。

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委有个重要通告。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转到全国去，行凶打人，砸，这样不行。

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想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的信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到工厂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工厂革命还要靠那里的群众，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学会当小学生，学会和工农相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志的谈话

因为工厂发生几件事情，都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搞的，搞来搞去就搞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现在你们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可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幕后指挥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幕后指挥。

你们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吧？

听说上海工人贴我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辩护，可能明天大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陈伯达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如果你认为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那完全可以贴大字报。

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我们说工厂革命有根本两条是：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个钟头或四个钟头的文化革命，总之是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还有一条是，组织一个领导的班子，由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首都红卫兵》社论《再论坚决平反、彻底平反》

六、各大专学校开展大批判大辩论

清华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小组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清华大学 1053 战斗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一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同时，也还有的同学感到他的自我批评还不够。我想他基本上认识了是站在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

工作组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不单是工作组，也不单是清华的工作组，几乎带有普遍性。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这种情况，就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这是我们在中央全会详细讨论了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清华园必须大“乱”》

从以上几个文献资料来看，当时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始终牢牢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批判刘少奇的路线错误、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的大字报《革命少数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再论革命的怀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学的谬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一号决议——关于组织原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二号决议——《关于对待各种组织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第四号决议——关于转抄印发首长讲话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第五号决议——关于保护少数

一九六六年九月，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林杰对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雍文涛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谭立夫同学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同学对他的讲话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因为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观点不是谭立夫一个人的问题，是错误的影响未被肃清的反映，这正是我们赞成批判谭立夫同学错误言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其他。当然，一时受蒙蔽的人如果觉悟过来，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与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作斗争，那他仍然是真正的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而且必须彻底肃清他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你们说九日（指开会）没说八点。昨天才知道今晚八点开会。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查？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

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陪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它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

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

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对清华大学要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的批示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井冈山第一红岩战斗组《一百个为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

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

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

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

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

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讲话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吧！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

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北京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学生乔兼武 杜文革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 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十一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深夜十时许，《紧急呼吁》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紧急呼吁》。

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北京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贴出《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等等标语口号。

北京师范大学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 李文博的大字报《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戚本禹余秋里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兵团在天安门宣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孔家店的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发刊词：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告全国革命人民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点建议》

北京农业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谭震林在农林政治部接见北农大工作组讲话
错误是中央犯的，检讨你们去，具体地说就是少奇、小平同志，你们不要讲他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陈伯达同志三次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出了问题不能让少奇同志检查，我们这些人去检查。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北农大的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犯路线错误，还是发动了群众，如选革委会问题，北农大的革委会还是控制得不错。第二是红、黑线划分开，一共搞了九个党委委员的问题。第三搞了黑帮。如有缺点那是抓得不紧。我们分析当前阶级斗争是复

杂尖锐的，形形色色都出来了，好嘛！让他暴露，让他放！不要管。机关找个办法，要成立红卫兵，有人不赞成，农口是统一的，别的口不统一。掌握红卫兵不能靠联络员，要靠我们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谭震林对北京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

有关农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过去我这样讲了，现在也不收回，总支、支委改选以后要管党的生活，所有党员都必须执行十六条，学好、用好语录，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当权派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农大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郝文等一帮，一个是改组后的党委。“保皇”与“批皇”相结合，只保不批是无原则的团结。炮打司令部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开炮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司令部而言的，不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互相打。

北京工业大学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谭力夫贴出了以“鬼见愁”署名的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后来这幅对联的横批又从“基本如此”演变成“绝对如此”。）

对联的意思很明确：老子是高干，儿子必然是英雄；父亲是“牛鬼蛇神”，子女则天生反动。

这副对联一经贴出就立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对联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与他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

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中国医科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不好，我也有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

北京航空学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冲锋》：《论少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林杰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康生谢富治杨成武与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代表谈话
康生说：你们这个《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写得很好嘛！你们批赵如璋批得很好嘛！

谢富治说：谭力夫的讲话是修正主义的。你们在科委和赵如璋斗争二十几天，做得对！干得好！

杨成武说：你们“红旗”不是臭，而是香，他们说你们臭，领导说香！西城区纠察队精神可嘉。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北航红旗战斗队《论“怀疑一切”》

“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批判、要革命、要造反。“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怀疑一切”决不是“否定一切”。我们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相信经过人民检验，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相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事业，革命斗争一定能取得彻底胜利。除此之外，我们都要怀疑。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戚本禹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部分战士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江青对北京航空学院同学的讲话

陈伯达说：你们这么多同学，到体校住，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

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所以人家认为北航是我们指挥的。其实你们一举一动，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工人他们有这些行为，你们不要有对抗情绪。他们是受了蒙蔽，有人在幕后操纵，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幕后操纵。你们不能怪工人，昨天我在第一机床厂替学生说话。今天我替工人说话。可能你们要批评我折衷主义。

江青说：你们的主流是非常好的，但不太讲究策略，我就忧虑。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以后，你们又出现了新苗头，分不清敌、我、友。这是战略问题。7号晚上同学们发了一个电报，反对我们总理。我不知道总理说了些什么话，我知道总理受中央、主席的委托。这样一来就要大乱。最近又有叫依林的，贴副帅的大字报。林彪同志，恩来同志，我认识三十多年了。贴出来后，又撕了。不经辩论，这不妥当。我觉得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对他们不要用“保皇派”、“罢官”等名词。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同”是原则，“异”是枝节。第三司令部不是已分裂，第二司令部不是被抄家了吗？有人问我怎么办。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分裂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蒯大富到哪儿去了，来了没有？他脱离群众，做起总指挥，不到群众中去就不行。对过去曾经整过你们的少数同学，只要他们检查得好，承认错误，又有揭发，可以让他们归队。对高干子女，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走错了路，不怪他们。要怪他们的中年人、老年人、幕后人。你们要主动找他们谈。他们有人找你们谈，你们不感兴趣，对吗？谭立夫作了一点检讨，不坦白。你们不要采取他们采取过的办法。对谭立夫，也不要打他，要批透他，批倒他。批不倒还算什么本事？对承认错误的，要欢迎归队，要把是非搞清。

北京地质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

北京地质学院成立的东方红公社是北京大专院校中成立得较早的批判刘少奇错误路线的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

关锋：希望你们参加今天的会，批判斗争邹家尤。邹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邹家尤是革命的话，就该这样做，谁有意见他就去听。还会打死他吗？不会的，我们应和同学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么就说什么嘛。邹家尤一定要来的，不来是不对的。允许对邹家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允许说邹家尤是好的，也允许说邹家尤是坏的，你们若是认为不需要批判或者现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们不能妨碍他们批判。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关锋吴德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第一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查，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该随叫随到。第二条：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该去检讨。第三条：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工作组没有意见，或者已经没有意见了，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援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的行动，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的。第四条：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是不能说是错误的，是对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认为对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要彻底肃清它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消除流毒。应该进行平反，造成另一种舆论。只是口头上说“我错了”，这不管用，他们（指“东方红”）的检讨材料和你们整理他们的材料，必须交回，随他们自己处理。院文革我建议你们也考虑一下，不要搞清一色。“东方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吸收他们参加？也应吸收他们参加。

北师大的工作队队长撤了职，一机部派人去闹，说北师大右派学生有问题，右派学生的后台是林杰——关锋——康生——陈伯达，一直追到中央文革去了。

西城区纠察队到地质部打了人，扣了八个人。为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会来地质部，你（指邹家尤）为什么不出面？而你的女儿在那儿，群众火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女儿带着人去骂“东方红”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群众说话嘛，要教育女儿，不要保老子，不要保爸爸，是好人也用不着保嘛！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李富春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

（一）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

（二）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销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

（三）《东方红》不是反革命的，要平反。叫何长工宣布，向全国宣布。

（四）卓雄可以调回来。（卓雄是地质部付部长，因犯错误调往××探矿机械厂，调回是因为《东方红》同学了解情况所需要）

（五）下次开斗争会时，何长工、胥光义、赵承来、旷伏兆、卡固都要参加斗争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荣鑫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工作组临走时留下了这一部分材料应当交出来。第二：工作组走了后，院文革还继续这样做，这一部分师生员工材料也应当交出来。第三：你们红卫兵也有些内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对方的，今天上午也达成协议，也要交出来，这些材料交出来怎么处理，双方各派出四人，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点清，双方达成协议，找一个地方暂时封闭起来，我们国务院市委也参加一、二个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学生来做。

北京机械学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全国红五类子弟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二战斗组《南下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毛泽东主义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处办《紧急呼吁书》

北京铁道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陶鲁笏在北京铁道学院的讲话

北京矿业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的讲话

煤炭部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

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死了三个人，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啊！蒯大富，现在他们不是反对吗？差点被整死！有一个同志卧轨了，他写了遗书，是很好的血书，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情？他卧轨没有死，压断了一条腿，现在还在医院里。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性。你们看看王光美，她是凶神恶煞，他批示工作组长作报告，她光写厉害话，简直是凶神恶煞！王光美是什么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腐烂了！你们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电影吗？你们再看看，那是大毒草，那才是真正的大毒草。有的人给我贴大标语，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看给她贴大标语，她是什么东西？那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啊！电影出来后，她很得意，很欣赏，飘飘然，自以为得意，丑态百出，简直令人作呕！我建议你们看看这部电影。她个人坐在屋子里边，戴着项链，穿什么衣服，她是哪个阶级的？

秋后算账是从你们院传出来的。（同学们说：是王任重搞的）王任重你们很了解，我就不说了。（同学们：不了解）王任重原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事中央文革不知道，是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揭发的。

你们可以揭发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这里不是有许多“反革命分子”、“起义的叛徒”……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如果我们是叛徒，我们就是要叛变他们（指王任重），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徒。

你们抓了三个人是吗？我想，除了那些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要抓，这些人是反革命的，对那些反对戚本禹的不要抓，你们抓了没有？（同学：没有！）你们做得很好，没有抓。戚本禹可以炮轰，戚本禹是不怕炮轰的。（掌声）不要给这些人扣上“反革命”，这是我要说的。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也不要抓，这是陈伯达、江青同志要我代他们说的。但我个人的看法，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要批判。搞秘密组织进行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活动的要抓，要坚决镇压。李洪山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应该抓。

北京化工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谷牧接见工交联络站和北京化工学院部分师生谈话纪要

谷牧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象薄一波烧材料，销毁罪证，这是明明白白的反革命行为。具体到部里的问题，是没有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是抵制中央指示。

“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我们研究过，现在先搞起来，没有经验，十条中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进去，工厂中这么多造反组织，一个脱产的也没有，不可能。按十条规定，不提倡脱产，要在业余时间干革命。基层干部要做到能上能下，最好半天生产，半天脱产，不能形成管理阶层，不能一脱产就在上面发号施令。文化大革命中，脱产的要少些才好，脱产的要尽量少，脱产越多的越没有发言权。南昌有几天除了水电厂外，都停工了，有的工厂也临时停工，这不好。要抓革命、促生产嘛！

我承认你们的联络站，凡是你们革命造反的要求，我们都积极支持，必要的物质，我们一定给你们。关于薄一波的材料问题，薄一波批的文件，薄一波与陶鲁笳在各地的演讲稿可以给你们。只要有利于揭发薄一波的问题，又不违反中央的保密规定就行。这点我们是一致的。在工交口不把薄一波的问题搞深、搞透，

毛泽东思想的根就不能扎深、扎牢。以前我们想先批刘、邓，然后再批薄、陶，这是框框，看来群众不等我们了。薄一波是与刘、邓联系在一起的。工业七十条、托拉斯就是他们搞的。我们和你们一起干。

我们是上压下挤。欢迎你们造反。

北京医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陶铸认为：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向卫生部要材料是革命的行动。

十一月三日发生的争执（指北医，医大同学向卫生部要黑材料，从而和卫生部部分群众发生的一场武斗）主要责任在卫生部，不在同学们。

打开窗子，柜子等，这是卫生部逼出来的。但这样的方法以后不要用，不要宣传。

已经拿到的一些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有的退给本人，有的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有的销毁。还没有拿出来要交出来，中央有详细的补充规定，传达下来以后，按新的规定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该抓的不抓，是我们的错误；不该抓的抓了，并不证明我们有力量。不是有人造谣说我们要抓三十万吗？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在中央通报前，有人操纵打人，但打的都是坏人。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坏人打好人，镇压革命，所以中央发通告，要抓人。

北京外交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陈毅接见外交学院革命造反派及红卫兵战士时的讲话

国际关系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邓小平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革命师生怎样团结起来，自己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撇开院党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一斗、二批、三改。”。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文革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语言学院部分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十位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华侨三校代表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陈毅接见外事口几个学校的学生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斗争张彦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陈毅在外交部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同学们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外语学院工作组长刘新权问题的口头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与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组织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说：你们说经常汇报思想这个方法好不好？我看这个方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上一个不健康的東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这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更严重。所以，刚才谈到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感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灌输奴隶主义，使党员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我们党内一直没有肃清。这次非把它肃清不可！按这种恶劣的作风培养的所谓老实党员，都是盲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讲话摘要

周恩来说：你们到（石家庄国棉）一厂去贴大字报时，中央关于工厂的十条还没下来，你们走在前面，闯对了。现在十条公布了，肯定了你们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和第二外语学院代表的指示

中央民族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

北京政法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政法学院作的八点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谢富治给北京政法学院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童小鹏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座谈纪要

北京师范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首都三司北京师范学院红旗大队军号支队《彻底打倒折衷主义》

北京邮电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阎长贵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群众喊“要求罢陶鲁笱的官”，我说：“重要的不是罢官，重要的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反对这个错误路线过程中，提出对以谭力夫为代表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对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批判并不是群众斗群众。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我们就要很好的团结他们，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因为这对团结多数很不利。如果有人利用我的讲话说革命同学是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这是错误的。

北京广播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在广播大楼门口接见革命师生谈话
姚文元来跟大家见面了，姚说：同学们！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对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指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周总理命令学院工作组组长李哲夫：按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处理黑材料。

周总理第二次电话指示：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暂时撤出，你们找五个代表，我派一个外事秘书和你们一块搜查。

中央戏剧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北京体育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江青对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江青说：“贺龙是保刘的一个干部，是站在反动路线上的人，应该搞一搞。贺龙解放后一直衰退，这回想混过文化革命，所以要触动触动他，但要适可而止。”

这一部分由于掌握的材料限制，对各院校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论述很不全面。但从中可以看出，比较典型的是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

七、红卫兵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一）关于一副对联的辩论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一股歪风

（一）自来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贴了一副“鬼见愁”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写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写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清华附中 高六五五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写的大字报《做顶天立地的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 刘京、谭力夫的文章《从对联谈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从谭力夫的发言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在红卫兵运动中，关于“自来红”问题的争论，是与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问题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下面，谭力夫的另一个发言，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大字报《撼山易 撼红卫兵难》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北航附中革委会、红卫兵《关于对联的回答》

在“血统论”影响下的破四旧行动中，北京首先开始了批斗、殴打地富坏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学、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皮带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怒斥声不绝于耳。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我讲第三个问题，你们没提到，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

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们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全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长期的革命工作。我们这一代做不完。如果你们做得好、能完成，做不好，还要你们下一代去完成！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要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了，这是一株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从中吸取点‘油水’。脑子里有了‘油水’就可以跟他辩，把他驳倒。你们不把谭力夫的讲话驳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谭力夫：《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我的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最近有些人总爱讲红五类、黑七类的，把人分成等级，这样做不对。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现在是不合适的、错误的、反动的。有人问，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是矛盾，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见人的成份。但不依它为主，要时时，处处看人的观点。

(二)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二) “纠察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在王任重的指导下，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二）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坏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评了这个呼吁书，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王任重。

正如王年一说的：在红卫兵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央上层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 31 所中学红卫兵的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三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业学院一中红卫兵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四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北京人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项禁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五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六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七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九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十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定要坚持文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第六中学学生程家宝等三人被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打斗八天之久。程家宝等人的揭发材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学生王光华。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战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近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一切当权派、炮轰一切司令部”，这是纯粹的反革命口号。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红卫兵报》编辑部《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

叫嚷什么“要怀疑一切！”这个口号很明显地就是在公开地与毛主席唱反调。它们叫嚣这个反动口号，其目的就是妄想煽动群众去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怀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它们变天做舆论准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战士 滕久昕《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最近，有一小撮资产阶级狗崽子叫嚣什么要：“炮轰一切司令部”，要“打倒一切当权派”，……这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退休老工人徐沛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九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毒打六中教师王明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毒打工人高生金并关押其八岁的儿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晚，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市第六中学视察。

讲到了“劳改所”时，陈伯达十分愤慨地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不管对什么人，这样搞都不行！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吵架也可以，但不要动手，武斗。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傍晚七时多，陈伯达、吴德等等又一次来到六中。直奔“劳改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刺杀六中耿小西。
继“劳改所”之后，红卫兵中的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

（三）“炮打中央文革”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红后代 铁血纵队《中学生问中央文革——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一问中央文革小组》

这张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主要是：当运动中中学小将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时，有些人藉此大骂小将们是“保皇派”，“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等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么不出来支持革命小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二问中央文革小组》
这篇大字报主要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对两派不是一视同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林院职工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外地革命师生同李洪山辩论整理的会议纪录

李洪山说：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十月六日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分裂了，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还有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谭力夫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永向东战斗队等《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甚麽路线？》

它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左”倾路线。具体的事例有：从六月二日以来到七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扭转方向。江青等在北大定下了调子，说张承先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扼杀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十月六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并非全体同志）打着“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懂得策略”的旗号搞关门主义，执行“左”倾路线，把运动又引向了邪路，在全国又搞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新形式。

“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等等口号满天飞。最严重的事例：把一个青年学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血统论，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是彻头彻

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阶级分析相对抗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等《踢开中央文革小组 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小组》

它说：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我们所反对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同志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比“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要“策略”一点。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北京女二中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问得好 —— 支持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永向党战斗队等《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二个月运动的总结》

这篇文章自己把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了。但恰好是它在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易振亚，万会秦在林学院辩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觉得和李洪山一样必须踢开。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若干问题是原则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老红卫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批在文革中起过先锋作用的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一向自命不凡，绝不会赞同文革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
最大威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北航红卫兵纵队《批评和监督中央文革的典型意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 颜晓东《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他说：十月三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十月以后，关锋、戚本禹等人，挑动少数派斗争多数派，他们对多数派施加压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捍卫十六条战士《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

它说：十二月四日，首都的革命学生把彭真等黑帮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对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必须斗倒、斗垮、斗臭。但是，它似乎给了某些人立即转入斗批改的信号，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批完了，进行斗批

改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人正在酝酿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跟关锋、戚本禹进行辩论的问题，于是他们进行了“急刹车”。这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是批判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立夫讲话的错误？》

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文革为谭力夫平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第一把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物理系 刘中桓 杨川昭《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两位作者认为：农大附中伊林，滌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二）——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

一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就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我们要向中央文革小组，你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民主呢？还是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引下的小宗派的民主呢？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然而某些同在这段时间里实质上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怀疑一切”（实质上是否定一切）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观思想，“一切权力归左派”（多数就无权了吗？）是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自私自利思想，“红色恐怖万岁”（是指向群众的，而不是象前阶段指向地主、资本家）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报仇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所欣赏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四问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刚刚贴出以后，马上遭到猛烈的围攻，在《二问》《三问》相继贴出以后，现在又有更大规模的围攻现象，把我们诚恳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诬蔑为“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写出各种各样的大标语，什么“砸烂你们的狗头”呀，“你们是反革命”呀，“八一纵队的一小撮混蛋们，你们没有好下场。”有的甚至叫嚣“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宰了他王八羔子”……满城皆是。总之，开动了大量宣传机器，大骂八一纵队……扬言要“抄”我们，要“砸”我们，跟踪我们，绑架我们……我们刚贴出大字报，马上有人用大标语覆盖上，有的甚至刚贴出不久，便被撕得干干净净。出现了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搞得最激烈最凶的是以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少数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在前段（尤其是十月份以来），支持了造反派（少数派），大大解放与助长了其造反精神，同时犯了路线性甚至有些是方向性的错误。它片面的支持少数派，而甩开多数派。就是在这个低估多数派的革命积极性，实则是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指导之下，中央文革未能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抬高少数派，客观上压制多数派，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辩论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如陈伯达，江青，关锋）就给定了调子，后来越提越高，堵住了不少人的嘴。关于“谭力夫发言”的辩论也刚开始，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就在辩论会上定了调子，以后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

戚本禹，姚文元等也定了调子……等等。前段“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等帽子满天飞，向多数派频频袭来，促进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加剧，陈伯达同志在 9.25 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会后，联动成员在北京广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

（五）首都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朴

（四）党中央耐心地对犯错误的红卫兵进行教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对首都高校红卫兵的讲话

经过七个月的斗争，各个组织都要回顾一下，有的坚持批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工作组，批判负责领导机关，一直坚持到底，这是左派。这种坚持性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组织有：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第三司令部、政法公社、首都兵团、第二司令部形成的造反联络站。

有些组织，特别是中学，运动初期，在工作组撤销后，象北大、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等，阻力小了，冲向了社会，他们取得了成绩。我开始接触的都是中学生。从红绿灯到警察的服装……比较有成绩的是反修路的开幕，这些尽是红卫兵干的事。这是九月初的情况。后转为大学，成立了第一、二、三司令部。第二司令部开始偏于保守，也要支持。第三司令部人数少，也要支持，他们过去是受打击的。

十月提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红旗》十三、十四期社论，十月六日我们在工人体育场把态度表得更明显了。运动是发展了，今后还要发展。过去偏于保守的、中间的，今后方向如何？要向上。第二司令部十月二十二日他们表示要开门整风，我欢迎。我说，为什么你们处于保守、相信工作组的话？要检查怎么受骗的，多数是不自觉的；少数是自觉的；多数程度不严重，少数程度严重。开门整风人家先批评这更加不容易，这种勇敢精神我称赞！（同学问：第一司令部属于哪一派？总理回答：）第一司令部开始成立时（后来有变化）偏左，后又改组。现在是保守还是奋斗，由群众来定，最好不由我来封的好。

西城区纠察队以前有些成绩，但骄傲起来，犯了错误。我不是下结论。看了你们（指西城纠察队）的第一号至十三号通令，我倒要研究一下。如第一号就有问题，对老干部要保护，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要求老干部，包括我在内，要让老干部继续革命，要求前辈好好革命，不要你们保护，你们保护他躺在太师椅上，结果不是帮助，而是让他停止革命。你们保老干部太多。地质部你们去保护，你们上当了，是工作组邹家尤找去的。地质“东方红”的同学对小弟弟，小妹妹要原谅他们，他们受了骗，何长工之流倚老卖老，把你们出卖了。当时我非常不满，同学斗同学，他在那里笑呵呵，他那革命的灵魂已不存在，象这样的人保护他干什么！不要去保护他，当时我知道后很不满，这个风气没有纠正过来。你们的通令我初翻了一下，有些话是错误的。你们（西城区纠察队）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我赞成陈伯达同志说的，高干子弟最好不当领导。但有的高干子女与父母脱离关系，我们也不赞成。这样办不好，不提倡。还有一个问题。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可现在纠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

（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

周总理生气地说：我不同意。打人不是枝节问题，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在北京城里！

大街上出现了反动传单，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革。你们是放假闹革命，有责任揭穿这个问题，看看是谁搞出来的。

这次发生的问题，首先是领导关心不够，中央抓得不紧，主要是廖承志和他的帮手抓得不好。大，中学校参加有各种组织，左派的，中间的，保守的，要求

不经过协商，象巴黎公社选举。我一听说选举就不同意，不能光靠票数。果然，选出来大家不赞成。无记名票选，好象很民主，但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意见，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大前天六号晚上，通过向中央文革报告，要扩大组织。如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西城区……左派等，要经过商量。廖承志跟同学见面就说中央文革决定的，同学就不好说什么。这两次廖承志要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因领导的问题而打人，造成七日的行动。大前天在民族饭店的行动，连工作组劝都劝不住，爬窗口进去打人。第三司令部沈××被打（总理问：她今天来了没有？众：来了！）她来了可以作证。七日许多人围住，交通都阻塞了，这是廖承志犯的严重错误。他不是严肃地指出，诚恳耐心地教育，而是另一种态度，放纵。对《解放军报》记者不尊重，引起大家大笑，侮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解放军。……打这打那司令部已经多起，这不是正常现象，不是革命的需要！甚至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峰、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不尊重，甚至贴了海报、标语反对，那就不应该了！中央文革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定的，是经过半年多考验过来的，是有很大成绩的。中央文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

现在宣布：十二月二十日以后，解放军休整一下，调一二十万帮助中学参加训练，大学后一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社论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等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帮我们改正缺点错误。和踢开中央文革、解散中央文革是两回事。

关锋说：王任重在北京，湖北、湖南情况与中央文革没关系，没汇报过，文革不负责任。轰他不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康生说：凡是反对林总和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做斗争。对中央文革态度的辩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

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陈伯达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欢呼声）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

周恩来讲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两人已经代表我们大家把应该说的话、重要的话都说了。

处分了少数几个，就是十几个，就是几十个，就是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了罪的，这些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把他们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

康生讲话

最近，我们在街上看到有这样的标语、大字报，一小撮人，有的写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特别是林学院的李洪山，贴反对毛主席的标语，清华大学的易振亚，易振亚是反对我们林彪同志的。同志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的，这样的人是什么人？你们说？（众：反革命！）对！反革命，反革命利用的小走狗！我们是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但是对于这种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斗争到底！彻底地斗垮他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如果我做错了，不妥当，你们完全有权利批评。但是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蔑视他们，他们根本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他们只会干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什么“霹雷”战斗小组、“梅花”战斗小组……，这些家伙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陈伯达讲话：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有一小撮反革命的幕后人物，他们进行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我们要经常保持警惕。

周恩来讲事：

最近几天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我们执行了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

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玷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时的座谈纪要

这几天我听到一些反映，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到反面，犯错误。你们不能私自拘留，也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要私设刑堂，私设刑堂不对。

你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

在主流下的一股歪风一定要批倒，现在全国打人行凶的很多，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作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你们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不要败坏红卫兵的名誉。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们支持。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来，他哪来的那么多病呀！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

你们有些青年搞无政府主义。你们抓王任重开了个十万人大会，开得不太好，不得人心。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

你们三个司令部可以商量一下，搞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就不要什么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林杰谈《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现在，北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前一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些作了检查，少数人不但不检查，还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利用群众，进行反扑。从北京看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江青同志、攻击伯达同志。

有些人的确挑动群众斗群众，武斗严重。如重庆，他们就操纵一部分群众，打死了十多个革命群众，有学生、有工人。夺取新的胜利，就是打退资产阶级新的反扑。

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利用这个口号，反对忠实执行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坚决执行革命路线的林副统帅，有的直接指向毛主席。这些大字报是反动的。这一小撮人是现行反革命，我们应当坚决镇压。

现在有些人攻击中央文革，说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斗黑帮。这完全是诬蔑。在江青同志十一月廿七日的讲话就能看出，最近北京市革命左派召集了十万人斗争彭、陆、罗、杨四大家族的大会。

这种思潮在北京早就出来了，现在在北京形成了一股逆流，这个面一定很窄，抓了以后，整理材料送到公安局去。

北京有一条线，攻击北航“红旗”、三司、戚本禹、关锋同志，攻击江青、陈伯达同志、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一股风，一股逆流。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它地方当然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哪个是，要群众来判断，群众会看清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与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座谈纪要

“全国在京革命派控诉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把这个斗争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具体来讲，就是开这个十万人大会，用这样一个方法好不好？我们的意见，是不是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你们方向是对的，批判谭力夫嘛！为什么全国印谭力夫的讲话呢？还不是他那一套，是当权派搞的。福建省委有个中学印的非常漂亮，是福建新华书店印的。工厂也印，机关也发，谭力夫是个小话筒。几十万人的激愤到谭力夫身上就错了。要利用谭力夫的材料，抓住对谭力夫的这个斗争，而这个斗争还是抓他的根子刘、邓，把他提高到刘、邓路线上来。搞这个事当权派很高兴，他有了替身了，他还高兴了呢！他们可以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我们要想办法争取这些人，告诉他不要做他们的替身。李洪山可以斗，他是现行的。李洪山和谭力夫还有区别。经过研究，谭力夫是小人物，决定在学校里深入地批斗。你们学校可以斗，要欢迎他归队，当然比较难，要做很多工作。因为当时抓了李洪山，我们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你们扣了谭力夫完全有理由。你们把控诉材料印出来，你们到处去张贴都可以，这比你们开大会效果都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与部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记录
听说廿五日有十万人斗争西城区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和周荣鑫。

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情况下，目标要更加集中，集中目标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声势，集中刘、邓路线，要一个方面、一条路线的深入细致地搞。方向一定要集中。

在这种情况下，十五万人的大会建议不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戚本禹说：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贴戚本禹的不能抓，贴他的（指着王力同志）也不能抓。陈伯达同志说，给他贴大字报也不能抓。江青同志还让我们转达：“给我贴大字报的不要抓。”但我们要补充一点，搞恶意人身攻击的要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江青说：西城区纠察队，还有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的问题。这个组织形式是不妥当的。它凌驾于红卫兵之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凌驾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上。对这个组织，从开始到现在，要看经过，看其多数和少数，关于它的功，我调查不够，初期在破四旧和接待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后来被坏人利用，当了宪兵，打人。他们自己私设刑室，关人。听说广播事业局还有一个软禁室，关了許多人。西城区纠察队我们调查了很久，伯达同志去了好几次。如果说这个组织没做一点好事，他们委屈。这个组织后来被坏人利用了，到处打好人，打死许多人。开始还打坏人，后来就打起好人来了。这是不允许的。我相信，西城区纠察队大多数青少年是好的。他们可以抢小汽车。一会抄这，一会抄那，但大多数是好的。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付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付部长之子。这些都不在话下。有的小家伙抄了人家的表，自己带上了，知道的要交上来，钱自己花光了，要自觉地做检查。但是，你们的主流是好的，这不是主流，以后，抄谁的家，可通过公安局去抄。要抄政治的，如文件、材料等。最近，小将们抄了不少东西，给我们看。从陆定一家抄出了不少东西，都展览了。财宝不要抄他了，要做展览。就是那么一小撮人，梁老彬、吴小宗，他们把打人惨叫声录下来听，这是什么行为。一小撮人刮了一股歪风，必须打掉！如果不打掉，我们的革命就会引到邪路上去。红

卫兵不要搞纠察队，“纠察队”纠察别人，本身就不好。千万不要破坏红卫兵的名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
纪要

江青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关于揪刘少奇的问题）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其他怎么做都可以！

戚本禹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王力说：“可以把中央首长对刘少奇的批评交给你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大专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清华大学井冈山 蒯大富发言：《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

北京大学 聂元梓发言：《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师大一附中 陈永康发言《愤怒控诉刘少奇镇压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红卫兵破四旧问题

关于红卫兵在除四旧过程中出现的所谓“恶果”，近三十年来已经渲染得够多了，无须摘抄。但是，对于右派们制造的各种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谬论必须批驳。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八一八”以后的“革命造反”从破“四旧”开始。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上面的鼓励和支持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主要原因是：第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改变社会面貌。第二，毛泽东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三，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怂恿和支持。第四，说到底，肯定和号召如此这般的破四旧，就等于肯定和号召打砸抄。明乎此，就可以懂得当时何以不下令坚决制止打砸抄了。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当时周恩来、陶铸、陈毅再三再四地劝告红卫兵不要打人而何以不起作用了。

它的这种分析是荒唐可笑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与破四旧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通过一斗二批三改，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以，破除四旧不能离开一斗二批去进行。否则，就有可能走偏方向。

学校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特别是中等学校的红卫兵走向社会以后，就把破除四旧，特别是把改地名、改店名、改发型、改服饰等作为重要任务。这与文革的主要任务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革命热情，让他们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只能因势利导，逐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上来。

第二，破四旧与打砸抄的关系

即使是破除四旧，也绝对不需要搞打砸抄。因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只能通过一斗二批三改、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去解决。在破除四旧活动中，发生了打砸抄，甚至打死人的现象，这是违背党的一贯政策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当这种现象发生以后，党中央的领导人反复教育群众要执行党的政策。只是由于场合不同、对象不同，各人说话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右派们拿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是鼓励群众搞打砸抄的。

第三，是什么人在打砸抄，是什么人在支持打砸抄？

在破除四旧中，恶意煽动搞打砸抄的，首先是一小撮坏分子、社会流氓。他们乘机捣乱，混水摸鱼。其次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希望制造混乱，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再次是青少年中的少数极端分子，他们自恃出身高贵，但又害怕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的父母亲属，就把斗争的矛头向党外人士、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并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

由此可以看出，右派们制造的各种谎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关于红卫兵组织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红卫兵组织一开始成立，就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针对红卫兵中的“自来红”的争论，强调指出：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因对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态度不同，红卫兵运动发生了分裂。清华附中等中学的“老红卫兵”和“西纠”是坚定地保护领导机关和老干部的。八月二十七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九月五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总的说来是由一些高等学校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护老干部、保护工作组。惟一的例外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九月六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总的说来由一些高等学校中的少数派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工作组的反，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异常复杂，核心问题是一保一革。多数派也造反，总的说来，他们是造牛鬼蛇神的反，而不是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更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对于到处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用说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许多老革命家忧心忡忡，毛泽东也不赞成。

这里摘录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反映了客观事实。第二段话歪曲了事实真相。

按照它的说法：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三司革命造反，不仅遭到一司、二司的抵制，而且也遭到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老革命家的抵制，还加上“毛泽东也不赞成”。

三司与一司、二司之间一个革一个保，革什么？保什么呢？八月份以前，由于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普遍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把一大批革命小将打成右派、反革命，而一司中的少数人是追随工作组的文化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原来被打压的革命小将要求工作组承认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一些工作组的少数领导人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为被整的人公开平反、不肯交出黑材料。而一司中的追随工作组的文化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以及一司、二司中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出来保护工作组的错误。两者必然会发生斗争。并不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三司才更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周恩来对革命造反、对三司、对少数派的态度，从这一部分材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如他本人说的：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至于陈毅，从这一部分和其他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十一月份以前，他是支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的，从十一月份开始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发生变化。而陶铸支持刘少奇、邓小平错误路线的立场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

说“毛泽东也不赞成”，则完全是歪曲。它用的两个材料：一个是九月十五日林彪关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讲话；一个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对这种歪曲已经在第四节批判过了，不再赘述。

三、关于一副对联的争论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鬼见愁”的对联说明了阶级斗争“左”倾向影响了一些青年，他们把唯成分论看做是阶级路线，因自己家庭出身很好而抱有“自来红”的优越感。它说明了这些青年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反对造老干部的反，保党委和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反对揪工作组的，有各校的多数派，有清华附

中的红卫兵、有西城纠察队，其中以谭力夫最为有名。他们要保党委和工作组没有别的武器，就搬出了唯成分论。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反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歪曲谭力夫的观点，对他横加挞伐。

王年一承认一些高干子弟搬出“自来红”的思想就是要保老干部、党委和工作组。为什么保卫老干部、党委和工作组就没有别的思想武器呢？因为他们要保的是这些人所犯的路线错误，就只能祈求于“自来红”的观念。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思想。看来，陈伯达的分析打到了这些人的痛处。

四、关于红卫兵纠察队的问题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西纠”的个别成员后来表现极其反常，原因复杂。这时，有的老红卫兵思想极度苦闷，表现反常，残酷殴打、虐待牛鬼蛇神。

难道说那些被殴打、甚至于杀害的工人、教师、学生都是牛鬼蛇神吗？

所谓“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在初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对纠正少数青少年在破除四旧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起了好作用。但是，也埋伏下不少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领导干部的问题，没有分清少数青少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中的过火行为，与“反革命的报复”行为的界线。这样，它们中的一些人，就在后期起上了错误的道路，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在支持革命造反派，以及对待所谓老红卫兵、自来红、纠察队、炮打中央文革等问题上、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而且注意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教育争取多数的政策。

2007年3月31日初稿

2011年7月27日修改

第二章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

意见强调指出：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对中央各部委的指示

看来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两条道路的问题要解决好。

工作组的同志应勇敢的把责任担当起来，帮助处在保守状态的解脱自己的处境，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发生。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关于档案问题，要按政策原则办事，把所有规定的要彻底处理，在属于规定之例的，向同学讲清楚，当众销毁，避免扩大彼此的对立。

以后各部委要多担责任，过去归北京市委管，现在各部委要多担责任，不要推给北京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与文化部煤炭部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戚本禹等召开中直机关部分同志座谈会，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

戚本禹说：刘、邓大字报一张不贴，叫什么内外有别？他们就在毛主席身边，我们就更应该站起来保卫毛主席。你们回去可以检查一下，没有出刘，邓一张大字报，到现在还在观潮，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每个部门都是一分为二，总有两路线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才奇怪呢！中央文革是一个新的组织吧？也还有两路线的斗争。王任重就整天同我们斗，天下哪里有那么纯的东西，

二、党群系统

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张平化对中宣部处长级以上干部讲话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满清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京大学陆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后来我们派出的工作队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该讲主要还是我们派工作队的人的责任。

这个话我们不能不猛醒，不能当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不听，你要愿意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联络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王力在中联部张贴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

《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节录）

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王稼祥从逃避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生的病，突然好了，精力很充沛，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抛出了他的一整套的“三和一少”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检查失言失算”，就是要“纠偏”，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路线，就是打击坚持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刘宁一老同志。

他的所谓“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就是要用他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来代替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国际群众组织活动的方针”，又是一套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莫斯科裁军会议，是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一个表演，立即遭到破产，引起左派不满，赫鲁晓夫要给发奖章。

这样一来，毛主席在王稼祥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冒头的时候，就捉住了，就严厉地进行批判，迅速地加以纠正。……

同王稼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防止和反对政变的斗争。……

在这个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这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最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在中联部的一切部门彻底打倒王稼祥的阴魂，扫清王稼祥的影响，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统战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富春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

以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大家族”是何其毒也。请你马上宣布，打“四

大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革命的方向迅速转过来。

李富春的这张大字报揭开了统战部的盖子。

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信

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的事，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

刘宁一的这封信揭开了全国总工会的盖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刘宁一的大字报《欢迎向我开炮！》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等人的大字报《挖掉杨尚昆黑帮头子在全总的黑线》

我们完全同意刘宁一同志的大字报，在全总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揭开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以刘宁一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谁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是刘长胜、张修竹、狄子才！他们是反党分子杨尚昆伸向全总党组的黑爪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刘宁一等接见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谈话

刘宁一说：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嘛，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闹革命，工作组压制群众，群众就不高兴，就革命，工作组就说什么反工作组就是反党。不能那么说，你们要是反对我，也不能说反党。说有 20 几个人检讨了，这是不对的。

马纯古说：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工作责任心差，全总要彻底来检查。我坦白的讲，前段我还感到全总这次搞的不错哪，也搞了一些牛鬼蛇神嘛。你们拿出来信我一看，我大吃一惊啊！问题闹严重了，已责成大椿、王家扬要好好检查。为什么搞了李有为、张希鹏，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同志的头上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接待人员代表时的谈话

团中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话

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团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师生的。过去团中央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进一步揭发。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团中央口头上挂的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做的是脱离群众的路线。

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

李富春的这个讲话对中央领导层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团中央的领导人存在的问题都说得很清楚：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只要不是真正的当权派，也可以有组织起来的自由，不要阻拦，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搞人人过关，人人检查。

平反是平反“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至于个人的缺点、错误，不属于平反的范围，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要求过高。”

三十八人有两派，不算多。

我没有说上下左右一起烧。

斗争中的过火行为，过火的言论，既往不咎，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

我说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但我没有说过不要批判，要批深批透，罢不罢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自封，是要群众作鉴定。

一定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大民主，少数派抬不起头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文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常委除了主席、林总掌握大方向外，主要由总理、陶铸、伯达、康生、我，我们五个人管经常工作。

批判过去以“二胡”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

调解放军到团中央来，我要王道义同志征求各个筹委会的意见，欢迎就来，不欢迎就不来，还是走群众路线。

二、文教卫生系统

中国科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

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要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有人替吴晗辩论清官贪官的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县知事”，县知事有几间房子，不是贪污来的吗？父亲是个职员，三十元以下，冬天一个皮袄，不剥削是从哪里来的呢？贫下中农冬天哪有皮袄？

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去清华作了二次报告，也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作到这一点，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谈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限的错误问题：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

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一些政策问题：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 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了科学院的文革代表四十五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廿至卅人，而反对他的有一百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廿至卅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护。

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共产党不是还有民主党派吗？有的没党没派，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也算是一个党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

我在七月底八月初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给我的研究解决国家科委、科学院的问题。我们五十多个单位有许多同志推荐，从最紧张的单位推出刘西尧同志当联络员。

是要罢张劲夫的官就行了？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也不来调查研究了，在这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院党委？

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杨威路”改成为“反修路”，这件事做得好，我们支持他们。但当时他们就要闯进去，我们的反修文章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的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在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他们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

大字报贴到大使馆里墙壁上，文斗就变成了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护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武装部队，徒手警卫队，一定要勇敢地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

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了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去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我是周某人。他问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必然吵架，是武斗势必要影响到国际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

在你们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觉。应该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更要做社会调查，阶级分析。从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时时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系、母系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还没有改掉。

红五类的子弟不要以出身好引以为骄傲，要做为前进的动力，要注意不要受旧东西的熏染。现在有的红卫兵（指出身不好的）造反造到自己家去了。与父母大吵一场，出身不好的要造反，背叛家庭的阶级，好嘛！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家庭，也是一好加半好嘛！有差别就应该承认。红五类子弟坚持有差别，是有道理的，但也要团结那些出身不好的表现好的人一起干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线，变成

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讨，没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误的，行动也是错误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他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没有检讨，他说检讨了。检讨了没有？（下面答：“没有！”）我是不敢当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向尹达同志检讨了。（历史所团支部书记傅崇兰同志在台下高声说道：这是反党分子邴家驹放出来的谣言。）我为什么必须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

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象他们那样。

八月十五日由部分群众召开的万人大会，张劲夫同志为什么不去参加大会呢？那么你（指张劲夫）为什么不去呢？怕什么呢？总比哈尔滨好吧。自己灰溜溜的，人家一看也有问题。对你自己又没有下结论，怕什么呢？要有生气，但又不能骄傲，可能你们会说，这很难。共产党人嘛，就应该处处出难题。

杜润生斗了没有？院党委对“应地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九月五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对杜润生、卫一清的认识，能不能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也算是对你们院党委的考验。

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

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生活上、原则上应该让他们活下去，你扣多了他们生活困难了，还不是由国家去解决，由国家去照顾嘛！即使是敌我矛盾也要让他们活下去，只有让他们活下去，才能改造他们，改造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死了，还改造他们什么呢？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

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

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是这次运动的重点。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富春对原子能研究所部分同志的讲话

这个材料既反映了原子能所的运动情况，又记录了李富春的讲话。这次讲话思想性、政策性都很强。如：

1、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2、江部长（江一真）说：任志是革命左派，还说我们这里有“扒手”，对不对？

3、有人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无理，并宣布造反领导小组是非法的，还要求我们检查。对不对？

4、有人说我们受了利用，立场有问题。对不对？

五、什么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机关批不批？

六、机关要不要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七、我们所的运动一开始就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百分之六十五、七十的人被贴了大字报。有人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可以写。江部长说这是上面布置的，根子在这，还有更大的根子，就是您。对不对？

八、农林口布置我们专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派，搞他们又是大方向不对，又说机关和学校不一样，都是干部，这和学生不同，我们所的运动不知怎么办？

九、什么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有人说群众中有人要陷害任志。

十、什么是牛鬼蛇神？

十一、有的群众希望组织起来，成立战斗组织，但怕有人说是和“东方红”战斗小组唱对台戏，说转移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等。

十二、有一个团员带头到（党）支部串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去了，有人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冲散支部大会，矛头指向群众，企图搞垮支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不同意见代表讲话

问：中央军委的指示科学院是否也适用？

××所问：运动初期所党委赵××，庞××泡制了一份材料，没有什么证据，把几十个人打成反革命，写了一份材料，没给党委讨论就盖上党委的公章。我所文革成立后，要求把材料交给我们。

问：我们所六月十二日有个会议，布置抓小牛鬼蛇神，群众要求公布，想看一下怎么反击的，反击后十一个人打成黑帮。怎么报上去的？怎么反击的？想了解这个情况，可以不可以要求所党委回答？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宁一赵毅敏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刘宁一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
有比较好的同志跟不上形势？

总理：这些人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这蒙蔽了你们。毛主席是要求青年敢想，敢说的，中国党没有把主席的建党思想贯彻下去，这中央要负责。中央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部不办毛泽东思想的党，现在应该把毛主席的党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不但党过去是这样，共青团也是这样，死气沉沉，这应该难过。我们所以落后，是天真和机械。这有个危险。假如在毛主席身边真睡的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难道只靠毛主席来发现吗？苏联的教训是很大的，赫鲁晓夫蒙蔽了斯大林。他不是斯大林死后才出现的，他那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了，在十八次党代表会上还作了党章的报告。（按：原稿如此）斯大林式的党就不如列宁式的党，列宁式的党就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每个党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能提出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的谈话

总理说：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处处长、副处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于他所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和平生活十七年，领导与被领导有对立态度，修正主义根子无法挖掉。做一个“长”，总有点权，小首长也须批判，他做了“长”也会神奇十足，瞎指挥，不是平等作风。当然要从上往下，不能从下往上。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把有点毛病、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人说六月一日的社论打击面广了，我读了几遍，没有错的，写得很好。这是《人民日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振奋人心的社论。有些领导用它来扫有小毛病的群众，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就要平反。群众立场一时不稳，思想上一时的倾向可以批判，但不能搞成牛鬼蛇神。

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批判到什么程度，才能转入斗批改？

总理：矛头应当指向当权派。当权派有好有坏，不能说都是坏的。炮轰司令部可以轰，但不能说所有的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要掌握材料，有的

放矢。没有材料不是放空炮吗？有材料才能打得对。领导应当引火烧身，不引火烧身是不对的。真金不怕火炼，对大部分人，错了改了就不要烧了，又不是把他烧成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掌握火候。你们回去后，对反动路线不批判，对被压制的同志不去帮他们平反，那就白来北京了。你们回去要仗义执言，对准领导。当然火候不能掌握那么好。我们虽然经验多些，也还不能那么准，有时过了，有时不及。你们有一点好处，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感性知识。我们只能看材料，听汇报，都是死的。群众眼睛是亮的，好坏总会考验出来的。回去后发动群众，方向对，方针对，步骤也就对了。你们自己去搞，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

问：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总理：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最高指示、最高领导，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具体的党的领导，有的瘫痪了，全靠还不行，出现了新的情况。北京哪个学校的领导还在起作用？北大？清华？北师大？都没有了吧！革命不革命，还是革得很好。具体的党团领导有时可以中断。张劲夫现在起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但是撤了，我还不知派谁去呢？我们原来也想加强、改组，但是现在从哪里来那么多人去换？否则又变成了工作组。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反党。打倒“法西斯党”。笼统地说是错误的，不能丑化党。不要主观跑去喊打倒党的领导，这是错的。但是暂时中断是允许的。

问：怎样才算有贡献的科学家？如何保护？

总理：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应当一视同仁。我们大搞反动学术“权威”，这当然是少数，批判是必要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把他们批判倒，要下一些功夫，把他们的理论推翻。但打击面不能太宽，一般看在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对运动对立的可以批判。你们现在还没有批判，谈不上保护不保护。但有些红卫兵抄他们的家，我们去保护一下。保护只是在抄家问题上采取保护措施，有几位做很重要工作的科学家也被抄了家。他们态度很好，没有埋怨，他们知道不是党决定的。保护，并不是反动学术思想不能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

当在十一中开会时，是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科学院也有份，因为是文化单位。但对工厂、农村县以下的小学校没有作为重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方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想有个步骤，先这个后那个，红卫兵不进厂，农村最后等等。这一阶段还是有限制的，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老想有前有后，特别是领导冲击了，不管它，让它那样。

十月时，我们没有想到要放假到明年，开始只放暑假，后来放半年，现在看至少一年了，放到明年秋天。这是群众的创造，常常推翻了原来的设想。要承认这个，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我们要承认智慧从群众中来。善于领导的人，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加以提炼，然后下去，再提炼，再深化，再下去，不断反复，才能成为理论，不断总结，才能摸出规律，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对红卫兵运动是这样，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这样。

广电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话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7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的讲话

江青说：在北京地区，时传祥搞了个捍卫团，是保守势力，已经臭了。我准备着陶铸的女儿领着人来抄我的家。让他们来抄好了。如果他们不动我的文件就让他闹，如果她敢动我的文件，我就要把她逮捕起来。

文化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说我讲“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是同情绝食的，但我不赞成这个办法，不要太辛苦，吃饱了再闹革命，要长期革命。有人说绝食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过去我也绝过食嘛！我说绝食也是个创举吧！结果后来传成这一切全是伟大的创举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

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廿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等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我来过信，对旧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没有触及问题本质的揭发。赵燕侠也来过一封短信，表示她没有尊重我对她政治上的帮助，作了一些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联名来信，竟然用种种“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至于上面我指出的那几个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

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周恩来讲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

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得力的支持者。在方向上，我是坚持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的，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是，在实践上，曾经犯过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做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

最近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小将们，他们就去曲阜造了孔子的反，那是有两派意见的，有的人就不让造反，说造孔子的反还得了？就把关都关起来，这些小将们就不管，他们去了以后，就发动周围的贫下中农发动了曲阜师范的同学大造其反，造反造得很好，而且发现孔庙里有间房子放了一些反动的国民党党旗，变天帐等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把它保护起来，长期的保护起来了，而且那个地方它是不让劳动人民进去，从来不让劳动人民进去。这一次浩浩荡荡跑进去以后，而且把孔夫子牌位给烧了，孔夫子的七十二个弟子的牌子给砸烂了，他们还要挖孔夫子的坟。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可以挖，就是平孔夫子的坟，当然，陈伯达同志有指示了，对文化古迹，对汉碑之类的东西要保护，因为是作为文物来保护的，而且指示要把孔夫子的庙要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办成《收租院》。我看孔夫子的庙的问题和故宫有类似的地方，我看伯达同志指示，对曲阜孔庙的指示，对故宫有参考的作用，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就是要把故宫办成阶

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当然不允许在这里宣传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宣传他们的毒素，不允许，绝对不允许。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冲入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周恩来接见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的代表。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谢镗忠姚文元对文艺界部分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革小组就草拟的文艺界文革的三条指示征求意见。

这三条精神，主要是搞革命，根据十六条，不论地方、军队，自己起来闹革命，不许用任何借口来压制革命。第二条提出徒步串联的问题，下厂、下乡这里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必强求一致。或者先串联，或者先下厂、下乡。你们中间有的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乡下。大城市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大城市下厂、下乡少。文艺团体下去，主要提倡徒步，这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与工农相结合，老实地当工人、当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徒步与乘车相结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斗批改的问题，好象现在有一种说法，江青同志十一月廿八日报告以后给分割开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斗批改中的。

国家体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洲新运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我们没有想过不让你们去，我们中央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见，一直信任你们。你们想出气。不对，为什麼这样？庄则栋、李富荣、郑凤荣、徐寅生，你们为什麼要出这个气？为什麼要出气？搞得不清不白。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对不起老同志。最近有人到贺总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争面子，这样做不对。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这种作风怎能允许？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原来我想的与这差一大截，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後，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场没站好，这与领导有关，你们身上没有官气、暮气，有骄、娇二气。我深深想了一下，就是第一届新运会得胜了，几次乒乓球得胜了，骄气增长了，娇嫩气也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一部分意见是对的。过去体委，北京市，上面对你们有些放纵，教导不严。我还请你们吃过饭，陈总也请过，我也有责任。过去我娇惯了你们，放纵了你们，我有份，老总也有份，当然直接责任是荣高棠，他是常务书记。梦华对我说，誓师大会与荣高棠无关，因为荣高棠同志是早晨刚刚出来。即便荣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是荣放纵的。你们知道他会支持，你们才敢这样做，甚至把老师也拉出来了，把外地革命师生也弄来。还要请我去，我没功夫。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麼？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麼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你们不应这样。同学们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导弹实验有个科学家叫钱××，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裸姆给赶走了，他老婆上街买菜，生活大大降低，未影响情绪，保证了导弹实验。另一个是红线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头发剪掉了，挂牌子，坐卡车游街，扫街。她革命是买来的，给她高薪，洋房，汽车，现在降到每月四百元，还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希望，香港来了一些人访问她，毫不埋怨，情绪很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

体委发了四点建议，中宣部批了的，供各地参考。现在看来，批是有错误的，强调革命不够。你们的专业运动员，练一点还是要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就不对了。以前两篇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有效果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四点建议也是这样。革命重要么！过去，四点建议抓革命强调不够，是体委建议的，我过了手，我也有责任。你们批评四条建议是有理由的，应该批评。现在我代表中宣部把那个四点建议撤销么！

拿我和同志们商量的四条意见，再和大家商量一下。

（念第一条）这条加一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看这样抓革命就强调够了。

（念第二条）这条还是讲革命。别处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儿讲抓革命促训练，这一点我是请示总理的。

（念第三条）总理说你们在本省串连可以，外省串连也可以，但不超过十天，这是总理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

（念第四条）可以派代表。但主要靠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派人找中宣部，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总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

尤其许多地方提倡的锦标主义、物质刺激、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还有地方主义、私心杂念，甚至于你欺我诈，彼此争夺。这样一种运动，这样一种作风，那还不是跟资产阶级世界一样了吗？

可是《体育报》呢？恰恰相反。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登毛主席的语录，不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恰恰是“庸俗化”、“形式主义”，甚至于出在荣高棠这样的口里，首先敌视毛泽东思想。

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一个誓师大会，一个国务院请愿，不出国。这两件事可把我触动了。因为这是非常清清楚楚的道理。荣高棠利用出国的问题来开誓师大会，他要来代表全中国人民，说他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七亿人民出国的。有这样的话嘛！然后蒙蔽我们的运动员，以他出国与否来要挟，而且正是毛主席十一月三号在天安门接见刚完了，我们还正在开会总结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下决心不可，不仅不让荣高棠出国，我也就不再会见了。

今天在座的从金边取胜回来的这些体育界的同志们，我还是高兴地欢迎你们，（鼓掌）因为你们没有辜负我们五号那天对你们的临别赠言，（鼓掌）你们是带着《毛主席语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出国的，所以你们能够胜利归来！（鼓掌）而结果呢？果然地胜利归来了。（鼓掌）就是说你们没辜负我们五号那天晚上对你们的期望，你们没有辜负党、毛主席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体育界对你们的期望。

陈毅同志讲话

从体委同志发表了意见，揭露了各方面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整个体育运动的路线和反映在生活上，完全证明了荣高棠是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一个障碍。

我们要归功于左派，也就是所谓的“少数派”。左派，革命的左派，他们有这个敏感，他们深受欺负，所以他们能够反映，把这个矛盾首先反映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能勇敢地承担这个揭露，首先打烂，这首先是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掌声）因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任何一次大革命的起点，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出发点，没有这个革命精神，一切革命无从谈起，这不仅是体育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整个的阶级斗争，整个的国家革命，整个的世界革命都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革命的造反派、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就是革命派。他们的作用，我们要心服、口服这一点。我们不要看到说是他们这里面有些人，或者有些什么我个人或者看不上眼，再因为个人的关系没放好，我们就忽视他的政治作用。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这不是一种无产阶级

革命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主要看他政治上表现什么东西。

贺龙同志讲话

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荣高棠自觉地、有组织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党委，把持文革，组织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打击围攻和阴谋陷害工农兵出身的干部，镇压革命群众。他还蒙蔽乒乓球队一部分优秀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和干部，并挪用《体育报》的宣传工具和假借辩论为自己评功摆好，恬不知耻地以无产阶级司令官自居。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继续搞他所谓的“誓师大会”，请愿示威。当周总理、陶铸同志批评以后，仍然在玩弄新花招，采取新的形式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革命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长期以来，他还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投机取巧，把持国内权威，搞宗派活动，大搞物质刺激，锦标主义，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企图把我国体育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

荣高棠犯这样大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过去负责体育工作，抓得不紧；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对体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强调团结多了一些，合了一些稀泥，对革命派支持不够；对荣高棠的错误察觉较晚，置之不理。有的同志给我提了些意见，我诚恳表示向他们致谢，

陶铸讲话

第一点就是我是支持体委、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但是我要承认一点错误，就是支持得迟了一些，应该是支持得更早一些就好了。从我们的内心来讲，总理、陈总、贺总我们赞成的，赞成把荣高棠打倒的！所以赞成罢他的官的！但是我们内心赞成，我们还是没有举手。为什么没有举？还是中央决定，毛主席决定！

第二点意见，主要的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一个串连的问题。最近我们搞了四条，送给总理，送给文革小组审查去了。

高教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的答复

蒋南翔说：彭真反党是成立的，因为他一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是有了矛盾的，五八年清华是贯彻了党的教育改革方针的，五八年陆在六十条中是指名批判清华大学的，陆的老婆反对林彪，有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专院校六六年应届毕业生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陶铸与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座谈纪要

教育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教育部徐昕等同志的信

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泳冬、朱岩、刘德珍五同志给陶铸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

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这样做。

卫生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黄树则接见山东省卫生系统赴京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最近，你们看到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要不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大原则问题！这些言论、标语和行动是反动的！必须揭露，必须揪出来，制止他们的活动！不管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总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革命的，就要站出来！

你又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还不是假的！

当然，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没有的，如果贴，就是反革命！贴林彪同志的大字报也是反革命！以前我讲过，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彪同志不能怀疑，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讲我是毒草。就是不能怀疑！我讲了不少错话，但是这句话没有错！

卫生部盖子揭开得比较迟，主要在部党委，但司局长不要抵触。如果挨了批评、斗争就不满，那就是给刘、邓提供思想市场。即是为革命受些委屈，有什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这没什么委屈。

广东省有个粤剧演员红线女以前在香港，我们争取回来的。给她高工资，一千多元，比马连良低一点，还有优厚的待遇，有小洋楼，有小汽车，后来加入了党，表现不很落后。她要求减薪，减到四百、六百，这样的共产党员很容易当。

香港、广州跑来跑去，到处受欢迎，又不下乡，又不劳动，这算改造好了吗？不算！过去反右时也批判过，但效果不大。这次文化大革命可能改造好了。北京 101 中学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了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一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去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黑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做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如果这话是真的，是真改造好了。这次革命，待遇取消了，这一下跟共产党走就是真的。但还要看一看，因为革命不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是不行的。

钱信忠作了两次检查，卫生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肯定。文化革命以前，毛主席讲，卫生部是城乡老爷卫生部。这就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以前，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卫生部相当严重，批掉反动路线，再加上斗、批、改来揭么！卫生部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无可抵赖。文化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否则为什么叫城市老爷呢？卫生部党委要有勇气，一方面自己揭，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帮助，变成革命的卫生部，不然就很不卫生，卫生要保护革命群众的健康么！现在卫生部作了一些调整，稍许有点进步……有了一点进步但很不够。钱信忠检查了两次，很不深刻！还可以再检查么！卫生部党组要坚决革命，坚决支持大方向对的同志们，要依靠革命的同志帮助我们。……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三、外事系统

外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

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了一些政策问题，如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打人并不可怕，革命嘛，是暴动，看到打人，不要惊惶失措，见了不能马上镇压，挫伤群众积极性，北京今天有些地方打死人了，不要惊惶失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对这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越搞得深入越要讲政策。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有的红卫兵去抄人家的家，有的红卫兵又去抄他们的家，他们就赶快回来保他的家。（黑五类）红卫兵要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好的，但是要和派出所联系，不要把人置于死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有的抓住老往派出所送，派出所很快就满了。有的红卫兵说西哈努克是国王，要求我们搞阶级路线，我们还是要跟西哈努克搞统一战线。有的人提出要砸烂洋货。提倡国货，这是对的。但是用洋货也没有罪。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有的风一吹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运动是健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但也产生了一些偏差，要及时纠正，

陈毅的这些话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而有的人说，周恩来、陈毅是反对打人的，而康生、谢富治却是鼓动打人的。如果断章取义，陈毅也说了：打人并不可怕，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也可以说陈毅在鼓动打人甚至打死人呢？

对外文委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陈毅在斗争张彦的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打二十九个人为“反革命分子”证明了这廿九个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结论要倒过来做。不是反革命政变，是革命事件。不顺张彦的心，不顺张彦向上爬的心，他就打。对五人小组来看大字报他非常仇恨在心，他想在这个地方立一个功，想在陈伯达和我之间制造分裂。想这样整五人小组，以为我可以回来就可以批准，这个他完全估计错了。

在对外文委五十多天，张彦来打“反革命政变”，宣布“反革命事件”，实际上他搞的是反革命。我们听了反革命的话，犯了听反革命的话的错误，我一点不含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陶铸在这个讲话中说：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单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而且要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机构。

外文出版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外国专家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在华专家 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留苏回国学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步前进都是斗争的结果，一个紧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大学的筹委会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但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

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家乡——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过时了，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而他就公开地宣扬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容较量。

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了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从十月初起开始了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

对路线错误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出路线和执行路线的区别，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二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很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的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第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路线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面，与群众一起，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

侨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等在接见部分归侨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代表座谈纪要

四、工交系统

第七机械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五”部分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抢材料，抢文化革命的材料，砸保密柜，档案室，中央是不提倡，不赞成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过火的。昨天他们来了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看了材料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抢是过火的行为，中央不赞成，不提倡。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北京市的这个行为，特别在院校带有普遍性，空军学院、地质、外语、体院、机械学院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院校和你们院部情况布一样，七机部这种行为更严重，对你们七机部来说，这种行为更不能支持，更不能提倡。

我们也不同意说成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因为牵涉许多人，除了被少数个别坏分子利用的，其余一般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次七机部发生的事件在各机械部中是个教训，其它机械部不要去参观了。其它院校的教训也很深刻，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同志为这事被撤职了。邮电学院把材料放到武器库，以为这样就保险了，结果人家就是从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了，邮电部长停职反省，搞得各部很被动。

第一轻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谷牧在第一轻工业部全体党员和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运动打击面宽了。据说一轻部在家的司局长，有三分之二在大会、中会和小会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处长以下的干部，有七十多人在大会、小会上受到了批判，有的同志反映，八月十三日这次会被揪上台的就有二十多人，有十几个是处长和一般干部。

这一段运动有错误，应该首先由工交党委和薄一波同志负责。一波同志在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上，听了少数人的发言，不经调查研究，也不与部党委的同志交换意见，就轻率地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并且不加分析地把上台发言的人都说是“革命的左派”。这是很不妥当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谈话
我不希望同志们利用我十一月四日的讲话，影响对薄一波的批判，或者为个人的错误打掩护。也不希望用我的话去压制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先念接见工艺美术工作者时的讲话

五、财贸系统

商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

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在领导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学生中红色造反军和筹委会两派的对立，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红色造反军这一派学生找到中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同监察组的同志（我当时认为主要是刘孜如同志）挂上了钩，建立了联系。我又听说（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的）刘孜如同志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没有按照曾传六同志交待的三条去办，相反地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对刘孜如同志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刘孜如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先念同志的指示和姚依林同志的意见，曾传六同志已经转告给他，而他却置之不理，也不听曾传六同志的招

呼，在那里片面地支持学生中的一方的做法，是控制并指挥着监察组的同志同领导唱对台戏，是别有用心的，是想把水搅混。我认定刘孜如同志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是政治扒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一、关于六、七两个月的运动问题

方向性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把揭发的重点首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强调“炮打司令部”和引火烧身，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

二、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题

我们却说“群众的眼睛红了，再下去，就没有政策界限了，”在研究分析问题的时候，我说过：有的人贴的大字报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的是有个人情绪等，我还给个别人（有局长，也有一般干部）打了“保票”，或者发表过自己倾向性的意见。

三、关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

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把刘孜如同志也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是极其错误的。

四、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由于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认识，对于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也缺乏认识，因而在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表现出行动迟缓。我们没有立即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地认真地结合我部运动向群众作检查，没有迅速地同群众在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准备批判吴雪之，同志们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粮食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李先念在粮食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你们谈到你们部关于“三个横扫，一齐扫”是否方向路线性错误有争论。

三个横扫一齐扫，中间有一个短时期内，突出两个锋芒不够，面放宽了一些，大了一些，这是个缺点，但决不是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与学校的情况不同。三个横扫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负责，不能由党组负责。

二、这个革命是个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当统帅发动起来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地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廿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辫子也剪了，等等，有些过了些，这也是难免的。

三、炮打司令部问题

如果各级司令部都要打，是不是都当成修正主义打？！

现在一打各级党委，各级领导都成了黑帮，那么，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就落空了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允许这样想。开始这话不能讲，你讲他就要揪你。现在讲是时候了，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学生对省委，市委一围就是几天，不出来就揪人。你们那也有人说盖子没揭开，打成牛鬼蛇神就过瘾了。

粮食部的运动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商业部有吴雪之。他就是对党不满，趁着群众运动的高潮，伸出黑手想捞一把，组织地下司令部，想把姚依林打成牛鬼蛇神，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平时他不讲不学毛泽东思想。现在他大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其实是政治扒手。群众把他黑手抓住了。现在看来，确有几个部，几个副部长有问题。看来，他们也不一定是牛鬼蛇神，也不过是一二三。其他是三类的，但也要经过斗争，否则他们不服气，转不过来。这一小部分人，并不是每个部都有，总是少数。外贸部就没有。粮食部里，部长一级也没搞出来嘛。有少数并不奇怪，不然，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就不灵了。

有人说我在商业部讲过一次话，检查了三个横扫、五个原则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没有讲过。

商学院组织大围攻，围攻了一百多人，七个人打成反党分子(没作反党结论)，还抓了人。学生斗学生还打伤了人。以后了解七个人被打伤、挤伤。这还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陈国栋代表粮食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错误表现在八月以前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明确运动的重点。当时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就是说，不管是领导干部，或者一般干部和职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都要把它揭发出来，批倒斗臭。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集中火力，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火烧党组。没有首先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上的错误更有了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的前三条上。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上下一齐扫”，“党内外一起扫”，而没有重点。党组在司局长会议上还讲过，启发诱导知情人揭发问题，做到揭深揭透。在大字报揭的面已经比较宽的情况下，党组还错误的提出“犁庭扫穴”，“搜索战场，寻找死角”，怕把牛鬼蛇神漏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等在中央财贸各单位代表会上的讲话

李先念说：我犯了错误，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要求我们检查是合理的、应该的，欢迎同志们揭发。对同志们的揭发，我抱欢迎态度，希望同志们揭。在六、七月，就是在八、九月份，老实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脑子中仍然继续起作用。对两派——革命的左派、革命的保守派，看不清。同志们问我，多数派、少数派，谁是左派？我说都是革命派。所以，你们说我合稀泥，我接受，我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比较认识到这个问题。

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错了的，为什么不该怀疑呢？不该批评呢？

李先念的十二月讲话比较九月份的讲话，应该说是大有进步，就是不知道他的这个认识是真的呢？还是违心的？

六、公检法系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谈话

法院本身的运动，对某些同志，秦义等他们是一般干部，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他们毕竟不是领导干部，不是当权派，所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牛鬼蛇神。用了很大力量批判斗争他们，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要叫王维纲检查，批评他是合理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这件事我与戚本禹，周荣鑫，严永明三位同志商量过，请示了总理，王维纲同志应该检讨、批判，总理也赞成。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彻底批判。

高院至今对沈兰村镇压革命学生未很好地揭发批判，未引起强烈反映，这是完全应当重视的问题。为什么高院不重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对某部一个学习简报的批语。

贰、本节简论

从中央机关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来看，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除个别部委如宣传部、文化部等以外，一般都采取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方针，把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一些有问题的人，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方面，是根据当时中央一线领导的指示，向有关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部委比较主动，认真检查了前一段的错误，如商业部、粮食部等。有的部比较被动，如国防科委、地质部、广播电视部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他说：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的。

2007 年 4 月 16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8 日修改

第二章第七节 各省区市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市召开革命师生斗争黑帮分子宋硕大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接见“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

张春桥说：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 13 个公社、48 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325 人。其中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出生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 8 月 31 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吴德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各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吴德的这次讲话主要也是说政策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戚本禹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工具车间讲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吴德传达中央指示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体现在今天的社论上（按：《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吴德给北京市职工的一封信

你们这次离开生产岗位，出来串联，发生在今日《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之前，应当照发工资，同时也不能对你们有任何歧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纪录
座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纪录
座谈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工矿企业文革的十二条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吴德在“斗争彭罗陆杨集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指示。

二、上海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陆续来沪串联的近万首都红卫兵中的绝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坚定地站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一边，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及各级党委的错误领导，大力宣传“炮打司令部”，得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市委发出对付北京红卫兵的十条指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对遭受围攻请求支持的北京红卫兵说：“你们是革命的怎么会受围攻？”如果你们是革命的我们就支持。”完全否定北京红卫兵是革命的，从而在一部分上海群众中盛传“这批红卫兵是假的”、他们是“被学校轰出来逃到上海的”、他们“把上海运动搞得乱七八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红卫兵给正在给电校学生讲话的上海市委常委宋季文递两次十万火急的条子要求市委解救被围困近一天的北京同学。宋对电校的学生子说：“外面有人要围我，你们是会保护我的吧？”另一方面，上海市委听镇江车站报告：“北京市委派来红卫兵”，于是这天的《解放日报》发出“首都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的报道。当天，上海许多学校贴出“欢迎首都来的真红卫兵，假红卫兵滚蛋！”的标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曹荻秋在工作队长会上说：“当前形势很好，但有一部分人到处串联，宣扬不要文斗，要武斗，要打倒一切，凡是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都要打倒，这种人在大中学校活动特别多，……要打倒市委，炮轰市委，炮轰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保卫市委，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出版局等各机关、工厂在市委的策划下，成立了“机动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正当北京红卫兵准备搞“炮轰上海市委”的联合行动，并事先通知上海市委时，曹荻秋忽然决定“接见”北京学生，在这次会上有三个北京学生，根据市学联干部提供的材料上台攻击另一部分北京红卫兵。北京学生认为曹荻秋的接见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希望和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要求上海市委给予印刷的方便。等候多时，市委方面不予理睬。北京红卫兵和上海一小部分人冲进上海市委，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有人说北京学生打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市委打了北京学生三十几个人。在市委授意下，许多单位动员了一大批干部、工人停止工作，专找北京同学辩论。有些单位领导还恶意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现在阶级斗争很

激烈，市委门口天天有辩论，你们应该去受受锻炼。”并且还做贼心虚地补充：“要三三两两地去，不要让人看出是有组织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又有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晨，北京一零一中、四十七中、一百中、一百二十中、一百二十二中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到达市委门口，提出了上述两个要求。当时市委门前被层层“工作人员”拦着，这些人声称是“自愿来维持秩序”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下午，有一队前来市委门前游行庆祝的队伍与首都来的红卫兵发生冲突。这时，围攻达到了最高潮，大批的工人、学生、郊区农民云集在市委门口，密密层层围了许多层，这批“下班”，那批“上岗”，在最“紧张”的时候，有些单位甚至受命选拔三、四百名身强力壮的工人，集中起来，不上班，与市委保持单线联系，做好“保卫”市委的一级战斗准备，只要一接到市委电话，二十分钟内要赶到市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由于上海市委领导人一直不肯接见，北京红卫兵冲入市委机关，遭到市委工作人员阻拦，有的拧北京红卫兵的胳膊，拉他们头发，还有人把红卫兵从楼梯上往下扔。

曹荻秋对上海市委门前群众的讲话

曹荻秋说：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

他的言外之意是：北京来上海串连的学生少管闲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北京学生一直被围到5日晚上，当市委用汽车把北京红卫兵“押送”出来时，市委内还向外面围着的群众伟传出了煽动性的话：“这车是坏的”、“这车是指挥的，最坏”，“越到后来越顽固。”……于是外面群众就把头伸进窗口大骂：“混蛋！”“滚蛋！”有的还敲碎了玻璃窗。

这就是上海的“九，四”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北京来沪红卫兵《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记上海市“九四”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一九六六年九月，市委写作班代表《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一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二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首都 齐卫东《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对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曹荻秋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曹荻秋在“三千”会上作检查。他在“检查”到对首都红卫兵的错误时说：“对北京同学来串联认识不足，更没有看到他们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当发展为对立情绪后，没有采取措施缓和”；“你越对立，他越对立，他要出气，不让他出，他气出不出，我们过不了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市委不派一个负责人参加大会。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点。会后，工人们组织好队伍，浩浩荡荡开到上海市委大楼门口，表示抗议。工人们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要求。

工人等到十点四十分，雨越下越大，却有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叫张克让的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许多工人觉得曹荻秋太不讲道理，架子这么大，不愿意去。总司令部为了顾全大局，下令大队来到友谊电影院。曹荻秋竟始终不肯露面！工人们说：“跟上海市委没什么理讲，我们上北京见毛主席去！”造反的工人们大旗一挥向北站涌去。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两千多工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六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

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十四次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可他们全然不提电报的精神，反而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工人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想往，非常高兴，准备动身。谁知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等不开，二等还不开，一夜过去了，还是没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

十一日中午十二时，陈伯达来电给工人，望工人们回到上海，搞好生产，就地解决问题。

十一日晚十二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到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

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于是大部分工人于晚八时回到上海，另有一部分步行北上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华东师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

十三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等五项革命的合理要求。

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完全合理的要求：

(1) 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2) 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麼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3) 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4) 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

(5) 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时的讲话

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忙于派工作组。对工作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无论搞土改，四清，什么都有一种习惯，要派工作组；还有解放军是战斗队亦是工作队，这已成为一个习惯的形式。因此派工作组本身

不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土改派工作组就不是路线错误，四清也不是。问题是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它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但它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组。因此不能那样谈，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没有派工作组吗？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

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

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首都 齐卫东《从“安亭事件”看上海市委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

最近在中央讨论的时候，毛主席也曾经讲过，说我们现在如果从去年十一月份算起的话，到现在不过整是一年，在一年里，前六、七个月，就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底，这个呢，只能是舆论准备阶段，就是大家发动群众，思想要有准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这中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还算舆论准备阶段。从六月一日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那么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也只是五个多月，还不到六个月。

我还开过一天的会，这和什么人开会呢，就是即强烈的反对我答应你们五条这一批工人开会，他们说我犯了错误，说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叫我。几十个厂子，上千个人，现在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很多工人到这儿来见我，要求我谈话，前天我谈了一天。我和这一些工人同志接触中间，我也就深深地感觉到，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反对你们的行动，举了种种的理由，反对我答应五条，仔细听下来，同志们会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反对党中央，并不反对毛主席，他们也并不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时就搞不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张春桥说：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们想写的简单一些，越写具体越难，越没有办法写，争论越多，我们准备写那么八、九、十条有一般性的。例如，要保证质量，要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革命，不要扣工资……最近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你们对十二条不满意，反对的人可多了，他们说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得太少。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内的。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有些地方的提法要修改。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

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是坏人要破坏，但有些老工人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对于这种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骂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问题。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象上海形势很好，可以全面铺开。有的就不行，象中小城市、三线问题，

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

有些人，薪水一高，有个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自己有家小。有些人就没有这种顾虑。

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学生很愤怒，要上街游行示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给他们提过建议，这次提建议叫他们不要游行，因为这一游行要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在大会上的发言：

三、天津市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有情可原，但不可以推广。热情好，但方法不可仿效。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随便一问他能承认吗？热情可佳，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地说是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查一遍，一检查就三、四个小时，这样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方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

他们说保护李雪峰，让他上了小汽车，后来抢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查四次的时候，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六次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同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座谈

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些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她，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

四、河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

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陶铸：你们革他们的命就要有阻力，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们要顶住，不要怕。

这次接见的情况说明，河北省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问题还很大。

五、山西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戚：赵树理不是学术权威，写小说的怎么成了学术权威？赵应该是反动艺术家。

关：是个反动艺术家，总之可以批判就是了。

戚：应该批判。

关：群众之间互相贴大字报，这没有什么。如有领导、有组织，拉一派、搞一派，那就叫群众斗群众。太纺的杨丕夫我认识，解悦我也认识。我和杨丕夫谈了两个晚上，批评了他。前几天，接见了太纺的几个人，我谈了三点：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大方向。杨丕夫挑动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杨丕夫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二、解悦是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她的工作搞得很好，她挨了打，我们表示慰问。三、有人说：林彪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反解悦是对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

工人：聂元梓等新写的大字报，在大街上广播，说刘××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是第二号，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

戚：你有你的看法，聂元梓有她的看法，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嘛！

关：北京有的经验需要学习，有的就可以，比如昨天有人砸了第三司令部。不见得北京才有经验，其它地方也有嘛！如西安交大对三级干部会，就起了很大作用，做了干部的工作。有的干部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发动路线，而且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大多数能回来，当然要斗争。不见得北京有经验，其它地方就没有！我看交大的办法很好，我很欣赏，起了很大的作用。叫他们一展览，一宣传，就站到学生方面来了，支持学生。这不是很好吗？

六、内蒙古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解学恭与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红卫兵谈乌兰夫问题

中央撤销了他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已承认了自己的全部事实。

让乌兰夫上天安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要相信毛主席。但是，让乌兰夫上天安门这并不影响和妨碍大家继续揭发他、批判他以及他的同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刘宁一在包头市接见部分工人学生和干部代表时的讲话

七、辽宁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谢镗忠与东北工学院红卫兵谈话纪要

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姜健生，他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

姜：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顾虑的，怕万一造错了人不好，特别是老干部年纪大，身体不好，涂了墨，游了街，戴了高帽子，造错了不好下台，将来道歉都来不及。

姜：中央文革支持第三司令部，有些地方有人认为是是否过了火，老叫人家回来检查。老干部事情多，特别是运动中事更多。没多大影响的问题，光是点工作组的问题，就算了吧！检查了一两次就算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不能让人家老回来。

姜：三类、四类干部很难区分，有些三类干部打成四类干部的，象文教系统，党内大点的干部定为四类的很多，恐怕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中央能不能规定一些更具体一点的政策？

姜：造反什么样子才算造得好，而不是形“左”实右？

谢：造反嘛！就要有些造反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造反的。省市的问题你们看准了，确实有把握就大张旗鼓地干。北航“红旗”很好，我很欣赏，他们要北航工作组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罗舜初回来检查。到国防科委干了廿八昼夜，到最后赵如璋才回来作检查。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们天天在那里闹，天天派人送饭，造反精神好的很！

姜：就是因为这件事就干了二十八天吗？

姜：北航“红旗”那种做法有不少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闹，不成样子，过火了，不知中央文革小组怎样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
同学：有两个，有两个的总部被我们捣毁，我们不承认它们。他们的一些人到中南海去闹事，大喊要把陈伯达拉下马，我们听到后很气愤，就封闭了他们的总部。

陶铸：你们的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来时，我批评了他，他怕字当头，你们省委书记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指胡亦民），你承认不承认。（胡点头）

在黑龙江问题上，东北局是支持潘复生的，潘复生是少数派嘛！东北局也是支持红色造反团的，正因为这样“八·八”团不是要造东北局的反嘛。辽宁、吉林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来，宋任穷没很好地帮助他们执行中央方针，所以说他们是三分之一正确，客观不？

你们辽宁是搞得很厉害，执行得很厉害的一个省。（指胡亦民）我看你们执行得很厉害。（同学插话最厉害）不是最厉害的，甘肃、黑龙江省更厉害一些。

山东济南有个红卫兵师，我看是官办的，要汽车给汽车，要什么给什么。

我听说你们把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游了街，把他放在装满黑材料的袋子中间，反穿皮袄戴着高帽子，用汽车拉着在沈阳游了一圈。我看搞一下也好，是不是以后不搞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谭力夫的这种观点是反动的，这是封建贵族的办法，生下来就是“公侯伯子男”，这是反动的。

你们同意《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吗？这是主席的思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我说中南局搞得冷冷清清，湖南搞得很坏，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湖南省委为什么不能开除党籍？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同志的发言还是诚恳的。潘复生同志指出东北局三分之一是正确的，三分之二是不正确的。东北局在沈阳支持了潘复生，支持了哈尔滨造反团是正确的，在辽宁没有支持造反派，东北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

学生：我们从“八·二五”后开始分歧。主要在对待院党委的态度上不同，我们主张先大鸣大放揭问题，即先定性后罢官。而他们主张先罢官后定性，到底谁按十六条办事？不同意罢是否就是保皇？

陶铸说：两方面都是革命的，但他们激进些。

罢官是东北局决定的，后来复了，就压制了那一派，这是省委的责任。

北大有一部分人原来最拥护李雪峰，可是现在斗李雪峰最厉害，揪住不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对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的讲话

八、黑龙江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大连海运学院船电六一级长征红卫队《长征宣言书》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编辑部《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周恩来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谈话要点

你们炮轰了省委领导，省委有错误，但对省委还要一分为二，不仅对省委是这样，对市委、地委、县委，每个机关都要一分为二。

欧阳钦错误有多少，可以揭发，因为他有病，不能回去。就是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刚开过刀，也没让中宣部要回去斗。

潘复生同志到黑龙江是光杆去的。他过去在河南是被打错了的，后来平反了，调到中央在总社工作一段时间又派到黑龙江去的。

“黑帮”、“黑线”再不要用了，十一中全会有人提出，主席考虑之后，还是不用，因为定义解释不清楚，帮多大、线多长，界限不好判别。

你们叫红五类，就有黑五类，除了红就是黑，概念绝对化，这很危险。犯了错误的人的子女也不能叫黑五类，这样就成了宿命论了。毛主席最反对宿命论。有的人昨天是革命干部，今天就是反党干部了，要允许人家改造嘛！

《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斗争的消息，电视台广播了，扣押了人，全国只有黑龙江一家（潘复生讲话：这个错误由我负责，不是同学的责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十月十八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周恩来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潘复生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报告

我省商业厅厅长×××没有什麼问题，在食品公司斗了他之後，他回来洗洗脸，继续去召开会议，毛主席说他是真革命的，经得起考验的。有些人就不行了，

躺倒不干了，情绪不高。也有些老干部发牢骚，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现在连个俘虏都不如。这些人思想有些情绪，想不通。一般干部也是把缺点看得多，大方向，主流认识不够，这种思想不解决就是阻力。主要问题是“怕”字当头，对群众躲躲闪闪，要挺身而出，检讨自己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
斗团潘复生你们可以提意见，也主要用写信的方法，不能抓住一条辫子不放，他还要工作。对潘复生，反正现在你们想抓，不能抓潘复生书记，说他是路线错误，不然这样就没完了。

我告诉过宋任穷，批判欧阳钦是对的，黑龙江省他责任不比李范五少，但现在有病，一斗就死，这对你们也不利，允许揭发将来再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
斗团谈话记要

他们在前期带头对院里，省里搞得比较活，比较凶，批评得尖锐（问：谁反映的？省委反映的）我首先说，你们三个团都是革命的，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里面有激进的，中间的，保守的，他们是激进的，你们是保守的，我那个时候，就这样讲的，当时开会时，你们就没有起来辩论嘛！他们把李范五揪出来了，又揪出陈雷，王一伦，又揪出了杨易辰。过了一些，我打了电话，你们三个都是革命组织，大方向是一致的。

两件事，一个是讲省委问题，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省委也成立不起来，生产也不能抓。这次你们“八·八”来北京，到三座门，搞科委，抓路阳，搞得也有点过火了。

工程学院教学上有很多问题，我都相信的。刘居英有他的一套。五月份我陪谢胡去哈时，见到刘居英，就警告他了，陆平已经是黑帮了，你要看看沾了多少，能不能划清界限。我当时怀疑，后来查出来他沾了许多，刘居英搞了许多专家路线。你们当时是否尖锐揭发了，我不清楚。

你们说根子是国防科委，这就值得研究了。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副主席的领导下，要一分为二，成绩要不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上了天，不是靠毛泽东思想吗？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就讲这一件。当然，不光是国防科委一家，还有其他很多单位，是全国工人，专家，领导三结合，还有国防工办协作，还有领导和中央的关心，毛主席的威望。如果六〇年专家撤走后，不靠自己自力更生怎么取得六二年以后的好转。不错，六一年后有个波折，把专家和知识分子重视过多了一些。专家也出了点力量，出了点力量就骄傲起来，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自以为是，瞧不起新生力量，这是他们的本性，当然贡献力量是好事，专家撤退我们自力更生后，64. 10—66. 10. 四次试验，每一次都提高一步，不像苏修那样搞浪费试验。我们不是骄傲，这四次弹无虚发，能说科委没有一份吗？当然，你们有意见提出来，不能说是错了。当然，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可以怀疑，不了解的可保留，这是合乎科学的。你们不能把主要目标对准科委，追根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二十多年来，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二十多年来，根本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还是旧的一套。都垮了，影响了我们的党员群众和非党员群众。

起名就是符号，不要在这个上面争，在这个枝节上争，就会把你们引到歧路上去了。天安门一定要改，你改什么呢？改东方红吗？对世界革命也不合适，我估计主席不同意改，我和主席谈，主席也不同意改，主席说根本不要改。东西长安街也不要改。古时候有长治久安，今天的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有什么不好呢？井冈山、延安也都是老名，主席在那里住过就有意义，这样一分析，也就没什么改头啦。反修路在苏联大使馆前边，要整它一下还可以。你们这个红卫兵改一个名，他们那个红卫兵也改一个，我们都不晓得了，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革命者不反对一切形式，但不要流于形式。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到本质，重点放在内容和本质。比如这个暖水瓶，就是看它是否质量好，如果质量不好，就是

写上东方红，反倒把东方红玷污了。名字这个东西，不太封建，不太落后就可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远新《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的讲话

我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要过好五关：亲属关、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生活关。我的头一关就是亲属关，政治思想是一个关。有人说我多无论，我是一无论的，都要归到思想上。思想关，政治关是根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个要根除。

我从小就开始交朋友，又是个大家族。我是个南方孩子，到××地方骂我是个侂子，到沈阳骂我是蛮子，他们（指学生）欺负外来的，在山东××地方打我，我也交朋友，和他们对打，我十二岁就离开了家。我父亲是个职员，常常失业，每月收入不超过三十元，我家里没有一亩地，家里只有祖父留下的一栋房子，一双对（？原文如此），就这两件封建东西。我入党时写得封建家庭，后来还是写封建家庭。我为什么填封建家庭，我父亲是代理县知事，外祖父在太平天国时当山阴（按：在今绍兴市内）知县，我祖父兄弟五个，三个是知县。封建习惯在我家太多了，我兄弟三个，老二抽大烟死了，三兄弟我主观愿望想把他拖到黄埔，他也考中了。北伐时打武昌还挂了花。以后他恋爱犯错误，受了留党察看处分，他不××了，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他半途逃跑了。不能强迫他革命，革命不能输出，连弟弟都不行嘛。

我对红卫兵说，你们抄人家的家，有抄对了的，有抄错了的，搞不好人家抄你的外婆家，你就该保护了。我说这个话很重要，“红五类”、“自来红”这是反动的血统论。现在不是批判一付对联吗？（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西城区纠察队搞成这个样子，违法乱纪。

有人说我是主张抢的，我是不提倡的。我这样说过，他硬是要，你就是不给，不怪别人嘛，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发生冲突抢了嘛。你要给他抢还不抢呢，抢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是不提倡抢的。

清华的蒋南翔参加了中央会议，大家对他恨得不得了，但后来斗了几次，大会一次，小会一次，就斗不起来了，没兴趣了。同学之间争论反到激烈得很，兴趣很大，这不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时的谈话

总理：铁道部有什么鬼！总搞绝食，吃的饱饱的。在毛泽东时代，绝食总不太好。

红：（三门峡工人被部党委所迫搞绝食）铁道部害怕群众运动。

总理：变成我来兼铁道部长了。兼也兼不好，你们（指红色造反团）应当说服他们（指三门峡工人）。吃饱饭干革命，绝食总不应该提倡。尤其是在北京，外地也一样，我也要派人去。

（当我们谈到现在北京以李洪山为代表的一小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时。）

总理：这一小撮不但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文化大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触及灵魂么，一小撮总会有的，你们旅大也会有的。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十点五十九分，在国务院会议厅讲这样的话。二十年以后，你们四十多岁了，正是当权的时候，以后你们真的这样做好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底了。我这不是将你们的军，我是鼓励你们。二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看出来了。

九、陕西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刘澜涛对西安市大学中学生的讲话

刘澜涛的这次讲话表明：他贯彻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态度是坚决的，行动也是迅速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西安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同志：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

（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同志：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同志：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给西安工业学院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一再等待你们，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吃饭，我怎能睡觉呢？党中央怎么能看着你们不吃饭，有些问题要研究。

你们这个组织是合理的，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保护你们安全和自由，大楼可以分一部分给你们办公，交通车受阻拦应给西安市讲，你们不要阻拦。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停止。

这些问题要让他们辩论解决。不，不！有些问题要根据材料才能解决，有些……要停止辩论，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你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结果是怎样？它的后果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后果。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人，影响多么不好。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你们有权提出罢郭××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人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没有吃饭，不吃饭不是等于向毛主席示威吗？毛主席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全国问题有先有后。有毛主席，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全局来看的。看一个人不但要看现在，而且从整个历史来看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干革命遇到困难就不能前进了吗？要磨炼，要锻炼，受到一些挫折阻力算得了什么？遇到困难不吃饭，热情好，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呢？我们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反动政府也不应该如此。我们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象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你们可以派少数代表来北京，我将……一天 24 小时都不够，现在全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全国还有生产、外交问题……很多，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心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送来。立即停止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省委所犯的错误的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六月六日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

八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连续发生了反学生的严重问题，在铜川还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空鸣枪威胁学生的严重事件。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对新疆少数派“红二司”战士的讲话

看一个阶级，不仅是从经济范畴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产品的分配这方面去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从这个方面看，虽然没有剥削了，没有地租的剥削，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力量，还在那个社会里面存在。这件事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那么，既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这个国家如果没有阶级了，那么这个专政的对象不就没有了吗？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阶级？这个问题就成为毛主席的思想同一切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一些好心的，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死板教条的人的分水岭。

在中国方面来讲，取得政权以后，十七年来，大概进行了以三种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

第一次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主要的是以经济范畴为主地进行了阶级斗争。这就是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等等。说是以经济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这个大概在五六年以后就基本解决了。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在三十年前就宣布在苏联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次、五七年整风反右，这一场斗争主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政治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说是以政治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经济范畴、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经验，我们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曾经提出来十月革命的九条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这又是一次。

第三次、就是我们这一次。以文化、思想这个范畴为主，当然联系到经济范畴，当然也联系到政治范畴。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是超过了文化革命的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的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新疆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电文

革命学生和工人激于义愤而采取的静坐、绝食和停工的行为，责任完全在于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中央对于革命同学和工人接受中央关于恢复饮食和工作的建议，表示极大安慰和热烈欢迎。

十一、山东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挂上牌子，强迫劳动，我们不赞成。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泄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打人不还手是对的，阻止打人是应该的。对什么人也不

能打。有些人还说文斗是修正主义，就更不对了。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这里也有炮打司令部的，我也是司令部里边的，也是挨炮打的，我也挨了炮，有错误我就检讨，可是也有这样的头，非要把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打垮不可，但是我不听，我们要坚持党的原则，你们打吧！我们都准备戴高帽子游街，准备挨斗，准备牺牲，叫我游街我就游，但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黑帮分子”，我就不喊，死我也不喊，我喊毛主席万岁，斗几下就投降还行？要坚持原则，不能投降！共产党人只知道不怕死，在日本鬼子、蒋介石面前，我们准备牺牲，不怕牺牲，该和你辩就辩。

红卫兵是清华属中创立的，北京有一个红卫兵西城分队，他们倡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都是红五类，这个队伍革命性极强，斗争性极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最相信十六条。我家也有个纠察队，经常调走，开什么会都叫他去，去维持会场秩序。北京有的红卫兵到外地串连，的确很好，有的名为串连，到处乱跑。回来就造谣，在北京还闯乱子。在北京八中有两个学生，是红卫兵人家不要他了，他自己出去造谣撞骗，自称是十三个学校的总指挥，叫本校红卫兵关起来。现在交给家庭管制。这两个学生是什么人？是红五类，红五类的学生也有思想不好的。后来成立了纠察队，权力很大，知道哪个学校红卫兵不纯，经过调查，就去个人下令解散，重新成立。

现在还有那么一小派少数的人联络校外的一帮人，把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不贴的，甚至有那么一张大字报，说中央犯错误了，要改组。你们同意这一张大字报吗？

学生打市委，工农不同意，是否叫工农斗学生？学生砸市委对不对？（众答：不对。）机关里黑帮、学生砸党的机关又是什么行为？（答：是反革命行为）工农兵保卫党的机关是革命的（众答：对）你们说，只许学生砸市委不许工农群众保卫，这是什么理？纠察队命令在中南海若干公尺内不准停留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答：革命的）对，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有些学生砸市委，工农起来保卫市委，工农没打学生，学生就说对了，这是故意制造是非，是不对

的。只许学生放火，不许工农点灯，那不行。共产党的组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分开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这么些年，有许多革命老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父母儿女被杀，只剩一个人，他还是要革命，你们打这是什么行为？管他什么理由，党的机关里出了问题，可以贴他的大字报，可以要求党的上级机关把他揪出来，但不能砸，就是前北京市委，三家村黑店，北京的红卫兵也没有砸，改组时是庆祝，为什么市委内有人犯错误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去砸市委？这叫什么道理？这叫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我们自己掌握着政权怕什么！砸市委，抢国家机要室里的文件，抢国家的机密干什么？！谁下的命令？！谁叫你砸的？！不仅工农兵，就是学生看见这种事起来保卫市委有什么错？（众答：没有错）抢国家机密是什么行为？是反革命行为！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隐瞒是不对的，这是个大问题。北京有些学生戴着红袖章到处胡作非为，听说有四个学生，把南京市委砸了，把市委书记揪出来打了，工作人员要保卫市委，皮带上带钉子，一皮带把头打破了。这一条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们为什么要砸党的机关呢？前北京市委，三家村，也没砸过。

在斗争时，要掌握住，别用那些戴高帽子，下跪，打人，打我们的共产党员，给我们的共产党员戴二十八斤的高帽子，用铁丝挂铁牌子，这是什么人呀！对我们的共产党员这样厉害，这样狠心？是什么人在背后指挥？你们是大学生，这些问题，你们有责任去弄清。

全总在市委安排后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市总工会，撤走时有些人要斗我们，最后左派起来了，还是敲锣打鼓地送走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陶铸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峰，他们是顽抗破坏。

十二、江苏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江苏扬州中学初一学生 郭苏扬《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

8月25日，我报名参加了红卫兵第二大队，8月26日，被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一大队发出了“呼吁书”，诬蔑我们是“右派”。我爸爸妈妈就开始反对我了。我父亲是扬州市监委。他说我是“卖命为右派办事，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要我“退出第二大队”。我坚决不承认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爸爸气极了，上来就给我两巴掌，打得我脸直发火，但是我一直昂着头，挺着胸，毫不动摇。他又用杈棍打我，我趁机跑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妈妈硬把我拖回去，一路上说：“你昨天不回来，我和你爸爸一夜都没有睡觉，你爸爸气得肝都疼了，弟妹又小，一家身体都不好，你把我们急倒下来怎么办？”这是什么话？一到家，爸爸威胁我说：“你就不想回来啦，你才十三四岁，钱没有，粮没有，衣裳没有，看你敢走！”以后，我爹妈一直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与同学接近，讲话，用尽各种手段“说服”我。他们说：“地、市委的干部过去受过革命的考验，有的是在四清运动中提拔上来的，没有问题”。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毫无效果。我爸爸便给我三条路：一、参加一大队。二、哪个大队都不参加，等事情搞清楚再说。这段时间内，不准出家门，不准和任何同学谈话。三、如果继续留在第二大队，就脱离父子关系，永远不要回来。

我被关在家里三天，大门不准出，同学不准来，使我和同志们断了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郭嘉宏《控 诉 书——愤怒控诉镇江市委工作组对我监禁四个月的政治迫害》

从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关押了四个多月。

六月十五日革命群众贴了党支部书记汤政的大字报，自发地开了批斗汤政的大会，给他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他。

六月十六日，工作组挑动了四千多农民围攻、殴打工区的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派了刑车，绑架了我们十二个同志，就连公安人员的身上也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

六月十七日又借“保护”之名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关押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参加绝食斗争的《揪江渭清战斗队》代表向首长汇报了江苏省委迫害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学生的罪行，我们进行的三天三夜绝食斗争，完全是江苏省委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十三、浙江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的讲话

就搞文化大革命说，现在只能说是初期，是个开头。如从去年批判《海瑞罢官》算起，刚一年，但前半年规模不大，广大工农兵刚开始注意，学生作一般辩论，报纸上也只开展一般的辩论，打“笔墨官司”。今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了北大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马上起了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到八月八日，十六条出来，又一个高潮，特别是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后，又起了一个新高潮，各地学生革命大串联，炮轰省市委也起来了。金华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全国从那时到八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这证明群众起来了。

你们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我看了李学智的检查，检查太轻了，说什么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个“性”字要去掉，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中发 [66] 622 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平同志电话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当天下午两点半，林副主席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十四、安徽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张星临《斗争现实教育了我》

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些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好同志至今还没有解放；一保再保的“老保”们仍在耀武扬威，以“左派”自居；革命的组织“八·二七革命造反派”被压在阴山下，被称为“老鼠队”；许多县对“八·二七”进行声讨，许多“八·二七”以及支持“八·二七”的同志被抄家、被绑架、被扣押、被扣掉工资；许多学校的牛鬼蛇神蠢蠢欲动，有的甚至戴上“五保卫”（保省委、保工作组、保院党委、保爹娘、保自己。）的红袖章，在“八·二七”等革命组织中大抓“右派”学生。芜湖三中的一些混蛋们甚至狂妄地喊：“现在是运动后期了，该抓学生中的右派了！”真他妈的放屁！对于串联队，尽管安徽日报故作姿态，在九月廿八日发表了一篇“欢迎”外地串联同志的社论，然而围攻、陷害北京赴皖串联的事件却不断发生：清华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学，X X X，X X X被打成“反革命”，X X X被打成“狗崽子”，在芜湖的清华及其它北京高校的串联队，与合肥一样，也被当成是“最最不受欢迎的人”。……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有的被家里抓回去关起来不让回校，有的则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在安徽的几十天，才使我对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感性认识。我现在才明白，我校“筹委会”及红卫兵总部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形“左”实右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以新的手段压制同志的意见，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八·二七”串联会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某些领导人和蒯大富才是真正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要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以彻底批判。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给蒯大富等同志戴上的反革命的帽子，其“工艺过程”也是一路货色——造谣、歪曲、污蔑、捏造、断章取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翻老底、无限制地上纲、直到构成“反革命”的“罪状”为止——这是一切顽固的“保皇派”的惯用的手段，这也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贯伎俩。……对照一下我自己在前一阶段由于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于是就“怕”字当头，

“我”字为首，生怕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而丢了面子，于是便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作为一个预备党员，以“怕”字代替“敢”字，以“我”字代替“公”字，远远落后于一般同学，心里实在是万分难过。这一跤跌得是太疼了，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刘宁一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八·二七”革命造反派同学汇报到同学被围，被打，有人喊“誓死保卫省委”、“誓死保卫李葆华”；合肥师院“红绸子弟兵”翻印吹捧谭力夫讲话；“八·二七”被打成反革命；贫农社员陈光林；蚌埠地区的情况，北航赴蚌同学高家富被打和其它受伤同学抬到北京住院；有人喊“程光华万岁”；法院院长鲁凡等人也参加围攻学生；安徽工人受迫害，工人有的自杀和被关押；蚌埠十一月十日车站挤死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李富春接见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时的讲话

第一、谢副总理、刘宁一副委员长对你们安徽是已经肯定了的，同学们回去好好闹革命，要闹彻底。

第二、七机部的工人，任何工作人员对你们有任何不礼貌、不正当行为，由王秉璋同志向你们道歉，特别是在北京，我也向你们道歉。

第三、同学们表示不干预七机部的事，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准备参加他们的辩论。辩论后，谁对谁错再说，你们不干预是对的。

第四、七机部有一部分同志十一月七日到中南海的行动是过火的。你们出来劝阻，这是正当的。十一月九日晚由陶铸、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和我等几个人找他们谈话，认为冲中南海是不对的。当时最凶的是××学院，这是不对的。

第五、我们接待人员对同学们热情不够，接待不好。这个我们要检讨。汪东兴、童小鹏我们都要检讨，不好的我们要撤换，加强接待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谢富治刘宁一等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的讲话

你们安徽十五、十六、十七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打伤了许多学生，还有工人、还有……在那些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群众斗群众，有些同志受到了打击，我们对这些同志表示慰问。从“八·二七”到现在，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廿六、廿七（指八月）群众斗群众，后来廿四、廿五、廿六（指十一月）又有一些工厂群众斗群众。

十五、江西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对半工半读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白栋材在会上讲话：

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

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一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广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本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条：省委要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

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

第五条：立即恢复生产……

陶铸：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的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省委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的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用火来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见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

16，福建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张春桥关锋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同学们：九月一日以前我校运动冷冷清清，九月一日学校扣留了北京南下串连队，扬言要搞臭他们，后来串连队索性留下。此后我们这些少数派就出现，自

已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炮轰队。因为他们宣传“八·二九”是革命事件，所以被扣留。他们（指多数派）直说“八·二九”是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乱。他们有的到我们家里说：“你们干反革命。”有家长到学校哭哭啼啼，说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教训”、“要听先生的话”，“要听校长的话”。他们不让我们代表上京，不发给我们代表证。我们学校，有三十多个大小黑帮（反映关于工作组评黑帮的情况，还有谢、骆、郭三青年教师怎样被打成黑帮）。他们学谭力夫这样骂我们，谭力夫讲话省委大力支持，还有新华书店翻印。

十六、河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刘建勋接见郑州大学学生。他说：“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文敏生在郑州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刘建勋说：省委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支持你们，依靠你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敏生说：八月四日，我们在体育场开过一次大会，听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讲话录音，在会上省委宣布了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留校集中学习，听取批评和意见。现在，根据中央指示，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自觉性，省委决定：工作组的全体人员，立即全部撤出学校，集中整训。工作组撤出后，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时，可以贴大字报进行批评，也可以把大字报和批评意见，送交给他们。工作组里犯有错误的人员，凡是群众要求他们回去检讨的，在一定的時候，让他们回去听取批评，进行检讨。

这次会议的情况说明，河南省委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态度坚决、行动迅速。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河南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一度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而毛泽东却表扬了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的讲话

河南在十一中全会前也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的结果吃了亏，十六条下达前我们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北京一个学生说：同学去到开封师院，被围攻了，把我们关到楼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纪登奎与开封师范学院师生的谈话

纪登奎说：“工作组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历史错误”。为党完成了一个错误历史使命。派工作组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过去包办代替就不对，当然个别的例外，但不是开封师院。如果有人喊“保卫校党委”、“保卫某书记”（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校党委喜欢听，我劝他赶快承认错误。

总的说来，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在全国的前列。

十七、湖北省

18，湖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在汉串联，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部分院校前一段受到压制的少数派到省委门口，和南

下大学生一起，与省直干部、部分有组织（或自发）前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进行辩论

针对北京学生扰乱了武汉秩序，王任重安排北京红卫兵卜大华、宋要武赴汉，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的运动，卜对省委工作做了批评，也热情肯定省委工作大方向；他们严正指责了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的“混蛋”行径。

南下造反学生多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院和华中工学院少数派学生里活动，并在湖大建立联络站，后树“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大旗，点火发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省委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张体学说：“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傅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哄堂大笑）……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省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会场外，南下学生40人在省委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决定绝食抗议。

晚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在另一场合，张省长再当众挥泪痛斥人大学生赵桂林。

保护省委的群众与南下学生展开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王任重给湖北省的八条电话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阎长贵与武汉地区少数派座谈纪要

学生说：

十一月一日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进洪山宾馆，会议没开成。

在十一月七日同张华同志协商，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1）同意召开三级干部会，（2）保留参加权利，（3）我们揭发的材料要铅印出去。三级干部会不能关门开，要参加批判大会。

在协商过程中发生了工人斗学生三次，挨打的不说，在此情况下，中央精神得不到贯彻，地委，县委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

现在武汉地区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工人斗学生比九月份还严重，还动了武。省委合稀泥，四日早上韩副省长授旗给大专院校红卫军，现在多数派也在造反（和少数派对立）。（史子荣、）张体学他们就搞折衷。

阎长贵说：

十六条公布以后，是否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此结束了，现在看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仍然受到压抑，不少地方还是支持多数派，压抑打击少数派。很多支持党委的传单是一些漂亮的传单，但是少数派的则是草纸印的。还有一种奇怪的事，八月八日十六条广播了，但是在八月廿日出了谭力夫的发言。谭力夫的发言有什么了不起呀！发表出来是风云一时，到处翻印，清华印了两万，他们没有两万人；师大印了一万，师大也没有一万人，师生员工加起来才七千人。人手一册，绰绰有馀，大学印了，中学印了，学校印了，机关印了，北京印了，各地也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谭力夫的发言可以分析出一些问题。林彪同志是副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对林彪同志的讲话为什么人手一册，而谭力夫的讲话却人手一册？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根本不可能理解。我听师大的一个多数派同学说，筹委会对谭力夫的发言最感兴趣。

据反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恐怕还是相当严重咧，反“右”反得很厉害咧，手段很高咧。（插：他们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我校还有一个同学戴高帽子游街）你们湖北抓右派抓得很厉害，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但是一个学校打了好几百这是干什么？

你们湖北对串联很反感，还开大会控诉赵桂林。（插：张体学代表三千二百万湖北人民控诉赵桂林）对待串联的问题不是小问题，革命串联是毛主席支持的，反对串联究竟反对谁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关锋：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一点情况。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陶铸接见二司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根据中央意见和他自己认识，讲了 5 条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旋即发展为 40 万人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市委酝酿已久，组织部长辛甫实心牵线支持的。于是，武汉有了与造反势力对抗的、体制性的强大的工人、基层干部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后称“工造总司”。‘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除了工总和九一三之外，算是第三大工人组织。主要的地域是在汉口，汉阳和武昌也有。人数大约有 7—8 万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成为武汉造反工人、干部中最有组织聚合力的群众组织（其前身原是工人总部的一个武钢分部，后从总部独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阎长贵接见武汉部分师生谈话记录

阎：你们湖北的情况分三部分。（1）枪打出头鸟，学生抓右派，从六月中旬到7月份；（2）抓南下“一小撮”（笑）；（3）秋后算账，大致是这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同学们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揪后算账派王任重！”“推倒折衷主义！”“打倒调和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同学：我们是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旗帜鲜明（陶：开门见山，我欢迎）首先向你们报，王任重有哪些问题，作为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汇报，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汇报。王任重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犯下滔天罪行，我们有些材料，既有书面材料。文化革命以前谈一个问题，王任重写的《资治通鉴》读书笔记，61年、62年大量放毒，与邓拓唱一个调子，在全党流传，为右倾机会分子一唱一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王任重作为当权派，不号召大家学主席著作，而号召学《资治通鉴》，说比水果糖、牛奶更香甜，奉为珍宝，凌驾于毛主席著作之上，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力求古为今用，与邓拓差不多，还有虚假红旗，官木生的问题，他还到主席家里作客。四清运动中关于双十条，在展览会上大肆鼓吹王任重。搞个人独裁，特意说大，突出自己，凌驾于主席之上。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最早派出工作组，而且王任重还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文化革命引歧途。七月三日，给湖北省委的信是黑指示，恐怕是经过你同意的。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清楚。我们要揪王任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王任重打倒。在揪王任重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归根结底，不过这两条。具体来自何方？值得我们深思，反动路线不批倒批臭、怎能斗、批、改。为了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搞出来，就要把阻力搞清楚。王任重是你部下，老战友，首先让你谈谈对王任重的看法。

十八、湖南省

19, 湖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 5 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 279 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张平化说：我重申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

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

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

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

陶铸这次讲话中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的右派们都认为这种说法是否认、摆脱党的领导。但说这个话的却是他们狂热拥护的陶铸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

“八·一九”事件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性的事件。和“八·一九”事件相联系的所谓“三相信”这个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来镇压学生运动，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

我回去是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请罪，请罪！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大家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鼓掌）第二个任务，就是造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我有两段错误：一段是在中南局五月会议以前，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抓文化革命。后一阶段是抓了，广州会议以后那是抓了，但抓错了，就是派工作队，急急忙忙往学校派工作队，搞了一条错误路线，对大、中学、文化机关急急忙忙派工作队。是谁干的？是我干的。

譬如对长沙发生的“八·一九”事件？你究竟是表示哪种态度？长沙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是站在被镇压的学生的这一边？还是站在镇压学生的老爷那一边？每个同志都必须迅速选择。必须明确表示态度。我感到有不少的人是站在革命群众对立面，替老爷们讲话，动不动就讲学生闹事，闹什么事？人家闹革命，闹革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阻拦？为什么要镇压？为什么要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有所谓徐天贵被绑架的问题，长沙出现了传单，反对所谓绑架。我们看徐天贵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被抓起来？是在学生被镇压，一天两天请求省委解答。……并且给他戴了高帽子，这个事情，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身上，在于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回避和群众见面？在群众愤怒的情况下，把我们一个部长抓起来，这叫什么绑架？所谓绑架，是土匪行为，与革命群众怎能相提并论？请发传单的人想想，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去了？

最近在湖南宾馆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在招待方面的一些缺点，不热情，或还有其它原因，引起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反感，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打了服务员，把一个服务员打的伤势比较重，服务员也咬了红卫兵的手。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本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责己严，责人宽。就是红卫兵打人不对，应该向红卫兵同志提出来，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为什么要抓住这个事情，散发传单，大肆煽动？把受伤者打得很惨，煽动群众包围红卫兵，打红卫兵，并且还向全国来歪曲这个事情，这是什么行为？

张平化回湖南之初，态度还算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张平化对湖南“九·九”大会代表的讲话

中央提过要炮打司令部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司令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湖南省委几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炮轰司令部主要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部，揭省市盖子没有问题，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分清楚的嘛！群众分的清。

省委揭盖子，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能肯定，由你们决定。我在湖大检讨，有人说我是为自己的错误定调子，大家分析。这几年来主要是搞

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由大家分析。省委这些人到底是大家的敌人还是内部问题。搞当权派要看一贯，是什么样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9·24”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谢若冰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噪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
按规定张平化同志在北京是不能与你们见面的。因为他是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他不是宣传部部长了，但是我请示了中央，还是让他去作检讨了。王延春以前搞得很坏，是毛主席让张平化回去的。他回去也搞得不好。我请示了中央，建议他回去，他今天回去了。

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最严重，（向陶铸同志汇报“中央八条”的问题）中央文件未形成，你们说的“中央八条”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的前身，在这两个文件发出前王任重同志通了个电话，告诉他通通气，他（指张平化）迫不及待地散发，全省往下讲，想要解决县的问题，搞成了“八条”，这是错误的，太急了，影响不好，中央没有正式

文件，你就搞个“八条”，后来中央文件不是“八条”而是“六条”、“五条”，你就被动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我一定要亲自反映给毛主席。

挑起“八·一九”事件。湖南大学同学拿了几桶浆糊到市委贴大字报是好事嘛！发生事件是湖南王延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八·一九”发生以后，中央认为王延春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王延春不行，张平化自报奋勇，我们就把他调到湖南去了。这次从北京回到湖南，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

二十、广东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林杰与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林杰：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保皇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保皇派，是根据客观规律讲话嘛，你不改正错误，一直下去就是保皇派，这顶帽

子是摘不调的。学哲学的人就很清楚，概念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只有承认错误，站过来，才不是保皇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是错误的，就是要平反，这帽子是错的，这与事实不符合，应该平反。你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嘛！这是名副其实的。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为什么不敢叫！在革命派面前不承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保皇派。

在保皇派面前不敢说，说他是革命的，是两面派的态度。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必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是真正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十六条、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闹革命。你坚决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阶级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

你到北京街头转一下，便可看见“炮打中央文革”、“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中央文革产生的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法”，这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说，中央文革不管谁指定的，都是违反十六条的，这矛头是指向谁？是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即两个月的总结（原题不是如此），毛主席有批语的，说这个总结很好。可是有人说是大毒草，他们说是很好的大毒草，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是公开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猖狂极了。

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群众组织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来决定。北京第三、第一、第二司令部，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决定。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哪个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个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看得很清楚。第二司令部，我看不怎么革命。第二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是矿院的，矿院某些人现在对中央文革攻击很厉害。

21，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十一、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王任重给广西师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的一封电报
我和陶铸商量决定，授权予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全权处理。韦国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我相信他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确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任重的这封电报有问题；如果别人对韦国清有意见，你还让不让提？

22，四川省

二十二、四川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四川赴京代表团问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西南政法学院十五名红卫兵的谈话

你们要炮打司令部，这很对，但是事先要调查一下，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也打了。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也可能有一两个不好的人，对这些人也要打；反之，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司令部，也要注意里面也有好人。那些人不经过调查研究，就是提出“保卫市委”，“保卫院校党委”的口号，那肯定是错误的。

你们学校有人斗争北京政法学院去的同学，是错误的。

你们有三个同学被逼疯了！有一个住院，还有一个是彝族学生，请你们回去替我向这三位同学问好，打人不对，把人逼疯了，更是严重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接见重庆及西南地区师生的讲话

我有一个个人意见：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兵子弟来领导文化革命。高干子弟是不是不能参加文化革命领导呢？不是的，还可以当积极分子参加文化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的讲话

同学们提出这次北上告状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们认为是革命行动！（鼓掌）同学们还提出，你们在重庆市“炮轰重庆市委”，有人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吗？（众：不是）我们也认为不是。

有同学提出要求改组重庆市委，罢市委书记的官。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改组，暂时不要罢官。

有的同学提出，重庆中学红卫兵被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

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压力的，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你们脱离关系。重庆市委这样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王典兴（自贡市培红中学学生，十三岁）

王：有。

总理：呵！就是这个小同学！（另一同学插话，才十三岁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

王：我与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总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家中兄弟多吗？

王：我父亲是工人，四十多岁，共产党员。我是老大，如果我父母不和我断绝关系的话，要被扣工资，开除党籍！

总理：不要怕，我保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

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 2—3 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关于军区收枪的问题，开始他们还不敢动手，怕打起来了，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去，无论如何也要封存起来。’最后军区还是执行了。现在又不搞民兵训练，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嘛！”

“要他们检查、批判，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搞轮番轰炸，李井泉不是说已经生病了吗？这样搞久了反而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把这些批判对象拿来连着搞三天三夜，就搞垮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的讲话

“还是让大家回去闹革命，如果一切问题都让中央作出决定，那还要你们回去闹什么革命呢？不仅四川，还有贵州、云南，学生阻力很大，任务很重。主要是三个学校：成都地质学院、民族学院、成都大学。西南的问题还要向中央请示，运动的深度、广度发展还靠大家揭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十一月二十七日要求来北京时，就有七十九名工人强行上车来北京，他们到北京来，我们是要招待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革命的。

（对廖志高同志）听说你们已经签字承认他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错误的。（对工人代表）你们批评省委的错误，是对的，但不应该抢车，你们抢车是错误的。你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每项行动我们都支持。你们造反，看造什么反。你们到了北京，我们要管你们。四川省委承认你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不对的。

现在正在绵阳、广元的工人，可以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来，最多不超过三百名。我们抽时间跟你们谈，但具体问题还是回四川解决。

工人到北京问题，我们不能松口。我们停止运送红卫兵，主要是为了抓紧运输生产资料、燃料及其它物资，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不仅不能影响生产、破坏生产，而且应当促进生产。你们要替中央考虑，中央的意见很坚决，就是不赞成你们全体来北京，只能派代表来，你们已经是最高指标的代表团了。

这次派十辆大汽车运送工人，你们四川省委同意这样做，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对廖志高同志）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给中央。你们来了，我们当然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感到很恼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进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是哪一派的？

（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决，我是一贯支持少数派的。档案材料（包括混入的黑材料——记录者注），你们派人去要就是了，不要冲进去，冲进去就失礼了，就会被抓住小辫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你们兵团在途中的很多，广元、西安，紫铜都有，有两批到了广元，也有到西安的，如果他们再来，我就派你们几位回去做工作……。在紫铜的，我已委派当地县委书记在做工作。在紫铜的也可以推派代表到北京，其他的回家。他们都是好意，你们领导还不能命令他们，我们一边称赞一边说服他们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现在有的同志有两怕，即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怕群众，就压制群众；回来群众起来了，群众给予压力了，又是怕群众，随便答应签字，不坚持原则了，这就是两怕；有的人满足了少数派的要求，多数派不同意，怕多数派揪你，就成了三怕。因此，原则必须坚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部分赴京人员的讲话

十一月二十五日造反兵团与保守的产业大军的冲突，要说理嘛！在当地解决嘛！矛头要向上，指向厂党委、市委、省委，西南局。他们受蒙蔽，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他们，原则问题不能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对西南区联合赴京告状团全体代表的讲话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可以提，我给你们建议：具体行动还是要一层一层地挖深挖彻底，不要先作结论。很多地方不就是为黑帮打起仗来，纠缠在某些问题上，斗争就不能深入。口号可以提，口号可作个宣传，不要在口号上争论。“轰、火烧”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词，不是真正拿炮去轰，拿火去烧。关于“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你们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当然是不会放弃的，要在斗争中考验，要提出具体问题。

现在已经查清，关于西城区（指北京）……就是邹家尤的女儿，是他父亲搞的。

李井泉他很气馁，一出来就很紧张，血压就高，中央的意思是先让他写个检讨，给大家看看，不行再检讨，然后再出来。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接触过他，他比廖志高还紧张，廖志高也很紧张。你看，我跟你们谈了那么多次，也不紧张，血压也不高，怕就怕出病来了。

二十三、贵州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至十月 X 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六封信

九月五日至七日，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小巷一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查。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这不是白色恐怖是什么？能说这是红色恐怖吗？这不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是什么？难

道是支持革命运动吗？这是工人、市民、学生群众的自发行动吗？我不相信。联系到“八·三一”、“六六”事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24，云南省

二十四、云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农林学院等九批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生共五千多人进入省委大院，炮轰、火烧云南省委、西南局。

阎红彦对学生说：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八二三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大中学校文革负责人会议上，

阎红彦说：炮轰省委可以，炮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

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跟党中央、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从这一天开始，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保卫派是暗中受到省委支持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在昆明第八中学红卫兵的倡议下，成立了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由云南大学、昆明师范院校学生发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他们串连四十一所大专院校一千一百多人，到云南日报批判该社发表的三篇社论。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九一四风云”。

但“八二三”一派认为“九一四”一派不够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云南大学同学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昆明红卫兵造反派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批判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派封闭了云南日报的地方版编辑部、采访部。省委加以拒绝，云南日报从十五日起停刊。

25，西藏自治区

二十五、西藏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十二月，各省市自治区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很不平衡，加之，资料收集有限，这里反映的情况只能是挂一漏万。这一次修改，也没有来不及补充，只好有待来日了。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北京一九六六年发生的“大兴县八·三一事件”。

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这件事发生的政治背景，从全国方面来说，党中央刚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革命群众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从北京方面来说，中等以上学校兴起了红卫兵运动，他们在学校开展四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横扫四旧，兴无灭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就要作垂死挣扎。在他们看来，革命群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阶级敌人”造他们的反，就要坚决镇压。在城市，他们借少数无知的青少年的手，制造了许多打死人的事件。他们认为，这样声势还不足以压倒对方，必须在农村组织更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的行动。

这件事发生的具体过程，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群众就自发地行动起来。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现在已经知道的是：“66年8月31日晚，……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却令人费解，大兴县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公社主任高福兴、团委书记胡德福，而他们是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那么，在天堂河农场主持开会的是谁？而天威公社早在8月27日就开始屠杀，又是谁布置的？这些似乎都成了谜。其实，事后不久，公安部门即已查明：这个事件是由所谓“联动成员”参与组织策划的。

根据杨尚昆的日记中的一段记载：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

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 76 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 1966 年 8 月 5 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 66 年 8 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 75 年 9 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 75 年 9 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 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 24 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这就说明，北京市大兴县一九六六年发生的“八·三一”事件，幕后的真正元凶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当时就已经查明了事件背后的黑手，公安部门为什么没有结案处理？为什么没有上报中央或者上报中央在哪一个环节上被压下来了？

2006 年 5 月初稿

2011 年 8 月 4 日修改

第二章第八节 部队院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十月前军队院校文革运动发展概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条公布以后，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随之开展起来。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以上的军事领导机关，另一条是部队院校。

关于部队领导机关的文革运动开展情况，公布的文献资料很少，此处不作论述。

关于部队院校的文革运动，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军委、总政根据十六条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系列规定，如：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 中发 [66] 302 号

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指出：“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

《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 23 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规定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

其他，还有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等等。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

他说：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叶剑英讲话：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在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如打人、打死人。有些青年，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拾到一些金条。

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形成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搞成两个国家一样，那就不对了。

二、十月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军队院校文革进入新阶段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总政召开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

陈毅在会上的形势报告：

现在有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极少数人怀疑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

整个历史时期，毛主席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1，我们推动国际形势发展的力量更大了。中国是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文化大革命产生深远影响，对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文化大革命是否使人害怕了，朋友少了，把人吓坏了？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疯狂诬蔑我国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要掀起一个反华高潮。中国文化大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即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大多数人赞成，一小撮人反对。他们说我们“反苏”我们不是反苏，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排

外”，我们对各国人民都是主张友好的。他们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把毛主席神秘化。我们相信真理，掌握真理。他们说我们“好战”我们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我们对帝国主义就是好战，对亚非拉人民则和好。他们说我们消灭知识分子。我们是改造知识分子。

2，越南战争形势很好，越南抗战决心更加坚定。越南战争是拖的局面。越南主战是主流，曲折要估计到。

3，美苏处境困难。双方交易并不顺利。

4，美帝国主义要颠覆亚非国家，现在亚非国家反帝斗争有新的高潮。

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加剧。

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

我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根据的，根据就是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三十多华里，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

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运动的同志要“敢”字当头，不要有“怕”字，“怕”有两种，一种从个人出发，怕不应该；还有一种从工作出发，怕把工作搞乱了。要看到运动起来了，可能有点乱，不乱不治，不浊不清。乱过后，才

能看到真正好的干部，好的学生，把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把百分之三的坏分子抓出来，把许多问题揭出来。

因为工作组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当别人勇敢地起来批判他的错误时，他承认压制打击革命学生，当时站出来批判工作组的只是少数。因此就出现了分裂，批判工作组错误的人就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假左派”，这些都要取消，在今后的运动中不要重复这种现象。

现在又有文革小组，党的领导是不是要保证呢？我们考虑，干脆重新组织文革小组，党的干部也参加选，好的就选上，群众认为不好的干部就让他选不上。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军委研究）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就好比我们的代表大会期间的代表大会主席团，到开代表大会时，上届中央委员会就把权交给大会主席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产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的领导。

杨成武在会上的讲话：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

肖华在会上的讲话

部队院校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给挖掉，把教学工作中的旧框框、旧条条，统统踢掉，让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然一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部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得更好！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统一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毛主席是当代的马克思、活的列宁，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实际上，叶剑英对“紧急指示”极为不满，他“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

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叶剑英传）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陈伯达指出这是“借战备压革命”，不同意发出。为了扭转由于《紧急指示》下发所造成的革命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 5 份电报，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才没有发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林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

三、军委一些负责人态度的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叶剑英在空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文化革命。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思想的大革命。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动员。最好的备战。最好的交班：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诚地拥护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认真学习林付主席。

（一）坚决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判断大是大非的界限：

（二）要坚决跟毛主席走革命的道路，必须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

（三）坚决拥护毛主席，就要认真学习林付主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陈伯达对国防部大楼前军事院校造反派的书面讲话

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都站不住脚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讲话：

在文化革命中要处处注意起模范作用，不要乱斗，不要跟着他们那样去闹，那样闹，我是不赞成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不要报复，“你整老子，老子就要整你！”你斗我四十八天，我斗你四十九天，比你多一天；你骂我十句，我骂你十一句，什麼“罪魁祸首”、“滔天罪行”、“刽子手”，没有什麼意思！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你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就是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就是破坏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什麼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

徐向前讲话：

你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麼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叶剑英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完全赞扬你们的硬骨头精神。你们顶得住冲击。但是要注意，任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份了，搞过了头就错了。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到运动的大方向，知道运动是向什麼方向发展的，你们点名是不应该的。有少数人出来就不大听话了，有的人到上海住高级旅馆，有的住资本家家。有我们解放军坐火车，位子没满就关门，红卫兵叫开门，他们也不开，结果红卫兵打碎窗子混进来。红卫兵说：“这种解放军，我们不能学。”不如红卫兵，连中学生都不如。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对这件事很愤慨。有的首长有病，人家都犯了心脏病，还是硬拉着走。有些人要求到总部看大字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些大字报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你们要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干涉机关文化大革命。最近有人围攻〈解放军报〉社，要砸〈解放军报〉。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刚才成都军区战斗歌舞团提出你们受了压抑，继续奋斗，你们十六人来到北京告状。你们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我们支持你们。

近来收到很多条子，见到场面上的标语，提出陈毅、叶剑英我们两人十三日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必须批判。批判院校的反动思想，首先要批判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西医大红色造反中队提出，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给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新的障碍。

兽医大提出廿条，太多了，不能念。其中有两要求上次讲李基才的话作废，质问我，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彪副主席，你们有什么权利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这件事。他们又递了一个条子，“敬爱的叶副主席：……。”我谢谢你们有“敬”有“爱”，你们要求给李基才恢复名誉，但未提明用什么方法，是否要在《解放军报》上搞一个启事呀？

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有人冲了中南海，冲了国防部大楼。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冲这些地方究竟要干什么？我讲这些话的声音又大了，大家又要说我在发脾气。有人这样干，我怎么能不大声讲呢！严格地说来，这种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

陕西有个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教员，可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在这一小撮人当中，有的父亲是黑帮，已经自杀了，有的人全家都在台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肖华陈毅刘志坚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讲话：

我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我那天讲话（十一月十三日）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现在有些人根本不想这个问题了，揪住工作组不放，把根本问题忘记了，说句错话，办件错事，都揪住不放，这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很多精力，浪费很多时间。

把大专院校的做法搬到工厂是危险的。学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工厂怎么能放假呢？一放假国民经济就瘫痪了，那怎么行呢？军事工厂能这样闹革命吗？有些军事院校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他们不懂得厉害。他们要去农村串联，如果农村停止生产，一年歉收，整个国民生活就成问题了。

陈老总又是那一套，又是定调子、划框框，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误会是可以的，但我还是这样讲，我还是要解释，我讲的是有道理的。

别的我不敢讲，我没调查。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几万张大字报，很有意思。“滔天罪行”呀，“刽子手”呀，“罪魁祸首”呀，“没有好下场呀，”“挑动群众斗群众”呀，“一切严重后果你要负责”呀，“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呀，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并没有打中要害。

现在这个斗争，有人担心，我也担心，我担心的是，现在不去斗争黑帮，不去斗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揪住一些同志来斗，每个部斗部长每个单位斗单位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我很耽心这样子文化革命就搞不好，就不能搞到底。一讲黑帮，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面太大太宽。我去过一些学校，见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没有打中要害，没有打到真正敌人，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这样讲，听起来不舒服，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是不是你这个陈老总讲话是个大阴谋，不让我们讲话，封我们的嘴？你们不要这样误会，你们的嘴我封不住，你们要写大字报，我制不住但是讲这样一个问题有好处。

我讲这话可能有错，可能有片面性，欢迎大家批评。可能批判我，我要出席批判会，可以，只要我有时间。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还很难说。

有的人提出，既然形势这么好，搞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搞得影响生产，那么没秩序，学生不好管了，许多人伤了感情，多数派和少数派吵架，相见仇视。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要严厉批评。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大字报贴出来了，各种言论出来了，各种思潮出来了，确实有些方面有些不好，但是也说明一九六五年五月以前和今年五月以前的那种平静局面是不可靠的。现在问题真正暴露出来了，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出来了。通过这个“乱”，达到真正的治。我们就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过去不牢靠，今天经过斗争，就真正牢靠了。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个决心，敢于放假闹革命，敢于成立红卫兵，敢于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敢于让革命群众在中

南海附近贴大字报，敢于让各种思潮上街，中南海北门、西门、王府井、天安门贴的大字报最多。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量，敢于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讲话：

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例如：有人坐火车把门一关，不让红卫兵上车，红卫兵就把玻璃窗砸烂过来，红卫兵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习。”这不是批评几个解放军，而是批评全军。这是一小撮老鼠败坏了军队名誉，有些人在上海要吃好的，住高级旅馆，坐小汽车（听不清楚）。但是还有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要细算，我们犯错误还有比这更错误的吗？要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如果不改，还受某些人的蒙蔽，就还要犯错误。我们知道有一个山西的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军人，来到北京，你们在前面冲，他在后面指手划脚，暗地指挥，我们要追查，他是跑不了。这些人有的父亲是黑帮、有的一家在台湾，我们不能看着你们掉下去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叶剑英等接见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现在一个学校分好几派，听说北大有八十七个组织，这样就集中不了力量，连文革委员会也成立不起来。你们有几个组织？（答：六十多个组织）这还了得。

有些地方出现了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筋疲力竭，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罚跪、低头、披麻带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中南海，冲国防部。现在全军军事院校被抄家的干部共×××家，下命令以后还抄了×××多家。我支持批判×××，但是现在看来做的过火了，他毕竟革命几十年了，你们把老首长整垮了，把你们都提成司令、部长？部长、司令将来都是你们的，我们要交班，但现在时间还不到。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未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抢车票、占车厢，连红卫兵都不如，红卫兵说你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

以前开了两次会，我们两次都扭了，都是十三日会后有些不好的影响。接待站有的同志说廿九日大会不要开了，我说还要开，要消除不良影响。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十三日的讲话说一，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捣鬼，教员中也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七八糟，故意搞得越“左”越好，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了，这就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冲进国防部不严格的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的说那就是反革命。

有人认为少数是左派，多数是右派，那是错误的。少数中有左、中、右，多数中也有左、中、右，你们两部分群众都是革命的，方法不同。马列主义对外，那是错误的。

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修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当然我的态度好些，那就更好了。十一月廿九日本来是来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念，后来肖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四、部队院校文革运动出现反复，叶剑英在会上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叶剑英讲话：

我们在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又连续两次接见了来京的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在那两次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军队内，同时也在军外去到处印发，散发的很广，因此也就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

这一点我们认识不清，所以在上两次讲话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会后许多同志对我们的讲话提出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的感谢。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

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呼口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次反复，是与我们两次讲话有直接关系的，我是有责任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犯错误，我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这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

全国解放以来，这个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我们同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的斗争，我们同罗瑞卿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罗瑞卿这一小撮篡军反党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在某些方面还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内部也是有市场的。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某些单位，某些领导人和工作组，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在运动中压制民主，打击革命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敢于给他们提意见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打成“野心家”等等，蒙蔽一些群众来保自己。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还没有作认真的检查，死死抱住反动路线不放。据我们了解，第二军医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领导，这些院校的某些领导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并不是主流。而军委的几个负责人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特别是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的两次讲话，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同时也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这些讲话又被人搞到军外去到处印发，在全国也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四、处理复员军人单独成立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来电中所提的三条意见，批示通报全国同样照办。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的原电转发你们，望遵照执行，并请转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

南京军区党委三条意见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一、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有这三条批示。

二、如果解散了，我们如何交代，会不会说我们是黑组织，打成反革命，受打击怎么办？把工作做好了，一般是不会的。

三、警备区的问题，市委的问题，你们按十六条办事，如果威胁你们，架机枪，挑动群众斗你们、打你们，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警备区是犯严重错误，要受纪律处分。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如果确实受到打击、压制，应回本单位去解决，错了就应当平反。

五、建议周总理接见你们，是集体接见，会后开座谈会，只能接见代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首先回答大家的要求。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希望有个自己的组织，这是原则问题。现在是搞各行各业组织再联合。

革命的组织应具备三个条件：

- 一、承认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
- 二、承认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 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

不少复员转业军人代表找我，开大会叫我去，因为我没有功夫，并且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去。后来开完大会后请愿，十一月十一日冲进中南海，有几位副总理接见了大家，我没出席。不管怎么样，任何人不许冲进中南海，因为这是毛主席所在地，谁要冲，我们要誓死保卫。

主席、林副主席作了三条原则指示，这是真的。

我没有用毛主席的几句话，叫你们解散。你们的组织问题，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从来没有下命令解散任何革命组织。十七日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提到纠察队这个名字成了管红卫兵的组织了，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们提议，组织纠察队不好，大家同意解散。我们只是把几个犯了法的坏分子逮了起来。

你们的组织可以存在，可以和其它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可按行业成立联合组织。

（听说天津、贵阳等地的复员转业军人正向北京进发）

总理说：赶快去劝他们不要来。

贰、本节简论

运动初期，军委在叶剑英等人的主持下，对军队院校的文革作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指出：“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叶剑英认为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并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对空军也是如此，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尤其是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四个元帅在两次部队院校大会上的讲话，完全是对部队院校革命选择派的打击和压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虽然对这两次讲话作了检查。但是，这次叶剑英的检查究竟是真心的呢？还是违心的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在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说：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按照这种说法，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两次讲话的主要责任在刘志坚身上。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叶剑英传》对这件事作了详细描述：

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 11 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 10 万人。林

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说：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

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 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12 月 8 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 13 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 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 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查。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12 月

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也说：迫于压力，叶剑英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陈毅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

这里提到了周恩来，看看周恩来是怎么说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说：

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在十一月十三日林副主席是不同意接见，但结果呢，在十三日其它副主席出席，把我也找去了。所以肯定十三日是不接见的，就是接见了，要四位副主席讲话也是不对的，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有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稿子也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哪里讨论的，是打电话通知说开个会，没认真讨论过。

一九六八年十月，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说：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

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2007 年 4 月 28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修改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七年的任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的政治目标主要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的政治任务，主要是：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1)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 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发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北京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的两个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最近上海、蚌埠发生了停车事故，这是严重的问题。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麼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后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别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麼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

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

蚌埠本来分两派，影响了市的工人运动。造反派支持市工人造反派，保守派反对，打伤三人。本来市委能解决，但市长不出面，被打的工人当然义愤填膺，造反派就把车停了。这一下子南北就停了，旅客们给我打电话提抗议。三十一日市委才出面解决。停车后再解决就难解决了。领导有两怕：一怕见群众；二怕群众包围起来什麼都叫签字。两派都签字，这没有立场。造反派停车是公民行动，让市长签字这不能同意，责任由市委负，行为不能同意。造反派义愤，但不是革命行动。中央向他们呼吁复工开车。现在已经开车了，

刚才向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是关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王力在“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

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们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

(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 50 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

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

（总理：好多地方，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

面考查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

（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还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

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

（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

（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

江青讲话：

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

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

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

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

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早一个时期病重了，小将追到医院去斗他，关锋给解了围。一来就要揪这不妥当，因为他们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

李先念、谢副总理，这都是好同志。

谢副总理过去我不了解。他原来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个出来揭发邓小平。总理批评他是对的，他手软。他对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手软，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的反。他们的头头应该抓起来。最近联合行动委员会去捣乱，号称三千人，说周总理要揪谢副总理。他们的骨干少，只有二、三百人，他们是分化瓦解的，已经出来了一个造反团。小头目要抓，要专政。

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们不这样，我们对陶铸也是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等同志，他们都在工作，跟陶铸不一样，他们都有诚意向你们检讨，陈毅已经写了七天检查了，现在还在写。我们要欢迎。有的同学心里很不平，应该平了，要给他们自我批评，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头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气愤。不要把斗争锋芒给坏人利用了，他们准备作自我批评，要允许自我批评。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刘志坚就是这样的人，他耍两面派，有的人很能耍两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说主要任务抓军队，到了军队他又说三分之二的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这个人就是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象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付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那个好，肖华好。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正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付组长（康生：他还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师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

周总理讲话：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

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

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第一、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集体财产，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调查研究，吸收群众的合理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第三、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第四、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

第五、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

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

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在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

通知

通知指出：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小学教师应在本校所在地串连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急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陈伯达对造反派学生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现在有些小单位，从全国看一个大学，也是一个小单位到其他单位夺权，你要夺我要夺，不是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而是一些小团体之间互相夺！看谁先夺就先夺到手，没有夺的也夺它，这样成了内部斗争，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想想，我有一个想法，在全市夺权应当是象巴黎公社那样，工农兵学商召开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夺权，是不是请你们考虑一下，你们要跟工农、革命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店员商量考虑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代表北京市的工农兵、革命师生、店员、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哪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他夺过去来得好，大家看怎么办。

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小团体主义，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要总结经验。现在夺权那些是好的，上海，山西。毛主席说：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二种形式，一是进城军事接管，自上而下的派人接管。现在出现新的形式，群众自下而上的接管，这比巴黎公社经验更多，我们的接管应比巴黎公社接管的更好。现在过渡时间，建议北京开一个工农兵学商的联席会议。文化大革命是从北京开始的，现在北京落后了，小团体主义成了全国的模范，不要让全国学习北京的接管风，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不是有这些缺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这样就要有一个准备，是不是你们现在考虑一下。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店员、机关工作人员，大家考虑搞一个筹委会，筹备代表全市的筹委会，包括军队、工人、农民、革命师生（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

关，那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我夺过去，要好一些。大家觉得怎样？

有些机构，有些单位，都属于全市性，甚至是全国性的，在北京市特别是有许多全国性的。那么一个小团体还不能代表一个学校的大多数，比如占领或选举一个全国性的单位，叫谁去承认呢？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不然一个小团体夺了一个全国性的单位机构，或者是全市性的单位机构，这样就不好解决，这样另一个小团体就又要来夺权，还是搞大联合。你们机关的革命派，各机关的革命派和不同的机构，要总结一下经验，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夺权形式。有的是本单位本机关为主，外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外边帮助，不同的情况有的可搞临时代表会议，全市性的代表会议，各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学习上海的经验，山西的经验，这样比较好一些，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也可能是各团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各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那个地方应该夺权，提出方案大家讨论嘛！还可以提出一般的号召，这样就会出现许多夺权的新形式，合理的新形式，本身是代表无产阶级权力的，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了许多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所以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好好说一说，总结经验，现在这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是很好的，不仅把本市的经验，上海的，山西省的，也是要总结一下。你们这些战斗团体开小的会议，作战要以联合的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王力对人民日报社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广播系统夺权的谈话

听说中央电台的革命派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裂，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讲话

就夺权问题毛主席和对姚文元同志做了如下回答，大意如下

毛主席：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要搞大联合，要做出榜样来，你们自己去闯，闯出一条路来。不要学过去那样试探试探，不要有那些框框，跳出那些框框，大胆去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决定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

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一）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

（二）对于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有意见，可以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他方式提出。

（三）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代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陈毅同志致电因晋谒列宁斯大林陵墓遭到苏修血腥镇压的我留欧学生 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国务院亲切慰问反修战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就向苏修驻我使馆示威事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国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全体留欧学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记者述评：首都红卫兵誓当国际革命派埋葬帝修反，苏修集团越是害怕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越要在全世界大力宣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 林彪〔2〕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 泽 东 一月卅日 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谈《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

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公社的原则，要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举。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上海市、山西省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在他们

权力被革命群众夺掉的时候，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夺权，妄图反攻倒算，把他们失去的权力再夺回去。

（二）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

（四）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对夺权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答复张春桥请示：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周：才夺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四) 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 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

毛：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 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 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 停职留用。(四) 撤职留用。(五) 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一边斗争，一边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造反派)。留用，一边斗争一边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流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修改报刊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1) 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2) 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被戴高帽子，抹了黑脸的，洗洗脸继续上班工作。

(3) 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得挽救他，使他改过自新，不然怎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4) 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

出，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敢字当头，再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

一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有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得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通告说：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文汇报》的编者按说：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

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上来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是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记者述评《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 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三、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革命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其中第四项提出：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主要看他们对待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待群众的态度，采取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抓，就是抓十六条中指出的第四种干部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和死顽固分子。这是个别的。罢，就是罢十六条中所指的第四种干部。这是少数的。提，就是提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一种干部和部分第二种干部。留，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二种干部和第三种确有悔改的干部。调，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三种干部，调离他们的领导岗位，分配适当工作。总之，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对干部要重新排队。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造反红卫兵统一组织『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中一批激进份子拉出一些人成立『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

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廿七号送给我，我廿八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答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写上提出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 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

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

五、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据的权力夺回来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省革命农民行动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登载了四个革命造反组织的呼吁书，并发表了社论，欢呼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是黑龙江省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反革命经济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社论号召革命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全体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编者按：

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呼吁书，号召农村的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但适用于黑龙江省农村，同样也适用于全国广大农村。

一个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农民运动正在全国广大农村汹涌澎湃地发动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农民起来造资本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加强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正在趁年终分配之机，继续玩弄经济主义的阴谋，采用少留多分、分掉公积金、分掉种籽粮、动用准备粮等卑劣手法，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突出政治，顾全大局，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那些在幕前幕后进行阴谋破坏的坏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农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切革命的农民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迎接我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通告称：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全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声势浩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由红色造反团各联合总部负责人，省军区负责人，省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负责人，酝酿协商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我们郑重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呼吁书》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一道战斗。

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站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

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

六、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键在于大联合》

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没有这种大联合，匆匆忙忙地跑去夺权，那不是空话，便是妄动。那一定是搞不好的。所以，关键在于大联合。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山西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现在青岛市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成功经验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由于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组织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这些都妨碍和影响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妨碍和影响了我们去

进行胜利的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省宣布夺权。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约定：没有“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王效禹就联合公安厅、省军区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分会等，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王力说：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的要那个有严重马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四号紧急通告：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

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他们。

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容易。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攀登科学研究的新的山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吴德接见北京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了旧市委、也就是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彻底被捣毁！同时也宣告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前市委和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总的后台是一个，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还有第二号人物邓小平。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窃夺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把北京市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基地，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

贰、本节简论

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份，有上海市、山西省、黑龙江省、实现了至下而上的夺权，并经中央批准。二月份宣布夺权并经中央批准的有：贵州省、山东省。四月份经过中央批准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北京市。这就是全国第一批成立的省市一级的革命委员会。

此外，在一月份宣布夺权但未得到中央批准的还有：

辽宁省一月十四日夺权；

吉林省一月十八日宣布夺权；

广东省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

江苏省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夺权；

青海省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夺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夺权；

安徽省一月二十六日宣布夺权。

这些统称为一月革命风暴。

但是，右派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所窃据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号召全国全面夺权，并不是什么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而是历史性的错误。它是非常悖理的。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三次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十六条》还承认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既然如此，号召全国全面夺权，就制造了矛盾，造成极大混乱，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戕害。干部和群众已经分为观点不同的两派或更多的派，夺权成为抢权，你争我夺，你夺我保，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在僵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出现，纷争不已，由文斗发展到武斗，既推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就横行于全国。

号召全面夺权，是随心所欲吗？是标新立异吗？不是。它是基于幻想，又出于无奈。所谓基于幻想，就是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所谓基于无奈，就是：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情况下，在根本不可能认识文化大革命搞错了的条件下，在天下大乱已经开始的局势下，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激化了的种种矛盾无法解决上海“三停”的危险可能灰飞烟灭现实，生产停止运转的危险可能出现，而无领导状态总不能长期继续，所以只有破釜沉舟，全面夺权就是惟一出路——也是绝路。

全面夺权，是与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进退维谷的局势密切关联，它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苦果。

右派们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如此咬牙切齿地痛恨，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夺了他们的权，也就是挖掉了他们的命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与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不相容的吗？

这完全是歪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占干部中的极少数，百分之一、二、三，而其中真正是至死都不肯悔改，如王年一这样的，又是犯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干

部中的极少数。从他们手中夺权，决不会因此就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也决不会因此就否定了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种分析。

从夺权斗争的开始，毛泽东就反复强调临时权力机构中一定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只要是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悔改的干部，都先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像邓小平这样的表示“永不翻案”，在一九七三年就回到了领导岗位。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出现了革命风暴，确实不是偶然的。

在革命群众的冲击下，绝大多数省部级以下的党政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在原机构中设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两套班子的设想很难实现；

春耕生产大忙在即，不容许这种状态继续延迟下去；

在一些不肯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挑唆下，一些工人盲目脱离生产，上访请愿，造成铁路交通堵塞；

在一些不肯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挑唆下，社会上经济主义泛滥，一些人强行要求国家调拨物资、增加工资福利、调动工作岗位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出现了革命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至下而上地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新动向。毛泽东即时抓住了革命群众这一新的创举，因势利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夺权的新阶段。

右派们把这说成是出于无奈。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会把一切革命的创举，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等都说成是无奈之举。

2007年7月20日初稿

2011年8月1日修改

第三章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市委一些人的怂恿下，工人赤卫队一些领导人开会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楼要求曹狄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号称拥有八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曹狄秋与赤卫队代表谈判。

工总司、机联站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调动十多万造反队员，包围了康平路一带的街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赤卫队部分队员一万多人徒步去北京告状。

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生产遭到严重影响。国棉十七厂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印刷工人也大批离厂，影响了正常的印刷任务。据统计，单在 26 日至 29 日四天内，就要少印老三篇二十四万册，毛主席像十八万册。上海机械厂六千个职工全部停工，一部分北上串联，每人给一百元，还提前发了三个月的工资。上钢三厂六个转炉已停了五个，大批化验员外出串联。与此同时，港务局亦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获悉赤卫队要抄柯庆施、张春桥的家，决定向康平路上赤卫队发起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二时，工人造反派向盘踞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六点多钟，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到四条马路上集中。

在昆山，造反派阻止赤卫队北上，双方发生冲突，造成沪宁铁路中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麼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后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别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这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麼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火车一停，人民不满意。这是保守派的一个包袱。影响国计

民生。有很多去华东、华北告状的都走不了，人家很有意见。造反派支持恢复正常工作。少数顽固的要批判，违法的要制裁。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答：还没有拿到。）思想革命，思想要搞透，这是第一，造反派不要急。一个组织封另一个组织容易引起反感，不利于争取大多数。他们有公民权，应向他们说明错误，教育才能起分化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文件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北京电：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一致认为这是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

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周总理：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一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了，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屈，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

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举行了有利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急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

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

昨天晚上，有二、三十个不速之客翻墙进了我的住处，自称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没接见，我是有准备的，当然不知道赤卫队什么时候会冲进我那里。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够把言论权、时间安排权给我们，工作会从容一些。上一次来上海，到最后几天，是无法生活了，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愿意干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上药二厂九个赤卫队员（宋志云 王阿头 曹林 魏涨生 李忠发 冯永山 沈光银）写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张春桥对上海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九个革命造反组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川沙县严桥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农民造反之势锐不可挡》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新华社记者：上海三十一个革命组织发表《紧急通告》：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新阴谋 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

二、从上海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

一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大会有十万人参加，发出了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号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狄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狄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狄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

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狄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

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自一月六日起，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由机联站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毛主席讲过：“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地位，这说明，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很关心，并寄予无限希望，我们

两人每天要打电话回去，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非常关心，他看到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很高兴，后来又看到上海的革命工人起来了，更加高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夜，我们到毛主席那里去，他说：“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来到上海作调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员，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张春桥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夺权问题谈话

毛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周：才夺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

毛：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一边斗争，一边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造反派）。留用，一边斗争一边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流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一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
现在接管成风！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

主席很关心上海，一是经济问题，全国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阶级强大，在党政机关瘫痪以后，自己搞起来。

（有人提出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姚文元：“那你们提个方案，谁当第一书记？”

工总司代表：“要中央派嘛。”

张春桥：“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我想他们的阴谋鬼计会继续被群众戳穿的，刚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

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

周总理讲话

我欢迎上海革命群众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我们支持你们高举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你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支持你们反对矛盾上交，主张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这提得及时，提得很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上海有个接管风，陈伯达在体育场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前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但新反扑不止经济主义一种形式，最突出的是矛盾上交。经济主义和矛盾上交是分不开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接管，一个单位内部烂透了，内部起来闹革命，外力给予支援，实行接管。现在接管变成一个风气，本单位内部还没有形成革命力量，外边就去接管。

接管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瘫痪了且腐烂不可救药；二是内部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是外部支持。

接管是监督的性质，监督的好处是业务可以继续。对领导，严重的象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现在决定采取撤职留用，考察三个月。（有人说三个月不够，财贸方面时间要长一点）三个月不够还可以延长。夺权是夺的监督权，不是管业务，否则你们就陷入业务圈子，影响闹革命。粮食部革命派写来一封信，说从今天起夺监督权。我赞成由先念同志找你部几派商量一下。粮食调度是很灵敏的，不要影响业务。接管《红旗》十六期刊登了，是我们主张的。但不能一下子说接管都接管，中央商量了，采用监督方式，不接管业务。

（有人问：外贸谈判，能否到场监督？）具体监督方式在监督机构成立了再研究。

（有人反映：监委不监督领导，只监督业务。）你们成立了监督机构，连它也监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各地兴起的“接管风”，并就夺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批准上海夺权，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编者按：

《文汇报》从今年一月四日以来，面貌焕然一新，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它连续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本刊转载的《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好得很！它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有些负责人，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或没有改造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不学习，又不接近群众。因此，他们直到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于是就跟着瞎说“过头

了”，“太乱了”，“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对”等等。应该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这样下去就要从不理解走到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志，极有必要读一读《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篇文章，照照自己的思想，换一换脑筋。希望这些同志，赶快猛醒！赶快猛醒！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1)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 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

我们的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远见，给了这件大事以极高的评价。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王力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

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的经验总结了，提高了，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革命群众，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从他们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阶段的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这一个中心：夺权。我们只要把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生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一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夺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大联合。夺权是争取群众，联合要在斗争中联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讲话

就夺权问题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做了如下回答，大意如下

毛主席：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要搞大联合，要做出榜样来，你们自己去闯，闯出一条路来。不要学过去那样试探试探，不要有那些框框，跳出那些框框，大胆去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上三司”等四个单位再次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三、上海市“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红革会等大学生群众组织开始调查张春桥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等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相互串连，各红卫兵组织采取联合“炮台打张春桥”的行动，并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出面攻徐景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红革会四十多人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张春桥通知上海警备司令部调部队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红革会联合其他八个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广泛印发，“炮台打张春桥大会”流产。红革会频于瓦解。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高校“红革会”

张春桥：

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姚文元：

红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并带有威胁性口气说的。廿四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派了队伍，廿六日开常委会要派部队保护他们，卅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办？红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搞大联合。可红革会把住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

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非常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最近马路上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这个行为适合谁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后策划者，大方向转移了，

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首要任务：1、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大联合大夺权。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四、上海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们大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庄严地宣告：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为中心的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上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从今天起，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彻底垮台了！一切权力归于上海人民公社！

必须彻底剥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权力，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要夺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单靠哪一个团体、哪一个革命组织都不行，必须实行各个革命组织的大联合，执行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

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它是在空前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经过大联合而形成的高度的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各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所以有巨大的威力。它是在砸烂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器产生的

新的地方权力机关，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它不是只代表一个革命组织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当然临时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

现在，一小撮牛鬼蛇神，包括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纷纷出笼。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抗相结合，相勾结，跑来登台表演。有的拉拢一些受蒙蔽的人，成立类似“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公开或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或同这些组织的分子相勾结，到处袭击和破坏革命造反派组织；有的化名换姓，混进革命组织，在革命组织之间和革命组织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有的用糖衣炮弹腐蚀革命群众，企图在革命队伍中收买他们的代理人；有的继续煽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有的进行反革命宣传，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定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革命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一）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全市各单位、各区、县革命组织，都应当召开革命组织的联席会议，具体地分析本单位的各项权力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确定应否夺权、如何夺权或者夺权以后如何掌权，总结经验，确定自己的任务。

（二）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把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击溃阶级敌人的反扑，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红色大军。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最根本的建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

张春桥：

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一再地接见我们，

（一）夺权问题

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

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

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

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

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

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

第二、夺权斗争的中心是三结合问题。

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

1，有必要实行三结合

2，有可能实行三结合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第三，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

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

(二) 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三) 镇压反革命问题

(四) 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至 1968 年的主要工作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王洪文《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姚文元对上海市革委会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唐平铸同志 4 月 15 日在人民日报社中所列文章中一篇）是交给上海了，要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来写。

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极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毛泽东思想是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上海《文汇报》新生后办报的几点经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我们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在学校里深入下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花的代价要大一些。有些学校有共同的任务，又有不同的任务。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学校里培养“文学家”、“艺术家”，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

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

姚文元：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主席讲：一种可能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个阶段搞好，要打硬仗了。当然，有没有反复，这也难说。上海是全国所一部分，还受全国的情况影响。当然如果有反复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在全国当前还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这一仗打好了，以下几仗才能搞好，这一仗打不好，下面斗批改就动力不足，斗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对刘邓的批判是一致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王洪文《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大灭敌人威风》

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徐景贤谈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徐景贤谈毛主席对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丁学雷文章《革命委员会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革命委员会的无耻诽谤》

（二）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整风，促进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突出思想革命

反对“材料挂帅”，打“人民战争”

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

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

反对关门主义，团结大多数

整顿思想，向“私”字开刀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者按：今天，本报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

处去？》。同时，刊登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这两篇文章，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大字报提出了一边战斗、一边整风的号召。他们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运用整风方法，自觉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都讲得很好，很及时。这两篇文章，值得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注意，并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姚文元和上海红卫兵革命大联合筹委会座谈时的讲话

有人假冒红卫兵的名字，干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这方面还有相当尖锐的阶级斗争。

对“联动”的斗争，革命的红卫兵在思想上认识透，打击一小撮头头。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条路线在中国的反映，是组织上的表现。这是哪里来的？还是从头上有皱纹的人来的。“联动”是革命红卫兵的死对头。应该看到这问题的本质，不是一种固定的现象。上海有几个中学，“联动”有活动的，放在革命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革命的红卫兵要搞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摆出我们的观点，不搞秘密暗中的斗争。就是搞好的事，也可能被敌人利用。开门整风，纠正错误，不然可能走向歪道。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搞臭风头主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二、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克服几个“怕”字

（1）“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

（2）“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

（3）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

（4）“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

（5）“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

（三）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

有人提出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我们是怎样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

我们学校在大联合问题上，同学之间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矛盾：第一，革命派红卫兵和过去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第二，革命派组织之间的矛盾。第三，由于反动血统论的毒害，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也有矛盾，也就是红卫兵战士和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同学之间的矛盾。

四月七日，成立了全校的红卫兵团。

在这段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 （二）破私立公，清除《修养》的流毒，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 （三）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群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
加的编者按

编者按：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但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所起的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正如列宁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列宁指出的这种情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高度警惕。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当他们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抑的时候，也会起来反抗，进行斗争。他们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于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又往往表现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弱点。他们热中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难的情况下，又会悲观失望，表现出政治上的右倾和动摇。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斗争，是一座伟大的共产主义熔炉。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完全可以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克服的。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努力增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及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王洪文《整掉不良的作风》

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特别是某些负责人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暴露出来了。它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响斗争的大方向。

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真正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第八印染厂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张春桥接见上海舞蹈学校大联合委员会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总司常委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论派性的反动性》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三）领导干部“亮相”，促进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陈琳瑚《我要造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同志检查“亮相”《请罪与造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的检查：《放下包袱，造反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陈琳瑚同志发言《我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文汇报》编辑部《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曹荻秋《我的检查》

旧上海市委所犯的错误的我负有主要责任。现在，把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所犯错误和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广大革命群众交代。

- 一、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 二、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 三、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作好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革委会副主任姚力谈向革命小将学习的体会《哪里群众意见多，我就滚到哪里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传达毛泽东指示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干部虽然已经解放，但多数未被结合，他们情绪灰溜溜，见人矮三分，抱着“只求解放，不求结合”“有了面子，不要位子”的态度，决心从此“掼掉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准时跑，省得再检讨”。有各别的虽已结合，但是“怕”字当头，劲头不足。

当他们听到要参加工宣队时，感到很兴奋，认为“毛主席支持工宣队，能参加这支队伍，是最大的光荣”，“是革命造反派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

（四）搞好机构改革，做好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组织机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再拖上两三个月，群众非造他们的反不可。区和县夺权后，不要急于先改造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因为过去的机构已经瘫痪了两三个月，建立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群众又不熟悉。还是把原来的搞好。所谓打碎国家机器，是要把里面的坏人除掉，组成三结合的班子。

这些组织（指革命委员会里的各小组）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庞大的机构，把事拿到局里去做，把原来的机器开动起来，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结合，不要新设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工人阶级当权，不是把革命委员会都变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执行什么路线。当然，要把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同时要不断地提拔一批新干部。

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 —— 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编者按

《红旗》杂志编者按：《文汇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社论。这三篇社论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及时、尖锐，道理讲得正确，也很有“杀劲”。本刊特转载其中的一篇，供读者学习。

现在，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包括基层的革命委员会，例如大专院校的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使革命委员会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就当前情况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还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争权、掌权。这是在人民内部反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要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掌权，就能从经验不多到经验较多，就能从事情办得不太好到办得很好，就能学会不熟悉的东西，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如果是为个人争权，为小团体掌权，那就会被鬼迷了心窍，毛主席的话、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而一意孤行，忘记阶级敌人，而把炮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弟兄。这样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各级革命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中有私心杂念的同志，必须认真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他们切实地迅速地改正错误。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

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社论《永葆革命的青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重要文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这个文件的决定。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切切实实地做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现在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谈“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张春桥对上海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编者按：文汇报《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一文，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希望广大新、老革命干部，在当前大好形势下，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实行群众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富春对上海团市委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发“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隔离审查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革会工业组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的决定

（五）搞好教育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文汇报》、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转发《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刊登《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〇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批示

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六）清理阶级队伍，抓好对敌斗争

一九六七年六月某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个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还指出：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段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是一个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好文件。

这个决议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粉碎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市革委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一九四〇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〇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出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李、戚之流不只是一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徐景贤谈清理阶级队伍中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批示：

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马蜂窝就是要捅》

《红旗》杂志编者按：我们向读者介绍《马蜂窝就是要捅》这篇评论，它把所谓“老大难”的本质及解决的方法，都说清楚了。根本的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上海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有“老大难”问题的单位去的办法很好。工人阶级不但应当在工厂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应当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这是一件大事。打好这一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就有保障了。

（七）整顿党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八）排除极左派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上海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

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海中串会《红卫战报》编辑部（影印版）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

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祸首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贰、本节简论

一、上海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自一月六日起，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由机联站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上三司”等四个单位再次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这些夺权都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其原因是这些夺权一不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夺权，而是各个组织都是以我为中心，争相夺权；二是夺权以后的领导班子不是由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支左的军队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个方面共同组成。

二、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等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相互串连，各红卫兵组织采取联合“炮台打张春桥”的行动，并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出面攻徐景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红革会四十多人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

张春桥通知上海警备司令部调部队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红革会联合其他八个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广泛印发，“炮台打张春桥大会”流产。红革会频于瓦解。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关于上海市“红革会”及一些其他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右派们是非常支持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红革会等组织决定炮打张春桥，理由有三：

第一，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打击异己，培植亲信，护卫以他为首的夺权，排斥任何其他夺权。

第二，张春桥原在上海主持文教工作，也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

第三，张春桥有历史上的问题和疑点。

炮打张春桥事件夹杂着由谁为主来夺权的斗争，显然不能完全肯定；它的锋芒是对着张春桥的阴谋诡计和见不得人的历史的，在较大的程度上又应予以肯定。

毛泽东从大联合夺权的全局出发，支持张春桥是可以理解的。

张春的肮脏和卑劣，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这一事件给上海红卫兵上了重要一课，使他们认识了中央文革小组是什么货色，使他们懂得了许多道理。这种反而教员的作用，使他们终其一身也难忘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是否从这个右派的说教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至死不变的人总会有的。人们看到一些逃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仍然在那里宣扬他们当年的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英雄事迹”。

三、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张春桥、姚文元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二月五日，上海市成立临时权力机构，当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里面考虑了巴黎公社、苏维埃、我国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城市人民公社的经验。二月十一日，叶剑英批评上海市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而擅自改名。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等人讨论上海市工作问题。在讨论中，毛泽东充分说明了把地方权力机构改称人民公社将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后果。

这件事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精神。即使当时叶剑英站在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对上海市改变名称的问题提出批评，对于他的意见中的有益成分，毛泽东仍然予以采纳。这也就彻底揭穿了右派们一贯攻击毛泽东“独裁”的谎言和谬论。

2007 年 6 月 12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4 日修改

第三章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关锋同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抵达北京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的讲话
斗争越尖锐的地方，斗争就越有希望，我看北京有希望，上海、天津有希望，山西也有希望。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刘格平等五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刘格平的组织下，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夺了权。原省委省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晚间，刘格平等三名领导干部公开站出来，向造反派代表两千多人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王力接见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讲话
山西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很好。

在一单位，一个市，一个省，把权力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革命派一定要联合，不能采取小集团，分散主义，但也不能一下子就组织一个大组织，一下子就联合起来。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地方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样，领导机关如果不是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叫他靠边站，就要夺他的权，我们应该相信机关的大多数，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相信他们是要革命的，机关以机关的干部为主，外边的起支持，监督作用。机关的权要夺过来，主要的还要依靠机关干部，不能今天这个组织接管了，明天那个组织又夺过去了，这样就可能不适当，采取简单的方法不行，夺了权的能用的人还要利用。

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总指挥部》第一号通令。有多少条？有四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

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三号通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二、四·一四事件揭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山西省发生了“红总站”等造反派“四一四”炮轰刘贯一等人事件，刘格平、陈永贵等人支持；“红联站”等反对炮轰，张日清等人支持。两派矛盾日益加剧。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解决山西核心小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周总理：“象政法部分搞成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才报告的，我们没有批准，你们有意见，可以搞实验么，结果好多文告都可以专政委员会出面，中央就没有以公安部单独发布军政性的文告，还有军管会一整套专政机构，搞成两套了，搞成最最权力机构，好些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分散的很，组织机构分散的很，反映了你们核心小组思想分散，政治生活分散，组织生活分散，你们是最早的一个，一月十二日夺了权，一月十三日公布的，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这个内战不是群众的内战，是你们六个人的内战，当然陈永贵不在了，徐志远在下边，六十九军同志刚去，你们不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吗？这一点你们就没举，你们不是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席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而相信群众在先，没有群众那有党啊！从思想上提高起来，你们犯的比较广，指导思想是分散的，领导思想必须先吃两头，上面是主席思想，下边是群众，这个指导思想在你们的组织条例中看不出来，发言中看不出来。我同意关锋、康老的讲话，和中央文革几个同志的讲话，还是刘格平同志水平高，刘志兰的思想水平太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些，象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经说了话，非去！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虑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昨天张日清说了李雪峰的好多问题，当然是问题了。但是那是局部的问题，华北局的会议，也不是黑会，那次会上内蒙的问题搞对了，河北的问题搞对了，山西的袁振搞错了，这不是局部的吗？华北局机关的问题也是局部的嘛？昨天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打不倒李雪峰，死不瞑目。”这究竟搞革命呢？还是搞报复呢？象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做核心组的成员，真不够格。我同意王力说的，刘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持站出来，提出原则性的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将来可以吸收一些青

年的小将，增加一些新的血液，改变一下成份，你们先努力一个时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小将不是党员，也可以列席核心小组的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刘格平会见北京红卫兵赴晋大队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关锋王力等接见山西代表李金渭时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一）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刘格平接见山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五）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一、会议认为，山西省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尖锐。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曹中南、陈永贵、徐志远等同志执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会议也肯定了张日清同志参加夺权，站出来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后来，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四·一四以来，张日清同志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打击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队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的活动。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少数执行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尤其是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张日清同志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二、会议肯定了四·一四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四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四·一四使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好的形势。那种认为“四·一四是扭转斗争大方向”、“是反动路线”、“是个政治大阴谋”、“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要揪后台”，等等，是完全错误的。

三、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教导，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有的甚至调民兵进城，大搞武斗，问题很严重。会议认为山西军区应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四、必须正确对待两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

五、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于它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实际上颠倒敌我关系，无视党纪国法，乱抓、乱捕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甚至严刑逼供。

六、会议认为，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组织。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王大任。

八、会议认为必须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刘格平同志。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核心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要突出革命委员会的作用，扩大革命委员会常委，增加核心小组成员，名单另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三、晋中、晋东南两大派武斗愈演愈烈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晋中地区两大派在平遥开会。会后，上街游行，两派队伍相遇，开始对骂，进而棍棒相加，砖瓦横飞，武斗逐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赶到平遥古城，解决两派斗争问题，促进两大派的联合。

不久，“总司派”把平遥的六个城门全围了起来。陈永贵也被困在属于“联络站派”地盘的平遥第一中学里。

凌晨零点多一点，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 3 人，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又立即把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令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谢振华迅速命令驻祁县的三一九团马上部署兵力先行赶往 50 里以外的平遥，自己又亲率 1 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奔赴 300 里外的平遥。清晨时分，谢振华率部赶到后，立即让那个武装营的几辆军用卡车都架上机枪，再派一个连的战士不

带任何武器徒手坐在另外 3 辆卡车上。接着，又派代表与两派头头联系，力劝双方平息争端。两派头头看见解放军的军车威风凛凛地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又听见解放军宣传周总理的指示，不得不同意解放军进城。当天，谢振华率部并带着陈永贵撤到祁县，在三一九团住下，次日，又率部再带着陈永贵一起返回平遥，制止尚未平息的武斗。在谢振华一行赶到平遥之前，太原“总站派”头头杨成效带万余武斗人员把平遥的“总司派”统统赶出了城，并占领平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省革委会在太原市中心五一广场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隆重欢迎陈永贵凯旋，同时，声讨“总司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事后，“总司派”抬着被打死的女学生的棺木游行。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山西省革委会在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刘格平接见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一八二纵队全体战士的讲话

首先是红总站、兵团、太司三大左派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实行在联合。这有很大的战略意义。毛主席一声令下，现在太原市联合起来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个单位了。

红联站大方向错了嘛！中央文件都写着，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为什么错了？因为他们跟上张日清，刘、陈、刘跑了。当然，张日清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陈刘还不一样。他们跟上刘陈刘跑，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对抗、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认为，农村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外地的学生去串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干部，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连地富反坏也串连进去了，造成了坏的后果。他举了很多大队干部被斗，被游街、游田、戴高帽、站板凳的例子。对广大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贫下中农是很反对的。贫下中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干部？”“如果这样对待干部，儿孙后代也不让他们当干部了。”我到王寨大队去，一个七八十岁的贫农老太太抱住我的腿不放，哭着说：“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她的侄子是个干部，被夺了权，游了街，全家打成保皇派，天天在广播里骂，不让他们一家人参加大会。一个人犯了错误，全家男女老少受牵连。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反动路线的蒙蔽，一时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干部挨斗掉泪，不敢吭气，怕打成保皇派同样挨斗。

陈永贵同志对农村中的一些小学教员串连起来向大队干部夺权也很反对。遇有这些情况，他认为，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说，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未经上级审批以前，就单方面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做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中央同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现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发各省、市、自治区参考。

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作了若干修改，请按照修改后的规定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两派继续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某日，陈永贵在山西省革委会第廿九次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又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

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

会议还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并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

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山西省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关于山西晋东南问题的通知
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进行。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制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一九六八年四月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陈伯达说：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周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说：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林彪等人接见 XX、XX 军时的指示

林彪说：

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主动找陈永贵谈。陈永贵是最照顾大局的，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军爱民的作法都是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拥政爱民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态度很明显，不搞两层政权，支持革命委员会，有缺点也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就被动。中央支持刘格平，你们不支持？！中央讲拥政爱民，你们反政反民，怎么能行呢？！

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不然就要彻底垮台。主要是军队，军队去向不对就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对中央路线。流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剖山西的问题可以看出北京军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周恩来利用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关于最近不要派人去大寨参观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九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山西省委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

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四人同时选入省委领导班子。

贰、本节简论

山西省很早就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充分展开。在革委会内部、在群众组织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仍然很大。

一九六七年的“四·一四事件”，初步揭开了省革委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纪要，对问题作出了结论。山西省军区以及后来的六十九军，名义上支左，实际上支右。中央会议以后，思想也并没有真正转变过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晋中、晋东南地区武斗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6年7月初稿

2011年8月10日修改

第三章第四节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大搞白色恐怖镇压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八·三一”、“六六”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出现了白色恐怖，大批地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这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小巷一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查。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委的个别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某些错误，需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否则将继续被动。工人斗学生的情况已基本制止，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尤其是本地学生同南下学生的对立上并未解决。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确实出现了白色恐怖，大批地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不要犹豫了，争取早日同群众见面，以便取得群众谅解。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在思想上是相当混乱的，直到最近还有的同志在保留革命串连行动，还要中央在国庆节前下令撤回革命串连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但是，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现在，每个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都还远远没有完成，需要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去把它搞好。革命串连应该在搞好本地本单位的前提下进行，……目前，我们应该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此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十月某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社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精神是不符的，也是脱离当前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的。

再次建议召开一个五百人左右的代表会议，省、市委的同志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并进一步认真地、彻底地作自我批评

二、革命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 电报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省军区得知贵阳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的消息后，立即向部队发出坚决支持左派的紧急指示。当晚派部队支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清晨，省军区出动了部队，配合左派组织，把早已调查清楚的确实为反动分子控制的“红卫军”、“赤卫队”总部包围起来，逮捕了一小撮反动头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 这个通告〔2〕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省军区召开了盛大的坚决支持左派的誓师大会，进行了示威游行。省军区领导同志连续五次公开表明态度：对左派坚决支持，对保守派分化瓦解，对右派坚决打击。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其中第四项提出：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主要看他们对待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待群众的态度，采取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抓，就是抓十六条中指出的第四种干部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和死顽固分子。这是个别的。罢，就是罢十六条中所指的第四种干部。这是少数的。提，就是提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一种干部和部分第二种干部。留，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二种干部和第三种确有悔改的干部。调，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三种干部，调离他们的领导岗位，分配适当工作。总之，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对干部要重新排队。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造反红卫兵统一组织『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中一批激进份子拉出一些人成立『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

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

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廿七号送给我，我廿八号送给主席一份，

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們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答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写上提出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 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

四、革命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政治部《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 一、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部队思想教育
- 二、加强调查研究，从斗争中发现左派
- 三、坚决地支持左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李再含《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在如何识别左派问题上，经常听到某些同志似是而非的议论：

“革命群众不听话。”

“左派也犯有错误。”

“革命群众组织不纯。”

“各派组织各有优缺点。”

“‘保字派’关心生产，革命造反派不关心生产。”

“我不了解情况。”

在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时候也会看得不准，支持错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有五多五少，即：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看枝节多，看大方向少；接近“保字派”多，接近革命派少；接近干部多，接近群众少；看出身成份多，看政治表现少；怕字多，敢字少。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发的“全省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

当前市场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挑起了“翻案风”，“反改造风”和投机倒把风。甚至围斗、封闭工商、税务等国家机关，围斗、殴打工商、税务、私改的工作人员。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计划市场。活动猖獗，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直指红色政权。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市场上的反映。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李再含在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在对敌人斗争中我们要注意依靠广大的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如果只有口供，是定不了案的。必须要有证据，而且要有多方面的证据，这就是包括人证、物证、旁证。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

在这个问题上不定不要搞逼、供、信，搞逼供信是向敌人告密。搞逼供信有一个很大危险性，就是搞不好，他乱咬一口，就搞混乱了，使我们找不到头绪，敌人就可以蒙混过关，可以跑掉。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性，你轻信他的，就会弄得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要注意几个结合：一个是专案工作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另一个是内查外调要相结合。

贰、本节简论

贵州自 1967 年 2 月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来，掌握革委会权力的一派与另一派不断发生激烈争斗，动乱持续发生。看来这是第一批夺权地区的共同问题。

李再含是第一批站出来支持左派的省军区领导干部，一九六九年以后被撤销职务，原因不详。

2007 年 11 月 14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8 日修改

第三章第五节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黑龙江省广泛建立红色造反团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范正美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六人，写出《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院党委定为“反革命纲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以陶源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的当天，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陶源作报告。陶源说：现在有人要关共产党的门，开国民党的门，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要共产党的书记下台。他们打错了算盘。现在我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郑重宣布：哈师院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只有把这些人揭露出来，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排除干扰，使哈师院的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工作组进院以后，由党委拟出的名单，欲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达 180 余名，其中学生 162 名，政治系师生 18 名以上，仅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 14 名教员，被拟抓的竟占了一半。再者，在这些被拟抓的师生中，其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解放军子弟为少数，仅七十余人，而大部分是以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历次运动中，党委或系里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名义被定为“混水摸鱼”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大会布置反右派，并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哈军工的文革积极分子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并打着大书“造反有理”的红旗，到各大专院校去煽风点火，各个院校的文革造反派，也

在积极地串联，在这种情势下，不少院校也相继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在哈尔滨第一次掀起了红色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一路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在院子里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学生们在会上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讲台上宣布要造院党委的反，要造省委的反。

哈军工造反团两次到师院点火，两次遭到了在院党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围攻。围攻的人们根本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造反有理”这句名言。他们说：“造反有理是反动口号”，“单提这四个字没有阶级性”，“这是毛主席在白色恐怖时期提出来的，现在过时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你们造谁的反？”有的人甚至还在“造反有理”的横幅旁边贴上了“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的白纸字条。人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毁他们的旗，分割他们的队伍，实行分片包围，一个个堡垒清剿式的围攻。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滚出去！他们大讲三段论：

造共产党的反就是反革命（大前题）

共产党的地方党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题）

所以，造共产党省委、学校党委的反就是反革命（结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晚，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造反有理大会，许多人愤怒地指出，省委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在会上表示：“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好，大家给省委提出了许多批评，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省委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向各高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会开得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晚，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范正美等人在学院召开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辩论：一是时至今日造反有理这句话还对不对？二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不要党委领导？三是今天晚上的会开在半

夜该不该?最后，省委常委、副省长陈雷到会讲话：：“哈师院的革命群众自己召开群众大会，传达陈剑飞同志的讲话，这是革命的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好!我支持你们!”台下爆发出雷鸣般地长时间的掌声并高呼“向革命领导干部致敬!”“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大会胜利结束。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后改称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范正美被推举为总部负责人。

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正式宣告成立，对当前形势声明如下：

- 1、省委 7·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 2、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自 7·16 之后，由于执行了错误路线，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必须彻底揭露；
- 3、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自即日起，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战，向修正主义宣战，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并愿意同全院革命的师生员工一道，把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4、凡是同意我们上述观点的同志，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黑龙江省委根据学生对省委 7·18 大会的批判，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展开大讨论、大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先后接见了一个个大专学校红色造反团，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在这里，我代表黑龙江省委，向革命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红卫兵学习！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你们。我要向你们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当时哈尔滨 14 所高校造反派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都称为红色造反团，在此之后，经过串联，又成立了有 14 所哈尔滨高校造反团参加的哈尔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总部。由各校派出自己的成员，组成总部办公会议；开始是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当头，在中央关于干部子弟退出群众组织的指示之

后，工大陈造反（原名陈轮鯨，文革时改名）任负责人、到一月份，又换黑大的张连科负责。哈师院派出甄裴秀，作为常务成员。办公机关开始在北方大厦，后来迁至黑龙江省委党校靠近清滨路的教学楼一楼。

与此同时，另一类群众组织也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成立。

哈尔滨师范学院于 8 月 14 日，由院党委通过院武装部部长王某，在中文系党总支召开的部分党员会议上，串联学生总会主席范传臣成立起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对这位学生干部说：“你们应该赶紧成立一个组织。”

这位学生干部说：“应该成立，同学有这个要求。”

8 月 18 日，中文系的这位学生总会主席，用学生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排除参加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的学生总会干部的总会干部会议，研究成立八八团的问题。会上，大家七咀八舌地说：赶快成立一个组织吧！不然，人都跑到红卫兵那边去了。在讨论组织名称时，争论很激烈，最后，还是按王部长的意见，把名字定作“八·一一战斗团”。并于当天利用开全院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机，在大会上，由他们的头头宣读了成立“八·一一战斗团”的倡议书。八·一一团成立的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潘复生对他们说：“你们学院已经成立了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不要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他们中有人听到潘复生的意见之后，产生了动摇，不同意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并且退出了八·一一战斗团。但是，当时中文系学生、院学生总会主席的范某，还是坚持必须成立。于是，他们又回头去找院党委书记和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等人，院党委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他们表示全力支持。八·一一战斗团后来还是改名为八八战斗团。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在哈尔滨，哈军工的八八团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鉴于哈军工的影响，哈军工八八团做了全市八八团的首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夜间，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发表公告：

“在我院文化大革命中，以杜若牧为首的院党委，执行着一条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相对抗的路线，压制、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打击、

迫害革命群众，成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也忠实地执行了杜若牧及省委的错误路线，已不能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造反团决定敦促解散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并接管和协助管理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院学生总会主办的黑板报)、印刷厂、汽车库等五个部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宣布撤消李范五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对省委书记王一伦、陈雷、任仲夷“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间，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曾经派过一次由各院校派代表参加的汇报团，向周恩来汇报过哈尔滨的文革情况。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汇报团，并同他们一起照相留念。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杜若牧自杀身亡。

杜若牧于停职反省之后，感到威信扫地，抬不起头。夫人王××是哈医大一名副书记，天天也在群众的炮火的猛烈攻击之下，两人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谈话。10月30日，全市造反派在八区体育广场，搞了一次对大专院校联斗走资派大会。师院造反团组织杜若牧和李某参加了这次大会。从八区批斗回院之后，又遭了院八八团一顿批判。回家后，杜若牧洗完了脸上、身上的墨水之后，对夫人说：“看来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信任了，要换年轻人了。”说完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夫人发现杜若牧吊在便所的水箱下。等抬下来，已经气绝身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并混杂着某些旧军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内，在几天里组织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史称“三军”)的组织。十二月五日，约几千人，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100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明了情况。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

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省委和军区果断采取措施，“三军”被迅速取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省委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

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

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陈伯达（1）同志： 请你和小组（2）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3）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4）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5）还未收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 （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收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中央认为：（一）同意照你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 1 号文件转发解放军报记者撰写的《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团结大多数的》长篇内部通讯。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一月六日下午，省委书记于杰送省委印制的传单式的中央文件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他首先向范正美转达省委以及他个人对造反团的热烈祝贺，他说，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省人民的光荣。同时也希望我们戒骄戒躁，在争取和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方面，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光荣。

在全团大会上，中文系造反团分队的 X 某某，却提出了绝然相反的看法，并贴出大字报，对造反团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攻击，同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造反团的表扬有鬼，有鬼，万万不可上当”。

大家认为这不是攻击师院造反团，而是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人高呼：“这是反革命！抓反革命！”全团当即表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造反团纠察队派人押送市公安局，交由司法处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哈军工出现了贺珍、周涛等 27 人批评江青的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王敏自杀身亡。

王敏是中文系八八团的一名骨干，在当时，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比较积极，平时同学们对他也有积怨。在八八团解散以后，他思想不通，串联几个人去北京上访告状，回来的当天，即 1967 年一月的一个晚上，被中文系红色造反团开会批判，给他抹了黑脸，加上当场挨了一位与他绝情的女友的一记耳光，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损害。中文系分队长董振山立即向总部报告，总部得知情况后，范正美和杨桂宾立即赶到现场，这时会已结束。范正美和杨桂宾在董振山的陪同下，到宿舍里看望了他。并再三向他说明，会场上的一些做法，总部是反对的，是绝对不

允许的。王敏当时的心情已经平静，他还说没关系，可以理解。等这些人走后，他要求上一趟厕所，上吊在厕所的水箱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从这一天开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等院校的造反派，联合接管了《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省市广播电台和省市公安局。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等七个单位联合组成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委机关的权。

“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在一些已经夺权的单位进行反夺权，少数坏头头被抓。

工人组织赤卫队、学生组织八八团被解散。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省革命农民行动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哈尔滨公安局和《黑龙江日报》赴京代表的讲话

要支持红色造反者。这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潘复生、汪道全的支持下，二十三个单位的造反团成立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消息：黑龙江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农村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

编者按：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呼吁书，号召农村的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但适用于黑龙江省农村，同样也适用于全国广大农村。

一个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农民运动正在全国广大农村汹涌澎湃地发动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农民起来造资本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强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正在趁年终分配之机，继续玩弄经济主义的阴谋，采用少留多分、分掉公积金、分掉种籽粮、动用准备粮等卑劣手法，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突出政治，顾全大局，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那些在幕前幕后进行阴谋破坏的坏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农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切革命的农民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迎接我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央文革小组转中央：

最近各地出现烧党票（党员入党志愿书）风。名之曰烧毁刘少奇党员的党票，涉及面很广，冲击力很大。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妥。个别错误严重的，应由党纪立即处理，以平民愤。一般犯有错误的学生党员应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以利教育本人，争取群众。亟待立即指示。

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总部

1967. 1. 26

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内部出现反潘复生的声音

哈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支持的工交造反团的领导人崔占成，因个人闹独立性而试图夺总部的权被指控，在全市各院校造反团，特别是在军工造反团的支持下被抓了起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刘录等人，认为“潘复生没有完全充分亮相”，革命还不到份，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说，目前黑龙江省是工

人造反派受压，学生造反派当权，因而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红革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哈工大造反团的领导人之一陈造反及其支持者 L×× 等人，同刘录等人进行了多次对话，终于破裂，从工大造反团里拉起支持者，打起“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的新旗，全市多数组织的造反派支持了他们的行动。

当时的黑龙江省造反团联合总部在潘复生的支持下发动全市造反派到工大示威。甚至有人斥责工大造反团是“大杂烩”，但是，刘录等人率领的原工大造反团多数派并未因中央即将批准省革委会的成立而放弃己见，而是进一步坚持其主张，公然在全市四处活动，将“东北新曙光”的“曙”字涂改为“鼠”字，并且用白石灰水到处刷写大字块：“潘复生没有亮相”、“新鼠光长不了”、“学生领导工人运动，学生篡权”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召开“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委员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负责人）为核心小组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成员。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呼吁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宋任穷等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宋任穷说：“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复生说：“今天我和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喻屏同志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

“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们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全省的大夺权斗争，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做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把黑龙江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我宣誓坚定地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汪家道和游好阳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把反潘复生的造反派投入监狱

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召开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反击‘二月流’大会”上，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代表，把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说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同时，有人呼喊口号，提出应该把刘录等人抓起来送进监狱，事先准备好的公安干警立即将刘录等十几人抓到会场进行批斗。会后，潘复生还派人到哈工大宣布哈工大造反团是“右派组织”，“予以解散”。

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结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同军工个别人，搞潘复生同 27 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密，终归一时疏漏而被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对游等进行了多场批斗。后来，潘复生找范正美和刘雪峰等，说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实际上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夺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哈尔滨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决战时刻，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这样，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而把大多数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很好，可供各地参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对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的讲话

你们回去帮潘复生搞一批红旗杂志三期社论所指的二类干部做具体工作。革命委员会是个权力机关，不能搞业务，你们要陷入业务就不能行使权力了。一定要帮助省委搞出一批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富春听取大庆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潘复生、汪家道到达北京，（其他成员是3月11日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文革通知黑龙江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范正美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由潘复生、汪家道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黑龙江省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

讲话。他说：“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潘复生《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该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大庆油田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三、黑龙江造反派分裂为“捍联总”和“炮轰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规定：对于前一段冲击军事机关和在夺权斗争中出现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不论是学生、工人，还是机关干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关押的一律释放、宣布无罪。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哈工大刘录等十几人，应该立即释放并予以平反。但是，对于这件事却因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个别别人的意见而遇到了阻力。

潘复生召集省革委开会讨论。

一些群众代表说，不能说释放平反就是我们夺权搞错了，我们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央已经批准，这是推不倒的。问题是刘录等人，属于不同意见，不是反革命，我们处理重了。

领导干部赵去非说：当时是当时的政策，现在是现在的政策。对于刘录等人，这就叫做“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

潘复生郑重地作出结论，他说：“今天是今天的政策，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也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压制过去的革命积极分子。就按赵去非同志的意见办。”

刘录等人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他们对于“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的决定不服，并且根据中央《十条》的精神，派出代表到省革委会上访，要求为“1·31事件”平反。省革会（由范正美出面）的答复是：‘1·31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刘录等人的要求暂时被压下去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北京邮政学院几位学生来到哈尔滨之后，在哈尔滨街头抛出了《对哈尔滨的八点声明》。中心意思是：“哈尔滨有问题”，“哈尔滨现在运动冷冷清清”，“哈尔滨必须大乱”。本来按兵不动的刘录等人，也对省革委会发动了猛烈批判。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范正美。

此时，黑大红色造反团以黑大革委会成立为导火线而分裂成两派：黑大红色造反团组建校革委会，要结合于天放（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进班子，并且让他担任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一直没有批准，因而造成黑大红色造反团对省革委会的不满，黑大造反团一部分人贴出了几张“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

在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潘复生的支持下，黑大造反团以赵玉才为首的一批成员，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对于天放发起了猛攻。

同时，哈外专造反团对张万春在全省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发表声明说：目前在哈市出现的问题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反映。

当时潘汪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情况之后，打电话给省革委会：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认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同时，又指示省革委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

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

潘汪回哈之后，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

潘复生动员群众代表出面成立“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并指定范正美和聂士荣、宋振业等人负责。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省革委会在八区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揪斗于天放，斥责于天放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我们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并在会上当众将于逮捕，投进看守所。

五月三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潘复生《关于黑龙江省夺权经验》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省革委会在潘复生主持下，作出决定：请示中央宣布“三司”为非法组织，并同时派出由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赶赴鸡西。（鸡西有个“红联总”即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还有个“三司”即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以与红联总及另一个组织相对。由于双方各仗着有人支持，两派对立十分尖锐。）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潘复生《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约二、三十人，到省革委会要求潘汪接见汇报鸡西问题。潘汪要范正美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有人高声喊道：“潘汪不接见，我们就不走！静坐开始！”由此开始了这些人在省革委会内的静坐。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省革委会常委在潘复生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静坐炮轰派的对策。根据大家的发言，潘复生总结为三大对策：

一是紧急调动动力、平房两个区的工人捍联总进驻院内，保卫一〇七，同时调抗大机械战校(原哈市机械中专)的捍联总进驻一〇七四栋楼内，以阻止炮轰派突然进楼；

二是紧急加强省革委会的警卫部队，派一个加强连到一〇七、一〇九，保卫省革委会机要部门；

三是在适当的时机，把静坐炮轰派“起出”一〇七大院。

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会驻地四栋院内外聚集了数千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很值得同志们注意。省革委会的批语也很好。现在发给大家参考，并望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下午，潘复生再次召集捍联总在一〇九一栋一楼会议室开会，全体常委出席，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全体省革委会常委批准，以抗大机械战校捍联总学生为后卫，以平房、动力捍联总工人队伍为先锋，在一〇七四栋二楼架起广播喇叭喊话指挥，几千工人动手，把炮轰派架走。但是静坐者留下 10 多人，依然端坐在省革委会的门外、马路对面一边的台阶上，表示要求潘汪接见的决心毫不动摇。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在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下，哈军工山上派借助平房 2000 余名工人捍联总的支援，一路冲进哈军工 56 号楼，夺了哈军工革委会的权，山下派为了保卫革委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发生了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

同一天，潘复生又指挥捍联总将在门外对面街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架上大卡车拉走。

不久的一天上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排着整齐的 6 路纵队，冒着大雨，迈着沉重的步履，唱着国际歌，从校门出发，由东至西在大直街上游行，许多成员泪水和雨水，沿颊而流，观看的市民都很同情他们。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潘复生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说，现在搜集到的情况表明，炮轰派已经在哈建工土建大楼内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必须把这个反革命据点拔掉。他们把这个情况还报告了周总理。这一天上午，潘复生通过韩潮，调动抗大机械战校和发电厂工人捍联总，由潘汪遥控指挥，韩潮等人带头，拿着大棒冲进土建大楼。由于炮轰派拼命抵抗，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武斗，造成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的极大损失，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流血。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哈师院造反团根据范正美的谈话和穆国兴的意见，准备就目前形势发表第四号声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

范正美提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潘汪首长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4 月份出现炮轰派问题以来，我们在对待炮轰派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我们省革委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我觉得逐步发生了一些偏差。应该指出，炮轰派对待省革委会的根本态度是错误的，是政治性的，方向性的，必须严肃指出，教育他们承认错误。应该充分肯定，在这方面，省革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毕竟应该承认，炮轰派还是造反派、左派犯的错误，或者说是犯错误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逐步加以改正的。6·5 事件之后，我们支持捍联总对军工、建工夺权，对他们采取高压，以致于矛盾激化，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检查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近来发生的“6·9 夺权”、“6·21 夺权”，省革委会直接指挥捍联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联系鸡西、电机校等一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方向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会搞到自己头上。应该说，我们对于炮轰派的这些错误，我个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我愿意为省革委会承担责任。因此，我建议常委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在对待炮轰派问题上，调整一下我们的方针、政策。我再一次说，对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承担责任。”

宋振业马上表态，表示他完全同意范正美的意见，范的发言代表两人共同的想法。

接着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是各个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大体分四个部分：一是范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二是范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4月份以后。4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三是范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四是范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说：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

潘复生作总结，他说：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范正美在会上表示：“我们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由此，省革委会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范正美与宋振业北京上访。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22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哈师院造反团发表《炮轰宣言》：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范正美连续写了几封公开信：

《给全院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公开信》、

《给全院干部的一封信》、

《炮轰我前段工作中的错误》、

《给参加所谓〈捍卫三结合指挥部〉红色造反者战友的公开信》，

与宋振业联名写的《我们对当前我省我市形势的几点看法——给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们的公开信》。

所有这些信件的中心点是，公开检讨自己对待炮轰派的错误，表明自己对现实、对镇压炮轰派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范正美参加炮轰派汇报团，住进西苑宾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黑龙江省潘复生等时的讲话
周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哈尔滨“捍联总”代表团卅多人，赵去非也被中央调来。

当谈到“六·五”事件时，周总理很气愤的讲：“他们（哈军工）只有 200 多人坐在那里（指革委会地 107）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接见？”

当谈到 6.9 反夺权时，周总理批评了他们，捍二不服气，军工的阎××辩解：“他们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敌我矛盾。”

戚本禹说：“你们错就错在这里，在总理批评你们之后，还不接受。本来是内部矛盾问题，不应该夺权，不应该把他们打成逆流。你们内战外打，你们要做自我批评，总理说得很明确了。”

谈话期间，总理很气愤地把赵去非从后面坐位上调到前面，详细问了他的家庭出身，工作经历等等。然后质问他：“哈尔滨的武斗如此严重，你采取了什么措施，你们为什么要镇压他们？”赵去非答不出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捍联总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挑起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戚本禹 吴法宪接见黑龙江双方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说：你们哈尔滨嘛，老造反派，最出名是哈军工，全国各地都有你们，现在搞的很不好，很敌对，联合不起来，本来是内部矛盾，用敌我的办法来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的了。

这就好吗！这不都达成了，说明大家都是要革命的，现在你们都打红眼了，真正不想活下去了？现在打死轻于鸿毛，不怕死上前线。你们哈尔滨是反修前线，北有苏修、东有朝修、西有蒙修。

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后，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十二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捍联总又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厂的武装夺权。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

1967.11.07；中发〔67〕340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接见黑龙江省炮轰派代表时的谈话
你们开始搞的太顺利了，就不会有曲折吗？一帆风顺怎么能行？你们黑龙江为什么到北京来补课，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太顺利了，“八八团”一下子就垮了。“八八团”为什么垮了，就是因为他们和战备军、红旗军站到一起，所以站不住，“八八团”虽然垮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存在，所以钻入你们两派里来了。你们哈尔滨忘掉了敌人，就要引起更大的乱子。

你们两派群众都是革命造反派，两个组织都是造反派组织。希望你们两派头头不要领错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毛远新传达周恩来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很好。这是黑龙江省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市、县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均应按照这一协议方针，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希望两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热烈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斗私，批修”为纲，消除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发给两派各 10 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的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查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它在前进的道路上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该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帮助它。中央希望黑龙江省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黑龙江省处在同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种外国特务，还在寻找机会进行

破坏活动。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利用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

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

四、六、一九六八年潘复生搞的“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

运动

一九六八年元旦后，潘复生指派范正美、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主持两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贯彻十二条协议。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上述最新指示。

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 65 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 23 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潘复生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 5 万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潘复生于 4 月 14 日、16 日、5 月 11 日、21 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

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

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令办公室广为散发，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林彪关于旅大地区的三点指示

一、军队无论如何不能开枪，防止坏人挑拨我们开枪犯错误，千万不要上当。

二、要继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支一派、压一派。

三、当前特别重要的是继续抓好工人队伍工作，有了军队，有了工人阶级，有就能稳定局势，我们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穆国兴给潘复生、汪家道写了书面检讨。他诚恳地向潘、汪检讨，认为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且从六个方面，列举了自己的错误事实，多角度分析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之后又主要从主观上多方面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穆国兴抱着极大的希望，结果是，师院捍联总发出一个比一个调子更高的勒令，要他交待他是如何搞阴谋诡计的。他说：“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是阳谋。在哈尔滨我是正确处理派，他不容我。我只好跑到北京找中央。到了北京，我承认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7·20 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往学院写了三封公开信，把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及处理黑龙江省问题的个人意见都向全院公开了。我作为院革委会主任站在炮轰派一边，有派性。我诚恳地检讨。他有错误，中央允许他改正，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别人，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

一九六八年六月初，哈师院和农学院一些人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范正美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

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宇”、“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范正美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范正美和宋振业联名给潘复生、汪家道呈上了他们给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省革委会常委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1968.06.18；中发[68]98号

批示规定，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汪家道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开始，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后8次召开电视、有线广播大会，分专题揭批欧阳钦、李范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

第一次是6月29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第二次是7月15日，专题是批“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

第三次是7月26日，专题是批“政权建设方面修正主义罪行”；

第四次是8月3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第五次是8月12日，专题是批“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

第六次是9月16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城建路线”；

第七次是9月24日，专题是批“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第八次是1969年2月5日，专题是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潘复生在黑龙江省革委会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穆国兴自杀身亡。留下一个没有署名的遗书《几点说明》：

一九六八年八月，哈尔滨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专案组，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通讯员报道《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编者按：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潘复生借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省革委扩大会议上，组织对范正美、宋振业的大会批斗。先是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范正美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范正美认识不高、检讨不深。，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范正美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

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就将范正美和宋振业隔离审查，派人轮流看管，直到 1969 年 5 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这期间，共组织对范正美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贰、本节简论

黑龙江省这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

首先是群众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原省委企图镇压但没有成为事实；也遇到过对立面但很快就垮台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在潘复生、汪家道的支持下，革命群众组织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走资派的权，很快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用周恩来的话说：这确实太顺利了！干部和群众都没有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锻炼。

正因为如此，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很快就遇到了新问题：革命造反派如何对待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在它成立的初期不可避免产生的缺点错误？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产生的缺点错误？黑龙江省的炮轰派抓住省革委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动不动就要炮轰，这是撤台，不是补台，因而是错误的。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抓住炮轰派缺点错误不放，无限上纲，把炮轰派打成二月逆流，这就错上加错。

在潘复生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挑起了革命造反派内部的矛盾斗争，利用捍联总打压炮轰派，造成大规模武斗。在斗争中由于原八八团的人员大量参与其中，使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

经过中央反复工作，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两派达成协议，潘复生也作了检查。但是，一九六八年，潘复生又利用“反右倾”的机会，打击原炮轰派的领导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他自以为得意，其实，这就为他在自己在一九七一年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1971 年 8 月 6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

2007 年 6 月 30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9 日修改

第三章第六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山东省掀起了红卫兵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十二个学生去北京学习，参加了“8、12红卫兵誓师大会”、“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在天安门前成立了“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青岛事件”（市委挑动工人斗学生）山东大学去了近二千人，会合北京等地的学生，支持青岛三大院校的革命，《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十几个同学成立了“驻省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省委为了撵走他们，不让他们去省委伙房吃饭，引发了绝食斗争。他们绝食几天后，本校、其他院校、工人、市民中的许多同志们都到省委去看望他们。在省委大院召开了“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省内串联，到下面地、县发动学生、工人、农民成立红卫兵组织、开群众大会“揭批资反路线”。这些组织一般都加入到“山工联”、“山文联”、“山红联”等省一级的群众组织中去。这样全省各地一部分文革势力与“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直接联系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王力汇报了他们对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二、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青岛市、山东省的造反派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对青岛市造反派谈两条路线斗争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又有问题了，实质上是象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打江山的办法，解放那个地方接管了，不是通过群众暴动，从底下起来接管的。军队占领，军队接管，包括许多留用人员，当时是需要这样的，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路就在这里。接管有各种方式方法，有的完全接管，因为那些家伙全是黑帮。

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因为我们还有些具体事情，我们不熟，今天一个条子，明天一个条子，闹得你头昏眼花，不能抓文化大革命了。第三种，轻一点的可以停职留用。第四种更轻一点的可以监督使用，你听我的！这里有的全部接管，有的撤职留用，有的停职留用，有的监督使用，这要看具体人，具体时间，还要看自己的力量怎么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策动一些人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

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提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告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工人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些人开追悼会，抬着棺材游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键在于大联合》

凯歌阵阵，喜讯频传。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安厅、省军区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这些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其中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

三、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夺权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约定：没有“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王效禹就联合公安厅、省军区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分会等，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王力说：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严重马的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四号紧急通告：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七年二月，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组织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进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他们。

三、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我们省革委会常委会的几个同志，就下去走了几趟，到了几个单位，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就我们看到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如果不警惕，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狠狠地把它打下去，怕就会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最后一段所讲的，虽然我们夺了权，但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有中途夭折、半途而废的危险。我们看了几个单位，是有这样一个危险的。

我们去的这个学校，有个红卫兵小将的组织，原来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大方向斗争最坚决最积极，现在被打下去了，被解散了。他们的两个领头的被公安机关

拘留了，那里原来的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了。这样，运动就被打下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复辟了。

这个厂的两个造反团体，本来是委员会的创建者。但是现在他们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一些工作的做法，他们也不知道，车间里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常态，恢复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就是说，干部都上去了。一切都是老样子，这实质上也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下去了，不过方式不同，是“和平演变”罢了。

以原来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带头，把以前的所谓保皇派原封不动地组织起来了，把造反派的组织全部打下去了，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很“顽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连续围攻了她两天，围攻她也不投降，一直自己坚持，并写出了一张大字报。

一个是，说造反派的组织不纯，成份不纯，说里面有些坏人；第二个，是说革命造反派开展斗争的时候戴了帽子，打了人，破坏了十六条；再一个呢，就是说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里面不要党团员，或者是说（有的是这样提的）“他们矛头是指向了党团员，斗争党团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是“右派组织”，是“应该彻底打垮的”，应该搞个新的“左派”组织，让新“左派”组织上台。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主要的危险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打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对群众的革命组织有的解散，有的压下去，有的遭到围攻，有些地方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情况。当权派重新上台，原来保守派组织也原封不动上台，重新把权夺过去，对这一股逆流如果不打下去，如果有的单位叫它复辟了，那么这个单位就仍然恢复原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上风。

自从解放军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支持左派以来，有不少人挑动革命群众组织与解放军的关系，值得我们警惕！现在解放军出来以后，他们又采取挑拨解放军与革命团体的关系，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很容易上他的当。

目前虽然济南市发现这个逆流，我想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很快就能打下去，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好形势。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就在这个时候，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新特点。

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竭力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妄图抽去它的革命灵魂，使它成为“合二而一”的大杂烩。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利用他们的影响，大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指使他们的同伙，混进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有的甚至公然叫嚣，要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乘机大作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拉一帮打一帮，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竭力往革命闯将的脸上抹黑，说那个人“出身成份不纯”，那个人“造反动机不良”，那个人“怀有个人野心”；他们利用过去的影响，暗中操纵，积极复活“保字号”组织；有些人甚至公然威胁曾经批判、斗争过他们的革命群众组织，说什么“过去你们斗了我，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该是我和你们算账的时候了。”“不能等到秋后算账，现在就得算，马上兑现。”如此等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写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并转毛泽东等的信

信中说：我于三月四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二月十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

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

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

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

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

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

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杨得志等人的讲话

周总理讲了话，大致是五个问题：

（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集中领导要加强，部队除了军队指挥大权以外，其他各种大权都归省革委，大军区也参加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员，杨得志作副主任委员。

（二）回去后部队要开会，要把思想问题解决一下，包括县人民武装部以上的都要参加，一周的时间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问题，部队领导同志要作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讲讲话，给大家鼓鼓气，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也去几个人也讲讲话，表示对大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全撤回整训。

（三）二师要用野战军把他吃掉，并从原地撤离，改变性质。

（四）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要放手让革命造反派去把他冲散。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部队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据这个意思，回去起草个核心小组，报请中央。

康生讲了四个问题：

（一）左派组织。山东的左派队伍不错吗！

(二) 关于公安局。这算什么解放军，这是公安纵队，他们和当权派混在一起，内蒙就有三个独立团反对毛主席吗！市公安局的解放军是属于地方部队的，撤出去！

(三) 市武装部。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

(四) 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

关锋插话说：你们对公安局，武装部太轻视了，他本来就是坏的，围攻公安厅是他们挑动的，你们安排一下，济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厅管起来就行了，公安局放手让造反派冲，冲垮了完了。我们不提倡武斗，如果他们非给我们顶牛不可，武斗就武斗，你们造反派要学会争取群众，杨毅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批判，但主要应解决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高明智要撤职。

肖华插话：山东支左谁主持的？

袁升平答：张仁初！

肖华说：怎么能让张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张二疯子，袁升平你应当自己抓起来。

周总理插话说：支左办公室要撤回，统一归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管，

杨得志插话：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

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么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装部呢？怎么不让群众讨论呢？

康老插话：有些不是调离，而是要撤职，像高明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

这封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

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

“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

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 54 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萧华对济南驻军的指示

（1）中央认为济南部队，在“三支”、“两管”中有很大成绩，在济南、青岛夺权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支左工作没有经验出了错误，希望你们坚决改正。

（2）支左问题，省革命委员会同志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逆流来自部队，执行了拿枪的刘邓路线。在这方面，部队对自己要严，要照顾大局。

（3）应支持王效禹同志，支持省革命委员会，支持左派，支持“三结合”，巩固和扩大这个胜利。首先和王效禹同志的关系搞好。

（4）对重新夺权问题应该实事求是，真正夺错了的要夺过来。应该改组的就改组，原来夺对了的要坚持。

（5）支左工作要统一，省革命委员会直辖指挥部撤销了，就主动了。要和省革命委员会互通情报，听说你们没有开会，应开个会，应面向干部战士进行正面拥政爱民的教育，要慎重，把团结搞好，干部对左派难免有些看不习惯，不要把支流看成主流，要看主流，乱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听信谣言和个别人挑拨。

（6）向公安部队作好工作，有的可以调整一下。

（7）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批判刘、邓、谭、白。中央对山东很关心，希望你们作好工作，尤其把“三支”工作做好。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张春桥在山东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一) 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

(二) 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

(三) 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

(四) 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五) 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1）来信上的批语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效禹《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取得夺权斗争胜利之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勾结起来，连续进行了三

次疯狂的大反扑。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群众问题上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千方百计地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利用他们钻入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同伙的合法地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处心积虑地把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搞垮革命群众组织，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它的群众基础。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问题上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界限，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他们制造种种谣言，竭力挑拨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的关系，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人民解放军这个强大支柱。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评论员《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本刊发表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件。它具有重要的普遍的意义，值得所有已经夺权的单位、所有革命领导干部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研究和学习。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头脑中的“私”字，时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我们从今年一月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来，做了一些工作，但也犯了许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在某些问题上则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错误地宣布徐州市郊区狮子山大队“毛泽东思想红农军”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在工厂支左工作中，犯过调和折衷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四月份以来，我们没有以两

条路线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斗争大方向上去分析和识别“踢开革委会派”这一革命群众派别的性质，只看他们的支流，不看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以致混淆了是非界限，错误地认为“踢派”是代表保守势力进行反夺权。同时，对“支持革委会派”一方的意见又偏听偏信，使领导到部队造成一种支持“支派”厌恶“踢派”的强烈的倾向性。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街头宣传和有的宣传组在支左工作中片面支持“支派”，压制“踢派”。五月三十日，我们支左单位的部分工人农民上街参加围攻“踢派”的大规模武斗，宣传组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武斗激烈时有的“踢派”群众来营房请求保护，我们也没有收留。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济南军区党委转发《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查报告很好。据我们了解，该师在徐州支左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是比较好的一个单位。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能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毫不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而是痛痛快快，直直爽爽，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真检查，深刻认错，彻底改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边。现将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学习参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南京军区党委转发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很好。二十九师的同志，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不仅对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批评，而且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这种转变。当中央文革小组派去解决徐州问题的王效禹等同志受到威胁时，他们提出：绝对保证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有二十九师的部队在，就有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这种言行一致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是全军都应该学习的榜样。现将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查以及济南军区在转发时的批语，一同发给你们参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张轻秀在徐州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部队领导在前一阶段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使徐州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使踢派战友们受到打击和压抑，现在回想起来万分痛心。这个责任主要由我们 6063 部队来负，在这里我们万分沉痛的心情代表 6063 部队党委，再次向你们公开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王效禹在青岛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山东武斗还少吗？不少，昌潍、济南都有。

青岛有的有利条件，造反派没怎么受气，夺权后算一帆风顺。昌潍、济宁、临沂、烟台、威海造反派受压抑很厉害。徐州四月份是造反派天下，五、六月份就是白色恐怖。青岛造反派日子很好过，这是因为青岛支左部队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67 军在全国很有名，青岛应特别拥军，尊重解放军，扩大解放军的影响。

北海舰队几个领导同志在支左方面有问题，我不同意是北海舰队的问题。

前一段，济南、青岛都有人贴了××、××的大字报，有人说：“挖出了山东后台了，山东的权是走后门走出来的。”一个省的权的问题，怎么能走后门走出来？两个人就决定了，他两人是中央的，不管他，刮邪风是不好的，我们不要理邪风。在这个问题上弄不好，要犯错误。

青岛夺权是文革小组催我们夺，我们才夺的。社论是陈伯达同志亲自定的稿。当时已有了上海大联合，我认为青岛要走上海道路，走大联合的道路，海洋学院的同志，说走三司的道路，我说不存在，最后冯起搞分裂，夺权弄不到一起，这是方向错误。当时主席指示大联合，大夺权，青医的同志知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海院的同志错了，一直回不过来，现在好了没有，我不知道。走三司的道路是走回头路。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王效禹谈解放干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杨得志在六十八军党委常委会上讲话

王效禹同志是个老同志了，一九五〇年就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历来如此。最可贵的是他的敢于造反精神。过去传说的他被打成“右派”。实际上是舒同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政治迫害。那是 1953 年，他曾被撤职，降级、贬到基层工作，1962 年才平的反。文化大开始时，他是青岛市的副市长。当谭启龙，张敬涛等在青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一个人站出来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旧省委决裂，公开声明要作他们的“叛徒”。因而又遭迫害。但他始终威武不屈，坚持斗争，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就是在被软禁的期间，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反对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他，回了电报，并要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支持他的革命行动，特别在他处境困难时，更是大力支持他。

“1.21”他领导青岛夺权以后，又奉中央文革的指示来济南，领导了全省的夺权斗争。

关于我们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最早发现的，三月份就向我们提出来了，就山东医学院问题，向我们指出，我们弄不好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但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和觉悟。后来转弯“下楼”，主要是中央的支持和帮助，军内外广大造反派的帮助，与王政委支持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最近山东地区有些人就因为关锋、王力犯错误，也怀疑起王政委，怀疑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来了。这是错误的。

徐州也有借此反对王效禹同志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连云港事件的决定

据报“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今天又包围锦屏磷矿和化工厂，抢了部队的枪，民兵的枪，并打死打伤部队人员，曾先后的两次伏击解放军这种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接此电话后两派必须立即停止武斗，两派立即撤回原地并积极协助

6117 部队、6066 部队，连云港卫戍区司令部、283 部队，维护好社会革命秩序，保证港口、铁路运输正常。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六三〇七部队、北海舰队《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

六三〇七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大方向，是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一面红旗。

北海舰队驻青岛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前舰队党委常委的少数同志在几个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保护旧省委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不积极支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以后，他们又利用“拉鞠”，支持“炮轰政法部”，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曾经给青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个错误主要由少数人负责。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的文件及附件

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这一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王效禹的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党委作的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 关于形势问题

一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

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二）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

（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

（四）生产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效禹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题

六、贯彻九大精神，解决王效禹的错误问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山东 13 个地市，112 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委会。

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

五、开展“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临沂发生上万人参加的武斗，打死 9 人，伤 15 人，抓了 200 多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省革委会派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

一九六九年二至五月之间，在冠县又发生了多起大型武斗，死伤多人。全省约 40% 的县市革委会被推倒或改组。

贰、本节简论

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特点是：

一、首先是造反派结合王效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在青岛市夺权，然后二月又到省里夺权。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二、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曲折，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策动一些人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安厅、省军区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这些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其中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

“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这肯定是不能容许的，“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也是必要的。但是，后来把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派的造反派组织都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捕头头，就做得过分了。

三、正是因为山东省的夺权过程太顺利了，地方支持造反的干部与部队支左的干部认识不统一，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地方部队支左干部支持保守势力反对革命左派夺权的一股逆流，与王效禹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进行的反逆流之间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中央是支持王效禹的，教育犯错误的部队支左干部端正立场。

四、在建立地、县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过程中，要团结广大群众、解放干部、打击坏人，这些都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原来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乘机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这种情况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由于资料缺乏，无法作出判断。大约在一九六八年的下半年，王效禹提出了“反复旧”。这个所谓“反复旧”运动究竟是怎么搞的？搞到了什么程度？由于资料缺乏也无法判断。

五、九大以后，中央着手解决王效禹的反复旧问题，认为王效禹犯了严重错误，是把矛头四指向。

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并和王辩论起来，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

“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 27 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

1969 年 5 月 20 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 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

1969 年 5 月 29 日济南军区、山东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

1971 年 3 月 30 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

1971 年 4 月 14 日，王效禹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

文革后，王效禹回到山东，1979 年 2 月被开除党籍。1995 年 3 月 2 日，在青州因病去世。

2006 年 8 月初稿

2011 年 8 月 11 日修改

第三章第七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急起猛追 学习上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工厂造反派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

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

昨天开了大中学校的座谈会，着重谈了夺权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也是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目前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

我们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了。简单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样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取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

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

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来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等八个系统。铁道部应该把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

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卅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去夺权去，已经驻了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夺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务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

大、师大等在北京市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只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督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

最近北京出现一些所谓全国性组织，象什么中国红旗军，全国青年……造反军（听不清），其中好多都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象五七年的右派现在也要翻案了，右派怎么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都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

江青：现在祝贺同志们夺权。在我们刚进城时，叫做军事接管，就是夺权。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归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预祝同志们胜利！什么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中央一个也未承认。我们要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实行专政，这是反革命的组织。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但里面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我们要团结、争取、教育、改造他们。、

陈伯达：在这个运动中，又重新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头目，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是是无产阶级文化和革命夺权斗争中跳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铁路分部《告全国革命铁路员工书》

最近，铁道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耍出了最卑鄙、最阴险的手段，公然挑动一些受蒙蔽的铁路职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并唆使铁路系统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出“造反”的旗号，搞什么进京“告状”。他们故意制造混乱，妄图使铁路运输瘫痪，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反革命行为。我们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铁路职工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我首先庆贺你们誓师大会的成功！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誓师大会，响应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对上海全市工人书的倡议，支持党中央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和公安局报喜队的讲话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戚本禹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不应该夺。至于怎么夺，应该由内部的左派来夺。对于一些单位首先接管，其次再夺权。一般的，就说要接管，接管以后再监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应该紧紧掌握在左派手中。“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一般不要提，不巧妙，应该团结大多数，以左派为核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江青 陈伯达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讲：当前总的形势是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关键的问题是夺权。如果那个单位还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理人掌握，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搞不好。

北京是一个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这只是开始。

昨天我们曾提到有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中国红旗军，另一个是中国红色革命夺权总部（“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他们夺谁的权呢？他们夺无产阶级的权，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已抓了红旗军两个头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戚

本禹讲：74号已经抓住了。）他们蒙蔽了許多人。昨天发现他们有七、八个头子，（一个叫黄老头的，）有一个叫刘海清，是李井泉的警卫员，他们霸占了中医学院一座大楼，我们去抓他们，我们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缴了我们八支枪，扣了我们公安部副部长。我们勒令他们十五分钟把人交出来，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结果把他们瓦解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林杰接待《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部分同志的讲话

《北京日报》革命同志依靠自己艰苦奋斗，在社会革命力量支持下，从黑帮手里夺了权。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北京市各工矿企业事业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下厂问题，中央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提到要有计划的下厂，不要一涌而去。现在我听到有些厂人数过多，比如有一个厂四千多工人，去了二千多，到了车间，生产发生问题，生活也发生问题。还是按中央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下厂。

为了克服小团体主义、小派别、小宗派、个人主义，我们准备在报纸上重新发表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以前我们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看起来还不够，还要把《整顿党的作风》重新发表。一面斗争，一面学习，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不然的话，革命就不好，就会影响生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

内部问题可以用协商方法解决，不要拍桌子，瞪眼睛，不能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笑话，为什么要分两个派？大方向一致联合起来吧！保守派要分化，瓦解他们老工人，要团结说服他们搞成一个大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大方向一致不要争来争去，革命派内部不要闹纠纷，要加强团结，把革命搞好。

关于改选，酝酿一个时期再改选，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名单贴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赞成，经过大民主讨论，不要包办代替，工作组包办代替错了，你们不要包办代替，听取大家意见，改选不要匆忙，匆匆忙忙不符合大家要求也不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王力与北京广播电台两派同志的谈话

王力传达毛主席指示：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裂，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李震对北京市红卫兵和公安干部的讲话

戚本禹讲话：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与矿院《东方红》这两个组织都是革命组织。现在两个革命组织在公安局发生了斗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这样大的斗争，惊动了北京市，连总理也惊动了。发生了流血事件，双方都打人了。

谢富治讲话：毛主席在前几天，要军队、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各方面的造反派。我们必须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保护左派，这是我们的神圣任务，也是毛主席对我们下的最大命令。我们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部队，公安人员，也应象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依靠左派，支持左派，保护左派，坚决站在左派一边，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斗争，对反动组织“工农红旗军”，“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色恐怖队”专政，用这个来支持左派。前天在石景山公安局出现了很不应该的事件，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出动警察不是支持左派，不论主观如何，实际上助长了右派，这个，保皇势力欢迎。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傅崇碧传达周恩来的紧急指示

〔参加单位：政法公社、矿院东方红、北京九中、市局干警等。中央公安部李震副部长亦在场。〕

傅崇碧同志传达了周总理如下指示：

总理派我们来。矿院东方红和政法公社都是左派组织，出现了分歧。北京市公安局是我们的治安中心。在这里不能武斗，双方可派代表进行谈判，每方派十人，到人民大会堂，其它可以这里等待，但不许武斗，在这里也不许互相骂，骂就不好了，暂时不要在这里广播宣传了。

双方不要派太多的代表，太多了就不好谈了。

在公安局吵起来打起来，敌人会高兴的。而革命同志一点也不会高兴，这样闹下去影响非常坏。

谁武斗谁就犯法，我们每个革命造反派都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伟大号召，有问题双方派代表协商解决。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谢富治在《粉碎反动组织“红旗军”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红旗军”也是纸老虎。只要我们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起来斗争，专政机关配合，就会很快把它们粉碎，搞垮，当然他们没有最后死心，还在顽抗，他们可以不再打那面在人民群众中很臭的“红旗军”的旗子，他们可以改头换面。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彻底把他们打翻，向他们专政。但还要讲政策，把他们的头头关进班房，专他们的政，对他们大部分群众要争取。拘捕少数，大多数承认错误就算了。以后搞红旗军，不要自动出好多人，不要听到电话就去好多人，比如，八一中学只有一百多个“联动”，一去一万多人，这个不行。以后到哪里抓红旗军，要得到专政机关、卫戍司令部、中央公安部的意见，叫去多少就去多少。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戚本禹在北京国棉一厂辩论会上的讲话

最近几天京棉一厂发生了大事，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很关心。武斗肯定是错的。从今天起要执行，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无命令的随便抓人，第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三点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人代表讲话

一、关于北京的大联合, 更进一步的落实。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 然后再联合。

二、关于夺权问题, 要彻底巩固所夺的权。反对打倒一切, 是当权派就打倒, 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夺权的第一步, 要搞一个筹备委员会。搞一个筹备小组。由工人、学生、军人、农民和革命干部代表参加, 名称暂时还不定。先开一个一百人左右的座谈会, 成立一个 20 人左右的筹备小组。座谈会的代表工人四十人, 学生二十至二十五人, 其他可由当地驻军、机关干部等代表参加。

三、抓革命, 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公告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 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 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 实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及公安部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傅崇碧讲话

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 光夺了印, 这不算夺权。政法公社夺公安局的权二十多天了, 他们作了不少工作, 但是还有缺点, 甚至错误。根据各造反派的倡议, 要解放军接管。现在中央批准了军队的接管。

我们“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注意:

1、左派在夺权中打架: 如昨天铁道学院情报研究所等, 高教部谭后兰和聂元梓的部队也干起来了。比如“八一”学校抓“联动”, 一共才一百多个“联动”, 一下子去了一万多人, “联动”没抓好, 自己反而混战一场。最近在石景

山，矿院东方红、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和政法公社发生冲突，他们指责我们偏向政法公社，我们不承认，这是左派打架。

2、不要乱抓人，抓人要报告公安部，我们派人去抓。

3、不要搞“马路新闻”，各取所需，断章取义。

4、我们要协助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维持公安。其它工作还要和大家商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谈路线斗争和夺权问题

一、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二、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问题

现在这是一种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凡是带“长”字的全要打倒，全是坏家伙。这个口号是极端反动的。

夺的好的有贵州、山西、上海，他们搞三结合，主要靠本单位革命力量。特别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社论中讲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

北京还没有搞成临时的权力机构，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为什么搞不起来？可能是革命派受压制还不够厉害。同志们很着急，中央文革也很着急。有人问怎么办？不要紧，再等一个时期总会有办法，大家要努力。

三、解放军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谢富治傅崇碧与首都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

北京市的夺权和其它各省市不一样，北京市已经夺了一次权。夺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赵凡、陈克寒等的权，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夺的。李雪峰、吴德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与各省市不一样，各省市是第一次。今后如何提法，应好好商量。

北京不一定用“公社”这个名字。现在农村有公社，还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个公社。现在北京搞的倾向革命委员会。上面有人焦急，下面有些人焦急，是好心，但是准备工作要做到家，否则心不齐。现在要搞三结合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

今天要谈就一件事。对市委书记要给他们一个检查改进的机会。给他们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条件。在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来判哪些人好些，哪些人差些，哪些人更好些，哪些人更差些。今天还是商量这件事。北京市哪些干部可以三结合，要给他们作工作，那里有错那些检查，给他们自由，不要限制自由。你们要给他们自由，不要老关在房子里。

市委的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己犯了一些错误，要让他们开展工作，将来一定有一些人要参加三结合，不管怎样，要给检查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不要老派两个人在后跟着，那样不行。

现在要防止打倒一切。有一种是左派，他们打倒一切是偏激。这种人工作好做。有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觉得把别人都打倒了，自己就无所谓，还有那些地、富、反、坏、右也提打倒一切，要注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傅崇碧丁国钰在“抓革命促春耕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谈取缔一切反动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2·12 号通知第二条(对组织采取的办法)有九个组织不是好组织,应该宣布取缔,有三个反动组织。不是好组织嘛,就是坏组织,反动的有三个。

1. 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2. 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
3.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4. 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5. 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6.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7.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
8.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
9. 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第一个,第二个,第六个,这是三个反动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傅崇碧说:

现在是我们工人打架,每天最少七、八起,少的几百人、多的几千人、最大的有几万人。通县打仗二万多人互相打。最近北京工人组织中武斗相当严重,不仅打伤了人,而且损坏了国家财产,有好多电话,屋子,广播器材被砸坏。工人组织中有打人的,搞喷气式的,私设公堂的,现在农村也有捆绑工人审讯的。昌平搞得很厉害。平谷县罗乃宽总站的人到哪里去夺党、政、财权,什么权都一起夺,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起来反对。现在全国性组织很多,在市委大楼有几十个,在市总工会也有几十个。我们工人同志应协助大力宣传取缔这些组织。这些组织

到处搞电话，抢占公房，抢汽车，搞油印机，要经费。有的专门夜里活动，这样对北京社会治安很不利，有的组织一天要换几次袖章，有的到处乱搞马路新闻。

谢富治说：

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开会总结了前段夺权的经验。第一点，夺权要实行三结合，不三结合，是夺不好的，不三结合，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第二点，夺权要搞大联合，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部门都要实行大联合。不大联合，你夺过来，我夺过来，成了抢权了。第三点，夺权必须是革命造反派，真正左派夺权，不能是保皇派夺权，不能搞假夺权。第四点，夺权必须依靠本单位、本企业、本部门，由本单位、本部门左派，自己夺权。必要时外部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可以配合，加以协助。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戚本禹谢富治接见《北京日报》社群众的讲话

戚本禹说：刚才和谢富治同志，还有周景芳同志，开了个小会，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根据中央革命的三结合的精神，首先我们决定北京日报要派军代表，实行军事接管。（众：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军代表大概在十二日之前派来（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军代表来了以后，驻报社的工人、学生都要退出报社（鼓掌），什么道理呢？不是说我们不欢迎这些工人、学生，我们欢迎他们的（鼓掌）。原因是这样的，北京市原来那个“夺权委员会”（接管北京市的那个夺权委员会）它的夺权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它不是经过革命三结合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根据中央精神，现在正在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原来这个夺权，不是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协商、经过革命三结合而产生的，北京日报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有的组织参加了，有的组织没参加，所以严格地说，这个接管是未经中央承认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谢富治关于军事接管北京市厂矿企业的讲话

北京××多个工厂，××万工人，需要军管的是一百零几个，这一百零几个工厂有××万产业工人，占北京市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一百零几个工厂的产值占北京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是些关键工厂。

这些工厂的形势是：一种是左派夺了权的，力量占劣势（或优势？）我们要支持，一种是虽然夺了权，但各派斗争很激烈；一种是夺了权，但是左派夺权还是右派夺权，面目不清楚。对左派夺权我们要支持，如果右派夺权，我们再夺回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中发 [67] 101 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地革命委员会：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转发你们参考。各大、中城市如有类似情况，可以参照办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准备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陈伯达在北京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说：

“今天在这里开的会是我们首都职工的一件大喜事，对于推动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阶级斗争正在十分尖锐地进行，希望你们提高警惕，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打退反革命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复辟，绝对不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扑，绝对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对不许在四清中下台的干部反攻倒算，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是春耕大忙季节，农民兄弟正在起来春耕，工人战友们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为支援农业尽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产品质量，坚决与破坏生产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北京工交系统已派解放军帮助你们，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保证生产秩序正常进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那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由他们支持你们，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周总理说：“希望你们好好向他们学习，突出政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把整风工作作好，按系统按单位实行大联合，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逐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委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若干条文的理解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记者《到劳动人民中去锻炼成长——记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子女自愿下厂劳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委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日，康生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言（草案）》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军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军管与四九年不同，不能恢复旧秩序，造反精神不要管掉了，要搞好四大，怎样才真正抓了革命，促了生产，怎样放手发动群众，同志们讨论一下。三结合要充分准备，不能搞复辟的三结合，和平的三结合，调和的三结合。要等左派占了优势，干部要先经过生产班子的考验，看他们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是不是真正改了毛病，三结合要稳一点，不要急搞，先搞些典型。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戚本禹关于《北京日报》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代会全体委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傅崇碧黄作珍对参加大中学校军训的军队干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长途电讯局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戚本禹在中国京剧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学校及工矿单位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初到今天（四月十八日），共开了五、六次会，都是讲一个问题：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要打内战。

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下面有各式各样的谣言，哈尔滨有传单，说我是个反革命头子。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下面就有很多谣言了。

今天正式决定：到外地串联的学生，除了去青海的“五一”以前撤回来以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

有人说军管是派工作组。那天主席跟我讲：“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革命。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

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容易。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攀登科学研究的新的山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吴德接见北京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对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窃夺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把北京市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基地，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党中央改组了旧北京市委，组成了北京新市委。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下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巨大胜利。

但是，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完全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辜负了北京市革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彻底砸碎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机器。相反，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执行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京新市委终于被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

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

三、深入搞好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六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谢富治给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电话指示

当前的大方向是三个方面：（1）批刘邓就是为了本单位的斗、批、改；（2）批旧市委；（3）整风，主要是整无政府主义，搞思想革命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少数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革命小将整风进行反扑，有的省、市反复比较严重。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针对逆流进行的反击，一方面让大家把大方向针对刘少奇，要搞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

目前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进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与主流同时存在的，冲击主流的，这里有保守势力，甚至有右派势力，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也活跃起来，要干扰这个方向，要把斗争转到造反派内部，转到其它次要上去，次要的人，次要的事，这并不是主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傅崇碧对北京“革命造反者”负责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戚本禹谈当前形势

经过大批判，全党、全军、全民把盖子揭开，展开群众性批判，写了很多好文章，工农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多，把群众的革命觉悟提得这么高（如光明日报登载清华的小将批判“人的阶级性”一文并没人为之加工）小将挖叛徒集团千辛万苦，一个一个查对，大批判中建立功勋，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标志青年一代，看到我国接班人可靠，有了保证，这是一。

第二、夺权斗争。主席说：三、四、五月看出眉目。过去很多省市掌握在刘、邓叛徒集团手里，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手里，现在六大省市夺权胜利，有的经过两派斗争，已有胜负（青海、内蒙、福建），两派斗争激烈，局势已明朗化……。干部经过考验，青海、四川都有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斗争激烈，很有希望。反而不明朗的地方弄不清楚，不知道运动起来了没有。要支持左派，地院东方红有风格，同学自己出粮票，把四川的革命派保护起来，周总理、康老表扬他们。湖南斗争厉害，抓湘江风雷，抓了好多人，张德生反对抓人，出来造反。不要光看发生武斗，打、砸、抢，要看主流，有的是革命反抗，并非打、砸、抢。坏事可以变为好事，经过反复斗争，局势就明朗了，有了“三结合”对象。还有的省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多数的省局势明朗，这是群众付出了代价，经过斗争的结果。所以，形势大好。少数省份，保守派占优势，局势发展不平衡。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少数军区迷失方向，个别的是坏人（如赵永夫）大多数是认识问题，经过斗争，正在转变，尤以经过军委扩大会议后认识统一了。

第三、很多单位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运动在深入。北京有很多单位进入斗批改，全国需两，三个月。

第四、整个生产局势好。一月上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经济主义，局面相当严重，经左派反击，主席一月风暴号召，大有好转，军队参加作了很多工作，四月以来，局势好转。

当前苗头有两个：

（1）左派重新冲击军队。左派开始炮轰省委，省委住到军区，又炮轰军区，发了八条命令，不能炮轰军区，军区遇到冲击，抓了人，犯了错误。军委十条下达后，左派（听不清）对过去的错误不认帐，又来冲，重犯历史错误。个别人是

别有用心的，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利用支左的错误，来挑动群众（山东、广西，韦国清是好人），中央文革不赞成，军区大都是认识问题。

（2）无政府主义。现在是现象，不成为系统的东西，即打、砸、抢，什么命令也不听。“联动”也是无政府主义，关押不是个办法，放出来教育，争取多数，少数顽固的，让他们表演，“联动”的基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右派的子弟，主张血统论，对他们要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北京的“联动”还到天津、武汉去闹，他们闹，让群众去对他们斗争，群众会对付他们。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陈伯达说：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按照毛泽东思想应怎么搞法，应搞一套适当的机构，要精兵简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本身应是非常革命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机构。是不是可以说在北京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机构还没有形成。因此要总结经验，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按照毛泽东思想，在北京要建立一个模范的政权。究竟怎么搞法，我们现在请教你们。譬如有不少现实问题，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工作，又不脱离本单位、本工厂、本农村，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参加教学，同时又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是不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切实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说，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机构嘛！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

我们的机构，今天的问题是要来一个大革命化。现在没有比较可靠的成熟的经验，要群众讨论。比如人民公社，我说一个不脱产，戚本禹说不行。要通过实践，我们也是两派嘛！（戚本禹同志：是一派。）怎么样又不脱离群众，又不脱离劳动，要总结经验。各地方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陈永贵他们搞得好）。有的差些。我们不仅要总结北京的经验，而且还要总结其他地区的经验。总之，要记住毛主席讲的：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反复讲的。究竟怎么参加，群众出智慧。

我们有这么些意见：

一、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或促工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

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机构的神圣任务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和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革命群众中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王力同志：不革命的也要保护，就是保护群众中不同意见人的人身安全。）

三、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王力同志：抓、抄）。随便抓人、抄家不行。

（周总理：最近抓的人找不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注意，这容易被坏人钻空子。）

煽动武斗的坏人，应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处分或者制裁。但是，如果禁止不了武斗，他一定要武斗怎么办呢？斗斗也没有什么大坏处，谭厚兰同志和聂元梓同志就武斗过嘛，他们两人现在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坏人煽动武斗的话，坏人就会暴露出来。有人就在煽动破坏国家财产。（王力同志：破坏财产到那种程度（指北京二毛一座四层楼厂房在武斗中被拆毁）一定要查。（谢副总理：赞成。）

四、公安机关的坏人要撤职，有的要适当调整、改组。

五、最后一条，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生产，到处流荡，自由跑出跑入，扰乱革命和生产的秩序，对于这样的人，工厂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机关也一样要扣工资。

周总理说：我同意伯达同志刚才提的六点（按：我们记录为五点）意见，提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再讨论，形成一个正式文件。刚才王力、关锋同志说了，北京市机构瘫痪了很久了，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半个月了，应该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一定要成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

（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要形成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你们也支持谢富治同志，今天我们来就是表示支持嘛！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学校全体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北京市革委会传达陈伯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和平门中学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戚本禹在北京玉渊潭中学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革委会教改小组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傅崇碧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

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军内有真正的陈再道，如果有把握就打，如果没把握就不揪。武汉问题的处理是对全国造反派的支持。凡是右派势力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北京也有一些流言蜚语，造谣诬蔑，我们要警惕。

河北问题，有七、八千人来到北京。我们要解决河北问题，张家口、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石家庄有点底，我们打算派北京的一些同志去调查。现在调查有两种，一种是右派动员农民进城。革命派要引导农民搞大批判，抓大方向。第二是武装部要搞的。武装部正在调查。现在保守势力集结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过去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这个口号是反动的。

中南海揪刘战场我去过，看了很高兴，江青也看了。在西门、北门搞是一个好事，揪不揪得出来不一定：但给刘少奇一个示威。不要在那里分派嘛，反对刘少奇还要分派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代表的讲话

我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委托，与同志们商量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关于撤退中南海周围揪刘联络站、指挥部的事。

第二件事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就是有很多同学到外地去。当然北京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在武汉支持三钢、三新，反对“百万雄师”；在四川支持 8·26，反对产业军；在河南支持二七公社，反对十大总部。这都是革命行动，我们支持。

武汉问题解决了，河南解决了。甘肃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河北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有人说第二次大串联开始啦！没有那么回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武斗问题，要制止武斗，这已经是反复强调的了。目前北京有保守势力搞武斗，密云县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

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

《五·—六》（首都五·—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讲话：

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

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豹、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

康生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两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两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周恩来讲：

一个是形势，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

一个是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事件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现在有个倾向，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

谢富治讲话：

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谢富治在北京西单商场武斗后的讲话

商场糟蹋成这个样子，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你们算是什么革命派。这个商场要展览十天，让全市工人都看看，把两个组织的名字用大标语写上，在北京市出个名，双方组织支援的单位也全写上名，通过调查要把凶手搞臭。工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可以通过辩论，不要打骂，为什么要调人？（红造会说：我们只有六十个人）他们还能把你们吃掉？打死人我负责，让北京全市的工人和学生鉴定看看，你们做得对不对。两派的头头都有私心杂念。在展览时要军队保护现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红代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周恩来李先念对北京市中学生两派代表的讲话

【八月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揪斗谭震林大会上，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对中学革命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摘录如下。】

周总理说：你们 43 派、44 派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刘邓。

李先念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联合？你们对刘邓是一致的吧？你们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一致的吧？你们都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吧？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联合呢？联合起来批刘邓嘛！联合起来有力量。你们对老红卫兵要做工作。

李先念并询问了“联动”活动情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陈伯达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英雄！你们英雄！你们又一次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去年你们到天津小站去翻案，搞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去给《天津政法公社》翻案，这是复辟，是逆流。你们是搞专政的，你们是学国民党六法的，对我们进行专政，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斗批批”联委会和“斗薄筹备处”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说：如果你们把刘、邓、陶和余秋里提在一起，我们是不同意的。不要把刘、邓、陈、薄摆在一起，陈云还是中央常委嘛，可以提“刘、邓、陶、薄”，单独批陈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同意。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26日晚，北外红旗大队经总理批准在人大大会堂斗批陈毅，此时北外造反团地院等冲击了外交部。陈伯达同志26日晚对北外造反团冲击外交部一事作了三点指示。〕

- 一、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冲击今天的批陈是错误的。
- 二、今天揪陈毅是错误的。
- 三、立即撤出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批斗彭罗大会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吴德对北京国棉二厂“八·二三”武斗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某日，谢富治传达毛泽东关于更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必快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大规模开展起来。更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宣传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成绩，讲方向，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不能把我们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有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地来谈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青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

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

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

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做错了！

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

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陈伯达讲话：

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 120 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

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 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周恩来讲：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八月五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

（3）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

（7）66 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对外地来京人员携带武器弹药管理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钢铁学院只关心打架，不关心国家的钢铁数字。头头有“私”字，想把别人搞垮自己来独占，私字当头会被别人利用，要加强敌情观念。武斗搞分裂，会被敌人利用，北京搞分裂对全国影响极坏，对上海不但不学习，反而要扰乱，说上海“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五月以后，两派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派，只不过一派对的多一些，一派对的少一些，对北京两派，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都支持，不能全力支持一派。北京要取消两派。不准开派会，尤其不能开派性秘密会议。一派完全想把另一派压倒是错误的。联合是唯一道路。一派吃掉一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联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北京市卫戍区关于严禁来京人员携带枪支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谢富治在“学习最新最高指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你们革命小将也是这样，在运动刚刚开始时，没有经验，犯了不少错误。现在我们应该把那些错误扔掉。你们当时，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勇气是好的，但是打人、抄家、喷气式、弯腰、剃光头，这些是我们伟大领袖从来就反对的。你们对那些走资派这么干了以后，伟大领袖也没说什么，但这并不是纵容你们这样去做。你们把当权派搞得灰溜溜的，那谁叫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但话又说回来了，不能因为这个，你们那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又对了。

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总结一次经验。毛著学习班就是叫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们不要泼冷水，不要搞得灰溜溜的，打击了革命小将，叫老保翻天，这绝对不允许。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志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在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丰功伟绩，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更重要，书记处加政治局，懂不懂啊，比书记处还重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主要工作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做了，这是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在人民中的威信最高的。北京有一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油印的标语，好几个学校都接到了。这个东西现在有一部分大学派传。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同那些损害我们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损害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那些流言蜚语，甚至公开、秘密地、半公开地来侮辱、来造谣、来挑拨离间，要跟他坚决做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在北京中学复课闹革命现场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工代会等的指示
市革委会办事组李冀山同志二十六日传达。

北京街上贴有我的大字报，但又看到有反对的大字报。请通知一下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同志们，请他们通知一下，不要对贴我大字报的机关和同志去贴反对他们的大字报，我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当允许有意见的人贴大字报，贴一点大字报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到明年五、六月准备的如何？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是不是可以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召开，一种是开完了九大过国庆节。就是说，最迟不要超过国庆节。从北京的条件看，五六月份是可以的。

再谈一条，党代会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先选中央再选省，再选县，这样有一个毛主席的党中央和主席思想，革命路线的纲领，才能保证党的质量。代表名额要多少呢？我主张会开大一点，可以有一万来人，代表有七八千，再加上请一些外宾，选一些红卫兵。

再谈一谈关于党章的问题，肯定要修改，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都很好地写到我们的党章中来。这一次，毛泽东思想，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

理论，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作为根本的纲领。要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要写在党章中。

关于毛著的问题，出第五卷，我看可以同时出六卷。

还有整顿党的组织，改造党的组织。要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在这一、二年中表现好的，是工农出身的。其他不是工农出身的，要表现特别好的，这一些要吸收到党内来。过党的生活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有条件的，现在就可以试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现在北京有这样一股歪风，借反对关锋、王力问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现在还有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外”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种武斗歪风老是刹不住，要调查原因，要追查责任。（李付司令员解释说：我参加了制止武斗，给订了六条，没有很好的执行，究竟谁没执行？）他们双方（指造反团和红旗大队）都犯过错误，不要不择手段地压制对方，一外武斗是极错误的，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你要告诉他们（“一外”）如果不改正错误，坚持武斗，这样下去就会走向反面，这与主席指示离的太远了，听说“一外”破坏的很厉害，这是犯罪行为，要追查责任，进行教育，派调查组调查后交上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总理办公室联络员王同志传达总理指示：

各群众组织随便抓人是不对的。用抢、骗、打的办法抓人更是不对的。以后不准这样干。再这样干要犯大错误。那就是要考虑你这个组织的性质。你们现在抓的人都要放回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接见北京工代会
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富治戚本禹在京西煤矿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谢富治说：

“抓 5.16 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 5.16，哪里有那么多 5.16 呢？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 5.16 的帽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有的人原来造反，现在不能够参加我们的会，工人中就有洪振海，还有三四个人，学校里边就陈荣金。他现在已经在坐班房了。

党的生活可以恢复，但不是恢复原来的样子。要搞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战斗的革命性强、生气勃勃的组织。对党员有三种情况：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领导工作。不起作用的党员，要劝说出党，可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中央的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要搞革命的大批判，在革命的大批判的基础上，搞复课。现在有些学校复课了，有些老红卫兵他们就去冲，说“你们是改良主义”，“你们是复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主席特别谦虚，不同意这样做。中央决定，以后用那样的活，李文忠和英雄四排那样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大概从昨天开始报纸上就没有这样一句话，以后不说了，主席也特别不同意祝寿，总理打电话给革命委员会，要贯彻两条，第一条不要到中南海敲锣打鼓庆祝，第二条，不要在街上贴大标语，主席讲以后不要题字了，关于毛主席塑象的问题，还是按毛主席的那个批示去做，希望不要建造了，以后再建立要按中央批准才行，街上画的宣传画，标语画，有的极其不严肃，画得很不象样，以后经中央批准后才可画，革委会要统一规定的。

有少数单位，主要是大学，个别工厂和中学，他们就是搞派性，互相整。

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这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清华井冈山那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四一四”，“四一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的是原来的井冈山么！但是他们团派也是有缺点的，如果“四一四”要把井冈山推翻，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井冈山要把“四一四”搞垮那也不合适，双方自我批评这是唯一的方法，

要以“四一四”为主不合适么！一开始我就去表明这个态度，我去了两次，当时的态度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严禁非法编印毛主席著作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批转北京香厂路小学建立红小兵组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谈修改党纲党章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8 3 4 1 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帮助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安谈清理阶级队伍（1968.02.05 至 1968.05.15）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上的讲话

郑司令员：

我讲一下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我认为是革委会每个同志都应有自己的态度，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究竟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我认为我们革委会中每个同志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我很同意今天上面几个同志的发言，为二月逆流翻案，事实上是自毁长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个人意见坚决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个中间，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这个意见，但是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人站队站错了，旗帜不鲜明，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立场，检查一下自己站队站对了没有，态度明确不明确，这是对毛主席、对林付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对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自己鲜明的旗帜，应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态度！

北京市革委会是以谢副总理为首的领导下，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身边的新生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的。我个人跟上面同志的看法一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所以，我们应该拥护革委会，支持革委会，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傅司令员：

最近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个大问题。

吴德同志：

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这是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什么“打倒彭真第二”，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这是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谢富治：

现在希望你们北大的两大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真、彭德怀、贺龙、罗、陆、杨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把主要矛头对准二月逆流的主将叛徒谭震林，向那些刘、邓的爪牙关、王、戚，还有周景芳这些变色龙、小爬虫，向他们做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首先抓大批判，抓阶级斗争，抓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抓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毛主席教导的根本，我们就有时抓，有时就抓的不紧，特别是近两个月抓得不紧，这就是大的方面有错误。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

第三，我没有象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任何时候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

第四，……在毛主席身边，在林副主席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身边。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关键。一切重大的事情，都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请示，这一点我们做得很不够。

我是列举了这么几条重要错误，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了。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翻案，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一九六八年四月至六月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中旬各口搞三结合夺权，当时我很怀疑，为什么农口那么容易？过去很落后，夺权却走在别人前面，问题很复杂。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九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的通知

最近发现流传着一些谣言，有的是口传的，有的印成了小册子，传单，有的是伪造的文件，讲话材料。例如，被说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关于“五个回合站队问题”的讲话，就完全是伪造的。这个材料流传甚广，有的人根据这个材料的观点搞重新站队，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

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毛主席批示：照办。

现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发给你们，望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试行。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1968.09.06；中发[68]140号

毛主席指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九月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遵照毛主席指示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九月五日全国一片红，也就是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个革命的贡献的伟大。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有责任向同志们来介绍，使同志们了解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过程，我们走了那些弯路，我们犯了那些错误。

周恩来讲：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

江青同志系统地讲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确实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作用。紧跟着还有很多大字报起来了，四大运动紧跟着就推动起来了。紧跟着，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这种情形形成当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运动。在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派，顽固地坚持跟随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以，红卫兵小将就要炮轰他们，要打倒他们，要火烧他们。

江青同志去年讲，一月上海的工人阶级拿出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夺取了上海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狄秋的权。上海以后，包含北京市只有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一个“二月逆流”。红卫兵小将们在这个时候，敢于起来反击“二月逆流”。

红卫兵不仅是初期有那样的丰功伟绩，就是在中期，去年这个时期，解放军缺乏经验，又是担负这样繁重的“三支”、“两军”的任务，红卫兵小将这一冲教育了军队，我看有很大好处，应该感谢他们。

我们伟大领袖预见到夺走资派的权，要取得全面胜利，到去年上半年还不行。到去年六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了两个点，一个是六月二十五日去的针织总厂，一个是化工厂，抓这两个厂试点。到了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七日就宣布了针织总厂的三条经验。这对我们支工，到厂里蹲点促进工人的大联合有伟大的指导作用。

一九六八年十月至十二月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分配工作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待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

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很好。这个报告是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以来，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来的，不仅对各大专学校，而且对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和单位都很有用。现在把它发给你们，供参考。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

1969.05.08； 中发 [69] 20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这一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及其他大、中城市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

贰、本节简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第一批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最后一名。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二月逆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比较扎实。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深入开展斗批改，形势发展很好。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北京大专院校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估计形势，到处抓“军内的一小撮”。在工厂、学校内部也重新发生两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大搞武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九月。

其中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2007年11月15日初稿

2011年8月13日修改

第三章第八节 解决陶铸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陶铸由中南局调到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六月四日，陶铸到北京上任。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第二次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下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陶铸在卫生部钱信忠等汇报时的插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电话指示

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

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

疾。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

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陶铸给中国医科大学学生顾瑞华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二、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主持召开了幾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

江青以为他害怕，鼓励地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

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么。”陶铸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这才明白陶铸的心思，原来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还蛮有感情的。

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宣布开会的话音刚落，谢富治就抢先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错误。在谢富治的带动下，有些人也跟着发言。陶铸埋头喝着香茶，一声不吭。生活会开了几次，始终一言不发。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找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找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总理和我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思找头阵，甚至从头到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时，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陶鲁笳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

（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三) 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

(四) 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

(五) 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

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

(六) 学生到外地搞革命串连活动，不要阻拦。教育部原通知的组织各地大专学校学生到北京参观计划，暂不拟实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群众时的讲话

(对钱信忠同志) 我觉得你搞革命没有劲，太“卫生”了。《健康报》不健康，我看卫生部不卫生。不革命还卫生吗？六月廿五日以后，我想为什么你们卫生部的运动不是有声有色，而是冷清得很！北京是冷清，卫生部更冷清。如果是我六月廿五日讲的关系，我负责任，我检查。你们自己现在改，也还不迟。

什么叫党的领导？支部很好，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这是党的领导，支部，群众不相信它，文化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支部不执行《十六条》。就不能算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看是不是正确执行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贯彻党的政策，不一定是党员不党员，党委不党委。打人我是不主张的。不要打人，文斗嘛！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把黑帮斗臭、斗垮，不摆事实讲道理是不行的。只有把大量事实摆出来，才能使他低头认罪。当然，运动中也不能保证一个打人事情都不发生，这么大运动，对个别坏分子打一下也不要紧。这话不好到处讲。你们不要光抓这一句话。真理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的道理，我们不主张打人，蒋介石才是靠打人。没有道理才打人。对打人要采取教育批评。反革命打革命群众是另一个问题，绝不容许，要严肃处理。革命打反革命要说服，以后不要再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

陶铸讲话：

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地，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

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可以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

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三、陶铸抓生产压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王任重打电话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编者按：这篇社论由陶铸主持定稿，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总精神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不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陶铸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

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编者按：对于以上两个文件，毛泽东划了圈但并不满意。他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泽东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泽东总认为搞了 17 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从这里开始，陶铸与毛泽东的分歧一步步更加显露出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的几点意见（金明转告）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中南局批转湖南两个报告，批语写得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但估计高了一些。

1、第五、六页，当前任务，第一条，末尾讲到“团结好两种人……”先讲“保皇派”，后讲“反对省委”的人，把后一种人摆在第二位，还讲到“团结——批

评——团结”，位置不对，“批评——团结”的提法不当，似乎他们犯了错误。

2、对于一小撮……都要“不失时机地”斗倒。太早了。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编者按：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在湖南作了一个抓“黑鬼”的报告，打压支持群众运动的革命干部。而陶铸还在大加赞扬“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对于张平化要“不失时机地”斗倒“一小撮”，陶铸认为只是“太早了”，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所以“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

一份《快报》中写道：

“社会哲学科学部涌现了左派组织红卫兵联队，他们以吴传启为代表，贴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锋芒直指陆定一集团伸向学部的代理人。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要求中央坚决支持吴传启等左派。”

看完这段消息，陶铸皱起眉头，不悦地问秘书：“社会哲学科学部有学生吗？”当秘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恼火了：“红卫兵都是青少年成立的组织，学部的老头子们凑什么热闹？四五十岁的人了胡子都长长了还组织红卫兵，纯粹胡闹！给我查一下吴传启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很快报上来了：吴传启，男，学部助理研究员。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深受关锋同志的赏识。

陶铸问：“这些材料可靠吗？”

秘书说：“基本可靠。特别是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条，在档案里就有记载。”

“好了，就凭这一点，党中央就不能支持他！”陶铸拍了桌子。

一天，工作人员催陶铸去接电话。电话是江青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的紧急会议。陶铸乘车赶到钓鱼台。他径直来到16号楼的会议室，见江青正召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会。见他进来，陈伯达连声喊：“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卢正义同志也杀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延安公社’和学部的左派吴传启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了！”

陶铸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听这话凉了半截，认为中央文革研究这事没

多大意义，但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我也听说此事了。不过，卢正义同志的影响并不太好，据说他在 1935 年被捕，被押送江苏反省院，后来自首变节了，还在狱中写了大量反共的诗词。”

“你作过调查研究吗？”康生劈头问道。

陶铸说：“还没有！”

江青说：“既然没调查就不能乱表态。我也听说你对吴传启同志不大感兴趣，有这事吧？这可是个感情问题，对左派应该支持，不支持还怎么谈得上支持革命！”

“对他们贴的大字报可以支持，但说吴传启就是左派，还要谨慎一些为好。”陶铸说道，“吴传启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我也让你看过，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封为左派呢？”

“有问题的人怎么不可以成为左派呢？”江青说“如果像你那样抓辫子，大概所有的革命左派都会被你整倒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听，忍不住把桌子猛地一拍：“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是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加入该党的！这样的国民党能够和我这样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你，你，你要干什么？”江青喊道：“支持左派起来革命，是毛主席给中央文革交待的职责，你、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可以代表文革小组要求你，你必须支持左派，否则没有资格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说：“陶铸同志，你太狂妄了！今天是在党的会议上，你凭什么对中央文革发这种火？你对江青同志要什么态度？支持左派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要骂连同我们一起骂吧！”

“对！要骂就骂我们吧！”姚文元也跟着喊了起来。

康生指着陶铸连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像话！真不像话！”

陶铸才走到江青跟前说：“江青同志，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冷静，都是为了从工作出发嘛，算了，不要计较了，全当我态度不好，向你赔不是了好不好？”

“我不和你说！我不和你说！”江青说，“我们找常委们去说理！找总理去评理！你太欺负人了！你今天不仅仅是对着我的问题，而是对着整个中央文革小组，你是在向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宣战！”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国庆节后，新华社要发照片。按过去的规定，国庆节时报纸在头版要发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照片，但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变了，怎么办？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带着照片和一些工作人员请示陶铸，陶铸毫不犹豫地：“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以前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可是，新华社带来的照片中，没有邓小平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这可是个大问题：报纸上领导人排列数序的变化，照片上领导人的位置都成为红卫兵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们从这里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以去打倒。

陶铸想了一会儿，问新华社的同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新华社的同志回答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看照片上陈毅站在毛泽东跟前，他的身个和邓小平差不多，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大家又都穿绿军装，便说：“能不能把陈毅隐去，

把邓小平移过来？”熊复说：“可以。”陶铸断然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冲冲地嚷道：“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长到陈毅身上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人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10月16日发出的毛主席将于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托调中增加一条崭新的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央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1966年10月17日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时，是10月18日凌晨3点。再有7个多小时，他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他让秘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通知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在5点来到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林彪坐在他的左侧，神色冷峻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周恩来看完那封信后传给陶铸，陶铸的脸色马上变了。陈伯达和康生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他们早已看到了那封信，是通过江青才转到毛泽东手里的。

当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及谢富治、李雪峰、宋任穷等人都看完信后，林彪声色厉地问：“这件事是谁干的？”

连问三声，没人回答。

林彪拍着桌子吼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怎么这个时候把膀子缩到乌龟壳里人了！你们谁知道这个？”

“我！”

当众人的眼光都瞅向他时，几乎都惊得叫出声了。

“我知道此事，”陶铸心平气和地说道，“熊复同志把 16 号的口号标语稿给我看后，他觉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提法过去还没有过，一旦提出来容易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给帝修反以反华的口实，决定删去前面的 8 个大字。为了中央会议的保密，我们又决定删去其他四个标语口号。这事如果作得不对，我负全责！”

“你点头此事前，和中央其他常委商量了没有？”林彪又问。

“没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是我决定的。因为过去像标语口号这类事，中宣部长就有权力决定。”

“你太大胆了！”林彪说，“连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都敢反对！”

“我没有反毛主席，删去这几个字并不意味着要反毛主席。”陶铸争辩，“如果大家都觉得我错了，我检讨就是了，不值得林副主席大动肝火。”

“算了！”毛泽东站起来，拿起那封信问道，“红卫兵小将们的意见你们都同意吗？如果同意就算了，现在就是要发动群众嘛。看来，这些小将们的确厉害，稍有不慎，就会造你们的反的。再过几小时，我们一同出来见群众，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吧？”

听完这些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都意识到这封信可能会触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想到毛泽东轻轻几句话便把此事了结了。于是，谁也没再对这封信提出疑义，一致同意恢复原来的标语口号，并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陶铸：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指张平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五、陶铸反对工人文革运动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陶铸对上海安亭事件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

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编者按：这篇社论是陶铸主持定稿的。很明显，它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新办法。）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毛泽东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表态，会上一些人作了检讨，包括陶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在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中，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了一口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康生说，“红卫兵已经分化了。”“有一部分老红卫兵被王任重、周荣鑫等人利用，用以反对首都三司这类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成为他们挑起武斗的炮灰。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就是王任重一手操纵的武斗组织，他们公然打人、杀人，死保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王任重不是个好东西，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在中南地区干了大量的坏事。但陶铸很欣赏他，很支持他。没有陶铸支持，我断定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毛泽东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

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

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把信转送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编者按：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不同意 15 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毛泽东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也可能说不对，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

报。

毛泽东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这次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其他一些人发言，特别是王力。

王力在会上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这次 20 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届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林彪在会议上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 180 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

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陈伯达澄清几点意见。

毛泽东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

陶铸在会上说：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在会上说：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派，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

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的关系，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

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

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時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了，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么？……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叫“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查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当然，决不是提倡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他说：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查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

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一，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张平化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 6 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 196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

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

（编者按：显然，这个话中说“极少数人”就包括陶铸在内。）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批判陶铸。早在十一月初，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个会当时没有开，王任重于十一月初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

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也不

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说出“咎由自取”的话。

十二月工交座谈以后，毛泽东就定了要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

不久，陈伯达又面见陶铸对他进行劝说：“陶铸同志，正因为我和你是知己才来劝你，你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和刘少奇、邓小平划清界限才行，这场斗争的性质你也该清楚了。”

陶铸说：“我先想弄清一点，你今天来是我们私人间的朋友聚会，还是奉他人之命来和我谈话？”

陈伯达笑笑：“也许两者都有吧。”

“那我就把我的态度彻底亮明。”陶铸说：“首先，少奇和小平同志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俩还是中央常委嘛，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我不能未经中央讨论和批准而像红卫兵那样喊打倒他们么，关于《长征红卫兵》的宣传，是我首先发现的，大串连是我极力支持的。不过也没什么。红卫兵那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拿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红箍箍戴着。我认为把自己划入红卫兵，水平那就太低了，我和刘、邓无界限可划。”

“我认为你这种态度极其有害，你知道吗？北京和中南地区已经有你的大字报了。”

陶铸说：“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有一次我在文艺系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进来一批红卫兵，把我当成肖望东。抢了我的话筒，夺了我的讲稿，拿了我的眼镜，我表现很顽强，毫不屈服。我说：我很高兴，如果我是赫鲁晓夫，就会被搞下台。你们这批红卫兵真行，杀！杀！不过，我对他们说，我陶铸是一贯革命的，说我陶铸不革命就要和他们辩论。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应该尊重一下小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陶铸说：“是我不尊重还是个别人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王任重同志有多大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够背着他和中央常委支持反对他的群众组织？要知道他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还有刘志坚，你们都不去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这个顾问更是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对此，我只能提出抗议。”

陈伯达叹了口气：“既然你听不进去，我也只得如此了。”

陶铸说：“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我不承认，你们有批评的权力，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力。”

陈伯达怔了一下，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把这个问题估计得太简单了，竟想通过自己的谈话来减少常委中的反对派，达到集中力量打击刘少奇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笑啊。

陶铸说：“这几天休息不好，有什么讲的不妥之处，请你不必介意，全当我没说！”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走出房门，连头都没再回一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个会由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大家都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陈伯达的讲话与67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联动’组织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次冲进公安部，强占了8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高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打倒中央文革’并撕下堵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刘少奇万岁！誓死保卫刘主席’等口号。又在第二天，第三次冲击了公安部。

对此，陶铸得意地说：‘这些红卫兵终于清醒了，谁镇压他们谁就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陶铸在中宣部讲话时说：“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

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

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同学提问：第一，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 11 月 26 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查。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三点指示。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第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第六是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第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

同学提问：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同学：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为什么中南局在十二月份还在散发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用意何在，为什么中南局还有这么大的胆。（二）金明对中南局干部讲，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今天还说这样的话，让中南局干部与红卫兵隔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

（三）中南局王任重、雍文涛、张平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陶铸怎么看，根子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么几个月，为什么这么猖狂，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王任重在文化革命以前，特别在 61、62 年写的黑杂文，凡是在攻击三面红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要交出，文化革命中的黑指示要求陶铸同志责成中南局与湖北省委全部交出。（二）张体学是否篡改了三点指示，湖北省委的三点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陶铸同志在处理三点指示问题上那么不果断，不亲自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至造成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九月要求接见而未接见，十月份让余乃强与杜大公搞书面意见，与三点指示有原则出入陶铸究竟站在那一边？（三）中南局为什么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十二月三日才向下面传达。

（编者按：显然，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是针对陶铸的。陶铸对问题作了回答和辩解。

在造反派的围攻下，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和陶铸秘书张汉青报告陈毅、李富春和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让几个副总理守候在附近，“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6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候了6个小时”。武汉造反派在拂晓前拿着陶铸的罪证离开，立即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的标语和各种流言在京城迅速传开。

几个小时后，中宣部大院便出现了记述这次接见始末的《特号新闻》：紧接着，要求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般地刷满了大院。

在12月上旬，群众是要求揪斗王任重，要求陶铸接见；到年底，王已经被揪到武汉，该“专揪团”部分进京人员，多少听闻陶铸在中央的情况，将对话升级为要求陶铸回答问题。历史证明：群众的这些活动并不是中央文革某某人授以计谋、透出消息或暗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陶铸：我知道贴我大字报从你们教育部开始，北京我的大字报还不多，可以贴么！我欢迎贴我的大字报。戚本禹同志说我的大字报是可以贴的，这个话我早在卫生系统讲过。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

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了高帽子，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 油炸九头鸟”！

王任重戴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王力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叫王力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八月，王任重给王力写了个条子，王力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

一九六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
〔周恩来、江青、康生、王力等也在座〕

陈伯达：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联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回忆，“直到深夜 12 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 2 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回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所谈就是指的 1 2 月三十日的那次接见。

周恩来并让秘书告诉蒯大富向“专揪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揪陶铸的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天快亮了，知道大家都没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里天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也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你们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必须向毛主席请示，而且经过党中央讨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在新华社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

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与“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的谈话

〔周总理于一月七日早上十一时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总理问了许多代表。摘要如下。〕

问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总理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总理谈到陶铸问题时说：陶铸同志要检查，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是中央常委。首先要在常委中检查。现在你们手头材料还不多，你们根据实事求是整他的材料交上来。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你们现在要多收集他的材料，可以贴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

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

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陈伯达：

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和广东专揪王任重问题小组谈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马上传到全国，那次我已经对陶铸同志作了一些评价。陶铸同志大概很不满意，评价的不对可以批评，可以为陶铸辩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

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

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

江青说：

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 40 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

康生说：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江青说：

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联

周总理讲话：

陶铸同志管文教方面的事情，陶铸同志满口答应下来。经过调查，转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有转正，统统回原来学校这就是一个方向问题，工作的方向问题，革命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清楚。去年 12 月第二次接见了你们的代表，正巧还有六六年的毕业生代表，双方座谈讨论，陶铸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说不可能这样做，不能所有同学回母校，陶铸同志闯出这个祸，中央就是要重安排，重新讨论，也取得了同志们的同意。不久发现了陶铸同志一些问题，福建、广州革命师生来京揪王任重，在北大接见揪王任重同志代表时，陶铸表现了对党对立情绪。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的讲话时揭露了陶铸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连续犯了错误，出现了很多乱子。刚才说的去年年底对于武汉、广州等革命的同学的对立态度是一次最大暴露。在群众的揭发中联系到六五年毕业生问题，不单是这一问题，许多问题是陶铸干的，作了很多坏事，陶铸到中央先是书记处常委，后担任了政治局常委，作很多这样的破坏工作，根据群众要求，党中央的要求，现在正准备作书面检查，今天我在这里揭发陶铸的错误使你们知道了这个来源，我把这问题说明白了，陶铸同志的问题清楚了，问题的性质清楚了，我也好说话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

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北京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讲话：

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和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当时我的责任是说明，揪出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我没根据嘛！

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我们年底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还感到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迹象），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

〔按：7月11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

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对“揪陶火线”战士的指示

伯达：

你们这些人是那儿的？这些棚子是你们搭的吗？谁叫你们这样干的？坚决地无条件地撤，……不要上当了，不要被坏人利用，这是中央的地方，不准在这里损坏了中央的威严。无条件撤退这里，不是明天撤，现在就撤……文化革命丑化了，这多难看，连走路也不方便。批判陶铸是中央批准的，你们批判陶铸我们是支持的、但不是这样做法，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我们年轻时干革命也没有这样干过。从来没想出这些花样，年轻人犯错误可以原谅，幼稚。现在就

撤，无条件地撤，（鼓掌）欢迎你们这样做，我们走你们就撤……

谢副总理：

不要上当，小孩也不要上当，中南海四门都封闭了，国际影响很不好。文化大革命丑化了，应该搞大批判。你们这样做是对中央施加压力，很坏，给文化革命没有增加什么光彩，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

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

江青同志：

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文章指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

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

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这篇文章了把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上海时代中学 陆荣根《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出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二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 4 月 3 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贰、本节简论

陶铸在文革中迅速大起大落，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型。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会议以后，他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彭真、陆定一的职位。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积极主张派工作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但就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

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以后，他还要搞书记处，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陶铸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反对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平化在湖南抓“黑鬼”镇压革命，陶铸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他斥责江青：“你也干涉

得大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十七日经陶铸同意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总理主持的生活会，陶铸作了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与群众发生对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时说：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这篇文章了把党中央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另外，陶铸还有历史问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中说：在南京水西门外监牢，我坐了五年，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想到能出来。后来叶剑英同志把我保出来了，一下子到了东北。当时经过审查，认为他有叛变行为。但这个问题，在文革中，中央并未作出正式结论。

这些年来，右派们对陶铸的“歌颂”，从反面证明了党中央当时对陶铸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陶铸在七、八月也说过错话，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他不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反对打倒刘少奇，他坚决反对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帮这样一个公式。保护了许多干部。

这些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2007年5月2日初稿 11月29日修改

2011年8月15日再修改

第三章第九节 批刘保帅保肖

壹、本节概述

本节概述

一、批判刘志坚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军队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萧华、袁子钦、李曼村、辛国治、王力、叶群、唐平铸、胡痴、宋琼、栾保俊、王春化、任定颐等同志接见了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刘志坚、谢镗忠也参加了接见）。

与会者向中央首长汇报了本单位及大会筹备情况，因未汇报完，又于四日晚继续接见。到会者又汇报了一些情况，指出要彻底批判陈毅、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总理讲了话。刘志坚作了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的初步检查

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

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

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衷主义，和稀泥。

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坏。

六、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

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

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

你们提出的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两次讲话确实有原则错误。不但你们这样认为，我们研究也是这样认为的。

叶剑英同志去年 12 月 31 日作了检查，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

陈毅同志虽然也是军委副主席，不是主要负责军事的，他主要负责外交系统的工作，他不但准备在外交系统进行检查，也准备在军队内部做公开检查。

受打击的、被斗了的、受围攻的、被丑化的、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的，我们宣布都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你们研究了叶剑英和陈毅的讲话，好像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实际上不是，从全国全军来看不是他们，正如同徐向前、正如同聂荣臻一样，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彭、罗、陆、杨的，是很坚决的，起积极作用的。你们是从局部上看的，我们是从全局上看的。所以矛头指向陈、叶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恰当。

根子在哪里？就是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查，最近我们才帮助他。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他也不请示军委，上不向林副主席请教。这三条指示（指文艺界的）是违背紧急指示的，更没有请示林彪同志，特别是全军的文革派工作组的问题。当时萧华不在家，去养病，林副主席不在北京，但其它副主席，比如叶副主席是管军事的。

现在谈谈开这个大会。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们开，开了对全军不利，矛头攻错了，大方向是对头的。我们不同意你们开这个大会，可以开

小会嘛，每个单位你们比我们清楚的多，不但我们不同意开，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常委，都不同意你们开。但你们一定要开的话，我们也不干涉，但我们不能参加这个大会。

对照一下以上讲话的原文，就可以知道，下面《叶剑英传》中的一段话完全是歪曲和捏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李曼村接见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时的讲话，传达了刘志坚的检查交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徐立清对解放军测绘学院学生的讲话

徐立清副主任说：刘志坚是个两面派，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推广者，他背着中央文革干了许多坏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来源：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联络站整理印发 一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肖华在军队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徐立清在军事博物馆作的解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

通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院校学员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说：你们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你们直接到中南海抓，我劝你们不要抓，中央也劝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办法，我们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关锋接见军队科研单位群众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戚本禹对军队院校同学的讲话

我认为刘邓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批判我，反对我，你们有没有不同认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说他是不是最大的，是不是党内的，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是当权派，所以我说他就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说我是加起来的，当然光有推理还不行。你们要深刻的理解，这条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大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杨成武同志我接触过，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忠于毛主席的、林副主席的。他是有战功的，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长征时，曾指挥过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过去的英雄，现在又是紧跟毛主席的，是大大的好人。

（有人问：肖华呢？）

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有缺点可以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有特殊的功勋。没有他指挥部队顶着，罗瑞卿早就政变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肖华在高等军事学院批判李志民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给总参三部和技术工程学院的指示

三部全体同志们和技术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军委一月九日召开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进行。三部什么时候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新亭关锋戚本禹对军队总参三部工作人员的讲话
戚本禹讲话：

说军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都没有提军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不提更使人产生麻痹思想，有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没有问题的，军内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中央的历来文件，红旗杂志社论都是肯定，

我看刘志坚不是死老虎，是个活老虎，还有后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江青在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

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整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师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造反派的讲话

四、成立以徐向前为组长的全军文革小组

二、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长：徐向前 顾问：江青

副组长：肖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群 王蜂 和谷岩 张清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12·25”会议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

部院合并不能说是大阴谋，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套上，

罗瑞卿与工办不能等同。

说赵尔陆是彭、罗线上的人。你怎么这样乱连？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江青徐向前对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的讲话

江青说：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开了成立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林彪接见空军党委会全体同志时的指示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要坚定不移。会有曲折，会有反复，大联合了，还可能有分裂，不要怕。

二，不要怕乱，乱透了就好。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斗私批修的过程。

三，不要急，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了，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撑过来，也可填平。反映情况要四快一慢。

四，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调查研究，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打包票，有的组织大方向对，政策策略不对，也会失败，南昌起义就是这样。

五，要心明眼亮，看清敌人，但不要夸大敌人，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六，支左就是支持毛泽东思想，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不符合

毛泽东思想就不支持。支左不要搞小动作，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七，反映情况要准，不要虚构，要全面，要客观。

八，争取主动，不要怕吃眼前亏，有错误要认真检查，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

九，既要防“左”，又要防右。防“左”就是防干扰毛泽东思想，防干扰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防右就是防老保翻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关锋和空军院校十二人的谈话

对刘志坚知道一些，逐渐了解的。他是搞两面派的，暴露有个过程，在六、七月份，原来就有些观察，但是想争取他。那时不知道他搞两面派。那时主席还没回来，当时文革也很困难，想争取刘志坚。他经常到中南海去，我们这些人不能去，他是支持刘、邓的。攻击文革小组不要党的领导。

主席回来后，批评了他，当时表示承认错误，我们也没有根据说他是假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看二帮的态度。后来他就很少和我们接触，不参加会议。他和王任重住在一起，他们是无话不说的，王任重的一些阴谋活动，他是知道的不少，没有和我们说。

后来他把刘涛接到他家里，有些大字报是口授的，实际上是支持保守派，但又和造反派接触，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保守派，真是岂有此理。

北京几个司令部，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支持第三司令部的，但不指挥他们，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刘志坚相反，有一次会议说：“三司可能有希望”。遭到他的激烈反对，他的女儿在一司。一司二司不能一概而论，二司不是现在造反了吗！

在派工作队的问题上，刘志坚是大力支持的，积极的很。王任重人，他痛快的很，文革要人很费劲。

他过分地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忘了普遍性，他背着林彪副主席搞了一套东西。现在彻底清理一下，告诉大家，刘志坚这条反动路线是和刘邓相联系。至于说军队内还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谁，这个话我不讲，不清楚，你们可以看一看。陈、叶副主席，江青、总理、伯达同志都讲了，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主席思想的。陈、叶都是好人，老老实实的，不要两面派，好处就是想到就讲。

叶是老实人，大节上跟紧主席的，他不是搞鬼的人。目标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

我看批判叶的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开。现在紧紧抓住刘志坚，从刘志坚这里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同志们读一读《告上海市人民书》，这是大局，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我提议你们两条：一条关心大局，好好读读这些东西。再一条是坚决批判刘志坚，批判完刘志坚再看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锋在接见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炮兵机关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谢镗忠接见斗争刘志坚大会筹委会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徐向前说：

吴法宪是个好同志，他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林副主席指示的。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江青说：

就是这个刘志坚，从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指定他参加，他捞了点政治资本，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到中央文革说军队

的事情很多，回到军队又说三分之二时间在中央文革工作，实际是两头都不沾边，他搞另外一套。这个人坚决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参加座谈会后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开会，那时我不在北京，是伯达同志告诉我的，撤工作组他是投了票的，后来参加刘、邓主持的会议，他又马上投降了。（徐向前同志：他还攻击伯达同志。）在上海，他也不请示，就自己走了。我感到在紧急关头，这个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轻易怀疑一个人。现在才发现他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对你们装出支持你们的样子，在另一方面破坏文化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不应指向的方向。这次把他识破是一个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1）的批语（2）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中发〔67〕21号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

中央责成你们：

（一）凡属真正的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以及保证党内文电正常传递的人员已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应当由你们向群众正面讲清道理。如果革命群众怀疑党和国家机密文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要求清查，说服不了的时候，可以采取由你们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共同封存的办法处理。

(二) 凡是把整革命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必须立即全部取出，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当众处理。

(三) 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另外，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发至县、团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陈伯达在全军文革小组会上的讲话
主要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徐向前肖华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徐向前讲话

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姚文元同志批评我们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地方落后了三个月。我认为这估计非常准确，而且这个批评是我们的动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何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徐立清对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七日，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职工的一封信
主席批示：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主席：

解放军报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

林彪 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小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

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林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林彪对《解放军报》的重要指示

- 一、热烈地拥护毛主席。
- 二、热烈地支持左派。
- 三、坚决地打击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 四、永远保持鲜红的旗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陈伯达对解放军报的两个紧急通知

三、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

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处理海军的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扣上夺权的帽子，扣上“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师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师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不是不做工作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

刘、邓、陶铸、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在京西宾馆（北京）召开由各军区、各大兵种、解放军三总部以及有关中央负责人、中央文革参加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主要研究在军队中开展“四大”的问题。

叶剑英作为军委副主席，极力反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军队中的推广，他强调指出：“军队不能和地方一样，要区别对待，军队要是搞了四大就是等于放羊，现在，国际局势不明朗，万一，有了战争，军队一时集中不起来，出了问题，谁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

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都支持他的意见。

突然，叶群站起来指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说：“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

讨你的严重错误！”

叶群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叶剑英马上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

然后，站起来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叶剑英、徐向前等都站起来跟随喊口号。

萧华也喊，叶群马上制止：“萧华没资格。”

陈伯达接着讲了话：“萧华，你很骄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里，你是绅士，不是战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战士，你把解放军变成了私人军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队，你是专门搞投机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张春桥、姚文元也马上对萧华做了狠狠的批判。

江青说：“萧华，你很狂妄！你是不是毛主席的兵？我看你不是！你是资产阶级的近卫军！你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搞到了中南海，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真是狗胆包天！我是准备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在军队的代表作战到底的！”

江青说：“我提议，由向前同志主持总政工作，徐帅是老革命了，主席多次说，徐向前坚持红军不打红军，建国的時候，谁的山头最大？毛主席说是徐帅的山头最大，可是，向前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很谨慎，很好。我建议。”

徐向前立刻表态说要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再定。

叶剑英站起来说：既然会议有了新动向，我准备先回去学习一下。向徐向前请假。

会后，叶剑英、徐向前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揪斗萧华同志，违抗者，军法从事！”

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在萧华景山东街的住处找他，萧华闻讯逃到总政副主任傅钟的家里，从那里被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军委的扩大会议继续召开。

萧华一进房间，江青质问他：“你到哪里了？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萧华不说话。

徐向前很恼火，就大声对萧华说：“你就说，有什么？他们能把你吃了？江青同志是文革的旗手，她问你为何不回答呢？我和叶帅都在，谁敢动你？你要把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拿出嘛！”

萧华还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张春桥说：“萧华，你是胆小鬼嘛，你还能革命吗？”

叶剑英说：“萧华昨天晚上到了我那里，如有窝藏之罪，我叶某担当！”

接着讨论军队开展文革的事情。

叶剑英问陈伯达：“阎红彦死了，怎么回事？”（阎红彦是1955年授予的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1.8自杀。）

陈伯达说：“不清楚，可能是自绝于革命和人民。”

叶剑英说：“什么是可能？阎红彦是总理担保的，红小鬼出身，他能有什么错？”

江青说：“总理担保的人多了，谁能保证都是好人啊，死了就死了，阎王请他喝烧酒！”

叶剑英闻听大怒，拍案而起（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茶几上的几个茶杯就是被叶拍碎的），厉声说到：“军队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徐向前接着说：“谁敢毁我长城？”

会后，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检查（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陈伯达随后让秘书给军委办公厅送去他的条子，说那天说的萧华是绅士的话，是吃完安眠药以后说的，不算数。

江青向毛泽东汇报，叶群向林彪汇报。

林彪向毛泽东请示：叶剑英是不是想搞什么事情？

毛泽东批示：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一共十六个字。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徐向前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有人问肖华问题）我不能表态，我没有这个权利，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

党员，我要负责任，还要请示主席。关于他（肖华）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发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定。我看总政党委必须改组。

全军文革成员没有走群众路线，在关键时刻这些人露出来是好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一、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

二、凡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传单都盖起来。

三、肖华同志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因为他是总政主任，有国际影响，中央未定性质。

四、向外传达了的，告诉他们不要相信。

五、中央文革、办事处准备发声明，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谣，传到那里，从那里追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发生军区对冲击军区的造反派实行镇压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关锋对总字六四二部队“105 革命造反团”等九个组织的讲话

三部暂停文化大革命，因是我军神经系统。是否不搞！不是，要和地方错开。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和战备。总政要好好批判刘志坚，别着急，什么事要有一个步骤。刘志坚是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这个是伯达、江青和军队负责同志了解半年多，暴露充分了，可以公开讲了。以刘志坚为代表，要肃清他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仲华在装甲兵科学院解答许光达与贺龙等人关系

问题会议记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陆海空三军参加地方四清运动的部分同志的讲话

四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究竟这是两件事，应该有个界限。五月十六日党内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批判了彭真的反党汇报提纲。这个发表以后，正式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

不能把北京的四清一概说成是在彭反党集团的领导下全盘都错了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突然死于东海舰队一招待所院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毛泽东亲自招呼叶剑英到跟前来，笑呵呵的问：“好我的叶参座，怎么样，火气都发过了？我早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话说到当面，问题解决于面前，天就塌不了。”

叶剑英也道了歉。

毛泽东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对全国文革的形势指出：

1，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是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2，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3，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

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4，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

1，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2，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

3，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谢镗忠接见海陆空三军代表时的讲话

肖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肖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肖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肖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还没作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复盖，要保护肖华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

四、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林彪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
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
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
照办。

林彪 1 月 21 日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
之间，不能调合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以后，叶剑英主持军
委碰头会议，

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限制才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
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
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
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
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
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谢镗忠传达全军文革小组的指示

你们夺了防化学兵学院的权，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防化学兵部是军事领导机关，不要采取群众夺权的办法，你们可以自动撤出，不必作检讨了。不能利用全军文革的意见打击左派，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左派，就要犯错误，就要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

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命令草稿本来有一条是：加强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经过讨论被删掉了。

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

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

当时周恩来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在报请毛泽东批示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李曼村在解放军测绘学院粉碎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包庇邱会作的。我们承认你们是革命行为，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邱会作的问题现在不能作结论，运动要继续往下搞，对邱会作的问题要继续揭深揭透。揭发和批判邱会作的问题，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我回去向上反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叶群接见总后勤部机关院校部分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江青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组织代表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我

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全军文革接待站回答走访者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关锋接见筹备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谢镗忠接见军事院校战斗组织代表的讲话

"105"夺了防化兵部的权，他们下午四点开始夺权，不到二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以后跑到全军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经过，问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在总的方面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在防化兵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提出了意见，建议他们对军事指挥机关不采取群众夺权的方法。他们很快表示要把夺的权交回去。如大印，钥匙几大包，当时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受蒙蔽的一部分群众来围攻他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政变，围攻了他们好几个小时，本来"105"和各革命组织决定要把权交回给他们，因为受到围攻，所以不愿交出，第二次又到全军文革来谈，根据他们对防化兵部情况的了解，不愿把权交给他们。防化兵部的问题确实不少。兵部主任张X更兼研究院长是个三反分子，长期以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突出政治，专门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防化兵部的权该夺，这是对的，以后经过和他们协商，把权交给总参党委，并报军委，其它几个夺权单位如防化学院，防化研究院都应该夺，也可以夺的。

在这个问题上，最近以来，防化系统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反复，特别是在防化研究院，防化研究院的左派在"105"的支持下夺了权。我们立即支持他们，要非常热情的支持他们，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好的，夺得对。全军文革在徐副主席指示下，对这些单位采取支持他们的态度。他们 22 日夺权，我们就对他们讲了，到了 24 日彭绍辉同志在接见研究院的同志时说："这个权夺错了，因防化院是科研机关，是属于机关性质的，不应该夺权"。由于他这么一讲，长了保字号的威风，保字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对革命左派实行疯狂围攻，压制打击，这二三天以来，防化研究院斗争非常激烈，打伤了好几个人，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彭绍辉同志没有积极地站在左派方面，积极支持和保护他们的革命行动，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为保字号助威。这几天，防化系统主要是研究院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显得非常尖锐，这直到昨晚，王新亭同志接见"105"和其它组织时，才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初步的统一起来，当然不是说没有斗争了，还会有反复。九、颁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1967.01.28; 1967.02.11

“绝密

新疆军区党委：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几段批语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

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周恩来说：这个话是非常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
总理：

明天军委要发个八条，先向你们打个招呼。过去说错话不要追，不要算老账；第二，军委八条不能一下理解，要说明，要解释，不然凭意气还行。

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师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

肖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肖华与刘志坚不同。

刘志坚六四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把自己的缺点放松，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师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十一月还把老师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钊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讲话

贰、本节简论

编者按：中央对于前一阶段在部队机关及院校文革运动中推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主要算在刘志坚的头上，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则采取保护的方针。并且仍然任命徐向前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

可是，叶剑英等人不以大局为重，抓住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一月份举行的军委的一些会议上大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特别是由于前一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二月），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企图逃避群众的批判，把主要领导人及机密档案、甚至整群众的黑材料，转移到军区，从而引起了群众对军区的不满，挑起了造反派与部队之间的矛盾。

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缓和这些矛盾。

但是，叶剑英等人及一些地方的军区、部队的领导人，却把中央的这些通知、决定、命令，歪曲成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工具。

叶剑英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事实充分说明；尽管当时叶剑英等人说了许多错话，干了许多错事，中央还是一再地保他们过关，批刘志坚同时也就是为了保他们这几个人。这怎么能说成是“企图一律加以打倒”呢！

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军文革的领导，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任命徐向前为组长、江青为顾问，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支持解放军报社内部的革命小将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叶剑英等人对一月革命以来的形势不满，在军委会议上拍桌子大闹，说别人“搞乱军队，毁我长城”。在中央批准军委八条命令之后，他们的又利用“八条命令”

更大规模地去镇压革命群众。

2007 年 7 月 18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16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二篇

中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册）

目录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4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4
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	52
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90
第四节 内蒙的“二月黑风”-----	96
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114
第六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142
第七节 四川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159
第八节 武汉解散“工总”-----	181
第九节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211
第十节 广州解散省革联-----	285
第十一节 长春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309
第十二节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	312
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321
第十四节 抓叛徒-----	353
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371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442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和中南-----	442
第二节 打击极左思潮-----	472
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530
第四节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536
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555
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582
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631
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675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748

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753
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795
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819
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825
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908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壹、本节概述：

一、歪曲军委八条，镇压革命群众

“八条命令”颁布后，叶剑英根据“命令”，先后处理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与“造反派”的矛盾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从一月十七日开始，石河子市先后有七个单位的造反派冲击了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

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与汽车二团、独立团发生武装冲突，共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 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中共中央国 务 院中国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的谈话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条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

刘志坚揪出来我感到很突然，他不仅有这些问题，他还被日本人俘虏过。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聂荣臻与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校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

（据说，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这样一个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最近，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一）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 XX 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二）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 XX 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委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
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布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热烈响应军委号召，大部分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委规定

一，海军，空军，飞行航校，各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二，海军舰队，机关和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暂不搞四大，什么时间，另行通知。

望各单位遵照执行。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陈伯达接见第二军医大学和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

徐副主席的讲话你们要辩论，有的人还要打倒。（众：我们没有要打倒）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你们批评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思想对就保对了，思想错就保错了。我不赞成用这个“揪”字，我力气不够，我不赞成你们用这个“揪”字。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不好。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讲了。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我在街里看见一个汽车，上面站

着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难看，我不赞成，对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线要划清。犯错误不能当成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参加“湘江风雷”的通知

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规定的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和四〇三厂同志们：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单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由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专职武装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二月十八日，成都军区把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

成都军区抓了数万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叶剑英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
文章指出：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以达到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维持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聂荣臻对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和国防科委八局同志的讲话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看到真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命运，全世界人民把无限希望委托在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革命最高的指导思想。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主席著作，和他们本国情况相结合，指导本国革命运动，现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恐慌万状的，采取什么行动你们都清楚了。仇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采取一切手段，对留学生采取法西斯手段，证明他们是恐慌和虚弱的，苏联修正主义带头勾结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反华高潮，这就是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边境加紧活动，不断挑衅，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内地富反坏右纷纷出笼，斗争很尖锐，很复杂，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叶群陈伯达江青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叶群说：肖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肖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肖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

肖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肖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江青说：对肖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关于肖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肖华表示：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经全军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党委发表《严正声明》，批判武汉市“三钢”、“三新”等造反派二月八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抓了三钢、三新派的一批头头和骨干。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

（详情见“七二〇事件”专题）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通知

各总部、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各基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回学校机关检讨的规定”，完全适用于军队内部派往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工作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五一研究所和机要密码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关于青海省赵永夫事件另有专题详述）

发生类似事件的还有广东、内蒙古、安徽、河南、西藏等省。

二、“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谭震林陈毅给周恩来的两封信

〔两封信写于六日至八日之间〕

总理：

我们建议把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调到北京来，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身体得到休息。

震林、陈毅

总理：

建议把下列同志调来北京，如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霍士廉、陈丕显、刘子厚。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

陈毅、震林、先念、富春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

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三）略（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
 接见

叶剑英在会见时说：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总要经过一些合法的程序才行。现在中央该项小组的权力太大，他们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有些不妥当呀。许多老同志对此有反映，我多少做了些工作可很难有充足的理由。比如处理陶铸的问题，当初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长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我就有看法，认为他不适宜这个职务。但他毕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前的呀。不经任何手续，只是由陈伯达，还有江青同志的一次讲话就把他打倒了，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才好嘛，尽管他该撤。

毛泽东说：这事没和你商量过？

叶剑英说：没有。对此老同志很不理解。不但我不知道，当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他们问李富春时，他也不知道，说没讨论过。

毛泽东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商量嘛。他们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会议上来决定。不过，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叶剑英说：许多问题我也不清楚。谭震林、陈毅他们说，如果开了中央文革小组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正政治局委员的行使其他人的政治生命岂不是更无保障了吗？主席啊，大家的这种安全感还是应该保障的，不然没法安心工作。

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有缺点和错误完全可以提。但不能像刘少奇那样肆意攻击。他和一些省市负责人说，十一全会以后是中央文革执行了反动路线，这个话是颠倒黑白。

叶剑英说：刘少奇那种恶意攻击，我们当然不能客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也不能把大多数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推到刘少奇那一边去。我们之所以能坐下来安心搞内部问题，展文化大革命，不全凭解放军镇守边关吗？

毛泽东说：这个观点我赞成。军队要稳住，一定不能乱。革命造反派夺权，一是要有领导干部，二是要有人民解放军参加。没有这两条，他们夺不了权，即使夺了，也巩固不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毛泽东说：

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

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叶剑英说：有些人言行不一，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

李富春说：我看也是这样。别看有些人把毛主席捧得很高，实际上对主席的话各取所需，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并不执行。这个现象如果不纠正，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好。

陈伯达说：请剑英、富春同志说具体点！

毛泽东说：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

你相处这么多年，如果不扯到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上个月群众大会上，你一个常委打倒了另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江青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干的。我看了一月四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

江青说：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也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说：我不是赵老太爷，怎能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能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群众呢？党的领导呢？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实行封锁。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个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专门开这个会。除了小组内部的人外，其他人先莫介入。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或者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在别的地方一律不准议论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李富春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叶剑英说：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措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毛泽东说：偏要讲，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

周恩来说：是不是叶群、杨成武、萧华同志也参加的好？

江青说：萧华不能参加！群众对他的意见相当大，总要考虑到造反派的情绪嘛。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在中央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拍着桌子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发言。

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周恩来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当天晚上，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白天的争论，毛泽东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

(二) 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

(三) 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

(四) 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日程：

(一) 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 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会议还未正式开始讨论。

谭震林对周恩来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忽视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

谭震林接着对张春桥说：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他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呵！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说：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只看到这些干部参加革命、根红苗正的一面，没看到他们后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一面。陈丕显家的扶手连我们去了还用紫外线消毒，更别提普通群众了。批判他是帮助，怎么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说：这叫什么问题？就算老干部有缺点，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挨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张春桥说：不是，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谭震林说：你歪曲！

张春桥说：像你这种思想，起码应该批判即使我们想保你，广大群众也不会答应！

谭震林说：你所谓的群众，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吗！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今天会上我敢打保票，曹狄秋、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江华这些人没问题。你们把他们打倒是迫害老干部。江华一家子死了大半，这叫什么革命？

陈毅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张春桥说：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错不错有事实为证。你们整我不就是说我捕了几条鱼吗？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说：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不跟毛主席走的问题。

谭震林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

周恩来拍着桌子说：你给我回来！谭震林，你好大的胆子。有什么话好当面讲，干什么就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谭震林说：我就要和他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哪。

陈毅说：谭老板，你不要走，留下来就是要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周恩来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许多干部都揪出来斗，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吧！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说：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

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考虑问题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哭，为我们这个党哭！

李先念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陈毅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死心的！

叶剑英、徐向前说：连国民党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周恩来说：你们说打倒老干部有什么根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给我说清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全国就乱了。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康生说：我没看。

周恩来说：起草这么重大的社论，为什么常委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你们谁起草的？

陈伯达说：我不清楚。

周恩来说：今后写这种文章要事先给我们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

陈毅说：不但红旗十三期社论有问题，就连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我看林彪同志也要负责任。（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使人民军队失控。（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党的会议，当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下去绝对不能犯自由主义，不能搞小动作。同志们都要顾全大局，不能作损害党的任何事。好，散会。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写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

江青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

当即安排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党章上大概没有规定这么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常委审查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江青会见林彪。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上闹事的这些人：

毛泽东说：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放一声。

（对周恩来说）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周恩来说：

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有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周恩来说：

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说：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周恩来说：

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作检查。

康生说：

你们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无产阶级之怒！

谢富治说：

他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我就劝谭震林、陈毅同志不要闹，不要发难，他们不听，他们把中央文革的忍让当作了软弱可欺，真正是岂有此理！

叶群说：

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还不敢如此猖狂，他们比刘、邓、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对付各种可能。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党答应么？

周恩来说：

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个同志的错误，让他们作检查。

毛泽东说：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离开会场。

周恩来说：

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于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说：

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说：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说：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谢富治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利益讲话，你们的屁股坐歪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

李富春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叶群说：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的非常明确，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

康生说：叶群同志说得对！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我们在坐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

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

毛泽东在卧室里说：你们就照总理讲的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同时附了此信。〕

主席：

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周恩来与陈毅谈话

陈毅说：真没有想到主席会得出这样的！我们是在党的生活会上提意见，这可不是搞阴谋呀！我不怕，大不了成为刘少奇！他们不就是让我低头写检查吗？为了大局，我写检查。我真没有想到，江青还有这么大的能耐，竟使整个中国都按她的意志转起来了。没想到，说了几句心里话，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谢富治、李先念与谭震林谈话

谭震林说：林副主席应该站出来替我说说话嘛，我谭震林革命四十多年，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毛主席！我好糊涂啊！我错误地理解了毛主席批评伯达和江青的指示，以为下一步是反左，没想到反来反去，反到自己头上了，我太糊涂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啊。谁说我不写检查来，我写也是向毛主席写，不能向其他人写。我三天之内就可以交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叶剑英、李先念与徐向前谈话

徐向前说：我如果是张国焘的人，早在长征时期就跟他走了，还等到现在干什么？请你们汇报主席，我就是说了那么些话，要杀要剐随便，我不在乎。反正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这么大，我早已心满意足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宣布：上海市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对参加北京市革命师生军政训练的部队指战员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对“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进行了批评和驳斥。

这次会议印发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谭震林等人提出的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文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陶铸亲自抓，李富春亲自主持，谭震林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主张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烧。文件出来以后，送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样做打击面太宽了。把文件退了回去。周恩来阅后又送到中央文革，他在上面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值班的关锋认为：这个文件不好。王力、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也同意

关锋的意见。由这五个署名的文件，经过江青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批字，退给了文革小组。)

还印发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在连队搞“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些文件。

二月二十六日，是会议最紧张的一次。

康生说：二月十六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污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要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们奉陪到底！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政治家，我就是学她。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势这有什么不好？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藉口保护老干部，实际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藉口保护高干子弟，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陈毅说：江青同志，我没有否定延安整风！

江青说：陈老总，你别说话不算数！

陈毅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个话！

叶剑英说：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是怎样向主席汇报的，我认为向主席汇报我们的言论，应该经过核对材料，以防汇报错，甚至走了原样，歪曲了本来意思。

陈毅说：是应该核对一下，我要求核对材料。

周恩来要王力念材料：陈毅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是起劲地拥护斯大林，到后来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明显吗？刘少奇在延安时不是也大唱毛主席的赞歌吗？到后来又怎么样呢？你别看现在有人拥护毛主席，将来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陈毅说：这段话我不记得说过请给我删掉吧，我好像没说。

周恩来说：不要改了，陈老总你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要改了。

谢富治说：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狠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讲过的话可以不认帐，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说：同志们，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了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在青海，有个副司令员叫赵永夫，大搞反革命的夺权，他非法拘禁青海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操纵保守势力，冲击已经被革命派夺了权的青海日报，对青海八一八革命派事先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制造了二月二十三日的事件。这件事是谁支持的？

叶剑英说：是我。我支持赵永夫，称赞他们打得好！我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的！

江青问：什么命令？谁的命令？

叶剑英说：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这个命令是毛主席批准照发的。授予了军队在遭到右派分子的冲击时，可以开枪。

江青说：你这是镇压革命派！现在四川李井泉的死党，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制造所谓二月镇反运动，你也知道吗？

叶剑英说：是我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二月十六日公开信，我主张镇压一切敢于冲击军队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统统取缔。

江青说：他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十八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屈你们！

周恩来说：很快，我们再召集一次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会，专门研究一下军队支左中的问题，解决各地发生的情况。

关锋说：在内蒙，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之流，打击革命干部，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很怵目惊心，当然，青海、四川的问题就更典型了。现在问题很清楚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有后台的，有背景的。总后台就在上头。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这两类人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说：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江青说：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嚣张，又是拍桌子，又叫着号，你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什么话都摆在桌子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

叶剑英说：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说：难道你只是脾气、习惯吗？你的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有人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的。当时叶群、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李富春说：我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江青二位同志的指示是我向其他副总理传达的，如果传达错了，一切罪名我来顶，其他同志没有责任。对中央文革的许多作法，大家不满意，有看法，许多议论都是在我家里说的。

周恩来说：你做的结果是发展到这一步，使主席非常生气。你们都没有吃透主席的思想，都是凭着自己的脑袋想当然，这样还能不犯错误吗？中央文革就那

么几个人，管理全国这么多事，作了那么多好事，即使出一点偏差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们就兴灾乐祸！这就导致你们要犯错误。当然我也有错误，也应该检讨。对二月十六日的会议我没有及时地引导好，这是不可原谅的。事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没有把它当回事，只认为是发了发牢骚。

江青说：这是动摇啊！

周恩来说：是迟钝，我在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也迟钝了。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反正有一条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不管我周恩来也好，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好，我们都是绝对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们坚决听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令，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的关于天津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材料上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

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第二方面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极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

三、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用他们的思想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 100 余人。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一些人更加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情绪。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说：赵永夫打得好。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地方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

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什么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煽起了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有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肖华怒气冲冲地说：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

会场立刻哗然。

叶剑英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

这次会议情况迅速反映到党中央。中央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叶剑英在会议上“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随即迅速采取措施扭转会议的方向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2 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批评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

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

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点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毛泽东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四、“三结合”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杜绝将密码电报和秘密文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张贴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

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科研设计单位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肖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三个问题，继续抓四好连队运动，抓好部队的活思想。

第四个问题。加强组织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

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肖华对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马场进行正面教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说：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总后勤部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人员供应问题的通知

四、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

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讲讲刘、邓路线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关锋：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

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退江青。 可以，照办。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关锋在空军司令部谈话纪要

空政文工团的事情，空军做的没有错，是正确的，在路线上完全对。真正的坏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要不要逮捕？有嫌疑的，要不要拘留？是要的。在十条以后，还是要的。十条和八条是一致的，不能用十条来破坏八条。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搞了一些片面性东西，受人利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徐立清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时的讲话

四月十四日，你们开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你们这个会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会议也有些缺点，你们的大方

向是正确的。在会议上，他们来冲你们的会，特别是打你们的人，砸了你们的东
西，这一些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还把政治部的章子，保险柜砸开把一些公
章抢走了，这些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找《红联》的负责人，要他们把抢走
你们的东归还你们。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经济战线上，我认为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
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
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
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一
九五五年至五七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
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
彻底地、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不少的错
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高等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决
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
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
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彪对肖华同志口述的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电话指示的电话记录

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次发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以后，请主席和同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

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高等军事学院军管会召集该院两派代表会议纪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曼村与海军文工团军乐队代表的谈话

海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阵营是比较清楚的。据我所了解，一边是以李王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以三反分子苏振华和他一小撮狐群狗党为代表的黑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聂荣臻：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叶剑英：

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一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

二、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

六、军管是过渡。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

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至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的讲话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权限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谈谭震林问题

问：现在外面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人不是要打倒谭震林？他今天还参加会来了！毛主席真这样说过吗？

谢：没有这么回事，我参加会议没有听见主席这么说过，这是有人造谣！

问：今后农林口的问题怎么搞？谭震林的问题怎么搞？

五、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揭露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作了辩驳。

会后不久，一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 81 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有人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在李先念检讨大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认为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同志们应该欢迎李先念同志的自我批评，同时希望李先念今后多到各部里面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随时发现、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很好的几句话。今天的会证明我们经过半年多的奋斗以求的有了初步的结果，但这仅仅是开始。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是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如同主席所说的“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正因为这样，先念的检查是推迟了，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喽。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同意召开批斗谭震林大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李先念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打倒姚依林大会”上的讲话

我坚决支持打倒姚依林大会的召开。

我也是犯了错误的，以前你们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打倒李先念方向也是正确的，因为我犯了错误嘛！希望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批评。

我的错误，你们不要因为我而分两派，如果因为我分两派，我心里不安，感到惭愧。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周总理谈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风

今年一月由上海工人阶级为首，联合了革命群众组织展开向上海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经伟大领袖批准，传播到全国，这样就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更进一步唤起了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的觉悟，认识到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展开和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就形成了全国一月革命的高潮。当然，革

命发展高涨了，那么，阻碍革命不甘心失败的分子就要出来了。走资派不甘心失败，暗中操纵，就出现了二月逆流。又经过伟大领袖指出，经中央文革努力击退了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时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至五点半，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我们要提高警惕。民院抗大，东方红两派后面都有坏人挑动，钢院的也要注意：是否有坏人？有坏人就自己起来抓嘛！不要只抓对方的嘛！天津大联筹在陈伯达讲话以后就自己起来抓了。安徽的，江青 9 月 5 日讲话后，他们一天晚上自己就把双方的坏人抓出来了。这样就很好，不要别人抓，各派抓各派的。

这次周总理处理的农口秦化龙问题就处理得很好。本来谭震林讲了秦化龙是坏人以后，保守派就被扶植起来了，把革命派压下去了。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受到了批判，批谭是完全应该的，当时他们也提出为秦化龙翻案。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现在证明秦化龙确实是叛徒，在新疆监狱里叛变了，他们就把他揪出来了，这次秦化龙实际上就是曾经要为秦化龙翻案的这一派揪出来的，当然那一派也参加了一点，但主要还是这一派揪出来的。这就很好嘛！现在就不能把保过秦的那一派压下去而让保谭的那一派翻过来，那个保谭的案不能翻，这个作法是完全对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农口《革联》批准斗争谭震林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发生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是继刘、邓、陶事件之后，在一月革命高潮中发生的，又一个反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迄今官方未公布过正式文件。这里采取的资料是从民间著述中摘取的。它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参考：一是，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版的《叶剑英传》、《聂荣臻传》、《徐向前传》的有关论述；二是，二

0 一一年七月，王广宇的文章《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中指出：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这些材料都收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但历史证明：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并不是仅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作法提出强烈批评，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对他们的批评，称之为“二月逆流”是完全正确的。

所谓“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指“大闹怀仁堂”这一件事，而是包括从一月下旬开始至三月，叶剑英等人利用手中权力，支持、指挥一些军区，把一些军内外的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大规模地捕人，甚至开枪屠杀群众。

1 月 2 8 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2、3 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1 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2 月 5 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

在湖南，2 月 4 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 2 月 5 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2 月 7 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头上万人。

在湖北，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3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

在吉林，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3月4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8）

在四川，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

在福建，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3月9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3月22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8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14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才基本上遏止了这股逆流在全国的漫延。七月，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扭转了这一趋势。

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泽东也留有余地。毛泽东要江青去看望陈毅。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让他们于“五一”上天安门城楼。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对这个事件作了淡化处理，意在团结一批老同志共同做好工作。

实践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7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8月20日修改

第四章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

第二节 两种反动思潮——“联动”的“血统论”和遇罗克的“出身论”

壹、本节概述

一、“联动”分子从反动血统论走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大闹怀仁堂”活动中：

（一）“联合行动委员会”政治上走向反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西纠一小撮人乘王明瑚（王明瑚是六中俄语教师，平时工作认真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入运动。对于“红卫兵”一小撮人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值班的机会将王非法绑架到“劳改所”。

他们抢走了王明瑚的手表，将他打倒在墙角，用脚猛踢，抓着头发往墙上撞来撞去，发狂地向王的头上、身上抛唱片。王明瑚小腿被踢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们动用了“坐飞机”的酷刑，几个暴徒揪住王的四肢向上抛，使之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样抛了三、四次之多。然后将王上衣剥光，用钢丝鞭猛抽一百余下，使其昏过去。他们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小子和我们干部子弟做对的下场。”朱支前手还拿大姆指粗的钢筋抽打王明瑚，甚至用刀吹伤王的前额，鲜血喷出老远。

经过这几番非人的折磨以后，王明瑚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但是那群歹徒们还让他劳动，叫他围着炉子跑，逼他举大砖头。

直到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首长来到六中、才使王明瑚出了虎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联动给清华井冈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 1966 年 11 月 15 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八一”学校联动分子的一封恐吓信，全文如下：

八一纵队的儿子们：

你们小心点！三天之内爷爷们抄你们，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康小会，兰州小流氓李东京，北京小回子颜小光、北京大胖子邓国庆、天津小病包装小红、新疆小四眼以及你们的狐群狗党们，等着挨刀吧！下面将“八?一”纵队小子们形容如下：

颜小光：大肥猪；康小会：小狐狸；

韩北宁：大狗熊 李旦生：白面蛋白质

李乃民：日本人 丘志全：日本良人。

哈！哈！哈！哈！

山本太郎特务队（手印）

爷爷队（手印）

爸爸队（手印）

杀康小会战斗队（手印）

杀李旦生战斗队（手印）

杀李乃民战斗队（手印）

17 /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联动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7434 代号 发 1008 号

致北京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

狗崽子、臭流氓、王八蛋们，听你们爷爷发话：

你们八月份躲在家里，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犯错误时，你们却大打出手，抓住错误猛攻猛打，妄想整垮你们的祖师爷（老红卫兵）你们口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却妄想翻天，还想当造反派，夺红五类的大权，放你妈的个屁吧！

凭着你们这些狗王八蛋掌权，中国好不了。总有一天你红卫兵爷爷要掌权的！混蛋们，老实听着，你们口说造反派心想翻天，想为你地主老子翻案！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对老红卫兵你的爷爷你的祖宗如此无理放肆，还是回家造你老子的反去吧！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以你们老子的下场为戒，你们炮轰李钟奇转移斗争大方向，否认红卫兵大方向，真是混帐之极！

如果你们胆敢继续与红大爷作对，小心狗头！

坚决镇压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狗崽子！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万岁！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岿然不动！

砸碎狗崽子的狗头！

狗崽子休狂！

红五类万岁！

钢气节，英雄胆，酒热血，捍江山

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老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后，联动根本不理睬，进行打、砸、抢。

钢院附中联动分子把贴在校内的《通告》全部撕毁，并在上面加指示。

北大联动分子指着《通告》说：“这他妈没用，对三司就得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大附中联动分子砸了新北大校刊编辑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继“劳改所”之后，六中“红卫兵”中的那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砍变节”声称：“要除掉叛变者”。

当天黄昏就由他们的一个打手，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烈士子弟，现已被公安局逮捕）动手，对正要揭发西纠的革命学生耿小西进行公开行刺，耿身中八刀，其中一刀刺伤肺叶；他们本来是想一刀致死的，但因杀人者缺乏经验，连刺脖子两刀都未中要害，以后便乱扎起来，这样，耿小西才又捡得一条性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联动闯进了民族饭店，乱抄乱砸，并殴打了坚持斗争的北航红旗战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分子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人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公安人员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释放出来后，他们说公安部乱抓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会。

由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

彭小蒙临场指挥，她对清华附中的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

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

在彭，宫扇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人（其中一个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嘶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彭小蒙奔上台对刚刚念完口号的马X X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

12?26 大会上，联动干将李蜀龙抛出了大毒草《年终话三司》污蔑三司是“捕打”、“随意抓人”，是“压迫有理，抓人有理。”狂叫：“三司，三司，于若惹得天怒，人怒，兔子尾巴，秋后蚂蚱。”

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口号是：

1.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这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4.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5.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6. 活着干，死了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人、强占了公安部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工作人员，迫使这些人离开办公室。

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人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人的头部。

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

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人，又都从视窗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人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士，该女士当场昏倒，而他们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

这帮人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

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

第二天，即 29 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人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们才撤走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人，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士，踢伤一个男士，经公安部工作人员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康生对崔子明等人两封信的批语

康生批语指出：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评。我们对于任何批评，不管是对的或是不对的，都愿倾听。但是你们的来信，一不是反映情况，二不是提出意见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伪装成提意见进行商讨的样子来，1、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2、歪曲两条路线的斗争。3、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4、反对文革小组和陈伯达、江青。5、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广大群众实行大民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二）拿刀子捅人的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 康生 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座谈纪要

江青说：

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更何况老子也不一定革命。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这是流寇！法西斯罗！希特勒！（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影响极坏。）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四旧呢！提出对联的人，父亲职位高一点，是个大官，应该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对立罗！（那对联）我一开始就反对。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红卫兵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不能说修正主义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

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象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

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吗？

江青：谭力夫决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谭、方都是小人物。你们要批判王任重，他拖着你们犯错误，王任重给你们搞了，王这个人糟得要死，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背着我们小组另搞一套，他得停职反省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人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

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标语。

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

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人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惶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数百名联动分子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旗帜闯入北京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X X万岁！”等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把他们抓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又一批联动分子飞车过西单狂呼“打倒★★★，保卫刘X X”口号。并散发同一内容传单。

一月六日，联动砸了农大附中“八?一八”井冈山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北大附中联动分子X X的一封信。全文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

女儿 1.7 晚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疯狂大喊“打倒三司”、“打倒江 X”。

他们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战士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砸了北大附中井岗山。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康生、江青、周总理等中央首长谈联动会

康生同志：联动会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借此，欺骗群众，“三条”（按：“三条”是指联委会等造谣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也没有。中央文革怎样？我们支持他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逮捕他们。

江青同志：现在有个几百人的联动会，他们炮轰谢富治，包围公安部，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小头头应该抓起来，实行专政。他们号称三千人，里头有西纠、海纠、东纠。冒名周总理的指示。他们也是可以分化瓦解的，要把他们的头头目抓起来，专政。他们说抓了一百多，其实才抓了九个，对他们专政，是法律制裁。

周总理：他们联合行动委员会造些谣言，首先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又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样，都是胡说八道。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载 1967 年 1 月 18 日《中学文革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力威本禹接见清华附中革命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联动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强烈的抗议”，扬言要“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

联动狂呼：“三司是江 X 的干儿子”、“中央文革就是三司的后台”、“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口号。

他们到处张贴“打倒三司”、“油煎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决非好汉，全是混蛋王八蛋”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联动”于二十八中再次纠集五、六百名人，企图第 6 次冲公安部。

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 X”，“打倒周 X X”，“打倒陈 X X”、“刘 X X 万岁”等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当日开始，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摧毁了设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联动据点。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与

联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念四期社论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话）这个革命小将是指所有的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现在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否认一切是一种错误思潮。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这里讲革命小将犯了些错误，不是讲的“联动”犯的那个错误，和那个相差九万八千里。这里讲的错误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这根本连不上呀！不是那个意思（指一小撮顽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断：他们要翻身了），完全错了！我们都可以犯错误嘛，你们怎么不能犯错误？但是不是指的“联动”，根本不是那回事。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把“联动”挖掉。提高警惕。他们是一小撮。他们为什么顽抗？有新的情况它就反扑，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后台老板。它代表了一个反动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须坚决和它斗争。必须跟他们大干。要警惕他们，把他们击败。但要记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少数头头儿专政，作艰苦斗争，从政治、组织、思想把他们彻底批透批倒。在斗争中要执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争取，批判这个思潮，对多数采取瓦解争取政策。对四期社论他们歪曲，他们反对革命组织，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同谁斗争。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江青说：对于“联动”这个反动组织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对大多数进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组织严密，是有后台的。他们是对你们的，也是对我们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文革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谢富治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们，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

陈人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

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目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江青、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所谓“人民的敌人”而忧心如焚。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他们得知父亲仍然是一个兵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可以放了我。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他们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我被送回公安部，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后回家的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事做了批示。”

1977年他受过审查，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却也毕竟不同于自始至终受“文革”残酷迫害的老革命。其实，按照当时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变得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

父亲上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父亲到弥留之际，她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摘自陈人康著《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农大附中联动分子贴出了“拥护刘X X当国家主席”的标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反动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高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口号。

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

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

凡是穿白球鞋没系带的，头发长的，穿翻领大衣的都被称为“流氓”残遭毒打。

有四个职工在大民餐厅吃饭，无缘无故被他们拖出，剥去鞋子扔进湖里，一顿毒打，当他们知道这几位工人抄过联动后，他们便打得更凶，可见他们打流氓是名，行阶级报复是实。

联动分子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

钢院钢铁公社当场抓住了正在行凶的两个人。红代会作战部、体院、新北大、钢院、矿院、农大等战士纷纷闻讯赶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歼战，经过二小时战斗，抓住首恶分子一百二十名，搜出匕首十把，带勾钢鞭一把，打人的宽皮带数十根，步枪子弹二发、大批传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谢富治等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谢富治讲话：

中学运动的关键，同联动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打胜，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把联动思潮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联动打击瓦解，联动的头头儿还没有完全打败，他们还在活动；同时要把联动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刘格平陈永贵参观“联动罪行展览”谈话纪要

陈永贵说：“我们那儿也有‘联动’，逮捕了四个，我们送到了太原。你们（指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没有了解农村基层干部被‘联动’迫害得啥样！他们下

去的名义也叫红卫兵，反正红袖章很多，可是不干正事。他们（指联动）说四、五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北京，砸北京。我们贫下中农哪里让？他们和坏分子结合，和地富反坏右勾勾搭搭，借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搞武斗。把权夺在他们手里怎么成！”

（三）毛泽东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

江青说：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

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吗？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吗！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院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

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

（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

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

被关押（扣留）的 140 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说：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

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周总理讲话：

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

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

7434 密字 3452

最紧急通告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 4 月 24 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

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 1967. 4 月 X 日

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狗崽子们休想翻天，你们“五一”之前有好瞧的，只不定哪天将要砸烂你们的老窝。哈哈……

你的爷爷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 7431 密字 3452（注意此为暗号！）

（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联动分子在打给“八·一”学校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狂叫：“中央文革有什么了不起！”“打倒江X”“刘XX你们拉下得下马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个过路工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被联动分子殴打，借口是该工人衣领翻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打得鲜血淋淋。

同晚安定门外又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后投入“青年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刺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刺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说：“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四）特色社会中批判血统论、联动组织的余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谭力夫的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对联”一出现，江青、陈伯达首先煽动和“支持”，把事态引入歧途，后来更歪曲、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并把我们整顿红卫兵纪律，纠正、制止某些过头行为，指责为“右倾保守”、“消防灭火”。当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种倾向时，他们又把责任转嫁给无辜的青少年，借题发挥，无限上纲。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在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林彪、“四人帮”当真是批我这个无名小卒吗？不，他们是用“血统论”这根棒子，一头打孩子，一头打老子。一人受害，九族连坐，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现在，林彪、“四人帮”垮台了，真正推行反动“血统论”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了。

（谭力夫倒打一耙，是有人人指使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章云的文章：《斥“血统论”》宣扬“血统论”，是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的一个重要内容。

（颠倒黑白！）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胡思升的文章：《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

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

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

“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年青一代。

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按照胡思升的逻辑是不是要把阶级分析统统否定了？）

宋永毅：《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1966年6月，“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

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1966年8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

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1966年11月以后，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

联动于1967年1月1日颁发了著名的003通告。

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

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一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六省市”的革干子弟。

1967年1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这个民运分子也与其他民运分子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他对“联动”表现出的对文革的严重不满、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表现出严重不满，称赞为“是一些宝贵的思考”，称赞少数联动分子政治上走入歧途是“成熟”、“”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余樵：历史可以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2002年第2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

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查了多少人，查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

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

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永远战士：“联动”覆灭记

-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 七、元帅的愤怒
 - 八、揭发的真相
 -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 十、“红八月”大事记
 -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 十五、逮捕谭力夫
 -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 十七、“十二月党人”
 - 十八、灭顶之灾
 -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 后记 顽主天下

二、遇罗克的《出身论》从反对阶级划分走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一）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打着批判《血统论》的幌子反对阶级论

1, 《出身论》的要害在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说成是新的“种姓制度”

《中学文革报》编者按：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出身论》之一：《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

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

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

今天的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

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

学校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

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出身论》之二：《谈“纯”》

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

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 四．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

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

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反驳步曙明

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简直胡扯！

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站在革命阶级立场上对《出身论》的评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作战组、宣传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第三研究小组：《唯出身论》和《出身论》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社会影响、家庭影响，及两者关系

二、关于重在表现的问题

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出身论》的作者，虽然谈的是阶级出身，却不做真正的阶级分析，只是写了一些表面的个别现象，就荒谬地下结论说：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而否定阶级对一个人的影响。

《出身论》还有很迷惑人的一面，他们为了迷惑别人，唤起反动阶级的阶级仇恨，不惜用了大量篇幅谈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女如何受害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出身论》的作者们：难道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地主，资本家血腥迫害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罄竹难书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当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的时候，分过什么老子，儿子，成份，出身吗？百分之百的工农及其子女，不要说上大学的绝无仅有，能上小学的又有多少呢？他们在政治上有说话权利，当上什么官的有没有呢？如今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有几个上不起小学，中学，大学的？工农子女到如今上小学有困难的又有多少？

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就要求人人平等，甚至在要求平等的背后，仍然想像解放前那样，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才不算受害，这乃是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十足的表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二）一个真实的遇罗克

1, 遇罗克的家庭出身和主要经历

遇罗克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执行，年仅二十七岁。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是私营企业主，在“三反”“五反”中遇崇基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是贪污嫌疑对象，被关押、逮捕，母

亲就要受到隔离审查。在反右派中遇崇基说：“人和人，冷冰冰”等等，被打成右派，母亲王秋琳（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也被划成右派。遇崇基劳改。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

1960年夏末，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未被取录。

1961年春节前夕，他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申请被批准了。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遇罗克就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遇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征兵开始了。遇罗克又立即报名。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

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与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

1964年初，他回城，几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在一所小学代课。

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

1964年8月，他进入工厂当工人。

2，从遇罗克的日记中反映出的政治立场

1966年1月2日，他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主题批判近来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966年1月27日，他写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的。”。

1966年1月29日，他写道：“今天，则过份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

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6日，他对陈伯达颂扬毛泽东不满，他写道：“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1966年2月15日，他写道：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1966年6月4日，他写道：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1966年7月29日，他写道：所谓当权派云云，亦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行动起来？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三）遇罗克涉嫌刑事案件

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搞串联，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把手榴弹到香山埋了。

1967 年下半年，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遇罗克被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

接着又把对遇罗克的调查重点转到“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是否构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问题上。

196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1968 年 1 月 1 日，谢富治批了“同意”两个字。

1968 年 1 月 5 日，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的判决书，有这样三条罪名：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197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联动及反动的“血统论”

谭震林说：就算这些老干部有问题，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要挨整？现在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

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联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央是怎样处理“联动”问题的？

1966年6月，“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

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它一开始就遭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劝阻。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是血统论的推广期。“血统论”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走资派、保守派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同时，一批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纠察队”逐渐变成保护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1966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

1966年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告正式成立。并提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1967年1月1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发表003号通告，宣称：一九六〇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它要加以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为副主席的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文革是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它要加以粉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制度，它要加以取缔；各级造反组织都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产生的，它要加以打倒。这就充分证明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反动组织。

由于他们大搞打、砸、抢、抓、杀，攻击革命组织，残害革命群众，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一些干坏事的分子被扭送到公安机关，实行治安拘留。

1967年4月，北京市被公安机关拘留的140名联动分子，经过教育以后全部释放。

1968年以后，这些人同广大知识青年一道，下放到工厂、农村、部队经受锻炼。

1976年以后，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二、关于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

遇罗克的判决书及有关档案、平反书及其档案，人们都无法看到。估计很可能是“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一条罪名证据不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遇罗克以此为主要根据判处死刑，就是一桩冤案了。

这桩冤案的形成当然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但也并非如某些人说的是“四人帮”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而是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法院审判，并经过中央领导人批准的（宋永毅说：关于遇罗克之死，有些高干子女说，处死遇罗克是有关的中央首长批示的，是位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长。数一数当时中央里出身不好的有周恩来、康生、江青……，而这些高干子弟向我暗示，是在出身问题上很计较的那一位，可能是谁大家都知道了，他批示枪毙遇罗克。我们假设他们说的是真的，当他在写下枪毙遇罗克的指示时候，他已经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因为遇罗克讲出来的话对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应该是更容易接受的常识，对不对？无论这个人是谁——《民主中国》1999年6月号）。可见对个案件的慎重。

同时，不能因为遇罗克判处死刑是一桩冤案，就把遇罗克的《出身论》以及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都说成是正确的。

下面是两个民运分子对遇罗克及其《出身论》的评价：

宋永毅：《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对象——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

作者“对现存制度‘无比优越性’的肯定”，恐怕更多的是遇罗克行文时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至于他大量引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语录，在更切近实际的意义上，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和当时流行的“打著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已。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他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

《出身论》揭露了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

这个宋永毅非常可爱！他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反动本质以及遇罗克的真实政治面貌，清楚地揭露出来了。这个民运分子故意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不平等。其实，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的不平等！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中难道说存在过什么不同出身的人有平等的选择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吗？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由于阶级还没有消灭、由于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个人分工的差别仍然存在，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平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剥削制度、剥削阶级！

郑也夫：读《遇罗克》断想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直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

这个郑也夫也坦白得可爱。他把遇罗克的政治、阶级本质暴露无遗：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份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

2007年9月13日初稿

2011年8月24日修改

第四章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第三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日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

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约2000人，进入汽车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车二团的掌权派请求独立团支援。独立团派了92名指战员到汽车二团。

1月26日零时，双方开枪，造成5死6伤。

1月26日，农八师将一部分部队调进师部，对要求进入师部的造反派进行武装阻拦，在冲突中打死2人，伤27人。

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进行枪战。

这一天，共打死24人，打伤74人。

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

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

总理：你们冲进过新疆军区，没有引起什么问题，这很好。现在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应该以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不要被苏修利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我们的军队在，敌人是不会翻天的。不要这也怀疑那也怀疑的，毛主席有这样的信心，对你们这样信任。你们应该对中央军委有起码的信任，第一，新疆要把军队稳住，新疆这么多问题，先抽出一条来，什么应爱护？解放军嘛！

总理：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头，我立即起草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止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查组去那里调查，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

总理：12.19 绝食，停工是全出于激愤，可以理解。责任归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但不提倡。

你们回去着重宣传我们这几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石河子的指示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

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八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

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

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各师、团（场）、矿、企业事业单位均应成立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并受上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群众可以在本连队（车间）和团以上机关的本部（处）建制内建立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文艺团体、科研部门和医疗单位，一律按照原建制搞好本学校、本团体、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干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生产建设兵团所有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及全体支边青年一律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所在单位进行串连，不外出串连；有生产、工作任务的单位，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生产建设兵团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批判张仲瀚总结会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这个会议是开得好的，这个会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解决了生产兵团的关键性问题，这是一场夺权斗争，这场夺权斗争不只是表现在这个会议上，几个月来表现在生产兵团的各个方面，表现在许多事件上，一直反映到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相当激烈尖锐，我们经过这次会议，关键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问题：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

么健康。

第四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要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

第五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来说，大大落后于客观的需要，现在更加证明了，揭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小集团。

第六个问题：夺权的斗争，取得初步的胜利，还要继续，这个继续不是一切都打倒，区别两类矛盾。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军区支持的一派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不让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参加。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红二司等组织开了一个三万人大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与新疆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记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传达总理同新疆革命造反派来京代表谈话要点

〔注：此件为新疆军区文革办公室魏学武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九时五分，同全军文革办公室蒋培国通电话核对的。〕

一、新疆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但要与石河子事件、自治区党委内部斗争划清界限。

二、你们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他已经回到乌鲁木齐准备检讨，并且准备找你们谈谈。

三、军管单位除机要部门外，根据规定，有的可以串连，进行四大，但不进行大串连。除军队方面另有规定外，地方上，各造反组织，不应解散。

四、所逮捕的人，除现行反革命外，其它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要全部释放。

五、对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事件，中央的看法不变，责任在兵团党委和自治区党委。

六、三月十二日的大会，不要二司及其他造反组织参加是错误的。听说三月

十九日的大会开的不错嘛！

贰、本节简论

新疆石河子事件是一个地方的又涉及到军队的流血事件。

这件事的发生，一方面是建设兵团的某些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派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群众不了解建设兵团的特殊性，按照一般地方的要求在兵团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活动。

中央处理这个事件的原则是：命令部队向群众开枪是不对的；但中央不支持群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所属单位搞夺权。

由此涉及到新疆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问题。新疆军区不支持造反派夺权，造反派就冲击军区，军区就抓造反派。这也是当时全国的基本形势。

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就是反复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说服军队领导人要支持左派、要正确对待群众；另一方面教育群众要拥护军队，要正确对待军队犯错误。但是，这个工作遇到的困难很大。一方面是军队方面有来自“二月逆流”的影响，一些犯错误的军队领导人很难转过弯来；另一方面是群众中既有来自极右方面的干扰，挑动群众斗群众，也有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完全按照对待地方走资派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军队领导干部犯错误。

军队、地方领导干部、群众都要在运动中经受考验、重新学习。

2011年9月1日修改

第四章第四节 内蒙的“二月黑风”

第四节 内蒙的“二月黑风”

壹、本节概述

一、“二月黑风”

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来，呼和浩特市“三司”、“八·一八”派的一些群众对内蒙军区有意见，组织人在军区门前静坐。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中午 12 点 15 分，内蒙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希望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出来辩论。

正在这时，军训部付部长柳青提着手枪跑出来。

韩桐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

接着，柳青便开了两枪。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体内。

抢救了五个多小时，到五点五十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 20 分钟已无法抢救。

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818”自己打的。

到医院以后，红卫军、革命战士的人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

此后，内蒙军区还宣布许多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許多人。

二、中央领导人调查内蒙古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总理：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付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内蒙古问题的指示

内蒙的问题很大。现在武斗很严重，要求四方面代表分别给家里做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肖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肖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拉萨、新疆甚至提到，叫解放军滚走，叫解放军掉转枪口。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

总理：从十八号零点起停止对骂，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登中央消息。如果 18 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查肇事者。双方暂时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你们应该给我一个礼拜的功夫，从下礼拜起我们几个人分头做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与呼和浩特市“三司”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给周总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电报。

电报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的传达“中央精神”的口号下，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具体标语、口号如下：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

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

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国务院给内蒙军区的复电

三月七日电悉，同意对X院实行军事管制，该院系XX技术试验单位。军管后要坚决按照中央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及军委二月一日、二月十六日两项规定贯彻执行。对 818 暂不急于宣布为反动组织，不忙取缔，先进行政治攻势，分化其组织，孤立其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待进一步暴露后，再相继逮捕法办。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十八号你们（军区）要开会，十七号报告，还要飞机，这是先斩后奏，不让我们解决问题。“818”可能打人，组织可能不纯，但是几千人的组织怎么能宣布为反革命？军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们要求的。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不能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站在什么立场？不让你们包围师范学院，你们不听。用这种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总理：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同志：叶总办公室曾告诉过他们不要调兵）。

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耍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

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李天佑与内蒙古师范学院代表谈话纪要

当晚李付总长、吴涛政委同调查团全体成员，机场军代表杨××乘车到了师院，一看院里院外都是人，有几万人，就知道气氛不对。并上了二楼。李付总长进院时又重申：你们要把辕门打开，跟平常一样，用不用给你们派一个排来保护？

杨永俊：我们一定马上把工事拆除，看明天的情况吧！

临走之前，李付总长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要马上向总理汇报，请你们代向没接见的同志问好！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军区有些人说，中央来的代表团有八个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李天佑来了刮了一股妖风。我们内蒙军区就是党，光听中央就是奴隶主义。王逸伦是左派书记等。

一个小学生说乌兰夫是黑帮，盟委的一个书记用枪对准小孩说：“再说枪毙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的学生也被捕了。

他们还说：“派调查团是总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谁知道周总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二师宣传科科长、公安厅军事代表赵金宝说：北京商谈是“重庆谈判”。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

一份材料说：“你谈你的，我夺我的。”“你谈完了，我也夺完了”。“中央文革干涉了我们”。

王良太说：“你有你的少数，我有我的多数，多数没有了，还有警卫营”。

总理说：你们继续错误地支持一派夺权，把一派压下去，你们说夺了权，中央就承认，根本不可能。你们在全国放了第一枪，打死了革命群众，已经查清了！怎么能说中央同意呢？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陈伯达康生与呼和浩特市农民代表周文孝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三、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1967.04.13；中发[67]126号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

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

六、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

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

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八、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讲话：

从一月下旬报社问题后，本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可以解决得很好，报社问题可以承认错误。刘昌开始先承认错误，可是回去一商量就变了。以后群众要求见刘昌，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见，问题就大了。

“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医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请愿也好，静坐也好、会见也好，无非还是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支持他们。他们相信军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嘛。军区认为他们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调和了。打了两发子弹，命中一发。韩桐同志他还以为军区会开枪嘛，这完全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之外。

二月五日以来，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犯下去，还说是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活动。

二月八日韩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内蒙调查韩桐牺牲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区打的，弹头也拿出来了，口径与军区子弹相同。人证物证都在了嘛。两方组织去调查了两天，检查时对四方都说清楚了。回来后，把帮助化验的女医生马上逮捕起来，他们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哪位女同志来了吗？（田光同志站起来）你身体好些吗？（答：好些！）押了多少天？（答：卅天）看！

化验一下就押了卅天，这是内务部长叫她干的，你们就拘留审问。不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就是让她说韩桐的死是学生打的，不是×区打的。这不是对抗中央吗？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付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

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两件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军区在京的六位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以来，由北京军区派的副司令员腾海青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副司令员肖应棠，作了检讨。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使腾海青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以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连续在铁路局军管会前三番五次的示威游行，大喊大叫，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中共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正确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晚，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新城宾馆，撕毁中央八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公安厅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晚，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师范学院，妄图打击革命左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呼和浩特市一些人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

五、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滕海清在呼和浩特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自四月十五日以来，连续举行旨在反对中央决定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利用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不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等正确口号，蛊惑人心；他们公开怀疑中央决定，说什么“中央决定违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内蒙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们大肆制造谣言，大喊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他们还恶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大量工人、贫下中农，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挑起事端，制造白色恐怖事件。例如四月十七日晚冲击新城宾馆，撕毁中央八条；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二十一日冲击公安厅；二十二日晚冲击师范学院，妄图打击革命左派；十六日以来连续在铁路局军管会前三番五次的示威游行，大喊大叫。他们为什么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中共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正确决定，掀起这股反革命逆流呢？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及以后的一些天，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的约三、四千人，到北京，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讲话被接见的有内蒙《无产者》方面到北京上访的数千人。

周恩来讲：

最近这些天，因为内蒙古，特别是呼和浩特来了一些人，到北京来，一直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叫我们来给你们开一个会（鼓掌，长时间呼口号）。因为这个会不是简单的一个会，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还是头一次。

同志们！（鼓掌）我现在把今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今天在会场上也发给大家了）再作一点解释（鼓掌）：

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商量起草，然后又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批准的（长时间的鼓掌，呼口号，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喂！静一静！（继续口号）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继续鼓掌）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再鼓掌了，同志们，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你们听我讲嘛！同志们（鼓掌），不要鼓掌，听我讲嘛！

这一次这个决定宣布以后，刚才刘华香同志宣读了他们五个同志的检讨，刘华香和吴涛同志留在这里开会，回去的肖应棠同志就站出来作了比较好的检讨，可是其他的还没有检讨。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这些军区的个别领导人认识错误是诚恳的，还是不诚恳的，我们还要看一看。所以，当时不用点名的方法。这也是给群众通过斗争和运动来鉴别他们（长时间呼口号。有人喊：“我们想念毛主席”！）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连续呼口号，有些人还在喊。康生同志插谈：不要捣乱！）同志们！同志们！（连续呼口号）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要听我讲，我们几个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托给你们讲的嘛（鼓掌）。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长时间呼口号），同志们！（继续呼口号，吹口哨）同志们！同志们！我再要求你们一次，你们是听话的吧！你们得听我讲完以后你们再喊口号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话：你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嘛！同志们，你

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众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还继续讲。因为今天内蒙古军区部队个别领导人站在错误的立场和错误的认识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这些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拿枪杆子执行反动路线，多危险嘛！全国第一个从军区里打出枪来的是内蒙古军区。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因为你们是保守组织，就认为不能教育了，我们要教育你们，所以你们到北京来，来这么多人，当然有人纵容你们来的，我们先不管，对你们这些人，我们要说清楚，只要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是支持你们革命的（鼓掌），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跟这些反动的头子，蒙蔽你们的头子要划清界线，应当把你们的头子揪出来（鼓掌）。你们看吧，今天这个会场上，我们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来召集这样大会，要给你们讲清道理，就有人吹哨子把你们搞走了，欺骗你们么，要把你们和中央隔离起来嘛（鼓掌），你们日夜想念毛主席，我们现在向你们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他都不让你们听（鼓掌），你们想想吹哨子的让你们走的对不对？（群众答：不对）是嘛，他们少数人就起哄，将来叫你们遭殃，他们在旁边看笑话。所以，我们说你们的组织犯了保守的错误，是受他们操纵的，一点不冤枉，你们并不清楚，给你们讲清楚，你们就会觉悟了（鼓掌，呼口号）。毛主席，林副主席让我们接见你们，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想革命的好意是好的，我们应该鼓励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跟那些反动的家伙，反动的头子划清界限（鼓掌），至于保守的组织呢，那还是可以革命嘛，你们只要跟欺骗你们的头子划清界限，你们这个组织还会存在么，我们这个决定上没有说要取缔你们这个组织，只要是群众组织我们不采取取缔的办法（鼓掌），允许你们在行动中改正你们的错误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二月五日发生，中央就找他们来开会，开了两个多月，中央解决过省市自治区的问题，最长的是这个地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批准了九个要求，大家共同承认了的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从自治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上层领导者嘴里说出来，周总理说话不算数，没有效了。

我们又派了一个正式调查团，就是由军委总参谋部副总长李天佑同志为组长、吴涛同志为副组长，去了九个人吧，九个人的代表团，去把师范学院被包围

的情况调查清楚，也到军区调查站在哪一方面，还调查河西公司的事情。这完全是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商定去作的。可是去了以后，从军区里头，从工农兵、无产者方面传出来，说九个人里头七八个人是右派。完全是造谣。因为那里头去了两个记者，两个记者就是在二月五日前后同情呼和浩特三司革命派的，他们也被捕了，这两个记者是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出去的。军区不管他们是中央派的记者，也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并且还把自己的笔记本，日记本都没收了。中央打电话去叫他们放，军区还派人押解到北京来。我们叫他们回去把记者接过来以后，在北京的，他们的军区一位副司令员黄厚同志；他们正在北京作为代表会谈这个问题，他就带这么几个笔记本一直不给我们，等到三月下旬了，三月大概是二十号左右，咱们见到这两位记者了，才知道黄厚还带十几本日记本，等我们问他才承认，才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目无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调查的情形，就是代表团调查的时候，他们居然听信王逸伦那一派的人，弄了几个人向李天佑同志来示威，使他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很好进行。调查回来以后，居然从军区，从无产者、工农兵那方面放出空气说，是谈判了，北京我们是找各方面代表来会谈，商量办法，解决问题嘛，他们说北京的谈判是重庆谈判。说在北京谈判那么拖，只要我们这个组织扩大了，夺了权了，中央他们只能够承认既成事实。这个两面派的态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

由北京军区派了一位副司令员腾海青同志赶到呼和浩特去，领导这个军区来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情况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后，就向军区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央这个八条，当时响应他的有军区的肖应棠，也是副司令员吧？作了检讨。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暧昧得很。因为这样使腾海青同志就很难行使职权，受到反中央八条决议的群众的围攻。现在把军区的门四门大开，不仅军区的军事人员，就是非军事人员也可以出出进进、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办公了，使腾海青无法执行职权。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开会以前和开会以后，有少数人公然地煽动一部分人退出会场，采取恶劣的手段，吹口哨，等等，这是公然的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公开的对抗党中央的行动，这是绝对不许可的。

为了让那些被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象，能够回头，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就打了电报给呼和浩特各个群众组织，批了三条。这个三条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康生同志讲话

呼和浩特有多少人在街上示威，甚至还有几个部队的几个人参加，三、四千人的同志跑到北京来，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

三月九日内蒙古军区来的电报。他的电报怎么说呢？他们说：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谓的传达“中央精神”的口号下，（中央精神打着括弧的）竟然制造谣言，进行一系列的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在大街上大量地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通告，发表声明，继续煽动群众反对解放军，妄图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他们讲的反动宣传，大量张贴标语，什么样的标语呢？在这个电报上公开地写着，我念念同志们听一听，什么标语。这种大幅标语内容：第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鼓掌）同志们鼓掌了，问问同志们，这是反动标语呢？还是革命标语？（群众：革命标语。“喊口号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好，第二，谁攻击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鼓掌）第三，誓死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鼓掌）第四，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笑鼓掌）第五，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掌）这样的革命标语，竟然使内蒙军区能够向军委发电报说这是反动宣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内蒙军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

总理讲话：今天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接见你们。这个会是上午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喊口号，我们想见毛主席。会场出现混乱）

江青同志：解放军要遵守纪律对不对？（众答：对。）

总理：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又喊口号：我们要见毛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打倒王铎、打倒高锦明）我们很清楚你们想念毛主席，我今天上午报告了毛主席，今天才开这个会。（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当讲到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

错误时，会场很混乱），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纪律，要听听中央的声音。

江青同志：你们要听总理讲吗！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总理接着解释中央决定。）

总理：内蒙位置很重要，那里发生的每个问题，苏修很快就知道，前一段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错捕了很多革命小将，他们生气勃勃，敢说敢干革命性很好，而被打成反革命。八条下来，没机会和他们讲，遇到了阻力，主要是王逸伦、王铎搞鬼，你们没责任，是无罪的。

江青同志：首先问你们好，我完全拥护总理对中央决定的解释，中央决定是经过中央讨论，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聂荣臻同志：中央对内蒙问题是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后决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审查批准的，是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最听党中央的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能产生对抗中央的行动，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像林副主席指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台下一片混乱，递条子，送材料，这时江青、叶群同志接送来的条子和材料）

叶群同志：同志们、战友们，首先我完全拥护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的讲话完全反映了我们的心情。我来之前，请示了林彪同志，他知道你们来了，知道你们都是想多作一些革命工作的，他嘱咐我向大家问好，向大家致敬。

在这次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肖华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

这次你们到北京来，除七十三位代表是我们请来的，还有自己来的十几位，起码这一点就不怎么讲纪律。你们在人大大会堂也看到了，有两千七百多人嘛！有许多是自己跑来的嘛，这就涣散了，这就不讲纪律了。这么多部队自由到北京来，还是第一次。前一阵呼市军区大院乱得象市场一样。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

总理：明天开一专车，你们都走，参谋长负责。又一次对你们考验。中央做了这样的忍耐，警卫营行为不能不使人想：口头上拥护八条，但是不回去。是受了外界影响。有人故意歪曲调查组，要重新审定“八条”。“八条”是中央决定，根本不能改嘛！根本不能重新审定嘛！还有的说要搞什么“新八条”，这简直就是捣乱，显然里面有坏人，就看你们来揭了。

总理：这些人自由的离开部队是犯法的，再不听话，一犯再犯，就是散兵游勇，北京卫戍区就要执行纪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内蒙来北京上访的军人仍有一部分人不肯回内蒙，分住在六个招待所共 788 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一些仍然滞留北京的军人，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

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

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 100 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

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

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

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

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

众：“好！”

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

在五月廿四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

至此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所策划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罪恶活动达到

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对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的批示
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五条命令，很好。内蒙古军区全体干部和战士应该坚决贯彻执行。

内蒙古军区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机关，部队应该恢复正常的革命秩序，所有人员应该坚守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的决定

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二十四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 788 人（其中 150 人）宣布禁止外出，要他们自己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为负责执行上述决定，由谢富治，xx，李天佑，郑维山，xxx五同志成立五

人小组，以谢富治同志为组长，xx同志为副组长。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王力与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周总理讲话：

你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吴涛同志挨打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
区党委的人没去，去更得挨打。

从 4 月 13 日宣布八条以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来了许多人到北京闹事，24 号达到高潮，军委开的会，李天佑参加了（李付总长），动手打人发展到高峰，有 100 多人冲上主席台，把吴涛打了半个多小时，让他签字，李天佑制止，他们不听，政治部付主任徐立清上来讲，他们也闹。刘昌掌握会场也不制止，王良太发言鼓掌很厉害，他发言很有煽动性，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好！”和中央唱反调，八百多人等不急了，不择手段，估计形势不足，闹事把他们暴露了。接见警卫营时说了，给他们以后的考验机会，把军队秩序建立起来。昨天我们决定采取五项措施，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已经说了，等待到一定程度。五项决定是经过林付主席的，经毛主席批准的，是根据内蒙形势采取的。（宣布了五条措施）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公开批判乌兰夫等人的意见
1967.05.28；中发 [67] 169 号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意你们关于在《内蒙古日报》上公开批判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的意见。

1. 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为了严肃军纪，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采取断然措施，作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军委批准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命令。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和措施，受到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现在内蒙古军区机关部队已恢复正常秩序，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好转。

贰、本节简论

内蒙军区是全国第一个向群众开枪的省军区。

打死了一个学生，比较起来，这件事并不大。问题在于内蒙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不肯承认错误，说这个学生不是军区的人开枪打死的，而是学生自己开枪打死的。中央派人调查、验尸，取得了证据。他们还把参加验尸的军区医生关起来。真是荒唐透顶！

从根本上来说，内蒙军区的一些领导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问题反映到中央以后，中央对他们反复进行教育，并作出了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更严重的错误在于，内蒙军区的一些领导人公然对抗中央的决定，操纵、煽动、支持、纵容几千军人到北京上访、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在中央首长接见的会议上起哄，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殴打内蒙军区政委及军委办事人员。拒不服从中央返回内蒙的命令。

这件事也深刻暴露了建国以来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山头主义、特权思想、军阀作风等等。

2011年9月2日修改

第四章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起草和刻写“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密令说：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号召“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到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巷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高师与张平化签订“望江楼协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发生武斗

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并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大搏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湘江风雷”叶卫东、李铁凡等人，批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约十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湘江风雷”与高师矛盾激化

双方在要不要召开“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分歧，导致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

湖南省军区明确支持“高司”，“湘江风雷”与高师之间的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浪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宣布为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

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

1月20日，省军区执行中央“1·20”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即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此后“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全军文革办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

后来，省军区承认抓了五千人，实际是，三天内，省军区统一部署，逮捕大小头目一万多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由“高司”等九个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头目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 12 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

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省军区在第二号通告中，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

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群众和曾经支持过“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长沙红中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三月底四月初，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

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

高师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省红联”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

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省军区方面为：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 7 人；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 5 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叶卫东提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指导思想

他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革命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红中会再封《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红中会”、“井冈山”等，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将其封闭。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成立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一号强大造反组织。“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章伯森、梁春阳领衔，一批领导干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成立。省委“永向东”的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湖南省最早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

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各县区机关也都成立了“永向东”

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长沙市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在河东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河东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别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

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19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次日谈判，汤建平等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回答：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说：走着瞧！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中央文革发来电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省会造反派组织在东风广场（现在东风路省体育局门前的广场）举行十万人大会，

成立绝食指挥部，组织人到省军区绝食示威。湘潭也出现类似情况。

三、中央处理湖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对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坚持高姿态，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并立即印发公告，广为宣传张贴。对于在押人犯，坚决按照广州军区党委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华国锋在湖南长沙发表的声明

〔华国锋原是湖南“长高司”的结合对象，是“工联”的对立面。中央点名要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到北京汇报。十九日在长沙上飞机前，华国锋发表了与以前的观点相反的声明，表示支持“工联”。声明大意如下。〕

一、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悔改，接受群众批判。

二、“长高司”、“红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充当了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先锋。

三、“工联”始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支持。

四、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五、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晚，各造反组织领导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死亡 10 人，负伤众多。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长沙武斗事件的急电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二十一点二十五分）

长沙工联：

关于长沙武斗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有分歧要用协商的办法解决。

二、请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协助湖南军区，制止武斗，并同军区一起参加双方的协商。

三、严禁打、砸、抢、抄、抓，杀人、放火凶手要拘留法办。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省军区发布了一个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周恩来在中央领导人听取温玉成汇报时关于“湘江风雷”问题的谈话

湖南“湘江风雷”几乎遍全省，跨行业，其头头确实很坏，有的是帮会。

（《周恩来年谱》）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等接见湖南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的谈话

请他们转告湖南两派：（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农民进城；（五）学好文件，搞好生产。这五条谁执行好，谁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周恩来年谱》）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叶卫东提出“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一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几十万人你们没有压垮，现在又起来了。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人，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而是上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指示

总理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华初谈“湘江风雷”

“湘江风雷”成立以后，发展很快，对当时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

用。“湘江风雷”的斗争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二·四”批示后大肆抓捕“湘江风雷”成员，甚至其它组织的人员也抓。

现在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因为湖老谭搞假报告向中央文革谎报军情。

说“湘江风雷”有枪枝，是假的，是展览馆的。

说“矿冶”事件打死了六个人，姓氏名谁？住在哪里？家属是何人？交出来！可是至今还未交出。

]说“湘江风雷”搞经济主义用了二千四百多万元，实际上全湖南的文化革命费用，包括红卫兵串连费用在内，才一千七百万多元。到“二·四”批示前，“湘江风雷”只用了二万七千多元。同一时期内，“高司”用了二万四千多元，还不包括学校内开支的费用。

至于打、砸、抢、抄，我们不提倡，但“湘江风雷”当时打砸的也只是“长保军”、“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等保皇组织。“高司”当时也不例外，也参与了。

讲到株洲“湘江风雷”的罪状就更可笑了。说什么他们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已经联系好了。还说准备了许许多个麻袋，装人往河里丢等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到井冈山的红卫兵很多，当地的粮食，蔬菜都供应不上，要湖南省委支持，省委没人管。株洲的“湘江风雷”知道后，马上答应援助。于是借了三千多个麻袋准备粮食、蔬菜，这是好事嘛！冒想到倒成了一条罪状。

说组织不纯。当然，由于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某个基层内有一些不纯也是不奇怪的。

但光凭这一点是不是就能全盘否定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呢？当然不能。在决策人里面，有很多干部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晚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二百余人到裕湘突然袭击；

“工联”派十一人到农村贴中央通知，被抓走了，后来派三个代表去谈判也被抓去了，有一人当时用马刀砍死了。又派人去追，农民架了机枪，打了一千多

发子弹，打了一夜。

南郊有冻肉厂等八个工厂停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工联”在火车北站抢走 12 支枪，抓走 11 名解放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下午，“高司武工队”的四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度行驶，投了手榴弹，并向湖南日报社打了枪。在北站抢走了两挺机枪，十三支步枪。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工联”占领了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高司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工联夺过去。抓走了七个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湖南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7.19 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戚本禹等。〕

这次接见主要谈铁路运输问题。

总理建议“铁路军管，可介入地方，两派都退出。”并说：“邮电局军管行不行？”

总理：“你们都相信（47 军），我让 47 军黎源同志跑一趟行不行？（答：行！工联派鼓掌）他们都相信你，请你跑一趟，你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不要搞武斗了。谁拥护就证明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铁路是全国的命脉，停车损失就很大，特别是对国际有影响。”“双方铁路组织不要介入地方，他们双方也就不互相斗。”“铁路无论如何不能中断，要以全局为重。”

总理：“湖南问题不统一，慢慢会统一的。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国有刘、邓，中南局有陶、王，湖南也有嘛，王延春不是双方都不同意吗，你们可以批判他。”

总理：“双方做好调查到底谁夺了枪，我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要说假话。你们青年人，要光明磊落，错了就改，允许你们犯错误，也允许你们改正错误，我要求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

生。”

总理：“再不要武斗了，不要抢枪了，看哪派做得好，就证明你们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马上恢复交通，不夺枪，不武斗，不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黎源同志的部队保护岳阳到衡阳的铁路，今后军管一律由 47 军派人，原来的军管单位有意见也可以派 47 军的人去补充或调换。”

（来源：摘自 67. 8. 14 《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黎原在长沙“工联”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工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我代表我们四十七军全军同志向你们学习！

昨天总理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首先恢复铁路运输，然后停止武斗。

关于铁路恢复交通运输问题，刚才胡勇同志讲，铁路造反派负责的同志讲，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可以恢复铁路运输。确实有许多困难，比如说，安全问题，有人打了我们的同志，抢了我们同志的枪。我们解放军一定能够一定保证安全。

当前急务之需，就是要停止武斗。第二步任务，就是要协助我们革命造反派，制止武斗。

总理今天要听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听火车复车，开出第一列车；第二个消息是我们长沙工联与红联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你们大肆捕人，相当严重，比湖北对“工总”抓人多。人民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三八作风，错了就改嘛！要痛痛快快的。

军队有错就改，不会打成带枪刘、邓路线。这口号我不赞成。章伯森、梁春阳你们支持造反派我赞成，但一定要抓赵永夫式的人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不同意，你们赞成吗？（章、梁答：赞成。）

“湘江风雷”问题中央给你们分担责任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湖南医学院发生武斗，死伤数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戚本禹对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的谈话

江西、湖北的情况，你们要研究一下，湖南造反派受压制，中央是知道的，中央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你们不要走错一步棋，走错以后，就不好办了，事情不要做得过火，过火就错了。四十七军是支左部队，造反派围医学院，四十七军有不同看法，你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保证交通（包括铁路、公路、航运）不要出问题，双方要停止武斗。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十一点多，二百多人冲进去马坡岭国家军火仓库，拿走三卡车军火。

五千多名各组织人员冲进省军区司令部，占领所有楼层，包括保密楼，军事档案和一组密码被拿走。后无法拿回。

医学院被围困，断水断电 6 天。

7 月 26 日，415 团 6 连驻地被造反派冲击，军火被抢，士兵受伤，副连长刘美展在队前试图劝说，派性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刘美展指挥部队干部战士卧倒，不准开枪还击，自己被击中右胸牺牲。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咄！恢复起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央的批示措词不当。坏头头要抓几个，不能把整个组织看成不好的。中央也没说取消他们组织咄！

红联派：他们说“红旗军”是造反派，要翻案！

工联派：“红旗军”就是造反派，就是要翻案！我们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总理：你们不要恢复那么多，不要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翻案，想把对方统统

压倒是不可能的。“湘江风雷”要恢复，但总有少数几个头头是坏的，有的组织不大纯，当然说整个组织不好是不对的。将来究竟怎么搞法？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跨行业的。“工联”已经很响亮了嘛！很有影响，应该把这面旗子举得高高的。别搞那么多，每个事都翻案，把对方都压下去，不可能。

今天又比十九号进了一步了，有了这个基础，就准备考虑怎么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搞大联合，不能这样长期无政府主义。

现在军区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是因为他犯了路线错误！

总理：今天下午军区再讨论一下，把错误检讨一下。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四十七军负起责任来。军委研究准备改组湖南军区，加强军区。你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

（总理站起来要走，叶卫东又一次指责“红联”派抓了人）

总理：叶卫东同志！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气量要大一点，刚有一点胜利，就骄傲起来，我很不放心！刚胜利一点，就把另一派压下去，他们就更要反抗！造反派么！就要像个造反派的像子！

（“红联”派代表说“工联”方面造了很多谣，要求总理单独接见）

总理：你们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了。你们是群众组织，就得像个群众组织的样子，我们承认你是群众组织嘛！第一次接见后，你们说我有倾向性（“红联”派站起来要辩驳），军区犯了路线错误，你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害者。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的检讨

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方向，犯了路线错误。我要改，坚决改，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二月四日以前上报中央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如矿院上报打坏一百多万元的东西，实际上不到二万元。当时说到矿院造反派有八万多人，我们上报一万多人，实际上只有三千多人，当时说打死三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说“湘江风雷”有枪，实际上是展览馆的病枪，“二·四”批示下来以后，因为我看不惯造反派，把革命群众当成敌人，又把造反派大大小小的负责人都看成是大大小小的头目，人太抓多了，革命小将当敌人抓了起来，有的关了四、五个月，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了，这是方向

路线错误，是极大的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搞肃流毒，错误更严重，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没有阶级分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肃来肃去，肃的是革命造反精神。

第三，支左工作也犯了严重错误。

第四，我们搞了“六·八”通令，更是错上加错。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郑波在湖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不管那边，发展快了，成份慢慢复杂起来。叶冬初同志你们发展快了，正赶上一月风暴夺权，夺权多数是对的。你们那里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官办的，解散了。“湘江风雷”也确实有不符合要求的行动，到京告状抢了几次车子。个别事件造反派可以劝说的。铁路要罢工，我们劝说了。军区的报告，多方面的反映，后来还有从其他方面的反映，我们中央几个同志决定的，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军区确有错误，军区在执行“二·四批示”时扩大了，抓人抓多了，后来肃流毒把相同观点的也搞了，问题更大。从“二·四批示”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我们察觉是逐步的，到六月份我们比较明确了，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察觉的。我表示了态，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表态的。

我们对军区的指示有错误，对军区我们要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不能完全怪军区。当然形成这个局面军区有责任。我们的批示影响了军区，军区本身也有责任。龙书金同志到广州也承认有错误，写了检讨，比较好，主席批了五条，将来印给你们参考。

在广州检讨的比较好，回到湖南是另一个空气，武装部、军分区影响很大，很多改的机会都失掉了。军区的错误与刘、邓路线不一样，刘、邓是有意的反毛泽东思想，提出反动路线的与执行反动路线的有差别。军区不同，军区的“三支”“两军”的任务很重，又没有经验。军区认错了，改了就算了，从爱护解放军出发，改了就行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谈对湖南的二·四批示

中午 12 时半至下午 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泽东说：今年 2 月 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同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高校的问题还是依靠他们内部左派起来革命，不要采取他们的办法去压他们。“高司”四五千游行反对总理，反对我们，我是小人物，不在话下，总理日夜操心，调查研究，为你们平反，他们反对总理，你们不管，只顾打内战。有相当多人受蒙蔽，你们要作争取工作，团结他们，分化他们。高校都是小将，犯错误可以原谅。对“高司”现在不宣布是保守组织，还是群众组织，少数头头是保守的，无非是蒙蔽了些群众。“高司”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一点好事没干，尽管他反对我，我不能说他一点好事没干。它是群众组织，你们能消灭吗？也许他们的革命不依靠你们，如果你们不采取正确政策的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戚本禹接见湖南“红联”代表谈话纪要

戚本禹同志说：好吧，今天我找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你们不要走“百

万雄师”的道路。

从很多迹象表明，你们越来越危险，湘潭地区，“高司”炮轰周总理和我，而且游行示威！这是极端错误的。炮轰我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炮轰周总理呢？！轰周总理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消息是广州军区打来了电话。

高司很多同学是好的，现在认识了错误。“二·四批示”我们有责任，军区有责任，“高司”广大同学是好的。现在中央担、军区担，如果你们坚持，那就有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

群众组织方面，发现有这个趋势，特别是军分区发枪，为什么不抢枪？从江西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造反派要求武装是正当的。今后按规定有组织的武装基干力量，毛主席有指示。但总不能因为要武装就抢枪，抢总是不对的。

借江西这个例子，告诉湖南的同志，由于分区发枪，调动农民，造反派要枪有理由。要肯定，因对他有压力。但象长沙，造反派占优势，在大批抢枪就不对了。长沙秩序很乱，有点无政府倾向，不要说的太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月七日，在马坡岭和工程兵学院，工联和湘江风雷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4 号

已阅，同意。

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

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电告黎原

湖南的七二七工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再说服不了，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由国防口军管小组粟裕处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

怎样控制局势？中心问题是让解放军站出来作支柱。这个不一致，分歧就大了。解放军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不过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能到处去揪。对解放军在支左中的一般错误应该谅解。如果坚持错误，成为一个时期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抵制，批判，也要注意区别对待。湖南军区的错误，应由刘子云、崔琳负主要责任。龙书金过去打仗勇敢，五月份在广州作了检讨，后受别人影响，错过了改正的机会。不要承认了错误，还一定要打倒。戚本禹同志原来不认识龙书金，听说他很能打仗，现在犯了错误，都很同情，这是阶级感情。如果把对解放军的基本信念动摇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解放军受到冲击，内部涣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两个问题。四十七军的枪、他们看守的仓库，都去抢，他们这样怎能作好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呢？

两个指挥部（指制止武斗指挥部和抗暴护厂指挥部）合成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其它的武装组织，要经过指挥部承认才算，游离的社会武装组织，要把枪支收回。本身也要清查一下。将来株洲、湘潭、衡阳都用这个办法。乱放枪的要缴了。

戚本禹：打死人要法办。

总理：这种乱，破坏阶级团结。

戚本禹：乱有阶级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

我说过，我们是要武装工人同志的，但是你们双方有分歧，发了枪，互相打起来，就不好了。产业工人是要武装的，机关里的也武装一下，双方的造反派都要武装，把“文攻武卫”拿过来放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四十七军参加。有任务时，由指挥部派任务。“长沙工人”的同志也武装一下，分给他任务，保卫工厂。学校里也可以。我们搞有组织的。这样社会上没有组织的，游离分子掌握的枪就可以收回来。你们先组织起来，编上番号，四十七军派同志去帮助训练。但是一定要搞好大联合。不然一发枪枝，自己打内战就麻烦了。我先同你们说好，要保证不打内战，发了枪，要四十七军派人指挥。

我说过几次了，既然双方大方向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共同奋斗，就要团结起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那不可能。我要求你们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你们之间总是想把你们的共同点找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挑出来。昨天会上，你们表现不良好，为“湘江风雷”说了几句，你们鼓掌就不热烈。

对待刘秀英那样的人，你们在昨天的会上，表现得不够好。你们不欢迎她，那一边(指“高司”)也反感她，这样就会长期对立。如果他发言之后，你们欢迎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工联”、“湘江风雷”不但不歧视她，不打她，反而保护她，帮助教育她，就好了。你们在北京开了这样长时间的会，水平提得不高啊！

昨天崔琳一出来就打，这是谁搞的？(几位代表汇报了当时情况)

他们这样搞不对。不要只想着捉人打人。捉人，打人有什么本事？！要搞批判才能触及灵魂。

吴自立、蔡爱卿这些野心家就是想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他想夺军权，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想夺军权，那是办不到的。军权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调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要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批准。蔡爱卿是想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人很坏的。五九年反右倾时，他公开说他是彭派，说别人是毛派，他是个大坏蛋、大阴谋家、野心家。吴自立写小说，搞电影公开为彭德

怀翻案。这些人掌握了兵权、政权还行吗？不行，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要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讲话
总理：

除了军区负责外，这个错误还影响到中央，因为根据省军区二月三日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中央也批准了，匆匆忙忙发出了“二·四批示”。中央接受了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估计，说应该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中央要负责任的。虽然当时“湘江风雷”因为是人数发展比较多的跨行业的革命组织，在发展中免不了混进一些、也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怎么纯，出现了一些错误缺点，这个问题我们跟这次来京代表叶卫东、张楚榷、谢若冰等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况。但我们应该说这只是一种支流、细节，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还是革命的。把这个组织的头头采取了专政措施，就等于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用毛主席严于律己的精神，我们得到教训，中央没有得到自己的调查，就匆匆忙忙根据军区一面之词发出了“二·四批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不是说中央负起主要责任，省军区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呢？应该指出，报告是由省军区来的，事实材料是由省军区供给的（当然另外的一些报道也有这方面的消息），虽然中央“二·四批示”有一点笼统，但省军区拿这个笼统的批示，就把它扩大了，就好象整个“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不仅解散“湘江风雷”及其所属基层组织，而且逮捕扩大化了，不仅逮捕头头，逮捕到底下很小的单位，十多个人的一个支队的头头也捕了，刚加入十几天的也捕了，不仅如此，甚至于对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实行了叫“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也落入打击面。所以，压制、打击面就更宽了。这些责任，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恐怕要负更多的责任。

另一个问题，批示不是说了吗，有“红旗军”嘛。

“红旗军”的问题比“湘江风雷”要复杂。因为“湘江风雷”仅仅是属于湖南的组织，负责人也来过北京，比较清楚一些。而“红旗军”比较复杂。在全国

来说，是荣复转退一个跨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从这里往外地发展。这个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林副主席批的对南京军区的一个批示上就指出了：荣复转退军人不应该单独成立、也不应该成立跨行业组织，而应该参加所在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战斗组织。不然，除解放军外，民兵系统外，还有另外一个军，全国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批示。因此，我们就通报了全国军事部门，转告各群众组织。但是，当时荣复转退的代表在北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意见，到中南海请愿。十二月份我见了他们的代表三、四百人，把林副主席的批示、主席批准了转告他们，建议他们不要成立这种组织，还是按照自己所在工作岗位分别参加自己本单位的战斗组织。当时他们同意了。但他们要搞全国联合。当时我说，全国不许有这种联合。可以根据大、中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设一个联络站，由民政部门、动员武装部门负责那里的荣复转退的登记工作，一旦有事就动用，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当然这里也是一分为二，好人多，不服从中央决定的是少数。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借了军用卡车，在北京游行。有人带头，有三辆卡车一直冲进中南海西北门。有军队说服了他们，他们退出去了。对这种行动，由于北京的舆论不同情，他们就回到各地了，荣复转退的名义也少了。有的实行中央决定，参加到所在各单位的战斗组织里面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改换了名称，其中就有一个叫“红旗军”的。这个组织，总部在北京，是由几个坏头子操纵的，在北京搞打砸抢，甚至在大连闹事，后来我们发现了这几个人，把头头捕起来了。他们夺我们的枪枝。我们搞政治攻势，谈话后，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跟香港的特务有关系。他们在部门中、机关中有联系的。当时有的机关部门把他们扭送到专政机关，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因为只惩办几个头子，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没有追究。在大连也把坏头子捉了。哈尔滨一月份由造反派夺权了。他们改了名义，叫“后备军”，欺骗群众，勾结保守组织，搞反夺权。因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识破了，把他们瓦解了，群众觉悟过来了。同样，他们在贵州也有人煽动革命群众来反对贵州革命委员会。有一个著名的头子叫李××，在北京我们也把他逮捕了。在浙江，也叫“红旗军”，也是跨行业的组织，我们说服了浙江造反派的同志，“红旗军”在浙江不合法。下属组织归口，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我们对湖南的“红旗军”头头也是跟其他地方“红旗军”头头同样看待的。据现在调查，据“湘江风雷”的同志说，还有其他

革命组织的同志说，“红旗军”的下层还是好的，有的工厂里还是好的战斗组织。但他们的头头现在是不是也是好的？不是跟别的地方的“红旗军”毫无一点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还要作一番调查。为什么？因为“红旗军”的关系不象“湘江风雷”，它的头头关系复杂。当时“红旗军”的头头，跟在湖南退休的不满的军人蔡爱卿有联系。

他在军队里总不想做副职，五十多岁了，一定要做正职，掌权，甚至不满意分配他的工作，始终说怪话。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前后，公开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我们的毛主席，他公开说他是彭派。别人是毛派，要把解放军分成两派，他这样狂妄已极！另外，他的医生周潜川，完全是用骗人的医疗办法，骗钱、骗地位，窃取情报。而蔡爱卿同周潜川打得火热，密切来往，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面是一个败类。他不满意在山西当副司令员，闹退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军区让他退休了，住在长沙。他在长沙搞了很多地下的、不公开的活动。

“红旗军”成立时，他的妻子韩景平，开始时是作“红旗军”的宣传部长，后来表面上辞职了。她这个辞职是不是真的还得调查。

为什么？因为蔡爱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以前就是)跟另一个彭德怀的死党吴自立来往密切。吴自立原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以后，他仍然出来替彭德怀说话，以编写革命斗争史，编电影《怒潮》为名，明目张胆的宣传彭德怀。中央认为，吴自立是犯严重错误，甚至于是不能信任的，而蔡爱卿跟他来往密切。最近，他骗了“青年近卫军”小将，把他送到北京来了，“湘江风雷”把他逮捕起来了。蔡爱卿有一种暗中活动，据我们知道，蔡、吴他们在长沙的活动，还不止此。

所以，“红旗军”的领导究竟是否还有蔡、吴党羽？当然我们还要作些调查，就是文件上所说的要调查清楚。我们希望，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造反派“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帮助我们调查、弄清情况。至于原来“红旗军”下属各组织，毫无疑问，在工厂、机关、学校里，是革命组织，应该承认，过去取缔的，应该恢复，跟“湘江风雷”一样。唯有“红旗军”这个名义，和现在的首脑，希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各群众组织和中央调查清楚以后再作决定。这个问题，跟同志们说清楚。

就在七月中旬谈判的时候，蔡爱卿还在革命群众组织中放毒，比如，他说：现在是武斗的时候了，要拿武装杀到河西（湘江以西）去，解放大湖南。还说工人生产可以停止，他可以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他说可以夺军权。这种说法，可以说原形毕露，被小将们识破了。

至于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如果说“红旗军”的问题，中央在一月确实说过“红旗军”这个组织是反动的。在一月二十二号中央常委和文革共同商量后，在人民大会堂，由我代表讲过一次话，讲了“红旗军”、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名字。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委托黎原同志，请回到湖南继续调查。

现在，有一种形势分析是不对的，说武汉出了陈再道，现在全国的形势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前夕。全国都要实行反革命复辟呀！这种估计完全是悲观的、右倾的思想，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全国形势很好，陈再道的问题一暴露，武汉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嘛！“百万雄师”一下子就没有那么神气了，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都起来了，形势马上改了嘛！几十万人的游行得到武汉三镇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反正解决了。河南的问题，军区错误的领导，我们在北京开会，把他们撤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解决湖南的问题。但是有人错误的估计，既然湖北出了个陈再道，大概中南各省都有陈再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毫无事实根据，不实事求是。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或个别严重错误的，军队跟地方性质不同，不仅湖南如此，广东、广西也是如此，也要作具体分析。

他觉得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了，既然“二·四批示”是中央的，他们拥护中央批示，就是说军区作对了，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革命派，把他们说成保守觉得冤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讨论讨论，“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作了错误的估计，连今天我已经谈了三次了，也许是四次了。写信的同志应该想一想，中央批示写的很清楚，军区把它扩大化，少数头目就变成了几万个头目，组织就变成了全部是反动组织了，打击面这么大，这些责任不能都由中央来负嘛！特别是进行武斗，组织“红色怒火”，组织“武工队”进行武斗，这些中央都没

有提倡嘛！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结合在一起，比方湘潭开了几辆坦克向易家湾、淅口进攻，这个中央也没有提倡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啊！××还有一个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口号就不对头，夺谁的军权！×××，你是×××的。×××要夺军权，夺军权是不对头的。

再不能冲军区。要组织文攻武卫指挥部。刚才看了你们的计划，组织起来二十个连。但要注意一点，组织起来的连，不要跨单位，各单位各自组织，然后联合组织起来，执行警卫，也要分担任务。有了指挥部，就一起来，部队也要把枪背起来，这是第一个环节。

湘派：现在要联合必须坚持原则。筹备小组的名单长沙已贴出大字报，筹备小组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是包办代替，长沙有百分之六十群众不相信筹备小组，长沙市大联合必需以“湘江风雷”为核心。

戚本禹：毛主席说，有些组织提出以自己为核心，这是很蠢的。我的理解，这是强迫别人承认自己，这怎么能行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提议“工联”为核心。只能提以毛主席为核心。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批准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为你们担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代表，

总理：听说你们把“高校风雷”都赶跑了？

一代表：是因为他们反对你，我们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总理：那是少数人，不要那样搞吗！你们首先是搞起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二十个连，三千人，规定几条，树立起威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赶快组织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四点五十至五点三十五分，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湘江风雷”的双方代表

总理：黎原同志、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为筹备小组领导人。黎原同志任主任。

还有郑波同志、谭文邦同志、刘顺文同志，还有梁春阳，贾镛，万达怎么样？对！还有林国兴同志。万达有严重错误，可以通过筹备工作考验。

群众参加筹备小组成员，你们双方来的人要同等数目。原来商量各三人，也可两方各五人。你们（“湘江风雷”）要有一个，“青年近卫军”也要有，代表一个方面。“孙大圣”，敢闯，也有代表性，还有“长沙工人”。各方选自己的，然后协商解决，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这是领导机构，要尊重。

首先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双方各一千五百人，发枪一千条。“工联”方面工厂大，双方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每个连的人数就不相等。怎么样组织法，戴利（“红艺会”负责人）你们懂吗？派出勤务的时候，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指挥部下设的各级也是双方各一半人。比如参谋五个人，双方各两个人，军队一人，提出意见，由领导小组郑波同志下命令。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开始。权威树立后，不抢枪了，也可以收枪。

学生如何组织，看是否这个学校组织很好，如果组织很好，再经过训练，才能决定能否发枪。如果组织好了，四十七军的枪也调来了，交通恢复，在这个条件下，再乱放枪，就把他的枪收回。再经过一段，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好了，秩序建立了，才能清查枪支。如果现在搞他，他会给你搞暗杀。首先把长沙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不许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黎源等会见衡阳党政机关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在省政法干校又接见衡阳代表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五年，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湖南的报纸一直没有转载。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湖南省委积极派出工作组大抓“三家村”、“小邓拓”。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张平化上调中央主管宣传部的工作。长沙发生“八·一九事件”，九月初，张平化主动请求回湖南“请罪、造反”。不久，听到“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风声，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向全省干部作“抓黑鬼”的报告。十月，他又作检讨。以后被中央保护起来。（一九七三年，张平化又被派回湖南担任一把手，他又干了不少坏事。十月政变后，张平化被华国锋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在批“凡是派”中，张平化没有紧跟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了。据说，他写有回忆录，至今没有见到。不知他在去见马克思前是否有所悔悟？！）

一九六七年初，中共湖南省委瘫痪以后，湖南省军区负责支左。但是由于它的一些负责人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把造反派看成是右派。特别是对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四处收集他们的“黑材料”，加以夸大，无限上纲，上报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湖南军区的报告，未经调查核实就下达了“二·四批示”。这个错误当然由中央文革小组负主要责任。

但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在执行“二·四批示”的过程中，又加以扩大化，在全省把“湘江风雷”组织支队长以上的头头都抓起来，估计全省在万人以上，有可能达到两、三万人。后来又提出要在全省“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进一步扩大了打击面。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湖南省军区与相当大一部分造反派的矛盾。

湖南的另一部分造反派组织，以“湖南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为主的“省红联”的头头们，受湖南省军区错误的影响，以及小团体主义派性的干扰，跟着干了一些打击“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的错事。形成了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以上这两大矛盾就成为了一九六七年二月至八月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大串联、大批判逐渐演变成了大武斗、大枪战。

这其中有许多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

2011 年 9 月 3 日修改

第四章第六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第六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壹、本节概述：

一、青海省文革运动的开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开始了青海省的文革运动。

文章发表后，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社论是“大毒草”；另一种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编委中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闯了大祸了！这是办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下午，报社气氛进一步紧张，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打扰了省委的工作。”

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要求报社作出说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六日，有更多的人涌进报社，大字报也越贴越多，以致省委大院内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有的部、委也有人写出了大字报。

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于是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至四楼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的内容都是：“社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负责写社论的人从“政治错误”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左右，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着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

同时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庞大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工作组对青海日报社动了“大手术”：

一、程光远停职软禁在家反省，陈逸专派二人监守隔离别室，雷经农从中分化出来，要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

二、由省纪委副书记张全志坐镇报社，开展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

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

四、组织专人专版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

五、继续内查外调，为“程、陈反党集团”的定性和组织措施预作基础性准备。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青海，本省也出现了“8·18红卫兵”等各类群众组织。所有外地红卫兵都站到了肯定和支持“六三社论”这一边；青海本省的“8·18”红卫兵、工人组织也都在这时公开表示了积极支持“六三社论”的意见。

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大字报高潮，大字报的矛头指向青海省委，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红卫兵和工人群众来到省委，高音喇叭汽车也开到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口号、毛主席语录，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后就直呼“王昭”之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社更是关注焦点，一拨一拨红卫兵向省委报社工作组讨说法，韩洪滨、张全志、史克明、薛可成了冲击重点对象。

在这一汹涌浪潮下，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被迫撤除，报社工作组不知何时也已悄然撤退，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红卫兵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

文革，取得了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

青海“文革”形势大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8·18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8·18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焦点”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在一月夺权中爆发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青海的党、政、军纷纷用各种形式明的暗的硬的软的表示了反对。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赵永夫在党委会上也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他们效仿地方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三个小时后，起来造反，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宣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夺了刘贤权的权。刘贤权被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住处放双岗，警卫员、秘书不得与他接触。他们拥戴赵永夫，赵则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导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获总后勤部青（海、西）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八·一八

革命造反派”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书记王昭。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夺了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由于对方攻击其组织“不纯”，“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纯洁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整风”，将几个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门严肃处理。结果给正在伺机行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一个出手打击“八·一八”的机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张晓川掌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出动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军车，省军区的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全城游行。他们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坏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借以向“八·一八”示威。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一份电报，说“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将电报发给中央，被赵永夫拒绝。刘的夫人安绍杰将电文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兰州，由兰州军区发给中央军委。但未获回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赵永夫等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军管小组到报社。但占据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组织

动员守卫报社。西宁市各“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员组织派去近两千人守卫报社，相当拥挤。当时气温很低，有的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赵永夫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暂时没有动作。军队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青海日报社被重兵包围。在报社外面，是从草原调来的部队，一辆辆汽车、装甲车把印刷厂围得水泄不通；南面占领了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晒台，西面则在民房屋顶架起了机枪，在北面湟水河一座木桥上，更是布满了一层层荷枪实弹的年轻士兵（他们有的甚至不会说汉语）。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包括干部、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大约上万革命群众便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的保卫战，他们在报社印刷厂四周搭起了帐篷，日夜轮班，吃在斯睡在斯，报社许多编辑记者和印刷厂工人拿出家里的米面煤砖给守卫人员做饭烤火……。

烧煤用尽后，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有的家属给他们送饭送水。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给赵永夫发去“三条指示”，要求部队撤离报社。

赵永夫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等十二人到兰州军区抗议，搞“绝食斗争”，要求收回“三条指示”。

兰州军区把要求青海军区将部队撤离报社的指示用电话传给了“首都三司联络站”和“八·一八”。

“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八·一八”控制报社继续出报至这一天为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

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赵永夫等再次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除刘贤权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见一致。他们拟定行动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三、镇压革命群众的二·二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

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 “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 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 (略) 与此同时，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改到二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后字 2 0 5 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直接策划、指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

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

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

二时半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据被俘的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说：“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在（被俘者）人群中走来走去，从八·一八派的大队长到小组长以至一般成员，全被抓出来，高举双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说：‘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

枪声停止后。赵永夫、张晓川等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并层层传达编造的统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伤我

干（部）、战（士）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朝过道撤退，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这次事件，前后共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人。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采用各种刑法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有人说这是叶被误作林）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赵永夫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四、中央文革召开青海问题调查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青海开枪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指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时，“军级干部会议”（后来又叫“军以上干部会议”）已开了两个星期。

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他借机自我表功，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据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后来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

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

中央文革的《简报》刊登了红卫兵的来信，诉说他们被赵永夫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召开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

关锋 戚本禹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吟，“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没看见死人。

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戚：谁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没有枪？

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时间：夜至 22 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肖华。〕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 ×××，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晚至 24 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成员。接见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24 夜—25 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

本禹、穆欣、肖华。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你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支支吾吾）

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〇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组织了。

张：（重复，罗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 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 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 到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 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 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 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 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 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 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 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 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 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 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 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 一二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 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 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 命的一律平反。

(四) 对受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 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 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

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中发 [67] 110 号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 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 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 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 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青海代表时的讲话

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

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

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

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

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

贰、本节简论

青海赵永夫事件极具典型性，它是当时文革形势的一个缩影。

一九六七年一月，各级党委和政府由于负责人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批判，陷入困境，而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妖风越刮越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各地造反派纷纷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权力，从而加强对运动的正确引导、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此时，党中央命令各地的军队支援左派，然而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缺乏正确的理解，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而他们的这种错误立场又得到中央那些搞“二月逆流”的老人们的支持、纵容。

赵永夫作为一个副司令员为什么敢不经兰州军区、中央军委批准，就从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手中夺了权，并把他软禁起来，有人怀疑他这个时候就已经从上面某个人那里得到了支持。

二月二十三日事发当天，叶剑英就得到了西宁市大规模屠杀群众的情况报告，并直接打电话给赵永夫，鼓励他“打得好！打得好！”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青海事件，这既是邀功又是备案。然而，这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如果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屠杀群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立即进行调查。

二月底，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介绍青海“镇压反

革命”的经验。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以后，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第四次青海问题调查会上，就由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这说明：事实很清楚，性质很明确，处理很干脆。

叶剑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 103 页）

然而，就是这些人，在一九七六年政变以后，又闹翻案了。不说别的，一次军队行动，打死三百多个工人、学生，其中还有不少是十五、六岁的娃娃，他们就不感觉心中有愧吗？

2007 年 10 月 4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26 日修改

第四章第七节 四川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 50 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重庆驻军五十四军代表支持下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 30 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并当众焚烧了刘少奇、邓小平像。八一兵团代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发言分别是红岩机器厂八三一代表、红农八一五代表、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代表、财贸八一五代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重庆“联络站”一派召集 50 多个群众组织开会，讨论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及联合夺权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 50 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急电，称重大八一五等组织在驻军支持下进行的“一·二四夺权”是“假夺权”。

因夺权而激化的内部矛盾使重庆造反派正式分裂为两大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副主任有重大八一五熊代富、财贸八一五王绍川、原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徐正身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 50 余人。

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革命组织围攻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军区派出部队逮捕围攻成都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经叶剑英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

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这封信。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

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

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重庆革联会得悉中央军委2月17日致四川大学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公开信，连夜向所属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把四川大学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员抓起来，并提出“如有抗拒者，以革命行动对待。”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

至 2 2 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 3 3 7 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重庆革联会布置凌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学八二六人员（包括从贵州经重庆返成都在火车上的八二六人员），砸了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重庆八一五派抄砸由西师八三一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控制的“一二·四惨案调查团”并将其成员赶出人民小学。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再次遭到重庆革联会一派抄砸，三司人员上街游行抗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召开大会，宣布工人造反军（北碚地区）六号门纵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当场逮捕 7 人，勒令登记自首 58 人。会将拘捕人员五花大绑车载经北碚区、沙坪坝区、市中区游街示众。

重庆市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 237 人，刑事拘留 746 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重庆革联会专政委员会与重庆市公检法联合发出《通令》，宣布工人造反军（临江门街道）前哨支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拘捕 13 人，勒令其余 80 余人三天内到派出所登记自首。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庆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和市公安局上午在解放碑召开批斗处理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大会，会将被捕者田树堂、许洪烈等五花大绑戴手铐挂黑牌游街示众三天，此外该组织还被判处管制 2 人，劳教 1 人，勒令

登记自首 72 人。

重大八一五出动 20 多卡车人员到北碚区抄砸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重庆师专附中八一五等组织以“一贯反对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联会”等罪名将重庆大学红岩公社负责人徐光明扭送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关押 15 天至 3 月 7 日释放。

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工矿企业职工为主组成）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江海云在成都被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新重庆报》公布革联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告》，发表镇压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的报道及社论《扫除一切害人虫》

重庆革联会组织人员晚上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重庆革联会一派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级镇反专门机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重庆革联会组织上千人围攻反革联会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军工造反兵团广播站，发生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以来全市第一次冲击国防工厂事件。

重庆革联会布置各单位组成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专门对反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进行抓捕、捆绑、刑讯逼供）。革联会组成警司（五十四军）、公安局、红卫兵（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三结合镇反小组”，到区县、工厂、街道地段指导“镇反”；从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四十一

中东方红等抽调 80 余名学生组成打鬼队，驻市公安局进行擒拿格斗、捆绑等训练。

从二月中、下旬开始，重庆反革联会一派的一些群众组织相继被驻军、革联会或参加革联会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拘留、揪斗或“勒令”自首、请罪，其间大量出现对被抓被斗人员捆绑、殴打、罚跪、游街，对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进行抄砸等武斗现象。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

到 3 月 4 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 5 0 0 0 余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重庆革联会对綦江县松藻矿区工人造反军打通战斗团实行戒严，捆绑斗争 577 人，拘押 120 多人，勒令登记自首、写认罪书上千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重庆革联会和市公安局宣布市中区红旗纸箱厂红铁锤战斗队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逮捕 3 人，拘留 5 人，勒令登记自首 7 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重庆北碚区驻军宣布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重庆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八三一负责人周荣等 7 人被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重庆驻军对后字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负责人及骨干 30 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 29 人。

重庆驻军在西南师范学院校园主持对西师八三一“首恶分子”的批斗大会，会后逮捕了“首恶分子”。

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黄廉从北京归来在市中区牛角沱车站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重庆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反革联会的九一五战斗团团部。九一五负责人 8 人被拘捕。

重庆新华印刷厂红旗战斗队被公安局勒令解散，负责人被逮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砸抄反革联会的财贸九二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重庆革联会和公安局临委会在重庆灯泡厂实行戒严，宣布该厂八二八战斗团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余四个组织勒令解散，捆绑斗争 80 余人，拘捕 29 人，斗争会后游街示众。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的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六五分团发出通令，勒令该厂反革联会的军工造反兵团解散（此前该团已被抓捕和批斗多人）。

据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 2 月 24 日到本日止，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 个，由群众出面砸掉的 82 个，自行解散的 146 个。

据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在《向山城革命群众揭露重庆市二、三月“镇反运动”的情况》中称：“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七百六十二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基层单位，大多数是工厂的）。”

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到三月底止，重庆全市被拘捕 2253 人，24 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另外被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抓捕的人员和砸垮的群众组织不在其内。

（以上关于重庆的材料摘自何蜀《重庆文革武斗日志》）

据后来统计，这次所谓“军委二·一七公开信”散发后，在四川省各地逮捕了八·二六派革命群众约十万人。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 1100 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 8 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 33000 余人。

二、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

康生同志说：

1. 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 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

3. 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

4. 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 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 14 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

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

康生：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 8·15 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 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

总理：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

人”几个字。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 7012 部队一个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 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

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

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

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

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

江青的讲话

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

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

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

周总理的讲话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

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

三、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

康生：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周总理：韦杰同志，你在1月29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陈伯达：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

杨成武：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

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周总理：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題，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1967.04.04；中发〔67〕154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

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

- 1、派军队保护造反派。
- 2、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
- 3、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付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

的滔天罪行》

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下旬，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七月初，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将红色派从“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并且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7790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7790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王回来后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结果这些人都会被泸州的红联派俘虏。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1962年的6月19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

案。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还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宜宾市革筹派人与宜宾市武装部协商，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八八团一个连，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谢英富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

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民兵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州。另一路则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这就是有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行至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附近，遭到对方的伏击，被对方打死打伤多人。并被围困在此地多日。后来在 7790 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张键的指导下，对对方展开夜袭成功，双方均有伤亡。

一九六八年初，宜宾地区红旗派派人到宜宾县打死红色派一人。

谢英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傅文琪等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谢同意傅某等人的要求，派人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到了观音后，有两个队员将对方的一个人打死了。一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一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四、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 8·15 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

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

总理要他当众辟谣。

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 [67] 159 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

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

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

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五、八·二六与八·一五两派之间内战不止

贰、本节简论

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有它的特点：

一、关于所谓“中央军委二·一七公开信”问题

关于中央军委的这封信问题：

二月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事实很清楚，就是叶剑英搞的。

二、关于所谓二月镇反问题

以后搞清楚了：这封信是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批发的，从二月十八日开始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川用飞机散发。

这是否也可以看成二月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二、关于二月镇压反革命运动问题

正如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的：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

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在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了六万人至十万人，创造了全国的新记录。

三、关于宜宾的刘、张问题

原宜宾地委书记刘洁挺、宜宾市委书记张洁挺，一九六二年被李井泉秘密关押多年，并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六五年撤消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

2007年10月31日初稿

2011年8月28日修改

第四章第八节 武汉解散“工总”

壹、本节概述

一、湖北造反派批判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至五日，“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

他们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受到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曾经“保省市市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

五日，“工人总部”组织开始采取压制“联合会”的“革命行动”，自行决定拘留三千余人，“联合会”也密谋用暴力抗争。

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早上一时，周总理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

总理向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捉了一些人，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汉是全国一面红旗一样，我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红旗为什么捉那么多人？当时北京就没抓，实质上武汉情况没有揭穿。所以，是一个“先进红旗”到北京来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插手北大，清华，当了北京市的顾问。

张体学主要是王任重拉坏的。王任重到北京来斗了几个小阿飞，非常恶劣，你们武汉很受影响，王任重自吹自擂，一大车，一看，真不象样子。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点了张体学的名字。我特地看了王任重一眼，他好象满不在乎。下来，我向王任重说：“你要好好帮助一下张体学同志，他太不象话了”。他连忙点头“是呀！是呀！”其实都是他搞的，真是个两面派。

王任重到广州养病，你们把他揪回来了。你们到北京找陶铸诉苦，陶铸还发脾气。

王任重是 12 月回武汉的，你们进行批判斗争刚刚开始斗一个月，你们就争论，闹意气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大联合搞嘛。

形势发展很快，现在是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林杰和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代表的讲话

“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无政府主义”。“现在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王任重写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等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信

自从去年 12 月 25 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

自从 1 月 20 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

从去年 12 月 25 日到今年 2 月 24 日整整五十天，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

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

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

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

湖北省委因错误严重要改组是肯定的，但新的省委到底如何组成，望你们注意。现在应当争取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对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超、陈扶生、邓祥、饶兴礼等同志参加。群众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了解，可以由孔庆德、张竞等同志分别与各组织协商，哪些革命组织同意参加的要首先吸收，暂时不愿参加的革命组织，留下名额，还要做好工作争取他参加。

我希望湖北军区学习山西的经验，派出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如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新华工、华师等）去进行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和通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王任重：《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以外，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张体学同志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总、二司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

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

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二司》等 12 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

即《二·八声明》。这个声明主要方面正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的重要性，以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勾结保守势力和社会上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危险情况；另一方面(次要的方面)则由于头脑中“私”字作怪，对夺权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和做法的其它某些革命造反派组织，指责为“托派”、半途出家的投机商”，因此在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引起严重分歧和打内战。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内造反派

军区通知造反派到军区礼堂听报告，一个人也不准缺席，不准外出，会场上

造反派被保守派包围，台上架有机枪，一个连的战士负责警卫戒备森严。副司令员孔××、叶×、韩××亲自主持大会，会上孔××把几个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说他们是「反革命小将」、「小牛鬼蛇神」等，随后，军区副司令员叶×、韩××都控诉、训斥革命造反派为「假左派、真右派」、「纸老虎」等等。这时就有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斗后就当场抓走了三个人，有一个人要求公布被抓人的罪状，一个保卫科长跑上来就打了他两个耳光。一些战士高喊「要按军委八条办事」。

会后在文工团共开了六次控诉造反派的罪行的大会，小会检讨，请罪不计其数，文工团共抓二十二，大会斗争时坐土飞机，带手铐，大会「亮相」一百八十七人次，行政看管二人，警告五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

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

把“拥护或反对《二·八声明》看作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把群众分为“香花派”（支持《二·八声明》的人）和“毒草派”（反对《二·八声明》的人），并公开发出指示：“香花派靠边站！”在工矿、企业、学校剥夺“香花派”群众的听报告、被选举等政治权利。对“香花派”群众大搞人人请罪，个个过关。在汉口井冈山大楼搞了所谓“工人总部罪行展览”，在武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搞了所谓“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红武兵”（百万雄师主力）“造反大队”、“二·一八”红星军、“中学红卫兵”等 7 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王任重、宋侃夫大会”，有三万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造反派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分三批对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等革命造反派进行了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一律解散，非法逮捕了一百七十五名革命群众，宣布行政管制四十三人，监督检查的二千零九名，提出警告的更是不

计其数，逼迫自杀四人（二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一人，上台示众约有一千零二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工造、三新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军区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坚决站在军区一方。在签发声明时，出现问题，红武兵方面派代表要求在声明上签字，遭到拒绝，同意他们在三新、工造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单独以红武兵名义发表批判文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陆军第 29 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

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同志向二司等在京代表说

《二·八声明》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要停止内战。

工总、九·一三、二司等立即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主动停止了历时二十天的全市大辩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与到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要求恢复武汉秩序，要注意工业生产、大联合、恢复学校中的班级建制。要求集中抓好 3 件事，抓革命、促生产；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

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抱怨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下面为难。他并且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即下面建立机构来分别领导各省文革，或者当地军队定期派代表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人总部

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宣布解散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勒令 48 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它组织”。十几天之内，逮捕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湖北军区副政委张竞失踪

张竞，贫农出身，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支持左派的革命群众，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一直在搞支左的工作，工作中，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支持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新华农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深入新湖大调查研究。于三月十七日失踪，后停职反省、检讨，被软禁起来，不准会客，不准与造反派联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

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并逼二司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

工造总司和三新认为军区无权这样做，这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十六条，把支左变成了支派，要求军区放人，为工总平反。工造总司和三新因此与军区公开分裂。

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 3 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称“二司比工人总部还坏”。布置各公安分局大肆调查二司大小负责同学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大整黑材料，为镇压学生运动做准备，接着就解散了曾反对《二·八声明》的新华工、新湖大、工造总司等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宣布了「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反革命组织」的罪行

又抓了六个同志，其中四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当时两个女同志说：「我没罪，我不去。」士兵就推她们、拉她们，她们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望着台上的毛主席像痛哭。会议主持者就命令拉上幕布遮着毛主席画像，演员们和被

捕的人都流着泪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时悲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礼堂，最后士兵用绳子将两个女同志五花大绑拖走了……。留下的同志含泪目送着她们，嘴里不断呼喊：「保护八条，不许打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邓子政贴出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二司水电学院（即红水院）战士奋起反击，举行了声讨邓子政、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游行。武汉大学、湖北医学院、十四中等二司相继到红水院游行，支持红水院二司。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新华工数千人到红水院及武昌游行高呼“打倒谭震林”、“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被认为是“反革命游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接见湖北“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不然，他们可能把你们砸了。工人总部的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组织，我们还没有宣布反动组织，只宣布解散。因为广大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二司，同对工人总部不同，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只是二司做了很多坏事，我们不是没有材料。让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搞出来。我们是历史的看问题的。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

现在的总部，在实现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你们说有人想把你们整垮，谁想把你们整垮，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

同意他们现有基层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也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或参加其它革命群众组织，但不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总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对湖北军训团及群众组织的讲话
钟汉华讲：

“二八声明”必须彻底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搞的，你们要扛起批判“二八声明”的旗帜，要批深批透，“二八声明”远没有批倒。

工人总部做的，二司差不多都做了，工人总部没做的，二司他做了，二司广大群众不要人人过关。

工人总部有我们的家属，我们也抓了嘛！

陈再道讲：

解散工人总部就是最大的支持嘛，工人总部很不纯，九个人就有七个坏分子，工人总部是群众强烈要求解散的，没有宣传是反动组织，只解散。

要把批判“二八声明”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邓。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支“左”办公室某负责人在华中师范学院作报告声称“凡是与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穿一条裤子的都是保字派组织”，“谁死保《二·八声明》，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三、武汉造反派提出为工人总部翻案、炮轰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二司、三新等数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

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十周年。二司和三新两支队伍在长江大桥头会师时，双方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毛主席万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情激昂。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三军部队战士与三字兵、三司等一起单方面举行游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造反派乘《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机，东山再起

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三新工造和几十个工人造反组织开始加强了冲击军区阵式，上万学生静坐。满城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陈大麻子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陈再道在群众抗议声中被弄得焦头烂额，十分被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

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组建省、市革委会，遭到拒绝，三新工造提出：，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这是他们的权力。此时，二司拼命为工总翻案，工造、三新也参与其中，为工总问题，工造三新和其它几十个中等造反的工人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和军区对立，冲击军区机关，游行，到市、区、公安局静坐，示威，工人组织全力支持学生，工总解散后，一部份人参加了工造，一部份人不参加任何组织，成散兵游勇，同工造、三新一道活动，协助工造、三新游行示威，这些人当时称“钢八司”，（即按时上下班、下班后 8 小时自由参加运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陈再道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斗了王任重没有，这人要搞一下，会要开大些，是否把厅局长开个会。（江局长说，人太多了，是否分两层开，书记、秘书分开，上下揭，内外揭。）二司与工人总部把他们关起来，实际上是保起来。王任重写了几个东西，还要通过军区转发到地县。光写成绩，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说他为什么是三反分子，抓住成绩不放，对错误没有认识，未触及灵魂，把张体学与他关在一起，要张体学揭王任重，张说：“你像不像三反分子，我看不像”。

大专院校对“二八声明”认识不够，与刘邓路线分开来看，新湖大坚持不批判“二八”声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他有看法。大专兵保省委犯了错误不能怪他们，怪王任重、张体学。他说他是党的好儿子，这是用来迷惑人的，所以抓“南下一小撮”犯了错误。开始。他们没有把握，后来他们打出来，你们不要他们，他们就下厂下乡，现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注意的，今后也要注意，有人把“三字兵”当作敌人是不对的，要允许别

人改正错误，欢迎别人革命。现在有一小撮人造谣表演跳出来，华农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手拿左派，一手拿右派，锋芒所向是清楚的。

学生不搞军训、不管工农，还要出去，“二八”声明也不让批判。为什么要把串联取消，也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二司批判“二八”声明不下，说谁批判“二八”声明就没有好下场。有的说：为什么不让去工厂？就是不让去！在学校搞斗批改冷冷清清，学生就喜欢轰，打旗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三新召开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会，

二司应邀参加大会。会刚开始，就遭数千三字兵冲会场，挑起武斗。三新、二司为了顾全大局、率队到湖北大学操场继续召开批判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红水院等校出现新动向开始出现“提着脑袋质问陈再道”、“武汉支左大方向全错了”、“炮轰陈再道”等大标语和大字报，反复辟的斗争序幕正式拉开了。

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则刷出“支左大方向全然没有错！”等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两派分别举行了大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八周年二司、三新的队伍高呼“坚决执行《十六条》！”“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队伍则呼“坚决拥护武汉部队公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二司、三新等刷出大标语“工人总部是革命组织”、“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另一派则刷出“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谁为工总翻案，决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陈再道钟汉华给湖北“新华工”等组织的电话我们依靠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战士，是不会动摇的。受蒙蔽的，你们

要争取他们，用瓦解的方法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一定会在今后跟你们站在一起。

《湖北日报》要搞个报刊监督小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二司各一人，你们协商一下，监督报纸办好一些。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市“抓办”派出新工作组到中学去镇压学生运动。市新一中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向市“抓办”提出撤走新工作组，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等四项严正要求，但遭拒绝。新一中小将毅然进驻市委，并宣布从4月12日晚9点开始绝食斗争，有1000多人参加，斗争得到全市革命群众支持。绝食54个小时后，军区领导人被迫答应四项要求，但第二天就单方撕毁协议，拒不交出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情况。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钟汉华给武汉军区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

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

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

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院校红卫兵。

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报汇了。江青同志说：我收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3000多人绝食。

（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

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传达了陈、钟打回电话传达的内容是：

“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时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据说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似乎文革在 1967 年已经该转入镇压反革命来收尾了。

（当时参加 19 日汇报会议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

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探得此事，就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 19 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批示，感到震惊。他们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武汉事件后，陈、钟承认电话“事件”是他们打电话说了假话，但文

革以后，在陈的回忆里又重新讲了以上情况)。

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二司、新华工几百人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进行了20多天的静坐斗争

他们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被汉阳公安分局非法逮捕的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分部的负责人夏邦银同志(工人、共产党员)是革命闯将，坚决要求立即按军委十条放夏。但武汉军区拒不接受，反而挑动保守派和上万不明真相农民进行围攻，于是二司、新华工几百人从4月下旬开始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进行了20多天的静坐斗争，得到全市革命群众支持。最后公安局(已军管)不得不释放夏邦银，夏出狱后即与广大工总战斗队员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武汉“钢二司”等对话

同学：现在武汉到处流传着陈再道十九号的讲话，并且影响很大，三字兵活动猖狂，我们希望证实澄清一下。

(念特大号外“北京来电”)

特大号外(特大喜讯)(北京来电)

- 1、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没有错。
- 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 3、江青同志说：武汉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不散。
- 4、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我根本没从北京打电话回去，是我们的政委给家里打的。

下午与钟汉华谈话记要

同学：相信你已经知道上午的谈话内容了吧，你们讨论得怎么样？

钟：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陈再道与武汉革命造反派的辩论

小：第一点，在你们的《严正声明》《公告》以及你们在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

陈：这个问题嘛……你们也找，我们也找嘛！

小：你们不是已下了结论。

陈：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的讲话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棉事件

武汉棉织厂 40 多个红武兵围攻到该厂去贴大字报的华中师范学院二司小将，用粗木棒、砖块玻璃片毒打，当场受伤 26 人，重伤 9 人。造成轰动武汉三镇的“4. 29 武棉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三司围攻湖大

三司保字派近千人纠集部份三字兵连续三次围攻新湖大解放区，挑起严重武斗，新湖大战士被打伤多人，解放区校牌被抢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清华井冈山中南调查组 5 人在汉阳调查时，遭冷冻机厂的红武兵和三字兵的毒打。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新湖大、新华工、红水院、机械学院等校斗争王任重连续举行了斗争湖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秋后算账派总头目王任

重大会，把王任重拉上台示众，二司、三新等革命造反派愤怒控诉和批判了王任重的三反罪行。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汉阳轧钢厂保守派阻挠该厂工总战斗队员开竖旗大会，用铁棒、木棍打伤工总战士四、五十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江汉公安局民警闯进公安学校打人

在上级策划下，调动近百名民警撞入公安学校，伙同该校三字兵将新公校红司的大字报全部覆盖，并毒打红司战士，打伤 30 多人，重伤 5 人。新公校红司向公安局多次照会并提出七点严正要求，遭拒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新公校革命学生在公安局前进行绝食斗争，

得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外地赴汉调查组的大力支持，到 17 日，全市有四万人参加绝食斗争，一百多昏倒，几十人休克。军区领导人迫于形势，不得不签字同意新公校红司的七点要求，但两天后就单方面撕毁协议，说签字是“被迫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

代表：军区机关 24 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了 200 多人。武汉抓了 2600 多人。

一张保字号的反动大字报，共 48 张，说：“周总理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三字兵还说王任重“秋后算账”提的过早了。

武汉特动尽是高干子弟组成，王任重儿子，张体学女儿，韩东山儿子。有的特动说。过去我爸爸用这（铁鞭）打鬼子，我今天用它打思想兵。

戚本禹说：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 3 月里

被捕的工人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红武兵等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武汉市大专院校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
宣布坚决与二司、三新站在一起，坚决为工总翻案。

三字兵中革命的同志起来造反，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武兵中要革命的同志也站起来造反，成立了“红武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都宣布坚决与二司、三新站在一起，坚决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冷冻机厂、水泵厂的一千余名红武兵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静坐的群众

在精心策划下，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进行静坐斗争的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等革命小将，200多人挨打，几十人受伤，14人重伤。事件中有便衣警察、军用卡车参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

这七条（指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七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实际上是保护了几万人压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而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正确，是错误的，是省委内一小撮策划二司内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军队搞垮。三新、二司只准他们一小撮讲话，不准人民讲话，这是什么大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中央文化大革命方针、路线、政策。现在他们这七条要产生严重后果，看来否认这七条比较有利，他们已经干了不好的事情，冲击军事机关和军管单位，围攻军代表，方向完全错了。这不是对缺点错误提意见嘛，他们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参谋长，绑架钟政委，而且强逼签字。

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就不能挽救他们，要大搞舆论，利用一切宣传工具。

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有人插话：刘真是否等一等呢？）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晚上 12 点左右，有人派出近百名解放军包围新湖大，不许新湖大战士出入，这是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同日，商业学校保守派勾结建校、钢校的三字兵突然袭击商校二司朝阳兵团，重伤 10 多人，四、五人被长马刀砍伤，一人被迫跳楼。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武汉总字 127 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副省长、张华副秘书长操纵了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在省、市领导干部中大搞签字画押式的“集体亮相”，一次就公布一百多干部集体签名的“亮相”大字报，公布了几次，声称有六、七百领导干部站在保守派一边。

付省长孟夫唐同志养病多年，运动以来没有他一张大字报，就因他在四月底公开表明支持二司、三新而被军区正式文件（如“5. 21 公告”）中打成“孟夫唐之流”。

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任爱生亮相站到二司、三新一边后被陈再道之流唆使三字兵抄家，绑架拘留，残酷毒打，最后任爱生被迫跳楼求救，摔成重伤。

原付市长薛朴若，三月份被委派为市“抓办”副总指挥，说薛是好干部，但当薛 5 月 15 日起来造反，愤然辞去“副总指挥”，并宣布坚决支持二司、三新后，就被打成“政治投机商”。

四、武汉军区六·四公告引发两派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造反组织举行集会游行

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盛大集会，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一周年，会上还有新北大公社，

清华井冈山等赴汉战士发言，聂元梓等同志也来电祝贺，会后进行了游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任爱生同志给陈再道的一封信公开信 陈再道： 我还未死，成了残废，这个责任应完全由你负！ 我于四月上旬曾写了几张大字报，反对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当时严厉批评了武汉部队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不是支“左”，而是支“保”，他们扶植已经垮了台的保守组织，打击革命造反派，压制革命造反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并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

四月二十八日我又给你和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前段武汉地区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强烈要求你公开检查，迅速改正，以利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当时我还指出：你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是湖北省委常委，一切重要会议你是参加了的，一切重大决策你是参与了的，省委在文化革命中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你一份的。但由于你的特殊地位，对你的旧帐没有认真清算。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你就怀着刻骨的仇恨，赤膊上阵了，利用你的特殊地位，更加顽固地坚持已经破产的刘邓路线，疯狂镇压革命左派。信中还讲了一下张体学，就其错误，你比张体学的错误要严重十倍，危险十倍！因为你盗用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盗用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利用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你执行了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

不是吗？由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湖北地区几乎要葬送在你的手上，从武汉到专县，从工厂到机关学校，整个湖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遭到严重打击，我省文化革命的烈火几乎被你扑灭。在你的大力支持下，保守派死灰复燃，例如：二月份以前，全武汉三字兵几乎全部被分化瓦解，剩下的不到 3000 人，可你却为三字兵涂脂抹粉、鸣冤叫屈，明的暗的竭力扶植，现在已达十几万人。另一方面，你对工人总部这个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却造尽了谣言，放尽了暗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硬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大批的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关进牢房，并非法宣布解散“工总”。你靠的是什么？是保守势力，如“三字兵”、“黑武兵”、“大专兵”等。继续蒙蔽他们，竭力扶植他们。你打击的

是什么?打击的是“工总”、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革命左派组织。尤其恶毒的是，你纵容和策划“联动”、“特动”、“黑武兵”经常制造武斗，打击革命造反派和敢于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压制革命干部起来革命，压制干部起来造反。在这里，顺便把我受迫害的情况讲一讲。5月3日下午，军代表李俊找我谈话。当天晚上就找了数十人抄了我的家，强行将我绑架。绑架时，用毛巾将我的嘴堵住，放上了大卡车，并对我进行拳打脚踢，把我关押于22中中等学校的三字兵司令部，完全失出了人身自由。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不能学毛选，不能看报，不能会亲属，连大小便都不能随便外出，生命安全遭到威胁。对于此事，我曾向三字兵联络总站和“特动”提出抗议。他们说：是经过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批准的。后来我又向你和孔庆德、韩东山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要求你们直接处理。但是你们置若网闻，根本不理。我也曾向支左办公室提出过六项要求，即：(1)我的问题由支左办公室处理；(2)到北京去告状；(3)向武汉市人民发呼吁书；(4)保障我的人身安全；(5)有权看报和学习毛主席著作；(6)每三天会见一次亲属。这六项要求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解决问题的诚意，相反你们却叫军代表李×告诉三字兵总站负责人谈。任爱生那三张大字报非常狠毒，要三字兵对我严加处理。在被扣押期间，我对你还提出不少要求，特别是要求保障我的人身安全，但你回避这个问题，一直到6月17日晚上，三字兵“特动”对我做出最后决定，我才不得已于18日上午9时越狱跳楼。……现在我仍是气息奄奄，人命危浅。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再次向你提出六项要求：(1)、你必须公开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2)、你必须为工人总部平反，朱洪霞必须立即释放；(3)、必须公开宣布支持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左派组织；(4)、公开宣布对“大专兵”、“乌拉希”要分化瓦解；对三司、三字兵当作一般群众组织和保守组织，绝不能作依靠；(5)、公开宣布解散联动、特动、黑武兵，并严加惩办首恶分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6)、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陈再道，你看过我的信后，可能暴跳如雷，可能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我和其它亮相的领导干部进行政治迫害，但我任爱生严阵以待，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生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生；我死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不管面前出

现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我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决心不会有丝毫动摇！ 陈再道，你不回头，就将加重你的罪过，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会饶恕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也决不会饶恕你，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林付统帅也决不会饶恕你！何去何从，由你选择，不过时局将迫使你迅速选择罢了。 任爱生于病中 1967.6.1

《红水院》1967.6.15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二千多百派围攻长办联司，90 多人被打伤。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军区发表 6.4 公告

武汉军区在 6 月 4 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

“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下午，400 多百派围攻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驻市委联络站，受伤 8 人、联络站被砸。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几千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工总、二司、三司革联等驻汉阳的联络站。

百派冲入大楼后毒打造反派战士并施放毒气，几十人受伤，十几人重伤。百派攻占了区委大楼，汉阳一片白色恐怖。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百派误伤解放军战士

解放军空字 659 部队三十余名穿便衣战士清晨乘军车往郊区参加支夏劳动。行至汉阳桥头，被百派误认为九.一三，遭伏击，对解放军战士拳打脚踢，当场数名战士血流满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机械学院二司战士游行庆祝中央《六. 六通令》时，六卡车百派把队伍切断，毒打机院同学，伤 20 多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工造总司”等以“文官政府”名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紧急公告”和《6.4 公告》针锋相对，号召全市工人努力生产、抓革命、促生产，加倍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防止武斗，并下达七条命令，禁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进攻武昌造反派联络站

六、七辆满载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驻在区委大楼的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区委大楼全部被砸毁，联络站 20 多名同学全部被打伤，5 人重伤。在场数千群众奋起制止百派行凶，也惨遭毒打。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围攻造反派驻在汉口民众乐园联络站

上午，近百辆卡车满载上万全副武装百派围攻驻在汉口民众乐园的工总、九. 一三、二司、新华工等联络站，多次冲击，打伤造反派 200 多人，死 6 人，重伤 14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围攻第二机床厂的造反派工人

1000 多百派围攻第二机床厂的造反派工人，打伤 40 多人，重伤 13 人，被逼跳楼 4 人，绑架 17 人(其中有到该厂去调查的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柴玉本)。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居仁门事件

凌晨 5 点，几千百派手持狼牙棒、带倒钩的长铁钩、长矛等包围居仁门红锋中学 36 人，企图砸掉二司的广播站，有的百派还穿了石棉衣，准备火攻并对红锋中学实行断水、断电、断粮。红锋中学二司小将坚守楼顶，向全市呼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三千有组织的农民袭击华中农学院，致死华农学生。

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秘书接电，提出要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嘲笑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吗”，不同意党委去研究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循礼门事件

晚 10 点，40 辆满载百派的卡车在江汉路横冲直撞，狂叫“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街道两旁小孩高呼“解散黑乌龟(即红武兵)，镇压反革命!”百派恼羞成怒，下车用长矛往人群中乱刺，受伤很多，当场被刺死 2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武汉钢二司《千刀万剐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始，连续出现汉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汉口六渡桥——第一次大武斗

百派首先抢攻中南旅社旁的财贸大楼，想以此作据点占领中南旅社，然后围攻人民文化园。下午一时许，一千多全副武装(头戴安全帽或钢盔，手持两米多长的铁矛)的百派向中南旅社奔过来。并占了财贸大楼。凭借大楼居高临下，砖瓦石头象雨点般打向马路。

一支由工总、一冶、工造总司铁军和“钢八司”组成的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杀向财贸大楼。其中二十多人冲上了二楼。

就在这时，百派从江汉公园派出七卡车援兵，包围了财贸大楼，七辆全新的大卡车，朝着群众冲来，几个小孩当场被压死，老太婆更难逃横祸，群众被铁矛刺伤，被车上早已备好的石头、酒瓶打伤。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硚口、人民文化园方面相继开来了十多辆军车，停在十字街口，解放军出面调停。

“毛泽东思想武钢九·一三战斗兵团”的“敢死队”，分乘三辆卡车从人民文化园方向过来，当一辆卡车冲入百派阵地时，一辆军车封住路口，卡截了后面两辆车子。“九·一三”的车上几十名敢死队员(除个别被群众救出外)几乎全部被打死。

与此同时，被围困在财贸大楼内的二十多人，大部份战士被打死。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特大血案中，有一百多名造反派，革命群众被打死(其中不少是十几岁的小孩)，重伤就有三百多名。……

十八日上午九点钟，百派使用了毒气、烟幕弹、硫酸和高压水龙，又一次向民众乐园发动猛攻。

从清队运动开始，对胡国基搞打击迫害，在长达两年的“学习班”毒打迫害之后，1970年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名义被“扭送”公安局，关押四年之后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间以“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胡国基又被收监，收监的名义是在毛主席逝世那一天还在贴大字报的“大不敬”罪名，最后法庭是以“反革命报复伤人、打砸抢”罪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在湖北××水利工地

调动农民与工地上的老保，用长矛、锄头、扁担围打工地上造反派，有150人被打死，1000多人负伤，使全国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汛期瘫痪。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在汽车配件厂

凌晨，约一万多百派和从东西湖市郊的大批农民围攻汽配厂联司二百多个上夜班的工人，使用匕首、大刀、长矛、高压水龙、瓦斯等凶器。二百多联司战士除几名幸免外，全部受伤，重伤50人，工人工程师杨正超等十多人惨遭杀害。厂内20台机床被砸，二月内难以恢复生产。同日晚，新华农战士也在武昌被百匪围攻毒打。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武汉革命造反派数万人在汉口民众乐园前集会

愤怒控诉百派大屠杀，追悼6.17死难烈士。群众高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百派内部分裂

原三司司令部驻汉口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袁军公开声明宣布退出三司，加入三司革联。百派内部一部分人杀出来，成立了“百万雄师革联”，声明坚决支持二司、三新，坚决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汉阳轧钢厂、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上千个手持铁棍、长矛的百派围攻汉轧工人总部，切断水、电，并用吊车吊至半空向楼内扔浓硫酸、燃烧弹、烟幕弹。工总战士高唱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英勇自卫，由于寡不敌众，死 8 人，重伤 100 多人。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百派调了上万人从水上、陆上围攻四院造反派，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困在大楼上，四院最后被攻下，造反派战士和家属死伤不计其数。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水运工程学院

万余百派和农民从水、陆两路围攻新水运二司战士，守卫大楼的水运二司、工总、九. 一三战士被逼全部跳楼，当场死伤数百人，被绑架 300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第二次大武斗

6 时开始，“百万雄师”叫战，广播促“工造总司”：“（1）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2）“将五类份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3）“将抓进去进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4）“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

针锋相对的广播员朱庆芳等控诉“百万雄师”、陈再道……放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8 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消防车开来几部，开始向“工造”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水龙头向“工造”喷水和当年电影中向罢工工人喷水一样。

10 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向“工造”大楼内抛石头，“工造”内已准备了大量石块予以回击。

11 时，强攻不下，“百万雄师”开汽车将“工造”大门撞开，准备杀入。

12 时，“工造”后面无线电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二十辆汽车全副武装的支援“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工造”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已看大势已去寡不敌众，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可怜广播员朱庆芳，小姑娘那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也被杀死。

当场杀死 28 人，杀死“工造”负责人联络部副部长王明杨，杀伤“工造”

负责人、宣传部长彭祖龙、保卫部部长严志斌、广播员姐妹俩朱庆芳、朱庆玲，一死一伤，姐姐朱庆玲肠子被勾出、致残。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大楼

长办造反派群众于 25 日深夜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只有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晚一点多钟，“长办联司”收到总理办公室七字回电：“那个东西不能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司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召开誓师大会，决心将抗暴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

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工总、二司等在武昌举行盛大游行

庆祝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6.26 来电，决心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并对百派中给蒙蔽的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思想攻势，使他们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日下午 5 点，武汉工学院二司宣传车在汉口水塔附近宣传中央 6.26 来电，群众拍手欢迎，在水塔上的 100 多百派二次冲出刺伤二司战士，重伤 8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武汉军区发出《通告》

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百派包围新湖大，并出动装甲车把新湖大围墙撞倒，

见新湖大战士就毒打，有一个路过的红体兵(造反派)因叫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被百匪当场打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钟汉华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社会上叫百匪，踏平什么，骂是骂不倒的，谣言被戳穿了，可以教育老百姓。红卫兵有的喊：“解散工总，欢迎受蒙蔽的起来革命”。很好。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问题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帐不对，但有的人的帐，还是要算的。

那些所谓造反派“三新”、“二司”不听我们的话，中央的话也不听，中央社论说成是大毒草。对“三新”、“二司”同意你们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错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时间更长。他们内部分化很厉害。

“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们的分化更有好处。

“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说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

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武汉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勤关于工总问题的报告
在工总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一直是参预其事的。三月份取缔工总，我们参加了，我本人也参加了，三月十七日全面大逮捕时，我是副总指挥

(一)工人总部的性质问题：可以肯定的讲，工人总部不是被少数反革命操纵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

(二)领导权的问题：工人总部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呢?据我调查了解，对照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十条以及历来逮捕人的规定，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认为朱鸿霞同志等九位勤务员绝大多数是好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尽管有个别勤务员有严重错误，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七·一五大血案——第三次大武斗

7 月 15 日，是武汉最热天气，武昌高校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当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经过汉口电车公司门口时，突然电车公司内“百万雄师”“闪电兵”武斗队冲入游行队伍，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双方发生武斗。半小时后，十几辆满载长矛、大刀“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到处追杀没有地方躲的学生，另一些就挨家挨户搜查，一直到晚上 11 点才结束，搜查出的学生 200 余人集体到电车公司，大个子关进大会议室，块头小的关进食堂，由区公安局出面审讯学生，要他们承认挑起武斗的责任，交待后台。

“百万雄师”包围搜查后，将王兴武查出杀死，另又杀死了几人，为了毁灭罪证，将这几位人遗体埋于东西湖，东心农场桃树林中，“百万雄师”农民总部所在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战士 吴克强《放开我，妈妈!》

贰、本节简论

一、湖北省文革形势大好，造反派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尽管当时中央并没有马上表示支持，但总的形势是很好的。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二司》等 12 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这表明，一些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热，在宗派主义、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支配下，在造反派内部争高下。造反派的这个错误很快就被执行错误路线的武汉军区领导人所利用。犯错误的头头们很快就清醒过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二·八声明》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要停止内战。并主动停止了历时二十天的全市大辩论。

二、武汉军区的某些领导人乘机打击军内外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徐向前到武汉亲自主持会议，徐向前问：“武汉军区为什么听不下来？”孔某某说：“我们的腰杆子不硬。”徐向前说：“反对面怎么办？”孔说：“抓？”徐向前说：“对！各总部、各军部都要抓。”徐向前说：“别的军区有反革命，难道你们武汉军区就没有？我不相信！要抓，你们还下不得手，不要怕，有武汉军区作后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日，武汉军区继续镇压军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宣布了「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反革命组织」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宣布解散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勒令 48 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它组织”。十几天之内，逮捕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并逼二司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

三、造反派愤起反抗，军区领导人坚持错误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造反派乘《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情况。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 4 月 21 日接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棉事件，开始了保守派殴打造反派，造反派到公安机关、军区搞静坐。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 3 月里被捕的工人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声称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拒绝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几千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工总、二司、三司革联等驻汉阳的联络站。开始了六月份的武汉全市大武斗。

2011 年 9 月 5 日修改

第四章第九节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壹、本节概述

一、南京军区下属各部开展“四大”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所属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

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一是对地方造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二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

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部的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一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

斗队，其他各部门也纷纷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

军区政治部“四大”一开场，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向军区领导“开炮”的大字报，直呼“尊姓大名”，特别是有些人，“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还有不少部长出面写的大字报，例如：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日左右，宣传部的摄影干事陈时秋写了一张大字报

陈时秋认为：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他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

这张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是：陈时秋和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苦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得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一片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

这次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

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

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但秩序井然。

会议中间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军区“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他们的

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大叫：“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接着，他们强令领导人“低头”、“弯腰”、“请罪”，并强令领导人“跪下”接受批判，并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政治部的人很快撤离会场，并让军区领导人也离开了会场。他们又把文化部的方泽浦揪住不放，也要方泽浦“下跪认错、请罪”。

有人把这件事描绘成“轰动性”的新闻，说成是“军区政治部发生了反革命叛乱”。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南京军区后勤部一部分人，召开批判大会。

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

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

赵玉祥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

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

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

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

许世友当时在北京开会，当他听到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大厅里糊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向许世友开炮”；听到“一、二四”大会的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这还得了，这些乌龟王八蛋造反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要翻天啦！”他一再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打电话，要求王必成“立即把那

些造反的人抓起来，首先把政治部那几个造反头头抓起来”。但是王必成感到“抓人”这样的大事要慎重，不敢下手。杜平政委，鲍先志付政委，林维先付司令员都不赞成。

二、许世友下令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有 30 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

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

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许世友认为“八条命令”就是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放手大胆干了。他很快提出了一套类似“镇反运动”的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造反派头头，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而后定罪判刑；

——“抓人”的标准和对象：谁写大字报，谁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就把谁抓起来；

——动用部队：六十军 181 师；

——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军区党委“第一线指挥”：付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1967 年 2 月 9 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 陈荣安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

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 60 军 181 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王主任亲自听取造反派的意见。

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

还有两位军区付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王六生主任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当天下午，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怠”。

南京军区司令部的“舆论班子”，大量炮制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高、方、艾”为首的“造反派”猛烈开火；把政治部的“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

二月十八日以后的日子里，南京军区天天抓人。

施关彬、陈时秋，于第二批、第三批被抓走了。

新闻科李少白副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宣传部战士教育科副科长杨炳仁，因为过去犯过某种错误，这次也被抓起来了！

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等等统统都被抓起来了。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 8 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

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园、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

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

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

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

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

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

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

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

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

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赵玉祥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 60 集团军 181 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 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被关押的人，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被关押的人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 181 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

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 916 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

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短短几天之内，按“官方统计”，总共逮捕的有 505 人。实际上究竟抓了多少人？

实例一：许世友原安排六十军 181 师师部所在地，作为被抓的“反革命”关押地（临时牢房），以为宽宽有余。可是几天后，这里“囚犯”爆满，装不下了，不得已又到镇江附近的小移庄营房另开辟一处关押“囚犯”的牢房。仅一个师部营区关押的人数也大大超过数百人。

实例二：军区后勤部被抓的“反革命”，集中关在南京上新河的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在这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 700 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后勤部在大礼堂后召开批斗大会，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参加，“专职人员”，高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赵玉祥、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被押解到南京军

区后勤运输部批斗。

田从洵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指控他是机关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

于国城任营职，指控他是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赵玉祥任营职，指控他骄傲自满。

周乃馨任连职，指控不详。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人物，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了一批。整个行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

按照许世友原计划，除了第一批四人（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浦）经军事法庭宣判，关进大牢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关进大牢的人，就是高丕忠、艾汉美等人。其他的人，有的要“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有的要去农场“劳改”。

许世友在南京的抓人行动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引起了北京的注意。

三月底，“军委十条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之前，许世友已经从北京上层领导得到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许世友开始释放被他抓捕的军内造反派艾汉美等人。

艾汉美释放后，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领导给他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

一九六七年四月，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和县，后勤部某工程团劳动改造，其中赵玉祥、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

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人。这批人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艾汉美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军区政治部在他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的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严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他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陈时秋、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到浙江义乌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负责文教卫系统。

南京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干部，被许世友“清洗出门”，流放到浙江各地。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

三、南京军区受压的干部要求平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号，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叫张春桥去接他。

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毛主席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并同意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

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

许世友对别人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

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顾少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付科长）等人经过多方联络，取得二十军领导的同情与支持，通知南京军区政治部下放浙江的部分人员举行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人：有被许世友“抓捕”、“关压”的造反派头头，有一部分科长、部长，有不同部门的代表，共计 40—50 人。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九人。即：

高琏章（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

王元仁（干部部科长）

孟祥海（青年部付部长）

陈永安（“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夏继诚（“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顾少杰（宣传部付科长）

陈培光（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

陈时秋（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科干事）

这个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开始大家推选陈时秋，过了两天，陈时秋提议把这付担子转交给艾汉美。

一九六七年八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曾部长找赵玉祥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赵拒绝了这个任命，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赵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给二十军发“急电”。

电文内容是：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

并列出了抽调的 40 人名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的电话指示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赵树湘，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后来，这四个人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在杭州召开了南京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

会议主题：就是筹划“赴京告状”的有关事宜。

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中旬，浙江的南京军区干部“批资总部”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人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人、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人，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朱顺潭（嘉兴野战医院医护人员），揭发控诉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通知朱顺潭到这里谈话。

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

“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

“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两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晌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

没有多久，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

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

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赵玉祥透露：

“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

“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

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

“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

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

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

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赵玉祥等平反小组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副书记谭友夫。

走访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

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旬，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等地，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压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同志作了个别交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晚上，中央调查组在南京空军招待所，专门召开了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艾汉美和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 200 多干部的代

表，赵玉祥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刘锦平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 340 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 20 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 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 916 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刘锦平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汇报进行到凌晨 2 时 15 分。

会后，“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同志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

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黄朝天（要塞区司令）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联合成立的“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付政委鲍先志，在南京AB楼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代表。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张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学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

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甫（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么？”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 27 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玉祥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玉祥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玉祥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

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 74 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

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

林维先、鲍先志也一致表态：二月抓人肯定是错的，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肯定也是错的，应该平反。

由军区政委杜平，副司令员王必成等人，以军区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检讨报告。因许世友一直在大别山上，不下山、不发话、不表态，前后写了好几遍，一稿、二稿、三稿，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这时，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

南京军区后勤部 9 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 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 86 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

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玉祥。

林副司令说：“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

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鲍先志中将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

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
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
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

南京军区总医院 8 个小护士，都不满 18 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参加了告状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他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 21 名代表作

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至午夜 12 时 50 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不承认告状团 21 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代表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代表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下旬，周总理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晚，周恩来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亲自布置解决军区内部问题的学习班。

这次参加会见的人员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等同志；还有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 8 时左右，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付政委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总理到来。总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总理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报告总理，

全部到齐”。总理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张波涛突然听到总理点他的名字，声色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到”！

“你老家是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

总理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一位官员座位处“崩”出来的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反应灵敏的总理，立刻明白了“条子”的“内含”，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二十一人”，那位递条子的官员提出。

总理略加思考，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杨！”（周总理这样称呼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

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

杨代总长接着进一步安排了学习班的有关事项。

根据总理指示，十二月八日，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南京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付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二十一名代表”有两人：艾汉美和李英武，“七名代表”有一人。

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始终没有出现。据说，许世友正在中南海里“养

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 21 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二十一名代表的意见。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 人也在主席台就座。

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会议自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6 日历时 14 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

在大会上，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揭发南京军区在二、三月“抓人事件”中打击迫害造反派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 22 人，开除 8 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

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 [68] 18 号文件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

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了，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

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 error 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 error 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 error 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 error 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

康老：

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 error，这些 error，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 error，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 error，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 error，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

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 error，他自己也承认的。

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

江青：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

总理：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

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四、许世友擅自决定批判“倒许乱军”分子

一九六八年二月某日，南京军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

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发表讲话，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不报告中央，竟擅自决定点名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斗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南京城掀起了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风潮。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的大街小巷、大会小会，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付”，“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的罪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浙江省革委会诞生的日子。许世友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天特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

到会的干部有二十军、浙江省军区及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南萍，熊应堂等负责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

由许世友训话，他说：“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王、林、鲍’北京出了‘杨、余、付’，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我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我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啦！我们要捉住它！斩断它！”“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了，统统要揪出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许世友从杭州回到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代会”。

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这次“积代会”，以揭批“杨、余、付”、“王、林、鲍”这条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干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

在“积代会”上，军区政治部直工科干部许某人作了一次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他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列出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并在这个会上，一个一个点名，亮相，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及其他造反派头头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给每个人头上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抓牙”等等。

许某人在台上点到某个人的名字时，台下就有一伙“助威的啦啦队”，立即发出吼叫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附和，加油的预备队”，临场吆喝一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学习班初期，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他强调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但是，杜平的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舟嵎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营级参谋朱雷等一大批舟嵎要塞区领导干部，被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家也被抄了，在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经历了残酷斗争。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二百多人，奉命调回南京，重返白水桥，参加学习班。

李书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章兆琪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

艾汉美被定为“头头中的头头”，“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在学习班未开始之前，李树和等人指使“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对他连砍了“三斧头”：

一天晚上，正当艾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二十来个凶神恶杀的陌生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艾感到莫名其妙，简直“祸从天降”。艾他们说：“我与你们既不相识，又无来往，无冤无仇，有什么问题好清算的？”这帮人气势汹汹，扬言要把他“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艾家四周围满了群众。有的气愤地说：“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天中午，艾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过来了。这回，他们真的动手啦！对艾拳打脚踢，把碗筷饭菜、桌椅、家俱，砸的稀巴烂。接着，又把艾和陈时秋两人一起绑架到“军区军人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现场批斗会，强迫他们“低头”，“弯腰”，“下跪”，“架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天上午，艾汉美等人乘坐卡车，前往白水桥。当汽车到南京中山东门外

的卫岗时，又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拦截下来，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艾汉美滚下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他们又一次被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里，又是低头、弯腰、架飞机，又是一番批斗。

白水桥营房，“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嵎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

“舟嵎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嵎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等人。

在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营区内，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讯、不准接见亲友。进了这个学习班，如同进了一个大铁桶，几百人全捂在这个大铁桶里，这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赴浙江“三支”、“两军”的 200 多名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批资总部”的成员可谓“众矢之的”。他们被精心编排在不同的班组里。每个班组由李树和挑选的“精英强将”担任领导骨干。“重点”人物被分割包围在各个班组中。每个“重点人”都有专案班子负责内查外调。

李树和虽然只是保卫部的副部长，他成为学习班的唯一负责人。无论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总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传达“许司令指示”，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办”。他和许世友之间有“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一切听许司令的”。

这个学习班初期，许世友亲自到学习班讲话：“你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不要指望谁来保你们，救你们。我说过，杨、余、付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了！不管是谁？都要揪出来。这个学习班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收兵”。他还说：“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反对毛主席，那就不行，我就不答应”。“我曾对毛主席表过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打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谁要想造反变天，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就要开杀戒了！”有一次，他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一天晚饭后，谈某邀艾汉美在附近散步“转一转”。他俩边“转”边聊。当“转到一片平房时，谈问了艾一句：“老艾，听说你们去年被行政看管的地方，也是在白水桥，就是这一片营区吗”？艾应声答了一句：“对呀！就是这里，我被关在第二排平房里”。这样“一问一答”之后就“转到”别处去了。

第二天，我艾所在的宣传部小组学习会议上，刚刚开始，支部书记肖某大吼一声：“艾汉美！站起来！”

这当头一闷棍，使艾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啦？”

“同往常一样，准备检查材料”。这样答非所问。

肖某十分不满地说：“你心怀鬼胎，装蒜！”

“我来揭发”！这位“揭发”发言人，正是昨晚同艾“一问一答”的谈某。

他说：“昨天晚饭后，艾汉美别有用心地把我带到他们去年行政看管的地方去，给我指明他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介绍他们怎么挨整！怎么受罪！对我进行现场说教。我感到他讲话的味道不对，赶快离开了。”

接着，对艾展开了大批判。学习小组组长王某人说：“艾汉美昨晚对谈某的现场说教，是公开地同我们学习班搞对抗，我们在学习班里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而艾汉美却在行政看管现场，控诉我们这个学习班还在继续镇压群众，这不是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又是什么？毛主席说过，反动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艾汉美的这次现场说教，就是一次活生生地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现在倒许乱军的黑干将，黑头目野心不死，仍在继续活动。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把他们批倒批臭”。

一九六八年五月，陈荣安一九六七年二月写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作为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白水桥学习班，被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

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

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校张蕴茂。

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

重来之后，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某某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自杀了。副部长苏国勤被逼疯了。

吴俊红小鬼出身，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诸多的学习班，唯有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许世友一再说“政治部是重灾区”。带头“造反”的，带头“赴京告状”的，带头反许的，都是政治部的“乱军分子”。

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

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斗、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师以上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穆增祥、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

一九六八年某月，“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 20 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又命令 20 军沈云章副政委速来“南政班”。

一九六八年六月，赵玉祥成为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了 120 天（6、7、

8、9 四个月)，定了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走到那里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赵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批判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学习班党支部给赵戴上 7 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李树和召开学习班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央电报指示，中央批评南京的‘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是多中心论的口号，是帮倒忙。

李树和统一规定：“以后把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去掉倒许两个字”，保留‘乱军、夺权’四个字。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是陈时秋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小组会上逼陈交代是攻击毛主席。

当时，陈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由于天天逼迫交代，逼得陈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

其实，学习班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陈，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陈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

（到北京学习班后，高岳言告诉陈“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要逮捕你的准备哩！”）

一九六八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开始了。周贯五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等 12 人又被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间，白水桥学习班由宣传部召开对艾汉美的批斗大会，其他各部派少数代表参加，总共约有 50—60 人。

这次大会持续三天。其中，艾作检查两天，对艾批判一天。

事先学习班支部书记肖某告诉艾作检查不怕内容多，不怕时间长。

艾按照学习班原来的要求，把每一个故事过程讲完之后，归纳小结，“上纲上线”，都是六个字：“倒许、乱军、夺权”。

对艾的批判发言，比较平和，与学习班开头对艾的那几次批斗会，气氛大不相同，没有低头、弯腰、下跪、“驾飞机”等动作。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赵玉祥第二次下放到后勤某工程团劳动。

一九六九年元月，赵玉祥因肝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

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赵谈话，冯对赵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

五、中央决定南京军区的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紧急会议，李树和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今天先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学习班到达北京后，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

此时，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许世友对他们二人说：“这次

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还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不倒，也不能把你们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王蕴瑞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

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学习班。

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李树和又在会上慎重其事的宣布说：“经学习班研究决定：艾汉美等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

廖容标副司令亲自坐镇学习班，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学习计划，报经毛主席亲自圈阅。

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

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学习计划的核心，就是彻底批判许世友鼓吹的“倒许、乱军、夺权”的“多中心论”口号，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军队的错误言行。

学习班的领导班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各部门的学习小组，分别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学习班全体成员对候选人投票选举。最后，由得票最多的七人，组成新的学习班领导小组。

这七人的名字是：

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湘（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成员 李广中（文化部科长）

成员 纪国城（政治部军事法院法官）

成员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干事）

成员 郭群生（青年部干事）

成员 井洪寿（组织部干事）

新选举出来的七人领导小组，有部长、副部长、科长，又有一般干部；有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也有持“保守派”观点的人，还有持“中立”观点的人。七人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赵树湘作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是许世友要打击的部长一级的代表人物。纪国城和艾汉美则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

5月18日，游览长城。

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十三日、四月三日，在北京学习班上，舟嵎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先后三次在舟嵎要塞区 700 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

舟嵎班办公室主任整李朝龙一再动员朱雷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他宣称“这是党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朱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查批准，在舟嵎班 700 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朱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

（以后，朱雷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八个月的支左工作，就成了朱的罪状）

一九六九年四月，赵玉祥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上班，并且派他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

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

“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

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 4 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陶春和代理科长说。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赵玉祥回答。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

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 1—567 页，时间：1967 年 6 月 5 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

“啊那有那么多？”赵玉祥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 500 字计算，那就是 25 万字。在集中营里关押了 45 天，平均每天写 5600 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 5 天，却被逼写出了 25 万字的“罪行”材料。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北京学习班召开了一次交心大会，团结大会。

这次大会，按照领导小组的预先安排，由各部门的代表介绍本部门前一阶段总结经验，促进团结的心得、体会。

会议开始不久，有一些同志不满足于这种“泛泛而谈”，主动上台，自由发言，各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展现大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群众情绪高涨，会场气氛骤然活跃起来。领导小组因势利导、“顺水推舟”，

使会议迅速掀起了群策群力地“消除分歧、促进团结”的高潮。

艾汉美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带头上台“讲团结”的一员。他向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同志发出誓言：

“从今以后，我们要把同志间的分歧，裂痕甩到太平洋去！”

“从今以后，我们要与群众中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他在台上的表态和誓言，当场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陈时秋，施关彬等坐在台下的同志们当即站起来振臂高呼：

“我们要与过去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

此时，坐在台下的另一位同志王某，也是宣传部的。在白水桥学习班，他是学习小组的头头，是批斗艾的积极分子。他在艾发言之际，“唰”的一下站立起来，高声急呼：“听了艾汉美同志的发言，我很受感动，在白水桥的时候，我批判他言词过激，调子过高，他不计较这些，我现在也表个态，今后再不要在群众中分这一派那一派，不要群众斗群众”。

艾与王某在会上的表态，当场又带动其他同志、接二连三纷纷表示“团结一致向前进”的愿望和决心。原来计划这个会开半天，结果开了一整天。

最后，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同志总结时，非常高兴地说：“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好！确确实实地开成了一个交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是近几年来很少能见到的动人场面。”

廖副司令员也非常满意地说：“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好！体现了团结的新局面！”

中央联络员老王说“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成功！说明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水平不一般”。

有一些同志说：“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在北京开的确实好！到了南京，那就又不一样喽！”

六、许世友借整顿机关大批赶走批评过他的干部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到南京，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

许世友说：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

政治部通知，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上午，许世友在南京部队体育馆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谈“整顿机关”的问题。

他说，最近毛主席签发了一份关于军队干部复员的文件，军区机关要精简，给大家打个招呼。

毛主席签发的这份中央文件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的更不属复员之列。复员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全国将 41 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

一九六九年六、七月，赵玉祥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看望赵玉祥。

郭政委对赵说：“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

赵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1969 年国庆节前夕赵玉祥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赵在家休养。

一九六九年八月起，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

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 7 条出路：①支左、②去生产兵团、③去人武部、④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⑤连以下干部复员、⑥轮番下放劳动锻炼、⑦营

以上转业。

许世友违背党的政策，把一批又一批地把营以上的干部复员回乡了。（当然，复员干部本身就有问题）

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

一九六九年八月某日，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陈时秋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

此时，陈的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陈谈话，说他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他提供情况。陈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

根据以上情况，陈时秋补作为复员处理。

陈时秋是建国前参军的干部，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 6000 元复员费卖断了。他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一家七口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他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工资 47 元（原工资 96 元），以工代干，任摄影记者。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第三批走的是孙皓月科长。他是中校，是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老资格科长，当然不属于“复员”对象，但许世友又以“精简机关人员”为名，与“复员”对象一起“滚蛋”。孙科长被流放到安徽皖南深山里的一个县人武部去了。李少白付科长稍晚一些时候，也被赶到安徽的县人武部去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陈荣安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陈作复员处理。1969 年 10 月初，陈复员到浙江湖州，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前后，组织上正式宣布艾汉美“复员”的决定，是军区政治部复员干部中离开较晚的一批人员。

一九六九年十月，组织上找赵玉祥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赵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赵谈话，敦促他到生产建设兵团去，赵仍然拒不服从。

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曾对赵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也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赵玉祥说：“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

赵回答很干脆：“那就复员吧！”

协理员说：“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

赵同意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赵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艾汉美一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毅然决然离开军区家属大院，把家搬到南京远郊的工厂里安顿下来。

他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两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一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走。

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

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赵玉祥（参军 20 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 100 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 36 元（在军队月工资为 108 元）。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 5500 元的复员费卖掉了”。

七、许世友借清查“五·一六”大批逮捕干部群众

一九七〇年四月起，南京军区开展清查“5.16”运动，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历时三年多，比六七年二、三月间实行更大规模的大抓捕、大镇压。

1971 年，许世友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功：已经挖出“5.16”分子 1190 人，还有嫌疑对象 2000 人。

被许世友委任为“前线总指挥”的吴大胜上报数字是：隔离审查一万多人，江苏全省清查“5.16”分子二、三万人。

当许世友调走后，江苏省委的正式调查结果：三年多清查，江苏省共有十三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死亡两千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据江苏省委调查，南京军区被打成“5.16”的军级以上干部达 84 人之多，仅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 11 人。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

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

这时，许世友也大声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〇年四月，原华东军区军械部部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李仲麟，被扣上“516”帽子，逮捕入狱，关押在娃娃桥监狱一个单人牢房里。李仲麟被关押不久，即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幸亏发病时他强撑着身体趴到牢房门口，用头撞牢门，看守发现，送到某医院抢救，才得以保全。基本痊愈后，批准他保释回家继续治疗。他还是落得个半身不遂的病症。

李仲麟出狱后，带着病残身体只身上北京告状，据说通过孔从周（炮兵工程学院前院长，毛泽东的亲家）的关系，把申诉信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许世友一状。

一九七〇年七、八月间，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陈荣安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陈荣安的“5.16”假材料，以及陈荣安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罪行”材料，导致“5.16”假案。

陈荣安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出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查，家属也受株连，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朱雷被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骗出380医院（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长刘宪华指挥下，给朱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朱申辩。

1970年10月5日。普陀守备区党委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朱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XXX率2名战士强行押送朱一家回山东老家。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朱和妻子张志敏与押送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全站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边，一致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XXX连长灰溜溜离开现场，

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警备区求援。普陀警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 6 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的押送措施。

顾永年缓解了押送措施，让朱的家属携二个幼子逃脱。朱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

朱雷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跃求援，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朱雷又上访北京状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

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惠兰都被逮捕入狱。

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五日深夜，赵玉祥在家中被当地派出所秘密逮捕，直接投入南京市娃娃桥监狱。

1970 年 12 月 5 日晚 11 时，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赵玉祥家，对赵说：“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赵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拿起一件棉大衣，向妻子郭泽俭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走就是三年。1973 年 11 月 1 日，被无罪释放。

赵玉祥到了派出所，军代表向赵宣布了逮捕令，要赵在逮捕证上签字，被赵拒绝了。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赵反手戴上铐子，把赵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赵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赵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

狱警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军代表指导员说：“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

苦头吃”。有一位看守说：“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

赵大声对他讲：“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

看守们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赵填写，又被赵拒绝了。赵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看守问赵：“你叫什么名字？”赵不回答。又问：“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赵说：“我家住在红花地 24 号”。看守：“怎么写？”我回答：“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红’。花是葵花向太阳的‘花’。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地’。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赵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赵，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赵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赵“进去”！

一九七〇年底，朱雷到军委总政上访，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并给我写了公函。

朱雷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嵎要塞区。

一九七一年初，清查“5.16”开始后，许世友决定短兵相接，亲自审问史景班。

这天，由李树和陪同，许世友与史景班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史景班！你跟‘5.16’组织是什么关系？”许世友开门见山、单刀直通要害。

史景班毫无思想准备，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搞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好？只是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明白许司令这话的意思”。

许世友的火爆脾气，一听史景班这吱吱唔唔的答话，很不耐烦了。

“你别装算！‘5.16’是什么货色，你不清楚吗？军区政治部那些跳得高的家伙，不是‘5.16’吗？你跟他们没有联系？现在我不讲明，让你自己坦白交代，早交代早主动。”

许世友这番话，史景班听明白了，回答说：“我与军区政治部造反的那些人，是工作上的关系，他们中间有没有‘5.16’，我不知道。”

接着，许世友问道：“批资总部的头头，上北京告状的那些人，他们参加‘5.16’的活动，你能不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上前两步，直逼史景班跟前，把桌子一拍，大吼一声：“史景班！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别人已经供出了你的‘5.16’罪行，现在给你坦白机会，你还嘴硬，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我与‘5.16’毫无关系。”史景班坚定自信，理直气壮地同许世友顶了几句。

许世友怒火冲天，怒不可遏，“啪”地一声！狠狠地朝史景班的脸上，抽了一耳光！史景班脸部被打得通红，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但他没有惊慌，没有失态，仍然平稳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

（一九七四年，史景班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被中央任命为昆明军区副政委）
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极其神秘的口气，向葛化领导人大谈一通“艾汉美在南京的罪行”。而后，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

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

对这些问题，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

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听了这番表态后，大为不满。他们没料到，葛化厂领导人竟敢对南京军区这样的大机关不买帐。于是，他们就合盘托出“许世友”这张“王牌”，说“我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是我们许司令的意见，艾汉美的问题，是许司令亲自拍板决定的”。

他两原以为，只要抬出“许世友”来，谁敢不屈服？那晓得，张瑛同志回答是：“不管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军内的事情军区内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由地方上负责”。

南京军区的那两位军官，只好“扫兴而归”，葛化党委书记张瑛的态度，得到党委副书记张琦及党委成员吴官正等的一致支持，没有按照许世友的指意去办。在这之后，南京又给葛化寄来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群众揭发的“艾汉美‘5.16’材料”。葛化领导仍然坚持不办学习班，听候南京的审查结果。当然，本来打算重用艾的计划也只能“暂停”了。

艾汉美免遭“隔离审查”的劫难。但当年同一起“反许”的几个人，如：南京的赵玉祥，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等，由于处于许世友的权力控制下，一个个在劫难逃。

一九七一年五月，朱雷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实政策。

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朱的一举一动。

1971 年 5 月 5 日夜，他们派一名干部率领 5 名战士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8 时，将朱雷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

深夜 11 点 30 分，普陀警备区军管会的吴掌林对朱进行毒打，并责问：“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

翌日，一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朱雷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蟥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朱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朱的绑架，借给朱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岛看朱。朱妻一到桃花岛就与朱一块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 35° 高温下，依然把朱一家三口人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下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

尽管土牢门上加了锁，土牢门外设了二道岗，依然 24 小时不分昼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

他们指使四名战士，对朱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朱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朱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朱的胸口要枪毙朱！

宋干、栾经诚等人，还用饿饭手段摧残他们。有时一天只给他们三口人二餐饭，有时一天只给三口人中的二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连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一点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

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的第二天，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一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

回来。

一九七一年六月，普陀守备区正式认定朱雷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志”的“5·16反革命”。

1971年6月30日，宋干等人突然把朱一家三口拆散，把朱雷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逼朱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轮翻对朱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折磨到黄昏，打得朱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鳞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

“九·一三”以后，又诬陷朱雷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

朱雷的六十多岁的老娘得知朱的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朱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对朱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了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您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您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朱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朱的老母回到了山东老家后，对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朱雷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在押送途中对一再扬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朱雷乘车北上申诉冤屈，讨回公道。在绳子胡同2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嵎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在舟嵎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朱的一家人的罪行。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干事卢淑琴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的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

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

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

一九七二年十月下旬，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来函，说陈时秋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

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部郑汝培为专案组，同时受到派出所的监控。

不久，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

但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嵎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

朱雷无奈只得再次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一九七三年三月，有一天突然看守打开号子门在门口高喊：“3002 出来！”。看守把赵玉祥带到提审室。

主审台上已坐定了 5 位解放军。正式审讯开始了：

问：“你的罪行很严重，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你认罪吗？监护你为了爱护你教育你。关了你这日子，你该反省过来了。谈谈你对你所犯下的毁我长城，反党乱军的罪行”。

赵答：“我没有罪。我的问题，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1968 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都解决了，党中央早有定论，毛主席接见过我们，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接见大会上当众给我们平反。如果你们说我有罪的话，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摆在什么位置上？我建议你们三思，你们不要犯严重错误！”

问：“你狡辩！关了你这 29 个月，你的肝火还这么旺，脾气一点也没有改，看来还要给你服败火的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给你吃败火的药，为了挽救你，希望你转变立场，认罪！”

赵答：“你们秘密诱捕我，关押我长达二年五个月，长期不审讯，这些都是非法的。你们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笔帐一定要清算的！”。

问：“我们对你很清楚，你辜负了党对你的长期培养，个人主义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不悔悟，我们为你惋惜，你能说，也能写，有水平，具有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经验。我们对你是有备而来的，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赵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有备也好无备也好，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专政方向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矛头对准我的吗？这是大前提，大前提错了，你们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当然认定我态度不好”。

问：“今天是我们审讯你，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样吧，你回到号子里再好好想想，写份材料给我们，明天就交上来”。

赵答：“可以”

第二天赵就把材料交了上去。

过了几天这 5 个人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个，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

问：“你写的材料我们拜读了，那不是交代罪行、低头认罪的材料，那是一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材料。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揭发你的同伙，争取立功和宽大处理”。

赵答：“我实事求是，一贯如此。这是一。第二，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写的材料，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不搞实用主义。你们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这是你们的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这一个我不能乱来，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上、道德品质上，为了自己“活命”而无中生有去诬陷好人。我至死也不干这种勾当。对不起，不能遵命”。

当天晚上七、八点钟，赵玉祥和犯人发生口角，这是常事，被值班看守发现了，以“大声喧哗违反号规”为借口把赵喊出去，训斥一番之后，给赵反手戴上了铐子（双手腕铐在腰背后面），一铐就是七天。七天不能睡觉，洗漱饮食，大小便均不能自理，都由犯友帮助。看守对赵说：“你太顽固，有必要对你施行刑具教育”。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看守突然呼叫赵玉祥的犯号：“3002 出来，把东西全部带出来！”

又进了提审室，6 位“同志”端坐在那里，他们请赵坐下。

主审对赵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属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属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对你宽大处理。出狱后，要继续交代问题，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外传，要严格保密。有问题我们还会找你，还看你的表现”。

赵回敬了他们一句：“谢谢你们的关照！”。

1975 年 1 月 18 日，中共南京市委给赵玉祥平反了，平反通知书如下：

赵玉祥同志作为“五·一六”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

中共南京市委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

并按每月 36 元补发了三年工资。娃娃桥监狱得知赵补发工资，寄来一张发票，要求工厂财务，在补发的工资内，把三年关押的伙食费扣下来。工厂财务没有征得赵的同意，把三年非法关押的伙食费给了他们。

八、许世友离开南京，遗留问题不了了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许世友离开南京。

一九七四年五月中旬，南京军区复员到湖北的艾汉美、湖南的洪期钩，南京的赵玉祥，浙江的陈时秋、高丕忠、陈永安等从各地汇集南京军区政治部，提出我们的冤假错案谁来了断？

政治部派了两个干事对付他们。

他们提出：“军区清查我们的‘5.16’问题，已有好几年啦，总该有个结果吧！”

“究竟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我们是‘5.16’呢？”

“军区不是早就要对我们隔离审查，现在我们送上门来，要抓要杀请便吧！”

那两个小干事“无可奉告”，只能是“向上汇报”。

“磨”了几天，终究给了一个“巧妙”的答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艾汉美的‘5.16’问题予以排除，有关‘5.16’的材料由各单位自行销毁”。

洪期钩等也得到同样口径的答复。

一九七四年，由于“支左”军代表大批调走，浙江省革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宣办增加五名临时负责人，陈时秋为其中之一，陈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摄影报道，抓好全省摄影工作；经支部大会陈被选为委员、副书记；负责《宣传通讯》审阅；参加政工组“批林批孔小组”；协助严永洁（省委书记谭启龙夫人）从中央文化部领受的文艺批判等工作。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朱雷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他一家的的事实，浙江省委全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朱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书记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

谭启龙书记于 5 月 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①舟嵎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②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③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朱雷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

后，他讲：“你记得没错”。朱雷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 13 号楼，210 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论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朱雷问题处理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

这个复查处理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

这个“部门意见”，首先，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员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

一九七五年四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县委，承认寄了关于陈荣安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然而，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没有恢复陈荣安在“5.16”假案前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浙江省委调陈时秋到舟山定海本岛马目“学习班”学习。

中央 [75] 16 号文件的规定，“办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学习班”。

“学习班”设在马目公社北岙大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省广电局领导周林同志。其他有广电局记者徐运灼、宗伯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陶汇章，《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省法院审判员余荣夫，火车司机谢志明，杭钢工人张小定，汽车厂工人孔汉茂，杭大学生李显通等约二十多人。后来派来一位“省红

暴”派的农民张来根。

经过三个多月的无人管理的所谓“学习班”，只有靠自觉，自己学习、自己劳动。

11月初，“学习班”集中到地委党校，集中揭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要上纲上线到“反党、篡权、复辟”。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对陈时秋执行隔离审查，

关押在浙江展览馆三楼讲解员休息室，多次拉到宣传部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

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陈交代“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陈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陈交代攻击华主席。陈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

谢兰生为头儿的专案组，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

省委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查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铁瑛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指使舟嵎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朱雷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嵎要塞 65 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厅长的李朝龙，对朱雷进行非法拘留，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朱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18岁长子被解雇了工作。

在狱中，公安局对朱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

朱雷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违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并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

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诉。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经浙江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陈时秋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

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陈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陈的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以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不让家属探视。“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

陈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陈的家，拿走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1950年参军，分在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工作，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被隔离审查，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80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酷，一片“红色恐怖”。

专案组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陈时秋的“十大罪状”：

(1) “恶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去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

(2) “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师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师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

(3) “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滨翻案。

实际情况是：“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活脱脱一个陈世美）。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出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表态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

来吧。

一九七七年某月某日，陈时秋被提审了一整天，要陈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陈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

把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络点。

一九七七年，在清查运动中，原吴兴县机关的某些领导人，把陈荣安的申诉活动（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陈荣安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他平反假案），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对陈荣安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杭州市公安局向朱雷发出“释放证明”，明确告诉他：拘留他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过铁瑛书记。

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在狱中绝食抗争，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在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朱雷保证，在朱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

失。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也向朱雷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朝龙一封信，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热情欢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监狱大门。

朱雷出狱后，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兑现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帐了。他又去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铁瑛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他再去省公安厅告诉，竟然遭威胁和恫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

朱雷置公安厅的警告不顾，毅然再次赴京上访。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的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 罪状一：“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 事实是：陈时秋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查。张永生建议他们向党中央申诉。 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 事实是：1974年11月在北京，陈时秋和高丕忠去看望周建人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陈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

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嵯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责’。” 事实是：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军。舟嵯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手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

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嵎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给铁瑛写信反映情况朱雷的情况。

后来，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

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事实是：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省宣政[1979]120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浙江省检察院发文，浙检一起[79]11号，《免于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

12月25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陈

时秋被匆匆释放。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郑汝培送我陈时秋去故乡安吉县红旗林场劳动。

林场有陈家的亲戚，知道陈时秋的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陈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陈如亲人。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陈时秋《劳动、思想小结》（摘要）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 77 年 6 月 10 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我从十二岁（1945 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于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于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 72 年 10 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委，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 72 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 72 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 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

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宣传部周永祥到林场对陈时秋说：“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

陈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

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

陈时秋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浙江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 [1982] 75 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 [79] 11 号《免于起诉决定书》。”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他们平反落实政策。

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

他们公然向朱雷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珠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问题”。理由很简单：“这是在清查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指示”。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浙宣干 [1984] 11 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 [1979] 120 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

宣传部领导周群对陈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一揽子解决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某日，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向陈时秋宣布定性结论：“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

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旬，浙江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陈时秋谈工作问题，要陈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

陈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

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陈时秋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

校领导和同事们待陈时秋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多年，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照片上了光荣榜。

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发了浙宣干 [85] 38 号文件。

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 1981 年 11 月 19 日以公群(81)12 号文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时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

公安局对朱雷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 1977 年 3 月 23 日被我局拘留审查。经审查，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 1979 年 9 月 29 日释放”。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楼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

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 318》文件。舟嵎要塞区《(1988)党

字第 35 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 年 1 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陈时秋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 [1993] 24 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

陈时秋在杭电返聘一年到 1994 年 10 月正式离休。

二 00 五年六月十日，陈时秋向浙江省委宣传部申诉，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 [85] 38 号文件的结论。

贰、本节简论

所谓“南京军区镇压军内倒许乱军分子”的问题，实际上许世友镇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南京军区一些给他和军区其他人贴过大字报的人的问题。

受打击者之一的艾汉美，在他的《石头城的风雷》一书中，最后说了这样一些话，这里介绍给大家：

“南京军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许世友一次又一次地压制和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这是一场激烈地短兵相接，反复多次地生死大搏斗。

许世友从始至终，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压反革命”、“反击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在许世友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天下，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就是他许世友的天下，他就是“许家天下”的“皇帝老子”，唯我独尊，至高无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自始至终总是把那些给他写过大字报的人，反对过他的人当作“坏人捣乱”，当作“右派翻天”，当作“反革命暴乱”。肆意动用部队、动用真枪真刀，采取专政手段，把那些人统统抓起来，大批大批的抓人，成千上万的抓人。凡是能够用上的种种罪名，统统套在那些人头上，施行“坐牢”、“判刑”、“劳改”、“开除”、“清洗、滚蛋”、“扫地出门”，株连家庭亲友，制造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在南京军区历史上，造成空前规模的大劫难、大灾难，致使整个南京军区不计其数的干部、群众蒙受深重的冤屈、痛

苦和伤害。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许世友既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加上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项头衔，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他疯狂推行“多中心论”，公然标榜“以我为中心”，以“拥许”、“反许”划分敌我，判断是非，凡是拥护许世友的人，就是革命派，就是大左派；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大坏蛋。

在当年的“许家天下”，许世友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许世友的话，就是“王法”，就是“圣旨”。他一再扬言：谁要造他的反，他就把谁抓起来，就专谁的政。我们新闻科的摄影记者陈时秋同志，是一位十三岁起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的红小鬼。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为许世友的随身摄影记者。陈时秋以其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和欣赏。陈时秋偏胖，许世友喜欢称他“胖子”。那几年，陈时秋成了许世友走到哪、带到哪，形影不离的随员。文化大革命中，陈时秋出于爱护领导的良好愿望，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希望许司令保持优良作风的大字报。李树和把这张大字报汇报给许世友，他勃然大怒，不问长短，不分青红皂白，冲口而出：“胖子造我的反，我就专他的政”。许世友“金口”一开，陈时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5.16’分子”，被开除党籍，先在南京的白水桥被“行政看管”五十多天，后又在浙江蹲大牢三年多。

南京军区文革期间，不只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遭到许世友肆无忌惮的压制迫害，还有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是一样在劫难逃。某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许世友仅凭着道听途说，无证无据的“揭发”，亲自出马，多次审问逼供，硬要这位少将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该少将坚强不屈、拒不就范。许世友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大骂一声：“给我滚！滚！”就是这么一个“滚”字，使这位少将回到原单位，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死去活来。有人向许世友反映：“这位老红军，从小参加革命，久经考验，一向忠于党，忠于人民，怎么可能是‘5.16分子’呢”？许世友一听，马上改口说：“那好吧！不是就不是”。由于许世友“开恩”，这位少将的命运才算出现了转机。请看：许世友的话多“神”！他一字可以送“死”，一字可以送“生”，他岂不是成了当今的“皇上”吗？

当年，面对许世友的横行霸道，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尽管深受其害，饱受苦难，但我们没有吓倒，没有畏惧，没有屈服，而是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凭着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定信念，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在南京贴许世友的大字报，在抗州造许世友的反，到北京告许世友的状。明知征途有风险，迎着风险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身家性命，与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作坚决斗争。为保护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为履行党章、宪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为伸张正义、维护真理而斗争。

我们这些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无名小卒，在许世友的强权势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用许世友的话来说：是一群只需他“一脚就能踢死”的“乌龟王八蛋”，哪能经得起他的“少林武功”、“用脚一踢”呢？但是，我们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挚拥护和鼎力相助。我亲身经历就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我每当危难关头，或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总有许许多多地好心人，和我心连心，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六八年，在白水桥“围剿批资总部”的学习班里，我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之际，与我素不相识的范传典同志，本来是“奉命”负责“监视”我的动向，他却反而“倒向”我这一边，冒着“投敌”的风险，变成我的“内线”，充当我的“秘密情报员”，给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

六九年，当我被复员“扫地出门”，四处安置无门，又被逼着我们全家下农村，面临奔波流浪之时，幸好军区政治部的卞庸中秘书长、文化部的王浩科长、还有我爱人所在工厂的周厂长等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同事；就是靠他们对受压群众的同情与仗义、对许世友蓄意整人害人的不满和愤慨，及时给我提供了“避难所”，给我“救命信”，帮我闯过难关，使我全家顺利走向新生活。

我复员到武汉之后，又被许世友诬陷为“5.16”反革命，再次面临“铁窗”之灾。又是幸亏我所在的厂方领导张瑛等同志，这些同志对我在南京的情况并不清楚，然而他们靠着共产党员的正气和良知，识破了南京军区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毅然顶住南京军区的“命令”，才使得我免遭一难。

事实充分说明，普天下的人民大众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我们对许世友

的抗争，是顺民意、得人心的正义行动。我们赢得人心，“得道多助”。因而我们的抗争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策群力地群体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我们经历了十年抗争。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使我们经受了痛苦与磨难的煎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场灾难，使我们受了苦，遭了罪，损失了很多、很多；也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增添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敢。这是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是一笔世代受益的精神财富。当年，许世友一再狂叫：“造反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他要“统统杀光！”他恨不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但是，历史的发展同许世友的痴心妄想、诬陷、咒骂，恰恰相反，我们这些人有“上帝”保佑，“苍天”照应，我们并没有被整倒、整死，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二〇〇一年以来，我数次去南京、上海、杭州，见到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南京的孙海云、赵树湘、季遐年、纪国城、冯玉章、尤亮、夏继诚、孙宅巍、陈培光；上海的赵玉祥、张炳奎、周自求、方源瑾、吴燕京；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施关彬等等。除了因病过逝的洪期钧、陈荣安等同志外，我们相见的这些同志，可以说是南京军区当年造许世友反的主要代表。四十年后，我们亲切相见，欢聚一堂，举杯畅饮，谈笑风生，百感交集，无比兴奋。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变老了，头发变白了，多数人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有些已经八十以上的高龄啦！我们从大难中闯过来，还能活到今天，而且活的很硬朗，一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堂堂正正，健健康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胜利！我们这些人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个像许世友所宣判的那种“坏蛋”、“反革命”。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同志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好战士！”

2011年9月18日初稿

第四章第十节 广州解散省革联

第十节 广州解散省革联

壹、本节概述

一、省革联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全家学语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接管公安厅

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 13 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 10 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公安局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

晚上 12 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 13 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

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

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

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

下午 4 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人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 18 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是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等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八一中学、七中、铁路中学、省实验中学、华师附中、十三中、十六中、十七中和二十七中学生为主的主义兵，在广州再度活跃起来。

华师附中出现了两张令人瞩目的大字报，一张题为《我们就是好汉》，另一张题为《满天怨恨满天仇》。两张大字报，都重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并说：“我们红五类就是靠对联翻身的。对联就是好得很！好得很！我们是顶天立地的自来红，我们里里外外都红透了，崽子们，叫你们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大字报又呼吁：“革干、革军子弟，狗崽子骑在你们头上，你还沉默吗？抬起头干下去，干下去才有活路，砍头如同风吹帽，坐牢算得什么！”

（二）一些人冲击军区，军区取缔一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一部分军队院校学员、文艺团体的成员，串连回来后，要烧一烧军区，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打了一些领导干部，戴了高帽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一部分地方造反派参加了冲击军区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一）

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

我人民解放军应该坚决捍卫和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昨晚部分同志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

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十七时三十分

命令（二）

一、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二、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广州面临港澳，情况非常复杂，希望你们提高警惕，不要介入这场冲击，应该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八条命令。

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二十时三十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发表大联合筹委会宣言，参加发起的单位有 14 个总部，所属成员约 27 万

由地总、红总发起的筹委会，从 1 月底就开始酝酿串连了。

2 月 4 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发出“实现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倡议书。

2 月 21 日晚上，一致通过吸收‘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参加了‘省联总筹委会’。”

省联总核心小组成员包括：王云亭（红旗工人）、吴开东（三司）、李广（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何登培（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陈保伟（红旗农民

总司令部)、黄秀琨(地总)、冯春青(市工交战线红旗造反总部)、赵树安(一司)、张礼敬(省政法革命委员会)。由地总的黄秀琨担任核心小组组长,办公地点在原省委大院内。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

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

总理: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主义兵四处出动

一口气砸了七中红旗、十六中红旗、二十四中井冈山、二十中井冈山、三十八中井冈山、五中东方红、华师附中红旗、广雅八三一、中学红卫兵广州兵团、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组织总部。大街小巷,到处响彻了他们的怒叫声。在广州兵团门口,他们贴了一副大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滚蛋,老子反动儿好汉”,横批是:“狗仔子翻天”。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省革联垮台
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
凌晨 4 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然的行动，按预定计划，一举捣毁了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原计划拘捕 130 名首要分子，实际拘捕 243 名，其中有些是其他组织抓来，或自动投案的。该组织七名常委中，有五人被捕。

在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飞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主义兵继续搞抄砸

下午，华南实验学校、铁中、广雅、三中、七中、四十四中、五中、十七中、六中、二十一中、十五中、十三中、四十中、二中、八中、红一中、外语学校、人民一中、华师附中的主义兵，在八一中学开会，决定先砸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然后再砸五中、六中的对立组织。他们宣布了行动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私人财物；讲文斗不讲武斗；作好打的准备。

他们对前来劝阻的空军联络员说：“我们决心都下了，谁说也不能改变。我们已开过会了，人都通知啦。珠影太坏了，我们抄这一次珠影就垮台了，以后就不抄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主义兵砸珠影东方红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宣布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几名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成员向驻公安局军代表低头认错

军代表提出四点意见：一、你们自己来，我们抱着欢迎的态度；二、你们在公安局所作所为，要很好交代，要承认错误；三、在公安局拿走的东西要送回；

四、军管小组随叫随到，不得违抗。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至六日，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三日，警司主持召开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

有 150 个群众组织、市、局、公司及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共四百多人参加的广州市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指挥部由警司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分领导干部组成。这是领导全市生产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警司在中山纪念堂、省人委礼堂、省科学馆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万人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警司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

清晨 4 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 15 个人，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八百多人，包围了珠影东方红。

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 6 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散会后把被捕的人带走，民兵、部队撤回，行动在 7 时 30 分结束。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均奉命整风。

广州一司、三司、华农东方红公社、外语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中山医东

方红公社、华工红旗公社、中医学院三〇一大队、广东艺专学校东方红公社、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广医红旗、广工红卫兵、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先后开始整风。而尚未有动作的单位有暨大、华师、行政教育学院和美院。

整风的办法，通常是先用一周或半月时间，进行动员和学习文件，然后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检查整改步骤，进行整风。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广医红旗召开全体队员会议，

负责人公开检讨，承认反对军区的错误，“向毛主席请罪”。解放军联络员在会上发言。广医红旗无话可说，随即派代表到军区请罪。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警司宣布取缔中大红旗等一批造反派组织

中大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

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

与此同时，军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纷纷奔赴各单位，演说、宣讲、做报告，批判省革联是“右派夺权”、“假夺权，真保皇”。

解放军开进了省委大院。

广医思想兵、继红军等组织，派出汽车上街报喜；

华师一月风暴等组织，也派宣传车上街广播；

中医三〇一打电话给军区祝贺说：“解放军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由解放军接管广东。”

广州三司表示：“通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东方红派代表到电台检讨，暴动纵队也派人到工程兵司令部承认错误。

3月1日，中南林学院东方红公社，开始整风，大鸣大放。据军区文教组反映，“各群众组织对东方红公社意见很多，主要是：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没有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群众要求解散监督小组，彻底闹革命。

对中南林东方红参与了冲击电台、冲击工程兵司令部等活动，要求公开向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广州一司开除广医红旗，并在社会上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警司发出关于在广州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应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各外地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陆续撤离广州。

至3月12日之前，全部撤离广州的有：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驻穗联络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北京工业大学驻穗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穗联络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井冈山之声”、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赴穗点火队、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等33个组织。

撤离后尚留部分人员的有：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穗联络站，留下八人办报纸；清华井冈山驻穗联络站，留下四人办报纸；哈军工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警司留下16人交代问题；武汉三司被警司留下三人交代问题。这类组织共12个。

还没有撤离广州的，只剩下一个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穗联络站，共三十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广州一司、三司中学部等单位发起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五千人参加的大会，表示支持解放军

会上有 12 个群众组织代表发言，七中红旗等四个单位代表则“向毛主席请罪”，并声明过去他们所攻击军队的传单、漫画、标语等，一律作废。

大会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信。

会后群众上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中学开展军训，准备开学。

在省体育场召开有几万师生员工参加的“中学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市十二中、二十二中、三十四中、省实验学校、铁中等校的学生，纷纷回校报到，参加军训。

当时中学开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教员与学生关系紧张，被斗过的教师不愿在原学校工作，要求调动；武斗过教师的学生怕报复，不敢回校；二、组织涣散，领导班子难以形成，夺权组织管不了事，学生生活散漫，不接受管理，下厂学生，工厂不放；三、思想兵与主义兵矛盾很深，势不两立；四、公物损坏严重，桌椅缺损相当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组织——地总也发出“当务之急——开门整风”的号召

总部以及所属分区、分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全面整风运动，“整掉队伍内不自觉地滋长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根据）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对总部进行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纯洁组织”。

地总是和军区关系较好的群众组织之一。他们兴高采烈地把 3 月称作“东风浩荡的 3 月，成绩辉煌的 3 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广州一司发表公开表明，对他们曾在电台围攻军管小组，表示认错

声明称：“对于受我们攻击过的电台新领导黄业同志及其他解放军同志，我们诚恳地表示向他们赔礼道歉。其外，驻电台小组在撤离电台时，为了掩饰我们一司参加电台‘一.二二’夺权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印发的《一.二二电台的夺权是革命行动》的传单，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在此，也一并声明作废。”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

黄永胜公开批评了省革联：“省、市人委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广东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得较晚，革命左派还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和联合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就把一个省的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的一小撮人，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革命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抵制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不仅妨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而且也对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布第 1 号布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公安厅二办开始对省直站下属 102 个群众组织（其中重点组织 27 个）展开了全面调查。

同时结合调查的有暨大东方红、暨大工人大队、中南林学院教工红卫队、省中医学院反迫害大队、中南科学院等，

另抽调七八名干部负责调查中大红旗、八.三一等组织。

初步调查结论，把 27 个重点组织分了类，定为一类的（条件是“三冲一抢”，搞白色恐怖，干坏事多的）群众组织十个，1670 人；定为二类的（参加“三冲一抢”，但问题一般）群众组织八个，1693 人；定为三类的（有一般活动，但问题不大）群众组织九个，801 人。所谓“三冲一抢”，即冲公安局、冲军区、冲电台，抢文件。

对一类组织的头头，无论是幕后指挥的、为首的，还是转入地下的，都要严厉打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省市军管会开始打击“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

和“非法组织”

凌晨 1 时，省公安厅和警司派人到广州远洋分公司，逮捕了“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的三名负责人。

清晨 5 时，警司在市公安局配合下，突袭“老红军总部”，拘捕了九名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二办领导小组开会（专政小组寇庆延、马芳、鲁少泉等人参加）研究“省直站”的性质问题

初步认为“省直站”（不包括其下属组织）属于反动性质。但又觉得定为反动组织太重，故初步定为非法组织。最后省直站被划为“内定反动组织”，不戴帽子，列其罪责，宣布取缔。

所属基层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进行取缔，或不定性质勒令解散的有 17 个。其中省政协分站、粤剧院在险峰战斗队为反革命组织；文化局东方红、广州海关革命造反总部、粤剧院东方红、省话剧团东方红、省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分站、南海水产研究所 1110 兵团、省化工机械进出口公司革命造反大队、省政协东风战斗兵团等被划为反动组织；中南公路工程处修配厂联合兵团被划为右派夺权单位，勒令解散。除此之外，还有六七个被列为重点组织，“接近反动组织边缘”。人员方面被列为打击的重点对象 15 名，其中准备拘留五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

《广州日报》在翌日发表社论《广州的第一声春雷》祝贺，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实行了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单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广州市军管会就“镇反”问题召开会议

江贤玉在会上说，“目前，对敌人打击不力，反革命气焰未打下去，与广州军区首长要求还差得很远。”

他提出目前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解决干警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使广大干警认识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对敌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内外反革命复辟，我们就要人头落地。”第二，“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为了适应当前要求，打破关门主

义办案，各级领导要深入第一线，不要在机关批案，要在那里抓人，就在那里批判斗争。”第三，“加强宣传工作，教育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第四，“下次战役行动主要是解决打击敌人不力的问题。”

初定 4 月 2 日为第二战役的日期。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大武装部以召集红旗工人赤卫队骨干会议为名，在驻中大部队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拘捕九名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管小组陆续进驻各重要地区和单位。

（三）中央处理广东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讲话

广东是边防地区，还有两个口，香港、澳门可以自由出入，它们随时可以钻进来，要依靠群众和军管建立革命秩序，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不是推迟，更不是代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

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市各组织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赵紫阳让权实际是逃避责任。你们（指华工红旗）没参加，很好。我们当时在北京听说你们“夺印”，都很可笑，没有权，先夺印。听说后来只好把印送军区去了，谁也不要。

三月份中央处理了这件事，纠正了，实行了军管。

华工红旗：我们认为与“八·一八”之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斗争到底。

华工“八·一八”：我们认为“红旗”不是造反派。

三司：介绍，略。

总理：看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你们三司不可能包括全部的大学，也不可能只有三司才是左派，必须搞大联合。

总理：广医“红旗”谈一谈，两派都上来。

广医“红旗”：举出与其对立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群众组织及驻军代表的讲话
曾经夺权，但搞错了或有严重错误通过军管解决（象广东等）

广东本来想通过军管促进一下，但开了五天会，看来还会有所反复。

“1·22 夺权”大方向还是对的，这夺权的方法当时的作法是极严重的错误，逐步地脱离群众，又上了旧省委的当，我看还是上了当，没有经验，急于夺权。

广东“1·22”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省革联”夺权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不论参加或支持省革联的，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请罪问题，而应自我批评。

军管前发生了从冲后勤部开始到冲击军区。这分两部分，一部分从军队院校内部开始，由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一起，串联一开始，就都到北京等外地串联，所以一下命令回来后，带着一些余波，要烧一烧军区，打了一些领导干部，戴了高帽子。到二月七，八号就开始冲击军区，这件事本身是错误的。冲军区，地方同志也没进去嘛，除了个别的刚才说的以外。

公安局夺权是另外一个情况，先夺权的是外来的进去的，而且还有北京政法公社参加的，军管后证明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做得是不大好的。这个不责备他，

我们还是把他送走了，安全送走了嘛。

广播电台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广播学院的几个同学揭露出来的，本来是支持造反派的，摸了以后证明这两个少数人的造反派不仅成份不纯，主要是作风，他的做法、方向都错了。北京来的广播学院同学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站在它对立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群众把他们揭开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形。

在这里军区也跟着犯了一些错误。军区宣读了军委两项命令（指二月八号军委来的命令）后，虽然逮捕多了一点，但比起其他地方也不严重，共逮 450 人（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组织头子，其中最多的是八一战斗兵团）已放 169 人，在押 281 人，广州以外，逮捕 238 人（已放），交易会开始前，于三月廿二日至三月廿八号一周拘捕了 508 人（数目大），放了 280 多人，过后还准备放一些，总共三次捕了 1196 人。

四大事件：“1·22”夺权，“1·25”反夺权（公安局）、冲击广播电台、二月七号、八号冲击军区，军区并没有把这个做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

《颠倒》一文文章发表很早，是发表在《新北大》广州版上（二月廿八号登的），在小报上也没什么，当时没有闹出事来。错误在于南方日报三月十二号转登（有删改），三月十四号广州日报转载并加了按语。文章没有做阶级分析，没有一分为二，如“省革联”夺权的大方向也没肯定。压了革命造反派。

“一声春雷”（指铁路局夺权经验），一声而已，不那么响亮。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不那么够。但还是想搞三结合，方向还是对的，革命造反派有一部分没有吸收进来，无产阶级权威的确也不够，但可以改进嘛！

还有一个问题是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还没有成熟，但也不必解散。工人组织分成“工联”（即誓师保卫毛主席工人大联合造反总部）、地总、红总、红旗工人赤卫队、广东红旗……、广州工人……、六种组织，应该承认“工联”是革命造反派；红旗工人赤卫队分裂成两派，但总的还是革命造反派；广州工人……、广东红旗……，看起来应该也是革命造反派。“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

支左工作没有完全做好。但支左对广州军区则是七大任务之一（七大任务是：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作战、备战）。军区支左是有成绩的。但也犯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如左派摸得不那么准，但可以改嘛！

既然“1·22 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省革联”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可以改，就不要去责备“省革联”。认为支持“省革联”就是错的、就是反革命，反对“省革联”就是革命，这都不行。这还不在于“四大”事件里的，还在以外。这种标准都是错的，不应该成立，应该取消。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

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以上，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与“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

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

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

常委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也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贯彻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够，没能正确地识别和坚定地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军区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较晚，情况不了解；介入时，正值一些革命左派在省革联夺权，市公安局反夺权，冲击军区和军管广播台中犯了错误的时候，正值粉碎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指向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的时候，当时我们对造反派的错误看得过重，许多同志带着对某些革命造反派极不好的印象，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对待省革联夺权和冲击军区等“四大事件”的态度去鉴别左中右，而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例如对于一时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左派，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甚至不适当地取缔，解散了一些群众组织，错误地抓了一些人。反之，对于某些偏于保守的组织，则认为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没有参与“四大事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在实际上，起了压抑革命左派的作用。正如一些小将批评的：“你们对一些革命左派的支持，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对一些有保守倾向的组织，态度暧昧，脚踏两只船”。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

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康生对广州军区黄永胜等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和解放军报记者

24 日晨，总理单独接见了广州“红旗工人”、中南局联络总部和解放军报

记者各一人，谈话主要精神：

1、广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红旗工人”、“工联”、“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为核心首先联合起来。可以分三步联合：(1)基层战斗队的联合。(2)中层分部的联合。(3)各总部的联合。

2、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 2—3 万人，双方签订的四项协议是靠不住的。

3、总理指出：“春雷”（是铁路系统的老保）已走向反面。

4、造反派不要介入他们（公安局）的问题，要依靠他们自己解决。“125”的确是个大杂烩，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但不要推到保守派那儿去，要团结大多数帮助教育他们。

5、总理指出先孤立分化瓦解“地总”、“春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交红旗”、“红旗工人赤卫队”可以争取。

（来源：1967 年 8 月 25 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 132 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州赴京代表团时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周恩来就广州各派执行“制止武斗四项协议”发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广州“贫联”去参加了“地总”举行的工革会，介入了武斗，打伤打死 180 多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州“贫联”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要有独立性，要有独立位置，成立独立组织。

打电话回去通知广州，1. 不要开大会，“九·五命令”发表后，发生武斗是不对的，刚刚发生武斗，你们又开大会，这样容易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2. 把留在军区警卫营大院内的贫下中农劝回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黄永胜在接见广东各地代表时的讲话
具体解决几个问题：

1. 要为韶关“八一工农兵总部”平反。谁出面的就由谁出面平反。如果军区出面的，那就由军区出面为你们平反。

2. 要派部队（带枪）到四会，保护你们（造反派）回广宁。要把被关的人都放出来。

3. 海南那个冒充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要调查。你们把他抓起来，送交军分区，我们责令他们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广州“旗派”五名代表时的讲话
极左思潮不光你们那里有，全国普遍都有，你们也受了一些影响。

主席视察后，集中地提出了四个字“斗私批修”，你们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吗？是主席回来时在列车上找三派谈话，什么道理都讲了，最后送给他们四个字。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工交红旗”和“地总”代表的讲话

军区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两件事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改了就行了，比如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

要破旧立新，把不合理的制度要打碎，要革命化。

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不是刘少奇的黑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广铁分局两派关于维护广铁分局军管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实现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双方代表的谈话

总理高兴地说，广州三个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了，十万人的大会不要延期了吧？

革筹小组还是五个人，陈郁同志不是主要的嘛，孔石泉同志在下面搞得还不错。革筹小组就这样定了，你们要是相信中央的话，就是那五个人，我们发扬民主够多的了，先成立起来。

现在两广要赶快赶上来，两广都在前线，你们广东我本来已向主席报告，月底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又拖了十天。

主席最近指示，“包括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承认错误，认真改正，得到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站出来，重新站到革命队伍的行列里。”

今年夺权斗争中发生了新的问题，一月份激进的一部分组织先夺了权，但很多没有夺好，没有联合另一派来夺权，一派夺了权，把另派排除在外，这是搞不成的，从一月份到现在，取得了经验，就是推动联合。现在存在的问题，两派中有一派是偏于保守的，当然，这个联合中有的可能激进些，有的可能保守些，都是群众组织嘛！不和群众组织联合和谁去联合呢？以左派为核心是肯定的，但不能以哪一派为核心，自封左派是可笑的，是愚蠢的，一定要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考验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执行自己签定的协议。以前保守现在不保守了，前进了就好了。左派不能吃老本，老同志几十年的老本，几下子就吃光了，你们才一年半的功劳，不是一下子就吃光了吗？

主席最近批示：什么叫牛鬼蛇神呢？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二、广州地处边防前沿，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加强军民团结，大力支持军区做好支左工作。

三、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当地驻军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一协议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州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广大工人，海员和铁路员工已经分别以不同形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和林彪同志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讲话，警惕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或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斗私，批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提到形势问题，最近有这么个估计，总会有人这样想，认为形势不那么好；但多数人认为形势还是大好的。说这种话的人，是急躁的、有派性的。这些人想那一派还在，对立派还在，这是从派性出发。悲观论是站不住脚的。希望你们回去批判悲观论。虽然有走资派，特务，美、蒋间谍，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存在，但是大局已定。所以，对形势不能说不好。不能

听走资派，特务分子，坏人的挑拨。

把你们过去的什么“广老谭”、“一小撮”等错误口号全部肃清。我们反对象“揪军内一小撮”这类极“左”口号，但不能让右的思潮复活，即不能让老保翻天。再有不能让坏人复活，兴风作浪。

是什么原因解放不了一大批干部呢？最重要的是有走资派象赵紫阳等挑拨，和其他因素。赵紫阳是叛徒喽！第二种原因是地方主义，这次认识多一些，以×××为首的一小撮，把中央批的人，排在外边，南下的干部起带头作用这是好的。不能拿缺点来否定主流。地方主义不应该翻案。批判地方主义，就是批陶铸的，不然陶铸怎么能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怎么能叫他两面派呢！受地方主义影响就容易造成小资产阶级派性。第三个原因是坏分子，例如郭风、黄士民挑拨你们。他们不把你们向好的方向引导，而故意挑拨，这不能怪群众，怪他们。

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们！欢迎你们！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地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不这样作，就不能搞斗批改，就不能搞大批判。

康生同志：文件上讲，我五月份到广州，去是去了，那是接受中央专门任务秘密去的，没有什么重要指示，因为当时不能公开，只是最后在夜间，临上飞机前才与黄永胜同志谈了谈，因为是专门任务去的。文件这样写，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向同志们抱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十二条协议

贰、本节简论

一、造反派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省革联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

这次夺权有很大的缺点：省委把大权轻率地让给了‘省革联’，而‘省革联’在接权以后，又唯我独‘左’，排斥其他革命左派，也没有结合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八日，一部分军队院校学员、文艺团体的成员，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打了一些领导干部，戴了高帽子。一部分地方造反派也参加了冲击军区的活动。

二、军区混淆敌我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委的某些领导人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直接下了两道命令，支持广州军区抓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由地总、红总发起的偏向保守大联合筹委会发表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提出广东立即实行军管，毛泽东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至三月初，主义兵四处出动，一口气砸了几十个造反派的总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省革联垮台，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省市军管会开始打击“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和“非法组织”。

三、周恩来指出军区错误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群众组织及驻军代表的讲话指出：军区也跟着犯了一些错误：逮捕多了一点，但比起其他地方也不严重，共逮 450 人（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组织头子，其中最多的是八一战斗兵团）已放 169 人，在押 281 人。广州以外，逮捕 238 人（已放），交易会开始前，于三月廿二号至三月廿八号一周拘捕了 508 人（数目大），放了

280 多人，过后还准备放一些，总共三次捕了 1196 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黄永胜与造反派代表座谈，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四、各群众组织之间争地位，直至武斗，长时间联合不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这说明，广东问题也深受“二月逆流”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的讲话中，周恩来总理称：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这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2011 年 9 月 20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一节 吉林瓦解三大造反组织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长春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红革会，二总部、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群众组织共同组成第二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这几个革命群众组织，退出了二总部。并串连工人组织共同组成长春公社。

省军区认为这是搞“分裂主义”；组成的长春公社是“分裂主义的产物”，不予承认。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长春公社在吉林省军区门前集会游行，表示对军队支左工作有意见。

吉林省军区认为这是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派人上街参加辩论，印发传单，以及在广播和接待来访中，散布“长春公社大方向错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长春市发生“二·二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林军区派部队参加对“二·二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散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吉林省军区对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负责人和肇事人，

一时许多群众被迫打着白旗请罪，长春公社也被压垮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下旬，吉林省军区在组织地、工、光整风时，提出“三个彻底”（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使“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的组织解体了。三结合筹备工作也没有吸收他们参加。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先后恢复了组织。省军区认为他们还在继续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

我们支持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红革会，二总部，这是对的，但是压制了另一个革命造反派——地、工、光、野和他们串连革命工人组织等成立的长春公社，这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又迟迟没有认识，没有改正，给长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感到十分痛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

中央认为，你们《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是正确的，你们的检讨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一定能够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中央认为，在吉林应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的同志和“红革会”、“二总部”的同志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敌，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贰、本节简论

关于吉林省的文化大革命资料，收集到的很少。

吉林省军区虽然也受到“二月逆流”的影响，压垮了“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的三个造反组织，但比起其他一些地区来说，所犯的错误就轻微多了。

经过几个月，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检讨起来确实是：“痛痛快快”的，

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

2011 年 9 月 20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二节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福州部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有人冲击大会、妄图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
要韩先楚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先楚两天两夜。

“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
福州军区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有人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

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

一些地方出现“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召开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贡献。

这个反扑的特点是：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福州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
康生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福州召开声讨大会，
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
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
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州军区作出决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三、中央着手处理福建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廖海光：对 1·26 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 1·26 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 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

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了，就发生了批判斗争。

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 12 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福建从 1·26 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 300 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 74 人，福建中医学院 400 多人抓了 11 个，扣留了 14 个，3 月 26 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当时 2·11 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

们 2·11 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 12 个同学，2.13—2.22 开三次全县大会，到 3 月 5 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远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六点左右，抓了 12 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 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

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 1·26 好得很！

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

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 1·26 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

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 1·26 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 28 日来的，26 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柯纠耿：1·26 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 1·26 问题粗暴，简单化。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 8·29 有什么用？发现的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三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怎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总理：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 1·26 事件及 2·7 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汇报谈福建问题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

总理说“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吾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

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总理：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研究，解释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

韩先楚：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

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总理：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贰、本节简论

福建军区的问题也是受“二月逆流”的影响。

1，“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行为过激。

2，福州军区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认友为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要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方向错误。

3，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火上加油。

4，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立即响应。

5，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慌忙出错。

6，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军区召开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一错再错。

7，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也是一错再错。

8，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六点意见：（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5）在1·26事件及2·7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6）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开始扭转。

9，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正式结论。

10，韩先楚承认主要错误有三点：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态度较（许世友）好。

2011年9月2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重点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你们不要把矛头不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也不指向反党集团。比如现在斗争的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而不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同彭真一样。有反党罪行。斗争的矛头一定要对准。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深刻地批判主要人物。肃清他们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说成是什么“圣人”，一直用反动的孔子思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孔子思想成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解放以后，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他们在革命阵营里的代理人，为了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千方百计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维护和散布封建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他们还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毒害劳动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伙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公开地鼓吹“尊孔复古”，便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大罪行。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能有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孔子思想以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立身之地。不把它们连根拔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建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铲除反动透顶的孔子思想，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一批红卫兵小将们当了大破孔子思想的急先锋，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密切配合下，在这方面已经敢

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倒斗垮斗臭，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一、狂热地歌颂、美化孔老二，恶毒地污蔑、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大肆宣扬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

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辱骂党的领导。

四、妄图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打扮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五、鼓吹人与人“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妄图模糊阶级界限，抹煞阶级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

〔按：早在 1950 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大搏斗！由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使《清宫秘史》至今没有得到批判。刘少奇、胡乔木等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下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检查中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部分。〕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 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二) 一九六七年三月重点批判刘少奇包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

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贯串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在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

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三）一九六七年四月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提出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不会分散力量、妨碍夺权斗争呢？不会！恰恰相反，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把他的罪行充分暴露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开火，从而在共同的斗争中，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更好地奠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彻底批判了这一小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划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界限，划清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执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的界限，从而促使更多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大推动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的文章：《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社论：《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都要坚持的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我军在执行支左、支工、支农等项光荣任务中，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所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的反扑，打垮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权，掌好权，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如果我们把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那就会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减弱和分散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批判的火力。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干部问题是当前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绝不是什么“转移目标”，而是正中目标；这个批判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毫不相干”，而是关系大得很。

有人大嚷什么“革命派是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家”；又有人在胡说什么“我们执行了压制群众的反动路线，你们执行了打击干部的反动路线；我们保护了一小撮，你们打击了一大片，大家彼此彼此”。对于这些谬论，必须痛加驳斥！

有少数人，却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作任何阶级分析，不区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而笼统地区分什么“群众”和“当权派”，认为“凡是当权派拥护的自己就要反对”，“干部起来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就不去积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极端错误的。

（四）一九六七年五月着重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大批判的谈话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加写的二段话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

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修养》一书的关键是什么呢？

它的关键，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关键是背

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彻底革命的批判精神，大破大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象一根光彩夺目的红线，贯彻始终。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破旧戏舞台上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那种否定工农兵、颠倒历史的反动现象，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狠抓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作舆论的准备。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时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破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大破奴隶主义的《武训传》，大破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大破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大破大立。一切

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大批判、大斗争的目标，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拿起笔杆握紧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反击。这是我国文化革命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武器，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利用“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来征服人心。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必须争夺的前哨阵地。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总要先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敌人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就要高度重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夺回他们窃取的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正如《座谈会纪要》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

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不仅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拿起笔杆子，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泛滥。我们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作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作勇敢坚强的突击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拿起枪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任何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将被我们彻底粉碎。

（五）一九七六年六月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陈伯达在文艺界“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上的讲话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我们这次召开的大会，是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支持包庇的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总攻击、总清算的信号。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的斗争大

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和稀泥”，你们这是“捏合”。不对！什么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今天最大的原则，就是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这个大方向的是和违背这个大方向的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握住大方向，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斗争大批判，怎么叫“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林杰的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不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极端相反的，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上，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奴隶主义主张盲从，不要真理；无政府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无政府主义奉为绝对，同样是不承认真理，主张盲从。我们既反对奴隶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反对用打倒一切政权、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去代替奴隶主义。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指出：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文章：《痛打落水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这是当前北京市一切工作的纲，是全市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日报》社论：《革命大批判的模范》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斗争、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开辟了十几个战场，举行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社论《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呢？

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不能！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公开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指出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和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四方面代表谈话

周总理说：我给你们供给一个材料，刘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嘘他在安源的历史，主席不吭声，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实，主席一直在领导安源斗争的。萍乡的煤、大冶的铁、汉冶萍公司，当时安源运动是湖南省委去领导的，主席全部历史都清楚。主席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刘少奇总是吹嘘，跟我说过几次，（对姚文元）跟你也谈过几次吧。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从二十年代入手批判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跑到苏联去不到一年，回来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还不仅是安源，还有上海，还有广东，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广东省港大罢工他也插了手，其他的我就不讲了。

我听到不下五次，很奇怪，以为有什么名堂，总是程咬金那么三斧头，当时还不会想到八月以后的情况。批判刘的根子要从二十年代搞起。真正批判刘的话，二十年代很多可批。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年前的今天，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里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

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②④。“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②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几段批语
文元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应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

还宜在二三个月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阶级已不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八）一九六七年九月重点是发表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大批判专栏好得很》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

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同这条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条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所谓桃园“蹲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是假四清，真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煞费苦心炮制的所谓“桃园经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个黑经验，由王××在北京、天津吹嘘放毒之后，接着，他们又到许多省市兜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发全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彻底批判。

一、把社会主义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形势看得漆黑一

团，也把桃园大队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在给王××的信中硬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基本上是反革命两面政权”。王××也说：“桃园这个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二、大搞神秘化扎根串连，疯狂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作社会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

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用开调查会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行了。……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还说：“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只有扎根串连，他们不怕了，才能讲话。”

整个的“选根”、“审根”、“定根”、“用根”，都由她一人独断。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神乎其神。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把我们桃园看成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

三、用“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相对抗，胡说什么：“四清运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王××到桃园也说：“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她还说：“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连结在一起。”她污蔑桃园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在动员干部交代问题时也说：“你是忠于四清，还是忠于四不清？”这样，就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论问题大小、性质如何，都用“四不清”大棒加以打击。

四、打击一大片，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

她胡说：“干部的四不清是普遍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问题，不可相信。”“不论干部好坏先斗他几次再说。”

桃园大队原有大小队干部四十七人（包括“四清”前下台的在内），在“四清”中挨批斗的共四十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王××在大整干部的同时，又借“群众洗澡”之名，大整社员。全大队有一百五十五人作了检查，搞得桃园大队人人自危。

五、保护一小撮，扶植坏人当政

六、大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七、大刮经济主义黑风，美化桃园，对抗大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腐朽不堪的“文采”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

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时而显得极右，时而装作极“左”。批判陶铸，批判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对于当前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部署。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目前，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从极“左”的方面和从右的方面来搅乱斗争大方向的倾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迫使一小撮阶级敌

人，经常改变他们的做法。目前，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革命队伍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以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面目出现，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妄图破坏和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的、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五·一六”，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一切革命同志，务必充分提高革命警惕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的文章《炮轰陶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在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前进》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群众，都应该从姚文元同志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要懂得阶级敌人并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斗争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地加强敌情观念，牢牢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显微镜，随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斩断敌人的黑手。对于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搞阴谋的反革命小集团，必须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群众队伍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最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敌人从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常常从这里寻找弱点，冲破缺口。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

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制造武斗的祸首》
中国赫鲁晓夫导演的臭名昭著的桃园“蹲点”，是采用法西斯手段，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丑恶典型。

在这方面，他们搞了许多野蛮的做法。“燕飞”（又称“喷气式”），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王××一手创造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九）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对大批判的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

（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一条彻底完成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路线。

而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十几年来在农业问题上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竭力保护和发展富农经济，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疯狂地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广大贫农、下中农。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妄图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复辟的路线。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中央狠抓革命大批判，推动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中就指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要把矛

头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指向反党集团彭、陆、罗、杨；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肃清他们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都要坚持的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大批判的谈话指出：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指出：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指出：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指出：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和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指出：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但是，一些“造反派”热衷于打派仗，一些保守派热衷于玩逍遥，真正能够老老实实坐下来搞革命大批判的革命派，不是很多。

2011年9月2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四节 抓叛徒

本节概述

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布署

（一）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

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

调查要结合本单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单位，偏向的去搞叛徒。这样会把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打倒叛徒哲学》

（二）中央关于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二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查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查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一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查敌伪档案，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查，狠挖深挖，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三）中央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

二、有关抓叛徒的几个具体案件

（一）关于把瞿秋白定为叛徒问题

1，周恩来关于瞿秋白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周恩来在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2，中共中央文件中有关瞿秋白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中央第十二号文件中说：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3，瞿秋白：《多余的话》

4，陆定一访谈

大约在 1990 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5，一九八〇年中央纪委的复查报告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查。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一、被捕经过

二、受审情况

三、拒绝劝降

四、从容就义

五、关于《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这本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有些人说成是瞿秋白同志“叛变”的主要根据。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先刊登在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

由此可见，把《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同志叛变投敌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关于把陶铸定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叶剑英的谈话

毛泽东说：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六) 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 1969 年 11 月 30 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三) 关于定彭真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四) 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示一些干部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将回复中共西北局的电报送毛泽东批发时附的信

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封信电报

2，红卫兵的调查揭发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

“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

“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

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一九六七年四月某日，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

杨献珍说：“我有罪，我有罪！”这样就交待了他和高仰云都是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罪行，并交待了与他一起写“反共启事”的有安子文、薄一波、廖鲁言等九人。

一月二十九日，他（王鹤寿）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打急电：“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同志：请即从电台用急电（或通过中央组织部李楚离同志）帮助转告北京市委冯基平、陕西省刘文蔚、华东局魏文伯、赵明新、天津南大高仰云、吉林赵林等，如果红卫兵他们问我和殷鉴在监狱中的名字时，务请绝对不要告诉他们。”

3，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肯定薄一波等人出狱属于自首叛变性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康生讲话

江青说：“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讲话

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李富春接见国家计委同志谈斗争薄一波

自首叛变 61 个人，是刘少奇批的，没有报告主席，没有报告中央，是同张闻天勾结起来搞的，主席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

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贩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

洞里爬了出来。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4，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

“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华国锋的批示

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一、“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

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

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同志。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反共启事”是敌人事先拟好的，内容相同。

四、六十一人出狱的情况

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对于他们出反省院前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交代。据查阅的档案材料证明，赵林等十位同志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写的自传中，都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和经中央、北方局指示履行程序出狱的情况。赵林等十六位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填写干部履历时，多数同志填：党允许、北方局决定登“反共启事”出狱或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履行程序登报出狱；有的同志填北方局营救出狱。薄一波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陕西省委写材料证明同狱人刘聚奎这段历史时，说：“刘一九三六年出狱，系根据党的（北方局）命令，履行出狱程序出来的。所谓出狱程序，即是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个手印，这件事是经党组织（北方局并中央）指示办理。”这些情况说明，薄一波同志等对他们的出狱情况已作过交代，不存在“长期欺瞒组织”，“串通一气，互相包庇”的问题。

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

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七、调查的结论的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的处理意见是：

(一) 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四) 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的通知

（六）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问题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泽东的一次讲话

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郅中复的父亲郅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

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七二年七月，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把瞿秋白定为叛徒问题

关于瞿秋白的被捕问题，虽经复查，但还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说：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写的什么内容？

二、《多余的话》究竟是不是瞿秋白写的？六十年代初李克农告诉陆定一有真迹存在（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陆定一为什么不经请示就一口回绝：“不买了”？后来他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后也说：“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可是为什么复查还是认为：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

三、争论的焦点还是在对《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本身怎么定性。其实，瞿秋白自己在文章中已经说了：“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二）关于把陶铸定为叛徒问题

何时把陶铸定为叛徒？又何时正式为他平反？这些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材料。

（三）关于定彭真为叛徒问题

关于彭真是否叛徒、特务的问题，既然中央没有审批，就说明证据不足。在中央没有审批的情况下，康生就急急忙忙向群众宣布，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四）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

关于六十一人案件问题，争论之点在于：

一、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关键在于：“敌人规定的手续”是怎样的一种手续？刘少奇向中央究竟是怎么说的？据张闻天交待是：“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可是，实际上，“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

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这样一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二、从北方局后来执行的情况看，刘少奇等北方局的领导人对这个所谓的“简单手续”的涵义和内容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对出狱的人履行这样的手续并不表示异议。而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成是“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所以，这件事刘少奇负有主要责任。

张闻天虽然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这个决定，但他并不清楚所谓“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而且他也没有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张闻天负有重要责任。

事后，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此，他们都只知道这批人是：“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出狱的”，并不知道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复查报告反复强调：毛泽东早就知道这件事，想以此说明，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查这件事，是毛泽东出尔反尔，用这件事来整人。但事实说明，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有红卫兵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仍然相信原来的说法：这些人只是履行了一个“简单手续”出狱的，中央知道这件事，说服红卫兵不要纠缠这件事了。可是，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红卫兵查出了当时这六十一个人分九批在报纸上刊登的《反共启事》，以及一些人在审查中交待的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中央在掌握了这些新情况后，才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作出批示。

出狱的六十一个人虽然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北方局的决定，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他们个人不应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同狱中，有的人如刘格平等就采取了拒绝执行的态度。这就说明，个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复查报告说：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人。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

三、复查报告说：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一个革命组织难道为了保存力量就能够命令它的成员在敌人面前叛变吗？一个革命者难道能够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就向敌人自首叛变吗？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每个人自己就不可以按照保存力量的原则向敌人自首叛变呢？这样一来，还有什么革命气节可言呢？

第二，如果说这一批人是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叛变的，可是其他的人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叛变的，而只认为他们是个人的行动，既然如此，其他被捕入狱的人就有可能效法这些人的行动，引起雪崩一般的叛变潮。

第三，这批按照组织指示叛变出狱的人，由于他们共同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就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特别是与刘少奇之间的依附关系。这就成为刘少奇搞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人员基础。

第四，这个案件提供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革命组织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吸取。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以及个人的行为，是完全有理由的和必要的。

2011 年 9 月 22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五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到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七、九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实际上他与毛泽东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通知陈再道
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
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召集“中央文革

”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说：要给山西六十九军和陈永贵等打招呼，他要闹就让他去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指指林彪，说：你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毛主席环视到会的军队干部说：你们都是将军。不能只看军令，还要看政治水平。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按：原山西省军区司令，很早起来造反的）也不行，要罢刘格平等人的官，不要中央罢，让红卫兵去罢。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他说：张达志、洗恒汉从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

毛泽东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他主张，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毛泽东说，南京居民反对武斗，现在又出现了第三派，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

“内蒙训练的军队都回去了吗？”毛主席说：军队还是听话。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除外发 72 元（按：那时战士每月发 6 元津贴），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

提到湖南，毛主席对当时控制湖南的人不让“湘江风雪”、“六号门”等群众组织成员当民兵想不通，他问：这是为什么？并说：要四十七军军长、副军长、政委、副政委等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两派都来人，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

谈到干部，毛主席说，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嘛！武汉的“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

毛主席说：你们太天真了，你们说外国人不拥护我，中国人也有不拥护我的，北京就有人不拥护我。毛泽东同意公开点罗瑞卿的名，并说：彭（德怀）罗（瑞

卿)黄(克诚)谭(政)都要拿出来斗，要见报。

对于我们党的状况，毛主席一方面指出：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另一方面也不同意重新建党，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种程度。

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然后得出结论似的说：现在军队首当其冲，是当局了。并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陈再道书生气，要帮忙，并准备在武汉游泳。

毛主席讲了以后，与会者大多数不赞成他去武汉，周恩来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矛盾斗争激烈，考虑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主席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

林彪也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毛主席自信地说。

“武汉比较乱。”不知谁冒了一句。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三个小时后出发。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总理说：“成武，你出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周总理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主席使用。

会后，周总理将杨成武和汪东兴叫到怀仁堂，专门研究毛主席外出视察的安全问题。周总理反复交代：“武汉东湖很乱，上述两条任务，你一定要做好。”

会议结束后，当晚周恩来先飞往武汉，为毛主席安排住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 3 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毛泽东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飞驰，沿途经过石家庄等地，路边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打倒闫同茂！”“闫同茂是个好同志！”……到了郑州，大标语刷进了车站：“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并要随行的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转告大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

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

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

二、毛泽东周恩来着手解决武汉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周恩来召集会议

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周恩来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

此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

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

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

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

12 时，武胜路电车公司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

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

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晚，谢富治、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

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

谢富治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

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
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

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

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

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到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王力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 立即停止武斗；2. 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 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 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 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 3506 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

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尽管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周恩来 15、16 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

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有可能要早些。

“三新”、“二司”（湖北两个群众组织）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

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

“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毛泽东对军队在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不满意的。他明确主张政府和当权者应当少抓甚至不抓，由群众自己去抓。他批评武汉军区的司令说：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这下动脑筋了。但又说：不管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毛泽东并不把干部的所谓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他多次声称：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毛泽东以征询的口气问大家：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

说完，他又重复一句：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对军区如何处理好两派之间的事，采取什么方式，毛主席想得很周到，他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

训怎么样？毛主席问到会的人。有人回答：军训反过去了。毛主席并不相信这种回答：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毛主席问汇报情况的同志。

“他们提出，全线反击。”汇报组的人回答。

“那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心情，毛泽东还是指出：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搞一个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毛主席对群众提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刘培善”的口号，提出：“不要太看重。”“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毛泽东的话里，是有倾向性的。

毛主席对谢富治、王力说，对湖北，省市县的干部，也要找一些谈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晚，周恩来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

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

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 18 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三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

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 17 日看过。

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会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毛主席一见到陈再道、钟汉华就和他们热烈握手，亲切地招呼他们坐在主席的身旁，然后问道：你们怎么样？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随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我 1 月 21 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的身上来了。”毛主席看看坐在身

旁的军区领导说：你们没有那么厉害，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的错误严重。湖北与河南、江西比，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军事机关。1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造反派又得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了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约束了，下了命令了，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

谢富治汇报他们到了武汉那些革命群众组织总部时，毛泽东当即批评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我们都平衡了。”王力说。

毛主席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嘛，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回答。

毛主席一听乐呵呵地说：“方向路线错误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陈再道听了毛主席讲的这番话之后心情平静了许多。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毛主席不同意陈再道提出的处理方法，并指示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指陈、钟）不行，有的人不听，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快快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急了。”

毛主席给陈司令出了个好点子：“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在“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陈再道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出面讲话。”

王力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于这种情况甚是明白，指出“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中央文革的人）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讲到这里，毛主席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做好思想工作。

会上有人谈到“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似乎有点冷淡，也有点慌的样子。

毛主席说：“‘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的，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不能说他们都是坏的吧。”

毛主席又说：“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

说到“百万雄师”内部很大部分是工人时，

毛主席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招待所（指主席住的东湖宾馆）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进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市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立即插了一句：“后来推迟三个月。”

毛泽东说：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招待所）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解放”、“油炸”、“全线出击”哟等等，不能全信。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

会上谈到湖北省的干部，说江毅影响好、赵修问题多、徐道齐可以、杨锐可以时，

毛主席明确指示：“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有什么罪？王任重申辩说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些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去批。”

这时，有人插话：主席说的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自己承认了，谁给你平反呢？王任重死抱着自己不承认。

毛主席说：“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同陶铸关系很密切，有些人等打

起仗来就可以看出怎么样了。”

会上有人说到新华工学生都是戒备森严、全副武装时，毛主席感到有点惊奇，说：新华工还这么森严？江西为什么基干民兵可以有枪，为什么红卫兵不可以有枪。毛主席有点为红卫兵鸣不平，他说，如果刘培善有气魄，就把民兵的枪支收回来发给红卫兵。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和湖南。

会议最后又集中到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

毛泽东指示：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责任在上面，在军区，下边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军队就是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毛主席明确指出，抓朱鸿霞不得人心。叶冬初有点水平，受一点压迫好。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人受一点压迫好，蒋介石压迫我们，就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一绝食就紧张起来，才不要呢！到现在绝食没有一个死的。有人问我，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绝食的，我说因为社会主义不完全，还要革命，要部分推翻，不要全部推翻。1月21日军队支左介入，以后搞了八条，对这个八条如获至宝。军队抓人多了，以后呢？搞了十条，正是夺权介入，八条的时候军队锻炼一下好！

毛主席当着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的面，指着谢富治、王力等人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一个‘百万雄师’，军队机关，怕他们造反。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他们内部也可能发生内战。”谢、王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总理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周总理在讲话时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他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毛主席还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

让人家革命，声明发表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会检讨。世界上的事情，这几个月来，一年来什么怪事都有了。章伯森、刘瑞林有些什么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不这样，那我就瞎了眼。

会上毛主席得到报告，说北京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去斗。

毛主席说：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刘少奇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毛主席说：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对军区领导同志说：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空军、兵种都冲过。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这个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半结束。杨成武当时认为开得很好。毛主席把解决武汉问题，从方针、原则到具体步骤、方法都安排妥了。只要认真落实，问题并不难解决。参加会议的人，对毛主席这样安排，都表示赞同。

陈再道、钟汉华尽管对要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看到毛主席并没有要打倒他们的意思，因而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散会后，他们向毛泽东敬礼告别时，毛主席还很客气地送他们到走廊。

在走廊上，遇到几位招待所的服务员，毛主席立刻把他们招呼过来，笑着向他们说：“认得陈司令吗？再不要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毛主席并要他们和陈再道一一握手。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

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

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在就被泄露了

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

（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

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

蔡政委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

传达会议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上扬。

牛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

面对干部的不满，蔡、牛要求“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周忠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

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19 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 8 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及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

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

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武汉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杨成武找驻武汉的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传达了 18 日晚的会议精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

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

会议开了八个多小时：

谢讲了二个多小时，

王讲了三个多小时，

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

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多小时，

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

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一些人冲击武昌东湖宾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

下午四时左右，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

独立师的战士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

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

19 时，又有 8201 的 49 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 120 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

22 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23 时半，8201 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 200 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 日 24 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 日晚上，（师）370 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 12 点带领 3 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

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

（“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 8201 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

“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19 日晚上 10 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

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

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

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 100 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 8199 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 3 点左右，8199 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往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 8201 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 8201 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凌晨，8201、8199 军人及百万雄师人员殴打、架走王力

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 27 辆卡车和 8 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

这时，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7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

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

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 8 车 8201、8199 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 8201 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

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

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

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

“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竟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楼楼3楼46房，

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的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

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 8199 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在这个过程中，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 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 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 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 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 8201 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 29 师政委，调 87 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

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

当晚，叶明、韩东山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原来，7月20日下午，叶明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命令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张昭剑对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四、独立师的一些人及“百万雄师”搞武装示威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

“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使唤

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以 8201 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 8201 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章迪杰承认：“‘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

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20 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 20 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从凌晨 2 时开始对武钢围攻

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 33 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 100 多人。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 200 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得知消息，从东湖宾馆转移到专列上

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下面的情节摘自师东兵的纪实文学，仅供读者参考：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醒，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百万雄师’和部分军队已经冲进了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险地！请你赶快离开险地！”

电话不知谁打的，毛泽东“啪”地一下摔下了电话，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只见许多人已经冲进了宾馆。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西安事变”的镜头，难道陈再道今天想效仿当年张、杨二将军，让我当蒋介石第二不成？

门被“咣”地一声推开，毛泽东一惊，警卫员小高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汪主任正在紧急调动部队。”

“现在调兵还有何用？”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我决不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寸。要搞反革命事变，倒要看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我就不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调遣！小高，你别怕，跟着我你死不了，即使死了，也是光荣的。”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毛泽东爱怜地抚摩着小高的头，给他正了正军帽，泪水盈眶地说：“傻孩子，到哪里躲呀！陈再道要发动暴乱，我还能逃得出去吗？”

小高突然想起总理曾交代由武空副司令刘丰负责主席的安全，便要通了刘丰的电话，把话筒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什么等待！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件军装，满头大汗。他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毛泽东已经平静下来，点上一支烟，问道。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恨恨地吸了一口烟，“我撤离延安的时候还给胡宗南留了点纪念品。现在，我离开武汉，这里的东西都不要了，统统留给陈再道，看他敢要不敢要。”说完，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连拖鞋也未换。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三十六计，走为上。这笔帐，留着慢慢算吧！”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走下楼梯，来到院内，只见汪东兴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指挥着警卫战士们不准任何人靠近这座楼。毛泽东冲汪东兴感激地点点头，向后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毛泽东感到脚下一阵发疼，低头一看，原来因没换鞋子，只穿着一双拖鞋，被草丛中的荆棘扎着了。杨成武急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毛泽东勉强穿上，自己穿了毛泽东的拖鞋。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笑着说：“难为你了。”

三人继续向前急走。

“站住！什么人？”树丛里传来一声压低声音地猛喝，并拉了两下枪栓。毛泽东、杨成武、小高三人立即停住。突然几束强烈的手电光照了过来。杨成武和小高立即本能地护住了毛泽东。光束在杨成武的脸上照了一阵，只听“哎呀”一声，电筒光熄灭了，几个军人从树丛里跑了过来。

“对不起，原来是杨代总长！我们是武空警卫连的，在这里负责警戒。今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们奉命来保卫这里。”一个军官向杨成武举手敬礼、报告。

杨成武和小高松了一口气。杨成武命令他们继续执行任务，同小高搀扶着低着头的毛泽东匆匆地离开了。

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翻过了一个斜坡，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挂着将军锁的小门旁，周围寂静无人。小高把锁端详了一会儿，用力一拧，那锁竟然被拧开了。毛泽东笑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力士’，力大无穷呀！今天我们是真正地走后门呀！看来前门走不通走后门也是个好办法嘛！”

穿过小门，三人来到了东湖西岸。老远就看见沙滩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旁站着一个人。双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那人迎了过来，小高上前轻声问道：“是刘司令吗？”

“是我。”刘丰迟疑了一下，用手背揉了几下眼睛，当他确认前方站着的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代总长杨成武时，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带着哭腔说：“毛主席，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没事，没事。”毛泽东摇着头说，“大不了坐坐陈司令员的班房，尝尝滋味，可你们不让我尝。算了，让别人尝去吧！”

毛泽东这哀伤中的幽默，没有引起任何笑声。

“主席，上车吧！”刘丰说。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刘丰的话，他双手叉腰，回过身去，久久地凝视着前方的东湖宾馆和他住过的那座米黄色的小楼，一言未发。半天，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着说道：“陈再道真是一头蠢驴。他要是派一支兵马把守住后门，我还能逃得出来吗？看来，这真是天助我也！”

随后，毛泽东在杨成武、刘丰等人的护卫下，赶到了戒备森严的“专列”上。）

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 8341 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

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 17 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

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五、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

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飞赴武汉。

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 15 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百余 8201 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

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

8201 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

空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

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下午 3 点 54 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

飞行途中，吴法宪对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

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

40 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

这一情况由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 5 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 8341 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 8341 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到达山坡后，周恩来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

“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周恩来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36 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同意离开了武汉。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当时毛泽东就在车上，总不能让老人家在车上等着吧！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不等的，他就朝飞机走来了。

杨成武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那些战士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主席操着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毛泽东示意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亲自组织平息事端

周恩来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以后，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

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

二十一日上午，叶明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具体位置。武汉军区只得向总理汇报，说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

这时，武汉空军的刘丰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立即赶到二十九师。对张昭剑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

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

于是，29 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 15 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当晚，支左的空 15 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

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

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 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 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像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蔡炳臣稳定军心

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

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

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百万雄师”在 3506 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

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的权……”。

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

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 8201 为核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电话
(下午三时)

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二至三天。

(引自 1967. 7. 24 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凌晨 3 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

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

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凌晨 3 点多钟，周恩来等到达山坡机场。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胡宾馆这边，为安全起见，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 7212 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 7 月 22 日凌晨 3 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 70 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凌晨 5 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山坡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 8199 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8 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

后来才知，武汉“720”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谈话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

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武汉的问题。

怎么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他对杨成武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的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毛泽东说：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师参加？

毛泽东说：这类事情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说，如果能在内部解决武汉问题是最好的了。

毛泽东说，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会调动农民，占领三个学校。

他说，解决武汉问题，牵扯的问题相当大，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说：“派兵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办法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北京有两万多“百万雄师”的人，要做好工作，让他们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

毛泽东说：“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呢。”

在谈到周恩来提出的武汉问题处理意见时，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因此毛泽东同意把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

武汉和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到了中午 12 点半，毛泽东又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他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以免受害。

毛泽东说，三方面一起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

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毛泽东又说，如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又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他最后说，叫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吧。

杨成武离开梅岭一号，马上给周总理挂通了电话，并把毛主席上午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传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约 50 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 1500 辆，继续在全市游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回北京

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

下午，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

北京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

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

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 12 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深夜，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

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 3 点钟，陈再道、钟汉华收到了以中央名义调他们进京“开会”的电报

此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续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

武汉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陈再道、钟汉华去机场时，游行队伍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 15 人。

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

三军“无革派”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

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 60 万人抵抗；组织 10 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8199 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

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

武汉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工总”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的。这组织号称四十万人，实际也有二十万人吧！被逮捕了五百多人，被迫解散。这是一个较大的组织。我们到武汉去，要为“工总”平反。

九·一三也是一个造反组织。

钢二司虽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由于是“工总”的观点，受到压制。这是一个学生组织，是一个造反派组织。

“百万雄师”有三大派力量：

(1) 独立师（番号××）带头。这次主要是独立师搞的。它以前是××部队，有×个纵队。

(2) 人民武装部。××个大厂子都有人民武装部，有枪杆子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九个头头，其中四个是人民武装部的。

(3) 公（公安局）检（检察官）法（法院）已被军管，但是，是独立师军管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百万雄师”。

两次来围攻我们的都是独立师和公检法。第一次来围攻我们，开始来两百多“百万雄师”的。我们做了些工作，他们后来就走了，这些人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后来来的都是独立师，不讲理，说也不听，就是他们把王力同志拉走的，并制造了许多谣言。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杨成武谈话

“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以前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也是建国以后才认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的。那时，他是河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毛泽东每次到武汉，都要见到他。他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能打仗……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几天，看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杨成武说：“他们不会反对你的。”

“对！对！对！”毛泽东连说了三个对。

他转而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

“不清楚。”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带着毛泽东的指示，飞回北京，向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也向陈再道传达了这三句最高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

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人把陈再道、钟汉华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陈再道、钟汉华的安全。总理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谢富治出面做做以后，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

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

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

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

徐向前的标语口号。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还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到京西宾馆，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会议还决定 7 月 25 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凌晨 5 时，“百万雄师”出动 38 辆卡车、3 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 25 日上午 11 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一支又一支的空 15 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 8201 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守东湖宾馆的 8201 战士，痛哭失声。

（按命令于 8 月 1 日将防务移交 15 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有个方针要解决武汉问题，好人坏人都请来了，小将多，北京的革命派要紧跟中央作工作，这些天大规模游行，明天开大会，表明我们支持，这件事不能只看成谢富治、王力，特别是谢富治，

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矛头针对武汉一小撮，百万雄师一小撮、军内更是一小撮，不要面很大，要懂政策，明天下午五点要开一百万人的大会，学生、工人、农民、兵，中央首长出席，井冈山也讲话。在天安门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有一件事告诉同志们，坏人来了很多，再厉害也没关系，但不要抓。将来开了会，需要的话作面对面的斗争。需要的不打就不错，但要有组织的找几个学校，百万不要讲百匪。听说北京有，要集中起来，军队由陆空解决，中学、工人不要去，红代会组织一下。矛头对准陈再道、牛师长、蔡政委、王任重，将来凶手搞出来。军内已经集中了，大学红代会找些人把他们集中。将来还要请一批来，一切都要按中央文革指挥。我们这次出去带红卫兵，是主席当面给我讲了两次，但他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挂帅不行，一挂，就压垮。但要带徒弟。因为他们只有一年革命历史。再没有主席那样爱我们工人、学生、工代会。这回想当头，连自己厂都管不了，我这个人别的不行，只这一点慷慨，谁要来顶我，我明天就让。武汉这一次离不开大批判，离不开刘、邓、陶、彭真这个大批判。要搞到明天，促进大联合，大学毛著这个锐利的马列主义武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

武汉“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份人，他们要打倒谢副总理、绞死王力，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理，他们反对总理在政治上不利，但实际上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付主席。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那些人，还有武装部、独立师、军区机关、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我们相信武汉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受蒙蔽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了。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交给群众斗争”等等。王力他们回来了，我们隆重的在机场迎接。

六、北京及全国各地支持武汉革命派，声讨“七·二〇”事件的制造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给毛泽东、林

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参加天安门大会

下午 3 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

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 4 点多钟，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

周恩来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师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

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

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 8201 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 8201 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3 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 央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

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〇”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

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

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拚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

周总理、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周总理、康生同志、谢副总理及其它同志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焘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北京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 与“百万雄师”

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

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的谈话和决定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 15 军或 2 个师（指 44、45 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岭、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 15 军部队或 29 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8201 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 40 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

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 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 8201 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 4 个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

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

革命派

“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

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

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

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

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玩火者必自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红司新华工代表聂年生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钢二司代表杨道远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一项检查错误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指示：

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 44 师、45 师、29 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 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上午 9 时，周恩来在钓鱼台 5 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

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的考验》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张贴武汉军区 1967. 07. 26 公告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 刘丰：《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

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谈话

八月四日，中午 12 时半至下午 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主席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这时，他高兴地问：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主席对独立师只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就顺利地开拔出去，甚为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驻得太久了。

毛主席说：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

还有今年 2 月 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

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

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

毛主席说，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

他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

（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解放军各单位批斗陈再道

三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

一、“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条件？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二、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蔡答：我是凶手。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三、“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伟大教导。应当加强同人民解放军的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应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支持军队的同志，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应当学习人民解放军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在处理军民关系中，也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军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不要不许革命。

“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军委各单位斗争陈再道

钟汉华供认不讳：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要他们释放被抓的工总战士等四点指示，是他违反周总理不准向下面传达的规定，擅自叫蔡炳臣传达的。

蔡炳臣也交待了：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了。他们向下传达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下面的不满，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在传达时他们还进行了恶毒的煽动，说：当陈再道汇报“百万雄师”的情况时，周总理听不进去，当汇报新华工、新湖大等情况时，王力很反感。说中央代表不愿听他们汇报等等。这就是他们煽动“七·二零”反革命叛乱的一种舆论准备，是他们打出的反革命叛乱的一个信号枪。

这次战斗从八月七日晚七点半开始，到八日晨七点半结束，历时十二小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高呼口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大会胜利结束。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

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

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

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

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在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四）好人斗好人。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 and 解决的办法。

第二、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注意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

七、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朱鸿霞夏邦银等《永远忠于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
武汉是反革命暴乱。

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

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

独立师（即 8201 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

“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

“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

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 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

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武汉警备区的命令

为了解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

大群众”的伟大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持社会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现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警备区机构由七二五〇部队兼任。任命方铭同志兼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同志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张绪同志兼任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同志兼任警备区副政治委员，并从八月十八日正式办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8201 部队干部揭发《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8201 部队干部揭发：《“七·二〇”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
曾司令员：

1) 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二〇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

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部署，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超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

十月八日晚上 7·30 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曾、刘首长，警备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革命派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二十个组织参加。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周恩来谢胡在武汉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康生在武汉东湖长天大楼座谈会上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

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的关键。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要作斗批改的模范，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外同学都要回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你们要复课闹革命，也要结合大批判。

现在主要是在本单位斗批改，可以说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都没有很好的搞。你们要搞好本单位的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主席说，现在是大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有七个省，包括青海。六、七、八月一下子就解决了八个省，有湖北、河南、四川、江西、浙江、内蒙、甘肃，这说明速度快了。过去一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成立了革委会，但还有些反复，如黑龙江。

我们正在解决十一个省的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算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在十月、十一月解决的话，就共解决了廿六个，剩下来的就只有新疆和西藏、云南了。估计十二月份可能解决。

还剩一个年头，明年六月份到后年，就是扫尾，准备三年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刘丰接见湖北三司革联代表谈话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钢新之间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陈再道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玉华关于湖北形势问题的报告

北京“五·一六”是个反动组织，对武汉肯定有影响，武汉肯定有几个人，但不能夸大大。扩大化不行，要犯错误。运动的重点要抓住，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关于武汉红代会问题的电话指示

13日晨4:50，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给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打来电话，由曾司令的沈秘书接，并传达此电话：

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

‘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七·二〇”事件

1，一九六七年湖北“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

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但它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

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散。

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

陈再道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2，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提出的中央关于处理湖北文革问题的四点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说明中央对湖北问题的关心和重视。

3，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思想始终没有转过弯来，表面检讨，实际放弃领导，消极对抗；独立师政委蔡某某、师长牛某某对抗中央指示，在官兵中煽风点火，实际上起到了幕后操纵的作用。

4，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中央代表团驻地及武汉军区大院，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实属叛逆行为。

5，中央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6，十月政变后中央批准湖北省委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是完全错误的。

2011年9月24日修改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到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凌晨 3 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毛泽东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飞驰，沿途经过石家庄等地，路边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打倒闫同茂！”“闫同茂是个好同志！”……到了郑州，大标语刷进了车站：“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并要随行的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转告大家。

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 9 时。毛泽东在风光秀丽的武汉东湖召集周恩

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郑维山、杨成武开会，听取派往西南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汇报云、贵、川和武汉地区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 8 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林彪起草了一封信，写给毛泽东的。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决定派邱会作飞往武汉。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中午，杨成武接到电话，说邱会作要来武汉，有重要情况。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赶到了武汉。

杨成武看到了那封写有“亲启”字样的信封，立即呈送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马上叫来了杨成武、汪东兴等人。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二、毛泽东到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 11 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杨成武接到了周总理从武汉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说：我正在和林副主席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毛主席；武汉的事情对外报

道，要含蓄点，不点名。

最后，周恩来说，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不受伤害。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武汉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中央复电的批语。

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电如下，请酌定。”

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上午，杨成武又一次飞往上海。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问题。

3 日下午 5 时 45 分至 8 时 50 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毛主席听后，首先表示：“乱了就好，同意林彪同志的看法。”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午 12 时半至下午 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审阅一个文件时，批示：“已阅，照办。”命令规定不许抢，不许发；已抢的限期归还。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晚上 10 点 25 分，毛泽东在会议室时，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杨成武等人谈话。

会议从 10 时 30 分开始，开到次日凌晨 1 时 10 分。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形势怎么样？请你们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三、毛泽东到江西、浙江、湖南、湖北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上午 9 点 40 分，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的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着军装。

程世清首先汇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95 命令后十几天的时间，收到了群众交上来的枪达五万多枝，他们用这些枪武装了一个工人团，两个营又一个连。

毛泽东插话，哦，武装工人，这个好。

程世清继续汇报说，有几个军分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赣州、抚州两个地区的个别领导人，支持保守派，发生了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开枪的严重事件，现已按中央 8 月 10 日的文件进行了处理。

毛泽东说，抚州发生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中国有没有内战？有没有武斗？这就是内战，这就是武斗嘛！

程世清说，周总理说，抚州事件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说，对的，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又问，过去他们也是两派对立？是否过去的对立领导上批评了他们？这次要从教育入手，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已经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当他们汇报到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一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就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不同意向红卫兵和战士开枪。

毛泽东说，对这个政委要保，他听话嘛，看到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就听话了嘛！在紧急关头他就坚决不同意开枪，不同意打嘛！

“造反派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现在对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处理也要注意，不要坏对坏，他对我们坏，我们对他也坏。”

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主席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照办。传达到群众以后，群众很快就变了，拥护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说，各省去凑出一个协议来吧。

他又问起一些他知道的干部，他说，黄志珍、白栋材怎么样？你们要多争取几个人嘛！他们有错误是确实的，能改就让他改……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明确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人不多但能量很大，与社会上的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么！”毛泽东做个手势，再吸燃香烟，然后放缓声音：

“过去我们有多少山头，许多互相见面都没有过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好多个根据地。在座的同志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嘛！”

毛泽东用夹了香烟的手指指杨成武：“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认识的嘛，毛儿盖过草地前才熟。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哪一个为核心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有的学校造反派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

江西的同志汇报说野战军在江西威信高，旗帜鲜明，已有五百多人被右派打了。

毛泽东说，右派打你们，左派不打你们，这个阵线很清楚啦！

说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江西省一级还是要站出一些干部来，要消灭造反派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到部队去挑拨战士与干部的关系，说你们战士和干部不一

样，干部钱多，生活好等等，这是不能得逞的，很多人想当兵还难呢，军队是个学校，每月还有六块的津贴费。

他又说，军区搞“四大”不能搞得太苦了，要文明些，我是对那些不雅致的做法翻案的。把我们内战时期斗土豪劣绅的一套来用，是不对的，这是干部嘛！过去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十几年来从未曾要人武部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集训一次，现在你们先集训一下，中央也应该开集训班。

“内蒙独立营训练后很好，回去后就支左了。有些右派你们也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极少数，训练后可以转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包括左派。现在到处揪赵永夫、谭震林式的人物，哪有那么多呀！保守派，右派，他承认错误了，自己又回来了就加以保护。

最后他对江西的同志说，你们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现在的理抓在你手里，为什么你还这么凶？这样你就输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午 11 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 5 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以为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 5 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 5 军和 20 军要互相学习；20 军向空 5 军学习，20 军为主嘛，空 5 军

要服从。”

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

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云：“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们看成朋友，那他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 20 军和空 5 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主席反映空 5 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泽东又是一大番议论：“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 62 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继续评论干部，这种评论并非全面，只是即兴评点：“陈毅打过仗不

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说到了南霁云。

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勋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说：“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要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

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了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

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 613 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 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 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 250 亿斤至 260 亿斤；今年棉花可产 180 万担，去年是 150 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

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晚 6 时至 8 时，毛泽东在他的武汉住地，接见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和武汉市的方铭发及警备区的领导人，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均在座。

毛主席听了两位军区新头头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毛主席首先谈形势，他说：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主席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主席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主席说：你们按中央 9 月 5 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主席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怎么地不得了。他对曾、刘两位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一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班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好。”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分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主席还说，干部不要多，要精干，三七开，一百个干部中三十个精干的能办事的就了不得啦。十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并指示：以后一年训练一次。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主席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德）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 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主席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方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

毛主席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红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明年春季以后，至迟后年一月，要开九次党代表大会。

党团员多数是好的，有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好，团员比党员好。

工、农、兵、学、党，选代表，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当代表不行。

主席讲：邓小平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黑修养，打过仗，邓要保……公不离婆，夏曦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李维汉他们是接我的手的，接后就反对我了。

主席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彪）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

他说：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 年我退居二线，1959 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 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 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查研究过时了，1966 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一。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彪）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十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三个师只二万五千人，报四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主席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 8 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恩来、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指示，要杨成武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跟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我们今后的战斗任务是：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妄图复辟的一切阴谋诡计永远破产。

充分发动群众，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深刻的改革，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除了对工人阶级作了重要指示外，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

当前，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这个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我们

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把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来一个大破除，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把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便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统统改掉。这样，就会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反修、防修就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为了更好地批修，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狠斗“私”字。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破私立公，牢固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修正主义产生的条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大事，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大联合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学习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

青讲话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毛主席视察各地讲话的通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长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形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

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是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

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心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关于宣传工作的四点指示”

目前，全国各地正流传着许多谣言，这些谣言对我们的领袖的健康表示怀疑，非常明显，这是某些别有用心阶级敌人故意散播出来的，意图蒙蔽人民，动摇革命群众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信赖和支持的决心。为了使广大群众认清阶级敌人的面目，揭穿敌人的阴谋，兹作四点指示如下：

- （一）毛主席身体健康，应积极宣传。
- （二）坚决杜绝一切不负责任的谣言。
- （三）最近传出去的关于毛主席不办公的消息是误会。
- （四）禁止宣传或张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奋勇前进》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就要牢牢掌握“斗私，批修”这个纲，把它贯彻到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中，用它来统帅一切，带动一切，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就要根据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就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

就要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观点，发扬民主作风，反对摆架子、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要平等待人，到群众中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就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做到统一指挥，协调动作，克服各自为政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完成本单位的革命、生产、教学和工作任务。

只有实行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才能依靠本单位、本组织的群众，把混杂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个别坏人清除出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革命干部，参加到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发挥他们的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是当前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关键。革命干部，一般来说，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较高的政策水平。只有让大批革命干部站出来，挑起担子，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才能建立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权力机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大任务是，让大批革命干部，包括一些犯了错误、不再坚持而又认真改正的革命干部，参加到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大胆地使用他们。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了群众性的批判，这就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扫清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完全可能

和需要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接见郑维山滕海清高锦明时的谈话摘要

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把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地学习一下。比如形势，主席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这是主席概括的，我们学习不够，这是个决定性的问题。形势好还是不好，远的不说，从五八年、五九年就有两种看法。对人民公社、大跃进，一种认为大好，一种认为不好。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对，基本出发点是大跃进搞糟了。那时有缺点错误，彭德怀利用这点向党进攻。三年困难时期，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把形势估计得黑暗得很。说要八年才能恢复，这个影响散布很广，毛主席到处视察后，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讲了三条：一形势、阶级和阶级矛盾，击退了单干风翻案风，那个猖狂得很，后来发表了公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首先在形势问题。主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社教时又有这个问题，刘少奇说只有王光美那一套行，其余的都不行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形势的看法也有许多不同，今后还会有，形势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去年五月主席对谢胡同志讲，今年二月同卡博同志讲，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失败，走资派胜利，一是我们胜利了，走资派失败了。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条？主席总是这样辩证的看问题，他是为了引起警惕，防止骄傲、麻痹大意。这是主席的一贯办法，主席总是把困难估计得足足的。他对卡博同志讲，你在中国再呆几个月吧，呆几个月就可以看出

眉目来了。当时我对眉目也很不理解，大概认为会有革委会成立起来，实际上主席说的眉目是大局。今年国庆谢胡来了，主席讲，看出眉目来了。第一是胜利，但也不排斥失败的可能。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主席是从战略上看的，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大局已定，现在就怕思想跟不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周恩来对“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的解释

看形势，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立场，就能看到主流，看到本质，否则你就只能看到支流，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是大好形势，主席思想深入人心。

乱得越透，解决得越快越彻底，为什么呢？因为把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才好解决，反过来乱得不彻底，乱得不透，掩掩盖盖，反而解决不彻底。坏的东西暴露出来了，群众也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

毛主席这个话是在九月份讲的。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七个省市（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现有八个单位在北京把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就是内蒙、浙江、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甘肃）。以上一共有十五个省市到年底再解决十个单位（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河北、宁夏、天津、陕西、辽宁），这样就共达廿五个省市，全国剩下四个省、自治区（西藏、新疆、云南、吉林了）。整个部署到年底，都能看出来了。目前十个省市的代表也已到了北京。看来明年初春就初步解决问题了。×××首长说：到明年五月就解决问题了，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主席指示最近可以发表几篇教育革命方案。主席又对教育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最近提出了党的问题，吸收新党员的问题，可公开宣传，处理党员，

恢复党的生活，就不好公开宣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差一些，有的地方看起来是很平静，实质上是一潭死水。针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大乱。象新影，象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当然也就不能够很好地搞斗批改，大批判。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乱敌人！乱敌人！！有些单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但还没有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就应该在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批判，解决干部问题，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进行斗批改和大批判。对于有些搞得比较好的单位，革命的大联合搞的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搞斗批改、大批判。

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一个民族，总要有它自己的艺术尖端，现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可不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艺术尖端？大家知道，搞一个样板戏是不容易的，千锤百炼，总要改二、三年才成。因此，不可能每一个戏，每一个文艺团体搞的节目都搞成样板。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党中央指出，复课闹革命，就是要“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党中央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途径。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决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复旧”，什么“改良主义”。

复课闹革命，这就是当前学校中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学校中，一切抵制这个大方向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须澄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并作重要指示，

是实现中央关于“第一年发动群众，第二年基本解决问题，第三年是扫尾工作”伟大战略目标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

这次巡视，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问题。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由于“二月逆流”的影响，全国不少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驻地野战军部队，在支左工作中发生了错误。特别是发生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一些左派组织认为，全国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提出在全国开展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有的甚至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

通过视察，毛泽东说：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中央认为，根据当前的形势，仍然有可能实现中央关于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的布署。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问题。

进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各地的群众组织大体上都分为被军队支持的和被军队压制的两大派。这两大派往往是在初期共同批判省委走资派的错误路线，以后由于在某些问题如干部问题、斗争形式或策略问题上，立场不同，而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加之，在群众组织的成员、特别是少数头头中，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思潮，形成两派的激烈斗争，后来发展到一些省区的严重武斗。

通过视察，毛泽东提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一个工厂，形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关于干部问题。

当时，各地在成立革命委员会遇到的障碍，除了大联合的问题外，还有三结合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领导干部的问题。一种是认为领导干部都有问题，找不到一类干部。另一种是，只愿意结合支持自己这一派的领导干部，反对结合支持对立派的干部。

通过视察，毛泽东说：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

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

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次视察所作的指示，是在全国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严重进攻面前，担心文化大革命遭遇挫折，而采取的一项退却行动。致使革命的群众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看法并不合乎客观实际。文化大革命也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可一味地盲目冒进。

2008年8月8日初稿

2011 年 9 月 27 日修改

第五章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壹、本节概述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会上大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

会议作出的决议说：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后，他们的反周活动日益猖獗，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

他们的组织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

方面的动态情报，他们还拥有一些交通工具，抛撒传单时还动用汽车。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

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随后，这些传单大量出现在北京大街上、农口各局和各院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首都 516 红卫兵团散发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传单说：

“武汉事件”已经引起“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要人们思索：从“武汉事件”联系到“全国大规模武斗”，“是否向我们证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

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另一个司令部”是什么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五·一六四名成员被群众抓捕

唐亦安、郭海燕等 4 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 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在 24 小时内把被抓的 4 人放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被抓的 4 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 4 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

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是：《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 5·16 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

（二）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 月 17 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两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

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王琪、黄金琪的谈话

如果象“五·一六”兵团恶意地采取这样的态度，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批判。批判少数坏头头和他的后台。对于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我们不要去指责。

“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精，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

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

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谢富治说：

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星之火战斗队《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

“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轰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

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中央首长谈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戚本禹同志：

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后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运动方向要把矛头指正，要集中力量展开大批判，批党内走资派，要发表一些评论。对“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进行批判。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 8 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有关五·一六的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

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说：

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

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还向总理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四个“五·一六”分子的情况和农口老保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五·一六”的谣言，总理笑着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

总理后来还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就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扭送秦化龙给北京卫戍区的信

〔秦化龙：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傅崇碧、黄作珍同志：

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五时

（来源：1967年9月19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53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谈到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时，周总理说：“‘五·一六’问题，‘九·一’讲话谈到了，三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更清楚了。‘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象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四十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总理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四十八小时就放了。”

周总理继续说：“‘五·一六’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五·一六’另一方面军揪军内一小撮，影响我国威信，动摇军委领导，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许可的！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四）通过批判‘五·一六’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

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央通知中关于警惕极左的一段话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

防止坏人，提高警惕。九·一、九·五、九·一六至九·一七，总理、中央文革同志们的讲话精神，特别是江青同志九·五的讲话，指出“五·一六”的危害性……为什么中央很重视它呢？因为这个组织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这样一个支柱……对毛主席司令部，现在有一种来自极“左”的，或者来自右的。“五·一六”就是来自极“左”的，它是反革命组织，是秘密的，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接见毛里塔尼亚大使前后对外交部工作人员谈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

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来源：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今天传达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最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内容极其恶毒。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

军委办事组首先指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然的中心任务，要全力以赴，用这些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挖出这些反革命，为人民立新功、破案立大功，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也能立新功！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根据以上精神，一定要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彻底地把这伙反革命挖出来。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十月上旬在天桥、王府井、外交部驻地发现这类反革命传单，是油印的，刻写的，用的天津光林纸，通过邮局寄的，几个城市都寄了，都收到了，这部分复制品，不能再复制翻印，可以在群众中研究，到破案后再收回。这部分传单通过分析有以下的特点：一、对外事部门、统战部门、公检法部门、文教部门很熟悉，因为传单中有很多×话。二、会刻写钢板，刻写和寄出封面是同一个人写的。看来这个人有油印机。三、这个人懂古文，用了不少旧

词成语。四、这个人毛笔字很有功夫，看样子这个人练过柳体字，所以估计象混进党内的旧知识分子或“五一六”兵团的后台，但他比五一六分子还坏。五、这人对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对群众运动不满，对文化革命很不满，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人想为右派翻案，看来对反右是不满的。六、是自己用面粉和的浆糊。七、是用四月十三日和四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糊的信封。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五·一六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五·一六分子把五·一六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来源：《红旗周刊》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12月4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讲话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

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

“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作幌子。

“五·一六”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

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五·一六”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五·一六”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驻外使馆代表的谈话

比如对“五·一六”的处理，北京就搞得比外地好，按主席思想，除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抓起来外，如张建旗，扣留起来，对群众要做工作，以便孤立少数。刘令凯这个人，我们保过他多少次，还是这样，他反我最早，而且是因为我保陈毅同志，这我很难理解。只要是善意的，贴大字报，提意见，甚至打倒都没有关系。是善意的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北外红旗大队把他扭送公安局、是我命令把他放的，他倒反过来说是派人搞的。他到现在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许多学校批他，我和文革小组同志给他解了围。我听他批判陈毅同志好几次，就在这里，不到天亮是不散的。我把他的意见转告了陈毅同志。

“五·一六”的头头不行，他们动摇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背后有坏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先念在财政部座谈会上谈五·一六

“五·一六”问题，出了个刘振玉，刘振玉并不是“五·一六”组织里的，是和陈大伦联起来了，通过操纵，出了点主意，这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甚至再出一个二个三个刘振玉，都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大联筹和使领馆等代表时的谈话

外事系统是有坏人破坏的，你们年轻，不要以为“非常委员会”反革命案件的线索破获了，就完事了。还要发动群，继续追下去。外交部总是有些嫌疑的。外事系统要擦亮眼睛，王焕德搞出来后，机要局就搞出几个人的小集团嘛！

“五·一六”也不只是炮轰总理，他们随时都可以转移目标，目的是要把无

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

“五·一六”分子仅指“五·一六”的头头，不要把一般受蒙蔽的人都叫做“五·一六”分子，不要搞群众。“六·一六”也是几个头头坏，下面的群众总还是革命的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董枫同志谈“五·一六”等问题

〔董枫同志：周总理联络员。地点：北京商学院 85 兵团总部。〕

“五·一六”中央已经宣布是个反革命组织了，“五·一六”不仅是反总理一个人，总理是主席身边的，毛主席说的话，通过总理来贯彻，反总理不光是反总理，是反中央，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理很多讲话是毛主席讲的，但是总理不能说那句话是主席讲的，针对总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财贸口（5.16）直接对总理，实际不仅是总理一人，实际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反中央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

总理上边是毛主席，很多地方，单位总理都要管，外事口总理也要管，总理的担子是很重的。外事口总理为什么管？因为夺权夺出了漏子。

“五·一六”是坏组织，不仅北京有，外地也有活动，还散发，寄一些反革命传单。中央已经表态了，大家（指商学院）抓“五·一六”是对的，因为中央已经说话了，这是反动组织，要把它揭出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五·一六”也不是那么多，现在抓了多少人，都是群众扭送的，几个人么！张建旗、程镇华、郭海燕等七、八个头头。这些头头主要是学生，真正是“五·一六”的重要成员是大头头，小头头。外国几个参加活动的发现不多。最坏的还是在后头。我看坏头头不只是在后边，青年学生知道的事情少，好多材料都是干部提的，学生一看问题多了，敢“造反”么！“五·一六”人不多，问题更严重的是在后头。出谋划策，提供材料的幕后。

一个思潮的问题。极“左”思潮，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坏人就利用这些极“左”思潮，利用这些东西鼓动起来，前面是青年学生，没有青年学生可利用的，就自己出面干。当然学生也有坏的，中央已表态了还想干，中央已表态说“五·一六”是什么东西了，有的还想干，有的送了卫

成区还坚持反动立场，当然这是极少数。

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坏人不多，最坏的是后台，不能把有这种反动思潮的人都当“五·一六”打，你们学校是根据地，的确历史比较悠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抓 5.16 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 5.16，哪里有那么多 5.16 呢？

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 5.16 的帽子。

（来源：1967 年 12 月 8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 63 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关于抓 5.16 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 5.16 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 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5.16 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 5.16 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轻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 5.16 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 5.16 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 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二、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说错活批评是

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纪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 5.16，5.16 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

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有人说：3.10 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 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 5.16？看是什么联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

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讲话

北京市抓“五·一六”比较健康。不要因为“五·一六”就老保翻天，反“五·一六”就是二月逆流的发源地。

一九六八年某月，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

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

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

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

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

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

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

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

陈伟回答：“没有证据。”

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林立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

（《王力回忆录》）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群众大会

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师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早上 4 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〇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

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文章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文章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中央会议

他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

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日，毛泽东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

余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文章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文章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文章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文章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文章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文章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师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主席，我讲不合适，还是由老师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师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继续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揪出来的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他们是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

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说：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〇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烈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对煤炭部在京单位群众组织代表的指示

总理指出，现在有一种呼声，什么第三次大串联，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反对自由外流。点一点火还不够吗？又把自己的派别观点带下去，制造紧张局势，很不好。自由外出的，一律不算下矿人员。全国形势很好，不能乱搞。

煤炭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7年8月17日（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

《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

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江青同志的讲话

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 1959 年 8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红旗》杂志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一文

8 月 19 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 8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 9 月 17 日出版的第 14 期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话

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摘要

总理：要求你们支持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当然首先依靠群众，还要武装，更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而解放军就是在这方面作得好。抓军内一小撮看来不合适，我们以前这样宣传犯了错误，告诉你们，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不管彭德怀、罗瑞卿怎么样，解放军是支柱，八条十条都有效，要联系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

她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

（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

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

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的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周总理：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三、批判在外交部夺权

（一）一些群众组织冲击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刘晓发表了“三月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发表了“打倒陈毅”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提出了“打倒陈（毅）、姬、乔”口号。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

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要大中小结合，

要彼此打个招呼。

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织代表的对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时的讲话

周恩来：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

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

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

周恩来：

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

周恩来：

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

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

（二）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和姚登山同志交谈

他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

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

传达后，群情激昂，高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

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

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

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力给姚登山的一封信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批斗陈毅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

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三）火烧英国代办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与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的谈话

〔时间：凌晨三时，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被接见者：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北外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

周恩来：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造反派：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

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造反派：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 19 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四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四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

（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的同志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 10 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

你们现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搞严肃的阶级斗争，你们一个学校都没有团结起来，你们还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回到学校两派三派联合都不容易，还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谢副总理插话：这是一个梦！）这是

一个黄粱美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的讲话
〔摘要。“财联会”代表也出席〕

陈毅同志这样批判，他们还不满足，和我们距离很大，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意见，我就不能和你们说一样话嘛。我只能通过你们向群众传达，不能都接见。外交部这样批判还不满意，外交部的权最大了。我参加过他们的大会、两次小会，还不满足。现在中央说话了，碰钉子了，没有办法了。监督权不算太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权夺错了。一个学院一派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撤消了，看来非把中央都抬出来才相信。外贸部本来做得不错，一派又搞成两派。

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不要学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的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判，希望你们就此止步。外交部在中央各部我是支持最多的。我要对中央负责，外交部走到边缘，开了会。你们外贸部不要学外交部，我直接管外交，结果把权都夺了。他们直接打电报给驻外使馆，结果顶了回来。

姚登山到处做报告，他到外贸部去过一次，他在外贸部的报告是错误的。制造混乱，煽动性很大，我当面批评了他。

中央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中央提了刘邓陈了吗？你一个司局长干部怎么能这样提？中央批准了吗、他用这个口号给驻外使馆打电报，人们不懂，是哪个陈啊？你们总是把事情做得那样绝对化。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周总理接见柬埔寨外宾之余与翻译班同学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陈毅问题
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和一位翻译的谈话
一、“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

二、“外联”核心组与“6.16”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参预了“五·一六”的活动，过几天我要去揪人，我有材料。

三、我现在不到外交部去，我要是去讲话，外交部联络站就垮台了。

四、北外红旗大队打姚登山是错误的，但姚登山把红旗大队比作卡比卡米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姚登山要一批二保。

五、外交部目前进行的四大是正常的，外交部乱的不够，还要大乱，但不许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的讲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

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

〔时间：晚〕

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谁打、砸、抢谁就犯错误。

二、外交部的档案文件要保证绝对安全，如发生问题，立即报告总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 34 个战斗队的群众。”

总理说：“对 516 不要认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线索就认为没事了，还是有坏人的，要注意阶级斗争。”

四、处理王关戚问题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改正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 1 点，周恩来在钓鱼台五号楼，找刚由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谈话

讲了对 16 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 8 月 7 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

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就让他走了。

关于这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

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

毛泽东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

时间：8月26日凌晨1:00—3:15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沈阳三派（八·三一、辽联、辽革站），同时被接见的有喻平、徐少甫、张正德、王坤×、莫文祥、李国华、凌少农等人。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凌晨，中央文革召开生活会批评王力、关锋

批评王力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提出王力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毁我长城；

第二，反对周总理，以王力的八七讲话为代表；

第三，反对中央文革，主要是反对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个人

第四，王力是“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

陈伯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吴法宪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

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周总理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最后，由江青作了总结；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并宣布：王力请假检讨。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

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

（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

（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

（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

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还说：

我对他们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

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把王力、关锋转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转送到西山一座别墅。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他说：“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

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不久，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中央打击极左思潮的问题，当时和现在都存在许多争论。

一、关于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问题。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在北京是否存在一个所谓“首都五·一六兵团”？从现

在看到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这样的一个小组织确实是存在的。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准周恩来。无论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和参加者的出发点、主观愿望如何，它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分裂、瓦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取缔这个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这个组织的一些主要骨干分子，由群众组织扭送到公安机关，基本上就瓦解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请假检讨”以后，吴德在北京市借口清查“五·一六”、清除“王关戚”的影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搞了一次大换班，把一些人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这就已经有了扩大化的迹象。

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了一个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何时成立？主要任务是什么？进行了那些工作？似乎都不清楚。

二、关于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问题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有的人借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个错误口号，就把一切批判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活动，都说成是“揪军内一小撮”，因而都是错误的，因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就是错误的。

有的人把“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既然同意“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也就是赞成“揪军内一小撮”。

有的人甚至认为，“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来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因为通知中就有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就从这段话说起。

众所周知：中央五·一六通知中的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时亲自加上去的，是整个文件的精髓、灵魂。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意在强调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仅混进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

导机关，也混进了政府机构、军队机构、以及各种文化机构。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突出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思。

以后，对这样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由于一些省军区打压革命造反派的事件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武汉七二〇事件暴发，在一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了“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提，实质上是突出了“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所以，“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曾经同意过“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但是，在处理七二〇事件的定性及方针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的人是有区别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中第一次提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谈话提到：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师参加？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杨成武谈话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

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中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吴法宪在中央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的发言中，根据叶群的示意，把陈再道的问题与徐向前挂上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说：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

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提议几个元帅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说：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出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这就是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实际上是突出了“军内一小撮”，这样就会给人们一种错觉：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当前打击的主要对象。由此，就会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的一次反革命暴乱，陈再道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后面有某个老师在操纵或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正是在“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一些人，包括中央文革的某几个成员，特别是一部分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热，认为：目前全国形势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到处都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以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就开始检讨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并批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

这就说明：“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三、关于处理“王关戚”问题

王关戚的问题究竟是谁提出来并向毛主席汇报的？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周恩来通过杨成武汇报的（杨成武说）；一种说，是江青通过张春桥汇报（陈伯达说）。很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

当时认为王关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看来主要是两条：一是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毁我长城”；二是煽动在外交部夺权，“反对周总理”。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王关戚有一定的责任，但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他们。

当时处理王关戚问题的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检讨信的批语说得很清楚：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就是说：他们是犯些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仍然称他们是同志，处理的办法是“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当时对王关戚三人的看法和处理是否有区别？

很明显，是有区别的。首先请假检讨的只是王力和关锋，四个多月后才是戚本禹。就王力和关锋来说，江青明确地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二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三个人的政治立场根本不同：

戚本禹一九八三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刑满释放以后，他在公开表态中，从未贬损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锋一九八三年虽然免于起诉，但仍被开除党籍。他出狱以后，对过去的政治、现实的政治都不愿公开发表意见。是桃花源中人式的？还是张春桥式的？令人费解。也许有一天这个谜底会有人揭开吧？！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中有一篇对关锋的的访谈录，标题中有句话是：“对我的失误和过错，我不想回避”。

王力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一部反思录就说明了一切。他说在请假检讨以后就开始反思，他反思的结论是：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的两次讲话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个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几乎都参加了起草，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所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

这就证明了江青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四、关于中央批判极左思潮的评价问题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打击对象上的微妙变化。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不是向敌人继续进攻，而是采取退却，从此，文化大革命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其实，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多次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战略部署是：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开始，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新阶段。

由于“二月逆流”的干扰，影响到相当大的一部分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个错误与过去一些地方的走资派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区别的。为此，中央采取了一个省一个省邀请各方代表到北京谈判的办法，先后解决了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北京、四川等等省市的问题。

进入七月，中央正着手解决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问题。总的来说，革命形势是好的，运动进展是顺利的。

不意，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发生了省军区独立师少数人与“百万雄师”少数坏头头相互勾结，煽动一些人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恶性事件。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武汉军区领导人有意策划的对抗中央的行动，而是由于领导人犯错误的影响下发生的少数人的“叛逆”行为。由于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坏事变成好事，加速了湖北省问题的解决。

但是，有的人在这种形势面前发生了偏向。他们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标志着全国形势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各省军区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后台的支持和操纵下，用武力对抗中央、夺取权力。因此在各地提出了“揪陶铸式的人物”、“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夺军权”、“夺外交大权”等等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口号。如果按照这种错误方针去做，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打乱了我们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就必须采取坚决的有力的措施，纠正这种极左的偏向。为此，不仅在外部的要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而且在中央文革内部，也要“消肿”，清理极

左思潮。

事实证明，在中央文革内部确实存在着“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形左实右的王力式的人物。

事实也证明，纠正极左偏向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然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

2008 年 3 月 2 日初稿

2011 年 9 月 29 日修改

第五章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刘贤权在青海省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个别人怀疑中央决定，认为“决定是假的”，“没有盖章子”；极少数的坏人，趁机造谣惑众，说什么“中央不完全了解青海的问题”等。还有的群众组织去京告状，实际是告毛主席的状。这是极其错误的。

八·一八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是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and 先锋，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准了以王昭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要是：

（一）六·三社论是文化革命运动中斗争的主要问题，一方以八·一八革命组织和外地学生，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彻底为六·三社论平反；一方以王昭等为首，勾结“保”字号组织，反对平反。这个斗争很激烈、很尖锐，持续时间很长。事实证明：前者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斗争中很多群众被欺骗、蒙蔽，上了王昭等坏蛋的当，有些群众组织起了保护王昭的作用。

（二）炮轰省委、火烧王昭的口号也是八·一八和外地学生提出的。在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并见之于行动，没有高度革命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当时一些群众组织，并没有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相反地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相对抗，提出新的省委是革命的，炮轰省委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等，为王昭等人解围，向省委报喜，特别是把青海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都归于王昭，流传什么“王青天”！王昭确是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革命组织这一革命行动，是完全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三）王昭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毛纺厂工人到省委静坐示威，李家庄孤儿问题，迟迟不处理，还调农民进城以及以后几次调贫下中农进城，围斗工人、学生等，都是在王昭的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严重的是有些问题发生在主席批转王效禹

同志的保证报告以后。

(四) 围斗、排挤外地学生。在“胡天申事件”上，他们大搞“慰问”，夸大病情，假报病危，扩大了事态；组织写传单，到处散发，企图搞臭和镇压外地红卫兵；组织写起诉书，写反击大字报等。搞得西宁满城风雨，一度出现了“捉拿凶手”的白色恐怖，有的学生连袖章也不敢戴。白天不敢出门。而王昭则自以为得计，说什么这一下抓住了他们的问题。严重地造成了本省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

(五) 徐国源同志第一张揭露王昭的大字报，刺痛了王昭，他便布置许林风、薛可写反驳的大字报，到处张贴，扩大影响，并在西门外几百人围斗徐国源，进行压服，甚至张贴揭发王昭和省委错误的大字报时，有人就当场提出质问，要把人家轰走。

(六) “民和事件”，查明确有“黑材料”，八·一八作的非常对，而红卫兵总部等，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则千方百计为省委开脱，大肆攻击八·一八盗窃了党的机密，制造了“民和事件”。

(七) 王昭重用坏人，结党营私，谁要给他提意见，就打击报复。生活上拉拉扯扯，极不正派，伪君子，假装正经，乱搞男女关系。

(八) 王昭同三反分子罗瑞卿的关系极为密切，六六年四月即有人揭发，但始终不作交代；同王仲芳互相勾结，攻守同盟，企图达到包庇罗瑞卿、王仲芳，使自己蒙混过关的目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

关锋同志：

青海事件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

第一条，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军区副司令员）夺了党在青海军区的军权，推翻、扣押了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

第二、他篡夺军权后，又勾结××部队，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多人，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事情，军内也没有的事情。

最近青海出现了大标语，要欢送刘贤权，打倒刘贤权，（刘贤权同志是中央调至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内蒙是个大军区，刘贤权现在不能去，由别人去代理，

以后去。

戚本禹同志：

你们其中一些人还在进行对抗中央的指示，写“打倒刘贤权”的大标语，攻击八·一八大方向错了。

二、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为庆祝青海日报社革命委员会诞生，《青海日报》六月二日发表了题为《把〈青海日报〉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的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告各省劝阻革命群众组织和文艺体育团体来青”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在亿万革命群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中，宣告成立了。这是“一月革命”风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青海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又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了革命的“三结合”。这就保证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

这种大批判、大斗争，在推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时候不能放松，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放松，在掌权和用权的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核心骨干作用。在青海省的夺权斗争中，一批革命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亮了相。毛主席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青海省的革命干部，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做的。

青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帮助他们转变过来，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群众，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打击报复。而是以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在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中提高觉悟，反戈一击，共同对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公告

一、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由刘贤权同志任主任，由张江霖等同志任副主任。

二、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

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四、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六、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扑。

七、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

八、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往所发出的一切公告、通令，

必须坚决执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青海省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文章：《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

三、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中共青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解决一批重大遗留问题

省委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由这一决定而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律予以平反昭雪。省委还对解决青海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全省的十一个遗留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如宣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青海是占主导地位的，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是好的，是革命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前的第四届省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受到全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些符合全省各族人民愿望的决定，把功过、是非分清了，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

一九八几年，中央军委作出结论：赵永夫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日逝世。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以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

在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大传播、

大普及，革命大批判如火如荼，革命大联合日益巩固，革命三结合空前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全省一片红，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整个青海高原呈现着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当然，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勾结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秘密串连，幕后策划，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否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大方向。社会上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也伺机反扑，妄图否定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绩，大刮翻案妖风。

斗争仍然在继续。

2007 年 10 月 4 日初稿

2011 年 9 月 29 日修改

第五章第四节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呈中央并华北局会的报告
报告说：最近在呼和浩特市出现了“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下司令部”为
乌兰夫翻案的传单。证明一小撮坏分子在幕后积极活动，企图利用民族问题挑动
蒙族（主要是土旗蒙族）群众，反汉排外，为乌兰夫翻案。有的黑帮分子也借机
翻案。对此，绝大多数革命群众极为愤慨，并对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认为区党委在斗争乌兰夫反党集团上，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的保护
乌兰夫，奎璧，吉雅泰。许多同志质问区党委“为什么保住乌兰夫不让斗”“为
什么不敢放手让广大群众斗争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等，反映很强烈。也有
一些不明真相群众对中央保护乌兰夫产生了误解，怀疑“是不是刘邓搞的，毛
主席知道不知道”“中央这样保乌兰夫，内蒙古党委又不敢放手斗，是不是过去
搞的有问题了。”

请中央把区党委关于乌兰夫问题的报告迅速批发下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请示中央批转“关于乌兰夫
错误问题的报告”

经过讨论，华北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建议，即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
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
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乌兰夫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 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四、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电报，
和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滕海清谈内蒙古目前形势

“八条”下达后，方向明确了，四·一三到五·二六，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反党集团制造的反革命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五·二六以后，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彻底粉碎了反党集团的阴谋。五·二六以后“八条”在内蒙古各地得到了认真的普遍地执行这段时间里较好的，呼市比较平静，按正常秩序进行工作，其它各地方也逐渐好转。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乌兰夫总指挥部文章：《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四、积极发展资本主义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领导权

六、搞独立王国，破坏祖国统一

七、反对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抹煞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

八、抹煞民族区域自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九、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彻底革命，积极推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

十、极力美化宗教，主张“和平共处”

十一、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十二、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十三、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四、乌兰夫是贪生怕死的大叛徒大特务

十五、乌兰夫是不学无术、养尊处优的大王爷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高锦明在内蒙古自治区批判乌兰夫大会上的讲话以乌兰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大致有三种人：

(1) 老搭档，老班底，多年来与乌兰夫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像金璧、王锋、吉雅泰。

(2) 拉进来的封建上层人物，他们是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小股份公司，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恶活动，这一部分人以哈丰阿为代表，包括封建上层，叛徒、卖国贼、间谍、外国特务。

(3) 近年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小撮骨干，包括蜕变的“老干部”、“走资派”，李贵等。

三、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滕海清高锦明时的指示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等中央首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接见滕海清、高锦明同志，做了如下指示。〕

1、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经成熟，同意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不仅是内蒙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全国对内蒙都很关心，内蒙成立革命委员会会有很大影响，对修正主义也是个打击。

2、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一定要求得那样完善，人数不可过多，机构不一定那样完整，是个过渡，要在斗批改中逐步完整。在斗批改中通过实践，需要的机构建立起来，不需要的就去掉。革命委员会是个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搞个成熟的架子。要在斗争中逐步改进，逐渐成熟。

3、军队方面：人要适当多一些，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干部解放得多这是好

事，但不一定都参加三结合，可作工作，各盟市不一定太多，呼市可以多一点，因为他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将来可以逐渐扩大，付主任中可以有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可以搞得小一些，照主席的教导，在斗争中逐渐成长。

4、革命委员会，从机构到人委都要有个革命化，都需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

5、各盟、各旗（县）条件成熟的可以搞革命委员会，你们可以先抓几个典型，把经验报上来，还不够成熟的，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斗争中考验，锻炼干部和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路线，掩盖阶级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以适应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

内蒙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哪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正确地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八、大搞挖肃运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滕海清在内蒙革委会上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过去没有打死什么人，最近打死了一些人，国家的机器、枪又被抢。究竟怎么看待？毛主席说主要是：

- (1) 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
- (2) 群众里有坏人；
- (3) 无政府主义。

东三盟这三种情况都存在，内蒙的情况也符合全国的情况。这里告诉我们不能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另外加强队伍中思想建设。敌人不甘心死亡，主要手法是操纵一部分受蒙蔽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内蒙处于边疆，有苏蒙修、日、蒋特务，在这时要插手进来捣乱。他们可能和走资派联系起来破坏文革，社会上地富反坏右乘机钻进来，也打着造反有理，甚至钻进我们造反派内部来，大造谣言，破坏文革，因为我们空隙很多，造反派中的派性是最大的防空洞，敌人肯定要钻进来，国内外敌人就是找这样场所。造反派内部不能那样纯洁，造反派内部争名、利、权起了很坏作用，这些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滕海清谈内蒙形势

当前内蒙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尖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及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蒙修特务，互相勾结起来，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一些坏家伙有一个暴露的过程，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暴露了，有些正在暴露，这是件大好事，只有让他们充分暴露出来，我们才能消灭他们。

东三盟（呼盟、哲盟、昭盟）武斗正在发展扩大，阶级敌人暴露得还不充分，现在我们有很多地区，很多单位，有这种情况。乌兰夫黑帮分子放在那里不批不斗，对这些人还恨不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偷偷的保乌兰夫及其一伙。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还逍遥法外，还有大批判、斗批改搞不起来。一方面领导不力，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另一方面，里面有阻力。也就是有部分人，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在内蒙廿多年的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很好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吴涛给内蒙古革委会各常委同志的一封信

信

文教口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以后，必然要涉及到其他方面，这是又一次从文艺界开始的更加深入的革命，当前面不要搞宽，防止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把乌兰夫的黑线彻底挖净。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内蒙地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要充分地注意到，乌兰夫在内蒙廿年的统治，他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流毒，还远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乌兰夫这条黑线还没完全彻底挖掉，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我们同乌兰夫的斗争就算完了。没有完，他们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这一套东西根子是很深的，就是连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也还没有全揪出来，内蒙揪出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逸伦、王锋，军区揪出了乌兰夫在军区的代理人××、××、和黄、王反党集团，并不等于全内蒙的黑爪牙和黑线全部挖出来了。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军区机关、部队整顿整训结束了，好像矛盾解决了。

必须看到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很复杂，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要防止右倾，甚至麻木不仁。

有些地区阶级敌人刮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还有的人把黑手伸得很长，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其他弱点和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插手到造反派内部，利用造反派的派性，瓦解造反派的队伍，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制造造反派之间的思想紊乱。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区机关有的人还在背后搞鬼，有的人耍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也披上左派的外衣，混水摸鱼。实际上他们蒙蔽了很多群众，从极“左”或右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干扰和破坏对乌兰夫的批判。

四、开展挖肃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教育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

话

一、不抓阶级斗争，教育革命是搞不好的。

二、一定要彻底揭开教育界阶级斗争的盖子。

最近几天有些人公开讲，保乌兰夫是保定了，一定保住；还有人讲；内蒙二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如果成绩是主要的，功劳是乌兰夫的。……公检法是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许多坏人。王再天一手把他包庇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很多真正革命同志受迫害受打击。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的讲话

滕海清说：

我们挖黑线、肃流毒，他们没有理由说不挖。有人便借此说是“压制老造反派”“带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你们这里摇摆性很大，呼市也有摇摆，呼三司摇摆很厉害。包头学生摇摆，工人坚定。

吴涛说：挖肃斗争就是搞阶级斗争，矛头是对准敌人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有些人反映是“整老造反派”“站错队的参加挖肃斗争就是老保翻天”。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老造反派应当肯定。但造反派队伍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不能这样说，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革命造反派队伍也是如此，不作阶级分析地讲老造反派是不行的，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是对准造反派，有坏人抓出来，你的队伍就更坚强了，更纯洁了，对革命有利，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挖肃斗争中钻到造反派里的人，完全有，特古斯在去年就是个造反派，还是响当当的，进革委会时都叫他进，那个时候抓他，群众有情绪，让群众自己抓出来嘛，我们从党内、军内挖出了一批走资派，是打击谁了？再纯洁也纯洁不过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是也挖出了揪出了坏人？

滕海清说：农村牧区划阶级，不要搞挖肃，大批判就是肃流毒，农村划阶级斗牧主要搞，有坏人也可以揪出来。发现新的地主可以划。

滕海清说：老保是有想翻天的，但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们怎么也翻不了天，有些地方复辟了，我们慢慢地有计划地总要搞他。有人说，公检法百分之八十是

坏人。其实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看大方向，看基本的，大多数是好的，光看支流问题，钻在里面就会出不来。阴暗角落总是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会有。有人说我们压制造反派，真正受压制的是假造反派，或者根本不是造反派，是资产阶级造反派。对真正的造反派我们怎么会压呢？我们只能支持。

滕海清说：

你们前段走了一段弯路，你们在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时，发生了动摇。

把反击右倾翻案与挖肃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为乌兰夫翻案。不是有人大肆宣传呼市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这是什么人说的，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会这样说，内蒙、乌盟各个旗县都成立了革委会，人民当家作主，他说是复辟，这不是敌人吗？不是替乌兰夫宣传吗？

革委会被牵着鼻子走，你们被什么人牵着走的，为乌兰夫翻案的人牵着你们的鼻子走，你们糊涂就糊涂在这里。

群专问题，不少旗县两派，出了很多毛病，你抓我的，我抓你的，互相抓，这样不行，要很快纠正。

上一段批评了你们的错误，也是对全区其它地方的教育，如果都这样无政府主义还行，我们是有政府的，报社、电台不得了，一点不能出乱子。

乌盟报纸是错的，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有的是好人犯错误，有的是坏人插手。还在那里为乌盟报辩护，现在还明目张胆地到外地宣传，为乌兰夫翻案，不得了，什么想不通，群众通了，坏人一辈子也通不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在听取内蒙察右中旗汇报後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权星垣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讲话

有的没有发挥骨干作用，说什么“自己好容易结合了，可再不能犯大错误了。”

有的人，人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贴过他的大字报，他叫人家检查，

有的人却说什么“那时我看他们就不正派，看现在真的揪出来了。”

有的人说过“如果保守组织胜利了，也在挖乌兰夫黑线”，

个别有翻案的，例如公安厅就有。公安厅造反派有右倾思想，曾一时对王再天的面目没看清，于是就有人说(原红革联)“造反派不对了，保了王再天”，

有人说：“我们组织不该解散，那时解散坏了，如果不解散，现在还不和咱们联合，还不闹个席位。”

有的干部不是挖敌人、肃流毒，他趁这个机会否定造反派，说什么：“看，那时不是看准了吗，他们里面就是有坏人有牛鬼蛇神！”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对内蒙古文艺界的讲话

文艺界的挖肃斗争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了。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基本上揭开了，主要的坏人我看基本上是挖出来了。也可能还有。

文艺界的造反派应该自动地按照江青同志的讲话精神办事，向阶级敌人进攻。但是在特古斯揪出之后，一段时间有反复，以后又有一段反复。反复的原因，一个是敌人在那里顽抗，我看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领导同志思想右倾。

文艺界因为有些同志捂阶级斗争的盖子，有些群众就拉出来，新组织了其他战斗队，有些同志很担心是不是又乱了？毛主席说要搞大联合，我们搞分裂了，有各种谣言，各种看法。那种乱不是乱我们自己，是乱了敌人。那样一分，有些同志就头疼啦。其实我们老造反派思想保守，促了一下，这样一促就把敌人暴露了，我们老造反派当然有点功臣自居，一促对他有帮助，这样老造反派就转过来了。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同新杀出来的战斗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真正地把坏人抓出来。

我认为文艺界的挖肃斗争和内蒙整个地区一样，现在首先就是要继续抓阶级斗争，以抓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为中心内容来办毛泽东学习班，来提高大家的两条线路斗争的觉悟。其次，挖出了这些敌人，应该把他们的流毒，他们反动的罪恶肃清。

你们揪出二百多人，是否都是打倒对象？我认为这二百人中间，当然有些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但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人。

下一步干什么呢？应该是斗、批、改的问题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挖肃斗争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大批政治案件被发现和破获。乌兰夫集团一明一暗的两套班底和“新内人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发。由乌兰夫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革命翻案集团被砸烂。披着革命领导干部或革命造反派外衣的，伪装革命而实际反革命的两面派有的已被挖出。这就粉碎性地打击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特别是牧区，今年一月兴起的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牧区，所到之处，砸烂了乌兰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牧区残留的封建和宗教势力，横扫了日本帝国主义、苏蒙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一切残渣余孽。

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号通告和五月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纪要正确的。

当前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集中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妄想从根本上破坏和否定伟大的“挖肃”斗争，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翻案，为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翻案。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要弄的反革命新花招，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①阶级敌人从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我们迂回斗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有时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名，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实。他们接过反对“整群众”的口号，死捂阶级斗争盖子，保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装出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样子，极力扩大打击面，把矛头引向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以转移视线，乘机溜掉。他们还会采取揪明保暗的办法，把一些次要的人物推出来，牵制我们的主要力量，“舍车马，保将帅”。他们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残酷打击了一些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以保住自己。他们还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妄图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之间斗争的歧途，等等。这是阶级敌人狗急跳墙，进行

垂死挣扎的突出表现，是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的主要手段。

②施展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搞右倾分裂活动，妄图分裂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和煽动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施展借刀杀人的毒计。他们捏造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制造革命组织之间“磨擦”，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抓住小事小非，无限上纲，激化矛盾，造成长期对立，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挑起“内战”，煽动武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搞臭，以转移视线，在混战中求得生存。他们有的披着革命的外衣，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花言巧语，上窜下跳，左右煽风，挑拨军政之间，军民之间，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部队和部队之间，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极力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而我们有一些糊涂人，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正在上当。

③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人推出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破坏“挖肃”斗争，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暂时不理解，恶毒的把这场斗争污蔑为“跟中央唱对台戏”，“打击老造反派”，“支持老保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糊涂人，由于右倾思想作怪，也跟着敌人瞎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出发，非常注意社会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狂呼乱叫，蒙蔽和煽动群众，刮起翻案妖风，例如：当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造谣，乱叫，“×××是杨成武线上的”，“搞挖肃斗争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看不到内蒙革委会的右倾是最大的右倾”。当自治区革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政策界限，引导群众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时，他们又狂叫，“挖肃斗争大方向错了”，“要击面宽了”，“纠偏了”，“刹车了”，等等，等等。

④施放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革命意志。他们有的利用小恩小惠，金钱美女，腐蚀瓦解我们的队伍。有的利用某些同志喜欢奉承的弱点，歌功颂德，肉麻吹捧，设下圈套，使其中计，诱惑他们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还有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暂时窃取的权力，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的财产，滥发奖金，补助，拉拢部分落后群众为其服务。这种种手段，其目的就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的翻案活动。

⑤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散布“搞生产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停产，就是全面胜利”，极力煽动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制造事故，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设备，造成停工停产。他们有的诱骗落后群众，投机倒把，退社单干，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制造紧张空气，破坏市场供应，利用封建迷信，腐蚀群众，蛊惑人心，以瓦解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半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要胜利进行“挖肃”斗争，就必须狠反右倾。首先在呼市文艺界兴起了“挖肃”斗争，一举揪出了披着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实则反革命的特务分子特古斯，打了一个前哨战。右倾思想还在顽固地抵抗，污蔑革命群众揪出特古斯是“形左实右”，是“黑手揪红人”等等。今年一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口号，选择公开包庇坏人的公检法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首先在呼市开展了“群众专政”，同时在牧区提出了划阶级、斗牧主的战斗任务。一开始就揪出了黑司令官苏修特务王再天，在三月底四月初，乘揪出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之机，向我们举行反扑，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支持“老保翻天”、“压制老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办学习班的形式，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全区目前“三右”主义仍然是运动的最主要的危险。当前主要是反右，反形“左”实右。要注意有人以反“三右”主义为幌子搞“三右”主义，以反右倾翻案为幌子搞右倾翻案；但也要防“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哲盟《×××》、《×××》从去年到今年四月，错误严重得很，你们是造反派，犯了错误改了就行。哲盟革委会和《×××》压了你们不对，我们是批评了他们。你们《×××》也是做得过分了。我们告诉你们，赵玉温不要打，你们不听。肇那斯图、阿古达木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你们就不打。那时我们不揭你们的底，可能你们是受蒙蔽。革委会成立了，还是那样，一直搞的不像样子。我这

并不是说哲盟革委会压你们是对的，革委会压你们是错误的。《×××》、《×××》广大群众是好的，犯错误的是头头，你们带头冲革委会，那怎么是正确的呢？你们犯错误改了就行。不能说你过去正确，现在正确，一贯正确。没有那样的事嘛！不能否定过去的错误。《×××》不能压《×××》、《×××》。《×××》的大方向是比较正确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从三月二十六日乌盟小报出了问题以后，一直到现在，最近才把这个盖子揭开。实质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乌盟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人在那里搞了一套班子。实际上，乌盟革委会是两个中心、两套班子。他们不是搞两派的派性问题，而是搞了一个黑班子，搞反动的“多中心论”。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 1946 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 年 4 月 20 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 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

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二十多年来，“新内人党”疯狂地进行了民族分裂和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利用已经窃取的权力大肆宣扬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公开叫嚷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大量散发“三五宣言”，提倡民族自决，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他们打着民族特点的幌子，叫嚷要“踏出自己的路”，拼命推行“三不两利”，“稳、宽、长”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极力宣扬反动的“三基论”，他们还大搞所谓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行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搞民族军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分裂祖国、实现内外蒙合并、复辟资本主义，做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乌兰夫等“新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为了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利用合法身法，大搞宫廷政变，组织地下黑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并在呼市等地区搞反革命夺权。大搞反汉排外。把“新内人党”的骨干安插在要害部门掌权，阴谋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目的。

五、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纠正清队等中的错误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我们的错误突出的是：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违反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相当普遍地产生了逼、供、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人党”六万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人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出“内人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人党”。当时曾出现了许多极端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边防站是内人党的边防站”，“内人党是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

二、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

比如盟市一级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统计，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区党委、人委机关的处长和盟市机关的部长一级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参加了“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有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全区正副县（旗）长、党委书记共有七百零五人，参加“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三、对待群众组织，犯有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四、在第四次全委会之前，高锦明同志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防“左”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贡献的，对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有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

例如，在《内蒙古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散布了“狠是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批示：照办。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 共 中 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概要）

1969. 12. 19；中发 [69] 85 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中提出：由于目前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决定成立“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实行对内蒙古的一元化领导。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 85 号文件，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对内蒙古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协助前线指挥所工作。

“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最后以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杜

文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黄振棠（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四人组成，郑维山为书记，杜文达、黄振棠为副书记。

六、七八年以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七七七月七华国锋等同意内蒙党委a七八年以后
意见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中共中央批示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希望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也有同类的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胡耀邦同志通知这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达这一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_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

十一、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全盘否定对乌兰夫的批判及内蒙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

内蒙古自治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是全国的先进地区，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模范自治区，在国内外都曾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工作走了

弯路。重工业的发展过快，畜牧业的发展被削弱，影响了全区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关于批判乌夫兰的错误问题

关于乌兰夫的错误，是于一九六六年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处理的。由区、盟监委和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开了两个月，他先后检查了四次，刚开始态度极不老实，最后一次他检查了，还很诚恳，他表示要永远做毛主席的小学生，要让在实际行动中看他。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在此前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与乌兰夫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中说：“内蒙古自治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是全国的先进地区，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模范自治区，在国内外都曾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工作走了弯路。重工业的发展过快，畜牧业的发展被削弱，影响了全区生产的发展。”这就全盘否定了一九六六年对乌兰夫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地区对乌兰夫及其他一些的人历史问题进行审查，提出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问题，中央并未审查批准作出结论。因此，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一大冤案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关于二月黑风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来，呼和浩特市“三司”、“八·一八”派的一些群众对内蒙军区有意见，组织人在军区门前静坐。二月五日中午 12 点 15 分，内蒙师范

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在喊话，希望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出来辩论。正在这时，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提着手枪跑出来，韩桐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两枪。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体内。抢救了五个多小时无效死亡。内蒙军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第一个向群众开枪的军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事实确凿，何来什么“内蒙古二月逆流”一大冤案？！

三、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错误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党内清查“新内人党”；二是在革命造反派内清查“坏人”；三是在牧区划阶级清查“牧主”。

一九六九年初，中央领导人多次对内蒙的错误提出批评，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内蒙主要负责人就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错误向中央作了检查，并着手纠正。

华国锋、胡耀邦等人都只抓了一个内人党问题大做文章，而对遭受严重打击的革命造反派，不但没有平反，而且变本加厉地以种种罪名继续进行迫害。

2008年8月31日初稿

2011年10月1日修改

第五章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群众河北省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天津发生“八·二六”流血事件，

1966年8月26日，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天津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是向文化大革命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参加；

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参加。压力不大，会后，万晓塘自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万晓塘逝世。

天津市委组织五十万人参加追悼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

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张淮三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

中央派解学恭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二、取缔“野战兵团”，成立五代会，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宣布天津由河北省辖改为中央直辖，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淮三在公安局“政法公社”夺权
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驻军按毛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郑维山到天津搞调查工作，听郑三生、肖思明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

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批语，对于学校的

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的工作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五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十七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十二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

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团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天津延安中学革命大联合的体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延安中学红卫兵姜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灵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天津延安中学三年二班 许玉仁《打倒风头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办理为宜。

一九六七年三月，天津市召开了五个代表大会

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批复取缔野战兵团

李雪峰、解学恭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

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

××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选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江青讲话：

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

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支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

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

康生讲话：

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

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

周总理讲话：

“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没有责备他们嘛。”

“北京 80%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 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讲：

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颀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万晓塘死了，跟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

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无效，反而不好。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陈伯达谈“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的问题

你们过去虽然做得对，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掉到泥坑中去。你们过去正确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随便干了。商量都不能商量了，过错也不让弥补了，非打倒不可。但打倒的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回头，要变成被打倒的对象。想想嘛，把天津闹乱了，有什么好处。

天津的部署是中央决定的。

没进红代会，这是缺点，可以弥补嘛。无非有缺点，解放军再三说要弥补。你们这样搞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你们少数人正确？你们的行动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你们这样跟解放军对抗是严重错误，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化革命运动搞好的一段话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解学恭传达陈伯达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陈伯达对天津武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戚本禹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宣布为法西斯组织。对于这种事的人，内部要造反，把这种人揭露出来，认真处理！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杀了人就没有事了？那不行！要处理的！达成协议以后，马上打电话停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问题只能靠内部解决，禁止任何人带人到外单位参加武斗或冲击。今后规定一个简单的标准：谁去冲击谁负责，谁抓人、扣人谁负责。武斗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质变了，不管你这个组织过去怎么样，都不行。以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什么组织，是革命组织还是法西斯组织。

戚本禹说：我再讲两点意见：

一是塘沽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用武斗的精神去支援一下，两派考虑一下，要派人去参加劳动。这要与驻军研究商量，安排好再去，安排不好不要去，去了绝不能发生武斗。那是个特殊地方。如果在那里发生武斗，军管会有权按“六·六通令”处理。如果有人包庇，我们就要过问。这一点你们要向上海造反派学习。上海港运发生困难时，上海造反派去支援，参加劳动，做出很大贡献。武斗停止生产就是犯罪。今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项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白天搞生产，晚上搞革命，任何人不得随意离开生产岗位。

另一点意见是，建议你们不管哪一派，今后不要随意说“军内一小撮”。你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三依靠”：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解放军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与地方不同，如与天津的万张反党集团就根本不同。他们是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他们长时间来形成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军队不是这样的。军队中也有坏人，但是极少数，如彭德怀就是坏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好的，是经过考验的。要不，为什么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可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性质是不同的。不是坏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一小撮”，不要哪里都抓陈再道，哪有那么多陈再道？就那么一个嘛！犯了错误可以炮轰，可以检讨。有坏人你可以提出材料，我们研究，不能随便提“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昨天我提出搞一个塘沽港的协议，一个油田的协议，一个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大家都没心搞了吧？搞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以后就又去搞武斗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天津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港口封锁要解除，护港大队解散。对国计民生的事你们要有责任感，几十条船停在那里，每天要付出多少英镑，合人民币四百万元，相当 50—60 万农民一年的生活。重要的是妨碍工厂设备的进口，更重要的是政治影响。

不管哪一派，都是这样，不能说我是造反派，就任何事情都可以干，可以吗？（双方代表：不可以。）那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上海的造反派，港口堵塞几十万吨都一下子解决了，这值得你们天津学习。如果对港口不负责任，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造反派。

我对港口哪一派都没意见，不是责备哪一派，要很快的把港口疏通。天津的革命派，你们两派要帮革命之忙，帮国家之忙，帮人民之忙。我和伯达同志很关心港口、铁路运输，任何人不能封锁港口、天津港口关系到北京，关系到全国。

天津军队要帮助港口，中学生不要去港口，大学生也不要。他们写大字报还厉害。要让搬运工人去，要把港口迅速疏通，这是最大的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大家要顾全这个大局。这几句话是不是毒草啊？可以当面批评。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戚本禹讲话：

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

三、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

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

江青讲话：

同志们好！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我还有别的事。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是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我们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派，毛泽东思想派；就是一个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一个阶级，不是什么派别。我们总是讲工人阶级嘛，没有讲工人派别嘛！你们现在搞了两大派，势不两立，我同一个地方的两大派讲过，你们都抱住一块大石头，把这块石头当作宝贝不放。抱着这块大石头就走不动路，怕丢掉了这块大石头，就低着头走，就迷失方向，这怎么走呢？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有些人还得意得很，把这块大石头当宝贝，被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很高兴，可以不要看路，可以闭着眼睛。

你们打砸抢搞的太没味道了。太没有意思了。你们干得津津有味，也害了你们，害得你们不能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得你们不能很好的掌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谢副总理说：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九月五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

（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周总理：你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健敏：我们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们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大家都听到啦！（赵健敏：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大联筹”是跨行业的，应该归口嘛，应该加强扩大五代会嘛。加强扩大也好，充实也好，你“大联筹”和“五代会”不能成立两个政权对立。凡是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吸收到“五代会”里来，共同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才有方向。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动的，要打倒。不能自己创一个方向，以“我”这一派为核心，不管你造反多早，这样作都是错误的。《文汇报》已经批判了这个问题。

工厂本身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好联合，也好巩固。学校就差一些。各学校要规定一个时间，都要回学校来，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不让毕业。你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这个协议？（众：有）去外地串连的，中央已决定不招待，不开支。这一点，要靠你们自觉的执行，回到本校搞斗批改。客观条件已成熟，就是考验革命小将的时候，看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谢富治：石家庄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周总理：我们学生到处抓“军内一小撮”，错了。当然现在不抓了。学生要想一想拥军做的怎么样？军队要想一想爱民做的怎么样？

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把情况和群众一说清楚，就不成其为百万雄师了。

天津的学校联合，还有些困难，他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指挥全国。学校就去包办一切，总想支配天下。包打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

老保翻天有两种：一是走资派在后面操纵，坏人可以搞起来。二是社会思潮，思想里有“私”字，个人主义影响，组织小团体，派性高于党性。联合的关键在那里？主席说了四个字，“斗私批修”。这是主席指给我们的斗争方向。大联合要建立在“斗私批修”的思想基础上，一定要多作自我批评，把“私”字去掉，才能联合。学生现在要赶上来，不要还是学生领导一切，跨行业不行。现在学生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不要以“我”为主，唯我独左。（众：鼓掌呼口号。）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大联筹”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现在协议的文字上写的怎么好，怎么漂亮也不行，就是有个别的野心家想垄断天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揭穿这个盖子。我老实说，我是好意的，“大联筹”的同志不要怪我，我是这样说，我是不赞成你们“大联筹”这个组织的。你们是跨行业的组织，混杂了不少不好的人，被坏人利用。你们赞成不赞成我的意见？（一部分人答：赞成）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的工人，都按照工厂、行业，所有学生，按照学校班级联合起来，不要搞跨行业的组织。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你们天津的大联合就起实际的作用。现在搞这个“大联筹”，是跨行业的组织，要归口，回到本单位去。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題？“大联筹”的同志？

（“大联筹”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程国富同志表示同意协议，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诬工贼、学贼。）

说赞成这个协议的“大联筹”的同志是工贼、学贼，是完全错误的。赵健敏这话是完全错误的。

（赵健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谢副总理说：你学生不能和人家工人对立。）
劝你们工人不要被那些学生拉着鼻子走，工人应该左右天津的局势。

（谢副总理说：赵健敏，你们有不同意见，应首先在代表团里面斗争，不当回到天津串连群众，开会向群众讲这就把事情搞坏了。以后有意见可以发表，但只能在代表团里吵，今后这样的事情要注意。

大专院校一代表说主要是五代会不执行协议，人家联合去备案，他不给备案。

谢副总理说：那就不对了。关键是两代会，一个是工代会，一个是大学红代会，你们先把工代会、红代会怎么加强、扩大，达成个协议不好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都是抽象的，你们争权还不是争工代会、红代会，然后是革命委员会。关键是工代会，大学红代会，对不对？

众答：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接见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

三、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

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

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四、中央文革判定天津市出现了一个黑会一个黑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吧？

（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一讲道理。

姚文元同志讲话

被中央文革去年十一月份就揭露的所谓“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什么会呢？只要看一看这个会的后面有黑手，是什么人，就可以弄清楚，据

说有两员大将，一员叫方纪，一员叫孙振。方纪，何许人也？是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刘邓在文艺战线上的代理人，周扬安排在天津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振，何许人也？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就是雪克，就是大毒草《战斗的青春》的炮制者，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这样一些人召开的一些会，同志们，是不是黑的，（众答：是）该不该揭露？（众答：该。）

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他们召开这个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取而代之，这些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方纪，我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人见过面。但一九五八年，他写了一篇《来访者》，我是批评过的。《来访者》是控诉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当年，六月十八日他给周而复——大毒草《上海的早晨》作者的一封信，这封信经过林默涵发出的，他把他的《来访者》说是构思不成熟的问题。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了一封信，他是和刘白羽商量写的，在这以后，他又说《来访者》思想上是积极的，只是艺术上没有达到，而且说，只要帮他的忙掩盖过去，下次到上海面谢。从这里看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一条黑线，在全国有一个网，一个方纪受批判的问题，四面八方都动起来，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大群人，都在为他奔走。《来访者》这篇作品发表以后，马上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并且加了按语，说是大陆的揭露，揭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而且把方纪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功臣”。当时，香港反革命报纸说方纪这篇小说是“良心的发现”，就是这样“赞扬”的，可见他的反动本质。后来我又看到英国有一个特务机关出的一个刊物叫《苦果》（译音），内部发行的，专门搜集社会主义国家内最修、最修的作品，收集中国两篇半，其中就有方纪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员孙振，一九五九年的《战斗的青春》，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一些坏书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有些大毒草好多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一丘之貉，组织这本书的人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叫刘金，这个人跟雪克转了很久，他也写了很多，后来被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这本书一出版，广大工农兵纷纷反对，在一篇文章中点了，说它是坏作品，是美化、歌颂叛徒，诬蔑我们军队，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刚刚开了一次

座谈会，要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上海的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得到了刘邓的黑指示，慌张已极，马上下令禁止批判这本书，而且说：谁批判这本书，就要检讨。陈丕显这个家伙，是根本不看书不看报的家伙，但他三天就看完了这本书，看完就下令不准对这本书进行批判，他们究竟是什么黑关系！这还看不出问题吗？（江青同志插话：陈丕显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还居然看了这本小说。）就是这些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你们天津还有一个人，叫吴雁，又名王昌定，是周扬很欣赏的，为他翻案，写了一本《创作需要才能》，周扬看了以后，为他捧场。这篇东西是经过方纪修改后，才在《新港》登出的。

江青同志讲话

有一个电影，叫《探亲记》你们看过吗？（众答：看过。）这个作者叫杨润身，这个人也在你们天津，也是黑会的积极分子，他这个《探亲记》，算是修到家了，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歪曲伟大的解放战争、卫国战争。在他的电影里，写整个战争，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无亲可探，但非要探亲。他的第一稿说，儿子当了高官，不承认贫农的父亲，恶毒透顶，歪曲工农兵。但象这样一些家伙，一个月拿着国家的高薪还不说，还要拿着非常非常高的稿费，不义之财，是剥削，我有证据。拿着这些稿费，作为他们黑会活动的经费。这里（江青同志念单据），方纪一百五十六元，杨润身三千元，孙振一千元，多啦！王昌八百元，袁静八千元。举一点例子，同志们听一听，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来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赤裸裸地说明他们要夺权。孙振给一个董阳，不知道是什么人物，大概是伙伴吧，还有邵文宝、滑富强、王静、张贺明写信，指使他们夺权，务请注意，这是他的亲笔信：“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夺权的观点制造舆论。”说：“为了扩大影响，是否考虑与全国各省市已经占优势的或者还在坚持斗争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联合发表呼吁和宣言。互相支持，造成优势。这一切搞好，夺权才能得到广泛支持。”

一九六七年的五、六月，天津市话剧团在天津、北京等地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陈里宁案发生在湖南

陈里宁是湖南省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办事员。

(1) 陈里宁批评刘少奇的问题

根据陈里宁在 1965 年 11 月 10—11 日写的一份交待：

我害怕刘主席反对毛主席。我疑心刘主席的原因有如下一些：

1. 1950 年刘主席作土地改革报告，说地主三年可以改变成份。这个说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很明显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

2. 1956 年他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快消灭，资产阶级正消灭。这很明显是种修正主义。1962 年中央农村工作双十条说明地主阶级存在，并没有消灭。经济上改变了，政治思想上没改变，不能算阶级消灭。列宁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消灭阶级社会带来的一切痕迹，才能算消灭阶级。

3. 刘主席在 1959 年军委扩大会上说：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搞林彪、××× 人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提高领袖的威信与个人崇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正确，并不要别人去搞个人崇拜。~}

4. 毛主席一贯主张掌握党的政策要反右防“左”，坚持正确的路线政策。可是刘主席 1959 年说：掌握党的政策要左一下，右一下，象开汽车、飞机一样。我认为这是对党的政策开玩笑。

5. 刘主席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修掉了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1962……正当赫鲁晓夫反华之时，这是不是相呼应？如此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我在×××看守所交代过了。这些矛盾我提出来，总是遇到批判，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害怕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会与蒋介石呼应，人头滚滚。

6. 1960 年湘潭市都说刘主席故居要修花明楼。党委书记不通过手续，跑到湘潭市×××厂要马达、电线、木材、水泥。刘主席家是地主，房子本来就比农民好，再修好让别人参观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算不算背叛地主阶级？

一九六二年，陈里宁开始研究刘少奇的问题，与别人交谈并写日记。

一九六三年初，陈里宁的日记本被人偷去。

一九六三年四月，陈里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湘潭市人委秘书长，“他诬我精神病，把我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回机关后，我又琢磨那些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月，陈里宁写信给毛主席谈到了他的怀疑。“不久我又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我继续琢磨那些问题，但湘潭人委办公党支部开大会批判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于陈里宁仍然坚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改，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经医院鉴定：胸部透视无异常发现，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态清晰……。不久又出院。

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陈里宁写了几十封信给一些部位和个人，谈他对刘少奇问题的看法。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陈里宁又被送入湖南精神病医院。医院作出结论：

结论：(1)此员精神病复发，其所以出现反动言论，乃是原来反动思想在精神病症状上的反映。(2)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公安部派人将陈里宁从湖南精神病院“秘密逮捕”押解至北京入狱。

一九六五年八月，陈里宁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伴诊×同志述：目前病人正在京×××受审讯，因病，影响审讯。已和我院联系，先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继续审讯。查体：一般情况佳。精神状态：意识清醒，接触良好，对答切题……。但无自知力，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被审。印象：精神分裂症（妄想型）。

(2) 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

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

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么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二）陈里宁案平反在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里宁第四次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

主管大夫金弘敏从陈里宁的言行及“病历”中看出了“问题”，她否定了以前对“病人”的诊断，冒着风险，帮陈里宁把写给中央文革的信件发出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教工和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联合医院的造反派，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造反派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公安部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

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群众。负责人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群众误入监狱。群众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

这时，侯虞铿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

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周恩来总理要负责人接电话，负责人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

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

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

负责人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余的人留下做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谢富治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负责人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并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

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

负责人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

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并宣布陈里宁自由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向王广宇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在“红卫医院控拆刘邓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陈里宁发言：

金弘敏大夫的发言：

会后，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以后又转到历史研究所。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说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

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

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

戚本禹派人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

（三）《新时代的狂人》出现在天津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人员王广宇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王广宇的问题时，把这件事当成他的罪行之一）。

一九六七年五、六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他们去看演出。办事人员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

（四）围绕陈里宁问题的两派斗争

一九六七年七月，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戚本禹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戚本禹交待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

1967年7月末或8月初，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

戚本禹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陈里宁回到北京，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中央文革办事组关于陈里宁问题的电话记录的传单

戚本禹为了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大致内容是：“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

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 至 3：55，地点：人大会议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

因此不能说他是有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贰、本节简论

一、利用群众示威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天津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说：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周恩来在当时也指出：

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

万晓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

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

二、群众组织阵线不是十分鲜明

开始天津市委少数人支持的“红卫兵野战兵团”，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这个组织被取缔。

新的天津市委（直属中央）成立以后，推动大联合，筹备“五代会”，又出现了一下子吸收偏右的群众组织过多过快，同时又排斥了一些造反的群众组织。

在造反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中，混进了不少坏人，他们热衷于搞打砸抢，甚至抢劫财物、强奸妇女。

三、中央文革处理天津“两黑”（一个黑会、一个黑戏）问题出现偏差

关于黑戏问题，目前看到的材料不多，就江青、姚文元讲话来看，不能说明这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准备成立“工农兵文艺革命委员会”，要夺权，究竟错在哪里。

关于黑戏问题，虽然没有看到《新时代的狂人》的演出剧本，但是，它所表现的原型——陈里宁，确实是一件冤案。

一九六二年以后，陈里宁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行，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很正常的事。当然，要注意方式方法以及场合。

一九六三年，湖南省湘潭市在处理陈里宁的问题时，只是认为他神经有问题，把他当作精神病人强迫治疗。

一九六五年，公安部插手陈里宁问题，把他作为政治嫌疑犯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一月，群众组织为陈里宁造反，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插手陈里宁案，把陈里宁释放出狱，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北京市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利用陈里宁问题作为筹码，搞派性斗争。

戚本禹为了调和两派矛盾，再次把陈里宁收监。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把陈里宁问题，与王关戚问题挂钩，断定《新时代的狂人》是黑戏。

此后，中央专案组断定：陈里宁是“假反刘、真反毛”，把陈里宁定为“反革命”。

就这一件事来说，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就太多太多了。

2008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4 日修改

第五章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批判江西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和新疆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南昌少，你们的事情出在九月三日，比较迟，南下的同学去了，起了一个推动作用。当然主要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江西省市委确实没有精神准备，我看确实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开个大会，单传达就要不少天，一定要给地、县级干部传达，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就欢迎。你们还继续串联，斗批改。允许他们开会，向当地工农传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

第一点是各级党的领导要在群众面前经受考验。

第二点，确实在南昌和其它地方，省委引起群众斗群众。责任不在于群众互相之间，主要的根本的在于省委。

第三点，希望在座的同志们，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并肩作战，共同革命。

二、批评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魏厚庆、曾凡珩等人两次集会，研究夺取江西省党、政领导权。

魏厚庆在会上说“上海夺权有几天了，我们不能再等了”。

会议公推他为夺权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魏厚庆、曾凡珩等人按照计划，同时在省人委和省委两处举行夺权大会，宣布“接管省委、省政府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召开批斗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的大会。这股夺权风很快传遍全省各地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赣州红卫兵为营救因“反军”陷狱的舒北斗，五千五百三十五人绝食。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七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十七时二十分，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一次电报指示

你们进了《江西日报》的同志，望能立即退出，以利报纸立即出版。至于《江西日报》的报头问题，因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以不改为宜。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关于《江西日报》问题的第二次电报指示

据悉，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同志尚未完全撤出，报纸至今还没有启封出版，对此中央十分关心。

一九六七年五月，江西大联筹的万里浪、张羽等人提出“五项要求”，在省军区门前“静坐”。

“静坐”持续两个多月。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对江西军区文件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有关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批示及他自己的指示

总理指示：

1. 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

2. 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

3. 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4. 刘培善先作检查，军区那个检查，你们（指军区）自己研究。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严令：立即释放舒北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南昌军分区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南钢 6·29 事件。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四日，赣州发生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武斗。打死 168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大联筹的电报

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晨，新华社南昌记者站及时准确地报导了江西保守派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

总理传达主席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而是强……是要流血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七月份把局势稳定下来，迎接“八·一”，要把斗，批，改搞好……从广州、福州调一部分部队来江西，稳定局势，维护社会治安，树立无产阶级权威。

总理、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除军事机关以外的武器弹药，在十天之内全部集中，在本单位封存好，不准转移，不准埋藏，不准调换。”

总理说：“农民进城不只是他们的责任（指联络总站），挑动农民进城是军分区、武装部，我在这里直说了，不是军分区、武装部哪能挑动武斗？！”“农民大批进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不好，这是错误形势，军事领导机关责任要大些，他们确实是下了命令的，我们了解。”“军区、军分区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有坏人，也有犯错误的，有些地方要派小股部队去处理，如波阳、景德镇，要不，就不好办了，要有权威的人去处理。”“江西军区要作一个好的检查，要比六月七日检查要深刻要坚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一些人策划火烧萍乡煤校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周恩来送审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这个稿子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

主要内容是：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给新华社江西分社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机枪扫射五十八次快车，

联络总站派温圳的张勇布置，动员农民，用机枪，火车本来往东走，上饶通知他后退，车轨上有枕木，停下来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五人，打伤七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话记录
总理：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我就是怀疑你派的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那里的武斗制止？刚才说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军分区，武装部确是不象话，放纵了几个月，已经成了习惯。

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对造反派）以你们造反派为核心，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跟亮相的领导干部商量，现在军区威信不够，你们信不过，所以夺枪，这是在南昌等地。另一些地方联络总站力量大，联络总站相信军区，那样搞联络总站又要反对，我们希望联络总站能够觉悟，马上转过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在赣州军分区头头李胜的支持下，“反复辟大军”残杀造反派，打死 223 人，准备上翠微峰打游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赣州事件后，亲自派广州部队去赣州。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萍总”造谣说济南部队写反动标语，并以此为借口冲 6013 部队驻地，抓走济南部队四人（一个副营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副连长和一个战士），打伤五十七人，重伤七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进驻吉安的广州 6182 部队战士到军分区参加会议，军分区头头指使二十多名战士毒打野战军战士。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西四方面代表谈话

周总理说：

今天我把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请来了，济南部队是从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去的，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部队。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个部队的军政委程世清同志、副军长杨栋梁同志。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出的队伍，谁要说是刘少奇派出的，是污蔑，谁说的，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

第一，江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现在赣州、萍乡、宜春、南昌、波阳、抚州、九江、上饶、景德镇都派了部队去，我有一个要求，军区、军分区、独立师、独立营、人武部，其他地方部队，应当对野战军抱欢迎的态度，搞好工作。

第二，无论如何，既然达成协议了，首先在北京要执行，不要互相谩骂，互相打人，捉人，抢东西。

第三，江西问题快到临近解决了，军区党委要改组。现在有条件成立筹备小组了。

三、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3 号

此件看过，照办。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

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三）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温道宏、鲁鸣、罗元炆，陈昌奉等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四）各革命组织及江西省广大革命群众，应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保证铁路等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勇于揭露和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联合筹委会”方面的革命造反派，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摆事实，摆道理，进行耐心的、细致的、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提高觉悟，投入革命的行列，决不可采取打击报复、歧视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实现以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六）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一个野战营进驻抚州，因为要去的时候，抚州有独立部队，本来两个营，一个福州派的，一个是本地公安部门改编的，原来中央决定把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今天野战营进驻抚州，派联络员到前面联络，由副团长去联络；但是进驻的人被绑架 28 个人。新任副司令员直接打电话打到抚州军区说，把联络同志都绑架了，姓刘的参谋长他不承认，要他释放，他也不承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抚州军分区一些人发动军事叛乱

八月二十四日，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之后，他知道主席说话了，知道自己错了，

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凡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搞农村包围城市，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

有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

三、筹备、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江西省南昌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贯彻中央“九·五”命令，纷纷上交武器弹药》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视察江西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

（一）毛主席对形势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说，“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们：“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二）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到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们：“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主席问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时说：“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们：“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主席还教导我们：“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们：“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右倾时，主席教导我们：“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

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组织群众政策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压抑，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说：“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子、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人家也不好。”

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军队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说：“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受蒙蔽的。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俱，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主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们：“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 6011 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满意，主席说：“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发生武斗以后，省大联筹和极“左”派互相攻击，形势比较紧张。

革筹小组及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次武斗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起来的，责任不在广大群众，并组织两派群众短期集训，要求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仇恨集中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身上，揪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通过省革筹小组的工作，革命派提高了觉悟，从而稳定了局势。

一九六七年九月份，极“左”派借口为“三大户”平反，对省革筹小组施加压力

革筹小组依靠省大联筹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视察江西时所作的最新指示，掀起大联合高潮。以后，当部分极“左”派在坏人的策划下不断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时，革筹小组又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狠抓大方向，不受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革筹小组就多次邀集极“左”派负责人座谈，并多次深入南航、一中、医学院等单位对极“左”派的群众耐心讲道理。

长江航空工业学校，是极“左”派的主力之一，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到这个学校大讲特讲毛主席关于“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的最新指示，使小将们走上了革命的正轨。他们感动地说：“起初我们认为程世清，杨栋梁等同志是带派性来的，感情对立。现在觉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和杨司令员更亲近了。”这个学校克服极“左”思潮以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不参加武斗，主动交出武器，百分之九十的师生和工人，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掀起了复课闹革命的高潮。

一中红八团，就敲锣打鼓向革筹小组送检讨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南航井岗山因该校东方红首先挑起武斗，他们便用武装进攻东方红，要东方红缴械投降。

省革筹小组及时抓住这些典型事件，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省大联筹所属组织，对他们进行活的政策教育。

南航东方红也自觉地作了“肃清我组织中的极‘左’思潮”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极“左”派的活动达到高潮

程世清到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等单位听取工人对形势的看法，教育工人阶级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潮，坚持斗争大方向。在省革筹的教育帮助下，广大革命工人不参加外单位的武斗，排除了极“左”派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初，革筹小组请示中央同意后，把极“左”派的后台黄霖从北京押回南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

经过群众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极“左”派组织的大部分群众看清了叛徒黄霖的反革命真面目，纷纷表示，要和黄霖划清界限，彻底肃清极“左”思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初，发动群众，大搞“三查”

商业厅系统的商业厅战斗团（属省大联筹）和商系总指挥部（极“左”派所属组织）之间长期对立，不断发生武斗，致使文化大革命处于停顿状态。省革筹小组把两大组织的全部常委集合在一起学习。商业厅战斗团揭发了坏人幕后操纵商系总指挥部的罪恶活动。会后，两派逐步消除了对立，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轻化工业学校发生武斗纵火事件

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拘留了武斗纵火事件的策划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现将江西省革筹小组如何正确对待极“左”派的材料一件发给你们。这个材料中总结的经验，在全国一部分存在这类矛盾的地区和单位，是有参考意义的。

希望你们自己也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需要我们经常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目前，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已作出指示和规定时，尤其需要具体的经验总结。如有比较好的典型材料，望核实后及时报告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程世清等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央同意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其中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昕、陈昌奉、黄先、刘瑞森、郭光州、丁士来、于厚德、许洪云、李鹏、于德馨、万里浪、蔡松龄、涂烈、汪桂荣、吴才榜、陈全生、周开炬、蔡方根、张行阳、龙标桂、刘剑秋、王萱春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并由程世清同志任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社论说：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江西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模范地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始终把学习、执行、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组织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最迅速、最广泛、最深入地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受蒙蔽的群众，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样，他们就以迅速的步伐，实现了全省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成

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四、批林批陈 批判程世清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以来，程世清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

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

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

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

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

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

林彪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

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为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

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到江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对许世友等人）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以及江西省的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白栋材、李登云、于德馨、黄知真、陈昌奉、熊振武、张志勇、邹文泗等十一人，先后到达北京

从这一天开始，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江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的“反攻倒算”行为，点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领导人。

一九七四年二月初，万里浪、张羽等人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进行革命发动，揭发省委某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一打三反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会见涂烈，谈话三个多小时，指出：“斗争从你的信开始”。

涂烈一回到南昌就召集群众组织代表广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揭发批判。会内会外结合。

六、江西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烈、蔡方根等人在南昌市西湖路二十一号集会，传达王洪文的指示，组成以涂烈为负责人的“七人”核心、以蔡方根为负责人的“二十一人”骨干组织和以“江卫文”为名的材料班子。一方面建立“武斗小分队”，一方面搜集印发省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右倾翻案活动材料，大造革命舆论。

七、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一审宣判：

判处涂烈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判处万里浪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张羽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魏厚庆、曾凡珩有期徒刑各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八、李九莲案件的始末

（一）一封恋爱信引起的风波

1969年2月28日 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明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

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3月5日 曾昭银在不知信的作者的情况下，接信后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往赣州地区保卫部。

1969年4月 曾昭银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部队和赣州军管小组保卫部让他协查“反革命匿名信”。

1969年4月30日 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时，李九莲说破实情。当夜曾昭银向军管小组保卫部报告。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由冶机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师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其中一则日记如下：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像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

- 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注：此处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注：此后被公布此日记的资本主义者故意省略，本书编者无从查考）

（二）在一打三反中，李九莲以反林罪名判五年徒刑，后改免于刑事处分

1970年1月29日 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认为处理太轻，携卷往省革委会要求重判。

1970年2月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1年1月5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作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1972年6月20日，鉴于林彪折戟沉沙，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1972年6月20日上午八时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李九莲被安排去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三）在批林批孔中，李九莲要求平反，得到一些个人和组织的支持，被判十五年徒刑

1973年5月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最高法院、公安部。上访的困窘中节食资助一位带着孩子的新四军干部的妻子——也是冤屈上访申诉者。

1974 年 4 月 4 日，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

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1974 年 4 月 13 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74 年 4 月 14 日 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代表义愤的赣州人民，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4 月 14 日 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1974 年 4 月 16 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

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1974 年 4 月 17 日 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 年 4 月 19 日 李九莲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 年 4 月 20 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李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1974 年 4 月 22 日，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 年 4 月 25 日，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 年的 4 月 25 日 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1974 年 4 月 26 日 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1974 年 4 月 26 日，“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4 年 4 月 30 日 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4 月 30 日 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

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1974 年 5 月 2 日，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

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发表讲演。

1974 年 5 月 9 日 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 4 月 24 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 年 5 月 10 日 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1974 年 5 月 11 日 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1974 年 5 月 11 日 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1974 年 5 月 12 日，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

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

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1974 年 5 月 18 日 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 年 6 月 1 日 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1974 年 6 月 2 日，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各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1974 年 6 月 1 日 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1974 年 6 月 7 日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1974 年 6 月 10 日夜，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

接着，1969 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6 月 11 日 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1974 年 6 月 13 日 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1974 年 6 月 14 日 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 年 6 月 17 日夜，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1974 年 6 月 29 日，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1974 年 6 月 30 日 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 年 7 月 4 日 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 年 7 月 10 日 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1974 年 7 月 12 日 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1974 年 7 月 23 日，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

1974 年 8 月 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1974 年 8 月 8 日 《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

1974 年 8 月 20 日 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1974 年 8 月 21 日 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1974 年 9 月 15 日 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1974 年 9 月 30 日 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等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974 年 10 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974 年 10 月 22 日 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4 年 10 月 23 日 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974 年 10 月 25 日 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974 年 10 月 29 日上午，朱毅贴出《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

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974 年 10 月 30 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1974 年 11 月 1 日 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1974 年 11 月 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1974 年 11 月，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

面对越愈恐怖的高压，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 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

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974年11月29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散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出卖，4人被当场拘捕。

1974年12月3日，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

关于李九莲的问题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

李九莲的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

关于李九莲调查委员会问题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竟搞的是什麼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

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查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查。”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

1、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救世主”，“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

领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出了第一片嫩叶。”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

4、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等等。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的官们祭起了一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

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 26 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

方道球同志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

1975 年 1 月，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 10 月 22 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 年 5 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 年 5 月 22 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三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 年 7 月 3 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 年 9 月 27 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

刘庭荣（后被判刑 15 年）、管佑龙（后被判刑 15 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 7 年）、林锋（后被判刑 5 年）、罗斌（后被判刑 15 年）、邱彩云（后被判刑 10 年）等 16 人被拘捕。

1975 年 12 月 20 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 年 5 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

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四）十月政变后，李九莲以反华罪名判处死刑，“李调会”被定为“帮派体系”

1976年12月28日（另一说，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同文中也对邓小平“颇有不敬”。

1977年初，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

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 年 4 月，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根据 1977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1977 年 12 月 8 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1977 年 12 月 11 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判处死刑。

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 年 12 月 14 日，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

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

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二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1978年7月2日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78年4月30日，赣州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坚持批评华国锋判处死刑

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口号。

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昂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

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1979年4月，赣州中级法院复查李九莲案。

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

1979 年 4 月 16 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79 年 4 月 14 日 赣州地委同意中级法院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五）华国锋下台，李九莲“平反”

1980 年 1 月 29 日，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

1980 年 3 月 15 日，地区法院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 1969 年的拘禁、1974 年的逮捕和 1975 年判刑，以及 1977 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

1980 年 4 月 14 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了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1980 年 5 月 8 日，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

1980 年 9 月，江西高级法院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

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 年和 1974 年、1975 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 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1980 年 9 月 17 日 江西省委研究作出批复：“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消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1981年1月23日 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在赣州地委扩大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反革命李九莲和非法的李调会案是不能翻、也是翻不了的。”

1981年1月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坚持李九莲案不能翻。

1981年1月，新华社记者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其中指出：“李九莲由于两次被无辜囚禁，判刑申诉无效，自然对整她的前公安部长产生强烈反感，加之前后与世隔绝了七年之久，对社会上很多真实情况不了解，有一些错误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对华国锋的批评也并非一无是处。”

1981年1月25日，胡耀邦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1981年1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接到胡耀邦指示，当即给江西省委负责人作批示“（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1981年3月24日，赣州地委决定为李九莲平反，对因李案被冤狱株连者进行复查重处

1981年3月26日 赣州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刘玉瑞代表地委就李九莲案复查处理问题作报告

1981年4月13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派员去李九莲家宣读对李九莲的复查改判书（并未作无罪宣判，留有严重政治错误尾巴），李九莲母亲向他们提出六项要求，他们回答：完全给她平反这个她达不到。

1981年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

省高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指出：“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没有分析此前兴国县法院对李九莲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赣州地区保卫部认定李九莲有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确，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莲在劳改期间的表现，和她在《我的政治态度》中一些攻击粉碎“四人帮”、攻击领袖、吹捧江青的言论，“没有对李九莲这个具体人进行认真地具体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认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处了她死刑”。

“从1979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九莲申诉，中央有关部门也陆续转来为李九莲申诉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区中级法院……(也)进行过复查。但由于在我们头脑里‘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她没有了这条罪还有那条罪，总想抓她一点尾巴；案内没有证明(她)犯罪的材料，还想再调查找些材料来定点罪。在定性上，认为她构不上反革命罪，还想定她诽谤罪，以致使这个案件不能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得到纠正。”

1981年5月9日 江西省高院审定作出对钟海源(81)刑二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被告人钟海源无罪。

1981年7月 朱毅、方道球、曾传华、宋德恒、康为民等近六十人出狱，但无一被宣告无罪，均结论为犯有严重(帮派)政治错误，尚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

刘挺荣、马军、罗斌竟被改判成刑事罪犯，(待)“刑满”释放。

1981年8月8日 李九莲母亲卢菊英要求原调委会人员帮助他们向上面反映自己的愿望，为李九莲平反昭雪。

1981年8月底 朱毅赴京上访李九莲案平反中的严重遗留问题，

1981年9月12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为彻底处理好就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的会上说：

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评华国锋，是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长期被管制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拖得又太久，影响之深广是必然的。当年受到“李调会”人员冲击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在台上。这样，同情李九莲等人的人很多，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所以处理善后必须稳妥：既要坚决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团结。对当年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伺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1981年11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

《报告》说：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2 年 7 月 鉴于李九莲案及受株连人员近一年来未得到中央有关方面庄重承诺“再复查”，朱毅再度赴京上访，仍无果。

1983 年 8 月 17 日下午，赣州地委书记杜昭，指使地委保密委员会借口朱毅涉入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中央下发的(调整 and 落实政策)文件起诉，以“泄密罪”逮捕朱毅。

1983 年 8 月 18 日 杜昭借口打击刑事犯罪，一举刑拘了李调会骨干和有牵连人员数十人。

1983 年 9 月 2 日，曾传华、宋德恒、梁义贵等原李调会骨干十余人被五花大绑，和刑事犯一道徒步游行示众。

1984 年 9 月 李调会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七人被“泄密罪”再次判刑。

1987 年 4 月 由于杜昭退休，省委和高院干预，朱毅、曾传华、宋德恒等被宣告无罪出狱。

2003 年， 赣州官方编撰《赣州地区大事记》

其中记：“1974 年 4 月 26 日，一些人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在赣州市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揪斗、批判、拉山头、打派仗等活动，历时数月被解散（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后遭错杀，1981 年平反）”。

贰、本节简论

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收集到的不多，很多重要问题都没有反映出来。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

一、关于军事叛乱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中央作出解决江西问题的决定性以后，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为首的一小撮人，对抗中央的决定，在抚州农村，欺骗、挑动一部分农民群众，用武装包围城镇，占领了九个县。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

二、关于李九莲问题

其实、李九莲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它被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利用，搞得扑朔迷离。

（一）李九莲的政治立场问题

1966 至 1967 年，李九莲是抚州第三中学的高中女生，文化大革命中是第三中学红卫兵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

“1966 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这说明她当时确实是一个革命造反的战士。

1968 年高中毕业后，分到某工厂当工人。这以后，她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急剧地变化。一个曾经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为什么在九大以后会产生严重的政治上的怀疑、动摇情绪？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家庭、个人方面的原因。

促使她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从她自身经历的几件事可见一斑：

1968 年夏 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远赴深山“共大”，哥哥李东林则在西宁基地有“科”难“研”。

1968 年秋 看到青年熊辉被以反判刑的布告，李九莲同情不已。

1968 年秋 “清队”（“三查”）开始，李九莲的父亲、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李忠华因黄埔军校同姓同名者被“揪出”，常跪地求李九莲代写认罪书，屡遭李九莲拒绝。

1969 年 3 月 21 日，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

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8日，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了一封未署名的信。

1969年5月1日，工厂保卫部门查抄出李九莲的三十篇日记。

从这一封信和一篇日记的内容来看，可以确定：

第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产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

第二，对刘少奇的问题产生怀疑：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

第三，对现行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

第四，对林彪产生怀疑：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第五，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这其中包含着对某些极左或极右的倾向、做法的不满，但总的说来，是一种严重的政治上的怀疑、动摇情绪。由于李九莲只是在私人通信和私人日记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应该确定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而不属于违法乱纪问题。

（二）在一打三反中对李九莲问题定为恶攻林彪属于敌我矛盾，在林彪事件后改为人民内部矛盾

对李九莲问题的定性处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并经保卫部同意，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交由群众处理；

一种意见，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认为，属于“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1971年1月5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由此可以看出；李九莲政治思想上的错误虽是多方面的，但程世清仅仅抓住李九莲批评、怀疑林彪这一点，无限上纲，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

因此，到1972年6月，林彪事件发生后，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又批复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由此可见；对李九莲问题的第一次错误处理，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把帐算到林彪集团身上。

（三）在批林批孔运动及抓整顿中，对李九莲要求平反问题定为反革命翻案活动，属敌我矛盾，李九莲判刑十五年

1973年5月李九莲开始上访，1974年4月4日，李九莲开始贴出《反林彪无罪》等六张大字报。并得到朱毅等人组织的“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支持。

1974年4月13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即使按照1972年6月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意见，李九莲要求平反也是应该的。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此时却抛开反林彪问题，抓住李九莲其他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无限上纲，说“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则是完全错误的。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一些遗留问题，又要稳定大局。不搞大字报上街、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应该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加以引导。

江西省、赣州地区的领导对“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一开始就采取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的错误方针。

由于矛盾双方都采取了对抗的行动，使得矛盾不断激化、升级。

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全国推行“全面整顿”，对李九莲一案的处理再次升级。

这实际上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怀恨在心，借机进行报复，坚持错误，不肯悔改。

（四）十月政变后，对李九莲以反华罪名判处死刑，“李调会”被定为“帮派体系”

1977年初，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年12月11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反对华国锋、对邓小平“不恭”而被判处死刑。

1978年4月30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因书写“打倒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1978年7月2日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事实证明，李九莲、钟海源是在十月政变后，以反对华国锋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的。李调会成员二十四人是以“帮派体系”成员罪名，分别被判处五年至二十年徒刑的。

与此同时，在全国，因反对华国锋而判处死刑的有五十多人。因涉嫌“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骨干”而被捕入狱、判刑的若干万人。

（五）华国锋下台后，群众要求平反，官方不肯平反，最后羞羞答答地“平反”

群众以李九莲反林彪有功、反华国锋无罪，要求平反。

江西以李九莲造反有罪、翻案有罪，紧跟“四人帮”有罪，属轻罪重判，错杀，撤消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不肯平反。

胡耀邦以李九莲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说明了其本质是好的，反对华国锋、对邓小平不恭是受了极左的影响，同意平反。但强调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最后结果，地方法院答复：完全给她平反这个她达不到。

处理李九莲一案的历史过程告诉人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2008 年 3 月 13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7 日修改

第五章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造反派批判省委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甘肃境内，以大中学校和铁路系统职工为先导；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随处可见。

从中旬开始，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大专院校，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5月20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文化革命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兰州大学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

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

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张，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

一九六六年六月，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就掀起一次斗争高潮，

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

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

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批判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

当日下午，江隆基去世。（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

（1978年1月26日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平反昭雪。）

一九六六年六月，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八月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革联派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汪锋呈报中央撤消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委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

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喷气式”等，裴孟飞死。（文革后平反。）

红联派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汪锋被红卫兵追得无处藏身，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兰州“造反”群众组织红联派及外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揪斗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制止动乱扩大的五项规定：（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要到外单位贴大字报；（三）不要出宣传车；（四）讲要派代表提抗议；（五）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围斗，更要严禁打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针对革联派红卫兵横扫“四旧”造成的破坏，省人委批转省文化局《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报告》，提出，凡属于中央、省级、县级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妥善保护，不要使其遭受破坏和损失，省博物馆、县（市）文化馆等事业单位所保存的历史文物或文物展览，目前一律停止开放。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及赴兰红卫兵宣布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成立了“工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甘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李友九被兰州铁道学院“造反派”揪到该院批斗。

此后省委和省政府一些领导人被兰州各高等院校进行了轮番批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肖华找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到西山去，向他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洗恒汉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传达，要他们搞好思想转弯。洗恒汉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他，只是叫他们转好思想弯子。洗恒汉回甘肃后如实向张达志作了传达。

洗恒汉和张达志统一思想后，他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进占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建立据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会后，甘肃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甘肃省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部分师生 3000 余人，组成 200 多个“长征队”，徒步前往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等地进行“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军委会议的精神，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政治部副主任张 X X 就带头贴出大字报，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洗恒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洗恒汉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字报出来后，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 X X 同志站出来了。

在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 X X 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军区决定由张 X X 接替李虎担任文办主任，王 X X 接替高维嵩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

对洗恒汉和张达志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要洗恒汉交待同贺龙的关系问题；批判洗恒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反派们给他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洗恒汉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竟一头栽下台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铁路工人群众组织“火车头”成立。

二、革命造反群众组织宣布夺甘肃省委、省政府的一切权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两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查封。《甘肃农民报》停刊。《甘肃日报》改为只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的《红电讯》。17日，在一派群众组织主持下，《甘肃日报》重新出刊。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通知，决定今后“文化大革命”实行分口分级管理。（一）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主管，文化大革命，生产工作由生产领导小组负责；（二）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省委文化革命接待室及外地师生接待站；（三）撤销农村社教办公室、城市社教办公室及城乡社教委员会；（四）按照工业、农业、文教、大学、财贸、党群政法及综合 7 个口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分别管理所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兰州 34 个“造反”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

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瘫痪。

此后，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属机构相继被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号召“全面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红联的领导权逐步转移到“火车头”手中。

红联开除了肖泽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红联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三月，红联又开除了“红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驻甘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陆续进入全省厂矿、农村、学校，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任务。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 3 月 11 日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兰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驻兰州部队指战员 15 万人集会游行，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兰州地区革联与红联两派群众组织在甘肃日报社发生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兰州铁道学院一群众组织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打倒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均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兰州地区一部分群众组织冲击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并围攻斗争了办公室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二至五月，在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的支持下，“火车头”一派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不斗汪锋；

开除“七·一”战斗队；

开除“红战”；

把矛头对准军队；

又结合了王世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从“红联”中杀出来，另行组织了“红三司”。

从而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

“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三、中央发出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军委让洗恒汉回到兰州，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洗恒汉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

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并与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洗恒汉和张达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洗恒汉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说：“张、洗是老实人！”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洗恒汉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他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他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洗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洗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洗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听取了张达志、洗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洗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洗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甘肃省军

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峰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照办。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兰州军区党委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

（转张达志、冼恒汉同志）

一、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

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二、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给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本件已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观过。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三同志已于十三日回兰州，拟与他们通电话后，如得他们同意，将甘肃军管会改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吸收胡继宗同志参加。

本件另印发给碰头会各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兰州地区一群众组织又冲击并占据了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办公楼，并静坐至 23 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七里河桥发生大规模武斗，约有 4 万多人参加。

兰州一群众组织从是日至 30 日冲击甘肃省军区办公大楼，并静坐“绝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同意将原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和省、市政府副省、市长以上领导人，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兰州军区发出第 5 号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间，冼恒汉和张达志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你们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

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的具体指示，杨嘉瑞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份人和詹大南到北京。

中央并没有通知詹大南去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压企图让中央改变五月十四日的四条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中央为了帮助甘肃军区的一些负责同志觉悟过来，彻底改正错误，又通知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和甘肃军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去，同时也通知胡继宗参加“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座谈会 7 月 22 日结束。

甘肃军区的不少人，还是错误的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要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汇报情况。

康生，关锋，杨成武，在几次听汇报当中，都曾多次指出詹大南的错误，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觉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首长甘肃领导同志

康生说：甘肃犯了错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分裂，是在一百天之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红三司成立），他们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分裂，出现了红三司，这是突然的吗？不是。是掌权以后发生了变化。甘肃二月五日到十日，五天的形势是很好的。为什么会分裂呢？一个是夺权以后把原来的“走资派”当作死老虎不斗争，不批判汪锋了。

康老讲：另一个唯我独尊，不尊重别的组织，对别的组织排挤。二月十日，开除了肖泽民，十八日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康生、关锋、杨成武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人，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

康老讲，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

你们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后，参加的人开小会，帮助詹大南进行检查，座谈回去以后怎么办，写出了纪要。并由康生和关锋提出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讨论。最后报到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甘肃省领导同志

康生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

康生讲：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龙炳初、张忠等二十名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在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并直接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主席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家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端正了方向。两级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歧已基本解决，对于今后如何把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进行了充分讨论。纪要如下：

（一）《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

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詹大南同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洗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志对“四条”竟然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这次来京，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谆谆教导，认真学习文件，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同志应向机关、部队和革命群众，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

（三）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洗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

（四）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

（五）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大家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张达志、洗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

组成了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兰州部队组织游行，支持武汉革命群众，反对陈再道。红联派一些人冲击流行的部队。

红联派联合革联派，企图打垮“红三司”。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兰州地区“群众组织”之间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召集各派组织商谈制止武斗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1967. 07. 29; 中发 [67] 229 号

呈主席批示

林彪七月二十九日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

中央认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中央同意《纪要》中的六条意见。中央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甘肃省军区和当地驻军，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和《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并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此件连同《纪要》可发至连队和人武部干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关于中央转发甘肃纪要的批示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康生等人接见甘肃到会人员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批转毛主席批准关于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一事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关于传达中央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冼恒汉回到兰州。

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决定：

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

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

陕西省由当时的 21 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

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

对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

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

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提出结合裴孟飞。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胡继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甘肃省军区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命令》：（一）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进城参加武斗的，由军分区和县、公社人民武装部立即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二）凡农民进城参加武

斗的专、县、军分区、人武部要立即查明原因，对策划的主谋者，严加追究；（三）军分区、人武部与当地驻军紧密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甘肃日报》发表《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集中力量搞好三秋》的社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革命大联合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全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600余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甘肃省学校系统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兰州一中革命委员会成立。

此后，各学校陆续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许多学校废除了教导处、教研室，取消了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将师生接班、排、连、营建制编队，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做法。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使用了枪支等武器，致死致伤多人。

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共17人组成，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兰州军区、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会见兰州地区第一批成立的 50 个基层革委会成员，要求革委会成立后，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甘肃工业大学 1966 届全体毕业生向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发出倡议：知识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兰州市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已经全部开学，绝大多数学生到校上课，各类中等专业学校也相继开学。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甘肃省第一个县级革委会——临洮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兰州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决定由驻甘肃地区各部队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去，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兰州地区贫下中农、革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甘肃省完成首次承担的印制 50 万部《毛泽东选集》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在兰州召开甘肃省基层革命委员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革委会建设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兰州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兰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兰州军区决定对甘肃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全省 27 个劳改单位也同时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某月，兰州军区常委讨论王、张案。

洗恒汉参加过两次会议。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兰州地区 10 万人誓师大会，“迎接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甘肃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吴金功任主任，王立有(解放军代表)，王莘夫、杨平定(学生代表)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洗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阴、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胜、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

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冼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由 105 名委员组成。革命委员会包揽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

是日，兰州 25 万军民集会，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 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五、甘肃省狠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兰州市公安局破获了英国间谍乔治·瓦特(英国人)以工程师的身份，用特务手段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并大量偷拍禁区照片的间谍案。

同时，还发现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彼德·迪卡特(西德人)也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

15 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乔治·瓦特有期徒刑三年。同时宣布把彼德·迪卡特立即驱逐出境。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欢送首批医疗卫生工作队队员去农村进行医疗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甘肃省革委会上报下发常委会议《纪要》，说“以裴孟飞为总头目的刘、邓第二套班子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又出来同我们斗争了。这个斗争由来已久。斗争的实质是谁掌权的问题”。

随后，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省革委会召开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誓师大会，要求各单位“要集中目标，集中火力，狠揭狠批，穷追猛打”。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甘肃省革委会召开兰州地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誓师大会。兰州地区第一批 1200 余人参加的“6 . 26 ”医疗队分赴农村、牧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白彦博任主任。冯国政(解放军代表)、陈启荣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四月，省级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甘肃全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接着追查“5.6 反革命阴谋集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全省审查干部达 30 多万人，原中共甘肃省委 19 名常委中有 8 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洗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河南省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决定从原省级机关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抓革命，促生产，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兰州地区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铁道学院、兰州医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 8 所高等院校及一些科研单位，领导“斗、批、改”运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由 105 名增加到 125 名；常委由 24 名增加到 35 名；增加王国瑞、朱培屏、谢金胜、李宗虎、李荣山、年继荣、陈建兰、高明芳、单秀为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兰州市首批 600 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全省 11 个专区（州、市）和 82 个县（市）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甘肃各地普遍建立“五·七干校”，全省先后有 1.1 万多名干部下放到干校或农村劳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民勤、甘谷、庄浪三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定》，强调学大寨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

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向一切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

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兰州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甘肃省会宁县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后，甘肃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甘肃还“动员”大批职工家属下到农村。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关于电影《红河激浪》的调查报告。

称《红河激浪》是“反党分子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翻案的反党影片。

（1979年9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宣布撤销这个报告，为《红河激浪》平反。）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美国间谍特鲁茨·封·汗林德（西德籍）有期徒刑10年。

特鲁茨·封·汗林德于1965年10月来中国后，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分为掩护，窃取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严重地危害了我国安全。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全省卫生工作会议结束。

会议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要求到 1970 年上半年，原有县以上城市卫生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的 50% 以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要积极推广合作医疗，到 1970 年底全省农村达到普及，要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到 1970 年底每个大队要有 2--3 名“赤脚医生”。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并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 1964 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兰州军区派出了军队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 1969 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省金属材料公司干部袁自立、胡森成、刘显昭向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干部分配中存在的任人唯亲和派性问题。

省革委会以“攻击红色政权，攻击四个面向”的罪名，把三人打成“反革命告状团”。袁自立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刘显昭自杀，死后又定为“叛党行为，清除出党”。

（1977 年 11 月 2 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给予彻底平反。）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和大学生，组成“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第一批 2000 多人，分别到酒泉、金塔等 22 个县开展工作。

8 月 15 日，又决定派第二批 5000 余人，分别进驻敦煌、民乐等 22 县。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航天基地发射成功。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冼恒汉、皮定均、胡继宗、徐国珍、张忠、王国瑞、朱培屏、李书茂、龙炳初、胡定发、姚树荫、白明、商进

生等 13 人组成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洗恒汉任组长，皮定均、胡继宗任副组长。

是月皮定均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一九七〇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甘肃省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轻工产品也上了一个台阶。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产的电视机，

一九七〇年，全省粮食生产达七十三亿斤（一九六九年前，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一九七五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

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六、甘肃省的批林整风运动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西北小组会议。

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

下午洗恒汉刚到会场，就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

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三条：1、会议暂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

洗恒汉回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邓大姐、董老留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后，甘肃同全国一样，开始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一日，中共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开幕，17日闭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 1098 人，代表着全省 43 万多名党员。

会议通过了洗恒汉代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的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 68 名委员和 2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

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洗恒汉为第一书记，皮定均、胡继宗为书记，作出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整风的决定》。

大会闭幕后，陆续增补宋平、张忠、年继荣、秦彦章、禹贵民、茅林为书记。

（1972 年 7 月 5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宋平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半夜给洗恒汉打电话，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

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他说：“洗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

洗恒汉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

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洗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

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

1971 年 1 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洗恒汉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 10 月 1 日不出铁，他俩从高炉上跳下去。

洗恒汉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 月 1 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

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甘肃做到了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

（宋平在 1978 年省党代会上也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 25 日至 30 日在兰州召开全省民族工作座谈会。

根据会议精神，甘南、临夏等地对平叛和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有步骤地作了处理。对绝大多数因被骗上当或裹胁参叛而被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宣布平反纠正；对错没收财物的，酌情退赔或救济。

（1983 年，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再次进行了复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铁道学院等 6 所高等院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11 月 14 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分批撤出驻校工宣队、军宣队；高校各系一级不再成立革委会。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对甘南州委《划定资本家成份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对可划可不划资本家成份的坚决不划；对划定为资本家成份的（不含反动资本家），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党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尚未划定资本家成份的城镇，暂不划定。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五·七”道路育新人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实行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公、检、法），甘肃日报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国营 404 厂、504 厂、兰州铁路局等单位撤销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担任地方党委和革委会主要职务的暂缓撤离外，其余调回原部队。

一九七三年八月，洗恒汉参加第十次代表大会

洗恒汉看不上王洪文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中央副主席，他和其他很多人思想都不通。

周总理亲自做他们的工作。

叶剑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江”、打过仗，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大寨走过的路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 万多人参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 23 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

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一九七四年六月，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1800 多人毕业。

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追悼会在兰州举行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全省高等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提出“要发挥工农兵上、管、改的作用”，“要充分估计高等院校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的严重性”。

六、甘肃省的全面整顿、反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

洗恒汉表示坚决拥护，他在常委会上说：“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派黎光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被黎光和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

黎光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甘肃省委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

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洗恒汉，叫他出面解决一下。洗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十七日，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洗恒汉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会上既没有汇报，也没有让甘肃省委谈意见。有关领导人说：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

中央把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洗恒汉看，并让他修改。洗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

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洗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洗大胆修改。

国务院联络员要洗恒汉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

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洗恒汉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说黎光“在整顿兰州铁路局期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借批派性为名，实际上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的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一时，王洪文等人在北京接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郑州、兰州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肯定了洗恒汉的意见。

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纪登奎和万里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洗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纪、万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洗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

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纪、万亲自同赵滔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

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洗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洗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

（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 1982 年 11 月给洗恒汉作的审查“结论”中说，这是洗恒汉“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洗恒汉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到兰州。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

（这就是“结论”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全省 3.9952 万所各类学校，正在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右倾翻案风，不仅在教育界、科学界，而且在其他战线都已造成严重的影响；“铁道部以万里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在兰州铁路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此后，《甘肃日报》连续数月，发表刊载了大量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三月，国务院文化部遵从江青指示，派人来到兰州铁路局，在省上配合下，创作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战长年》和电影剧本《主要战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改组兰州铁路局党委。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在兰州市七里河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庆祝大会。

七、十月政变后清查“洗家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洗恒汉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

洗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

华国锋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 2 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

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冼恒汉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

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

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

冼恒汉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

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

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兰州地区揭批江青集团万人大会。

会议特意安排兰州铁路局的赵滔、张恒云发言，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华国锋又把冼恒汉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他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他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

洗恒汉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直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

刘建勋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洗左右为难。在中央开会时，洗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华国锋对洗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

洗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他的信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以后，叶剑英曾经两次指示洗恒汉，让洗给青海的领导人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洗恒汉思想不通：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洗恒汉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他们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赵永夫获释时间不详，平反结论说：他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9日逝世。）

一九七七年六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洗恒汉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

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八日和九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洗恒汉的批评。

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洗恒汉、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洗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洗恒汉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华国锋：刚才，听了洗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洗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洗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洗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

（洗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

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

（洗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

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

（洗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洗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洗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

（洗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洗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

（洗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

（洗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

（洗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洗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

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洗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洗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洗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洗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当然，对洗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洗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洗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洗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

（洗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师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

……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洗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

（洗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洗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

（洗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

（洗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洗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

（洗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洗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洗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洗恒汉同志，对洗恒汉同志是爱护的。

（洗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最后，中央的结论是：“洗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洗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洗恒汉当场表态：完全拥护。

中央决定后，洗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 3 0 1 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发出：“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一九七七年六月，韩先楚、肖华、宋平回兰州后，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洗家帮”、“西北帮”等活动。

洗恒汉被扣上“‘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

在“结论”中强行划定的所谓“洗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支左”的人员。

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洗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他们被定为“洗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例如：

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

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藺进生和曾给洗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洗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

军区副政委高维嵩，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洗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军区副司令员，贺龙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一九七八年，兰州军区党委发“四号”文件，说洗恒汉“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给王X X摘掉了帽子。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军委决定让洗恒汉回兰州最后解决问题。

余秋里洗恒汉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人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洗恒汉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他说话。

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洗恒汉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把他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就连他的孩子们来看他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他谈话说，他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

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他进行严厉审讯、逼供，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他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关于洗恒汉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其中说：“洗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下发关于洗恒汉《免于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大意是：中央决定，洗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

一九八四年六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洗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

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贰、本节简论

看了甘肃省的文革资料，对甘肃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得到几点看法：

一、甘肃省的文革进程与全国大致相同；

1966年5月至8月，甘肃省委一些人执行了错误路线，把矛头对准群众，打击一大片；

1966年8月至12月，广大起来革命群众、干部起来批判甘肃省委的错误；

1967年2月，以红联为代表的革命群众组织宣布夺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权；

1967年2月以后，红联内部发生分歧，甘肃省军区支持的一派打击不同意见的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造成内部分裂；

1967年5月，从红联中分裂出来的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红三司，省委代理书记胡继忠表态支持；红联与红三司之间矛盾激化，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把矛头指向兰州军区；

1967年5月至7月，中央着手解决甘肃问题，下发《关于甘肃问题》、《兰州军区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等三个文件；

1967年8月至12月，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贯彻中央三个文件精神，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三结合；

1968年1月，成立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社会稳定，抓革命促生产取得比较显著成效：

1，甘肃省在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扩大化的倾向，打击面过宽。

2，甘肃省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涉及的人和事不多，作了一些政策调整，社会比较安定。

3，甘肃省在全面整顿中，没有大的反复；主要是铁道部在兰州铁路局支一派压一派，翻了一次烧饼。

4，甘肃省在反右倾翻案风中，主要是根据中央华国锋等人的指示，在兰州铁路局把整顿中颠倒了的是非又颠倒过来。

5，甘肃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完成了一批国家在建的重大项目，如刘家峡水电站、酒泉钢铁厂等等。

总的来说，甘肃省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属于搞得比较好的，上面的中央和下面的干部群众都是比较满意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省，管辖这样一个省的兰州军区，在这个省支左的部队，十月政变以后，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三、十月政变后，在兰州军区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洗家帮”

1，清查“帮派体系”的原则；叶剑英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叶剑英说的这一条原则，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党性原则，而是资产阶级的派性原则。

2，清查“洗家帮”的根据：所谓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的问题在于：洗恒汉得罪了政变集团的几个主要人物；

(1) 洗恒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甘肃省传达中央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精神的会议上，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尽管他是请示了华国锋的）；

(2) 洗恒汉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召开的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在华国锋看来：“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

(3) 洗恒汉在一九六六年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叶剑英多次要他为赵永夫平反的指示。

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华国锋，一个是叶剑英；这三件事就证明了洗恒汉“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

3，清查“洗家帮”的将帅：在清查“洗家帮”这盘棋中：

(1) 韩先楚只是一个卒子，由于他在林彪一案中沾了一点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中又失去了三个第一，这一次他当然要好好表现一下，充当了急先锋。

(2) 肖华是被派去的解决兰州军区问题的钦差大臣，他由于自己的过失，丢掉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好几年了，难得有这次复出的机会，当然要大买力气了。

(3) 叶剑英才是解决兰州军区问题的主帅，军队问题还轮不到华国锋插手。

4，清查“洗家帮”的结果：

(1) 结论：站在“四人帮”一边去了，但还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

(2) 处理：免于刑事处分，提前离退休，降低政治生活待遇。

5，清查后洗恒汉的“冤屈”：

(1) 文化大革命确是一场内乱、灾难，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政策，但这是党中央发动的，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我作为一个军人，只有服从，只是一个执行问题，为什么要追究我的责任？

(2) 我对“四人帮”一贯看法不好，同他们没有非组织的私下往来，为什么说我站在“四人帮”一边呢？

(3) 我对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的态度，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为什么说我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呢？

从洗恒汉的自述：《风雨八十载》来看，至死，这些问题，他都没有想明白。可叹，亦可悲乎！

2008年6月3日初稿 2011年10月7日修改

第五章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河南省军区某些负责人镇压河南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

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壮大，有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

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

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

这时，郑州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派”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即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组织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力，再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

会议决定：1、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主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

“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学生唐伟贴出大字报：《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

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五九、六〇年老帐？

这篇文章被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

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非法”组织。

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上报武汉军区党委，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

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面对军队的强大压力，只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到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替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

“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及“红刺刀”等战斗队，全面否定刘建勋，把“御用工具”的帽子扣到郑大联委头上。并提出“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统一口号。（四月廿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们提出要“坚决打倒刘建勋”，说中央表扬刘建勋是“不了解情况”，“受刘建勋的骗”，还把“打倒刘建勋的黑后台谢富治”的标语贴上了街。把纪登奎软禁了四个月。把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斗了一百多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上午，省军区调动大批军队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

打着欢呼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的旗号，联合郑州地区的保守派进行声势浩大的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部队游行队伍走到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上午，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

几日内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联”示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郑州市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
省军区指使人暗地记录参加游行的造反派组织名称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
“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镇压反革命了”。

当天晚上，河南日报实行了大逮捕，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军区不仅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闹天宫》独立纵队：《二十八个为什么——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章指出：

郑州、开封、新乡、信阳等地有名的、斗争最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新保皇派”和“反革命组织”；

极力排斥和恶意中伤被保守势力恨之入骨的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最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来郑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保皇势力大抬头，空前活跃，跳得格外高；“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的《二十七个为什

么》，含沙射影，恶毒攻击郑大“革联”、河医“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抛出攻击郑州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二十七个为什么》以后，河南省委的第二号人物纪登奎亲自“登门拜访”？

一些人口口声声喊着“炮轰省市委，火烧刘建勋”，而他们却在大街飞小巷、马路、墙上到处写着“打倒郑大革联”，“打倒党言川”之类的大字标语；

最近几日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郑大校门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联”示威；省委直属机关几千人，二月一日上午也明目张胆地来到郑大门口向“革联”学生挑衅；

一些人把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张耀东等隐藏起来，不交给全省革命造反派批、斗；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文敏生，长期住在河南省军区医院里，省军区却把文敏生保护起来；

郑州、开封、信阳等地的驻军和公安部队都直接参与了支持保皇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河南省军区在元月三十日上午调动大批军队，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部队游行队伍走到郑大门口时，格外起劲地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最近几天省军区扣留和大批逮捕郑大的学生；二月二日郑州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时省军区不予支持。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河南省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

“严正声明”排好大样以后，何运洪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声明要印几十万份，要派飞机散发。”还说：“要再搞几个团来，搞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下一步就是镞压反革命了”。

当天晚上，河南日报实行了大逮捕，策划了报社、电台的假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河南问题的批示

（当时冲军区）

毛泽东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郑州日报》问题的批示）

准备查封军管，时机宜迟几天，让骂解放军的多骂几天，然后左、右两派各派数人来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 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
- 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
- 三、接管后停刊几天；

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政委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五时三十分

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各方代表谈判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河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何运洪当着干部的面说：“谈判我还不准备去哩。去不去由我哩！过去没犯过错误，这次霍上犯个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驻开封的部队野战军一军开枪打死群众

作为野战军开枪打死群众，开封是全国第一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开了八枪，军队只承认开枪了，不承认打死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省军区在全省展开了大逮捕

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何运洪、李善亭亲临现场指挥，一次就捕二百多人。

并指使人整理了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豫农红总、黄委会东方红、印染厂八一、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革命组织的黑材料，在批语上冠以“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罪名，准备进行大逮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杨 X X 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

杨 X X 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礼拜他们就完了！”

公安公社立即行动，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等《就谈判问题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省军区给陈再道、钟汉华的报告中说：“关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谈判问题，我们拟采取限制郑大联委等组织一方代表名额的办法，把谈判的时间拖下去。……目前郑州形势正在急剧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谈判时间越向后拖，对郑大联委越不利。他们必将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体。”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打成“反革命”

公安公社立即行动，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三千多人；郑州仅印染厂八一红卫兵在一天内就被抓走二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两派协商名单的谈判

党言川去了北京，派史文华、王月亭作为郑大联委的全权代表，参加协商名单的谈判。何运洪、李善亭借口郑大联委主要负责人没到会，两次终断会议，使名单协商无法进行。军区支持的一派向中央报告说：“郑大联委毫无赴京谈判诚意，党言川无视中央、总理指示，拒不参加谈判，甚至提出要单方面赴京汇报，并已非法派代表赴京，致使会议再次终断，建议中央文革敦促党言川立即返郑。”

党言川从北京返郑到军区参加协商，何、李又要了说党言川延误与破坏谈判，向党言川提出两个条件：一、党言川承认错误，写出检查，印十万份，在郑州、北京散发；二、党言川开上广播车上街请罪三天。党言川不答应。

三月三日，第四次谈判时，何运洪宣布：“党言川不承认错误，无谈判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待承认错误接受条件后，再继续谈判。”就这样，使赴京汇报长期终断了下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军区宣布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

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何运洪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已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会上，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伟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

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何运洪说：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不是冒然的”“是有根据的”等等，

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对此，赵文甫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军区宣布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

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后，何运洪又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说：“关于河南日报社的谈判问题，报社已经军事接管了，河南的两派只剩了一派，我们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上午，党言川被绑架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的同学在郑大革联与党言川交谈。

党言川说：“过去有些作法不对，今后应尽力与军区搞好关系，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正在这时，门外人声嘈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把郑大革联包围了！广播车大叫：郑大革联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郑大革联！并强行冲入搜查并把党言川架走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

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 50 名联委成员中 3 人被捕，10 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 人被斗，102 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 40—50 人，写检查 113 份，4340 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40 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
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毛主席 河南人民想念您——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军区付政委余嗣贵在大会上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还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

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

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蔚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后来查明，仅仅郑州、新乡、焦作、洛阳、开封等八个县、市，直接由公安公社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就有十五个，宣布为“非法”的有七十多个。

洛阳地区上报给省公安厅的“非法”组织、有一百多个(实际数目远不止此)。

郑州市郊十个公社就被解散了三百四十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桐树洼大队二十八个组织就被解散了二十四四个。

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中的成员，大批被捕、被斗、被劳改和勒令到公安局登记，搞人人请罪。如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就有近一千人；郑大革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就有近二百人。

大逮捕中，全省上报了四千三百多人。实际上，仅据七个县十个市的调查，有名单可查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人。

二、中央解决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天之内，在郑州砸了河医东方红等十四个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十大总部要冲击二七派绝食现场，五月三日钟生溢去武汉开会坐在火车上对某人说：“明天郑州有好看的。”陈再道、钟汉华对制止武斗曾给何、李有指示，大意是，武斗开始不要去部队，只去一些人或宣传车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谈河南问题

五月五日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开会。

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同志问谢富治副总理：“河南问题怎么样了？”

谢：“你们红代会支持的二七公社是对的。军区的作法是错误的。”

韩：“为什么还不解决？”

谢：不那么容易，中央文革现在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外省了。中央正在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它牵涉到军区问题，不能一下解决，何运洪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

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

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正在省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强行架到汽车上，“抢”到农学院，通过摆事实、讲形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被“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

“予农红总”和郑州大学附中“红旗”一些学生又把刚刚被保守派批斗后送回住处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夜，纪登奎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

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车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两派发生武斗，打死打伤千余人，有名单可查的重伤号就有五六百名，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纪登奎说：河南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支左问题上搞错了，去年八月份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除了一小部分，摧垮的面相当大，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摧垮了，信阳、商丘全部被摧垮了。现在当权的“三月左派”整天喊着与公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公安公社是什么人呢？是死保王一鸣（公安厅厅长）的人，军区搞“三结合”结合他们，各县公安局都是这样。他们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省直机关、十大总部是怎样起来的呢？就是原系统、原机构、原部门把真正造反派压下去以后，其余都成了“造反派”。省直机关负责人李伟是省监委付书记（原公安厅付厅长）丁石的秘书。省直机关不许有一张反面的大字报。丁石一贯支持多数派，在工学院也是支持多数派的。现在的郑工造总原来确是造反派，郑工造总也是清楚的。他们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都压下去了，原组织一百多人造了何运洪的反，质问何运洪为什么把造反派压下去。我曾问何运洪这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不听，很顽固，把所有大学的造反派都说成是我的御用工具，本来这些造反派都是从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何运洪抓住了所谓“冲军区”、“打、砸、抢”，把造反派都说成是“御用工具”。他

们利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谁冲公安机关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平顶山公安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搞便衣活动，镇压学生运动。安阳、商丘，开封都是这样，反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说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认为是错误的，我写过一份检查中说：“如果把冲军区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那么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们不要逮捕学生，逮捕我好了。”

（农学院李天祥插话：“军区又向学校派了工作组，军区宣布说，工作组是经过军区挑选的。）造反派被压得很惨，也有个别很好的人，据说洛阳 344 部队一部分人、硬骨头六连、林县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非法后，下面乱宣布非法组织，中央十条命令下达以后，他不仅不改，还开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说军区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群众组织翻了个个儿。把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革命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

赵文甫、杨蔚屏跑出来说：“形势很好。”杨蔚屏在前一段运动中被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了，这时他便说：“我死到棺材里也要记住这件事。”省委机关干部大部分过去了，戴苏理也过去了，还骂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大杂烩”，还要出来“三结合”。何运洪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什么样子？公安厅的权交给了保守派，造反派炮打公安厅是对的。“河南日报”社也是这样，还有电台。准备“三结合”的付省长李庆伟是支持保守派的。叛徒齐文俭过去带着日本人到处抓人，也被结合起来了。“三结合”净搞“中间人物”，搞到底全部来个倒退。法院结合了一个伪县长，公安厅把权交给了保守派，报社也是这样，生产指挥部结合的李庆伟支持保守派，齐文俭是个叛徒。谈判前应该悔改了。军区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来中央，要把问题解决一下，带枪的不好办。

总理：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结束，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答复几个问题：

1、造总代表明天赶到，你们负责让他们回来，材料北航归还，问题很清楚，不在材料多少，道理摆清楚，问题一清二楚。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安全没有保证，那么在河南有保障？靠谁？

2、增加代表，由我们的记者同两方面商量一下，对方也要来，对方没人，不来也可以，时间定了，以后通知军区。八·二四比较有名，可以来二个至四个，谈判不等，继续进行。

3、革命干部王庭栋、耿其昌要他们来，何运洪负责打电话，把他们送来。文敏生、杨蔚屏、戴苏理你们说他们也在郑州，他们一块来。军区来人少，司令员张树芝身体不好，来么！来北京可以治病，好不好？付政委余嗣贵也来，政治部主任也来，一共四个人；八·二四来了，一军支左负责人也来一个，可以一块谈。

4、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人牺牲了两个，二百五十人在开封被扣，一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么！

对军事院校的同志不能有任何歧视，让他们安全离开，也告诉开封军分区、一军，保证二百五十人的安全，武斗你负责。郑州、开封大武斗要劝嘛！能劝下来？你今天打电话，明天汇报。

5、红代会去做了许多工作，支持二七公社有材料，记者站（红旗杂志）去找你们谈，弄清楚再处理，北京不要再派人去了，在北京汇报好了，事情总要转过来，不要扩大。

6、明天派医疗队去。何运洪也要负责，军区一军有医院，要好好的治，不能只给一方治，不给另一方治，那些都是阶级兄弟，拥军爱民嘛！

我们要调查，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你们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就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字报，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十大总部”和“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都是为了摧垮河南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在这些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中，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高大同、王维群、王庭栋、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公社

省公安厅付厅长高大同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

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公社。

从五月到七月，河南省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据一份“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的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 47 人，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 23 人，占此级别干部人数的 49%；同情二七公社的 2 人，占 4.25%；中间状态 1 人占 2.12%；支持河造总的 15 人，占 32%；支持十大总部的 6 人，占 12.7%；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分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陈伯达谈河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记录

总理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肖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关锋同志说：

军区的同志检查认识错误，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提出来，这是好的。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问题看重了，把河造总的问题看轻了，是不是一边听你们的话，一边不听话，甚至对你们很激烈，影响了你们对问题的考虑。二、是不是你们支持那个、不支持那个，是以他们对刘建勋的态度去区分的。如对郑大联委，你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刘建勋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错误，去年调北京，表现还不错。你们对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对刘建勋的态度为转移，如果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想下去就错了。（戚本禹插话：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三结合了，你们还报要打倒刘，和中央对抗。）造总提出打倒刘，还要打倒刘的后台谢富治同志，这是不对的。要不要从这方面去想一想。

杨代总长：

二七公社不能从纯不纯去考虑。主席说，天下没有清一色的东西。主席说坚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们从纯不纯这个框框去看问题就错了。他们打砸抢可能有些过头，但他们是年青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个问题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对二七公社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说二七公社有好处，但又说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过来。

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六十七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天津市防疫医疗队造反总部赴豫医疗队《从夏邑县看河南的“独立王国”》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总理：洛阳打群架很厉害，不符合六条通令。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六通令，军分区无论如何要劝阻，派不带武装的。军区除一军负责的地方要多负责任，把

武斗劝阻。生产下降的尤其是洛阳，还有煤矿，平顶山，焦作，还有铁路全部军管。有权制止武斗，我刚才……去广西那边，一国际列车 94 个小时停在柳州，复杂了。把农民调到车站打司机，司机受伤，把车开到柳州停下来。要交打人凶手，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这多不好！运往越南前线的，国际影响也不好。徐州也搞得不好。郑州是关键地方，不管怎样打架，不要打到铁路上来，一切为运输服务……你们双方打电话，不要讲下去，算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反刘邓兵团《撕开河南“独立王国”的黑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首长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生接见纪登奎耿其昌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許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系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谈话

戚：你们至少有三个缺点：

第一，你们那个组织有不纯成份，也有不好的，个别组织有坏人，这不能全怪你们，抓的人放出来，全进了二七，有坏人是不好的。你们要研究。

第二，有小团体主义，不大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统一战线也不讲。我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还搞统一战线，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

么都正确，说你们这，你们一定不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还是私字作怪，所谓小团体主义那就多了，什么风头主义呀，山头呀……，

第三，方法不对，所谓方法不对，无非是打、砸、抢，你们说有没有？（二七：有）对，你们要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戚本禹与河南“河造总”代表的谈话

戚：河造总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是杀出来的，我的看法，你们都是造反派组织，但你们有错误，后来你们在军区问题上盲目支持军区错误的东西，军区在支左是错误的。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关于不准占领郑州邮电大楼的指示

〔六月二十八日晚总理联络员李杰同志传达〕

郑州邮电大楼是重要交通电讯枢纽，一旦中断，严重影响国内国际斗争，工作甚巨。不管那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必须确保该机关的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准随便占领和干扰，更不准打、砸、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六月六日通令执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周恩来对河南各派及铁道部军管会代表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何运洪：这次来京，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二七公社等革命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而且长期不承认，不觉悟，不改正，给河南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经过中央首长的帮助，吸取了革命造的派的意见，才使我清醒过来，军区犯错误的责任在我，是错误领导的结果。我是有罪的。现在我向中央首长，向革命造反派检查错误，军区支左一开始，大方向错了，没有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了打倒对象。把郑大联委看成“御用工具”错误地把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二月份连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革命群众，没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中央指示各派赴京汇报。……

对二七采取了压垮、拖垮的办法，这是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公开与毛主席思想对抗。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非法组织，起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流毒”。让他们上街请罪，军区接待站不仅不制止，还压制，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二、三月抓一批人，是从郑州开始的，被抓的大部分是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党言川也被关押，压制群众运动，破坏了“四大”的正常进行，此影响在全省造成恶果。造反派被打下去，保守势力抬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四月底传达了林总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安徽省问题的决定，军委十条命令，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并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我们主观盲目自满，自以为正确坚持错误，把当时二七公社向我反抗当成是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操纵下的翻案妖风，所以四月十六日又重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并且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还登了报。打击了郑大联委，我们越来越被动，直到五月二十日才撤消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根本搞错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认识不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保守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怕字当头，骄傲自满，不爱听不同意见，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徐文礼（一军）：对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路线性的，错误地提出了口号：“打倒八·二四幕前幕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二·八事件看得太严重了，军队开了五枪，还有三枪没查出来，打死一人尚未查清。总之开枪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共抓了 294 人到现在还有 15 人未放。三月十四日赵静生同志在师院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我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向“八·二四”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戚本禹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

第一、军区的错误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打击了造反派，但不是刘邓路线错误，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省委负责人和各派组织，对刘、文、纪三人要作具体分析，

第三、对河南军区的要求和希望，要把立场和观点转过来，主要的在于领导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干脆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就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戚本禹在河南部队领导人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检讨很快同群众见面，中央一批时间就不会长了。你们要做好部队工作，不需要层层作检查，主要是你们作检查。部队和二七公社对立情绪这样大，主要是你们过去宣传灌输的结果。如果这个工作作不好，就会出现内蒙的情况，就会有象张杰这样的人鼓动群众来北京。内蒙有人鼓动，四川也有人鼓动嘛！对你们河南，中央是有准备的，准备你们来十万人，别的省也可能来一些人。昨天告诉傅崇碧同志，准备一百万人的接待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戚本禹与河南省三派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及两个附件

1967.07.10； 中发 [67] 216 号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

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附：

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河南省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周恩来戚本禹与赴京汇报的河南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

周总理：

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还不错，中央转发了！各方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中央也转发了。这对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认识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有好处。

中央批示上写了，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文、赵这两个人挑拨关系，你们过去没有看清，经过揭发，现在你们就看清楚了。

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工作中虽然犯了某些严重错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当时在全国来说，都程度不同地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要看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调到北京工作，对自己错误作了认真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个革命的领导干部。

陶铸提议把刘建勋同志调到北京加强北京的工作，中央同意了。陶铸就利用刘调到北京的机会，把文敏生搞成代理第一书记了。

文敏生是新四军五师的。文在五师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就发现他是喜欢搞小名堂的，后来文调到中南，李先念同志也提醒过陶铸的。后来纠正河南吴芝圃的错误，把刘建勋同志和文敏生调到河南，两人的关系就搞不好。文在代理第一书记期间搞了很多花样。

赵文甫给你们的信，康生同志看了，是挑拨离间的。赵文甫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建勋同志表现是不错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离群众太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站不出来。刘建勋同志在第一书记中是好的，他在河南是敢字当头。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刘建勋同志，还有吴德同志，把这个彭真、刘仁搞的旧摊子搞起是不容易的。彭、刘虽然不在幕前指挥了，但他们是后台，下边出来搞，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揪住不放。后来刘建勋同志调进来，也是揪来揪去，常常都是几天都回不来。

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看了你们的检查报告，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本来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看了，批了还是叫你们先学习一下，把思想搞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戚本禹刘建勋接见河南各方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同志座谈纪要——供河造总战友参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江青同志：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热烈鼓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群众高呼口号）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号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那边。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

康生：

我建议明天一天，核心组要搞出协议来，这个问题本来今天就明显了，刚才有个同志写了嘛，主要是达成协议和贯彻执行协议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一）双方达成协议，反对百万雄师在武汉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写出文件、传单在社会上散发。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分裂、挑动武斗。

（三）双方重申，保证实行已经达成协议的“七·五”协议书，特别制止日益发展的武斗。

（四）双方达成协议，黄河防汛协议要坚决贯彻执行，材料、物资、计划不允许破坏。

（五）坚决拥护军区的检查报告，拥护中央的批示，欢迎、支持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

这样五条建议，请你们商量，看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赞成，你们就回去平心静气搞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声明

在省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先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错误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在全省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許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压制了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摧垮二七公社组织、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等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革命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特别是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所作的重要指示，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坚决，很不得力。毛主席、党中央二月要我们组

织各方代表赴京汇报的指示，中央四月关于安徽问题的五条指示，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都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自以为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二七公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看作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又重申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二七公社，并且还压制打击了支持二七公社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豫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这就错上加错，越陷越深，给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些错误应由省军区党委常委、主要是何运洪同志承担责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总理：

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军区都来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汉，震动全国。林副主席说，武汉的问题，值得全国各个军区学习。大家来了，听到了呼声，不仅是北京、上海，而且是全国。实际情况你们看到了，明天报纸就出来了。只有毛主席的威信，林副主席的威信，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有些地方出现另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象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河南省军区党委有个检查报告，在北京起草，在郑州修改的，意见是否一致，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听陈桂昌同志讲，郑州连印的地方都找不到，河造总、八大总部不让印，当然不是广大群众，只是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头头，也不是所有

的头头。在武汉有些传单、海报纯粹是造谣，说要王力同志留武汉是让斗争的，有些保守组织的头头就是靠造谣吃饭的，这能吃几天？

康生：

那天晚上武汉事件发生，毛主席、林副主席讲，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解放军有很大教育意义。我们本来很希望省军区表示态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但没有得到省军区的反映。那一天晚上何运洪同志装病没有去。那么紧急的事情，何运洪不到会，我很不满意。我事后检查，何运洪没有病。对武汉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你们的正式决定和声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四天了，没有见到你们表态，到底为什么？不表态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表一表。你们军区直属武汉军区，你们过去的支左工作，支左方针，实际上是执行武汉军区那一套。

武汉问题的关键：

一个是部队的少数人拿他们的错误路线去煽动欺骗干部战士，八二零一部队的少数人表现很不好。这能怪战士吗？战士是好的。这一点河南军区要检查一下你们作得怎么样。最近十大总部、河造总开会有军队参加。四、五十人穿便衣，郑州市人武部的干部穿便衣指挥，这是玩火，玩火要烧到自己的。

第二个是利用公检法。从全国各省看，有的利用公检法干了许多坏事。武汉利用公检法镇压造反派，河南这一条从省里一直贯彻到下边，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个教训。这次会议上，我们批评了公检法，他的代表就回去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公检法又翻了，可能要打倒我和戚本禹同志。何运洪同志恰恰在这个时候不参加会议，公检法恰恰在这个时候翻这个案。何运洪利用公检法，丁石、赵文甫是搞公检法的。你们捉多少人，你们没有实际数字，连党言川也捉了。

第三个教训是利用人武部。省军区支持军分区犯错误，分区有没有支持县人武部？人武部有没有动员农民进城的？武汉少数犯错误的同志利用百万雄师把三新、三司、二司、三钢、工总等造反派压垮，河南利用十大总部、河造总把二七公社全部压垮。

第四个教训是利用地方机关的保守派。河南非常突出。河南省委省直总部实际上是保守组织。刘建勋、纪登奎有错误，但还是好同志，你们去搞。最坏的是

赵文甫，你们支持他，他支持军区。利用这个组织去打垮那个组织，河南和武汉是一样的。

因此，河南有武汉事件重演的可能。同志们要认识清楚，从武汉事件吸取教训。这个会议上，大家要好好把观点摆一下，把思想统一起来，不要讲的一套实际行动相反，言行不一致。有了错误改了就好，如果坚持错误，长期不改，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你们要好好讨论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提高思想认识。在这里两个月，河南问题实际没有解决，所以经过这次会议希望能得到很好解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给驻开封七二四九部队的指示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时，七二四九部队靳师长电话传达：

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报刊公开称“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康生：

中央对河南问题已经有个批示，同志们已经看到了，新来没有看到的同志，可以发给他们看一看，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中央在批示中讲，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河南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因此，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二七战士高呼口号），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

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你们通过后报告中央。对刘建勋同志，中央批示中也讲到了，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这个批示，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二七公社”文章：《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河南省军区机关《秋收起义战团》全体战士：《坚决打倒何运洪、李善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及驻军负责人的讲话

三、中央决定后河南的新形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刘建勋对河南“二七公社”省直革联服务员的讲话

（一）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对待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问题。

（二）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问题的。

（三）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问题，对于“文攻武卫”问题，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出来的，江青同志把它肯定了。当时，何运洪勾结文敏生、赵文甫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保守组织，挑起武斗，围剿、镇压赤手空拳的革命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是完全正确的。

（四）防止“二七公社”基层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篡夺的问题。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胜利了，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防

止骄傲情绪，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刘建勋王辉时的指示

现在有些人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与党中央看法不同，请你们很好地看看九月一日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恩来对开封武斗问题的指示

（九月四日晚九时以后，老保先后对我仪表、空分、阀门、拖电等厂进行骚扰袭击，叫喊要消灭六零九三和造反派，并冲击我高压阀门厂，使用黄色炸药。一军杨政委和杜副军长先后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九月五日上午八时四十五分，河南省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组周成继同志来电：总理很关心开封问题。总理指示我们向老保明确指出：）

“必须立即停止进攻，放下武器，得到保护。消灭造反派和驻军是反革命行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驻开封部队的电话指示

〔时间：凌晨一点十分〕

把九月五日的命令，读给他们听，劝说他们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毛主席的最新的最高指示。不准夺枪，不准抢劫火车，这样作是不对的。

可以告诉他们，双方派代表，组织双方谈判。把武器封存起来，不要再继续武斗了。如果开封谈不成，可以派一定的代表到郑州。如果郑州解决不了，可以到北京。应当就地停止武斗，就地谈判。总之，不要再在那里搞紧张局势，不要再继续武斗。要他们坚决执行命令，维护命令，执行最高指示。作耐心艰苦的工作，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如果发生情况，及时向我们报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吴法宪在武装干部会议河南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康生第二次接见武装干部训练班河南组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毛主席视察河南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毛主席乘专车到达郑州，火车停在飞机场。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毛主席离开郑州。毛主席在郑州共停留一天多。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同志。下边是刘建勋同志传达毛主席接见他们时的谈话纪要：

（当毛主席见到纪登奎时）

毛主席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毛主席笑了，向着纪登奎）

毛主席说：“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刘建勋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

毛主席说：“何运洪那么厉害！何运洪干的好事！”

（当刘建勋汇报到调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

毛主席说：“集训也得去好人。”

（当刘建勋汇报到开封情况时）

刘建勋：“我们主张作政治工作，不打。”

毛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作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刘建勋汇报到少数人不讲政策，随便打抢、有时打死人时）

毛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都起来反对就收场了。”

毛主席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主要从理论上把他们批倒。”

毛主席说：“对。”

九月二十二日，当毛主席听完刘建勋同志汇报了河南的情况时后，陪同毛主席视察的张春桥同志又传达了毛主席沿途指示精神，内容（并非原文，刘建勋同志根据张春桥同志讲话整理成为四条）如下：

一、形势大好。全国已解决了七个省，基本上解决了八个省（包括河南、江西），争取今年再解决十个省，南方五个省，北方五个省，一共二十四，黑龙江解决两次。中央是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不能垮，是要支持。文化大革命七、八、九三个月大进了一步，春节前全国要基本解决，要纳入轨道。形势和任务就是如此。

二、上下级关系为什么搞得那么糟？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都不要一棍打死，最顽固的也要给一碗饭吃。北京开武装干部会，不好的去，好的也要去，党、政、群干部也要去，左派也要去、红卫兵也要去，红卫兵权力很大又很凶，也要训练。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教也不能诛。扩大教育面。主席在上海讲了几次，并在许多省都讲了，中央文革也认真讲了的。

三、大联合的问题。那条语录（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七月十八号主席在武汉第一次讲的，这个话没有接受。武汉问题如果用这个思想去解决就更好。主席反复讲这个问题。七月谈过、八月也谈过，在上海把这条语录给工人讲了，很灵。上海大联合的高潮就是主席这几句话搞起来的。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全国一宣传，效果很好。

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是这样讲的：“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这是有人操纵，无非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张春桥同志讲：反复宣传主席这个思想，主要是工人，对学生、机关干部也有效，工人阶级要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要工人来左右局势。因为最有发言权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说了算数。主席就问我：“乱得起来吗？”我说，不要紧，工总司不动，就不会乱。要确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要让学生牵着鼻子跑。

四、主席讲：“上海军、干、群三个方面的关系比较好。”主要是经常进行整风，三方面整风。这是以军队为主，下次以群众组织为主，依次轮流，请别的方面代表参加。这个制度比较好。工总司每天坚持半天学习毛著，半天工作，天塌下来也不管，军队不再召集。

干部问题是一个重要条件。上海部、局长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说，绝大多数是好的，要解放干部，教育干部，使用干部。干部中除了走资派，为什么斗那么凶？有些官做大了，坐汽车了，房子好了，工资高了，这都还可以。但是不要有架子，不讲民主，脱离群众，所以，一有机会就起来攻你。

刘建勋同志问：北京五·一六是什么意思？

张春桥同志讲：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它有三条：一是反中央；二是反解放军；三是反革命委员会。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后一段，关于革命委员会，就是主席亲自加的。

（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7年10月29日，第35期，第二，三版）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刘建勋在接见河南省郑州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纪登奎在河南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有些人对形势估计很悲观，说什么“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等等。把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到处“反复辟”，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在他们看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了，而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就错了。有的说：“现在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还要大乱”。

极“左”思潮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群众。他们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发展山头，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在干部问题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极“左”思潮的风，在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宣传以后，刹了一下，但是思想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有人主张要无条件地联合起来。还有些人搞翻案风，不管过去处理的正确不正确，把多少年前处理的老案子翻出来，把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子翻出来，把民主革命补课来个“彻底翻案”。

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县打内战，总有二十多个县吧！并且还有一种“内战不可避免论”，说什么“内战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前一段有一股极“左”的思潮，有一个学校发表严正声明，炮轰建勋同志和我，炮轰警备司令部。我到他们那里，我说，你批我们支持庆祝风，这个意见是对的，今后那里开庆祝会都不再去参加了。说我们没有抓大批判，这个意见是对的，我们今后要抓大批判。同志们批评对的我们都接受，都改正。至于对形势的分析，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呀等等，我们就不能同意了，你们可以保留意见，允许你们慢慢转。

有一个地方造反派分成了两派，一派先开枪打死了人，是没有道理的。解放军给另一派做工作，说他们不对，不要去报复，我们负责解决。但是另一派不服气，他就上去把人家围起来，又打，又抓，还说人家是“反革命”。这样搞就麻烦了，他比人家搞得还凶，本来有理的事情，你去压人家就没有理了。

现在河造总起来了，起来是好事。起来，我们就本着中央讲的精神，看一看他们的表现。他们现在贴出来了很多大标语：“支持戴苏理”，“纪登奎靠边站”，“打倒王庭栋”，“批判陈桂昌”，等等。还有“河造总越战越强”，“河造总是顶天立地的造反派”，“河造总好得很”，“河造总要起来抗暴”。他们在前一段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无条件的联合，不联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现在有的地方是学生领导一切，中学生领导一切，他们说了算数。这种情况要改变。大联合中要做工人工作，按系统把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在郑州，我们整整奋斗了两个月，现在联合起来了。总之，加强工人的工作，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发挥工人的主力军作用。有一个地方连第一线指挥部的指挥长也不要解放军当，要中学生当，那怎么会行呢。

省里准备成立筹备小组，条件成熟的地、市、县也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谈河南两派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郑州铁路造反派及各地在京铁路系统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郑州铁路局代表时的讲话

本来中央的批示已经写好了，准备用，用四个名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全国，现在看到你们这个协议，批示要修改了，如果你们回去要打仗搞分裂就不批了。如果回去确实搞的好，中央再批发，通报全国表扬你们。如果你们不执行协议我还要通报全国批评你们。今天我在中央文革开会还称赞了你们，但在会上听了你们的发言，看出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只管郑州，不管别的地方，郑州通车了，别的地方车不通了你怎么办？回去不要再发展组织，再发展组织就要闹磨擦。回去开会要双方共同开会来庆祝。军管会、省革筹小组可以去人参加，现在我不是对你们各打五十大板，还是看你们回去后的实际行动，已经达成的七个协议都算数，回去要努力实行。今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尖锐，不这样讲，刘建勋、王新同志回去为难。当然我对毛主席大联合的方针是无限乐观的，对群众也是相信的，但具体到一些基层单位和某些问题上就不一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郑州铁路局系统七个单位和西安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这是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斗私，批修”的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在河南，陕西境内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各级铁路军管会（军管小组）和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

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夺取革命、生产的双丰收。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是已经联合的（如广州铁路局、柳州铁路系统），或者还没有联合的，中央也号召他们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达成类似协议，迅速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就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及西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至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 7 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 14 个局（全国共 18 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刘建勋对河南两派谈周总理的指示

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初，全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据一份资料显示，省直机关六十六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 393 人，已解放 284 人，占 72%，其中第一把手 31 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王新向河南省大联委传达中央首长七点指示精神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1.25；中发 [68] 17 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南五千万人民表示热烈地祝贺。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九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南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新局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驻河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克服了省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加强了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玉、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四十一名担任常委。

河南省有五千万人口，有许多现代化工业，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河南省革命委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的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五、河南省的反右、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群众觉悟了。现在“革”与“保”的概念过时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主要表现是公与私的斗

争，党性与派性的斗争。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来，否则，就要落后，就会犯错误。

目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迅速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极大障碍。这是两条大毒蛇，被它缠住身就不得了。它腐蚀人们的斗志，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文化大革命。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灭亡，正在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刮翻案风的人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解放军，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革命造反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刮翻案风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其实，去年八、九月间，我省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极“左”思潮，但是，我们进行了坚决抵制，很快就把它克服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右的思潮就逐步抬头了，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反击了一下，杀了一下这股风，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这股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了，最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如果不是以

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英明果断的决定，把刮翻案风的黑后台、变色龙揪出来，地下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多。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么？！

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杜河堤同志：他是总后台。）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手了。在这个问题上，戴苏理犯了严重错误。

戴苏理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的，戴苏理散布过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潘复生同志和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查，我不讲了，我的错误我作检讨。

戴苏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去年二月逆流中，他是破门而出的，跳得很高，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造反派。当然，在二月逆流以前，他支持过某些造反派，特别是郑工造总。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要说明清楚，那是我们统一研究的，是我派他去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他谈过三次话，是耐心地争取他，希望他从反动路线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但是，他说：“站队站对了，不能再站了。”这是什么逻辑！当时，他说这个话，使我非常愕然。在北京汇报期间，驻马店的保守组织找他谈了几个钟头，他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群众，出了许多坏主意，包括保坏干部在内。这个材料造反派的同志得到以后，我转给康老了。康老有三点指示，让我告给戴苏理。第一点是，戴苏理不老实；第二点是，问你要把群众带到那里去？第三点是，问你为什么老说何运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戴苏理尽管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回到河南以后，还是耐心地帮助他的。我一回来，就请纪登奎同志给他谈话，我也找他谈过话。在河造总有些人为了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筹静坐的时候，我要他出来做点河造总的工作，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可是他误解了我们对他耐心帮助的心情，相反地认为我们犯了错误，得罪了某个群众组织，非要请他出马，不然我们解决不了。

让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他利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在某些群众中的影响，继续蒙蔽一些群众，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干部，大刮反革命翻案妖风。他想借这个东西把我们的阶级阵营搞混，以达到翻案的目的。我们说，这是做不到的。戴苏理对他参加三结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有一派势力，非让他出来收拾局面不行。这样想就大大的错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什么问题他都会看翻的。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最近，我看到戴苏理的女儿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说：“你搞垮革委会困难很大”，“你们独立是一件很蠢的事”，“我一直在学习‘左派幼稚病’”，“你们原可以在革委会内部造反，布尔什维克连最反动的议会都参加过，你们为什么不能留在革委会内部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他儿子颠覆革命委员会。她这个观点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你的儿子，竟然在登载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的报纸上逐段的“批判”，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李文忠同志，你的儿子思想为什么这么反动？你的老婆又是一个叛徒。如果你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你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仇视，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此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你女儿的信中还劝你回家种地。种地并不坏，问题是你的消极情绪。我看你有时候消极，有时候并不消极。前些时候你的宿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你不是积极得很，为什么现在又消极了呢，要回家种地了呢？你的女儿还说“就怕刘建勋不让你走，离开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个话如果是出于孩子们的年幼无知，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你的指导思想，认为河南离开你就不行了，非让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那是非常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去年八月，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曾出现一股极“左”的思潮。主要是有的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什么河南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要“揪军内一小撮”，曾一度发生了抢枪的问题，出现了造反派的某些分裂现象。

戴苏理借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我们不抓“五·一六”，什么‘一男一女’的事，攻击建勋同志。其实，这件事是建勋同志亲自处理的，协助中央把坏人抓起来送到北京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捞不到半根稻草。至于谣传我同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有什么关系，什么在王力家里办过公等等，我没有必要来批驳这些谣言。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戴苏理是大做了文章的。去年十一月，正当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现高潮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了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联合的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也就是在对待河造总这样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下联上也联，联合不倒旗的问题上，我们认识上是有缺点的。

我说过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这句话是不大确切的。我有缺点，说错了话，我愿意作自我批评。但是，戴苏理大肆散布什么“你们派性大发作”、“你们压了我们”、要什么“政治平等”、要“无条件联合”什么“不分左、中、右”等等论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去年十一月，社会上就出现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股风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把矛头指向省革筹小组，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造反派。叫嚷什么“八月逆流比何运洪还厉害”，“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起来“抗暴”，要“砸烂派性委员会”。

戴苏理说他“憋了一肚子气”。对我和杜河堤同志去年十二月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为不满，说那个讲话“派性大”。我和老杜同志又专门找出那篇讲话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你攻击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

你攻你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在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又讲过一次，在八二零二部队也讲过一次。建勋、王新同志在学习班把右倾翻案风狠狠地批了一通，报社还发了一篇社论。有人对这篇社论是为大为不满的，大骂“派性发作”，还要揪黑手。这篇社论是张耀东他们几个人写的，有个别地方讲的不确切，提法不太科学，但总的精神是好的，给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当头一棒。尽管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戴苏理一概听不进去，一直骂我们“‘左’

了”，“派性大”。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我们认为是对的，戴苏理认为是错的。所以，戴苏理攻击我们，正说明我们作对了。

我们曾设想过，在三月底实现全省一片红。可是，三月初我们从煤矿一回来，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就向我们反映，下面大联合、三结合搞不动了。这时，我们觉察到有问题了，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不然，为什么郑州、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区都搞不起来呢？这时，我们警惕了。当然，没有提到象中央指出的这样原则高度来认识。当我们看到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不是苗头，已有行动了。而戴苏理看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感到“大吃一惊”，表示要“回家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紧跟中央，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对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猛烈的反击。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其次是，拉山头，搞分裂，一手扶植保守组织，一手支持形“左”实右的分裂派，也就是戴苏理称赞的那个所谓“猴派”。第三是，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抹杀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蒙蔽群众，死保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进行翻案活动。第一步，想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第二步，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戴苏理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陶翻案，为文、赵之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通讯员《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

新的组织机构把原来的“八组两室”改为四个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包括解放军代表十二人）。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人员除参加革委会办公的以外，一部分留机关搞斗批改，一部分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深入基层。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工代会主任申茂功：《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

党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地闭幕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会的召开，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全会发表的公报，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有的人说：你们光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指责人民解放军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革命委员会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省直机关集中了一万多人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下一步还要搞整党。工人宣传队一开进去，就出现了一种谬论，说工人阶级与造反派的矛盾是普遍的矛盾。有人造谣说压了“红色公安”，压了造反派，解放军把“公安公社”的头头启用了。我这里负责声明：这完全是造谣，全部是造谣！有的人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头脑膨胀，利用种种借口，对抗工人宣传队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有个单位揪出个牛鬼蛇神，有人竟说，他在“二月黑风”中路线站对了，为什么你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工人宣传队进到一个学校，发动群众，开展忆苦思甜活动，他那里就写社论，说是否定了路线斗争。

上次开会，有的同志讲，有七个县少数中学生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按自己的意志左右革命委员会，一切都得服从他们，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当时说，这些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如果让他们掌权，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句话触怒了那些搞独立王国的人们。他们一定要到北京去澄清这句话，说刘建勋讲错了，问为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掌权？

有的说什么“八月黑风比二月黑风还黑”，“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有的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加以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实现反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他们大喊大叫，“要普遍开展反复旧”。戳穿了，就是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刘建勋同志：反对工人宣传队，反对人民解放军。现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谣言多起来了，省直机关是空军四十三师搞的，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说这个部队是“支保”的，是压制我们造反派的。有些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说革命委员会复旧了，说复旧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开着喇叭车上街，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全城，组织好多人围攻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宣传队赶走，企图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轰掉。提到“复旧与反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笼统提反复旧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新与旧的斗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红旗》四期社论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提出的“反对复旧”的，是完全正确的。笼统的提反复旧，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引向打内战。有个地方利用反“二月逆流”，一夜之间动员三千人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大造舆论，好象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二月逆流”的继续。

有的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加以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实现反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他们大喊大叫，“要普遍开展反复旧”。戳穿了，就是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刘建勋同志：反对工人宣传队，反对人民解放军。现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谣言多起来了，省直机关是空军四十三师搞的，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说这个部队是“支保”的，是压制我们造反派的。我告诉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

有些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说革命委员会复旧了，说复旧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开着喇叭车上街，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全城，组织好多人围攻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宣传队赶走，企图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轰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同志们看了那张大字报，提到“复旧与反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这个传单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公民，跑到安阳发表了一篇讲演，然后到一个煤矿去串连所产生出来的一支大毒草。

新与旧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复旧，我们第一承认，第二反对。我们天天反的，是要搞革命化的。但决不能接过革命的口号去反对“三红”，这是一个阴谋。有人指着鼻子问有没有复旧？我说有，经过斗、批、改，就是要反掉它。工人宣传队，就是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就是最大的复旧，就是要破它，就是要破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新和旧的斗争还是存在的，一万年还存在。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嘛！问题是看你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敌人借反复旧为名，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妄图一个早上把政权夺在他的手里。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他们说，你压制造反派。我们说，不是，我们压的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对于上了当的人，经过教育，使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有些人作文章说我们是保守主义，责问我们为什么不赶快整党，不赶快吐故纳新。他们说：你们的党龄比我们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有的地方把革命干部都说成是“老油子”，“老狐狸”。他们说，老油子还不该进“五·七”干校？有人说所有老干部都要彻底清查。把这些人赶出去，他们进来。他们到北京，造谣中央也镇压了造反派。

有人就扬言“造反派受压了”，“造反派受排挤了”，“这是对造反派没有感情”，“造反派没有掌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全面反复旧的问题，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三红”。这会引出什么后果？有个地方利用反“二月逆流”，一夜之间动员三千人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大造舆论，好象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二月逆流”的继续。这是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反“二月逆流”。

这是对当前形势看法中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阶级敌人歪曲反复旧的口号，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一个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一个是批判右的思潮，批判“不见得”派，要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增强军民关系，目标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谁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革命，形势发展的就快。项城县就比较好。有六十多个县属于这个类型，在那里毛主席的指示基本上能够畅行无阻；有三、四十个县属于一般；还有一、二十个县

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多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乡市革委会有些人是不敢斗争的，有个一般干部去宣布革委会对那个厂做的事件的态度，他敢于斗争。到了那个地方，又推、又揉、又揍，结果还是宣布了，无非是这样几条：一条是复旧是有的，但当成中心来反，一哄而起来反革命委员会是错误的；二是你们搞武卫队，不靠真理，靠武力统治，横行霸道，要立即解散武卫队；三是你这里是独立王国，不能整党，否则搞起来也是“派党”。有少数人不让他讲话，把麦克风夺了，可是他还是讲，广大革命群众鼓掌欢迎，少数人在角落里吹口哨、搓地板、跺脚。这个干部开始进厂时，遇到了刁难，不让他进去，说我们是保密工厂，又说是四机部的厂子，进去得经过四机部批准，后来又说得经过省革委、省国防工办的批准。这些理由被驳回以后，又说得经过工厂革委会讨论才能进厂。后来只许进去五个人，被围攻达四小时之久。

郑州铁路局的郑建国，有过一段造反历史，后来被齐林、王国佐这两个走资派拉拢腐蚀，给钱花，给酒喝，拍肩膀。说他是响当当，他就头脑膨胀，多次制造停车事件，周总理讲话点名批评后，我们进行了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人替他说好话，说他是老造反派。

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问，你说是不是有复旧？我说：有。但是，谁要想转移大方向，掩盖这个矛盾，突出另外一个矛盾，说什么“反复旧是中心”，“造反派受压”，“革命派不香，保守派不臭”，这统统是阴谋。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在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

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什么党的原则？在你们县搞的乌烟瘴气。四不清干部反攻倒算，四清积极分子受打击报复。四清运动中处理个别有出入的，可以在整党后期来处理。但是，你们支持翻四清的案，这是不允许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帮助他们克服错误思潮，执行毛主席“三不脱离”的指示，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一日，王新在河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六、河南省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二年某月，河南省召开批林整风会议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河南省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联系河南实际，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一日，河南省批林整风北京汇报会议

河南省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参加了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

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1972. 11. 04；中发 [1972] 42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七、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1976年4月初，临近清明节。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

清明节这天，我当时所在单位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同志，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大家气愤之余，结合当时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致认为这决不是小事，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4月5日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人在现场观察群众的反映。当时看我们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十分拥挤，相比之下，二七塔下倒显得冷清起来。同时，我们的《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大字报，客观上声援了我们，并没有出现反驳我们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厂传达室通知我们：新华社河南分社来电话，让我们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我就是代表之一。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我们。他表情十分严肃，但详细地听取我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我们，他已将我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告诉我们，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我们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我们没有作错。有的同志就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这个建议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

我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我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我们向他们宣传了我们的看法。当时没有发生辩论，也没有阻拦。为保持花圈的原状，一车只装了十几个。本准备拉到厂里，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我们就直接拉着去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一位姓张的办公室副主任找来接待我们，怎么谈，就是不接受这些花圈。我们也就不和他废话了，自管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我们就回到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我们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和我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事后听说，省

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去告我们的状，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派部队支援我们。

我们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 厂等 72 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 4 月 6 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

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反革命的血腥暴行。这是 1976 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它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件”一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

4 月 7 日晚，接上级通知，我厂党委/革委会集体收听中央台新闻，即中央决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消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中央台的记者到场采访了我们，。在随后几天中央台报道各地拥护中央决议，声讨“清明节”事件的大规模游行中，其中有郑州肉联群众游行的电视镜头。在河南，郑州市革委决定将焦春亮同志追认为烈士。

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专政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事后知道，省委已将他们要判刘敬死刑的意见告知司法机关）。我们肉联加工厂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也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没有查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我们肉联这些人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

二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到肉联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

（直至后来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们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据说，连给焦春亮的年幼的孩子每月 20 元的抚恤金也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何远《尘封的记忆》2005 年 10 月 7 日）

八、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兰考抓的黑鬼却是张钦礼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清工作队就地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秦一飞、周化民又首先拿张钦礼开刀。

运动一开始，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钦礼同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县委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啦，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实际上县委目标是很明确的，至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会后，张钦礼的大字报陡然增加，谁不写张钦礼的大字报就是“保皇派”。

秦、周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给他打上花脸，当牛鬼蛇神拉到兰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在反右派期间，由于赵文甫坐镇兰考，全县三分之一的干部被打成右派。开封地区负责反右斗争的是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秦一飞、组织部长王某。他们和赵文甫的看法完全一致。张钦礼说，兰考的干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抗日时期的；二是部队转业的；三是土改时期的。他们对党并无二心，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事实，怎么突然之间都成了敌人？赵文甫批评张钦礼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是为右派鸣冤叫屈。张钦礼受到降级处分，从此“内部控制使用”。

在大跃进期间，张钦礼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一九六〇年，张铁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于十月二十八日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

张钦礼恢复工作以后，焦裕禄被派来兰考，张钦礼与焦裕禄亲密合作。焦裕禄死后，张钦礼积极宣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

在四清运动期间，地委派来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某局周化民为副团长、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四清对象首先是县委机关干部，对准张钦礼。他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这期间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特别是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铁礼。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小撮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焦裕禄

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请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

秦一飞、周化民说，张钦礼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了个大窟窿，说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变物质。他们俩打报告，向省委要一百万斤粮食、一百万块钱、五百台八匹马力的柴油机补“窟窿”，被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当面批评一顿。

周化民说，“党领导兰考近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面貌，焦裕禄来了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通讯中说焦裕禄讲了这，说了那，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

秦一飞在大会上说：“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是条龙能吸多少水？还什么典范、榜样，他干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来兰考看什么？看兰考人穷得俩人穿一条裤子。”

焦裕禄的骨灰由郑州迁回兰考那天，有几万人自发到火车站迎接，那哭声真是惊天地动鬼神，而秦一飞、周化民命令他们带来的两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都不准到车站，秦一飞也没有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张钦礼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焦裕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

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二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北京一些人到兰考炮制出紧急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已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话通知不让印发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兰考革命派发出决不允许诬蔑焦裕禄传单

兰考六中全体红卫兵“焦裕禄战斗队”革命师生和土固阳公社干部，在张钦礼同志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北京《焦展》“最最紧急呼吁”中的错误观点。

县委把县直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三天过后，没有写出多少东西。

一九六六年十月间，张钦礼到湖北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

徐俊雅（焦裕禄同志的爱人）也去了。周化民就派人监视张钦礼、徐俊雅，做徐俊雅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热情支持革命干部，纷纷到县找他们辩论。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红旗——四个生产队，联合倡议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兰考县宣布开展文化大革命，保守派事先印好了攻击张钦礼的传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旬，保守组织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一些干部组织了所谓“卫东林”司令部。对于保他们的组织，要啥给啥，他们做好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一角钱，是让买别针用的。

土山砦大队五个贫农社员到县，碰见了X X X，X给了五位社员一百五十元钱，说是到省里罢周化民的官哩。但到了省委后他们又说不要罢周化民的官了，叫罢张钦礼的官。五个贫下中农一听不对头，他们说：“金钱买不住俺贫下中农的心”，于是就回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月，兰考的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斗争，又把保守派压下去，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二）造反派一月夺权，被军区逮捕入狱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革命造反派夺权，

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夺权进行得很顺利，把大印夺过来了，但是党、政、财权没拿到，只拿到一个木疙瘩，并没有实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县武装部反说造反派是“反革命暴动”，是“修正主义”

造反派开会商议，分为三线，一线在县城里，跟他们干，他们可能抓我们，拷我们，第二线在城外，第三线在农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八日，晚，何运洪从开封派部队把县城包围了，来了三连人，老保带头逮捕革命派。

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这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壮声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把第一线全部逮捕了。

造反派派代表去交涉：一、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疗；三、赔礼道歉。

部队派人来，说“你们是反革命暴动，我们是镇压反革命”。

造反派一万多人把三连人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还把司令抓起来，游街示众，他们开卡车向外冲，造反派人多把车推得向后退，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

造反派问司令员：“你来干什么？”

他说：“支左的”。

问：“谁是左派？”

他说“不知道”。

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

他说是“执行任务”。

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

他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

造反派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

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有些人害怕了，不干了，说这是解放军，不同于保守派呀！；有的人说投降吧！还有人说，上北京告状，就这么三条办法。领导成员决定坚持。保守派和部队对全县大包围，造反派就反包围，搞游击战术，他们缩小包围圈，造反派就跳到外面去，周旋了二十六天。

保守派说，张钦礼过去打过游击，主意多。他是现行反革命，要通辑。见了张钦礼，开枪打死，要死的不要活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又来了一次大逮捕

前后捕了一千二百人，把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小服务员都逮捕了，就剩几个领导成员没捕着。他们想跳出包围圈，跑到北京去告状，但车站上就有通辑令，还有象片，有几百里的封锁线，不敢去车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张钦礼被捕

留了少数人坚持斗争，其它几个骑自行车到杞县

才到不久就被包围了。当地的同志说，包围了，不象你们的人。有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人吸引过去，这几个人都被捕了。其他人往西南冲，冲击了第一圈。冲出后，麻痹了，走不动了，喘气了，说话了。被公、检、法的头头，一个副县长听到了，他说好象是张钦礼在说话，又包围了，被捕了，捆起来。

这时，有三卡车全付武装的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但不敢走兰考县境，怕群众抢。绕道转了一夜，直到天明才进了县城。

把他们关进监狱，和抓反革命一样，张欣礼的手指扭断了，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监狱里挤得不得了。

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押在监狱里一直不放出来。

二十八名县委委员就有十三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开始审讯

两侧是手持冲锋枪的战士，还上了刺刀，

政委大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

张说：“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

他又要张低头，

张说：“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他就拳打脚踢了一阵，要张交待。

张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

他要张交出后台老板，还说“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

张说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问张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

张说：“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

他打了张一巴掌，打得满口出血。他说：“不许你侮辱毛主席，不许你胡说。”

他就给张带刑具，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

他说：“你交待！”

张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

他又给张带上手铐，别人的手铐在前面，张铐在后面，还说是“优待”，张说：“饭是要吃的，不吃要饿死。”他们又用绳子把张身上缠紧，张说：“越看你们越不象毛主席的军队，不象左派，你们不讲理。”一天没问出口供，又下了狱，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又审讯张欣礼

是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的。

他说：“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

张说：“我也有要求，三条：1. 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2. 去掉刑具；3. 自由演讲。”

他说：“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

张说：“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

他们的办法是用八个彪形大汉，两个人一班，把张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张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张钦礼在监狱遇见刘师长

监狱放风了，房顶上架着机关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

在监狱门口，张欣礼见到了对面 8 号牢房的一个老同志（他是一个志愿军的炮兵师长，52 岁，说他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带了手铐，大喊大叫大骂：“你们是法西斯！狗官站出来！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水！”

张喊着向刘师长敬礼。刘用铐着的双手向张鼓掌欢迎。

从七号牢房出来了几个看监房的人，就拧张胳膊，按头，屁股都坐到脸上，全身骨头发响。腿被打伤了，不能走。

张就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懦。”

两个拿刺刀的战士向张逼来。张往前凑了一下，战士往旁边让开了。

张问：“你们为什么要刺我？”

战士说：“不让你读语录。”

张说：“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兵？”

战士说：“是。”

张说：“那为什么不让读毛主席语录？”

战士说：“叫你小声点你就小声点。”

张说：“声带是我的，我愿意念多高就多高。”

刘师长说：“你们是法西斯！白色恐怖！狗官站出来！”

战士走过去问刘师长：“你凭什么不怕死？”

刘师长说：“我凭的是毛泽东思想！凭我这条老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用汽车拉着张欣礼等三个人去游乡

头上戴着纸帽，插着白旗，开 4000 余人的斗争会。喊口号，群众不举手。

张对旁边的人说“你看，我们还有群众呢！”

有一个人包了六个纸包递给我说：“要肃清你的‘流毒’，这是你的‘流毒’，给你！”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六个熟鸡蛋。都被他们打掉了，

以后就再也不敢让张欣礼游街了。

在狱中审了张 53 次，上刑 27 次。

张欣礼住的牢房里是两个人，同住的人姓白，张作了工作以后，白说是派他来监视张的，他们给他两个条件：1，不要同张讲话；2，不要让张死了。做了可以减轻或不判罪。十六个解放军，分两个班看守，有的解放军端着枪，上了刺刀，脸色很难看。有的问吃不吃得饱，受不受得了。就向他作工作，说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国家要摸反修、防修的经验。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我们要扛起反修反帝大旗。你们都是贫人出身，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忘本。这样就慢慢的熟起来了。经过 50 多天的工作，在 16 个解放军里，5 个人同意他们的观点，其中三个人可以让他们坐下，躺一躺，在牢房里走一走。两个班长白天收集造反派及军内的情况，讲给他们听。

（三）张钦礼出狱并当上了县革委会的主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张钦礼听到中央表态的消息

送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毛主席象。

一个班长对张说：“有希望了，听说二七公社与保守派在京谈判，中央表态了，中央支持你们。说军区支左支了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张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班长说：“这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人背着我们说的，被我们听见了。”

张在监狱里对着毛主席象宣誓：“前半辈子跟毛主席闹革命，后半辈子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张钦礼接到中央决定放人的消息

狱中的炊事员老王送的馍里夹了一张条子，写道：据说中央决定放人。下面写着“新华”两字。这是新华书店一个组织的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兰考老贫农为张钦礼喊冤

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下起，为张钦礼喊冤。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指示当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地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战士营救张钦礼

又送来一个条子说，保守派打算把你搞出去，在三天内暗害。我与那几个解放军商议。他们说：如果发生事情时，让我从牢房小窗子爬上去，翻墙逃走，他们两个人掩护我，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夜三时，张钦礼出狱

那两个解放军已经下岗了，忽然门锁响了，张马上拿了一个铁盒，好作武器。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原来是指导员进来了。张问他：“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来看一看你。为了你的安全要你出去。”

张看他今天的脸稍好看一些，就说：“你们不是要害我吗？等我穿好衣服穿好鞋。”

出了牢房，一个小车飞快开来，车门一开，两个人把张一架，塞进汽车就跑，架得紧紧的。车开得很快。到了县里张说：“车子别开了。我知道你们要杀我，我死，要死在兰考，再开我就骂。”

他们说：“我们是有任务的，老同志，我们一怕老保害你，我们交不了差，二怕革命派不放你走，才这样做的。中央限令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护送你到北京。”他们又说：“你可别跳车，你跳了车，我们就没有脑袋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兰考县十个领导干部：《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焦守凤：《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张欣礼到了北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兰考县张钦礼焦守凤谈话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夜；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边会议室。〕

（中央首长处理河南问题的第八次汇报会议开始，刘建勋同志热情地向张钦礼同志招手，张钦礼走到刘建勋同志跟前，刘建勋同志让张钦礼同志坐在杨成武同志的席位上。当时杨成武同志不在首长席）

刘建勋（关心地）：听说你的手指被打断了。

张钦礼：是的。

刘建勋（对总理和张钦礼），控诉他！

（总理点了点头，张钦礼同志回到原席位上）

（会议中张钦礼同志讲话时，未讲完就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插话打断。张坐下。停了一会，总理走到张钦礼同志面前和张亲切握手，随即拉着张的手走到休息室，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室内有戚本禹，杨成武等同志。这时，刘建勋同志带焦守凤同志进来。）

刘建勋（给首长介绍）：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

（总理站起来和焦守凤同志握手，并让她在张钦礼同志旁边坐下。）

周总理（关切地问张）：你什么时间到北京？

（张因耳朵被打坏，未听见。）

焦守凤：他的耳朵被打坏了。

周总理：你给他当翻译。

周总理（问张）：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

张钦礼：2月26日夜4点被抓。

周总理：他们什么时候将你放出来的。

张钦礼：七月二十八日晨三点。七点由解放军同志送我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的。

周总理（关切地）：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那个监狱押着？

张钦礼：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押了二百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一千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

周总理：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

张钦礼：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

周总理（生气地）：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

张钦礼：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张钦礼同志一面说着，一面伸出两个被折的指头。周总理无限关怀地抚摸了它。）

周总理（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用手指张）检查治疗。

（总理联络员谢××上前问张的住处，并记下来了。）

周总理（气愤地）是谁抓你的？你在监狱里押了多少时间？

张钦礼：在监狱押了一百五十六天。逮捕我时是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的。（周总理记下李地山的姓名）

周总理：开封军分区有人支持你们吗？

张钦礼：在提审我时看来，开封军（分）区的杨司令员和徐副司令员是同情我们的，兰考中队中一部分战士是同情我们的。

周总理：对他们，你们要区别对待。（并嘱咐张钦礼和焦守凤两同志）回去，你们要艰苦奋斗。

戚本禹：（问焦守凤）你妈妈来了没有？你还和她吵架吗？

焦守凤：她回去了，我没跟她吵架。

总理：好好作你妈妈和妹妹的工作，她们会明白过来的。

焦守凤：我一定照总理指示去做。（接见到此结束）

总理和张、焦二同志握手告别，张、焦二同志又走进双方汇报会议室。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张钦礼在首都革命派欢送河南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
《何运洪是残酷迫害兰考革命派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钦礼为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河南省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做群众的小学生》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报道：《永葆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记兰考县革委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革命的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记者《革命先锋——记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老贫农阎协崇》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盐碱地稻菽千重浪——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记实》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下放干部的好榜样——赵新贞》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县支左部队坚决按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教导办事 深入细致地做好已解放干部的教育工作》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破坏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抓紧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兰考县工作的新进展

张钦礼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期间，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文件。

（四）张钦礼又被王新撤职、关押，出狱后升任地委副书记

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张钦礼又被批斗、撤职

1970年，兰考县革委下发了一个《奖励生产成绩卓著者》的通知，内容是“生产队达到每人年产小麦500斤，奖励马3匹；大队达到这个标准的，奖励东方红拖拉机一台……”。

被为省委副书记王新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物质刺激”、“标准的刘少奇生产党”，“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干部到兰考批斗张钦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一九七一年初，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

张钦礼在信阳地区革委会挂了个副主任的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省公安厅副厅长）日夜监管，实际上是软禁。

张钦礼在兰考的家数次被抄，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历数他的种种“罪状”。

他们还把宣传车开到了张钦礼在山东的老家，堵着门口叫喊他的“罪状”。张钦礼的老母亲——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前辈，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活活被气死。张钦礼通过了种种刁难才允许回家安葬老母。秦、周二人为此还出了一期“敌情简报”报告给王新。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呆了几个月。

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发生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其中，除调走七人外，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兰考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周总理再次接见张钦礼

1971年11月10日，周总理再次接见张钦礼。他说：“张钦礼同志，你受委屈了，你的事中央全都知道了。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老熟人了。你治盐碱，治涝灾，很有成绩嘛。”

周总理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张钦礼、杨贵）？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一九七二年六、七月，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张钦礼参加了省委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与王新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已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这里的壁垒分明, 焦裕禄生时为兰考人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十四日, 是他逝世十周年, 十年来的实践证明: 焦裕禄同志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彻底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里呆了十几天, 使我建立了充分的信心: 谁想在这块土地上, 搞资本主义复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焦裕禄同志生前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大批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硬汉”。

十次路线斗争中, 林彪死党王新曾在兰考大肆摧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 但是, 几乎没有一个人屈服, 一直坚持到胜利。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仍是兰考的第一把手, 他的事迹足可写一部史诗。当然, 现在还不是写作的时候, 只能放到以后。

一九七四年二月上中旬,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的信, 又初步了解了兰考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 正在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斗争, 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一场极其深刻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这场斗争, 对于每个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一九七〇年七月起, 林彪、王新路线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 踢摊子, 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 其中, 除调走七人外, 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 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 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 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 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 大整基层干部, 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 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 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原信后面遗失)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斗争大快人心, 兰考人民马上动起来, 开大会, 游行, 又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气势。张钦礼同志回来, 传达了中央及省委的精神:

一、批林必批孔、挖根，批翻案妖风，批王新，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

二、要在农村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

三、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四、要训练骨干，试点，要有深度，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问题；

五、运动要由各级党委领导，不能抛开党的组织，对各种错误倾向要揭、批，但要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特别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工农兵群众是主力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是我根据钦礼同志谈话和报告随便写的，不是原话)。

群众非常听毛主席、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话，前两天，群众想把那些闹翻案的人示众，经县委一说服，就不揪了；调查的人可以把揭发材料转去处理。

我深信，林县也是一样。砍红旗渠的是林彪、王新等反党集团。现在的县委、公社党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武阳、艾生等同志都是好的。要维护正确的领导。

你们那里怎样?知识青年应当在批林批孔中起作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

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

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

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

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五）十月政变后张钦礼又被逮捕入狱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戴苏理找张钦礼谈话

戴苏理已经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左右，张被捕前，戴苏理把张钦礼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张钦礼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刊登新闻：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

贰、本节简论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颁布实施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河南省的领导干部在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带动下，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比较早，也比较多。这种情况对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十分有利。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河南的革命造反组织也准备向一撮走资派夺权。

二、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颁布军队支持左派的八条决定，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思想保守，对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以及支持革命造反的领导干部，抱着严重的对立态度，以支持还是反对刘建勋划线，支一派压一派。采取了发声明、组织部队上街游行示威、在报社搞夺权等一系列的行动，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何运洪又以群众把矛头对准军区为由，对革命造反组织采取镇压措施，宣布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逮捕其骨干分子，在群众中搞请罪活动。

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就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召集对立的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何运洪对抗中央指示，采取拖延战术，企图压垮对方，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领导才开始接见河南对立双方的代表。经过领导同志反复做工作，先后八次集体接见双方代表，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才作出关于河南问题的决定，成立以刘建勋为组长的河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

四、一九六八年一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

一方面，由于革委会本身的不完善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人接过“反复旧”的口号，打着“反复旧”的旗帜，把矛头对着革命委员会。这就错了。这两种情况的区别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对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是拆台，还是补台。

另一方面，由于一些跟着何运洪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加上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利用，打出了革命委员会“不见得”好、革命委员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旗号，把矛头对着革委会。

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况，由于资料缺乏，都不是很清楚。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开展这些清查工作的主要对象大多数都在原来的革命造反派中。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是与非、罪与非罪的区分，十分复杂。稍有不慎，就会犯打击过头的错误。还有一些地方、一些人本来对革命造反抱有仇视情绪，乘机打击进行过革命造反

和支持过革命造反的人。这种情况各地不一，对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张钦礼的情况很特殊，他是在一九七〇年被王新以搞所谓“刘少奇的生产党”的罪名打下去的。

五、十月政变后河南省的所谓“揭批查”问题，主要不是“扩大化”、“派性”，而是镇压革命、大搞复辟。当然，河南的当权派又当了一次典型——坚决镇压革命的典型！他们获得了全国第一！所以他们受到上面的夸奖、维护。以后，河南的当权派还当了一次典型——镇压人民纪念毛泽东活动的典型！他们居然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的人判了几年徒刑，他们又获得了全国第一！

2008年1月11日初稿

2011年10月13日修改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

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说：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这个问题，我请示了主席。如果华北局书记处有问题，可以改组嘛！夺权不成。

代表：从已揭发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开批判斗争大会，可是书记处却传达了所谓“中央的三点意见”……

代表：我们要继续贴揭发李雪峰的大字报，并要开揭发斗争李雪峰大会。

总理：可以贴大字报。你们把“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都贴到街上去了，李雪峰三个字都倒过来了。我每天都看到，也没有制止过。雪峰检讨不是不可以，最好时间晚一点。他也没说不给你们检讨。主席也说过，检讨检讨就够了，总是检讨干什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石家庄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代表

谢副总理：石家庄、张、宣、唐、秦地区经过双方协商和解放军努力，在陈伯达同志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央文革的指示，

顺利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三个协议都很好，我们热烈地祝贺。（全场热烈鼓掌）。希望造反派，解放军同志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武斗不符合革命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武斗只能使敌人钻空子，只能使走资派地富反坏高兴。

陈伯达同志讲话：这个协议是大家努力，两派协作，能达成协议，这是很大成功，是我们走向胜利的一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谢富治第四次接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等地近来有些人，个别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付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些动摇。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个别人不怀好意，大家不要失掉警惕性。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张家口石家庄唐山等地代表讲话
伯达：我们担心你背后有人捣鬼。一个工人阶级不可能设想非要停产武斗才舒服，一定是有人告诉你们怎么干，在你们幕后指挥，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指双方）可能隔着好几层，我说你们这几个地区都要注意，这是肺腑之言。

谢副总理：现在有少数造反组织不纯的问题，有地、富、反、坏、右，甚至有杀父之仇的人。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起作用，特务、地、富、反、坏、右对我们有仇恨，唯恐天下不乱。煤矿停产，帝国主义、苏修、蒋介石才高兴，你们没有敌情观念。

在生产中坚持生产一直表现好的，不管他是哪一派，都要表扬和奖励。

你们大学生包办一切，大学生不懂生产的重要性，处处包办人家的事。

现在有相当的造反派，不关心生产，不关心生产的造反派不是好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河北省保定邯郸地区代表的讲话

保定成立革命筹备小组、工代会、红代会，联合起来，这件事联合起来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革命路线，不联合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大批判，关键是大联合，这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最关心的，你们要立新功。到北京

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文件，最近特别要学习江青、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和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想一想是派性高于一切，还是党性高于一切。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唐山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天津附近天津的各派不管那派，也不管那个学校，如果到农村里边制造派别，制造武斗，抢收庄家，那是罪过，绝对不允许的。（严肃）郊区的农业生产，按照往年一样，那个生产队生产的，那个生产队收购，一定要割好、收好、捆好、分得好，不能抢公家庄稼，如果那一派有动员农民抢割，那是很大的罪过，历史是不能宽恕你们的，大联筹要特别注意。

谢富治：下一步搞政治协议，根据江青讲话抓大方向，抓大批判，要搞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河北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的讲话

谢副总理：你们鲁迅公社有几个问题，应提起高度注意，你们不改变态度，没有好结果，根本大方向得好好扭扭。一个组织纯洁性；二是对解放军的态度；三是斗争政策，方法是适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三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今天我只讲了你们，不是说解放军和另一派没问题。

陈伯达同志：河北的问题，是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不想管，让你们吵去，闹去，总会闹出个头绪，总有一天不想闹了吧。现在我再给鲁迅公社提一个建议，我不赞成你们再存在。你们鲁迅公社是跨行业的，是个大杂烩，甚至谁也不认识负责人，跨行业的。我建议你们组织解散（谢：别的地方也要解散）。什么马路兵团、八五风暴等全要不得。你们（对红旗）现在不是有个共同的目标吗？（搞红旗及××），这个目标是错误的。（谢副总理：你们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军是错误的，反对其它军也是错误的。

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发了精神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写得很无聊，我不想看，最后谢富治

同志告诉清华大学，你们怎么不处理呀！他们就把他抓到公安部。我告诉谢富治同志不要抓，还把他放回清华，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采取专政措施。事实上，他出大字报那天，他那一派 414 就把他藏起来了，怕把他打死。如果把他打死群众就犯错误。不应该打，更不应该打死。讲这个故事，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习再学习。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席。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对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突出一个“公”字，狠抓一个“用”字。突出无产阶级的“公”字，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狠抓“用”字，就是发扬毛主席历来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这样做的结果，就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各级革命委员会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立了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共为八十人，其中军队支左干部四十一人，

地方革命干部，包括生产指挥部原有干部，共三十九人。各组（部）的人数为：办事组十人，秘书组十五人，保卫组四人，政治部二十三人，生产指挥部将原有的一百二十人，减为二十八人。此外，另有附属、服务人员三十多人，包括炊事员、电话员、机要交通员和汽车司机等。

从革委会成立近一个月的情况看，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新的革命机构，同旧的观念、旧的不良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

中央同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三月二日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希望你们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设置工作机构时，都能参照执行。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贰、本节简论

关于河北省的文化大革命状况，也许是由于资料收集太少的原因，还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非常遗憾！

2008年9月21日初稿

2011年10月14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

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张体学同志书面检查”的批示

1968.01.30；中发[68]2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同意张体学同志这一书面检查。望武汉军区党委召开现在武汉的湖北各地区代表和武汉市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革命干部的会议，印发这一书面文件。在取得群众代表同意之后，张体学同志即可参加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在实践中认识改正错误，努力建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制止武斗，反对三个分裂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通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告武汉市三钢、三新各革命组织：

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抢枪，坚决制止这个违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为。并请他们准备派代表来京商谈。

八、中央解决湖北军队内部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黄永胜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

总理：李迎希不能回去，其它几个同志什么时候回去啊？军区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地方问题，王任重、宋侃夫、刘惠农都在这里，还有那些黑手，都搞来，进

行批判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大批判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才能解决跨行业问题，黑手才能抓出来。如果不解决跨行业问题的话，坏人就会互相包庇起来，就揪不出来。军队的问题，李迎希要批判，张广才还要作自我批评，其它几个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叶明、孔庆德在七·二〇作了些事嘛，有功嘛。黑手要抓出来，李迎希就是黑手嘛！干部有问题的，可以来，解放的干部也可以来，在这里做工作嘛！坏家伙也可以到这里来批判。跨行业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来解决。解决得好对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都有影响，可以解决一些。

清理阶级队伍可以揪出坏人。比如孟夫唐，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嘛。军队内部，意见要取得一致，问题就好办了。

来了后要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群众组织头头也来学习，来了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批判大杂烩。

康生：对军队，对革命委员会，对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教育。现在的革委会与以前的领导不能一样看待，不能把刘少奇的专政同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一样看待。

春桥：去年一月湖南提彻底改造专政机构，毛主席说不能提彻底改造，提这是错误的，只能部分改造。

康老：王、关、戚抓军内一小撮，后来揪出了杨、余、傅。有一些群众受蒙蔽，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矛盾指向军队。武汉揪武老杨，广州揪广老杨，把军队看成什么，军队不能夺权。

总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夺权。

康生：你夺权是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中心问题是稳定军队，稳定巩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口头上拥护而实际上反对，这是错误的，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说“军政府”，这是国民党的话，要学习、执行江青同志九月三日讲话。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三个分裂主义，李迎希就是一个代表。张广才，毕占云，你们要与他划清界线，他是反党夺权，要着重批判这一点。他们错误有现在的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对的。

总理：军队要团结一致，集中统一，不能搞分裂。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把党委组织建立起来，统一军队内部思想问题。军队纪律一刻也不能涣散，不能夺权，不能一说就是黑指示，不能瘫痪。军队要服从命令。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入人心的。要广泛宣传。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有人想搞坏事，想把军队带走，这是带不走的。张国焘不是要把部队带走，也没走成，他的老婆、孩子还是我们以后送出去的。青海发现了赵永夫是个坏家伙，叫他到北京，他就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这样坏，要他们来，他还是来了。武汉独立师要调，还不是调出武汉了。部队是经过考验的，是有传统的。

总理：李迎希搞夺权是反党、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反党行为，他是黑司令，要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这对军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把军队威信树立起来，军队威信树立了，革委会威信也就树立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曾思玉在湖北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中央开会解决军内问题，揪出了李迎希这个反党夺权的野心家。李迎希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典型的两面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李迎希旧账未还，新账又来了。旧账是去年一、二月份的夺军权；新账又来了。我们主持军区工作以来，他就搞阴谋活动，在那里搞分裂。军队要稳定，他要搞分裂。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巩固嘛！他就要搞垮，挑拨群众组织的关系。

李迎希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反党夺权。去年他借军区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搞了大量阴谋活动。去年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会，他在大会上开会夺权，有些跑腿的人跟着出谋划策，他说：同志们的意见（指让他下台）我赞成，我同意，我欢迎嘛。当晚几个人跑到他家里，密谋策划，订了夺权计划。李说：这个兵权我敢拿，但要有个合法手续，我也拿得下来，能力不够，夺了再说，我指挥过七个军，夺这个兵权要出自你们的口，不能出自我口。开了这个黑会，就按这个计划搞开了，但群众反对没有实现。

第二明知故犯，违抗中央。李迎希当面给我们说得多好啊，要如何如何，背后又在搞鬼，要把军队搞乱。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批发的八条命令，搞了个三条指示责令正面教育的单位搞四大。

军队和地方不要挂钩。有个六所，逮捕了一个闹事派（×××），还有人要干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冲了，幕后指挥就是李迎希，有人还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我是7月23日到军区大院的，说了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他得意洋洋，说路线斗争，就是要给他平反，我走了后，底下提了五百多个条子，这个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很毒辣。不准搞四大，他硬要搞四大。

第三、搞翻案活动。“7·20”以后李以一贯正确自居，第二天召集这八个同志谈话，要作自我批评，说各有各的账，他紧张了。军区几个常委同志叶明、孔庆德、姚喆，他们作了高姿态检查。我找李迎希谈，他说好，好，好。可是就是揪住不放，他一进门就对他们提了三点：①要叶明等请罪；②要别人承认他自己一贯正确；③要给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平反。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组成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体学的三点意见
有的人揪武老杨是不恰当的。

我们要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武汉军区党委，曾、刘和省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

三、武汉“北、决、扬”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摘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摘要）》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〇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一九六七年九月，《扬子江评论》创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北斗星学会”“命名的团体在武汉正式成立其精神领袖为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与冯天艾。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 1957 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既抨击了“搞什么鸡血疗法”的逍遥派，又针砭了“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司令”、“佛爷”（掌权者与造反派）。〈宣言〉表示，他们要做的是“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换句话说，他们要在官方报刊社论外自己寻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手段、方法的答案。〈宣言〉无论在思想上和语言上表现出了对当时正统意识形态的某种离心、反叛与挑战。

这一读书会性质的组织不久便被当时湖北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曾思玉与刘丰公开指责为“一个奇怪的组织”，并在无形中迫使它解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概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日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么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于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 516 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希望和和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中派——考茨基派：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形左实右派：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 516。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决、扬”即“北斗星學會”、“决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是 1967 年 11 月至 1968 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異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體演變的三個名稱。據馮天艾（華中工學院學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憶說：“北、决、扬”人員極盛時不過 25 人，由于認識上的差異，造反派鋼、新兩派中絕大多數人對其都是反對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強烈批駁其觀點。魯禮安（華中工學院學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黃石鐵山的新派抓獲押送新華工，再送武漢警備區關押的。由于魯在“七二〇”事件前冒著白色恐怖為工總翻案，被抓後，鋼工總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了營救活動，但並非出自對其觀點的贊同。鋼工總領導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營魯”

四、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紅旗》雜誌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提出：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

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山東省革委會主任、濟南軍區政委王效禹在《人民日報》发表的署名文章《擊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全國最先搞“反復舊”，对全国的造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武汉造反派認為武漢就是《紅旗》社論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結合而不是革命三結合”。1968年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初期，“在革委會裡，基本上是軍代表說了算，干部代表和群眾代表不起作用。群眾代表只是個花瓶和陪襯。當時有一種說法，說群眾代表是‘開會主席臺，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小車來。’”

武汉造反派认为，1968年底，大、中學生大批畢業離開學校到軍墾農場、上山下鄉，隨著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准學習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為專案審查對象，軍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隊”來整造反派。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以奪取造反派在各級革委會中的政治地位。“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

一九七九年初，單位的人來家裡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島，見到了青島市革委會主任楊葆華。促成胡厚民下決心回武漢發動“反復舊”。

胡厚民在協和醫院住院，請朱鴻霞、夏邦銀、郭洪斌（Z口區房地局工人、工總組織部長）、田國漢（湖北印刷廠工人、工總宣傳部長）等巨頭先後上門找吳焱金承認鋼、新之爭中的錯誤。“胡厚民出院後，邀吳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講了抓他的經過和青島之行，還反省說，當年你們揪‘武老楊’時，我們共同

對敵就好了。他還說‘反復舊’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三個人出面掛帥牽頭。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復舊”打頭炮的是武鍋的王光照。

王特地選了對工總大逮捕的兩周年紀念日一，在廠門口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列寧選集》中的一句話“我們決不半途而廢”，這與朱、李、吳署名的《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大字報，拉開了武漢“反復舊”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鴻霞、吳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講，講保守派怎麼回潮，造反派為什麼受壓，為什麼要“反復舊”。王光照在“反復舊”中，在全市各單位一共講了60場大型報告會，與他同臺演講的有丁家顯（武漢測繪學院學生，鋼二司勤務組成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吳焱金、朱鴻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軍宣隊拿“三條扁擔”、“三根繩子”壓造反派，“三條扁擔”是指“派性、打砸搶、搶槍亂軍”三條罪名；“三根繩子”是指造反派“想當官、想入黨、造反動機不純”三條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漢口工藝大樓街頭召開“反復舊誓師大會”。

大會由胡厚民主持，朱鴻霞和吳焱金分別講話，有數萬人參加大會，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造反派感到揚眉吐氣”。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將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群眾組織代表接到北京京西賓館。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離造反派頭頭與群眾聯系，要壓制造反派捍衛“文革”成果的努力，臨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總武漢客車制配廠頭頭）當“反復舊”負責人，交代說：我們去北京以後，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寫信，你們在武漢鬧得越歡，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付廉返回武汉搞反復舊

付廉回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搞斗批改，我当时在孝感花园，谢青云是团长。他找我谈话，说：老付，你根子正，有时候说话不看场合这个不好，这次是不是帮助我一下。你有时候没有头脑，容易动肝火，这次本来是对你们有利的。安排

我在机关组，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固定的组，团部可以随便进出，我进去他们就谈天，我走开他们才继续开会。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玩了几个月，说我是个幽灵，有时候还借他们的车子开去大悟县城玩，车子可以随便借。

当时军代表都是一把手，权都在他们手上，当时都听军代表的，这个权力分配方式是军区和张体学做主的。实际上是利用斗批改让干部进行反夺权。开始是黄正荣找我回去，后来刘建章他们说武汉来人，要回去搞反复旧运动，我说都回去。在反复旧的时候，街上大字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还我革委会，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厅里的干部对我说，张体学说你是一个大祸害，把那么好的一个斗批改搞散了，他要喝你的血。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朱鸿霞、胡厚民等成立所谓“反复旧”指挥部，搞“反复旧”运动，湖北武汉地区许多单位停工停产。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胡厚民认为：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他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

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有人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集中和统一一直被看成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石。而且，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文革’动乱之后，毛又强调自上而下重建集中和统一制度的必要性。但这个根本原则现在遇到了挑战，而且，另一个原则——分权与制衡——提出来了。如果实行这样的原则，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会从根本上被动摇，甚至毛的绝对权威也可能会成问题。”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

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办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并没有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

一九六九年五月，反复旧的时候把谢保安打入另册

他们巴不得我早点走，免得留在武汉找他们的麻烦，就很快下户口，落户到宜昌去了。

汉阳区还特地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去宜昌，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做了交代。此后我就开始了在农村的生涯，其它人都陆续回城走光了，我就是回不来，当地农民推荐了许多次，都不行。最后宜昌县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刘兴举直接对我说，小谢，如果上面不做安排，你们就不动，推荐是一百次也是没有用的，这才知道当权派已经把我打入另册。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六九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付廉的学习班

航运局成立革委会，给我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召开什么党委会、行政会都不通知我参加，我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完全是名不副实，我还算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坐的地方，牟登第也是副主任，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张蓉是主任。一次别人喊付主任，我说王八蛋才是主任，刚刚好杨家新在边上，说我骂他，我们就是这样被悬在那里，一直悬到坐牢为止。

1969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我的学习班，在复兴公司，先抄家再搞五不准，他们12个人对我一个，侯善生负责。他们搞车轮战我也不理他们，自顾自大瞌睡，等到我醒了看见他们在打瞌睡，就把他们的烟拿出来给他们分烟，不让他们谁。有时候我就讲笑话骂他们，说随着混的人没有好结果。他们一凶，我就提醒他们说毛主席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现在是对目标对准谁，文革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给他讲故事。张德咬把他们叫过去训了一顿，说你们这是谁办谁的学习班？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做做好事不要讲故事好不好？张德咬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就是靠拍领导马屁和整人起家的，老工人没有不骂他的。

1969年夏天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就把我解放了。张体学找我谈话，说湖北省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省军区的赖副司令员是指挥长，你和杨爱国担任副指挥长。杨爱国协助赖副司令员工作，你负责组织材料供应。我问赖指挥部设在哪里，他要我不要管，这个指挥部后来设在交通厅，派一个胖子盛工来协助我。当时修公路最缺的就是柏油，我和张进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找交通部和石化部要这个东西。赖振华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出身，人蛮随和。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出过一次车前轮跑掉了的事情，他年纪又大，就开始担心怕他出什么事，我跟杨爱国有自觉为他当保镖。在这个指挥部里，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不放心，到 11 月份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北京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里，开始的架势蛮大，张钊剑当着我们的面吼陈祖文，说你陈祖文不要以身试法，吓得陈祖文几天睡不好觉。还用大字报去搞任爱生，这个人是湖北省最早起来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个性很刚，不怕他们。后来逐渐地松了，实际上利用我们新派去整钢派，利用小头揭大头，我们不是重点，还是他们利用的动力。批判胡厚民我们都做了发言，主要就是讲几句增强火力，具体讲了什么不记得了，胡厚民也检讨了一次。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的军代表是个小孩，拿我们没得整，成天就是谈天，肉包子要吃十个，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吃胖了。我们 1970 年 6 月回到武汉兵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陈祖文说这个气候不对。家里都传说我们被弄到河南南考去劳改去了。在兵站住了几天，有几个首长去转了一下，后来在武汉剧院开了一次大会之后，就各自回单位去了，一回单位就看忆苦思甜展览。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五、湖北省的“两批一清”运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月二十八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

十月三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 10 条，从第 5 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

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此时曾、刘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这次会议，批“北、决、扬”只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 1000 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

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

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

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学习班的领导人对胡厚民特别“重视”，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一九七〇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

他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

他说：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

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

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

陈伯达越说越气地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把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照发

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十日，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

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至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相玉等。

一九七〇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刘丰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一九七〇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曾思玉说胡厚民是“北、决、扬”的总头目与“五一六”合伙

曾思玉在湖北省“两代会”上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一九七二年，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三人单独关在省公安厅。

一九七三年三月，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等转移出武汉，到了咸宁。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一些人为杨道远翻案

一些人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二年，又一次办付廉的学习班

付廉回忆：“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

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蛟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二年，张体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

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刘汉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

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六、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三月，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

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钢派的人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

新派头头张立国就要顾建棠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

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新派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新派的人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

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群众代表留了借条，将 3 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代表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

凡是 1974 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 4 年徒刑，这些人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付廉回忆：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

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

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

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谢某）谈话：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命 8 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叁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 5 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不出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 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叁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到他在车站路 15 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

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 9 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武汉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准备谢某补台至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谢某从农村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五年初至一九七五年底，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

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

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

七、湖北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省委通知挂职锻炼的群众代表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一些人继续为杨道远翻案，

一直都是写信给周恩来、江青、王洪文等人，后来就因此说我跟四人帮写效忠信，恭喜江青做女皇什么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三月，成立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等七人核心领导小组

参谋班子有胡厚民、顾建棠、彭勛(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沈复礼、聂年生、曹承义。

胡厚民开玩笑说：“彭勛是摇鹅毛扇的。”彭勛说：“我是鹅毛，胡厚民是鹅头。”“鹅头”之称从此不胫而走。

胡厚民对到省委的行动进行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具体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这个班子是“钢头新兵”。

随后，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和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

号召全省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

口号大多数为胡厚民等参谋班子所拟订，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列席会议。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关于

各级党委补台、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等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

3月9日、11日，夏邦银、谢望春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研究转弯子的会议上，打电话出来“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胡厚民等人按其要求，部署调度群众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前往，省委负责人出面接见，谈妥三五天后再回答。

（后来被说成：“1976年3月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一些群众代表到省委、省革委會，听取省委負責人的答复。

（后来被说成：“3月19日冲進省委、省革委會機構，圍攻、控訴省委負責入）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

“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月8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人山人海，群情激昂。

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

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中断了电话会议，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

据谢保安（武汉三中学生，钢二司常委，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回忆：

我们进入省委办公楼一个个办公室找，最后我看到他们在那个会议室里，就把门一敲，要他们中断会议，跟我们一起去跟群众见面。宋侃夫说要有个值班的，刚好我今天值班，是不是我留下来，我们就同意了。

随后我们把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去。因为要等待汉口这边布置会场，我们就把车子沿着水院到广埠屯转一大圈。后来赵辛初说我们要解小手，我们就到龟山脚下的公共厕所，看着他们方便。因为当时担心如果万一

有人打他们一下，或者他们自己想不开，所以很紧张，他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赵辛初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我们到达武胜路之后，已经是人山人海。赵辛初他们一个个沿着长竹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他们还都算是做了明确表态。

朱鸿霞、胡厚民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会议是田学群主持的。

会议结束之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就把他们交给省委秘书长陈克东他们接回去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他们一一护送到家。

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完全是不得了，说我们中断了省委领导的电话会议，造成全省革命和生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

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 1975 年)“六四”报告。

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 1/3 的单位搞起来。

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

“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 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 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

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

类似这样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出现新的。

胡厚民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是后来被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想调顾建棠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

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顾建棠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群众代表提出省委、省革委补台的具体意见

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

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他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

夏、朱、胡提出：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

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夏邦银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一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

具体意见：一、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中共中央委员）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勛到宣传部当副部长。

当时，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指示，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

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八、政变后镇压造反派

十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实行镇压、翻“七·二〇”事件的案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 8 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

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省委向省直机关传达“四人帮”被抓

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谢保安听到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的消息

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

“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 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 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 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 Z 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 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波澜岁月》179 页至 183 页，自费印刷，2003 年）

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胡厚民被關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 45 號看守所。

一同關押的还有楊道遠、夏邦銀、朱鴻霞。原來因“北決揚”案件被抓的人也都關關在這裡。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夏、朱、胡、张 4 人逮捕。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七月二十四日，胡厚民的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它）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

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一九七〇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

张立国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夏邦银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北决扬”问题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另一说：“决派”的组织有数千人登记）。由于他们创办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在上面发表他们的观点——一个不大的文革不同政见者流派在武汉登场了。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〇”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首先集中在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上。他们认为：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并且是直至今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因而他们宣布：“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放到了‘决派’肩上。”什么是他们要建立的新政体呢？那就是“公社”，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建立这一新政体呢？“决派”主张“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于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还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政治与阶级状况的分析中。

他们认为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更深一步，他们还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在中央，则是以1967年开始转而批极“左”，迫害造反派的文

革派首要人物康生、张春桥及周恩来等。“北、决、扬”断言：“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中心任务。”

与他们异常激进的阶级、路线分析相反，在对待中共及保守派历来重视的干部与群众的“历史问题”上，“北、决、扬”却表现出了特有的宽容和理智。早在1967年5月20日，鲁礼安、冯天艾便以“红司新华工敢死队”的名义贴出一张题名为〈“大抓叛徒网，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大字报，文章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现在又能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即使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历史，基本上仍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把他们仍称为变节自首分子，硬将他们塞进‘叛徒网’之列。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打击革命干部，就是挑拨干部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

与上述分析相随的是，“北、决、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面临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而“决派”——“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换句话说鲁礼安等人准备建立新的政党取代已经腐化的中国共产党。另外，鲁礼安等人还按照马克思关于“废除常规军”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要求消灭人民解放军，代之以人民武装。

“北、决、扬”这一自视为“造反派中先进分子”的认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中有更为完整的阐释。该文认为文革中所有派别可分为六种：极右势力、保守派、革命造反派、中派——考茨基派、形左实右派、决派。作者认为，一般造反派与决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造反派不仅普遍漠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而且也很少认识到他们的敌人已形成了阶级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认为‘文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某个走资派，所以不去反对革委会。相反，他们在革委会相互争权夺利。‘决派’却不一样，他们完全理解，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紧张化决定了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必要。这就要求推翻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建立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一个民运分子指出：“北、决、扬”等人”要彻底推翻“革委会”，推翻并重建腐化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北决扬”所反映的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候，一些省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和流派，如上海的“炮打”派，湖南的“省无联“，山东的“翻案兵”等等。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根据湖北省上报的不真实的材料，断定：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其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从而，错误地把“北斗星学会”和“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织”。湖北省又把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一些学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并判刑。

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

二、关于“反复旧”问题

1，一九六八年二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三结合的架构在组织上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很不完善，往往形成军队干部一家说了算的局面。在一些地方、基层单位中，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就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感受最深的是原来的革命造反派。

2，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九六九年初，苏联加紧了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并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造成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央为加紧备战，稳定内部，推进文化大革命，积极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3，当时，在一些造反派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认为，全国的形势仍然处在一种非常严重折危险局势中，而中央某些领导人，在“七二〇”事件以后开始右倾了，甚至认为毛泽东本人对方向路线错误的斗争也发生倒退了，由严肃处理军队支左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转到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而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就是一个标志。

4，湖北省的一些群众组织代表，由于自身的一些感受，加之不同程度地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在全省发动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在当时局势下，这样做显然是与中央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

5，中央对湖北省“反复旧”运动错误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是把湖北省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请到北京，周恩来四次接见做说服教育工作。然后，中央“五·二七”批示指出：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批示一方面指出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开展“反复旧”运动的错误。此后，所谓“反复旧”运动也就停止了。这个问题也就算是解决了。

三、关于“两批一清”问题

到了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以曾思玉、刘丰为正副主任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中，又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搞了许多道听途说的材料上报中央，致使中央发出《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而他们又利用这个指示去打击革命造反派，把一些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都打成“北决扬”的总后台、幕后黑手、五一六分子。人数达六十万之多，时间达四、五年之久。受打击最重最深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带头人以及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揭露和清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中，发生扩大化的错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四、关于群众组织代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起伏问题

随着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湖北省一些受打击的群众组织代表企图乘此机会，揭露过去一段时间反文革倾向的错误，求得对革命造反派的公正待遇。但是，由于与运动总的要求不合拍，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虽然如此，但一些领导人自知理亏，对个别人还是作了一些释放、补台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搞整顿，造反派又成了挨整的对象，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都“滚”出了革命委员会，下放到工厂农村。

一九七六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湖北省这些挨整的群众组织代表又闹腾了一阵，随着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政变，他们敏感地预见到最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

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成了“四人帮”在湖北省的骨干分子，被关押、批斗、逮捕、判刑、坐牢。

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性。只是在湖北省这方面的材料揭露多一些，其它一些地方还封闭得很严密。

2007 年 12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14 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加强管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报告

他们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盗卖国家资财，炒买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工业品，盗卖票证，金银，外币，毛主席象章，甚至贩卖枪枝，弹药，毒物，汽车，私设地下工厂，雇工剥削。他们抗拒管理，活动猖獗，甚至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而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无牌商贩和无牌手工业纷纷出现，乱摆乱卖，哄抬物价，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较重的生产队和社员，弃农经商，擅拿产品进城，高价出售，扰乱了市场秩序。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市场上尖锐斗争的反映。

目前市场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獗。各地务必要重视加强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有关部门要大力配合这个工作。对于投机倒把活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狠狠地给予打击，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主义市场阵地，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中央文革小组：

最近各地纷纷请示，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搞，还是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搞；农场职工是参加工代会，还是参加农代会，有些农场职工为此事争论不休，影响了运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国营农场是以农为主，而且许

多农场是场社合一，因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应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进行，农场职工以参加农代会为宜，当否，请复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批转广东革筹小组关于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

一月二十五日报告悉。同意你们的意见。

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20；中发[68]32号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悼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党向民、舒光才、范布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以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

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彪听取丁盛同志汇报后的指示

三、广东省的批林整风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根据讨论精神写成的纪要：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 2 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 3744 人，有 78% 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

《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就这个《纪要》所提出的问题说：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

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莫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 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 1 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四、李一哲的大字报事件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

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

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

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五）谈反潮流

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

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二、限制特权

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

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

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

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

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

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贰、本节简论

关于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收集到的很少，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资料，就更少。

一、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与其它省相似。

所不同的是，在夺权阶段，赵紫阳搞了一个“让权”，中央采取措施对广东实行军管。

军管以后，军区又把参与夺权、冲击军区的群众组织打成非法组织、反动组织，逮捕“反动头目”一千多人。

二、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广州街头出现的李一哲大字报事件，是广东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

（一）李一哲文章的作者

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据说，“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是王希哲自己说他们与造反政治立场不同。

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

（二）李一哲文章发表的过程

“本文”写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这时，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3，8，24-28）刚刚结束。

“序言”写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连同“本文”贴上街头。这时四届人大即将召开（10月11日中央发出通知）。

（三）李一哲文章的基本思想

王希哲在一九九四年说明过他们当时的基本政治态度：“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

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

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久远，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

王希哲认为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的方向走去了。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1994年12月，第18页。）

（四）右派文人对李一哲文章的评价

有的人说：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其次，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李一哲

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宋永毅 孙大进：《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有的人说：“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

有的人说：“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1976年版）

（五）对李一哲文章问题的处理

一九七三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共广州市委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批判李一哲。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三月，广东公安机关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人及其支持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人及其支持者被平反。

从李一哲文章的发表到最后平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李一哲的文章是当时右倾翻案风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章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

十二月九日报告收悉。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教育革命先在本校，本地进行的意见。目前，大、中、小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不要外出串联。为了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

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应当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作好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工作，提出改革方案。报纸也应加强对教育革命好的典型经验的报导。全面的学制改革实施需报中央批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吉林省军区《关于吉林省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小学放寒假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可以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工则仍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望各地参照执行。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

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达成了《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个协议的达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成就，中央同意并支持这个协议，希望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执行，保证落实。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中央希望吉林省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各地的革命大联合和吉林省的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康生接见吉林省群众组织和军队代表时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你们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很快就要成立了。你们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达成几个协议。你们吉林成立革命委员会，不经过革筹小组，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你们还是比较先进的。你们虽然占十五、十六位，但有新的创造。

干部问题你们经过讨论有几个解放了。有几个干部这一派那一派有些意见，阮泊生、郑季翘几派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还有对宋振庭、宋任远的意见不一致。长春公社要解放郑季翘。红革会、二总部要解放阮泊生。

阮泊生问题，你们说有个党籍问题。光看这个问题不行。要看他的整个历史。我不认识这个同志，不能光看一时一事。阮泊生三八年总入党了吧，填表是真的吧，四八、五八、六八、三十年，三十年你们不看，就咬住那一个时期，这是不对的。

郑季翘我接触过几次，这个同志是不是没缺点，没错误呢？那不是。人只要做工作，总会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要看他的大体。他大体对陆定一的中宣部，对周扬的批判。他有他的长处，同志们，你们知道罗，他是批判了周扬从苏联贩卖来的形象思维论的。他和陆定一阎王殿中宣部是有斗争的。

赵林是个老叛徒。

富振声，这是我知道的，我在莫斯科，他去，我审查的，这个人不但和陆定一的关系很恶劣，我估计他个人历史上也有问题，他从东北到莫斯科这一段有问题。

还有李砥平，是叛徒。

粟又文，省长，这个人是个“民主人士”，我接触过，问题很大。

宋任远我不认识，据说他在统战工作上反对李维汉、徐冰的路线，也执行过也反对过。

宋振庭这个人我有接触，是延安鲁艺的学生，这个人说过错话，写过杂谈式的文章，据说还有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罢了官，这不要去看，我们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他好的一面。五八年我到长春，他专门向我汇报了长影的问题，他对长影的斗争是坚定的，当然这是吴德同志领导的。这不但是对长影的斗争，这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另外，他对陆定一宣传部和教育方面都作过斗争的，这个人你要抓他的错话错事随便都可以抓到的，但从大节上看，基本上还是反对阎王陆定一的。这个人大概是这样的。宋振庭这个人反右斗争时他会是一分力量，反“左”时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就是了。从这方面看他不是三反分子。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会组成：由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徐中禹、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钊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飙、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乌孟庄、王维宾、孙凤歧、尹家英、姚美玲（女）、许肇昌、周文贵、朱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三十五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担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两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吉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年多来，吉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揪出了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的大批判，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八个地、市已经有七个地、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吉林省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工业得到了发展。

长白山麓，辽松平原，一派大好形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人们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把刘、邓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以“斗私，批修”为纲，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各项工作，夺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吉林省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问同志们好。今天由我读一读中央的批示，同志们，大家都收到了吧？（读批示全文）

总理讲话：

第一件事，革命委员会是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就不能站在一派的利益上，一派的主张上，就都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应该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合乎的就改嘛。

第二件事，要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吉林省是多民族地区，汉族是大多数，还有朝鲜族，西部白城地区还有蒙古族。

第三件事，加强敌情观念。

第四件事，生产问题。汽车厂在全国很重要，不仅国内重要，还有战备、援外任务，我们希望汽车厂要带头，希望你们计划要订得高一些，因为你们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机械化程度最高、最先进的工厂。要求你们在生产上，第一季度过两个月了，第三个月要转入正常生产，第二季度要跃进，吉林省在工业战线上打响这一炮，希望你们能够实现，你们有没有信心？（众答：有）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

〔按：文革中，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单奎章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支持下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一百六十六人、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百一十一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贰、本节简论

吉林省的文革资料也是残缺不全。

一、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革命群众批判吉林省委执行错误路线的材料，基本没有。

二、一九六七年二月吉林省长春市的革命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第二总部和长春公社。

吉林省军区及吉林的驻军采取了支持第二总部，压制长春公社的方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一九六七年八月，经过中央的耐心教育帮助，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发出《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

四、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二月，资料缺，大概是两派继续斗争，甚至武斗。

五、一九六八年一月两派达成三个协议；二月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

六、一九六八年二月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以后的资料又没有了。

七、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说：文革中，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单奎章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支持下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一百六十六人、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百一十一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

这件事怎么看都叫人难以置信！

2008年5月22日初稿

2011年10月21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造反派宣布夺江苏省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和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关于九项问题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第二次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第三次与南京大学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江苏造反派宣布夺权。排斥南京八·二七，排挤一派，夺权派应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单位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这个夺权，但认为有严重错误，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召开庆祝大会，三十万人参加。

南京八·二七去了五万人参加大会，照顾团结，把夺权斗争推向前进。

夺权派找了个反对南京八·二七的中学生上台发言，批评了南京八·二七，说他是站过来了。

大会提出“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

在《新华日报》上登了：“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直登到二月十八号，还在登，还有文章，长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谈纪要
周总理：

学习最近的毛主席的关于夺权的指示才行。《红旗》三期社论是毛主席亲笔改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思想，尤其是第三段，主席改得最多。学毛著必须和当前实际斗争相结合才能活学活用（翻开《红旗》三期社论第三段）

这一段（指第三段）对于你们今天接见很重要，各方面都说到了，你们夺权我们已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

建议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用了发生政权问题。中央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际上震动问题，首先造反派是政治上占优势，现在有些单位是人数上也占优势了。保守派在瓦解。造反派人数上占优势后，就会骄傲了，包办代替了，当然这只是苗头。希望你们警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到三月二号，省军区主持开了个农业生产会三天，，有省、地、县三级参加。

“抓革命、促生产”也委托军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关于如何对待人民解放军

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二、关于“亮相”

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三、关于三结合

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三结合”。

四、关于江苏省委

王力：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

五、关于宣传工作

比如有个“百丑图”你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还有“砸烂×××有狗头”，陈伯达同志说要把这个“砸”字砸碎。骂人不等于战斗。比如说：“×××混蛋”，这能增加他们攻击我们的资本。

六、关于几个口号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那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七、关于“私心杂念”、“内部整风”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八、关于反动、保守组织

康生：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是可以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争取、团结、教育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二六”之后打、砸、抢发生了，打、砸、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不仅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

决定公安厅，公安局军事接管。外部造反派都退出，内部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出新生力量。

报纸是党报。造反派夺权之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成了派系报纸。里面有些口号是错误的，是很错误的，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当然，最好是协商，改组，现在看来不行，还是军事接管。外部的都要退出。内部若有力量，能够很客观地报道，就出报。否则就停它一个时间。

工厂方面，特别是军事工厂，很长时间搞两派斗争，生产搞得不好。工厂怎样军管，正在考虑。用哪种形式还在考虑。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队保卫。不叫外面去串联，看情况。

杜方平表态：错了就改，没有跟得上就再跟上，我自己知道有错，不知道有这么大。

杜方平向八·二七同志表示，你们批评，要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我欠了八·二七的债，有多少，还多少，我支持了夺权的一派。

我的指导思想是支持一派，团结另一派。支持以后，实际上支持了一派，打击了一派。虽然对南京八·二七有团结的愿望，但过早表示了态度，事情发展就难以控制了，没有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着急。

文凤来发言。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回去以后先要夺“私”字权。欢迎八·二七，东方红帮我们整风，和解放军搞好关系，支持解放军。回去一定好好干，一定做团结的种子，绝不做分裂的苗子。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同敌人江渭清是一致的，过去由于受压制，对压制过自己的同志有意见。后来学“毛著”少。

张建山：中央首长对我帮助很大，我一定要夺“私”字的权。最近南京黑字兵很猖狂，更重要的江渭清这一派还在起作用。我们做了一些事，的确是违背了中央

指示，反正群众要干就干了，有人说我们的后台是江渭清。我自己有决心，解放军接管，我们双手欢迎，否则收拾不了。

曾邦元发言：首先拥护中央的决定。不欺骗党中央，不阳奉阴违，这是革命者起码的品质。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斗争，彻底揭开江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来因为受压制，是带宗派情绪的，我们也要从掌权派所犯的错误中吸收教训，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证按中央指示去做。刚才杜方平讲欠债，我们说，不是欠债还债的问题，我们都有错误，对革命是损失。

外地驻宁联络站代表：我们外地的也犯了很大错误，提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作触及灵魂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省委办公厅分部：《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家屯》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南京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

张春桥讲话：

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

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

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

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风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

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

南京部队从老早就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

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

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够那样随便地冲了。

姚文元讲话：

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

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我看南京第一位工作是制止武斗。五月份武斗规模还小一点，当时我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武斗规模慢慢大了，看来南京一搞起武斗，比一·三事件更大了，以前是两派一起对付赤卫队，现在是两方面自己打了，是否双方面努力把武斗制止下来？过去是中央下命令，执行六·六通令呀，六月二十四日通知呀！六·二四通知是各人通知各人一方，但这几句话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得有个协议书。一般是搞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书，双方协议，签字，传达，双方都要真正的组织执行机构，譬如说，武器，枪支集中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土枪、土炮、

棍棒也要收起来，双方都不制造武斗舆论，高音喇叭，宣传车都撤掉，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第二个想谈谈大方向问题。三·五和五·一四讲话还适用不适用？我看除了个别词句外，现在情况还差不多，联合问题没有解决，夺权还没有解决，还是军管嘛！我看军管会现在有瘫痪的危险。要是那样子，江苏的形势是有利，还是不利？

三、江苏两派大规模武斗，中央解决江苏武斗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遣调查组赴江苏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出一个调查组前往调查了解和协助解决南京和江苏省无锡、苏州等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如劝阻武斗、冲击军区、部队、夺取部队枪支弹药、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等等，调查组由三军干部、红旗杂志、新华社记者，国务院联络员和北航红旗革命小将组成，共 38 人，由刘锦平同志任组长。请你们协助他们搞好这项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的电话指示

南京海军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军械学校红联总部和革联：

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他与武汉陈再道比较有根本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希望你们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做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会逐渐理解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由镇江 252 部队李德康在 252 部队内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无锡的陆渭文，常州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李德康主持了会议。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清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梁炳生详细地介绍了杀回常州在常州外围的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情况三代李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代会包下来。”参加会议的无锡陆渭文有自己的考虑，考虑的问题有二点，（1）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去参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2）如果参与了攻打常州，“战争”难免会有流血与伤亡，如果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自己如何向无锡人民交代。由于陆的思想顾虑，所以在会议中迟迟不作表态。

接着，省军区赵司令第二次接见，被接见的有无锡陆渭文，常州梁炳生，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 XXX 及“252”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很关心常州主力军返回常州的问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后，赵司令提出了一个送常州主力军回去的方案，他可以派出 XX 部队思想倾向主力军的一个解放军连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

整个接见都是谈的常州问题，陆渭文等于旁听，可能也是接受对无锡主力军的一种思想感染。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赵司令没有回答，而在旁边的省军管会的 XX 首长接口：“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陆渭文得到这句话，做到心中有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文革调查组接见首都红代会在宁战士时的讲话
八月廿一日下午，中央文革江苏调查组接见了首都红代会大专院校在宁战士。总理秘书宋皋同志讲话要点如下：

- （一）南京文化大革命开展比较早，交大，南大都比较早，但形势较复杂；
 - （二）要研究解决五月十四日后南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要历史的唯物的研究；
 - （三）五月十四日张春桥同志讲话是中央肯定的；
 - （四）如果都是造反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没有前台？有没有后台？有没有后台的黑后台？
 - （五）你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建立革命新秩序。
-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华东联络站《华东通讯》第十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分歧简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江苏简讯》载：《南京两派组织简介》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红总、八·二七和促联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南京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江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的复电

中央完全同意和支持你们三派代表于九月四日在南京达成的《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并且高兴地听到你们三方已在南京开始实施。

中央要求你们把这一协议书和中央这一复电印发全省，号召全省各市、县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能按照这一协议书的各项规定，结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逐项付之实施。同时，中央要求各地驻军和军管代表协助和保证各派群众组织对协议各项的贯彻执行。

愿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大批判中联合起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某日，刘锦平在苏州两派谈判签字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刘锦平在无锡两派谈判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无锡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 9 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

“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

“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

部队的代表：27 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

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

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

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张春桥同志讲话：

五月份去了一次南京、镇江、常州、无锡没有去，离上海最近的苏州我也未去，南通，苏北更没有去。

七月初六月底主席曾说江苏形势很好，大有希望。为什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可以解决了。但后来证明只是瘫痪了，武斗还没有斗够。

七月中旬，我在这里见过江苏三派代表，那时候就谈到能不能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他们说可以，以后又说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到南京去谈判。实际上一边谈判，一边武斗，你们以为武斗可以解决问题。

那时候有一种思潮：“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最激烈时，“八·二七”退到下关，那时候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说慢一点，他们还可能没有打够。

现在华东地区，山东、上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安徽这几天发展很好，浙江基本解决了，江西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福建，江苏的问题等待解决。一个是前线，面对金门、马祖；一个面临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保证上海地区的生产和江苏本省的生产都有很大好处。既然条件成熟，又有需要，我们觉得可以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请同志们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解决问题，今天军队的同志来了，希望军队的同志把思想清理一下。因为江苏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如果军管会本身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过来，或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就很难把江苏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而且在这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这是主要的，当然六十军也有一部分，我希望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很好讨论一下，江苏形势，究竟有哪些缺点错误，有多少，下决心改正，不要掩盖，虚心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就能够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军队问题。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再一个是造反派存在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比较多，这是造成分裂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单位同时存在。

被打到上海的主要是工人，少数是学生，这样搞谁高兴？还不是走资派高兴！到上海去的有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现在天冷了，没有衣服，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解决。被打到上海去的有五、六万人，最高潮达到十万人。安徽走的早些。这一方面，希望南京军区，省军管会，各地的军管会，还有二十七军要主动帮助解决，劝说他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武装打回去的办法。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

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单，说许世友同志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是彭德怀放的，这是胡说。这完全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康老插话：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要分析一下，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是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康老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同志保李葆华压八·二七，许世友同志提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看全部的传单，有些传单是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普同志是“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骂进去了，而且把我也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嘛！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啦！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人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那里象个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有一股风嘛，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去调查，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知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最后，我给文凤来同志打了电话，北京给军事院校也是打了电话的。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查组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个帐，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希

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铁路局系统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讲南京的大联合：

姚文元谈斗私、批修：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江苏红总方面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刘锦平接见南京八·二七方面的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刘锦平接见江苏工总勤务组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接见南京促联方面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刘锦平在省军管会委员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五”指示就是标准，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落实到江苏的几条。按“三·五”指示，都应做自我批评。

（南京）军区有（南京）军区的账，省军区有省军区的账，廿七军有廿七军的账。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标准，搞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张春桥接见第二十七军首长谈无锡文化大革命

（一）对部队加强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张春桥说：“你们二月份取缔革命组织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犯了错误，部队转过来不容易，现在“626”、“主力军”来了，对部队要多进行教育。

（二）作好工人队伍的工作，先使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张政委说：上海工人联合了，没有谁能影响他的。你们无论如何先把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可先把工代会搞起来。

（三）（提到革与保的问题）张政委说：革与保的关系是有这个问题的，但需要做历史分析。1.3 事件以前，两大派是在革或是保，在非常鲜明。1.3 事件基本上把保守派打垮了，后来造反派胜利了。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有些到造反派去了。情况就复杂了。每个大的组织，都有左中右，就是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也要保护群众，把坏人揪出来，我们要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

（四）（当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时）张政委说：你们可以多想一些办法，也可以学习山西省的办法，搞个政治协商会议。你们 27 军、空军炮九师、人武部和“九·二”、“主力军”、“626”等大小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定期开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先联合，不一定马上把所有旗帜倒下来，那是最后的理想，名字不一定马上取消，可以待下一步。如果大家都觉悟到了，取消更好。现在有许多地方，先基层联合，自下而上，一个车间，一个工厂，一个系统联合起来，成立工代会。以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方向，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大联合。现在先达成几条协议，作为联合的基础，纲领。

互相打起来都有死伤，打起来没有好拳，骂起来没有好言。是走资派挑动的，恨要恨走资派，要恨阶级敌人。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看清，主观上还以为是革命的，群众有些误伤，这样被打死了当然是可惜的。这场大革命，一点代价不付不可能。这次代价最小。江苏武斗是比较多的地方，上海就没有那么多。大家想一想，三年解放战争付出了多大代价！抗美援朝战争将近三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也要三个年头，我们能一点流血都没有？阶级斗争嘛！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嘛，我们内部也有阶级斗争反映嘛，免不了失手错打了人，有误伤。这种事要分成两类：一是打群架，打起来总会互有死伤。两派都打了，都不要怪对方。另一类是专门打人，用武器杀人，凶手，当然要抓起来交专政机关处理。暗杀更是那个了，

当然不行。活埋，一定有坏人在背后出坏主意，安徽就有，是阶级敌人插手。象你、我，会去活埋人吗？把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内部团结了，就找到出路了。现在，常州还在打，很紧张，铁路又不通了，沪宁铁路经常停车，上海、金华那边都通了就是常州这个关口过不去。我要向你们呼吁！今天请煤炭工业部，铁道部的同志也来了。现在淮南煤矿的煤运不去，你们那个关口过不去，影响上海冬季生产，影响整个五年计划。毛主席号召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你们要认真执行嘛！

康生讲话：

最近。我们接到云南的一个电报，报告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斗私批修，打掉派性，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以便促进大联合。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了有八条。这八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很好。我在这里向同志们介绍一下。第一，以势压人。就是以自己的力量压制别人。特别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人多的那一派要注意。我在青岛听到机车制造厂有人自我批评说“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就是说的以势压人。第二，唯我独左。就是我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他都是老保，以我为核心。这不是主席批评了吗，是最愚蠢的！第三，对干部你打我保，你保我打。反正从派性出发，（总理插话：这恐怕对你们有点写照吧！）第四，自己不作自我批评。讲是讲了，是叫人家作自我批评。第五，从派性出发，对干部也好，对群众也好，谁支持我，我就结合谁。是派性，不是毛主席路线。同我的意见一致的结合，不大一致的不想结合。第六，报复主义。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第七，学习毛主席著作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第八，对人家光看缺点，对自己只讲长处。这是比较普遍的。他们检讨这八条以后，原是按派系组织学习班，以后联合起来组织学习。这是云南一个地方（下关）的经验。主席看了很好，比较简明扼要地把派性，阻力检讨出来了，希望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时参考。

总理：刚才军区来的二十一位同志在门口要求接见，我们准你们进来了，但要告诉你们一条，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

（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 21 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

从这三个地方汇报看出来，也听出来了，协议定了，本来应该很好执行，但总是受到干扰。一个就是没有按系统联合，一个就是学生去干扰。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首先按系统联合起来，协议执行就有问题，只要一个学校干扰，就会影响工厂。

如工厂联合起来，就不会受干扰了。各省都是这样，江苏也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十一月十八日的号召，南大很快达成协议，提出退出工厂，但实际上这个协议没有实行。南大八·二七还到各县去串连嘛！上次说了，不要到工厂串连，也不要到各县串连，现在要停下来。一个学校不能包办。文化大革命开始串连是对的，那是起了带头作用，破旧立新嘛！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我们是忘不了的，在文化革命历史上要大书特书一笔。但是到了今年，情况不同了，夺走资派的权，应该以工人为首了，上海就带了头嘛！如果运动的领导者是学生，就不稳定，就会摇摆，最容易受社会思潮影响，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派性发作，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江苏之所以拖到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的很清楚。南大协议，首先达成，希望南京大学做个表率，协议要执行嘛！你们是受过压制的，你们回去，你们的贡献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和你们都个别的谈过嘛，如果把手伸得很长，又要管工厂，又要管各县，就象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北师大等五大院校要管全国，手伸得很长，结果自己管不了自己，还得收回来。

常州应该把协议修改好，戚墅堰铁路机车车辆厂与地方分开，单独搞个协议，树立个样板。扬州工人虽少，但总比学生多，不要被学生支配。师范学院你们叫鲁迅大学也好，都要复课闹革命，建立红代会，职工搞工代会，农村搞农代会，按照中央十月十七日通知，按系统大联合，不要去干涉地方上的事情，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纲，特别是要斗私批修。

我希望今年年内解决，南京也好，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也好，都要做出榜样来，那能拖这么长的时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嘛！军队一定要把军管搞好，铁路，交通都要实行军管。港务局无论如何要军管。如果你们认为军管有的人不行，我们可以换人嘛！但你们一定要服从军管。军管会的威信一定要树立起来。毛主席，林副主席派的人，权威一定要树立起来。一定要把军管会的权威树立起来。明天我再找部队少数人谈谈，军管会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没有军管会这个桥梁怎么行？！

铁路交通系统要脱钩。但你们笼统的提脱钩也不行，还是要工人阶级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觉悟起来，组织起来。铁路系统，交通系统要脱，各地工人要联合起来，多数的要欢迎少数的，象解放军欢迎新战士一样欢迎他们回去。因为都是阶级兄

弟嘛！有缺点各自作自我批评嘛！简单的说脱钩，不那么容易，要达成几条协议。订协议要双方都能做到，不是用对自己有利的去压另一派。铁路系统的人到铁道部，交通系统的到交通部去谈，我同意，可暂时住西苑。脱钩要积极脱，要有几条协议保证，谈好再离开代表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希望南京大学各派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

目前，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应该立即回到本校去，根据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所阐明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复课闹革命。要认真学习 and 确实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校的斗、批、改。

要以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实际行动，来推动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的讲话

康老说：关于镇江问题，由李作鹏等同志同南京军区的同志共同来帮助解决。镇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很坦率地讲，你们那个地方两大派由于派性发展，社会上的派性影响到部队。部队意见不一致，军队的派性也影响到地方。因此，中央很关心江苏省的问题，镇江是江苏省的一个重要城市罗。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国务院，中央文革给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贺电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许世友在南京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许世友：

今天大家谈的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在用脑考虑问题。不像过去没有敢把大家放在一起，大家都虚心了。自从上次和大家见面后，我就没有管过事。杜方平、高小平是坏蛋，是黑手就应该斗，一切责任要向黑手，是他们在搞鬼的。同志们对以后想了很多，怎么办？这些意见都很好，成立革委会要很好学习上海，特别是报纸，《文汇报》跟中央跟得很紧，我只看《文汇报》，《解放日报》只发了30万份，《文汇报》发了60万份还不够。江苏南京的问题要搞好，关键在头头，你们说要搞好就搞好了，你们说要搞坏就搞坏了。抓黑手、抓坏人一定要自己搞

自己的，自己清理自己的组织，否则就要乱。上海的经验你们要很好的学习，我们虽然比上海推迟了一年，但也有好处，经验教训要多一些。红总方面受了杜方平的骗，八·二七就没有受高啸平的骗吗？现在要向前看，要顾全大局。军管会要硬一些，对一些坏人、杀人的、破坏的、强奸妇女的，该抓则抓，该捉则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复，因为你们的联合就是敌人的完蛋，敌人是不甘心的，干部问题应该联系调查，这样好，干部解放要联合解放，坏人也要联合审查，现在干部要照顾到整体，要有全局观念，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应该是国家的，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山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否则你们的山头一下子也搞不好，红军也有山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一定要照顾到大局。对南京的问题我一直不管，生病去了，今天我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今天的气氛很好，你们派性少了就好了，群众是要跟毛主席的，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群众就会把你们抛掉，你们不能掉在群众后面，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曾邦元同志反映现在有骄傲自满情绪，有什么骄傲，现在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抛掉，有派性，组织上联合起来实际上并没有联合。现在还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一定要打倒，它是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的，有无政府主义的人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一切他自己说了算。上海把坏人拉出来，挂牌子，戴高帽子进行斗。这些人你不打击他，他就打击你。你们这些头头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有人暗杀你们的。军管会要大抓毛泽东思想学习，在组织上要抓好干部，对杜方平、高啸平的斗争，还是联合起来斗，这样比单独起来搞好，斗坏人不能联合还能联合起来组织政府吗？杜方平是前线指挥官，他与林杰有关系，杜方平后面还有杜方平。你们八·二七没有上高啸平的当吗？我看是上过当的。你们在北京四个月，我去过一个月，是住在主席那里，你们见不着。你们关心我的身体，老是自然发展规律。我今天讲的可能是主观主义，过去打，现在不打就算了吗？你们犯了一点错误，接受经验教训就行了吗？我们犯的错误比你们多。

四、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象我们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

许世友：

刚才姚文元同志读了主席，中央的批示，中央一系列指示，我们只有坚决照办，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我们活着做毛主席的人，死了做毛主席的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有人想搞什么鬼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我们就对他不客气，叫他人头落地，就和他干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江青：

我想讲一讲国际国内形势。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财政混乱状态。这就从上两个月英镑，美元贬值开始，黄金出现了两种价格。美元一贬值，就要囤积居奇，抢购物资，物价上涨，工厂倒闭，人民生活就要发生困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国内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势呢？我们国内货币稳定，人民的基本生活是稳定的，这在全世界还找不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众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讲这么两句一对比，就看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一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不同。帝国主义出现了二、三十年来没有的混乱。敌人混乱，对我们来说就是胜利！就是大好！

那么国际形势如此，国内形势也大好。江，浙是祖国富饶的省份，目前形势也大好。这在同志们今天的热烈情绪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不打不相识，到现在在一起成立革委会，不是形势大好吗？但是在大好形势下，敌人是不是就睡大觉呢？就不活动呢？不能这么说。也还是有曲折的，有某些反复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正常现象。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贯串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就是“左”倾，或叫极左，形左实右和右倾分裂主义，我们就是和他们不断进行斗争，不断前进的。在大好形势下，我提醒同志们，在目前来自敌人的干扰，右倾保守，分裂主义是主导，而不是形左实右，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表现。去年下半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退了形左实右以后，也可以说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的爪牙以后，右倾分裂主义苗头就开始了，到今年右倾分裂主义便大肆活动，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相当可观，表现在为“二月逆

流”翻案。同志们知道什么“二月逆流”吗？从前年冬到去年二月，蹦出来个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的干将。他跳出来把锋芒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搞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他和形左实右是一脉相承的。目前他们跳出来想翻案，我们藐视他们，要他们跳出来，不跳出来不好，你们说要不要让他们翻案？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叛徒。特别要点他的名，是因为我过去保过他，他在江、浙有一定市场的，我提醒同志们要警惕！去年春天他就在这里干不正当的勾当，利用他在新四军的关系活动，今天有重新告诉同志们的必要。另外，过去中央文革这个班子，就是刘，邓留下来的班子，个别坏人隐藏下来，干了些坏事，现在把他们揪出来了，不能再干扰了，他们利用这个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企图否定革命小将的功勋，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军队要不要把他们打倒！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动摇新生革命委员会。你们现在正在成立革委会，一个新生事物，缺点错误总是难免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不要上坏人的当去动摇她。这个新生事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提出，在革命的过程中，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要向他们进行斗争。同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我只讲这么一点，供同志们参考。

总理：

同志们，今天姚文元同志宣读的中央批示，很快得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向大家庆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鼓掌，口号）今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整装待发，急着回去开成立大会，这是一件大喜事。

刚才江青同志说的很对，我们首先应该从形势看问题。形势大好，世界一片大好，尤其是中国形势大好。敌人一片混乱，帝国主义金融，财政危机，赤字上升，通货膨胀，四十年来未闹过这样大的金融风潮。现代修正主义者开了一个二月黑会，报上也评论了，也是支离破碎，矛盾重重。帝、修、反在一起，美帝，苏修的指挥棒不灵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革命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我们要夺取全面胜利！（口号）兄弟的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支持下，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前后方配合得很好，仗打得很好，美帝、苏修日子更难过。现在中央批准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是第十八个，在中央等着批的还有四、五个省，

照这样，三、四月份二十九个省市基本上可以全部成立。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十九年前解放了，现在文化大革命又取得了辉煌胜利。从上海一月夺权，到现在江、浙两省成立革委会，全国人民是很高兴的，敌人是恐慌的。我们就是要敌人恐慌，美帝、苏修要捣乱，他们也要考虑考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如果他们冒险，就会彻底灭亡！

（江青同志领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谁要挑衅，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成立革委会，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要在江苏省革委会的领导下，首先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叛徒刘、邓、陶、彭、贺、彭、陆、罗、杨、谭震林以及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大批特批，批倒！批臭！（口号）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起来，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进行大批判，对广大的群众教育就更深刻了，就更好地推动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从这个关键问题着手，不要忘记当前形势。

第二，从去年冬天到今春斗争有反复。去年的“二月逆流”，他们想恢复旧秩序，经过半年斗争，批臭了，后来极左思潮，“五·一六”形左实右闹了几个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声号召，就击退了，钻进几个坏人，中央文革自己挂起来的，感谢中央文革劳苦功高的同志。极左批了，右的又来了，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总有一小撮兴风作浪。可以肯定，只要中央文革一声号召，马上他们就垮台。目前在北京街上可以看出这一小撮人在活动，搞右倾分裂主义，不会不影响到江、浙、上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是，反动的就要打倒。只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就能推进江苏各地、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对敌斗争。江，浙，安徽处东南前线，曾是蒋贼财阀统治地区，南京曾是国民党的巢穴。要有敌情观点，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间谍，都要提高警惕，他们要干扰，他们闹不起大事，但可以干扰我们。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对敌斗争眼睛就亮了，对敌斗争就会节节胜利。南京大军区，不仅管江苏，而且要管上海，浙江，安徽。江苏是东南重镇，很重要。所以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好好地进行斗争。

第三，批准的常委名单，没有批满，三十九位名额，只有二十八位，还空十一位。主任就是大家热烈欢迎的许世友同志，副主任七名，有可能多一些，有的省九名，十几名。副主任，还有十一位常委没补，军队、地方名额都未选齐，尤其是群众组织的代表，还没有选为副主任的。提议副主任改为若干名，另几名待补，究竟选几名由常委讨论，逐步充实，不要仓促定下来。浙江采取这个办法，江苏也可采取这个办法。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懂得大联合的重要性。人民解放军支左不支派，所谓支左不支派，是不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而要支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四，拥军爱民问题。这是毛主席所号召的，刚才江青同志说了，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九·五”江青同志对安徽讲话，以后又接见红卫兵讲了。根据毛主席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事物，要巩固加强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要在拥军爱民中表现出成绩。过去这方面有反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反面的，这种反复不仅过去有，今后还会有，这有好处，反复，取得经验教训。靠什么解决？林副主席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思想作为标准。拥军爱民要双方作，人民解放军最听话，犯了错误，一声令下，马上就改，改了就好。世界上那有这样好的军队！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才有这样举世无双的军队。这一点，江苏驻军，六十军，二十七军，一个去江南，一个去江北，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军种，兵种。犯了一点错误，改了，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最后，江苏已成立了革委会，上海要与浙江，江苏配合起来。生产要有煤，运输要畅通。农业生产去年增产，今年江苏麦情好，在座的几位女同志，都从公社来的，她们清楚。农业好，工业只要革委会抓，一抓就灵，江，浙工人阶级抓革命促生产一定能上去，把安徽带上去，在全国起作用。

康生：

江青同志讲，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极左思潮也要防止。实际上，形左实右，北京有，南京也有。现在有一小撮替“二月逆流”翻案，替“二月逆流”的头子谭震林翻案。要坚决打击他们，不让他们有任何活动。江青同志再三讲了，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毛主席最近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搞山头，搞

宗派，要搞全中国的大山头，要做革命派。革委会成立了，委员们千万不要带山头主义思想参加革委会，要当四千七百万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不是各派联合会。不管哪一派，哪一种山头，只要真正实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样的人就要相信，依靠。要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机构，有缺点要帮助改正，新生事物难免有缺点，不要认为这个人犯错误，动不动就打倒。这是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不是各派联合会，要好好地爱护，帮助。

周总理讲要拥军爱民，中央批示中也讲了，我几次对江苏讲话中讲过，我是共产党员，有义务为一些老同志讲好话，不管一小撮反许世友同志，我和许世友同志一起工作过，许世友同志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林副主席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今天证明我这个话没有错！同志们，错了没有？（众：没有。向许世友同志学习！向许世友同志致敬！）我不是说许世友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他是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品质，他有缺点错误就敢公开承认，就改，这点要向他学习。中央批示中说，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觉得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革委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保证的，他不会搞阴谋，不搞两面手法。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拥军爱民。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关于形势问题

第二、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第三、关于加强革命委员会建设问题

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尤太忠在镇江的讲话

五、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〇年四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一九七〇年八月，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五·一六”分子108人，点名“五·一六”248人，挂上“大名单”的“五·一六”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五·一六”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一九七一年一月，省五七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五·一六”的重任。

1971年省五七干校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五·一六”开始后陆续进来的。

1971年2月，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五·一六”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五·一六”。靠边审查，

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五·一六”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五·一六”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五·一六”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

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五·一六”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

放在南京钢铁厂的 60 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

1971 年 10 月，迟明堂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1971 年底，干校 3000 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 1600 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 400 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 80% 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一九七一年六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被打成“5·16”的占 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 55.5%，处级干部占 42%，一般干部占 30%。

1971 年 11 月，省级机关在职干部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 2400 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 70% 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 人中有 25 人打成“5·16”，其中有 8 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 43 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 64 名“留守人员”，有 39 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 60%，处室负责人占 62%，党支部委员占 80%，党员占 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 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 100 多人，

逼死 5 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 4 0 0 多人。有的科研单位 1 0 0 % 的科以上干部和 8 0 % 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工作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 9 7 2 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研究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 2 0 0 多人辛勤劳动，投资 5 0 0 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一九七一年十月，被南大一位被打成“5·16”骨干的人泄愤检举。江苏省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怀疑，一位被审查。

1 9 7 5 年 5 月 3 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 2 9 8 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 8 4 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 1 1 名。

一九七一年六至十月，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

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 2 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 3 9 0 0 多个、2 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 2 0 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 1 2 0 0 多场，收到举报材料 2 万多件。

4 个多月内就有 5 0 0 0 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 6 0 0 多人。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

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

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

1972年底，南京市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二年底，盐城地区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

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

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六、无锡市文革进程

（一）革命群众批判无锡市委路线错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由轻院631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

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无锡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全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辩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6.26”造反兵团，

一九六六年七月，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 XX 老师，XX 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无锡市第一中学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无锡市第一中学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无锡市第一中学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任，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 64 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无锡市第一中学校园内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无锡市第一中学，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 5.6 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

接着被几名工作组成员押进学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

一九六六年七月，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

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 6.26 造反兵团”

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

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

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

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

锡师：“8.18”

机床“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会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

“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多的压力，造了那么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全全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底，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

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1966年8月15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

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字跌进了深谷。

一九六六年九月某日，无锡市“拱北楼”面店的工人曹桂宝以“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在无锡市“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辩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

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势力。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 81 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

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一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卜岩等人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

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 XXX 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

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一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

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

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竟发展到十万之众。

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

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

“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

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

“亦工亦农；

“造反兵团；

“红色公安战士”；

“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

“红艺兵”等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无锡市陆渭文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

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全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

造反队与“红总”挂上了勾，随后，陆渭文被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红总司令卜岩在与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当面对郑挺说：

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

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无锡市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揪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宣布成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下午，无锡市工联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当”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派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6.26”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闻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

（二）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741”轮船会议。会议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二、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6.26”总部，由浦湘海主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在无锡市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无锡市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

(三)无锡驻军支左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无锡市人民欢欣鼓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无锡市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 1、2、3、号通告，前往 27 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在场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 4、5 人。

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

“741”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1022”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周 XX。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支左”部队宣布建材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抗议支左”部队宣布主力军一些基层组织为“反动组织”。

1967 年 2 月 16 日，以“6.26”为首的数万无锡红卫兵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事先得到了“支左”部队中的宣传处长王晏的警告，王晏说如果你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他们的头头在王晏的警告下屈服了。于是非但决定不参加游行，而且在行动上向支左部队倾斜，在以“6.26”为首的学生游行时，在大街上刷出了“6.26 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幅标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红总”方面集中了三、四千的主力军队伍，前面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紧跟着由“红总”宣传部负责人陆渭文扛着“红总”大旗在前领头开道，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驻军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全付武装的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数十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午，支左部队一个武装连包围了“红总”，由无锡市公安局配合宣布“红总”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当场逮捕了“红总”主要负责人金坤泉，江汛，周炳荣三人，把“红总”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堆集在一起拍成照片，把“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摊在桌上拍照，这些照片就是“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

一九六七年三月，尤太忠（27军军长）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会议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27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这一军队内部的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对无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周国彦、傅耀良等返回无锡，组织了“又来了”战斗队，无锡造反派又开始活动。一批以陆渭文为首的在公安局接受审查的“红总”工作人员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7.5造反团”贴出了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声明；贴出3天后，“红无锡报”仍无承认错误的动静。“7.5造反团”又派人去交涉，“红无锡报”仍不予理睬。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无锡市二中“7.5 造反团”的第一批数百名红卫兵去“红无锡报”门中静坐的队伍，在匡建中的带领下，抬着写有宪法条文的标语牌出发了。

当天下午，

二女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沈红军带领下参加到了静坐示威的行列；

市一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马金山的带领下支援了；

锡师“8.18”、八中“8.18”、二女中“红革会”、机床技校“4.15”、七中

“4.23”、“抗大红旗”、抗大财会战校由李福阳带队下进入静坐现场，

“农机红旗”等全市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起来声援，并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静坐的行列。

一批“6.26 兵团”的大学生，也到现场，

“九.一三”火箭造反司法部为中学红卫兵们的静坐示威维持秩序，防止外人破坏。

红卫兵们的战旗一面面地增添，他们的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

当天晚上，经过参加静坐的全体红卫兵的代表讨论，决定除了继续静坐以外，自愿以绝食抗议的形式强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卫兵们不顾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寒风，静坐绝食；

从第二天开始，队伍中已经不断地出现有人昏迷倒地，但清醒着的人仍旧坚持斗争。

4 月底，静坐绝食仍在进行着。这时候，随着北京反“二月逆流”斗争的形势的明瞭，在 27 军干部内部对红卫兵静坐绝食的看法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表面上是以军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为一方、以宣传处长王晏为代表的另一方）。

由于受到北京政治形势的转折和地方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27 军委派了作战处的解经伦处长出面与学生代表匡建中进行了谈判。由于绝食，谈判前匡建中已经接近昏迷。在接受注射了一支葡萄糖盐水后，匡建中向解处长阐明了学生尊重部队，同时又要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的意见。经过两次谈判，解处长代表军管会承认了“红无锡报”在前阶段批判“6.26”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性错

误”。谈判结束后，由各参加静坐绝食的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宣布静坐绝食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几千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喜悦的心情红卫兵，返回了各自的学校和家庭。这次静坐绝食胜利结束后，静坐绝食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加上“6.26兵团”，开始组建无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以此代替因被“二月逆流”的打击而自行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驻军支左人员王晏找到了无锡机床厂主力军人员周锡林，在学生中找到了“无锡抗大一机校”的邹海根，树起“十三系统”（按行业划分）的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支左部队决定为“红总”平反，在狱中放出了金坤泉，周炳荣二人。江汛于67年8月出狱，金坤泉等人的出狱后，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

在红总平反前，第四届红总中心组调整由金坤泉（挂名），陆渭文，殷松勤（党员），陈书刚（轻院老工人党员），章传贤（党员市劳模）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发生“火烧”小延事件，“六派”学生向“九派”学生发起进攻。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在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了十万人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

上午九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次平反大会的主力军群众们喜气洋洋，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旗飘扬，几个月来放在口袋里的主力军的红袖套，从新套上自己的左臂。

陆渭文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上由“6.26”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由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代表众多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台作祝贺词，在十多位代表发言之后，会议宣布结束。

经过了这段曲折，无锡地区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部自动倒旗，全部同意称主力军，在这时“红总”的内部组织作了明确的调整，“红总”下属十二个兵团。

一兵团，（建筑兵团）下面还有辖管的小兵团。

二兵团，（财贸兵团）

三兵团，（纺织兵团）

四兵团，（重工兵团）

五兵团，（轻化玻陶兵团）

六兵团，（交通运输）

七兵团，（轻工兵团）

八兵团，（塑料系统）

铁道兵团，（无锡火车站）

电讯兵团，（电讯系统）

邮电兵团，（邮电系统）

市机关兵团，（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主力军队伍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估计在 20 万左右。

此时，支左部队支持的“十三系统”改名为“九、二革命串联会”（简称“九、二”）。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派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陆渭文任“总指挥”，徐志纯，浦湘海为“付指挥”。

在轻院内让十二位旧市委常委们同“革派联总”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互相揭发当时旧市委所执行“资反路线”，会议进行了三天。

第四天晚上在三阳街头，公开斗批十二位常委，向全市人民公开汇报斗批当权派的实况，同时还表示了“革派联总”方面企求让这些常委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亮相，取得全市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谅解，时局一步步地在向有利于“六派”方面发展。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九派”学生向“六派”学生进攻，在中途六派学生得到了主力军一兵团的拔刀相助使“九派”学生在砖头瓦片下头破血流的败走。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九、二’总部见‘红总’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反而把九个市常委藏起来，觉得‘红总’太有点猖狂了，立即决定进入战备状态。

(1)，成立武斗指挥部，聘请五位高级参谋，一位是军队转业英雄团团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团参谋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坦克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师政治部主任。

(2)，挑选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四个基干团，担任应急任务。

(3)，选准‘红总’主力队伍，给予狠狠打击，以示警告。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晚，西门桥附近又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拥挤，这天正好“红总”有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值班，得悉在西门桥地区发生武斗，情况不明，这时由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陈等人因对情况不明，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没有派队伍去增援，作出决定，明天（6月20日）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目标是去军管会请求军方制止武斗的发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管会办公所在地——无锡饭店时，竟发现军管会人去楼空。

主力军建筑兵团受“九、二”攻击，同时“九、二”武斗队伍已包围轻院

“6.26”，陆在人民路段得到二个消息，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赶奔建筑兵团所在地救援，自己亲自率领500名左右的队伍赶奔轻院前去“解围”，以声势逼退了“九、二”队伍。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体育场桥发生二派冲突，“六派”派出队伍增援，“九派”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在这次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可能是暴露了身份，结果被“九、二”一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对准这名“六派”群众，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这名“九、二”人员在文革后期被判刑）。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由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学生（锡印九、一九）去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一批向古巴出口斩甘榨用的古巴刀，领头去抢刀的学生陈 X（文革后期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上，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头挤挤，大部分人是在马路二旁看热闹，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这时有七、八个十多岁小孩子，他们自称为“红小鬼”，人们说他们懂事吧？不见得。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吧也并不一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可能认为“主力军”好“九、二”不好的“六派”观点，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思想感染，所以才会称自己是“红小鬼”，这批“红小鬼”突然大胆妄为，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他们与“二、八”公社的敌对行动立即受到“二、八”公社内“九、二”的驱赶。

“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这次事件的结果“九、二”留下了 9 条死尸。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由无锡化工学校的几个学生，在荣院边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里面投掷，引起双方互为砖头石块的掷投战，以后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开了头，血流满面。

下午 4.5 点钟，由“小猛虎”队出动对付荣院的“九、二”，接着又从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在这辆消防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 14 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九、二”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二”方的俘虏。这个 14 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在荒野。

下午 5 点多钟，在荣院内开出二辆“铁甲车”，前面一辆铁甲车在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并且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已逃之夭夭，周围围满了主力军的群众，陆见状就呼叫众人，赶快抢救，围观的人告诉陆“来不及了”，据说，车子被卡停后，立即起火，外面的人高喊：

“缴枪不杀”。在车厢开处，先由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杀出来，这第一个冲杀出来的“九、二”被人一刀砍伤，掷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命不肯出来。待到第二天早上，火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主力军所救外，无一生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晚，“九、二”武装冲进轻院校内，对留守学校的少量学生发起攻击，烧去了校内的大字报棚，无伤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在国棉二厂内二、三千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到达南京。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南京军区一位主持工作的领导，指示尤太忠（军长）马杰（政委）吴戈华（政治部主任）三人到南京 A、B 大楼，解决 27 军‘支左’的问题。

尤太忠，马杰决定带王晏参加……”时间不到十一点钟，一位秘书带他们四个人进了 B 楼，上了二楼会议室，还有十几个人都已经等在那里。

那位领导说：今天请你们 27 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象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吴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

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 27 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

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的？

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

领导不太高兴地说：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十五师，炮九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你们 27 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了。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绉绉的说，你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吴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吴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出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吴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军党委常委会是在军机关会议室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王铤，徐学忠，吴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 1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
- 2 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 3 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吴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

（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象话，要重新写。（2）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吴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二”。（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 27 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尤太忠意见的人请举手。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吴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到指挥部。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并将他们带到他们“外人不准进入”的办公室内，介绍了有镇江 252 部队李德康等俩人认识，同时在场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

李德康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后说：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蹲在南京，总要想办法逐步向本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镇江群众组织）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

陆、浦、梁三人对李德康的承意表示了感谢。

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院的枪抢了，带走。

陆渭文，浦湘海问：“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李回答：今天下午你们行动时可以由“屁派”军人派人给你们带路。

军院的人详细地介绍了仓库位置的大概方向。抢枪主要是仓库里的枪，仓库保管员，也是他们的人。

这次商议结束，李德康从他们的小挎包内拿出了二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

陆、浦俩人回到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各兵团头头，指挥部警卫班（游击兵团）“6.20”部队（原小猛虎队改名）等人。陆渭文把任务布置完毕。

中午饭后，12 点半开始，先由“游击兵团”的人走到由哨兵站岗的大院门口，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后将哨兵抱住，夺下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哨兵解决后，才由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进武器仓库，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没有弹药）尽数地搬了出来，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所以品种上从 18 世纪的本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结束。

这时 252 部队的李德康提出了改变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立即通知镇江 252 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宁的主力军全数当夜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

陆渭文带二、三十人留守南京三天，亦去镇江。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 27 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二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坑道口在一个大山的岙里，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 0 师的一个步兵排。”

这天上午 7 点钟，邹海根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周锡林带无锡柴油机校造反派

‘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邹海根，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来了，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

邹海根说：“没有。”

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二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毫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1018”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苏州踢派与支派的武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苏州由 27 军 79 师支左）踢派又面临被打出苏州的危局，踢派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上海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主力军分指挥部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出武装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一百人左右取名为

“7.22”部队随上海分指挥部来人奔赴姑苏城，从此随这支“7.22”部队之后，大批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帮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找到了陆渭文，并当面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刘锦平为首的中央文革“无锡问题调查组”来到江苏，并通知“六派”“九派”双方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

陆渭文接到通知之后，留守在洛社待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深夜，由“九派”的武装人员从河对岸泅渡到皋桥，将“飞虎警卫团”放哨的芦洪生捉过去，以后将芦洪生装进麻袋后活活打死。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深夜，一支“九、二”武装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五兵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方面击毙，主力军方面，五兵团头头蒋群，身中对方一梭子子弹而死亡。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九、二”一个东片武装连私自行动，偷袭东北塘主力军，“九、二”前哨一个班由连长徐耀富带领，在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由七兵团头头华仁良，李伏阳，许万祥等四人出门巡哨，在黑暗中相距不过 10 公尺左右，当华仁良发向口令时，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内的名字，华仁良误为自己人，准备上前握手之际，对方发出“叭叭”二声枪声，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当时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华仁良身边的其他人迅速伏地，身边的警卫员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将“九、二”连长徐耀富当场击毙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亦击中徐耀富身后的二名机枪手，二名机枪手受伤倒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九、二”方面既对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故在主力军的包围中俘虏“九、二”武装 13 人，“九、二”出动的一个班一死两伤俘 13 人全军覆没。

一夜激战之后，由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主力军的增兵，吓住了潜伏在模具厂的其他“九、二”武装，东北塘发生夜战和七兵团头头胡仁良，陆志良牺牲的消息，于 9 月 14 日早晨，通过电话传到了设在洛社师范的前指挥部。

由于洛社”9.6”事件，”9.9”事件的发生，陆渭文与副总指挥徐志纯商议，准备将驻守在张村，东北塘的七兵团队伍调回洛社，当时徐志纯的意见，因陆渭文要照顾全局，还是由他去张村传达指挥部决定，于是，徐志纯带领一个警卫班和七兵团头头金浩良从 9 月 13 日出发前往张村，巧遇”9.13 事件发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并执行指挥部决定，将该地区队伍全数撤往洛社地区。在 9.13 事件中主力军撤离东北塘，这时由主力军内部有二名队员，一叫李介明，一叫王耀坤，处于气愤，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对二名受伤的“九、二”“叭叭”二枪，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这二人在运动后期被判处“无期徒刑”。（王耀坤现已减刑出狱，李介明死于狱中）。

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挡，立即端起手中枪，在半自动步枪上推上刺刀，子弹呼拉一声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带领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 3 百多人迅速撤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清晨 6 点左右，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清脆的枪声，陆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陆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九、二”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九、二”队伍，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支“九、二”约二百人左右的精锐队伍是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的，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一个班由于不是正规的军人出身，遇上这支“九、二”队伍之后，心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立即撤离阵地，结果另外二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活捉，所以“九、二”武装能顺利进入洛社直扑“指挥部”，“九、二”武装开枪击中宣传组负责人 XXX，XXX 中弹倒地，无人救治，后因流血过多死亡，一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混出造纸厂，其余数人被抓。

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陆渭文自己带着中路 10 多人进入离洛社桥约 50 米处的一片桑树地里，伏地观望，眼看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二”抢占，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等高地与“九、二”隔河枪战，机枪、冲锋“嗒嗒嗒……”的对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主力军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下来。

大约到 9 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三公里处的石塘湾亦是枪声大作，“九、二”的水陆二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6.20”部队进攻。

陆渭文在洛社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在陆身边的二名参谋，周梅泉，邱旭东（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是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文革后期被“九、二”打瞎一只眼睛，而精神失常）向陆渭文提出建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九、二’有十倍以上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不能硬拚，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石塘湾“6.20”立即撤出战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亦已赶到，陆命令队伍亦向玉祁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立即组织了一支 60 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传达了陆的命令后才阻止，徐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徐告诉彭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祁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 10 点多钟这时正好有洛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 2.3 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这时才使主力军在铁路边的农民村巷上喝上一碗稀粥。到 11 点钟将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

“9.15”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结集，从 9 月 1 日起到 9 月 15 日半个月的时间内武斗这个恶魔夺去了 20 多位主力军年轻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无锡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 9 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

“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

“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

部队的代表：27 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

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 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两派代表从 9 月 26 日离开江苏去北京“谈判”达三个月之久，于 68 年 1 月 28 日返回无锡。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于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五日，在镇江的主力军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下午，陆渭文离开无锡，“九、二”包围老轻院，“九、二”武装发起冲击将老轻院后面围墙打破，企图冲进轻院，“九、二”邮电局职工，万常培头戴钢盔，手执长矛，试图在围墙的缺口处冲进轻院，正好被主力军

中的王建昌，手中私藏的卡壳枪横向放出一枪，“碰”的一声，正好击中万常培的钢盔，脑袋开花，倒地毙命。（王建昌到文革后期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这次老轻院被围 36 小时之久。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陆渭文在轻院内组织了近三百名群众，列队护送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回厂。当陆渭文亲自带队走出老轻院大门口，巧遇了弹丝一厂主力军头头王炳贤，王对陆说：“老陆，你是总头头，家里事多，国棉三厂还是我替你去吧。”陆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这支队伍就由王炳贤带头前往，队伍刚进国棉三厂厂门，外面“九、二”武斗据点里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进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全部被包围活捉。代替陆渭文进厂的王炳贤被抓去后，被“九、二”人员用外表包着橡胶的铁棍猛击头部，无外伤而使头颅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四）无锡市革委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无锡市革命委员会在无锡市体育场宣告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很快就在全市城乡刮起了一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其正式名称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建立各级“群众专政”机构。市里有“群专办”，区局或党委级大单位也有“群专办”以领导“红色台风”。而中小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则建立“群专队”、“群专组”。另外“旧公检法”尚未完成“斗、批、改”没有“彻底砸烂”，所以只能“配合运动”，而另外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后改名为无锡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下面有十个建制连队的“工人纠察队”，下属各连分别以数字序列授番号，如“工纠一连”“工纠二连”……）分驻全市各处要津。总指挥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另外在“工宣队”里也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队员“结合斗、批、改，投入清队运动”。

由于在建立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和无锡驻军中主要的“支左部队”关系密切的“九二革命串联会”一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工人宣传队”和各级“工纠队”，特别是各级“群众专政”和“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清队”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成了是以“清派”为主体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无锡报》评论员文章《掀起一场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

。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四名原市委常委，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无锡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挂着牌子，涂黑了双手，由用长矛等冷兵器全副武装的“工纠队”押上卡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游示众。然后各级各单位一齐动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各式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也被“群众专政”揪出来斗批游街和关押刑讯。

一时间市中心的人民路和中山路，天天都被挂着大牌子的“老牛队”（即所谓“牛鬼蛇神”），和手持棍棒或细竹鞭押解他们的“群专队”充斥街衢。斥骂声和呻吟声不绝于耳。

原蓬帆厂厂长丁国荣，是小皮匠出身，在五十年代被提拔为干部。“文革”前夕调任蓬帆厂厂长。因其为人宽厚清正，勤於职守。且经审查政治经济生活均无任何问题。两派群众一致同意其参加筹建中的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正待厂革会成立即上任时。突然被原单位揪了回去。原来几年前，丁国荣在家中杀了一只鸡招待老同事。此事被打成了“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丁国荣被揪回去第二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畏罪自杀”。死人无法斗批，就做个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裳匆匆开了个斗批大会了事。事后证明这个“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纯系子虚乌有。

年及七旬的原市委委员，在抗战初期毁家纾难率众投奔陈毅元帅的季恺老人。他被挂着“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的大牌子，站在市中心手工业大楼（现商业大厦）前广场上示众。

工商业者沈渊如先生，是我国著名兰花专家，号称“兰王”。酷爱兰花的朱德元帅每次来无锡视察，百忙中往往抽空和沈渊如切磋兰花，互赠兰花和兰艺书籍。六八年刮起一阵“揪朱德”风潮时，沈渊如被从省里来的专案人员和无锡地方当局抓起来，要这个七旬老者交代朱德元帅来无锡时和他一起搞了什么“阴谋活动”。沈渊如被“群众专政组”吊起来一顿死打。当即老人就完全瘫痪，不能说话了。

接着，运动就把矛头对准了“革派联总”（即原“主力军”一派）方面的成员。以“坏分子”、“假造反真保皇”、“打着红旗反红旗”、“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特务”“阴谋复辟”等等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

（五）陆渭文等成立“反复辟指挥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台风”越刮越盛，部分市革会委员和一些群众提出质疑，反被斥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干扰破坏运动”。有部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原“革派联总”人员，只能采用“非组织手段”在郊区一条小河的船上秘密商谈抵制“红色台风”措施。商量了一夜还是一筹莫展，只得草草散去。可是这个幼稚的举动竟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并由市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参谋强迫“红无锡报”美术编辑陆廷栋等人绘制所谓《暴动方案示意地图》。陆廷栋等人明知是捏造，在淫威之下不得不画，因此他们不肯认真绘制，只是含糊应付草草画就。那位参谋大为不满，就自行按军事地图规格炮制了一张《暴动方案地图》，作为“罪证”刊登在《无锡九二报》上。与此同时，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夜，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 10 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

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

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 5.9 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原“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

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陆渭文再次召集会议。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 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 10 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断然拒绝。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同日，陆渭文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

陆、匡、陶三人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 3 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

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

匡建中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

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

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口号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

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常熟市的每个角落，苏南地区……

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 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

全市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场“彻底粉碎反革命暴动阴谋的人民战争！”。

全市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被关押拷打，被迫逃亡他乡。

未及逃脱者，被揪斗后打入“老牛队”长达数月。

这个所谓的“五月暴动”案，在两年后又被当局捡起来作为“无锡五一六十大阴谋罪案”之一。

一九六八年十月，丁可南等人去武汉等地试探的人员返回济南集中后，无锡主力军在济南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朱砚龙，殷松勤，丁可南等在济南郊区，“千佛山”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听取了丁可南等赴武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会议认为：“我们逼走济南，离开无锡越来

越远，但仍要加强与本地群众的联系，要派出小队人员进入靠近江苏，无锡地区开辟新的联络点，到无锡发传单等。

会议之后，即派出戴国荣，张永康等人进入连云港等地区开辟新点，这时的无锡外流人员心中唯一的希望是祈求着争取中央对苏南地区的“表态”。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由于常州主力军内部发生争吵，山东负责管理这帮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出面驱赶常州主力军数十人离开济南，双方发生冲突。陆渭文为维护常州主力军人员的利益卷进了这场小小的冲突，结果常州主力军在第二天被迫离开济南，陆渭文被山东“文攻武卫”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了起来，关押十多天后，陆渭文亦被“驱逐出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陆渭文召开韩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由陆渭文，匡建中，朱砚龙，殷松勤等十多人，在韩庄养路工区召开，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无锡文革初期，卜岩写的“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作了历史的评价。朱砚龙提出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匡建中提出了“怎样提出我们今后的口号”，“口号”好比是一面高举的旗子，可以起到号召群众如何去奋斗的作用，会上听取了戴国荣等人在连云港地区的工作汇报，会议进行了一天时间。会议结束，匡建中等人仍然返回济南。

一九六九年四月，江苏省革会与山东省革会取得联系之后，由无锡市革委会派员要将济南的无锡主力军人员接回无锡，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晚上，陆渭文和匡建中被驻浙江的解放军送到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靠近宜兴），交给了驻无锡市的解放军。

陆渭文回到无锡后，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多。

（六）无锡市革委会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〇年春天，无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一九七〇年九月，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到正规的监狱中去，名义是“拘留审查”。

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 18 只大监房，16 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囚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

陆渭文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 70 年 20 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

许世友说，“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 67 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上午九点过后，看守俞天杰喊：“‘013’出来。”陆渭文走进审讯室，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说：“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70 年 20 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

“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徐世忠说：“好，如果今后查出你是‘5.16’时，新帐旧账一起算。”

陆渭文否定了自己不是“5.16”，但全市列出的“5.16”十大罪状还得交待，在这“十大罪状”中陆渭文是直接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的，占了“八大罪状”。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1）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

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 1022 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二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

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刺激”的口号，无非是“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这两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

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又把这事定为“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并把这件事的参与者、组织者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2) 《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当时，军管会已经承认错误，这时又把这件事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3) 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及待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在这件事上，最多是是两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军管会至少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这时，却把它定为《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之一。

(4) “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二”派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查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夺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这些武斗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5) 火烧装甲汽车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一路上向人群作S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这个事件也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进行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6) 七月三日大撤退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革派联总”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这个行动却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7) 洛社武斗

一九六七年七月，“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

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篡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8) 夏季阴谋

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

此“大案”追查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

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

(9) 五月暴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

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10) 流亡政府

一九六八年五月，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锡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

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此外，还有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

该“要案”即指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出，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

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

在围绕上述事件追查过程中，发生许多严刑逼供的事，如：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 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 xxx 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 xx 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自七一年一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于喷血身亡；

陆渭文的妻子张 xx 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河；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 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 xx 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逍遥派”。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 xx 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七四年底仍可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机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铃医生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还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据查；

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

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

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竟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一九七四年，由于民愤太大，市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

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籍，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

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

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七）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一年十月，无锡当局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情”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彪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

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有关当局说：

“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一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

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

一九七二年初，王晏等又放出风来，说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象；次日天一亮，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

继续“深挖”的需要，又开始对九二派下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甚至于，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也因是“九二高参团”成员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一九七三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初，专政机关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象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

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

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

王晏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蹊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一九七四年初，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们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

王晏等人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他说：“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

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

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王晏、张文治等人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

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

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

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问题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某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关于陆渭文、匡建中问题的对话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

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

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市委领导人召开各种会议，说：“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

“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还社会上放出一股风，说：“……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一九七四年五月，沈静园教授和某人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

问：“x 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误会。x 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 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 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问：x 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負責任？”

答：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基层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 xxx 同志进行审查，现已核查清楚 xxx 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

有的还加上：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各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并且说：“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地方还正式规定：“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

然后一阵风发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 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and 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 x 年 x 月 x 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有人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帽子。

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

一九七五年，匡建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

一九七五年冬天，由看守所干部出面找陆渭文进行了一次试探性地谈话。

看守所的干部问：“陆渭文你承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陆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既然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何来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七六年四月，陆渭文被送到四面是水的北堵农场去“恢复一下身体”。

（八）十月政变后对革命群众的镇压

一九七九年三月，陆渭文“无罪释放”。（与苏金坤两人同时释放）。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陆渭文，袁达洪自一九八另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污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一次和平演变”，我国是“封建专制主义”；恶毒诽谤党的中央领导。“寄希望 X 的死”，妄想变天，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等。

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被告人陆渭文伙同丁 XX 以帮助社队办厂为名，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

判处被告人陆渭文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被告人袁达洪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无锡市中院驳回通知书》

陆渭文：

你不服本院[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判决的申诉悉。

现经复查认为：原判决认定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和量刑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你提出“原判决定性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苏省高院驳回通知书》

陆渭文：

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84]锡中法刑字第 26 号刑事判决不服，以事实有出入等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证实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原判决认定你与袁达洪自 1980 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密谋潜逃苏联、台湾后窜至福建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以上犯罪事实有你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你申诉中否认犯罪事实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特此通知。

二 00 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陆渭文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陆渭文，男，67 岁，汉族，江苏常熟市人，高中文化，原无锡市铸造厂工人，现无正常职业，现在住址是，无锡市江海新村 15 号 202 室，邮编是 214026，电话号码是 8292153

申诉事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84]锡中刑事第 26 号刑事判决书[附件]认定本人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本人表示不服。于 1992 年曾向无锡市中院提出申诉，92 年 8 月由无锡市中院“予以驳回”[附件]

于 1997 年曾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直至 98 年 12 月“予以驳回”经办人于法官[女][附件]

本人对以上两次驳回仍表示不服，

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以权代法，野蛮硬判。原判决，罪名内容，五句言论，“一个企图”。

所谓“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我国是封建主义专政”，“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与当时原话有原则的不符；“一次政变”，“寄希望 x 的死”这两句与本人无关。

所谓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是故意捏造，陷害。在庭审时，公诉人拒绝当庭出示证据，证词[以上庭审记录在案]

所谓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并无此事[由同行人士丁可南作证]

无锡市中院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

本人在 82 年左右，与袁达洪，李伏阳，二，三人，闲谈的地点在袁达洪家中，方式是茶余饭后，观看电视节目时，言论内容中，从未谈到不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不好。这样归纳：A，主观上从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目的。B，并无故意宣传煽动。C，即使是有错误观点，并无向社会扩散，不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行为。按《刑法》规定就不构成犯罪。

历朝历代，衙门审案，只有屈打成招，而从来没有不要当事人承认，不听当事人申辩，不要证据或与证人对质，而判处刑罚的。

二，1992 年，本人接无锡中院“驳回通知书”时，[经办人一男一女]说，你的事表面上是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现在还是党的一元化理领导。。。，本人当时完全谅解中院及经办人的为难之处。但足见是，“以权代法”的司法不公。

三，1998 年 11 月，由江苏省高院经办人于法官[女]俩人在无锡三凤楼饭店房间内找本人谈话，内容，A，从现在看你的言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了的。B，判你的刑是根据他人的揭发材料。C，你的案子是省，市委共同定的案。

本人当时就表示不服，理由：

- 1，本人并不要求用现在的法律来处理我过去的问题。
- 2，在省高院的复查中仍然是偏听偏信，当时的所谓揭发材料，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记忆，有人因诱供交代问题，有人为立功交代问题，对待言论的回忆，以谁为准？

四，如此简单的案情，当事人申诉 20 年，而不给平反纠错，问题的结症所在，恐怕省高院还是不敢推翻省，市委作过的决定。经办人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如果这样，要法律何用？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句空话。

要求，请求省高院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本案再次复查，纠正这一冤案。希望，不要让国际社会笑话，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居然一个普通老百姓，因为在家中私下里议论了有关政治的话和到福建厦门在鼓浪屿上出于好奇想看看金门岛而就成了反革命，吃了五年官司。至今当事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人权何在？

今年年初本人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几日后答复曰，该案已多次书面答复作出处理，今后不再受理，来信也不再回复。即将此申诉打入死牢。当事人实难瞑目，充分相信法院乃人民法院之心不死，苦心等待。

近日，又闻肖扬院长之声，”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有错难纠，甚至有错不纠，则不仅使公民权利一旦受损再无从恢复，而且严重者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再审作为给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难以撞开的墙。司法的权威正来自于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此语当能为我的申诉起死回生。一言九鼎，掷地有声。

谢谢，谢谢！

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申诉人陆渭文上

2004. 10. 28.

七、苏州陆兰秀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最初，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她多次向毛泽东、林彪上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但马上招来地方当局的打击。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陆兰秀写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来看，她只是反对把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还没有走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直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地步。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陆兰秀写了二十来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她说：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

“对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的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

“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从国庆二十周年以来，我所写二十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使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份，使够偿还。”

“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陆兰秀被处以极刑。

一九七八年，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苏州市委为陆兰秀平反。

一九八二年，中共江苏省委又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在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

一九九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心血》。

二〇〇一年，《陆兰秀狱中遗文》，由丁群编著，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包括了陆兰秀在狱中的全部日记、文章和审讯记录。

贰、本节简论

江苏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资料，收集不多，而且一九六八年后就没有了，难窥全貌。好在它的一个地区——无锡市提供了较多的资料，使人们对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能有更多的了解。

一、文革初期，江苏省委执行错误路线，主要责任人是许家屯。十月政变后，他得到重用，被派往香港担任新华分社的负责人。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后，叛逃美国。

二、江苏省的一月夺权，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一派夺权，排斥异己。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南京市有 10 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 330 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一九六七年三月，江苏省实行军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后，两派武斗越来越升级。

七月，江苏军管会，无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

无锡主力军约四千多人被打出来了，从无锡退到南京。江苏省还有许多人跑到上海。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中央直接出面干涉，还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到江苏省督促检查。一直到十一月，各派之间陆续达成了一些协议，如《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关于南京大学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扬州两派达成协议、南通达成了一个大联合协议、无锡双方搞了一个重申十四条，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常州也达成制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等等。但为了一些支节问题又争论不休，协议很难落实。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才基本解决问题。

三、一九六八年三月中央批准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情况说明，省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又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四、无锡市提供的资料说明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的若干情况

1，一九六八年无锡市成立革委会后，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是按照中央统一布置进行的。但执行中有扩大化倾向。加之，当权人物中原本就有压一派的问题，而“老造反”中社会成分比较复杂，违规违纪的现象较多，很容易形成把矛头对准造反派的局面。

2，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造反派的带头人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仍然采取对待“旧机构”的态度来对待“新机构”，组织所谓“反复辟指挥部”，企图以武力进行对抗。这样的作法，是与中央的战略部署相违背的，不可能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是，地方的当权派利用一打三反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则是完全错误的。

3，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无锡地方党委按照中央一九七〇年中发第二十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发第十三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进行了清查“五·一六”的工作。

在此期间，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了林彪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 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这一段时间，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无锡地区来看，肯定是搞扩大化了。

有人说：这是“浩劫中的浩劫”。这就站到反动立场上去了。

4，十月政变后，当局对陆渭文这样被错关在监狱中的革命造反派，即使在平反翻案的大潮中，也并不急于平反，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无罪释放”。陆渭文出狱后，当局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一九八四年以他说过的几句话和企图叛逃台湾、

苏联的莫须有罪名，判刑五年重新投入监狱。虽经陆渭文多次申诉，法院至今仍不平反。这就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五、苏州陆兰秀一案，收集到的资料不多，吸取到的教训不少。

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困惑。这并不是只有陆兰秀一个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部分党员干部的大多数人逐步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学会了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自觉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支持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始终坚持反对文化大革命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像陆兰秀这样发展到公开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确实是极个别的。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这里面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如果仅仅是因为陆兰秀的这些思想，就把她逮捕法办、就判处她的死刑，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陆兰秀能够活到今天，她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人们有理由相信，她一定会认识自己的错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坚决地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2008年6月15日初稿

2011年9月1日修改

第五章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浙江省军区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付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1966. 12. 29；中发 [66] 622 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话纪要

这四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在军区的同学要好好地招待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医院绝食的同学让他们见院长；第三件是我派飞机接张司令员和同学跟红卫兵代表十个人，如果何以祥能来就同时来；第四件事情是派军用飞机、派军医、护士去看阮副司令员。检查完了能从飞机就飞机来，不能坐飞机就火车来。这四件事，我们在北京谈的时候，你们在杭州的情况要照旧，不要发生任何情况，你要负责的。经常跟总参谋部保持电话联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等《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你们到军区去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

最近军区的事件，由浙江省委应负完全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有部分责任，这些可都是省委引起来的嘛！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江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五人受伤）这说明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委这边，没有很好

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

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杜平同志去浙江，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也一起回杭州，会同浙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并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

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

1967.01.30；中发 [67] 32 号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月廿三日的决定，遵照中央军委一月廿八日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高干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三）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恶例，特别是一月廿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四）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受伤或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幕后有策动群众斗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严办。

（五）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偕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丁均

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军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中央批准。

（六）凡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包括在这次斗争中的材料，统统由杜平同志、丁均同志会同省委、军区、造反总部派人负责清查集中，然后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理，不许有任何隐瞒。

（七）犯法同学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

（八）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对此事向群众作深刻的检讨。

（九）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十）中央号召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粉碎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路线！

中央号召浙江军区和全体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与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二、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地方各级军管会相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各级军管会成立后，努力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安排人民生活，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

当国家财产眼看要被烈火吞没的时候，他奋身冲进火海，为保卫国家财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三月，省军管会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南萍、陈励耘认为：省军管会主要领导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

一些群众到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要军管会改变工作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

1967.07.19； 中发 [67] 223 号

中共中央批示：

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以必要的保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

红暴会回去后靠拢省联总，形势向好的方面转，浙江是个好形势，再往好转，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这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

（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此事为由，说张永生与陈励耘、X X 等人策划，平息肖山、富阳等地武斗，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其中肖山县打死二十七人；富阳县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伤致残的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被砸单位一百六十六个，受害家庭二千零五户。）

三、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

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

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〇期上登载了《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红暴派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

你们怎么啦，没好好的干吗？帮助、批评、联合，这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了，毛主席批了示，说明你们不同于湖北百万雄师，但不等于没有错误，主席批的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与浙江的红卫军也不同。

现在军管会是空五军、廿军，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那就是说：说到最后你还是站在保江华，保龙潜的立场上，你们立场到现在正是站错了，还没有站过来，难怪别人要说你保江保龙了。

你要求翁森鹤不代表红暴，因翁森鹤已发表声明退出红暴，这要求合理的，可以给你们解决吗！翁就不代表你们，最近杭州发生了很多谣言，康生怎样，春桥怎样，杨代总长怎样，在京西宾馆发出了电话，（方即阻止不承认，说有坏人挑拨离间，并攻击南、陈两政委把话带开去了，）（总长：红暴不等于没有坏人，当然是少数，浙江是很复杂的地方，如温州不可能没有美蒋特务）温州左派政策上有点过激，但温联总是坏的，这不等于省联总不好，你们又怎么去和他们联系的呢，要提高警惕，还有很多谣传什么空五军、二十军有分歧，南、陈为了夺第一把手在争权夺利抢位置。所以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有黑手黑帮，南萍在中央检查七次，这全是造谣。你们在上海开会就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

总理说：

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我们和军队同志谈时也讲了，军队内对龙潜的批判不要搞到社会上，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是军区政委，批判应放在军内，你们在少年宫广场大庭广众下批判，让坏人照了相，送到台湾就是敌人攻击我们的好材料，香港、日本就是想搞这个。

红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组织，跟你们闹对立，那是不对的。现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红暴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

红暴那里有那里算，基层有的就在基层联合，当然要帮助，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工代会，红代会都允许他们参加，允许他们承认错误，实现联合。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地县原来有红暴的，或者有观点与红暴相同的组织的，在他们承认错误检讨之后可在地县与他们联合，当然温州、金华、肖山、诸暨等是另外性质。就是这些地方组织，在承认这些错误后，也允许他们回来。温州造反派在政策上掌握不好，不大符合主席的教育，争取，分化的方针，要有他们自己揪出坏人，走资派。工总司没有做好这工作，现在还有几百人在山上，武器在他们手里，这里还有些是劳动人民。工总司有些口号提得不当，非要叫老保，要他们投降。

北京回去后，的确红暴有一部分人被省联总的人斗来斗去，方剑文他们讲的有夸张，但他被关近一百天是事实，这一点总是你们理亏。可能各个厂象方剑文这种情况不少。在一个厂是少数，加在一起有几十个人就不少，有几百人就更多了。你们斗龙潜，叫红暴六个学生陪斗就不好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代表团红暴派临时指挥部代表的讲话

总理：承认错误，多做自我批评，这样主动，二是承认空五军、二十军，军管会，而不是只承认军管会，不能把领导人和群众分开，有些话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承认两个改组，你们初期受压，我们很同情，支持你们，当然，空五军、二十军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他们会改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 一、你们浙大能不能带头达成几条协议，今天晚上就达成协议。
- 二、关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浙江要迅速推动革命委员会，这是大局。现在在这里水到渠成。今天五号了，我看再学习一个星期最多了。如果在十号以前，就在这里达成协议，马上把三结合和干部商量好。回去共同学习，各单位搞大联合，推动全省三结合。总之，在二月份要搞好。你们怎么能等到八月钱江潮吧！现在已成立革委会有十

四个省，最近有六个省准备马上搞，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吉林、新疆。你们弄不好连中游也赶不上了，落在二十个省后面，那不是下游吗？浙江地处下游，难道甘居下游吗？”

三、关于精简机构的问题。

四、大联合问题和三结合问题达成协议。我（对？）红暴讲了五条：

1) 红暴比省联总犯的错误要重，刘英，石耘他们自己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

2) 对解放军，红暴要支持解放军。两个改组以后，五军，廿军，二部分海军支左方向对嘛！军管会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他们会作自我批评的。

3) 红暴不要拉队伍。因为一个已联合了，拉队伍要分裂开，另一个，原来没有红暴的地方，建立红暴，势必会搞打，砸，抢与走资派有联系的组织拉进来，那么，老造反派就变落后了。

4) 促使大联合，任何一个单位，十几个人也要大联合，红暴也要推动。

5) 推动三结合。后来，总理又说：还要推动大联合这一条。

凡成立革委会的，三代会的，不要推翻，要扩大，加强，吸收他们（红暴）参加。这样他们答应了。

五、关于正确对待红暴问题。

总理说：“人家站错队，现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应该联合他们。保守派难道永远是保守派？他前进了嘛！你造反派，难道永远是造反派？老本吃不了多久。”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军管会及“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的谈话

南萍同志向总理汇报去年七月北京会议后，紧接着二个改组，开展革命大批判，九月份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月进行政权教育，当时考虑省革委会条件具备，接着批判刘邓反动建党路线，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围剿派性，增强党性，浙江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工作也存在缺点，一度事务忙乱，当时政策性问题缺乏有力措施。特别对红暴方面工作抓得不紧。南

萍同志提出，大家要做大好形势促进派，要从大局想问题，多想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面问题，具体问题都容易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派性问题了。

总理：

你们的协议起草很好，具体化了。

前一条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做促进派，不做促退派。

第二，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第三，对解放军要支持；这条好。

第四，要批走资派；在浙江的代理。

第五条是具体的，促进支持基层革命大联合，已经联合的不要拉出来，已经建立革委会的不要再拉了。总的是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

第六条“三代会”不能推翻，这个对的。

第七条省联总，红暴派逐步完成历史使命，提得很有策略性，接下去是活动范围。

第八条铁路，公、检、法……

第九条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清理队伍，这是很重要。

第十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在浙江更重要了。

第十一条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你们协议达成了。

最后一条准备在二月份成立革委会，既然如此，那就要很快在今天（16日）达成协议，签了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的批示

1968.02.22；中发〔68〕34号

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同时，浙江大学两派也达成了《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

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肃清其流毒。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进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警惕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要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为争取早日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四、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驻军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一百五十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领导干部二十八名，占百分之十九；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九十四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工人三十六名，农民二十一名，学生十九名，一般干部十二名，机动六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五十名代表中，安排十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三十七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十五名（工人七名，学生四名，农民三名，机关干部一名），包括“红暴派”代表三名；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暂安排六名）；军队干部十一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

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

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

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

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

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

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

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

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

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

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

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周建人（原省长）。

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

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

南 萍（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五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

熊应堂（二十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

朱全林（二十军副军长）。

孟昭玉（五十九师政委）。

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

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

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曹思明（舟嵎要塞区政委）。

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四、革委会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各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办公人员暂定二百人左右。

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准备在革委会中建立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主要负责党员组成，并组织一个精干班子，作为核心小组办公机构。

考虑到革委会机构新建，要立即全部接替原省委、省人委的工作须有一个过程；同时，大批干部一时也无法处理。因此，将原各部、委厅、局暂时保留，逐步精简、改造。遵照中央决定，各部、委、厅、局都成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搞好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总理讲话：

希望回去以后要加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中央的批示中，这次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点得这么多，是最多的一次，你们得到批示，要重视路线的斗争，“要斗私，批修”。

批语的第二条中说，希望你们在路线斗争中，在斗私批修的学习班中，革命大联合要促进。这个问题在浙江有争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能联合起来。十二条协议中央已经批准了，要很好地执行。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

江青讲话：

大好形势下也有反复，表现是不同的，有的是形“左”实右，极“左”，实际上很右。这种形式表现在去年夏天。从去年冬天开始，虽然击败了形“左”实右思潮，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但右倾的多。右倾分裂，从冬天到今天有所抬头。对这，我认为要站稳阶级立场，提高警惕。现在有人替去年二月逆流翻案。所谓二月逆流是从前年开始的，二月逆流的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击溃后，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党内有其代理人。你们浙江也有一小撮，表现在各种翻案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同志们注意。当然要反对形“左”实右的右倾保守，这样使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想瓦解人民解放军，想推翻新生革命委员会，特别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党斗争历史上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以极“左”，实际上是右的。有的公开以右的面目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客观规律的问题。出现后要识别他们，要勇敢地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康生讲话：

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刘少奇是大叛徒，刘少奇第一次被捕自首在长沙，被捕自首了，×××还送了他四书五经，27年

在武汉缴械，向汪精卫投降。（江青：有确实证据。）29年在满洲里被日本捉捕，这个大叛徒，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一次，35年在上海被捕。第五次36年到北方局又被捕投降。同志们知道，他投降敌人早就投降了。他自己说是老革命，实质上是老反革命。他搞一个老婆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也是国民党特务，王光美是国民党特务，美国通过彭真、刘仁、武光让她搞林副主席。到延安以后和大叛徒结婚，一对夫妇是一个老大叛徒一个老反革命。（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是搞战略情报的。）邓小平是个逃兵，真正是一个逃兵，他还有重大问题没有揭开，不但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打倒刘邓陶！彭德怀里通外国与赫鲁晓夫勾勾搭搭。（江青同志插话：是汉奸）贺龙是土匪，小将揭发，南昌暴动以后，投降了，国民党给他封官，就是为了一个条件没有封。国民党代表在那里住，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调转了（江青同志：杀了我们多少好党员）陆定一是大叛徒，此人很早就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胡克实一起，胡给他一千元钱，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同志插话：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现在有了确实的证据，是叛徒。我们还保过他，净搞阴谋，小将搞出来的，许世友同志立了新功。）

据我们知道，蒋匪情报局，有潜伏在国内的特务，有五条任务：（1）企图在今年三月27日（蒋伪青年节）在各地，特别在广东，云南边境，进行扰乱，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妄图动摇人民解放军。江青同志不是九·五讲话讲过了，现在的特务在边境，调查人民解放军番号，革命群众有义务，坚决打击，特别警惕，许多地方把军队的秘密情况泄露出去。（3）他们企图利用派性斗争作分裂，分化工作。希各机关各部门，提高警惕，心明眼亮，把坏人揪出来。（4）他们还要发展他们的特别机构，发展外围组织。浙江我不知道，很多地方出现反动组织，问题在他有潜伏的干部，打着红旗反红旗。（5）你们浙江武器要交，千万要警惕，千万要注意，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些是你们的纲领，敌人是妄想，三千一百万人民会识破这些企图，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要上当。不提高警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上当。

陈伯达讲话：

四大家族（除了孔祥熙）都出在江浙两省，四大家族是在江浙财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浙江的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宁波，国民党军阀很多都是从浙江出来的，蒋介石、胡宗南（总理：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江苏、浙江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党内走资派在浙江有特别的活动，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现在所有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他们都是代表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包括浙江的走资派，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浙江的胜利是特殊的作用。

要做阶级分析，江浙财办成了四大家族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强大的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斗争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一些地区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参与阴谋活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张永生同 xxx 等人，带领“宣传队”去浙南，发生武斗，仅丽水大港头一地，就打死十一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

一九六九年二月“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开始后，南萍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六九年三月，会议期间，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

一九六九年五月，张永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至四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 1 5 0 多人到北京告状。

1969 年 6 月 6 日，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1969 年 6 月 1 2 日，“红暴”派近 2 0 0 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1969 年 6 月 2 0 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1969 年 6 月 2 5 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 3 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1969 年 7 月 1 1 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6 月 2 6 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

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1969年7月12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200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新温师”、“新四中”等七、八十人伙同人民印刷厂保守派，籍口“印传单”毒打该厂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曹夏春等五同志。后被拉到军管会。军管会接待组的判决是：“限令三天内，人民印刷厂造反派向全市、向军管会作出检讨”。有人对“温联总”说，“要作好准备。是不是成立纠察队？如果外面有人来冲，就用汽车去挡，挡不住，就辗死他几个，反正都是牛鬼蛇神。”温联总散发传单说什么“踏平温州，血洗鹿城，严阵以待，来犯者有老婆孩子的三思而行”等等。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温联总头头叶少华、姚国麟等人组成八人小组。

七月十二日凌晨起，温联总就有组织、有计划，抢劫枪枝武器，打开了温州最大的战备军火库黄龙山军火库。全市八个军火库全部被劫，共计TNT炸药5700斤，赤磷1471公斤，人民币几顿之多，雷管、手雷等不计其数。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温联总架着机枪向南山陶磁厂的革命造反派扫射，工总司战士张银松身中六弹，壮烈牺牲。

在几十分钟内，温联总便立刻占领了市内的制高点：积谷山和华盖山。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数百名温联总人员在华盖、积谷两山的火力掩护下，冲进了附医。

立即控制外科三楼，向门诊部楼上扫射，投掷手雷。工总司房管兵团王阿汉、姚连福、孙永生等人在附医守护伤员，当即遭到机枪射击。王阿汉当场中弹牺牲，姚连福头部中弹而死，二十五岁的青年孙永生腹部中弹，医师正在抢救，被抓走而死。

温联总的机枪截击。当场又打死温五中十七岁的红卫兵刘美蓝和文卫总司的蔡鼎武。过路的亦被打伤多人，

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附医医务人员也被从病房中、手术台旁、门诊室里一个个拖走。被分批押到第五中学，进行拷打和审问。医师俞××被抓去后低血糖病发作，发生休克，昏倒在地上。

正在住院医疗的工总司伤员和在这里守卫伤员的“商总司”、“房管兵团”等五十多名战士被全部抓走，甚至连温州军管会代表邀请“文卫总司”白求恩战斗团负责人和医师组成的张银松烈士验尸小组，也被匪徒扣押。

他们用机枪对着病房扫射，向病房掷手雷、炸药包。小儿科二位病员当场毙亡，外科烧伤很厉害的病员王乐清已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化钱三仟多元，由于医师被抓走，不能抢救而死。一位中毒性腹膜炎妇产科病人孙仲香，血压很低(60—70%M)，靠打针维持生命，也因医务人员被抓走，病情急速恶化而死亡。正在输血、输液、输气的许多病人，由于医务人员被抓走，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婴儿室搞得更惨，婴儿的床位和编号全被搞乱，母亲认不到自己的亲生孩子。住院病号四百多，由于医务人员被抓，医疗设备、贵重药品全部被抢、整个医院被破坏，这四百多阶人被驱散，停止治疗。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温联总”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等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

温联四次用火焰喷射器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温联总守在最高处一一钟楼上，用机枪控制了周围的要道。工总司、商总司把钟楼炸开了。经过两天两夜，几千间楼房化为了灰烬。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深夜十二时，解放军 65 17 部队进驻温州城。

“温联总”头头在雪山秘密开会，扬言要吃掉 65 17 部队，来多少吃多少。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早晨。“温联总”红楼指挥部在各牢房内摆上集束手榴弹，楼下的操场里架设了机枪。冲进四号楼房，带走了六位难友。九分钟后，楼下就传来了枪声和六位难友最后的口号声。接着冲锋枪就朝牢室里扫开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新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办《工造总司战报》编辑部《看！王芳、王福堂之流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记温州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一九七〇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二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六、南萍等人的非组织活动

一九七〇年以来，南萍、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

南萍、熊应堂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彪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这个工程是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

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南萍、熊应堂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

一九七〇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

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

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

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 xxx 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

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

一九七〇年七月，陈励耘把林彪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

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

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

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

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

一九七〇年九月，翁森鹤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副主席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

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

一九七〇年，南、熊根据林彪“六大块四小块”的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一九七〇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

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

会场门口挂的林彪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

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南萍在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

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彪达到了高潮，

一九七一年一月，在省党代会上，南萍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

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彪的书给南萍。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彪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

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南萍、熊应堂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

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

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南萍从王维国处回来后，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毛泽东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

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

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

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

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

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

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

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

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

一九七一年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议，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

（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公然刊登了林彪的画像。

七、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的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铁瑛、王子达、白宗善、马龙、张孝烈、万振西、夏琦、侯建新到北京开会。

这次会议由许世友主持，联系浙江实际，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对浙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至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一）会议收获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二) 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三) 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四) 今后意见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复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查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浙江省委传达中央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职审查的决定

一九七二年，铁瑛任省委副书记。

一九七三年五月，谭启龙任浙江省委书记。

八、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接着就来了一个整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后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翁森鹤被拘留审查。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七五年七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挠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

（后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五年十月，谭启龙和铁瑛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 400 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

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

此事被毛泽东发现，批示：“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张永生平了反，谭启龙留北京审查。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永生坐镇北京，与冯仰澄等制订“批邓联纪打谭”的方针，策划召开“省两全会”。

张永生说：“拼出一条命同走资派斗”，“就是咬掉几只牙也不能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要尖、要硬、要韧，要像一把锋利的刺刀”，“要抓住战机”，“向走资派再一次夺权”。

一九七六年四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为省委书记。

九、十月政变后对革命者的镇压

一九七六年十月，张永生将大批材料转移至北京，后又将其中的一大批运到杭州。张永生说：“不上他们的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不讲”。

张永生指使省广播电台徐力印制传单，到南京、广州、南昌、上海等城市散发。

张永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表示“反正是个死”，要“发动一些人，豁出命来干一场”；“准备丢掉一切幻想去斗争，乞求是条死路”；提出要“上山打游击”，“把造反派串连起来，坚持和他们斗”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显通（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 届毕业生，1968 年 3 月 18 日被任命为浙江省革委会常委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被在全省首先隔离审查和批斗。

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李显通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对李显通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翁森鹤被逮捕。

一九七七年二月，铁瑛任浙江省委书记。（至一九八三年三月）

一九七七年七月，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 年第十四期上刊登的文章说：对付帮派骨干分子“要像当年对待“日本鬼子”、“国民党”以及“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都不为过，并提出“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

自 1976 年 11 月到 1980 年 2 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

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

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

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

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

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

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

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 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 202 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 662 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 7 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 190 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 4 人被判处了死刑。

就在铁瑛眼皮子底下的省城杭州，这里仅举两个厂的例子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了：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 1949 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 年 12 月 2 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 24 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1981 年，“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

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何、孔二人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1981年6月10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66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

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

台州被判处死刑的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

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

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

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在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如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张永生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永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案经审核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张永生……上诉人在上诉中的所谓：“不能把我过去积极追随和卖力执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反革命性质加以定罪”，云云，纯属狡辩。原审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第十七条之规定，以现

行反革命罪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完全正确，特此判决如下：

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翁森鹤反革命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出于反革命罪恶目的，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是无恶不作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是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打砸抢主谋和指挥者之一，是五毒俱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浙江一霸。给全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判处新生反革命犯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杭西法刑字[79]第 74 号）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罪名，“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回杭后“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1974年，抵制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解决。

以反革命罪判处李显通五年徒刑。

一九八〇年某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杭法刑上[80]74号）

裁定：李显通案维持原判。

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李显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

（1981 年 11 月 20 日，李显通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在李显通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 1985 年 4 月突然通知李显通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给厂里布置对李显通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份；旅游学院借用李显通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孩子和亲属。）

一九八〇年，方剑文被提拔为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

（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 年 2 月 8 日带领“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三千多支，子弹五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同年 6 月 12 日，方剑文带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上均摘自《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P123、128 和 130）。）

（后因倒卖钢材被判刑五年）

一九八〇年，姚国麟被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

（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

（后因跟市公安局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一九八〇年，杨秀珠被提拔为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为省建设厅副厅长。

（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未逮捕归案。）

二〇〇七年九月，李显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
铁瑛在三十年前一手制造的浙江冤假错案后果之严重，为害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其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

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罕见。那些遭受铁瑛极左路线打击和迫害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被无理审查、批斗，不知有多少被撤职戴帽开除，被殴打致伤致残，不知有多少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不知有多少被迫害致死。这三十年来，虽然不断有人上访、申诉，仍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至今仍饱受着贫病和心灵创伤的煎熬，而且还累及到我们的亲属和子女，这对“和谐”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多人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死的已经死了，就算“死者长已矣”，那么活着的人总还是多数，还有他们的子女那就更多了。然而，这些人均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是耄耋迟暮之年，来日无多，他们为国家辛辛苦苦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劳保福利、医疗保险等基本待遇都被剥夺，总不能让这么多的人统统含冤衔恨地离开人世吧！

我相信，浙江现任省委尤其是赵洪祝书记直接受胡锦涛总书记的委派来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必将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借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强劲东风能抓住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浙江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发展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贰、本节简论

浙江省委执行错误路线及群众对它的批判，材料收集不多，情况不明。

二、浙江省军区因保省委与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而驻浙部队与省军区观点不一，也产生了矛盾。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管，成立军管会，未能解决上述矛盾。只得又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

三、“红暴”是一个“老造反派”（材料不清楚）。但它后来支持军区未经审查和批判就保彭冲，因此犯了错误。虽然中央在处理浙江问题时强调要联合，在成立革委会后，地位不平等，在某些地区还受压。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有军分区、人武部的支持。因此两派斗争不断，武斗升级。

四、南萍任省革委会主任以后，不仅一个时期、一些地区压制了原红暴派的群众，也在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中打击了原革联派的群众。他还参与了林彪集团的派别活动。

五、在批林批孔中，张永生、翁森鹤等人乘势而起，要求解决清队、打反、清查中发生的问题。以谭启龙、铁瑛为首的省委领导，在政治高压下步步为营，有求必应。而到整顿时就反守为攻，置造反派于死地。

六、铁瑛建国以来一直在浙江省工作，1977 至 1983 年任省委书记。他在文革中及政变后的表演，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复辟狂。

“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走资派要革命派的命”，是这样吗？

2008 年 7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1 日修改

水陆洲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413980771>

内容包括：《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等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二篇

下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下册）

目录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3
第一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
第二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57
第三节 杨傅余事件-----	92
第四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133
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54
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79
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0
第八节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24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267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	267
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18
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12
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30
第五节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88
第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98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514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514
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529
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578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一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道县等地发生大规模杀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至五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

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会上说：“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

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红联”集中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

“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当晚，寿雁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以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为由，当场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打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了地富的女儿钟佩英及她的两个儿子。道县滥杀的序幕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突然各地谣传：“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开展大规模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组织报复，互相残杀。

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组织了一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这些人中，有3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其中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个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他的情况后，就扶他上了北京。

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在北京呼吁有正义感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湖南屠杀”的简报，呈送给中央负责人。震动了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

黎原返湘后，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47军140师炮兵520团进驻道县后进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10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 6 9 5 0 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 1 5 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

“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 2 人，打伤 7 人，俘虏 3 6 0 余人，被缴枪支 1 2 0 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的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红联”召开 4 0 0 多人的追悼会

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一九六七年八月，零陵军分区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 0 7 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

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 7 7 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

9 月 2 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6 9 5 0 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 6 9 5 0 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

“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原 6 9 5 0 部队一营副营长刘富安回忆：

“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口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口，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 1 2 人，打伤多人

这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人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但是，杀人事件仍在道县及周边地漫延，这又与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糊涂思想和错误对策有关。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下发《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

全文如下：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这个文件本身说明：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随后，又增派部队，这样才逐步控制了局面。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道县，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

中，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 14,000 多人。

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四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处理。

一九七八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一九八二年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对道县杀人事件作指示：“要严查惩办。”

一九八四年五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 1389 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

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

二、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天左右，“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等反对省革筹小组当省革筹小组的名单公布后，“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络站”等“，便立即在大街上张贴了反对这个省革筹小组成员名单的大字报，称这个名单是“中国赫鲁晓夫第二搞的”，是“二月镇反黑主帅一手炮制的黑货”，并攻击省革筹小组“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华国锋滚他妈的蛋！”等等。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齐卫东”、“夺军权”等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反动标语

“红中会”下属组织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战斗队与“夺军权”战斗队（队长杨曦光），分别在大街上张贴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与《誓死揪出周恩来的严重声明》，配合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周活动。

“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反周行动，受到了“工联”派的坚决反对。

“湘江风雷”总部即刻发表了《关于不准炮轰周总理的严重声明》。

公开发声支持“齐卫东”与“夺军权”反周行动的组织，只有大学与中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数很少的小组织。

“红中会”只发了一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

当“工联”方面一旦出来反击“反周”活动时，“红中会”的其他组织便立即表示了对“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声援。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由“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等 25 个“湘派”组织公开发表《八·三〇声明》

《八·三〇声明》批评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名单，提出了“誓死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的口号，并指责“工联”领导人“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恢复湖南铁路交通的电话指示
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同志来电

黎原同志即转胡勇、叶东初二同志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同志：

九月七日九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一、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二、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开足了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

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

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主席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谈到极“左”思潮时，

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

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

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主席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

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

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

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

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

（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

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主席又说：以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红旗军问题时，

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视察中的指示

杨成武、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二、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苦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

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辩。

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

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本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

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支，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高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出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们，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榷、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三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三人已定（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榷）。“工联”，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五名，双方各留二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吴自立这些家伙已经垮了，不要去责备那一方。小将上了当，我们老头子还上当嘛？刘少奇、彭真唱双簧，骗了人嘛！不要去责备小将。他们七月十八日听蔡爱卿讲话，觉察出了嘛，这是好事、应该欢迎。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五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二千多人，有一千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湖南还打算派个调查组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十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主持长沙政局的 47 军研究收枪问题。

会议认为散失到社会上的枪支两万多支，子弹几千万发。只收回五千多支，子弹 70 万发。其中，工联派上缴 2000 多支，湘江风雷上缴 100 多支，其他组织上交 1400 多支。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在“东方红总部”举行的有 20 个“湘派”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 10 月 11 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

在《成立公告》上署名名的 20 个组织是：

湘江风雷（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

湖南红旗军（复员军人组织，领导人为毕建）

长沙农联，

东方红总部，

青年近卫军（中学生、社会青年、青年工人混合组成）

湖南省红工会

省直联络站（省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

长沙财联

长沙虎山行

体委红旗

北区工联

红导弹

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周国辉）

矿冶井冈山公社（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张玉纲）

师院《永卫东》兵团

红中会（长沙中学生造反组织，领导人为孙学申）

红专会

九中《重上井冈山》

其中，“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是或成员人数众多、或影响较大的社会性群众造反组织，而“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虎山行，矿冶井冈山公社，九中《重上井冈山》”等，却不过是一些工厂或学校内部的小小组织，在社会上并无多大声望，成员人数有的仅仅只几个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

后来，“长沙工人”、“长沙农联”等组织发表声明，不承认签署了《九·三〇声明》，而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也在 11 月 24 日发声明，对“省无联”不予承认；“青年近卫军”则干脆又参加了省革筹小组领导的“工代会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郑波等同志交给总理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总理接过材料看到材料上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时，

问：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

答：准确，有这么多。

总理：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

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放心？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二十天还是一个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三四一事件（八月十日）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象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五·一六”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

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卿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萧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自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揪军内一小撮）提错了，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这是不符合毛泽

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好。校内搞四大，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出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

现在的极“左”思潮方向是不对的，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们中央常委与文革就是在一起办公的，有事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人要用显微镜找中央的空子。还有的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都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极“左”思潮，长沙是有他一定市场的，你们应该引起警惕，你们自己起来批判他，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中央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懂得了，改了就行了。

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五·一六”极“左”思潮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二·四”批示是文革起草的，但没叫捉那么多人嘛！不能说你们批判极“左”，你们就“右”了，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批“左”的。

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〇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十一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省无联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有三条黑线：

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

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

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原在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指示的大会上的讲话

这股反动的极“左”思潮，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刮经济主义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闹翻案风，让牛鬼蛇神打着“造反”的旗帜，进行阶级报复。极“左”思潮的实质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判极“左”思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1. 有的说，现在不应该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2. 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打击革命小将”，是“想压垮造反派组织”。
3. 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狡猾的阶级敌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猖狂加以反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硬说是反动路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他也说成是反动路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他硬说这是刘氏反动路线。一句话，就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加以攻击，打着反对刘邓路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造了很多反动舆论，在群众认识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必须澄清。

（一）“革”和“保”的问题。

（二）“反迫害”的问题。

（三）借口反血统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

目前，在革命群众中，对于抓黑手，揪坏头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需要加以解决：

①小资产阶级派性。一些人只要派性，不要党性，毫无原则，不讲阶级分析。

②怕自己组织揭出坏头头，揪出黑手，不光彩。

③私心杂念作怪，怕报复，怕“斗不过”，自己吃亏。

④ 还有些同志认为：“抓坏人，揪黑手，是专政机关的事，是上头的事；我们只管斗走资派”。

⑤ 有些人耽心在造反派里揪出了黑手和坏头头，会造成“保皇派翻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对四十七军就中央 [67] 367 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

一、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二、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为了更好的搞好大联合，根据上述精神，当前的工作，按原布置不变，要坚定的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于确实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经过认真调查，报军批准。

三、贯彻中央通知，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教育、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对于与高司同观点的基层组织，应区别对待，对广大群众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教育他

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参加联合，同时下很大的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反派，正确处理本单位受蒙蔽的群众，共同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四、在做好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

五、要贯彻中央 12.2 通知，要密切注意动态，警惕敌人从中捣乱，要随时说服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随便上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1967. 12. 21； 中发 [67] 39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并各地方报社：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领导小组及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班返省汇报团。

周总理：

现在促进大联合中，又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搞分裂；还有一种右的，原来已经瓦解不存在的一些组织要复活，

湖南高司也是这样。我们说，工联和湘江风雷应该联合起来。高司的少数头头跟当时的军区犯了方向错误，送枪对左派群众很大打击，如益阳、常德、湘潭都是。这样跨行业的组织不行，但他在学校、工厂、机关中的基层组织要欢迎他们参加大联合。

不能因中央批语，把过去跟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跨行业的已经垮了的组织，重新复活。当然，下面基层组织可以参加联合。不能上面重新复活，这样复活就等于把去年党、政走资派所组织的保守组织，官办组织都可以恢复了，比如上海的“赤卫队”，北京的“捍卫团”。（康生：联合不倒旗，是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指保守组织。）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不是把走资派官办的组织复活起来，不是把受省军区方向路线错误影响深的组织复活起来，如果这样做，这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这不是推动革命三结合，而是不可能三结合。这点要说清楚，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是极“左”，搞分裂的，口号极“左”，实际上本质反动。湖南从湘江风雷中分出来一个组织，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叫“省无联”。把叶卫东同志排除在外，把总部砸了，叶卫东同志还受伤了，你们知道吗？（答：知道。韦钦讲了一些情况。）你们湖南内部观点不一致，回去汇

报还不成熟。谭辅仁同志，你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湘派反映批判极“左”面搞宽了）在群众中批判极“左”思想是对的，但到基础群众组织去抓人是不对的，北京搞“五·一六”我们一再强调只抓少数坏头头和后面的黑手，要自己抓，不要别人抓，不要到对立面去抓人，不要扩大化，也不许右派翻天。湖南批判极“左”思潮，抓人，如果扩大了些，应该纠正。“省无联”认为，中央批准的以黎源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湖南黑三线的反革命三结合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个口号是反动的，矛头针对中央的。“省无联”还说什么“批判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这怎么说是反动的呢？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要打倒中央批准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等同志。这是不对的，他们过去支持过造反派，是革命领导干部。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在北京搞清楚。

你们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林国兴同志来了吗？（林：来了。）一开始我就要你们把张家政吸收到学习班来，你们不同意，这是不好的，他是代表一派嘛，张家政这个人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只要他不反对中央、省革筹小组，我们应该欢迎他到学习班学习。湖南班要把张家政接到学习班来。他在北京等了三个月，你们讨论了五十多天还不解决，我说过好多次没有解决，我是有意见的。（众：张家政还在北京，湖南来了十五人要揪他），来了十五个人，你们要去说服他们，在学习班不要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先做十五个人的工作。（有人提出，“省无联”也来了几人学习。）“省无联”只要他们不在长沙搞分裂，他们可以来学习。湖南晚一点等十天再回去，学习好了再回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

康生讲话：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因为形势大好，敌人感觉他们就要死亡了，狗急跳墙，蹦出来了。在北京出现一个××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们写了一封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恰恰是十

月一日出笼，十月三日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战马悲鸣”翻印了这个文件。

“省无联”的纲领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

“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证明林副主席的话非常英明。在林副主席指示以后，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这是最大的一桩好事，这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有好处。

这个纲领是一个什么纲领呢？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

“省无联”的行动纲领。

第一条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些反动的理论家，还跟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们是恶毒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他们讲：毛主席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代的思想，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象周国辉讲的，有人揭发的，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毛主席的思想比起马列主义是比较古老、陈旧，还是落后的，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充实、提高，才能上升到毛主席思想的新时代。同志们你不要看他的全部，只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他们如何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

根据他们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你们看，这些话真是反动透顶，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

专政，要国民党、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疯狂的无耻的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不但是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假借反对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我们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污蔑成资本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毛主席领导的党都说成是特权阶层，看成和赫鲁晓夫的党一样。他们这样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没有刻骨的仇恨才奇怪呢！（众：呼口号……）这里面没有反革命才怪了！这些刘、邓、彭、贺的小娄罗，国民党的小丑，杰出的“学者”，大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这些话，就是他们反革命理论的根据。从杨曦光的文章里面看出，他们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东西。

第三部分，他们对我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估计。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良主义，自从“省无联”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他们又说：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同志们，你们不要被这话蒙蔽。毛主席的权威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吗？我们知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共知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思想权威才树立，他们被自己的话冲昏了头，既然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是改良主义，怎么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思想权威就不能在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中树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真是语无伦次。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都是改良主义，大家知道各省的问题得到解决都是毛主席解决的（众：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拐弯抹角的千方百计的蒙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改良主义，各省的问题解决也说成是改良主义，革筹小组的建立也说成是改良主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一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是改良主义？！他们就这样来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众：口号）。

第四部分讲到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对湖南问题所作的指示，江青同志十月十二号的指示。根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才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他们还胡说八道：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月十二日的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文化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说：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

“纲领”下面接着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湖南取得胜利，周国辉特别发挥了这个理论，说林副主席指出在湖南首先取得胜利，这完全是胡扯。

第五部分：“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省革筹小组打倒，他们上台，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说省革筹小组个别的打倒不行，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某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还说：“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这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了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据说把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叫做战略退却，这是什么意思呢？红卫兵犯了错误，告诉你们赶快退却，但是到十月十二号就进攻了。他们挖空心思歪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歪曲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的讲话，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第七条，“在转折的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既有反革命的理论，也有反革命的行动。

陈伯达讲话：

这里边有个人叫周国辉，他说：“他们对我们什么都骂了，就是没有敢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今天就敢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革命的大杂烩！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的大杂烩。对这些社会渣滓，没好多话说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总理大笑说：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伯达等中央首长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就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省无联”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是反革命的，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我们说凡是要革命的人民，就要从你们的组织中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革命的三结合说成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要搞反革命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专政，搞地、富、反、坏、右的专政。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能存在，那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专政。“省无联”企图搞的那个东西，实际就是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

江青讲话：

我建议要把普通的一般的受蒙蔽的群众，同他那个组织的少数的个别的坏人或者是背后的什么老师，什么后台要有区别。（总理：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有罪的少数坏头头，但头头不一定是坏人，我们如果不区别对待很容易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点作为建议提出。我的话如果讲错了希望同志们当面批评。

周总理讲话：

我们对“省无联”也是逐渐发现的。去年十月我在武汉，还有郑波以及省革筹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在，听他们说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说，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我们还劝说“湘江风雷”按行业、按部门组织不要跨行业。当时“高司”提出要翻案，我认为“高司”不要再恢复了，基层单位认识错误的可以联合。当时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省无联”还把我的这段话说成是“逆

流”。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个省都要宣布：不要跨行业的组织。

我对“省无联”的情况知道不多，直到这次郑波同志带来各种观点的人，包括“省无联”和持“省无联”观点的人收到了一些材料，听了几方面的意见，认识才清楚，发现“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象刚才上面几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纲领。我觉得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这样的反动东西还公开演说，出报纸，他们的纲领贴在大街上，公布于众！江青同志说得对，既然跳出来就要批判。不要只看到公开出来活动的这些人，对他们幕前幕后的黑手要有足够的认识，既然跳出来了，就坚决批臭。使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刚才康生、伯达同志又对“省无联”的纲领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話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他们“省无联”是响当当的毛、林派？

他们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把我们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骂了，谢富治同志是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同志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骂了，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真是反动到了极点。这完全是反对江青同志“九·五”讲话。

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有今天。不仅十七年来是如此，五十年来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毛主席的思想在地球上继承了马列主义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并超过了前人。因为时代发展了嘛，后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可是他们还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同那些少数懂得一点毛泽东思想的人重新建党、建军。

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姚文元：中国当然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讲向何处去？）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

他们说，要取得革命的真正彻底的胜利，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要重新进行阶级分析，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这实际上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全暴露出来。“省无联”借此就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要推翻五十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跟参加“省无联”的讲清楚，大多数人是会退出来的，今天在坐的也有参加“省无联”的组织，你们还会跟他们走下去吗？（参加无联组织的人答：不会！）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这需要你们回去搞清楚，不要只看到表面这几个人，还有的藏在暗地里，表面上这几个人多数是一时走错了路，说错了话，（康老：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夺军权”，你们问他向谁夺军权，向林副主席、毛主席夺军权？向人民夺军权？）（江青：用夺军权这样的名字，就是错误的，他们来领导人民解放军，他们来掌握军权，见他的鬼去吧！）

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在六零年才真正在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从六零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才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又说：三分之二的军权没有掌握在林副主席手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的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一直就没有离开部队，指挥着部队。去年是建军四十周年，他们把我们有四十年历史的解放军也否定了。我们提出三相信、三依靠，第二条就讲的是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解放军搞乱。

包括“省无联”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怎么错的，把问题揭露出来，分清是非。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如“高校风雷”、“一中夺军权”、“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络站”等等，自己组织检查，找出自己组织中的坏人。

湖南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潮，康老说是极反思潮。（康老：是极反思潮。江青：是极右思潮。）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你们那里复课闹革命，根本没

有搞，你们要知道复课闹革命是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大方向。只有那些极“左”思潮的人才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现在已经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了。你们要促进省革筹小组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促进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召开。不管是学校、工厂都要回到本单位去，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

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四十七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四十七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编者注：应指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但不要走极端，不要随便捉人，要区别对待。省无联内部有老造反派。群众还是受蒙蔽的，应该区别对待，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他，如何团结他。一个办法是因为有老造反派，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就不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反动纲领和行动，又怕“投鼠忌器”，这样手就软了，心就软了，怕把群众赶跑了。这样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不是争取群众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指出他们的纲领、行动的极端反动，使他们猛然醒觉，反戈一击。我们照顾到受蒙蔽，但我们立场不明确，如何促进他们的觉悟？群众和头头要划清楚，不要故意的都去捉人，这方面我们批评了“省无联”，是因为他们犯错误了。现在轮着你们犯错误了。如果是本组织搞的，那允

许罗！不必那么急，何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同志耽心也就是这个问题吧！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杨曦光的一封信

一·二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阀，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杨曦光《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于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妃，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于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份，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流，以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份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份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长沙一中“夺军权”钢 812 分队 杨曦光 刘小兵《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一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九六八年二月，“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在批“省无联”时发生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家政、杨曦光等人被捕入狱。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领导人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

3月30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

江青说“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

她还说：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后又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恶劣极了。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有人为长沙红中会翻案

“3·30”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余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余大川以一中红造会“3·30”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3·30”联络站（简称红“3·30”），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余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南省高级法院审理“省无联”结案

张家政（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被判 20 年

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 15 年

毕健（湖南红旗军）判 10 年

杨曦光（红中会）判 10 年

周国辉（高校风雷）判 7 年

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判 3 年

李仲昆（湘江风雷）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各单位，一大批“省无联”旗号下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那些“黑手”，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判刑、批斗。

（1980 年代初，出狱几年后的几名当年的大学生、中学生，就自己因文章因言论而被治罪的问题，先后向省与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诉。胡耀邦批示：省无联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1981 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省无联”有关人员的案件，撤消了“反革命罪”，除个别人因要对某武斗事件负责而仍须获罪以外，大部分人都宣告无罪。

同时，湖南省委也作出了决定，认为文革中对“省无联”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却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是错误的，是不实之词，因此，予以平反，撤消原定性结论。

杨曦光起初得到的改判，是“免于刑事处分”。杨曦光不服，继续申诉。1983年，湖南高级法院再次复审，改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省高级法院的这个改判，在报送省委后，始终没有批复。)

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长沙市工代会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6；中发[68]56号

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广“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七、湖南的反三右一风与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根据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

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站在梁、尚一边的红“3·30”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8·19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实际上，在一些市县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由于一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1·24”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1·24”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源，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

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

汝城发生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

叶卫东对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返回涟钢

双方发生发生武斗，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宣传贯彻“七.三”布告 情况续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1968.07.19；中发 [68] 111 号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现将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造成浩大的声势，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孤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此种宣传，应当同拥军爱民联系起来，同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清理本地本单位的阶级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等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新华社及各分社，应及时把各地宣传“七.三”布告情况及问题发表，登内部的《文化革命动向》，不登报。

一九六八年八月，省革委会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省委机关干部“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梁春阳、尚春仁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胡勇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

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谈话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

后因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胡勇由华国锋与47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胡勇、唐忠富等人作为代表参加中共党的“九大”。

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已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

“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已内定为中央委员时说：“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唐忠富当选中央委员。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概要）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

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

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附件一 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1969.12.18）。

附件二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1969.12.3）

八、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〇年春，开始进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运动

中央也发出了1970年的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查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的“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与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 军方与各级革命委

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

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已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

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长沙市在两个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紧接着中央发布了 17 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

1970 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她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她现在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

青年近卫军司令谭海清，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后又开办过公司经商，稍有成就，于 1997 年去世。）

一九七一年夏天，“清查 5·16 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

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

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

九、湖南的批林整风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二年十月，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因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被中央撤消一切职务，进行审查。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

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

大字报也上街了，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一九七三年三月，张平化又被重新派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一九七三年底，闹平反的纪某被法院判了二年刑

长沙市有一些人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是，在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被公安部门以扰乱社会的罪名逮捕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还被法院判了二年刑。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强调指出：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省委常委，
胡勇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长沙市委、长沙市商业局党委发下文件，对××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或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

一九七四年三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

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不久，有人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这些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这些以“穷志诚”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八条”指示
此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十、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头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批判。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秘密开会，

张厚在会上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

胡勇在会上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猻不散”。

接着，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开会，他说“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勇邵阳的谢智峰、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讲话，回湖南后进行了广泛传达

他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

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由唐忠富传达了江青对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

胡勇接着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把运动搞起来，“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汇报情况

他指出：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材料。

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信，寄给鲁瑛，信中说：省委某些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叶卫东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研究工作

建议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工作

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汇报。唐忠富说：“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和十二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一些人，两次找省委负责人，要求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全会。

但遭到省委一些负责人的反对，建议未能实现。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共同策划对抗湖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大会的指示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唐忠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以省、市总工会的名义，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大会发表的公开信和批判发言中，指出：省委某些负责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声明要同这些人“坚决斗争到底”。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继续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唐忠富还对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总工会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

叶卫东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

在唐忠富等人的影响下，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的运动陆续开展起来。

“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进行宣传。

省市总工会还计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发生十月政变而被迫终止。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

由金祖敏把他们编写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迟群，揭露省委一些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胡勇、叶卫东带领一批人到株洲

胡勇、叶卫东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卫东等人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

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写”。先后写出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

这些文章指出：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是“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叶卫东在市总工会召开的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人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把矛头指向反击右倾翻案风。

唐忠富指出：这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来的这些人包围在省委大院。

二十日清晨，唐忠富、张厚等又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

张厚亲临现场，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

双方发生武斗，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露张平化的老底，

他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到北京汇报情况

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

唐忠富在准备的“汇报提纲”中，指出：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时，唐忠富还要求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加紧工作：“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

唐忠富等人上京后，张厚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

八月十七日，唐忠富、雷志忠来信给张厚等人，信中说：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信后表态同意，并将信转交胡勇，要胡看后烧掉。

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商量整顿民兵组织的问题。

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

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经长沙市委书记张厚同意，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接管长沙市民兵指挥部

张厚确定朱香桂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并责令其负责起草解决民兵指挥部问题的方案。

一九七六年九月，叶卫东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

十一、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的镇压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张厚说这是“右派政变”。

唐忠富说：“十·六事件”是“右派政变”。

胡勇在会上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

会上提出“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受到审查

这些人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

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叶卫东被正式通知“离职审查”

在离职审查期间，叶卫东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叶卫东被宣布拘留

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叶卫东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胡勇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唐忠富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原长沙市委书记张厚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叶卫东由省人民检察院移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叶卫东起诉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胡勇由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移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唐忠富起诉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长沙市人民法院对胡勇在进行了公开审理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1997 年病故。）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一字第 20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一字第 23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一九八二年六月，胡勇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张厚被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张厚被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沙市人民法院起诉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驳回叶卫东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 20 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驳回胡勇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 23 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刑事判决。

(出狱后，已过 55 岁的他，曾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经商办过公司。)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厚进行了公开审理。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以“被告人张厚身为负责干部，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机，卖身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进行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确认被告人张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考虑到被告人张厚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被捕以后，对其所犯罪行有所认识”，判处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八四年三月，原省委书记章伯森，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

经数年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查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治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

贰、本节简论

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湖南的报纸一直没有转载。“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湖南省委

积极派出工作组大抓“三家村”、“小邓拓”。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张平化上调中央主管宣传部的工作。长沙发生“八·一九事件”，九月初，张平化主动请求回湖南“请罪、造反”。不久，听到“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风声，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向全省干部作“抓黑鬼”的报告。十月，他又作检讨。以后被中央保护起来。一九七三年，张平化又被派回湖南担任一把手，他又干了不少坏事。十月政变后，张平化被华国锋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在批“凡是派”中，张平化没有紧跟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了。据说，他写有回忆录，至今没有见到。不知他在去见马克思前是否有所悔悟？！

二、湖南抓“湘江风雷”的头头，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的。这个错误当然由中央文革小组负主要责任。但湖南省军区负责人也难辞其咎。而“高司”派的群众则是受了蒙蔽。大家都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三、湖南道县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确是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

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与文化大革命有牵连，但主要并不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武斗，更不是革命造反派杀人。这件事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极少数坏人利用了当时的特殊条件，煽动起了一些群众的仇怨情绪、无政府主义思潮。

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得知情况后即指示四十七军派出部队，长沙等地的革命造反派也派出人员，到当地制止这种违法犯罪的屠杀行为。

有的人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徒劳的。

四、湖南的“省无联”和极左派思潮在全国也具有典型性和尖端性。

“省无联”的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

它们的纲领说：

“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

“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它们所要推翻的所谓“特权阶层”，就是指的我国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它们所要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就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而且它们是要用国内战争、“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

判定这样的纲领是极左思潮、极右思潮、形左实右的思潮，难道说不对吗？

还可以看看海外的民运分子们是怎样赞扬这种思潮的：

“如果认真地阅读一下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及相关的《我们的纲领》等文，便不难明白：这些文章尽管运用的还都是钦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义，但它的理论分析已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意识形态，它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全面的反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激进倾向，尤其是以它为代表的“新思潮”以反对文革中在一月夺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的政体形式为直接号召，以“中华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式的新的民主政体为奋斗目标，对处于文革暴风骤雨中的群众运动，会带来极大的煽动性并进而造成不可控制性，最终必将形成对整个中共所代表的制度（不管是“文革派还是“政府派”）的挑战与威胁。”

“透视一下省无联们的理论追求，也不难发现为康生所指责的“极右实质”。当杨曦光们把90%的共产党干部作为一个腐朽的，应当被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把毛泽东及“文革派”夺权后的“革委会”说成是“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时，省无联已完全走到了整个中共制度——包括政府派和文革派——的对立面，这时，尽管幼稚的杨曦光们憧憬的政体只是一种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权，但对中共来说，自然是极端的反革命的，是必然通向多元政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省无联的极“左”思潮给中国文革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璞玉含沙，良莠混杂的思想史料。”

有的人试图把“省无联”与极左思潮分开，把头头们作的报告、写的文章说成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与“省无联”没有关系。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明明标的是“省无联”的“纲领”、“决定”，怎么能与省无联分开呢？如果说不是由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集体决定的，就不能算是这个组织的東西，那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也并没有发表声明否认这些纲领、决定！

历史条件是不能任意套用的。对当时针对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的政治纲领，教条式地搬到当时的中国来，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革命的。

五、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湖南开展的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由于看到的材料很少，情况不明。但是，第一，湖南在建立县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由于夹杂了一个批判省无联，许多地方借此打击革命造反派，由人武部、保守的一派掌权，黎原承认，这样的县多达五十个左右，几乎点了一半。第二，在反右倾翻案风中，夹杂了资产阶级的派性斗争，原造反派中的掌权派与受压派相互指责：一方说掌权派应该对右倾翻案风负责；另一方说受压派是在反革委会。第三，受压派在反右倾翻案风中采取了一些过火的作法，不是补台而是拆台，甚至挑起武斗。第四，掌权派利用中央反武斗的政策，对受压派实施过重的打击。第五，原省委领导人、亮相干部华国锋等人在支一派、压一派中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六、十月政变后，湖南当局对革命派的镇压，真正做到了“莫须有”。他们把革命干部和群众在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下，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都说成是“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向党组织建议任命某些人担任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怎么就是“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后来，中央不是也任命了这些人担任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吗？

批评某些省委负责人的错误，向中央汇报材料，怎么就是“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难道说赵平化、李平化又成了党的化身？

2011年11月16日修改

第六章第二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夺省委走资派的权，遭到朱声达等人的镇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银川市革命造反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宣布夺了省委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交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宁夏军区发表声明支持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联委会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

张怀礼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声达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张，要张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春雷讲话，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张怀礼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不叫他去联委会，就断绝了关系。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朱声达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军区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军区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

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

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

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

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

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

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

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革命造反派，发表了“三·七”声明。

军区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

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区对“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锋、杨静仁、马玉槐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

军区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进行压制。

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朱声达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朱声达等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军区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宁夏军区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朱声达在军内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宁夏军区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康健民到宁夏，朱声达、江对康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关于银川新华社事件的指示

五月卅日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点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一事件：

1. 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查处理。
2. 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 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朱声达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

朱声达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

朱声达等认为是“反革命叛乱”，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

一九六七年六月，“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朱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朱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朱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朱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七年，中央在 222 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宁夏军区拒绝检查、处理。

社会上出现了“222 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 222 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军区党委会上，马克传达了洗政委的指示，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朱声达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永宁发生“八·八”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忠发生“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惨遭杀害。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派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三、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宁夏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宁夏军区在北京办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代表时的谈话

康生说：

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

你们那一套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

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我要求你们三条：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

一、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

一、坚决拥护八月十八日兰州军区公告

二、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革联筹）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指挥部）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谈话康生说：

去吴忠谈判的是那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八六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好！让他们搞！（此时康老很气愤）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八六团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不会完全撕的，（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独立师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洗恒汉打电话，

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洗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冼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冼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指示主要精神如下：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康生李天焕对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的谈话
康生说：

中央、中央文革认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的形势，象宁夏把杨马揪出来了，朱声达的反动路线也被揭露啦，当然还没有揭深透，可以说基本上揭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出朱声达反革命的面目，反党反毛主席的丑恶面目，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觉醒，军区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开始觉醒，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暴露之后，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这就是看出反动路线是怎样见不得太阳。六十二师部队进驻宁夏后，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吴忠虽然部队到的晚了，造反派受了些损失，但以后还是进去了，做了很多工作。永宁的问题，只要坚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也会很快解决的。因此，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形势会很快更加大好起来。

你们在北京不请示中央，做这个做那个，要加以警惕，不要搞宗派，中央正在解决宁夏问题，你们还在那里另搞一套，串连了一千多个单位。

武汉事件后，我们报纸上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就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对。

对筹备处要把头头和群众分开，对那种杀人头头要惩办，对群众要教育要争取，对吴忠反革命头头要逮捕法办，对受蒙蔽的群众要做工作。对永宁人武部要指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主要由朱声达来负，人武部也有责任。

青铜峡的反击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康生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的讲话
康生说：

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

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问题。

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总指挥部和三司在银川还有冲突，还有武斗，还有打、砸、抢。

现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北京、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青海，市里还有个青岛。另外，有些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比如说象河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内蒙、四川、甘肃这八个地方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这种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敌人、特务。第二种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就是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人。

第二个问题，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重要条件，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同那些企图动摇、干扰、瓦解人民解放军的，和他们坚决斗争。

党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洗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是对准六十二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六十二师。

宁夏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在八·八、八·一三吴忠事件以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六十二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看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从江青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就听到，必须巩固、扩大，发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绝不能干扰、动摇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

在这里，我向宁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解释一下，原来会议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问题，第二个是解决指挥部与筹备处的武斗问题。据我们所知，宁总司、宁三司基本上没有参加武斗。因此开始宁总司、宁三司的代表少一些，你们不要从形式上来看。以后照顾了，你们还有意见！你们没有参加武斗，这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组织同当时直接武斗关系不大，所以开始代表少一些，这里希望同志们了解中央的作法，不要误解，很多省都是这样，要消除这个误解。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第一件就是 9 月 26 日，主席接见各地军区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同志，这件事，我们宁夏军区的同志也参加了，包括朱声达同志。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同志们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节纪念大会。

第三件事，中央 10 月 7 号的通知，这是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的重要指示。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在九月间，有一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去。

朵恩华发言，揭发了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的一些活动情况

军区稽振华、马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揭发了朱声达及何其仁和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向辉宇在会上揭发了朱声达对抗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

大联筹马生其系统地揭发了大联筹的问题。

康生说：

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 12 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商金仓就朱声达如何把手伸进大联合筹备处的问题做了揭发。

马子明揭发到张号从贺兰山下来传达了参谋团的停止生产、布置武斗的指示。

张艺系统地揭露了朱声达与反革命修正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张元树谈到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五卅事件”、对抗中央 222 号文件；揭发有人造谣说谢副总理说，宁夏和新疆问题很复杂，中央不急于表态。

张德贵揭发朱声达造谣“2·11”声明是经过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的；谈到何其仁策划让筹备处派一个女同志扮做单玉虎的老婆；谈到朱声达策划筹备处派十一人上高级党校去揪张文林，目的在于打击总指挥部；谈到吴忠人武部、筹备处派大批农民阻挡 8048 部队到吴忠执行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了朱声达蒙蔽群众以及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些情况：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李剑白说：“你在前面指挥，我当后台”；朱声达派解放军到各单位宣传反对一·二七夺权。

王希年揭发了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吴忠八·一三事件和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行：讲到朱声达手段阴险，制造上述事件时不是开会布置，而是在下面密谋策划；筹备处派到各地的高参都用代号不用真名。

62 师后勤部付部长王锦借助《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详细地揭露了青铜峡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洗恒汉同志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 62 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 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 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

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

康老接着说：

“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洗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人去指挥的。象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的干部）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

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是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子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

陶泊表示要向中央低头认罪，交待问题，并谈了朱声达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某些活动：朱声达对抗 117 号文件，（指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朱声达说周总理派人来宁夏秘密调查石嘴山的武斗；何其仁上贺兰山和筹备处各处参谋团策划阴谋；何其仁传达说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是“开快车，要翻车，要勤打招呼”。

康老说：

“这个问题我同同志们讲一下，主席说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主席是讲过的，因为当时还有反对兰州军区，反对张达志和冼恒汉同志的，主席才讲了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你刚才讲的，是中央文革根据主席所讲的，说兰州军区对青海赵永夫的问题的处理，对甘肃詹大南的问题的处理，对宁夏朱声达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文件。在处理甘肃问题时，文件上有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听取康健民汇报宁夏问题时的讲话

康老几点指示：

一、要深入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林付主席的指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支左。部队自己，尤其是干部要很好学习。我们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在内，实行天天读，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师和军区要好好掌握，那个地方野战军真正把毛著学好，才能做好支左工作。因为解放军是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支柱。宣传毛泽东思想，支左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当前主要学习毛主席三个地区的指示，在全军中进行教育。

二、军队要好好把林付主席“八·九”指示研究一下。对待干部问题，帮助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因此，××师要团结军区、人武部、独立师广大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对朱声达错误要批判，但不要整个军区、人武部、独立师都认为有错误，把军区领导与群众，主要干部与一般干部分开。因此，要好好学习“八·九”指示。

三、对群众组织政策要掌握稳。对筹备处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不能压，主席指示已经讲了，要争取教育分化他们。主要问题看到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还有第二个杨、马，主要责任在他们。

四、不断教育群众团体和群众组织，掌握政策。当前部队应去促进大联合。有的以人多以势压人，有的唯我独左，叫他们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天天把主席的东西看一看。……有的违背主席指示，要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巩固起来，倒旗联合。你们情况不错，开始别要求那么高，一步一步来。不愿倒旗也可以。联合小组这个形式很好。有些问题摆一下也好。要作自我批评，要联合。抓毛著学习和学习班。有这个基础联合小组可以扩大一点，好像一个协商会议。不赞成的问题摆一下。干部也是一样，大家赞成的就三结合，不赞成的就摆。不要你打我保，你保我打。群众不要有这个思想，一个干部不好，这个组织就垮了。不要受人挑拨。甘春雷即使结合错了，群众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以群众为主嘛。群众从这里解放出来。需要增加信心，自己独立思考。你是主体嘛。宁夏这个问题比较深，离了干部不行。

还有工人工作比较落实一些。各地都是工人落实好，工人总是比较先进的。哪个地方工人领导学生就好，哪个地方学生领导工人就差，就出问题。

一、筹备处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不是搞重庆谈判，是受教育。

二、加强宣传，报纸、电台、宣传车，对中央首长关于宁夏问题的谈话、兰州军区公告，要反复宣传，把有线广播搞起来（特别是电台有线广播）。

三、不要抓头头，抓来要放。

四、适当的分发武器，要武装造反派，如果他们对银川进行反扑，坚决自卫。

五、筹备处破坏铁路，康老很生气，把朱声达叫去训一顿。这是反革命事件。

六、第三势力对自己参加谈判的代表数量少，他们很有意见，中央说可以考虑。

七、继续用飞机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一、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朱声达同志自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〇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一·二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

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三、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一、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网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

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千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

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三、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 222 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 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 222 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

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 62 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毛泽东：照办。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 8037 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宣读中央决定并解释：

第二条中有三点区别：第一点区别，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的，如象张怀礼同志就反对这条路线。还有其他的同志。第二点区别，错误的重要责任在朱声达同志，江波同志也有错误，何其仁同志也有错误，决定上面没有写，这就把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和其他人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点区别，朱声达同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有他的书面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这就是把朱声达同志过去犯错误和现在愿意改正错误加以区别。

第三条，二十一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得很好，主席表扬过。

六十二师是从甘肃调去的，在兰州大军区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稳定了宁夏的混乱局面，在宁夏“三支”、“两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

兰州大军区是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表扬的，他们在支左中是很有成绩的，中央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无论在解决青海问题，无论在解决甘肃问题，无论在解

决宁夏问题，无论在解决陕西的问题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支持。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

第四条后，宁夏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地区，一方面靠蒙修，一方面靠苏修，还有马家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希望同志们要提高敌情观念。

第五条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

康健民同志，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

张怀礼同志，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

徐洪学同志，621 师副师长，

王志强同志，地方干部，回族，过去做过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副主席，银川市委书记，在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左派。

李天冲同志，六十二师政委，也是支持你们文化大革命，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命令到宁夏去的。

许仲波同志，炮十五师的政委。

乔克广同志，宁夏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

李江烈同志，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缺点，后来很快地支持革命派。

丁毅民同志，回族，受了迫害，开除了党籍八年，还坐过三年牢，原来是在山东的，在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今天，总理、江青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不要什么文件了。

陈养山同志，是一个老同志，开始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改正，群众很谅解。

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大致七个席位。

周总理：

同志们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急速大办特办，工厂也办，农村也办，机关、学校也办，街道里弄也办。

第二就是开步走，搞革命的大联合。把群众工作做到家，要赶快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已有十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十个是江西，后面还有几个，你们要赶上去，更前进一步嘛！

还有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陈毅对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的谈话

四、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转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五、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

《编号 0 0 1 5 6 5》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

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关于冼恒汉的审查“结论”说：冼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

贰、本节简论

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事件发展的过程过程基本上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

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他们把传单都撕了。

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冼恒汉打电话，

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冼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洗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洗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洗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洗恒汉说：“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 62 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 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 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

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洗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派野战军到宁夏支左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 2，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发生了青铜峡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并策划炸毁青铜峡大坝的事件。
- 3，宁夏支左小组将情况报告兰州军区，兰州军区当即转报中央。
- 4，周恩来亲自复电洗恒汉；要兰州军区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
- 5，兰州军区提出三点意见报中央，康生受周恩来委托复电兰州军区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兰州军区当即通知宁夏支左小组。

6，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

7，要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是完全正确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8，事后，对参与这一事件的群众，除极少数杀人、爆炸的坏分子以外，均可不以“反革命叛乱”论处。

9，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 0 0 1 5 6 5）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这是出于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考虑，是完全错误的。

10，通知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这是他们一贯不敢正视现实，捏造的说法。对青铜峡事件的性质及采取的措施，明明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怎么能说“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呢？！关于洗恒汉的审查“结论”说：洗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则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2008 年 7 月 22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9 日修改

第六章第三节 杨余傅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要杨成武随从南巡

（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林彪在红一方面军第 1 军团第 4 军任军长，杨成武在红 4 军第 11 师第 32 团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再次见到林彪

1938 年 9 月 25 日，在师主力于平型关发起战斗的同时，杨成武团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第 5 师团步兵第 9 旅团 400 余人，迟滞了日军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师主力首战平型关的重大胜利。

林彪被阎锡山部误伤返回延安后，到苏联养伤去了。他和杨成武之间便再也没有交往。

一九四八年，在平津战役前线，林彪与杨成武再次见面。

一九五九年，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和林彪的接触多了起来。

一九六五年底，批判罗瑞清，杨成武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罗撤销职务后，由林彪提名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

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说东道西。

在对待老干部、老师问题上，林彪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

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杨成武当时也在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师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受命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了。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过后，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的问题，综合整理后，于8月3日上午，又一次飞往上海。

3日下午5时45分至8时50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

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8 月 4 日，中午 12 时半至下午 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 1 点，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杨成武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深夜和杨成武等人谈话。

那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杨成武，晚上开会。

杨成武问：“什么议题？”

秘书说，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讨论以后几个月的任务。

晚上 10 点 25 分，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会议室时，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已经到了。

会议从 10 时 30 分开始，杨成武没有想到会开到次日凌晨 1 时 10 分，花了近 3 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视察。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他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

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杨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

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967年7月，根据林彪的指示，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

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1967年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 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 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1967 年 11 月 3 日，“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湖南请示报告的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毛泽东在该件做了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 36 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举行审查样板戏晚会，由刘锦平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出席。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出席，杨成武事先没有通知，临时请林彪到会。

叶群批评杨成武、吴法宪：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总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

一九六八年某月，黄永胜把一份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政变的情况简报批给叶群。

1967年6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这个请示报告所附的第一号调查方案即是调查叶剑英1934年在江西筠门岭战斗中被俘问题。

军管会负责人给黄永胜、刘兴元的密信

刘兴元密报给黄永胜的关于叶剑英被俘问题材料的密信

黄永胜的亲笔批件

1968年某月，文年生专案得到线索：叶剑英和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开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黄永胜与江燮元（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在1968年4月6日的谈话记录

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情况简报

黄永胜把这份简报批给叶群的文件

林彪办公室秘书李春生、保密员李根清的证言

（1980年12月3日下午3时，第二特别审判庭开庭审判黄永胜，伍修权主持审判活动。）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对吴法宪说：赵子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二、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关于杨、余、傅问题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在住处主持会议，讨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

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会议

接着，周恩来与许世友谈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晨一时，周恩来与叶群、吴法宪谈话。

接着，周恩来到江青处开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会议中途通知吴法宪参加会议。

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

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林彪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或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

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

经过四次讨论，会议通过了两项决定。

经林彪提议，会议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

司令。

毛泽东、林彪退席后，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

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

第二，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

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

第五，决定在 3 月 23 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根据毛主席、林彪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为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来到杨成武家里，当时工作人员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12 点半左右，林彪的两个秘书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他们执意要见杨，张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一个秘书说：“101 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杨成武说：“谢谢 101，不要紧的。”

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吴法宪通知余立金到他家商量事，余立金到吴家后，由杨德中率领的警卫部队带走。

不久，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电话到杨成武家，声音很是急促：“张秘书，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张秘书立即拨通了杨成武卧室的电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杨成武的家里，带走杨成武。

赵志珍刚推开门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全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被推搡着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年近 8 旬的老太太和只有 10 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但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恶狠狠地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闯进杨成武的卧室。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杨成武有点睁不开眼睛，他穿着睡衣，站了起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大的墨镜。他身后是手持短枪的士兵。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

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道走出房门。几个士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着进厕所。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早上五点左右，周恩来等人与郑维山谈话。

周恩来对郑维山说：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撤销代总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限，揭发杨成武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彪、周恩来等人与傅崇碧谈话。

林彪和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在小会议室里。

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都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天。

这时候，总理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

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

一会儿，林彪来了，总理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去。

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命令一宣布，总理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总理进来时天快明了，傅崇碧正和陈锡联吃水果，聊天。总理说赶快弄饭吃。傅崇碧吃了一点。总理问为什么不吃了？傅崇碧说不吃了。总理说什么也搞好了，是不是走？傅崇碧说我回去取东西。总理说，还回不回去？干干脆吧，要什么东西，你写个条，让陈锡联办。傅崇碧说不写。这么急，又不

是打仗。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

走出小会议室，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

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

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

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

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

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十余人都坐在里面。

林彪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民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走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江青说：“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吴法宪说：“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伯达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说：“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带头呼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杨成武说：“我说几句——”

江青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一一与杨成武握手告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的讲话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

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相上下的人。

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

会议决定：

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

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

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

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治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楚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

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

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

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

第二点，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大家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象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

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本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作坏了的事情。

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

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

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

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

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表面上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他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引了一句俗语“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就反对这句话。可是杨成武对于这种反对这句话的人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

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的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

八届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

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语言，那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

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

杨成武等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在进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两

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

前年，自从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们在党内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等等陆续的揭发出来，也把各地方党政机关、中央政府机关里头一些走资派揭发出来了。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按照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中央文革是作了极其伟大的工作，她带领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要想继续执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想要保护有一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发动的“二月逆流”，是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打击、继续打击红卫兵小将。甚至于提到历史，要为王明路线复辟，直接把矛头指到我们最伟大的、四十年代的我们的整风运动。就是说，二十多年以后，他们要搞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维护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到了去年七、八、九月，出现了形左实右思潮，如“5.16”。还有其它的活动，特别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事情，又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了以后，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藏在内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

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查清楚的。

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分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从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

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

（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现在只想谈一谈我对这些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的认识过程。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识破他们，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

例如刘少奇，他一贯封锁毛主席，其实他是一个四次叛变的大叛徒，大特务，大内奸。我们是有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送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又设立专

案组，有确凿的证据，有大量的旁证，这是铁证！叛徒、内奸、特务。他那个鬼老婆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的大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象王、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许多事不请示伯达同志，也不请示我，更不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九月五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把他端出来了。当时，我们为了受蒙蔽的、受迷惑的群众，我们很谨慎地采取了分割政策，我们大家讨论，并且向我们的毛主席请示了。但是王、关，我们分割不开，戚本禹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不然。到了下半年，戚本禹更猖狂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摆到台面上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例如去年十一月九号和十一月十二号两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就是不点名的批评戚本禹的。

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象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为了这个问题，我反对过他两次，我是跟他正面的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发展到今年（几号我忘记了）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当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跟我一样，可能有缺点、错误，也许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这是一个很正派的同

志，这允许吗？！

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 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

陈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

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起，到现在恰好两年。在这开始以后，我们就取得了几次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

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

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

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在总结这几次大胜利的教训，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教训呢？就是说，还是要防备一些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防备两面派。

杨成武之流也是这样，耍了很多把戏，是一个中等的变色龙，不大不小，但不是那么大，比王、关、戚稍微大一些，他实际上是王、关、戚的后台。（江青同志：他搞窃听、监听，偷盗文件，用特务手法邮检文件。据我们这两天知道，杨成武都有份。）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用这样或那样耍两面手法，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杨成武就是对上面欺骗，装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同时对林副主席，更不用说对毛主席，对中央、中央文革采取封锁的政策，在背后耍阴谋，搞背后活动。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充满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接触过的人可能会感到这种人有他的特点，正象林副主席讲过的，他是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

他搞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这篇文章事实上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这是真的，他在军事单位里，他就说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只改了一个字。

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放在我那里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商量过，谈过的。我们不打算发表他这篇东西。但

是他不断催，不断打电话。可是他是代总长呀。使我们相当愁眉苦脸，他看我们没有动，他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有把好关，让他发表了。最近这篇文章不让它突出，放在第二版。这时，他又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戚本禹又来向我们施加压力，戚本禹又向姚文元同志和我施加压力，说什么“为什么不登这些消息呀！他是代表全世界人民声音的，为什么不登？”我们说，杨成武他怎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呢？他不是比毛主席更高了吗？这一点我们到抵制住了。没有再给他机会（姚文元同志：同志们，那天各报第一版登的都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杨成武居然公开的施加压力，就是要把他的文章登在第一版，这不是要驾凌于毛主席之上吗？）（江青同志：我昨天还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跑到他家里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很可笑。（江青同志：是个小丑。）是非常卑鄙齷齪的资产阶级政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变色的小爬虫吧！

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

在 1953 年、1954 年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革命面目；

在 1959 年揭露了彭、黄、张、周的牛鬼蛇神反革命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中间，从 1965 年月日 1 月姚文元同志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到 1966 年 6 月 1 日，就揭露出来了彭、罗、陆、杨的反革命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阶段，1966 年 6 月 1 日以后到 1967 年“一月风暴”以前，由于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路线彻底揭露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从“一月革命”以后，又将叛徒陶铸的反革命的面目，将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及其一伙，揭露了他们的反动逆流；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争取全面胜利阶段中间，毛主席的阳光又将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中间、是刘邓安置的变色的小爬虫王、关、戚的面目揭露出来；

现在又将阴谋家、两面派杨成武，叛徒余立金，以及傅崇碧他们的两面派面

目，反动的面目揭露出来了。

这些胜利的取得，在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导下面，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胜利的时候，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二月逆流”是 1967 年二月中旬，一直到三月中旬，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中间，所发生这样一种反革命的反动逆流。当时是在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反对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的阶段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以叛徒谭震林为首的还有几个人跳出来了，他们坚决的支持刘、邓路线，公开地、狂妄地、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付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江青同志：抓“军内一小撮”杨成武是负了重大责任的，在我的批评之下，他曾经假惺惺的写了一个自我批评。他自己身为人民解放军，要破坏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们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推及到二十几年以前的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他们恶毒的攻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且涉及到毛主席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矛头对着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他们否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的原则，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污蔑成为“形而上学”。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他就是反对了毛主席对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几十年来的党的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他们是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完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否定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和相信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这种阶级路线。他们想迷惑一部份、欺骗一部分人来组织他们的反党集团。否定阶级路线，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主席的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样就引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愤怒，引起中央文革同志的坚决反击。在反击中，谭震林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中间拂袖而去，并且声明，说是要砍脑袋、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等人，他们不甘心退出舞台，他们还想垂死挣扎，所以，他们的爪牙杨成武跳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补充一点，杨成武这一次跳出来，他以前当然就做过很多的坏事，是他指挥傅崇碧冲中央文革所在地受到坚决抵制之后，江青同志对于傅崇碧这一种错误的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作了原则的批评和斗争，这使得杨成武非常紧张，就在第二天，他就突然称病，在背后耍阴谋，妄想夺空军的权，夺中央文革的权，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对谢富治同志，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讲话完后，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江青 康生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周总理：现在宣读命令。

江青同志讲话：

现在有的学生说是要油炸我，绞死我。等到我空了的时候，我就亲自去叫他去油炸，要让他绞死我。

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别有用心的人就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什么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一批二保。复辟就搞起来了，而且说他是一贯正确，这对不对？对余秋里要一批二保，这是我们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还是要作，但是革命小将就不要上他的当了。

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有人又企图利用这样的事情来否定中央文革。

在三月八日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当场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那一天以后，杨成武忽然间说：病了。其实他在背后天天开会，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叶群：打倒余立金！）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夺了一系

列的权都被我们识破了。

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付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问题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们！（总理：一批二保）。

目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在反动的那方面占优势，要击溃他们！
康生同志讲话：

王力是个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信，（口号）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么说：他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的时候就舒服了，就已经象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叛徒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诱导的作风”，诱导他到反革命的作风。戚本禹说他“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缺点，更加意识到应该努力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就是要全部投降。

陈伯达同志讲话：

这个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经过了几个大的战役，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

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

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

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

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

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

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

周总理讲话：

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好好地改正错误。至于广大的指战员，是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不管当年我们的部队是从哪个根据地来的，现在你们还不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分什么彼此呢！

北京市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指导成立起来的，另外经过去年的一月风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说，要经过革命代表会议，一个个地成立起来以后，再成立总的，所以成立了四个代表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成立了以后，我们四月二十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在那个会上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把去年中央军委一月的八条、四月的十条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这一点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是红色政权，初期总是有些粗糙，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出了个别的坏人，这没有什么！好象小孩子刚生出来，总要害点疹子，害点病啊，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她要生存下去，成长起来，要健康下去！所以谁要痴心妄想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搞垮，那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现在全中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正如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五·一”前基本上可以成立起来了，完全成立起来了。

在几个月前就有福建一个战士来了一封信，给杨成武，说你的这个文章，首先题目上就是错误的，毛主席的权威是经过无数的实践、革命奋斗，经过广大人

民的智慧，被毛主席集中起来，系统化了，成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人民中，革命人民中，生根了，扎根了。还有什么大树特树的必要呢！这种人为的大树特树，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你看一个福建前线的战士，他敢于批评当时的代理参谋长，这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有革命修养的，是学习了毛主席宝书的，熟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这一点应该引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们的骄傲。

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付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

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今年元旦社论，得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的五条任务：

第一，好好地来进行学习。我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提高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战斗的水平。

第二，我们就在这个学习班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把全国 29 个省市争取在“五一”前统统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各个战线上，各个部门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在应该夺权的地方实现革命三结合。使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能够把斗批改搞好，实现勤俭节约闹革命。

第三，我们要强调拥军爱民。

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工人同志，我们的责任很大，不仅要把革命抓好，在革命的原则基础上要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席，不能旷工，不能搞。我们要反对那些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缺勤呀！旷工呀！要真正的把我们的生产搞得更好。我们相信今年——1968 年北京的生产不管是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也要在全国树立一个榜样。我们的机关、我们的学校都应该搞好斗批改，以后我们更多的人去接近群众、接近工农，投入生产支援工农业，精简机构，真正实现斗批改的成绩。

第五，就是各个单位根据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小组的组织来进行整

党，也要整团，整理红卫兵的组织，整理革命的队伍，把坏人清理出去，把积极分子提拔起来担负重要的职务，这样子把我们的队伍搞得更整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经过锻炼考验的人跟广大的军队代表结合在一起，引起军、干、群的结合，革命的老、中、少的结合，这样子就能够有力量来准备，迎接我们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次代表大会！

三、杨、余、傅在关押中

一九六八年三月，杨成武被押送到武汉后，很快转移到湖北孝感，没有多久又被转移到河南。

他的妻子赵志珍和孩子们关押在这里。

杨成武要来了纸笔，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

信交上去了，都石沉大海。事后杨成武才知道，他写的 20 多封信全部被扣押了，并被下令焚毁。但一个人把这些信秘密地收藏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傅崇碧突然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职务，不让交接，甚至家也没让回，他有牢骚。

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走出小会议室，

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

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

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

当然，没有任何人再给他讲什么，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关七年。一个加强班 30 多人看他一个，不到一两个月就换一个地方，大概是怕让人知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9·13”事件后，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从捡来的报纸上敏锐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 40 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来一个人，说是要向她做调查。她也很认真地和那个人谈了话。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神秘地“自杀”了。

四、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1972 年某月，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管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把自己的分析告诉杨俊生，并把杨俊生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主席。

缪锡跃自己还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总理采取了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一支到滑县，以很快的速度，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出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

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

一九七二年某月，两个陌生的军人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其中一个很客气地对杨成武说：“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杨成武对赵志珍说：“好事，咱们要解放啦！”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北京白广路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汪东兴说，他是奉命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的：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觉得热血直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和最后出逃的情况。

杨成武说：“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说：杨、余、傅都要翻案。

毛泽东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杨成武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他。

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总理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

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

周总理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周总理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后来，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对他们的工作也谈了些意见，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工作。这实际上是对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平反。

一九七四年八月，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

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个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七年与人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是他不再进屋来。

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肖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

第四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车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总理。

总理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的眼泪下来了。见到总理，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了。

总理说不要激动，你受了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周总理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说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肖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

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

总理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 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人派个车。……

总理一一把这些事交待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总理说：不要紧。说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总理说：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傅崇碧说：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我不干了。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一九七四年的九月三十日夜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 25 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一九七五年，“解放”了的杨成武，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那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总理给毛主席的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 10 月 20 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

事名单，估计 10 月下旬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同志改正。周后注 11 月 9 日）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工作和学习。待成熟了，小平可以不兼总参谋长，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都是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看了这封信，杨成武深深感到总理的信任，也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五、杨成武又一头钻进了政治旋涡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杨成武打心眼儿里拥护。

一九七六年某月，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在指挥演习时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叶剑英等领导人派杨成武和梁必业、张震一起去处理后事。

一九七六年，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杨成武是主持工作的副总长。

后来，叶帅被迫“靠边站”了，杨成武照样向他请示。

一九七六年九月某日，聂荣臻元帅把杨成武找了去，对他说，那几个人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你要告诉叶帅，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聂荣臻还说，他们有特殊身份，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要出大事。

当晚，杨成武上了玉泉山，找到了叶剑英，对他说：“叶帅，聂帅有要事转告您。”

叶摆了摆手，说：“出去散步。”

杨成武明白了，叶是担心隔墙有耳。听了杨成武的转告，叶说，我们的想法一样。

那几天里，杨成武往返于几个老师之间，给他们当起了“联络员”。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叶剑英又把杨成武找了去，要他告诉聂荣臻，已经商量妥当，准备马上采取行动。同时叶又叮嘱杨成武：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杨成武又经历了一次职务的变动

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约杨成武在三座门谈话。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中央决定你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等形势缓和后再回总参工作。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后，罗瑞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傅、余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通知指出：1968年3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

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

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

通知说：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

通知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

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通知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一九八三年十月，杨成武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

贰、本节简论

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

当时，陈伯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以后，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是把杨、余、傅勾结王、关、戚作为“五·一六”的后台。

二、“杨、余、傅事件”并不复杂。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参加，讨论杨成武的问题。周恩来说：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检举的。林彪说；讨论了四次。三月二十二日，作出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关押审查；傅崇碧调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按照林彪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有三点：第一，山头主义；第二，两面派；第三，绝对主义。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

杨、余、傅全部平反，恢复职务。

三、“杨、余、傅事件”的真相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

所谓“杨、余、傅事件”，林彪在宣布时虽然说了三个问题。

其中关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是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人民日报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九六七年底，毛泽东在批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说过：主要是陈伯达的问题。

关于山头主义，当时，林彪说：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

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

文革前以及文革后，炒得最热的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发生的“桃色事件”；另一件是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作为当事人的吴法宪，从一开始到后来，就对这些说法抱有怀疑。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要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牵连到他的妻子陆力行，那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第730页）

林彪集团的另一个主要成员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杨成武事件谈了自己的看法：

搞掉杨成武，不让江青在军队中有代理人

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江青发现了杨耍横的本钱在于她，江青对杨的拉拢，有些毛是知道的，有些是江青的私货。当然，江青认为她在主席面前的形象最重要，杨成武在她眼里算个屁，江青是个极其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人，她一反常态，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坚决要求打倒杨。然后，毛主席、林总、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对杨的倒台是挺无奈的。杨自己也太不争气，自己打倒了自己。如果杨留下就等于把江青在军队的代理人留下了。

(99)

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或者说杨成武是江青害倒的。杨成武如果不公开表示投靠了江青，是无论如何不会下台的。即使问题再严重一点，也不会下台。林总说过：“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是，林总为了不让“上海帮”破坏军队，决心放弃杨，他虽然没有参加主席主持召开的会，但林也没有给杨求情。杨成武为什么投到江青那里去了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主席对江青的

评价是高的，是信任的，主席实际上是让江青在中央文革主事的，杨是看在眼里的。二是他认为自己同林彪的关系是不需要多考虑的，稳如泰山；如果同江青也能密切起来，那就是“双保险”了。关键的问题是林和江不是一路人，这种“双保险”在政治生活中是做不到的，“双保险”变成脚踩两只船，结果翻了船。

(105)

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

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杨成武、吴法宪在林彪同江青的关系上，都办了一些事。他们两个人的作法则根本不同。吴法宪是在忠于林彪的前提下，去同江青打交道，吴法宪只能做一个忠实的“传话筒”。杨成武就不同了，在多数问题上，他和吴是一样的，但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杨是夹带自己的意见和打算的，林也万万没有料到，杨对他也是两面派。林总更没有料到的是，杨成武竟敢以江青压林！林总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这样杨成武根本不可能继续成为军队统帅的实际副手了！

综合吴法宪和邱会作两人的说法，可以看出：搞掉杨成武是林彪又玩的一次阴谋，他就是要把军委办事组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以便他篡党夺权，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一三以后，毛主席说：在杨成武的问题上，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五、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杨成武又一次卷入了政治漩涡。

在十月政变中杨成武充当了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之间的联络员，成为掌握、调动部队，作为政变后备力量的主要负责人。

由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说一九六八年杨成武参与了叶剑英等人的政变活动，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杨成武在左右两边如此摇来摆去，也不可能得到邓小平、叶剑英的充分信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罗瑞卿等人恢复职务以后，他就派到福州军区去了。

2008年6月24日初稿

2011年11月8日修改

2012 年 5 月 13 日再修改

第六章第四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上的讲话

郑司令员：

我讲一下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我认为是革委会每个同志都应有自己的态度，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究竟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我认为我们革委会中每个同志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我很同意今天上面几个同志的发言，为二月逆流翻案，事实上是自毁长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个人意见坚决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个中间，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这个意见，但是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人站队站错了，旗帜不鲜明，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立场，检查一下自己站队站对了没有，态度明确不明确，这是对毛主席、对林付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对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自己鲜明的旗帜，应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态度！

北京市革委会是以谢副总理为首的领导下，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身边的新生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的。我个人跟上面同志的看法一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的，所以，我们应该拥护革委会，支持革委会，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傅司令员：

最近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个大问题。

吴德同志：

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这是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什么“打倒彭真第二”，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这是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翻案，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文章指出：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

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 65 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 23 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四月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陈伯达说：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周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说：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潘复生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 5 万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潘复生于 4 月 14 日、16 日、5 月 11 日、21 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章指出：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复旦大学等校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大字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成员、《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串连一些人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革命委员会，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三、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么？！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台。商丘一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手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我们打垮了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的进攻以后，当前又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逆流。有些坏家伙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江苏的代理人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为叛徒、特务翻案，为黑手翻案，搞保杜、保高活动，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故意制造混乱，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经常放阴风，点鬼火，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关系，挑拨军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甚至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甚至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进行恶毒攻击，妄图否定伟大的群众运动，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极“左”思潮的代表。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有左、中、右各派的区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作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只有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部队，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完整地、真正地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才能有最强烈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党性。我们一般所说的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党性的斗争。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说，不仅要看他们的口号和言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实际上站在那个阶级一边，执行的是那个阶级的路线，他们的行动对那个阶级有利。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无产阶级先锋队历来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安部侦破“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嫌疑犯的供词中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徐向前等。

十二月，公安部根据嫌疑犯供词列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名单。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

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令办公室广为散发，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总结丰富的阶级斗争实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作为无产阶级的左翼，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新形势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切实地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要防止斗志松懈、停滞不前的情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顾革命的大局。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妄想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活动。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准许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文章指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

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红色字体是毛泽东审稿时加上的）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湖南“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根据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宣称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

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站在梁、尚一边的红“3·30”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8·19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实际上，在一些市县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由于一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1·24”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1·24”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源，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楚，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决不能使我们麻痹起来。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妄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足为怪。我们要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开展持久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把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少数的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八年六月初，哈师院和农学院一些人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范正美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

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字”、“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范正美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一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能不经历十分剧烈的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的斗争，会经历一个很长时期。革命委员会逐步巩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离间和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联系。他们或者大刮右倾翻案黑风，妄图扰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施放糖衣炮弹，妄图欺骗或腐蚀我们的同志，使革命委员会某些成员脱离群众。

不论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不论是清理阶级队伍，其阶级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极少数阶级敌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大批政治案件被发现和破获。乌兰夫集团一明一暗的两套班底和“新内人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发。由乌兰夫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革命翻案集团被砸烂。披着革命领导干部或革命造反派外衣的，伪装革命而实际反革命的两面派有的已被挖出。这就粉碎性地打击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特别是牧区，今年一月兴起的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牧区，所到之处，砸烂了乌兰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牧区残留的封建和宗教势力，横扫了日本帝国主义、苏蒙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一切残渣余孽。

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号通告和五月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纪要正确的。

当前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集中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妄想从根本上破坏和否定伟大的“挖肃”斗争，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翻案，为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翻案。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要弄的反革命新花招，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①阶级敌人从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我们迂回斗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有时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名，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实。他们接过反对“整群众”的口号，死捂阶级斗争盖子，保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装出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样子，极力扩大打击面，把矛头引向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以转移视线，乘机溜掉。他们还会采取揪明保暗的办法，把一些次要的人物推出来，牵制我们的主要力量，“舍车马，保将帅”。他们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残酷打击了一些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以保住自己。他们还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妄图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之间斗争的歧途，等等。这是阶级敌人狗急跳墙，进行垂死挣扎的突出表现，是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的主要手段。

②施展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搞右倾分裂活动，妄图分裂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和煽动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施展借刀杀人的毒计。他们捏造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制造革命组织之间“磨擦”，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抓住小事小非，无限上纲，激化矛盾，造成长期对立，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挑起“内战”，煽动武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搞臭，以转移视线，在混战中求得生存。他们有的披着革命的外衣，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花言巧语，上窜下跳，左右煽风，挑拨军政之间，军民之间，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部队和部队之间，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极力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而我们有一些糊涂人，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正在上当。

③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人推出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破坏“挖肃”斗争，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暂时不理解，恶毒的把这场斗争污蔑为“跟中央唱对台戏”，“打击老造反派”，“支持老保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糊涂人，由于右倾思想作怪，也跟着敌人瞎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出发，非常注意社会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狂呼乱叫，蒙蔽和煽动群众，刮起翻案妖风，例如：当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造谣，乱叫，“×××是杨成武线上的”，“搞挖肃斗争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看不到内蒙革委会的右倾是最大的右倾”。当自治区革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政策界限，引导群众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时，他们又狂叫，“挖肃斗争大方向错了”，“打击面宽了”，“纠偏了”，“刹车了”，等等，等等。

④施放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革命意志。他们有的利用小恩小惠，金钱美女，腐蚀瓦解我们的队伍。有的利用某些同志喜欢奉承的弱点，歌功颂德，肉麻吹捧，设下圈套，使其中计，诱惑他们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还有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暂时窃取的权力，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的财产，滥发奖金，补助，拉拢部分落后群众为其服务。这种种手段，其目的就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的翻案活动。

⑤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散布“搞生产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停产，就是全面胜利”，极力煽动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制造事故，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设备，造成停工停产。他们有的诱骗落后群众，投机倒把，退社单干，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制造紧张空气，破坏市场供应，利用封建迷信，腐蚀群众，蛊惑人心，以瓦解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半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要胜利进行“挖肃”斗争，就必须狠反右倾。首先在呼市文艺界兴起了“挖肃”斗争，一举揪出了披着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实则反革命的特务分子特古斯，打了一个前哨战。右倾思想还在顽固地抵抗，污蔑革命群众揪出特古斯是“形左实右”，是“黑手揪红人”等等。今年一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口号，选择公开包庇坏人的公检法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首先在呼市开展了“群众专政”，同时在牧区提出了划阶级、斗牧主的战斗任务。一开始就揪出了黑司令官苏修特务王再天，在三月底四月初，乘揪出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之机，向我们举行反扑，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支持“老保翻天”、“压制老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办学习班的形式，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的通知

最近发现流传着一些谣言，有的是口传的，有的印成了小册子，传单，有的是伪造的文件，讲话材料。例如，被说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关于“五个回合站队问题”的讲话，就完全是伪造的。这个材料流传甚广，有的人根据这个材料的观点搞重新站队，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

一九六八年八月，哈尔滨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专案组，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

一九六八年八月，湖南省革委会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省委机关干部“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梁春阳、尚春仁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重要讲话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他们煞费心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杆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他们提出所谓“四反”“一粉碎”。

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

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潘复生借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省革委扩大会议上，组织对范正美、宋振业的大会批斗。先是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范正美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范正美认识不高、检讨不深。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范正美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

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就将范正美和宋振业隔离审查，派人轮流看管，直到 1969 年 5 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这期间，共组织对范正美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

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

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八年三、四月提出反三右一风的背景

1，三月，北京出现了为“二月逆流”、为谭震林翻案的风潮，周恩来以及北京市的领导人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吴德都出来表态反对翻案。

2，三月，出现了杨成武事件，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

3，四月，公安部侦破“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嫌疑犯的供词中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十二月，公安部根据嫌疑犯供词列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名单；这些审讯材料肯定有真有假，结果如何？希望这些材料没有被销毁，给后人一个交代。当时肯定是引起了最高当局的警觉和重视。

4，一些省市发生了针对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事件，如上海复旦大学等校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大字报；河南省有人提出“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砸烂派性委员会”；湖南省有人提出一些县市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老保翻天”等等。

这其中就包含着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投降等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从三月到十月，中央查处的重大案件，进展不大，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它搁置下来。

一些省市发生的问题虽作了相应的处理。其中的情况又各不相同。

对黑龙江省的“炮轰”省革委会一派，中央作了正确处理，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回去后虽然有少数人继续活动，但多数人都能在省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工作。然而，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对炮轰派的人继续进行打击。

湖南省批评省革委负责人的一派不是搞三右一风而是反对三右一风的，他们的意见确有合理之处，但他们的一些作法又违背了中央布署和政策。对他们的处理，似乎过重了。

四、十一月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山东、湖北、河南等一些省发生的“反复旧”运动，是对反三右一风的延伸，但已经不属于中央发起反三右一风的范畴了。

2011年11月19日初稿

第六章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概述：

一、支持安徽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你们是来控诉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你们的压力，犯了罪恶，你们的控诉，我们支持你们！

前一些时期，在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现在是既反对革命又破坏生产，并把革命的锋芒推向上，矛盾上交，他走开，办法是经济主义，矛盾上交。

要按系统岗位组织起来，譬如学生就以学校为单位，如蚌埠商学院以商学院为单位，合肥农学院以合肥农学院为单位，再联合全市。

至今还没有批准任何全国性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组织。我正式宣布有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批准。

现在北京有反动组织，最近破获两个，一个冒充为“全国工农兵红色造反夺权总部”；还有一个“红旗军”，在东北哈尔滨有，北京有，湖南有，最近杭州也有，说这组织是毛主席批准的，根本是造谣。这头子是反动的，逮捕了两个头子，刘沙、胡国光。

北京有西城纠察队，其他还有纠察队，思想变坏，打人杀人。逮捕了一些头子，最近这些青年人受人欺骗，组织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实际上乱窜，下半夜活动，骑摩托车、自行车、喊反动口号，也要把反动头子逮捕，教育群众。在陕西有个“红色恐怖队”，（西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 15 万到 20 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

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

照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

发了这个决定。

二、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联合委员会等革命组织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由于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遭到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一司、工人三司、“红卫军”，“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夺权的一派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采取补救措施，而是以对待“一·二六”夺权的态度划线，把反对他们夺权的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实行镇压。在安徽各地逮捕了一不少人。对逃跑了的人还发了通缉令。

三月十五日一次武斗就打伤对方几十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夺权代表时的讲话

从现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县要到北京来捕人，一定要经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

不能擅自下通缉令，过去下的通缉令应当取消。

不许对持不同意见的实行镇压逮捕，已逮捕的一般应当立即释放。

不准武斗。

不能随便去制造谣言。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

六、“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的讲话

康生宣布并解释解释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讲：希望你们回家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在中央九条的指导下，允许改正错误，真正揭露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1967.04.01；中发[67]117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对安徽造反派的电话指示

周道元：周总理，我是周道元，是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的。

周总理：你们今天一点钟要开会吗？开什么会？

周道元：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周总理：你们的主题和中央的意见不相同了。怎么能把矛头对准严光呢？这个会不开为好。大字报主要应该对准李葆华。对严光同志的大字报可以送到省军区和军管会，不要满街贴。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安徽合肥四月十六日开追悼大会的问题的指示

安徽省合肥市工人一司并请转告各革命组织：

一、你们要在四月十六日召开十万多人的追悼大会，我们认为这样的追悼大会不宜召开，我们不赞成你们开，现在全国正在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请你们立即说服各革命组织，不要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二、我们建议：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注意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安徽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葆华，决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

三、安徽两派同意联合贯彻江青九月五日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首次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安徽有一股力量是反对“九条”、“五条”的，有的是不坚决执行的。省军区就有这样的同志。安徽在7月下旬出现了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反动口号（指打倒王力、康生、揪出后台等口号）。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再挑起武斗了！

芜湖联总代表汇报了被三筹处打到外地——南京、上海、合肥、武汉、北京等地联总战士和留芜战士人数，总数约十万人。）

三筹处代表：联总骗人，没有十万。

总理：难道你们没有骗人？你那七万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康老讲话：曹在凤同志、梁守富同志对 6408 部队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向 6408 部队赔礼道歉。

江青同志讲话：

现在讲一讲形势问题。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那当然在某些地区个别地方觉得严重，其实不然，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如果从历史来看，今年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了！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也锻炼了革命干部。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你们比早一个时期更好。现在各省大体上这样。当然个别地方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此外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总之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对这个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就是说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重要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配合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我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讲，首先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外，还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等等，他总是要破坏的。

（第一个问题是党中央。）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上当受骗。从右的方面，就是今年一二月间有一股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声明，如果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样的情况。我说是这样的文攻武卫，不要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就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那么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是不是说

军内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军队的同志错误缺点是有，应当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

第三、谈革命委员会问题，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出来的这股歪风除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人民解放军，抓一小撮，第三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混进去，但他毕竟是个新生的事物，他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有的人就要把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搞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挑动吗？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的指示

九月五日晚，康生、江青、的指示传到合肥，全城沸腾，群情激昂，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长江路灯火辉煌，鞭炮齐鸣，表示庆贺目前合肥一派大好形势。

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

二、提高警惕，划清界限，揪出自己组织中的黑后台、坏头头。

三、坚决执行“九·五”命令。

四、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首先加强了两派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接见安徽支左部队有关人员讲话

合肥市听到了江青的讲话，当晚两点就轰动起来了，合肥前一个时期武斗很厉害，今后亦可能为大联合作出模范，要求安徽作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

1967.09.23；中发[67]306号

毛主席批示：

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安徽“P 派”和“G 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九·五”指示》的一个材料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

实践证明，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一个地方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尽管在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分歧，都是可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

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向安徽省革命群众学习，大力展开拥军爱民的活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安徽省七地区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

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德生传达康生对安徽省军管领导小组的指示

李德生说：芜湖出现了反对“九条”，矛头对准中央，有的跑到北京来闹，反陶二世等等。前时候，芜湖来的三个人在中国科学院被群众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分局。芜湖军分区的同志叫他们把这三个人放了，现在追回一个，还有两个跑了。

芜湖的问题，我们不能看成是一个群众问题，这里面有无黑手，坏人操纵。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在的大好形势下当然也有些逆流。特别在安庆、芜湖、蚌埠有，这种反复是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是有规律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怎么反复，中央的方针、中央文革的指示，群众会逐渐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嘛，群众是不赞成现在再分几大派，分裂嘛。这个方针是定了，这个方针是不能变的。所以你们安徽的形势，就象主席最近指示的要防止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罗，想破坏中央的方针，破坏我们的大联合，破坏安徽的大好形势。

两派性质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问题，如果按着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看起来容易解决的。就是说，除掉派性，除掉宗派观点，容易解决的。因此，同志们还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私”字，一天不斗，一天还要生长的，所以，从斗私批修，大联合中来看问题。

张春桥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说把八条、“十条”合在一起就提出“拥军爱民”，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这次重制录音要在全国放。

我们部队在执行“八条”时过头了，“十条”下来群众回击了我们一下。“六·六通令”下早了一点，时机不成熟。

“五·一六”只有少数黑手，群众是受蒙蔽的。如果通缉“五·一六”就易造成对立，秦化龙也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一个组织的坏头头，也要依靠群众自己去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廖容标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的指示
中央十月廿六日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正式作了批示：

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同志、张文碧同志、李长林同志、宋佩璋同志、林育生同志、李保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同志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为付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着整

个安徽省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安徽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指示，严光、宋文同志并没有真正地执行，毛主席要支左，他们是保右，甚至错误地做出决定，要部队不同“八·二七”革命群众一道读主席的语录，一道唱主席的语录歌。他们甚至通知了李葆华，那就是说象他们自己检讨那样，假支持，真保右。象他们检讨那样，从开始一直到这次会议，他们总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对抗、抵制，所以他们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他们的这种错误影响了各军分区，这种错误影响了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使安徽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三月份在这开会时，严光同志同彭胜标同志当时对我们、对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不满意的。应当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对他们作到严格批评，《九条》上没有点他们的名，没有明显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他们不满意。严光还企图把党中央同军委隔离开，企图找总参谋部的人告状，可是他们没有实现。从北京一到南京军区就表现不满意。回到安徽他们并不是真正执行《九条》，教育好派，坚决实行。他们实际上挑动群众对抗《九条》，利用夺权派对中央没有批准他们夺权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这样，引起群众分裂，最后武斗时他们发枪。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自己讲过，是死保李葆华，而且还作了镇压革命群众的作战计划。前一个时期镇压“八·二七”，后一个时期镇压炮轰派。省军区也只是一小撮人反对《九条》；实际上反严光、宋文的，从二、三月间，司、政、后干部、战士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反对他们的。在二、三月间，严光、宋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在省军区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二、三百名干部。甚至于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禁闭起来，有的流放，有的迫使他们退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一律平反。在中央四月一日《五条》中有一条，给被打错了的人平反。《九条》中间也讲了。严光、宋文对抗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平反。

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军管会呢？就是中央没有批准夺权，成立军管会就是不承认合肥的那个夺权。为什么叫南京军区钱钧同志去主持军管会，这就是严光、宋文不能主持。改组，说明严光、宋文不能参加军管会，所以新改组的军管会就没

有他们。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

派十二军去安徽支左，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极大的关怀。安徽有些地方有人反对十二军，污蔑十二军是“陶二世”派去的。“陶二世”，这是对我的，这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安的帽子，这完全是污蔑，是极大的反革命污蔑！敌人、走资派制造谣言在安徽是“集大成”的。当然其他地方也有造谣的，但安徽是突出的，他们甚至竟敢假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假造陈伯达同志复林副主席的信，在阜阳、涡阳散发。在芜湖、蚌埠、安庆，表现很明显，特别是在芜湖。安徽有人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还要炮轰、打倒周总理，还要打倒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我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谢富治，谢富治没有到过安徽，还要打倒，你们想想这是革命行动吗？

好派的李文安同志、李胜利同志，都作了自我检讨，炮轰派也作了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宝贵的，这是符合主席要求的。最近有些地方有些反复，这又说明了什么东西？说明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不是开一次会进行一次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不时刻掌握毛泽东思想，时刻掌握中央指示，这种派性它还会发作。

周总理讲话：

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以后，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当天晚上双方传回去，各自将自己的黑手和背后操纵人揪出来。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好事，马上把它通报全国。江青同志九月五号讲话录音，不仅在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听，而且在全国各机关、企业、单位、工厂、各学校、部队、公社都放了，就是说江青同志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毛主席司令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是起到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而且超过中央书记处的职权。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讲的话嘛！

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根据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调十二军来主持安徽的支左工作。就在这次你们开会以前，没有一个野战军在安徽为主力，所以这个决定是我们最高统帅、副统帅决定的，直接跟南京大军区商量，不是调一部分，是全部队，也可以说绝大部分转到以安徽为主，住在安徽支左，来负责军管，推动安徽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学生虽然起了突击队的作用，现在拿学生的派性强加于工人阶级，那工人阶级就不能接受了。（呼口号）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希望你们其他的地方，大联合要以工人运动为主，先从工人阶级联合起，因为安徽许多大中城市，许多工矿企业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交通运输，不仅有一个淮南，还有马鞍山，有芜湖，有合肥，有蚌埠等等。这些地方大联合都要以工人为主，这就是说学生不去干扰厂矿工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嘛。这样学生会受到教育。现在学生应当结合工农，首先是工人。

《九条》、《五条》发表以后，我批评过群众准备开群众大会来斗争严光同志，我们说还是背靠背的揭发，可以揭发，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到这么个条件嘛！他还是军管会副主任，因为群众大会一批，当然不可能继续工作了。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眼光来看前进了嘛！严光、宋文两位同志不管在李葆华的时候，过去在曾希圣的时候，和地方关系搞的久，和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他就要犯严重错误，一直坚持反动路线，一直到《九条》以后还没有改，这次要彻底批判，并且改组军管会，改组军区，这是需要的。要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军区没有改变。这次不同了，十二军去了，你们又说“十二军算老几”。十二军是我们统帅、副统帅调去的，主持安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部担负起来，所以改组军管会，也要改组军区。这个事情，我们和南京军区许世友、钱钧同志都商量过的，钱钧同志还回南京军区担任他的职务，不存在《九条》有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对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的批示

《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很好。这是安徽省革命群众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成果，是坚决捍卫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五条》决定的重要措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这个协议。以“斗私，批修”为纲，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安徽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

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驻合肥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的电话指示

（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劝说无效。怎么办？）

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对驻合肥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的电话指示

（李德生报告：芜湖“三筹处”的四个组织冲击部队，抢走枪枝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4. 14；中发 [68] 61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安徽省军管会四月十日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李德生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安徽省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开始就积极投入运动，同刘邓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展开尖锐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一日毛主席对安徽驻军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英明指示，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和五条批示。九月前后，康生同志多次接见了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并作了讲话。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对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不仅引导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指导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辉煌成果，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隐藏在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这一夥阶级敌人或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散步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此等等，充份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搏斗，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李葆华、黄岩等的反革命罪行，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揭穿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各项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狠抓阶级斗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支左不支派，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

了巨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安徽是我国煤炭钢铁、粮食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省分，是我国东南水陆交通运输的要道，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工农业生产，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把安徽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

不要说谁反对我就打倒谁。在安徽的确有个时期，有的不明真相或受蒙蔽的人写过大字报要打倒我。我正式声明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对写过大字报的人不要进行攻击，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希望同志们再三转达我这个心愿。我过去的谈话中对个别同志，个别干部，个别解放军指战员作了些批评，对的，同志们就改正，不对的，请同志们谅解，我是出于对同志们的爱护。话可能讲错，讲过了头，请同志们谅解。

许世友讲话：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们要坚决照办！一百个照办！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口号）我们要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同志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坚决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军委就打倒谁！我们解放军，不管任何人都不准讲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军委的话，谁讲就是犯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的一切一切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句话，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周恩来讲话：

现在安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将近两年了，你们经过了许多次英勇奋斗，许多次激烈斗争，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值得欢迎的，值得我们庆贺的。（口号）这个革命委员会是省的，还需要把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现在有的已经建立了，有的还没有建立，要把各个工厂、学校、机关、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要建立革命委员会，首先要联合起来，要联合，就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现在全国各省市已经建立了二十个革命委员会了，你们是第二十一位。我想，虽然你们是名列二十一位，希望你们后来居上。后来居上是指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各派群众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跨行业的，象伯达同志说的那样是个大杂烩，那样就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前几天，就是四月八日在长沙，在毛主席的故乡宣布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是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是不甘落后的。你们那里跨行业的组织，通俗地说法就是好派和屁派，用外国字就是 C、P，现在大联合了，这些派都不能要了，就是象同志们说的，要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反革命派。（口号）我们要打倒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要建立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第二件事，你们报告上写的最高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今天又听到了毛

主席的最新的解释，我们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要吸收很多年青的革命造反派，就是无产阶级左派，朝气蓬勃的干将参加，就是说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还要加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我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接近朝气蓬勃的。当然还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一百五十九名，军队很谦虚，退出了一部分，只有二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五，革命领导干部三十二名占百分之二十，加在一起占百分之三十五，群众代表九十名占百分之五十七，机动十三名占百分之八，如果机动数里面再有群众代表的话，群众代表就超过百分之六十了。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数是二十至三十岁的，少数超过四十岁，从整个比例来看，是青年、中年人多，是有朝气的，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在实践中证明是朝气蓬勃的。

第二个比例，是常委中看老中少的比例。二十九名常委中，五十岁以上的有八人，四十岁以上的八人，四十岁以下的十三人，老的不超过六十，绝大多数是中年、青年。从年龄来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也是有朝气的，当然也还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还有第三个比例，就是在常委中军队也是很谦虚，只占七名，革命领导干部占十名，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占绝大多数。新的血液加入革命委员会，说明这个委员会是实现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年轻的较多，我们很高兴。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本来你们的常委中女同志很少，当然现在也不多。我们中央文革对别的省也提出过增补女同志，但都比较困难。你们安徽省做了模范。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因为她是女同志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也是支持这个意见的。四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德生，廖成美同志响应很快，立即打电话回去，马上就增补了女同志。现在已有五名女同志，在副主任中有两位女同志。二十个省市都赶不上你们，你们是后来居上。这是值得祝贺的！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只有一位女同志，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嘛！希望你们安徽在抓机动名额中也注意这个问题。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中很多都是很能干，一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掌权时就把女同志摆在一旁，这是很不公正的。我接触到很多到北京

来的女同志，很能干，但是就是选不上，广州、武汉都有这种情况。你们安徽是第一个赶上来的。占人口一半的劳动妇女不论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是很能干的，做起事来并不比男同志差。在我们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就是模范。我们的比例也少了，在座的十二同志中只有二位女同志，只占六分之一，这一点你们也可以批评嘛！

总之，要称得起朝气蓬勃，在军、干、群比例中，群众比例要大；在老中少比例中，中少比例要大；在男女的比例中，女同志不要太少，这样才能使革命委员会气象一新。革命就是要培养接班人，老的当然也要，但是中少要多一点好。要有妇女参加，这样才能区别于旧的政权机构。旧的政权机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干部政策造成的。现在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掌权，革命委员会应当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毛主席今天特别提醒这件事。你们首先响应了毛主席这一号召，是特别值得称赞的，特别值得庆贺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章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处理安庆芜湖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讲

话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他们煞费心机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杆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他们提出所谓“四反”“一粉碎”。

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

长期以来，隐藏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但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舆论，而且欺骗和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组成专业武斗组织，不断挑起武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仓库、银行、商店，炸毁和烧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了国家大量的粮、钱和物资，炸毁价值三百万元的冷库，以及市交际处大楼、专署大楼、交通局大楼、机电大楼等十多处公共建筑物，油粉厂全部烧光。他们还在华阳垦区一次烧毁国家棉花十七万斤，在宿松抢劫国家银行现款十多万元。许多无辜群众被打死打伤，甚至老太婆、儿童也惨遭杀害。

(二)连续不断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杀伤和殴打解放军指战员。今年以来，先后冲击驻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近八十次，抢走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各种装备物资和干战个人衣物。有的连队被抢劫一空。在冲击部队时，还向部队驻地射击、投弹，用石灰渣和小便在战士头上浇，用木棍、家俱往战士头上砸。在部队厨房水缸里拉大便，在干战耳旁、肩上、头顶鸣枪威胁，

绑架部队首长，先后共打伤指战员好几百人，打死四人；仅振风塔反革命事件中，一次就打死解放军二人；连给群众运粮的战士也被枪杀在汽车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下达后，七月五日，一小撮阶级敌人还继续煽动和蒙蔽部分群众，对军营港务局的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的打、砸、抢、抄、冲，抢走全部武器装备和许多物资；他们连救死扶伤的卫生医疗单位也不放过，七月十七日又煽动二百多人，冲、砸、洗劫驻军卫生队。两次共殴打干战二百多人，十四人重伤住院。

(三) 抢劫车船，私设关卡，中断交通、邮电。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迟迟不能恢复，使军事指挥受到严重影响。

(四) 抗拒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对抗省革委会关于安庆问题的多次指示，围攻、殴打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年“九·五”命令颁发后第五天，两派上交武器的第三天，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和蒙蔽“红造会”部分群众，公然对抗“九·五”命令、“六·六”通令，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将“联委会”打出城外。今年一小撮阶级敌人又煽动和蒙蔽“联委会”部分群众，制造了“一·二〇”武斗流血事件。

现在已经查明安庆两派都进了坏人，插进了黑手。这些坏人、黑手，是上述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的一部分。

原安庆专署专员陈振亚，是个腐化堕落、投敌变节分子，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伸进群众组织的黑手。他开始打着支持好派的幌子，在“三·一五夺权”后混进“地革会”当了副主任。以后又跳出来，混进“红造会”，接二连三地“写声明”、“发贺电”挑动群众斗群众，上窜下跳，往来于北京、合肥、安庆之间，做了许多坏事，并把黑手伸到各县，多次召集各县当权派开会，唆使他们支持一方，压制一方，挑动群众斗群众。

原安庆市城建局副局长胡成斌，是蜕化变质分子，曾被开除党籍。去年武斗期间，他担任“联委会”的军事顾问，赤膊上阵，策划和指挥武斗。

原安庆市文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张强，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他组织“干联站”，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直接为“红造会”武斗出谋划策。在“红造会”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说：“在军事上加强防御，主动出击，打乱对方的后方，消耗对方的人力、物力、财力”。

原安庆专署工业局副局长陈良玉，是伸进“联委会”的黑手，担任“联委会”的“政治顾问”，并参与调动岳西农民进安庆城搞武斗。

原安庆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徐一美，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是“干联站”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坐镇“红造会”总部，出了许多坏主意，竭力鼓吹“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煽动武斗，制造分裂，恶毒污诬制止武斗协议是“马歇尔计划”，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后，还公开喊叫“我就不怕当刘秀山”。

钻进“红造会”的坏头头马兆国，对抗中央关于航运系统与社会上脱勾的指示，担任武斗组织“工总司”的总头目，指挥武斗。在“工总司”私设刑堂，绑架和毒打我解放军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把一个农民吊起来活活打死。许司令指示，叫安庆两派代表来合肥协商解决安庆问题，马兆国竟威胁说：“谁去枪毙谁！”“七·三”布告下达后，还煽动和指挥“红造会”部分武斗人员，冲击、打砸、抢劫部队卫生队。

恶霸地主的儿子何守平，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总指挥。他参与策划和直接指挥“一·二〇”武斗事件，对抗周总理指示和省军管会通令，连续制造了枪杀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并插手几个县的武斗。

刑满释放分子吴洪杰，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参谋长。他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指挥“一·二〇”武斗，指挥炸毁价值数百万元的冷藏库等大型建筑物。

钻进“红造会”的坏人孙邦志，是叛徒、巫婆的儿子，是漏网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反动诗，侮辱伟大领袖，泡制《公开信》，散布大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言论，对抗中央关于军管公检法与社会脱勾的规定，进行反革命串连，到处作黑报告，煽风点火，干了许多坏事。

安庆长期武斗，与混进军队里的个别坏人插手指挥有关系。一个是安庆市前人武部长徐征法，是好派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一贯腐化堕落。还有一个是安庆军分区科长杜长信，是“红造会”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不是个好家伙，很坏。这两个人我们已经决定把他拘留起来，在部队内部进行批斗。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

1968.08.04；中发〔68〕120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安徽芜湖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和绝望挣扎，挑动一部分群众，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十二军党委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采取了有力措施，特别是他们抓住了“七·三”布告作为强大武器，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七·三”布告，声讨芜湖地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政治攻势，团结，教育和保护了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露和孤立了阶级敌人，迅速稳定了该地区的革命局势。

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只要把“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宣传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同拥军爱民结合起来，持续地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使“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收到立竿见影的

贯彻“九大”精神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

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

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贰、本节简论

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夺权也很早（一月二十六日），但是他们是一派夺权，而且对反对他们一派夺权的其他革命造反派实行打击，这样，就不可能得到中央的承认。

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军管。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实行军管前就犯有与走资派勾结、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管后又继续坚持错误。

而造反派内部也长期武斗不止。

中央又改组军管会，调十二军到安徽支左，担负起三支、两军的任务。

到一九六八年四月才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又发生

了什么问题，情况不清楚。

2011 年 11 月 20 日修改

第六章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解放军支左，造反派内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的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西北光学仪器厂发生二·一〇事件。两派武斗，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

省军区把这一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造反派认为，这是省军区和驻军负责人搞的一次“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致中央央办公室电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这里不是回族多的地区，却自上而下的成立了回族革命造反司令部。地委统战部最近还向各县统战部发出通知，要各地党组织研究与拟定支持本县革命回民造反的有效措施，并通知各回民聚居区的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我们认为这样做，

不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不利于按系统、按部门大联合。应怎样对待这样的组织，请速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来电的批示

各级党委，各军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来电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防止坏人利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纠纷，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区都不宜按民族划分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也不要以民族名称命名群众组织。已经成立的这种组织，应劝说他们自动解散。可以自愿参加本单位、本系统的其它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报道：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几段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西安问题的指示陕西省军区：

陕西省军区：

对西北光学仪器厂二·一〇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和陕西省军区反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二·一〇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两个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在二·一〇事件中犯了破坏国家财产错误的，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陕西省军区在处理二·一〇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跃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的经验》

陕西米脂县武装部在支左工作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公开表态支持“一〇一”左派群众组织，但是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在关键时刻，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主流，看本质，看斗争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支持“一〇一”革命小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这是很值得参加支左的军队同志，特别是参加支左的人民武装部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米脂县武装部帮助“一〇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革命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做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改变看法的。希望迅速改变过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

为了解决铜川的问题，兹决定：

一、由兰空工程部队抽调一个团（二千人）加强铜川支左力量，协同原驻铜川的部队，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制止武斗，封存收交武器。在执行上述指示时，部队一律徒手，坚持五不（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等。如有人向部队开枪，打死打伤部队的人时，报中央请示处理。

二、由二十一军派得力干部（师以上干部）吸收兰空，铜川市武装部干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管。

三、铜川两派九月二十五日已达成贯彻九·五命令的十项协议，中央已另电加以批转（略有文字修改），希望两派重新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由军管会监督执行。

四、在两个协议签字前，陕西省军区和二十一军对八·一九公告作公开检讨，宣布撤销该公告。

五、指名抽调原当权派及两派组织的部分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编入陕西省军区学习班内）。

六、由军管会召集两派进一步协商，贯彻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搞革命的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把煤炭生产抓上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中央认为，铜川地区“铜总会”和“铜总司”在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和“联委”在九月二十五日分别签订的两个“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是很好的，是符合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的重要指示的精神的。

希望铜川市和渭煤系统的两大职工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重新在这两个协议上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从此开始，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实行整风，促进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陕西军区首长接见西安交大革委会代表的讲话
黄传龙说：

我学得很不好，在 8134 部队中时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地方解散了群众组织。在耀县我们把耀县统指解散了，首先是交大同学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因此，三月二十号解散了统指，四月四日，在十条没下来前彻底平反了。

黄经耀说：

介入以后对西安形势发展的分析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正确，如对当时西安出现的打砸抢和“反右倾”的认识是看得过重的。在处理上就有错误，如对 2.10 事件，1.28 事件，军区的 5.1 剧团，新华书店，抓了些人，对错误的定性都过高了，把群众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错了。

庆华事件，开始把一方打成反革命，支持一方去抓人、游街。以后反过来，说错了，又把另一派抓了一帮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郑州铁路局系统七个单位和西安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这是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斗私，批修”的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在河南，陕西境内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各级铁路军管会（军管小组）和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

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夺取革命、生产的双丰收。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是已经联合的（如广州铁路局、柳州铁路系统），或者还没有联合的，中央也号召他们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达成类似协议，迅速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就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及西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至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 7 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 14 个局（全国共 18 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二、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陕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习仲勋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地区的代理人叛徒刘澜涛等批倒批臭。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揭露并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广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经验。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三、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

据初步调查，在陕西工作的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包括去世的)有六十三人被整。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死后还被声讨、批判。

一、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工委建立以来，一直是受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据汪锋、周仲英等同志证明，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加强我党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又增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十八军成立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对工委工作十分关怀，毛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曾在延安多次听取工委的汇报，对工委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工作方法，都作过明确指示。

二、工委在原三十八军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对旧部队思想作风的政治改造。在连队建立了学习小组，开展了新作风活动，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积蓄了革命力量；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回部队担任排、连、营职务，逐步掌握部队。同时，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三、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及时组织部队起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大造三十八军“赤化”、赵寿山包庇“异党”的舆论，并指调三十八军中几十名所谓“异党嫌疑”分子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洛阳干训团和西安劳动营受训。工委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正确对策，通过

做上层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保护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使用阴谋手段，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派蒋的亲信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即着手以其嫡系替换了该军所属十七师连以上军官，凡被他们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营、团干部陆续撤职、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工委及时将暴露了身份的我党地下党员转移出该部队，并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组织三十八军所属部队起义。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同年六月，一七七师一部在河南辉县起义。三十八军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壮大了革命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先后给予嘉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党中央命令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文化节大革命中，陕西省群众革命活动的材料，收集很少。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材料，也没有。

三、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西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也执行过错误路线。以后，迅速检讨了错误。

四、陕西省军区及驻陕部队，在支左工作中，虽然也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好的。

2008 年 7 月 29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0 日修改

第六章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沈阳军区支左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二月，沈阳军区几次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〇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并宣布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戚本禹对沈阳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代表的谈话对劫夫同志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想保他一下，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我请示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倾向这个意见。

从这几年来看，劫夫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是执行主席文艺方针的。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体会很真实。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六二年末、六三年初。

《女民兵》是三八节出来的。

劫夫不是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主要看音乐实践，你们可以整个研究一下。他的曲子是豪放的、健康的、革命的、乐观的、鼓舞人们斗志的。

劫夫同志，不要强调这些，要严格要求自己，老干部，许多地方不如小将，要向小将们学习。本应该你率领小将前进，不但没这样，反而落在小将的后面，你的错误要检查。就压制群众这一条就该深刻检查。

批评他不要戴高帽，不要“喷气式”，还要给他创作的机会。回沈阳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要拘留，不要抄家，要让他自由。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接见辽宁朝鲜归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21·1联合调查组：《一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丑恶嘴脸》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沈阳军区派一名负责人参加了“辽联”常务。

中共中央东北局、沈阳军区支持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

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派、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派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

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

这时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派出部队；并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个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派在整风时，沈阳军区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沈阳军区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看得过重，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

这个期间，沈阳军区还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份，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沈阳军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沈阳军区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

一九六七年四月间，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

宋任穷听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不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东北局书记处作出一个《三点意见》。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

使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李富春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说：“王鹤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央明确指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二、中央召集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委、沈阳市委、沈阳三个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办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鞍钢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我们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愿意生产，毁了一个焦炉，要一两年恢复。我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先进。我就不相信鞍钢十几万工人不愿生产，一天只炼×××吨铁，但代表在这里开会几个月，而对生产搞得这个样子不痛心，看看这么大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痛心。鞍钢都停产，我们是不怕的。问题是你们这样搞完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你们派别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吗？个人争面子，不为国家，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

你们在原则的基础上为什么不能联合？双方见面完全像个敌人。一年来，你们更往敌我矛盾发展了，这怎么解释？见面就动刀，开了枪，就烧房子，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建设起来的。现在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你们学习，但先要学习林彪同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中央文件很多，你们学了，没有用。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希望你们鞍钢生产这面红旗不要倒下去，当然也倒不了，倒了也有人扶起来。焦炉停了，还会有人恢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产停了，没有人说话，不痛心，听不见工人的声音。

彼此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思想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但是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不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鞍山的王、赵、罗、钟来批判？把相互之间的小不和要放在次要地位！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李富春接见鞍山鞍钢两派代表讲话

必须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谁都是一个考验，看谁没有诚意。我们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解放军，这是首先要讲的。如果不把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总理不接见你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谢富治付总理亲临北京钢铁学院，

谢付总理说：“还有个王鹤寿也不好斗！”，“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斗嘛！”，“毛主席说要搞好钢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凌晨，周总理接见湖南代表时，在谈到鞍钢支左问题时说：“王鹤寿不仅是反动路线问题，而且是反党分子，蒙蔽了大量群众，很多人中毒很深。”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陈伯达接见赴东北代表团学生代表，谈到鞍山问题时说：“王鹤寿是老大叛徒，大坏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李富春说：“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谢富治说：“王鹤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

一、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把鞍山、鞍钢当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发生严重武斗，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生产，对鞍山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王鹤寿尤甚，他是鞍山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查明他是个自首变节分子，还是个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他是镇压鞍山市和鞍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革命派的罪魁祸首。中央决定撤销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四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

二、鞍山市、鞍钢广大革命群众，革命职工，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鞍山市委、

鞍钢党委内以王、赵、罗、钟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肃清其流毒。同时，要努力搞好本单位、本企业的斗、批、改，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等革命组织，是在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搏斗中杀出来的，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给予支持。

“钢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等群众组织中的广大群众是好的，他们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王、赵、罗、钟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要认清王鹤寿、钟剑平等人的反动本质，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坚决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革命派与受蒙蔽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四大”的方法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绝不能用压服和武斗的方法解决。鞍山广大职工群众和大多数干部是要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和听毛主席话的，完全可以在斗争的大方向下和大批判中，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只要这样做，都是好的。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鞍山市和鞍钢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要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把革命摆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广大革命职工要保卫生产，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保证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发挥运输能力，加强设备维修，财贸部门要努力做好各项供应工作。要节约闹革命，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人力、物力、财力。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公安六条”、“六·六”通令和双方签定的“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坚决制止武斗，严禁打、砸、抢、抓、抄，对现行反革命、杀人凶手、夺枪、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以及幕后策划者的操纵者，由卫戍司令部依法惩处。加强各种武器管理，民兵武器和其它一切武器，一律交卫戍司令部清点、封存、看管。一切杀人凶器应立即上缴卫戍司令部销毁，今后不得制造、使用。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兴风作浪，

混水摸鱼，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否则，严加惩处。坚决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保证社会治安。

六、中央决定成立以三十九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同志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分别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财贸工作。军管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执行“十六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好斗、批、改。要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七、要拥军爱民。鞍山驻军支左工作虽然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声讨驻军领导干部是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自觉地支持军管会和军管人员的工作，维护军管会的领导，千万不要听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解放军要热爱人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了缺点和错误，立即改正。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军民团结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鞍山市和鞍钢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市三大派群众组织达成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情况汇报的批示

1967.08.21；中发 [67] 265 号

沈阳军区、辽宁军区：

八月十七日电悉：

中央认为，你们对沈阳市三大群众组织就制止武斗，恢复生产问题，进行说服教育，达成协议，做得很好。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耐心地向三大群众组织做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的执行。长春情况和沈阳类似。沈阳军区可将你们的来电和《协议书》发给长春驻军和吉林省军区，请他们参照沈阳的做法，进行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接见辽宁各地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你们铁道学院把抢过来的枪支弹药、炮等通通封存起来，由警备司令部派人去收行不行？（工总司：可以。接着讲价钱。）讲价钱是不行的，我熟悉你们学院，不要以为中央没办法，非你们学生搞革命？你们再武打，我就解散你们学校，你们对抗的话，我们中央就采取专政措施！（双方吵架）你们为什么这样吵，你们各保一个，后面都有牛鬼蛇神。有两个办法，你们不执行，就用专政的办法缴上来；再不行，解散你们的学校。你们不要以为铁道部没有铁道学院不行，你们背后都有牛鬼蛇神。

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那么敌对，文斗也不要那么紧张嘛！旅大的问题很大，武斗都到码头上去了，损失国家的声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起来。

要号召辽（宁）大（学）“八三一”、东（北）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都回来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八条、十条命令是拥军爱民，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的讲话要好好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十六条、工业十条学习，加强纪律性，要把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学学，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学一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掌握大方向的旗帜，党性要战胜派性，整体利益要高于小团体利益，知识分子结合工农，不要学生指手划脚。去年初期学生是先锋，经过一年了，现在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报纸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你们要好好学习，把沈阳做为中心来解决，辽宁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以来，沈阳市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鞍山市军管会两个报告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十三军、四十军来电的批复

十三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烂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中央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必须立即坚决制止。

四十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锦州南山监狱红色造反团指使劳改犯人为其制造手榴弹，作为武斗工具。中央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绝对不能容许。

中央除指使昆明军区、沈阳军区，对上述行为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外，希望各地对监狱和劳改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中央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准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

（二）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三）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

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

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到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涛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

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芳等人和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

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并且以自己有过犯错误的教训自居，自以为是，对军队同志的一些意见，则听不进去。相反，却偏听偏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这样就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站错了队，不是坚定不移地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而是同马、顾、喻站在一起，搞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不是一般错误，而是立场错误。我在搞《三点意见》中起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使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比较相信我而支持了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来承担，特别是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徵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了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一切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了，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〇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

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时搞革命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辽联”常务，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东北局、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不够分明，同时，在沈阳市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厂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参加进来，实际上并未形成沈阳地区革命大联合，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给以帮助，而不应该参加所谓筹备三结合的机构。

二、三月份，由于我们对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和在运动中的贡献看得不够，对他们的某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当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三月份整风时，我们不仅对他们帮助不够，反而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我们也看得过重。在三月份整风时，错误地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流。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对他们进行

帮助。可是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上述错误的作法，使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受到了压制，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四月份以后，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领会，因而跟得不好，结合沈阳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不好，在促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很少关心。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得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中央赴辽宁省调查组、辽宁省军区关于沈阳三派达成“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十条规定”的报告

总理并报伯达、康生、富春、中央文革：

总理最近几次对辽宁问题作了指示以后，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各派中一部份极左分子的干扰，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重申“九·九”协议、彻底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迎接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为此，我们组织各派代表通过充份协商，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各派代表一致恳切请求在报请中央审查后生效，以利克服阻力，使之顺利地贯彻执行。现将“十条规定”报告如下，请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沈阳三派“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的联合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1968.01.24；中发〔68〕14号

沈阳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在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也犯有严重错误。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就已经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因为当时中央决定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三级党委、沈阳、辽宁省两级军区领导干部和沈阳的三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开会，他们的检查就未批发下去。最近，他们对检查又作了修改。这次所作的“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辽宁省地处国防前线，又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中央希望沈阳军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和“斗私批修”的原则，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思潮的影响。中央并希望沈阳军区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广泛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加强军民团结，作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夺取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沈阳三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十项规定的批示

1968.01.24；中发〔68〕16号

辽宁沈阳三派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达成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这十条规定的达成，是辽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进步。中央批准这个协议，并希望沈阳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保证落实。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又处在国防前线。辽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均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辽宁省各

地各革命群众组织，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掌握斗争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宋任穷同志书面检讨
1968.01.24；中发 [68] 13 号

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现在，全省十个市，四个专区和盘锦垦区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鞍山市，阜新市，锦州专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二个县中有四十个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有二十三个县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百分之九十点五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沈阳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占百分之七十九，人数已达百分之八十七，有二百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去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粮，棉征购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工业生产也在逐步上升。

现在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广大革命群众迫切希望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经过我们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酝酿协商，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除留十四名作机动外，按一百六十一名份配如下：

（一）革命群众代表一百零一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其中：工人代表五十二名，占百分之三十二；贫下中农代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二；红卫兵代表二十一名，占百分之十三；其他革命群众代表八名，占百分之五。

(二) 革命干部代表三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二。

(三) 军队代表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十六。

在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沈阳市九十四名，占百分之五十八，外市，专六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二。有些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市，地，县，委员暂缺。

2，省革命委员会拟设常委四十五名，除留四名作机动外，暂按四十一名份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人（内工人代表十二人，贫下中农代表三人，红卫兵代表四人，机关干部三人）；革命干部代表十人；军队代表九人。经过协商，建议由陈锡联等三十八名同志担任常委（名单附后），暂缺常委三人（工人一人，革干二人）。

3，建议省革命委员会由陈锡联同志任主任委员，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国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4，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各组均由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总名额暂定一百五十人左右。原省委，省人委所属机构，除组成精干的业务班子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和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外，其余全力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行使任何权力。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5.08；中发 [68] 70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五月七日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同意设四十五名常委；同意由陈锡联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田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光荣诞生的。两年来，辽宁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和帮助下，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他们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周桓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联盟的残余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隐藏在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辽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央热烈祝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遵照林副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讲话中所说：“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使自己成为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比例。中央希望，辽宁的工人阶级应充份认识自己的领导责任，在完成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中起着带头的模范作用。

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辽宁省至今还存在着跨行业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希望，辽宁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应积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然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部队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铁路交通运输计划。

中央希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吸取他省先进经验，把辽宁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沈阳军区及辽宁省各方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问你们好！庆贺你们！刚才康老读中央批示时讲的话，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早在去年八月毛主席就提醒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推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早一点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想早一点、快一点。但革命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像天津、河北就快一些，辽宁是耽误一些时间，今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家很高兴，但回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我过问过辽宁的一些工作，我想如果做的好是可以快一些的。毛主席指定的四个地区，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无论是从革命和生产来看，都是这样。为什么辽宁在后头呢？就是斗争的复杂性。你们辛苦了！革委会成立的过程确实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要跟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在东北的代理人斗争，逐步把问题挖深挖透，把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出来，

擦亮眼睛，跟他们划清界限，同时又要同藏在暗处的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反党集团作斗争。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进行破坏，如像杜者蘅这些人呀，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受到一些干扰。不仅如此，辽宁的特务呀，内奸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呀，在机关、工厂、学校，他们也在活动。暗藏在机关、工厂、学校、码头广大群众里头，使运动受阻，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揪出来，不然他就干扰。例如早就知道的叛徒宋黎、特务侯志，他也要干扰一阵。还有坏头头在干扰，例如这次揭发出来的张祥久等人，他们也干扰了我们，如果不等群众觉悟，没有认清就过早处理，容易伤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等事情成熟了，就容易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但应该说，在中央工作的也好，在大区工作的也好，也还有些耽搁，拿鞍山来说吧，早就揭发王鹤寿是大叛徒，应该早解决，我们耽误了。比如对宋任穷，中央一再想挽救他，但他不按中央的愿望办。直到现在还在文件上点名，给他留下一点生机，一线希望，希望他从死不悔改到改悔，这是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但不是说他的错误就不严重了。本来去年八月份就把地方三级党委、两级军区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请到北京开会，想早一点解决问题，现在九个多月了，中间经过些曲折，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代表们、广大群众取得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解决一个省的问题，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学习，成功来得不易呀！所以，现在你们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很高兴，庆贺你们明天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经过这样长的时间，辽宁省、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在明天同时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学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一步按毛主席指示前进的胜利！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既然成立的晚，就应该吸取许多省市的经验。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人数比别的省都多，工人比例数大。现在报告上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五名，留十四名做机动，先按一百六十一名分配，将来各大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百七十五名可能还不够，也可能突破框子。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那时不够了，你们再报告中央，这个暂且不说，就拿现在来说，把革命群众代表比例增大了，工人占五十

二名，过了半数，这是好的，这体现了有广大群众代表的新生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当然，也需要军队帮助推动。一年多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沈阳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不错，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做了检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后还需要把工作做的更好。所以决定他们有二十二名委员、常委九名。还有革命干部十名，并且有一名从黑龙江借来的毛远新同志。当然他要谦虚。你们光借不行，还需要自己省的干部，所以回去要通过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解放一批干部。辽宁是个大省，大的工矿企业这么多，需要很多干部，有经验的干部，即使犯了错误，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就应该解放出来。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仅仅有军队和群众代表不行。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毛主席指示的很清楚，人民日报社论也讲了，我不再多说了。

在常委比例上也照顾了这一点，常委原四十五名，留出四名机动，给鞍钢、旅大、抚顺和铁路，这四个单位至少有一个常委，如有的能当副主任就当副主任。其他四十一名，二十二名革命群众代表，也占多数。军队和革命干部十九名。辽宁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辽宁省一个很急迫的组织任务和政治任务，希望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再从年龄来说，青壮年居多，五十岁以上少数，只有十三个嘛！其他都是五十岁以下，二、三十岁的很多，这是一个好的气象。但有一个缺点，不如陕西、安徽，就是女同志少。沈阳工矿区女工占很大的比例，农村、学校女同志也很多。这一点是旧习惯，破四旧，就要破这个旧习惯，就是有大男子主义，今天在座的男同志代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提出工代会协议上提出成立工代会要有女代表。毛主席说：“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嘛！希望你们回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沈阳三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组织尽管有些错误，有的错误严重些，也是上面少数领导人的问题。如有的组织受东北局、省市委走资派的蒙蔽，群众没有责任；有的组织有少数坏头头，由他们自己解决。像八三一这次自己解决坏头头的问题，自己抓出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是一个胜利，现在说你们“八三么”不会反感了吧？（康生同志：就是怕说“妖”，妖在你们身边你们也不揭发，唐铎是个苏修的大特务，李光灿是反革命分子，他到北京找杨献珍和杨成武的亲信，还说自己是八三一的参谋。你们要特别注意美帝、苏修

特务、蒙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你们那里前前后后什么都有，真是五毒俱全哟。还有辽联的柳运光，我认识他，是个坏家伙。) 每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各个组织里都可能有坏人，不要只说别的组织里有坏人，自己组织里没有，不要被敌人利用。不要总强调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左，没有那么回事。年青同志犯些错误是不可免的。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按毛主席指示自己揪出来，像八三一这次把张祥久等四人揪出来是好办法。别的组织不要去讽刺、指责人家，要好好整顿自己的队伍，辽联、辽革站都要贯彻这个精神。不要只看人家短处，要看人家的长处，把人家的长处学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要轻装上阵。你们在这里八、九个月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听了很多了，要把这些精神带回去，有极“左”思潮的说你们“右”了，“修”了，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怎么能修了呢？！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怕别人说。八三一来开会的同志在北京解决了内部问题，揭发了张祥久的问题，取得了很大胜利，你们要求一架飞机送回去，所以我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应该把毛主席的声音尽快带回去，不要还认为除了张祥久就选不出头头来了，不要迷信他。

你们三个革命群众组织把沈阳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外市县的事让人家自己搞，不要去干涉人家，不要包办代替。

第三个问题，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毛主席有两个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要带头，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联合起来，这一点我们很高兴的是你们提出回沈阳首先成立工代会、军工代会，也提出了要很快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我希望你们的提议经过省革委会讨论能很快实现，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就要受到干扰。例如张祥久的问题解决了，沈阳、苏家屯铁路局的问题也解决了。辽宁工人比重这样大，工人阶级更应该起模范作用。不仅沈阳，要拿沈阳的经验去推动旅大、抚顺、本溪、铁路以及其它很快成立革委会的城市。十个工业城市，只有三个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没解决，要很快跟着成立。关于组织

问题，就要把跨行业组织逐步取消，当然成立很久了，一下子取消有些留恋，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第四个问题，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要加强敌情观念，过去群众组织之间打内战就是敌情观念不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直到日本投降，辽宁就是帝俄、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国民党来了，还是半殖民地。旅大苏军一九五五年撤出。前后六十年，隐藏下很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分子，这在东北来说比在别的地方会多些，当然，同整个人民中来比较，只有大海中的几滴水。我们一定要有敌情观念，要把特务呀、内奸呀、反革命分子呀，都揪出来，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没有敌情观念，就会被敌人钻空子。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来解决，要共同对敌。军队不仅担任“三支”“两军”任务，而且要保卫国防，有战备任务。我们要非常爱护解放军，即使他们在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认识、改正错误，对他们就要更加拥护。这一点我们说，东北的军队他们是听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东北地区是全国的关键部分。首先要求铁路局和大连海港要搞好，枢纽不通就直接影响生产。再就是抚顺煤矿搞不起来，鞍钢的生产就上不去。鞍钢上不去，全国的钢也就上不去，不仅是数量，特别是品种的问题。煤、钢上不去，就直接影响机械、化工等上不去，对全国影响就很大。所以说，东北是全国一盘棋的一部分。刚才，康生同志、伯达同志讲了，东北问题毛主席去年七、八月份就有指示，我们抓的晚了一些。现在促成了革命委员会，原来形势就很好，欣欣向荣，现在应该更加面貌一新，你们说北国风光无限好，辽河两岸尽朝晖，我说不只辽河两岸，还是松辽平原。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是大喜事。今天参加会的还有吉林的同志，有八三一来京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些同志，你们回去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对中央批示要坚决照办，坚决执行。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1968.06.18；中发〔68〕9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批示规定，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汪家道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锡联：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我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一、要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进一步揭开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盖子。

二、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在对敌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和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三、要高举鞍钢宪法的伟大红旗，深揭深批工业战线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把黑十二条批倒批臭，通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反修、防修能力，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物资刺激、技术挂帅的毒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基础上，搞好工矿企业的斗批改，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工人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彻底改革重叠臃肿的管理机构，建立革命和生产的新秩序。

五、要通过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发展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大联合争取尽快地成立各级工代会，实现基层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六、要用鞍钢宪法统帅生产、指导生产、推动生产，我省工业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生产许多极其重要的产品，不仅对全国工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关系

到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每个工人同志都要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

社、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分三类。

一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类班子的成员比较纯，新的血液多，思想先进，核心团结，步伐一致，敢想敢干；作风深入，联系群众，有权威，有号召力；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自觉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带头参加革命大批判，积极清理阶级队伍，革命、生产都取得显著成绩。

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绝大部份成员的出身成份好，历史清楚，他们热爱毛主席，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班子里的新鲜血液少，多半是原班人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不强，思想比较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群众说：“他们基本上是老一套。”

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打击迫害贫下中农，排斥新生力量，大搞右倾翻案，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因此支农部队力量使用上，应当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照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转发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68. 12. 07；中发 [68] 163 号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现将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今冬明春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调查和部署。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划归沈阳军区的决定

四、沈阳军区、辽宁省委召开批陈整风会议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

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党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在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

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记者《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五、十月政变后的镇压活动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

揭批运动进入第三战役。

到去年年末，已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两千四百人，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一万五千人。

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过程中，发现还存在种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一、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不纯，抵制清查。二、派性掩护，查不下去。三、隶属关系改变以后，不了了之。四、对调入人员考核不够，使用不当，留下漏洞。

辽宁省委在五月末召开的一次纪委书记和揭批办主任会议上，介绍推广了本溪市复查验收的经验。复查验收以来，全市从各级领导班子里，又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九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七名；清理出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十七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十五名。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六、张志新事件

张志新（1930—1975）天津人。女。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68年的春天，有一个星期天，她是到一个姓闫的女同事家里，想向她借江青文化大革命时候讲话资料。这个姓闫的女同事说张志新你站过来吧，不要站在那一派。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她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理解，比如说江青叶群她们过去是干什么我对她们都不了解。这个姓闫的这个同事，就马上向当时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去汇报这个事情，写成文字了，都写进在档案里头。

1968年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9月，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被动员上山下乡。10月，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辽宁省“一〇·五”干校。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也在其中。张志新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首先一开始是弄来就开批斗会了，揪出来就说她反革命，反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同志什么之类都来了，来了以后她当时只知道这些，白天劳动，晚上审查批判，必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挖她黑思想，而且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就413专案组。

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最一开始，她被编入第三大队女监犯人的一个班里，实行集体关押，很快，张志新由于坚持自己的言论，被单独关押。在狱中无数次的坦白交待过程中，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头至尾没有承认错误。

1970年5月，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案件经一层层同意，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同意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示没有异议。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他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

1972年，张志新那个时候已经确实是疯了。林彪事件出来了，监狱里面学习，批林批孔，在外头请人来给犯人做报告，批判林彪，在那个大会上犯人也听了。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候有一个犯人就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张志新起来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当时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的纪录，第五个议题就是审议张志新。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是那么疯狂，还是犯罪，让他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整个记录大概60个字，不到100字。

张志新死刑的判决公布之后，沈阳监狱中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时年45岁。

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贰、本节简论

一、宋任穷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动动摇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犯过不少错误，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好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他的书面检讨基本上

是好的，并经中央转发各地。可惜，十月政变以后，他又一头栽到错误路线一边去了。

二、陈锡联作为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表现基本上好的。九大、十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华国锋等人策划十月政变，他就立即倒向政变集团中去了。

三、辽宁省的张志新是一九七九年以后被炒得最火爆的事件。

(一) 这个“烈士”是由高层领导精心策划制造地一个假典型

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1970年5月，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根据张志新在狱中的表现：张志新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攻击，并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材料。其中：

张志新说：“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辽宁省委没有批准。

1972年，张志新在批判林彪的大会上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批准。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这一切说明；张志新被捕、被判刑、被判死刑，都主要是因为她“反对毛主席”。

可是，一九七九年，辽宁省委负责人任仲夷为了制造一个反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就故意掩盖张志新的“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只说张是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的。

1978年1月，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

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张志新事被披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

1979年3月，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写出专题报告。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张志新不仅反对林彪、“四人帮”，同时也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这些任仲夷是心知肚明的。

对于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为张志新题词，华国锋就不题（如果张仅仅是反四人帮，这正是华求之不得的；正因为他知道张的主要问题是反对毛主席，所以他才不敢表态）。有人问任仲夷怎

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对张志新案复审的汇报。省委书记任仲夷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杀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任仲夷在会上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省委要搞出一个很好的文件，给张志新同志以表扬。这个文件不仅下发，还要向中央上报。”“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从我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别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值得向她学习。”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疯狂践踏党的民主生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草菅人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

1979年7月31日，光明日报经胡耀邦同意发表陈禹山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说：“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话。

2005年，陈禹山发表文章承认：其实反对毛泽东才是张志新被杀害的主因。但至今，绝大多数的人们仍未知道这个真相。陈禹山说，当年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时，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冤案真相尚未全公开。当时全国的报刊报道说，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事实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

这样，在二十五年后，由他们自己的人揭穿了由胡耀邦、任仲夷等人制造的这个假典型。

（二）胡耀邦、任仲夷制造这个假典型的目的是要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治路线服务

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此案平反，震惊全国。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985年，在张志新“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辽宁省委领导等七人题词，予以纪念。

张志新的名字还载入了《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这些人就是要让“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005年5月，《炎黄春秋》发表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的《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一文，

任仲夷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炎黄春秋》。他在给杜导正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炎黄春秋》编者说：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文章赞扬张志新：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

可是，一个高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打倒毛泽东”的人，她究竟具怎样的理想和信念、究竟具有怎样的党性、究竟具有怎样的“大无畏精神”，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吗？！宣扬这样的理想和信念、这样的党性、这样的“大无畏精神”，究竟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不也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吗？！

（三）张志新案件本身的教训在于：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没有彻底改造旧的公检法，没有认真搞好斗批改。

如果张志新的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主席的错误认识，真的仅仅是在私人谈话中、在学习班的交待思想中说出的，按照毛泽东关于审干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根本就不应该逮捕，更不应该判刑。

张志新在狱中遭受到种种虐待，甚至遭到非常残暴的行为。这些情况说明，旧的剥削压迫阶级统治下的监狱的黑暗传统，仍然深深地遗留在新中国的监狱中。作为党中央在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作为中央政法系统的领导人，彭真、罗瑞卿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而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要摧毁旧的公检法的一个原因。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到七十年代，辽宁省的监狱仍然存在种种黑暗面，说明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没有彻底改造旧的公检法，没有认真搞好斗批改。

可是，那些借张志新案件攻击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人，他们做得又怎么样呢？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他们打着清理“帮派体系”的口号，逮捕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的徒刑？杀了多少人？在九十年代，河南省甚至对参加纪念毛泽东活动的群众，都敢逮捕，甚至判刑。震惊全国的“四君子”案件，即是其中的一例。

2008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11月21日修改

第六章第八节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

康生同志说：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

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 14 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

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

康生：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 8·15 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 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

总理：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 7012 部队一个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 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

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

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

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

江青的讲话

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

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

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甬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

周总理的讲话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

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

二、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

康生：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周总理：韦杰同志，你在 1 月 29 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陈伯达：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

杨成武：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 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

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周总理：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題，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1967.04.04；中发〔67〕154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

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

- 1、派军队保护造反派。
- 2、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
- 3、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付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 一、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下旬，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七月初，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将红色派从“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并且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 7790 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 7790 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王回来后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结果这些人都被泸州的红联派俘虏。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1962年的6月19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

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案。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还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宜宾市革筹派人与宜宾市武装部协商，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八八团一个连，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谢英富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

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民兵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州。另一路则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这就是有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行至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附近，遭到对方的伏击，被对方打死打伤多人。并被围困在此地多日。后来在 7790 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张键的指导下，对对方展开夜袭成功，双方均有伤亡。

一九六八年初，宜宾地区红旗派派人到宜宾县打死红色派一人。

谢英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傅文琪等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谢同意傅某等人的要求，派人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到了观音后，有两个队员将对方的一个人打死了。一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一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三、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 8·15 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

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

总理要他当众辟谣。

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 [67] 159 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

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

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重庆“八·二六”派成立了统一组织，在重庆市经委设立了“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还是“反到底”。在反到底底下有六大司令部，造反军的负责人还是由黄廉兼任、工总司班长是李木森、军工井冈山头是邓长春（各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叫“军工井冈山”），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七工人造反兵团、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反到底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重庆反到底延安兵团、重庆反到底农民司令部等。反到底的农民组织比较复杂，有农民造反军、农革会，二七等。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央军委将铁道兵的 8711 部队移来重庆，他们和四川省军区的独二师都是支持反到底，而五十四军仍然鼎力支持八一五。

市革筹组开始运作之后，市委就彻底瘫痪靠边站了。

派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了新的内容。在对于干部的态度上，反到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说刘张是好干部，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烂萝卜”。最初的群众纠纷是辩论“红十条”“红五条”，反到底说八一五不执行红十条，是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八一五就说反到底反军、是砸烂公检法的牛鬼蛇神。砸派说八一五参加搞“二月逆流”是走资派的帮凶，是资反路线的二次反扑，八一五说自己是跟着军队走。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两派武斗，武斗中越南留学生被打。

两派在重庆发电厂、电力技工学校及杨家坪等地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伤数十人。

两派在重钢和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江陵机器厂等地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重庆市第三中学（今南开中学）两派武斗，死 1 人。

砸派新成立两天的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被八一五派抄砸。

万县市赤旗战团红卫兵数千人涌向万市公安局揪斗局长，要求释放“镇反”中逮捕人员，引起两派冲突。致伤学生数十人，其中 31 人送专区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万县地区万县市、万县、梁平、开县、忠县、巫山、巫溪、城口、奉节、云阳九县一市武斗队数万人分五路进攻云阳县，与云阳县“11·27”派武斗队展开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反到底派要召开批判李井泉的大会，当时是八一五掌握着李井泉，他们不给对方批判。反到底派只好扎了一个稻草人写上李井泉的名字，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 30 万人大会搞缺席批判。批判完了之后就把草人烧了。这个事情后来反映到了中央，周总理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还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诗来形容，说“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重庆发生第一次大武斗，地点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师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团发生了武力冲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师“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学生去支持西师 831，都开了汽车过去，双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两三千人在那里荒坡上拦住打。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指战员数十人受伤。

两派在后字 242 部队、邮电学院、工业学校、机电公司等地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两派继续在西南师范学院大规模武斗，重大八一五再次派出的增援武斗人员由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指挥，以校体育队学生组成“敢死队”强攻，获胜后将俘获的砸派人员押到重庆大学毒打审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重大八一五武斗人员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施家梁附近遭砸派武斗人员截击，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并遭到关押毒打。熊代富被砸派作为“武斗头头”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途中火车上被八一五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走。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建设机床厂与第二十中学两派武斗，死 1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至十三日，两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学（今兼善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 6 人。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身亡的猛虎团负责人王树良等 3 人被暴尸街头示众三天。八一五派实行戒严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两派在大足县青坪公社斗碗寨武斗，死 10 余人，经济损失约 80 万元。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至二十一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武斗，死 1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涪陵县两派在涪陵轮船公司船员俱乐部武斗，1 人重伤死亡。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两派武斗，死 2 人。砸派占领全厂。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设于大坪五一技校内的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砸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上午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以钢钎、大刀为武器进攻无效后，八一五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命令石油学校武斗队纵火将该小学烧毁，武斗中死 4 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 3 万余元。重大八一五武斗队返校途经重庆医学院后门时，遭砸派武斗队拦截，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副政委被刺伤。

两派在石油学校武斗，死 1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涪陵县两派在涪陵轮船公司船员俱乐部武斗，1 人重伤死亡。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两派武斗，死 2 人。砸派占领全厂。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设于大坪五一技校内的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砸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上午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以钢钎、大刀为武器进攻无效后，八一五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命令石油学校武斗队纵火将该小学烧毁，武斗中死 4 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 3 万余元。重大八一五武斗队返校途经重庆医学院后门时，遭砸派武斗队拦截，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副政委被刺伤。

两派在石油学校武斗，死 1 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重庆师范学校、市第一中学、光明中学等单位八一五派武斗队和市第十五中学、煤炭学校等单位反到底派武斗队分别抢夺部队武器。沙坪坝区几所大、中学校及工厂的八一五派下午抢夺了区武装部汉源路武器库后，因发现武器大多是从群众组织收缴上来的不能用的破旧枪支，晚上又去区文化馆内武装部办公楼抢夺武器。在冲击大门时，有人欲抢夺一卫兵手中的半自动步枪，争夺中枪走火，打伤二人，打死第一中学学生一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两派上午 11 时至下午 2 时在（北碚）重庆纺织五厂武斗，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西师附中无产者和砸派猛虎团都入厂参战，双方使用钢钎、棍棒、石头、烧碱水等。同日，两派在北碚街上武斗，死 2 人。

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 2 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重庆医学院 66 级毕业生、砸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

两派在建设机床厂武斗，死 1 人，伤数十人，砸派占领全厂生产区，半自动步枪大量流散出厂。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两派在北碚重纺五厂再次武斗，八一五派动用了自制土炮（发射鹅卵石、石块）、鸟枪。砸派猛虎团被土炮打死 2 人，伤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两派在重医一院东门武斗，死 2 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两派在重医一院门诊部武斗，死 1 人，伤数十人。

两派在（北碚）重庆光学仪表厂武斗，死 3 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120 榴弹炮、火箭筒等，江陵机器厂 4 个车间和中心计量室、厂内家属区、街上居民区遭连续炮击，若干精密机床、计量仪器遭破坏，厂内 203 小学和一些家属区房屋及石门街上民房被打坏。伤亡多人。驻军领导召集两派负责人谈判，达成于 11 日 20 时停火的协议。但签字 1 个多小时后（次日凌晨）武斗又重新开始。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至九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四管联发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八一五派攻占后字 242 部队、煤炭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伤亡多人。后字 242 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两派在嘉陵江南桥头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砸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打死 2 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

两派深夜在（北碚）浦陵机器厂（上海内迁厂）武斗，厂内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全厂停产。从次日起八一五派武装包围切断了该厂的粮、菜、煤、水供应，该厂上海援内职工被迫于 7 月 15 日全部返回上海。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砸派猛虎团前往八一五派控制的（北碚）红岩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小口径步枪、猎枪等，死 9 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至十二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水陆两用坦克、高射机枪、三七炮、八二炮、120 榴弹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

器。一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 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八一五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于 8 日增援中梁山武斗后留驻于战旗小学的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于黎明前以自制土喷火器和土炮伏击从煤校返回重庆电机厂的砸派武斗队，砸派被土喷火器烧死 2 人，烧成轻、重伤各 2 人，钢钎刺死 1 人，重大八一五武斗队被自己土炮喷出的火焰烧成重伤 1 人。当天上午，重大八一五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砸派河运学校航锋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八一五武斗队使用了非法私设的电台进行联络。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重庆两派在大坪、杨家坪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群众死伤惨重，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余。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黄廉到成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谢富治、王力接见黄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等到重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四川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与副组长刘结挺及中央代表、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一起到武斗严重的北碚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纺五厂等单位视察。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重庆八一五派及邻近几县同一派的群众组织武斗队在成渝铁路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并在石燕桥及李市镇、安富镇等地先后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一空。

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不论哪一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坚决按中央“七三布告”办事。

万县地区两派在梁平县大河机械厂、县文化馆等地大规模武斗，死伤数十人。主力军派退出县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到北碚街上向驻军上缴武器，与八一五派发生武斗。

张国华、刘结挺等在北碚区分别接见两派群众。

张国华、刘结挺与中央代表李再含于午后 1 时至晚上 10 时半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接见砸派代表。

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砸派“红总”发表《敦促蓝亦农、白斌二同志改正错误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张国华、刘结挺与中央代表李再含到武斗严重的望江机器厂给两派做工作，要求停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北碚街上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游行的两派发生冲突，伤上百人。当晚，八一五派向西南师范学院发动进攻。西师八三一于次日凌晨撤离学校。八一五派控制了北碚城区和大部分农村。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中化龙桥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胁，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业校，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八一五派攻占该校。该校反到底派红岩兵团死 10 人。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张全兴和“战地摄影师”唐世轩被小口径步枪击中身亡。为报复，该武斗队抓获反到底派俘虏 200 余人押回重大毒打审讯，其中毒打致残 1 人。重庆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与林彪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陪同下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在讲话中专门谈了制止武斗问题，严厉指出：

“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重庆长安机器厂与东风造船厂两派武斗，死 2 人，伤 3 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机器厂六月天兵、重钢三厂铁拳头等组织武斗人员到江北区委大院内职工宿舍抓走中共江北区委代理书记郑天明，关押于重钢三厂招待所内审讯，翌日郑死亡。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 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 5 吨，伤亡各 1 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两派在北碚区武斗，死 3 人，伤 13 人，八一五派北碚区“捍红总部”下令将北碚青木关至歇马场的小湾公路桥炸毁。

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 18 户。

两派在荣昌县城武斗（持续至 8 月 6 日），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死 78 人。

两派在大足县三驱、宝兴、城南、城西等公社同时武斗，死 100 余人，经济损失约 200 万元。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反到底派占领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

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到杨家坪地区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 2 人，伤 10 人。

建设机床厂 45 车间工人何心贵去车间为同事领取工资路上被三十五中学一武斗人员当作活靶子练枪法打死。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两派在北碚火炬镇（澄江镇）武斗，反到底派攻占该镇。八一五派武斗指挥、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负责人、红岩公社公安员唐天伦被反到底派俘虏。

两派在（北碚）重庆第二十三中学武斗，死 1 人。

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死伤多人，动用了坦克。该厂八一五派武斗负责人方文正在久攻不克时下令将反到底派占据的厂俱乐部烧毁。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在攻打该厂医院和水塔一线时纵队长谢宗正等 3 人身亡，重伤致残 1 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后，该武斗队负责人出于报复下令将该厂无辜群众 1 人从家中抓出杀害。八一五派武斗队并将从家中抓出杀害的无辜群众 7 人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枪杀后未死者由师专附中武斗队补枪致死。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重庆军分区 667 号交通艇早上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封锁长江航道的检查哨高射炮击沉，解放军 3 人遇难。

两派在市中心第二十九中学和相邻的大同路小学武斗，八一五派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负责人张光耀徒手前去双方交火地带救护中弹同学身亡。

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建设机床厂职工宿舍）被反到底派用四联高射机枪击中烧毁；反到底派在进攻该厂军库时，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负责人、红一连指导员王木全（九中学生）等多人身亡。

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武斗队到建设机床厂领取武器后返回时在储奇门路口遭到凯旋路中学八一五派设卡拦阻，发生冲突。

反到底派南岸城建兵团武斗队从建设机床厂领枪归来，在黄葛垭新市场附近遭到八一五派伏击，死 10 人，伤多人，十几支半自动步枪被抢走。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下午 6 时左右，潼南县武斗组织从涪江对岸向城内发射迫击炮弹，其中一发炮弹在县粮食局职工食堂门前爆炸，炸死 13 人，炸伤 5 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万县地区“主力军”派九县一市武斗队攻克云阳县城，

抓捕“俘虏”341人（其中县委正、副书记3人，副县长1人，部、局长7人），枪杀“俘虏”32人。云阳县“11·27”派撤离前于7月15日夜锯开县人民银行国库门锁，强行提取现金72.5万元，随后经巫溪、城口翻越大巴山逃往陕西平利县。在这场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武斗中，发生了江南“穿心战”集体枪杀38人，祖师观武斗打死156人，江口大会堂棍棒打死18人，巫溪朝阳追歼杀害和冻死67人等罕见惨案。自1967年8月开始武斗至此次武斗结束，云阳全县共被打死1021人，其中抓捕后杀害的622人。云阳成为武斗重灾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重庆市发生激烈的炮战。

“当时总共只有十七八门炮，炮击持续了一个来小时，估计打了三五千发炮弹是有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总参在渝的通信兵学院发生警卫连枪击事件，打死三十余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山城战报》、《八一·一五战报》编辑部《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评四川时局》

一、两个基地 几股黑线

二、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上台后干了些什么？

三、五十四军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

四、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

让王力企图把四川作为篡党窃国的反革命基地的阴谋见鬼去吧！

让刘张两挺企图把四川变为刘氏独立王国的黄粱美梦见鬼去吧！

打倒王力，打倒刘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指示

（1）刘、张的问题是四川十条的问题。对待刘、张的态度就是对待十条的态度。打倒刘、张就是反对四川十条，就是反对了中央。

（2）刘、张的住处不要转移，原来住在哪儿，还住在哪儿。军区要保卫他

们的安全。这是对军区、部队的一个考验。

(3) 揪斗刘、张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揪斗刘、张的会，无论刘、张在不在场，那大方向就错定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
总理：

现在是江苏、浙江。安徽、湖南、辽宁、陕西、宁夏、新疆，有八个省三月底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就看你们的了，你们落后了。

重庆“八·一五”去年把李井泉搞去，根本不斗他，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二月“镇反”根本是错误的。

十条贯彻不够，你们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贯彻不够，没有把握住这个主要斗争方向，你们在党委会上的发言都没有讲。

你们在党委会上的发言，都没有把握大方向。反刘、张的材料，很多都是从李井泉那里搞来的，实际上是替李井泉翻案。

(张国华：记得总理还说，再打刘、张要通报全国。)

总理：是的，是在主席那里讲的。十条为五十四军说了几句好话，是否有点翘尾巴了。

他是了解情况的，有点吞吞吐吐（指张国华）。我问的那句话，就是要你直说，你要敢讲。你那发言是滑稽的，你对重庆两派的说法是矛盾的。“八·一五”是响应“红成”在成都打刘、张的，你说他比“反到底”错误少，你的发言是有偏向的，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讲话。你在中印边界，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你的决心那么大，为什么这次你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十条对五十四军称赞了，五十四军有点翘尾巴。对“八·一五”偏听，所以“八·一五”响应红成打倒刘、张的口号，没有站在全局，五十军去年十二月的电报是好的。五十四军在重庆的

态度有问题，助长了“红成”打倒刘、张的气焰。张、梁、刘、张是不可分的，是十条上肯定的。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指梁）你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敢那么批评，没有讲“八·一五”。给“八·一五”那样讲就好了。

如果斗争矛头对准刘、邓、贺、李、廖及其一小撮同伙，那就把思想统一起来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开了五十多天的会，没有把这个问题突出。如果突出了，问题就解决了。

你们在成都要像梁兴初同志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那样，尖锐的批评红成对刘、张的问题，问题就解决了。刘、张对“八·二六”多讲，张、梁对红成多讲，大家讲话，口径一致，就能在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了。你们要对准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刘、邓、李、廖、黄、郭。

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就是反中央。在四川就是站在李、廖一边，在全国就是站在刘、邓一边。

五十四军去年风格不错！就是回去翘尾巴了，不仅思想感情没转过来，立场也没有转过来。

反到底得不到机会斗，不然他们为什么反映这么强烈。市革筹处理是不公正的，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江青：

十条过时，就让李井泉再出来嘛！你们觉得过时了没有？

你们四川出了那么多的大报纸，（指群众组织的报）革筹小组是中央批准的，而且是经过了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就让人家那样搞。（指登小报打倒刘张）刘、张和我没亲，攀不上。

我今天放一炮，你们两位（指张、梁）是中央派的，一个从广东去的，一个从西藏去的。刘、张是中央平反的。你们是一起从这里回四川的，应该抱得紧。张、梁是军队的，更应该主动。我这样讲，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刘、张也有缺点错误。要顾全大局。四川已经乱得差不多了。不顾全大局的人，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你们要搞大联合。

革筹小组去了没有十天，就打倒刘、张，就分裂了，试问你们革筹怎么领导工作！分了派，不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老天爷啊，你们革筹小组九个月了还没有扩大。

四川了不得了，有一个女同志参加工作就是好（指张西挺同志），还要搞点女将，不要搞大男子主义。××（指某革命委员会没有女同志参加）封建死了，连资本主义都不如。

康生：

四川问题不能解决，主要是方向有问题。只要你们说一句“打倒刘张就是替李井泉翻案”，就行了嘛！

伯达：

说要李井泉，不要刘结挺是反革命口号。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

“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林彪对张国华、梁兴初关于四川问题的指示

会议要搞自我批评，搞自我批评问题就好解决。采取这种方式才能联合起来，才能共同对敌。两派斗争不能恶斗下去。开始乱一下是需要的，乱是乱了敌人。乱够了就好办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5.28；中发〔68〕75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四川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后方，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解放以来，阶级斗争仍然是特别尖锐。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他们曾经千方百

计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招降纳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把四川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

经过两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露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四川省的胜利，是得之不易的。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的结果，这是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巨大成就。我们向四川省七千万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央同意：由张国华同志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徐驰、邓兴国、江海云（女）、王恒霖、彭家治、张泗洲、冯玉德、蔡文彬、杨志诚、但坤蓉（女）同志担任副主任。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所提的常委和委员名单。

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广大群众，提高阶级的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要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公开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继续巩固、继续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必须遵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继续努力建立革命委员会。

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揭露那些挑拨军民关系的坏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方面。四川省的工人阶级、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把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

设的重大任务，当作是自己的光荣责任，对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罪恶行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各项指示。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意见。要顾全革命大局。在斗争中，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战斗指挥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全体学员的讲话

总理：红成中间有反复，走了弯路。有一次，我们有错误。去年七月红成有很多人要到北京来谈一谈，我们只请来了少数人。我们伟大领袖批评我们有点失策，应该来，后来来了 500 多人，来少了，讲了，回去后没有传达，有反复。人若多来一些，就广，就深，就理解得快一些。少数人歪曲中央负责同志讲话。人来少了是教训。二万多人，听起来多，比起前年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又算得了多少？！

去年，军内的少数几个人，把革命运动压下去，后来有了十条、五条和中央一系列指示，也还有反复，是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对立。

在这当中，一针见血的，就是江青同志在三月十五日指出的，把矛头指向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就是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翻案。这句话最尖锐了，一句话就使你们猛然醒悟了。

“8·26 兵团”、“红成”，过去战斗在一起，与李井泉作斗争，流血在一起嘛！一月夺权后发生分歧，分开了。

现在不是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吗？首先要在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中体现出来、希望成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作出榜样，影响专县，推动重庆。

妇女成员有 9 名，接近五分之一，还有五名还可以补，不算坏，但不完全满意。为什么这样强调此事，因为闹革命时，我亲自见到你们有很多女将，还有打伤的，斗争很英勇，现在看名单就没有了，不知是什么原因？闹革命有她们，掌

权时就不要她们了，这还不是大男子主义？是不是四旧？我很支持江青同志的意见，打天下有她们，坐天下没有她们。旧意识应不应该打破呀？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就是林副主席之下，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学生，我看现在在座学习的女同志就很少，这个旧习惯不易打破，在劳动人民中，妇女作用很大，重庆的同志知道，在工厂中，就是在国防工厂中，妇女也是很多的。我在四川呆过，四川的妇女是很勤劳的。

江青：

目前国际上正处于革命大风暴的浪潮中，这个浪潮席卷全世界。从去年冬季开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国家，开始了财政危机，去年底英镑开始贬值，今年一月美元贬值，从而引起经济基础动摇、崩溃，这是主要原因。所以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抗暴运动，例如四月美国黑人的抗暴运动，五月三日的法国学生运动，五月十三日开始的法国工人和学生结合的罢工运动。目前在法国已有一千多万人参加，还有西德，西班牙，席卷全世界，这是空前的。因为它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起来反抗。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应该说的，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以道义上的声援。所以，国际上是一片大好形势。

国内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全国 29 个省市，四川省第 24 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一件大事，因为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参加的，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班子，这就说明了政权的性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按 270 名分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占 63%，这个比例是了不起的，世界上没有的（众呼口号）。军队代表 36 名，占 15%。人民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出身绝大多数是工人、贫下中农，这个 15%与革命群众挂钩比例就更大了。革命干部 50 名，占 22%，这个比例也不小。当然，四川这样一个大省，工业的比重大，应该有更多的干部站出来工作，你们要帮助他们站出来，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都要与人为善，帮助他们站出来。

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性质是有充分的革命群众基础，有着人民解放军作坚强柱石，又有革命干部作重要组成部分的。这种领导形式是很好的，是革命群众创造出来的。因此，革命群众，革命小将，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都要很好爱护革命

委员会，对新生事物要帮助她发展巩固，她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毛病，但是应该看到这是新生的党政军一元化的政权。刚才总理、康老讲了，说得到就要办得到。我们必须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照办。重要的是发展和巩固就要诞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中，贯串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当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还处在相当艰苦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四川很有希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四川革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勇往直前，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击退了一次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终于取得了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四川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决不能使我们麻痹起来。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妄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足为怪。我们要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开展

持久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把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少数的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最近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这一指示，透彻地揭露了世界上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共同的反革命本质，透彻地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本质，向我们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伟大胜利：我国大后方重要工业城市重庆革委会诞生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副主任鲁大东、黄廉、熊代富。

六月二日，重庆市军民在大田湾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参加大会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近三十万人，千遍万遍地热烈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狠抓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必须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持久而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加强敌情观念，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其他公开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毛

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兰亦农同志说，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在自己的工作中永远相信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革命委员会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指示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努力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的革命战斗指挥部。

兰亦农同志说，全市广大革命人民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战略方针，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罪恶阴谋，把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负责同志李大章、梁兴初、张西挺出席了庆祝大会，并讲了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重庆部队负责同志、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出席了大会。重庆警备区负责同志韦统泰代表驻重庆部队指战员在会上讲了话。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鲁大东、黄廉、熊代富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成立庆祝大会上，二轻兵团部分成员抬一尸体冲击主席台，与值勤士兵发生冲突。从主席台上下来帮助值勤士兵维持秩序的反到底派负责人李木森、邓长春在混战中被打伤。

四、开展“揭、批、查”运动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市公安局直属单位的 921 名干警集中到大坪公安学校进行“揭、批、查”，规定“五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出校门，平时不准回家）。同时将巴县黄泥湾集中审查的处以上干部也集中到公安学校，一部分继续武装看押，一部分交原单位揭发、

批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防工业工厂“八一五会议”上，重庆反到底派武斗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邓长春和八一五派武斗头头、重庆市革委常委方文正被逮捕，与会代表揭发了二人指挥武斗、枪杀俘虏等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召开“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公布了邓长春、方文正的罪行材料。

在这次大会上，重庆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讲话中宣称：“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邓长春背后有一个黑高参团”，由叛徒、特务、走资派组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组成的将官集团”相勾结。讲话中并将前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于克书、前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路斌武等干部公开点名指责为操纵反到底派的“黑手”，将重钢公司以中层干部为主的反到底派群众组织《遵义红旗》称为“坏组织”，诬称这些干部“挑动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出谋划策”，甚至“赤膊上阵”等，从而为重庆文革中的“一号专案”等许多冤案的炮制出笼定下了调子。

此后，一些重大武斗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和杀人凶手陆续受到清查处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巴县陈家桥炮兵学校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学习班负责培训省革委、成都军区作为“彻底改造公安机关的新生力量”而从农村招收的 1190 名复员军人。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代表市革委、警备区作砸烂公检法的报告。学习期间将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刘佑东、副局长王一押到学习班批斗、毒打。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事件（枪击军车致解放军死伤）的直接责任人、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负责人朱登明逮捕（1979 年 12 月 11 日，市中区法院以枪击军车致解放军死伤罪判处朱登明有期徒刑 18 年）。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按照毛泽东部署，重庆驻军于 10 月开始换防。重庆市革委会本日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 20 万人“热烈欢迎十三军光荣进入四川和重庆大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本月止，南岸区共收缴武斗枪支 1267 支，子弹 29 万发。

一九六九年一月五至八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三天中在公安学校组织大、小会批斗了被集中审查的公安干警 38 人。市公安局二处干部张永恭、公安学校医生韩珍被迫自杀。

一九六九年一月，坐落于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群众自发修建的武斗死难者公墓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茛的修建。从 1967 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 113 座墓茛。其中现存碑文资料可考的 92 座墓中安葬了 345 人。死者多为武斗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 299 位死者中，最多者是工人，占 176 人，其次是学生，占 104 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 82 人）。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 196 人中，最多者是 20 岁以下，占 69 人，其次是 21—30 岁，占 66 人。年龄最小者 14 岁，最大者 60 岁。因武斗中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占领区，此地安葬的死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这是全国至今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公墓。

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重庆军民 15 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欢送首批 1.2 万名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自此，大批中学生被赶到农村，其中一些人继续参加了当地已处于尾声的两派武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重庆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群众专政大军”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建立“群众专政大军”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到 7 月止，全市“群众专政大军”人员已有 30 余万人，大量出现乱抓人关人，乱搜查抄家，刑讯逼供等武斗行为和违法乱纪事件，被群众骂为“专政群众大军”。

重庆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群众专政大军”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建立“群众专政大军”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到7月止，全市“群众专政大军”人员已有 30 余万人，大量出现乱抓人关人，乱搜查抄家，刑讯逼供等武斗行为和违法乱纪事件，被群众骂为“专政群众大军”。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接见时叶群同志在座。（云、贵同志尚未到）

四川七千万人，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大，比法国大，比西班牙大，在欧洲仅次于苏联。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答：近两千万）当三个贵州。你们就等于几个省的头头。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靠四川，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的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

主席讲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就是团结，这是列宁的话。马克思第一个宣言也是号召团结。这次“九大”，毛主席号召团结，无产阶级赤手空拳，打倒资产阶级靠什么，靠的就是团结。

今天你们在座的同志，我知道不很团结，有的是对立面，有的是半对立面。对立面没有关系么，可以团结起来。过去抗日时期在一起，打土豪在一起，民主革命反封建也在一起，反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在一起。

我的意见很清楚，我就是和稀泥，调和，为什么不能调和呢？不和不行，就是要和稀泥，不团结不行，又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而是革命内部。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至八日，万县地区开县两派分别抢夺了县人民武装部和县警备中队的枪支弹药。于 21 日、26 日再次发生武斗，死 6 人，伤 60 人。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三日，涪陵地区垫江县“勤务站”一派（与八一五同派）8300 人组成“万人上京告状团”，要求中央承认其为革命群众组织，经长寿乘船于本日

上午到达重庆，进占重庆火车站内重庆—北京特快列车，造成 20 次特快列车停运 18 天，7 月 17 日重庆站发出的各次列车全部停运一天。重庆站收入损失 60 万元，毁坏铁路车辆、电器设备，毁坏、丢失卧具，抢走食品等各项损失共计 639586.84 元。

一九六九年以后，重庆除去个别地区和单位还不时发生因派性冲突而引起的打、砸、抢、抄、抓一类武斗外，武斗从总体上转变成为所谓“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人保组”、“专案组”、“清队办公室”、“批清办公室”、“群众专政大军”等机构对被清查、批斗、关押、审讯的人员进行人身摧残的形式，其间又有一大批干部、群众被毒打折磨致死、致残、致病，并造成大量冤案。

五、林彪事件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经历的各种波折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反复旧”运动，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

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提出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两个报告作出批示，决定调

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关于刘、张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实际已被撤销职务。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九月底，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为四川举办了 5 0 0 0 人至 6 0 0 0 人的学习班。

一九七〇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之下，黄廉和周家喻一同下放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

一九七〇年五月，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黄廉又回木材公司被当做“五一六骨干分子”办“四不准学习班”，据说还与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和格瓦拉有关系，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布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八月十六日又宣布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

一九七一年五月，重庆市革委会委员、长安机器厂反到底派负责人吴凤岭因在 1967 年 8 月 21 日率武斗人员从人民银行江北城分理处强行提走人民币 67 万元，经四川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由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逮捕（1976 年 8 月释放回厂）。

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 四川省人保组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全市共发生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 22 起，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 1737 人，作案凶手 878 人，已拘捕 239 人。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两次接见了刘兴元、李大章

等四川省负责人，宣布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联系四川实际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请示意见。

一九七二年七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召开常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央召集四川省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 10 人到北京，讨论制定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提名黄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而当选出席大会。

六、邓小平大搞整顿下的四川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期间，四川发起“批派”运动，黄廉又被赵紫阳指为四川的批判对象，说他们是“四大名旦”（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市委报告称：武斗杀人案件已处理罪犯 88 名，其中判处 5 年以上徒刑 14 名，免于刑事处分 44 名，释放 30 名。

一九七六年四月，黄廉入党；

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省委下文安排黄廉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

七、华国锋邓小平大搞清查帮派体系下的四川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黄廉成了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关押审查了五年多，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四年多。

周家喻也被判刑 15 年。

江海云被清查，被撤职并开除中共党籍。

一九八二年，黄廉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骇人听闻的大罪名，被判处 18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八、坚持继续革命的人

二 00 四年八月，黄廉、周家喻文章：《打倒修正主义、还我社会主义——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

看中国修正主义头子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的？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及发展概况

二．修正主义头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在国内又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的？

三．要救中国，要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光荣地位，必须把反翻案反复辟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革命同志们，目前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处在生死关头和存亡之秋，要振兴我们的民族，要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重放光芒，我们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本清源。反复辟、反腐败、反对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围剿，已经是到了义不容辞和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无产者团结起来，打倒资本主义！还我社会主义！

工人、农民、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

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黄廉 周家喻

2004 年 8 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黄廉刑期满释放。

现在，黄廉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居重庆，是“无房子无家庭无医保无工作”的“四无”流浪者。

二 00 五年九月十日，中国工人网洪天水从重庆报道了黄廉的现况：《一个非凡老工人的特殊“待遇”》

二 00 五年十一月十日，四川省宜宾市落实中央政策上访五人小组的申诉
我们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批干部、工人、农民，只因观点不同，就被抓捕判刑劳改，自判刑那天起一直不服，几十年有理有据的申诉未得解决，今年三月我们十一个“反革命”到京上访，被宜宾市当局接回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我们说：省高等法院讲：“不能开这个口子”。

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有错必纠，对以上中院告知我们的那些话又怎么解释呢？市辖各县“文革”的案件全解决了，只有翠屏区没有平反纠正，这都是事实。

案例一：去年 10 月翠屏区法院审理复查“文革”中彭光荣一案,就是审鉴庭李忠如法官亲自审理后并写出终结报告。彭光荣无罪为什么法院依旧维持彭光荣，有罪判决呢？下面是当时的中央文件摘要，按文件规定就必须纠正冤假错案给我们平反和生活出路。

宜宾市受害人：邓耀光、李顺伦、吴鸿东、谢英富、邓子云、周福全、李世金、方腾霄、彭光荣、陈元中

二 00 六年一月十六日，江海云去世

江海云被清查，被撤职并开除中共党籍后，在四川省科技情报所从事技术工作。担任数据中心主任及两个高科技公司董事长，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学术带头人等。其工作成就及优良作风得到各方好评。

贰、本节简论

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有它的特点：

一，关于所谓“中央军委一·一七公开信”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四川汇报会上：

康生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叶群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在接见四川代表的会议上：

康生说：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 19 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 18 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

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 20 分钟开始大逮捕。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打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告名单。

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了六万人至十万人，也创造了全国的新记录。

二、关于宜宾的刘、张问题

原宜宾地委书记刘洁挺、宜宾市委书记张洁挺，一九六二年被李井泉秘密关押多年，并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六五年撤消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布把刘、张“挂起来、

靠边站”的决定，八月十六日又宣布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现在能看到的材料仍然很少，无法作出评论。

三、关于重庆等地的武斗问题

四川重庆等地的武斗，无论在性质、组织、规模、武器、时间上，在全国都是创造纪录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后，四川的武斗主要是在造反派内部展开的。先是‘八·一五’派跟着错误路线走压制了“八·二六”派，后来“八·二六”派反压制、争主导与‘八·一五’派对着干。

两派都组织了各自的专业武斗组织。

两派都使用了步枪、机关枪、大炮、坦克等现代化的武器。

两派都打死了人、杀死了对方的俘虏。

武斗的规模发展到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武斗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一九六九年。

双方武斗中滥杀的负责人最后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种武斗的后果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影响是深远的。

2012年9月6日修改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学校开展军训，狠抓教育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三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唐伟为代表的纵队派。团派和纵队派都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蒯大富所依赖的嫡系部队是“28团”和“31团”，所以称为“团派”。唐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时，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纵队”。

前期的四一四串联会，后来的四一四总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四一四分部，这十一个系的四一四分部，是四一四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行政单位都有相应的四一四分部，如200号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等等。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合。四一四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分别代表四一四中的鹰派和鸽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北京市一些群众组织召开炮打谢副总理的大会，孙蓬一在大会上发言。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正式成立了“4 1 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

一九六七年四月底，戴维堤在北航红旗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 1 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请北航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 1 4”几个“议员”名额。

于是戴维堤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 1 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 1 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陈伯达：

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后的经验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学校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对不对？（谭：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对，那个时候，还搞过革命，后来又没搞下去，停了。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教育制度不能再让资产阶级那一套来统治我们学校了，要产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制度。

这个教育制度，马列主义还没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决了？

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问题。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席说不但学文，这个文包括很宽，学做工、学做农、学军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学要改革，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在当前，对于广大革命师生来说，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青年运动的革命方向，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逐步完成各个学校的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把这些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领域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校从根本上得到改造；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千百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我们的学校成为“抗大”那样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和平门中学的讲话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中有这样三句话：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三句中提到的内容，我们叫五项学习内容。我现在想提出来让同学们注意一下，在军训中不管那个组织，那种观点，你红卫兵也好，你红旗也好，你们到底学得怎样，有那些成绩，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这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人民军队的老传统，也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路线的东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你们应当关心这个问题，应当讲这个问题，应当争论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戚本禹在北京玉渊潭中学的讲话

你们没有高中，毕业后怎么办？办成高中好不好？（鼓掌）没有房子自己盖。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学制要缩短，不要学那么长，中学六年，不要这么长嘛，大学毕业都成老头儿啦！

（有人说复课闹革命是个大阴谋），复课闹革命怎么是个大阴谋呢？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声音嘛！怎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学制、教育方法都改革一下。资产阶级的教育也有过革命，戊戌变法时就搞过洋学堂，这是从英美那里来的，后来又从苏联那里学，苏联也是从英美那里学来的，总之一句话，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中学四年就够了，最多五年，初中改变一下，要搞教育革命和解放军同志一起研究，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是总方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毛主席对军训最关心，他把这事当作最重大的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谢富治和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了两派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聂荣臻肖华谢富治在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聂荣臻副主席讲话

一年以前，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过去这一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划时代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七亿人口的大国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亿万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在

党内的代表人物的猖狂进攻进行总反击，这场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目前正处于决战阶段。

现在，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大家面前。在全国解放前夕，在一九四八年底，毛主席曾经向全国军民尖锐地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的问题。全国军民坚决响应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取得了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处于决战阶段。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给我们下的进军令！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盘据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一个地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深入地展开。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长期以来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问题，是有关世界革命的全局问题，是斗争的大方向，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对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讲话

二、北京市高校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谢富治传达中央给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一、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在徐州的都应该接到通知后，一天内应当立即回来。红代会要派人去说服。如还不听，可同军队、公安机关协同强制回来。

二、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市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本校。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晚，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周培源“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帮助式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

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决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陈伯达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师生的讲话

我今天是来谈教学改革，我们怎么来谈教学改革？

过去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继承来的，教育制度还有从苏联抄来的教育制度，到现在还不多。一百多年，这种教育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关于教育制度问题，毛主席很早就

提出来，他很早就探索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你们要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我们现在来就向你们学习，教育制度能不能搞好，要靠大家，要靠毛泽东思想。今天就出这个题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 赤 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四三战报》编辑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长文。

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对立’；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接见清华大学师生讲话

请你们研究一下教改的问题，创造一个新的教学制度，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把它具体化，提出一套大体的方案。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傅崇碧同志跟我讲，最近大学生好一点，中学生准备你死我活地斗一下。

你们都是两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

你们现在搞武斗这些队伍都要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不晓得还有什么样“队”。这些队都要不得。

刚才傅崇碧同志给我看了几张图片，小学、中学校破坏得很厉害，桌椅、板凳、窗户等破坏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揭露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的阴谋活动，彻底批判他们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干革命，应该协助他们把安置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一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要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否则，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就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凡是现在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同志座谈纪要》

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

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团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掌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只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后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二，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严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反坏和工农兵的

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信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聂元梓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议上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

聂元梓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聂元梓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

聂元梓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就有人马上提出反对，有人说聂元梓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常委们都拥护这种意见，聂元梓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过了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聂元梓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

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

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谢副总理说：“对钢院不了解，来是主要解决武斗问题的，今天（指七月三十一日）你们两个同学讲钢院都打死人了。

在谢副总理的主持下，座谈一直进行到早晨六点多钟，达成了十一点协议。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在团派看来，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

四一四派认为，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

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三、北京高校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错误估计形势提出第三次大串连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种估计对不对呀？

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种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同志的讲话

清华，走了五、六千。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 5000 多人，这不好。

康老插话：

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一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

召回来，但是不灵。（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

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 周泉纓、杨忌非《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 1967 年 6 月重版的一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1967. 09. 23；中发 [67] 30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省军区并转各群众组织：

中央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现转发给你们。

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对在外地串连的学生作如下决定：

一、除中央特许的少数人以外，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北京；

二、北京的学生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应立即全部撤销；

三、希望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帮助动员北京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

四、本决定，也适用于到本市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串连的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周泉纓《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前几天，主席有最新指示，要我们开办训练班。这样会有很大好处。

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发动，第二年是决战，第三年是收尾。现在文化大革命一年半多了，现在基本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垮了。

四、北京市革委举办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讲话

最近以来，有些不怀好意的、甚至恶意的、甚至坏人、甚至走资派挑动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经常有一点哪。这一点我看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个是坏人利用这个无政府思潮，你清华已经贴了伯达同志的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么？我看不行。据说你们清华有一个人去告诉戚本禹，怎么讲了，你们上百人的材料我都整……那一天就抛出那个人的材料，你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什么话呢？最近党校出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听说了没有？你们消息大概比我灵通。（没听说）都听说了的么，李广文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没见过这个人。康生同志经常都是很保护这个人。他翻脸不认人，就贴康生大字报，贴得很恶毒。我听了这件事很生气，肯定是个坏人。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啊，听说我们政法学院也贴了康生大字报，还是那个人的大字报。你在小站搞伯达材

料，这个账没清算。现在就这样做呵，这种办法千万不能这样子啊！千万不能上坏人的当啊！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

战士：周景芳的态度极不老实，很嚣张，说没有接到你的新指示前，他什么也不说。

吴德：就几条嘛：1，你们根据戚本禹、谢富治指示去执行；2. 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质问；3. 谢富治同志、戚本禹同志还讲了一条，他回去还有自由，你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要注意六·六通令。就这么几条嘛，最近“大庆公社”抓了人，那不好，抄林杰的家，中央也要通报。

战士：孙泱之死，你知道吗？

吴德：我接到了你们一个报告，说是死在暖气管上，我也很奇怪，1.3米暖气管怎么能吊死？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至3：55，地点：人大会堂。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

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多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谢副总理讲话：

今天不是你们请来的，是我自己找得来的。找得来的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陈伯达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复课闹革命哪，好象怎么都响应得不那么热闹了，没有动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昨天陈伯达同志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问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复课闹革命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所以伯达同志就特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就去，去跟大学谈一谈。所以我今天就来同同志们谈一谈。有十来个学校，可以不复课，让他去打架，什么钢铁学院啊，什么民族学院啊，什么人大啊，什么第一外语啊，第二外语学院还有工业学院哪，还有什么清华，还有什么北大，总有十来个学校，让他什么时候打够了（众笑）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再开学，其余的 62 个学校 52 个学校开课，十个学校让他们去打架。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学习班的问题。学习班，北京市已经知道有数的有六百几十个学习班，有 4 万多人，实际上可能超过这个数目。几个经验。

这个学习班第一就是要三结合，就是有革命群众的领导人，有解放军，还要有已经站出来的和准备站出来的干部，起骨干作用，核心作用，你没有干部，你差了这一条。

第二点，要集中少数文件，而且通过这个文件把复课问题解决，而且集中解决问题。

第三、最主要的是解决大联合的是自我批评，各派自我批评，所以干部在里边好得很。那么红卫兵的自我批评，就感动了干部的自我批评，干部的批评又推动了红卫兵的自我批评，所以办得好，都是这样。这个自我批评，大学生最困难。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泉纓《和周泉纓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同志给谢副总理的信
谢副总理：

我们要求提审反革命小丑周泉纓、杨忌非（均已被捕）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伯达同志，中央文革。他们背后有坏干部支持他们。我们准备把这个案彻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同意提审，请求您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蒯大富一封信的批示
可以拉回来批判斗争，但只能文斗，不能打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外语学院昨天发生的这场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股武斗风总是煞不住？
要检查形成这次武斗的原因，追究责任。

二、外语学院二派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三、这些问题的解决靠武斗是不行的，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工代会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江青：今天请了大、中学的小将参加，你们提了好多问题，我想你们还是好好听听工人同志发言，有一个条子说“据说要放寒假了，引起很大混乱。”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制造混乱，不要上当，还有什么要下厂往外跑，总之，是不想坐下来搞斗批改，要提醒你们现在煤很少，有些学生自己搞煤，用电在屋里做饭吃，这应当吗？一点也不顾全大局，希望你们给这些人说不要这样干，学校问题最近要专门找个时间听听汇报。

内燃机工厂一工人发言说：现在学生还到工厂去串联，去贴大字报，再去可以不可以赶他们？

伯达：可以，是什么学校去的？

工人：农机学院，还有“新人大公社”。

伯达：有礼貌的请他们回学校去，告诉他们，工厂的事，我们自己管，

京棉一厂工人又说：“人大三红”也到我们那里贴大字报去了。

总理：各单位都回本单位搞斗批改。

江青：我们建议学校红卫兵小将不要包办代替工厂的事情，这样搞不好。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时谈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周总理指出：“政法学院有个陈荣金，起初大家都支持他。你知道他到处煽动，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太猖狂了。”

《联指》代表插话：“这家伙到处去夺权，他们还到广西同另一个组织结合夺公安厅的权。”

戚本禹同志说：“政法公社就是到处去夺权。”

周总理接着说：“我们现在已把他（指反革命分子陈荣金——编者）拘留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陈：同学们，我们今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你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了没有？

第二请问你们对复课闹革命有什么意见？

众：坚决复课闹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复课闹革命。

陈：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众：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

张春桥接见上海文艺出版界代表时说：

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些观点，说：“造反派敢冲敢打，敢于打天下、夺天下，但坐天下不行”，不要以为是共向东就这样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说“四一四”要坐天下，“四一四”必胜。说上海市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说造反派能打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但不能说要重新换班，权力重新再分配。我们在掌权中来学习嘛！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全国有十四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五、六个也快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五、北京高校两派武斗加剧

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北京高校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实现大联合。所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将北京主要高校的两派头头集中起来学习，要求他们“斗私批修”，早日实现大联合。

清华 5 0 0 多名干部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参加了 4 1 4，占 4 1 4 全部 7 0 0 0 人的百分之五。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石油大庆公社谈北京公社利用反余秋里和其他几个副总理，实际是炮打毛主席的司令部时：

江青同志打断他的话，气愤、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嘛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答：有一些）只有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么表态的？（答：我们认为有二月逆流。）

总理：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我没听清楚，你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一遍。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

江青：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我还保了他，你们打嘛！你们打得对嘛！有两个展览根本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林副主席。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

总理：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讲你们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你们一点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你们是一再地保，你们倒是一贯正确了？！

总理：应该谈你们自己的错误，从二月份以后。

（大庆公社代表谈“五·一六”问题）

江青：你们已经捞不到什么了，你们还讲什么“五·一六”。我们反“五·一六”的时候，你们倒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总理：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你们一直保，倒成了一贯正确的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是反对我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轰呢。你们从头到尾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是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喊：打倒谭震林！）

姚文元：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谢富治：二月逆流是想推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我很气愤，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答：要！）一贯保的倒成了一贯正确，你们一点不做自我批评，不听！不听！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康老：余秋里搞大庆展览时，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搞掉，而去买刘少奇的黑照片。

江青：一个石油展览，一个农业展览，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没去看。

康老：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叶群：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二月逆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姚文元：我刚才叫他重复一遍，他不敢重复，有胆量再重复一遍。

江青：你有胆量重复一遍，没有胆量吧！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我希望你们多做自我批评，你是个头头，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群众帮你检查。

各位首长：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北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

聂元梓在会上说：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聂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

1，我对谢富治，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谢富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资历从职务上来说，都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投靠在江青脚下，投靠在中央文革脚下，别人不用说，在王关戚倒台以前，连对于戚本禹这样的“小字辈”他都是毕恭毕敬。在市革委会讲话，言必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一定要紧跟江青同志”，还要一一历数中央文革的成员，不厌其

烦地重复道，“康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伯达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王力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关锋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戚本禹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等等。他还宣布，谁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中央文革哪一个也不能反，反江青是反革命，反陈伯达是反革命，反王力是反革命，反关锋是反革命，反戚本禹也是反革命...真是令人感到不堪入耳。当时我们正在同王关戚进行斗争，“除隐患”战斗队的活动，动静很大，听了谢富治这样的讲话，我气得手都直发抖！

2，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搞名堂，我私下里对谢富治讲过好几次周景芳在市革委会中，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各单位都有耳目，背着市革委会秘密调查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动态，上报中央文革。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参加市革委会工作的工人，他不愿意跟着周景芳搞特务活动，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在是革委会里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就对谢富治讲周景芳搞特务活动。谢富治呢，还为周景芳开脱，说周景芳在北京市革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要反他，等等。我明明是揭发周景芳，让谢富治这么一说，我是反周景芳了。可是，谢富治这话说过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西单商场大武斗。一追查原因，是周景芳指挥西单商场武斗，周景芳暴露出来，所以垮台了，这也不是谢富治把他拿掉的。相反地，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谢富治也没有把周景芳活动的罪行公布给市革委会的委员们，他自己更是一句检讨的话也没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谢富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定他就是中央文革江青那一伙的。

3，对于王、关、戚，谢富治的态度同样是全力维护和吹捧他们，以致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了王、关、戚及其后台中央文革的一个搞阴谋活动的据点。经我多次向谢富治讲王、关、戚等利用北京市革委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谢富治仍然一再地为他们做解释和开脱。后来，谢富治不仅将北京市革委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还想在要求市属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整风实现革命化和制定各级革委会革命化条例的幌子下，变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如北京市革委会一样，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因此我在市革委会会议上讲，制定革命化的条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革命化。所以，要整风就要首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聂元梓说：这样就打乱了他们以革命化的口号下，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这样就引发了会议上的冲突，导致市革委会会议矛头一转，出现集中火力批判我的上述情形。

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开小会批评聂元梓“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等相继发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七个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

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他们三个人和聂元梓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他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内的两派打起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到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李钟奇和聂元梓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他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聂元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八点；地点：哲学大楼 206 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同志。这个凶手，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新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查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唐春景等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查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希望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群众组织提供方便条件以利制止武斗和武斗的调查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

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第一天，

4 1 4 占领了旧电机馆，

汽车楼是 5 月 1 4 日晚上 7 时左右占领的，同时占领的还有焊接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四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团派占领了 9 0 0 3 大楼，旨在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3 时，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的 2 0 0 多人队伍轮番进攻，东区浴室内的四派守军拼命抵抗。

4 时 3 0 分许，主楼区的四派 1 0 0 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操场西边路上相遇。

5 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 6 0 余人冲锋增援。

9 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西两边攀梯进攻，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双方展开拼杀。

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四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纠集大批人员，攻打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

1 3 时许，团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经过喊话劝降，最终使浴室守军打着白旗下楼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团派发动进攻不久就占领了东区浴室的一楼，但是，他们无法攻上二楼。因为 4 1 4 在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决心固守二楼（东区浴室只有两层）。要占领整个东区浴室必须首先占领屋顶，因此团派很早就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屋顶。

四派守军大部在二楼休息待命，只派几人通宵在浴室屋顶戒备，发现团派进攻，主力自然到屋顶迎敌。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四派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第一教室楼，实施佯攻。四一四除了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之外，并没有攻入“一教”的行动。

“围魏救赵”不成之后，四派就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四派担心在主楼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大概是 8 时左右。

出动土坦克时间最早也在 1 0 时以后。

一名 4 1 4 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代表谈判，团派同意派车将 4 1 4 伤员送医院救治，4 1 4 守军才放弃东区浴室。

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 603 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 7 月 27 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 601 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7. 三”布告等文件精神。

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的头头们。于是，“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于是，“4.14”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 9 时左右，工宣队刚刚抵达西主楼的过街楼，4 1 4 人员迅速搬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及其他据点，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

在工宣队进入主楼的同时，4 1 4 的武斗人员交出武器，

当时布置藏匿了部分武器，但在下午 2、3 点左右被围困在科学馆的 4 1 4 人员获救之后，就全部上缴了；

四派和工宣队的领导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 10 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队对此深感满意；

工宣队进入 4 1 4 的所有据点，受到 4 1 4 方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

在工宣队和团派冲突期间，4 1 4 组织人员给工宣队送饭送水，协助工宣队救治被团派打伤的伤员。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 50 比一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十一点 30 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 and 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中的荷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三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7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十、十一、十二号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五四一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

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

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

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

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

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

七、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深夜，毛泽东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韩爱晶接到中央领导人召见的通知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 10 分 20 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治后面往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戴维堤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关于制止北京市大学中的武斗问题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

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

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关于北京市大学中的两派斗争问题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

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

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

「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

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

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关于大学的教育革命问题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

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

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

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

师范大学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关于今后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问题

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的检讨

八、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谢富治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的讲话
现在有几件事，当着两方面说一说：

第一条：清华井冈山和 414 在言论上，行动上要支持宣传队，不得有任何障碍，妨害宣传毛泽东思想（包括广播台使用）。

第二条：清华两派立即停止互相攻击，要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蒋南翔，这一条要立即执行。

第三条：全面落实 7 月 30 日的“六条协议”，（念六条）很好嘛！

第四条：清华两派要主动接触，为革命大联合创造条件。两派首先无条件放回所有被抓的人，除 4 个外全放，今后不准任何人借口抓人，不管 414 的也好，什么人也不能抓，你还抓宣传队，抓就抓我好了。

第五条：清华两派确定联络地点，确定联络人员。这一条很好，是好事情嘛！

第六条：在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积极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第七条：是我加的两派都如此，接受宣传队的帮助和指导！你不要看不起人家老粗，工人、解放军。你们是大学生的，毛主席就支持老粗。毛主席讲大学生要渗点沙子。我不懂，毛主席给我讲的：你大学生是一堆粘土，要加点沙子，渗点

老粗，改善你那个团粒结构，就是要渗工人和解放军，我谢富治也是老粗，你又说我那七条，你压工人，你压我就反对。他们发誓不敢赶！你宣传队要体会他的困难，要帮他的正忙。

什么七条、六条，就是一条，支持、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是有人反对宣传队就是犯法！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定地走上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因此，红卫兵和一切知识青年都必须拜工人阶级为师，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当前，学生同志们应当热烈欢迎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努力同工农兵打成一片。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应受到批判。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他回答“要准备什么？”的时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后），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加写的一段话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以后），毛泽东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

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1970.06.05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训，恢复上课，搞好教育革命。

可是经过一年以后，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也没有开展起来。一部分学生外出搞串连，一部分学生在校搞武斗，还有一部分学生在家当逍遥派。

二、在中等学校，存在着“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斗争，争论谁是最老的、最革命的造反派。

在大专院校，存在着“天派”与“地派”的斗争，争论是批谢富治还是保谢富治。

三、进入一九六八年五月，北京大学的“新公社”派与“井冈山”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发展到公开武斗，并有外校人员卷入，聂元梓被人刺伤。

四、进入一九六八年五月，清华大学的“团派”与“四一四”派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发展到使用热武器的阵地攻防战。从五月份一直打到七月底，号称“百日武斗”。

五、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

线”，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园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中，沈如槐将 4 1 4 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

- 1、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
- 2、文化革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论”、“收尾论”、“转舵论”、“两小撮论”；
- 3、针对干部的“平黑论”；
- 4、针对群众的“平保论”；
- 5、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
- 6、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
- 7、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 8、反对冲击军队；
- 9、反对极“左”思潮；
- 10、“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沈如槐认为：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华 4 1 4 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做了如下六件大事：

(1)与蒯大富决裂：坚持不懈地批判蒯大富的错误，与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决裂，建立了一个政治纲领明确、组织机构严密的群众组织，打破了蒯大富的一统天下，冒着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阻止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使其红卫兵专政始终没有披上合法政权的外衣，从而减轻了极“左”派的危害；

(2)大力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促进三结合，这是 4 1 4 的政治纲领。4 1 4 为领导干部取代红卫兵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而大造舆论，在清华为保护和解放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把谭浩强（团委副书记）、罗征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应中（党委常委）、刘冰（党委副书记）四位干部作为典型对象，发动

了一次又一次解放干部的运动；但是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教师；

(3)坚持反对极“左”：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这是4 1 4的理论旗帜。4 1 4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反对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冲击军队；但也犯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和个别人在个别地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

(4)创立四派思潮：与团派就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的党和政权的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刻而又广泛的论战，形成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并在清华坚持实践“四一四思潮”；

(5)反对中央文革：坚决而又讲究策略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文革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与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6)开展武装自卫：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与团派极端分子进行了“百日大武斗”，阻止了蒯大富消灭反对派的图谋，最终与团派同归于尽，并导致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在武斗中犯了炸高压电线杆的错误。

“四·一四”思潮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与中央的路线并不一致，这从它反对中央文革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同时从十月政变后它享受到的政治待遇，也可以看出。

六、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北京市大专院校的派斗、武斗，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影影。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北京市大专院校的武斗、派性斗争问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派工人、解放军战士进驻学校；一条是把已经毕业的学生安排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

这样一来，问题迅速解决了。

有人说：红卫兵运动由此终结了。这个话有些言过其实。红卫兵运动的任务转变了，它的活动形式也必须随着转变，不能老是到社会上去冲冲杀杀。其实，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任务就已经转变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只是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包括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思想跟不上形势，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

七、毛泽东接见后五大领袖的遭遇

聂元梓

1969 年 11 月，下放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第二年夏天回京治病。

1971 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1973 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

1975 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1978 年 4 月 19 日，被捕入狱。

聂元梓以后在自己的申述中，反复强调她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但是，由于她是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因而就不可能得到反文革领导人的赦免。

谭厚兰

1968 年 10 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 年 6 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

1978 年 4 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1982 年 6 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 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 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 年 11 月，去世。

王大宾

1968 年 10 月，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 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 年，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 年秋，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 69 元。

1973 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

韩爱晶

1979 年，被捕入狱。

1983 年 6 月，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蒯大富

1968 年 12 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电解工。

1970 年 11 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

1973 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1978 年 4 月 19 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1983 年 3 月，判处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1987 年 10 月 31 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五大领袖的遭遇极具代表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2008 年 8 月 16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2 日修改

第七章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造反派要求夺省委走资派的权，中央决定对云南实行军管

(一) 群众要求会见阎红彦而冲击军区，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张曙光在接待工作会议上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下午，阎红彦在省委书记处碰头会上说：“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

晚上，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潜来昆明，由阎红彦亲自秘密安排，住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李和阎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阎红彦如何检讨，军区内部斗争激烈，×××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深夜，阎亲自送李井泉飞往上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领导到会。

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

阎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

赵健民说：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多数人同意赵的意见，不能去。会议决定拒绝出席。

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

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

当夜，少数南下串连学生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有人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

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成立了“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参加的共有一百零七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二十九人；科处级干部六十五人；一般干部十三人。

八派认为：这个干联站是一派的参谋部，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破坏联合、为四清下台干部翻案、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这个组织于三月十日宣布解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押解的人看他老实，就卡住他的脖子，赵健民就骂这些人是反革命。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

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糊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晚上，王甸在西山地下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阎红彦设法对付中央和群众

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说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夸大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

阎红彦并对下发出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傍晚，叶剑英打电话到昆明军区：阎红彦同志在什么地方？他身边有些什么人？安全不安全？你们要说服造反派，不要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

陈伯达在电话中反复指示“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不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等等。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在电话中要阎红彦端正态度。

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清晨，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即派人前往小麦峪捉拿阎，清晨六时到达小麦峪时，阎红彦已死。

当日，有人在社会上造谣说：“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

深夜，张曙光、×××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给中央汇报。

下午，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老婆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

赵健民说：他们（指造反派）只能将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我宁可个人牺牲，也要和他们斗到底。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四十三医院泡制一封“控告信”，“控告”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

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

“红卫兵总部”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况，支持革命造反派。并同意革命造反派、军区、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革命造反派代表十三人及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给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请告诉周兴、秦基伟二同志并转告云南省委、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三、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四、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五、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过去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保守派和一些不明真相分子，使他们觉悟过来，特别是要把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决定和两个十条草案，以及这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新挑衅的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以便促使他们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改变错误，而不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六、我希望省委接受我上面所提出的五点建议，并坚决执行，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云南省现在的紧张局势，可以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扭转过来，走向健康的发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谈话纪要
上次说明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云南日报的工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云南日报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你们力量不够，可以争取外援嘛！革命学生可以协助编辑，但主要是靠自己，保守派可以争取一部份，当然不可能全部争取。还是用原来的云南日报，内容面目焕然一新，我打电话给刘殷农同志，叫他们写一个告昆明市，云南省人民书，局面会很快得到扭转，就可以改变面貌，不要怕。

云南还只是初期苗头，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定时期是会强调经济要求的，用物质利益来毒害工人，你们要坚决反对，反对谁呢？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他们会把矛盾上交，保守派要比你们还“左”，提出极“左”的口号，使领导无法答复，然后到北京来，你们赶快回去，戳穿他们的阴谋，揭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反扑，劝阻他们不要上北京来，上北京来也不能解决问题。

比如云南日报，以云南日报的造反派为主，尽一切力量帮助，其它机关也是一样，你们帮他们去造反，把业务搞得更好。北京有个新情况：群众起来，领导不通，一怕躲起来，就象云南省委一样，这样就促使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群众，阎红彦回去后，就是不解决问题，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领导躲起来，这样就使造反派把矛头转向群众，找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

深夜，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离开昆明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有的地方落后于北京。特别是云南，很落后，路又远，红卫兵去得晚一点。但是红卫兵终于还是到了，震动了。很多地方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就是一个。

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又主持了十月工作会议。各级领导还没有想通，会上揭发了很多问题才逐步想通，其他省的领导都谈了些问题，多数地方有效，而云南有的有认识，有的没有认识，有的根本没有认识。不理解，怕群众，怕革命，怕革到自己头上。所以云南在第一个高潮，第三个阶段没有很好的动起来，就在一月四日发生了这个事件，是在关键问题的表现，是省委仍然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

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出来，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

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大一股洪流，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

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

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

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

现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意云南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到北京来，他们和我畅谈了两次，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们在北京任务基本完成，明天他们就要回去了。在北京只能解决大方向，具体问题要到本地解决。自己解放自己，问题在本地。我们有一句话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电话记录

总理：今天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有个电报给你们吗？希望你们按照中央的希望。完全支持了你们，责任完全在于省委。这个电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亲自看过的。我们希望你们跟昆明的同学、工人，说服他们按照这个希望，按照你们大会的决定，今天夜里还是退出离开军区大院。

陆林：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我们今天和主席团有一些分歧。

我们走的时候太乱，说撤就撤，撤了什么也没有，撤得灰溜溜的，那些保守派真是要讥笑我们了！

王旭辉：主席团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是郊区的，离这个地方几十公里，今天就没有办法撤走。我们是郊区厂矿，根本没有准备，天黑了突然通知撤离，那不是前几天下着雨，我们搭了一些帐篷，现在怎么撤法也不讲，就限昨天 24 小时以前撤出，这是办不到的。工作中一点准备也没有，大会主席团就是他们说了算，工人的意见他们根本就不听。从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来讲，从我们进来以后，从来没有听说过宣布什么大会主席团的名单。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工人有多少，红卫兵小将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撤了，咋个搞的，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上午说通知撤，结果工人的意见怎么撤，他又不讲，下午又作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撤，但是到了天

要黑的时候，又说要在昨天 24 点以前全部撤出。外边又下着雨，这个情况大会主席团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人的死活问题，叫我们郊区的撤了睡在露天坝坝上去？像这样下着雨，有老的，有小的，有的还是家庭妇女，这些在露天坝里怎么睡呢？他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大会主席团说了算数，工人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陆林：我们完全撤走，只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第二个条件，要军区给我们平反，第三件事，我们要在军区设立一个联络站。

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名称仍为“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八派）；

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少数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的即云大炮兵团等少数组织重新命名为：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即后来的炮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叛党自杀经过。

（二）军事院校学员及部分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会同红卫兵小将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打倒孙雨亭首次大会于晚八时在检阅台召开，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各阶层群众约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孙雨亭等被揪出来示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些群众组织，借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说，“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三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扩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

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开进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

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派代表赴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的讲话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能叫托派，托派是很坏的敌人。

“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中央哪里提过这个口号，报纸上也没有提过。全国也没有这个口号。

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请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撤回来。你们反映的一月份冲军区问题，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所谓反右倾的问题，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在根据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反你们要搞“大乱”。你们这样提，完全是错误的。冲军区也有你们一份，撤出军区你们又要讲条件，这些责任你们怎么能推掉呢？

康生同志讲话：

南下同学到云南煽风点火，成绩很大。这一点要肯定。据军区的领导同志反映，黄兆琪同志也是在高仰义等同志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刚才讲了你们一些缺点，也不要紧，不过是为了冲击你们一下。

在当前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注意：

一个所谓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在文化革命中，特别是各学校各地方都存在。这是很反动的、很不对的，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有人提出“反上层路线”，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正确的阶级路线。不作具体分析是不对的，是达不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目的。

再一个问题是，夺权中怎样“三结合”。怎样进行三结合。一种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建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有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领导的解放军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干部代表。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主张的三结合，是正确的三结合。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其中工厂三结合的工人不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干部也要分技术干部、一般干部、领导干部。

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不是对所有的当权派都要夺权。（伯达：过去提的普遍夺权，全面夺权，这些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全面夺权，普遍夺权，那么，他们（指李成芳、张子明等军队领导同志）的权你们夺不夺？解放军的权你们夺不夺？如不夺，就不全面，就不普遍了嘛！

再一点，夺权以后，省的名字，中央已有通知，不要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临时权力机构还是用“革命委员会”比较好。有的地方用过“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现在也要改了。上海原来用过，现在也要改了。

还有一点，要和同志们交待一下，即斗争的办法问题。十六条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的文件历来强调这个问题，但现在各地有些斗争方法不符合十六条，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等等，不知云南情况怎么样？有些报纸上登什么“喷气式”挂牌子，这些做法只能脱离群众。（伯达：“砸烂狗头”这些话以后也不要用了。）还有人下跪，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毛主席坚决反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有理就讲理嘛！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搞那些？搞那套，说明你没有理，简直是形左实右！过去用过那些做法的不要再算账了，今后不要再用。

还有一件事要向同志们交待一下，就是关于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大字报有革命的大字报，有反革的大字报。反革命就利用大民主，利用大字报，反对我们，例如“联动”就是。这是一个一分为二。还有一个一分为二。就是有质量好的大字报，有质量不好的大字报。有的是低级趣味，如现在流行的“砸烂你的狗头”，只是骂人！（伯达：什么混蛋啰！油炸啰！绞死啰！枪毙啰！火烧啰！这些话没有意思！有的还做一个纸人，用火烧掉，多无聊呀！这都说明没有道理，道理不充分，如果是好好调查研究，掌握了材料，掌握了道理，就不会这样干啰！）

另一方面要注意，也有不少是不实事求是的，马路新闻，谣言可多啦！成了传播谣言的工具。危险的是有些青年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偏偏喜欢看马路新闻，听那些谣言。红卫兵的报纸的确有些好文章，但不能传播谣言。有的还惹了乱子，如说朝鲜政变，越南政变。朝鲜就来信向我们抗议。有的还向我提出抗议，搞到我的头上了。减低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降低了文化大革命的威信，有些报纸喜欢把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等等，印成照片，画成漫画登在报纸上，直到

现在还有人搞。如有一个叫“百丑图”的，印的那么漂亮。这种东西无论省报（《湖北日报》登了）、红卫兵报都不要登。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采取这种斗争方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谢富治接见云南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康生会见赵健民听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赵健民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指示的。

第二，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

第三，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以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为主任；

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子明、云南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为副主任；

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为委员。

康生在北京专门找李成芳、张子明谈话，告诉他们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的动向。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省军管会的负责人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必军委扩大会议。

省军管会负责人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二三派的态度日趋明朗。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压制了炮派。

（三）昆明地区两大派发生严重武斗，谢富治王力到云南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属于八派的昆明市公安局八八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刘殷农贴出大字报：《昆明市公安局八八战斗队向混入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公子丁荣昌宣战》、《揪出丁荣昌的后台》。

炮派则反对将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张贴街头。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省军管会召开座谈会，周兴、郭超、赵健民等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炮派在市内检阅台召开了“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

八派认为，炮派的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是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冲击会场。

八派的打算得到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和一个联络员的支持。

八派冲击会场，大会中断，双方在广场上、东风路上展开了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昆明机床厂炮派的群众庆祝成立五·一兵团进行文艺演出。

军医学校的八派组织冲击会场并围困演出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双方陆续调集人员到昆明机床厂，准备武斗。经省军管会做工作，双方撤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军医学校炮派组织开会声讨同校八派组织的罪行。八派组织冲击会场。

地方八派、炮派组织均调集大批人员前去声援。

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三百人赶到现场，隔离双方。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

一直持续到六月三日才结束。

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
昆明军区党委：

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上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一）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机关、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四）对军区副政委张子明，胡荣贵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在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中 央 军 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

以后他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

他是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

一九六七年六月，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

揭露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五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

《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指出：“蓄谋已久的五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五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五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李再含给昆明军区党委的一封信

我完全拥护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五月三十日对昆明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据说有怀疑是假的。经我了解，这是确实的，没有半点虚假；又有人说军区党委谎报情况、欺骗中央，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下所作的指示，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用的惯伎，他们常用这一套来欺骗群众，破坏中央的指示，万万不可上当。

“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双方都可能犯有错误，但性质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犯错误。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建议军区党委召集双方代表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斗争水平。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共同对敌。至于他们本身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整风解决。而不用外部解决的办法。

一九六七年六月，省军管会编辑的《赵健民近况》在军管会常委中传阅

《赵健民近况》第一期中载有：“赵健民说八派不好。”

《赵健民近况》第二期中载有：“赵健民讲云南的走资派就是李成芳和秦基伟两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黄兆其指挥的照妖镜战斗队散发传单，指认赵健民是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十九日，八派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高呼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康生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

康生：

- 1，历史问题也可调查，但不要到街上贴，轻易公布。
- 2，双方面都不赞成打、砸、抢。
- 3，双方都要保证，尤其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无论如何要保持不能断。
- 4，双方达成协议，不要抓人。
- 5，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
- 6，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王力：

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

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八·二三”派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富治接见驻昆明部队时的讲话

一，搞军管的同志们在目前错综复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时时刻刻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前进，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左右这个大方向。无论怎么干扰，也不能离开这个航线。

二，军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没有经验。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不能不管，有些地方可以不管，不可不管，不可多管，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应该管的单位是关系国计民生，而左派又不占优势的，影响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如果不是属于国计民生，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我们就可以不管，实行军管就是多余的，像省委办公厅实行军管干什么。

三，军管是没有经验的，进入工厂、机关、企业，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支左问题，刚才×××同志讲的好，谁是左派要有一个识别考验的过程，还有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左派的问题。一个单位，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的一个单位一个左派，有的两个造反派，那里的表态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要有调查研究的态度，不能随便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支持，因为我们要求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到那里去。有些搞不准不一定表态，因为左派不一定要哪个批准，北航红旗哪个批准了，他就是很好的造反派嘛，听说有一个军工厂先去一个宣传队，后又去军事代表，以后又去一个宣传队，又有驻厂的军事代表，他们各支持一方，随便支持，没有经过任何人讨论。我记得北京卫戍区也到了很多工厂，他们很谨慎，在厂内外他们作了很多调查，支持的都经过北京市革委会、工代会、红代会大家讨论大家公认，有争论的放下来再调查，第一批有十八个厂，有争论的一个，第二批二十个，有争论的两个，他们又去调查。你们去几天，就支持一

派，采取不慎重态度，这个问题要由各方面讨论，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决定一件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去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谢富治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七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七次座谈会。短的三点钟，多的六小时，一共开了七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三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五、六小时，多的八、九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已经开十二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十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

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

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

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

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同志，陈康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一出来就糟了。又出得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既然关键是在两级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要负领导责任，要多负些责任。

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在坐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谢富治王力在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的讲话
王力讲话：

从今年一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夺权的阶段，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斗争，有了很大的成绩。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决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本身也是一个严重的锻炼。这是运动的主流，这是运动的本质。

一、二月间是有一股冲击军队的潮流。一月二十八号，发布了八条命令。这八条命令为了稳定我们的部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又没有经验，又加上有这么一个八条，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出现了一个在二、三月间把一些革命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把一些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是出现了这样一些严重的错误。总结了两段的经验：冲击军队这一方面的经验以及军队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经验，就发布了四月六号的十条。从四月六号以后，全国的形势很快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把形势就看错了，口号也提得不对了，到了四月下旬，还死抓住一个“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一个口号，这就落后于形势了。这一个期间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占主要地位的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把他们的错误看重了，甚至于把性质看错了。一定要抓什么赵永夫啰，又是什么永夫什么永夫啰，有的又说是一个又粗又黑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啰。我们有一部份军队的同志就把革命小将的这样一些毛病看得太重了。总而言之，双方都没有理解毛主席提出来的伟大的“拥军爱民”的口号。

所谓云南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这么三个问题：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内部的关系、昆明的以及云南的两大派的关系问题。这样为什么毛主席说相信昆明的问題，云南的问题能够同志们自己解决呢？就是说同志们这几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題是完全可以在“拥军爱民”这个伟大口号下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

有的同志批评这次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是“抹稀泥”的方针。我不赞成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会见昆明机床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对《云南日报》报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 error，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

三、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在省军管会负责人主持下，八派和炮派的主要负责人举行谈判。

八派一个下属组织的人冲进谈判会场，打伤炮派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1967.08.08； 中发 [67] 237 号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召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说明了中央的批示，并指定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黄兆其等人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四）昆明地区两派的武斗进一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昆明海口二九八厂两派组织武斗，死三人，伤十数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挥的“专揪叛徒战斗队”大量散发传单：

《叛徒赵健民的自白》

《赵健民和黎玉两个叛徒是怎样互相勾结的》

《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八派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到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派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双方死九人，伤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

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八派在内应下，抢了省体委国防俱乐部的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昆明军区的电报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并告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

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炮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夺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

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与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

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议商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炮派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三五六厂两派武斗，死二十人，伤二百三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炮派在三五六厂下属组织的配合下，抢三五六厂枪 313 支、子弹 135000 发。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的给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给昆明军区的关于二百号信箱武器问题的电话记录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十九时三十分。

一、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批示，大力宣传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中央文革八月二十六日的四点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二、驻军部队由原来的一个营增加到××个连，尽最大努力劝阻。坚决保卫武器。

三、如果劝阻无效，立即抓起头头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炮派攻占博物馆，双方死八人，伤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云南省一部分干部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人们称之为“摧资兵团”。

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是省市两级中上层干部和一些厂矿、学校、企业的支部书记、厂长、经理及地、州、市、县一些观点相同的干部。

这个组织当时在昆明有四千多人；在全省约有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是支持炮派的。

（省革委会成立后，被认为“不是好组织”，成员受到清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八派又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东川市军管会瘫痪了。

炮派把东川军管会主任、十四军 42 师师长田大邦，干部刘友义揪到云南省军区礼堂批斗，刘友义同志当场被打，田大邦被连续批斗，因高血压、心脏病而病倒。

东川市武装部长、军管会副主任王若海被炮派推下高楼摔死。

武装部打开武器库，向农民发枪，挑动农民进城制造大规模武斗。

在新村包围矿务局机修下，停水、停电、断绝一切交通、通讯达一月多。

在城区、农村、工厂杀害八派的工人、农民、干部达 200 多人。炮派不准八派收尸，用打冷枪的手段，使收尸群众又被打死、打伤，造成几十俱尸体曝晒一周之久。

由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建功，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朱家璧组成两级军区制止武斗工作组到东川后，停火交枪，由解放军战士保护八派群众，才把尸体收回掩埋。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山壮族族自治州在军分区、人武部及各级公检法部门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农民革命军”组织，约有十六七万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七日，昆明电机厂两派组织武斗，死六十八人，伤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八派和炮派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两派又达成了《关于停火交枪的补充协议》和《关于严禁打、砸、抢、抄、抓和立即释放被抓人员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陈康、赵健民未得到中央的允许，擅自到北京，要求向中央汇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赵健民给住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的工役制部队工人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工役第八团的负责人贾玉玺打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八派成立“打倒赵健民作战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八派在内应下第二次在省国防俱乐部抢枪。
八派前后两次在省体委国防俱乐部抢走各类枪支一千多支，子弹一百多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上旬，赵健民同原省人委的炮派负责人司以恭通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原省委办公厅主任等人起草了一份《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许多领导干部，包括原省长周兴都在上面签名。

一九六七年九至十一月，炮派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破坏部队稳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云南省军管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昆明市粮食局直属库两派发生武斗，死两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八·二三派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
黄兆其在会上说，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原省委办公厅主任代表原省长等一批领导干部在会上宣读了《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炮派第二次到云南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炮派第二次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十三军、四十军来电的批复

十三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烂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中央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必须立即坚决制止。

中央除指使昆明军区、沈阳军区，对上述行为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外，希望各地对监狱和劳改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中央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准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

（二）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三）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对昆明军区的指示

请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坚决执行“九·五”命令，都不准抢枪，不能抢档案。要耐心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八派第三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连用机枪和五六式冲锋枪数百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八派攻打昆明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死一人，损失财产四十二万余元。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再含接见昆明八·二三战报记者的谈话

原省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阎红彦带了×××、×××。这个人表现很不好，和中央唱反调。其中特别突出的一次，在李井泉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讨论伯达同志的报告，李井泉在那里鼓动大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当时云南来说，对伯达同志的报告到处挑毛病，大唱反调。×××过去我也不认识他，这次开会才认识的，这个人就大唱反调，起码看，是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很好批判他的这些东西，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是不是还有？

赵健民不是主席直接讲的，是中央文革的意图，叫赵健民站出来。这样，谢副总理到云南直接找赵健民谈话，

昨天我听说昆明军区三大机关声明在贵阳街头出现，我立即下令复盖了。在贵阳我们不允许，我们一定要照中央指示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谈，可以向中央反映，军内问题是有原则的。你们两大派要正确处理军内问题。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一些，这段时期，鲁副司令员常跟我联系。对黎锡福、李兆昇同志，我建议送到北京医院治治病，保护起来，他们不是属于三反分子、叛徒，不属于这些问题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八派攻击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厂的炮派，死十七人，伤四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海口三五六厂下发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枪二千零二支，子弹一百八十四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旬，滇东北炮派联合进攻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赶走了军管会的军代表，打死打伤干部、群众，又把八派大批群众关押起来，占领了毛家村电站、会泽、以礼河成了“炮管区”。

随后直逼东川新村，新村八派干部群众于 12 月 17 日分两路撤出：一路往昆明，一路往汤丹矿山。

东川炮头李国治制定了进攻东川矿区的计划：“以农村为依托，以民兵为骨干，围攻矿山。围而不攻，将军管会崔保平等和八派骨干逼下金江，一举歼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八派人员枪杀部队战士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炮派攻打东风大楼。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炮派在海口三五六厂下发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汽车拖挂二联高射机枪二挺，五六式机枪七十一挺，五八式重机枪七挺身而出，子弹二万五千余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云南东川矿区问题的指示

东川情况非常危急，两派发生严重武斗，危及工矿安全。东川矿区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必须保护矿区安全，如果破坏矿区就要问罪，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

炮兵团李国治等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举进攻东川汤丹矿区，占领东川矿务局机关和军管会驻地。打死支左部队战士 2 人，坚守矿山的职工 2 人，打伤多人。

十四军 42 师副师长崔保平及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被逼徒步下金沙江边，冒着漫天鹅毛大雪的掩护，在江边群众的帮助下，连夜渡过金沙江，爬雪山到达四川会东。

从此，东川的军管会及所有的支左干部、战士，和八派观点的干部、群众，都被打出东川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派攻打预制管厂，死十四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派攻打驻元宝山的炮派，死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炮派攻打云南省建筑安装公司的八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八派第四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弹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八派第五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子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八派开远的下发组织“一三〇”将抢第十三军的部分武器运送到昆明，计有九二步兵炮二门、炮弹二百发，高射机枪一挺，子弹数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派在小麦峪设伏，打死过路群众十人，伤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八派攻打云南砖瓦厂，死二十一人，伤多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大兵团作战，攻打云南汽车修配厂群众组织“一一·三〇”，双方共死六十六人，伤数百人。

（五）中央召集两级军区领导人及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总理讲话：

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

司、政、后闹得乱轰轰的两次叫张子明、胡荣贵来，群众不放。黎锡福同志受伤，李兆昇同志被打，这样谁能出来劝阻？部队不稳定，谁造成的？打了电话叫军区不要搞四大，这是好意。有人说是大毒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

‘把矛头指向野战军，把野战军搞成这个样子。大军区、省军区你们心安吗？十三、十四军过去都是一个兵团吗？司令员是陈庚，陈庚是薄一波的人吗？政委是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是薄一波的人吗？

康老：说两点，第一点提这样口号，形式上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把薄一波扩大化，扩大影响。另一点，这种提法起瓦解我们解放军的作用，动摇、瓦解我们解放军，是自毁长城，这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党内走资派所需要的。怎能用这样的口号反十三、十四军！

云南的两个组织都是跨行业的组织，成份不能很纯，很多人跑出来，很难巩固。我们一直想搞按系统、按行业、归口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梁中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部队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下关市八派的“四二〇”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持炮派观点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死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对云南郭顺兴事件的批示

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总理批示：平浪的问题我们报告了总理，

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住昆明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七十七人前往下关，途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南华，于十三日到达下关。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目前住在军区大院的军队开展四大单位的所有人员，应动员他们一律撤出、返回本单位。

力求尽快的把军区机关和省军管会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东川、一平浪、文山、大理、曲靖及其他地方的武斗必须制止。
云南省和昆明市不准有攻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大字报。
禄丰杀害团副政委郭顺兴的凶手和指挥杀人的头头必须限期交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愿意派飞机将双方谈判的代表接来北京签字。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两派达成停火协议，昆明已于一月十四日十八时停火。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下关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攻击，工八团李国贞任副总指挥，工八团有三百多人参加（在下关共有七百人），双方死一百零四人，其中八派七十七人，炮派二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的电话

从近日情况来看，武斗并未停止，某些地区继续发生严重武斗，如一平浪、楚雄、下关，曲靖，昆明东郊金马村还发生了严重破坏 202 次客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下关驻军领导机关向昆明军区党委报告《滇西挺进纵队》问题

报告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公里，攻占了禄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谍，横冲直撞，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下关的工八团全部人员离开下关去昆明。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主持编制了一份报告，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反动联盟”，“指挥手下一些亲信，诸如李明(省军区副政委)、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帮，结党营私。”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李树林等主持编写“干部情况汇报”，提出“必须打倒”和“进一步审查”的有一百四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谢副总理：

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二、三号起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又破坏了一平浪煤矿，又砸了盐矿，到下关杀了一百多人，这哪是文化大革命？武斗一个组织最厉害的就是《援越抗美》，王非，何德庆你们机关就是不听话，云南就是不执行十一月十四号决议，王非你派人到部队去串连。

今天叫赵健民来参加会。你出来干了许多坏事，你片面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

刚才总理给我打了电话，你们（指云南军区）要告诉工八团迅速地停止武斗。周总理说了，他们（指工八团）这是完全违背了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如果立即放下武器，我们还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好的，是革命的，不然就用军队包围起来，强迫交枪。

康生：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禄丰，还带有 1400 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九日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15 号占了楚雄，14 日在某地抢了 3500 件武器，16、17 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某部相遇，工八团冲破堵截，继续往昆明方向前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经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原省人委办公厅某副主任任等六人将一份“赵健民材料”送中央文革小组

材料说：赵健民是个自首叛变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打倒。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北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

“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报告。在未取得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流）待命。”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鲁瑞林等从北京飞回昆明，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

“滇西挺进队”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滇西挺进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

以上各条，希望你们立即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十分，部队攻占甘海资矿区。

工八团坏头头坚持不肯放下武器，撤除工事，并首先开枪，部队当即自卫还击。

在这次围剿中，打死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工八团四百八十人被捉。

一九六八年一月，在黄兆其的主持下，“八·二三”派成立了一个“打赵作战部”，“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叛徒二十八人，走资派二十三人，国民党伪军官、特务七人”等，制定了对“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狠打、痛打、打死”的方针和部署。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关于云南鸡街、铅厂、雨过铺事件的指示 一、关于鸡街、铅厂、雨过铺发生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中央为了解决云南问题，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持学习班的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谭辅仁。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谢富治吴法宪关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谢副总理：

你们定了“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两个协议。

工八团的一部分人，在滇西成立了什么“滇西挺进纵队”，云南的军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要他们交枪，交出坏头头，进行训练，他们没有很好听从，他们后来抵抗，先行开枪，后来双方伤亡很多人，军队也伤亡了一些人。

康生：

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受他们利用，现在觉悟了，达成了协议。赵健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现在已经成立十四个革命委员会，广东很快就成为第十五个，吉林第十六个。

最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江西省军区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有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今天已经发给同志们了。这个批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他讲，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有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了错误帮助他们改正。但是，另一方面支左工作中有成绩又应当宣扬他们的成绩。

江青：

我们的主席是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但是在你们那儿，有武斗，有的地方斗的还不轻。武斗不能算好事，因为伤害了人，损坏了国家财产，不能算好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

第一，如果你们搞了革命大联合，就是不打不相识。

第二，青年人就非常喜欢枪，拿了枪，放两下，也是个锻炼。你们来自祖国的边疆，要是将来有什么战争，你们也锻炼了一下。

第三，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假如你走过了头，就是说走到对立面去了，如果不是在人民内部矛盾里头超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要剿匪！你们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们一声令下，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听毛主席命令的。你们想想看，你们的枪就成了火柴棍了嘛。没有枪想枪，有了枪怕人家抢，第三步送回去吧！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

得，武斗是很坏的事情，不应该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嘛。为什么一定要拿枪，有的拿机关枪，有的地方拿高射炮，一万五千多发炮弹，对着天空咚咚咚的打了一万五千多发，我心里一直不舒服。

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就要遵守双方的诺言，不要再搞武斗了，你们再搞武斗，就会成为过街耗子，人人喊打。因为人民群众不能很好的安心生产。你老想打，哪有那么多子弹，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因为搞得人民不安生，我想小将和革命群众，目的都不是如此，都是为了革命，我刚才听说背后有两个坏人，挑拨你们，你们上了当。甚至还有有的说到中央来就修了，说这话是反革命。到毛主席这里来，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反而说你们修了，这是挑拨，是造谣，是对中央不尊重，是污蔑。

周总理：你们回去后：

第一个任务，回去都要很好的执行协议，还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仇恨集中到他们身上去，把革命群众、革命战士联合在一起。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到北京来学习。

第三，我们人民解放军处在边防，现在，十三军、十四军都有了自我批评，我们相信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也会有很好的书面自我批评。部队搞“四大”的，要按正确的原则。

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要经过群众的大联合才能解放领导干部，解放一大片，批判一小撮。否则革命三结合就无从谈起。

云南有个广播发射台，因为武斗，分成两派，停止了广播，使毛主席的声音在海外、东南亚、西亚、北非都听不到了。这那里是革命行动，是破坏行动。从今天达成协议起，再不准有这种行动，这是土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许可。你们看到“2·6”命令了吗？（即指1968年2月6日发的“中发(68)26号文件”）只要破坏国家设备和财产，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用“二·六”命令采取行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关于贯彻落实“协议”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文山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已于二月十日下午达成停火、交枪协议，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后两派一起游行，互相祝贺，互相赠送毛主席像章，气氛很好，现正为全面实现协议积极努力。

最近，东川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业已达成了停火、交枪协议。下关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正在积极准备谈判和交枪，放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罗元发与昆明两大派在京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罗元发副司令员电话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云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二个协议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在文山州支持的负责人向中央报告：“农民革命军”是官办组织、军事化组织、武斗主力。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殷农等又揭露赵健民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结成“反革命联盟”、“屠杀革命群众”，“网罗一批特务、叛徒、走资派黑爪牙”，是“国民党代理人”，对这批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

同期，刘殷农又揭露省委书记、常委刘明辉、孙雨亭、高治国以及赵增益等和一批厅局领导干部分别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了云南参加军以上会议的同志

三、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陈康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五·一”前全国一片红，各省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不能落后，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阻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力争在“五·一”以前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如果跟得很不紧，不照顾大局，就要犯大错误。

要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和本地区的代理人，在西南要特别注意对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进行彻底的批判。李成芳、赵健民是两派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揭发出来，是两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日，巧家县人民武装部某副部长和红派头头决定，从农村调集三千三百五十人进县城。

县贫总常委扩大会、县武装部政工会决定：用各区武装部的枪武装红派；把对立派跳得凶的干掉几个。

这一时期，全县共杀二百七十七人（其中五类分子五十三人）。其中，

大寨区：杀十四人；

蒙姑区：杀四十一人。

十月三十一日，巧家县革委会成立。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

十二月二十五日，县革委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号召外流人员回家。

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县革委会又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外流人员返回。这时外流人员已达三万二千五百多人。

全县共批斗干部、群众二千四百三十八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学习班中的八派和炮派签订大联合协议。

两派在让不让张力雄签字的问题上发生争执。

谭辅仁对黄兆其说：你放心，我谭辅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

谭辅仁对李毅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一百进不了革委会，你不要在那里搞。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任命谭辅仁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安炬祥、胡文龙等写了一份《紧急报告》，揭露省委书记高治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轻工厅厅长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并提出要“立即逮捕”。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陈康、周兴到学习班参加学习
他们各自去对立派的宿舍作检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黄兆其、刘农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送中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五日，曲靖地区的八派群众组织，连续向中央、云南领导机关报告：

林山（原曲靖地委书记）、唐荣生、乔文锦（原曲靖军分区正、副政治委员）之流，在赵、张的支持下，疯狂地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计划，策划组织了滇东北挺进纵队。中央着手解决云南问题后，又组织了滇东北游击军的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将《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送中央。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谭辅仁在云南学习班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他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增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现在全省范围内正在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总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

云南今天以前的这个形势，的确搞得很复杂、很乱。当然，我们不怕乱。这种形势的造成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增派以及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挑起来的。云南的问题乱得差不多了。有些人说，还要乱。我说，我们也不怕。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在云南的那些增派要乱，让他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怕不怕呢？不怕。因为有野战军在那个地方。

一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另一条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中央的精神，在那里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这个问题，是在针锋相对斗争的。按后一条做了的，方针就错了，一错百错。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错，从上到下错了，这就把整个云南搞乱了。

不要把坏人当做好人，也不要将好人当做坏人。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里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这里讲了几个人了，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谁是谁非，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0；中发[68]128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胜利宣告了云南地区阶级敌人复辟活动和垂死挣扎的彻底破产。

中央希望，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做到：

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充份认识到云南地处祖国边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缅甸、印度和泰国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屏障，是援越抗美斗争的前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边防。

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大造声势，坚决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迅速猛醒过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于犯有中央指出的那些反革命罪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依法惩办，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遵守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大力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科技路线，坚决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知识分子要坚决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防止阶级敌人从中破坏捣乱，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云南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云南省十四个厂矿企业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代表共三百三十人，由鲁瑞林任团长。

会议历时五个月，主要解决这两个系统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

会议中有三十五人被批斗，返回原单位后又有六十人被批斗，其中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谭辅仁主持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履更猛烈的进攻！》的决议。

四、“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省革委会在全省发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云南日报发表《搞好斗批改，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昆明军区对省公检法实行第二次军管。

十一月十八日，省公检法学习班正式组成开学，至一九七零年五月结束。

审查结果：

站错队的五百二十八人；写检讨的三百多人；被批斗的二百一十九人；重点审查的一百五十人；按敌我矛盾审查的六十四人。

审查过程：

打伤的六十多人；疯癫的九人；自杀的八人。

审查结果：

清除出党的二十五人；留党察看的二十四人；取消或延长预备期限的十八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四人；犯有各种政治错误的二十五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五人；受团纪或行政处分的十人；逮捕的三人。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云南日报发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敌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日报发表《彻底清算刘少奇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并联名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赵健

民等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所谓“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成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

云南日报还发表了《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授意，由涂晓雷等人写了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

文章指出：赵健民等人“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就是他们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根据省革委决定，开办省级机关学习班。

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开学，共有学员七百三十九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一百六十九人；处级干部二百五十三人；一般干部一百六十九人。其中有：

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郭超、薛滔、吴作民

原副省长刘披云

原省革委常委、委员张恩璞、张兴华、李文进、刘鑫、吴生敏、鲁大洲何正廷。

其中：

有三十七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分子；

有二十二人被开除党籍；

有三人被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有十七人被监护；一人被拘留；一人逮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云南日报发表《打倒二月逆流急先锋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云南日报发表《大叛徒赵健民是云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延观（笔名胡立群）、刘殷农、林敬荣（笔名林叶）联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文章，揭露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三十年代就摇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分子，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云南“经过苦心经营，确实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黑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内奸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旬，玉溪地区召开党代会，批斗了刘世杰、鲜文富、普朝柱、王连增等人。

十二月二十九日，地区召开大型批斗会，四百多名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跪满台上。

据统计：全地区揪斗干部、群众二万七千九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七百多人，打死带死一千零八十九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日报发表《不准赵健民颠倒历史——彻底清算赵健民反军乱军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日报发表《更紧密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云南日报发表《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的社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省革委会研究组整理、编印了十多期《云南是非大批判材料》，共约三四十万字，发致全省各大系统。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九年五月，红河洲所属十三个县市，十二个州属单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分清路线是非，共批斗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四人，占全洲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属敌我矛盾性质的二万三千四百零八人：

叛徒：四百三十九人；

特务：九百人；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三百二十六人；

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二万零七十四人；

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千九百七十五人。

到九月底，全州批斗的人数上升到六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划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

清查的重点事件有：

《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滇西挺进纵队》；

《滇东北游击军》；

《摧资兵团》；

《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结合事件批判重点人物，计有：阎红彦、陈康、赵健民、张力雄、林亮、候良辅等。

这次会议选举了出席九大的代表。选举中陈康落选。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云南省革委，指出：云南省的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毛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后，陈康当选为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刘殷农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追查“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他还说：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

一九六九年一月，滇南支左负责人到文山州的八个县作报告，他说：

农民军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力军，是受坏人操纵的坏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头头要投案自首。

凡是军分区、军管会、人民武装部批准建立的革委会，都是赵健民在文山地区的代理机构，推行了武装夺权的一部分，要一律推倒重新建立。

文山把崔正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度人（军分区政委）揪出来，红线、黑线就清楚了。

一月十二日，滇南支左负责人在文山万人大会上说：

今天会后要行动起来。群众要注意，革委会要注意，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可以。打，可以。但不要把他们打死。

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

三月，文山州革委会主办了《文山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

派出大批“35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群众专政小组”，到工矿企业、农村捅马蜂窝。

文山州八个县，从县委书记到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打倒的有两个县；被打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六个县。

共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九期。

在清查“农民革命军”中：

有六万二千五百六十八人被捆绑毒打；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受伤致残；五百三十四人被打死逼死；

有一万九千多人被立案审查；七千六百六十四人被定为“九种人”；五千二百五十二人被判刑；其中，死刑二百六十八人（实际杀掉六人）；死缓刑一百二十四人；无期徒刑一百八十八人；有期徒刑一千六百人；监外执行三千零七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江川县革委会举办干部、群众一百二十六人学习班，清查“滇挺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案。

清理中，批斗三万二千零三人；划为农革军分子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人；列为农革军骨干分子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其中：生活上管干部五人；地区管干部五十七人；县管干部一百一十二人；军队干部十九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新平县革委会清查“特务组”案，

该案认定：以县人民武装部长华定周为首，县公安局长何国运、县长李章明、县人民武装部副政治委员毕成、县人民武装部秘书叶定忠、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刘通怀都是特务组成员。

在清查过程中，打死杨芳洲（手工业管理局工人）、覃淑贞（县医院工作人员、毕成的妻子）、杨家发（戛洒区副区长）等人。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滇东北的二十多个县、市、区和一些省直属单位，开展以清查东游为主体的运动。

一九六九年二月某日至十二日，曲靖地区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会。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清查东游反革命组织。

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东游案牵连被审查的干部群众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我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一九七零年七月八日，昆明召开万人大会，公审“袭击 202 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案

清查过程中打死一人，自杀一人，牵连一百多人。

最后判决：

李长年、周明忠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谢光亮为同案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智鹏为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李家寿为主犯，判处死缓刑。

李海清为主犯，判处无期徒刑。

四、建立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谭辅仁在省党代会上作总结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昆明军区领导人到北京研究政治边防问题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革委会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

四月八日，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

会后，这项工作在全省铺开。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在边疆地区搞政治边防，共揪出九种人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人，揪出反动地司、头人八千一百一十五人。

这次搞补划阶级成份，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定为贫下中农而被升为地主、富农成份的有七千六百零五户。也有部分地主、富农分子降为劳动人民。

在重划阶级成份的同时，共抄家三万零六百二十户，抄家财物广大读者价值一千多万元。

在这个过程中，德宏州有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一人外流到缅甸；红河州有二百五十户、一千三百一十一人外流到越南。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七零年十月，中央任命周兴为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七日，谭辅仁遭暗杀

五、批林整风、批林批孔

一九七一年六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必成为昆明军区司令员（1979年）

一九七一年六月，中央任命周兴为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收到李德生转来的一份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补划阶级成份时产生了副作用。

周恩来在这一天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有关情况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六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

参加学习的，军队系统有八百四十一人，地方系统有一千零一十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一人。

这次学习班传达了中央四号文件，对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开展了大批判。

学习开始时，周兴代表省委和军区党委宣读了中央四号文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纲领。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要批判林彪一伙对我省边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大讲什么“政治边防”，实际上是贩卖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妄图把边疆搞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周恩来在昆明对周兴说：“昆明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来在召开十大期间，对周兴说：“云南的划线站队问题纠正了没有？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

一九七三年八月，陈锡廉对周兴说：

“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千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这是谭辅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们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

周兴回到昆明后，两次召昆明市委书记黎伟到他家，要求黎伟带头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二月，昆明市逐步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三大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原来的八派，是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打蔡、马、雷、董（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高远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战役，打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战役，打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战役。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首，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的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某等人。

“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是原来的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这一派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

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委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同时又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子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揭发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

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

在此期间，何立宽、胡玉珍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商量，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根据“提、补、纳、调”方针，调整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班子。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传单、材料、发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串连会，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在刘光兴的指挥下，批判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

刘光兴与李国梁、赵××商议，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要把其中十八人安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云南

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将云南三大派的六个头头调到北京，限令他们在二月十一日春节之前“倒旗脱钩削山头”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中央召集云南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等三十二人到北京，举行两个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派性，统一认识，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

最后形成云发【1975】26号文件。

会后，中央对干部进行了调动，将部分军队在地方上任职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将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调离云南。

将三大派的头头组织到北京、包头、大寨去参观、学习、劳动。

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任命贾启允为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涂晓雷多次向中央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

他把贾启允提供的邓小平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的话向中央汇报。这个重要材料，被《红旗》杂志社的“池恒”等编写文章采纳。

一九七六年一月，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人写出大字报《云南问题宣言》，提出：云南贯彻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的气氛”；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等人商议，向王洪文写信和向北京派来云南的记者汇报：楚雄州、县领导干部“私设王洪文专案”、“带头怂恿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

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等，信中涉及的干部有余活力、高仕良等二十四人，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十六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执笔并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编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指出：“一批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王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扑”。提出：“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存的省委必须改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延观将王洪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供给黄兆其。

王洪文在这次讲话中，批评云南省委一九七五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的很厉害”，“省委反派性，搞带职下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迫害新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的一根棍子”。

一九七六年二月，刘殷农说：“我在市委斗，你们要在外面斗”，“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不是三个人的问题”，“是镇压造反派”。

刘还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出抓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连时间也是错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亲自编写了向省、市委发出“宣战”的公开信。提出“要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要把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撤、停、免、调，抓”的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刘光兴支持禄丰的张乃贤等人找到楚雄州委书记余活力，要求释放罪犯李国荣、李清明。

二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在州委大会议室对张乃贤等人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支持”、“对走资派就是要敢斗，不能手软。”

二月二十七日，张乃贤等人与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一同到昆明要求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延观又向黄兆其提供了一九七五年省委贯彻二十六号文件的情况：邓小平接见了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四人后，“刘明辉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搞大调整，把年轻干部大批的搞下去”，“郭超伙同万里在铁路局刮右倾翻案风”。

胡延观还对黄兆其说：“省委一九七五年为阎红彦，赵健民翻案”。

胡又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简报，并作了摘抄。

胡延观还将省委领导人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讨论情况提供给黄兆其。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在省委决定召开地书会议的前夕，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等提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要“扩大会议规模”，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免、停、调和下放”的地、局一级“新干部”请来参加地书会议，并要尽快恢复他们的职务。

在会上，沈炳章带头发言，金奕旦等人表示支持。

刘殷农说：邓小平是“梯也尔式的人物”。

张奎林、徐宝兴组织带领建委系统五百余人到会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黎韦和高治国等领导干部，

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杨建祥等人组织了二、三百人的“告状团、“上访团，进驻省委领导机关，揪斗省、地、州党委领导干部。

会议期间，黄兆其、刘殷农还主持拟制向中央发出揭发省委的电报，提出要“改组省委”，另组“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涂晓雷亲笔加上“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

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通过斗争才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刘光兴在黄兆其、刘殷农拟制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

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与黄兆其、刘殷农要求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

这个电报有一百多人签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丁正中、陆元明、陈伟等人带领州委大小汽车五部及州委副书记罗运通，组织了一百余人赴昆告状。

四月八日，丁正中等人组织了二十余人的告状团第二次到昆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执笔编写了《敦促刘明辉转弯书》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二至八月，黄兆其、刘殷农要求释放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同时，黄兆其还支持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释放陈克发、杨运昌等十三名在押人。在黄兆其等人支持下，十三个地、州、市先后共放出一百二十四人。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何立宽与黄培根、陆元明、丁正中、陈伟、马昭、任怀灿、童永昌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多次策划，形成了以何立宽为首的“核心”，确定了打倒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民、文山县委书记杨铎、副书记项朝光；批判原州委副书记王槩、罗运通的计划。

文山地区从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多次开展对王民、王槩、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人的批判。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将一九七五年中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省委向中央报告省级机关和地委常委以上干部排队情况，以及省委关于对阎红彦、赵健民“问题”的研究意见等，编写在会议第四十七期简报上。在“简报”中还反映了与会者的一些意见；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确实已经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刘明辉等几位常委“搞阴谋诡计”、搞“核心中的核心”，是“超级省委”。省委贯彻(75)26号文件，是“整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镇压造反派”。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上旬，“昆明地区部份群众准备于四月八日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省委是幕后指挥。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材料送到清华大学交吴炜煜转报江青等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黄兆其先后五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揭露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提出要“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一九七六年四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清华大学等处联系，报送揭露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涂晓雷化名王正名、沈炳章化名朱永红，携带“昆明未遂四·八反革命事件等材料，到北京汇报情况。涂当即受到接待人吴炜煜（人民日报记者）的表扬说：“你们云南揭邓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话（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从你们寄给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的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运动”。接着吴炜煜对涂晓雷说：“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作够”等等。

一九七六年四月底，胡延观在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发表演讲，揭露省委“以整顿为纲，把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把有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

满意、二要算帐，三要翻案的所谓‘老家伙’重新扶上台，实行领导班子大调整、大改组、大换班。

他的演讲稿被徐宝兴等人大量翻印散发。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黄兆其、杨玉荣、刘浩林敬荣等人开会，对省委理论讨论会制定了五条方针：①要揭发省委假批邓的阴谋；②要戳穿搞纯学术讨论的骗局；③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④会内会外配合；⑤争取把这个会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

林敬荣将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理论讨论会上张贴。

一九七六年三至九月，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等人多次对省委常委进行“分析排队”，制定了“靠、打、拉、烧”的方针

在此期间，黄兆其还直接指挥曲靖、玉溪、大理、红河、文山、昭通，思茅、保山、东川等十三个地、州、市和部份省级机关、厂矿的活动。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公开贴出打倒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和大标语，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活动，但徐、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

十九日下午，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一起到胡延观家，共同商讨追查“后台”，胡延观揭发王必成、黎韦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

二十四日晚，胡延观和黄兆其一起将王必成、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的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要求追查。

一九七六年五月，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成员多次进行策划，责成陈伟编写了《文山地区触目惊心的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分别送给《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以及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安炬祥等人。并指派陆元明向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炬祥诬告文山州、县主要领导干部，图谋将州委副书记王民、王槩赶走，把支持帮派的李凤萼、苏复调回文山，恢复郭明进文山县委书记职务。

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月，何立宽、陆元明、童永昌等人支持在押犯家属两次进驻州委机关，经过十七昼夜谈判。州委释放了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

一九七六年六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清华大学等处联系，报送揭露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胡延观把云南省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瘫痪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口授给去北京的林敬荣，转报给了迟群。迟群收到“报告”后，对吴炜煜说：“象这样的情况很重要，你遇到了及时转给我。”林敬荣接受了吴炜煜关于“云南问题，象一个要穿透了的脓包一样，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的意见。回昆后分别向胡延观、黄兆其等人作了汇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昆明市党干会议前，刘殷农提出要“按翻一、两个”，“换掉一批人”，要“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

会后，刘殷农亲自编写了“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的文章，向楚雄、西双版纳和文山的邱立峰、马正全、何立宽等人传授。

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胡延观知道了中央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第二天就把这一机密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并要黄兆其“注意斗争策略”。

黄兆其等人得到这一情况后，于七月中旬和八月初两次在杨慰农家开会，提出“要抓紧解决恢复职务的问题，争取多一个算一个，然后回本单位斗”。“要抓紧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些组织问题”。对省委领导“不能拿掉几个，也要争取分是非时棒棒打重一点”。

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间，刘光兴多次说“抓人是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光兴支持下，一九七六年全楚雄州释放 18 人。在释放时，出现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送。

一九七六年八月，黄兆其要昆明铁路局的郭弟元、徐洪文等批斗了省委副书记郭超。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何立宽指派陆元明等人到昆明，将由其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并由陈伟将这份材料寄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

在这份材料中，揭发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棨：“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揭发原州委副书记李铤“有叛徒嫌疑”等等。报告中揭发文山州、县十三名县委常委“大刮右倾翻案风，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将八名州委常委，五名县委正、副书记“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批斗”。

一九七六年八月，刘光兴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

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提出：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

八月八日，楚雄召开州委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革命舆论，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

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批判州委书记余活力。

刘光兴要求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

八月二十日，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

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求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一九七六年八月，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

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提出：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

八月八日，楚雄召开州委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革命舆论，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

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批判州委书记余活力。

刘光兴要求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

八月二十日，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

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求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写信给文化部于会咏、刘庆棠提出要求改组云南省委。

九月中旬，涂晓雷和林敬荣到连云巷向《人民日报》“记者”谢荣镇面谈了改组云南省委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九月，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说：“余活力犯走资派错误，不能主持毛主席追悼会或致悼词”，“我主持追悼会，普贵忠致悼词，以后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黄兆其要涂晓雷、林敬荣写了一份“改组省委”的计划和名单交给到云南来的“记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两晚上，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徐宝兴等人在杨慰农家开会，按照黄兆其与胡延观事先的商量，提出了对“五大书记坚决打(倒)”，“但重点应该转向王必成、黎(韦)”的方针。并提出了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会后，黄兆其把他们策划的方案告诉了胡延观，胡表示赞同。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由涂晓雷、林敬荣执笔写成“报告”，胡延观看后表示同意。经黄兆其审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方案送交谢荣镇，郭剑峰转报上去。在这份改组省委的方案中，要求中央派一个在云南军内外有影响和熟悉云南情况的中央委员(指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当省委第一书记；要黄兆其、朱克家等人进省委领导班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省委决定拘留楚雄州禄丰县“八·二五”事件的现场指挥李成滇、普文荣。

刘光兴在执行拘留普文荣时，亲自参加为普文荣举行的“告别酒会”并流着眼泪说：“用我的手抓自己的战友真是痛心”，“我希望你们在家的要团结战斗”。

在拘留李成滇前夕，刘光兴向禄丰的唐联学等人说：“你们这次欢送造反派头头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一些，来了可以批斗余活力”。

十月十二日，唐联学等人给李成滇戴上大红花，出动一百多人，坐汽车，呼喊“热烈欢送战友李成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口号送到楚雄。

当天下午批判了州委书记余活力。

七、十月政变后的应变活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组成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六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的秘密指挥机构，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兆其得知逮捕四个领导人的消息，十三日、十六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

黄兆其认为这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

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

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 X X X 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志“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消息后，认为是“右派政变”，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动向和行动计划。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起义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迅速返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人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人，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起义的动向，

黄兆其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意见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十一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十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军用手榴弹四枚。十七日、十九日，何立宽又要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十月十五日下午，刘光兴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认为逮捕“四人帮”是“右派政变”。

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

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十六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

十七、十八日，刘光兴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

十月十八日，晚，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行动计划。

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二千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还由涂晓雷等写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

八、十月政变后的翻案镇压活动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十八人到北京开会

会议结束时向中央写了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央任命安平生为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9年12月)

同时任命陈丕显为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铨秀为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给云南省委纪委的批复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刘明辉为省长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云南地下党、“边纵”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报告》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批示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的通知(节录)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黄兆其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据载：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黄兆其被公安人员带着与赵健民在贵阳市宾馆相见。黄兆其告诉赵健民：“您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当时，我们八派的几个负责人可以随时去中央文革汇报工作，主要是向康生汇报。又说：我不知道划线站队中死了那么多人。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赵健民说：文革，是全国人民一声灾难，云南是重灾区。您，我，都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吸取教训。）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刘殷农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涂晓雷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胡延观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刘光兴反革命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拾贰年，剥夺政治权利叁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何立宽反革命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声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九、受迫[害群众的申诉活动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日，思茅市林进良等十六人的公开信：《云南“揭批查”运动中的特大冤案》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批判斗争的就有 150 万人（约为文革中参加这个群众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15 万人，抓捕判刑和劳教的约五万余人。县团以上干部为 7549 人。

思茅地区景东县为例，全县被批斗人数为 3100 多人，被打伤致残的 1000 多人。从县到生产队撤换干部 1000 多人，抓捕 125 人，由公安、警察、专案组将受审人员五花大绑押到 14 个公社巡回游斗 108 人，正式判刑 53 人，在批斗大会上活活打死 4 人，残酷折磨致死 9 人。

思茅是行署所在地，文革中只不过是普洱县辖区的一个镇，人口不足二万。当时一口气就抓了 103 人，判刑 52 人，逼死 8 人。

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廷祖，被普洱县常委会用 55 个字，以反革命罪判了 6 年刑，出狱后，不给落户，成了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白恩培在《云南现代简历》的序言中声称，“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全省只判了 24 个人”。

鲁瑞林将军是你们认定的黑后台，还捏造了一个一·二四假案陷害他，可中央认为是假案，为他平了反。

朱克家你们认定的是这个“体系”的首席代表，目前重新入了党，在恩洪煤矿任部门经理。

广大的工人、农民、法官、老红军、老干部，他们早就对此事有过公平的定论，对省委某些人枉法弄权倒行逆施行为早已深恶痛绝。

50 年代原云南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写了一本《紫苑随笔》有这样一段话：“组织了几万干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一个真帮派体系也查不到，查了 15 年却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执行的是‘党内分裂向后看’。”他们对上不听招呼，听了传达拒不执行，对下，对伤害的同志，又封锁消息，也不平反，直至今天。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将军在《西南三十年》中写道：“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就必然在揭批查中发挥其破坏性和影响作用……”

景洪县小勐养农场×××党委书记，在解决揭、批、查蒙冤坐牢释放回来安置就业的人员会上讲：过去我有派性，抓你们时巴不得枪毙，才解心头之恨，现在看来错了，司法上的事，我无权解决，现在回来了，同等工龄，别人拿多少，给你们拿多少。

思茅地区主管政法的×××副书记，1998年当听完受害人×××陈述当时揭、批、查时阴风熠熠、杀气腾腾的状况后，感叹道，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啊。”“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不几天他就为这个受害者签发了改判文书。

×××民警，她负责监控×××受害者，2004年8月15日为这个受害者送去了水果、月饼，见面后讲道：×大爹，我也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人家上面叫我来看着你，请你理解，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饭碗也会丢的啊！

思茅地区原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一天与受害人×××不期而遇，他深切地握着手说：这些年你受苦啦，那时人家李德云（组织部长）想抓谁，就抓谁，哪个还敢说个“不”字，就连张文英（地委书记）也讲，老史啊全区凡公社以上一派观点的已经抓了2000多人了，这样搞下去，以后怎么交待！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李树林等三〇四人关于请求撤销违法违宪的《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的报告

云南揭批查受清理审查进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批斗的150多万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的15万多人；被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处死刑2人，审查期间捆绑吊打、刑讯逼供，被打死，逼死的千余人。

昆明市寻甸县13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全部以“四人帮”帮派骨干篡党夺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两个农民生产队长也以篡党夺权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全县判了一百多人。

云南揭批查抓“四人帮帮派骨干”，工厂抓到班组的“工人四人帮”农村抓到生产队的“农民四人帮”。昆钢车间抓“四人帮”，还要“三男一女”，连一名军嫂也抓上凑数。

处在高黎贡山里的腾冲县桥头生产大队，揪出了“农民四人帮”，分别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生产队长和大队信用社会会计。回民马天祥以“阴谋篡夺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4年，妻子被逼疯，女儿被拐卖，家破人亡。

玉溪市江川县的民政局干部杨秀杰，是参加解放战争，多次立功的老干部，罗庆明是江川一中的体育老师，是西藏平叛立功的转业干部，两人被定为“帮派

后台”，发动全县签名，“要求枪毙杨秀杰，罗庆明”，采取不签名不记工分，不分口粮的手段，造成“民愤极大”假象，被玉溪市中院判处死刑，不给上诉，于 1978 年 9 月枪杀，还不给家属判决书，不准家属收尸至今尸骨无存。

昆明市禄劝县屏山镇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被审查批斗，一名被判刑。生产队长 23 人被关押，数百名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更为荒唐的是，凡被批斗者，人人罚款 100 元，由县委副书记罗应祥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收罚款。

云南揭批查枉法滥判无辜，五万多份判决书，五万多人的政治生命和血泪，是铁的事实，云南省委向党中央和公众宣布和云南党史记载，云南揭批查判刑只有 24 人，欺上瞒下。三十一年来不准申诉，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农民出狱后，不给落户，不分土地……云南的揭批查运动制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错案。

二 00 八年三月七日，李树林等关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 26 年来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 号文件——为解决我们的生存权，致全国“两会”的公开信

以安平生、王必成为书记的云南省委，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把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农民，打成“‘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作为敌我矛盾，动用专政工具判刑处罚，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

云南揭批查运动自 1976 年末到 1983 年，计：被不准上诉名为处死实为谋杀 2 人；被判处刑罚入狱 5 万多人；受党纪、政纪、行政开除公职处理 15 万余人，受审查、批斗的 150 多万人，审查期间被打死、逼死千余人。其面之广，其数之巨，堪称全国之最！

各省传达贯彻中发[1982]9 号文件的消息，云南省委再次下令，再用刑罚镇压的手段，对付私议传播该文件的人。

原云南省交通厅的张显忠、傅觉悟，原昆明市委宣传部的王海泉、昆钢的董时汉，×××的家属陈建英等，都因偷偷传播中发 [1982]9 号文件精神，被以“现行反革命”、“泄密”等罪名抓捕入狱。全省在同一时期，因同一问题被抓捕的都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竟达千余人。这些人被关押的时间，最短的三个月，

最长的达三年多。云天化的钱厚源因传播了该文件精神，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其高大的身躯被压弯投入囹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保山地区干部滕少清，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保山地区在揭批查中违法、违纪的实际，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按理说，这是共产党员的权力，是《宪法》保障、党章允许的合法行为。但云南省委受不了了，怎么能容忍自己辖下的问题，被捅到中央去呢？于是，他们派公安厅的张××和省纪委的贾××，冒充是“中央调查组”找滕少清调查落实所反映的问题，滕欣喜若狂，将时任保山领导搞揭批查违法、违纪的问题一一汇报。滕少清哪里知道，这次谈话成了他“攻击”领导的“交待”证据。因此，1982年11月2日，滕少清被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云南日报》为此还在头版发了专讯：“坚持邦派立场，攻击清查工作，诬告陷害领导，保山地区邦派残余分子滕少清被依法逮捕”，并配发短评——《保持应有的警惕》。滕少清在狱中受尽折磨，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逼供、诱供、指供。保山地区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对其起诉，由于没有任何“反革命”证据。只要有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滕少清最终还是于1983年4月28日，以“诬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为“（1983）保地法判字第04号”。

十、对赵健民的审查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赵健民被关押在北京西半壁店卫戍区看守所，写出《呈谢副总理并报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并党中央并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并康老并中央》央的申诉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赵健民被转移到交通部干部学校。

八月十五日（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赵健民回顾自己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健民最初认识“左”的的偏向，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赵健民经过认真的思索和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赵健民认为，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成次要矛盾。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赵健民反对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快、急燥冒进……

一九五七年赵健民对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感到很不理解。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赵健民读了一遍，不禁暗暗吃惊，心想怎么全翻了个。他明显感觉到，文章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

一九五八年夏季，赵健民成了在这一运动中成为主要对象，被作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批判的重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冒进。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党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严酷的事实，使赵健民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和讲话，使赵健民颇为振奋。

八届十全会后，赵健民与一位熟人交谈时，不无忧心忡忡地说：光讲阶级斗争，生产搞不好，也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赵健民认为：文革初期，不久呈现出来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无政府局面，使他感到理论与实际相背离。阎红彦之死，赵健民本想中央能表示个正确态度，但中央不但没有态度，反要省委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赵健民认为，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到处煽动闹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把整个社会推到了内战的境地。赵健民觉得，这是拿国家当儿戏。

这时，赵健民结合自己的经历思索着：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到这个地步？

结论是明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那么，为什么“左”倾错误得不到纠正？赵健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会命令正式逮捕赵健民，转至秦城监狱。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赵健民被押回昆明，进入云南省第三监狱。

一九七一年三月，赵健民被转到省第二监狱。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赵健民写十八万言的申诉书，他认为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和斗争，在历史被捕问题上是一个政治坚定的，能以生命作条件捍卫党的利益的；在 1968 年 3 月 1 日同康老的谈话是爱护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利益的。

关于赵健民的历史问题

1932 年 11 月，赵健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 年 5 月，赵健民担任济南简易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济南北区巡视员。

1933 年 7 月 2 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此后，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

1934 年 5 月，赵健民建议成立成立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书记。

1935 年冬，赵健民与莱芜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商定，组建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委员会。赵健民任代理书记。

1935 年冬，赵健民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直鲁豫特委书记黎玉接上了关系。

1936 年 5 月 1 日，新的山东省委建立，黎玉为书记，赵健民为组织部长兼济南委书记。

1936 年 9 月 27 日，赵健民被捕。被判有期限徒刑五年。

1937 年 10 月，山东省高等法院以停止羁押的名义，将赵健民等人释放。

1957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赵健民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我们认为：赵健民同志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坚持独立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文革中审查的历史问题：

其一，供出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周宝祥

湖南一个老同志证明：赵健民在敌人审讯中供出的周宝祥是省委书记黎玉的化名。

但黎玉本人否认用过这个化名。

其二，供出了寿张乡师党支部书记王福昌

在审讯时，敌人搜查出赵健民打给王福昌的电报底稿，王福昌被捕。

但敌人并未问过他担任支部书记的事。

其三，供出了莱芜县委负责人刘盛玉

叛徒方春荣证明：赵健民到过刘盛玉的家，赵健民没有否认。

这是否就是供出？

其四，供出了共产党员刘嘉典

审讯时赵健民说：自己入党的介绍人是刘嘉典。

实际介绍人是姚仲明，刘嘉典是他联系的党员（此人叛徒方春荣熟悉）。

这算不算供出？

其五，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审查赵健民历史问题时认为：“意见书是一份事实有真有假，可以作种种解释的敌伪档案材料。”

这样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依据？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赵健民第一次接见亲属。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赵健民提出了迅速结案的四条要求。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云发1974第83号）上报中央

意见列举了赵健民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1936年在济南被捕叛变

第二，积极追随刘少奇、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第三，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结论为：赵健民是罪大恶极的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中央撤销赵健民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依法严惩。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赵健民分别给康生和中共云南省委写信，要求尽快作出结论。

一九七五年九月，复查组负责人将云南省委上报中央的意见给赵健民看。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赵健民被释放回家。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

维持一九五七年中央组织部审查结论。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上报中央。

同意省委组织部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云南省委发文件为赵健民平反。

贰、本节简论

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关于阎红彦自杀的问题，过程很简单：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领导到会。

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

阎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

越健民说：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多数人同意越的意见，不能去。会议决定拒绝出席。

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

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有人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

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说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

阎红彦并对下发出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傍晚，叶剑英打电话到昆明军区：阎红彦同志在什么地方？他身边有些什么人？安全不安全？你们要说服造反派，不要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

陈伯达在电话中反复指示“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不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等等。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在电话中要阎红彦端正态度。

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对阎红彦自杀问题，当时的中央是怎么结论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给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请告诉周兴、秦基伟二同志并转告云南省委、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

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出来，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

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

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大一股洪流，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

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

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

周恩来的讲话除了“可耻的叛徒”这顶帽子可以不戴之外，其它内容应该说都是正确的。

阎红彦自杀问题的要害，就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对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了对抗的立场。在下挤上压的境遇中，他不愿意悔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在他看来，这叫做“以死抗争”；在革命群众来说，这叫做“死不悔改”。

二，关于中央监护审查赵健民

中央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呢？

1，关于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个决定是康生个人作出的，还是中央集体作出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康老：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变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特务云南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

就是执行他们（指美蒋）的计划。你上次来北京，几次写信找我谈话，你那一次谈话，我向中央反映了，你那次谈话，是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

谢副总理：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

赵健民就是要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周总理：

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

这些材料说明：当时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是中央的决定，而不是康生个人决定。

2，关于赵健民建国前的历史问题

审查赵健民建国前的历史问题，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是一份关键材料。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审查赵健民历史问题时认为：“意见书是一份事实有真有假，可以作种种解释的敌伪档案材料。”

一九五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采纳了他们认为是“真”的事实，作出了有利于赵健民的“解释”，从而得出了赵健民“坚持革命”结论。

一九六八年的专案组，采纳了原中组部认为是“假”的材料，作出了不利于赵健民的解释，从而得出了赵健民“叛变”的结论。

经过六年多的反复查证，关于赵健民被捕的一些问题仍然找不到有力的肯定或否定的证明。因此，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云南省委上报中央的《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中央没有批复。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云南省委解除对赵健民的监护，释放回家。

3，关于赵健民在建国后文革前的政治立场问题

根据《赵健民冤案》一书的记载：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赵健民回顾自己在建国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健民最初认识“左”的的偏向，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赵健民经过认真的思索和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赵健民认为，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成次要矛盾。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赵健民反对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快、急燥冒进……

一九五七年赵健民对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感到很不理解。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赵健民读了一遍，不禁暗暗吃惊，心想怎么全番了个。他明显感觉到，文章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

一九五八年夏季，赵健民成了在这一运动中成为主要对象，被作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批判的重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冒进。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党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严酷的事实，使赵健民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和讲话，使赵健民颇为振奋。

八届十全会后，赵健民与一位熟人交谈时，不无忧心忡忡地说：光讲阶级斗争，生产搞不好，也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按照赵健民自己的说法，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抱着抵触、甚至反对的立场。

4，关于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

(1) 文化大革命初期，赵健民执行了反动路线对抗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健民就紧随阎红彦执行刘少奇的打击一片的反动路线。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革命群众起来批判云南省委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赵健民采取了极为恶劣的对抗态度。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押解的人看他老实，就卡住他的脖子，赵健民就骂这些人是反革命。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

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糊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赵健民认为：文革初期，不久呈现出来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无政府局面，他认为，中央指导文革的理论与实际相背离。

阎红彦之死，赵健民本想中央能够转变态度，但中央不但没有转变态度，反要省委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康生会见赵健民听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赵健民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指示的。

第二，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

第三，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样做的。

(2) 云南省军管会成立以后，赵健民支持炮派“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康生在北京专门找李成芳、张子明谈话，告诉他们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的动向。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一直持续到六月三日才结束。

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以后他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

他成了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他在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抗中采取了支持炮派的立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在谢富治、王力的指导帮助下，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上报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召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说明了中央的八·八批示，并指定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赵健民在军管会中负责抓生产方面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

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3) 在云南省两派大规模武斗中，赵健民私自到北京遥控云南炮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陈康、赵健民未得到中央的允许，擅自到北京，要求向中央汇报。

赵健民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到处煽动闹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把整个社会推到了内战的境地。赵健民觉得，这是拿国家当儿戏。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赵健民给住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的工役制部队工人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工役第八团的负责人贾玉玺打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上旬，赵健民同原省人委的炮派负责人司以恭通电话。

一九六七年九至十一月，炮派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

综上所述，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一九六七六年五月以后，他以为有机可乘，迅速改变颜色，打出支持造反的旗号，实际上支持一派“揪军内一小撮”；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他支持一派，挑动大规模武斗。

（5）赵健民在监护中的表现

在监护中，赵健民提出：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到这个地步？

赵健民的结论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那么，为什么“左”倾错误得不到纠正？

赵健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赵健民的政治思想、立场，属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右派。对他进行监护审查是必要的。

第三，关于谭辅仁和他搞的“划线站队”以及他的死

谭辅仁到云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开始他就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实际上他是利用八派打击炮派，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形成自己的一派势力。

谭辅仁在云南执行了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决定；经过中央同意，他又在边疆地区搞了建立政治边防、在少数民族地区搞了重划阶级成分。在这些工作中，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划线站队。问题在于：他所谓的“划线”并不是真正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划线，而是以拥护或反对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去划线，这就必然会走偏方向，没有打击到真正的敌人，而打击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干部和基本群众，激化了社会矛盾。

谭辅仁的被暗杀，是社会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自己造成的恶果。谭辅仁作为一位守卫边疆的大军区的领导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被暗杀，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第一例。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深地吸取。

第四，关于造反派中对立的两派互相来回打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昆明八·二三“井冈山”战斗团、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积极起来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通电话，要求进驻军区大院的群众撤离。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这样一来两派开始产生分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些群众组织，说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三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扩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

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开进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省军管会主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李成芳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二三派的态度日趋明朗。

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省委书记赵健民等则支持炮派。由于李成芳是省军管会的主任，有他的支持，这一时期，八派占优势，炮派受到一定程度地压制。

一九六七年六月，谢富治王力到昆明处理云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上报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意见承认：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原军管委员会主任李成芳调走，改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

由此以后，陈康、张力雄、赵健民等支持炮派，鲁瑞林、周兴等支持八派，两派之间发生严重武斗的局面，逐渐形成。

在这一段时期，由于有陈康、张力雄所代表的昆明军区、云南军区的支持，炮派占优势，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调集云南军方、地方及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解决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由于炮派派所属工八团进军滇西，在下关挑起大规模武斗，打死打伤数百人，然后又进军昆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数次下令，要

求工八团停止前进、交出武器。工八团违抗命令，中央下令派部队包围，强迫放下武器。虽然造成较大伤亡，这也只能是咎由自取。

一九六八年二月，云南省军区、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均发枪给炮派农民，并组织农民武装包围城市。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

这样一来，炮派及其支持者受到中央的批评就比较多。中央认为，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领导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任命谭辅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八年八月，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谭辅仁任主任。

谭辅仁到云南后，支持、依靠八派，大搞划线站队，清查的主要对象是炮派的各级骨干以及支持他们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这又使得炮派的干部、群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错误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谭辅仁被杀。

一九七一年以后，周兴、王必成主政，由于谭辅仁主政时期，周兴本人涉及较深，他没有解决谭辅仁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搞整顿，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主要干部调到北京开会，并调动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还把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调到外地学习、劳动。这时，无论是八派的还炮派的，都成了“坏头头”。

从现象上看，是八派与炮派之间“翻烧饼”；八派起来了，压炮派；炮派起来了，压八派；八派又起来了，又压炮派；炮派又起来了，又压八派。

从本质上看，是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那里作怪，甚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那里作怪。一部分群众，尤其是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头头，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带着私心，有的是图谋私利，甚至是为了维护自己特权和地位，总是要搞唯我独尊，以我划线，支持一派，压迫一派，挑起群众斗群众。

第五，关于十月政变以后大规模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安平生、王必成执行中央关于清查“帮派体系骨干”的指示，依靠原炮派的干部和群众，把原八派的干部和群众作为主要清查对象，波及全省一百五十万人，将云南 5 万多干部、工人、农民，打成了“四人邦云南帮派体系骨干”而判刑入狱。

这个问题的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充分地揭露出来。据现在反映的情况来看，云南省是搞得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把隐瞒了三十多年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地揭露出来。当然，最终地解决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

2008 年 8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5 日修改

第七章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一些人冲击军事机关，福州部队在处理中发生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福州部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有人冲击大会、妄图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

要韩先楚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先楚两天两夜。

毛泽东说：“韩先楚同志这样很好，坐着汽车去接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有人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
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
一些地方出现“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贡献。

这个反扑的特点是：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福州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
康生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福州召开声讨大会，
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
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

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当时 2·11 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州军区作出决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二、中央着手处理福建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总理：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 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总理：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 1·26 事件及 2·7 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汇报谈福建问题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

总理说“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吾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

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总理：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研究，解释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

韩先楚：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

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总理：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三、福建两派群众组织继续进行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陈伯达与福建省双方谈判代表的谈话

八·二九控诉说：他们围攻我们，他们有四千人围攻我们，我们在楼上只有四百人，刚才通电话时，他们还在进攻，占领了三楼，还放毒气，还准备放火，用抢来的棉被、棉衣放火，冲击时他们用小口径步枪配合，我们大部分被小口径步枪打伤，伤势很重，有的穿过肺部、心脏，他们还挖了三个洞，准备用炸药爆炸，我们重轻伤有二百多人。现在已断水、断粮。我们战友二天二夜没有吃了，天天被挂牌游街和强奸。

革造会代表说：八·二九那边说他们现在想复课闹革命，但厦大、华大、林学院、二师院又来了不少人。我们已经放了人，他们不放。

伯达同志讲：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是错误的，是反动的，“过得硬”（泉州）是反动组织，要他们解散，没有人武部，“过得硬”是搞不起来的，军分区、人武部搞“过得硬”是过不硬的，是反动的，给工分、给饭吃把农民糊里糊涂调进来还不知道干什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凌晨一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一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达成第一个协议：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抓的人员。必须在八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以前释放完毕。望我们立即执行。其他问题在继续协商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二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二个协议：放人后，“革造会”在三小时以内撤出华侨大厦及其周围的全部人员，回到原地。原驻华侨大厦的“八·二九”等八个总部在半个月以内全部撤离华侨大厦，另迁

较为朴素的新址。“八·二九”等组织原驻的其他楼厦应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革造会”原驻的楼厦，也应该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三个协议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三个协议：

坚决执行中央七月十三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双方坚决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经进城的应立即动员返回原村。必须绝对禁止任何人、任何机关，利用任何借口，或者利用所谓“老区”的名义动员农民进城。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应担负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不得借口进城，已经进城的，都必须尽快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福州、诏安、厦门、泉州、崇安、晋江、福清、仙游、建阳、建瓯、南平、宁德和全省各县市已经进城的农民，省军管会、军分区、人武部负责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原村。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七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四个协议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四个协议，双方保证在全省各地做到：

1、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抓、打、搜、拘留不同观点的群众，砸、抢、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2、在协议达成三天后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在街头上的广播站。

3、不得撕毁、涂改、复盖不同观点的大字报、标语。不准搞一言堂，保证“四大”。

4、互不围攻，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包括街头的制高点）。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国务院给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五年毕业生定级问题的复电

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八月六日来电收悉。现答复如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暂缓定级问题的通知是指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生，不包括一九六五年暑期以前的毕业生。

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目前是否定级的问题，国务院正责成有关方面进行研究，将另行通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破坏协议，就是犯罪。人民解放军的枪不能夺。凡事要三思，任何一派都不能轻举妄动，千万不能做这两件事：一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二不能夺解放军的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晚，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现在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们回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农民已进城的要他们回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

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双方应该严格遵守协议，付之实施。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厦门某海军基地十艘军舰武器被抢一事给陈伯达的指示

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陈伯达：

禁止继续挑动农民进城武斗，这是很重要的。你们看是不是？现在到处都有人动员农民进城，很有可能是军区、人武部或保守派搞的。

(代表汇报厦门保守派“革联”和公安局老保下乡发动农民进城情况)

没有人发动农民跑进城才怪，发动农民进城一定有人组织，是公安局、人武部、军分区搞的。厦门就是公安局搞的，公安局要悬崖勒马。叫农民进城武斗，不做工，拿工分(代表：封锁海堤的农民还给钱，给三餐干饭，让他们抢劫集美侨校的侨生仓库。)这是对革命犯罪，对党犯罪，是反动的活动。

他们发枪给保守派是一种罪恶的活动，是什么左派？是保守派，是真正的假“左”派！有人是在玩弄权术，不能玩玩这些权术，这是玩火，玩火必自焚，这是破坏国防，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发枪给这些保守派是培养一批带枪的流氓，后患无穷。

(代表汇报 8 月 19 日凌晨三时到现在刘、李、田赤膊上阵，在瓷厂，“革联”和驻军对我“促联”开枪扫射。其中革联瓷厂“新红军”在 8·2 事件中也充当打手，扔出手榴弹，炸伤我八·二九公社负责人邓志国同志等)

福建这个协议(有关制止农民进城，反对武装老保)原来我还以为是比较好的，但厦门就这样干起来。这是违反群众的希望，群众希望他们不要武斗，他们违反了中央、毛主席的希望、毛主席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韩先楚：我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没有和地方领导干部很好商量，所以很多工作做不好，平反工作，制止农民进城，制止夺枪，要下最大决心，用最快的速度去办。我们前一个阶段在支左工作中犯严重缺点错误，准备向大家作检查，先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了，中央文革福建组提了意见，修改稿子，过一两天可送给在京的福建同志征求群众意见。我们敢于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修正错误，错了就改。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深刻的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慢，改正也较慢，给福建运动带来损失，对不起中央和广大群众，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愿意改进错误，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武斗，制止农民进城，制止保守派杀害革命派，把散发的枪枝收回，挑动农民进城的，送枪给保守派的，一定要严加惩处，我们一定能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好。

伯达同志：韩先楚同志的表示是好的，我们欢迎。福建军区的检讨可以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满意了就可发表，韩先楚听了昨天情况，他表示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违背中央，荒谬的调动农民进城的反动行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陈伯达第六次接见福建双方代表时的指示

福建的枪大量在保守那里，是送的。造反派也有，但很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造反派，夺枪主要是保守组织送枪给保守组织，送枪给农民。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保守派就垮了。

寿安支左就搞得很好，对保守组织，你们要会懂得做工作、分化瓦解，对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抓，让其组织自己抓。你如果一抓；坏人就在煽动，一煽动他们就团结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们。

要争取多数群众，最大限度孤立坏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为什么要破坏国防，夺舰艇的武器，没有坏人操纵不会这样干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前面有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你们要有敌情观念。内部也有敌情问题，但不要互相猜疑，到处疑神疑鬼就不好了。杀人、放火的就很可疑，开机船追舰艇是很可疑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和福建双方代表告别讲话

五、福建有人继续冲击军区，要打倒韩先楚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会议上，

陈伯达同志说：“有人说，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州抓军内一小撮，打倒‘韩再道’这是有政治目的的”。

周总理说：“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很紧张，对野战军司令员动不动要打倒，在福建搞什么‘韩再道’，还要揪‘闽老谭’”，总理说“一定有坏人插手，不然，很难使人相信。”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陈伯达杨成武接见福建代表时的讲话

伯达同志说：你们福建还是很乱，你们双方都要负责任，特别是革造会要负主要责任。

杨成武同志说：冲军区是错误的。总理要我在一日六时挂电话给福州军区。要找皮定钧，找不到，找到廖海光。因为昨天有二百个人冲到军区去抢枪。（革造会说没有这回事，他们是要求皮定钧接见。但旁边有个中央联络员证明有这回事。）还把韩先楚同志家的东西也抢走了，还拿走二个秘密的军事文件。中央打电话，主要是要追回两个文件，不准拍照，不准抄写。你们要求皮定钧接见，总理有三点指示：

（一）可以接见。现在皮定钧是最后一个指挥员，因为韩先楚病了，在北京。如果你们要揪，就要犯严重错误。

（二）你们现在喊出“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我们不能接受。韩先楚同志有错误，要帮助，不能打倒。你们要揪军队一小撮，这是错误的。

（三）告诉皮定钧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要中央调查组跟革造会说清楚：他们可能上美蒋的当，也可能上地富反坏右的当。现在所有抢的枪要封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伯达同志接见福建两派时说：“打倒韩先楚，中央不接受。韩先楚同志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解放军，这里就有鬼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总理陈伯达对福建问题的指示

福州市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并北京红代会在福州的同学、以及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并抄送福州军区、省军管会、中央调查组、八·二九总司令部：（以上均请福州军区转）

福州军区是福建前线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担负着很重要的战备任务。你们随意进驻其指挥机关，这种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联络站负责人讲话

周恩来：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就到处揪陈再道，这是对我们伟大军队的污蔑！革造会要听中央的话，要拥护那个八条。

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动摇军队，不要自毁长城，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了，今天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说今后再夺枪就是反革命行动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八·二九”总司，“革造会”，厦门“革联”、“促联”。

伯达同志讲：韩先楚是前线指挥官，你们以后会晓得，打倒他是不对的，回去要做好工作，要与韩先楚同志合作。‘打倒韩先楚’是政治上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总理说“现在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广州揪黄永胜，福州要揪韩先楚，南京要揪许世友，沈阳要揪陈锡联，他们是老将军……’，这是对伟大的军队的诬蔑。”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革造会”、“军造会”时，（“军造会”是非法组织）总理说：“福建要把矛头对准叶飞，全国对准刘、邓、陶。你们不对准叶飞，打倒韩先楚，台湾在广播了，你们要警惕，敌人欢迎的事总不是好的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接见时，问了韩先楚同志身体怎么样……，毛泽东说：你是打不倒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周恩来对福州军区请示电报的批文

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周恩来：

我们有错误是宣传上，今年红旗十二期社论强调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有个认识过程。

第三次出去串联，帮倒忙，好多是这样，福州也是这样。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部分军队代表讲话
伯达同志说：“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指挥官，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官，担负着很重大的任务，保卫着祖国。”“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根本要不得，根本错误，中央是反对的。听懂了没有？”

周总理讲：“‘九·三’指示不是说明了吗？搞两面派这是刘少奇的作风，彭、罗、陆、杨的作风，在福建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韩先楚，放着叶飞不管，福建的走资派是叶飞，中央的决议里都点了名嘛！你们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韩先楚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早就讲了吗？不管怎么，韩先楚中央是保定了。”

康生同志说：“中央就是要保韩先楚，保定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州军区和福建省革造会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军造会”与“四·二〇”有没有关系？

军造会：没有。我们和四·二〇在打倒韩先楚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某些做法上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认为福建乱的根子是韩先楚。

总理：照你的意见，把韩先楚撤掉，问题就解决了？最高司令部没有同意，我本来不准备说这个话。广东好，福建差；浙江好，江苏差；山东好，河北差，辽宁也差。辽宁早就来了，我们还没见他们，非要把他们解决好不行。等了一年半了，现在是应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所以请你们来，趁热打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关于勒令福州《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全体同志时，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毛主席支持韩先楚同志，党中央支持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官，你们不保，不支持，是什么意思？只有台湾高兴。蒋介石高兴。”

吴法宪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是保韩先楚的，你们要打倒，你们不是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这样做，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六、中央批准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在中央学习班时，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说：韩先楚同志，你不是会打仗吗？你同他们打一仗。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接见六大区的军队代表，

主席又讲：韩先楚同志，拥护你的那一派没有问题了吧？你们要做好反对你们的那一派群众工作。对造反派和对军队不同。

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说：韩先楚同志来了没有？福建不是很复杂吗？后来不是韩先楚同志做了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吗？你们的报告很好（指成立革委会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4； 中发 [68] 132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批准福州军区党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名单，同意韩先楚同志担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定钧等十一个同志担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教育革命中，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都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必须把这件事抓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韩先楚在福建县以上革命委员会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去年十一月实现全省（除金门外）一片红，到现在，基层单位也绝大部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进入龙岩地区执行任务的部队，广泛宣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政策，举办了八百多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军事行动的配合下，兰汉华、赖祖雄、张震东等坏人操纵的武装集团已被摧毁。

军区党委一月初开了支左工作紧急会议后，问题比较多的地方，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但有的地区转得还不快。

根据一些单位摸底的情况，县、社、队的班子状况，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差的占百分之十几。公社、大队和一些基层单位问题比较多一些。

这些班子的问题，主要是：搞资产阶级派性，一派的人掌权。“和事佬”、“逍遥派”当家。原班人马上台，照旧的一套办事。还有的班子是坏人掌权，镇压革命造反派。

现在，支左单位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还有问题。比如：一个地区有若干单位，各个单位分工包干一些系统，都有自己的支左办，派出支左人员各成系统，工作上各有一套部署，口径也不一致。部队支左系统向下布置的工作，革命委员会不知道，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工作贯彻不下去，形成各抓一条线，各有一套做法，多套马车，很多中心，搞分散主义，实际上革命委员会架了空。

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晚，韩先楚皮定均在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委会支左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皮定均讲话：

- 一、韩司令到军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坚决同叶飞作斗争。
-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
-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突出表现出来，在党内军内就更加复杂了。
- 四、怎样把这一次会议贯彻好？

七、毛泽东接见韩先楚等人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

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八、十月政变后对革命群众的镇压

一九八一年《人民司法》第 1 期 刊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文章《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冤假错案也不少》 福州、厦门两市中级法院和建瓯、沙县、三明、龙海、莆田、平潭等七个县(市)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 98 件。发现确有问题的 93 件，占 94.3%。其中属于无罪的 67 件，占检查案件总数 68.36%。应免于刑事处分的 2 件，占 2.05%。定性不准或量刑

畸重，应予减轻刑罚的 21 件，占 21.4%。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3 件，占 3.06%。

如福州市中级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反革命案件 22 件，经复查应宣告无罪的 17 件，占 77%，应改性减刑的 4 件，占 18%；能维持原判的只有 1 件，占 5%。

厦门市中级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 9 件，经复查全部有问题，其中应宣告无罪的 7 件。

龙海县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 12 件，有 10 件是错案，2 件事实不清，需要重新调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李庆霖正式被捕入狱。

一九七九年，李庆霖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后，李庆霖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

连续两次减刑，1988 年减为 10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贰、本节简论

福建省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同其他省的情况大致相同。

一、首先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执行错误路线，压制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

二、其次是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支左中犯错误，过重地打击了冲击军事机关的革命群众。

三、然后是群众组织的一些头头犯错误，他们冲击军队，提出要揪军内的一小撮、打倒韩先楚。

四、福建处在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线，情况特别复杂，形势比较紧张。在这样的环境下，正确处理与部队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缺乏这样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念，只知道一味地蛮干。这就是教训。

2008 年 9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6 日修改

第七章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抵制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广西军区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间，广西军区对“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广西军区开始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事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

有些造反派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

广西军区对这种说法很反感。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伍晋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

广西军区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日报》事件的电报

(1) 进驻报社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利。

(2) 要维护军管小组、革命组织，要支持军队对报社军管工作，军管小组成员要做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搞好报纸。

(3) 有意见可以和军管小组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持军管小组正常工作。

(4) 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判，也可以在报上讨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今晚接见，主要解决紧急问题。柳州国际列车停运。我等了你们五天，你们不听，你们不觉悟，把派别斗争搞到列车上去了。

（并送传单给总理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越南同志问到韦国清同志的问题时，主席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总理：主席是说过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对韦国清站出来问题中央是要支持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嘛！

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军区调查，自十三日起有武斗，西大“革联”、“工总”、二中“赤卫军”三、四千人围攻一中，支持一中的也来了三、四千人，军训团的解放军被打伤了几人，孔竹被斗争，军区宣传车被砸坏一辆，双方伤三百多人、没有六六粉熏防空洞的事，现武斗已基本停止。

《解放军报》记者王荔报告：十三日打起来，发生武斗，汽油烧被子的事，记者进不了现场，无法了解，挖眼睛的事没发现，确实被打四百多人，伤一百多。

《红旗》杂志记者报告：武斗确是十三日发生，情况与上差不多。

总理：第一，这边（指联指）你们劝说开了列车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是伍晋南策划还没有调查清楚，若调查清了，要处理的，但是，他们冲击报社，还打了贺电，这完全不对嘛！

第二，武斗问题，我们打电话给军区，要立即制止，广西是前线。

康老：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席讲“三结合”“三依靠”，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指“四·二二”）这一派从来未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

总理：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康生同志：贺希明是一九二九年被捕的，后来到国民党当高级军官，是桂系的，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霍泛是不是党员搞不清楚，是个叛徒。你们要和他们划清界线，这是对抗性的矛盾。当然，他们坏不等于你们坏。你们是受蒙蔽的。

总理：桂林“老多”过去是出名的嘛，“四·二二”是造反派嘛。你们造反的早，觉悟的晚。又指“联指”说：你们造反的晚，觉悟的早。

中央首长还对“四·二二”代表说：你们要帮助伍晋南同贺希明他们划清界线。

二、广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广西军区的电话指示

〔时间：晨 7：30〕

通知航运工总（广西“四·二二”），19日在金鸡车站附近抢走了9023个军内列车炮弹，应如数交还广西军区。如不交还，中央文革就要在北京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并转告两大派，要顾全大局，今后一律不能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任何一派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中央文革就要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谈话纪要

总理说：

“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四·二二”拦军车截了援越军火。

“联指”抢了三千八百条枪，“四·二二”抢了四千八百多条，“四·二二”的枪比“联指”多，但“联指”的弹药比“四·二二”多。这样，内战势必越打越大。双方要停止打内战，武器封存，回原单位，占的地方退出。

七月份双方达成十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很高兴，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可是被破坏了。南宁打的最凶，（联指）要多负点责任。

“工总”恢复。熊一军、丁友仪马上释放。

军区过去是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指“四·二二”）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军区认识有很大提高，愿意检查错误，很好。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的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伍晋南同志你说对不对？（伍晋南答：对！）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军区支持你们，但不能助长你们的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决不能因为军区支左，知道你们造反精神旺的地方，又反过来压“联指”。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韦国清同志并不认为你们打了他，而改变对你们的态度，但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他，他才支持你们。不能乱打。

你们（联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你们对的都会给予肯定，错的要指出。

广西军区要教育各个分区改正错误。

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这些机关长期受彭、罗的影响，即使今天造了反，有些方法和作风还不对头，甚至挑拨是非，搞小动作，有的甚至搞特务活动。所以，这次运动中，政法部门必须深入地进行斗批改，要真造反，要认识到这些作风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撤消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恢复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名誉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现在讲三条：一、相信解放军，铁路马上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沿途武装巡逻；二、希望桂林老多站出来，参加护路工作，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按九·五命令办事，一字一句的执行，不要按派别观点，袒护一方，不能认为与四·二二观点相同就好，观点不同的就是坏的，这不是党性，是派性，铁路沿线要播送江青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三、领导干部（伍晋南、安平生）换个地方住，小将们不要受他们影响，要独立思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韦国清《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运动开始，由于我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就把一部分已经搞起来的单位暂停下来，大大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搞三个“横扫”（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我没有明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结果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挑动工农群众围攻革命小将的两个市委书记，在请示中央、中南局后，撤了他们的职。但我只限于组织处理，没有真正提高到方向路线错误来认识，更没有检查区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对待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我在思想感情上，不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肯定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他们起来革命造反，而是把他们的某些缺点看得严重了一些，加之我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阶级分析，看他们是否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而是片面听取汇报，就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特别严重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除了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外，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

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由于我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后补书记霍泛等人去。次日上午，我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我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我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我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我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处理三江问题上，由于我不是站在到三江参加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小将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压制文化大革命，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因而我在九月廿三日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我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在南宁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影响了各军分区和各市、县人武部，给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回顾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南宁“四·二二”造反派的想法有错误，压制了“四·二二”，特别是在砸“工总”总部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当时我们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了他们。但对造反大军成员“工总”中成分不纯的现象看得过重，是不是造反派有所怀疑，特别是当他们在夺权

以后，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遭到社会的指责时，更加动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于三月一日错误地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对造反大军中的“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我们早在二月就承表态支持过，但没有给予坚决支持。没有很好的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巩固内部，团结大多数，发展壮大组织。三月间，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我们没有从分析形势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执行中央指示，而是操之过急，简单生硬，没有很好走群众路线，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三月下旬，我们开始做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当时，由于我们工作做急了，对情况判断不准，以为机关干部阻力大，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因而，有些造反派即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我们对这种说法很反感。以为我们支持韦国清同志是对的，而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四月中旬，伍晋南同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我们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我们对两大派的态度，凡符合大方向的革命行动都支持。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同志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与支持。严重的是，一段时间未给予承认这个组织。因此，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的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错误地指责了他们，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压力，起了压制造反派的恶劣作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广西两派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对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的谈话

总理说：

你们联合了，还提什么以谁为核心？我多次讲过了，“以我为核心”这种提法是愚蠢的，可笑得很。

怎样才能看出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呢？就要看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三句话。

提出什么应该以“左派为核心”说自己是左派，所以就要以我为核心，你一定要说自己是左派。

挑起武斗。第一是走资派，账要算在走资派身上。第二是有坏人挑动，第三我们思想上受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

最近主席批了个文件，对牛鬼蛇神的定义加了几个字，牛鬼蛇神是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击面过宽，18年总不能说一个也没有改造好。另外还有敌特，这称第二类。

为文化大革命流了血死了人是值得的。解放战争三年夺取全国胜利，抗美援朝三年多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这次是过社会主义关，三年才过了一年半，免不了流点血，这是为文化大革命出了力。

不要因为打击“五·一六”的极左思潮，就变成右的老保翻天，以批判极左思潮来推动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认为，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以及各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个协议，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柳州铁路局已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希望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毛主席批示：照办。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过一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这种态度是好的。

韦国清同志在过去长期斗争中是有成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就很好。中央同意韦国清同志的检查，希望韦国清同志今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斗私、批修，把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说：

关于革筹小组，军区方面，军区两个，欧致富、还有个新来的那位，魏什么（黄永胜：魏右铸。）空七军一位……，地方干部有韦国清、安平生，再加个伍晋南，由韦国清同志负责。先把革筹小组搞起来，伍晋南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要经过一段过渡嘛！

代表：目前我们在四个专区发现有反动传单。（递上反动传单给总理）总理看后交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说，这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捣乱。

代表：我们还发现有秘密电台，有一个“解放军之声”（黄永胜同志证实说，军区是发现有秘密电台。）

总理详细地询问和记录了电台的情况，严肃的说：电台问题要认真追究。

总理：现在广西是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目前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关键是成立革筹小组，革筹小组主要就是干部问题。

今天下午黄永胜同志和你们谈了四个多小时，现在又谈了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毛主席批示：已阅，照办。

一、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

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二、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目前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一些对贯彻执行两派协议不力或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协议的地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执行协议。

三、广西处在援越抗美的前线，越南人民把广西称作是他们最可靠的后方。广西“四·二二”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

美工作。两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能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贯彻执行两派协议，革命群众就应当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站出来革命。今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要认真学习 and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三、中央决定后两派武斗加剧

四、两派武斗发展到抢劫援越武器弹药，清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灵山“革联”控诉团 2 0 0 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 2 0 0 0 多人，配备步枪 8 0 0 多支，轻重机枪 2 6 挺，冲锋枪 4 0 7 支，各种炮八门，手枪 1 6 4 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4·22”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4·22”1 3 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4·22”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 7 2 间，吃去国家粮食 1 4 0 0 0 多斤，肉类 8 8 0 0 多斤，耗费国家资金 2 0 0 0 0 多元。

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

2 月 9 日融安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

1 2 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

1 4 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 3 0 0 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 1 3 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

1 6 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 5 时才停火。双方对打死 5 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 5 户九间，厨房 3 间，牛栏 1 间。

“联指”方面抓获“俘虏” 3 6 人，押解途中 1 5 人被杀害。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 17 天内，全县杀 239 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

一九六八年二月，《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合浦县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5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

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 46 人，造成 16 户无男人，9 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 1651 人”。（《天等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 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 月 5 日至 12 日全专区共杀人 2000 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 1000 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 94 人。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 7 月 5 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局，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也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对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态度，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 12 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 40 人，（其中未成年的 12 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 10 个月的婴儿）有 13 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受害者财物。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24”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22”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此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4·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4·13”事件。

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斗死90多人。

据统计，全县 5、6 月份有 2 1 2 9 人被斗、打或被杀死”（《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第 3 5 页）。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 2 2 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 2 2 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 8 9 4 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 3 0 6 6 . 4 1 元，全部被吃喝完。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 4 月 1 3 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4 月 1 4 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 月 1 5 日）杀 2 4 人，4 月 1 6 日又杀 5 2 人。

从 4 月 5 日至五月 6 日杀 5 6 户 9 2 人（其中 1 5 户被杀绝，1 户 1 7 人被杀 1 3 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 2 7 0 1 . 2 7 元（内改嫁证明费 2 1 8 元，设卡哨搜人身 4 1 5 1 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 1 0 1 6 . 4 0 元），大米 7 6 9 斤。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 多人，将 1 2 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 1 7 7 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 4 0 %。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九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

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18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11个公社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1229人。

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广西驻军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

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22人，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108人。

（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共杀18000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局长）、黄海泉（原钦州地

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 “4·22” “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竟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10000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120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联指”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6600多元。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1人，副团长3人，政治部主任3人，经济部长1人，支队长4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

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

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5600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50多天时间，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伤致死75人。

（7月14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8998人参加，错误批斗150多人，其中死59人。

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 1 3 8 9 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第 1 8 页）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清查反团的概况：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 5 2 1 3 人，厅级干部 1 人，县级干部 2 3 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一个县就逼出“反团”4 0 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 1 1 天打死 3 3 8 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 7 8 6 4 人；

钦州地区 7 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 1 0，4 2 0 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 6 人，被迫自杀 1 7 人（救活 1 3 人），暗杀 3 人，外逃 1 人，重伤 2 1 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防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第 1 9 页）；

据《武鸣县志》记载：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

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

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至32页）。

另外，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XXX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区武装部长在县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古兆乡所谓破获‘反共救国军’组织，和实行‘群众专政’的经验，全县乱杀人的恶果由此开始。此后，全县有738人无辜被打死”（《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这个“反团”案到1983年已彻底平反，证明是个冤假错案。）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二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

6月19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直接策划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11人当场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伤残。

20日上午王德堂决定“积代会”延期一天，他向“积代会”布置杀人，公社回去后要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

王德堂在文革期间，还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 6 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 7 8 6 4 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 5 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打死 1 3 0 0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 10%，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四、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毛泽东批示：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 9 0 0 0 0 多份。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 5 1 个宣传队，南宁市有 5 0 0 0 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 6 6 0 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 3 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驻桂空军派出飞机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贺县、融安、等市县以及铁路沿线大量散发“七·三布告”。所有的口径都是“四二二”是违反“七·三布告”的“阶级敌人”，除此以外，没有别人去抢解放军的装备，没有别人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这些现行反革命都在“四二二”那里，必须坚决“镇压”。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至八月三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等。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 1 5 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 8 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 2 8 0 多人，杀了 3 3 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午 1 2 时，南宁市“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 [坍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埋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

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撼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 1 8 点 5 5 分至约点 3 0 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件事被广西军区报告给了中央。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

1 6 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解放军 6 9 7 7 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 1 2 0 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 1 4 0 多支，尔后又抓捕 8 0 多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南宁市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民房起火，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缉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 3，5 4 7 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9时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7月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市“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

决定 25 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7 月 24 日凌晨 4 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 23 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 多人搜山围村，抓获 70 多人，立即枪杀 25 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 120 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 146 人，开支现金 100400 多元，粮食 53583 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毛主席批示：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的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陕西省同全国一样，正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揭发检举坏人。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发生反革命事件时，要充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干部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

康生说：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浪”的朱仁站起来。）

总理：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

康生：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朱答：广西柳城县）家里是什么成份？（答：中农）你在党校做什么？（答：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哪里学的？（答：东北师大）什么时候毕业的？（答：六零年）毕业后呢？（答：到广西党校）

康生：你什么时候来的？（答：四月二十一日来的）

总理：你是“控诉团”的？（答：我们是汇报团）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答：没有见过）怪事！你们四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来了嘛！

接着，总理、伯达、康生问：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

朱仁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

曹东峰（西大“革联”）参加了这个会议。桂林“造反大军”有个人参加了半天。

总理：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总理：（生气地站起来对刘振林）我问你们，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对不对？（永胜：还成立了“接管监狱领导小组”。）你们组织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老多”要改个样子，不是去年那样了，今年变了，性质要变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第一，你们要承认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写出检讨；第二，今天就搬回去！第三，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千犯人，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

（当桂林“造反大军”刘天偿谈到桂林市被农民包围和在机场挨打的问题时。）

总理：打人是错误的，“联指”已经写了检讨，态度是诚恳的。农民进城问题，军队劝他们回去，“联指”也劝他们回去。

温玉成：你们的所谓汇报团，在北京做了很多坏事。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打烂玻璃，打伤战士，派战士把你们送到和平里，你们把战士也打伤了，现在这个战士还在医院。你们说在和平里开了一次会，实际开了几次会造了很多谣。桂林“造反大军”的去了，你们开欢迎大会。到处串联，散布谣言。

黄永胜：你们讲：“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还说“坚持就是胜利！”

总理：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康生：（对苏振国）我问你，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的是不是反革命，镇压这些人叫不叫迫害？对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你到底怎么样对待？怎么样处理？（苏答：回去调查……）不能等回去，就要在这里处理。（苏：我们没抢援越物资）

总理、康生同时说：你们都是“造反大军”。

康生说：梧州搞成那个样子，你们怎么能看得下去，怎么能对得起群众？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会怎么愤恨！

（苏振国：广西反革命两面派蒙蔽群众，……）

富治：这就是你们在北京贴大字报的口气，你们这就是反对“七·三”布告。

总理：“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立即停止武斗，交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抢夺的援越抗美物资。

（当西大“革联”曹东峰说“四·二二”常委龙智铭等人是被开除的，不能代表“四·二二”时）

总理：你能代表“四·二二”吗？你是什么“四·二二”？我们请的“四·二二”的三十个代表为什么都不来？

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当曹东峰讲到“四·二二”的群众在他们一边，不在龙智铭等人一边时）

永胜：你这个话就不对，你们杀人、放火、抢东西就叫有群众，他们就没有群众？！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群众！

总理：“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你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当然韦国清同志不是没有错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检讨了嘛，你们都看到了嘛，有文字为证嘛！你贴出这样的标语不感到问题严重吗？

总理：你（对曹东峰）给石怀宇写封信，叫他把“四·二二”三十个人劝好，两天之内叫他们到北京来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了。我给你们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温玉成：你们（对朱仁、曹东峰）这些头头阻碍解放军战士到和平里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从明天起你们就要停止这种活动，不能阻止！

总理：朱仁要负主要责任。你不是学生，你是个教员，是出谋划策的人，又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现在桂林、柳州的都来了，就是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给你们三十个代表不少了，不执行“七·三”布告就不能代表。

（朱仁说他们在和平里的人思想很混乱）

康生：不是他们思想混乱，主要是你们头头的思想混乱。你们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你们是站在阴沟里的黑司令部的路线上的。

总理：你们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

（朱仁：谢谢中央首长的关怀）

总理：现在讲柳州问题。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柳铁“工机联”王反修：马上通车）。你叫王反修？（总理站起来）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这个反修，要真正反修。你是学生出身，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们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你们是不是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

（王反修：“工机联”抢四千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

你们全在柳江南岸，占的据点很多。

（王反修：我们请罪。）

总理：你们同“钢联指”能不能够合作？“钢联指”来了吗？

（“钢联指”张坚答：可以解决。但我们安全没有保证。）

你们（对王反修说）的黑老板还在不在后面指挥？你不是张炎的“秘书”吗？你要说实话。你们能不能保证双方不阻挡通车？

（王说从来没有阻挡过。）

怎能说从来没有阻挡呢！

（张坚：他们放脱轨器。）

对！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啦！

（王辩解说：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

什么不懂事！这是反革命事件！

总理：（对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我向你，你们参加抢援越弹药，不能交出来吗？你们抢了一万一千八百箱，这不是小事！还有廖伟然，你们能在很短的时间交回吧！今天是二十五号了，你们要在一、两天通通交回来，你们明明知道是援越物资的列车嘛！一万一千多箱弹药，你们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怎么分的，难道不知道？！

总理：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总理：现在谈桂林问题。

（刘振林报告说：我们进占监狱的人，保证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撤出。）

总理：桂林“联指”曹铁军、李年生，你们也要保证，打电话回去。“造反大军”保证从监狱撤出，“联指”保证在“造反大军”撤出时不要打他们，双方保证。

（当“造反大军”提出“联指”抢了六千多条枪支问题时）

有没有这件事？

（“联指”李年生答：有这件事）

你们承认有这件事，就把枪送回去。有错误要像刚才检讨打人那样，检讨了就很好嘛！

（刘振林提出“联指”不在协议上签字。）

你们一派起草的他们当然不干。一四一师韩更同志、分区景伯承同志，你们两人与他们双方一起，搞一个协议。

你们（指景伯承）支一派压一派，检查没有？（景：已检讨。）

总理：景伯承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你们（指一四一师、桂林军分区）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两位（指韩、景）一个是一四一师的，一个是军分区的，要把桂林的问题好好解决。不只是解决桂林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铁路沿线、全专区的问题，铁路的从冷水滩到永福。大概桂林市的问题，“老多”要多负一些责任；城外的问题，“联指”多负一些责任。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有一万多条枪时）

总理：（问一四一师韩更同志）“老多”手里有多少支枪？（韩答：不知道。）

永胜：你们一四一师送给“老多”枪，还说不知道？

总理：今天是二十五日，要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包括韩更，景伯承两位，都要保证。进城的农民要回去。（“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收留了很多外省人员）刘天偿你们“造反大军”也有农民进城吗？有没有外省人员流入桂林市？（刘答：一个也没有。）（韩更：有）你说没有，一四一师都承认了嘛。农民由部队劝他们回乡生产。外省人员由你们“造反大军”负责劝他们同去。你同意不同意？（刘答：同意）你们回去达成全面协议，要有有效的保证铁路畅通，不要农民进城。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反对革命委员会时）

你们“老多”过去不是一向要支持桂林市革委会的吗？怎么也反对啦！这些问题，都要在协议上解决。

总理：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报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是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的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份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过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地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

（当刘振林说到他们正在清理阶级队伍，还揪出了杨德华时）

总理说：对呀！杨德华是你们保的嘛！杨德华是要揪的！

总理：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会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你们那样！快两

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呀！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要赶快通车。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对齐齐哈尔的司机那样对待就是反革命罪行。

不管哪一方抢解放军的武器弹药，都要迅速交回。再放火不行，双方抓的人都要放，劝进城的农民回去，铁路要达成协议。广西七月底要实现毛主席的批示，如果你们诚心跟坏人走，那是另外问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南宁联指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在宾阳县，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在军队革委会主任王建勋（6949部队副师长）、副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的直接指挥下，打死所谓的“阶级敌人”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人民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户全家灭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博白县“在贯彻‘七三’布告过程中，全县各地不断发生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人的事件，到9月底为止，全县被打死的干部群众共337名。”在整个文革中，该县非正常死亡者达千人。（《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扶绥县落实中共中央‘七三’布告，县革命委员会……层层召开现场会，揪斗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现

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伤残多人，后果严重”。（《扶绥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平果县，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被乱杀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15时，联指开始对“四二二”派占据的展览馆发动武装大围剿。

据官方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X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112页）

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8月1日8点，耗费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终于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联指”和军队冲进去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四二二’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军区某些负责人命令6912、6966、6936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四二二”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12条街道被打成一片废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南宁地面上的围剿基本结束，打死反对派人员 1 4 7 0 人，抓获“俘虏” 6 4 4 5 人和居民 2 5 0 0 人。

事后，“联指”用翻斗车搬运尸体，运到二塘煤矿丢下废矿坑 6 8 0 具，就近火化 6 9 4 具，在朝阳沟掩埋 7 5 具。

从解放路俘出的人员在中途被打死的有 5 2 人，其中有一批“俘虏”路经“广州照相馆”门前时，2 6 人遭军队枪杀。

据不完全统计，到 8 日为止，抓获“俘虏” 9 8 4 5 人，先后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其中关在区看守所的 2 6 5 人、区交通学校的 7 1 1 人、南宁幼师的 4 4 1 人，都被列入“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共救国团”的“要犯”“首犯”。

被“俘虏”的人员，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 7 0 1 2 人，其中被打死的有 2 3 2 4 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 2 4 6 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解放军炮火轰毁的街巷有 3 3 条，各种房子 2 8 2 0 座（间），建筑面积 4 6 万平方米，使街道的 5 个分社，1 0 0 0 0 多户，5 0 0 0 0 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价值 6 0 0 0 万元以上（同上，第 1 1 5—1 1 6 页）。

一九六八年，横县，乱打乱杀中“被无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一千多人”。（《横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 9 8 9 年，第 2 5 页）~}

一九六八年，阳朔县，“全县文革中打死六百三十九人”。（《阳朔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 9 8 8 年，第 1 6 页）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社论说：这些“阶级敌人”在农村呆不下去，纷纷跑到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桂林市“八·二零”事件

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22”桂林“老多”据点。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乾淨”。

8月18日，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到桂林，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8月19日在104部队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12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了“八·二零”行动。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份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月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着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

死 9 4 人，自杀 9 1 人，总计 3 4 5 人，超过 1 9 6 7 年 1 月至 1 9 6 8 年 8 月 2 0 日前武斗中死人 2 6 7 人的 3 0 %。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柳州军分区调动 8 县两矿一郊的“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的“四二二”据点，打死 1 4 6 人，共用去现金 1 0 万 4 千多元，吃去粮食 5 万多斤。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八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死 8 4 0 0 0 多人。其中：

宾阳县死 3 9 5 1 人。

贵县死 3 1 3 8 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 2 6 3 人，教师 1 5 6 人，学生 4 7 人，居民 1 0 6 人，农民 1 3 1 1 人，其它 1 2 5 5 人。

临桂县死 2 0 5 1 人，其中国家干部 3 2 6 人。

灵山县死 3 2 2 2 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 5 0 0 人以上，2 8 7 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

桂林市死 1 1 2 8 人，其中：干部、工人 5 5 6 人，全市冤、假、错案 1 1 5 2 2 起。

天等县死 1 6 5 1 人。上思县杀 1 7 0 1 人，占当时全县人口 1 . 3 3 %。

钦州地区 7 个县市失踪 1 0 3 5 9 人。

玉林地区杀 1 0 1 5 6 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8. 20； 中发 [68] 134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是援越抗美的前哨。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特务，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广西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韦国清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三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大造革命声势，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要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内团结和军政团结。认真落实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指示。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作好援越抗美工作。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歼灭敢于来犯的美蒋匪帮，巩固边防，保卫祖国。

中央相信：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化，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思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22”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5月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68）军营字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

7月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7月25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段振邦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极其伟大的战略意义，为我们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广西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220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下面这一部份具体数字，是今天经由民间调查而获得的，可供参考：

灵山县被打死3200多人；

都安县被打死441人；

开鸣县被打死698人；

宾阳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3681人；

上林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1906人；

蒙山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私刑致死603人；

百色地区被打死1073人；

河池地区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个县被打死千人以上。

据官方县志的记载，文化革命中广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尤其是在1968年韦国清等人下令的对反对派“四二二”的“刮十二级台风”中的死者远远高于其它各省。

六、“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第一号文件：《宣言》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第二号文件：《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的信

七、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革命干部和群众的镇压

一九八三年，原“联指”头头担任省革委会领导职务的人均遭镇压：

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1973 年任自治区共青团委书记），

邓文光（区建一公司工人，1973 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

李家海（南宁橡胶厂间指导员，1973 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

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后升任区党委常委）

先后被判刑或开除党籍。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广西文革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到。

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都曾经犯过方向路线错误，比较其它省来说，属于一般。

二、广西的革命群众组织很早就起来批判省委的错误，它们是有贡献的。

三、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由于广西军区支持“联指”，压制“工总”，革命群众组织分裂为“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并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发生武斗。这以后一段时间，“联指”派搞武斗比较主动。

四、由于中央反复做工作，韦国清、广西军区都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群众组织双方达成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中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作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广西革筹小组。这时，广西的形势是很好的。

五、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后，两派武斗、乱杀无辜、清查反团轮番上演并不断升级：

1，一、二月份，玉林、灵山、融安等地发生武斗，由于“联指”派有人武部的支持，处于强势；“四·二二”处于弱势。一般称之为“围剿”与“反围剿”。

2，二月下旬，一些县开始发生乱杀现象：

二月二十八日，大新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提出：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17天内，全县杀239人。

二月，合浦县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5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961人”。

三月十六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

三月十八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1000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三月十九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四月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 22 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 22 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 894 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 3066.41 元，全部被吃喝完。

四月十五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 4 月 13 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4 月 14 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 月 15 日）杀 24 人，4 月 16 日又杀 52 人。从 4 月 5 日至五月 6 日杀 56 户 92 人（其中 15 户被杀绝，1 户 17 人被杀 13 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 2701.27 元（内改嫁证明费 218 元，设卡哨搜人身 4151 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 1016.40 元），大米 769 斤。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 11 个公社 155 个大队，有 154 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 1229 人。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 10156 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12 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六月十五日，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 8998 人参加，错误批斗 150 多人，其中死 59 人。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 1389 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

3，四月份，各地革筹小组、联指更明确地把矛头指向“四·二二”。

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 110 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24”事件。

四月九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 12 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 12 级台风。

四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22”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此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四月十三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4·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4·13”事件。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斗死90多人。据统计，全县5、6月份有2129人被斗、打或被杀死”

四月二十一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多人，将12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177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40%。

四月三十日，广西驻军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22人，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五月三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但杀人行动并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五月中旬。

五月十一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共杀 1 8 0 0 0 多人。

五月十二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2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竞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 1 0 0 0 0 多人。

五月十三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 1 2 0 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 6 0 0 人并请贵县“联指” 3 0 0 多人支援，共 9 0 0 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 9 7 人毁掉房屋 6 7 间价值 3 7 9 0 0 元；共有 3 7 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 2 6 6 0 0 多元。

五月二十四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

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 5 6 0 0 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 8 0 0 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 5 0 多天时间，从 5 月 2 4 日开始到 7 月 8 日结束。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 4 2 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

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六月十二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 2 5 8 人，其中被迫害致死 3 5 人，致伤致死 7 5 人。（7 月 1 4 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 2 4 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 1 2 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七月十七日，解放军 6 9 7 7 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 1 2 0 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 1 4 0 多支，尔后又抓捕 8 0 多人。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 4 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 0 0 0 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7 月 1 9 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 1 8 日上午有 1 0 0 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市“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 月 2 1 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 2 5 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7 月 2 4 日凌晨 4 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 2 3 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

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3斤。

4，杀四类份子、杀“四·二二”都不名正言顺了，又提出了一个新名目：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

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1人，副团长3人，政治部主任3人，经济部长1人，支队长4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的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

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清查反团的概况：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 5 2 1 3 人，厅级干部 1 人，县级干部 2 3 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一个县就逼出“反团”4 0 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 1 1 天打死 3 3 8 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 7 8 6 4 人；

钦州地区 7 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 1 0 ， 4 2 0 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 6 人，被迫自杀 1 7 人（救活 1 3 人），暗杀 3 人，外逃 1 人，重伤 2 1 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

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

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 1 3 0 0 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 X X X 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 7 4 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

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 1 3 3 7 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 2 2 1 人被抓捕，2 0 2 人被关押，1 6 2 人被吊打，1 0 7 人被打逼死，3 4 1 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这个“反团”案到 1 9 8 3 年已平反，是个冤假错案。

5，七月，南宁市又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

七月十五日，中午 1 2 时，南宁市“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 { 坍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撼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 1 8 点 5 5 分至约点 3 0 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件事被广西军区报告给了中央。

七月十六日，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七月十八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南宁市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民房起火，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七月十九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9时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南宁市的几条街道被焚毁，两派相互指责，从实际情况来看，军队和联指开了炮，“四·二二”也有个别坏头头叫人放了火。

六、在两派武斗中，“四·二二”也犯了严重错误。

1，破坏广西两派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一九六八年二月，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

2，破坏铁路交通，不能恢复通车；“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在铁道上放脱轨器，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王反修辩解说：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

3，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一万一千多箱弹药，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工机联”抢四千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

4，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5，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6，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七月二十五日，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北京开会，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掠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

7，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千犯人），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

8，参加并主持了五月在北京举行的所谓全国造反派会议。朱仁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

9，汇报团在北京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还讲：“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还说“坚持就是胜利！”把送到和平里的战士也打伤了。

七、广西的问题，韦国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六八年以后广西的武斗，实质上是掌权的人武部和联指对“四·二二”派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行动都是韦国清布置策划的，但他也没有与这种错误行动作斗争。

第二，广西的乱杀无辜，都是在县级领导机关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全国第一。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从三月开始，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才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区革筹、广西军区实际起到了包庇纵容的作用。

第三，韦国清制造了所谓“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 3 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 15 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缉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 3,547 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八、广西的问题，中央也有许多失察的地方：广西的武斗，中央始终认为是两派斗争，实质上六八年以后是掌权的人武部和联指对“四·二二”派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广西的乱杀无辜，中央没有严察和严惩；韦国清上报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中央也偏听偏信，周恩来在七·二五会议上还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造成了严重后果。

九、有人说：广西两大派“四次闹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要周总理公断谁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一第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

派相安无事。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一九六八年夏，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

也有人指出上述说法不准确：在“七二五”讲话中，并无直接宣布广西“四二二”派为“反革命组织”的明确结论。不过，通篇讲话中，确实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少有的。确实给人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这样一些讲话传达下去，当然就会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了。

其实，周恩来的七·二五讲话非常明确：

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报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是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的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份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过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地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

“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准许他改，将功折罪。”这里既没有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也不可能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有些人，歪曲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硬要把“四二二”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者有些人借机挑拨“四·二二”派与党中央的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十、在广西，还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保党反派委员会”。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从它发出的“宣言”、“意见”来看，它的后面似乎有“高人”指点，以保卫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为名，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泽东同志为

首的党中央。这两个出现在一九六八年的材料，可以说是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的先声。

据说，这个案件在一九六八年就告破了，详情不得而知。后来肯定又平反了吧！

2008 年 5 月 9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9 日修改

第七章第五节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造总”等群众组织宣布夺权 并与军区关系日益紧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造总”等群众组织在拉萨市开大会，宣布夺权。

西藏军区支持。群众代表在发言中有一些攻击军区的言论。军区参加会议人员退出会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

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造总”等群众组织冲藏南军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给西藏军区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从拉萨发给中央文革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给拉萨革命派的电报

(1) 中央军委二月十二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

(2) 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拉萨市召开西藏自治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这次大会不准“造总”等群众组织参加。

陈明义在大会上的讲话

在当前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农奴主、农奴主代理人 and 地富反坏右、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而“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内的一小撮反坏分子同他们勾结起来，并成立所谓“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欺骗、拉拢、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耍阴谋，放暗箭，造谣惑众，颠倒黑白，制造混乱，妄图变天。他们要造无产阶级的反，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妄图实行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复辟。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拼命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实行白色恐怖；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疯狂地咒骂、污蔑我边防人民解放军，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一再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公开叫嚷要夺军权，甚至扬言要“血洗高原城”，“要与军区干到底”！他们极其恶毒地挑拨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甚至分化瓦解部队，煽动

部队“调转枪口”“反戈一击”，妄图搞垮边防人民解放军。他们拚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顽固地抗拒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西藏军区接管地方已集中的武器、弹药的命令；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抗拒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反对军区对西藏日报社等单位实行军事接管。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大方向的错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破坏战备工作、影响国防巩固的错误。一句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的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的“五·七”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一万三千多革命工人、农民、“农奴戟”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汇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负责人吕义山出席了大会。

“大联指”负责人郭铣之在会上讲话。

西藏军区政治部负责人阴法唐在大会上的讲话：一年来在农副业生产、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开荒面积就比去年耕地面积增长一倍以上，播种面积也增长一倍以上，这是一个大跃进，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了一份力量。

三、中央着手解决西藏武斗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

一、会议听取两派情况的全面汇报以后，中央认为：造总、大联指均定为群众组织，以便实现大批判、大联合。两派的性质暂不下文字的东西。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牧民进城，立即恢复交通运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江青等同志讲话和报纸的社论，这些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

三、要防止挑拨离间，调拨民族关系。

四、报纸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声音的。

五、如何做得好，这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还有一点要向造总同志传达的，“专打”不能定为群众组织、中央认为它是有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西藏军区任荣等人时的指示

一、拉萨两派均定为革命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批判、大联合；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民，牧民进城。凡是已经调进城的，立即劝说他们回去；

三、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立即恢复交通运输，保证交通畅通；

四、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搞破坏，挑拨民族关系、军民关系，不要上敌人的当；

五、立即出《西藏日报》电讯版，报纸要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这是天经地义的，《西藏日报》应立即出版，谁不这样做，就是对抗中央。

四、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周恩来对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的指示

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十日前要送上。西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概不超过十五号，应准备和四川同时成立。周仁山不能结合。

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张国华接见西藏两派代表的讲话

错了坚决改，要彻底平反。

在西藏有王其梅，历史上还有范明，还有惠毅然，这是走资派嘛！还有周仁山嘛！也要批倒批臭。

总的精神，西藏最迟十号要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送上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张国华接见西藏“造总”代表时的讲话

“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

“一月风暴”夺权，这大方向是对的，但条件不成熟。军区支持你们夺权，大方向也是对的。

军区与“造总”的关系，本来是好的，军区二月五日支持你们，但那个会开得不好，军区不应退出会场。在那会上群众有过头语言，过头语言不少，还有错误做法，那是不对的。军区对你们提出了是对的，你们应吸取教训。从这以后，你们和军区的关系就紧张了。你们以后又冲击军区，是两次吧！对冲击军区，军区看得过重了这也不好。

二月逆流。从西藏讲是王其梅、周仁山、惠毅然，甚至还有那一小撮。军区抓了你们的人那是不对的，

关于“专打”，中央表示了态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负责同志批了“专打”土皇帝，土皇帝指我，我并不把这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这问题说清了就行，以后不要再讲了。

西藏是在支左要作中犯了错误。三月份军区主动去和你们改善关系。

对于平反问题，军区搞得不彻底，平晚了，“四·一”指示下来就应赶快平反，而平得不彻底的可以弥补吗。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陈明义对西藏“大联指”代表的讲话

西藏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大联指”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尤其是揪出了周仁山，立了一大功，为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过去对同志们揪周仁山积极支持不够。去年七、八、九月把“大联指”内定为偏保组织 我负主要责任。对“大联指”同志们思想上、精神上都有挫伤，我作检查，是我私字作怪，关键时刻没有顶住。

西藏经过揭发、批判，阶级阵线基本上清楚了，作为西藏这样复杂的地方，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把几方面的敌人要搞清楚。

（一）十几年来，对范、白反党集团批的不够，他们的阴魂不散，几次政治斗争都有翻案。余孽还在。

（二）平措旺杰搞的东藏民青，这个窝子是国民党、帝国主义搞起来的，过去没搞清没定，现在看面很大。

(三) 已被打倒的农奴主阶级达赖、班禅集团还在心不死，他们有同主子在国外的，也有在西藏的。拉鲁的老婆也公然跳出来活动。

4、很多工作要研究，你们姿态高，今后要很好的团结“造总”的同志。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中央首长对西藏问题的指示

要注意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动向、动态。国外是大敌当前，边防可能出点事。

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对的。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各大组织里都有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抓，清理阶级队伍。要发展巩固大联合。

要立即制止武斗，停止打内战，恢复交通运输。西藏日报要联合出版，赶快出报纸，要传达中央指示。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西藏军区给西藏“造总”的公开信

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警备区部队，为了给驻财经大院驻军运送给养，保证驻军正常的战备工作，于上午进入该院。革命群众本应协助我们搞好这一工作，但该院的“造总”下属群众在少数坏人的挑拨下，对我部队开枪打手榴弹，打伤我干战数名，并毒打抓走我警备区司令员石板樵同志，还抓走我干战数名，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应立即放回石板樵同志和被抓走的我干部战士，并要立即交出凶手。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西藏军区给西藏“造总”的第二封公开信

我们在今日十六时二十五分发出致你部的公开信，经西藏军区、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反复播送，并以电话反复通知，想你们早已收听到了。可是截至现在为止，仍未见你们将非法抓去的拉萨警备区司令员石板樵同志和其他指战员送回。我们再次敦促你部立即送回石板樵同志和被抓走的干部战士，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并交出向我武装进攻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

近日来，我财经大院、大昭寺、西郊等地驻军遭到阶级敌人挑拨下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攻、辱骂、殴打，有的断粮、断水，甚至向我部队开枪射击。到现在为止，已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二十多名，抓走数名。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8. 28； 中发 [68] 136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五、”大联指”一些人抵制革命委员会、不支持军区改正错误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

“大联指”的某些同志不尊重革委会的领导，不参加革委会召集的会议是错误的，希望“大联指”的这些同志顾全大局，立即改正，否则要犯更大的错误。

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

西藏军区的“平反公告”和对大昭寺事件的处理是军区纠正自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错误，“大联指”应该支持军区纠正错误。

中央决定，将现在成都办的西藏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到北京来办。

六、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要在 1971 年实现全自治区人民公社化，同时结合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补划阶级成份，在农区调整阶级政策。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指示》原则同意《请示报告》所提出的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并对若干具体问题作出政策规定。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七、西藏的批林整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解决西藏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会后，西藏自治区负责人任荣等 6 人向中央写出《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其后，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 9 月 8 日批示及西藏自治区 6 位负责人写给中央的报告。

全区组织 6, 000 多名干部下乡，贯彻中央批示和自治区扩大会议精神。

八、十月政变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遭到摧残

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

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不努力培养本地干部并帮助他们真正当家做主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祖国各民族的民主平等团结统一），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末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要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

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对发展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调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在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纠正各种“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农牧业、财贸、文教、民族、宗教、统战等各项政策。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宗教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之间又产生了相当的隔阂。

本通知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

贰、本节简论

一、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革命群众破四旧的活动中，触动了喇嘛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可惜，这方面的具体情况缺乏资料。

二、革命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一派与军区合作，另一派与军区对立。对立的一派中有一些人成立了“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把矛头直接指向军区的负责人（张国华）。这当然得不到军区和中央的支持。军区相应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政策，因而犯了错误。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2008 年 9 月 9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30 日修改

第七章第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新疆各族群众奋起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关于《新疆日报》报社事件的电报

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

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

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给新疆大学的指示

【新疆大学“红三连”要召开“五·二七”民族大会。周总理发出紧急指示】立即研究说服不要开这个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新疆两派全体在京代表《关于坚决执行总理五月二十六日指示的联合紧急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三三五部队关于红三连召开民族大会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新疆医学院大血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畜牧厅大血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为制止乌鲁木齐市武斗给新疆军区的指示

一、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个人，要拿你们的是问！

二、给南梁地区送面粉。

新疆三促调集兵力，准备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全面包围新大、八农、新工等，企图一举打平三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夜，军区给红二司打电话，称：

- (1) 从晚十时至凌晨六时全市戒严；
- (2) 给新大“星火燎原”送面粉；
- (3) 恢复两派关于制止武斗的谈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奎屯农校武斗事件的电报

据报告，农七师农校发生严重武斗，红战团于今日攻占了红旗兵团三百余人所固守的大楼，人员下落、伤亡情况不明，请你立即指定专人，对此事进行妥善处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给新疆“红二司”电话指示

你们这几个月的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喽！这几个月我也没有管你们，也没有给区党委打电话，主要是考验你们了。目前是大联合、大批判、不要派性压倒党性了，不要走过了头，我需要提醒你们。……

你们的战友有的受了伤，有的被打死，军队做过了火。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处理这件事，要惩办凶手。……

对边境地带不能去了，有些地方是秘密的了，不能去了，是前哨。我讲的是阿尔泰，伊犁。伊犁有个副司令员，几个月没有工作了。同志，你们去的太远了，那是苏修的边界，一定要处理好，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任何地方只能是由毛主席任命的军区司令员，政委主持，不能由你们红二司主持，你们也不能做新疆第一领导人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二八”惨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周恩来关于召开国庆大会等问题给新疆的指示

- 一，都不要在人民广场开会；
- 二，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三三五部队自己开；
- 三，红二司在南门体育场开；
- 四，工农革委会等自己找地方开。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关于新疆喀什问题给七三三五部队的指示

“喀什地处边疆，是反修斗争前哨，必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要坚决贯彻《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当地的公路交通不允许任何人阻碍破坏，谁要设路卡、路障、破坏交通，要对该组织负责人查处。……你（指孟昭远同志）就代表我们中央监督他们双方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给喀什问题调查团来电指示要点

- 一、无条件开放交通，以前没有下命令，这次要给你们下命令；
- 二、八野、四野的武器立即收交，群众组织的武器由自己统一封存，今后喀什由七三三五部队负责监督；
- 三、到晨六时（北京时间）将工事全部拆除，并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志汇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哈密问题的指示

“总理指示，委托七三三五部队驻哈密××航校派出部队监督哈密铁联，红联（三促观点）于十月十四日已达成的四项协议的执行，保证哈密站运输畅通。”

“总理指示：哈密车辆厂，××厂两个工厂和工务段和机务段只能在厂内闹革命，不准到铁路线上去串连，不准在工作时间辩论，不要影响铁路运输。”

总理指示：今后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这是违背国法的。维护交通安全这是当前国家的最大利益。”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参加全国铁路会议代表的谈话中关于西北的部分

总理说：“哈密最近又有问题，车又不通了，这是怎么回事？乌鲁木齐的来了没有？”

申汇报：“这次会议，军管会没有通知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了，在七三三五部队帮助下才来到北京。我们局从五月份以来，为了抓造反派，截车、停车、罢工极为频繁。……我们在元月份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夺了我局党、政、财、文大权。三月二十日军管后宣布夺权无效，抓‘一撮反革命’，把我们压下去。后来军管会搞了第一线生产指挥部，由十五人组成，我们这一派无一人参加，从而把多一半的广大群众排除在外，剥夺了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运输。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总理激动地说：“二司在很多地方是少数，你们（指局军管会、铁联总）在很多方面压他们。压是不行的！”

申接着汇报说：“目前乌鲁木齐武斗仍在加剧，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我局二司观点的职工有一千多人被迫在外地，不能回局参加生产。从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七日，仅我们铁路职工就被打死七人，重伤残废近三十人，轻伤近百人。”

这时总理又关怀地问：“这些人现在什么地方？”

申答：“在外地，北京、西安、兰州、嘉峪关、哈密、乌鲁木齐。”

总理问：“你们组织有多少人？”

申答：“我们局在西北各省都有任务，五省都有我们组织的人，在新疆境内有四，五千人。”

总理听完后对苏静说：“乌鲁木齐局两派都不要走，留下来解决问题。”

最后总理说：“铁路是关键的企业，今年只剩下两个月了，任务很重，运输抓不上来，要影响整个建设。你们要搞大联合，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过春节以后，再把全路的同志们找来学习一次‘斗私批修’，再看看情况。”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在京学习代表时有关新疆问题讲话

总理说：哈密的情况我知道。新疆的问题我知道。你们铁路受地方影响，地方受军队影响严重啊！部队新疆军区和空军对立，兵团介入地方，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解决部队的问题，要“釜底抽薪”，“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左齐传达周恩来对新疆的指示

总理说：如果再让王恩茂上台，就等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齐谈中央文革对打倒王恩茂的意见

一、关于王恩茂，他（指中央文革同志）是用比较的方法来说的，王恩茂和上海的陈丕显比，与河南的何运洪比，与陈再道比，比的结果是王恩茂比这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恩茂两面三刀，阳奉阴违，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王恩茂必须打倒！这两天中央文革另一个同志也对我说，如果王恩茂不打倒就意味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疆的胜利。

二、打倒有几种倒法，一种是象刘邓那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一种是撤职，降低使用。另一种是调离，这都算是打倒嘛！后两种叫做圈外打倒，圈内处理。

三、王恩茂是新疆党的最大的走资派，是刘、邓在新疆的代理人，在自治区就是要打倒王恩茂、昌×才之流，在兵团就是要打倒王恩茂、张仲瀚，在新疆军区就是要打倒王恩茂、张希钦。王恩茂是自治区、军区、兵团党内走资派的总根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关于武光问题给新疆红二司的指示

总理说：北航的同学不但没有揭发，反而把武光保护起来了。现在已经由北京的专政机关把武光逮捕了。

新疆的红二司作为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对自己内部的坏人应当杀一枪，自己应动手把他揪出来罗，把黑手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关于逮捕依敏诺夫给新疆红二司的指示立即把依敏诺夫逮捕，押送军区看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周恩来接见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讲话中有关新疆问题指示

听说你们协议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武器上交给谁的问题，刚才我和铁道部军管会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室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新疆的问题我比较了解，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新疆军区嘛，主要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新疆军区出两名代表，空九军出两名代表，红二司（指铁造司）出两名代表，一、三司（指铁联总）出两名代表，共八人组成查封、收交、保管武器小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新疆铁路两派在京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并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贺电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邱会作对新疆军区党委及建设兵团党委的三点指示

〔这是元月二十七日邱会作部长在王恩茂和张希钦作完第二次检查后，对新疆军区党委、兵团党委、7335 部队党委所作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周恩来关于新疆红二司抄赛福鼎家等问题的指示总理指示说：红二司这样做是不对的。

拿走的东西都要立即一律交还，今后不能再犯。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周恩来就限期收回被抢武器对新疆军区的指示总理说：

三促最近抢枪很凶，让郭鹏同志对三促做工作，所抢的武器要限期收回，全部交回，否则要通报全国。一通报，他们就要垮台。

请军区出面谈。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建设兵团在京负责同志时的指示

总理：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主席看的材料比我们多，主席从头到尾把情况告诉我们。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生产兵团成份不纯，石河子就是有陶峙岳的人在里边，有张仲瀚的人，去的劳改犯多，有盲流，情况复杂，边境还闹事，对保卫边疆不利，才决定军管，这是主席告诉的，所以才起草了二月十一日的文件（十二条）。是你们（指丁裴等）起草的，我修改的，中央文革讨论的，主席、林副主席审定的。王、关、戚想插手，我说，这地方不一样，与青海不同。他们（指王、关、戚）经过北航红旗、红二司、王兵弄了不少材料。不然，石河子还会闹起来。你们（指孔、杜、曾、朱等四同志）不清楚，张仲瀚统治了那么多年，他在干部中搞小恩小惠。你们好象觉得对另派压得很厉害。兵团和军队一样，在本单位搞，不能和地方一样，不能到处串连。

总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短时间的，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反动路线。“十二条”是毛主席批准的。（朱：我们坚决执行“十二条”。）是啊！“十二条”是有具体规定的。工厂、农场不要进行串连，值班连队不搞“四大”，医院、学校是搞“四大”的。“八野”要解散，我给丁盛同志说过。“八野”回去时开了一个欢迎会，登了报（指六七年二月原“八野”代表由京返乌市时），我批评过他（丁）。“八野”他们有错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嘛！王恩茂同志参加这次会议（指兵团去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文革大会）招了麻烦。当时，我研究好了。分三个梯队回去，第一是军区，第二是兵团，最后剩下王恩茂、赛福鼎同志，叫他（指王恩茂）回去先到红二司去，他没有这样做，我批评了他。兵团参加了地方武斗不好。但王兵那派不对，长期住在外面，王兵他们回学校没有？小将不要过多责备，但错误应指出。

总理：文化革命已经两年了，绝对的保守组织没有了，像产业军那样的组织没有了，现在的群众组织里边都有左、中、右。生产兵团的“八野”在石河子问

题上是站在对的方面的。王兵这一派还没有完全割开，他们支持红二司是对的，但也有错误。不管对哪个造反派，不指出错误，就会唯我独左。

总理：只有共同对敌，才能搞大联合。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只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才能搞大联合。斗争的方向一定要对准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共同的基础，共同的敌人，是打击对象。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不然是假联合。

总理：兵团还有张仲瀚的余孽。在四月十一日后，我问了王震、张仲瀚怎么样？他讲：张仲瀚近几年变质了。他还讲了句公道话。我说张仲瀚是大地主，是阶级本质决定的。另外加上陶峙岳的余党，再加上盲流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劳改犯，这都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不作这个阶级分析，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兵团×××万人，要作阶级分析。陶峙岳有×万人，还有家属，有地位，有影响劳改犯人，他们也有家属，盲流××万人，有×万多人（多数是好的），有些人（因）本地生活困难一些就住外跑，真正贫下中农是爱土地的，跑去的人混进一部分地、富、反、坏、右分子。动员的上海、武汉、天津支边青年，上海尽量把工人子弟留下，把资本家的子女送去，从上海来讲，是对的，但你们那里增加了负担。当然，对支边青年要一分为二。

总理：新疆与苏联接壤。不能说一点地方民族主义没有。石河子问题发生后，主席三次说：再不能给新疆送劳改犯了。要不是“十二条”，石河子还会乱的，不管犯什么错误，整张仲瀚是对的，幸亏去年在这里开了二十多天张仲瀚的会。叶剑英不管他有什么错误，说什么错话，办了什么错事，但他协助处理兵团的问题是对的。不要光看到高楼大厦，但职工去了没有地方住，住地窝子。张仲瀚把石河子搞得很大，我一去就否定了，叫他分散。他搞石河子大城市计划，你们回去查一查，图还有，要搞几十万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

一、

我们兵团党委常委在运动中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表现在：一九六六年“九·三”参加了围攻革命小将，压制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一九六七

年七月间介入了地方武斗。在其它日常工作上也有缺点错误。对这些错误必须严肃对待，吸取教训，认真改正。

二、

张仲瀚、武光及其党羽操纵和蒙蔽部份群众，猖狂地反对《十二条》，成立“批判《十二条》委员会”，污蔑《十二条》是“大毒草”，是“反革命纲领”，追查指定《十二条》的“幕后人”，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股反革命妖风，兵团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给予了有力回击。对那些由于认识原因而违背《十二条》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批评教育。

三、

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是张仲瀚、武光及其余孽血腥镇压兵团原“八野”、“联总”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夺权的反革命事件。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仲瀚、武光及其黑后台的操纵下汽二团的“工造团”，污蔑这一事件是“武装镇压‘造反派’”、“‘一·二六’事件定性没定案”，“石河子的案我们翻定了”。这是明目张胆地跑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

兵团各级（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是领导兵团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已发挥了很大作用。对那些攻击“文革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派性文革”，以及“砸烂文革”、“踢开文革”等错误言行都要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

五、

他们操纵“xxx”死死抓住兵团党委一些错误不放，并大肆造谣，无限上纲，恶毒攻击，污蔑兵团党委“系统地、全套地、持久地、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了没有张仲瀚的张仲瀚路线”，诽谤兵团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大倒退”，等等。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制止武斗、上交武器协议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对新疆两派在京部份代表的指示

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部分代表，军内和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总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同志，早想见见大家，因为大家来这么久了。由于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学好。不能听小道消息，那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不能坐在一起谈了。这个我们有经验，所以今年就没有采取接见的办法，虽然见面少，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指示，社论，文章，标题都表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你们都看到了。你们两派来了四个多月了，看得应该很清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有五分之四，二十四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剩下了最后五个。这五个都是边疆地区，都有敌人的挑动，受敌人的影响，就联合不起来，敌人在那里高兴。台湾蒋介石就说，福建搞不起来。你们那里苏修就说，新疆搞不起来，印度反动派说西藏搞不起来，缅甸反动派说云南搞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说广西搞不起来。我们能让敌人高兴吗？能让敌人高兴吗？还是刚才那位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有自豪感，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多了，正如伯达同志讲的，我们应当学到一些本事了。胡乱闯、胡大乱、张大炮你们三个同志，我们都见过了，搞了两年多了，总应当增加不少的知识。你们造反派敢于批判王恩茂的错误，革命精神是好的，但是你们也有些错误，比如说康老讲了伊敏诺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留下的特务，你们受过他的蒙蔽，他挑动抓赛福鼎同志，你们还抄赛福鼎同志的家。

总理：赛福鼎同志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斯大林时期他与苏联合作，搞“三区革命”，解放后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与苏修、叛

徒、特务作斗争，把伊敏诺夫、包尔汉揭发出来，你们应当支持赛福鼎同志，你们反而上了伊敏诺夫的当。已处理了。

总理：你们在那里敌情是严重的，没有把敌情观念带来，苏修在边境上对新疆有一个强大的广播电台，我们正在作工作，想办法压倒它，这是思想仗，他们靠修正主义，我们靠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切都要靠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我们最近得到一些消息，看了你们一些材料，现在你们快要回去，要把毛主席指示带回去，可是你们还没有把毛主席最高指示学好。毛主席接见了没有？（答：还没有）你们正在等待主席的接见。兵团王兵与三司是一道战斗过的，也算是你们的战友，现在察觉他做了很多坏事，今天他没有来罗！兵团党委意见我们要研究罗！王兵是前车之鉴。当时，我们知道他是保张仲瀚的，受张的影响，我们打算挽救他，想把他和张仲瀚的那些打手、部长们分开，现在看来不行罗！如果在兵团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罗！你们在石河子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是受了他的影响。与自己一起战斗过的。总是会有分化，开始是革命的，以后有的人就蜕化，叛变了，倒退了。阶级斗争规律就是这样，自己要警惕，要抓大的。现在，我们要促进你们，很好地执行中央文革批示，实现革命大联合。你要在“六·二二”批示的基础上，双方要主动。特别是三促人数多，要主动，你们抢了枪应当上交，即使是对方交的少，自己也要做模范。你们交了，他们还会打你吗。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新疆两派大联合协议的批示
照发

毛泽东

新疆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七月二十八日签订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以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

总理：

只有自己揭自己的底，才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样就会走向团结。

军区龙司令员是班长，就应该维护人民解放军，不能再喊什么保王兵啦。当然，这是个别人，个别组织啦。这样，不管那派都要批评，犯了错误有几种人，有的犯了严重错误，是要改的，只有死不悔改的就打倒。要改的就帮嘛！

王恩茂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但错误是严重的。刚才说是与刘、邓、贺龙、习仲勋，叛徒是有区别的，是要改的。要允许给他机会嘛！

军区是巩固的嘛！回去会想通的，是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对毛主席的指示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军队是听号令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新疆敌人主要来自苏修、蒙修、想挑拨、破坏、但挑拨不了。广大群众是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何况有××万产业工人，只要经过教育一切都不怕的。回去后，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在新疆是没有区别的。生产建设兵团也是起了作用的，基本方向是对的。（略一段）

同志们，大局要看清，主要的来自修正主义、民族败类、民族分裂、里通外国分子、反动派、美帝属于一类。内部还有反动军官、暗藏特务、要作工作，要肃清，清理阶级队伍。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要挖出来嘛！加以清理。这是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要忘记这么三条黑线，双方都要抓出来。要抓住大的，不要抓住小的不放，把三条黑线忘记了。要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因此，回去——今天三十号了，你们回去不睡觉搞他两天死不了，搞大联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搞大联合，怎么把各个工厂联合起来。地方，如塔城、伊犁、都要做工作。不然白纸黑字，达成了实现不了。不能口是心非，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也是二心。王恩茂犯了错误，江青同志批评他，他还对你们讲了，没瞒你们，因此他这个检查不打算公开发表，一发表，说不定苏修拿去。王恩茂还不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

三、中央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经过与各方面充分协商和党委集体讨论，现将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具体意见报告如下：

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名额定为一百五十名，除留预备名额二十名外，暂按一百三十名分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八十三名（内工人代表三十九名，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代表二十二名，学生代表二十二名），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八；革命领导干部二十五名，占百分之十九点二；军队代表二十二名，占百分之十六点九。在目前已选出的委员中，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三十，妇女占百分之十。

二、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四十三人组成，除留预备名额六名外，暂按三十七名分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十七名（暂缺一），革命领导干部十名（暂缺三名），军队代表十名。

三、革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十二人。建议龙书金同志为主任，王恩茂、赛福鼎、郭鹏、裴周玉、李全春、杨立业、胡良才、孜牙、吴巨轮等九名同志为副主任（暂缺三名待补）。

四、革委会的工作机构，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工作人员暂订为一百二十名左右。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9.01； 中发 [68] 137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名单，批准由龙书金同志任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缺副主任三人待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

江青同志宣读中央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总理讲话：

现在讲一下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第二个问题，就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首先就要实现归口闹革命，迎接斗、批、改的新高潮。

第三个问题：就是民族团结，军民团结。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给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赛福鼎同志前几年在工作中确有严重错误，但最近几年有改正，有进步。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同志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民族团结，防止苏联修正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拨利用。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的批示

四、关于新疆的几项改革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疆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前进——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改革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兵团所属各企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

五、政变后的的若干改变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 1970 年在牧区划定的阶级成份应予推倒，不予承认。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

一九八一年二月，王震视察新疆后，提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

邓小平在建议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贰、本节简论

新疆地处边疆，情况十分复杂，中央处理新疆问题非常慎重。

二、对领导干部的处理有一个认识过程，从一时一事来看，不一定准确，如武光问题。历史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开始审查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谢良、杨之华、刘护平、李云扬、吉合同志等一百多人，于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后自首叛变问题。

康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这些人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这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这个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毫无根据地把这一大批革命同志打成了叛徒，而且把矛头指向曾代表党中央营救这批同志出狱的周恩来同志。

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方面把有关这些同志在狱中对敌英勇斗争的证据材料不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大搞逼供信，制造假材料。在审查中，他们采取法西斯手段，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致使马明方、杨之华等二十多位同志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新疆马明方案”（也称“四三专案”）进行了调查核实。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将中央专案三办《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遵照办理。

十月政变后，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称：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为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捏造罪名，颠倒是非等等，也是为了借机生事，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

2008年9月15日初稿

2011年12月2日修改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壹、本节概述

一、中央有关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对夺权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知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地方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二、中央批准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及中央报刊社论

1，上海市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2，山西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3，贵州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西南的春雷》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4，黑龙江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5，山东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6，北京市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7，青海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8，内蒙古自治区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9，天津市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10，江西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1，甘肃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 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2, 河南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3, 河北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4, 湖北省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

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5，广东省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6，吉林省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7，江苏省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8, 浙江省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19, 湖南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21, 安徽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2, 陕西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3, 辽宁省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4, 四川省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5, 云南省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6，福建省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7，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28，西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三、庆祝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江青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

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在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七月二十七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人民解放军做后盾。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愿意革命的教职员工应该欢迎，服从领导。不允许少数个别坏人刁难，要把这些坏人破坏斗、批、改的家伙揪出来。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本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这一篇按语。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斗、批、改，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很多的。我们还会遇上许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自从去年一月上海工人阶级首创夺取走资派的权的“一月风暴”到现在，整

整的二十个月了。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鼓掌）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

同时，我们大家也要紧紧地记住，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外还有一个台湾省没有解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彻底地把那些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各地、各单位的代理人斗臭、斗倒，并且要在我们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下，清理各个单位的阶级队伍，把那些坏人揪出来。要继续地批判一切反动的思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一些反动的学术权威、技术权威，等等。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精简的人员到基层去，到生产中去。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应该号召全国的革命人民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所以，现在开始组织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有配合地进入到各学校去，促进那个地方没有联合起来的革命大联合，同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教职员工中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个里头的斗、批、改。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把自己逐步地、不断地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按照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

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八年九月初，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标志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一阶段、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胜利果实之一，是批判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胜利果实之二，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它在各省市的代理人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胜利果实之三，是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复辟、反腐败的教育。

胜利果实之四，是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大民主、大造反的锻炼。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经过党的领导和伟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才取得的。

革命动力之一，是有一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路线以及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最根本的。

革命动力之二，是具有极高革命热情的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集体农民是革命的强大后盾。

革命动力之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保卫力量。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和保卫，要开展这样大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的。

革命动力之四，是广大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经过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先后参加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行列，并在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经过冲破各种阻力才取得的。

阻力之一，是各种反动势力的活动，如一些反动残余分子混入各种造反组织，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各种打、砸、抢活动，迫害、杀戮干部和群众，甚至企图乘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阻力之二，是右倾翻案势力的活动，如“联动”活动、二月逆流、杨成武翻案活动等等。

阻力之三，是左倾盲动势力的活动，如“五·一六兵团”的反周活动、“揪军内一小撮”活动、“反复旧”活动等等。

阻力之四，是各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扰，如山头主义。

四、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党中央的部署，在取得第一战役的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在各单位深入进行斗批改。

那种认为，第一战役取得胜利了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那种认为，由各种群众组织在社会上跨行业地自由串联、到处冲击领导机关、各种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进行武斗、枪战的活动停止了，就等于是群众运动结束了、红卫兵运动走下政治舞台了。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2008 年 9 月 1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 日修改

第八章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壹、本节概述

一、整顿党的组织，征求修改党章意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九大”问题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

1967.10.21；中发〔67〕322号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两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此件可发给连队党支部和地方相应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刺、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这是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生谈准备中共“九大”新党纲

当前是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很及时地提出了党的问题。党的问题有二，一是关于九大问题，一是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准备九大和整顿党的组织是分不开的，和大批判、斗批改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九大最好的准备，最好的整党，对干部也是最好的审查。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去准备九大，整顿组织也不是孤立的。整党是文化大革命中主席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主席发扬了最大的民主。把“九大”如何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过去准备大会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我们的党，关心我们的大会。各地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要受过去旧的框框的约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设想这个问题。

“九大”是不是没有准备，开得过早？好象有些地方还乱着，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还没有整顿党的组织，我看事情不是这样。整个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历次大会也没有这么好的准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我们考虑准备这样搞：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组，由这十人负责修改。这项工作由我（即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三人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现在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总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

三、修改小组不派人去，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

当前要抓住“九大”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孤立起来，要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要与恢复党组织生活结合起来，这是不容易的，有斗争，有人会“左”，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有些人就不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也有些党员尾巴翘得高高的，怎么样，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还要听我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党的生活恢复以后，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不能马上行使领导，等到吸收一些造反派参加党以后，才能起领导作用。它不能领导革命委员会，只是教育党员，辅助革命委员会的作用。

对党员有三种情况：

（1）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在过渡时期挂着，不是活挂，是死挂，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再做领导工作。

（2）历史问题弄不清楚的，暂时不让过组织生活，弄清了就可以过了，但有问题的就死挂了。

(3) 不起作用的党员，不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连一个群众都不如，不够条件的要劝说出党。可以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成立临时党支部，可以吸收党员。由党员核心和军管会讨论批准，党员讨论通过以后，经过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下达后，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致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远见，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许多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和讨论。现将征询的第一批反映通报如下，望各地继续征求意见，上报中央：

(一)大家提出，“九大”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历史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修改党纲，党章，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选举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委员会。

许多同志迫切希望，召开“九大”前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纲要；修增出版新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要指示补上，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二）要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章党纲，彻底批判和肃清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流毒。“八大”的党纲，党章和刘邓在“八大”的报告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体现时代的特点，存在着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必须彻底加以批判。“九大”的新党纲、党章，一定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贯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红线，一定要充分反映毛主席在党的建设方面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九大”应该成为党的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有些同志建议中央现在就成立新党纲、党章起草委员会，在“九大”召开前，把党纲党章草案发给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讨论。

（三）建议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我们党从建立以来，一直就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规模更加壮阔，斗争更加深入，意义更加重大。“九大”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加以总结。要编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材料，要编印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用以教育党员和干部，帮助大家正确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毛主席在我党建设上的伟大光辉作用。有的同志建议中央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代替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建议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以保证党的纯洁性，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有的同志说：“恢复党组织”的口号不妥，“改造党组织”的口号也不妥，叫“整顿党组织”比较合适。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有的建议“九大”以前进行，可以同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有的认为等“九大”开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再进行整顿较好。

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根据中央指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要作自我批评。要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审查党员，为召开“九大”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讨论中普遍建议，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发展一批，清洗一批。把那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革命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入党，以增加党的新血液。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

不少同志很关心共青团的问题，希望“九大”就此作出决定。

（五）建议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要老、中、少三结合，名额应比“八大”多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才能的新生力量应选入中央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再当中央委员。如果中央委员会要留“反面教员”的话，第一，“只能很少很少”，第二，必须是“认罪好改造好的”。“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王明之流绝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政治局特别是常委中，不能有反面教员”。同志们表示，要不要留反面教员，毛主席会考虑，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

（六）关于“九大”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提出如形势发展快，可以明年上半年开。

（七）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规模要大，人数要多，“开个万人大会，坐满人大大会堂”。代表中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老、中、少三结合。要多选一些部队、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的代表参加大会。

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能不能选为代表？一致认为不能选。“要让这些人当代表，下面百分之百通不过”。“对这些人不是选不选他们当代表的问题，而是讨论对他们进行处理，把他们清除出党的问题”。王明是特务、叛国分子、死不悔改，不仅不能当代表，而且应开除党籍、国籍。

代表产生的办法，多数同志主张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各方协商的方法产生。中央了解的，由中央提名，交下面讨论通过；中央不很清楚的可与地方协商，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产生；部队系统由于党的生活一直保持正常，

仍可采取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有一条原则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一定要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党员当代表。

（八）关于大会的开法，多数同志认为采取由上往下开的办法较好。先开“九大”，制定新党纲、党章，再开各级党代表大会，这样，“上面有纲领，下面有方向”，“可以保证地方党代表大会的质量”。

（九）大家提出，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党和国家相同的机构可以合并。层次重迭、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改变。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一定要精干，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反修防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楚，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

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

康生讲话：

第一，恢复和整顿党组织要走群众路线的。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二，恢复什么党，建什么党？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健康的，可能有少数会翘尾巴，要作好思想工作，要办学习班，抓活思想，抓斗私批修，要结合起来搞。

三、什么人可以恢复，什么人不可以恢复，或者暂时不可以恢复？如主席指示所说的，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决不可恢复，如果怀疑历史有问题的，要缓一下，了解清楚了再说。

四、什么人可以入党？恢复与发展必须结合起来。

五、党组到底和革委会关系是什么？有人说要突出领导，大多数人说要过渡。

六、恢复了干什么？恢复了也要搞斗私批修，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斗批改，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逐渐过党的生活。不能变成刘少奇黑修养的，听话的，要成为真正有革命朝气的队伍。

七、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有人认为工人农民中红卫兵少，或者根本没有，主张恢复团。红卫兵有的说可以存在，有的说可以不存在了。

所有这些问题，请你们讨论，本着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讨论一下，搞个报告。

周总理讲话：

我们有些不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与工人接触大大少于大中学生。第一张大字报出来时，学生起来快，需要学生点火一下。后来工人起来了。到打硬仗，搞大批判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行了。大中小学的来了，要好好向工人学习。

大联合问题，要斗私批修，制止武斗，封存武器，这样就要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造反派。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联合，但都需要从学习开始，首先要斗私批修。北京现在工厂走在前面了。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工人应起带头作用。在学生方面，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就是慢，不是说学生没进步，红卫兵我支持你们，应好好向工人学习，只有靠本单位群众，才能搞好。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现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发下，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元旦以前将意见报告中央，以便再作修改。

（发至县团级）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党中央《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下达后，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映很激烈。一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指示非常及时，非常英明，是对广大党员的最大爱护和关怀，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一）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

同志们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绝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而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把我党建设成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所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原则。

（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

在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党员和非党员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同志们建议：

（1）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解决思想问题。

（2）广泛发动群众讨论，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改善党群关系，彻底打消党员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怕党员报复的思想。（3）有的党员犯了错误，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三）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多数同志认为，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也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是什么：

综合大家的主要建议如下：

(1) 建议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吸收新党员，注意阶级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现，看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 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

(3) 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彻底批判吸收党员只根据什么“听话”、“生产好”、“业务好”等等，而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革命大节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4) 目前有一批预备党员未转正，有的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

清除党员根据什么原则：

(1) 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

(2) 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3) 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4) 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 有些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开除出去，不符上述条件的，经过教育，并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应恢复其党籍。

(四) 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

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核心小组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的办法产生，并报上级审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1）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2）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3）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

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修改党纲党章的热烈讨论，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破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成为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的思想基础。

中央认为：凡条件可能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都应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并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以前将修改草案上报中央。目前还不可能全面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也可组织一些力量作重点调查研究。

这是“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望你们接到通知后，认真讨论，并将你们的部署电告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谈中央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批语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 100 多人就够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 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 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 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
-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林，周及文革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二、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数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

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四十位，补选十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勋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中央委员原来是九十七人，现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能出席的还有九位候补中央委员。

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文革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参加碰头会成员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出席这大大小小的一共十二人。

再次，军委办事组的六位同志：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出席这次会议。

这次出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现在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与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共五十二人。

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一个人。有的大军区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别的任务，也就没再来人。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只出席九位同志。

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轶欧同志、郭玉峰同志。

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共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

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

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

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

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 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 3”、“7. 24”

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 22 年，从 1927 年到 1949 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 21 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

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

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

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

（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麼讲的。）

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 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 14”；七机部有“9. 15”、“9. 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 1. 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

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

（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翻）。“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文元同志：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富治同志：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同志：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

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十月五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同志：十月一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连“西纠”的九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文元同志：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富治同志：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同志：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富治同志：“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

〔时间：下旬。此为传达周恩来讲的话，夹有传达者的话。〕

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

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3、“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4、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5、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刘少奇、陶铸也支持肖望东。

6、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7、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

8、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9、许立群（总政付主任、干部部付部长一抄者注：似误。许为原中宣部副部长）的问题已经揭开，但叶剑英不报告中央，许立群说生病了，叶就想办法让他住进医院，保护起来。

10、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力量不足，和地方上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冲。以后发展到

全国冲军区（8月7日冲沈阳军区，占领了军区大楼，8月8日冲广州、福州、成都、济南等十多个军区）。他们倒打一把，说中央文革搞的。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说中央文革不出来讲话。

11、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12、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13、67年1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意。

14、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15、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当时总理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16、“上方宝剑”问题，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

17、不听毛主席的告诫，毛主席在二月十四日亲自找他们讲过：中央文革是正确的。但他们在二月十六日还大闹怀仁堂。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又批评了他们，严肃地指出：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但是他们还是不听，六六年十月高干会议上就打招呼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但是执行又是一回事。”是给他们打招呼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是世界观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18、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一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浙江军区张学伦的儿子领着省军区、省委、人委的高干子女组成一个连，到处抓人、打人。

中央要他把他的儿子送来，他不送来，给粟裕要电话，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没理他。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徐鲁滨已经结婚，结果男人是大资本家的儿子，要她离婚，她和另一个要好的一齐要逃往香港，从广州把他们捉回来了。

19、四川捉人问题。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20、2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地指出他们的严重错误后，又开生活会，他们毫无无产阶级感情，只有一个人说：看样子要检查，元帅、副总理都是如此。

21、赵永夫事件。赵永夫是付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二十三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付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22、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23、军以上干部会不对头。林付主席于三月二十日作了报告，就是制止他们，指出：“不要提带枪的刘邓路线”，以后怕坏人钻空子，就把这段去掉了。不是林付主席指出，还有许多军以上干部借对“八条”的错误理解，犯镇压群众的错误。是谁在保护老干部？

24、叶群同志有一次听叶剑英说：“从来没有见过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诅咒战争的。”他把群众当成敌人，自己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

25、他们镇压群众后，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坐几昼夜，要找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了。”

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同志去作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事，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是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

26、聂荣臻同志不但对 9·13，9·10 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

27、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28、“多中心论”是聂荣臻搞的，开“学代会”（抄者注：应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选代表，硬要有一条拥护聂的方能当代表。

“9·16”是反聂的，因此都不能当代表。总理发现了这件事，认为不对，要他们纠正，又补选了四十个，其中只有“9·16”的两个，而且这两个也是“9·16”中的“9·15”。以后两派打得没办法，总理为此事专门开会解决，又选了一些进去。但聂仍旧压“9·16”，聂说选举不知道，聂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党委发出的通知他怎么不知道。

研究体制，他弄个×委，十八个院，160 多个研究所，300 多万人，还要把过去合并的研究院、所拿回来。他还把南昌的两个五万人的轻机厂，不经总理批准，也不报告总理，自作主张地改做了试验工厂，还假造是林付主席批准的。这两个工厂一个开了庆祝会，一个工厂把生产改为试验线了。他还派人到处挖墙脚，青年人就是愿意归科委，因为这样就成了解放军。老工人有家口，就不愿意动，闹得思想混乱。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9、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

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30、总理讲，小组会大家对他们的检查很不满意，他们无所表示。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

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

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 1927 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

水每月只给 24 元，最多的给 40 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在别的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

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荣国、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物?]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 20 元，多的 40 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

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洗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洗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洗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52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

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1968. 10. 31；中发 [68] 152 号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于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份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

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

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担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份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脱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

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乾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提议，将这个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这个草案，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比较简明扼要，基本上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全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然后，由中央根据讨论的意见，作出修改，提交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领导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讨论。这次讨论，应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结合起来，成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强大动力。

对这个草案的意见，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分别集中整理，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底，十二月中，分两次报告中央。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四、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有关传达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

1968. 11. 12；中发 [68] 156 号

毛主席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二日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九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和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

附件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

附件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告

一九六九年一月，毛泽东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贰、本节简论

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为九大作准备，代表的产生、政治报告的起草、党章的修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等等。

二、八届十二全会的小组会上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右倾思潮的批判。这并不是什么由于少数人搞阴谋故意整人。首先是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一九六八年四月，刚刚处理完杨成武事件，这件事显示出在党内、在高层，确实存在着有一股右倾翻案、右倾分裂的势力和思潮。同时，在一些省市又发生了所谓反复旧的风潮，其矛头是对着新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其次是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大会的需要。尤其是即将在九大上新产生的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统一。

三、关于刘少奇的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这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指出：

“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这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

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

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第 26 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

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一九六七年五月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刘、邓、陶及其同夥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讲话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这个工作必须持续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在北京市代理人彭真、刘仁是一伙叛徒、特务，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坏人，许多单位的坏人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下隐藏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要搞彻底，必须紧紧结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们的代理人。不要光看着本单位的几个坏人，这样就可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对准被这些家伙包庇下来的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

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指出：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二）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1，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根据杨剑雄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风+“扬”右侧）、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搞乱。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

作为刘少奇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确实是不足的。但还有刘作衡（刘少奇的胞兄）的亲笔供词证明：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第二，但为什么刘少奇要刻意回避与杨剑雄的关系呢？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说：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

而事实却是：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时，杨剑雄去看守所会见了刘少奇，后来又根据刘少奇的要求在长沙刘少奇的居处会见了他的妻子何葆珍。刘少奇与出狱后与何一道到杨剑雄的家里表示感谢。

一九二七年正月，杨剑雄又在武汉会见过刘少奇。

杨少岩证明：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杨剑雄供词称：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剑雄给刘少奇的信。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此信证明，解放后刘少奇还知道杨雄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作衡交代：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难道说这就是刘少奇说的：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吗？他这样说究竟是企图隐瞒什么呢？

2，关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内奸活动”问题

关于刘少奇在武汉时期充当内奸活动的证明材料，主要是由丁觉群、董锄平、成柱周等人在一九六七、六八年提供的。据说，后来这些人又有翻供的表现。

这个问题只能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吧！

3，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这个案子证明人比较多，其中：

孟用潜，他原来供认刘少奇和他自己都自首叛变，后来又翻供了。

丁基实，他提供的是听别人说的材料，后来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助理技师，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徐廉奎，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庶务主任，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陈元祯，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警察，原来提供在工厂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庆云，一九二九年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提供省会公安局白局长谈刘少奇一案的一些情况证明。

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原来提供审讯情况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刘多荃，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原来提供张学良处理这个案件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徐廉奎、关庆云三人在复查时已病死，如果不死，他们肯定也会翻供的。如果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可以把假说成真；同样，这些人在复查中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也可以把真说成假。

仅有口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真凭实据。

第二，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当时刘少奇一案究竟是一个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还是与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

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

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

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

刘少奇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敌人的满洲日报，中共满洲省委两个报告均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说明：敌人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不是一般的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

一九五二年以前，刘少奇在自己的简历中也明确承认是“被一叛徒出卖”，为什么到了一九五二年又要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呢？

刘少奇自己很清楚；如果是“被一叛徒出卖”，那就是一桩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且有人证物证，敌人就不可能轻易地把他们放出来；如果是“在罢工中”被捕，敌人又“找不出证据”，那就是一桩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拘留一、二十天就可以放出来了。

那么，这两种不同说法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

第八章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

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

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分组情况如下：

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 80 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

交流彼此经验，总结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共六个大组。

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共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三部分。

这个报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一百七十六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

第一、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也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 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63军政治部付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么！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象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

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拔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二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日，毛泽东召见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更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

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26年，27年，28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1927年12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1929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

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底到28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1930年6月到8月。三次是王明路线，31年到35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50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AB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AB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

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 28 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28 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28 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一千多人，他们自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28 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 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

（总理：毛选一卷 37.5.3 和 37.5.7 两篇文章。）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 1927 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 1938 年。

（总理：可学主席 1937 年 11.12 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1942 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

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垮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

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捉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 400 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尿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1968 年 7 月 27 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 22 万万元，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

的讲话

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

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开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六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干，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由，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能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末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象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翻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尿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函、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九大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康老建议学习《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

还有一个文件，在延安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报告，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讲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那时候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过去几十年翻来复去犯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河南李维汉只讲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那时候一种倾向，既然同国民党联合，就不同他们进行斗争。同国民党斗争是不行的。如武汉那时候，我离开武汉去长沙，当时刘少奇、项英，只要联合，否认斗争。所以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就是蒋介石。汪精卫倒向反动阶级，也是倒下来的。党内也有被群众运动吓坏了，就是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后城市呆不住，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的一个矛盾。国共合作时掩盖的矛盾就突出来了。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国共合作。但这股风也有另外一股风，就是不要独立自主，发动群众，掩盖阶级斗争。现在反苏修不要掩盖苏联的广大工人、农民，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好坏都反了，经过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了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是坏人，一种是劳动人民，是好人。南昌暴动，召开“八·七会

议”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主要是“左”的错误。有些中间流派，可以联合也不联合。城市的小作坊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瞿秋白、李立三没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是不成事的。最大三次，一次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一次是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

彭德怀、高、饶也都是局部的，他不以党中央的正确不正确，而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罗章龙就是湖南人。我对此人相当熟悉。也搞中央，不晓得为什么另立中央。不管当时中央有什么不好，有话可讲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吗？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张国焘我认识他比较早，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前在长辛店搞过工人运动。搞职工夜校，他当校长。1918年我就与他发生关系。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搞国共合作，他坚决反对，他不到会。

土地革命时，犯右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主观打倒资本家，平分土地，可以过得去。六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搞人口平分地。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是犯错误的，经过中央苏区斗争的，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时帮过忙的。有个时候红卫兵贴他们的大字报，现在选他们进中央委员困难，其实和朱德、陈毅差不多。有人说朱德、陈毅反了……几十年其实也有时不反的。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是想夺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上海中央请示。中央批评是极端民主化。后来请我回军队了，我又不是复辟了吗？项英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来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我们这些人是右派。

一个时期项英没有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吸取了教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情，不能不利用他，不能不限制他，不能不改造他。他们要反限制。有的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有的就反对，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众中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机放毒，大闹一切。我看这样都无关大局。是指武斗。有的武斗几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象军队稳不住了，其实不然。军队有两派，野战军、地方军各支一派。如保定、浙江、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如此。这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

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了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过去搞武斗，现在应该联合，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那末记仇。

看有些干部，叫他犯错误检查了没有事。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抓住不放，譬如杨勇。当然他有错误。是哪个下的命令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是个老师下的命令，他们大闹一场，还强加于中央文革。）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

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把政策落实，一年左右，自己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所有工宣队、军队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工人阶级压倒一切。你反军代表，就说人家反解放军。其实是几个学生说几句话。反工宣队就说人家反工人阶级。这些话不要这样提，反一下不要紧，要作工作。大多数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街上贴几条标语就倒了，风一吹就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张春桥，有人要打倒张国华。打了半天，今年还在这里来开会。现在打的那一派比拥护的那一派还好一些。

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是形“左”实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关、卡、扣、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不是全部没有解决，是相当一部分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

今天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风英、孙玉国、纪登奎九个同志报名要发言。

还有谁要发言？谁发言就报名（等了一会，没人报名）先周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先通过，后发言）不发言谁晓得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同志们：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表示决心，并且坚决相信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一定能够实现。

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扼要地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斗任务，他在报告中，恰当地给予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应有的评价。在

分组讨论中大家公认，林彪同志这一报告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会议以后，在他的指导下，在 1961 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 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形成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它的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 1966 年 8 月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 年 10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 年 12 月的工业会议，1967 年 3 月军以上干部会议，1968 年 3 月 24 日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 年 10 月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主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地批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这些讲话，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战斗号令。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斗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大有利于人民的，而不利于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伯达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康生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1967年11月毛主席提出由党的基层组织参加修改起草党章。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30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讨论和修改，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教育运动。

1967年，毛主席把起草修改党章的光荣任务，首先交给上海党组的同志们，196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修改党章的经验，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开展了。全国各地综合整理上报的修改草案就有126份。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又在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广泛深入的讨论，集中整理上报的讨论情况和建议就有172件。还有大批人民来信。中央、中央文革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进行了修改。经过四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根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将新党章草案提交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党章草案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首先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深、用得最好、执行最坚决。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

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遵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第三，新党章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新党章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第五，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单扼要。

毛泽东在康生发言后说“怎么办？你们都是分秒必争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黄永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对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特别要做好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准备敌人大打。既要准备敌人打常规战争，又要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必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近，苏修入侵我珍宝岛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世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王洪文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永贵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孙玉国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的一个边防站的付站长，65年入伍。三月十五日他在付营长负伤后，代理付营长指挥，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他一上台，朝毛主席敬礼。毛主席站了起来，招手致意，孙玉国发言中间，毛主席数次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成员都鼓掌，微笑。

毛主席问旁边的人：他今年多大了？

然后又问孙玉国：你今年多大了？三十？（答：29岁）

哪里人啊？（答：辽宁的）

噢东北人。老家在哪里？（答：河北）

打过仗没有？（答：没有）

毛主席开始向大家：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王字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不用飞机、不用坦克、不用指挥车。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付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付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苏联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三月十五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五百米我们不打，三百米不打，一百米还不打。五十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不管用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回头看，

没有。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黄站起来）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说还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准备打仗，要做准备，各省都要能生产武器。主要是精神准备，新疆那里也可能要出点事。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

毛主席说：下面请尉风英同志发言，还是辽宁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尉风英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毛主席说：还有一个纪登奎同志发言。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是山西的，在河南受了点灾难。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纪登奎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林彪在九大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

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他对毛主席的这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现在这样的地位，那中国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那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红色的中国。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这样强盛的国家，而能影响全世界，诸种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的英明的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前前后后我比来比去，我那时候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

席他很高明，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肯定地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二十八年开到鄂豫皖去的……）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那种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发言完后）

毛主席说：还有谁发言？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了。这还是少数。下面先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赞成的举手。

（毛主席也举手，看一看。）

有希望噢，大概是多数，通过。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毛主席举手，看看）

也有希望噢，多数，通过。

（然后毛主席宣布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二、代表大会的第二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

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

这次会议把候选人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
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三、九届一中全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

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有十二人继续当选。

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

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

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

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机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是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

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的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讲话。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四、贯彻九大精神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康生在中央召开的整党建党会议上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

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甚至强调，好象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才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五十字”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不要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路线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

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

“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

“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

“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一些问题，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能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

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路线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那些各式各样的所谓造反派来领导整党？我们的整党是开门的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

第二个问题，“九大”通过的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个特点，是明确了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

第五个特点，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的两次讲话的通知

1969.05.09；中发 [69] 21 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康生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讲话

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看有主要有两个倾向：

一，扩大化。各地不同程度都有。个别地方还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正在纠正。这是一种倾向。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

二，最近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个别群众组织的头头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思想，认为他是造反派，只能清别人，不能让别人清自己。他们对造反派不加阶级分析，不以一分为二方法看问题。造反派中间也混进了坏人嘛。“七·二七”进清华（大学），有个宛长福（注：贵州“四·一一”派的）就丢了四个手榴弹。说明造反派中有坏人。……一个是抗拒在造反派中间，革命队伍中间清坏人，一个是矛头指向解放军、军管会。这情况山东正在纠正，武汉也在纠正，河南也有，四川也有。完全是干扰毛主席的大方向。实际上是干扰“九大”的传达和落实各项政策。

这两点都要注意。防止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专案干部特别要注意。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组织头头要特别进行教育。

第二个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主席指出，不但整党员，而且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里的问题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

有的地方作得好，向群众开门，不是形式上的，不是敷衍。另一种不敢让群众参加，，关门，半开半闭。所以整党问题中，四月二十八日的教导特别值得注意。整党一定要搞，但要小心谨慎，粗枝大叶就要犯错误。

陈伯达讲话（略）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解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应当怎样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当前还有一种论调，有的地方流行所谓“反复旧”，昨天简单地讲了一下。山东开始的。据我晓得的，北京一些学校、一些单位收到过十一月十七日青岛杨宝华同志的讲话，提出了“反复旧”问题。这个讲话，散布到各地方。福建、浙江、武汉、河南、兰州、重庆、成都，都散发了，错误地提出了“反复旧”问题。

同中央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提的反复旧问题完全相反的。武汉说是“全面复旧”。甚至说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掌权”。因此，错误地讲“无产阶级要再夺权”，“二次革命”。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们把这种“再夺权”叫作“实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歪曲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反对林付主席的报告，反对“九大”的方针。他们打着旗号，说什么他们是“继续革命”，这样来了解继续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有的同志问：政治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怎样理解？

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的水平，农村很分散、很落后，那么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让资本主义很好地发展。按这个理论，社会发展指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新社会制度就自然产生，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然到来；生产力不发展，革命阶级自觉革命没有用。

这种“理论”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套“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七·二七”事件？

“七·二七”，即 1968. 7. 27—7. 28，毛主席接见北京红代会的五大领袖，提出了这一伟大战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问题，开展斗、批、改新阶段问题，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这是有伟大意义的事。

第四，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是不是就是最后胜利？

现在有曲解。这种曲解说：主席不能说最后胜利，因此“反复旧”的人完全否定三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歪曲主席的话，利用主席的马列主义的语言，破坏革命，否认成绩，把红色政权还认为是“资本主义”。当然一些工厂、学校，机关还存在些问题，工宣队，军宣队工作中有缺点，斗、批、改的任务还没完，这是一方面，但如果歪曲主席的话，全盘否定三年伟大成就，那是完全错误的，形式上“左”，实际才真是复旧的……。

贰、本节简论

一、《历史决议》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这就是说，《历史决议》也承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经过党的九大批准，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它站在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说九大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胡绳的《七十年》说：“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并不成熟”。“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九大的政治报告，“贯串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确立的特定的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第 428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说：“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他们都说对了：贯串九大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九大使这个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了九大的政治路线。

二、九大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政治报告》

（一）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性质和特点

1, 必然性：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

2, 性质：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3, 特点：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二）阐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

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三）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下个阶段的任务、方针和政策

1, “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2, 党的整顿和建设

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整党建党的根本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三、九大的十分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一）中央机构中吸收了一大批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和群众代表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一些左派领导干部
在中央委员会中有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等一大批工、农、兵群众代表

代表

（二）中央机构中也吸收了一些在文革中改正错误较好的领导干部

如陈锡联 纪登奎 李雪峰

（三）中央机构中保留了一大批从历次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干部

如叶剑英 刘伯承 朱 德 李德生 许世友 李先念 董必武等等

（四）中央机构中也开始出现带有宗派性质的林彪小集团

如 叶 群 李作鹏 吴法宪 邱会作 黄永胜等等

2008 年 10 月 1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15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三篇

全一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目录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目录

概 述	5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73
第一节 九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73
第二节 继续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87
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123
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活动	149
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160
第六节 整党建党	194
第七节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203
第八节 教育革命	217
第九节 改革旧的规章制度	241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257
第一节 一九七〇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257
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285
第三节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304
第四节 林彪突然袭击 毛泽东反潮流	322
第三章 批陈整风	366
第一节 一九七一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366
第二节 吴法宪叶群的检讨	383
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397
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410
第五节 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430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449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449
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464
第五章 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	484
第一节 毛泽东巡视武昌	484
第二节 毛泽东巡视长沙	496
第三节 毛泽东巡视南昌	516
第四节 毛泽东巡视杭州	522
第五节 毛泽东巡视上海	531
第六节 毛泽东回到北京	536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覆灭	540
第一节 林彪等人叛逃	540
第二节 揭批林彪集团罪行	554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569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开展中美谈判	569
第二节 基辛格访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587
第三节 尼克松访华	598
第四节 中日恢复邦交	609
第八章 批林整风	626
第一节 一九七二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626
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637
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703
第四节 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712
第九章 召开十大	716

第一节	一九七三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716
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723
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737
第四节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747
第五节	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	760
第六节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768
第七节	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	784
第八节	评法批儒	798
第九节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802
第十章	批林批孔	809
第一节	新阶段新任务	809
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826
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859
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906
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925
第六节	筹备四届人大	930
第七节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	951

2012年8月14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概述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概述

第三篇是概述简论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〇年七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逐步向进行斗、批、改的工作过渡。

（一）就是要解决几个省的反复旧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有几个省的所谓反复旧闹得比较厉害，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分歧和斗争。其中以山东省、湖北省尤为突出。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严肃批评、处理了主张、支持反复旧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但是，一般处理过重，甚至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山东省的王效禹，湖北省的“北决扬”，贵州省的李，四川省的刘洁挺、张西挺，湖南省的章伯钧、梁春阳，等等。

（二）要继续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从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清队工作中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要注意政策。九大以后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但各地违反政策的事仍时有发生。

（三）开展“一打三反”。为了处理前一阶段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当时中苏边境危机，作好打仗的准备，一九七〇年一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活动，二月指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在打击反革命的运动中，处理了一批反革命案件，其中涉及到一些犯政治错误的人，打击过重了。还处理了一些文革中杀人、打死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有些地方对造反派中有人犯此类案子，处理特别重。如武汉新一冶工安公司的徐正全，是该公司造反派的头头，因几个人殴打百万雄狮武斗队工人王荣炎

致死，他在现场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

（四）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始于一九六七年年，一九六八年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小组。一九六九年以后几起几落：

第一次是高潮，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〇年一月

一九六九年因群众来信反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批示：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周总理、江青、谢富治等人作了指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提出：“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第二次是低潮，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〇年十月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以后清理五一六进入低潮。

第三次又是高潮，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九日、十八日、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这次高潮一直搞到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二月。

第四次是低潮但不是结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以后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泽东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清查五一六运动究竟结束于何时？不知道。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究竟清查出了多少真正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知道。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一九六九年以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作用就是从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了革命造反组织的骨干力量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大大地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第二阶段：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四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一）与林彪的斗争由来已久，“杨傅余事件”是林彪形成集团开始向党进攻的标志

1，所谓“杨傅余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杨成武的问题。

毛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和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彪说：“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

事实上是，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涉足军队，决心放弃杨。

林彪之所以“弃杨留吴”是他认为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林彪认为：，杨成武对他耍了两面派——既归依自己，又讨好江青（不便直接说毛泽东），竟敢以江青来压自己！他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2，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推荐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4，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〇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5，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6，在九大选举中委时安排人不投江青的票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 1502 票（参加投票代表 1510 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7，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8，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 月 18 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 月 19 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

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七月，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修改宪法的工作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

为什么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呢？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考虑。第一，如果设国家主席，很可能要由他来担任，但是，一，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又要增加许多外交礼仪活动；三，打倒了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又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第二，如果设国家主席而他不承担国家主席职务，则必须由其他的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斗争；一，很可能推举林彪担任，但林彪并不是适合的人选，他的身体不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很少参加，那么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更难胜任；一九六八年以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很不正常，他究竟要干什么，一时还捉摸不透。二，如果推举另外一位常委担任，就只能在康生与陈伯达之间选择，这必然会引起一场新的斗争。三、如果推举常委之外的元老人物来担任，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斗争。

2，林彪在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一反“紧跟”的常态，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推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第一，他捉摸不定；毛泽东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真意，还是谦虚、礼让？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要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总不会错。第二，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愿当国家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不增加多少实权，但对于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说就更加稳固了。

3，在讨论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修改宪法小组的一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

应该说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康生之所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决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是根据林彪的意见，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有人说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就离题太远，近乎“造谣”了。

在讨论国家机构时，张春桥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话，因为在宪法的其他地方已经有了。而吴法宪认为不能删，这是是否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

张春桥提出的是文字表述问题，而吴法宪则把它说成是取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这当然是两回事。

张春桥提出从条文中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其实，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曾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应该知道。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4，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他们认为，这一次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可以狠狠地整他一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批判张春桥，准备大干一场。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可是，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的观点。宪法

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这样一来，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火没有烧起来。这次战火没有烧起来，并不等于矛盾解决了。而是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留下了伏笔。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

1、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2、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3，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汪东兴、陈伯达带头在讨论会上发言：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

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

他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华北组的会议结束，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解学恭、吴德等都没有走，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知道。

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郑维山说：汪主任，事情有变化啊？

汪东兴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了，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毛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郑维山说：那么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汪东兴说：知道，不让点名。

萧劲光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啦。

在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4，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将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揭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5，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許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下山。

6， 全会下半段的进程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五）关于几位大将的错误问题

1， 关于陈伯达的问题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项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

2，关于汪东兴的问题

最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承认错误并作了初步检查。下山以后，表示正在继续考虑问题，愿意作进一步检查。但是，汪东兴九月十五日的书面检查，虽然表面看来是揭露了陈伯达的几件阴谋活动，其实并没有说出多少他参与其中幕后活动及真实意图。毛泽东认为，他和其他几个大将一样，与陈伯达不同，属于好心犯错误。充分肯定他愿意检查错误和揭露陈伯达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带动其他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有人说：汪东兴因为是身边的人，毛泽东就特意袒护。有的人甚至说汪东兴是毛泽东安插到林彪集团内的一个奸细暗探。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瞎说。历史证明，汪东兴在九大前后，与林彪、陈伯达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拼命向林彪集团靠拢，九届二中全会上，他积极主动地参与林彪集团的“倒张”（其实是要打倒康、江、张、姚，也可以说是“上海帮”）活动。

3，关于吴法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过一次检查，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他的态度比其他几位大将好，其实，这种好也是表面上的，他并没有交待任何林彪集团内部的真实活动。即使如此，林彪集团已经把他划入另类。时刻防止警惕他牵扯出其他几个人。

4, 关于叶群问题

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幕后协调指挥，小组冲锋陷阵；后期她观测风向，按兵不动。下山后，由于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她谈话，她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很明显，她这样做是为了丢卒保车。

5, 关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

他们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与吴法宪、叶群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也不作检查。

6, 关于林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倒张”事件的后台和总指挥，并且由他亲自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毛泽东为了保护林彪，把他与整个事件的活动分开。但是，在揭发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涉及到林彪身上。因此，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中指出：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

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

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这说明，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召开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了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华北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军委座谈会提出批评。

黄、吴、李、邱勉强作了一个检讨。

毛泽东仍然表示欢迎，并提出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作出检讨，结束这一桩公案。并以此推动林彪公开作出表态。

为此，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实际上是要林彪参加会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幕，

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

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则不作任何表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强调指出：

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

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

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中央打算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突然袭击事件，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离去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看来，林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第三阶段：一九七一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

这一阶段林彪集团的活动，已经从党内的路线斗争转变为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制订反革命计划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中国召开华北会议以后，林彪就已经开始考虑制订反革命计划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440 页）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信也去了。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他们认为：“和国外‘571 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

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

（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上海军区空军政委]、陈励耘[七三五〇部队政治委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林立果说：（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雄。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夺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我们是采取和平形式。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 [生活] 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 [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

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 they 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二）实施反革命谋杀

第一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林彪集团认为，这次会议最坏的可能性是把林彪端出来。因而他们就加快了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步伐。

第二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

林彪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八月五日至九日派叶群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商量对策。

第三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确切情报，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矛头公开对着林彪，是要搞掉林彪的政治信号。而且，毛泽东正好处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是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最好时机。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召林豆豆从北京到北戴河。林立果向林豆豆交底：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这预示着他们要开始行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具体谋划南北两线同时进行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第四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

林彪集团在南方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

林彪要搞阴谋，他的活动空间本来就不大，而且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是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等人联系。他既不亲自读文件，更不亲自亲处理文件。现在却有人一定要别人拿出林彪亲自批示的文件作为证据。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如林彪的手令，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又会说这是别人模仿的。看来只有林彪的讲话录音才能作为证据了。搞阴谋活动的人把自己在小范围内的讲话用录音保存下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吗？何况，即便是录音也可以造假呢？

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九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那么多事，怎么能说林彪是在那里“等死”呢？说这些事都是林立果干的，叶群可是亲自出马了的，有人证。说这些事都是叶群、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而九月十一日叶群、林立果都对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次是首长下了决心。如果这又是他们伪造的，那也只能说明：林彪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三）实行反革命叛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之后，王飞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计划。

于新野在会的中间，把林彪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钟，林立果到了林彪住地。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

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随后，林立果对张恒昌说：去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

王飞向他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他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他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多，林豆豆问李文普，他们要到哪里去？

李文普说：主任叫我安排明早六点去广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

林豆豆说：老虎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你们赶快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

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王飞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点五十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脚。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确定无疑地这是一次逃跑，而且是惊慌失措的溃逃！如果硬要说，此时，林彪还是不由自主的，是被人劫持的，是要逃往大连，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蠢话！自己走路、自己上汽车、自己上飞机，有这样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被劫持吗？大连与北戴河有什么区别？既然是怕有人抓他，逃往大连与呆在北戴河有什么区别！

再回过头来说，林彪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怕有人抓他？那是因为他心里清楚：他指挥搞了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他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指使叶群、林立果搞了反革命五七一计划。

够了，够了，林彪的一个逃跑行动，胜过十打声明。其他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四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在全国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公布林彪出逃真相。

第一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第二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传达到县、区、乡

第三步：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第四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传达到全体人民，但不向敌人、外国人泄漏。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林彪反党集团辩护。

右倾保守势力以及犯错误的人必然乘机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

群众受过去大树特树的影响，对发生林彪案件感到不可理解。

这些都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抓紧清理有关林彪案件的人和事

1，对黄永胜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2，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3，成立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

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

（三）抓紧处理几个重点地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在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在十七年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但是对于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如“二月逆流”问题。

第五阶段：一九七二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首要的工作是在全国开展继续批林整风。这又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2, 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讲到会议的文件之五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周恩来说：“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以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

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可是，后来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网络上还传播一篇张玉凤的回忆录，说什么这封信是康生的主意，由江青、张春桥写成，毛泽东是违心同意的，周恩来也上了当。即使张玉凤真是这样说的，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也不能说明这封信就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就亲眼见过，难道他也是说谎？可以推测的一种可能是：这封信的原件和抄件都不存在了（烧了）。康生出主意，由江青和张春桥把它恢复出来。所以政治局请示毛泽东要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开始毛泽东没有答应，真到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请示才同意了。因为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保留了原貌，可以把它看成是修改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3，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1) 关于新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2) 关于四川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3) 关于浙江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4) 关于江西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5, 关于贵州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指出：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6) 关于湖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7) 关于河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出：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8) 关于山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谈山东问题。

9) 关于海军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10) 关于北京军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4, 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5，整顿军队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二）继续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中央就注意抓这项工作。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

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至十一日，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个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

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

2，一九七二年实现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

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三）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一九七二年，在社会上已经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林彪的路线就是极左路线，林彪的极左路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林彪的路线错了，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错了；林彪摔死了，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在政治局内部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周恩来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反复强调要注意批极左思潮。其他委员有不同看法。这个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四件事情上：

一是一九七二年的国庆社论中，是否要写上批极左思潮？

二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是否恰当？

三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否恰当？

四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给毛泽东信，支持批判极左思潮，如何对待？

从这四件事来看，它涉及到中联部、外交部、人民日报社这样三个重要部门，而它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批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说：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事实再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局内部对这几件事讨论的具体情况，从一些零星材料可以看出：

关于国庆社论，周恩来最终同意了姚文元的意见，删除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改为正面阐述要做什么。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周恩来最后也同意了江、张、姚的意见。

关于外事会议的报告，周恩来经过政治局讨论也同意了删除原来的提法。

关于王若水的信，经过政治局两天的讨论，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指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至此，关于批极左思潮的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指导当时的批林整风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阶段：一九七三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同时，反对右倾也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继续批林整风

1，山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

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2, 海军问题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 1) 1967, 1968 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 2) 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 3) 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 4) 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 5) 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3, 空军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 1) 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 2) 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 3) “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 4) 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 5)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 6) 炮制《“571 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4，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1)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2)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3)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4)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5) 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继续任用、解放和调整干部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谓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笏、曾希圣等 13 名老干部。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总理、剑英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 246 人。会议主要议题是：一、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二、讨论批林整风问题；三、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确定代表名额为 1740 人。

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各项规定。同意党章修改问题的重点是总纲部分；按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写入“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写入人名，增加毛泽东近年来若干新指示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并开始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讨论情况。

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

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

还指出：报告中要指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

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十大政治报告稿。

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全体成员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十次大会预备会。

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

会议通过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王洪文作党章修改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在九大上没有当选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笏、叶飞等。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七三年，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右倾风愈演愈烈。

1，一九七三年，有人借文艺作品少，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人。

2，一九七三年，在教育领域也刮起了一股右倾风。一九七三年九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十二岁的学生黄帅，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她于九月五日、九月七日、九月二十八日，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他“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而黄帅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黄帅的日记。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黄帅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黄帅“批倒批臭”的口号。

3，一九七三年，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注意两种对立的思想斗争，放任自流。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处举行会议。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学一点历史，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

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

毛泽东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飏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4，一九七三年，在政治领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情绪也公开表现出现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

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讲：他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

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批评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

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5，一九七三年，在外交工作领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

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

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

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

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五）批周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对了谈话记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

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

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飏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四年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解决革命造反派和支持文革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排斥的问题。

发动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某日，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语

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

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线，小兵提升”。最近看到

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不久前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

有人说这个“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

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致信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材料不够，你们可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马宁写了一封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吴德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

一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批评：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批驳文章。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评一月十七日的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衷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时，将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01.18；中发〔1974〕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同志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讲话。迟群、谢静宜又在讲话中提出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

周恩来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给毛泽东写信，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一九七四年二月至三月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到三〇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运动的几项规定

12 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要揪军代表。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 05. 18；中发 [1974] 17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二）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

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复辟回潮，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抓住要害。

教育战线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批判上大学走后门；二是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

文艺战线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批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问题；二是批评晋剧《三上桃峰》；三是批评湘剧《园丁之歌》。

新闻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主要问题是批过了头。批评者反而遭到了批评。

还有在军事战线上抓了各大军区负责人检讨文革中的错误。

一九七四年八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事件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写信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检查了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中认为：这个“鱗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李先念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李先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物众多，级别很高，关系复杂，毛主席作了淡化处理，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流落出来的材料极少。现在知道的大概情况是：

韩先楚等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

王良恩在中央办公厅的审查中，“畏罪”自杀。

李德生不久辞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牵扯进去。

（三）筹备四届人大

进入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他说的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工作重点由批林批孔转入筹备四届人大。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是人事安排。重中之重是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和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的人选安排。这是新老两股势力、左右两派争夺的焦点。

新的势力的代表是江青（表面上是王洪文）、张春桥；老的势力代表是邓小平、叶剑英。

老人们充分研究了形势，掌握了有利时机，利用新人们的缺点、弱点，制造舆论（如江青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王洪文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削弱新派的影响，争取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

新人们猛打猛冲，不注意策略，常常陷入困境。如在批林批孔中又批评走后门；在政治局会议上抓住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表态。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外地前，约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因为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这些说明，攻击新人的舆论起了作用。

一九七四年十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斗争，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表面文章，实质仍然是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事先彻底检查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邓小平圈阅了，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同江青等人进行争论，拍了桌子并拂袖而去。这是老人们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的一次反击，火力侦查，看看各方面，特别是上面的反应。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这说明，新人们是主张进行回击的。但毛泽东不支持他们。（一九七〇年九月庐山会议，江青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告林彪，毛泽东支持了他们。）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这个批示与七月十七日、十月十九日对江青的批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了解毛泽东对江青的真实态度。

毛泽东的这一步棋，一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二是表示对邓小平的进一步支持；三是表示不要江青参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参与了，不管怎么说她不代表我，别人总会以为是多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支一派（老人）、压一派（新人）。实质上看，其中还包含有深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

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对江青提出的这“三不”，不就是要江青韬光养晦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说明江青一点也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建议，这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当时不正在酝酿人事安排吗？江青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她也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反对江青的人一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干脆，毛泽东自己先把那些人要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就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从最后定的名单来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

邓小任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样邓小平就与王洪文处于同等位置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在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仅仅排在邓小平之后。

毛泽东又提议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这样，张春桥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了两个重要职位。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则排在第二；邓小平是总参谋长，张春桥则是总政治部主任。一右一左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了。

再值得注意的江青。

她在这次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中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但是她获得了毛泽东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这里，在不经意间，毛泽东对江青作出了全面评价：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以及批周问题上都是对的，她的缺点是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搞了一个小圈子（四人帮），说错了一句话（周恩来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

2012 年 8 月 17 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73 万字

第一章 认真搞好斗、批、改

第一节 九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以“斗、批、改”为主要内容的阶段。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社论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具体地说，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把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在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落实。

怎样搞好团结？社论指出：我们的团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大团结。

具体地说，这就是：

1，从阶级路线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巩固地团结同盟军，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从政治路线来说，就是对后跟上的同志要热情欢迎。有的同志在运动初期一度站错了队，改了就好。不承认人家的进步，把犯过错误又已改正的人还总叫“老保”，是完全不对的。有些最早造走资派的反的人，在革命运动的曲折过程中，也会犯某些错误，也要认真改正。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

3，从领导班子来说，首先是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对已经解放了的干部，要大胆使用，不要一犯错误就算老账，重新打倒。对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亲一派，疏一派，你支一派，他支一派。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像、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

社论指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都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继续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要注意，绝不能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错了。

社论指出：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

判他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进一步肃清其余毒。

社论指出：对那种不搞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热衷于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对那种居功自傲，停滞不前，图享受，争地位的人，对那种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而还不愿改正的人，对那种玩两面派、搞“小动作”而不去认真、刻苦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要向他们问一声：同志，你是继续革命，还是革命到头了呢？

社论指出：组织整顿的工作一定要做，也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方法。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当清出除党，并不准重新入党。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要认真地把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驻清华大学联合报道《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一周年 欢呼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一周年》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

指示指出，目前全军形势大好，但“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对纪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复落实。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

社论指出：“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对吗？不对。

社论指出：革命大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那里？

第一，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继续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的革命大团结。

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

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

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

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

“九大”我们选出了新的党中央，我们要拥护新的党中央，拥护党的领导。我们新的权力机构，有缺点，或者代表性不够，自己参加这个机构，自己有资产阶级派性，想把它搞掉，这不符合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我们有新的党中央，有

问题就通过领导解决嘛！我们过去说过，新的权力机构，是经过广大群众斗争得来的，如果有缺点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有的可以改组，但不能推翻，朝三暮四，一派代表一派，好象一九五七年批判的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章罗联盟”，要“轮流坐庄”，那怎么能行啦。各种观点不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我们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标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把我们的观点，经过辩论，统一起来，大的的统一了，小的是必要的，可以保留嘛！就会达到毛主席所说的五个统一嘛！你不这样，新的权力机构，稍微不合适就认为是走资派，把它推翻，那就成走马灯似的了，这是发展派性，发展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我们是不允许的。

有些地方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如山东的“反复旧”，贵州一派压一派，都是上面自己挑起的，是错误的。就是这样，还是完善它，不能推翻另来。

现在红色政权建立了，更不应该筑工事，搞武斗，打解放军，对解放军抢枪，殴打战士，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分不清是非的时候了，那时走资派掌权，打起来就分不清；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不允许，再这样做是反革命行为，要由解放军做政治动员，坚持不改的总是少数。山西、新疆都是证明，广大群众是不高兴这样搞的，搞武斗被解放军包围后，结果只有坏头头负隅顽抗，广大人民群众是受蒙蔽的，经过宣传“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都纷纷离开武斗地点，上交了武器。

清华大学武斗的时候，许多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成了逍遥派，不参加，广大城市居民、革命群众最厌恶武斗，舆论不断，广大群众是不赞成武斗的，真正搞武斗的就那几百人，大学的负责人没有办法说服了，北京市革委也劝不下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革命工人、解放军组成的工宣队、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武斗停了下来，付出了代价，死了五人，伤了几百人。

某某、某某地区一小撮坏头头煽动一部分人夺取武器向某某跑，一宣传坏头头孤立了，坏头头被人民解放军抓住了××个人，×个跑散了，以后又抓住了。

如山东问题，青岛单独办学习班也好，把青岛问题解决好。徐海班回去后形势发展很好，连云港还有点尾巴，单独解决一下。山西机关和各地区分开搞，一个一个搞。内蒙古和东北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

“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一切为了战争，“八·二八”命令有很多特点，是为了巩固边疆的，象新疆的形势，西藏的形势，内蒙的形势要改变，我们已经在改变中，在东北好一些。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沿海有山东、辽宁、河北、天津、连云港、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也是边疆。“八·二八”命令不仅是对边疆的，对全国都适用。

“九大”以后，我们把各省靠边站的干部，没有最后定性的，也让他到工厂学习，也有好处。许多干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受了上级的影响，譬如在新疆，王恩茂要负责嘛！下面认为他对，跟着犯了错误，就允许改正，经过批判，到群众中去锻炼，给他信任，在对敌斗争中，到群众中去考验嘛！这个地方工作不行，换一个地方工作。要给出路。

新疆，还有西藏，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原来就在一起，分工不同，犯了错误，要给个改正的机会，首先他自己端正了立场，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组织上才有可能给出路。内蒙、贵州也有这种情况。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电台上的打仗宣传的通知

通知指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通知》规定：一、各级革命委员会需要增补委员、常委和副主任时，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增补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二、革命委员会中，有调往他处的或红卫兵从学校毕业后下放劳动的，都不要忙于免除他们的职务；对犯有某些错误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应按照“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帮助教育，不要轻易进行组织处理；对于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处理，应报请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要在群众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再上报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讲话指出：

现在，我们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要抓紧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掀起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国历来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国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社论指出：

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领导权的问题，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认真注意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斗、批、改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抓紧革命大批判，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群众都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当前，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国外的困境，正在加紧互相勾结，妄图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甚至放出种种空气，对我国进行核讹诈。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那一套，我们早已看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妄想煽动反革命残余势力复辟资本主义，妄想刘少奇一伙反革命分子再上台，这是白日做梦，头脑发昏。你们妄想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叛乱，只不过使我国各族革命人民可以进一步擦亮眼睛，肃清特务，彻底消灭叛匪。你们妄图发动武装侵略，就是自投于伟大的、正义的、反侵略的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之中。你们搞的核讹诈，丝毫吓不倒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只不过吓坏了你们自己那已经相当衰弱的神经，激起你们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起来声讨和反对你们，把你们烧焚在革命人民的怒火之中。你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即便全部使出来，也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大加速自己的灭亡，决无第二条出路。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通知
根据 10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当晚的通知要求：10 月 20 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

此前，毛泽东已前往武汉；林彪已在苏州。

此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等人前往河北，徐向前等人前往河南。

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分别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

现在离开过“九大”已经半年了，不能继续过去的形势，而是面临新的形势。“九大”的胜利，全世界革命人民向往中国，向往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我国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了，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给全世界革命人民、给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一个范例。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要反修正主义，首先要反自己队伍中的修正主义。不但要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国也要警惕。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醒，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了通知，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小撮人，地方上也有一些。但不能说太平无事了，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动。

我们任何一个政策，都要认真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你们再学习，再总结经验，看看过去，想到未来。

如内蒙犯了些扩大化的错误，但纠正扩大化，要防止另一种形势，防止对苏修、蒙修挑衅不管，对坏人不管，如果一味纠正扩大化，不注意这些，“左”的倾向就要走到右的方面去了，以错纠错就不好了。

同样，山东过去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纠正。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把各级革委会真正巩固起来，领导广大群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派掌权的如何补台，而不是重新搞两派斗争，这样就不对了。

再如，贵州是犯了错误，但不能否定贵州夺权的成绩，总是把李井泉、贾启允打倒了嘛。他们后来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不承认有对立面。贵州是大三线，更应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四川、云南、广西、湖南也应该做好，把三结合、大联合搞好。那一派有坏人，你这一派也有坏人，要把两派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实行真正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形势，停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凡是对自己不满意的，都看成是走资派、资反路线，那怎么行啊！山东不是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吗？还有武汉也犯了。老造反派不能批评吗？好象错了也不要紧，如果错了也不能批评，还有比老革命、老红军老的吗？为什么现在老造反派批评不得？这也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没有好处，阻止我们前进。

现在美帝、苏修两个头子正在争夺，他们可能自己打，也可以打革命的人民，他们的主要对象就是对中国。全世界人民向往中国，我们必须按毛泽东思想要有两手准备，我们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国家建得更加强大，使帝国主义不敢冒险。但同时又要有备无患，从坏的方面想一想。中苏边界问题，从三月以来，苏修仍在不断挑衅，现在虽然达成一个协议，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谈判，还有三天了。但拿我们的历史经验想一想，上一次，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同我们谈了半年，没有谈成，破裂了，边界冲突更加厉害。这一次也可能象上一次一样，也可能比上一次更加厉害，出乱子更大一些。来谈判找借口，搞突然袭击。我们要这样设想，要从坏的方面做准备，我们全国人民要认真进行战备动员。

陈伯达同志讲话

你们学习得很好，成绩很大。举个例子，韩金海是山工总头头，一来就帮助他，那时很困难。对韩金海我有点粗暴，在人民大会堂点了你的名，我是讲韩金海，另外我讲贵州工代会叫知识分子篡夺了，搞工联主义，实际上讲的是贵州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知道我讲的是他。对韩金海刺激了一下，也有好处。据说韩金海检查了十几个小时，两派群众都赞成这就很好嘛。但我还有一点担心，担心理论和实践到底能不能一致？象青岛的杨葆华，过去在北京解决山东问题时，杨葆华检查得比较好，把他的检讨在学习班大会上发了。但是，杨葆华回去后，据说没有完全贯彻那一次的精神。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注意工作方法》

当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工作方法呢？

- 一、抓好带头人的思想工作。
- 二、抓点。
- 三、抓三分之一。
- 四、要考虑到全局。
- 五、要考虑到群众。
- 六、领导和群众直接见面。
- 七、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八、开讲用会。

九、少而精。

十、留有余地。

十一、劳逸结合。

十二、讲究实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在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实践中，各地创造了许多好的形式。

举例如下：

各种类型的“五·七”干校。

插队落户。有的还把干部和教师、医务人员、知识青年等等组织起来集体插队。

领导机关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人下放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搞日常工作，定期轮换。

有的实行“两班轮换制”，一部分人下去劳动，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有的实行半日劳动制。有的由革委会领导干部带领工作人员分批到生产队当社员，到车间当工人。

工厂车间、农村生产队的基层干部，实行跟班劳动，不脱离生产。

参加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回本单位参加劳动，不脱离生产，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种形式。

干部参加劳动，是毛主席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为什么有些干部会犯走资派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脱离劳动，从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经不起资产阶级种种糖衣炮弹的腐蚀，跌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这个历史教训，是一切新老干部，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都要永远记取的。从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时候起，毛主席就反复强调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

金训华同志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了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战斗。今年五月间，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带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今年八月十五日，双河两岸山洪倾泻，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物资，奋战山洪，不幸光荣牺牲。根据金训华同志生前的多次申请，有关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
1969. 12. 19; 中发 [69] 85 号

1969 年 12 月 16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中提出：由于目前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决定成立“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实行对内蒙古的一元化领导。

12 月 19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 85 号文件，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对内蒙古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协助前线指挥所工作。“

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最后以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杜文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黄振棠（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四人组成，郑维山为书记，杜文达、黄振棠为副书记。

贰、本节简论

根据上述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九大以后，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搞好斗、批、改；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在抓好革命的前提下，努力促进生产。

2009 年 5 月 11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1 日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 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壹、本节概述

九大以后，有几个省，主要是山东、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前一阶段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反复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采取措施抓紧解决这几个省的问题。

一、山东省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 27 人在北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 7 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四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了“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的报告的批示

1969. 05. 25；中发[1969]26 号

毛主席指示：照办。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努力奋斗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等 7 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时的讲话
张铨秀同志的讲话

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是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由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长期陷于资产阶级派性，支左态度不端正，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犯了三个过。一上阵就没有很好的遵照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指示支左，因此介入文化大革命不久，就错误地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压制了一部分革命群众。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委会后，由于对革委会等认识的分歧，徐州市形成了踢、支两派，我们又没有正确对待，而倾向了支派，打跑了踢派；七月以后又在检查纠正前段错误中，又倒向踢派一边，打跑了支派。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军的领导没有认真学习贯彻，对照检查，而继续坚持错误。去年七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特许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办学习班，

十个月来，中央首长多次耐心帮助教育等待我们，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操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百忙之中，给我们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这些，本来是我们统一思想，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但由于我们领导上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存有打官司，争输赢思想情绪，所以在今年一月十一日总理接见军队干部前很长一段时间觉悟很慢，支左态度没有端正，部队思想没有统一，致使中央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还曾发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对军队领导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一段时间请示报告不够，有些指示没有认真执行，还曾出现一些公开“打倒王效禹”同志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我再诚恳地向中央首长作检查，请首长给与批评。由于我们的错误，直接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铁路交通一再中断，煤炭生产长期上不去，影响了生产，影响了战备，使徐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都处于落后状态，成了全国一个“老大难”单位。我们这些错误不但造成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长期对立，部队之间思想不统一，影响“三支，两军”工作，也影响了部队建设，特别是群众组织的联合，问题在我们军的领导，责任主要在我，不怪济南军区领导，不怪兄弟部队，也不怪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更不怪广大的革命群众。

现在新沂、睢宁、东海、邳县，在中央首长接见后，很快要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徐州地专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后，步子迈得很大，决心最近几天把徐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县、市都要向他们学习，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徐州市要按照总理改组革委会指示的原则，很快把革命委员会问题解决好，最近有些地方形势很不好，抢枪、搞武斗，我们希望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把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集中封存，立即无条件交还部队，其他武斗凶器也必须上交，在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停止武斗。

王效禹同志的讲话

刚才张铨秀同志讲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是我犯错误造成的。我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好。也给部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的错误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

的严重性在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仍然错误的支持一派。

杨得志同志讲话

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理解，对徐海地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了很多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惭愧，非常痛心。检查起来，我们在运动初期，解散了“红总”总部，在部队的两个学校，一个医院中抓了二十六个人，打击、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后对待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又没有掌握端平的原则，特别在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发表最新指示以后，批准了对连云港问题的七条错误的决定，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六·六三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与军区工作没做好有些问题处理不当，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

杨葆华同志的讲话

徐海地区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内战”不休。主要责任是我们山东插手徐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干扰了毛主席一系列关于大联合的指示贯彻执行，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招致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不能联合的分裂局面。因此使徐海的革命和生产，尤其是交通运输以至影响全国一些城乡的革命和生产，都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惨痛的，在此，我受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委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做深刻检查，向徐海班全体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徐海地区解放军同志们、两派广大革命群众作深刻检查，并坚决表示：保证我们山东再不插手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同样要求你们这样做，从此一刀两断。保证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支派和踢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观点，支持你们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

我在 1968 年 11 月 17 日“青岛市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发动了全市所谓“反复旧运动”，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

当时全国军民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极为重要讲话鼓舞指引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扎扎实实地斗批改运动，革命、生产出现一片日新月异蓬勃向前发展的大好景象。我市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但在此时刻，我却抛出了这篇错误讲话，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迎合了社会上有一股对抗清理阶级队伍的反动思潮，在一段时间，背离了大方向，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使斗批改运动受到极大干扰，破坏了革命三结合和革命大联合矛头指向了伟大的解放军，破坏了军民，军政关系，使山东青岛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地区的革命队伍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抗清理阶级队伍思潮大为泛滥起来，把运动引向邪路，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黄永胜同志讲话

徐海班，是在中央办的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习班。当然，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特别是我，对徐海班的工作做的不够，负有很大责任。我们除了同六十八军的同志有些接触，做了一些工作之外，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同志，直接接触的不多。但我们从间接接触中，我们感到徐海班问题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也感到工作难做。

你们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还在抢枪，还在搞武斗，还在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你们完全不顾大局，干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们长期打内战，阶级敌人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混水摸鱼。

首先你们对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审定批准的学习班八条注意事项，你们学习班有些同志是置若网闻。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冲、打、跑、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学习班开学以来，你们徐州两派先后跑回去两百多人次。仅踢派就跑回去一百六十多人次。有的人先后跑回去了八次。连云港“反到底”跑走了四十五人。他这个连云港“反到底”代表团，在头头王长发的带领下，跑回连云港达半年之久，经中央多次督促，至今不回来。特别是在“九大”闭幕以后，中央正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你们在学习班又刮起了一股叫做“逃跑风”也好，叫做“逃走风”也好，反正刮起一股往回跑的风喽。踢派头头徐锋带头跑，跑了六十八人。支派的孟宪臣带头跑，跑了三十人。徐锋在学习班先后跑回去四次。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全体学员后，广大

群众都欢欣鼓舞，正当热烈庆祝这一亲切接见的时候，你踢派的什么陆继坤，这个同志现在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就不参加庆祝会，跑到前门外去喝酒，搞非法串联，最后也跑了。

徐海地区抢枪武斗的歪风一直没有停止。特别严重的是大规模地抢枪、武斗都发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去年十一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大抢枪。有的头头带头抢，中央下命令要把武器交上来，你们迟迟不交，交又不彻底。这次“九大”以后，连云港两派都大抢枪，甚至于把戒备仓库的枪你们都抢了，四月二十九日，也是我们九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二十八日闭幕，二十九日，徐州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你们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却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你们究竟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解放军？你们却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胡说张铨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你们歪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派派出所谓“工人宣传队”，进驻已经实行军管的徐州报社、电台、夺军管的权。连云港“反到底”甚至派“工人宣传队”进驻解放军“三支”、“两军”办公室，不让解放军支左。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张铨秀同志传达了康生同志提出来的叫你们《徐州工人报》不要登“擒鬼录”的那些反动的东西，要你们停刊。但是你们不听，拒不执行，而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关于帮助群众组织更好地办好报纸、广播的决定。《徐州工人报》、《红色火车头报》、《徐州红卫兵报》还分别地发表“战斗书”。“战斗书”里头说：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给了一小撮穷途末日的阶级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你们这个矛头究竟指向谁？这个“穷途末日”是在骂谁？

在去年九月下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两派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但是，到了十一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中间有些人借口“反二月逆流”，在徐州大搞什么“反复旧”、“反复辟”，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军队，使徐海班出现的大联合形势又遭到破坏。今年二月，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徐州两大派大联合气氛又比较好。并且达成上交武器，停止武斗三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回徐工作团”，返徐落实协议。但是你们有些人却极力抵制“回徐工作团”的工作。并诬蔑“回徐工作团”向群众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在徐州的二月提纲。今年三月，新沂等四伙

在北京达成了三结合的协议，等中央首长接见后就回县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你们中间有些人大肆破坏，胡说“各县搞大联合，三结合是为了孤立徐州，办不到。”你们在干于县召开两市七县踢派的串联会，反对各县两派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协议，胡说在北京的代表“右了”，“修了”，五月中旬，钢山县踢派又借口什么“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八县的串联会，在地方机关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说在学习班达成的协议吹了。还造谣说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接见徐海班。

目前徐海班、徐州两派还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核心，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中央明确地指示，徐州革命委员会要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着平等的原则，充分协商，进行改组。你们各取所需，歪曲中央的精神，支派抓“改组”，踢派抓“承认”。你们这样完全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而有些东西完全和中央唱对台戏。踢派在那里强调“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扯皮。

周恩来同志讲话

徐州的运动过程：

首先，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徐州的革命群众起来响应，夺走资派的权，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还不是有两派的造反派都在一起嘛。山东的就是济南军区的批准了你们，南京军区也批准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后来因为你们自己闹分裂，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变成踢派了。这就形成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委员会不完全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王效禹同志到你们徐州市，他那时候还是对的呀，说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你们联合起来。你们不听。

到了八月卅一日，踢派又把支派赶走。这个时候，王效禹同志犯了这个错误。六十八军也犯了这个错误。八月卅一日那次武斗是错误的。

后来，有那么一小股采取了土匪的行动，来破坏铁路，断路，断桥，把铁路桥都破坏。那个时候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变成了六十八军，还有安徽的部队，合起来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吧，只给那一小股一点打击，捉了一点人。那个时候的名字也叫“淮海八·三一”。因为他“八·三一”被赶出来，他就用了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八·三一”都参加了。不能把那一小股破坏铁路、抢劫车辆、抢劫物资，算在大家头上。

后来的踢派就单独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喽，这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那个时候就得到济南这方面批准了，南京就没有批准了，这就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了。

那支派就更不服了，几次斗争，更影响军队，那么这里又搞了差不多半年，然后才劝支派回来，但是始终搞不起来。

一直到这一次“九大”以后，还发生这次错觉，错误地估计形势。

“九大”刚开过了以后，从四月廿六日起，就有这么一股歪风，说是“九大”开了以后，各省都要回去较量一番。因此，两派的头头都整理行装，不告而走。逃的逃，跑的跑。这次请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铨秀同志给跑回去的同志打电报，有一部分回来了，还有一部分说这次电报等级太差了，不来。要中央直接发电报。

你们现在看，王效禹同志检讨了嘛，支持一派不对嘛，杨葆华同志说得很沉痛，而且很诚恳，“反复旧”是错了的，他要把这个版权收回。他承认了错误，要拿他那篇文章做反面教材。

张铨秀有错误，他比较偏“支派”的，虽然后来也参加了“八·三一”的那个镇压，但是他还是有偏向的，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他就检讨了嘛，多次检讨嘛。对军队来说，军队也是分成两派。调到北京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委托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总参谋长为首的召集他们开过多次会，批评他，他们已承认错误。但到了学习班还有一部分人不通，但张铨秀同志开始通了，通了也不行呀！

张铨秀带着郑统一两人一道回去，踢派还是要打倒，管你通不通。你反正张、郑两位统统打倒。那你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吗？怎么法子能团结合作呀！就象着了魔似的。这是这方面。但是另一面，如果支派比较能够早一点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你动手我不动手，就是吃点亏，我还是坚持原则，那也可以不致于两派闹的这样对立嘛！现在不是因为部队总有一部分过去跟支派熟的呀！因为从一月风暴以后就接近的嘛！好，有机会总可以搞到一点枪，用来打几下子。好，你支派一打，踢派伤人，更闹的凶了，说现在徐州就要被包围，又要打起来了。

就拿中央来说，我们抓这个徐海工作抓的不紧，有时过问，有时又丢开了，你们闭得不可开交嘛！过问了，搞别的事情了嘛！以前也派过工作组到连云港去

调查尽管调查的时候是超脱的，不管“公社”派还是“反到底”派，我们都接触的，都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撤回去了，不然要陷进去，要犯错误。这是抓的不得情，有时抓得不紧，有时抓得不得情不能解决问题。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王效禹传达的中央首长与他谈话的要点

张春桥指出：根本上的问题是对群众的组织缺乏阶级分析。都看成是左派。对部队的态度是错误的。没有自我批评。

康生指出：复旧 15-20%是正常的。

周总理指出：你的骄傲更加突出，私字很多，旧东西很多。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杨得志在济南军区会议上的讲话

通过学习，大量揭发，认识到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严重错误，破除了他的迷信，认清了事实的真象。过去受蒙蔽的同志，大胆揭发，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对其错误有所提高。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青岛和山东夺权关键时刻起了很大作用，应该肯定。但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在前进道路上犯了错误，特别在十二中全会后，在全省搞了“反复旧”运动，大搞独立王国，大树个人威信，大耍两面派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包庇重用坏人，破坏斗、批、改的进行，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耍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同志也有，我也有错误的。我几次看到他的错误后，总是肯定他的成绩，对他的错误帮助不够。有一次我和袁升平同志同他谈心，三个人谈了五个小时。对他的缺点有所察觉，有过斗争，但对他的帮助还是不够的，这次中央对山东问题作了多次指示，认识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错误的严重性，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作为军区的第二政委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军队，是我当兵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过去我对他有些问题有察觉，有些问题没有察觉，这是党性不强，私字作怪，怕字当头。

例如谭启龙同志的问题。省革委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想提出来，但又怕人家讲我和袁升平同志过去是保谭启龙的，现在又为谭启龙说话，因此没有坚持这个原则。我和袁升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思想保守，造反精神不强，对谭启龙犯有走资派错误认识不清，犯了错误。以后，对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坚持原则不够，有些问题上我说了一些捧场话，在这个问题上讲，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又如王新阳同志是省革委常委，在“反复旧”时关进了监狱，一关关了半年。作为我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把一个常委关起来我还不知道，第一次我和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谈起王信阳同志问题是时，他说：王新阳在济南插手，第二次我又问他，什么理由关起来，他说王新阳有问题，但什么问题避而不谈。这样我就不好讲话了，这次王新阳同志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接受。

全省“反复旧”所造成的严重错误，由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负责。他把矛头指向我们，我们不好说话。河南刘建勋、纪登奎、王新三位同志的意见我同他讲了，我说他们提的和我们不一样，王效禹说上海和浙江都搞了，反复旧还是对的。山东“反复旧”是从上而下，不象河南的“反复旧”是从下而上。在“反复旧”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斗争了的，但是抵制不力。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层层过关，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上面一犯错误，下面跟着倒霉。

4、凡是由于“反复旧”引起革委会成员的变动，原则上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充实、调整，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是正常的调整不住此例。

一九六九年六月，王效禹回到济南后，不出席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

此后，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作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刘崇玉要写自传，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刘老师”。

总理：你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说是代表群众组织讲话，你们不以党性为荣，以派性为荣，这是错误，

康老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学习班领导小组）。

中央首长严肃批评：什么对（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也要搞“三结合”，这有什么三结合？这是糊涂思想。山东笑话多，出怪事，孔夫子思想很有市场，讨论“九大”代表时，杨葆华也提出三结合。韩金海、王竹泉提省核心小组也要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讨论批准。你的根本不知什么是共产党。杨得志同志给你们解释不听，还反对，过去王效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几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这是党的原则，同王有根本区别。核心小组要三结合，把三结合带到党内来，党内搞什么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常委讨论。这是错误的。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

有人说军区夺了我们的权，学习就是要架空我们，这是王效禹的思想流毒没肃清。军队夺了权，否定了你们夺权，这是苏修的论调。

江青：她骗了我（指刘崇玉），和她一起照了像，我让王（效禹）把她抓起来。建立青年班子，搞青年班子的实质是什么？怪事，把老干部都赶走了，只有青年人才革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晚九时，康生、李作鹏在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呆了五个多小时。主要是亲自处理打人事件（七月二日，红旗区文攻武卫的头头打了一个揭发问题的民警傅存贵）。

康生说：

孟庆芝、张美智在济南干了多少坏事，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不划清界限，到中央来继续干，破坏纪律。写自传写清楚，你们是干革命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过去这种影响，王效禹有责任，山工总有责任，韩金海有责任，造成什么后果，孟庆芝是坏蛋，你们跟他胡闹，是反革命，把档案弄走了，是包庇自己，是包庇反革命。

在学习班，有些人对王效禹的反动思想没肃清，什么被“和平夺权”，“被架空”。王效禹反军，不相信解放军，不是今天，已很久了。学习班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就是架空，因为有资产阶级派性。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康生姚文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负责人的谈话中央首长讲：

刘崇玉建的是王效禹的党，是从个人意见入党，这算什么党？

从这些事实中看出“反复旧”的危害性。在“九大”之后，还拉队伍，抢枪，不管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

个别地方是否有复旧，总之不要简单地肯定，也不要简单地否定。要具体分析。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在听取杨得志等赴京汇报山东批判王效禹运动情况时的谈话要点

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从近两个月的形势看，争取好的可能性更大了，更乱的可能性小了，但还没有排除，要既能纠正错误，又能稳定局势，关键在于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关键在于领导小组，在于领导小组的领导思想。

第三、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

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贰、湖北省

一九六九年初，单位的人来家里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

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Z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吴焱金。胡厚民出院后，邀吴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

，他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 60 场大型报告会，与他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吴焱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胡厚民认为：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他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

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

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在“九大”开幕以后，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

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并没有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反复旧的部分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

“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叁、安徽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去年这个时候,阜阳专区没有一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阜阳两派正在这里办学习班,互相吵架,阜阳地区有人甚至提出口号要“打过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芜湖、安庆呢,要走徐州的道路。芜湖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甘心,要走徐州的道路。安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成立革委会。

接着一个安庆事件后,

就出现了芜湖的六·二六事件。

芜湖事件刚刚要解决?合肥又出现了七·一六事件。

当前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旧,那里也是反复旧,这里反映一派掌权,那里也反映一派掌权。贵池县乌沙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反复旧”的司令部,把牌子都挂起来了。一个外调的人,到武汉去外调,看到武汉那里反复旧,说现在中央正在支持全国反复旧,谁要是不站在反复旧的这个大方向上,谁就是否认革命,谁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牌子都挂出来了嘛!有人看到武汉有反复旧的思潮,就往那里跑!我们安庆也是在幌幌动动的。

有的临时工也在闹事，有个别的把我们基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都拉去游街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些扩大化，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现象，但这个前进中的缺点，有些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有些不够揪的也揪了，不该斗的也斗了，在一些单位有这么些现象。

现在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这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什么“你那一派的干部解放多了，我这一派干部解放少了；在下放的时候，我这一派干部下放多了，他那一派干部下放少了；结合到办事机构时，你这一派的结合多了，我这一派结合少了”。我们说这些问题，缺点还是有的，但它毕竟是现象，是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只是在少数单位，少数的地区。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克服的，是容易纠正的。

（二）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如果把现在的形势看成是一个复旧的形势，要起来“反复旧”，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完全体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的，至少不应该说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是旧班底，原班人马。

这里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在有的单位没有或基本没有按“九条”、“五条”办事，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派掌权。在组织变化、人员下放、调整革委会办事机构等问题上，掌握不够好就出现这种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反对所谓一派掌权，有片面性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要求完全对等，事物总是不能那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多一个，少一个，这种现象总是要出现的。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又一个倾向。

（三）坚持“三不脱离”，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好群众代表。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譬如讲“反复旧”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认识清楚了呢？“复旧”问题究竟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主流问题还是支流问题？“反复旧”是不是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大家应当讨论清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样才能谈到团结。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可以讨论。再例如说领导关

系问题，权的问题，都应当有个统一的认识。最近不是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等等议论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譬如什么：“反复旧”喽。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

我们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当时曾经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等等，这是煽动对“九条”不满的语调。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认识。“九条”是不是就没有经过深入地了解情况呢？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不是都在吗？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肆、浙江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 1 5 0 多人到北京告状，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浙江省“红暴”派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红暴”派近 2 0 0 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北京卫戍区处理浙江“红暴派”组织赴京告状的通知的批示

6 月 2 5 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 3 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6 月 2 6 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二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 2 0 0 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七 0 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二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伍、山西省

一九六九年七月，毛泽东关于山西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份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

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战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对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同时也要执行毛主席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中央号召山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认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

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省军区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 20 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并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经过 20 多天的工作，收缴武器 7 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与此同时，谢振华还立即展开了“拨乱反正”工作。其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枪毙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列出的杨成效的四大罪状是：其一，迫害老干部致死。造反之初，他带头夺了省委的权，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迫害致死，尸体火化后，才通知家属。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号称百万大军的“总站派”总指挥。其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规模大，影响坏的武

斗，几乎都是杨成效挑动的。其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奸污无辜的女大学生后，将人从楼上推下致死。其四，破坏社会治安，强占民女，抢掠财物。

一九七一年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朋友韩丁等人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候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周恩来还说：“我们希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千里之外求仙名。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事情都说得绝对化了。我也不同意陈永贵同志所说的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是从局部看问题，是从他的局部出发。因此，他的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弄错了……”。

陆、贵州省

贵州自 1967 年 2 月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来，掌握革委会权力的一派与另一派不断发生激烈争斗，动乱持续发生。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贵州在京开会代表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

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正确方针，指导思想有错误，把贵州存在的某些问题看重了，要求太急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没有很好

贯彻毛主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的教导和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毛主席亲自批发的“红五条”下达后，我们仍没有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落实“红五条”。当革命委员会工作处境困难时，我们没有积极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反而对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埋怨情绪，影响了军政、军民的团结。

我们的决心是：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搞好军队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二、坚决稳定贵州局势，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的大局。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

三、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

四、积极作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

五、为了有效地解决好贵州问题，我们建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办贵州学习班。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两个报告

1969.05.23；中发 [69] 2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贵州省各级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县、市人武部，各地驻军，贵州省“九大”代表，各地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毛主席批发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加强部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两个“红五条”的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九年某月某日，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

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批示（概要）

1969年7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中共中央于10月26日批示决定，调整中共贵州省领导小组成员。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兼任贵州军区第一政委，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含留京学习期间代理核心小组组长，张荣森为副组长，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为组员。

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

此后，李再含实际上已离开了领导岗位。

一九七一年三月至四月，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的严重错误。

一九七一年五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指出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

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柒、河南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建勋讲话

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

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

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上，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自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

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

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

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在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

捌、四川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

1 1 月 5 日至 1 2 月 2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反复旧”运动，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

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在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严肃的揭发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1 2 月 2 5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两个报告作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关于刘、张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此后，刘结挺、张西挺实际已被撤销职务。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九月底，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为四川举办了 5 0 0 0 人至 6 0 0 0 人的学习班。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布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六日，中央宣布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我先读批示，批示并不长，很短，一段一段地讲。

第一段，两个报告，中央表示同意。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段，“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在四川省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里头，成立一个核心领导小组，就是党的领导，领导全川党、政、军、群的工作。这回扩大了。过去人比较少，现在扩大到十五名。这里头军队同志占很大数目，有十一位，当然罗，把刘结挺同志也算在解放军里头，他自己说犯有错误，但还是解放军。应该要求自己严嘛。那么，不是解放军有四位了：李大章同志、徐驰同志、张西挺同志，还有鲁大东同志。因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也必须久经考验的，即使有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但还允许他在集体里面改嘛。增补的就是谢家祥同志，大家都知道的。谢正荣同志是大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补他们两位为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大军区副司令员）、胡继成（大军区副司令员）、余潜（省军区政委）、何云峰（十三军政委）四人为省革委常委，然后再补邓经伟（省军区副政委）、顾永武（十三军军长）为省革委委员。另外，免掉的两位，王阴均【女，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已确定复员了，免去常委。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也不适合作委员了。免去他们的常委和委员。蓝亦农【原五十四军政委】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

第三段“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等九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刘结挺把军区“红总”、“千钧棒”拿出来支左，其他的就成为“老保”了。并在这个带有派性机构的领导下，使军队也陷入派性。现在纠正了。

第四段“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文革前为冶金部副部长、渡口市委第一书记，1968年后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成都军区参谋长】、唐兴盛（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辉燕【1969年6月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李安华【应为李华安，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蒋崇璟【文革前为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时为四川省革

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鲁大东、顾秀【1969年8月前为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时为铁五师师长，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钱敏【文革前为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丁先国【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冀绍凯（五机部政治部主任）等17人，组成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

最后部分：“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没有狠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李井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廖【廖志高，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任【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之流，批他们嘛！要把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整党。当然首先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狠抓斗、批、改。按主席提出的程序来进行。一直搞到下放。

结束语：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过：“四川很有希望。”但是你们辜负了这个希望。时间又过去这么久，现在我们又把主席这个话拿出来，而且得到毛主席批示“照办”。你们总要达到毛主席这个希望吧？

你们的报告，

首先是讲了这次开会，这次开会应该是说确切点，比以前好多了，比别的省在九大到中央来开会，比起来说，你们这次会是好的。另外你们从绝大多数，从领导同志起，正像你们所说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我们认为，这个估价，是合乎这次开会的事实。

我们也检查一下中央是不是对你们过问得太少了？是少了点。这件事情，我们看经过，我们有错误，要承认这个责任。没有抓紧就是了。造反派来北京，反对李井泉一小撮走资派的革命群众上北京请愿，我们还是不断接见的，也平反了。刘、张他们过去，李井泉压他们，是错误的，也把这个案子推翻了。解决了四川问题，成立了革筹小组。革筹小组回去，你们不请示报告，也不按中央规定的重庆问题的五条、四川问题十条办事，开始有个报告，我们没有批。那么后头呢，就是武斗继续发展了。情况不明了，你们的报告来得少了。

你们的五条检讨：

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例如“红十条”，双方都争，真正“红十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去执行。

第二条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就是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这个当然指的刘、张了。其他人也有的同意他们这个意见。王茂聚同郭林川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

第三，检讨的是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发动了全省性的所谓“反复旧”。

第四，是革委个别领导人，这个当然是指刘、张，头一个是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这是不是个人野心家？就是个人野心家嘛！第二个是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突出个人，独断专横，突出个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这里也要说王茂聚这个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来威胁，这种人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这种人不能当党员，要开除党籍。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封电报，王茂聚、郭林川两年多就那么个态度，所以他挑动、武装群众斗群众，那次省革筹小组也没有把“红联站”估计对，说他们都是保守的，上层不能承认，群众可以承认。这样就给王茂聚一个借口。就是他那武装打死群众的借口。我说这是犯罪的。

第五是强调领导核心不团结。

以后的十一条措施

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导班子带头学，带头用，自觉斗私、批修。这是最主要的。这次会议要逐步传达到群众中去，统一步调，要斗私批修。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第三条，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第四条，你们讲了革委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更不能推倒重来。

第五条，关于武斗问题。

第六条，讲干部政策。

第七条，要坚决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第八条，关于斗、批、改，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

第九条，宣传工作上要统一。

第十条，战备工作。

最后一条，要办学习班。

玖、湖南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

通知稿指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贰、本节简论

八届十二中全会特别是九大以后，在一些省份如山东、四川、湖北等省，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复旧”风潮。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提出：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

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的王效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对全国的造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他们那里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治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由此，在一些地方如山东、湖北等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九大以后，中央为稳定大局，即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处理。

现在看来：

第一，当时，各地确实存在着一些复辟现象。康生说大约占15—20%。

第二，一些地方，把这种复辟现象看得过重了，掀起了一股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的运动。这就偏离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第三，批评一些犯有“反复旧”错误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是必要的，但一些地方以后又把他们打成“野心家”、“五一六分子”。这就走偏了方向。

2009 年 5 月 18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0 日修改

第一章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第一部分 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江青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抓坏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

江青：造反派要看你是造资产阶级的反，还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反派容易，要有阶级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有的单位搞得比较好的，革命的大联合搞得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的搞斗批改，大批判，但总的说还是要树立队伍。

在这些不平衡的单位里头，是不是把队伍先树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

对三十年代也好，对十七年来也好，五十天来也好，都要一分为二，因为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来那就更多了，起来反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徐景贤对宣传界文艺界谈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就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给江青的信

此事在 1931 年、1932 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 1943 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二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查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查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

我看江青同志给文艺界的讲话，指出要他们揪出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这讲话很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文艺界、学校、工厂、机关，尤其是大学，也很适用。

当然，抓坏人，要象江青同志所讲的要稳、要准、要狠。所谓稳，就是要慎重；所谓准，就是不要弄错了；所谓狠，就是要抓最坏的，不要让坏人跑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一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查敌伪档案，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查，狠挖深挖，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谈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阶级队伍，纯洁革命群众组织，提高战斗力。各个群众组织一定要有坚强的阶级观点，坚决把混进自己队伍中的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揪出来。各个组织的坏人，要发动各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揪坏人为名，混水摸鱼，乘机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制造分裂，妄图把矛头引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对人民对同志一定要和，对阶级敌人一定要狠。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

要执行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打人，不要游街，要做好工作，交代政策，指出出路，要他们赎罪立功，检举坏人时，要防止起付作用，不要在批斗时替坏人散布流毒。

搞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时，可用检举箱，背靠背的检举，揭发坏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求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大字报、检举箱还可以并用，有些没有把握的问题，或者怕得罪人的，可以在检举箱揭发。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

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 A 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高增贵关于呼和浩特市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吴德谈清理阶级队伍

最近自杀情况严重，我要说一下，特别是农村，其它是学校、工厂。我上次对农村讲了一下。结果更严重了，我认为要停一周总结经验，要把自杀风刹住。

通县有个地主兼资本家，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他把一家孙子、孙女都杀了，他也要自杀，这主要是阶级仇恨要反抗而自杀。也可能是我们没给人家出路。是否可在第四条中加一句“严禁打死人的现象”，“交待政策、防止自杀，即使是坏人也要给出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1220 期刊载《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毛主席重要批示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

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

（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 1 2 2 0 期上的批语，手稿，1 9 6 8 年 5 月 1 9 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

1968. 05. 25；中发 [68] 7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根据毛主席五月十九日的批示，中央决定将此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望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份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的讲话

滕海清说：我们挖黑线、肃流毒，他们没有理由说不挖。有人便借此说是“压制老造反派”“带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靠群众，我们要支持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起来革命，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让人家起来革命，一辈子不让人家翻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老保翻天有，但是少数，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有些人借机翻案，内蒙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多，其他地方搞得很凶，实际上是走资派操纵的，是走资派在起作用。他们起来翻案，我们坚定一点就顶住了。

吴涛政委指出，挖肃斗争就是搞阶级斗争，矛头是对准敌人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有些人反映是“整老造反派”“站错队的参加挖肃斗争就是老保翻天”。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老造反派应当肯定。但造反派队伍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不能这样说，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革命造反派队伍也是如此，不作阶级分析地讲老造反派是不行的，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是对准造反派，有坏人抓出来，你的队伍就更坚强了，更纯洁了，对革命有利，并没有什么坏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王效禹谈清理阶级队伍

斗争大方向的问题，特别分清这样几个：现行的问题和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着重的重要要掌握现行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历史上的问题，历史问题是政治问题呀是经济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历史问题作过结论了没有？交代了没有？是不是没有弄清楚？没弄清楚的要弄清楚是吧？当前，我们

应当着重政治问题，不应过多的追究经济方面的问题。再就是历史问题、成分问题，现在这个成分问题上，我看了以后同志们抓得比较多一些，有时候这个成分就不好解决，他一生下来就定下来了嘛！但是，成分问题和当前的表现，毛主席也讲过这个话，要结合起来看，要不就我们光在成分上解决问题呀，看这个成分问题也容易打击面很广的，总起来，这些问题建议同志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一定要按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要区别对待，这一个政策界线，如果不这样作，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可能打击面会广一些，这样打到自己人身上，我想当前我们来讲正是个热潮的，在这个时候和同志们讲讲这个问题恐怕有好处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张春桥谈清理阶级队伍

对于国民党员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分清哪些是打击对象、批判对象。有的是集体加入的，所以面不要太广。

领导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政策，要掌握好党的政策，不然的话，一个个跳楼，这是不行的，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华东）师（范）大（学）一下子搞了这么多，人家要告你的状来了。学生要处理好，不要打击面过广。这和搞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有所区别。要大胆搞教师队伍，但不要搞人人过关，个个看档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冼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

〔冼恒汉：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1）把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同有一般政治历史的人区别开来，有政治历史问题也要把过去已经交待的同隐瞒反动历史区别开来。

（2）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要区别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中又要区别交待过的同隐瞒隐藏的，主要是挖隐瞒的，已经交待的又要区分安份守己的同不安份守己的。

（3）对跟着坏头头干过一些坏事的这些人同坏头头要区别开来。

（4）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同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区别开来。

(5) 在旧人员中，旧的人员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旧职员、旧官员这是不少的，把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同接受改造没有作过坏事的要区别开来。

(6) 把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阴谋分化瓦解解放军、破坏军民团结同由于派性作怪，冲击过军事机关，骂过解放军，向解放军提过一些错误意见的要区别开来。

(7) 把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人要区别开来。

(8) 对揪二套班子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现在有些乱套，省上有二套班子。你那个单位就一定会有二套班子？这样套是不行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李再含在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在对敌人斗争中我们要注意依靠广大的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如果只有口供，是定不了案的。必须要有证据，而且要有多方面的证据，这就是包括人证、物证、旁证。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这里我举个例子，如，对待有一些特嫌的。特嫌，就是特务嫌疑，对特嫌我们主要的是依靠群众来提供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很好的调查研究，把它落实下来。特嫌本身是特务嫌疑，是还没有定的，他也可能是特务，也可能不是特务，是嫌疑。如果你还没有搞到证据，来证明他是特务的情况，你就把他揪出来，这是失策，是不策略的。为什么？如果他是好人，那么你把他弄出来就冤枉了好人；如果他确实是特务，就等于向敌人告密。特嫌本来是我们内部掌握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你弄出来过后，如果他是特务，等于向他一敌人告密；而且特务，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总还有什么联系呀。你这样一弄，不就是打草惊蛇，把情况告诉了敌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内部掌握的问题，是我们要去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发动群众去落实的问题。

要注意政策和策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要搞逼、供、信，搞逼供信是向敌人告密。你一逼，他就供。过去彭真、罗瑞卿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你一逼，他就供，你就信。这常常影响到把真正的敌人搞出来，甚至放跑了敌人。

你一逼，他就乱咬，他就乱供。我们再不加以分析，轻信口供，到最后要定案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们逼着我讲的，你们要给我平反。为什么说又是向敌人告密呢？你搞逼供信，就说明你没有掌握他的什么材料。你在没有占有他的材料，没有掌握他的情况的情况下，只有搞逼供信，如果他是真正的敌人，他就知道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由于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只能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在同敌人斗争中，要根据我们占有的材料，有计划地，当着他不老实的时候，我们给他放出一两发“炮”，给他打出去，这一下他就知道我们是掌握他的情况了。在对敌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掌握政策和策略。

搞逼供信有一个很大危险性，就是搞不好，他乱咬一口，就搞混乱了，使我们找不到头绪，敌人就可以蒙混过关，可以跑掉。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性，你轻信他的，就会弄得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我们过去有过经验教训的。过去我们有的单位，一弄就是百分之几十的特务，都是坏人。结果，真正的坏人混到好人中去了，不是集中力量打击他，他就跟着好人一道平反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要注意几个结合：

一个是专案工作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缺一不可，而且主要的依靠广大群众。他本人的口供交待要和旁证、证据相结合。本人的口供、交待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从他本人的口供、交待中可以发现问题，可以分析出问题，可以找到线索。同时，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去作好调查研究，找出证据。有了证据，他就跑不掉了，就赖不掉、滑不掉了。

内查外调要相结合。同他面对面斗争、发动群众起来和他斗争，同时主要的是同敌人斗智，这也要很好地结合。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善于和敌人斗智。我们要有计划、方案，打一仗总结一次，提高一次，而且带头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和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对敌斗争的水平、本领。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吴大胜在南京工学院革委会学习班上的讲话摘要

当前，同志们都知道，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更加隐蔽，更加阴险，更加毒辣。当前特别最危险的是反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右倾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的形式是多样的，匡亚明曾经想翻案嘛，还有人这样讲嘛。我们造反派头头去找个人调查，要了解个情况，他讲：

“有没有介绍信？”讲“有，你先讲，我马上拿来。”他讲“不行”，架子很大。他说革命大字报是黑材料；说“过去彭冲同志你们不是要打倒吗？现在照样当省革委会副主任嘛”，威胁造反派。所以有的人就不敢去斗，不敢去揭他，怕以后他再来领导。这是右倾投降，我们要特别警惕，特别注意。第二个方面，当前在右倾方面，我们说对一个造反派组织来说，你说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本组织的坏人自己总是不去揪，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掩盖，你说揪到一个黑手揪到一个坏人，他总感到自己受到压力，我就奇怪，就想不通，坏人与你组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两个阶级的决战嘛，就是要把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里边的代理人揪出来嘛。我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战士问一个组织的头头，现在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压得厉害呀。”群众就反驳他，我就不感到压。他说不是这样就是右倾。往往把那个别的敌人、坏人，同群众组织混在一起，这个不能混淆。我们群众组织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看到你那个组织揪出一个坏人就高兴，是不是你那个就很纯洁呢？不见得，无非是一个多一点少一点嘛。一个群众组织混进一个两个坏人，在大发展的时候嘛，不奇怪。坏人主动揪出来嘛，就有功了嘛，与群众组织无关，组织仍然是革命群众组织，与他无关嘛，不要把坏人、反革命与革命群众联系起来，我看到有些大字报是不满意的，往往总是把坏人与群众组织纠缠起来。另一种看法也不对，揪出一个坏人总感到压得气透不过来，我们就是要揪坏人，我们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问题，我觉得江苏南京地区处理得不够怎么好。我建议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好地加以考虑，很好地加以解决。有人说我们受压制，揪××，批判××，我们就受压制。我说你本来身上没有疮蛮好，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与你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影响了我们共同对敌，发现任何一个阶级敌人，应该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敌人，我们有共同责任，不管他隐藏在那里，隐藏得多深，都要挖出来，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应该要狠，应该共同的揪出来，揪出来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胜利，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在南工没有听到这个事，社会上有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抓了一个人，一个阶级敌人啊，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干什么？另一个说：“这个坏人与那个组织有关”，这与组织有什么关系？阶级敌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嘛。我希望每一个群众组织立新功，把自己组织的坏人先揪出来，不要互相

揪，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混进这个组织一个坏人，这个组织不要掩掩盖盖的，生了一个脓胞，把它割掉嘛，割掉就好了嘛，就不会作怪，是一个胜利，一个功绩，我们学习上海的风格，互相提供材料，互相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打击敌人就不狠，就不能共同对敌，你们南工，基础是原来国民党的伪中央大学（众：对），你们看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啦？（众：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把潜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在这场斗争中立新功。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动脑子，调查研究，不要不从调查研究而从估计，从猜想搞，我们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过去历史隐瞒没有交待的，号召他们主动交待，那些顽固堡垒还是要去攻的嘛！既要交代政策，又要去攻，既要在社会上对江、陈、包、李、王、高、杜批判，又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阶级斗争中不要你保我打，我保你打，一定要共同审查。阶级敌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过去跟我讲了多少甜言蜜语的好话，一定要打倒他，一定要按无产阶级党性办事。如果不下决心把坏人揪出来，明明知道是个坏人不揪，那就是个立场问题，当然走资派、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要揪，干部不能站在那一边我就揪，要看他站在那一边，干了些什么事，有了错误检讨嘛！过去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问题揭出来看错误性质再定，不能站到哪一派就揪，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得很厉害，影响着我们的阶级斗争，影响着我们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管他站在那一边，只要不是走资派、叛徒、特务，有错误检讨了，改了就好了嘛。同志们一定要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有错误检讨了改了就好了，一是不要去保，一个要客观，一定要客观地看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影响到我们许多问题不好解决。当前南京这个现象要注意，有些干部解放不出来，也在这里。有错误的应该解放的干部也解放不出来。没有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真正应该打倒的也打得不狠，因为我们的力量就是不集中嘛。我们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怎样团结大多数，狠狠打击一小撮啊？学了就要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在斗争阶级敌人的时候也要讲政策，不要随便打人，不要随便抄家，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抄家要报，东西也要交上来。林副主席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同志们，政策很重要，是毛主席讲的，是党的生命。当前要持久地不间断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排除一切干扰。这是一个当前阶级斗争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群众发动得很广，群众情绪很高，从城市到农村，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了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有些是隐藏了几十年的，也挖出来了。主流是很好的。

当然，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要指手划脚地指责群众，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要积极领导群众，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也要善于引导群众经过群众自己的觉悟才能纠正。这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态度问题。

什么叫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清理那些人？依靠那些人去清理，用什么方法去清理？达到什么目的？这都是重大问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

首先，要把总的概念弄清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谁？重点是那些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夺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权。现在，正在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深搞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清除出去。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组织上讲，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招降纳叛，组成了一个黑班底，就是钻进我们党内隐藏下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要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很艰巨、很严肃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贯串运动始终的大方向。清理阶级队伍，不能和前段运动脱节，要紧紧地围绕这个大方向去进行。就是说，重点还是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很多事实证明：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很多他本身往往就是叛徒、特务；有的即使本身不是国民党员、地主分子，但已成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党内的，第二是过去的领导层（不是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的是挖暗藏的，就是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整人家的，而他们自己则被中国赫鲁晓夫保护下来。有些家伙隐藏得很深。有的隐藏了几十年。如果不大搞群众运动，是挖不出来的。这是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因为过去他们是掌握领导权的，现在虽然被夺了权，但是如果不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领导权还会被他们篡夺了去，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总是少数，但是相当危险。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就要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出去。这样，大方向就掌握准了。

清理阶级队伍，把重点指向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和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解放干部、整党建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些干部执行了资反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但基本上还是好同志，这个敌我界限划开后，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帮助，就可以解放出来；如果是属于混进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就从组织上清理出去。

清理阶级队伍，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大揭露，大批判，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有这样，才能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也才能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给合起来，而不至于形成单纯地为了揪几个人，脱离了革命的大批判这个大方向去孤立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要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律不要派工作组、工作队，已经派了的，要马上收回来，以免包办代替，压抑群众积极性。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那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的问题。

要注意调查研究，见政治挂帅，不要材料挂帅，但一定要有材料。“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如果光信口供，会造成麻烦，以后很被动。“要严防反革命分子暗害好人。”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严禁打人、游街和变相体罚。武斗并不能解决问题。敌人是害怕的是揭露事实。要教育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制服敌人。

要给出路，对于挖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应注意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挖出来的敌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真诚悔改，就宽大处理（当然不是宽大无边），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重点是清理党内的、上边的、暗藏的，那么，社会上的、公开的要不要搞？也要搞，但这和我们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是一回事。我们和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不属于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范围。对于社会上的，着重是搞现行反革命集团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要狠狠地打击，毫不留情。对于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般的是否还是用过去通常用的办法（例如过去农村沿用的每隔一定时间给他们训一次话，等等），其中突出地表现不老实、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要批判，但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隐藏的、混入党内的敌人，特别是领导层的。这是主要危险。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公开的，也有危险，但不很大，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敢于搞破坏活动，往往是在我们内部有他们的后台和代理人。所以，重点还是

要解决党内的、领导层的问题。如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连社会上的也一起普遍的搞，是否面就宽了。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我们一说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有的就不管他过去是否交待了，一看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就揪斗；一查档案出身成份有点问题，不问现实表现如何就揪斗，这是唯成份论，和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结合不起来。如果再搞上这么一段，不加以总结，可能出现更大的偏差。

革命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总是极少数。那个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要由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别的组织不要去揪，以免形成群众斗群众。

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的清理的对象、要求和做法对头的话，那么，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样去做，以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区分是否右倾保守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敢，就是右倾保守。没个界线要划清。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上海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就在这 4 百多人的单位里面揪出了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叛徒等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二百多名。

有一个地区他们把曾经干了六十多年特务工作的一个老家伙揪了出来。

有的单位把那个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的秘书也揪了出来，把工贼头子陆京士的小妹子，张闻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来。

阶级敌人向我们斗争的新的特点：

第一种情况：就是造谣歪曲、迷惑群众。有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出谣言，他们胡说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现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说什么“前一阶段是整当权派，是搞走资派，而现在就要整群众了！”也有的说我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一些谣言。比如在浦东最近就

传出了在 35 岁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经过审查，都要过关，也有的说，在市区里传出来，45 岁以上都要审查，等等谣言。制造这些谣言来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

第二种情况；他们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乱打乱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已经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小问题的人，一小撮阶级敌人就狠狠整这一些人来企图转移斗争视线。有的还说，这一次凡是参加过护工队的一般队员都要开除出造反派，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党员也要开除出造反派，参加三青团的一般团员也要开除出造反派等等。以上面的这些流言蜚语制造混乱来扰乱我们的阵线。也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家伙，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把一些对他们知情的人揪出来，进行批判，进行斗争，企图进一步压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或者他们打击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要的阶级敌人保护起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丢车保帅”或者说是“丢卒保车”等等。比如我举个例子：上海光学仪器厂，自从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们就回到厂里边揪出一批小业主，把一批早已被群众监督起来的，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斗，打一顿，他们还说是什么“最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呢？他们这里边有真正的阴谋，狡猾的阶级敌人还在他们幕后操纵着这个单位的造反派，他们就这样造谣或者打击一般的一些人员来转移斗争的视线，当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绝对没有要你把主要矛头对准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们更没有要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一些小业主。他们企图以这样来掩护自己。有一些阶级敌人呢，有意制造了一些小偷小摸来转移群众和领导的视线，比如有一个单位有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当群众发动起来时，他自己害怕了，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把人家的饭票、菜票、线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饭票，菜票，线票也拿掉，然后马上再去报案，他说我的东西丢了，因此就煽动群众要他去告状，以这种污蔑方法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有些单位，还有些阶级敌人蒙蔽了部分群众去斗争一些站错了队的党员、团员和一般干部，企图压住这些人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有的呢，一揭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倾翻案”，戴上顶大帽子。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

第四种情况就是制造事故，有的是制造破坏生产事故。比如最近有一个棉纺织厂，一个清花车间一共二十九个马达，一次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全部烧掉，这个厂有两个班生产的布，全部是坏布，给国家损失了几万元。还有一个纺织厂，为了选择一个工长，这么一个小事，一群坏家伙就趁机挑动，挑动了这个布机车间有一千多台布机停工两个多小时。有的也制造凶杀事件，比如上海××厂出现了这么一件凶杀事件，把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五月份曾经见过毛主席的一个复员军人，现在是他们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给割断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但要把这些走资派，把这些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揪出来，而且要把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摧毁掉，现在我们应该打响的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就是起到了把这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进行复辟的社会基础彻底地摧毁这样一个革命的伟大作用，对于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这样一场对敌斗争，不但是从组织上把这些社会基础摧毁掉，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所以当前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的大批判结合起来，怎样把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工作结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对内蒙古文艺界的讲话

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挖肃斗争中间，揪出了挖出了各种不少的坏人。现在揪出了二百人。你们揪出二百多人，是否都是打倒对象？我认为这二百人中间，当然有些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但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人。

我们文艺界搞得并不比别的地方晚，江青同志讲话之后，我们就搞。但由于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敌人顽抗，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右倾，再加上领导不力，所以文艺界文化大革命拖了时期。如果搞的好一些，迅速一些，成绩比现在可能更大些。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锡联说：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

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挖肃斗争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区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更深入地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一、不准随意抓人。凡属必须依法拘留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犯罪分子，除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按规定权限执行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私自抓人。

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斗争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中，要把武斗的指挥者和幕后挑动者同受蒙蔽参与武斗的一般群众区别开来，要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流氓犯罪、赌头赌棍同一般犯有偷摸行为、另星私贩行为、一般生活作风、偶而参与赌博的行为区别开来。

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当地支左部队和公安机关军管会对群众专政指挥部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并派人具体指导。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稳、准、狠的打击敌人，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并积极协助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执行专政任务。群众专政指

挥部的领导班子，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成为执行、捍卫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因此，参加群众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大公无私。

群众专政机构，只能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旗(县)以上的城镇建立。两派对立严重的地方暂缓建立，已建立的要进行整顿，待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再组织统一的群众专政指挥机构。各基层单位不再设立“群专”分部或小组。公社以下一律不建立群众专政指挥机构。过去建立的，立即撤销。农村牧区应坚决依靠广大贫农(贫牧)下中农(下中牧)，团结中农和农村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地挖出来，对地、富、反、坏、右就地进行监督管制，劳动改造。

群众专政指挥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支一派，压一派，不准一对另一派专政，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报私仇，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四、对于应该实行群众专政的人，除有现行破坏活动，必须依法惩办外，都应交给群众批斗，就地监督改造，一般不要集中看管。

五、关于“群专”，隔离反省的批准权限要从严掌握。今后凡需实行“群专”的对象，应由本单位革命群众讨论，经当地群专指挥部审查，报请所在地的革命委员会批准执行。必须实行隔离反省的干部，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后执行。过去未经批准而实行隔离反省的，由群专指挥部审查处理。

六、严格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斗，同时也要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分化瓦解。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私自抓人、私设拘留所、私制刑具；严禁武斗和变相武斗；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坚决反对逼、供、信。在批斗审讯犯人要允许本人申辩。

对于违犯“六六”通令的肇事者和背后操纵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及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有权追究，查明情况，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的教导，严禁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揪人、抓人及查、抄。如果发现对方组织里有坏人，要将材料交给对方组织，要相信那个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会把坏人揪出来。

八、对儿童犯罪的处理，要坚持正面教育。对幕后操纵、唆使儿童犯罪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进行批斗，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家长和教师都有责任把儿童教育成无限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后代。

九、凡需采用抄家手段获取罪证的，应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批准，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查抄。查抄时主要是查抄犯罪证据和政治性的反动物品，证件、枪支、弹药、凶器、毒品和赃款赃物。对生活用品，衣、物不准查抄和毁坏。查抄的物品，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一律上交银行、财政部门和军事单位。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挪用，违者从严处理。以往抄查扣留的财物，应立即补报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

十、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应该成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的模范，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执行任务。随时警惕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如有发现，定予严厉打击。

以上各条，希望向广大群众认真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关于查阅中央档案馆档案材料的规定（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重新批准）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在谈到陕西问题，毛泽东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

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

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

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

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悔改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不要怎么行？都把他們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

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在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九大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上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

“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及时解放犯错误而有了觉悟的好人。最近他们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提高觉悟，获得解放的过程，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制止了武斗，促进两派在组织上实现了按班、系的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許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冈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个别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在干部中揪所谓“黑班底”时，干部参加了一派有的就被说成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没参加的有的就被

说成是“第三势力”，搞得干部无所适从。有的人有历史问题已经搞清并有了正确结论，也要老账新算。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加剧了原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

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领会不够，主观上想抓反革命，但打击面宽了；有的是受了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正象有的同志说的：“过去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硬把对方的一些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贰、本节简论

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在各省开展试点，首先是文艺界。

第二阶段：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全国各界普遍展开。

第三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六九年底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错误。

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评价，可以概括几点：

第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一小撮隐藏在内部的坏人，自己跳出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第二，这项工作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第三，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左”的倾向，工作中发生过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抓住群众的历史问题或某些错误行为打击革命造反派。

第五，还有一些造反派的头头一见到从本派中揪出了坏人，就认为是打击了造反派。

2009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7 日修改

第一章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党全国亿万军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为害很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不多了，但还有反革命，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会乘机兴风作浪的，所以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奇怪。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的表现。当前国内外阶级搏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为此：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

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原则，对不同的犯罪，予以不同的处理。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立功赎罪。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批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群众专政的目的。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重要案犯需作紧急处理的，可用电报宣报中央请批。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特别要严防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混淆敌我，在那些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本派里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

要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建设一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公安队伍。

望各地接此指示后，认真讨论，切实执行。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

1970.02.05；中发 [1970] 6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

各军种、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军管会、军代表：

现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发给你们。

当前全国军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正在积极进行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战争挑衅。可是，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前的战备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央认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

中央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罚。

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和财务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财务监督。必须切实实行群众性监督。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伟大教导，结合当前的斗、批、改，开展革命大批判，厉行增产节约，坚决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

各级领导接到本通知，应立即进行传达，认真检查处理。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产；有的利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撤消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动，牟取暴利。他们千方百计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于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已经引起重视，正在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并取得了成绩。但是，还有不少地方认识不足，打击不力。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要发动广大群众去进行。一样要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

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才能解决问题。

一、各地要根据斗、批、改的发展情况，全面规划，具体部署，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要选择一批典型案例，交给群众，广泛讨论，召开群众大会，大造声势，发挥无产阶级的政策威力，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号召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的人，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立功赎罪。

二、要自始至终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及时地识破他们，抵制他们，揭露他们。使阶级敌人无处藏身，没有活动的市场，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三、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着重打击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对中小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批敌人。贪污盗窃必须一律退赔，私分公家财产必须一律追赔，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不许例外。

四、要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对混进来的坏人，要坚决清洗；一贯表现很坏、不适合做财贸工作的，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要选调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分子，充实财贸队伍。

五、为了杜绝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隙，中央重申：

（一）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二）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三）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

（四）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

（五）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斗争的教导，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展开坚决的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

（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

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着生产建设的新高涨。今年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铁路货运量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建设重点工程进展很快，农业战线上夺取丰收的斗争热火朝天展开。全国范围内，一个加强战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在新的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抓增产，狠抓节约，更好地适应各方面需要的不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当前，生产建设上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不少企业劳动效率和设备能力还可以大大发挥，生产消耗和产品成本还可以大大降低，库存积压物资还可以充分利用。只要我们坚决克服“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保守思想，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一定能够把生产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还是因循守旧，铺张浪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必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和军代表，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加强对增产节约工作的领导。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六日，刘建勋关于整党建党的讲话

正当我省整党，建党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三个文件”，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大家可高兴了，这个运动真是好得很。我们紧密结合“一打三反”进行整党建党，使整党建党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在当前，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抓好整党建党，抓好“一打三反”。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盖子和它在党内的反映，要搞好斗私批修。抓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纲。大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都提高了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千万不要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像大红旗。“纪要”中写的三件事，头两件都是讲的要抓阶级斗争，要把整党建党和现实阶级斗争相结合，和“一打三反”运动相结合。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

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

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

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刘建勋同志讲话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肃处理。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〇年在全国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整党工作等等相结合进行的一项社会治理工作，是当时深入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的地区，把有社会历史问题或有错误的人当成反革命加以打击，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还有的地区，借“打击反革命”之名，打击革命造反派的成员，这就完全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

也有的造反派头头因为本组织中揪出了坏人，就认为是打击造反派。这就是敌我不分的小团体主义。

2009 年 6 月 1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7 日修改

第一章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毛主席对北京市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在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话，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 8 3 4 1 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五·一六”是利用 1967 年发表《5.16 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 8 月份

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等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

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

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在这些单位目前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起来揭发批判，同时号召“五·一六”分子自己起来坦白。但是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要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发动群众是主要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 160 到 170 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二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

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1967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架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集团的几点意见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作过重要指示，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没有很好的落实，斗争得很不力，这是一个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现在对这场斗争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对王、关、戚、周景芳、林杰等一伙等反革命分子煽动和利用的极“左”思潮，必须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彻底挖出来，肃清它的影响。

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是以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周总理的态度。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另外，对打、砸、抢，也要使具体分析，它是否带有政治性。同时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吴德北京市举办的区县局学习班上的总结发言

在北京市到处伸手，反革命分子周景芳来市革委会妄图篡夺市革命会领导权的。周景芳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周景芳在各方面伸黑手，而且发展“五·一六”。他发展支队，发展司令、副司令。在卫生系统他也干了许多坏事，在财贸系统也派去崔许龙。崔许龙是“财贸尖兵”的后台，和洪振海，王景瑞勾结在一起，西单武斗指挥机关在市革委会。上有周景芳，下有财贸组崔许龙。

主要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起来。

极“左”思潮，“五·一六”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有极“左”思潮的人不一定是“五·一六”分子，不一定是坏人。极“左”思潮严重的没有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也可能有其他坏人，其他反革命分子。

还有的厂整党打板的，有的党员挂起 50%，这行吗？有的“纳新”把他的老婆也纳进来了。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对这种人不要斗争吗？不批判极左思潮，对有些人的问题弄不清嘛！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讲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 616 在一起。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

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康生同志讲话：

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

江青同志讲话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

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中册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

“……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一九七〇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七、八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五月十六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 11 月 1 日、9 日、18 日、20 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 1970 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 月 24 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 3 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

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 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从 67 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 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 年 9 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 年 3 月 24 日、27 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 49 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 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 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 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 8 月 11 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后来又利用了 48 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 48 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

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3.27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

“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4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1971.02.08；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 “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

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 007 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 200 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 20 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〇”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2. 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一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他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 组织方面的情况。

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

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

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上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向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角，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二套班子。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陈伟在国务院各部委清查“五·一六”专案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区别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这是当前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什么是“五·一六”骨干，什么是一般成员，什么是受蒙蔽的群众，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的。现在有个说法，有了组织才是罪行，没有组织就是思潮，“组织定性论”，这是片面的。有组织的也好，没有组织的也好，思潮是思潮，罪行还是罪行。并不是说有组织就是罪行，没有组织的就是思潮，并不是那样。

当前运动进入到一个深挖罪行，查阴谋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性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突破了，难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些阴谋搞不出来，难题就解决不了。当前大部分单位进到这个阶段，表面的，明目张胆的那些活动基本上查清了。主要是那些幕后策划的，搞阴谋的那些。

清查“五·一六”是清队的一部分。清查“五·一六”是挖隐藏的反革命，不是挖漏网的走资派。

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在七、八月份有三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个是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是围困中南海；第三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这三个方面互相呼应，配合得很好。这都是在七八月份搞的，并不是偶然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当时，他们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策划的，尤其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和江青同志。

他们为制造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开始首先就搞政治陷害，在湖南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造了谣言，现在正在查，所谓 007 密令事件，其实是造谣，完全是为了制造舆论。说是哪一天拣了个什么条，条上写着湖南省军区那一天发生政变，说这条上的字迹象总理的。这家伙就跑到北京来告状，“小小老百姓”打电话叫刘志坚接见了，并通过刘志坚对他说：“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很好，中央正在注意这个问题。”这个物证已经拿到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回去以后，利用这个就立刻掀起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的妖风。以后就是利用揪陶铸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就是利用反“二月逆流”还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是升级的。他们配合的很好，策划的很周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单从围困中南海来说，他的起因也不是很简单的。起因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引起的。“八·一”团开始是极右，是保刘少奇的，后来跑到极“左”，怕人家说他是老保、右倾。

对于他们揪“刘少奇”，总理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传达以后，“揪刘”不仅没有降级，反而升级了，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不然为什么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不是降级而是升级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阴谋目的就在于欺骗蒙蔽群众，戚本禹交出刘贼的认罪书，单独交给“新八·一”，不是在两派“揪刘”的时候。“老八一”有点孤立，揪了揪不行，它就回去了。刘贼七月九日的认罪书交给了“新八·一”，就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八·一”马上杀回来了，当时声势不是低了，而是升级了，策划了绝食。戚本禹亲自前往绝食现场慰问，以后又策划了贾建被打一事，送到反帝医院住院，戚本禹又亲自打电话叫医院接受，这个阴谋策划的很周密，但是贾建究竟是谁打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弄不清楚。事情发生以后，戚本禹直接给他打电话，并派王道明、焦玉山去问候，这样，就把绝食逐步升级了，以后，戚本禹在“老八·一”和“新八·一”之间进行了操纵，他们都参加了“揪刘”，这是他们的策划。当然，这是从整个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来看的。两派还是对立的。天派和地派几乎要发生武斗。八月四日晚上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来看，实际上他们配合的很好，特别是“八·五”行动，开会的时间都差不多，策划人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个反革命事件是联系着的，他的反革命策划手法是很高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

（一）“四抓”：一是抓罪行；二是抓重大案件；三是抓阴谋；四是抓重点。

（二）搞好几个区分：第一，区分是非。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第三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第四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

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1. 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 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

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 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篷，到帐篷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

“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

“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 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

“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 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 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 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仇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

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 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 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 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头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 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

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 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一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 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徐凯的十八条。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部分的讲话

“批清”运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中某些单位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健康的，这么大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总的讲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又发现一些单位是不是面宽了一点，因此，我曾经讲过一次，战线太长，要集中力量找重点的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就是要抓住重点，甩开那些受蒙蔽的，把那些没有罪行的先放一放，不是“五·一六”不要抓，是要把重点案件抓一抓。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不断得到中央的帮助。全国抓“五·一六”的形势很好，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 1052 人，在一段时间里 20 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 283 人，占职工总数 27%，占在职干部 43%，占党员 28%，占老工人 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 60%。

面宽的有的到了 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的面搞大了些，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重视起来，这就不能很好地把“批清”运动深入下去，或者上当搞乱。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 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清华有个人某年某月，有一天他坐什么车，带什么手枪，去钓鱼台捉谢副总理，进的哪幢楼，谁接待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说得很玄乎，经过研究，认为是假的。给他说“不对”要他推翻。他说是真的。后来问他进去见到了什么，他说进去那里有“钓鱼台”三个字。进门地方恰恰没有。经过很多工作后，他才说交代的是假的。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銜。“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希望，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 20 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〇”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陈伟在燃料化学部谈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泽东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精神

现在是“左”的右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面大了一些，谢静宜同志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一九七二年四月，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围困中南海，参加有的有四千多个组织 20 多万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不过 30 几个人。又如火烧英代办处，参加的一万七千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不过十几个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 ALL-ROUND CIVIL WAR。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贰、本节简论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拖延的时间很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直到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才基本结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的八、九、十月，这时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发现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组织，专门进行炮打周恩来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少数头头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第二个阶段：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〇年三月，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

一九六九年八月，江青说：“五·一六”的后台是杨、傅、余、王、关、戚。

“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摘掉。

由此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活动。当时有一部分单位提出：“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五·一六”）有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说：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一方面指出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现在，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此后几个月，清查工作暂时停顿了一下。

第三阶段：一九七〇年十月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周恩来多次讲话强调指出：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又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此后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相结合，重点在查阴谋活动，而不在于五一六这个组织。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叫林彪。

清查的结果如何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讲话：

他说：北京市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的人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他说：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教训。如有搞逼供信的，违犯政策的，也有打死人的，“五·一六”也不应该打死嘛！有的说白天不出活，晚上出活，夜间熬夜搞体罚，搞逼供信，指供、诱供，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 1052 人，在一段时间里 20 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 283 人，占职工总数 27%，占在职干部 43%，占党员 28%，占老工人 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 60%。面宽的有的到了 30%、40%、60%，有个单位把一

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审查重点人，重点人说不清楚了，就把职工名单交给他看，他就在上边画圈，一画一二百。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 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他们是一小撮，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有五六万人，可编一个军。

他说：有些重大案件，可以说，基本查清了。如夺外交部大权，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夺中央的权，财政部闹得最厉害。为陈里宁翻案。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銜。“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 20 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〇”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但是，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一九六九年以后的清查反革命阴谋活动，真正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分子，如“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小舰队等等，并没有抓到，反而主要起到了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作用。

2009年6月8日初稿

2011年12月28日修改

第一章第六节 整党建党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要动员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

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下面的意见，送到中央来的一共一百二十六份。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的意见写成了党章草案，然后再发下去讨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的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党章（草案）提到“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九大后，各地根据新党章，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

- 一、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实行开门整党
- 二、提倡斗争哲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 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的通知

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中说，中央决定于二月下旬召开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指示，推广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经验，研究“吐故纳新”政策，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

通知稿中附有中央组织部业务组郭玉峰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

从去年七月至十一月进行了整党建党。

- 一、加强党的领导，狠抓两条路线的斗争
- 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
- 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吐故纳新
- 四、建立坚强的党支部，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开始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

一九六八年初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有八千六百三十二名职工，其中党员一千零四十八名。

- （一）充分发动群众，在斗争中整党建党
- （二）整党中始终狠抓思想整顿

- 1, 对广大党员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
- 2, 对广大党员进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育和党的根本任务的教育。
- 3, 对广大党员进行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和新党章的教育。

(三) 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 1, 正确对待“老造反”。
- 2, 正确对待“站错队”的同志。
- 3, 正确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

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我们提出了四个条件：一，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比较巩固；二，通过清队，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三，整党取得了成就，党员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四，在斗争中已经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党员骨干。根据上述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不成熟的帮助创造条件。

通过整顿，全厂三十一个支部、七个总支和厂党委，共有委员一百七十二名，其中新的占百分之六十九。在三十八个支部和总支书记中，有二十八名是新干部。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

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军管会、军代表：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和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写得很好。这两个工厂整党建党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参考。请你们把这两个报告及其附件，同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月十五日批示“照发”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至县团级党的负责同志参考，并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和讨论。

一九七〇年七月，毛泽东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
的批语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及附件

1970.07.12；中发〔1970〕51号

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批阅

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

目前全国整党建党运动正在继续深入发展，整团建团工作也要跟上来。各级党组织应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的“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的指示，把整团建团工作提到党的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认真地把共青团组织整顿好，建设好。这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战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整团建团是关系到一亿五千万青年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党的领导同志的充分重视。在整团建团中，一定要突出思想工作，引导团员和青年认真学习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青年工作及团的建设的一系列教导，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团路线，通过三大革命运动把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青团，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整党工作已经大体搞好的地方，团的组织应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恢复团的生活，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搞好“吐故纳新”，做好组织处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青年吸收入团。还要逐步地做好超龄团员的离团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党的核心小组，对目前整团建团进展的情况，应认真进行一次调查研究，对于附件中提到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你们的意见。目前应抓紧试点工作，在十一月底前，望各地能向中央提供一至二件典型材料和修改团章的草案，作为中央召开整团建团座谈会的准备。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共青团和红卫兵的领导，积极开展团和红卫兵的活动，使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广大团员、红卫兵、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朝气蓬勃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突击作用。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翻印，但不许张贴，不许广播和登报。）

附件：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当前整团建团的情况和问题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六日，刘建勋关于整党建党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

《通知》指出：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所必须具备的 5 个条件是：一、广大党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三、经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阶级阵线基本分明。四、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通过整顿，进行了吐故纳新，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五、形成了一个革命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

《通知》提出，各地区可以分期分批召开省、地、县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建立各级党委，在 1971 年 7 月 1 日建党 50 周年之前，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基本上建立起来。

《通知》要求：在各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解放军、劳动人民的优秀党员要占绝大多数；妇女党员一般不少于 15-20%；在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少数民族党员要有一定的比例。

《通知》最后决定：新的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的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基本上就是党委会的办事机构。

《通知》发出后，自 11 月 24 日至 1971 年 8 月 18 日，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召开了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最近，有一批省、市相继隆重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其它省、市、自治区也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党委。

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召开的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的新党委，具有鲜明的新特点：突出地抓了思想建设；认真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要有正确的作风。要解决路线的问题，作风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整党建党工作，“九大”前的确抓得不好。从指导思想来说，那时候新党章还没有下来。我们的思想没跟上中央的要求。在获嘉开的整党建党现场会，主要是没有强调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没有强调揭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从发展党员来看，我们是十三万，可能占全国第一位，主要问题是有的不够条件，也被发展入党了。所以，“九大”以后，我们基本上又重新整顿。这是一个教训。

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

1972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经过整团建团，在绝大部分基层团组织建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县、地两级共青团委员会，并着手筹备工作，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把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团委建立起来。

中央批语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中央拟成立一个共青团工作小组，负责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协助中央联系和处理各地共青团的工作。

中央批语还指出：全国少年儿童组织统称红小兵，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加强对红小兵的领导。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生气勃勃地开展共青团工作》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并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上海市第六届委员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青团代表大会，也即将陆续召开。

当前，批修整风是全党的头等大事。各级团的组织，要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入批修整风的战斗，紧紧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揭穿他们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

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团组织的重要任务。

共青团在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必须大力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中央同意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北京市和上海市工会代表大会的两个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参考。

当前，各地整顿和健全工会的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批林整风这个纲，进一步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联系工会工作的实际，……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促进和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大团结。

整顿工会要以基层为重点，同时积极进行筹备，在工人运动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等条件具备的时候，首先召开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会代表大会，将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工会组织建设起来。要坚持工会的阶级性，同时坚持它的群众性，除混入工人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外，工人群众中包括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凡是要求参加工会的，应当让他们参加。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又要谨防阶级敌人混入工人阶级的组织。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北京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并选举产生了北京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新的领导机构。在条件具备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也将相继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贰、本节简论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进行整党工作。

经过试点，一九七〇年在全党普遍推行。

整党着重在对党员进行思想整顿。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建党理论，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思想，提高党员觉悟，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的。

通过整顿，绝大多数党员都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清除出党的只是查有实据的叛徒等极少数人。

整党工作完成以后，又接着进行了整顿共青团、整顿工会、妇联等等群众组织有工作。

2009 年 6 月 1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8 日修改

第一章第七节 毕业生分配、上山下乡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话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思想。你们群众内遗留下一些问题未解决，首先是支农青年问题，不尽你们地区有，武汉、上海、南京、长沙也有。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一点首先不成立。上山下乡是主席思想，本来我国城乡是畸形发展的，现在要消灭城乡差别，要工农结合，面向农村。我国农村地区辽阔，搞结合在农村的容量比工厂大得多，不能城市的青年都在工厂，农村的青年在农村，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应该更多的青年走到农村。有一部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有一部分干部子弟不安心在农村，有些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也不安心在农村，因此想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城市，特别是广州下乡青年还有一个户口保留这是陶铸搞的。现在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安排工作，要工作农村是广阔天地，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的人，本身就是还留恋城市，是受陶铸毒害的。下乡就应安心于农村。当然有的地方生活安排不够好，应该由各机关安排解决。第二个原因我替你们解释一下，是武斗要帮手时，给这些人一点钱粮，就容易出来，夺枪用了他们，当然我不是指责哪个组织，谁有就自己批评了，你们不要指责某些组织，现在搞复课闹革命，按系统、行业大联合，曾经帮助过你们的朋友成了你们的包袱，你们也不好处理，但是都不要指责对方。

现在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挑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说这种话的人就是错误的，现在广州支农青年有三万人左右，这个统计可能高了一些“10.8”文件下达后，回去一些，少了一点，大概还有一万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最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首都中学志愿去祖国边疆农村牧场插队的红卫兵战士《志愿上山下乡的革命小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务院关于社来社去农校学生要求国家统配问题的批复

1968.03.17； [68] 国发文 48 号

江苏省军管会：

三月八日电悉，同意你们处理“社来社去”学生的四项措施。中等农校从公社招生，毕业后回原社、队当社员（即“社来社去”），或统一招生，规定毕业后到农村当社员的办法是正确的，是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村发展纲要》第二十一条中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员，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批示“同意照办”的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指出：“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因此“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和统一招生规定毕业后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的学生，就应该一律按办学部门原来的规定到农村去，回原社，队去，当社员，拿公社工分，国家不发工资。

农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当社员，同贫下中农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灭资兴无，移风易俗的大事。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各级领导部门和学校，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做出贡献。要教育师生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走资派和坏份子的借机捣乱。对于那些打，砸，抢，抓和破坏，盗窃变卖国家财产的指使者，组织者及首要分子，应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处份。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

1968.04.04；中发 [68] 54 号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很好，特转发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讨论、参考执行。

毛主席指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在教育战线上，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陆定一等一夥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二，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

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又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逐渐树立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分配当农民的毕业生，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各种国营农场去。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去当中小学教员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劳动。

三，大专院校毕业生，都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私，批修”，大破个人主义，大破无政府主义，加强全局观点，坚决服从国家分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内地去。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带头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服从国家分配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毕业生，不论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在工资制度未改革之前，其工资暂按原定的标准发给。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其工资除了集体经济分配的劳动收入以外，不足原定毕业生工资标准的部份，由国家予以补贴。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工资发放办法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今年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军委办事组批发总后勤部《关于接受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总后勤部关于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分配工作情况报告

北京市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共有二万二千六百余人，除清华、北大、北航、京工、科技大学因国防机要部门减退一千七百余入，有待重新分配外，其他院校毕业生，都已离开学校，到工农兵当中接受再教育。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兰州武汉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兰州市一万八千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雄心，最近陆续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武汉市已有两万多名高、初中毕业生陆续奔赴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评论员《革命青年的榜样》

向青年同志们推荐本期发表的金训华同志的日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成长起来，坚决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决心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青年一代的心声。

金训华同志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了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战斗。今年五月间，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带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今年八月十五日，双河两岸山洪倾泻，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物资，奋战山洪，不幸光荣牺牲。根据金训华同志生前的多次申请，有关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报告》指出，对于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一年抓几次，定期派人下去检查。下乡知识青年较多的社、队，可在党政机构领导下，成立由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各地要抽调干部到知识青年中去，参加劳动锻炼，协助领导。

《报告》还提出，京、津、沪三大城市可在边疆地区试办集体所有制的五七农场，安置知识青年；农场要实行经济核算，采取评工记分的办法，不宜由国家包下来发固定工资。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应届毕业生的情况报告”

197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应届毕业生的情况报告》。

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参照这个报告把应届毕业生的工作做好。

《报告》介绍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通过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毕业生进行鉴定工作的做法，提出对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学生，要重在教育。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帮助他们继续做到“划、清、站”。对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学生，要“批”字当头，立足于“拉”，执行“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的方针。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1969至1971年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要求：1969、1970、1971年应届毕业生从本年7月开始分配，一般于7月底前分配完毕。各校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毕业生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作出新贡献。其分配办法、工资待遇等，均照1968年分配时的中央有关规定执行。已外迁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原则上就地分配，不再回到北京和其他大城市。7月18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外语院校应届毕业生分配办法的通知》，提出具体办法。11月9日，国务院又转发外交部的报告，指出凡在军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的1967、1968届及少数1966届毕业生，也予以分配工作。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要抓紧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上的领导。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中，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要坚决地打击一小撮拉拢、腐蚀、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要有力地抵制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侵袭和影响，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

为了搞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省、地、县要有专门班子抓，社、队要有专人管。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亲自动手。要认真总结和及时推广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教育知识青年、社队领导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要抓好典型，树立标兵，带动一般。面上的工作，一年要认真地抓几次。城乡之间，有关部门之间，应当密切配合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目前，有些地区采取由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做法，效果很好。这些干部，一面自己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面协助社、队加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既促进了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又带动了知识青年的革命化。这个经验，各地可以推广。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 200 来斤，外加 2、300 斤鲜地瓜和 10 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 200 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 100 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 1969 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

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即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

1973.06.10；中发 [1973] 21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对李庆霖同志的来信作了重要答复。现将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印发给你们，请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

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对你们从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带回去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以及这次印发给你们参阅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

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一人（内有专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1973.08.04； 中发 [1973] 30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教导为指针，层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纠正不正之风，以极大的热情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这项工作。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严格地全面地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并且总结经验，表扬先进，推动全面。

此件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附件发到省、市、自治区党委，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办法下达。

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

（发至县、团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他们中间，有从天津市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插队的三十名青年和一名教师，同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奋斗，粮食总产量三年翻了一番。河南光山县孙铁铺公社郑堂青年生产队，在贫下中农协助下，艰苦创业，一年建队，二年自给，三年有贡献，四年粮食总产从七万斤增加到二十万斤，棉花地拉沙改土，

加强管理，使亩产从十斤提高到一百多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由知识青年组成的担架连三排，在珍宝岛反击战中，配合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立了功。在云南勐腊县山寨扎根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成为爱尼族人民最喜爱的多面手。河北涿鹿县的插队知识青年程有志，在培育优良品种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在陕西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到黑龙江农村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抢救社会主义财产，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实际斗争锻炼，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成长，已有五万九千多人入党，八十三万多人入团，十四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更多的人成为各种各样又红又专的人材。

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有些领导干部，把这项重大战略部署当作临时措施，抓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不少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培养、教育无人过问。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把子女留在城市或者调离农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极力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他们甚至篡夺了个别单位的部分领导权，实行法西斯专政，残害下乡知识青年，而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对迫害、摧残下乡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有的甚至纵容包庇。

会议讨论和议定了六条统筹解决的办法，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1973.08.04； 中发 [1973] 30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教导为指针，层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纠正不正之风，以极大的热情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这项工作。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严格地全面

地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并且总结经验，表扬先进，推动全面。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贰、本节简论

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小学、中学特别是专科、大学积压下来未事先分配的毕业生已经有三届了。而且，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各单位已经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因此，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提上了日程。

毕业生的分配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的分配。由于这个时候大学、中学一般尚未恢复招生，小学毕业生可以升初中，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就只能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地方规定每户必须有一个子女下乡。实事求是地说，初中毕业的孩子刚刚满十五岁，就远离父母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了。这些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一部分是安排在国营农场，集体的插队落户；一部分是安排在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单个的插队落户。前者比较易于加强管理，后者就比较疏于管理，出的问题也比较多。

几年以后，有一部分人陆续考取了职业中专或分配到城市的国营单位工作。也有一些人被保送到恢复招生以后的大学学习。

一部分是大学专科、本科的毕业生的分配。这部分学生大部分是分配到国营农场进行劳动。几年以后，陆续分配到了新的工作单位。

知识青年到工农中间去的大方向应该肯定，实施中的经验教训也应当总结。

2009年6月22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9 日修改

第一章第八节 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革命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谈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文汇报》、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

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三，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第四，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应该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现场会上的讲话
大学今后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高中毕业升大学的路就堵死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根本的在于内容而不在于形式。

大学生包括中学生最难了解的是农民，知识分子最难的不是到城市，跟工人转一转还可以，而是到农村跟农民。

（二）不当普通劳动者，搞的还是修正主义。

（三）社会分工的消除，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毛泽东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 1，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 2，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
- 3，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
- 4，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 (一) 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二) 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 (三) 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的批评也宜从缓。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它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命委员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一九七〇年一月，毛泽东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
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将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的一封来信转报毛泽东时写道，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他的生活。

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0.01.31；中发〔1970〕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并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和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曾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加强领导，中央同意会议拟定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由张春桥同志担任组长，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同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同志任副组长，重新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

会议制定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中央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希望南方十三省、市、区积极行动，付之实现，并应将防治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也列入这一工作规划（草案）中去。血吸虫病危害和威胁广大人民健康，直接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战备观点出发，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并且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要抓紧时机，一鼓作气，连续打它几仗，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血吸虫病，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

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可参照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精神，加强对克山病、大骨节病、布氏杆菌病等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要从战备观点出发，抓紧时间，尽快做出成绩。

一九七〇年三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始招生，两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教导我们：“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严重危害广大贫下中农的健康，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应当积极进行防治。希望有这两种病的各省、市、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规划，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行之有效的防治经验，以期尽快地控制和消灭这些疾病。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0.06.27；中发 [1970] 46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军代表：

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供参考，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办理。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示：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过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和春桥同志酌定。

附件一：

一九七〇年五月，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现将中央血防领导小组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认真落实报告中所提出的四项重要措施。同时，中央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四日“关于上海贯彻南方十三省、市、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给你们，供参考。

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要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做出成绩，报告中央。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夏天农忙季节后，要展开一次爱国卫生的群众性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各地讲卫生，除四害、预防疾病的运动必须在城市依靠工厂、矿山、商店、学校、机关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群众，在农村公社依靠生产队的群众，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广大群众轮班参加，结合本地实际，在运动中养成重视卫生、持之以恒的好习惯。一年抓几次，久了便会像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一样，在全国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

附件一：

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附件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贯彻南方十三省、市、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一九七〇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内部刊物扩大订阅范围的通知

通知决定：对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参考消息》，从8月1日起扩大订阅范围。《参考资料》和《国际共运参考资料》扩大发行到省、军级；《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工矿企业车间和农村生产大队、解放军连队的党支部。

12月6日，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明确以上3份刊物的订阅范围，再次发出通知，建议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委员及军级党委委员等均可订阅《参考资料》、《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也相应作了调整。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

文化组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成立的，因为富治同志病了，总理工作很忙，所以以后就没有找文化组开会。

文化组三月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原因是大家刚凑在一起，有的同志民主集中制注意不够，个人发号施令。今后在吴德、贤权同志领导下，实行群言堂，要搞民主，当然也要集中。八年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搞了这么点东西，主席肯定了我们。出现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细致。对缺点错误要分析，正确的意见要接受，不正确的意见其中也有的好心人提的。我这么多年是细致的，不细致是站不住的。文艺关键是树立先进的人物，中间人物大量存在，反动是少数，我们用先进人物改造中间人物。我们对反革命的攻击要顶住。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四月十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的同志和一百九十八所高等院校（包括军队系统院校）的代表，共六百三十一人。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批修整风。与会同志怀着极大的愤慨，揭发、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滔天罪行，批判了他们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学习了马、列主义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长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总结了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次会议，着重对大学教育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经验，也初步讨论了中小学教育革命的若干问题。

同志们一致认为，这次会开得好。进一步分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会议将有力地推动教育革命胜利发展。

(一)

会议分析了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一致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他们长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教育战线上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新的光辉指示，亲自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斗、批、改，为教育革命树立了样板。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各地工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清队，整党建党，使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大学开始招生，出现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新局面。原来干部和教师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得到程度不同的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成长。全国各地广大群众沿着《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学校，积累了许多生动活泼的经验。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思想已经在全党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里生根。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会议认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得来不易。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

长期以来，在教育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教育战线领导权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毛主席不但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而且制定了一整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并且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许多重大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并且提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战线的任务。解放初期，遵照毛主席关于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工作”的指示，对旧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办了一些抗大式的学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主席发动对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适、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的批判，在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一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刘少奇一伙，在教育方面，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就是说不要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又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妄图把中国的教育制度变成封、资、修的混合物，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光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批驳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规定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胜利，使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势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和破坏，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他们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疯狂地反攻倒算。一九六一年，又通过制定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教育革命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并且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

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刘少奇一伙竭力封锁、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到处推行资产阶级的“两种教育制度”，妄图继续霸占住教育阵地，对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事实证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教育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次抵制和斗争，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甚至有的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在教育战线上，这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严重现象，引起了全国广大工农兵的强烈不满。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曲折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教职工奋起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了旧教育制度的反，夺了走资派的权。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极力煽动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操纵“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插手学校，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造成了学校长期“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严重局面。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长工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为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阵地的领导权，用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改造教育阵地创造了条件。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十二年的斗争充分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力量，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成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使教育战线的形势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但是，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谁如果不认识这一点，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就不可能坚持地百折不回地把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就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要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会议认为，造成这个新部队要靠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共同努力。但是，应当指出，搞好教育革命，办好大学，使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得到学习提高的机会，是造成这个新部队的一个重要条件。应当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去深刻地认识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性，正确处理教育革命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在当前教育革命斗、批、改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这是无产阶级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彻底摧毁剥削阶级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建立一个思想上、组织上革命化的党委领导班子。现在，有些学校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应当加强，特别要注意配备得力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些干部缺乏办学经验，又受到资产阶级散布的教育工作“危险”论的毒害，因而不敢大胆领导，这是不对的。没有经验可以从实践中取得经验。无产阶级不能巩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是真正的危险。只要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又能坚持走群众路线，遇事同群众商量，谦虚谨慎，多做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不断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逐步学会领导学校工作。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长期留下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政治作用。校、系两级领导班子要有宣传队员参加。革委会是党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实行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要继续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学校原有革命干部的作用，并大力培养新干部。要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

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要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贯彻两个“决议”，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用毛泽东思想建校育人。

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宣传队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旺盛的革命意志，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应当记取无产阶级派到文教战线去的人，在不长的时间内被资产阶级腐蚀的许多历史教训。要克服“临时”观点，树立牢固占领、彻底改造教育阵地的决心。宣传队员轮换不要频繁。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要相对稳定，对这一部分人的调动，要经地方上级党委批准。各省、市、自治区要加强对宣传队的统一领导、管理，派出单位要保证宣传队员的质量和一定数量，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二、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毛主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七·二一”指示中又指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各地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指示的这条道路，是彻底破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教育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要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要把学文和兼学别样结合起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工农兵学员在学校过程中仍要参加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要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反对单纯学理论和轻视理论学习的两种偏向。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继承抗大的革命传统。

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统筹规划，组织好厂（社）校挂钩，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校办工厂（农林院校的农场）应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教学和科研，以小型为主，既有一定批量生产，又要搞研究试制。防止贪大求全、片面追求科研生产指标的倾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把校办工厂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配备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并认真解决劳保福利等问题。要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开展科学研究。

遵照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学校要加强战备教育，组织师生学军，进行野营训练，开展民兵活动。发展体育运动。

各地遵照《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已陆续创建了一些厂办工人大学，遵照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指示信中关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的教导，在农村创建了一批“五·七”大学或“五·七”学校。这些学校已经多、

快、好、省地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人材，受到群众欢迎。各省、市、自治区要抓好典型，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同时要大力办好各种业余教育。

三、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阵地过去被剥削阶级长期垄断，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它的传统势力十分顽固。它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旧体系。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这些旧思想，总是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阻碍教育革命的深入。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教导，深入持久地批判资产阶级。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展批修整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结合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些反动谬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等等就是它的突出表现。在各个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中，这些谬论更是普遍。这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武器把它彻底摧毁，才能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要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克服那种认为革命大批判搞得“差不多”的思想和“走过场”、“一阵风”的错误倾向。领导要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紧跟国内外阶级斗争新形势，密切结合教育革命实践，联系师生的思想实际，有计划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要批判右的和极“左”的反动思潮。要重视对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批判要深入，就要进一步学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善于对事物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四、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是创建社会主义学校的重要任务。

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要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吸收工农兵参加教学活动，主要是就地聘请。要从工厂、农村、部队选调一批工农兵和同工农兵结合较好的革命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也可以选留工农兵毕业生担任教师。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积极支持选送教师的工作。

对原有教师队伍要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因此，必须继续抓紧对原有教师的再教育，引导他们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着重解决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防止只使用不改造和只讲改造不敢使用的两种倾向。要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原有的教师队伍中凡属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都应重在教育，加以团结和任用。凡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教育和改造。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对顽固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坚决予以揭露，批倒批臭，作为反面教员，教育群众。对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则应根据党的政策适当处置。

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他们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暴露出一些旧思想是正常现象，“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要耐心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继续大胆实践。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科学中的是非问题，要通过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在教育革命中要提倡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允许不同方案的试验和比较。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在强调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左”的倾向；在强调团结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

要创造条件，让原有教师分期分批到工厂、农村、部队，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尽快地适应教育革命的要求。年老体弱的，可分配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需要辞职、退休的，应根据国务院规定妥善安置。

五、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

的思想”的教导，工农兵学员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要坚决地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员和教员都要执行毛主席指示，“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是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的主动性、创造性，还是把学员当敌人那样管起来？是培养一批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培养一批书呆子？这决不是小事。教学方法不改革，一批生动活泼的工农子弟仍然有学用脱节或者啥也没真正学会，身体搞垮了的危险。因此，必须废止注入式，采用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法。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教师应发讲义或讲授提纲，提倡自学。

根据初步的经验，大专院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一般应有相应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选拔工农兵学员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坚决反对草率从事和“走后门”。五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或者学制在一年左右的进修班、短训办学员，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其他学员发生活费，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原单位给以适当补助。

大学学制暂以二或三年试行，进修班为一年左右。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待遇由国家另行规定。

六、教材要彻底改革。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积极编写新教材。应当深入实际，学习和总结工农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使教材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大破唯心论、形而上学，坚持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教材内容要少而精，要便于学员自学。

对原来教材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分析、批判、改造，推陈出新。适应选编一些反面材料，供批判用。要办好图书馆。

对改革教材的工作，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有工农兵参加。教材由各地编写和交流。

七、高等院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战备的需要，经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对全国原有高等院校（不包括艺术院校）提出了调整方案，会后继续试行。要逐步改变院校布局不合理状况，撤消专业要慎重。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原部属院校下放后，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学校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地方把学校办好，既要反对“条条专政”，又不要撒手不管。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八、会议就中小学教育革命中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认为我国中小学教育革命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

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必须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要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保证上文化课的时间，打好基础。要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课程和作业不应太重，生产劳动要安排适当，社会活动也不要搞得过多。

要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原有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教师任务过重的单位，应适当增加公办教师的指标和民办教师的数量。要选调优秀的工农兵担任教师。借调作其他工作的教师应调回。要清除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对道德败坏、不宜留校的人，要坚决调出另作处理。

“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和街道办学。民办公助的学校和民办教师，国家补助应是主要的。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要相应增加。今后，国家专拨一定数量的经费，以保证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各级计划、财政、教育部门应共同协商，提出分

配方案下发，不得挪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要特别注意加以帮助。

“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学制，暂不统一规定，各地可以继续按当地情况进行试验。

九、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是我国普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认真办好。

十、军队院校的教育革命，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三）

教育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大、中、小学学生占我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用毛泽东思想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说：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当前教育革命的斗、批、改，许多问题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解决。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教育战线的工作。“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要把教育革命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切实地抓好典型，总结经验，解决教育战线上出现的路线和政策问题。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各条战线，特别是有关部门都要经常关心和积极支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同志们坚定地相信，不管还要克服多少困难，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一定会完全实现。大家信心百倍，鼓足干劲，决心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央批语）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批语

1971.08.13；中发 [1971] 44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批语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党委，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的领导小组、核心小组：

中央同意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现发给你们，望各级党委认真讨论执行。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全国出版部门和工农兵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原计划召开两周，因为面临许多复杂问题，延长4个多月才结束。

周恩来于4月12日和6月24日两次接见会议代表，他说：“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座谈会提出了今后两三年内的出版计划，要求各地领导把出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目前，第一书记应抓一下出版工作。

会议提出：出版部门应当健全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实行三分之一人员坚持工作，三分之一人员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下放劳动的“三三制”。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同意了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

会议报告提出了关于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报告要求编辑队伍要“掺沙子”，吸收工农兵参加。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在全国试行新广播体操的通知

《通知》说：这套新广播体操由国家体委编操小组编制，中央乐团配曲。全操共有 8 节，做一遍约需 5 分钟时间。新操编出后，在 140 多个单位的 9 万多人中试做和修改，征求了各地和各部门的意见。从 9 月 1 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广播电台将予播送，北京电视台也将举办节目。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05.01；中发[1972] 19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目前，高等学校一九七二年春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一九七零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各级领导对招生工作一般比较重视，注意发动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较好地完成了招生任务，促进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发展。

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

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为了反对特殊化，纠正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选送学员的地区和单位，要把中央有关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本地区、本单位的选送名额原原本本告诉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推荐选拔；审批机关要了解群众评议和推荐的情况；学校要认真进行复审，有关领导机关和选送单位要给以支持。

（二）各有关领导部门、选送学员的单位和招生的学校，要按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应及时向当地有关党、政、军领导机关反映。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三）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做好从部队选调学员入地方高等学校培养工作的通知

自 1970 年以来，部队共选调了 9300 余名基层干部和战士进入地方高等学校学习。

这种做法至 1977 年停止。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五·七”道路育新人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北京来的好“摩雅”

贰、本节简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出版等领域里的革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很可惜，进入斗批改阶段不久，由于斗争任务转移，领导层的注意力也转移了。加之，有人利用批极左、搞整顿，刮起一阵阵的右倾翻案风。这些领域的革命未能深入开展下去。

这些探索的大方向究竟正确还是错误，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反复检验。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领域里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广大工农兵群众深受其害，体会最深。身处社会中下层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广大知识分子，也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

斗争正在进行中。

2009 年 6 月 29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9 日修改

第一章第九节 改革旧的规章制度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毛泽东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

1969年6月28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的精简整编方案：

总参谋部原编15个部、局，除合并或精简的部外，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调查部与总参谋部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谋部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谋部测绘局合并，这样，总参谋部共设13个部、厅、局。

总后勤部原编13个部、局，调整后为8个部，1个局，另设6个地区性的物资工厂管理局。

同年11月，又公布了总政治部机关的精简整编方案。

这次调整撤并了装备、动员、财务、军需等职能部门，变更了综合、计划、供应的管理体制。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决定组成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周恩来任组长。副组长有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副总参谋长）。

领导小组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设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根据小组的意图，负责对全国人民防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次日，经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军管会“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简报”

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军管会《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简报》。《简报》指出，1969年计划财政收支各为570亿元，是根据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15%，工业生产成本比1966年降低4%的安排确定的。从上半年执行情况看，实际上都没有达到预定指标，财政收入仅完成年度计划的40·8%。估计全年可能少收几十亿元。

《简报》提出，必须抓紧增产节约，加强经济核算，严格财经纪律，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压缩财政开支。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铁道部军管会、交通部军管会、邮电部军管会和解放军通讯兵部《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

《意见》说，电信、邮政从中央到基层都分开，属电信系统的事业、企业单位以及人员、设备统归军队领导。邮电部撤销后，电信部分成立一个电信总局，管理电信业务，归通讯兵部直接领导。邮政部分成立一个邮政总局，管理邮政业务，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

省以下各级邮电部门撤销后，电信部分成立电信局，由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武部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双重领导，以军事部门为主。邮政部分与交通部门合并，实行由省、市、自治区与交通部门的双重领导，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电信系统归军队领导后，其性质是军队领导下的事业、企业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电信总局和省、市、自治区以下的电信、邮政基本建设计划、财政计划、劳动工资计划、物资供应计划等等，从1970年起分别纳入中央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各项计划。

《意见》提出：交接工作应由上而下，由领导机关到事业、企业单位分批进行。全国电信、邮政分开的工作，于1969年12月1日前完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总参测绘局与国家测绘总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合并后撤销的通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民航总局“关于进一步改革民航体制和制度的报告”

决定把国家民航总局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按空军执行，各级机构按军队组织序列进行调整，但对外名称不变，仍为国务院直属局。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总参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决定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是直属中央军委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国防工业的规划、生产和科研的领导机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任组长。同时撤销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

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农垦部直属橡胶垦区下放地方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援外国人员的审查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三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军管会“关于下放工商税收管理权的报告”

报告指出：

一、扩大地方减税、免税的批准权。国营企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因生产、经营、价格发生较大变化和国营企业试制新产品，使整个企业发生亏损，按照国

家规定纳税确有困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批准，可以给予定期的减税、免税照顾，不再报财政部审批。

二、下放对农村人民公社征税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可以在全国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确定工商统一税的征税范围，采取减税、免税措施，制定简便易行的收税办法。

三、对投机倒把罚款和对个体经济加成征税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结合具体情况掌握处理。

四、下放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和集市交易税的管理权。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关于撤销华侨投资公司的报告”

华侨投资公司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成立的。18年来，在设有投资公司的12个省、市、自治区，共吸收华侨投资5281万美元，支援了祖国经济建设。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精简合并各部、委、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6月7日，国务院提出《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报告。

中央批语指出：国务院各部、委革命委员会通过党的核心小组加强对各部、委的一元化领导，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在落实国家计划的工作中，要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各部、委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外，一般都应下放。下放工作在今年内，应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完毕。不要什么事情都统得死死的，要坚决反对“条条专政”。

《报告》提出：

一、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合并为27个。

二、各部、委设立必要的层次少、人员精的办事机构。暂定编制为原有的 18%。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冶金部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

会议讨论制定 1970 年和“四五”期间的计划任务。确定：1970 年全国产钢 1700 万吨，力争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 1975 年，产钢 4000 万吨，生产能力达到 5000 万吨，基本建成内地的钢铁基地，并在各经济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同意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语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

6 月 11 日，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提出要在 1971 年实现全自治区人民公社化，同时结合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补划阶级成份，在农区调整阶级政策。

中共中央《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指示》原则同意《请示报告》所提出的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并对若干具体问题作出政策规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发。

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草稿)，由各省参加会议的代表带回各地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后，证明它能起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并解决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央现正式批准这个报告，望各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同时，可根据这一报告，联系到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在今年十二月中旬提出一九七一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发展计划。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民航收费标准的决定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全国棉花总产量四千六百多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花生、油菜籽、芝麻七千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糖料三亿一千六百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关于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报告》

《报告》决定：对国防工业的管理，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国防工厂的管理体制只下到省一级，第四、五机部的工厂全部下放，第三、六机部的工厂部分下放，由大军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领导。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出，1969年、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26‰左右。为了切实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要求在“四·五”期间人口

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 1975 年，一般城市降到 10%左右，农村降到 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低的不应回升。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国务院关于内迁职工家属安置问题的有关规定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国务院批准全面调整银行利率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国务院“关于 1971 年物价调整方案”

《调整方案》说，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决定适当提高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降低部分支农产品、机械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

从 1965 年开始，连续 6 年实行的粮食征购一定三年的政策，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通知》说，从 1971 年起，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五年的政策。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期间内，对有的社队由于国家投资兴修水利后增产幅度较大，或发现少数社队畸轻畸重的，可经过协商作适当调整。

《通知》还对 1971 年至 1975 年粮食征购基数作了调整。由现行的 726 亿斤调整到 765.5 亿斤，增加 39.5 亿斤。各省、市、自治区向下分配任务时，可以在中央确定的征购基数基础上，增加 5%左右的机动数，用以调剂受灾减免，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省以下各级不得层层加码。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增加储备的需要，在丰收的地区，可以通过协商，向社队适当超购一部分粮食。超购的粮食，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超购加价幅度不得高于统购牌价的 30%。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次调整工资，主要是考虑 1958 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已经工作多年，多数已成为生产骨干，有两三个孩子，每月工资在 40 元左右，生活确有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工资和情况类似人员的工资进行一次调整。

这次调资的范围是，1957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1960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1966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工人，以及与上述工人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职工。矿山井下主要生产工人的调整范围，可以分别放宽一级。

调整范围内的工人和工作人员，一般都调高一级。对 1957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1960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工人，可以调高两级。

在这次调整工资中，调高一级的工资级差在 5 元以上的按现行工资标准执行，级差不够 5 元的增加到 5 元，并对这次调级以后的同一级人员，也按调高一级人员的工资额发给工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
全国共有临时工、轮换工 900 多万人，其中从事常年性生产的约 650 万人，从事临时性、季节性生产的约 250 万人。

《通知》规定，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用临时工。

现在这种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凡是生产、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表现较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作的，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以改为固定工。改为固定工后，工资一般暂不变动，少数人工资过高，群众意

见大的，可以适当调整；工资偏低的，按照 1971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发出的调资通知中有关规定调整。上述临时工改为固定工，不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农业临时工。

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工作岗位，仍须使用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在企业工作期间的政治待遇、粮食定量、劳保用品应当和同工种的固定工相同。因工死亡、致残的应按固定工的劳动保险待遇执行。

对于矿山井下的生产工作岗位，从保护工人身体健康出发，可以继续试用轮换工，并应逐步改进。

县办企业的临时工改为固定工，要采取慎重态度，从严掌握，并须经省、市、自治区审查批准。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国钢铁、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工业大幅度增长，地方小钢铁、小煤矿、小水泥、小化肥、小水电、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得到很快的发展。各行各业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农机产品增加三百多种；耕作机械、排灌机械、加工机械、运输机械等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机具的产量成倍增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

十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一九八〇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八十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一百五十万台左右。排灌动力达到六千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施化肥八十市斤左右。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发

今年的农业生产，在战胜了旱、涝、风、虫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又夺得了第十个丰收年。目前，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

一、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人民公社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

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生产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的社队，经过社员讨论同意，可以适当地多留一些公共积累。

公社、大队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共积累，如果举办企业、购买农业机械等，在不影响生产队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同意，也可以从生产队适当提取一部分公共积累。

公积金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不准用于盖办公室、礼堂、招待所和请客送礼等非生产性的开支。

二、认真搞好粮食分配。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既要保证及时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同时安排好社员生活，“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生产队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留足种子和饲料粮。“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集体的储备粮主要用于备战、备荒，不得轻易动用。必须动用时，要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口粮的分配办法，一般可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分工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也可以实行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它适当办法。不论实行那种办法，都应做到既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实保证烈属、军属、职工家属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社员口粮应当分发到户，由社员自己管理。要教育社员勤俭持家，计划用粮。

要合理安排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任务或统销指标，坚决保证这些地区的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要合理安排林区、牧区、渔区社员的口粮。

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搞好劳动计酬，是按劳分配的依据。在社员劳动计酬上，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不断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当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应该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

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的办法，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群众商量，不可硬搬照套。要发动群众认真总结当地好的典型经验，改掉那些限制群众积极性的、繁琐的、不合理的東西，坚持那些为多数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并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必须批判。有些地方，“四类分子”在家的男劳力多，他们利用干部、群众的旧思想，煽动搞男女同工不同酬，剥削贫下中农，应特别引起注意，要及时揭发，坚决斗争。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 and 经济核算试行办法》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复员干部安排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四月，全国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制定《全国清产核资实施办法（草案）》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农村部联合调查组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增加棉花进口的报告”报告指出，1969年以来，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由1968年的4700万担下降到1972年的3900万担。因此每年不得不动用国家库存棉花，使库存纺棉由1968年的4864万担减少到1972年的3213万担。1972年计划生产棉纱1000万件，由于棉花原料供应不足，影响了棉花生产。到年底，国家棉布库存量将比年初减少15亿米。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棉花价格下降，对进口有利。因此，报告建议1973年从国外进口700万担棉花。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照办。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太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

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相信，全党同志一定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今年粮食产量可达四千八百一十二斤，比去年实报五千零三亿斤，减产一百九十亿斤。购销相抵之后，将出现一个一百三十六亿斤的“窟窿”，除进口三十亿斤外，需要挖库存一百零六亿斤。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今年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另一方面是近两年来我们对粮食工作过问

得少了，放松了，在连续十年丰收的大好形势下，思想上麻痹了，忘记了主席必须把粮食抓紧的教导。去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本应当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增加几十亿斤的库存。可是相反，却挖了十四亿斤库存。当时，我们对这一情况有所觉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年问题就更突出了。

粮食上发生的问题，也是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反映。周总理在今年初就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对此，我们领会不深，致使“窟窿”越来越大。造成“三个突破”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仅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两年，就增加职工九百八十三万人，超过计划五百零九万人。今年劳动计划是一百万人，但上半年就被突破了。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今年底职工人数可能突破五千五百万人，工资支出将达到三百三十七亿元，粮食销量也将突破九百亿斤。

一九七三年，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发出关于口岸工作的情况和改进意见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国务院批转一九七三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

各地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抓好体育战线的批林整风，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教导，从儿童抓起，积极发展群众体育运动，同时加强优秀运动队的建设，改变目前运动员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对国家计委《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的指示

十条的主要内容，即：

(1) 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主要是中央和省、市、区两级的平衡。反对各行其是。

(2) 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

(3) 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都要服从中央和省市区的统一调度。

(4) 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保证物资调得动，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申请物资，不准弄虚作假，虚报冒领。

(5) 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收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

(6) 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

(7) 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整顿企业。

(8) 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9) 加强纪律性，纠正不正之风。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违法乱纪的，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

(10)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总理说：

六九年以后，经济管理瞎指挥来了。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厂给炸了。林彪一伙直接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七三年。恶果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挡住。九大以后，林彪一伙破坏计划的材料，搞他一本，大家批判嘛。

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测绘、气象、邮电部门体制问题的请示”

请示说，自 1969 年底，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央气象局、电信总局、邮电总局等部门统由军事部门领导之后，对开展业务工作和对外交往带来许多不便利。邮

电、电信分开，增加了机构和人员，工作也不便利。为此，各地都要求改变这种体制。

建议：将测绘、气象部门分开，国务院和总参分别设立测绘气象机构；邮电部分从交通部划出来，电信与邮政合并，恢复邮电部。地方各级测绘、气象、邮电体制，也做相应调整。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测绘部门体制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气象部门体制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邮电部门体制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转发外交部关于加强地方旅游机构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 41 所院校的报告”

贰、本节简论

严格地说，作为斗批改阶段的改革规章制度的工作，还没有真正起步。

2009 年 7 月 6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30 日修改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一节 一九七〇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斗、批、改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方面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

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全世界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全中国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毛主席、中央：

北大宣传队“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都很好。这是八三四一支左部队进入北大后，对该校斗批改三个阶段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北京市的斗批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送上，请阅示。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军管会或军代表：

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发给你们。这几个报告写的都很好。请你们转发至中央、省、市、自治区管理的直属厂矿企业、事业革委会负责同志和驻大专院校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要他们仔细地阅读。要求他们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特别是那些老大难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一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是不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今后应当怎样认真搞好斗、批、改，更好地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九大”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继续有步履地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级的任务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

在一个一个地区、一个一个单位地落实。革命大批判在各个领域向纵深发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分明了阶级阵线，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伟大的整党建党工作，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数百万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兵结合，深刻地改变着社会面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涌现。在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我国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一个国民经济的新高涨正在到来。

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一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是不是认真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照办了；今后应当怎样认真搞好斗、批、改，更好地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找出差距，制定措施，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的批语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一、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

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五、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

六、苏修大帝国的迷梦

七、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倒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而斗争

在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正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日益成长壮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所有受美帝和苏修侵略、控制、干涉、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反对美帝和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勇敢、勤劳、智慧的伟大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丰项成果，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伟大智慧的又一光辉结晶。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改造世界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六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五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指示稿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未试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

毛泽东批示：照发。

一九七〇年五月下旬，吴法宪传达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谈当前形势

国内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

一个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毛主席说：“这个会议开得好，廿年来没开过这么好的会。”“这话过去我都讲过，没有听，现在好了，这次会开得好。”

二件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毛主席说：“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待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有困难的可以减免。”

第三件是战备：毛主席说：“半年来，战备搞得很好，不但军民要搞好，还要把民防搞好，要把地下道挖通，要储备粮食药品。”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

马哈古卜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毛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毛又说，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毛说，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毛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毛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毛说，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又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毛说，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

毛说，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九周年》

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这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

就是正确对待自己。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努力争取从思想上完全入党。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好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对付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农业学大寨》

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一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句话，就是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是大寨经验最根本的一条。至于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東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

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学得好？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彻底批判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坚决反对了资本主义倾向，有力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深入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混入党内的坏人，保证了社、队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手中。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各项任务，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次会议的公报和各项决定，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高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我们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我们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性教育。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1970.11.06；中发〔1970〕60号

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

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

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此件发至省、军级）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一段谈话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

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可讨厌了！

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 [luo，左“口”右“罗”]，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二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噏！噏！噏！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洲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

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 [luo，左“口”右“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秩序）

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们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一上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毛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多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再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 S 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 O 型，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〇年，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继续有步履地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一个一个地区、一个一个单位地落实。革命大批判在各个领域向纵深发展：

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分明了阶级阵线，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整党建党工作，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

数百万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兵结合，深刻地改变着社会面貌。

在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一个国民经济的新高涨正在到来。

在这个基础上，这年的上半年，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积极着手筹备修改宪法、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筹备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等等。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层中正在逐渐形成的林彪集团，企图夺取更大的权力，进行着各种活动。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幌子，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的人打成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反革命分子。另一个是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问题，他们打着坚持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幌子，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的人，打成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打倒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领导人。毛泽东发现并粉碎了这个阴谋。

一九七〇年第四季度，在继续完成既定的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突出地抓住批陈整风，教育干部。并着手考虑解决中美关系问题。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十二日，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与刘丰谈话。汪东兴把第二次书面检查呈送给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找汪东兴去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与李雪峰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叶群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检讨作了批示：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九日，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2009年7月13日初稿

2011年12月31日修改

第二章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把林立果送到空军。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北京部队文艺演出发生“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叶群报告了林彪，林认为这是一次打击军内造反派的好机会。他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他认为：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

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

叶群的话等于林彪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

吴法宪、李作鹏和其他驻京机关的领导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奋。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

造反派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这是“老保翻天”，他们联络清华“井冈山”等地方造反派发表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

萧华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织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

演出的时间是 5 月 13 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海军党委事先开了会，决心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李作鹏、萧劲光、张秀川还到了现场，空军的余立金也到了现场，卫戍区的傅崇碧带部队也到了现场。造反派则请来了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地方造反派。

演出开始不久，造反派冲击会场，等到冲进会场有上千人时，李作鹏下命令实行反击，把造反派分割开来。造反派又叫来了千余人，都被击退了。双方受伤有几十人，整个武斗经过了几小时才结束。

周总理、陈伯达、萧华、张秀川都在人民大会堂，他们都同意两派联合演出，给两派头头做工作。

5 月 16 日，杨成武、叶群、吴法宪等人深入海、空军总医院、304 医院慰问被造反派打伤的伤员，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等于公开表明了打击、压制造反派态度。

6 月 9 日晚，林彪、周恩来、中央碰头会议成员、驻京三军负责人再次观看了一派的演出。

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除军事博物馆的造反派和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之外，各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部队的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

从此形成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与林彪、叶群之间的特殊关系。

1970 年 5 月 13 日，叶群建议黄吴李邱同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

叶群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李作鹏接着叶群的话说：“三年前的今天，要不是叶主任支持我们，军队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得了逞，军队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

叶群就说：“这要感谢毛主席，是主席叫我支持你们的。我们要共同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这个“调研小组”就是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杨成武的问题。毛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和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彪说：“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

事实上是，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涉足军队，决心放弃杨。

林彪之所以“弃杨留吴”是他认为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林彪认为：，杨成武对他耍了两面派——既归依自己，又讨好江青（不便直接说毛泽东），竟敢以江青来压自己！他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这几个人都要通过叶群才能向林彪请求汇报工作。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同一天，温玉成被任命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不久，也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办事组会议上，温常唱反调，引起黄、吴、李、邱等人不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汪东兴多次把有关毛泽东的小道消息送给林彪。

汪东兴还常到三座门找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有时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家中密谈。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

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因为毛主席没有表态。

林立果说：苏联的司机有什么批头！？

众人大笑。

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又滑胆子又小，他以为巴结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毛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想在上海搞卫星中心，毛主席没有同意。

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形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责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

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黄、吴、李、邱插话说：“他们几个是上海帮。”

从此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人在背后根本不叫他们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林彪召集陈、张、姚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只有几部分。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中央文革向来是集体领导，为什么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江青还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批评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毛主席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生病，没有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这个时候，陈伯达赶写的政治报告草稿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字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〇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中央碰头会上批评了陈伯达。

吴法宪说：“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不发，送到他那里去的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的签字才算完事。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

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彪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林彪原来打算提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黄、吴、李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彪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在大会上，林彪与其说是作报告，还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为，他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彪说我就是念得磕磕巴巴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

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文化革命前参军到 41 军，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调到军区不久就当上了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得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

文革开始，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1967 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还在背后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其中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温玉成把李必达的这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

大概是 4 月 25、26 日，凌晨 3 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发现了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有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李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拒不交代。。

黄永胜给江青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是：“10 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

10 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据李必达的未婚妻王瑞华说：李必达直接向江青写了材料，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 20 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 9 点多钟，邱会作向周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之后说：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

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

黄、吴、叶、李、邱和大家，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语录》丢在飞机上，希望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军委办事组。

邱会作要 301 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去了。他认为，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林彪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形成包括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 李作鹏 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在内的特殊政治集团。

在酝酿和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

选举前，关于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中，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较高。康生、江青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上的造反派头头。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 1502 票（参加投票代表 1510 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九大一共选出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毛主席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各代表团征求常委人选的意见。

康生提出：黄永胜可进常委。

毛主席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

在一次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常委人选的会上，他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合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不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林彪、周恩来和其他多数人的意见：黄永胜不当常委，陈伯达仍然当常委，毛主席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谈话。

黄、吴回去后，立即报告林彪。林彪要他们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吴法宪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

他们对这件事报告毛、周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感到不满。

一九六九年五月，吴法宪等人听到一个新华社记者说：江青等人让他伪造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合影的照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黄永胜与叶群还把他们搞到的所谓伪造照片的原件，交给吴法宪，要他复印三份，由他们三人分别保存，作为证据。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前一张通行证起的作用不很大，因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之下的。

后一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报告特别多。例如：

报告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和对造反派不满的问题；

报告叶剑英汽车上装有特别电话，并有侦听作用问题；

报告聂荣臻在西山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宿舍问题；

报告邱会作支持清华“四一四”派反对中央文革等等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

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王飞、周宇驰又先后把吴法宪的上述指示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汪：“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汪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汪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〇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等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小“联合舰队”。

“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

成员有王飞、周宇弛、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

“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弛是“总管”。

他们的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叶群还为周宇弛、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九月，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林彪担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

林彪与他周围的人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第一关键点就是通过处理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部队演出发生的五一三事件，林彪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形成了一种特殊政治关系。

第二个关节点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搞下台。

第三个关节点是把黄永胜引进军委办事组担任组长，这样就形成了包括黄、吴、叶、李、邱在内的“大联合舰队”。

第四个关节点就是通过九大，除了林彪由党章规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外，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担任了政治局委员。

第五个关节点就是一九六八年以后陈伯达、汪东兴由于他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以及看到林彪集团的势力日渐庞大，逐渐靠拢林彪集团。

林彪集团的形成，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把林立果送到空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吴法宪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〇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等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小“联合舰队”。这个小“联合舰队”以后就成为林彪集团进行非法的阴谋活动的主要工具。

林彪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大致是：顶端是林彪；下面是叶群，由她负责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黄、吴、李、邱（大联合舰队）；另一方面是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刘沛丰（小联合舰队）。这是核心。外围还有争取的同盟者如陈伯达、汪东兴。他们

林彪集团的形成，不单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路线、斗争目标。

林彪集团的政治路线也是逐步形成、暴露出来的：

首先通过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就开始暴露出来。陈伯达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其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再次，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中说：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最后，王飞为林立果提出政变纲领是：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提出“民富国强”是总路线，这是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林彪集团的斗争目标，通过参加一九六八年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活动也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枪杆子”集团，而把原中央文革的成员看成是“笔杆子”集团。而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与林彪争夺接班人位置的，就是这个“笔杆子”集团。他们所谓“枪杆子”集团与“笔杆子”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2009年7月20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6 日修改

第二章第三节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三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毛主席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一九七〇年三月九日，住在苏州的林彪，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 3 月 8 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夜间 11 点 30 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

陈伯达在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的历次的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

一九七〇年四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一九七〇年五月中旬，吴法宪见到林彪时，问林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

林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

（据吴法宪 1971 年 10 月 21 日交代）

一九七零年五月二日晚，林彪、叶群“接见”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一九七零年五月三日晚，王飞、周宇驰召集会议，向林彪表“忠心”，

周宇驰：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也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黄、吴、叶、李、邱同游长城，赠诗题词，摄影留念。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向叶群写了一封信，再次表示他们要“永远牢记”叶群的“教育深恩”。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一九七〇年六月，王飞在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一面胡吹林立果“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出色，很突出”，说什么“早想请他讲讲”，一面又吹嘘林立果“很谦虚”。

鲁珉、贺德全等人跟着帮腔，要求林立果“讲用”。在其他一些人也表示同意后，王飞就说：“既然大家要求立果同志讲，我就把部党委的意见向他转达。”

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吴法宪在常委办公会议提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王飞对吴法宪提出的“两个一切”，首先在空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后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

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一唱一和，对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的宪法修改草案，提出非难。他们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说什么宪法修改草案没有写备战。

一九七〇年七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讨论修改宪法的通知

1970.07.20；中发〔1970〕5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了进一步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接到本通知后，认真动员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广泛讨论修改宪法，提出修改意见；二、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的候选代表。

（一）关于修改宪法问题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实现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它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二、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上说过：这个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已经实现了。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适应这种情况，需要对一九五四年宪法进行修改，使它成为一部在新形势下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新宪法。

三、毛主席关于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是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修改宪法的过程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修改宪

法是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十分重视，必须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广泛讨论，集中革命群众的智慧，采取“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做好修改宪法工作。

四、在这次组织群众反复讨论修改宪法的工作中，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2、我们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3、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

4、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

5、要总结历史经验，以我们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为主，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创造的并为毛主席所肯定的好经验，如人民公社及其政社合一制度，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同时，也要参考别国宪法中好的东西。

6、修改后的新宪法要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人人能记，便于运用。一九五四年宪法中，有些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删去或者根据新的情况改写；有些条文可以删繁就简，精简合并，避免重复。

五、这次动员群众讨论修改宪法，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根据上述原则，动员基层革命群众对一九五四年宪法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要把群众提出的意见分类整理，分两次报送中央。第二阶段

将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宪法修改草案，提到全国基层革命群众中讨论，修改意见仍分两次分类报送中央。

（二）关于通过“四届人大”代表问题

一、各省、市、自治区的“四届人大”候选代表名单均已经过民主协商提出。为再一次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应将各省、市、自治区“四届人大”全部候选代表名单（包括中央与地方商定的爱国人士特邀代表在内），分别提到本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公社、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革命群众中讨论和通过。在讨论中，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应将本省、市、自治区的全部候选代表简历介绍给基层群众，群众有权通过协商调换他们认为不能作人大代表的人。

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亦应将各单位已协商了的“四届人大”候选代表和他们的简历，再一次分别提到军队所属基层单位中讨论和通过。在讨论中，群众有权提出不同意见，通过协商解决。

二、华侨候选代表提到其所在单位的革命群众中讨论和通过。

三、各省、市、自治区、军队和华侨的“四届人大”候选代表提到基层革命群众中讨论和通过后，应分别在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党委会中最后通过，作为“四届人大”正式代表。

（三）关于动员群众问题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接到中央通知后，应立即召开会议，分级进行动员传达。

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所属单位，由军委办事组统一传达，其他各部队由各大军区负责动员传达。

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关键在于领导。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各级领导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国家学说的伟大理

论，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做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抓住重点，掌握典型。在动员范围广、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要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防止流于形式，走过场。

（此件可印发至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基层单位，向革命群众宣读，但不许传抄、张贴、广播和登报）

一九七〇年七月

一九七〇年七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

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

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信后，要汪东兴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汪东兴觉得难办。没有退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

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汪东兴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汪东兴说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汪东兴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

汪东兴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讲用报告”。

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讲用报告”。

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

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

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

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

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

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

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

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

王辉球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

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

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一九七〇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

（据吴法宪交代）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召开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宪法。

会议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出席。

这次会议争论异常激烈。

首先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康生提出不设，吴法宪坚持主张设。争论不下。最后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其次是关于国家机构问题，吴法宪提出：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康生、张春桥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吴法宪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但他对张春桥说的话非常反感。

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吴法宪反驳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发展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你今天吹这样的风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们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们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谬论。

康生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三个副词的观点。宪法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

一九七〇年八月，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

黄永胜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规定，擅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留在北京看家。

总理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黄永胜才勉强同意留在北京（注：此事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黄永胜留在北京）。

黄还布置办事组秘书宋城把准备好的天才语录带上庐山。

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贰、本节简论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修改宪法的工作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

为什么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呢？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考虑。第一，如果设国家主席，很可能要由他来担任，但是，一，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又要增加许多外交礼仪活动；三，打倒了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又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第二，如果设国家主席而他不承担国家主席职务，则必须由其他的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斗争；一，很可能推举林彪担任，但林彪并不是适合的人选，他的身体不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很少参加，那么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更难胜任；一九六八年以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很不正常，他究竟要干什么，一时还捉摸不透。二，如果推举另外一位常委担任，就只能在康生与陈伯达之间选择，这必然会引起一场新的斗争。三、如果推举常委之外的元老人物来担任，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斗争。

为什么林彪在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一反“紧跟”的常态，要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推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呢？第一，他捉摸不定；毛泽东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真意，还是谦虚、礼让？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要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总不会错。第二，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愿当国家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不增加多少实权，但对于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说就更加稳固了。

在讨论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修改宪法小组的一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

应该说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康生之所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决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是根据林彪的意见，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有人说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就离题太远，近乎“造谣”了。

在讨论国家机构时，张春桥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话，因为在宪法的其他地方已经有了。而吴法宪认为不能删，这是是否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

张春桥提出的是文字表述问题，而吴法宪则把它说成是取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这当然是两回事。

张春桥提出从条文中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其实，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曾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

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应该知道。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他们认为，这一次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可以狠狠地整他一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批判张春桥，准备大干一场。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可是，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的观点。宪法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这样一来，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火没有烧起来。这次战火没有烧起来，并不等于矛盾解决了。而是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留下了伏笔。

一九七〇年，林彪集团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把林立果推上组织领导“大小舰队”的第一线。

一九七零年五月二日晚，林彪、叶群“接见”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一九七零年五月三日晚，王飞、周宇驰召集会议，向林彪表“忠心”。这是一次重要的接见，向王飞等人下达了关于林立果今后的地位和作用的旨意。

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吴法宪在常委办公会议提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后王飞对吴法宪提出的“两个一切，首先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讲用报告”。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讲用报告”。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

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有人说：策划五七一工程、谋害伟大领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叛逃出国等等，这一切反革命阴谋活动，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那么，请问：林立果在林彪集团中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和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林立果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为什么林立果不仅能够指挥小舰队，而且能够指挥大舰队？林彪集团中的那些骄横无比的“老领导”、“中层骨干”为什么都那么死心塌地、俯首帖耳地听那么一个毛头小子调动指挥？因为这一切都是林彪事先安排好了的。

2009年7月27日初稿

2011年12月31日修改

第二章第四节 林彪搞突袭 毛泽东反潮流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下午 2 时，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 日到达九江市。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九日，汪东兴对程世清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那里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叶群上了庐山。

叶群带着为林彪准备的讲话提纲。

下午，林彪与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

（一）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三项。

（二）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

（三）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

（四）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关于备战工作文件，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五）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召开大会外，拟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周恩来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对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文运道说了对程世清说过内容大致相同的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叶群对为林彪起草讲话提纲的秘书谈话。

叶群说：首长一直坚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认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在天才问题上有争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天才，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国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

叶群拿出语录卡片说：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

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

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原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原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

林彪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么？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毛主席在常委会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晚，林彪对在全会上是否讲话仍犹豫不决。陈伯达再次造访。

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太。

陈伯达认为，在罗瑞卿，杨、余、傅，贺龙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意见都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

林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林彪上车去开会时，与叶群谈话。

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

叶群说：要讲！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 3 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林彪单独向毛主席报告，他要在大会上讲一点意见。

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

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完后已经 4 点半了。

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

周总理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讲话：“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散会时，大家陆续退场，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和邱会作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面，陈伯达在台上等着没走。此时，汪东兴就讲开了，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会前林彪报告毛主席要求讲话的情况，及林彪报告后主席说不要点名的情况，这时，叶群忙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叶群还讲：“林总说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太丰富了，主席比马克思、列宁还懂的多。我就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邱会作和李作鹏担心的是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三人把林彪“推”上台的。如果真如此，是没有不坏事的。他们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邱说：“不知道为什么？”李：“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 8 时许，邱会作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邱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吗？”

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文件，并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

吴法宪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

陈锡联第一个起来响应。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等很多人表示同意。

汪东兴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

周恩来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 12 点前后，陈伯达与吴法宪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

邱会作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吴回来后，对他们说：叶群讲，林总本来在开幕式上不准备讲长话，开会前，主席和林总交谈了很久，林总向主席反映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吴）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对林总说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

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到了吴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谈的，一直谈到 24 日凌晨 3 时才散伙。

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口气来说，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他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

陈伯达说，1967 年，上海‘一月风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安亭事件发生后，是他派张春桥去处理的，连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都是他在北京写好，用电话传过去的。群众起来了，张春桥当时并不敢去，是他写了几条要张去宣布的，并由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张春桥才去了。然后上海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张春桥也是不敢出去见群众的，又没有什么主张，还是他同张春桥同志直接打电话告诉他的办法（似乎也告诉了几条），结果大会开成了，夺权成功了。张春桥还吹什么他创造了‘上海革命’，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陈还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张春桥吹的那样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把张春桥的对立面镇压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中央支持，又允许镇压，哪有搞不好之理！”

另外，陈伯达还谈了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

陈伯达组织人拟写有关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

吴法宪要陈伯达搞一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陈伯达用电话传给他，由他整理。他自己还搞了一份林彪论天才的语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早晨七时，叶群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她那里去，商量林彪讲话以后的事。

叶群说我先给你们讲讲首长的意见：

第一，首长的讲话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宣读语录，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首长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

第二，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

第三，发言中千万不要点张春桥、康生的名，更不可摸“十一楼”的屁股。

第四，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最后，叶群说：我们几个都在各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

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

同时，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当时留守北京的黄永胜。

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口径，授意他的秘书宋城，替他起草讲话稿。黄讲了起草讲话稿的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

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十一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汪东兴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汪东兴报告毛主席了。

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

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汪东兴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

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汪东兴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叶群和林立果又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下午小组讨论的事。

林立果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

叶群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叶群要他们串连空军、海军、总后一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言等等。

吴法宪把陈伯达搞的语录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向吴要了拿去打印，并给吴几份。吴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各一份。

（据汪东兴说：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汪东兴一份材料，他对汪东兴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汪东兴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汪东兴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一直没有发出。）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

下午，邱会作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邱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你拿到了吧，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

邱说：“对对对，知道了。”

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在东北组讨论中

周恩来出席这个组的讨论。他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肯定林彪的讲话对宪法、对计划、对战备有重要意义，同意天才的观点。他说：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在华北组讨论中：

下午 3 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讲完后，陈毅接着发言：

陈毅说：我到石家庄后没有看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文件。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讲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谈谈自己一贯对毛主席的看法。从一九二七年认识毛主席起，我犯过错误，反对过毛主席。后来我发现毛主席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锻炼，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因此我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天才这个解释，主要

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

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对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

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意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沓兑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与他们斗！

有人当场说：你还有资格讲话！

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

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当时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

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

他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河北省的四位劳动模范先后发了言：一致对宪法修改草案不设国家主席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有问题，还点了康生的名。

华北组的会议结束，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解学恭、吴德等都没有走，

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知道。

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郑维山说：汪主任，事情有变化啊？

汪东兴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了，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毛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郑维山说：那么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汪东兴说：知道，不让点名。

萧劲光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啦。

几名工人委员请示吴德，要表态。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在华东组讨论中

二十四日晚，在华东组讨论中途，江青到会。

程世清说：宪法还是应设国家主席。一些人附和。

许世友说：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陈励耘说：不设国家主席，群众在感情上通不过。

江青说：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

程世清说：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江青说：我们要看得远一些。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宋太祖赵光胤在陈桥兵变时，部下给他披上黄袍，拥他当皇帝。毛主席不愿意别人拥护他当国家主席。

其他的人都不吭声了。

江青对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

许世友说：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我思想还是不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在中南组讨论中：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在西南组讨论中：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

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最重要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领导，对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都作了最高度的概括。对我们教育最大。而且这个讲话是在重要的时刻讲的，讲话针对性很强。

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还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吴法宪打听是谁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吴法宪对张国华和梁兴初说：这个人是谁？张春桥。并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后来，李先念也问吴法宪谁反对天才论？吴法宪说是张春桥。李先念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晚饭前，林彪叫吴法宪去他住的地方。

林彪对吴法宪说：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吴法宪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

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在西北组讨论中：

邱会作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他指出，在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还有人反毛主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三是，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他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取得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康生说：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

会后，邱会作对周恩来说：“我的发言，还只是一个开头，我准备清算造反派对我的摧残！”总理说：“不要心血来潮，要考虑成熟再说。”

晚上，邱会作继续参加小组会。会议还没有开始之前，张秀川同邱说：陆定一式人物就是指张春桥吧？邱回答说：“独立思考！”张碰了他的钉子。小组会正式开始时，邱用纸烟盒子给张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你指对人了，但不能点名，可以表示愤怒！”张看到他的条子后表示满意。

小组会的中间，邱在厕所里碰到曹里怀。邱问他发言没有？并鼓励他对林总的讲话要赶快表态。曹回答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一定会表示自己的态度！”

邱会作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在小组会上是比较活跃的。造反派把我整得太惨了，我对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是不满的，这也是我能够活跃起来的思想基础。我是坚决反对造反派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

在小组讨论中，有少数人没有跟着起哄，如刘建勋、李德生、吴忠、吴德等，他们认为，情况不清楚，中央没有明确的指示。

老资格的中委，除了陈毅外，发言不是很激动，但也都表了态。

聂荣臻说：“古人说大奸似忠，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人。革命的人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有时不慎重，说错了句把话的情况是有的。”

陈云说：“林副主席是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是一定要参加的。我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做点服务工作是可以的，也是应当做的。”

李先念说：“我是戴了‘二月逆流’帽子的。我不翻案，但我一定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挥，积极参加战斗。”

陈毅说：“谁反对毛主席就同他斗！我虽然身体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站起来同他们斗争。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 8 月 24 日那天的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是烧得很旺盛的，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实行了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和我等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极大多数中央委员共同思想和行动。大多数人对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极大多数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们是众矢之的，真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尤其是汪东兴和陈伯达的表现，使毛主席不能接受。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在毛主席身前身后办事的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是“最能准确表达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都是毛的人。他们却站在林彪一边，带头发江青、张春桥的难，发中央文革的难，毛主席是不会答应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陈伯达到林彪处。

陈伯达问林彪关于林彪对讨论的一些意见。

林彪反问：你听谁说的？

陈伯达说：叶群。

林彪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李作鹏给叶群的亲笔信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汪东兴向周总理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汪东兴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尚未发出的 20 份语录封存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全文如下：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

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林彪听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李作鹏拿着这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

吴法宪马上找小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并亲自规定要用那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

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张春桥紧急约见江青。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江青带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小组的情况。

江青报告说：大会会务组今天出了华北组的简报。各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他们要揪跟你造反的人，你一定要保呀！他们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呀！

毛泽东要江青回避，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周恩来处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打电话给吴法宪，告诉他：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毛主席没有接见江青，对她说，你走。

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

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不知道。

这个情况已经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你要沉住气。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汪东兴去。

毛主席问汪：“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汪说：“刚看到。”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过来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汪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林彪乘车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常委会。

叶群知道后急忙乘车追赶，车未停稳时叶群急忙下车，跌了一跤。

叶群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 2 时，毛主席要汪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 3 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泽东与康生谈话时说：不当这个主席了，不参加会议了，这个会议让林彪去开！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毛泽东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你是个道道地地的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当好了。你们去当！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会议决定：分组讨论立即休会。

毛泽东宣布三条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晚上，毛泽东召见了叶剑英及一些人吹风。

周恩来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

周恩来同前来的陈伯达、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华东组继续讨论。

许世友说：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

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那些家伙天天喊造反，他们造谁的反？党和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

陈励耘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有些人还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把问题说清楚！

许世友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叫他到江苏农村去劳改！

有人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陈励耘对着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大声说：自己站出来嘛！

王维国说：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

有人带着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郭沫若说：我是懵懂派，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马天水、杨得志、韩先楚先后向陈励耘打听：他指的究竟是谁？

许世友在江苏小组向毛泽东、林彪写信：几个犯错误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应该下放基层锻炼。

许世友拿着信对韩先楚说：那个鳄鱼眼的气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

韩先楚说：我也给他补一枪。

杨得志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

这三封信和南萍、熊应堂等人的信，都送到大会议务组，转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把三封信转给叶群并附一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西南组开会，张国华去参加召集人会议，吴法宪念华北组简报，并按叶群的布置组织全组举手通过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四时，张国华回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

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林彪开会回家，立即把叶群叫到房间。

不一会，叶群出来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开会回来了。主席说，张、姚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快把草稿给我。

叶群还叫人把她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撕下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晚饭后，吴法宪到林彪处打听消息。

叶群说，林彪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

不久，林彪回来了。

林彪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吴法宪打电话给邱会作：你的发言简报发了没有？情况有变，不要发了。

吴法宪打电话给北京的黄永胜：黄永胜要吴法宪把他的书面发言烧掉。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当日，吴德将华北组几个工人委员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你为什么不在会上反驳？

吴德说：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恩来说：不是很好讲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

吴德同陈一夫商量以后，由陈一夫执笔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聂元梓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请示总理以后的会议怎么开下去？

周恩来将信批转政治局传阅。

当晚，周恩来指示吴德组织委员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判聂元梓，解决她的串联问题。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早，周恩来致函康生。

称：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我已阅过几次，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我再转请你校阅一次。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亲改。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慰。

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退给周恩来说：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学习。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

毛泽东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

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这些说法都不恰当。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

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

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

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

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

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

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

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主要是追查小组会发言的情况。

康生说：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

会后，周恩来到林彪处谈话。

晚上，周恩来到康生处谈话。

以后，周恩来又约全会六个小组组长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叶群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

康生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

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

周恩来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邱会作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打电话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

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再不要同我往来了，不要相互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编的语录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字，你们也要注意。

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说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从陈伯达的住处出来以后，又到了林彪那里。

林彪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汪东兴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看过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

汪东兴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汪东兴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同林彪、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伯达。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江青会见叶群

江青起床后，对秘书杨银录说：叶群同志犯了错误，三番五次叫我向毛主席求情。她是副主席、副统帅的老婆，不去为她求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兴；去吧，又怕主席怀疑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将来说不清、洗不净。这件事，实在使我为难，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见见她，听听她说些什么。说不定叶群今天下午就会来找我，她如果来了，你报告我，我再考虑见还是不见。

十分钟后，叶群就到了。

她对杨银录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秘书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大约半个小时后江青与叶群手挽手高兴地走出来。

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青说：请你回去代问候林副主席。

叶群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幸福。

送走叶群后，江青立即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情况。

毛泽东对江青说：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等参加部分政治局委员会议。

会后，周恩来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吴法宪：

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康生到林彪那里汇报吴法宪等人的情况。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12 点以后，陈伯达来到吴法宪处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早上，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

周恩来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吴法宪说：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

吴法宪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周恩来问：你们搞语录了吗？

吴法宪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全会以大组为单位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录音。

放了两遍，大家完全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和斗争的性质。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先后去林彪、康生处谈话。

之后，周恩来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开始，林彪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了三次会。每次会 9 时开始，11 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

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彪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

林彪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

对于让林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都是属于表态的话，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

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

叶群说林彪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

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吴法宪把要他作检讨的事报告了林彪。

林彪对吴法宪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的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谣过。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你不要作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康生及全体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参加。

由林彪主持。

会上，周恩来、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周恩来说：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吴、李、邱几个人也拉上了。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陈检讨的主要内容有：二十四日在华北组会上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彪的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问题等。

接着，由吴法宪作检讨。

接着，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发言。

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修补林彪的讲话录音。

陈伯达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周恩来通知李先念、李德生明天回北京担任中央值班。（原定是李先念、吴法宪）换纪登奎、黄永胜上山。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找吴法宪谈话。

林彪说：毛主席又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召见刚到庐山的黄永胜。

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总理一直在努力工作，担子很重，很吃力。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说：“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泽东：“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么看江青，他还没摸透，因此他没有顺着毛的思路往下说，黄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泽东：“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做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张春桥不得人心，群众意见很大。

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

毛主席说：“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今后主要是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凌晨四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终于等到黄永胜回到住处。

黄永胜对他们说了一些毛泽东接见他的谈话情况：

接着，叶群来了。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检讨的问题，定了几条原则：

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

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

三是不揭发陈伯达、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吴法宪把自己的检讨送交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康生看后提出批评意见，吴法宪修改了两次，由周恩来、康生签名印发全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连续数次去毛泽、林彪、康生处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

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

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住处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

林彪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个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来了，大家都不发言。

陈伯达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往来了。

批不起来，会议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周恩来同康生到毛泽东处，将《我的一点意见》稿取来，给张春桥看过并同张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稿交给林彪看，林表示同意。

周恩来即到毛泽东处对《我的一点意见》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交陈伯达阅。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西南组上午开会，康生参加。会议没有批判陈伯达，实际是批判吴法宪。吴法宪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报告了周总理。

西南组下午开会，周恩来参加。会议继续批判吴法宪。

周恩来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

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

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

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会议批判了陈伯达。

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战无不胜。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姚文元在会上说：不表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邱会作回应说：表了态，也不定是最好的态度。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全会各小组结合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集中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判。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

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

汪东兴发言说：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

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

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周恩来飞回北京。

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的领导成员开会。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九月五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不定期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

一九七〇年九月三日，周恩来飞返庐山，先后参加东北组、华北组和华东组小组讨论。

周恩来在发言中继续批判陈伯达，在提及《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深夜，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这一次谈话时间较长，主要内容是怎样批判陈伯达。

毛泽东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下山前开一次生活会，问题不带下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周恩来先后参加中南组和西南组小组讨论。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中央常委召集各组组长会议。

会议决定再延长两天会期。陈伯达不再出席大会。

毛泽东提出：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

毛泽东说：这几年官做大了，不来了，也不写文章了。参加“军事俱乐部”。

陈伯达表示：我愿意检讨。

毛泽东说：很好。你可以同那几个与你共事的人谈谈。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陈伯达到了江青处，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

江青说：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会公报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晚上，叶群提出林彪应该去看望江青。

林彪给了叶群一个嘴巴。

叶群哭着说：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位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说明你诚心。

林彪说：主席是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上午，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

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

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

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二十点，江青打电话到林办；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

林彪回答：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马上去看你。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林彪、叶群“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到江青处辞行。

江青请林彪注意保重身体。

林彪说：这次不回北京，直接去北戴河养养身体。）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要黄、吴、李、邱一道去看望江青。

吴法宪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

叶群说：首长都去了，去做做样子嘛。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叶群及黄吴李邱等人看望江青。

叶群打电话到江青处；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他叫我和黄永胜、吴、李、会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我们等你的电话，

江青说：请他们现在就来，你快去回电话。

不久，叶群等几个人就到了。

江青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大好，本来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就没有去。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林副主席，也谢谢你们来看我。

叶群说：林副主席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话，会很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应当来看您，一来是同江青同志话别，再有一两天我们就要下山了；二来是听取并接受江青同志的批评帮助的。这次我们在会上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彪同志多次批评我们，说我们头脑简单发热，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负了主席长期的教导，也对不起江青同志，我们一定要向江青同志好好学习，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说：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难过，也觉得不是个滋味。我们是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件事是陈夫子搞的。本来陈夫子与小张、小姚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了我们，我们没有即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上了他的当，接受教训就是了。我们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彪同志讲，江青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总是给我说好话、做工作，所以我约他们四位同志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江青同志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您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热情地鼓励我们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

叶群对同来的四个人说：你们要牢牢记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对咱们的谆谆教导。

黄吴李邱同声说是。

江青说：你们不听毛主席的话，犯了错误。

吴法宪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

江青说：你们今后要吸取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多多联系。

黄永胜阻止吴法宪再说话。

回去的路上，黄吴李邱一起大骂：戏子，戏子，真***窝囊！

黄永胜对吴法宪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

李作鹏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

一九七〇年九月某日，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王维国、陈励耘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

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

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黄、吴、李、邱同乘一个飞机回北京。

他们在飞机上议论：

- ①黄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
- ②强调八月十三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来的问题。
- ③黄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邱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邱也不抱怨。
- ④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黄永胜，这是大前提。
- ⑤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
- ⑥黄、李、邱都警告安慰吴法宪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离开庐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离开庐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下午二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照完像后，下了庐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通知及附件

1970.09.12；中发〔1970〕5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中央军委：

现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给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五四年宪法，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在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七〇年三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工农兵广大群众半年多的反复讨论提出来的，是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中央政治局从三月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七月十二日，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任、林副主席为副主任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起草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全国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对一九五四年宪法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提交九届二中全会审查。九月六日，全会基本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和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以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为指导思想制定的。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巨大作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它力求简明扼要，

通俗易懂，便于群众学习和运用。在全国人民讨论修改和四届人大通过之后，它将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夺取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这件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希望各级负责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结合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向群众宣讲宪法修改草案，发动群众积极提出修改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于九月底报告中央。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二、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

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招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三、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四、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把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戳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五、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許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下山。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2009年8月2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31 日修改

第三章 开展批陈整风

第一节 一九七一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农业新丰收》

农业生产连续九年丰收，去年粮食产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是不高的，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要不断努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进一步适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成为农业生产第十个连续丰收年。

要坚持现阶段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指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要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搞好科学种田。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 18 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 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一、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 二、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 三、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
- 四、要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 五、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新高潮继续向前发展。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北美、欧洲、大洋洲的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此呼彼应。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克服重重阻力，在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战斗中继续前进。许多长期受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小国家，纷纷挺起腰杆反抗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在美国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尼克松政府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种族歧视的斗争空前高涨。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们好象坐在火山口上，日子很不好过。

我们党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担负的艰巨任务，迫切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完成党的“九大”

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我们要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的新胜利，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宏伟纲领。

《五·七指示》总结了我军几十年建军经验，要求我军的革命化建设更要有发展。

《五·七指示》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文献。

《五·七指示》为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指明了方向。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位的东西是“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农副业生产要搞，有条件的地方，中小型工厂可以办，但都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要把着眼点放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上。当前，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教导，开展批修整风。这是一场继续揭露和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斗争，是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我教育运动。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著作，深刻理解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在学习和批判中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工业学大庆》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两论起家，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各种问题。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大受解放军，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当作对自己的指示，把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建军方向，当成自己的建设方向，实行政治建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坚定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在同大庆条件类似的地方，要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完成“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的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在毛主席所总结的我党的历史经验中，那一些是今天应当特别引起全党注意和学习的呢？

-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 （二）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
- （三）必须力戒骄傲。

- (四)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
- (五)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 (六)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 (七) 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 (八)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

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漆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划了短线（〔〕）：增加的地方，在下边打了加重号）：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宫本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坚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 11 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 11 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二十一）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己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精神，为

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三十一) 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 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

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纪念八一建军节》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战无不胜的，是因为它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当前，全国人民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要更加刻苦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修整风，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进行下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国军民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拥政爱民，拥军爱民，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实现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相继隆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

一九六七年，最初几个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这时，党组织的整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毛主席把整党列为整个斗、批、改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各地认真学习新党章，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指示。

这次整党运动，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一小撮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被消除出党。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参加了党的行列。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既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还有来自工农和基层干部中的新生力量。我们的党提高了质量，扩大了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全党逐步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收到显著效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各级新党委普遍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正在深入发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加强党的领导，主要应当注意那些问题呢？

要增强党的观念。每个党员，每个革命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各级党委成员，尤

其要增强党的观念，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内，而不能摆在党委之外，更不能摆在党委之上。

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变换各种手法，妄图用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代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用资产阶级纲领代替党的无产阶级纲领，从而用资产阶级性质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目的。

要增强党的团结。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这个历史的教训不少。

要光明正大。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搞分裂活动，就一定要搞阴谋诡计。我党历史上那些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玩弄阴谋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分子，最终都逃脱不了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下场。

要加强纪律性。

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为什么有的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教训极其深刻。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着重抓了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召开华北会议开展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五七一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二、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林彪集团加紧实行反革命阴谋政变，毛泽东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毛泽东通过与熊向晖的谈话了解军委二级部长都没有传达中央汇报会议精神，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有后台。

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一九七一年第四季度，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三、一九七一年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开展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给尼克松回了一个口信，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口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周恩来总理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讨论台湾问题。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2009 年 8 月 17 日初稿

2012 年 1 月 1 日修改

第三章第二节 几员大将的检讨 吴法宪叶群的检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在车上谈了话。

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 15 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

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说：“这好嘛！”

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吴法宪说了八月十四日以来的情况，并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康生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吴法宪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康生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

李作鹏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说：这件事我是十四日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黄吴李邱四人的口径一致。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老找你们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待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四人都不吭声。

周恩来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到吴法宪说会议上有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说：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

吴法宪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我没怎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

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

康生说：你念的语录很好，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

周恩来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与刘丰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汪东兴把第二次书面检查呈送给毛主席。

主要内容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的。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年 9 月 15 日

毛主席看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在汪东兴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上午 10 点半，毛泽东让吴旭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 11 点 50 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 250 多人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 多本太多，可在 30 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多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

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泽东问：“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汪东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汪东兴说：“不清楚。”

毛主席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 24 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毛主席还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下午，汪东兴去找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

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汪东兴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曾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

慢慢地了解了。”

汪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曾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汪说：“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几日，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与李雪峰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

林彪说：我对毛主席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拚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林彪说：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

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叶群谈话。

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

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叶群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

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并说她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检讨作了批示：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

毛泽东在这句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 8 月 23 日晚 12 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 8 月 27 日晚上 12 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毛泽东在这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 8 月 27 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批道：“这样对。”

吴法宪把毛泽东对他的检讨的批示给军委办事组其他人看，黄永胜若无其事；李作鹏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吴法宪和黄永胜把这个批示给叶群看，由叶群亲自布置要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替她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

“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毛泽东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

毛泽东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

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毛泽东病情越来越重，由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成肺炎。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呢？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掌权的人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虽然没有读过哲学，有些事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辩证唯物论，没有特别学习哲学的必要。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是深奥难懂的，一般人学不了。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批阅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早在六届六中

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当前，毛主席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正在变为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为了使高级干部的学习搞得更好一些，特通知如下：

（一）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这里讲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员、地方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的同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读什么书？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一九六四年中央曾经选定三十本书，作为高级干部的学习书目。最近，毛主席指示，“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以下六本马、恩、列、斯著作和五本毛主席著作：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 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 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
- 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
- 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
- 六、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

毛主席五本著作：

一、实践论

二、矛盾论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三）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学习时间，首先靠自己挤，坚持天天读，可以规定共同的学习日，每周不少于两次。可以成立学习领导小组或者学习委员会，负责学习的规划、检查、总结和交流经验。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应进行讨论，并将落实的情况报告中央。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贰、本节简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毛泽东主要抓了两件事；第一，继续查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真相。第二，督促教育有关同志认识错误。

关于汪东兴，最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承认错误并作了初步检查。下山以后，表示正在继续考虑问题，愿意作进一步检查。但是，汪东兴九月十五日的书面检查，虽然表面看来是揭露了陈伯达的几件阴谋活动，其实并没有说出多少他参与其中的幕后活动及真实意图。毛泽东认为，他和其他几个大将一样，与陈伯达不同，属于好心犯错误。充分肯定他愿意检查错误和揭露陈伯达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带动其他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有人说；汪东兴因为是身边的人，毛泽东就特

意袒护。有的人甚至说汪东兴是毛泽东安插到林彪集团内的一个奸细暗探。这完全是顾事实的瞎说。历史证明，汪东兴在九大前后，与林彪、陈伯达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拼命向林彪集团靠拢，九届二中全会上，他积极主动地参与林彪集团的“倒张”（其实是要打倒康、江、张、姚，也可以说是“上海帮”）活动。这次阴谋活动失败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参与组成以华国锋为首的新贵集团，与元老派中右派集团相勾结，发动十月政变，逮捕文革中的四位杰出左派领导人。这一次他成功了。

关于吴法宪，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过一次检查，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他的态度比其他几位大将好，其实，这种好也是表面上的，他并没有交待任何林彪集团内部的真实活动。即使如此，林彪集团已经把他划入另类。时刻防止警惕他牵扯出其他几个人。

关于叶群，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幕后协调指挥，小组冲锋陷阵；后期她观测风向，按兵不动。下山后，由于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她谈话，她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很明显，她这样做是为了丢卒保车。关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与吴法宪、叶群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也不作检查。

关于林彪，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倒张”事件的后台和总指挥，并且由他亲自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毛泽东为了保护林彪，把他与整个事件的活动分开。但是，在揭发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涉及到林彪身上。因此，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中指出：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

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

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这说明，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2009 年 8 月 10 日初稿

2012 年 1 月 1 日修改

第三章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负责。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1970.11.16；中发〔1970〕6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三）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〇年59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 各单位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

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请你们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五) 对陈伯达的问题，外间有一些猜测，敌人也在探听消息。传达时请你们注意保密。有关文件不准翻印、抄传、听传达的同志不准记录、不准传播。

各地传达情况和反映，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1970. 12. 16；中发 [1970] 76 号

1970 年 12 月 10 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

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1971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 4 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

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

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

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1971 年 2 月 19 日，周恩来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一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毛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周恩来于 2 月 20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2 月 21 日，《通知》下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1971.02.23; 中发 [1971] 18 号

照发

毛泽东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

在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到会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会议的指示：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宣读后，到会的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了坚决拥护，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为使各地和中央各领导单位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能对毛主席的极其重要的指示有深刻的理解，并联系到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阴谋活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特将毛主席的指示全文，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和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

1972.07.02；中发 [1972] 2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〇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

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郅中复的父亲郅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

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未至一九五〇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贰、本节简论

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是由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倒张事件”引起的。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大家都比较清楚，就用不着更多讨论了。

2009 年 8 月 2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8 日修改

第三章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晚上，黄永胜给郑维山亲自打了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

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郑维山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同志，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郑维山说“要从这次会议开始，养成一个好的保密的风气”。还说：“谁泄露出去，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中央委员的要考虑他的委员”。

郑维山在传达时，大讲林彪的讲话，而在讲到陈伯达的问题时，只讲陈伯达在某小组跳出来，制造谣言。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八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罪行。

郑维山说，“工作这么忙，还开会吗？”

在其他常委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开会，

在会上，郑维山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揭发的，表个态就行了，可以单独表，也可以集体表”，“要防止有人利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来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在这次全委会上，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对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提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三十八军的重要检举揭发材料，郑维山不让专题上报。

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在审查这个报告时，特意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国野营拉练的通知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他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道：“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此后至1971年9月，解放军540个师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都进行了野营训练。通过训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走练打，全面锻炼了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野营训练也暴露出军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搞军事

训练而造成的许多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

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让人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有人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

的批示。

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九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三人。

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然而，军委办事组认为：庐山会议之后，主席看到 38 军对批判陈伯达和搞掉北京军区都有很大作用，于是，秘密把 38 军的领导叫到北京，由江青亲自组织 38 军写报告，江青说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 38 军的人特别卖力气。报告写好以后，毛主席又以 38 军主动写报告的形式，对报告做了批示，作为石头向军委办事组打了过来。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些做法，我们看在眼里，对主席的做法感到震惊，疑惑。但那时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更加痛恨。

周总理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主席要“全军学习 38 军”的指示。总理说：“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都要好好学习 38 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模范。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的几位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军委办事组的人，同陈伯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认识问题。”

主席说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认为。38 军的报告就其立场观点来，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学习 38 军的报告又不能支持他们的派性情绪，但陈伯达也要狠批，这是一个矛盾。

军委办事组在学习 38 军报告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学习重点：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骗子，对这个问题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同李德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德生说：“批判陈伯达的派性应当是学习重点，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的典型。”意即陈伯达压制了造反派。

邱会作说：“我是坚决反对李的观点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主要是政治骗子问题。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观点带到军委办事组来。”

李德生说：“难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后台了？”

邱会作说：“对不起！不仅我是革命派的后台，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这点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黄永胜看到他们的争论很激烈，就说：“军队是决不允许造反派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含糊。批判的内容还是对准陈伯达和‘上当受骗’的问题。如果超出这个界线就要把叶群也拉到里面来的，要漏底。这样就引起问题的复杂化。”

李作鹏说：“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别人总以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两位(指李德生、刘贤权)也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吧？”

邱会作说：“我同意老李的意见。我还主张应当‘翻箱倒柜’让大家看个清楚。比如说，我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某些人(指江青、张春桥)支持造反派整我的。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于在庐山叶群说的那些话，也要漏底，否则别人真会怀疑我们搞了‘炸平庐山’的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这个底必须漏，而且要漏的连一点渣子也不留。”

黄永胜说：“请李德生、刘贤权也向我们提些意见，揭发更好。”

他们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什么意见。”

李德生还补了一句：“你们的职务、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们的。”

李作鹏说：“你们不要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黄永胜最后说了两句话：“要有自我批评，要说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将 18 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黄永胜、李作鹏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70.12.19；中发〔1970〕77号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去参加华北会议前，请示毛主席：

“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汪东兴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

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揭发批判陈伯达。

涉及到李雪峰、郑维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报告

主席：

上海准备一月上旬(大约一月三日或四日)在“一月革命”四周年时开党代会，已有同志来京汇报。春桥同志和其他同志都要我回去一下。我想在三十一日或明年一月一日回去半个月左右，已向政治局报告过。这两天准备把几件紧迫的事办掉(如“红旗”付印等)。您是否同意，请批示。

这次回去，仍想抓一下大批判问题。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把《史记》同《汉书》、《后汉书》相比较，觉得前者在观点及文字上均高出后者不少。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

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翻看了一点《五灯会元》，才知道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虚妄是怎样用诡辩和折衷主义来装点门面的，这从反面教育自己辩证法的重要。另外还读了一些孙中山的东西。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此外，关于陈伯达，也要整理一些此人反动世界观的文字材料，揭发材料中这一部分很少。还想整理一点思想史的材料，以执行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继续研究”的任务。别的事可能办不多了。可否，请予指示。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晨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

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示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

林彪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

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例举了有的老干部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〇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济南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的通知

1971.01.06；中发[1971]2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伟大导师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报告的批示，极为重要，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问题。现将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姚文元同志报告印发给你们，望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以期不负主席的要求和希望。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林彪批示

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林彪

八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座谈会。

关于军委座谈，是否要急于召开以及怎么开的问题上，在军委办事组内部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邱会作认为：

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这是由下列三个问题决定的。

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的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毛主席在陈伯达身上开刀，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保护林彪；满足江青一伙的需要。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杀鸡给猴看”。如果江青一伙再搞点风浪，我们几个人就可能同陈伯达同罪论处了，至少吴法宪可能是这样的，对这一点，我的估计总是比较坏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

到我们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是，如问题升级到涉及林总，就是党内的大局问题，也涉及到九大路线问题。1959 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结局，可不可能出现？

我对庐山问题的前途是两点论，既要看到当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化。(一)庐山的问题，可能随批陈整风结束而结束，我想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伙兴风作浪之下，对我们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对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李雪峰不是庐山问题主要当事人，现在不是也下台了，但他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加在一块，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我认为如果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对庐山会议的问题，主席那里没有相对明朗的态度之前，召开全军高干会是不适当的。现在继续抓紧全军的批陈整风比什么都好。要是军委办事组能够在全军批陈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加上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出一个有份量的检讨，大家都有做“汪东兴”(解脱)的可能。

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基本上不同意邱会作的观点。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得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问题就定下来了。

这个座谈会有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

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召集各组负责人讨论黄永胜在开幕会上讲什么话的问题，又是一场争论。

邱会作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办，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要首先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

一、军委座谈会，提出了批陈整风的方针。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其实，我们和陈伯达什么‘关系’

也没有，我们和陈伯达只是非议过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犯过自由主义，为此江青不满，毛主席也不满。现在是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会议对我们的批评能否搞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的自我批评了。只要我们有自我批评，到会的人自然就会对我们进行批评了。只要出现了这种局面，批判陈伯达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这次军委座谈会开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要以陈伯达为对象，有自我批评，从而引起到会的人对我们几个人的批评。对我们进行批评甚至过火的批评，会议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会的人对我们没有批评，会议就失败了。”

邱会作的意见讲了后，大家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但也没有什么热劲。

有人说：“庐山的问题，大家看得见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这种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们说：“什么看得见看不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在会上不少人给军委办事组评功摆好，就是有点批判，在批评的话之后，又补充一些好话。比如冼恒汉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威信高，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但我们对军委办事组还是完全信任的。”

黄永胜对邱会作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黄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

黄永胜代表总参作军事工作报告，李德生代表总政作政治工作报告。

会议简报上说：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等等。

吴法宪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

有的人不同意吴的意见，这些简报都送上去了。

这个座谈会于二月中旬散会。它从一开始就列席了华北会议，但它本身从来没有开展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

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971.01.11；中发〔197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会议情况

这次华北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批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开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四百四十九位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一月九日起，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听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

二、对会议的估价

(一)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2、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他形“左”实右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支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4、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在延安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又害怕得罪张，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他随毛主席访苏，违背毛主席的嘱咐，私自离开代表团，进行个人活动。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二)会议通过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何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为何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两次传达都是那样不集中开会，草率了事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思想上初步肃清陈伯达的流毒。

会议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很严肃，大家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基本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很尖锐，也很中肯。

(三)会议贯彻“批陈整风”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全党全军起重大作用。

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

(一)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和组织准备。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天津支持坏人(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夺权，在保定地区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李雪峰对中央不满，在刘少奇倒后，只听陈伯达的话，他在河北省把革委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

里，排斥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在杨成武被揭发批判之后，郑维山坚持错误，继续搞山头主义，排挤外来部队，任人唯亲。他还在北京军区大搞以他为首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以是否拥护他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都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

(三)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同陈伯达、杨成武串通一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点名摧垮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却又向中央说“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四)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五)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希望李雪峰、郑维山同志与陈伯达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六)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四、今后意见

这次华北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军区师以上的党委，在华北各省、市、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纠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著作，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重要指示，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全体革命人民的团结。

(三)要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华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目前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北京军区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华北地区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解决的，不能否定党中央决定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如果有人借“批陈整风”的机会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破坏当前的革命大好形势，那是不允许的。

(四)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对于犯有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我们都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天津市革委会有些干部，过去受了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和蒙蔽，跟着李雪峰，

郑维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只要他们能够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决裂，同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严重错误划清界限，应该仍然信任他们。

在这次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1971]3号文件，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

(五)各级党的组织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的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六)要坚决纠正某些干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搞军阀主义、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走邪道，搞对内的大国沙文主义等歪风邪气，使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贰、本节简论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子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2009年8月31日初稿

2012年3月8日修改

第三章第五节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二月初，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说：“下边一些地区和部队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对一派群众的歧视可能还有所滋长，这要不断提醒他们；而其他地方，特别是内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复会大些，已要北京军区注意这一情况。”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晚，军委办事组讨论毛主席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指示，紧急召开在京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在人大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

总理在会上说：“在庐山会议时，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国经济计划会议在结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到会共同对国民经济计划‘拍板定案’。今天的会议，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的。这是今晚第一个内容。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这是今晚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由于黄、吴、李、邱，尤其是黄对毛主席的批评，是口服心不服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写好一个发言的稿子是有困难的。

在黄永胜发言之后，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

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于会咏、刘庆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们联合发言：“一、军队少数人把陈伯达当成国宝，不批评，我们表示愤怒；二、军队少数人，同陈伯达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在庐山搞的什么名堂？应当无保留地交代清楚；三、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还是保卫陈伯达的？对这个问题，军队几个掌握大权的人一定要表明态度，否则我们是睡不着觉的。”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邓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再下来是列席会议的马天水的发言。

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黄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要问的倒是：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

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

在会上以自我批评为主，也有批评。大家对吴法宪提了不少意见。对黄永胜主要批评他“对庐山问题，以局外人处之，领导和处理问题，很不得力。”对邱会作和李作鹏也有若干批评。

李德生说：对庐山的问题没有信心不对；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有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黄永胜根据大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讲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陈伯达是什么问题，有待中央对他的结论，可以肯定我们同陈伯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的关系，但我们同陈伯达又有一些关系，即对一些人犯自由主义的关系。至于说我们同陈伯达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拥护天才论，陈伯达是党内的理论家，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们同陈伯达不是怕不怕受牵连的问题，而是早就牵连进去了。虽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但我们相互之间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庐山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陈、吴、李、邱一起就在吴的房子里，长时期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中央文革的问题和上海的文化革命问题。开幕式散会后，叶群谈的“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陈伯达也是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我们怎样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问题。我们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唯一方法，就是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和进行自我检讨。这两者是统一的。只有彻底的揭发，深刻的自我批评，界线才能划得清楚。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包括李、刘)谈话。

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

总理说：“毛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这就很好。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说：“你们的问题，当然不仅同陈伯达有关，同政治局其他人（指汪东兴）也有关。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的难度。”

总理接着说：“大家对自己的问题要心中有数，有信心。自我批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主席最恨结伙整人。对你们整人是如此，别人整你们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没有这条，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

江青说：“毛主席的话，我早就向你们传达过，你们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什么包袱可背的，放下包袱才能写好。毛主席了解你们。”她还说：“写检讨主要是注意思想性，那些罗罗嗦嗦的事，多一件少一件关系都不大。”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从谈思想开始，到要自我批评和互相帮助都说到了。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三个统一。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吴法宪说：“过去，我同你说的事，也没有听你说过什么不同意的话。”

李作鹏说：“要是你都同我们说，也许不会有今天的事。宪法小组争论的问题，我在场你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就向各方报告了。难道你做得对吗？”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邱会作说：“我同意黄总长的意见，我们一定要顾全林总这个大局。除此之外，自己负责。因为这是个人的检讨，个人可以尽情写自己要写的事。”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同日，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批示：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吴法宪、叶群过去写的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开会。

毛泽东说：

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

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

第三是吴法宪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

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汇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

江青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检讨。

会上还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指示的补充通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2.25；中发[1971]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下旬，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邱会作的报告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我同陈伯达根本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1967年夏天才同他面对面第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论家”，还有就是对张春桥不满有共同犯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伯达是大骗子，他骗了我这样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上宣读，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我同张春桥虽然没有争吵过，但不来往，不接近。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周恩来：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下午，周、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并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黄永胜 3 月 21 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

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谈黄永胜、李作胸、邱会作检讨问题。

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问题。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至北戴河林彪处，并准备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事。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

“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 3 月 19 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1971 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 3 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和周总理、康生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毛主席是在他的卧室接见他们六个人的，主席坐在沙发上，向进去的人微笑招手。进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礼、握手，然后在两旁坐下。

毛主席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礼多人不怪，有礼不怕迟。”毛主席总是带着笑容说话的。正在谈话时，毛主席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叫汪东兴来呀？”一回儿，汪东兴来到了。

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

黄永胜说：“我们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我们犯了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进行自我批评，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对犯有错误的人采取不公平的办法，结伙整人，硬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我是坚决反对的。”

周总理说：“我们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延安整风精神很好，但现在是否还有效，就值得考虑了。”

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创造的马列主义的精华，是永远有效的。”

毛主席说：“我们党快 50 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每个人犯的错误都有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对立面，只一面是不会犯错误的。

“我是赞成不怕犯错误的。一个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错误，怕这怕那还做什么工作？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黄永胜也是跟着上去的一个，就没有事先考虑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虑会犯错误，还能上井冈山？”

“我是赞成犯得起错误的。每个人的经验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只有一面，不能成为经验。反面的经验，常常比正面的经验用处还大。当然，我也不是说，犯错误越多越好。但犯一点错，又能认识错误，也没有什么不好。其实改正错误，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刚才你们说，延安整风经验很好。但是，对犯错误的人没有正确看法，不是热心去团结他们，整风经验就没有什么用处。大家知道，我们讲的整风经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确总结经验和与人为善。如果离开

了这样一个目的而不是总结经验和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改正错误，还有什么整风精神？

“延安整风并非一帆风顺，是经过严肃斗争的。首先是领导人不能整人，其次是动员全党不能整人。我们没有整王明，是做了艰苦工作的。比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场生动的党内斗争，今天在坐的多数人都在场吧。（周恩来插话：除了两三个人外，其余都参加了七大）对庐山几个犯错误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他们很简单，要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退出政治局也不难，但这就不是党的政策了。党的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利益问题。不要他们几个人，是违背人民利益的。”

“我们将要开的会，要开成像延安整风会议一样。只准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准搞别的什么名堂。总之，是要实事求是，不准搞歪门邪道的东西。共产党应当是光明磊落的。”

周总理说：“主席今天的指示，也就是我们政治局领导开会的基本思想。谁要是离开主席的指示，去另搞别的什么东西，他就是我们的对立面了。”

康生说：“任何人想背离毛主席的指示，都是没有出路的。”

接着，毛主席手持报告，对着邱会作说：“这个报告（指邱的检讨报告）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我自己写的。”邱立即回答。

周总理接着说：“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这次他的检讨报告就概括为三个问题，概括得很好。把陈伯达视为大骗子，自己是小骗子；自己是受骗者，又是害人者。文字不长但把问题比较生动地说清楚了。”

毛主席说：“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识字牌背出来的。他还很年青的时候，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就熟悉了。”

周总理说：“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长征的路上，他是我们的青年小科长。”

毛主席说：“啊，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邱会作立即站起来大喊一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家也发出了笑声，全场的气氛很活跃。

毛主席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纪、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

毛主席的话音一落，汪东兴就说：“我就不去了吧？”

毛主席说：“你不是也沾了边吗？好，不去也可以。但自我批评还是有好处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三十一日，周恩来偕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

黄永胜汇报了战备工作情况。

李德生汇报了华北会议情况。

纪登奎汇报了国务院的工作情况。

周恩来谈了外交工作情况。

汇报完以后，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局面检讨。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还说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

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辩解和自我批评。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周恩来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

会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五日发出。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成员。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
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

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 99 人。其中包括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超等人。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回顾了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

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批陈整风会议分几个大组进行讨论。

周恩来参加了东北组讨论。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

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陈锡联当即给吴打电话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

吴跟他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

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吴，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吴说：“有这回事。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

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吴说：“不用了”。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吴打来电话，要吴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吴搞串联的这个事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为此还专门给吴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会。中央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内容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切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

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1)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周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展情况会议商定从二十四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阶段，并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六人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周恩来参加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组的讨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共四个部分：

（一）会议的过程和评价；

（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 error，是方向路线错误；

（四）今后办法。说：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最终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在天安门上，周恩来向毛泽东引见病后初愈的陈毅。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周兴同志的发言

- (一) 关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 (二) 关于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 (三) 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
- (四) 关于学习问题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贰、本节简论

华北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军委座谈会提出批评。

黄、吴、李、邱勉强作了一个检讨。

毛泽东仍然表示欢迎，并提出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作出检讨，结束这一桩公案。并以此推动林彪公开作出表态。

为此，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实际上是要林彪参加会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幕，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则不作任何表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强调指出：

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

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

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中央打算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突然袭击事件，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离去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看来，林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2009 年 9 月 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8 日修改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政活动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八月，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作为会议秘书长，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召开“党委联席会”。

会上，刘锦平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

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

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还说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会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人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

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

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〇年十月，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分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吴法宪问：为什么在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

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刘锦平纠合张国民等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刘锦平两次召开民航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

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一九七一年春节，王飞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

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周宇驰在小“联合舰队”布置收集情报。舰队会议。

周（宇驰）：

一、讲报情况、掌握情况的问题：

1. 情报的重要性
2. 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 死情况与和（活）情况，要活情况重要
4. 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不满足于等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

5.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二、报情况：

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

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彪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信也去了。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

(1)在全国范围内，“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

(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

(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转化，交叉发展规律，林立果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 “首长”和平过渡地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 “首长”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于新野说：那“首长”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 “首长”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

(1)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

(2)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

这个时候，反正“首长”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1)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很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林立果问李伟信，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李伟信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李伟信打听一下，李伟信问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李伟信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

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龚善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炮，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炮。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

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

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

（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政变事例部份标题

△ 拿破仑的两次成功的政变

△ 林肯被一演员暗杀

“雾月十八日政变” 纳赛尔由住室上车时遭卫士枪击

△ 戊戌变法与八月政变

△ 本·贝拉险遭“舞蹈演员”暗杀

△ 奥国皇储被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

△ 哈桑在外出途中被人用冲锋枪袭击。

△ 罗马古国的英雄恺撒被刺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江腾蛟 [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 [上海军区空军政委]、陈励耘 [七三五〇部队政治委员]、周建平 [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林立果说：（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陈励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都不过，黄总长他们日子也不过。

陈励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云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想这样搞也不敢。

林立果说：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江腾蛟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我们是采取和平形式。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

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

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

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

（对这次会议，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江指江腾蛟，王指王维国，陈指陈励耘，周指周建平。）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 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2) 加速我们的准备

(3) 组织上明确了：

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定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于指挥权

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

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上海教导队正式成立。

贰、本节简论

一、五七一工程的由来

林彪集团要搞武装政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林彪并不承认错误。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路线教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四月召开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这两次会议，特别是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为林彪集团提供了承认错误的机会。但是，林彪拒绝出席会议，黄、吴、叶、李、邱虽然作了检讨，也只是为了蒙混过关。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实际情况是：

一九七〇年九月，林立果就开始以广州的空军、民航为据点，进行活动。

一九七〇年十月，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分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说明，林彪集团打算改变战术，从上层打破缺口改变为从下层打破缺口；从以空军司令部为据点改变为以广州或上海为据点。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华北会议结束以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440 页）

有人认为：林彪的上述讲话还不足证明他知道林立果以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他看过这份纪要。

的确，现有的材料都是间接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晚上，林立果在上海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于新野在广州时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

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于新野对李伟信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现在的人可以声称他们对这些材料有怀疑、不相信。可是，当时的参与者确实是没有怀疑、非常相信的。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跟随一个初出茅庐的林立果去干这种有杀头危险的勾当呢？

二、五七一工程的制定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二十四日，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实施《纪要》的各种方案并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

根据林彪三月初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的指示，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林立果又跑到杭州，与陈励耘密谋。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继续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上海教导队正式成立。

1，当时，林立果确实制定过这样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吗？

当时参与讨论、起草这个计划的人，一共是四个：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九一三以后，唯一留下来的活口，只有李伟信。计划起草的过程情况都是由他提供的。

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可信吗？好在后来查获了一个记载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的笔记本。李伟信提供的计划内容与《纪要》的内容基本一致。

2，九一三事件后查获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的吗？

记载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记本是由空军学院的一位老工人在九一三事件不久交出来的，如果说是造假的话，恐怕也没有这么快。

见过这个《纪要》的人不多，李伟信虽然参加过这个计划的讨论，他也没有看见过这个纪要。但是，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来看，它与林彪集团实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致的。而参与实施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是很多的，从他们的供词来看，完全可以证实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

3，林立果召开过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在一起谈话。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参加谈话的人的供词与记载大体一致。

分歧在于：林立果等人把这次谈话叫做会议，甚至叫做“三国四方会议”。这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四个人中，王维国代表上海，周建平代表南京，陈励耘代表杭州，而江腾蛟不代表任何地方部队，只负责协调三地的行动。而参加这次谈话的其他人，则不承认是参加会议，只是参加了一次谈话。

三、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

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 they 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2009 年 9 月 14 日初稿

2012 年 4 月 4 日修改

第四章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入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民航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

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到北京要轻武器。这个人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周、刘、于（注：指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形势：◎会议

15 日夜开（注：指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周讲了目的（注：指周总理四月十五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批陈整风，达到团结胜利编组和庐山一样。——算旧帐姿态。黄、吴、李、邱、叶会前写了书面检讨。△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冲锋陷阵除攻打军委办事组外，把王维国、陈励耘点名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保密。——微冲图纸（注：指微型冲锋枪的图纸）——枪不搞仪式防止出内奸、叛徒。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一九七一年五月中旬，刘锦平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

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刘锦平、米家农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战斗小分队”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

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一九七一年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到很明显，有那么几个人做文章，矛头对着林副主席，一时很嚣张。新的条件下，X（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X（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敏感、明显、复杂，焦点就是接毛主席的班。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历史证明，没有那一个能与林副主席相比，不能有另外的接班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写上了是一回事，是否所有人都承认，能否实现，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可能要斗争，并可能产生严重的斗争，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一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

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住到了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彪有八十二处，引用林彪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彪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彪从建国到一九六〇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有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

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一九七一年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一九七一年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

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⑧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

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叶群回北京检查乳腺癌，找了不少人谈话。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小“联合舰队”开了一次“整风”会议。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争转入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过双重组织生活学习问题，搞政治的要学一点技术，搞技术的也要学政治不能搞私心杂念，不能搞个人主义。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风格，“舰队”是战无不胜的，但“舰队”成员是不是能一直跟着前进。不能吃老本，不断立新功。要有“欠帐感”。要很严肃、很朴实、（这次黑会的记录，是于新野手记的，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毛主席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林立果从北京回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顾同舟传来的电话记录。十五点，周宇驰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十五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林立果给林豆豆打电

话要她到北戴河来。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九点多，叶群通知毛家湾的秘书把几本书随送林豆豆的飞机捎带了。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十点，林豆豆乘飞机场从北京去北戴河。林豆豆到北戴河以后立即见到了林立果。林豆豆问：为什么叫我来？林立果说：自从庐山会议后，一组就揪住主任不放，几次检讨通不过，现在趁首长在北戴河休养，跑到南方打招呼，最终目的要打倒首长，首长身体差，又不肯服软，刘少奇、彭德怀的例子摆在那里，如其等死，不如拼一下。谈话因林彪要见林豆豆而终止。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林彪见林豆豆。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午饭后，林豆豆和林立果继续谈话。林立果说：九月五日，黄永胜将主席南巡的讲话告诉了主任，主任要跑，想跑到苏联去。林立果不同意，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林豆豆说：我三条都反对。我认为那儿也不要，就待在北戴河最安全。林立果说：你装作不知道，主任不让告诉你。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晚，林豆豆对刘吉纯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面知道了，怕整他们，在北京待不住了，要劫持首长到外地去，你知不知道？刘吉纯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要向上面报告？林豆豆说：暂时不要。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晚十点，叶群问倪煜蒙古共和国及中苏边境的情况。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九点，周宇驰打电话给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一份从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十九点，林豆豆要求与林立果单独谈话。林豆豆说：形势真的那么糟？首长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有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林豆豆说：你可不能帮着主任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不会原谅你！林立果说：依着你那就坐着等死啊！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你就眼

睁睁看着首长挨整？！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叶群对李文普说：老虎要回北京看牙，这件事不要对首长说。林立果到北京后，打电话报平安，李文普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点说好。（这说明林立果去北京林彪是知道的，叶群那样说是欺骗李文普。那么，林立果说他与叶群的策划林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欺骗林豆豆呢？）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送去几个西瓜，请江青同志尝一尝。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上午，于新野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对李伟信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给王维国打了个招呼。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到杭州，在医院见到陈励云，追问毛泽东在杭州到底说了些什么。于新野还同陈励耘密商飞机（一九七零年冬改装的伊尔—10 飞机。改装后的这架飞机，可以超低空飞行，具有很强的摧毁力。机身下面挂的是炸弹，机翼下面是火箭发射架）谋害毛主席的计划，于新野并说，准备于九月十日从北京派驾驶员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下午，周宇驰到江腾蛟家。周宇驰拿出顾同舟传来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给江看。江问：可靠吗？周说：还有更厉害的没有传达呢！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要不，很快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首长就要被架空，说不定被搞垮台。就算首长能过关，黄吴李邱被搞下去了，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现在一组（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回北京过国庆。现在情况紧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一组在杭州已经住了几天，机不可失。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一组 9 月 25 日前不会回来，经过上海时就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蛋，首先杀你江腾蛟。江腾蛟说：你要助手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说：王维国不行，太粗糙。江腾蛟说：那好，那好，那只有我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江腾蛟、周宇驰、李伟信等人在西郊机场迎接。林立果使出林彪的手令给江腾蛟看。随即转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林立果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是我们的时候了。本来想多抓点部队，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一个顶几个或十几个用，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攻下了黄永胜，就要搞首长。政治局开会，如果要摊牌，黄李邱首先会开枪，了

他们。我们总的代号叫五七一工程，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的工作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有叛变的，了他，他好的，成败在此一举。程洪珍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林立果说：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干到底！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们要誓死捍卫。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林立果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当东南总指挥，北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手你的指示办！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看，江腾蛟又看了一遍。看后，林立果要李伟信保存。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第一条是用火焰喷射器、40 火箭筒打专列。第二条是用 100 高射炮平射。第三条是要王维国趁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江腾蛟说：我听得直出冷汗，这三条都不行。第一，空军没有火焰喷射器，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第二，谁敢下令打毛主席的专列？要教导队去打火车，他们也不一定干。第三，王维国愿意不愿意？就是愿意，枪要是带不上车怎么办？周宇驰提出：杭州到上海有几座铁路桥？江腾蛟说：有几座，但都是由陆军把守。林立果说：陈励云有胆量，在嘉兴车站动手最好。李伟信说：在杭州干好，让陈励云干。周宇驰提出：由江政委带羊于新野去说服陈励云。江腾蛟说：还是让于新野一个人去吧。周宇驰又提出：上海机场附近不是有一个油库吗？轰炸油库可以造成混乱，趁机进攻专列。江腾蛟又提出很多困难。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早晨，在空军学院据点，周宇驰要程洪珍把办公室墙上挂的北京市地图（地图有墙的三分之一那么大）有钓鱼台的地方描下来，上午交给他。程描好后，下午四、五点钟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用铅笔标了方位，然后又说程描得不行，要程到办公室取原来的地图。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晨七点左右，在西郊机场据点，周宇驰对程洪珍说：“国防科委和空司科研部研制了一种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东西，有个文件。你告诉刘世英，叫他向科研部要来。或者你向孙水森（王飞的秘书）要，要来后交给我。”上午程洪珍向孙水森讲了周宇驰说的话，孙水森把这个文件交给了程洪珍。下午四、五点钟，程洪珍交给了周宇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周

宇驰在电话里告诉程洪珍到火车站接关光烈（关光烈，是驻河南某师原政委。关光烈来京，是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的），住在四号门（反帝路招待所）。后来又来电话，说由他亲自去接。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等人围绕炸铁路桥、炸油库两种办法继续产商量，终究达不成一致意见。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作了汇报。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七、八点钟，吴法宪给胡萍打电话说：“叶主任（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飞机一定好好检查，另外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谋。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简要介绍了五七一工程及林立果提出的三条行动方案。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王飞说：打钓鱼台有些困难。林立果说：在南线先把一组抓起来。王飞说：这不行，还是先礼后兵好。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开会谈判几条：第一条，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

了，刘少奇整死了。文革中空军支持抓联动，五一六本来抓走资派，又说五一六是反革命分子。让他们承认，口头承认也好。第二条，九届二全会要谈。双方都让步，林彪没法征求意见了。三个副词，毛泽东坚决反对，干脆撤掉不提。毛泽东把《我的一点意见》去掉。“反革命简报”收回去。口头答应也好，这就没有什么公开矛盾了。第三条，提出“民富国强”是的总路线，这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周宇驰还是坚持炸铁路桥。二十二点，林立果打了一个电话给叶群。林立果问王飞：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王飞说：除了开会我没有好办法。林立果说：我就不信搞不成。接着继续研究如何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周宇驰提方案，王飞摆困难。一直说到九月十日凌晨一点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由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的。原文如下：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 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继续密谋。林立果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王飞认为：虽然这事很重要，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毛泽东的动身又搞不清，搞不好是身家性命的事情。周宇驰这时也说：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考虑考虑，空间搞不搞？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王飞说：没问题，收得住！林立果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一次思想拉练吧。不过得绝对保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王飞把把“带交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送给了黄永胜。向黄说明是“晋草”（叶群代号）和林立果两人送的，黄说，“噢，是叶主任送的。”王飞向黄转达了叶群、林立果向黄问候的话。还向黄转达了周宇驰告诉的他得到的关于毛主席同某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的情报。黄表示对叶群、林立果感谢。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林立果要李伟信打电话给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晚十一时以后，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说：

“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胡萍说：“谈的很好。”叶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吴法宪）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叶还说：“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周宇驰对李伟信说：要更改三个人的代号，以后李叫‘金钟’，刘沛丰原叫‘槓子’，现改‘崔子’，王飞原叫‘阿飞’，现改‘黄翔’。而且要李把这三个人更改的代号，告诉‘舰队’的其他成员。其他‘舰队’成员也都有代号。刘沛丰说过，这些代号都报给了林彪、叶群。这些代号是武装政变时联络用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多，周宇驰打电话给王飞说：情况有变化，前天晚上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来电话发火了。林立果也给王飞打电话说：主任给我们抽鞭子，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动摇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十一点多，叶群对毛家湾的秘书说：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花名册和部队部署登记表送来，首长过几天要到大连，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给王飞：叶群说：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也是烈士嘛，我们是为革命利益，形势逼人，不得不这样搞。王飞说：不是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叶群说：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了。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赶快研究一下，十八点给我个回话。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在讨论中，江腾蛟、王飞强调困难多。林立果说：还是要搞，主任抽鞭子了。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吴胖子是个草包，没

有用，要不是她瞎指挥，庐山上那么多大将，还有陈伯达，还不会输得那么惨，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要上吊，还在电话里唠叨，一讲没个完。江腾蛟说：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王飞说：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干不成，不光我们完蛋，统统完蛋。林立果说：这次不一样，“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首长下了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这几天接连研究了几次，一直定不下来，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决断的勇气。这次要下孤注一掷的死决心，不能再拖下去。还是两边都要搞，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双管齐下。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六点，林立果要王飞给叶群打电话，汇报他们研究的情况。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点半钟，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方案。林立果看到鲁珉就说：现在要进攻啦，付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就拿来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鲁珉，鲁珉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 月 日。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一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依尔—10 轰炸。林立果对鲁珉说，你到上海去是他（指江腾蛟）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上海去，先和王维国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去组织指挥炸铁路。把火车炸坏了以后，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动手。鲁珉说，用轰炸机炸更厉害。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说：难过也没有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那天，首长诤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活着。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帮我撒传单。你

们谁能跟我一块去？于新野、李伟信、刘沛丰都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其他人也认为这样做不现实。于新野说：只怕等不到十一啦。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对李文普说：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刘沛丰把林彪的亲笔信拿回去。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到十二日，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 51 次（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永胜通话 16 次，与吴法宪通话 5 次，与邱会作通话 10 次，共 31 次 948 分钟。他们通话在五十分钟以上的有 8 次。一九七一年九月七、八、九、十二日四天，叶、黄通话前后，黄又与李作鹏通话 7 次。九月九日半夜，在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胡敏通话时，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与叶群通话，在叶与胡说完之后，黄永胜与叶群通话 90 分钟，吴法宪几次催促要与叶群通话。九月十日，黄给叶打电话 3 次，叶给黄打电话 2 次，在这五次电话中，一次长达 90 分钟，一次长达 135 分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中午 13 点 10 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 3 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 点 36 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 点 5 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 3 天没有休息好。回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李德生和陈先瑞等等北京军区领导紧急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两个小时后，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当时，空军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 5 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是 256 号三叉戟，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 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他们说，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

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果给王飞传达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周宇驰还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周宇驰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30支手枪，2支冲锋枪，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任务完成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周宇驰这时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还说：“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胡萍安排十三日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十三日七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时，叶群在林彪面前为林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六时，林立果在北戴河打电话向王飞交待新的情况和任务。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

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二点，汪东兴告诉邬成吉：中南海进入一等战备。

贰、本节简论

有人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非常活跃，而林彪却没有任何活动，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里等死。有人说：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活动很多，林彪的活动依然没有，林彪知道林立果的那么三个方案吗？没有证据。倒有证据表明，9月12日林彪提出要见尼克松。有人说：过去包括两案审理，都只认定只有一张林彪手令。而作者在探访中最先发现林彪的手令有横竖两张，那么林彪的手令是林彪写的吗？作者分析了林彪手令的语气、笔迹，认定大有模仿的嫌疑。有人说：据两案审理；没有发现黄吴李邱与两有联系，林立果搞两谋为什么不依靠黄吴李邱？总之，有那么一些人，在铁证如山面前，他们仍然要为林彪集团翻案，说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一是与林彪没有关系，二是与黄吴李邱没有关系。但事实如何呢？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制定反革命五七一工程计划以后，如何实施？这不是由林彪集团单方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第一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集团认为，这次会议最坏的可能性是把林彪端出来。因而他们就加快了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步伐。第二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林彪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八月五日至九日派叶群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商量对策。第三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巡视南方几省。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确切情报，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矛头公开对着林彪，是要搞掉林彪的政治信号。而且，毛泽东正好处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是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最好时机。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召林豆豆从北京到北戴河。林立果向林豆豆交底：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这预示着他们要开始行动。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具体谋划南北两线同时进行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第四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林彪集团在南方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两个小时，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对李文普说：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时，叶群在林彪面前为林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八时，林立果离开北京飞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二点，汪东兴告诉邬成吉：中南海进入一等战备。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林彪要搞阴谋，他的活动空间本来就不大，而且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是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等人联系。他既不亲自读文件，更不亲自亲处理文件。现在却有人一定要别人拿出林彪亲自批示的文件作为证据。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如林彪的手令，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又会说这是别人模仿的。看来只有林彪的讲话录音才能作为证据了。搞阴谋活动的人把自己在小范围内的讲话用录音保存下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吗？何况，即便是录音也可以造假呢？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九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那么多事，怎么能说林彪是在那里“等死”呢？说这些事都是林立果干的，叶群可是亲自出马了的，有人证。说这些事都是叶群、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而九月十一日叶群、林立果都对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次是首长下了决心。如果这又是他们伪造的，那也只能说明：林彪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可是，林彪出逃的过程告诉人们，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2009年9月23日初稿 2012年4月3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第一节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五章第一节 毛泽东巡视武昌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毛泽东通过与熊向晖的谈话了解到军委二级部长都没有传达中央汇报会议精神。

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有后台。

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八月，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工作，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作武装夺权的准备。

一九七一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黑龙江问题的决定

1971年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年 八月十五日，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情况。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还有常委。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汪东兴谈话。

八月十七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汪东兴继续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

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

1929年 6月 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

中共中央作汇报工作。8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个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他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

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来了那封信。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主席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

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

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

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

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一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江青）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

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7月15日至31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2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

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3744人，有78%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主席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

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

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日下午二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

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

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方法是打石头、挖墙

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二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 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

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

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

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

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

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

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

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

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这次巡视武昌主要找了三批人谈话。

八月十七日，找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谈话。主要是做刘丰、王新的工作。

八月二十五日，从北京找来华国锋谈话。主要是让他回湖南做工作。

八月二十七日，又与刘丰谈话。但刘丰始终没有揭露他与林彪集团之间的真实关系和活动，而且在李作鹏于九月六日到武汉时，就把毛泽东与他的谈话透露给李作鹏。这就进一步暴露了林彪集团的真实面目。

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要点如下：

1，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

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2，党内有人如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罗章龙、高岗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

3，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4，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5，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

6，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

7，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8，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9，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10，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11，犯了错误的人：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

12，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对犯错误的人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

13，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14，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

15，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进一步说明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实质、意义以及中央的处理方针。

有人歪曲事实，硬要把毛泽东的南巡说成是为了打草惊蛇、逼林彪“上梁山”。把毛泽东与刘丰等人的谈话说成是故意让他们向林彪透露消息。这种诡辩式的议论不可多得，很有必要让更多的人见识一下：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说：

“毛泽东为什么南巡？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了那么多措施，而林彪在‘冬眠’，毛不得不南巡，打草惊蛇。毛为什么第一站选武汉？因为他认为刘丰是林彪死党，毛与刘丰大讲林彪，却又对林彪严格封锁，但实际上毛希望刘丰透露。毛在武汉等了几天，刘丰没有报告林彪。他只能继续到长沙、南昌，让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这是为什么？因为广州军区是林彪的‘老窝’，两千多名师以上干部中总会有人报告林彪。林彪听了还能稳坐钓鱼台吗？果然，9月8日，林立果在接到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报告两天后，回到北京策划杀毛。”

2012年4月24日修改

第五章第二节 毛泽东巡视长沙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的专列夜间抵达湖南长沙。

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

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中。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

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 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

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这时，毛主席表扬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二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

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大家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上九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主席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

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主席说：不能说 he 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主席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

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主席在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时，又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

毛主席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

1935年 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主席说：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毛主席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主席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

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主席转向韦国清。他表扬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莫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作者注)算第四。

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主席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指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有没有参加呀？汪回答毛主席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主席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主席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讲到打锦州，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

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主席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主席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

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

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主席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主席说：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主席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后，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座谈讨论了一次。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汪东兴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边听汪的汇报边插话。边交谈。

当汪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

毛主席问汪：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汪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主席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汪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主席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毛主席对汪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

汪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主席听我讲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

毛主席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汪说：我还是有错误。

毛主席说：当然，你发了言嘛。

毛主席对汪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主席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主席还嘱咐汪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当时还考问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汪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

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

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

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指民主革命时期)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 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

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毛主席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 1 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主席指着丁盛说：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主席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主席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大家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主席讲到这里，看了汪一眼。汪补充了一句说：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

毛主席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毛主席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说过呀！

讲到这里，毛主席转眼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主席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主席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九十九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主席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

毛主席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主席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毛主席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

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主席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二。）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主席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么？没有论定。

这时，毛主席又引伸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毛主席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指当时的外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

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

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苏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主席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长沙主要有四次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同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晚，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听汪东兴汇报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座谈的情况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武昌谈话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内容：

1，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2，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

3，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

4，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5，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

6，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7，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8，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9，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们的办法也有三条：

第一个办法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

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

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10，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

11，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

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这样说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

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

12，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

出来的。

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其实人家都知道了，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党有五十年的历史，经过十次路线斗争，党没有分裂。这说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这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深入研究。毛泽东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第一次公开点了林彪的名；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把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的纲领进一步概括为：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对《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对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搞的突然袭击明确指出是搞阴谋诡计：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

毛泽东明确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搞了三天而不是一天半：有人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三天。因为这关系到对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怎么评价的问题。林彪的讲话是整个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在此之外？

毛泽东明确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件，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2009年9月初稿

2012年4月

第五章第三节 毛泽东巡视南昌

第一部分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许世友、韩先楚下午 5 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他们到了以后，由汪东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晚 9 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

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

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许世友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二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

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 1 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等座谈一下。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主席休息。

这天下午，几位司令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

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38度多。患了感冒。

晚上卧床休息。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上午 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汪东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汪东兴说：您看呢？

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

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

9月 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 40分钟就结束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毛泽东两次单独接见程世清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程世清向毛主席报告：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零点，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

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四大将一定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弄清楚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来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七月义再来时很神秘，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我说：你见到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立虹也不知道在下边干什么。林豆豆还要我少与林家接触。从林豆豆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

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

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弄的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毛泽东说：你可以写一个调查报告。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 13 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第二部分 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南昌主要有四次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九月二日，毛泽东准备离开南昌，临时通知再次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可是找不到，因为他们去打猎了。九月十几日，毛泽东到上海以后，通知许世友去上海，南京军区都不知道许世友到那里去了，许世友说他去了一个军队农场视察农业生产去了。许世友在南昌接见中对毛泽东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

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其实，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倒张”是比较积极的一个。这些事说明当时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

毛泽东在南昌的谈话中突出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批判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的说法。他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进一步在这些高级干部面前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

毛泽东巡视南昌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进一步了解到林彪集团的一些秘密活动。而且，提供这些情况的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程世清。这些情况涉及到的人有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这些林彪集团的核心人物；涉及到的事既有政治方面的又有军事方面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更高的警惕和更深的思考。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5月2日修改

第五章第四节 毛泽东巡视杭州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

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一起谈了话。

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

毛主席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

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做声。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 25 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

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主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一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

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四日，由汪东兴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

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汪东兴将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南巡讲话稿送给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

会上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上，于新野到了杭州。

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

于新野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

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得到新的信息。

杭州有一位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

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

况。

毛主席把汪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汪问：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凌晨，毛主席的专列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中午，毛主席叫汪东兴去。对他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汪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汪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汪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2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

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不同。

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上，对你们也说不上，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了。“万岁”，英文翻译为 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在谈话的时候，汪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汪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汪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汪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专列 10日 13点 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 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汪握手时间：“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

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十六点，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十八点十分，专列顺利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杭州的讲话主要有两次：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主席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毛主席同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主要强调了：

- 1，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 2，庐山会议前，林彪有两次要打电话、写信都被叶群和黄永胜他们阻止了。
- 3，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
- 4，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 5，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 5，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 6，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

军队要整顿。

毛泽东巡视杭州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进一步摸清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陈励耘继续隐瞒，不肯暴露真实的活动；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专列上。

九月八日，于新野到了杭州找陈励耘策划炸专列。这个情况毛泽东是否了解？为什么恰好有一天，他提出来把专列调离杭州？

2009年9月9日初稿

2012年5月3 日修改

第五章第五节 毛泽东巡视上海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18点 10分，专列到了上海。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毛主席一直等到 十一日的上午 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1个多小时。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 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

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说：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嘛！

许世友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

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么？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

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

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

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到 11 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

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毛主席立即对汪东兴说：我们走！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 12 点半钟就开走了。

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 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专列。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专列 18 点 35 分抵达南京站，停车 15 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

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 21 点 45 分，停车 5 分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零点10分，专列到徐州，停车 10分钟。

到兖州时是 2点 45分，没有停车。

到济南时是 5点，停车 50分钟。在济南车站，汪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

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上海只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一次。

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询问许世友现在对庐山会议事件的认识如何？

许世友只说坚决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没有说自己在庐山会议问题上有什么错误。

毛泽东只在车箱门口与王维国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

毛泽东趁他们下车吃饭时，没有打招呼就离开了上海。

毛泽东到达南京没有再见许世友，而且一路不停地回到北京。

这说明，毛泽东在巡视南昌、杭州以后，对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已经有所察觉。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5日修改

第五章第六节 毛泽东回到北京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13点 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15点多钟。

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就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

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

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主席说到汪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十五点，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

毛泽东单独交给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一项任务：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

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突出几点：

- 1，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 2，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 3，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 4，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 5，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泽东单独交给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一项任务：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说明，下一步的措施是如何防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问题。

2009年9月9初稿

2012年4月25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覆灭

第一节 林彪等人叛逃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之后，王飞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计划。

于新野在会的中间，把林彪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 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 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18点22分，值班员李万香接李海滨（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当时在山海关机场）电话：19点来一架252号三叉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九点四十分，二五六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

20点15分降落山海关的却是256号飞机。

李海滨告诉值班员李万香，对外只讲252，不准讲256。

（23点44分，李作鹏来电话查问飞机号码，我回答是256。而后值班员李万香请示李海滨，李说还是讲252。值班员李万香于23点50分打电话给李作鹏将机号改为252。）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点十五分，山海关机场调度打电话给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见你们来人接？

姜作寿说：我了解一下情况。

李文普说：我没有听说谁要来。

叶群告诉李文普：老虎听说姐姐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飞机落地了，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

刘纯结接到派车接林立果的命令。二十点三十分，过秦皇岛市不远，碰上了林立果的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

叶群与林立衡、张清林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

林立果21点钟到了林彪住地。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

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随后，林立果对张恒昌说：去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

王飞向他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他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他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

（鲁珉参加了这次黑会后，有意把眼睛搞红肿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十三日向

中央投案自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多，林豆豆问李文普，他们要到哪里去？

李文普说：主任叫我安排明早六点去广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

林豆豆说：老虎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你们赶快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

李文普说：如果真有什么事，到时候还可以在飞机上采取措施。

林豆豆和刘吉纯都不同意上飞机：林说：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你不去，我去。林立衡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 8341 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上二十一点多，林豆豆和刘吉纯到八三四一部队报告情况。

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汪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汪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汪：“报告可靠吗？”汪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汪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汪和张耀祠都守在汪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汪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汪，要汪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汪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

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汪，让汪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时以后，吴法宪打电话告诉胡萍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事。

胡萍就一面找人造假说谎应付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林立果早打主意，同时又给已去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假借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能回来，好留下林彪使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上二十三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时，周总理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派纪

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指叛国投修）。

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王飞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王飞对他老婆说：“暴露了！”狂叫：“抓起来我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23点35分，李作鹏来电话告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告诉你，它（指飞机）的行动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叶群给黄永胜打电话，想探听北京的消息，可是打到黄的办公室和家里都不在。叶群认为；黄永胜肯定是被抓了（实际上此时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召集的会议，因周来去接电话，宣布休会，黄永胜留在那里打扑克），既然黄永胜被抓了，那么抓林彪的命令也已经下来了。此时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23点50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李文普说：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

息室等吴法宪。

叶群跟着李文普从林彪的客厅出来，她对李说：快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林立果也对李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什么东西也别带。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

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

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李作鹏又于零时零6分来电话告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

香再次强调：“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时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

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付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

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

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 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

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过，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

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这时时针指向 13日凌晨 1 点 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 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见陈先瑞。

周恩来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一等战备。

李德生说：你立即回军区，把作战、机要、通信和北空指挥所严格控制起来，没有总理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李伟信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飞机跑。”

上飞机时，周宇驰对李伟信说：“你在后舱，我与于新野和两个飞行员在前舱（前后舱不通的）冲锋枪给你，在后边以应付万一情况。”

因前舱坐不下四个人，于新野又来后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等叛国投敌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 3点多，在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 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汪东兴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三点多钟，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乘直升飞机向蒙古乌兰巴托逃跑。

在飞行中，李伟信问于新野：“我们今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他说：“不成功便成仁。”

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

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

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

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 5 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 20 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士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于新野下飞机又向座舱打了一枪，一会周宇驰浑身是血走下飞机，骂于新野为什么乱开枪，这一枪正好打在他手腕上，他还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

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

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物品：

- 1、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航行图
- 2、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

伊尔库次克机场

位置：在伊尔库次克城东南8公里。标高：500m.

跑道：116—296 2750x60 (m) 水泥

导航台：116 方向 远台. 1R/514 3681m (距跑道端)

近台. 1/250 900m (距跑道端)

296 方向 远台 CN/514 3660m (距跑道端)

近台 C/250 960m (距跑道端)

恰克图导航台

位置：在恰克图城.

呼号： RT 频率： 695

- 3、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的一部份

- 4、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大量美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在西郊候机室，吴法宪拍着胡萍的肩膀说：“没有你的事，你回医院休息去。”

于是就叫秘书用他的汽车把胡萍送去医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来电话找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更正李的电话内容。

他说：李政委说的是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

飞，要李万香好好想一想。

李万香即回答：李的两次电话从未说到联名指示的问题，我是这样听的，也是这样记录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午 12 时 20 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汪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汪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汪：“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汪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汪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贰、本节简论

林彪究竟知不知道是要逃往苏联？

这里回放一下有关林彪的几个镜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23点50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

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从以上几个片段，可以看出：

第一，林彪知道叶群他们是要逃往广州或香港；

第二，林彪知道周恩来要来北戴河以后，立即提出马上走；

第三，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这究竟是他真的是要去大连，还是不愿意告诉李真实意图？

第四，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此时，林彪应该已经知道这次转移决不是平时的动一动，而是逃跑；

第五，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这就更说明是逃跑了；

第六，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这说明他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决不是吃了安眠药以后的迷惑状态；

第七，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有人认为，这是李文普一个人提出的孤证，不足以采信。

第八，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九，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十，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

的脚。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确定无疑地这是一次逃跑，而且是惊慌失措的溃逃！如果硬要说，此时，林彪还是不由自主的，是被人劫持的，是要逃往大连，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蠢话！自己走路、自己上汽车、自己上飞机，有这样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被劫持吗？大连与北戴河有什么区别？既然是怕有人抓他，逃往大连与呆在北戴河有什么区别！

再回过头来说，林彪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怕有人抓他？那是因为他心里清楚：他指挥搞了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他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指使叶群、林立果搞了反革命五七一计划。

够了，够了，林彪的一个逃跑行动，胜过十打声明。其他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益的！

2009年11月10日修改

2012年4月26日修改

第六章第二节 揭批林彪集团罪行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午，王飞在电话上与江腾蛟搞攻守同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江腾蛟叫他老婆用暗语告诉王飞：“你要江政委买的药，统统统统被人卖光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王飞同他老婆在家销毁罪证，转移赃物，还准备了一个假检讨，说他是“好心为坏人办坏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

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黄永胜等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

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朱德、刘伯承也分别写信或谈话，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绝密）：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

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对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作初步总结。

会议商定：

（一）逐步扩大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传达范围。

（二）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三）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四）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五）派刘西尧等人去国防科委主持工作。

（六）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会议还研究了有关外事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

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省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省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周恩来陪同会见。

毛泽东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师，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毛泽东还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一、当前全国形势很好。

二、中央在审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查出了大量物证人证，进一步说明：林彪叛党叛国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斗争的继续。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

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曾山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邓子恢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李富春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陈毅给毛主席的信及揭发材料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在广州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一九七一年十月中旬，纪登奎批转《保定分区学习班情况反映》（其中说：一些人在批揭批林彪过程中，把矛头指向三十八军）。

周恩来批示：要求军队方面的同志说明有关真相，团结起来，大批大揭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朱德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传达的文件：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中发[1971]66号文件）和

本通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二、传达的范围：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工厂、矿山、企业、事业位全体职工，农村人民公社全体贫下中农和中农，大学、中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单，小学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城镇居民中的劳动人民，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

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正在进行审查的人，都不能听传达。外国人也不能听传达。

三、传达的方法。根据若干试点单位的经验，首先应将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

四、加强领导。

五、在广大群众中传达以后，原来关于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保密规定，应作相应的修改。在工农兵和劳动人民中议论这个问题，是允许的。但是，仍然不登报，不广播，不写大字报，不写标语口号。同时，要教育听传达的群众，提高警惕，不要向阶级敌人泄露。

六、各单位传达讨论情况和揭发材料，逐级上报。重要的可以直送党中央和毛主席。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1971. 10. 24；中发 [1971] 66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57号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1号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2号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4号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5号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1971.10.24；中发 [1971] 68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7号……………1页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0] 62号……………5页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57号……………13页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1号……………21页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2号……………23页

六、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4号……………25页

七、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5号……………27页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根据周恩来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在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学习文件，深入批林。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讨论意见，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会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要求他们回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那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建议主席近期接见一次参加该地区座谈会的负责人。

毛泽东阅批：同意。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

“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林陈反党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政变，是有国际背景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七月中旬，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窜到中蒙边境活动。他在李雪峰、郑维山的陪同下，到处接见前线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他的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九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七百九十六篇。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 (一) 九届二中全会以前
- (二) 九届二中全会上
- (三)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肖克对林彪的揭发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聂荣臻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根据毛泽东二十日谈话精神，会议决定：今后在毛泽东像上一律不印林彪题的四个伟大，也不再提四个伟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

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下发，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讨论。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批阅李德生报来的《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空军政治部党委讨论空军市委常委七月六日办公会议精神纪要》。

周恩来批示：要将此事真相查清。空政纪要中提出的这五条措施，是最封建、最买办、最法西斯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周恩来主持并传达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一系列文件，并介绍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情况。

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王震、曾山、张云逸、张鼎丞等在京老同志先后参加了座谈会。

周恩来说：林彪事件，乍听起来是坏事，但再看再听再想，又是大好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二十二年的伟大胜利。基本的东西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路线清楚了，在这条路线下就要团结大多数，不仅在党内如此，就是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中，也要团结大多数。在正确路线下，组织问题就是团结问题。粉碎林彪事件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

周恩委托以李副春为首的十位老同志参加和领导各组座谈，并负责解释文件。

贰、本节简论

林彪突然叛逃，打乱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堵塞漏洞，稳定局势。

一、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公布林彪出逃真相。

第一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

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第二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县、区、乡

第三步：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第四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传达到全体人民，但不向敌人、外国人泄漏。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林彪反党集团辩护。

右倾保守势力以及犯错误的人必然乘机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

群众受过去大树特树的影响，对发生林彪案件感到不可理解。

这些都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抓紧清理有关林彪案件的人和事

1，对黄永胜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2，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

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3，成立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

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
三、抓紧处理几个重点地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在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在十七年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

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但是对于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如“二月逆流”问题。

五、林彪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几个人 ‘

第一个是叶剑英，林彪事件后由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有一个“二月逆流”的问题，但这个时候被毛泽东基本否定了。他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面貌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到一九七五年，他与邓小平相钩结，大刮右倾翻案风，阴谋逮捕左派领导人，他的真实面目才终于被毛泽东看清了。

第二个是华国锋，他被提升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相当于国务院的副总理，从其他同是所谓支持文革的老干部中突出出来了。

第三个是汪东兴，他不仅是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成员，而且与纪登奎共同领导专案组的办公机构。这是一个清查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人和事的、权力很大的机构。其实，他早在一九六八年以后就开始与林彪集团相钩结，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搞的突然袭击中，他也是一个重要成员。经过毛泽东的批评教育，他看到风向不对，立即伪装检讨并揭发陈伯达的问题，蒙混过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他的真实面目立刻就暴露出来了。

2009年10月某日初稿

2012年4月27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开展中美谈判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八年冬天，毛泽东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

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某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询问今年二月十六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故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外交部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来函一事报告：此举显然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十二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近期内，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十一月二十日关于两个美国人被拘一事的报告，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以后。

毛泽东批示：照办。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从全世界来说，美苏两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现在是超级大国撤军备战，但同时也进行谈判。首先美苏在赫尔辛基进行核会谈。另外，中苏举行边界会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美国大使在华沙向我试探，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装展览会上同我译员进行了谈话。对美其名曰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立场说得很清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就外交部复电稿事报毛泽东。

外交部拟稿复中国驻法国、瑞士使馆电稿：美方人员如要求见我大使、全世界可拒绝接见如要求见我一般工作人员，可接见，我必须两人在场，只听不说，允为转达，但均不约回答日期。

周恩来说：我外交部采取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现改复我驻法、驻瑞两使馆一电，采取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而在对我有利于接触时，才给回答。关于中美华沙会谈，拟在一月初答复：定在二月二十日恢复会谈。

毛泽东批示：同意。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修改外交部致中国驻波兰使馆全世界雷阳电稿及即将举行的第一三五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加写：在我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的；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中美两国恢复了中断了两年多的华沙大使级会谈。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外交部给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电稿和参加第一三六次中美会谈中方发言稿。

根据周恩来提议，将中美其名曰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

会后，周恩来又在改处加旁注：“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一三五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

同日，周恩来将讨论结果报毛泽东、林彪。

毛泽东批示：照办。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月，中美进行两次会谈中：

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它无意站在那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和台北政府的关系，有协助保卫台澎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随着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增长，美国将能削减现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美国愿讨论不仅台湾问题，而且在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代办在两次会谈中表示：只有严格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我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我方提出如果美方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自由的决断。

周恩来阅后批：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推迟中美北京会谈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提出：将会谈日期推迟至四月中旬，即在中国总理访问朝鲜之后、美苏举行限制核武器谈判之前。

毛泽东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外交部的建议。

商定：（一）推迟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将双方联络员的会晤，定在六月二十日；（二）建议毛泽东发表一简短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三）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

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

声明指出：“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

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尼克松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

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五日，周恩来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

周恩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访问。

十日晚，周恩来单独同叶海亚会谈时，叶海亚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相应的代表对话的口信。

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以来几次转达尼克松口信，并表示将把叶的传话内容报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同叶海亚单独会谈。

周恩来回答在尼克松的“口信”时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

勒杜列斯库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的关切，以及尼克松两次表示美方愿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

对此，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提出：如果美国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政府下令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行轰炸一事发表谴责美国政府的声明。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

出信息。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当天，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

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啾啾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

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

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迁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他在回答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时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趣。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

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给尼克松回了一个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回话，表示诚挚谢意，愿在两星期内给予答复。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口信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尼克松又补来一个口信，说明美国总统在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政府同意在今年内制订出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的协定，决不会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周恩来总理向叶海亚总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总统阁下极其迅速地转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由伊斯兰堡可直飞北京不公开的机场。乘机可用巴航波音机，如需中国专机，亦可派往接送。会谈连同空航来往，约需三至四天。通讯如需架设自带的无线电机，可于抵离北京期间临时启用。

鉴于基辛格博士行动难于严格保密，也可以考虑以公开身份来谈。如仍需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严格保证。在会谈有成效后，如需会后公布，当由双方商定。

其他细节，可通过叶海亚总统和中国大使直接磋商和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现在，我们应对基辛格的预备会议和尼克松的访问，作出各种可能的估计，预拟出各种对策，以便根据实际发展和变化，随时提出审查和讨论，必要时可加以补充和修改。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有人问：为什么要先与尼克松商谈呢？

因为他是当权派，如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些主张在大选前实现的可能性就大些。如先与其反对派谈，即使得到赞同，成为竞选纲领，当选后亦未必兑现。不如先当权派，后反对派，这样我们就更加主动。并且基辛格来谈招致失败，对尼克松竞选大不利，这也可对基辛格增加压力，或者也可使反对派振振有词。

有人问，中美会谈不同一般，会不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

美国群众运动，在尼克松上台后，确是高涨，重点在反战和反种族歧视。有人说，运动处于抛弃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之中。我们正好以从越南撤军和从台湾撤军、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动员美国群众，影响当权派中反对派的政策，增长群众的斗志。目前美国真正左派朋友都承认，美国正处在革命大风暴的前夕，群众思潮动荡起伏，需要正确领导，也正在开始锻炼和考验领导。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战争，中美人民来往和两国会谈，正是动员美国群众、考验群众领导的好机会。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这段历史可供参考。

又有人问，中美会谈会不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

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

又有人问，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

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

世界的必然趋势，姑不论美帝有无欺诈的可能，我现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斗、批、改阶段，战备不懈是我经常任务，若有风吹草动，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发给你们。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

斯诺访华后，陆续在外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谈及毛主席同他谈话的情况。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将陆续转载斯诺的文章。请在阅读斯诺的文章时注意，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如非党员干部和群众据此提出问题，亦请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予以回答和解释。

党内外的反映，请汇集后报告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二十一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在华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夫人。

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十五年来的一贯主张，

没有别的要求。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一九六九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发表就职演说。二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一九六九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中美开始新的秘密接触。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询问今年二月十六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故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这是美国希望与中国接触而采取的一项行动。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近期内，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中美两国恢复了中断了两年多的华沙大使级会谈。

尼克松寻找新的接触渠道。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

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自由的决断。

周恩来认为：这是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但是，这一次试探行动由于一九七〇年五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而遭到破坏。

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动。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

中美双方进行新一轮的秘密接触。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尼克松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访问。叶海亚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相应的代表对话的口信。周恩来回答在尼克松的“口信”时说：如果美方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

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中美双方达成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协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给尼克松回了一个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口信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由伊斯兰堡可直飞北京不公开的机场。

中国关于进行中美谈判的基本立场。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

这两个文件充分阐明了中国关于进行中美谈判的基本立场：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

中美谈判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不少人的疑虑。

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与美国进行谈判要先与尼克松商谈。

有的人怀疑：中美会谈会不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

有的人担心：中美会谈会阻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

有的人提出：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谈判的形势作了充分的估计：如谈不好，美国放蒋出笼、引苏东向，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

正如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的：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基本经验。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8日修改

第七章第二节 基辛格访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

至十一日，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个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三日，下午，周恩飞往河内。

本日至十四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周恩来从北京飞往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并介绍中共党内批陈伯达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谈中美关系。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修改外交部就中美关系问题发稿各驻外机构的通报时，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必须说明，除中美关系外，其他问题如涉及中美两国之外的国家，只能由当事国负责解决，我们只能阐明立场，交换意见，不许越俎代庖。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

周恩来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影射中美会谈。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大使转交恩维尔·霍查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封信。当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霍查的来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逃。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七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

拟出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安排中美双方的对口会谈和活动计划。将方案报毛泽东审阅。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作出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

体安排。

周恩来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着重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次大陆等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历史传统，不可能一下子隔断，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在这方面先有尼克松总统今年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后又有最近英国首相希思在访党年会上的讲话。我相信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时，虽然双方立场不同，但能互相了解，能谈到点子上去，能打到共同点。既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开始讨论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

中方首先否定了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

周恩来提出：可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毛泽东同意各说各的原则。

经过反复会谈，基辛格同意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

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通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力的决议。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召集会议商定立即组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谢伟思和夫人。

周恩来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外，不但出乎我们的意外，也出乎美国的意外。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但是我们能不能满足这个希望，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朝日新闻》客人。

周恩来说：二十二年来，被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在的席位，完全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美国在操纵指挥棒，有人给它配合。这次投票，七十六比三十五，这是铁的证据，代表了全世界多数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美国在联合国再利用表决器就不灵了。这次表决结果是违反美国人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次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七十六个国家，还加上弃权的十七个国家人民的愿望。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内派团出席本届联大。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同刚抵北京的金日成会谈。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告知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金日成回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

报告说：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预计十一月九日离京经上海、巴黎去纽约。一、代表团离京时，建议请姬鹏飞、李耀文、马文波、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关司负责人，与外交有关的其他部门负责人送行。二、代表团抵、离上海时，建议请市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一位常委和外事组负责人迎送。三、因许多驻华使节主动要求为代表团送行，建议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苏联边界谈判团和各国驻京记者。四、代表团离京和途经上海，拟发一综合消息。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外交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到达纽约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

讲话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我们代表团将遵循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

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个讲话载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外交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

发言稿说：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破产，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是毛泽东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我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个发言载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的批语

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

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

代表团的到来。

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周恩来在谈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时说：

联合国表决的结果，我们就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恐怕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会失败得这么惨。结果呢，这门就打开了。人们说：尼克松可以到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联合国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美国的提案，在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里，其中有十个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它们后来也投了支持阿尔巴尼亚、阿韦及利亚提案的票。如果这十票不是反对，而是弃权，那就变成五十五对四十九，美国程序性提案就会通过。这件事就表明了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以后发生的变动。这是第一。

第二，一部份刚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受到美。它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才投弃权票的。国的压力。在程序性提案表决时投弃权票的十五个国家中，多数是跟中国刚建交的

它们投弃权票也等于是支持我们，因为弃权票多了，其他票的总数就减少。结果就出现了刚才说的情况：美国的提案被否决。这马上就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不仅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而且是压倒多数的国家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反对的只有三十五票。

那七十六票怎么得来的呢？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没有变化。原来对美国提案弃权的十五票当中，有十二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这里大多数是跟我们建交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国家，现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墨西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一通过，它就宣布跟蒋介石断交。这就说明它支持的是美国的程序性提案，并不支持美国的意见，也不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它的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说中就说明了。另一种情况的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葡萄牙。它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是清楚

的。这样就增加了十七票，变成了七十六票。而弃权的也增加了，原来十五票弃权，现在十七票弃权。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的票数，仅仅只有三十五票，一下子就把联合国的形势变了，当然这里有偶然性，但是必然的趋势往往通过偶然的现象表现出来。这说明一种趋势：中国不能再被封锁了。

原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去联合国。但是我们一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去，我们就不能不去了。否则绝大多数支持我们的国家会失望的。

七十六票不仅反映了全世界人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来被剥夺的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正义要求，而且也说明了二十二年来美国的主张是错误的，在十一月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的欢迎会上，有五十七个国家踊跃发言。

美国是东道主，也抢先发了言，逼得苏联也不能不讲话了。接着蒙古也讲话了，日本也讲话了。五十七个发言的国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还有加纳，它同我们还未复交。有些建交的国家因为会议时间拖得太长，来不及讲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双方通报了越美会谈、中美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范文同一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越双方在中越联合公报上签字。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对中国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围绕着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问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是本届联大最令人注目的一件大事。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无理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权利，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在这届大会上，它被迫变换手法进行捣乱，苦心炮制了驱逐蒋介石集团是一个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集团都应占有席位的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妄图在联合国中制造“两个中国”。但是，同美国政府的预料相反，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一付诸表决就被打掉。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提案，则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压倒多数，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美国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自然报废。它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宣告破产。这是全世界人民的重大胜利，是美帝国主义的惨重失败，也是对某些假意支持而实际反对中国的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是全世界人民和主持正义的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我国出席本届联大的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受到许多友好国家的热烈欢迎，得到它们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同广大的中小国家一起战斗。尽管我们在联合国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履行我们的责任，不辜负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中国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我们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基辛格两次访华。

基辛格第一次访华。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

双方主要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台湾地位问题

周恩来指出：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二、关于台湾美国驻军问题

周恩来提出：美国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

基辛格表示：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

三、关于美蒋条约问题

周恩来提出：美国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这样，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虽然仍有不小差距，但基本达成一致。由于这一关键问题得到解决，双方达成尼克松访华的协议。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

美方首先提出的公报草案。

中方否定了美方草案。周恩来提出：可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基辛格同意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

十月二十六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与周边有关国家密切磋商

既然对中美谈判有人有疑虑，特别是周边有关的国家，这就必须与它们保持密切的磋商。

基辛格第一次华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三日下午，周恩飞往河内。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周恩来从北京飞往平壤，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发表公告。

这说明中国的原则立场是：除中美关系外，其他问题如涉及中美两国之外的国家，只能由当事国负责解决，我们只能阐明立场，交换意见，不越俎代庖。

基辛格第二次华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毛泽东接见金日成。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毛泽东会见范文同一行。发

表中越联合公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华社才发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即便中国共产党做得如此周到，也还是存在问题。这就是阿尔巴尼亚。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谈中美关系。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转交恩维尔·霍查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封信。这封信明确地表示反对中美谈判。当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霍查的来信。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将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进行讨论。美国等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这个胜利是毛泽东外交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方面，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两霸；另一方面，同美苏两霸进行谈判，打破对中国封锁、围堵。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8日修改

第七章第三节 尼克松访华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负责人开会，评论外交部起草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设想（修改稿）。

周恩来提出：草案关于台湾措词不能变，对国际形势部分可提出不同意见。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率先遣组抵达北京。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接见黑格。

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

周恩来表示，中美两国接近，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中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

会见后周恩来嘱熊向晖主持起草《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

周恩来将该稿修改后送毛泽东审批。

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会见黑格情况。

毛泽东同意《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若干技术问题。

江青等人提出，不应用电视宣传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若干技术问题。

周恩来提出，原则同意通过卫星电视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将采取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再租给美方使用的办法，以维护国家的主权。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分批接见以黑格为首的美国先遣组成员、技术顾问和专机机组人员。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接见黑格。

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要点是：

（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

（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

（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

（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五）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

（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在会晤，周恩来还对黑格当天转达的基辛格口信作了评论。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

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毛泽东病危，经过救治转危为安。

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

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转来的国家计委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八日，中央召集北京、上海、浙江党政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安全保密、宣传教育、新闻报道、接待方针等工作。

经周恩来同意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在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

他说：美国搞撤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做是潜在的敌人。新华社的报道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你们今天写的尼克松启程来华的消息中，未摘他说的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这段话说得最清楚不过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

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说是有个比较，还是民主党的那位前总统约翰逊，还是你尼克松，究竟哪个比较好。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是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谈话的一部分。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说：“就是啰。”

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

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形式与内容。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

周恩来在祝酒词上说：

总统应邀来华，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致了答词。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

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

周恩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丢掉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两方面的事。

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中美继续举行三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会谈。

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

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

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

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

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晚，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中美联合公报基本谈定。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同尼克松在机场休息室举行第二次大范围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访问杭州、上海。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

双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美《联合公报》内容。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尼克松在上锦江饭店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

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

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

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宣读中美《联合公报》。

他说：

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事物前进了，这就要求解们要在原则性基础上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进国际和平的实现。

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第一，双方没有密约；第二，我们坚持原则；第三，谈不上那一方胜利。将来，要用实践证明《联合公报》是否有效。

一九七二年三月四日，周恩来飞往河内，向越南党政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周恩来送审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

通报稿中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

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来，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

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上批示：

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

（引自《毛泽东文稿》第13册）

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前往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贰、本节简论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

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8日修改

第七章第四节 中日恢复邦交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民党访华团。

最近，日本公民党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五点主张：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论调；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四、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五、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周恩来在会见中说：如果按照公民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关系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订立和平条约，并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以飞鸟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

周恩来说：中日之间存在一低频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台独分子就是要搞台湾独立。现在联合国就有人说，蒋介石用中国的名义不能进联合国，如果用台湾的名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这个谬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在世界各地都还有市场。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关于中日关系问题

马克斯韦尔：我在北京期间，了解到日本的政策——她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已成为使你们政府关切的事情。

总理：最近我跟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谈话。他们提出“修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

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也了解到日本的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它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从生产数字来说，在西方国家几乎占第二位，美国以下就是它，从整个世界来说，美国、苏联以下就是它。

但它的经济是畸形发展，首先是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靠进口。经济自由膨胀，造成公害，把日本本土和西周的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搞坏了，要到远处去打鱼。公害最厉害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是第一。

第二、为要大量吞吐，就需要很大的运输量，所以造船事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当然这些船不全是自己用。日本的运油船大到载重三十五万吨，现在甚至计划搞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油只能通过管子装卸，靠岸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炼油化工厂多设在沿海，这样海水也污染得很厉害。美国也是这样。

日本的市场大部份是在海外。但海外市场有限，他们就要争夺。日本本身农业却破产了。本来日本农业还能够自给，大米还能够出口。城市大部份人过去都是吃大米的。现在改吃面包了，要进口美国的面粉。现在为了发展工业的需要，把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所以粮食的总产量比过去低。工业发展到现在，日本纯粹的农业区域少起来了。

这种畸形发展，照原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势必要跟人家争夺殖民地。譬如，它要向南亚次大陆、非洲、拉美和远东国家投资。

这个投资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经济扩张必然带来军事扩张。譬如它从中东运石油到本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油船在这里通过过多，会把那里的海水弄脏。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说，马六甲海峡是它的生命线。

这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它们带来的祸害。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想重新唤起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你看一个电影就懂得了。

但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复活的。因为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照刚才讲的，一旦战争起来，日本这个岛国怎么作战？

日本现在面临着的矛盾是走战争的道路，还是走和平的道路。走这样经济扩张的道路，必然要带来军事扩张，必然要引起战争。

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是受欢迎的。现在日本人正走在岔路口上。日本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提出修正资本主义呢？我们说：修正社会主义，就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你修正资本主义，是无法进入社会主义的。那就可能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二十六年的日本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没有凡尔赛条约造成的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所以我们说日本正处在岔路口上。当然大多数人民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要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日本应该跟中国友好，我们并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跟日本企业家们说，你们的政府太不讲现实了，对有七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而把台湾蒋介石看作代表中国，这真是荒谬。这次在联合国都改变了局面，日本不改变能行嘛！尽管这里存在着矛盾，这矛盾总要解决啊。

马克斯韦尔：我在北京期间，了解到日本的政策——她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已成为使你们政府关切的事情。

总理：最近我跟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谈话。他们提出“修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也了解到日本的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它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从生产数字来说，在西方国家几乎占第二位，美国以下就是它，从整个世界来说，美国、苏联以下就是它。

但它的经济是畸形发展，首先是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靠进口。经济自由膨胀，造成公害，把日本本土和西周的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搞坏了，要到远处去打鱼。公害最厉害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是第一。

第二、为要大量吞吐，就需要很大的运输量，所以造船事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当然这些船不全是自己用。日本的运油船大到载重三十五万吨，现在甚至计划搞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油只能通过管子装卸，靠岸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炼油化工厂多设在沿海，这样海水也污染得很厉害。美国也是这样。

日本的市场大部份是在海外。但海外市场有限，他们就要争夺。日本本身农业却破产了。本来日本农业还能够自给，大米还能够出口。城市大部份人过去都是吃大米的。现在改吃面包了，要进口美国的面粉。现在为了发展工业的需要，把农

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所以粮食的总产量比过去低。工业发展到现在，日本纯粹的农业区域少起来了。

这种畸形发展，照原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势必要跟人家争夺殖民地。譬如，它要向南亚次大陆、非洲、拉美和远东国家投资。

这个投资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经济扩张必然带来军事扩张。譬如它从中东运石油到本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油船在这里通过过多，会把那里的海水弄脏。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说，马六甲海峡是它的生命线。

这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它们带来的祸害。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想重新唤起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你看一个电影就懂得了。

但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复活的。因为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照刚才讲的，一旦战争起来，日本这个岛国怎么作战？

日本现在面临着的矛盾是走战争的道路，还是走和平的道路。走这样经济扩张的道路，必然要带来军事扩张，必然要引起战争。

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是受欢迎的。现在日本人正走在岔路口上。日本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提出修正资本主义呢？我们说：修正社会主义，就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你修正资本主义，是无法进入社会主义的。那就可能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二十六年的日本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没有凡尔赛条约造成的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所以我们说日本正处在岔路口上。当然大多数人民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要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日本应该跟中国友好，我们并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跟日本企业家们说，你们的政府太不讲现实了，对有七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而把台湾蒋介石看作代表中国，这真是荒谬。这次在联合国都改变了局面，日本不改变能行嘛！尽管这里存在着矛盾，这矛盾总要解决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关于中英关系问题

马克斯韦尔：最后，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能不能简短地谈一下中英关系的问题。

总理：英国承认中国。在西方国家中是较早的，但到现在还未能交换大使，原因是英国政府坚持那个站不住脚的逻辑。

它公开可以同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即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照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但它又说，如果有人问起，英国政府将说，英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没有变化。简直莫名其妙。我和麦克唐纳先生（前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他不久前到过北京）谈过，我说这些是你们文官制度搞出来的。他说，在工党内阁和保守党内阁中，有那么一些学法律的人搞出来的。他们说，过去说过“台湾地位未定”。由于说了这样的话，现在不能改了。这不是荒唐吗？

我说你们英国政策改变了多少次，为什么这个政策不能改呢？张伯伦的政策不是邱吉尔把它改了吗？它就是要保留这一点。这次在联大表决的时候，英国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反对美国提案，算是实现了它的诺言。但这个保留毫无道理吧！是否等将来如果台湾有别的大国搞“独立国家”的阴谋，你要承认它？他不敢回答。你这样搞，我们不干。因为你们留一个尾巴，而且很长。

马克斯韦尔：如果英国采取中加建交公报的措词，是不是够了呢？我想，那个公报中说，加拿大“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总理：英国同加拿大不一样，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对台湾归还中国承担了义务，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而且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这是英国发明的。

因为美国丢了中国以后，美国难过得很，互相推卸责任，发表了艾奇逊的白皮书，一方面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责备蒋介石，好像美国政府总是做得对的。杜鲁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声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领土野心。开罗宣言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嘛，台湾又已经归还祖国，现在联合国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但英国为了帮美国造一个籍口，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法律上做文章，旧金山和约故意只说日本已放弃了那些领土。《注：此处删去了“包括台湾和其他地方”几个

字》，但不说这些地方究竟归于谁，这是伏笔。还制造舆论说，等太平洋地区局势和缓后再说。苏联也没有在旧金山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也未说南库页岛（在北太平洋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岛屿）应交谁，为什么不说不说南库页岛也是地位未定？这个岛的南半部是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这比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晚十年就是了。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的行政长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地位问题早已解决了，所以英国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挖空心思出来的。当时美国占领了台湾海峡。英国是要帮美国忙的。

马克斯韦尔：我想这一切现在对中国实际上不产生什么问题。但是看来交换大使是不能早日实现了，而我想这将是伦敦的损失。

总理：我们没有什么，对英国不利。它已承认了我们二十二年，而其他承认我们比它晚的国家都交换了大使。

马克斯韦尔：我想，为英国目前立场所作的解释是，英国政府不能违背其过去政府说过的话。

总理：这是表面的话。实质上是要留一点尾巴，将来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它好承认。尽管英国是你的祖国，但我要批评英国的传统政策。它在任何一个地方总要留一个尾巴，你是研究南亚次大陆的，非常清楚。譬如查谟、克什米尔、东西孟加拉、东西旁遮普等，它任何地方总要留一点麻烦。

现在英国首相说，英国回到欧洲去，你既然要回到欧洲去，就该让亚洲人和缓一点嘛！应该把事情弄得更好些。谭森先生（前英国驻北京代办，他已在上月离任）可能有一个误会。以为我们老实，好说话。我们不隐蔽我们的观点，敢于承认错误。

你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坏人搞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阴谋的反动组织，叫做“五一六”，煽动一批群众去包围英国代办处，我们通过广播车，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冲进去，英国代办也听到了，他懂得了我们的政策。事后我们为它把房子修复了，表示了歉意。

我看英国有点误解，觉得中国人好说话。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对原则是一定坚持的。

马克斯韦尔：三个星期以前，这里有一位外交官——不是英国的外交官——告诉

我，中英谈判已经突破，即将互派大使。看来他的消息不正确。

总理：中英如要互派大使，他们就必须割掉那个尾巴。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

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民党第二次访华团。

周恩来说：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这样就打破了从吉田到佐藤这一个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日中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日中友好旧军人代表团及其他友好人士。

周恩来说：日本现正走在十字路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继续膨胀，军事力量也随着扩张，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种是，日本真正摆脱大国的控制，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搞自卫武装，不侵略别人，也反对别人的侵略。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领袖和夫人、共和党领袖和夫人。

周恩来说：

杜勒斯时代的观点要变了，他好像认为什么都是铁板一块，这怎么可能呢？杜勒斯的思想指导了你们整个五十年代。

如果不是必经阶段总统改变政策还执行杜勒斯时代的政策，当然我们两国就不可能接近了。但是，并不是说，写在公报上的现在都实现了。我们并不是要马上把台湾归还我们，因为你们承认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尼克松创立中美两往来，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你们两党都赞成的。不管你们哪一个党当权，我们都是一样的态度，我们不会改变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

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周恩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周恩来会见法国外交部长。

周恩来说：

你们在西方大国中是承认我们的。

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外交部长。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毛泽东的指示

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周恩来托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外交部日本处延长陈抗向正在日本的孙平化转达：要抓住时机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和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说：

支持田中政府恢复日中邦交这一点，你们社会党、公民党、民社都表了态的，我认为你们的话是对的。

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

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这样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日中邦交并不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

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如果说中日两国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也不谋求霸权。

请转告在野党和日本其他友好人士：如果我们中日两国得复交了，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友好往来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许多日本朋友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往来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中国人民结交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与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谈。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我们两国不是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建交问题。中美其名曰和中日之间可以用关系正常化这个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它的特点，它从来没和蒋介石发生关系，你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恐怕应归功于阿登纳总理，他是有远

见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竹入是受田中首相委托来华的。

周恩来说：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因为田中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力，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入表示，公民党也是作这样的解释。

周恩来说：公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评议不同。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

竹入表示，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中一定要用合法这个词。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报告同竹入义胜会谈情况。

会议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复交三原则：

- （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 （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政府将从台湾撤出其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
- （三）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恩来同郭沫若、廖承志等与竹入义胜继续举行会谈。

周恩来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一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中方将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的立场。

竹入表示，将带回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会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黑田寿男一行。周恩来说：我们的外交，是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七机部就引进英国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问题，将与英国进行谈判。

周恩来批示：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和日本青年访华团一行。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周恩来同郭沫若、廖承志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以及其他日本朋友。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来华作内部访问的金日成。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

双方就国际统一战线朝鲜、日本、美苏及联合国等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说：外交上争取同上层来往，目标是为了人民。同上层来往，又寄希望于人民，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求人民运动服从自己的外交政策；二是搞包办代替，强加于人。上层活动必须有原则性，但不取消容许的灵活性。我党几十年上层统战工作经验证明：同资产阶级决裂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即只斗争不联合；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右的错误，即只联合不斗争。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

周恩来提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政府、民间贸易并行不悖。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
内部宣传提纲”

宣传提纲指出，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即将来华访问，与我国领导人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田中首相访华，一是当前国际大好形势的反映，二是中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标志，三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结果，四是日美、日苏矛盾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

毛泽东批示：同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16页）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会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

周恩来引“饮水不忘掘井人”语，对长期致力于日中间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当场要求打电话给在日本的老朋友冈崎嘉平太，请冈崎

来北京迎接中日邦交恢复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同董必武会见赞比亚副总统及所率赞友好代表团。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及所率日本自民党访华团。

周恩来说：

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

中日之间来往几乎没有中断过，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特点。日本政府的做法有时开明，有时不开明。真正迈出第一步的还是田中首相，所以说揭开了中日关系新的篇章。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矗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会见小坂等人。

周恩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本政府特使椎名悦三郎在日本宣称：日将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保持下去。

中方驻日代表约见大平外相要求对方澄清此事。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单独会见古井喜实。

古井喜实受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之托带来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

周恩来就这个草案发表意见。

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的公告。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

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

周恩来对昨日宴会上田中致辞里所用“麻烦”一语提出异议，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以说是“添麻烦”。

周恩来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周恩来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里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中日关系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作的决定。）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举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

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

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

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

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

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

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

周恩来说：

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讲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

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种精神。

周恩来并当场将“言必信，行必果”写出交给田中。

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准中日联合声明草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田中首相举行答谢宴会。

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

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代友好下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陪同田中首相到上海参观访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会谈顺利结束

外交部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波恩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顺利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邀请联邦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正式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将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至十四日访问北京。

在访问期间，两国外交部长将签署和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的联合公报。此外，联邦外交部长将同中国政府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送别田中首相回国。

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周恩来会见台湾同胞、旅美华侨四十余人。

周恩来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贰、本节简论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时，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就成为外交工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经过一系列工作，至日本田中角荣内阁上台，终于实现了中日恢复邦交。

2012年3月11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批林整风

第一节 一九七二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帝、苏修同包括它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更尖锐了，更扩大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激起亚非拉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侵略和反侵略、革命和反革命的局部战争连绵不绝。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修正主义集团日趋瓦解。各国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改组。今日世界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统治。

过去的一年，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帝、修、反，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一年，我们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战斗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农业连续十年丰收，粮食生产在受灾比较重的情况下，比大丰收的一九七〇年又有增长，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

品种增加。钢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八，达到两千一百万吨，标志着整个工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基本建设进展较快，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进一步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有某些提高。人民解放军建设得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空前巩固。

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年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下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执行党的“九大”提出的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路线教育 促春耕生产》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 03. 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过去狠抓粮食生产是正确的，今后也必须把粮食生产抓紧，决不可稍微放松。没有粮食生产的发展，就说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说不上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必须继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同时，也必须注意，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促进的。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方面确有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也只有很好地安排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才更有利于使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和有各种专长的社员各尽其能，而且在各个季节都有活可干。发展多种经营，可以为集体经济积累更多资金，加快农业机械化，这就又可以腾出更多劳力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荒山、水面、河滩、“四旁”等等，单一生产粮食不便利用的，实行多种经营就都能排上用场。肥料不足，从发展牧业、林业、油料、养蚕等方面，正好可以开辟更多的肥源。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地力、物力的潜力是可以一挖再挖的。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综合利用，正是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一条广阔的道路。这样做，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对此，应当加强路线和政策教育，予以澄清。有资本主义的多种经营，有社会主义的多种经营，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决定于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只顾赚钱，不顾国家计划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样搞多种经营当然会走到

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是必须批判、必须制止的。但是，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正是为了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战胜资本主义势力，才更要下气力领导群众搞好多种经营。这个重要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我们不去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那就等于在这个阵地上给资本主义让路，那才是错误的事情。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教育社员先公后私，反对弃农经商。

以粮为纲，是就全局而言。就各个不同地区来说，要注意因地制宜。一般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同时根据当地条件，积极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和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生产。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区、林区、渔区，应分别以经营牧业、林业、渔业为主。这些地区，当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也不要搞单一经营；但是，应当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主要任务。对于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或留粮标准，要保证每人平均口粮不低于附近粮食产区的一般水平。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三十年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反复强调了这一方针，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严肃地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党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促进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当前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斗、批、改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于落实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

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分清是非，目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二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努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进步。

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犯了错误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毛主席指出：“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要提倡顾全大局。”对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要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关怀他们，教育他们，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就要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都要在革命实践中努力学习，斗私，批修，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我们应当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同志，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真学习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排除“左”、右干扰，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我党历次两条路线斗争证明，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得到广大干部和党员衷心拥护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是我们党不断巩固、兴旺、发展，革命事业不断前进和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我们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

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说明了毛主席正确方针的巨大威力。只要我们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方针，就可以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中，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坚持毛主席革命线就是胜利——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刘少奇一类骗子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宣扬什么“超天才”、“先知先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剥削阶级的精神宝库中，拣起破烂的人性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早已作过彻底的批判。我们要按照《讲话》的要求，努力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共产党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对一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言行，要以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坚决斗争到底。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还是少数“英雄”创造历史，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刘少奇一类骗子却颠倒历史，否定工农兵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作反革命的舆论准备。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联系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党的组织，要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经验，加速文艺战线斗、批、改的步伐。一是抓路线，抓方向，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排除形形色色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思想文化战线的种种流毒。二是抓党的政策的落实，切实搞好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特别是要切实抓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确地发挥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逐步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思想、业务水平，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三是抓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勇于实践，敢于创社会主义之新，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努力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适应广大工农兵日益增长的需要。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持数年 必有好处》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经验提出来的极为重要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特别是县、团党委以上领导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初步形成了风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前一阶段学习中，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把看书学习同批修整风结合起来，学习中央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和五本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

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它的理论基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许多同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提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空气更加浓厚。不少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比较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了各条战线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使革命和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效如何，要看我们能不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善于识别和抵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歪风邪气。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二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更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战胜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路线，不管是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革命的同志们必须努力锻炼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能力，锻炼自己的识别能力，在批修整风的斗争实践中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武器。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发扬光荣传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四十五周年》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人民解放军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指战员以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提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觉悟。干部战士认真看书学习形成风气。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加亲密。一个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正在兴起。我们的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了新的加强。全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朝气蓬勃，奋发前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们的军队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成长的。

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是我们这个军队的显著特征。

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

一年来，我国继续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我们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我们坚持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对亚非拉国家，我们是这样做的；对第二中间地带的国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即使过去采取敌视我国政策的国家，当它表示愿意改变这种政策，我们也同它谈判改善国家关系的问题。我们坚持了原则性，也为实现这种原则性而采取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我国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被剥夺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恢复，蒋介石集团被驱逐出联合国。一年来，又有二十个国家同我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在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年二月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进行了认真、坦率和有益的会谈。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了。最近，日本田中总理大臣应邀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协议。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篇章。这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将发生积极的影响。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这些伟大成就，使那种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使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指示

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贰、本节简论

继续批林整风是一九七二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 一、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 二、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 三、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 1, 新疆
- 2, 四川
- 3, 浙江
- 4, 江西
- 5, 贵州
- 6, 湖南
- 7, 河南
- 8, 山东
- 9, 海军
- 10, 北京军区

四、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完成了几项重大任务：

首先是尼克松访华。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周恩来、叶剑英接见以黑格为首的美国先遣组成员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其次是对西欧各国的外交取得突破。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再次是基辛格访华。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第四是中日建交。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举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2009年5月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八章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发出的“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对于提高全军指战员的觉悟，增进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使人民解放军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祖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必将发挥巨大作用。《通知》要求，全军指战员要深刻认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提高向全国人民学习的自觉性，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虚心地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地方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经常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听取批评，接受监督。要抓紧新年、春节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及冬季野营训练等机会，掀起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潮。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向全国人民学习的活动抓紧抓好，长期坚持下去，务必取得切实的效果。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诘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对陈毅一生作了肯定评价，并说：邓小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周恩来在悼词中说：陈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

全体代表。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1972.01.13；中发〔1972〕3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为了加深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央决定：

一、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扩大发放范围。工、矿、企业发至班组，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发两份，四十人以上的发三份；农村发至生产队，三十户以下的发两份，三十户至五十户的发三份，五十户以上的适当增发，居住过分分散的酌情增发，大队发二至三份；军队发至排，每排发两份；大、专院校和中学，每个教学班发两份，小学五、六年级，每个教学班发两份，教职员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发一份；商业部门发至班组和营业点，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以上的发两份；机关发至科、室，大体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发至居民委员会，大体上按有阅读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发一份。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都应认真办好学习班，培养训练宣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亲自宣讲，和群众一起阅读学习，开讲用会、座谈会，并根据文件的精神解答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好的发言稿，请选送中央。

三、文件发至基层后，要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如有遗失要追究责任，酌予处分。

四、中央将陆续发表这类材料，均照此办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1972.01.13；中发〔1972〕5号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972.01.13；中发 [1972] 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改组了北京军区。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挖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林彪一伙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死不悔改。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接着又从上海去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同）原副处长〕从杭州回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已在上海的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从北京叫来商量，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

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所谓“三国”，是指王，陈，周；“四方”，指江，王，陈、周。〕，开了一整夜。据陈励耘交代，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根据缴获的于新野的工作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一伙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于新野等，在四月二十三日晚开了一个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问题。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二）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各地方、各部队、各单位的揭发及案犯的交代，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和据点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林彪、叶群继续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据缴获的程洪珍的工作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从这些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量的通信、电台、窃听、录相、录音、照相、警报器等进行特务活动的器材装备，大量的枪支弹药，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二、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一伙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四出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一伙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他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有人要夺林副主席的权”，“林彪不当国防部长，就完全架空了”。他们说：“要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这是权力再分配的斗

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反革命谬论，是林彪提出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的继续和发展，更加露骨地暴露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他们狂热地吹捧林彪，到处散布黄永胜、李作鹏、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等人炮制的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在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再版三百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他们叫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没有突出林彪的“功绩”，他们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的党史材料和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大肆吹捧林彪。林彪一九六九年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诗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同时，林彪一伙利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空军某部现场会议，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林彪一伙胡吹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林立果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继续反对“九大”路线，反对毛主席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林彪一伙坚持“天才”的反党纲领，顽固地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林彪一伙到处大讲“天才”，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混合”，“极左派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他们鼓吹“应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继续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叫嚣“我们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舆论准备。

三、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

林彪、叶群、黄、吴、李、邱一伙，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欺骗和拉拢

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了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珉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李伟信等，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

四、秘密建立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专案”

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密的“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叶、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五、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由王维国组织了名为教导队、实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搞到了一批武器装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六、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彪一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所谓“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特务组织。林立果通过米家农 [广州民航局原政委] 组织的“战斗小分队”，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林彪一伙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

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这种“战斗小分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

七、秘密组织情报网，进行特务情报活动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他们使用打进去拉出来、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想方设法探听毛主席的行动路线。

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为他们“站岗放哨”，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

他们还大量地搜集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从北京、广州等地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手抄的这种情报。

八、为反革命政变建立通信网

林彪一伙按照《“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准备“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制电信通信装备。林彪一伙大量盗用通信装备器材，私调几十对专线，以北京为基点，组织秘密通信网。他们还试制了代号为“01工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林立果要求这种收发报机，通信速度快，保密性能好，体积小，便于伪装，要求能在市内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用。

九、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坦克、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林彪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指使其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飞行训练和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先后十次去某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十、盗窃航行资料，为叛国投敌作准备

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察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指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政变。林彪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迅速地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毛主席率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他们鼓吹的“江田岛精神”，不但仓惶逃命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不实行，一小撮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实行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受林彪一伙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觉醒起来，反戈一击，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分子，大多数正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同它的作者们一道，已经被

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它如同一切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林彪及其一伙怎样耍两面派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彻底地揭露了林彪及其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571 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时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用“独裁者”、“暴君”这种胡言乱语，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八七页。]。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咒骂列宁是“独裁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第三十四页]。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曾经咒骂斯大林是“专制君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四〇页]。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疯狂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林彪和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阴谋家、叛徒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由于他们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所决定的。

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种攻击和谩骂，毛主席早就痛斥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场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是极端狂妄，又极端虚弱的。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指出：“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林彪一伙正是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

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轮。其结果，就只能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曾经指出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在《“571 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反革命文件。通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逐条逐段的批判，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我国人民战斗的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附件一：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影印件）

附件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原文印件）

附件三：李伟信的笔供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各地工作情况。

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尤其是新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仍将斗争主要矛头指向王恩茂，不利于团结对敌。

会议商定，近期约新疆党委和军区负责人来京谈，以促进他们的认识和团结。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

周恩来说：把批判矛头对准王恩茂的两个主义和一个王国，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的政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现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出了林彪反党集团，从九一三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你们还没有自觉地深挖思想。

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03.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

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批、两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没有及时纠正这个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四川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所谓的“根据地”和“借用力量”，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成都地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

（2）现已查明，林贼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对成都地区在思想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林贼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3）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军区党委和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几次会议，在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同时，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

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的教导，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应当欢迎。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2. 03. 23；中发 [1972] 1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广大军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你们在斗争中，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认真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因病逝世。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的讲话精神

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最近发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指十二号文件），精神就是要解放干部。国家机关解放一批干部，解放了就要分配工作。有的要经中央批准，有的要经毛主席批准。过去是正部长如谷牧同志、胡耀邦同志都要报毛主席批。现在报的材料太简单了，手续也不完备，要报毛主席看，不行。最近苏振华同志写了一个检查，很认真检查了在地方工作时的错误（毛代表说：苏振华过去在地方上做过县委），军队里犯的错误，一段一段很清楚，毛主席看了批了，可以安排工作。林业部一个副部长写的检查很认真，但我们整理时只说他犯了一般错误。他检查他过去支持了出版刘志丹的小说。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的这本书，他那时的错误，就等于现在出版林立果的反党材料一样是反党性质的，但结论是一般错误是不对的。

又如有个同志反对学习大寨，实行包产到户，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他本人写得很深刻，但我们写得太轻了。不要在原则问题上马马虎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样对他们有利，也不会背包袱，否则到下面工作也不好。有个副部长在土改时有反攻倒算问题，没写清楚，这是个大的问题，路线问题，要在结论中写清楚，没有还的账一定要还，你忘了群众忘不了。

欠了账一定要还。各省委成立党委时，总理亲自抓，对这类问题都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检查，有的受了处分。这样对本人有好处，这笔账要还，至少要写封信，回到原来的地方作检查。当了官也不行，欠了账要还，如果不愿意这样做就

不好。

二、整理材料问题：正部长和中央文革直接处理过的人的材料要报主席批，副部长报中央批。本人检查要用路线观点来说清问题，光用“滔天罪行”、“狼子野心”这些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在批判他的时候“滔天罪行”，解放他时又不讲原则，原则是非要分清楚，不要写得太长，要实事求是，另外要写个报告，对这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一贯表现和他检查的要表态，提出使用意见。

材料问题要选择，不要带一大包，一个人一大包材料是包袱。结论、组织意见、本人检查，如有政治历史问题要附上主要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其他材料暂时放着，不要转。待中央研究后处理，不要搞邱会作那个办法。（总后下放了很多干部到

新疆，去时这边欢送，那边欢迎，各人的材料也没弄下去，以后就把人家在运动中的材料一大包一大包的转下去了。）

组织结论要和本人见面，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意见不一致就不要分配。如有个单位对一个副部长的入党时间问题，他自己说是1937年入的党，但调查的是1938年，他一直保留意见，故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夏部长说：1937年入党的算内战时期的干部，1938年的就算抗日时期的干部，故这两个年头是有区别的，如1938年1939年区别就不大了。）不要带着问题下去，矛盾不要带到地方去。结论是斗批改的最后阶段，思想要做通，不要把不干不净的分到地方去。哪些材料装档案，哪些不装还要研究。对副部长的材料各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要看，领导不看材料不好。（纪登奎同志谈到一份材料上写着“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认为这种提法就不确切，怎么叫“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这也是斗批改的水平问题。前一段分配到各省市去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问题，有人批评我们把“五·一六”也派下去了。

三、清查“五·一六”问题：全国总工会汇报时，纪登奎同志说：有人告状，江青同志把信转给我了，你们单位有多少“五·一六”？答：有200人。纪登奎同志说：有那么多吗？这就是扩大化了，答：我们定了两个。又问农林部有多少“五·一六”？答：有100多。纪登奎同志说：有这么多吗？会后全总和农林部的留下谈谈。以后又问交通部有多少？交通部的同志没有讲。

（1972年4月整理）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

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972. 04. 25；中发 [1972] 1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

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

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约见来京参加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

周恩来说：你们的报告主席、中央已经批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参加浙江省委常委，分别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要把浙江搞好。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

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04.27；中发 [1972]1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央政治局还商定了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排序方案。

周恩来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梁。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危害很大。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197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通知》回顾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以来到现在8个月中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的5项措施。

指出：“为了总结和交流这一时期的经验，以利于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使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目 录

-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1）
-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彪罪行谈话记录（摘要）……………（4）
-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8）
-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11）
-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21）
-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34）
-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6）
-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8）
-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50）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请求可否将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后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串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

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大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但是为的要贯串起来学习主席思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如何教育大家，对林彪这些人如何教育，都可以从文件之一中看出来。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幅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这个里头，也比过去的东西多了一些。就是他的国民党老反共分子证据确凿，托派证据确凿，

被捕叛变自首成了特务，这也是证据确凿。他整个思想是从国民党右派一直到托派、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当然，现在大家主要的火力是对付林彪反党集团了，但是陈伯达也是主要成员，大家有什么知道的事情，或者跟他共事的时候知道一些什么事，还可以揭发，还可以批判嘛，这样来充实这个部分。因为陈伯达里通外国的材料还不完全，如果还有更有分量的材料就更好，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审查。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已经印了，主席批评的意见，我们把它说出来，大家知道就是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不审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再揭发也就是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还有比这个更凶的吗？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谋害罪状千真万确的证据，那么多嘛，人人愤慨的嘛。这个性质是不变的了，顶多就是补充材料，不是继续审查的问题，而是揭发的问题。我们的措辞上是有点毛病。这好在是征求意见了，大家有更尖锐的意见，还可以提给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为专案组抓这个工作越看多了，有时候明摆着措辞不当，有时就疏忽过去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本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

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象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聂荣臻同志：连长）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

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聂荣臻同志：没有传达。）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三，四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参阅文件之二就是在学习批林整风的一些文件时，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些老同志，有九位同志写了书面意见，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老同志中有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还有曾山同志、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现在

病着，请假）等一共九篇。此外，还有一些老同志，如果还有揭发材料，我们还可以续印。

参阅文件之三，就是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飏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军博已经被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了嘛，他应该去过过目嘛，他也顾不了这么多。所以，做坏事的人，心测不轨的人，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国家这么大，能盖得住？现在就证明了，就从军事博物馆抄来的，是吧，耿飏同志，没错吧？（耿飏同志：没错。）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的军事思想完全是不对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也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拼了，分兵把口。那个时期有个杂志，叫《革命与战争》，林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杂志上，他特别称赞支持李德的观点。所以，他也有份的。彭德怀有份。当时李德很欣赏第三军团的两个头子，先欣赏彭德怀，后欣赏林彪，这不是偶然的。当然了，我们当时也是犯错误的了。林彪也不是正确的，他同样也是犯错误。你犯错误就得承认，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过。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搞的，就是中苏关系里头有十一个问题，它不是编年的，是按问题的性质分的。这个文件里头是讲些事实了，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我们的了，从海军基地、两国联合舰队这些引起的了。也作参阅文件。

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二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九月二十九，叶群检讨是十月十二，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印小一点，把主席批示印大一点，使大家可以学习。主席是批得很尖锐，但是总是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改。

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

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主席还是启发他们，先得到的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主席还提议帮他们加一段，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们把这段加进去。后来就是吴法宪、叶群的，主席也批了，这些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是发给大家的，我们这回打算跟前面两个批件摆在一起也把它再印出来。他们的检讨现在看许多是假话了，但是主席根据他们的书面的话，还是尖锐的批了，还寄予希望，要他们改的，我们可以对照来学。我们今天商量这作为文件之六，大概这个报告主席，主席会同意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嘛。

从前年庐山会议起，到去年“九·一三”，把这一段主席的这些文件汇集起来，这样就更看得完全一些了。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会更深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调整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概要）

1972. 05. 21；中发 [72]21号

1972年5月初，周恩来审阅外交部核心小组关于任命仲曦东等七人为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助理的请示报告，并报送毛泽东审定。在附信中说：“外交部副部长现只两人(乔、韩)，自从外交战线展开以来，实在忙不过来。几次同外交部核心小组商讨，认为非增加副部长和部长助理，才能把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还要从中青年干部中提一些人担负司局长职务，才能分担任务，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外交战线上的干部。”5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于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与华东组、中南组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并

作了三次发言。现将江青同志的这三次发言，综合整理如下：

毛主席的这封信，我有这样的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学习。只是我个人的领会，不一定那么深，不一定那么准确。

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十五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六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经过实践是比较清楚的。我坐在飞机上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山河，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对于共产主义，我没有看到。不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到了共产主义，还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所以说，这封信的根本思想，对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象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 B——52 旗号，打击 D——52 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

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解剖了自己，也解剖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通过混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这次学习有点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最大的学习。我在延安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开始学到了认识自己的困难性和重要性。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参加东北组讨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组如今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七日，周恩来起草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后将先送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

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情况及浙江、新疆等地问题。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
1972.06.05；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林彪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支语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

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后，周恩来去毛泽东处。

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周恩来修改、补充《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形成二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将提纲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

在谈到王明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检讨。并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党说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准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发言。

陈云就所谓“伍豪问题”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同日，陈云又写了书面发言：“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周恩来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词的情况作了说明。

还讲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公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存档。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 06. 28；省委 [1972] 9号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

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两只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

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 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

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 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 xxx 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〇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 xxx 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

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 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〇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〇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 “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

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〇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1972. 07. 02；中发 [1972] 2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各地在传达讨论“材料之三”时，要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武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展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各地在向群众传达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毛主席重要讲话、批示和中央文件时，采取了总结试点经验，开办学习班，重点培养骨干，然后向群众普遍展开传达宣讲的办法。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材料之三”的传达方法，各地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关于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问题，由民族出版机构负责解决。

一九七二年七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1. 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2.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1. 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2. 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3. 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4. 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5. 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6. 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1. 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2. 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3. 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4. 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5.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6.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7.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第二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路两用汽车的训练
- 第三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
 -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
 -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 十八、李作鹏窜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份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

周恩来说：出了林彪事件，出了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有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地出现。

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事：一是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二是“三支两军”，军代表、军宣队问题，要肯定基本成绩，但也有许多地方风气搞坏了，要改。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1972年7月9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示下起草的。

《报告》建议对应解放的干部抓紧工作，及时解放，原则上都应在公安部门分配适当工作。公安部机关军管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当予以撤销。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转发各地党委督促贯彻执行。

到1973年，全国公安机关陆续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调回了一大批业务骨干。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

电话会议，除传达毛主席、党中央七一六批示和中央关于调整两个党委领导班子外，不要作过多解释，免生枝节。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来华访问。

周恩来告诉江青：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与维在北京、上海谈了几次，又准备在广州继续谈。

周恩来得知后派人告诉江青：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议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后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3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于他们分别参加空军报社、总后卫生部学习党的关系和工作分配均由总政管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

走偏方向。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主席、中央：

我们贵州十三个同志于九月三日来京，在春桥、登奎，德生，洪文、周兴同志帮助教育下，对我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现将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送上，请审批。

蓝亦农 张荣森 贾庭三 李立

石新安 马扶增 张琦 李庭桂

陈行庚 张心田 薛光 吴荣正

吴向必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

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向党进攻，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在庐山上，他同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和上了贼船的梁兴初、谢家祥等同志，背着党中央，进行秘密串连。他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一煽动，他跟着起哄，提出要“揪人”。会议期间，韦祖珍向他“交底”，造谣说反对毛主席的就是中央某负责同志。

二、蓝、张极力转移批陈大方向，大肆吹捧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不认真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批陈不痛不痒，反而为林彪及其死党涂脂抹粉。蓝亦农同志说，“黄永胜前段没上庐山，他的检查是为了给其他同志承担责任。”“吴法宪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些工作，有功。”他们不抓批陈，用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无政府主义、整顿军队、整顿机关为借口，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他们擅自提出在全省开展“让毛主席满意，让林副主席放心”的群众

运动。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同林彪死党提出的“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口号相呼应，更加起劲地吹捧林彪，调子越来越高。他们在遵义为林彪修纪念馆，并组织参观；利用遵义会议解说词，篡改历史，宣扬林彪。蓝从庐山上私自抄回了林彪的反党讲话。张从广州抄回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又从梁兴初那里抄回了林彪在庐山上的反党讲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为传播。蓝在去年八月省积代会的报告中，大肆贩卖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要“保卫接班人”，胡说什么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迎头痛击”。蓝、张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还在贵州私自印发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并大量印发《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和周赤萍吹捧林彪的小册子，为林彪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三、“九一三”事件后，蓝、张不但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封锁中央。他们多次表白自己，谎称同黄、吴、李、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往来。并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揭发，大捂盖子，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蓝、张还对抗毛主席关于云贵部队由周兴、王必成同志统一指挥的命令，擅自调动部队。

四、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〇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九一三”事件前，关光烈给张荣森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送了皮包等礼物。蓝、张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蓝在昆明时，就曾陪同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借选“外事人员”为名，搞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蓝、张到中央接受任务时，蓝事先去见了邱会作。在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他们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又单独接见蓝、张。蓝还向邱会作要求把云南的雷远高调到贵州工作，邱不同意，说：“昆明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蓝将邱的这一黑旨意告诉了雷远高。蓝、张来贵州后，许多问题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报告，而向黄、吴、邱等人写私人信件和打电话，对林彪死党的黑指示坚决执行。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蓝亦农和梁兴初、任荣三人串连，由蓝执笔，联名告张国华同志的状，为吴法宪开脱。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1972.09.15； 中发 [1972] 38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批语

贵州省党委，省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望你们抓紧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批语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上述3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作的调查指出，这4所学校中的老干部（副部长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三级教授以上）、爱国人士（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以上）共有208人，“文化大革命”前原有住房1036间，20105平方米。在“文化大革命”中，住房被挤占的有189户191人，占上述3种人总数的91.8%。被挤占住房508间，共10101平方米。此外，这4所学校的9至12级干部中还有17人被挤占住房88间，687平方米，占原住房面积的41%以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

周恩来说：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好作风被一风吹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

讨论湖南问题。

要求参加座谈会的成员回去后继续做工作，推动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

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

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活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

“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彪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1972. 11. 04；中发 [1972] 42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

批语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会议认为，目前该地区问题中心是大抓路线斗争，加强领导工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会上还讨论了华东等地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谈山东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这场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好不好，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林彪的路线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左”的，还是右的？以及其它一些在深入批林整风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场大辩论，是由董立芳（二十八军政委）、汪易（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照远（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同志挑起的。

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怎么样？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军内，都是大好形势。但是，董立芳同我们的看法相反。他说，他有“三个不满”，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满，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对前途悲观失望，恶毒地攻击我们党“正在变”，“将来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胡说什么“最多中国变修”。他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一边，公开跳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1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三、林彪有没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也是董立芳提出来向党挑战的。他在批林整风中向党进攻，多次声称“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毛主席相对抗”，公开为林彪辩护。

董立芳胡说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所谓“四好的四个方面是体现了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董立芳为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辩护的另一条“理由”，就是把林彪的“六个战术”奉为打胜仗的“法宝”，胡说什么“过去仗就是这样打的，今后还要这样打”。

四、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那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的时候，董立芳却胡说什么“地主生活好，他的儿子就比一般人聪明”，攻击我们党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是“形而上学”。汪易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多次开会传达所谓“超天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同林彪死党吴法宪唱一个调子，吹捧林立果“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张照远同志在“九·一三”以后，还说什么“不承认‘天才’就会造成思想混乱”。

五、要团结，不要分裂

汪易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华北会议后，他又第一个跳出来，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挖无产阶级的墙角。他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给军区领导写的两封信，把军区常委分裂为“老常委”、“新常委”，造谣说“军区常委仍然是几个老常委左右一切”。他明明知道军区有的领导同志是由中央决定调动工作的，却捏造说是被排挤走的，进行挑拨离间。他过去为了爬上林彪的贼船，亲笔给林彪写信，说什么气要为忠于林彪而呼吸，血要为忠于林彪而奔流，不管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永远“保卫林副主席”。林彪倒台了，他不批林，却诬蔑坚持批林的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政治陷害。他一贯制造谣言，拨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封官许愿，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纠缠历史旧账，有意把水搅浑，大耍两面派，手段十分恶劣。

六、尊重和维护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董立芳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为军党委书记，军里担负着一个地区的三支两军任务，他自己也在一个工厂负责过支左工作，但他竟公然拒绝向当地省委汇报工作，甚至狂妄地说：“他（指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算什么？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抗拒党的领导。另一个例子，是张照远同志。他分工主管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工作，本应无条件地接受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领导，而他却到处伸手抓权，向省委、省

军区党委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严重地违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根本原则。

贰、本节简论

开展批林整风是一九七二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二、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讲到会议的文件之五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周恩来说：“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以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的。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可是，后来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网络上还传播一篇张玉凤的回忆录，说什么这封信是康生的主意，由江青、张春桥写成，毛泽东是违心同意的，周恩来也上了当。即使张玉凤真是这样说的，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也不能说明这封信就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就亲眼见过，难道他也是说谎？可以推测的一种可能是：这封信的原件和抄件都不存在了（烧了）。康生出主意，由江青和张春桥把它恢复出来。所以政治局请示毛泽东要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开始毛泽东没有答应，真到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请示才同意了。因为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保留了原貌，可以把它看成是修改稿。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组如今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陈云就所谓“伍豪问题”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发言。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三、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关于新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关于四川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关于浙江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约见来京参加参加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关于江西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关于贵州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指出：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关于湖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讨论湖南问题。

关于河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出：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关于山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谈山东问题。

关于海军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关于北京军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四、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诘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的讲话精神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调整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议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五、整顿军队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2009年5月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八章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广州讲话。

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一九六七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

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

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把毛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

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

他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

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批林“不要过头”。

一九七二年九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

姚文元在审稿中均删去。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国庆社论。

经周恩来审定，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阔”，“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殊化，反对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思想政治工作，鼓吹“规章制度万能论”，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妄图使群众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恰恰为无政府主义的滋长准备了肥土沃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作，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手法，揭穿了说，就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真的不要任何政府。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使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上台。他们只不过是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并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以我划线”，妄图对干部和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流毒所及，歪曲和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腐蚀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了思想混乱，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今天，要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就要深入批判他们这些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它的流毒。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文章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首先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觉悟。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左”右干扰和破坏，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文章

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能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

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周恩约见公安部负责人。

周恩来说：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把耳目、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给底下一个机会，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拟同意，请送耿飏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

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约见江青
要她将王若水的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
毛泽东提出：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江青会见周恩来
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

当天，张春桥、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
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约人民日报社鲁瑛、
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

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江青在讲话中指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理论部）。

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
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
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
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

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1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贰、本节简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极左思潮，是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的。当时是以王力、关锋、戚本禹为代表。并且与北京的“五·一六”兵团挂上了钩。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国内外有人攻击说这是整左派。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就叫林彪。很明显，毛泽东的讲话是就所谓“整左派”这个问题来说的，并不是评价林彪所执行的整个路线。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的讲话是把三个东西并提的，没有说林彪的路线就是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

在周恩来以后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他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加突出、系统的批判极左思潮。

可是，这个时候在社会上已经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林彪的路线就是极左路线，林彪的极左路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林彪的路线错了，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错了；林彪摔死了，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这样一来，在政治局内部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就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具体表现在四件事情上：

一是一九七二年的国庆社论中，是否要写上批极左思潮？

二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是否恰当？

三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否恰当？

四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给毛泽东信，支持批判极左思潮，如何对待？

从这四件事来看，它涉及到中联部、外交部、人民日报社这样三个重要部门，而它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批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说：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事实再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档案迄今为止没有公布，人们不知道政治局内部对这几件事讨论的具体情况。但是，从一些零星材料可以看出：

关于国庆社论，周恩来最终同意了姚文元的意见，删除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改为正面阐述要做什么。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周恩来最后也同意了江、张、姚的意见。

关于外事会议的报告，周恩来经过政治局讨论也同意了删除原来的提法。

关于王若水的信，经过政治局两天的讨论，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指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至此，关于批极左思潮的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指导当时的批林整风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 年 5 月初稿

2012 年 5 月 4 日修改

第八章第四节 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国对外友协邀请美国学者维特克夫人访华

1972 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 1972 年 7 月 19 日至 9 月 1 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江青接见维特克夫人

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 8 月 10 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决定于 8 月 12 日下午 3 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大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

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 30 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江青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

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

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多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研究江青接见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及时间

8 月 17 日、19 日、24 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

一九七二年八月底，江青在广州继续接见维特克

两地的谈话总计 6 次，约 60 余小时。

江青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一九七二年九月，张颖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

并提出：“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周恩来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

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

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

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一九七二年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

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贰、本节简论

关于江青接见维特克一事，闹得沸沸洋洋，说江青在谈话中“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关于这个方面，当时的主要陪同者张颖是这样说的：

“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

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事实证明：维特克根据与江青的谈话及收集的其它资料，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江青传记译名为《江青同志》，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

2012年3月10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九章 召开十大

第一节 一九七三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新年献词》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那些千方百计破坏这场大革命的牛鬼蛇神，那些做梦也想着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已经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笑。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胜利了，不要忘乎所以。过去军队打仗，打了胜仗就要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继续前进。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批修整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我们要充分看到广大群众在批修整风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搞好农业，加强农业。

要坚定地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人民解放军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

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各条战线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在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

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做好工作。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各条战线夺取新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一定要把“五·七”干校办好》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办好民兵》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1，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路线这个纲。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十大强调要特别重视九大再次肯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强调要继续执行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

毛主席制订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九大号召团结起来，就是为了实现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更大胜利。十大充分肯定九大路线是正确的，

并着重总结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号召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因此，十大路线是九大路线的继续。

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路线这个纲。讲路线，要讲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围绕着坚持或者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并不因此结束，以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要经常学，反复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2，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重点。

我们要学习十大对时代和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弄清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特点是天下大乱，进一步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的措施，增强战备观念，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教导，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地正确地进行斗争。

要学习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领会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这一战略措施的深远意义，为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条件。

要学习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认识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提高党委抓大事的自觉性；必须重视上层建筑，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认识依靠群众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爱护群众的积极性。

所有这些，都是十大文件中反复论述的路线斗争中的重大问题，是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弄清楚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学深学透。

3，我们要以十大文件为武器，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

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要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要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动员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用新的胜利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今年农业丰收，可能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去年（4800 亿斤）比前年（5000 亿斤）减产 4%，今年可能 5150 亿斤，公布 5100 亿斤。基本是增产，四、五个地方减产，超历史水平，是好事。

文艺，较好剧本发表不少了，不止十个，综合看，已经反映了中国革命各阶段的革命斗争。杜鹃山是写 28 年，红色娘子军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灯记、白毛女写抗日战争，智取威虎山、沂蒙颂（比红嫂好，比京剧缩短，还加上美工，写军民关系交错好些）写解放战争，奇袭白虎团是讲抗美援朝，龙江颂、海港是写社会主义时期，一幅中国革命图画，不容易了。打下了基础，能更好前进。

广义讲，凡是主张专政的都是法家、主席讲我们也是法家，我们主张专政，不是地主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主席给沙菲谈话，讲林彪骂秦始皇，就是骂专政，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我们要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专政不只是靠自己，有同盟军，农民，知识分子，90% 以上的革命人民，对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一分为二，我们反对的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是一致的。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都讲专政，讲如何实行专政，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剥削阶级，最后自己也消灭。

江西一个省委书记把小道消息当正道，说主席讲四句话“扫清庙宇，请进尊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召开一个会议，干部通通换了一批。

主席看“十批”五遍。

林彪未垮台时，主席讲孔子学术虚伪，孔是私生子，讲非礼勿动，非礼勿言。林彪说孟子和孔子不同，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好处，主席摇头。说刘少奇黑修养越养越修。

批孔子是五四时代就搞的问题，开倒车就要抬孔子。

“十批”中，主要是资产阶级观点束缚，不但有“人民本位”，也有阶级调和的。剥削阶级代表全民利益，得出这些结论，是资产阶级观点影响。在座的谁看过“十批”？研究方法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书应该出，不出不行，二十四史都出，但旧观点不扫清不行，应搞清楚。“十批”说孔子把人当作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阶级上台，都是对另一个阶级推翻，打倒，讲专政，不是当作人。最文明的无产阶级把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劳动者，死不悔改的关起来，杀，多数改造为新人，把资产阶级的人改造为劳动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把人当人的事，这是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

历代统治者沿用秦制，一面又骂秦始皇，为什么，未进一步讲清楚。林彪骂秦始皇，不是因为革新。被打倒的阶级，反对打倒他的新的阶级，就要骂秦始皇。中国历史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一段。搞革新的人曹操、王安石都肯定秦始皇。主席过去讲，斯大林三七开，秦始皇也三七开，功是主要的。尊儒反法，主要是反对专政这一点。中国历代反动统治比残杀巴黎工人不知残酷多少倍。这不讲残酷。打倒封建阶级，打倒皇帝就不得了了。对巴黎公社就是血洗，资产阶级可以不管。秦始皇只不过坑四百多人，算什么？

人家攻作品太少。慢慢会多起来，搞一个戏不容易。

国庆社论把十大路线、九大路线、基本路线的关系，解决了。

中央办第二期学习班，主席讲，选一些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批错误东西、敢于顶的工农同志，五号报到。我们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要经过斗争考验，否则锻炼不出人。要求增加工资也算是“反潮流”？首先是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主席讲，个别事错了，在正确路线下也有，区别在能平反。革命者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反潮流指反修正主义潮流，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潮流。为什么（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原则，不是马列主义者搞不成的，不讲马列主义不行、马列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总理报告引恩格斯的话，主席也讲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马克思斗争中发展起来，作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工人农民成长，和此有关系，讲马列主义一条原则。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关于“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经验，现转发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因地制宜地加强城市民兵建设。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战时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战争打起来，城市不能轻易放弃，有些城市要学斯大林格勒长期坚守。从上海的经验看，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此进一步加强城市民兵建设，着重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加强城市的防卫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十分重视。要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城市的革命秩序，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同时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民兵，加强民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提高民兵的战斗能力。要在普遍搞好民兵三落实的基础上，按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大力组训民兵武装基干营、团，民兵高炮营、团，和其他必要的专业分队，并随着民兵武器的增加不断扩大和加强。战争打起来，依靠这一批民兵的战斗骨干队伍，带动广大民兵和群众配合部队保卫城市，坚守城市。

各级党委要发扬全党抓军事，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仿效上海的办法，对民兵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和落实，切实把城市民兵建设抓紧。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

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又悄悄地兴起了。特别是在文艺、教育领域复辟的思潮比较突出。

这一年，邓小平复出，一方面有利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一些人中助长了复旧思潮。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的问题，就是要肯定革新、反对复旧。

这一年，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九大以来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

十大以后，毛泽东根据外交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周恩来负有重要责任），在政治局内部召开一系列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一年底，毛泽东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同时也决定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2012年5月22日修改

第九章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山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杨得志等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

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会议期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教育，省委、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在京其他常委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周恩来约霍士廉谈陕西问题。

一九七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继续讨论山东问题。

会议商定，王洪文赴浙江说服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要看运动主流，不要纠缠于历史旧帐，助长派性，放松批林整风的深入。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将政治局商定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对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3.01.07；中发 [1973]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山东省、青岛市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二十四位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以及“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等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谬论和谣言，联系山东实际，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希望你们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批林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支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正气，克服歪风邪气。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把山东地区的生产和战备切实搞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在毛泽东处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浙江及其他省、自治区批林整风运动情况。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同意陕西省委负责人来京汇报批林整风运动情况。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政治局拟于二十日听取陕西来京负责人汇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1973. 01. 24；中发[1973]8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由于我们有的同志思想麻痹，敌情观念薄弱，有的单位办事制度不严，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坏人钻了空子，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那种歪风邪气，助长了这些招摇撞骗等不良行为的滋生和发展，对我高尚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革命秩序是一个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现遵照中央的指示，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抓住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公安部门要与群众相结合，抓紧对各种诈骗案件的侦破工作。对于查有实据的案犯，要依法惩处。

二、一切人事调动，财物发放，器材设备调拨，招收职工和征集新兵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坚决纠正私人介绍工作、“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如有违犯要严肃处理。

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负责同志交办的事项，应按规定手续下达。电话传达时，要说明自己的单位、姓名、职务。有保密电话的，要用保密电话传达。各级领导机关的印章和介绍信，要严格执行使用制度，妥善保管。

四、对于上级机关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件等，如发现疑点，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五、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以上各项，请研究执行。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 1) 1967，1968 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 2) 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 3) 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 4) 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 5) 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一九七三年某月，毛泽东关于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指示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早在“九大”以前，吴法宪就在空军提出“忠于”林彪的口号，吹捧林彪“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亲自给林彪写誓言，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一家。吴法宪一伙利用一切机会，鼓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叫嚷：

“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等等。林立果是什么“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还制造林彪同毛主席“不可分”的谬论，胡说：没有林彪的“捍卫”，“就没有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林立果，就是紧跟毛主席”。他们鼓吹“选择政治领导”，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要“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

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亲自向空军组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

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

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山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指挥下，找空军与会的某些中央委员“交底”，策动他们向党进攻，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在会内会外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大吹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什么“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什么“伟大的天才、

全才、全局之才”、“第三代接班人”、“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红太阳”、“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

在此期间，江腾蛟组织炮制四篇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叫嚣：“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忠于林副主席”，要把“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紧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六、炮制《“571 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一伙极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蒙蔽群众，欺骗中央，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 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利用推广所谓“安全经验”，发动“夏季攻势”，再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他们大搞“路线交底”，疯狂叫嚣：当前“是决战的形势，摊牌的形势”，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斗才能解决问题”，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先下手为强”，“强行接班！”

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工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到各地的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策动“北兵南调”。一九七一年八月，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指使梁璞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东南沿海战备之名，炮制“八·二六”作战预案。他们还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掌握空运、空降。阴谋加强其反革命“根据地”建设。

林彪死党策划召开的“安全经验”现场会、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窃取器材经费等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有许多是王辉球、邝任农、梁璞、曹里怀等同志积极参与的，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阴谋破产后，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批示

1973.06.16；中发 [1973]22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示

空军党委并各大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空军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完全是痴心妄想。“九·一三”后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谣言，查清林彪及其大小“舰队”在空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林整风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纠正不正之风。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搞好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空军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而奋斗！

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民航系统揭发的材料，初稿）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整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揭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一

中央专案组根据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

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

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3. 08. 20；中发 [1973] 34 号

中共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总理、剑英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
此信并请告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盛、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の党籍。

后来在邓小平手上为李雪峰平了反。

当时，为什么把李雪峰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条是陈伯达在华北进行了许多活动，都与李雪峰有关系；二是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的简报应该归李雪峰负责。从具体情节上说，李雪峰可以推脱责任。从政治责任上说，李雪峰确实是逃不过的。更重要的是李雪峰一贯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文化大革命前，他是紧跟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后，他追随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009年12月7日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九章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

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

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

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发 [1973] 14 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3.04.03； 中发 [1973] 16 号

一，中发 [1973] 14 号文件是按县团级文件发的，可以口头传达全文到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进行讨论。

二、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不包括邓小平同志的信和《我的自述》（摘录）两个附件]，可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并加解释。

三，对爱国人士，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向他们作传达、解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贰、本节简论

重新启用邓小平

当时为什么要启用邓小平？

第一，邓小平与刘少奇确实有区别。邓小平在历史上至少不存在叛变问题。

第二，邓小平明确表示承认错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这是政治前提，没有这一条根本不可能考虑让他重新出来工作。中央下发的关于邓小平

任职的通知，特别附有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以及邓小平的《我的自述》，就说明这一点。

第三，经过文化大革命风浪的领导干部，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还需要放到实践中去继续考验。对邓小平的重新任用也同样包含这层用意。

第四，周恩来已经查出身患癌症，急需有人来顶替他的工作。

有人认为，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任用邓小平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根据事后情况的变化作出这样的推断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预测到以后的情况变化。

对邓小平的任用有一个过程：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一九七三年八月，邓小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了中央委员，但并没有选入政治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时，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说是总参谋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应该如何评价？是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悔改，还是“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的这个检讨和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悔改，还是过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提出：“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

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欢呼”、“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拥护，还是上台的策略？

有人认为：“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摘自权延赤著《毛泽东和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检讨”、“欢呼”、“保证”，相信他是出自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保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在实践进一步检验嘛！

周恩来当时也是相信邓小平的。他可能更多地认为邓小平本来就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江青恐怕是半信半疑。说她是半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说她是半疑，因为从毛泽东的批示到作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与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几个人犹豫不决有关系。他们只想让邓小平“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据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师、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张玉凤揭毛泽东晚年秘密材料》阿波罗新闻网 2007-03-04）她的这种说法可能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从以后的历史来看，邓小平在靠边站的几年中，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当时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否定；他当时没有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肯定。

据《秦城冷月》记载：

一九七四年二月以后，“他看到有关《三上桃峰》的材料后，冷冷地对前来看他的胡耀邦说：我看呀，江青本身就很空虚，一有点情况就担心别人为刘少奇翻案。我看他自己也觉得刘少奇的案子不扎实，为什么光担心人家翻案？要是你心中没鬼，还怕人家说什么呢？这里的问题很能说清楚问题的实质。”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这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下册第 249 页）

他的这些私下议论，知道的人肯定很少。

2009 年 5 月初稿

2012 年 5 月 4 日修改

第九章第四节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中央首长在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电影不只是故事片，还有科教片。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要求来说，太少了，这是我们的缺陷。

青年人喜欢新的东西，我们要拿革命的新东西给他们。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

（江青插话说：不是七年，是解放以来，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

教学片也要搞一点，推动教育革命。

文化组要把一些项目接过去，出版、图博你们还得接受呀，要拖到七五年吗？一年接一点嘛。

要迎头赶上。进口以后再学嘛。

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缺陷。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七年内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希望三年内填补空白。）

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

李先念讲话：

电影工业会议正在开，我听了一次汇报，有了几期简报。保定厂的生产形势还好，质量不稳定，还有些问题，比以前听到的消息好些。

（张春桥插话说：不一定。我了解了一下，好多单位一块搞，比较复杂，电影工业包括化工等等，好多单位现在没有人统一管。邱会作插手了，破坏得相当厉害。单打一，把这门搞得水平很高，很困难。）

其它上不去，它也上不去。

叶剑英讲话：

我们不要延续人家的东西，要创新。现在供不应求，要质量，也要数量。

我们的片子不够，就要增加生产。

你们是：“八一”厂的吧，要配合军队搞一些教学片，什么地道战、地雷战、打坦克的、防原子的。

江青讲话：

我抛砖引玉，你们思考。我应作自我批评，整了你们多少年了。批评也可以说是爱护。每一次批得时候多，批得有的人混身疼。我可能有说过的，说错的，请同志们原谅，当然也要指出：批评对的，你们就要照着做。我还有一点要自我批评的，就是很久不见你们了，当然我也可以推卸，很忙，可是总理比我忙得多。我好久不见你们，该作自我批评。

我觉得电影工业是很重要的，是综合的工业，应该很好抓上去。电影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因为我们的电视不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修字号国家电视很多。电影才有五十年的历史，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衰亡了。美国的好莱坞已经成了游览的地方。我们上山下乡的十六毫米影片还很少，八·七五还没过关，彩色印染法还没有过关。我们黑白底片原来过关了，但遭到了破坏。我们应该攻坚。今年如果印染法能够拿下来，就可以大批生产出口，就很了不起。你们现在用的胶片，是伊斯曼，是先进的，这几个样板戏，光、色、构图有缺点错误的话，同志们要负责。当然我也有责任，批你们批得不够。有几个厂分散在各地。我不可能到各厂去，大家聚拢来谈一谈，我抓了一下北京的。我还抓了电视，用电视促你们的。我是不看电视的，偶尔看了一次，还不错。电视我是批过的，后来上去了，我们又表扬了他们一下。我就请了些同志看电视，看了不少次。为什么《智取威虎山》影片那么久出不来？那么为难，拍不出来。学费交得太多了。

当然总的说，六四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有几个现成的，因为没有精力抓，也走了弯路。

你们批林整风学习也不够，批林整风要掌握武器，你们第一是受刘少奇的毒害，接着又是林彪。他们可不得了，要整死人的，为了一个八一厂，今天欢迎我们了，明天又赶我们走，叫演员吃冷饭，把嗓子都搞坏了。查查军委办事组的材料有一口袋。这几条汉子真可恶啊！现成的不给用。棚也不借给，搞得我们只好借地方。搞得我们好苦噢。我要问一下北影的新建厂建成了没有？（狄答：主要工程都完了。）

在我们这条战线上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揭要批。他们要破坏一个戏，使用种种手段。六九年冬天他们千方百计整我们，我被他们整得什么也吃不下去，突然耳朵都聋了。差点把我整疯了。没有被他们整疯就了不起。十次路线斗争很尖锐，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这成绩，还能站住，还能前进，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七三年怎么上阵呢？首先是洗脸、洗澡。洗脸洗澡的先决条件是剥画皮，批判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各条战线上的罪行。我建议你们不要散，用一个星期到十天，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不要搞倒了，先不要联系自己。你们是有成绩的，不要翘尾巴。才作了一点成绩，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不要把尾巴翘上天。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地为人民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真正向工农兵学习。还要鼓鼓气，大有潜力，我们已经走出一条路了，要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党和人民支持我们嘛，就靠我们干。怎么干？要揭林、批林，然后每一个戏，每一个团搞一点总结。

张春桥讲话：

七三年的第一天，政治局的头一个会，就是讨论电影。

从接见到交流，这说明我们党根据毛主席一贯的教导，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是很重视的。你看大年初一就开这么个会，用不着多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各方面对文艺的要求很迫切，要求多搞一些。说少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要分清两类矛盾。广大人民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要求，要我们多搞一些。能不能改变这个状况？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

建国以前就不说了，新中国二十几年来，文艺战线斗争是很尖锐的。许多大的斗争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

从《武训传》到《清宫秘史》都是毛主席提出来要批判的。《武训传》是批了，《清宫秘史》没有批起来。刘少奇在阻挠，因为他认为是爱国主义的。

后来林彪集团又破坏，斗争很尖锐。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斗争，现在领导机关发生了变化，阻力小了。积累了一些干部，有了一个队伍，没有这个队伍是不行的。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根据主席讲话进行实践的经验，也有受到刘少奇错误路线破坏的经验。尽管这个队伍内部还有一些问题，但总是有些经验的吧。只是

正面经验少了些。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队伍还不那么大，正在滚雪球。刚才叶帅说过去有几万人，过去不是有几万，是有几十万。现在有些人还在下边，下乡下厂，和工农结合，将来他们还是能搞出一些东西来。

你们现在搞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我看粗了一些。还是一部戏一部戏的总结，不但要总结成功的，也要总结失败的。因为是付了学费的，如不好好总结，学费就白花了。刚才讲了批林问题，练功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对总结经验，我们重视还不够。包括戏剧团体。

过去一提就是洋人，什么斯坦尼体系。连梅兰芳还写了几本书。资产阶级还是总结了一些经验的。所谓体系，就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跟我们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不能照搬，照搬就会犯错误。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我希望从领导也好，从创作同志也好，每一个人都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好好总结，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提高得就慢，要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当作一件重要问题来抓。你们总结了一下，还不够，还可以继续总结。

有的厂不在北京，回去也要向省委汇报，告诉他们七三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开了这样一个会，希望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也要重视。有的也重视，但不经常，不知道怎么抓。抓也不一定抓得很对。他们也要好好总结领导的经验。

姚文元讲话：

首先祝贺同志们已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刚才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得很多了，我补充一点，就是学习。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学习，读马列主义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还要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文艺工作者本身的专业知识也要学习。基本功要好好磨练，尽可能把武器磨得更好一些，毛主席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要把这个武器搞得更精一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许多关于文艺方面的指示、批示，我们应该好好学，要反复看，反复学。在批林整风中，要着重批林，包括批刘少奇，要批得好，批得深，批得透，要掌握好毛主席的文艺思想、革命路线。刘少奇、林彪都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今后创作更繁荣，就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革命路线。关键在于实践，江青同志不是说嘛，我们现在的这些成绩都是实践毛主席革命文艺

路线的结果。总结经验要总结得好，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感性的上升到理性，也要学习，学习主席文艺理论，这样才能总结得好，总结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水平比较高的，指导意义比较大的经验来。在新年的时候，我愿意和同志们一起学习，继续改造自己世界观，改造旧思想，彻底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决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现有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一切参观场所不要要求观众题词、留言和提赞扬意见的通知

毛主席最近指示，所有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请中外参观者题词、留言和提赞扬的意见。毛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各地方、各部队、各部门在国内外举办的纪念馆、博物馆、展览会以及一切参观场所，都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毛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我们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要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这些参观场所都不要请人题词，一般都不设留言簿，以免强人所难地写些奉承的话，甚至是违心的话。在参观时，更不要当场请人家提意见，使人家不好不说几句赞扬的话。如果参观者当场或事后对展览的内容、方式和人员服务的态度，主动地向我们提意见，甚至是批评的意见，除非是恶意攻击必须予以回驳者外，一般应表示欢迎。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

周恩来讲：现在开计划会议，计划会议给电影工业要加劲。进点口，作参考，但自力更生为主。进点口作参考，这才能超过。但不要寄希望于进口，要自力更生。上海、北京电影工业要协作，参考外国的东西，以便超过，一年不行，三年嘛，到一九七五年超过嘛。

李先念讲话：

电影工业很复杂，是综合性的，是个重要部门。现在开了会，希望同志们搞上去，要有个志气，要迎头赶上。卫星都上天了，三座大山都打倒了。钢都超过两千万吨，主席讲了，我们还不是搞上去了。这个我们为什么上不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要很好做工作，还有派性。

江青讲话：

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称霸，但是在电影工业上，我们要迎头赶上，不做爬行的奴隶。我向你们呼吁，要彻底批林，彻底揭发大汉奸、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只有把林彪的罪行批深批透批臭，你们才能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攻克科学尖端。

只有批林才能团结起来。首先批林。

这是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不然就是强加于人。

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干巴巴地老是万岁万岁，人家最讨厌。

张春桥讲话：

电影工业不仅是电影工业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造卫星上天了，全国都欢呼。如果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在卫星上拍照，那个照相机要求就得高了，胶片也就要求更高了。我举这两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不仅地面上的要求，也是天上的要求。我们要赶超，要有远大目标，要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都赶超过去。

轻工业部门有多少万种，头发夹子、钮扣、牙刷，这些东西也要搞，搞不好，群众也不满意。也应该重视，不过这些还有人抓。比较起来电影机、照相机更重要一些，也要有人抓。可我们真要立大志，就要把这些高水平的东西搞上去，这些过了关才行。不然我们的卫星打上去了，拍的照，发不回来，有什么用呢？所以只有这些过了关，我们的人造卫星打上去，才有更大的成果。大家不要只看成电影方面的需要，当然电影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过了关，整个化学、机器制造水平都会提高。抓住这事，促进整个工业发展。阻力是有的，困难是有的，主要是林贼一伙破坏，比如洗印厂，上海搞出染料，就是不试验，一等就是两个月。群众是关心工业发展的。要依靠群众，依靠革命技术人员，在党领导下是能够促上去的，是可以突破的。

姚文元讲话：

电视在努力，他们有雄心壮志。昨晚我看了他们一个计划，彩色电视也有决心赶上去。

昨晚看了《海港》部分样片，召集这个会很及时。江青同志已讲了详细的意见。第一就是要把《海港》拍好，第二要促进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展，也要把其他电影拍好。要批林，要鼓足干劲，要振奋革命精神，扎扎实实，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一丝不苟地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文艺革命中，我参加了许多会，我体会到都

是这个精神，这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态度，要继续下去。革命精神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舞台戏就是这样搞出来的。《海港》是表现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表现中国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应该把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人阶级英雄形象，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表现出来，用光、配色、构图、造型、电影语言，用种种手段去表现。

希望大家认真讨论，把取得的成绩巩固下来，不满足，继续前进。不仅电影摄制组，还有其他各团，要总结，要前进再前进。今天我们看了两部片子，用光、配色、技术、艺术技巧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这不是今天看了，从拍样板戏以来就看了不少了，如《智取威虎山》一个骑马动作，就请上海演员们看了许多骑马的片子。艺术创作就是要有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样才能把工人阶级的形象搞丰满，表现出革命的新中国的面貌。既要重拍，就要拍好。于会泳、浩亮、庆棠回来了，可以参加，帮一帮。

我们现在报纸上还是黑白照片。外国能很快印出彩色照片，今天拍的，明天就登。外国能做的，中国也一定能做到，只要经过努力。就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电视还有点雄心壮志，希望你们互相竞赛。

江青同志还是鼓励你们的。《龙江颂》是肯定的嘛，《奇袭白虎团》也表扬了嘛，就是今天《海港》有几个镜头江青同志也肯定了。希望你们搞好。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戏、电影少了不能怪会泳同志一个人，而且少也是相对的。（国务院文化组里）正气不得伸张，原因是未抓紧批林。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文化组应当集中研究一下，把应当揭开的问题揭开，否则，拖下去，很不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告吴德，领导文化组（可扩大一些有关同志参加）集中研究和讨论一下，伸张正气，首先批林，激发出新的革命干劲。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江青观看歌舞演出的讲话

怎么一看都是少数民族的东西，汉族的为什么不搞？

汉族的歌舞也很丰富多彩，应该很好发展，要攻汉族舞，要搞些短小的汉族歌舞。

《霸王别姬》就可搞成一个很好的剑舞。京剧可说是集汉族歌舞精华之大成。

《击鼓骂曹》可以搞成一个很好的器乐曲。

要很好发展汉族舞蹈，不要都搞少数民族的。

弹筝的女同志不敢穿裙子，可以穿褶裙，设计几种，淡绿、淡蓝、银灰色的。

你看又不敢穿裙子。你们不敢穿我就带头穿。不要把女同志打扮得灰溜溜的。墨绿的、玫瑰红的都可以。褶子可以打在两边，可搞飘带，袖口、领边，可绣些小花。京剧的大包裙，中国不穿，朝鲜还穿。

朱××的裙子很难看，又短，至少可加长二寸，设计白色的，你们不敢穿，我带头穿。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江青看《杜泉山》剧后的讲话

柯湘主调音乐要京剧化一点。现在我跟你们说，京剧还是要姓京。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江青在中央乐团音乐会中间及演出后的讲话

伴奏的女同志还是穿裤子，不敢穿裙子。女同志“夏穿裙，冬穿裤。”设法把裙子设计出来。女同志穿裙子，还要解决袜子问题。舞台上，生活中都要注意。出国要穿连衣裙，四幅，拼起来，直着垂下来。样板团的女同志要穿裙子。但不要穿超短裙。军队女同志服装也要设计得好看些，也可以穿裙子，还有衬衫。

南方的越剧正在改革，有人说改得好，有人说改得不好。我说改好，不改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不改怎么行？声部要改，搞音乐的要帮助他们去改。

总政出了两期简报，题目是“落实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关于音乐舞蹈的指示”——

（指六月二十四日）里面说“尽量少安排少数民族歌舞”。不要片面性、绝对化。我不是说不让演少数民族歌舞，是比例太大，要提倡搞汉族舞。我一说剑舞，都去搞剑舞，也可以搞棍舞、刀舞，要举一反三。要有辩论法。剑舞可以穿古装，也可以穿现代服装。千万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穿裙子也不要那么死，也可以穿裤子。一不能辩证，二不能举一反三。

头发谁都不敢烫，我带头烫。不能都弄成三毛流浪记。总不该让四十岁以上的女同志梳两个小髻。该烫的还是可以烫。一当然也不能搞成奇装异服。上海出现过这类现象，要煞一煞。但也不能乱蓬蓬。有的女同志，年岁大了，可以梳抓髻，结彩带。长发也可以，把长发盘起来。

毛主席指示，将《杜泉山》仍改为《杜鹃山》。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看《半篮花生》等样片时的讲话

《半篮花生》很新鲜，并不难改。

《送货路上》：很活泼，内容不错，表演形式有好有坏。

《两张图纸》：把新干部说得一无是处。当前主席提倡提拔新干部，唱了反调。

《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男教师是二流子。

（张春桥：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员摆布，女教师是热爱工农的，但最后给小孩子出了难题。）

教室看不出典型环境。

女教师还给男教师说好话，男教师转变也不合理。

“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应是“有文化能更好革命”。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

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奶。

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全国创作蓬勃开展，要抓一下评论队伍。创作组要组织一个小的评论组，鼓励创作，指出方向。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请春桥、文元同志先阅，并请提出意见。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看了一遍，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否要肯定教师的大多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进步，坏人是极少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二、关于学文化的问题，在批判这个电影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是否要肯定学生学社会主义文化及学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是必要的。以全面说明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妥否，请斟酌批示。

（建议改后我们不再看了）

文元 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文元同志意见，可以考虑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篇文章。文章不多，在质量。批周赤萍小册子，一篇文章就收效。

春桥 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春桥、文元同志意见，请照办。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江青接见刘诗昆等人时的讲话

刘诗昆在运动中被捕，关了六年，放出来了。过去主席问过他，是新四条汉子（黄、吴、李、邱）不放，是想搞叶帅。刘还是有错误的，抓彭、罗、陆、杨，还有“一·一九”夺权。最近主席又问了。这次接见是传达了主席对他的关心，希望他搞点名著的东西。“战台风”改为钢琴、乐队。要刘恢复基本功，给他一个钢琴，让他跟乐团去日本。

关于殷诚忠入党，让吴德作他介绍人，殷跟我们走了多少年，一直要求入党。赵燕侠可以去艺校工作。开始她是跟我们搞革命样板戏的，记一功。还可以回团演阿庆嫂，同时在艺校教书。

白淑湘是第一个演吴清华的，最近写了个检查，还不错，应该记一功的。去全团作检查，取得群众的谅解，还可以回团演吴清华。

崔嵬，让他拍《平原作战》。崔检讨不错，我们欢迎，完全可以让他工作了。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就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江青听取上海乐团音乐会时的讲话

这个作品有中国声乐的特点，我们的东西就是好。我们最重要的，要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要教育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要重视自己的文化艺术，不要轻视，不要盲目崇拜。毛主席对刘诗昆说：“要写自己民族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有的是吹出来的，其实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行。有人却把它们当作楷模，认为不可变。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听了我们的音乐，认为很好，而我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外贸部反映，外国人对《杜泉山》的反映很强烈，而我们有些人却不愿去看。

上海最近又有一些人反对现代革命作品，这些人中，有的是资产阶级权威，有的是旧上海乐团培养出来的观众。创办的创作评论小组，要对外国音乐进行评论，如对“无标题音乐”。最近，土耳其有音乐家要来，要搞清他们演的节目内容，不要再象费城乐团那样。“无标题”音乐是否没有内容，仅表示某种情绪，要研究。

要提倡和重视创作，可以把京剧的片段写成钢琴曲或管弦乐曲。“穿林海”（乐队演奏）一段就很好。还有一些唱段。如“狱警传”都可以搞成钢琴曲，突出人的作用。搞古代的要慎重，要推陈出新。有的可以不动，有的要出新，出新是很重要的创作。

近来有些人又借故事片少，向我进攻，这些话是放屁。我们自始至终在抓。有些原因，电影工业跟不上，“八·七五”放映机过不了关，林贼捣乱等等。

五七艺校招生要贯彻阶级路线，但不能搞关门主义。要讲成份，但不能唯成份，不要查三代，要重表现。要坚持以工农兵子弟为主，但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把一些有条件的学生弄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批复同意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音乐家于十二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江青批示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音乐家于十二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又批：今后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批评对外友协的报告是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是开门揖盗。并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号召大家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斗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批评江青的一封信的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禁止私自放映封存影片的通知
近来，有些地区和部门未经中央批准私自放映封存影片而且看的范围很广，这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中央有些部门，在京召开的专业会议，看内部参考影片，范围过火，看后也不组织批判消毒。这个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引起重视，严肃处理。今后，对封存的影片，必须严格管理，对经批准放映的内部参考影片，必须严格控制放映范围。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我看是出好戏。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文艺领域里的革命，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

一九七三年春节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集体接见文艺界的人士。

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新的文艺作品少了，原有的文艺作品又不能上演、出版、流通，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江青的主观思想上来看，要求过高、过严，考虑群众的需要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湖南创作的花鼓戏《园丁之歌》为例。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等人在审查中认为，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应是“有文化能更好革命”。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他们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是应该考虑的，对剧目加以修改、提高。但是，上纲过高，从政治上加以全盘否定，就不正确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长沙看了电影《园丁之歌》之后说：我看是出好戏。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必须调整文艺政策，鼓励创作，团结广大群众。

周恩来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

江青说：当然总的说，六四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这说明，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当时确实也存在一股借文艺作品少，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人的右倾复辟风。不重视这种严峻的形势，也是不对的。它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2009年12月21日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九章第五节 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五·七”道路育新人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北京来的好“摩雅”

教育革命开新路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 * *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

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

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 * *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

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央直属的原九所艺术院校合并，改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下设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和戏曲学校、舞蹈学校、电影学校。

该大学于本年十一月成立，江青任名誉校长。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推动下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一九七三年九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

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周恩来对迟群的言论进行了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

十月十五日，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指出：教育界出现了复辟、回潮现象。

他说：九月，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反对批孔，就是复辟。

当晚，周恩来找迟、谢静宜等谈话。

一九七三年十月，清华大学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运动中提出：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有六十多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迟群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有人搞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清华大学的这场运动，波及到北京和外省市的一些院校。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北京日报》编者按：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

“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许许多多象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犯有一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斗争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来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记摘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带理不理，不象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

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象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后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新型大学生 全国近三万名工农兵大学生陆续毕业，朝气蓬勃地回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一代新人在战斗中成长——记北京大学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生

贰、 本节简论

在教育领域，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

一件是辽宁省考生张铁生交白卷。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参加高等院校招生文化考查，数理化试卷交了白卷。他在试卷的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想。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这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编者按。

一九七〇年以后，我国高等院校试行招生，在工农兵青年中，采取由群众推荐、领导审查、文化考查的办法，录取新生。这是教育领域里的一项重大革命，废除了旧的高考制度的积病，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当时的辽宁省，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情况不清楚。不过经过媒体讨论以后，张铁生是被铁岭农学院录取了。

一九七六年以后，恢复了旧的高考制度，张铁生被讽刺为“白卷英雄”。经过又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中国的高考制度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考试制度，比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落后多少年。

另一件是北京市小学生黄帅写日记。

一九七三年九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十二岁的学生黄帅，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她于九月五日、九月七日、九月二十八日，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他“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

老师”。而黄帅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黄帅的日记。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黄帅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黄帅“批倒批臭”的口号。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黄帅写信给北京日报反映她在学校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黄帅的日记的是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后来，复辟派拿这件事做文章，攻击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没有道理。

正是针对在全国发生的类似问题，清华大学率先开展了反右倾回潮运动。其实，这种右倾回潮并不仅仅存在于教育领域。

2009 年 12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5 月 4 日修改

第九章第六节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五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事项。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其中有：陈云、李富春、邓小平。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 246 人。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宣布会议主要议题是：一、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二、讨论批林整风问题；三、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指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

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还宣布：王洪文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没有走上轨道；二、搞计划要依靠地方，以省、市、自治区为主；三、要把协作区搞起来。一旦有事好办。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周恩来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说：这个决定草案已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多次，总人数从九大一千五百人减为一千二百人自然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解释的。

他提出：在九届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有二百二十三人均拟推选为十大代表。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进行讨论。

周恩来参加东北组讨论。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就党的十大代表名额产生情况讲话。

张春桥就党章修改问题作了说明。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处举行会议。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董必武、朱德、许世友、陈锡联参加会议。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学一点历史，批判孔子。

毛泽东强调：批林整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划线：犯了错误的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李先念讲解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说：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从大跃进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都犯过一些错误。关于开展对外贸易，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先进技术还是要学，要互通有无，平等贸易。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

周恩来先后参加东北、华东、西南、华北、西北和军队组讨论。

周恩来听取各组汇报。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着重谈了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要继续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坚持企业下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条条要督促帮助地方，不能放而不管；打倒条条专政，是打倒专政，而不是打倒条条。

关于计划体制，总是要搞协作区，东北、华北先搞，其他地区准备此外，中央将大力帮助西北、西南，首先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为今后建立协作区打好基础。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计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要逐省进行调查研究，逐个项目研究商定。争取后两年半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确定代表名额为 1740 人。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各项规定。同意党章修改问题的重点是总纲部分；按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写入“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写入人名，增加毛泽东近年来若干新指示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笏、曾希圣等 13 名老干部。

会议还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会议印发的文件有：林彪、叶群的日记和笔记；毛泽东审定的《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会议结束。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并开始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开会，确定报告要点。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讨论情况。

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

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

还指出：报告中要指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

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七日，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转告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修改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和修改党章报告草稿。

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宣读、讨论十大政治报告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并商定由张春桥、姚文元再加斟酌后，印成修改送审稿报送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

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通过十大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和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稿。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在毛泽东处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通过《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会议谈到由谁作政治报告的问题。

之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作。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继续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

会议决定：十大代表分省、市、自治区在各地集中，召开不公开的预备会议，讨论十大文件草稿；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可先开预备会议，草拟各项人选项名单，此事拟由王洪文为主，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为副进行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部门出席十大代表分别召开预备会议的有关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将要出席中共十大的各代表组就地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下发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等 3 个文件，并学习中共中央下达的有关批林整风文件，为中共十大的正式召开作好准备。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王洪文主持下的中央十大筹备小组提出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和十大主席团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信中提出：为使筹备和准备工作衔接得好，主任仍为洪文同志，副主任七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均是在京政治局同志。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已列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名额及其成员名单，并作了增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在毛泽东处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议定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十大政治报告稿。
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介绍各地召开预备会议情况，以及对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讨论修改情况
/
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宣读经毛泽东圈阅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获一致通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介绍自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十大各项筹备工作情况，宣布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即日成立，中央政治局内已先成立一筹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筹备小组关于十大组织人事安排酝酿的结果。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商定：十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

关于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除以上七人外，另增加董必武、朱德两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讲了话：

关于政治报告，他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他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在讲到十大主席团增加了一些老同志，他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主席跟我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的同志讲，大家也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都不同意，我只好鞠躬尽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会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全体成员名单。

（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十大选举筹备委员会各小组协商通过十大主席团副主席、秘书长及主席团全体成员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宣读并解释毛泽东圈阅的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预选）名单、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预选）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十次大会预备会。

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

会议通过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讲：

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悔改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毛泽东宣布开会。

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

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王洪文作党章修改报告。

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十大代表开始分组讨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十大各项议程进展情况。

毛泽东表示将不参加十届一中全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十大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讲话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十届大会，

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在九大上没有当选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不少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十大主席团结束会

周恩来讲：我们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还是要抓批林整风这个纲、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目张地解决各种问题，做好各项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预备会。

就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事进行协商。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

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情况。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四届人大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情况。商定：

二、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通知，有关代表名额的调整，由中央指定的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

三、关于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拟选几个重点单位度作修改。

四、关于四届人大的其他筹备工作，拟先在政治局内组成三个小组进行：

1，组织工作小组，王洪文任组长

2，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

3，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

报告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周恩来就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中一则反映浙江温州地区情况的报道，批告王洪文：如今天大字报仍在街上，无论如何，要劝张永生、翁森鹤（将大字报改到机关、工厂内，这与目前开人大形势也有关系，请你再过问一下。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身亡。

贰、 本节简论

党的十大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党内外议论纷纷。右派势力乘机攻击文化大革命，散布林彪叛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破产了、失败了。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党的十大的政治报告正确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

二、把工农干部选进中央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的谈话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一九七二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这时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王洪文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王洪文参加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王洪文为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可先开预备会议，草拟各项人选项名单，此事拟由王洪文为主进行工作。

但是，选拔工农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设想，遭到了党内一些老干部的抵制、反对。这一方面是由于论资排辈的思想作怪，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思想作怪。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许世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商定：十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讲了话：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张春桥批评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当众对张春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了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

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三、调整领导班子，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二十一人：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四人：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共九人：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从政治局社会构成来看：

元老级人物占八人：毛泽东、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与九大比较减少二人：林彪、陈伯达）

原老级人物占十三人：韦国清、江青、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陈锡联、李德生 张春桥、姚文元、苏振华、赛福鼎。（与九大比较减少七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谢富治；增加五人：韦国清、华国锋、吴德、苏振华、赛福鼎）

工农级人物占四人：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

从政治局政治构成来看：

左派人物占七至八人，约为三分之一强；

中派人物占八至九人，约为三分之一强；

右派人物占六至七人，约为三分之一弱。

与九大比较，左派力量削弱了，中派力量加强了，右派力量也有所加强。

有人统计：九届中央委员 170 人，其中工农 47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工农 47 人。十届中央委员 195 人，其中工农 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24 人，其中工农 73 人。

四、十大以后立即着手筹备四届人大会议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并决定三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这些程序如果进行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这说明，中央对筹备四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抓得非常紧，预计在一九七三年内就要召开。

可是，十月以后，筹备工作突然停下来了，一直拖延到一九七四年底，才又重新开始筹备工作。这说明毛泽东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9年12月14日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九章第七节 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基辛格访华。

期间，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说：

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356 页）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357 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

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毛泽东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实了谈话记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蓉、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飏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给华国锋写的材料》，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商定：

（一）将毛泽东十二月中旬以来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口头传达至县团级领导干部；

（二）在中央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自一月一日起开始学习毛泽东最近关于外交工作、政治局工作和军委工作的几次谈话，并联系当前实际斗争进行讨论。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五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错误，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惜，由于材料极端缺乏，人们对这件事的了解，只能凭网络上的一些道听途说。现在也只能根据一星半点材料来讨论一些问题。

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说：“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应该是有案可查。下面根据现有的材料讨论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对这次会谈的批评对不对？

《周恩来年谱》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

《毛泽东传》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关键在于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

首先，可以回顾一下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过程。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基辛格抵达北京。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中美靠近是美国为了保护中国不受苏联侵犯的说法不满意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美国不能与台湾割断关系的说法也不满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举行多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 11 月 14 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请示，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以时间紧急为由，遂自行决定与基辛格继续举行会谈。

从会谈的内容来看，基辛格采取的这一行动，完全是预谋的，是事先设计好的，是为了摆脱毛泽东对会谈的干预。

其次，从会谈的内容分析。

基辛格首先强调中国面临着苏联武装侵犯的危险。

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接着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很明显，这是基辛格设的一个圈套。他是用苏联的威胁，引诱中国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周恩来的答复，没有一针见血地揭穿美国的阴谋，而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了。

早在尼克松访华前夕，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接见黑格。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其中一点是：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

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这次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手法而已。

再次，从组织程序分析。

在中美会谈结束以后，美方突然提出与周恩来再单独举行一次会谈，这是外交活动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上报毛泽东批准。不能以时间紧急为由，绕过毛泽东独自去进行。所谓时间紧急，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是美方突然提出的要求，我方完全可以种种理由推延时间。

由此看来，毛泽东提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二、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所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

《周恩来年谱》说：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毛泽东传》说：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有人说什么：“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有人说：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

周恩来、叶剑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所犯的 error，属于右倾性质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右的错误。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批评了周恩来、叶剑英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决不像有些人说的什么是整总理、想要打倒总理。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好。当然，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上纲过高，如“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毛泽东也批评了这些提法是错误的。

会后的事实说明：周恩来的工作没有变，周恩来在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变。那些污蔑、攻击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右派论调，统统破产了。

三、周恩来这一时期在外交工作上的错误与内政工作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这种右派论调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歪曲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立起来，是右派一贯地宣传把戏。

在国际上三个世界的错综复杂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

毛泽东自己就多次说过，他在处理罗瑞卿、杨傅余、贺龙等问题上，偏听偏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也犯了错误。

周恩来同样也会犯错误。例如，在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与内部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政策的调整与防止反文革思潮泛滥的关系问题、联美反苏与联合反美的关系问题，等等，他也有不少错误。这些都引起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多次提出批评。毛泽东的结论是四句话：“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但这决不是周恩来要对文革本身的提出质疑和改弦更张，不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泽东本人架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工作中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对江青多次提出批评，要她尽量少干预党和政府的具体事务，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这也决不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党的领导机构之外，更不是把他们看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要把他们打倒。

2010 年 1 月 11 日初稿

2012 年 5 月 5 日修改

第九章第八节 评法批儒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

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

毛泽东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红楼梦问题，主席讲过多次。主席要许世友同志看五遍。中国古典小说最好的是《红楼梦》。吊膀子是现象，本质是政治斗争，真事隐去，不好讲，恋爱是现象。过去评“红”文章多讲宝黛爱情反封建。争夺厨房，上次请你们读 59、60 回，主席提的。只有从阶级分析观点去看，否则看不出来，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处理阶级关系去看，才能看得懂。

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招安，是两条路线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内部斗争。前半部斗争，是逼上梁上还是妥协投降？革命路线胜利。后半部是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错误路线胜利，革命失败，最后被搞死。

批孔，写进社论。批孔，苏修也叫，国民党叫得厉害，蒋介石新年文告有一半内容讲这个，反对批孔，如挖了他的祖坟，洪水滔天。国民党精神虚弱极了，不得了了，大叫大喊，说我们几十年搞批孔，五四从批孔起来。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党内外出现了一股反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毛泽东敏感地发现在一种倾向下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他反复地提醒全党要注意这种倾向。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说：《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根据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指示，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批孔的文章。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飏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说明，周恩来对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反映比较迟钝。这种情况大约就是毛泽东批评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吧！

2010年1月4日初稿

第九章第九节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

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批准。同时，同意邓小平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部分成员会议。

周恩来参加。

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初稿方案。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人谈话。

毛泽东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

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

根据毛泽东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要兼职等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

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他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他说：“要准备打仗！”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同济南军区负责人谈对调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同武汉军区负责人谈对调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各大军区负责人全部到京。

根据安排，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别同他们就对调事谈话。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

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

毛泽东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

毛泽东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

毛泽东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

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

他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

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毛泽东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

他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 e l f c r i t i c i s m，自我批评。”他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

毛泽东说：“就散了啊！”

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

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

由王洪文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任职等问题的几次谈话要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商定：通知所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均出席年底或元旦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

贰、本节简论

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事已经考虑几年了。

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

为什么想了好几年才作出决定？可见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大、影响度很深。

第一，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油了。认为情况已经熟悉，不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第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往往容易偷懒，认为反正是那一套，不再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第三，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往往容易形成以个人为核心的关系网，认为下面的干部都是自己人，不讲原则，只看关系。

第四，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往往容易把自己管的地方看成自己的领地，认为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不尊重中国央的统一领导，搞独立王国。

第五，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

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再加上地方兼职，那就是这个地方的党政军民学由他一个人统管，而中国的一个大军区，比欧洲的任何一个个国家都大。如果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那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总之：

第一，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已经大大地扩充了，不仅管所属的部队，而且还管所属的地方的事务。

第二，这时大多数大军区的司令员，都已经在现岗位上任职多年。

第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暴露一些大军区存在不少问题。

这种局面不解决，有可能形成某种地方割据、中央指挥失灵的形势。

2010年1月18日初稿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十章 批林批孔

第一节 新阶段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元旦献词》

一九七三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在新的一年里，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抓紧有利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工农兵起来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林批孔 搞好春耕》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随着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国几亿农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必将进一步提高，革命精神必将进一步发扬。

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批判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学习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批林批孔 促工业生产》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健康地、胜利地发展着，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都非常好。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

当前，工业交通战线批林批孔运动，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同样是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抓住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就能更好地解决工业交通战线的具体路线和政策问题。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工业交通企业要继续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破除崇洋迷外思想，高度重视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支持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李先念华国锋对参加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的讲话

李先念说：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批准召开的，总理知道，主席也知道。我们要你们多开两天是为了等社论和 12 号文件。多留几天值得。”

“车皮总是调度的不大合理。昨天晚上我在政治局讲了，津浦、京广两条干线不够畅通，只好把大同、开滦的煤绕道由大连上船运往上海。看起来不合理。但按目前情况，还是合理的。看起来不合经济核算，但总比在那里停着好。山西煤运不出去，可不可以把北京的汽车抽出几千辆去山西运煤，行不行？这个现象是暂时的，会很快改变。通过现象看本质，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好的很”。

你们湖南要支援广交会一下嘛！

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主要来自中央部门，一机部长春会议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一机部来人了没有？请打电话找来。上海工人同志提的意见是对的，我也有责任。有的批评不那么准确，不要紧，基本精神是好的，应该欢迎。如果要求人家的批评一点出入都没有，那就不要人家批评就是了。大概秋里同志讲了一些错话。在怎样办好企业问题上，贯彻《鞍钢宪法》，依靠工人阶级，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的领导，还没有解决好。

天津市有个工厂规定心跳 200 次、血压 >90、发烧 40 度，才给病假。还规定工人一天只能小便两次，每次不能超过十分钟。这不是管、卡、压吗？这是那里规定的？这个问题揭的好，让他自己（指厂领导）先执行好了。有的同志就是喜欢压工人，根本没有群众观点。制度还是要的，但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提高工人觉悟，不能光靠你的那个制度。

有的省看来很乱，但乱不能怨群众，还是领导的问题。有的对群众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阶级敌人是有，斗争是复杂的，要按政策办事。

12 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不要认为不要这、不要那。这样可好了。不要借此压群众。不要光看第一段，主要在第三段。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要揪军代表。当然支左中有部分同志犯了这样那样错误，也不要揪回去。揪回去有什么好处。不是给光荣、伟大的解放军抹黑吗？有的部里就提出要这个回来，要那个回来。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在那个形势下，解放军起了伟大作用。当然，也有林彪的死党，那就不同了，要肯定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要讲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怎么理解？有人说：读古书困难，董仲舒和历代儒家代表人物，都把孔孟之道加以发展，成为系统的东西，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不只是这样，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孔老二要恢复奴隶制度，以后的封建制，同样用孔孟之道作为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

12号文件总的精神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党的领导就是要执行正确路线，你领导群众犯错误，大家不干。

有个工厂有些人要求增加工资，去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带着他们去造劳资的反。这怎么算党的领导？武汉有个银行，还是个很小的银行，他们对闹经济主义的就是不给开支，顶得好。中央打电话支持这个银行。你不合理，闹经济主义，就是不该发嘛！

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执行正确路线，执行正确的政策，人家本来不是反革命，你把他打成反革命，他怎么高兴？本来是反革命，你一风吹，这怎么行？有的一说加强党的领导，就不发动群众了，这也不对嘛！有极少数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批林、不批孔，又不联系实际，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个县委书记就是这种人，跑了四个月，每月拿工资，煽动经济主义妖风，北京就有他的联络站。还有一种情况，运动来了，干部病号特别多，有的运动一来就搁担子。本是病了应该住院，有的不是这种情况，温度37℃，脉搏70到80就住院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行吗？

搁担子的，群众批一下也应该。批林批孔运动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贼船的，用江青同志话讲，要用一百二十吨的吊车往下吊。人民内部矛盾，就

是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搞串联，一搞串联，分成两派，就把林彪、孔老二放掉了。

城乡交流有点不畅，现在不是没有猪，没有鸡，主要是没有很好的抓，对人民生活也有影响。要沟通城乡关系，加强收购工作。你们管工业的也要管管商业，

经济领域修正主义回潮，强调制度多了，制度还是要的，但问题是制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能搞管、卡、压，要靠群众自觉地执行。

还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冶金部有个高扬文，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对群众有刻骨仇恨，高扬文的材料可以每人发一本，有个按语，江青同志、文元同志看了，认为写的还可以。

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可低估，极少数地区有人煽动农民进城。对银行正确的东西要支持，围攻银行不是一个地方，要说服群众。是不是群众自发干的？不是的，背后是有走资派支持的，还有阶级敌人破坏。唐钢家属工二百多人闹经济主义，到冶金部、中南海闹，查了一下是支部书记的老婆，还有几十个共产党员的老婆。我们就通知了河北省委，唐山市委连夜赶来。我说一定有后台，这个话说的厉害了些，共产党员动员老婆闹，不好嘛！这些人就回去了。一定要把坏人揭露出来，如果现在都搞临时工转正，附加工资等，就冲淡了批林批孔大方向。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对进口的东西要审查，如造船工业我们有基础，可以搞，就不要进口运输船，要立足于国内，该进口的还要进口，为了抢时间，港口工程船要进口，把货单审查一下是必要的，港口堵塞，外轮老罚款，影响很不好。

华国锋说：

主席讲了，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山西陈永贵同志传达了，北京倪志福同志在中央发文件前也用自己的话讲了。

主席还讲了，“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

为什么主席提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孔孟的书，语言文字难懂呢？恐怕主席讲的不只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先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宋朝的朱熹又发展了一

下，更系统了。到元朝把孔老二吹的更高了，到了清朝就加了“大成至圣先师”等头衔。后来连不读书的袁世凯、宋哲元、张宗昌等也都尊孔，蒋介石也是把孔子抬出来搞什么“新生活运动”，现在台湾还在祭孔。盖孔庙，不仅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利用孔孟之道统治人民，就是外国人侵略中国，也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日本要在中国建立什么“王道乐土”，就是如此。林彪搞“克己复礼”也是用孔孟之道作为他的反动思想武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如此。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过去儒法两家一直斗争。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席评价很高，毛主席一直是反孔的。在毛选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批孔。这篇文章点了戴季陶，戴就是尊孔的。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温良恭俭让”，讲到“四权”，这些都是批判孔孟之道的。主席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很多文章是批孔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也都提到批孔。我们应该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老二的流毒是很深、很广的。听说日本也有孔庙，他们也读过四书五经，朱熹把孔孟之道编成课本，读书必须读它。从上层领域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来讲，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是不是这样理解，请同志们研究。

有人提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当时条件还不能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这个条件了，批孔是批林的关键，是挖林彪的根子，要好好理解。

十二号文件，总的精神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前列，大胆领导运动，如果压群众，捂盖子，就会犯错误。如果跟在群众后面跑，有人闹经济主义，人家一说增加工资，你说行，就领他们他到劳资科那里去，你非犯错误不可。

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对群众提的意见，要持欢迎态度，即要听群众的意见，纠正错误。又要坚持原则，大讲三支两军的业绩。

这次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林彪、孔老二，批的好，大家都有提高。不好好学习钻研，你的话就说不深，说不到点子上。比如“人之初，性本善”，如何用马列主义观点去理解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柳下跖骂孔老二骂得好。我们现在

报纸上登了女大学生嫁给农民，本来是表扬的，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写嫁给，这不是孔老二的男尊女卑吗？你写个女大学生和农民结婚不是很好吗？这也是孔老二的流毒。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国家计委《关于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报告中拟订的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要求是：

工农业总产值 4210 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 7.1%。

其中工业总产值 3000 亿元，增长 8.3%；

农业总产值 1210 亿元，增长 4.3%。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

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批孔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复古的反动顽固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正如毛主席说的：“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的继续。

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都告诉我们，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艰巨的斗争任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

斗争。尊孔复古，总是代表着倒退和复辟的没落阶级的利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纲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一步一步地清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

毛主席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反对儒家是很对的，却没有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也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包括广大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几万万人的大军，朝气蓬勃，英勇战斗。大批的批林批孔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大批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成长。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国务院关于恢复和新建一些高等院校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 1974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运动中，根据“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党委内部开展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它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富有战斗力，能够更有力地来领导运动，而决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党的领导。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原则，加以引导。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大胆地领导运动。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提纲》

农业方面，全国夏粮总产量预计 840 多亿斤（实际是 922 亿斤），超过了上年。

二、工业方面，1974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帐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

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发生动乱，很多路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 1 / 3 左右。

财政收支方面，1 至 5 月份，全国财政收支比上年同期减少 5 亿元，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25 亿元，出现财政赤字 5 亿元，而上年同期是收大于支 27.4 亿元。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1974. 07. 01；中发 [1974] 21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一、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在全国城市和农村普遍开展起来，正朝着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很好。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全国夏收作物又一次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了去年。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市、自治区。总的来说，生产形势是好的。完全可以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二、从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情况看，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当前突出的薄弱环节，一个是煤。一个是铁路运输。一至五月，全国重点煤矿共欠煤炭八百三十五万吨，其中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河南平顶山、河北峰峰两矿，欠产煤炭七百六十万吨。尽管开滦、大同、阳泉等不少重点煤矿，超产甚多，贡献很大，但三省两矿的大幅度减产，拖了全国的后腿。铁路运输多数单位是好的。主要是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少数区段，经常堵塞。使津浦、京广、京包、贵昆四条干线不能畅通，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

产。钢铁、有色金属、化肥、水泥等产品的计划和军工生产计划，都完成得不好。这里有缺煤和运输的问题，也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武钢、包钢、和武汉重型机床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成都一三零二厂等企业，大量减产。主要是内部因素。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三、有些省、市、区和城市以及一些企业单位的减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批林批孔没有搞好。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和批判。领导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运动一来，有少数领导干部又不是积极的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好批林批孔，纠正错误，落实政策。许多人有错不认错，使矛盾激化。有少数领导害怕群众，不打自倒，一轰就跑；擅离职守，放弃领导；甚至躺倒不干，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违反党的政策，随意表态，造成了思想混乱，影响了群众的团结。还有少数的领导干部，捂盖子，保自己；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团结不起来，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和捣乱。

四、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央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同群众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为上级和群众承担责任，取得群众的谅解。同时也教育群众和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五、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在听到本通知传达的半个月內，必须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要经过群众讨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撤销他们的职务。其他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动员他们迅速回到本单位，搞好革命和生产。经过说服教育，仍然不回来的，也要按照旷工处理。

六、经济主义是腐蚀无产阶级队伍，破坏批林批孔的修正主义思潮。各级领导同志和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觉，坚持原则，坚决煞住经济主义妖风。中央

重申：当前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批林批孔，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

七、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原则。什么是正确的潮流，什么是错误的潮流，要作阶级的分析。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违背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三号文件的规定，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给予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八、充分发动群众，发挥专政机关的作用，坚决打击破坏批林批孔、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的阶级敌人。对那些盗窃欺诈犯、杀人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对于贪污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也要进行打击。

九、中央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充分发挥作用，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模范的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就地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各地的党组织和各地的报纸、刊物和广播，都要表扬这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的，促进了生产的模范人物。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十、各级党委都要深入学习中央今年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分析当前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在抓好批林批孔的同时，于最近时期，认真检查一次国家经济各项计划的执行情况，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订出增产节约的有效实施计划。完成得好的地区和单位，要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完成得不好的，要迅速赶上来。

本通知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广大群众。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将讨论和落实的情况上报中央。

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不得擅自翻印、转抄、散发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央文件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而结束。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群众性的清查工作已经初步告一段落的单位，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

我们要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认真总结和推广那些革命和生产搞得好的先进单位的经验，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1974. 10. 11；中发 [1974] 26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央已经发了几个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各项指示精神。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各条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在国际上，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越来越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

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中央希望各单位抓紧做好下列准备：

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是运动深入的关键。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工农兵在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做好培养、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各级领导同志要注意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确对待在运动中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广大革命群众。决不容许打击报复，“秋后算账”。

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专案清查工作。全国在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方面，经过三年的时间，总的来说，除个别单位和个别人以外，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清查大致差不多了。应当对清查出来的人和事加以分析，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严格区别、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于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林彪死党，要继续清查、批判。对于少数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如问题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结论，把他们解放出来。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表扬那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的，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总结、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今年还剩下最后一个季度，要努力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国军民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中央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当前大好形势，以实际行动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个通知可以传达到广大群众，但不登报、不广播、不贴大字报，在中央宣布召开人大以前，对外保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与李先念、汪东兴谈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严禁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的通知

据反映，最近不少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顾国家政策法令，直接到农村社队和农村集市采购粮食、油料、肉类、食糟、水产品以及药材、皮张等农副产品。有的抬价收购；有的用化肥、煤炭、机器设备等国家统配物资换购；有的用公车代社队运输，换取农副产品；有的同投机倒把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非法套购，甚至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扰乱市场秩序。严重的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人对这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动，不仅不去纠正，反而支持纵容。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在市场上的一种反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严重地冲击国家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使国家本来应该收购的东西收购不上来，能够供应的东西供应不足，造成人为的紧张。而且还会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影响工农联盟，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开方便之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边防检查站人民武装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主席讲，国际形势，革命和战争因素都在增长，还是这个估计。主要倾向是革命这个提法，根据主席指示，最近没有多讲。会谈记录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总的是这个精神。打，最近几年还打不起来。天天讲缓和，因为有战争的危险。

主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席说：列宁为什么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专政？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要把列宁的话摘出来。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

主席上次接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讲过一个问题。有这么一段：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变了。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要靠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或者调节。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工人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会有这种情况。过去列宁说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滋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的人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林彪上台，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读马列的书，要写文章。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都能懂得。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四年年初，毛泽东批发了江青等人组织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江青等人抓紧在中央及各条战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兴起。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更是兴高采烈、闻风而动。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中央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中央的主要注意力就转到筹备四届人大上来，特别是四届人大常委会正副委员长、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等人事安排上来。

一场复杂的斗争，在党内高层中进行着。

2010年1月25日初稿

第十章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左传》），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

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

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孔子猖狂攻击“税亩”制，说什么“初税亩，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

当时法家先驱者们的主张和孔子的倒行逆施是相反对的。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在郑国有邓析，在晋国有范宣子等，他们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鲁国，少正卯也是主张这条政治路线的。他和孔子同时讲学，唱对台戏。孔子的学生几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这场意识形态的反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少正卯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孔子对少正卯的思想极端害怕和仇恨。所以，当孔子一朝掌权，就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势力，杀了政敌少正卯。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群而不党”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思潮和学派，从来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腐朽反动的旧思想、旧意识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响应十大的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孔孟反动思想的流毒，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某日，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语

同意转发。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1 页）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哲军的文章《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的冲击，如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这个作用，就是大家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重温一下。同志们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五次

指示的重点，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抽点时间学习讨论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有必要。

（一）为什么要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

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线，小兵提升”。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不久前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

有人说这个“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

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最近指示，并亲自要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要我们牢记步调一致才能得到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贯彻“十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致信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材料不免，你们可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

“二十军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当我看到军报《内参》上有关同志们在批孔问题上有困难时，我正好收到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

解释》，这两个材料对你们会有帮助的。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你们那里宣讲，并送去二百份供批林批孔参考，有什么问题，可请谢迟两位同志转告我。

江青一月十三日

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5.《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一月十五日，谢、迟二人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的信，发了江青赠送的学习材料。

一月十六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人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马宁写了一封信。

“据说空军机关对批孔有些困难，特请苏元勋同志送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名词解释》100份，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请指定一个连队，由苏元勋同志去宣讲。”“请指定一个连队，一定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请苏元勋同志转告我。

江青七四年一月十三日”

（苏元勋在空军机要部门工作，九·一三前是受林彪一伙压制的，还被关进了监狱，九·一三以后，才受到了重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吴德的信。

“吴德同志：我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代我向你们问候春节好，此外，请他们带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和《名词解释》各二十份，材料不够，可翻印，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不断深入下去，开花生果。

江青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北京卫戍区、公安部门两系统破获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案，人赃俱获。

十七日，周恩来将案情及处理办法报告毛泽东。

十九日，外交部副部余湛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向他面交照会就此事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

一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批评：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批驳文章。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评一月十七日的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衷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时，将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接报主席或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发。

一月二十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 01. 18；中发 [1974] 1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补充通知

1974.01.22；中发 [1974] 2 号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 [1974] 1 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

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

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四、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五、《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

以上为学习的第一单元。

六、《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以上为学习的第二单元。

七、《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八，《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

九，《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

十，《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

十一、《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罗思鼎）

十二，《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冯友兰）

十三，《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高亨）

十四，《〈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北京师范学院史众）

十五、《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军）

十六、《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杨荣国）

以上为学习的第三单元。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给海军苏振华的信，

“现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试点，并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其他材料以后再送。

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同志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信

“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的批林批孔更好更深入地发展，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送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要》和《批林批孔文件汇编》各廿本，到你们那里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将批林批孔运动取得更大胜利。

江青一月廿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首先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相当长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与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可以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二百份和《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十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光荣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毛主席说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王洪文同志领头唱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全体起立，唱歌）

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开个动员会，进行批林批孔动员。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後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我们晚了一天，但是现在我们赶上去。中央对批林批孔问题已经发了两个通知，第一号已经发到你们手里了，第三号还没有到大家手里。

去年“十大”以后，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迟群同志向各省传达了准备批孔的问题，指出批孔是批林的组成部分。批孔在北大、清华两个学校是很早就进行了，最近又搞了一个材料，就是已经附在中央七四年一号文件上的

这个材料。所以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江青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把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方面的材料综合成几个问题，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真忠实信徒。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

今年初，王洪文同志和江青同志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样写的：“主席：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王洪文、江青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主席还指示，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一道发下去。但是发得晚了一些，开始时耽搁了一下。我有责任。这是一件大事，本来还可以更早一点。现在我把两个通知念一下。（念通知，略）

第二个通知也念一下：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中发七四年一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略）

在报告了毛主席并经主席同意转发后，印发的过程中，江青同志也是注意抓这个问题。

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

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

这是六封信的情况。除此以外，江青同志还直接作了试点，一个是卅八军，一个是警卫一师，再一个是江青身边工作的一个直属单位。这些单位都已经作了试点。我们现在收到各地的简报，在批林批孔中，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也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军报的记者，要把方面先进的经验。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出去。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请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开个动员会，我的介绍完了。

谢静宜：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谢静宜：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材料印出来以后了，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印出来之后了，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江青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军报的一个内参，就是讲了二十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了一些抵制了，叫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有一个马振扶公社，唐河县的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迟群：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姚文元：“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把这个“趋身”改为“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鸟啊栖在树上，就是说他是这里讲的对啊，分析得很好啊，不打自招地告诉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栖身”嘛，栖身之后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杀头啦，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运用什么手段呢？“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是你看到什么气候要变，随机应变，这样子混过去之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搞反革命的政变，这又暴露了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又暴露了他搞野心家，阴谋家的手段，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江青：对。

江青：这里搞错了一个字，“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就是范蠡，春秋战国。”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十三日。同志们，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林彪搞《“571工程”纪要》的时候。《“571工程”纪要》，大家在座的同志都有了，这个你们没有，所以我想这要说一下。实质上不是“韬讳”，是“韬晦”，他要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反革命，所以他搞反革命两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欺骗我们，伪装。

迟群：他就是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为一个虎穴了，栖身嘛，藏起来，搞了许多画皮了。

周总理插话：七零年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七一年是他们搞《“571 工程”纪要》。

江青：七零年他搞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一段，这七一年三月搞《“571 工程”纪要》，就这个小讳，刚才讲错了，历史背景。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

举一个例子，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 A、B 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谢静宜：全校批判。

迟群：全校来批判人家，还，还把人家家里还诬蔑人家。说他们家里人有跳井、跳河、跳坑的习惯，这么样诬蔑人家。

谢静宜：贫下中农老大娘说，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诬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迟群：没有那么回事嘛，所以，

江青：这个材料是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的记者有一功。

迟群：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体罚学生，扎针，有一个教师学会了针灸，那是本来是治病的，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就是谁要所谓他们讲的调皮捣蛋，就说给他针灸针灸，就扎得你，反正是叫你难受。

谢静宜：说扎一个好了三个。

迟群：因为有几个，他因为那几个调皮，扎他一个，那几个……

谢静宜：吓的就赶快跑了，是这样的，扎跑了三个。

迟群：不得了，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专政，象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江青同志批了以后，我们去了，去了，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也到了他们小队、大队、学校、公社、县里，地委都去了。

谢静宜：到了他们家里进行家访。

迟群：到了，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亲属了。那里从县里头，当然教育部门还是主动反映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但是县里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了，公社里的第一书记，事情发生了半年，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没有去看看人家的父亲，母亲，就隔了那么三，四里地，所以这一次他们都作了一些表示了，当然还要看下一步了。说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这样忙，还看到了这件事情，派人来。直接到了公社去，到了大队，小队，到了本人家里去，我们就离得那么近没去。我说那不光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查一查你们里头有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我们去，还让那一个逼死学生的人给我们带路，这事就莫名其妙了，事到如今还没处理这个人，而且给了人家五十块钱，县里头说，那从教育经费挤出一百元钱，加起来县和公社给了一百五十块钱，人命逼死了，只值一百五十块钱。这是路线斗争问题。

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批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

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

谢静宜：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的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

江青：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和《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1974. 01. 25；中发 [1974] 3 号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

周因来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

批林批孔要结合，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批孔是挖四旧的根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根子，故必须多做社会调查，履广大工农兵群众；

批林批孔是一场长期、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故必须参加试点；

对运动中出现的每一事物，要有分析，要分主从，要看方向，要区别领导与群众；

报道要符合实际，要全面，不能只报喜、不报忧，或只报忧、不报喜；

军队分社和记者在新闻工作中要有勇气承担调查和报道任务；

批林批孔可与目前城乡正开展的批林整风、进行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进行；

要注意民族政策，不要涉及民族宗教的风俗习惯；

要警惕国内外反动派造谣污蔑和挑拨离间。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姚文元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一九七三年）“十大”以后，九月二十三日主席接见沙菲时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中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主席指出秦始皇二十二项功劳，粉碎了林彪的进攻。）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请代我向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祝贺西沙群岛全军，民兵，渔民同志们与敌周旋，取得维护祖国主权的伟大胜利。

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是路线斗争，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都要打倒帝修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各自在党分配的岗位上战斗着，为了表示我对同志们的祝贺，特请作家浩然同志，诗人张永枚同志，记者蒋豪济同志代表我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并送给你们

——《林彪与孔孟之道》500 份

——《五四以来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言论辑录》500 份

——《批林批孔材料（一），（二）》各 500 份

——《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500 份

学习的第一单元是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第二单元是《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第三单元是《毛主席视察南方时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以上三份文件请世友，紫阳同志为你们准备。中央的通知还会告诉你们其他读物。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

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

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在他的死党中间，甚至在公开场合，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并且题在壁上，记在日记上，当作“座右铭”。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搞武的要学文，搞经济基础的要懂得上层建筑。要害问题是批不批。要批，就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

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带头批林批孔。要发动群众，把孔孟的反动论点同林彪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对照，逐条地批。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通过批林批孔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深入基层，进行试点，训练骨干，抓好典型。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最敢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批林批孔最内行。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工农兵对他们的进步是欢迎的。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毛泽东关于一篇文章的批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 1974 年 2 月 4 日”

（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来源：姚文元 1974 年 2 月 16 讲话）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大业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最高信条和搞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林彪和他的死党互相赠送的条幅里反复互相嘱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说世界万事中，“克己复礼”是最大的事，也就是说复辟资本主义是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七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给毛泽东写信，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2 页）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

《规定（草案）》提出：各单位、各地区张贴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和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你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抱歉，未能及时收到你的信。

你们的材料那么困难，我很惊讶！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总会冲破障碍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送上：

《林彪与孔孟之道》

《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

以上材料各 100 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请告我数字。

这封信可以给国防科委所有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看。不愿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要，也可以看。

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敌人利用派性挑拨离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路线斗争，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个纲，这就是目前我国党、政、军、民、学以及其他各界的头等大事。

胜利是会属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们！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 1974 年 2 月 4 日”（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

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

我领会：为什么三篇选这篇，是否这样几点：

1. 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

2. 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

3. 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

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〇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林批孔七人小组和中央军委六人小组举行联席会议

讨论各地、各部门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至三月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林批孔及毛主席与卡翁达布迈丁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到三〇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批“克己复礼”》

目前，全国人民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

党的九大以后，正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号召，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了许多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据《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李固传中记载，东汉质帝被害，朝廷没有皇帝，太尉李固等联名上书大将军梁冀说：“今当立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林彪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和“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多次地大书特书，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林彪想当“皇帝”，搞“克己复礼”，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林彪“兴灭国”，就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中国复辟。“继绝世”，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举逸民”，就是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

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巩固和发展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包括蒋介石集团，包括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现在又在极力攻击、诬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对于阶级敌人的诬蔑和攻击，我们要给予有力的回击。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告以外交部名义将此意写入送审报告中待批。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2 页）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外交部送审报告。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3 页）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孔丘其人》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运动的几项规定

12 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要揪军代表。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 74，4，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3 页）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毛泽东 74，4，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3-374 页）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05.18；中发 [1974] 17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

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中央 17（号）文件下达后，各地进一步据此分析情况，布置工作，落实政策，全国运动情况很不一样，提出问题也不一样。运动继续深入，有各类不同情况，有的已在揭发批判，要注意区别两类矛盾；有的未深入揭发批判，有问题；有的搞到邪路上，南京搞经济主义，未全解决。全国形势好的。18 号文件讲涉外，不完全是涉外。云南发生外宾去参观，一派贴大字报，军区派人包围，不让贴，说是破坏。这就没信心，文化大革命中那么激烈的外宾也看到。

17（号）文件下达后，问题：①军以下提正面教育，什么叫正面教育，要不要联系实际？②提清查林彪集团阴谋活动，反复辟还搞不搞？那些问题仍存在，好好联系起来贯彻就能解决，和林死党有关的，很少，文件中说不算老账，有一条线，要交代清楚，主席打招呼，57 号文件为界。③领导和基层关系，重点领导机关如何搞，军队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地方如何？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搞四大。④革命大批判如何进一步深入？个别地方发现压群众情况，说过去搞错了。

生产，农业总的好的，有的有灾，前几天下雨旱象减轻，甘、新有灾，新疆麦收减产，定了。全国整个夏收不比去年低，工业仍钢、煤、运输问题多，轻工尚好，石油始终好的。钢计划 2700，欠产很多，国务院正想办法抓。还是革命形势决定的，武钢最近全部停了。有一些干部，少数，用破坏生产压革命。总要经过一个过程。多数人抓生产的，搞坏生产不得人心的。工业生产也要抓一下。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她自六月十七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大会和讯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4 页）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北京市委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研究儒法斗争史》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继续搞好批林批孔》

形势大好，还要不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呢？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正是毛主席、党中央历次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以后，江青等人组织一些人研究批林与批孔的关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初，毛泽东同意向全国转发这个材料。

江青等人抓紧在中央及各条战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兴起。

批林批孔如何联系当前的实际？

一个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问题。

一个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作的报告，提出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列举了九大以后领导干部中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思潮。

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这也就是批林批孔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实际问题。

可惜，如何开展批林批孔？如何联系实际？这些重大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没有展开充分地讨论，也就不可能在领导层中取得一致的认识。

当时，突出了一个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关于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05.01；中发[1972]19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在当时的的大学生及有关的干部中已经引起了震动，反响非常强烈。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走后门”问题点了叶剑英的名。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抓住这个问题，以检讨为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发难。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迟群、谢静宜又在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联系实际，提出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然而，如何开展批林批孔、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

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一计一成，又生二计，制造舆论说什么批林批孔是影射周恩来。企图把水搞混，转移斗争目标。

2010年2月1日初稿

第十章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壹、 本节概述

山东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运河市区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批林批孔批袁汇报团”、“批林批孔批袁指挥部”。

强烈要求：

- 1、给被打被压被迫害的假 5·16 平反伸冤；
- 2、给因清查 5·16 再次受株连的所谓“孙、孔、王右派集团”平反，马上释放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已死去）；
- 3、清除混进各级革委会中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 4、增加革委会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把造反的干部、群众代表补充进去。

各县各单位各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纷纷集会，声讨袁升平！召开各种形式的控诉会，讲演会，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把满腔的愤怒喷射出来；发表声明，书写讨袁檄文，张贴公开信，决心把批林批孔批袁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运河地区滕县革命委员会 28 名成员发出的“致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一封信”。

题目：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信的开头说：“正当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 1974 年 12 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了。喜讯传来，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山东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是正确解决山东问题的根本方针，是推动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胜利发展的强劲东风。我们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全信共有七条。

“二、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批袁斗争的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林彪死党袁升平的反革命罪行。紧密联

系我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袁升平疯狂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倒退的罪行，迎头痛击右倾复辟思潮。”

三、“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县委必须立即改变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袁、捂盖子，怕群众的被动落后状态。”“欢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混在干部队伍里进行破坏活动的个别坏人。对我县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马启廷（文革前的县委书记——抄者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以养病为名，借故逃跑，长期擅离职守，对抗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必经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按照中央 12 号文件的规定，切实把我县县委、县革委机关的批林批孔批袁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

四、周克玉是“袁升平的私党”，是“破坏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支左工作的罪魁祸首，必经彻底揭发批判。”

五、要求全县革命造反派应做工农业生产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六、革命造反派要继续促进革命大联合，要增强党性，反对派性，记取走资派利用派性，“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深刻教训。”“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袁升平身上。”

七、我们必经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林批孔批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提高警惕，坚决揭露和打击破坏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克服左右干扰，特别是右的干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让我们乘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重要指示的强劲东风，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障碍和阻力，把批林、批孔、批袁的斗争进行到底，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虽然没能取得全面胜利，但又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江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的“反攻倒算”行为，点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领导人。

一九七四年二月初，万里浪、张羽等人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进行革命发动，揭发省委某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一打三反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批示中央办公厅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转来江西省乐平县发生八名群众在县委静坐绝食、要求解决问题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要求中办负责人即与江西省委、乐平县委取得联系，劝说群众停止绝食，不可消极自毁；同时，靠乐平县委应按中央有关政策妥善解决群众所提合理意见要求，对不合理、不合中央政策的部分，提要求者也应自动改正。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会见涂烈，谈话三个多小时，指出：“斗争从你的信开始”。

涂烈一回到南昌就召集群众组织代表广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揭发批判。会内会外结合。

报——《反林彪无罪》，

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

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

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李九莲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李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

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讲坛持续数月之久。

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发表讲演。

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 4 月 24 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

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

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各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日，夜，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

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三日，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日，夜，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

一九七四年八月，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等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

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朱毅贴出《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

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

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臧克家的《吊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汨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

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散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4人被当场拘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

李九莲的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

关于李九莲调查委员会问题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竟搞的是什麼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

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查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查。”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

1、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救世主”，“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

领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出了第一片嫩叶。”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

4、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等等。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的官们祭起了一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

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 26 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

方道球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

1975 年 1 月，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 10 月 22 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 年 5 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 年 5 月 22 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 年 7 月 3 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
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
‘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
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
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
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
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
的灵魂！”

1975 年 9 月 27 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

刘庭荣（后被判刑 15 年）、管佑龙（后被判刑 15 年）、钟海源、康为民
（后被判刑 7 年）、林锋（后被判刑 5 年）、罗斌（后被判刑 15 年）、邱彩云
（后被判刑 10 年）等 16 人被拘捕。

1975 年 12 月 20 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
权利五年。

1976 年 5 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
南昌新建服刑。

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周恩来将一份材料批给王洪文

有关单位上报一份反映浙江省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要求批省委领导的材料。周恩来将此材料批给王洪文，要他处理此事。

王洪文表示：此事可以再看一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

下面报来反映浙江温州地区发生抢夺武器、扰乱生产的几份材料。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酌处。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浙江省军区
命令收缴被抢武器。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

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

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山西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山西问题。

决定王谦代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并商定约山西省委常委来京开会，讨论解决山西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山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的错误。

解决山西问题。山西省党政军负责人十二人参加。

会上，王洪文批评省革委会负责人谢振华主张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

中央罢免了谢振华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

四川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批示

重庆市杨家坪半工半读技校发生学生绝食事件。

周恩来批示：以国务院名义打电话转告绝食学生，指出绝食的做法是消极的、错误的，应该吃饱饭振作起精神，来与市委一起讨论，谋求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来关于重庆市“十大”宣传队抢夺枪支车辆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只告现象，没提如何处理意见。如果群众已动公愤，能夺回他们抢去的武器，救了他们抓走的民兵，他们在群众中已渐渐孤立了，正是做好工作的机会。

福建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四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研究福建省委、军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并通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福州军区的复电。

吉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转来通化某厂有人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建议给吉林省委打一电话，对此人不要事先批斗，不要施以压力。

甘肃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 万多人参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 23 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

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河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已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这里的壁垒分明，焦裕禄生时为兰考人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十四日，是他逝世十周年，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焦裕禄同志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彻底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里呆了十几天，使我建立了充分的信心：谁想在这块土地上，搞资本主义复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焦裕禄同志生前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大批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硬汉”。

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王新曾在兰考大肆摧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屈服，一直坚持到胜利。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仍是兰考的第一把手，他的事迹足可写一部史诗。当然，现在还不是写作的时候，只能放到以后。

一九七四年二月上中旬，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的信，又初步了解了兰考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正在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斗争，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一场极其深刻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这场斗争，对于每个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一九七〇年七月起，林彪、王新路线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

其中，除调走七人外，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原信后面遗失）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斗争大快人心，兰考人民马上动起来，开大会，游行，又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气势。张钦礼同志回来，传达了中央及省委的精神：

一、批林必批孔、挖根，批翻案妖风，批王新，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

二、要在农村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

三、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四、要训练骨干，试点，要有深度，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问题；

五、运动要由各级党委领导，不能抛开党的组织，对各种错误倾向要揭、批，但要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特别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工农兵群众是主力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是我根据钦礼同志谈话和报告随便写的，不是原话）。

群众非常听毛主席、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话，前两天，群众想把那些闹翻案的人示众，经县委一说服，就不揪了；调查的人可以把揭发材料转去处理。

我深信，林县也是一样。砍红旗渠的是林彪、王新等反党集团。现在的县委、公社党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武阳、艾生等同志都是好的。要维护正确的领导。

你们那里怎样？知识青年应当在批林批孔中起作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

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

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

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三月，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

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钢派的人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就要顾建棠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

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新派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新派的人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

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群众代表留了借条，将 3 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代表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

凡是 1974 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 4 年徒刑，这些人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付廉回忆：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

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

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

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谢某）谈话：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

命 8 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委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叁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 5 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出不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 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叁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到他在车站路 15 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 9 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武汉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准备谢某补台至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谢某从农村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五年初至一九七五年底，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

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

广东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

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

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

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五）谈反潮流

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二、限制特权

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

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

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 2 万字，从头至尾长度约 1 0 0 米。

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

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

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

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广东省政府领导人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活动。

一九七五年某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们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

王晏等人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他说：“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

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王晏、张文治等人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

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问题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某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关于陆渭文、匡建中问题的对话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

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市委领导人召开各种会议，

说：“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还在社会上放出一股风，说：“……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一九七四年五月，沈静园教授和某人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

问：“x 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 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 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 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问：x 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答：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基层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 xxx 同志进行审查，现已核查清楚

xxx 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各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并且说：“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地方还正式规定：“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

然后一阵风发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 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and 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 x 年 x 月 x 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有人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帽子。

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

一九七五年，匡建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强调指出：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省委常委，胡勇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长沙市委、长沙市商业局党委发下文件，对××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或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

一九七四年三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

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不久，有人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这些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

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这些以“穷志诚”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成立“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

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一九七四年四月，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荼展开了。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的陈益南，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他入党。

一九七四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八条”指示此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云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三大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原来的八派，是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

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打蔡、马、雷、董（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高远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战役，打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战役，打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战役。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首，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的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某等人。

“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是原来的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这一派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

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同时又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子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內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揭发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在此期间，何立宽、胡玉珍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商量，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根据

“提、补、纳、调”方针，调整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班子。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传单、材料、发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串连会，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在刘光兴的指挥下，批判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刘光兴与李国梁、赵××商议，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要把其中十八人安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周恩来批示

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方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

贰、 本节简论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

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其中，广东省的材料特别有意思。

一九七三年，在批林整风中，潜藏的一股复辟回潮暗流，逐渐形成并浮出水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出笼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有人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表示不满。”这正是一九七四年要发动批林批孔的原因所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

在批林批孔高潮中，李一哲们暂时收敛了一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们看准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时机，又开始大举反攻。

一九七五年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案件。

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一九七八年广东省又为他们平反。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七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规定（草案）》提出：各单位、各地区张贴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和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她说：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这个话也只是余音绕梁而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到召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去了。

2010年2月8日初稿

第十章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

编者按：这是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复信，很值得一读。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柴春泽，还有千千万万的下乡知识青年，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的老将们，经受过革命斗争的多次考验，经过了党的长期教育，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更应该坚决地支持子女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小将向老将挑战，也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老将接受小将的挑战，带领小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调查附记

柴春泽，原是辽宁省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时，他在学校最先贴出大字报，申请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比较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户，锻炼成长。

到翁牛特旗玉田皋生产大队半年多，青年点出现了一股“转点风”，他的父亲也动员他转回赤峰县。柴春泽感到这场斗争的激烈，更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两个决裂”，坚持实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教导。他给父亲回信说：“爸爸，我是响应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农村的，您是一个具有二十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不久，父亲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支持儿子扎根农村的决心。柴春泽感到很高兴，在农村干得更加出色了。

去年六月，柴春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八月三十一日，他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告诉他现在有一

个招工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他很不平静，觉得父亲思想上的反复，在一些家长中间很有代表性，便把父亲的信和自己写的复信在青年点拿出来公开讨论，鼓舞了战友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壮志。他父亲收到这封复信后，又受到很大教育，承认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因公出差，没有来得及回信，便嘱咐柴春泽的弟弟、妹妹向哥哥学习，并让柴春泽的母亲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春泽。

柴春泽所以有这样高的路线觉悟，敢于向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是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下乡两年来，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了五遍《共产党宣言》，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学习了《法兰西内战》、《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选学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有关章节，写了许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和学习心得笔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朝华的文章《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是否反映社会内容、有无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音乐界和各级文化部门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注意。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很重要，这是贯彻十大精神，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同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直接有关的一件大事。

“大事要讨论，讨论才能引起注意”。我们应当关心这个讨论，并将这一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为什么要展开这个讨论？仅仅是为了对某些无标题音乐作品作些分析评价吗？或者是为了对音乐的标题性或非标题性问题作学术研究吗？统统不是。这是文艺战线的一场大是大非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文艺的根本性质问题上所展开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钟志民《一份退学申请报告》

编者按：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的这份申请退学报告，自觉地批判了自己“走后门”进大学的错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反映了教育战线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革命干部的子女，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还是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二、革命干部是教育子女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把子女当做“私有财产”，把“走后门”上大学作为成名成家的阶梯？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① z h é（音哲）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① z h é 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那是说的剥削阶级内部的事。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事关反修防修，事关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吗？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宇晓的文章《驳一种修正主义的音乐谬论》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音乐理论，对“音乐”的概念，作了种种玄妙莫测的解释。特别是对无标题音乐，说得更玄，说是什么“纯音乐”，“绝对音乐”，是一种“超凡”的幻响，等等。这纯粹是骗人。当前出现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没有社会内容，仅是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对比的谬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对它的虚伪性、反动性与危害性，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报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形势大好 电影战线斗、批、改步步深入，一批彩色故事新片将在全国上映》

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于故事影片的一次可贵的实践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讯 春节前夕，我国电影战线传来了喜讯：彩色故事片《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等已经摄制成功，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将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

《火红的年代》等四部彩色故事影片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也是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于故事影片的一次可贵的实践。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形势大好，电影战线斗、批、改正在步步深入。

这批彩色故事影片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洋溢着火热的革命激情。《火红的年代》，是中国工人阶级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曲壮丽颂歌。它通过炼钢工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粉碎帝、修、反的封锁和破坏，炼出了“争气钢”的战斗过程，成功地塑造了赵四海这一具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工人阶级典型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和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胸怀。《艳阳天》，是描写农业合作化时期，以萧长春为代表的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同混进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影片深刻地揭示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我国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青松岭》的故事发生在偏僻山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影片围绕着由谁掌鞭赶车的事件，展开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描写了张万山这样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贫下中农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胜利。《战洪图》叙述海河两岸人民战胜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的英雄事迹，表现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顾全大局的胸怀，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这四部彩色故事片，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分别摄制的。各摄制组接受任务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战斗。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并结合创作实践，不断开展文艺领域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些影片的拍摄过程，生动地反映

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是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有力批判。摄制组里，党的一元化领导代替了过去的“导演中心制”。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美工、照明、服装、化妆、道具、制景、行政管理等人员组成了新型的创作集体，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打破了过去冷冷清清关门拍戏的局面。他们走出大门，把电影剧本交给工农兵群众讨论，对剧本的内容、细节，以至一句台词、一件道具，都认真加工修改，使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断提高。他们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和群众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一起参加劳动，虚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努力表现好工农兵的形象。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对影片摄制工作给予了热情支持，他们说：“拍好革命电影，我们也有一分责任。”在群众大力支持和鼓舞下，摄制人员的革命干劲更足。为了早日完成任务，《火红的年代》摄制组盛夏冒着高温，在钢花飞溅的平炉前坚持拍摄；《战洪图》摄制组赶拍雨中抢险的场面，寒冬也整天泡在水里坚持工作，从不叫苦。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寄希望于我们，工农兵寄希望于我们，早日拍好革命电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春节期间同时上映的新影片还有：彩色戏曲艺术片《沙家浜》（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移植的粤剧影片），彩色木偶片《小八路》，彩色纪录片《喜看农业大丰收》（一）（二）（三）号，《工农业生产的好后勤》，彩色科教片《新法制革》、《海带》，科教片《南京长江大桥——施工技术》，彩色科教片《修旧利废》、《地震》、《向炉龄要钢》。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报导上海乐团创作、演出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工农兵群众热烈赞扬这部作品革命气势磅礴，民族色彩浓厚，交响效果强烈丰富

据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电 继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之后，又一部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在上海正式上演了。这部作品革命气势磅礴，民族色彩浓厚，交响效果强烈丰富，博得了工农兵群众的热烈赞赏。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乐团创作和演出的。它以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曲调为基础，根据交响音乐的特点进行了再创作。全曲共分九个乐段。第一段《乘胜进军》，以雄壮的歌声和飞速的行进节奏，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年胜利进军势不可挡的情景。接着，根据京剧中的主要情节和

英雄人物的主要唱段谱写七个乐段，通过器乐合奏、合唱、独唱、二重唱、无伴奏合唱等形式和多变化的表现手法，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苦难遭遇和英勇斗争，展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最后一段《胜利会师》，以气势雄浑的大合唱，表现战斗的胜利和继续革命精神，热情颂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使整部作品达到了高潮。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一九六七年开始创作的。上海乐团的创作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决心进行交响音乐革命。经过六年多的实践，终于成功地把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搬上了交响音乐舞台。

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声乐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西洋器乐演奏和伴奏中，增加了锣鼓、京胡、板胡、琵琶、笛子等中国民族乐器，使音乐形象增添了浓厚的民族色彩。作品运用变化多样的表现手法，展现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有时高昂豪迈，有时细腻深沉；有时用以叙事，有时用以抒怀，有时又用以描写意境。《迎来春色换人间》这一乐段中，当杨子荣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时，合唱队也唱出同样的唱词作为他的回声，这样既描叙了林海雪原的开旷辽阔，烘托出杨子荣穿越丛山峻岭、只身深入匪巢剿匪的英雄气概，又表现出“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的深刻意境。这样虚实结合的手法，起到了丰富交响效果的作用。这部交响音乐还有一个颇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把京剧中的李勇奇改为英雄群象，采用合唱的形式演唱“这些兵急人难”和“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这两个唱段，表现出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千千万万个李勇奇正在觉悟，成长。“这些兵急人难”这一唱段，还采取了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把西洋音乐的手法和京剧传统的唱法结合起来，并以人声呼应代替器乐演奏作过门，听来倍觉亲切感人。

上海乐团在创作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精益求精，反复修改了十几稿，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他们对每一个乐句精雕细刻，严格要求。例如第四乐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中参谋长的独唱，原来是以合唱的形式演唱的，气势雄伟，效果很好，但这样参谋长的音乐形象压过了杨子荣的音乐形象。创作人员学习革命样板戏关于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的创作原则，经过反复推敲，减少了参谋长唱段中的合唱部分，又在杨子荣的独唱中运用了合唱艺术的多种表现手法。这样，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的音乐形象就显得更加高大和突出了。

几年来，上海乐团的文艺工作者把深入工农兵，接受再教育，不断改造世界观，加深对工农兵的感情，作为创作和演出的思想基础。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创作，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段文秋的文章《柴春泽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邓绪东的文章《为“扎根精神”叫好 读柴春泽的信有感》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报》刊登钟志民同志在校党委常委一月十七日约见他时的谈话记录《珍惜革命前辈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 决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过日子》（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热烈支持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南京大学党委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全校师生员工纷纷表示学习他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钟志民的父母积极支持儿子退学的革命行动 让孩子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员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在本报刊登后，钟志民的父母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儿子的退学要求，并检查和批判了自己“走后门”的错误。革命小将挑战，革命老将应战，值得欢迎。值得支持。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这是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那种明知是错，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了的说法，既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打掩护，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通不过的。钟志民父母的革命行动，鲜明地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风尚，应当加以发扬。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由江青指派迟群、谢静宜调查后写出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

1973年7月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

1973年7月14日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

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已做了调查并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

他们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于1974年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简报》指出：马振扶中学学生张玉勤（张因考试不及格，受到批评后自杀）是被修正主义路线逼死的，该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其实质是复辟。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起草中央通知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周恩来为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起草中央通知：

要求河南省委对此事认真复核，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

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

张春桥阅后批：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通讯员《老一辈打仗干革命，我们也要革命： 钟志民同志谈申请退学的思想经过》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狠批孔孟之道 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纪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说：

林彪特别欣赏孔老二所讲的“克己复礼”。他写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他和他的死党叶群，一唱一和，把这几句话写成了四个条幅，互相鼓励，挂在他们的卧室内作为“座右铭”。是哪一种人就有哪一种人的思想。林彪这个现代的复古主义路线的头子，真是抓住了古代孔子的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奴隶主阶级的规章、制度、社会秩序。孔子“复礼”，是要复辟奴隶制，妄想把当时中国社会恢复到奴隶社会。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复礼”，是想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沦陷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过去我的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世界观和所走的路线，都是复古主义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过去我在哲学战线上的写作和行动，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当时的复古主义的反动路线服务的。我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可是我拥护孔家店。经过“五四”运动，封建式的拥护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宣扬儒家垃圾的那些书，这就同蒋介石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服务。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就同刘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来，为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以及参加批林批孔的斗争，我才逐步地对于现代和古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其间的连贯性有所认识，对于我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的危害性之大有认识。我们现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从这两条路线的历史根源上，彻底批判以孔子为首的复古主义路线，宣传从法家开始的反复古主义路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汤一介说：

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孔孟的“德”、“仁义”、“忠恕”，就是林彪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篡改党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反动思想武器。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欢庆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暗中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他给他的死党叶群写下一个条幅：“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句话原是出于《尚书》，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信徒赵良用来攻击当时法家的代表商鞅的。事隔两千多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又搬出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一套呢？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提出这一套呢？这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这一革命震撼了世界，把帝、修、反吓得要命，沉重地打击了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

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林彪实在按捺不住他自己，就用两千多年前儒家攻击法家的反动东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林彪要行的“德治”“仁政”呢？《“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他要行“德治”“仁政”最好的注脚。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对反动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把被我们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使地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孔孟之道的“德”、“仁义”、“忠恕”等反动思想来篡改党的理论基础。革命人民对林彪鼓吹的这一套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对于鼓吹“德治”“仁政”、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决不施“仁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得好：“‘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一切要把历史拉向后退，反对革命的反动派，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孔孟鼓吹反革命的“德治”、“仁政”，没有能挽救得了奴隶制的灭亡。林彪乞灵于孔孟的“德治”、“仁政”也救不了他们的命。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史上一切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小丑一样，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古今中外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一个真理。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要镇压一切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揭露他们各种反动虚伪的说教，让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林彪、对孔孟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一定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的路线觉悟更加提高。彻底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说：

从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鬼花招，可以看出他跟两千多年前的祖师爷孔老二是一脉相承的两面派。林彪长期以来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在他指使别人东拼西凑的卡片里，有不少条条是关于“忍耐”的。他早就写下了“忍耐”两个大字，告诫自己“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什么是林彪的“大事”？不就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吗？

一生为复辟奴隶制而到处奔走卖命的孔老二，也叫嚷什么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林彪和孔老二隔了两千多年，可是都为自己的“大事”而号叫“忍耐”，正由于他们都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都要搞复辟倒退。他们是有共同政治需要的一丘之貉。“忍耐”这两个字，听起来多么善良而无辜，它背后却隐藏着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复辟阴谋，掩盖着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血腥罪行。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林彪阴谋诡计的一根毒蔓上挂了两个黑瓜，“忍耐”以外，还有所谓“韬晦（晦）”。这是他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林贼的“韬晦”就是说，躲在阴暗的角落，把凶如尖刀利剑的狼子野心藏在套子里，忍耐又忍耐，掩饰再掩饰，一旦时机成熟，恶狼就立刻跳出来吃人，来搞罪恶滔天的“571工程”了。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反动派不可能认识这条规律，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尽管林彪以一系列反革命策略来隐蔽自己，伺机而动，妄图拉历史车轮向后退，历史潮流照样奔腾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林彪无论怎样以不变应万变，千方百计“忍耐”“韬晦”，都无损于社会主义一根毫毛。等到他反革命魔爪刚一露头，立即被抓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林彪连同他的“五七一工程”统统被粉碎。任何阴谋诡计都挽救不了这个叛徒、卖国贼彻底灭亡的命运。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

经毛泽东批准。

通知指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一九七四年二月，江青等人关于张玉勤事件的指示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说，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也指示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

迟群把江青、王洪文这些话用电话通知了中共南阳地委。

当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罗天奇、杨天成被判刑 2 年。

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 280 余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精神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和复辟。在全国掀起“反复辟”浪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国务院科教组在《教育革命简报》上登载一批教育系统批走后门的材料，并加编者按语：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

之后，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并就一些地方和机关批走后门一事提出：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至八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系统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

会上传达了一月二十五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精神。

迟群在会上强调：不批孔，就是不批林；要求揪出各地复辟的代表，抓本地的马振扶典型。

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抓住实质 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

他们对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转载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为此发表的编者按语，表示了不同看法。

人民日报加的编者按语说：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的信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约迟群、谢静宜谈话

周恩来指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毛泽东叶剑英的信上的批示。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主席又批一件，关于走后门问题。

主席说：走后门问题很大，从支部到中央，牵涉到几百万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问题，可能会冲淡批林批孔，（还是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开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进来的也会有坏人，要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可能不完整）

我领会，还是要抓批林批孔这个中心，不要转移了，不能分散，要有分析，看稿注意这个问题。批林批孔还是路线问题，重点在领导机关。主席讲要抓住重点，不要片面，要一分为二。

大家反映，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走后门反而多了？知识分子也有反映。我说，文化大革命前不需要走后门，路线不对，搞修正主义路线，走前门，培养地主资产阶级接班人，前门就可以进去。文化大革命，学制改革，工农兵上大学，斗批改，前门无产阶级占领了，当然还不巩固，这样后门就突出了。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1974. 02. 20；中发 [1974] 8 号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附录：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 05. 01；中发[1972] 19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指出：，

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

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

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七日，周恩来批示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一则反映成都第四军医大学赏中高干子女走后门，并与其他工农兵赏对立情况的来信。

周恩来批示：责成总后勤部派一检查组协同成都军区对此事事先调查处理，要求该校加强教育、整顿工作，以改变四医大的校风。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给王洪文李先念吴德的信

江青在科影厂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的信件上的批语

洪文、先念、吴德同志：

这是件大事，不仅青少年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也需要学习这种知识。北京天文馆被外国人占领了，只有中国人一个画面。而天文学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并且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单是二十四史上就占有很大篇幅。

有些中国人不象中国人，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应该批判他们。我们建议支持拍电影，并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整理、研究祖国的天文学。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湘晖的文章《评湘剧《园丁之歌》》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风庆”轮党支部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种精神面貌在“风庆”号船员们身上又一次表现出来。“风庆”号首次远洋试航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凯歌，它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志气，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风庆”号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加以发扬。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1974. 12. 31；中发[1974]32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贰、 本节简论

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复辟回潮，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抓住要害。

教育战线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批判上大学走后门；二是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

文艺战线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批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问题；二是批评晋剧《三上桃峰》；三是批评湘剧《园丁之歌》。

新闻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交通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风庆轮事件。

主要问题是批过了头。批评者反而遭到了批评。

2010年2月21日初稿

第十章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八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事件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写信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鱗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鱗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表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王良恩转呈至周恩来，周恩来批给叶群：这些信到此为止，存留你处。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林彪家中搜出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表态信，王良恩又把这些信呈送周恩来，周恩来批示：退

一九七四年，江青等人得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在九中二届全会上写给毛主席、林彪的信，追查为什么隐瞒不报毛主席，为什么存留在林彪处。王良恩不愿意牵扯出周恩来，自杀了断自己。

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委托李德生韩先楚去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

李德生与许世友、韩先楚等人串通欺骗中央。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人物，一个是许世友，一个是韩先楚。

韩先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根据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公开的材料，概括如下：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韩先楚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也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又发表了“16条”，韩先楚嗅出点“史无前例”的味道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学生先是在学校内“踢开党委闹革命”，接着又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省委、市委陆续瘫痪。韩先楚困惑了：这是怎么啦？！老蒋没来，我们自己打起来了！从来都是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旧世界，打倒国民党，哪有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踢开”、“炮轰”自己的党委的呀？这不是共产党打共产党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看街道、广场和省委、市委门前如痴如醉的人群。听着“炮轰”、“火烧”、“油炸”、“打倒”、“揭盖子”的吼声，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连梦境都不是。这是那些被推翻、打倒的势力，被赶去台湾的国民党，才日思夜想，连做梦都想看到的情景呀！他痛苦地摇着头：我们这个党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为什么有些人要瞎折腾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正是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福建省委、省政府被造反派夺权的当天，一群造反派来到军区，要韩先楚表态。韩先楚接见了代表，明确答复：“我和军区党委一致认为，中共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夺。只有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才能夺权，不经批准夺权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和军区党委、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是根本不承认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叶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韩先楚在全省工作会议上，按照他自己“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的指导思想，“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鲮鱼眼”（指张春桥）。

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笼的《“571工程”纪要》中，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

一九七一年八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凡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噼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示：“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了17分钟。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毛泽东对说你去沈阳吧。韩先楚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只会打仗。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韩先楚说那是南大门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韩先楚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

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

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号文件

文件指出：“……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9号文件后有关单位整理出《韩先楚十大罪行》，几十条罪状除“林彪死党”外，几乎全是反对江青的、张春桥等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韩先楚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

韩先楚在信中提出：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9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一九七四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1972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郑磊的文章一出来，有人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检查了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中认为：这个“鱗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李先念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李先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毛泽东好像对这个 9 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中央下发 9 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 9 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

一九八二年七月，政变后的中央决定撤 1974 年的 9 号文件

韩先楚说：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

贰、本节简论

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物众多，级别很高，关系复杂，毛主席作了淡化处理，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流露出来的材料极少。现在知道的大概情况是：

韩先楚等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

王良恩在中央办公厅的审查中，“畏罪”自杀。

李德生不久辞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牵扯进去。

2012 年 5 月 13 日初稿

第十章第六节 筹备四届人大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

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会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

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为他们平反，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底关于八大司令员对调等讲话内容。

周恩来对吕正操等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记在心上！

周恩来转告杨成武关于他大女儿杨毅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消息，向杨表示慰问；并对自己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时讲过一些过头话表示内疚。

周恩来告诉杨：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周恩来进行第二次大手术治疗

一九七四年某月某日，邓小平与江青交谈

邓小平说，不得了了，总理的病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

江青说，那还不是你嘛。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

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4 页）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4.09.29；中发 [1974] 25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

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贺龙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电告王洪文

并要王洪文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晚，周恩来与江青谈话

江青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八日、九日，周恩来先后与王洪文、邓小平、李先念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通知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

《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报道：“风庆轮”一九七四年出航罗马尼亚，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港。在出航过程中，一些人提出：国产万吨级轮船早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轮船没有及早远航。交通部所派在风庆轮子上工作的两名干部拒绝将此事作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进行批判。船到上海后，王洪文指示把交通部的一名干部留在上海进行批判。并责令交通部严肃处理。

江青看到报道后致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二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洪文十月十四日”

张春桥批示：

“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

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张春桥十月十四

日”

姚文元批示：

“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姚文元十月十四

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

邓小平圈阅了该信。

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

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邓小平说：我要调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

王洪文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同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江青召见王海蓉、唐闻生

要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说：邓小平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一次二月逆流。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

江青十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

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王海蓉、唐闻生
听取她们转告十月二十日毛泽东谈话内容。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先后与王洪文、王海苏、唐闻生、邓小平、江青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叶剑英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周恩来先后分三批约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开会，解决风轮事件问题。

期间，还另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某日，邓小平到江青处面谈

邓小平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说话走火了，就算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及进展，提出：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份搞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我的身体情况比十月十七日见主席时间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毛泽东看信批：同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托她们向毛泽东汇报病情及其他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长谈
李先念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回京。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的指示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她们转达了毛泽东对江青的的批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准备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谈话
毛泽东：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好！

邓小平：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我赞成你！

邓小平：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

邓小平：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这个好。

邓小平：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先后与叶剑英、邓小平和许世友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主席的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 青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之后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其他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先后与李先念、纪登奎、邓小平、江青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与叶剑英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以及王海苏、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与王洪文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同王洪文武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与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乔冠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与王洪文、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与王洪文、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先后与王海苏、唐闻生和邓李先念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与王洪文、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周恩来召集会议

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参加。

十六日的会议增加了邓小平、李先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审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致信王洪文、邓小平：我基本同意。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参加的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人事安排问题。

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提出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人事安排意见。

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些让步。

根据会议讨论酝酿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第一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审阅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第一方案，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的批语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送汪主任酌办。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倪志福、吴桂贤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二十一日所拟两个方案名单。

会后，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等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

王洪文另机前往。

周恩来、王洪文飞抵长沙后，一起见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

毛泽东：

（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涨红着脸，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谈到邓小平时说）他（邓）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

[注：毛当时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就把笔放下了。]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沉默片刻）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又不告诉我。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要点：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江青等人要作自我批评，王洪文要在长沙写出书面检查。

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毛泽东说：在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

周恩来提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国央副主席。

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毛泽东表示：当前仍要继续强调备战。并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

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

毛泽东表示赞同。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下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中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周恩来、王洪文飞回北京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会议。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

（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一、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到会政治局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周恩来二十五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与乔冠华、黄镇长谈

贰、本节简论

进入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他说的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工作重点由批林批孔转入筹备四届人大。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是人事安排。重中之重是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和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的人选安排。这是新老两股势力、左右两派争夺的焦点。

新的势力的代表是江青（表面上是王洪文）、张春桥；老的势力代表是邓小平、叶剑英。

老人们充分研究了形势，掌握了有利时机，利用新人们的缺点、弱点，制造舆论（如江青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王洪文主持召开军委会议，

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削弱新派的影响,争取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

新人们猛打猛冲,不注意策略,常常陷入困境。如在批林批孔中又批评走后门;在政治局会议上抓住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表态。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外地前,约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因为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这些说明,攻击新人的舆论起了作用。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电告王洪文并要王洪文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是,一旦周恩来不能工作了,谁来顶替他主持国务院。王洪文吗?显然,无论是政治经验方面,还是工作能力方面,都不如邓小平。而且,毛泽东希望培养他将来接班做“皇帝”,而不是“宰相”。为什么不是张春桥呢?看来,毛泽东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晚,周恩来与江青谈话。江青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估计江青可能是提出王洪文任人大常委会正或副委员长、张春桥任国务院的正或副总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事先彻底检查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邓小平圈阅了,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同江青等人进行争论，拍了桌子并拂袖而去。这是老人们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的一次反击，火力侦查，看看各方面，特别是上面的反应。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这说明，新人们是主张进行回击的。但由于时机并不成熟，毛泽东不支持他们。（一九七〇年九月庐山会议，江青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告林彪，毛泽东支持了他们。）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同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问题。这是因为周恩来没有参加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但他听说了那天发生的争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江青约见王海蓉、唐闻生，要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说：邓小平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又一次二月逆流。这说明，江青在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后，并没有放弃她的看法，而且把邓小平的作为定性为又一次二月逆流。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这说明，毛泽东仍然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毛泽东的这一步棋，一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二是表示对邓小平的进一步支持；三是表示不要江青参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参与了，不管怎么说她不代表我，别人总会以为是多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支一派（老人）、压一派（新人）。实质上看，其中还包含有深意。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这个批示与七月十七日、十月十九日对江青的批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了解毛泽东对江青的真实态度。

一九七四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周恩来抓了两件事：一是解决风庆轮问题；二是筹备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谈话，支持邓小平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对江青的钢铁公司。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对江青提出的这“三不”，不就是要江青韬光养晦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说明江青一点也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要江青看李固给黄琼书是什么意思？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建议，这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当

时不正在酝酿人事安排吗？江青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她也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反对江青的人一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干脆，毛泽东自己先把那些人要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就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之后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其他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毛泽东就提出了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主要人选：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是：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国务院的副总理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提出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毛泽东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提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毛泽东提议增加陈锡联为副总理。

从最后定的这个名单来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的意思：让邓小平再升一级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他就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总参谋长。

周恩来提出：让邓小平再升一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体会到了周恩来的意思，干脆提出：邓小平再升一级任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这样邓小平就与王洪文处于同等位置了。

另外值得注意是张春桥。

张春桥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在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仅仅排在邓小平之后。

毛泽东又提议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这样，张春桥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了两个重要职位。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则排在第二；邓小平是总参谋长，张春桥则是总政治部主任。一右一左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了。

再值得注意的江青。

她在这次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中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但是她获得了毛泽东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这里，在不经意间，毛泽东对江青作出了全面评价：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以及批周问题上都是对的，她的缺点是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搞了一个小圈子（四人帮），说错了一句话（周恩来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

这才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让那些几十年来攻击、污蔑江青的谣言、混淆是非的昏话都见鬼去吧！

2010 年 3 月 1 日初稿

第十章第七节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

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

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

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桑比克、安哥

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

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

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

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贰、 本节简论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指：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

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略，它将团结全世界的人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争取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邓小平虽然在一九七四年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作了阐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言，但是，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他就彻底抛弃了这个理论，鼓吹韬光养晦。

2010年3月8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四篇

全一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四篇目录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目录

概 述	4
第一章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78
第一节 学理论 抓路线 促生产	78
第二节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86
第三节 召开四届人大	106
第四节 毛泽东关于批修正主义的指示	116
第五节 《红都女皇》事件	141
第六节 评水浒	146
第七节 落实文艺政策	158
第八节 农业学大寨	164
第九节 落实各类人员政策	173
第二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177
第一节 以三项指示为纲	177
第二节 整顿工业交通	186
第三节 整顿教育	194
第四节 整顿中国科学院	208
第五节 整顿军队	219
第六节 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228
第七节 整顿党组织	263
第八节 各省的整顿	268
第九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278
第三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305
第一节 一九七六年的形势和任务	305
第二节 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316
第三节 周恩来朱德逝世	355

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	366
第四章	毛泽东主席逝世-----	404
第一节	毛泽东的政治遗言-----	404
第二节	各级党和政府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407
第三节	全国人民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421
第四节	各国党政领导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上）-----	441
第四节	各国党政领导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下）-----	51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四篇概述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概述

第四篇是概述论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即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概述：

第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一月至八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理论、抓路线的战略布署。

发动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部署了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此作为统率全部工作的纲，使全部工作都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后来修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指出：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指示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

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

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如果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有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

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

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

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阐明了毛主席指示的理论依据。姚文元、张春桥的两篇文章对毛主席指示的深刻含义作了具体解释。认真学习这些文章，可以大大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

但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破坏，在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关于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争论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

话

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走，阻力会相当大。

一九七五年三月，张春桥修改的一个文稿中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马列主义的书》

军队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搞好军队工作，显然关系重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迟群传达的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讲话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

邓小平加以抵制。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姚文元送审新华社报告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

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

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并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言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

江青就某些问题作了检讨。

会后，王洪文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他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一九七五年五月某日，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

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

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学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

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指示

红旗杂志近期已刊载署名田春的文章，故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可不下达。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会议

邓小平：

三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戒政治局同志。

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很重要的问题。告戒、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连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主席问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浅。需要好好讨论。

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历史都提反修，是否改

变九、十大的提法？这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到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机床厂。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话是讲清楚。水平不够，讲不清楚。

纪律，不要送材料。

就是讲错，也有帮助。体委，十八号送材料。

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二十七日的会，没过头，没有讲。

这次会，我意见不应该把什么都讲。

这次，主席主要要我们讨论三要三不要。

重复讲。江青同志提倡论联合政府，是重要的，应当学。启发我学了改造学习、整顿三风，历史问题，五七年宣传工作会议。想想我们党，如果光有正确的风气，只有井冈山，九次决议，此外，在全国统治的是教、经，都是搞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勾心斗角，老同志可以想得到的。总结党的生活，怎样才能端正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全党，是延安整风。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对王明都要作具体分析。对四中全会。建党学说，列公也没有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对宗派主义，采取正确办法。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的不是。如张国焘，陈昌浩。非常耐心，又很严肃。才产生了七大报告。打败了日本，蒋。方针，政策，一片兴旺，五湖四海。高度统一。不是小圈子，是大圈。解放后，几次路线斗争，都是修正主义，没有宗派主义。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不搞修正。搞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政治局要注意。理论、经济，三条。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党不值钱，突击

发展党。我们带头做到这一点。

李先念：四月二十七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份。没有越轨。

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叶剑英：

政治局讨论批示、指示。三要三不要。我的体会：

1、56 宣传会议，批修。主要危险。五号文件以后，批资。形势很好。三月一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这个问题，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帮助我们。坚持，不是那一个人。

2、团结。不要分裂。不同于庐山。我理解：文革以来，文革许多人垮下去了。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在情况变化以后，任何组织都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分裂。

3、请示报告，严守纪律。

几乎重大的问题，

基，批，完全对的。

十一次路线，事先未请示。

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个人，组织，纪律。

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引起严重注意。

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

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背叛。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王洪文：

开了三次。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1、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2，四人帮。前年十一月会议。七人小组。分组讨论。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李德生材料。其他事情也议过。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3、抓大事。并不是都没抓。政治局学习，没有提出办法。国际问题，也有该研究没有研究。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直到看到修、经验是主要的？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我揽起来，因为事情经过我的手。

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

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二十七日会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有两个保留：

(1) 形势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2) 十一月会议。“十一次路线”。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十一月会议。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

二十七日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

他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

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某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

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小平：总参谋长。

毛泽东：就是这样。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张春桥等人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经验主义，虽说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在当时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敏感时期，容易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是给他们带上“枷锁”。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点，同一九七三年批周时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的“批走后门”联系起来，说明这次的提出“主要是经验主义”，矛头又是对着周恩来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

邓小平首先在政治局发难，并且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于四月二十三日作出批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不要只提一项。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打着讨论毛主席指示的旗号，攻击一九七三年的批周会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以及一九七五年的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五月三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了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批走后门的形而上学、三箭齐发，以及四个人常常搞在一起，不注意团结政治局的大多数。同时也反复强调三要三不要，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否定批刘、批林、批周。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上，邓小平等人为四月二十七日政治会议上的言论作了辩解。王洪文、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至此，关于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的争论，基本上结束。

”红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五年某月，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这本书的某些内容与江青和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一致。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红都女皇》的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为此，毛泽东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镡。”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经过反复查证，事情很明显：《红都女皇》不是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写的，也不是江青指使什么人写的，与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红都女皇》事件不是一个政治谣言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有人窃取了江青和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录音资料，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以此来打击左派领导人。

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大字报，攻击江青等人扼杀《创业》，抵制毛泽东的指示，长期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也是与上述活动相配合的。

这样的政治阴谋活动，在当时虽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它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也就不能公开记录入任何官方的正式文献。

评水浒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谈《水浒》

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浒》发表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

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中央转发的过程来看，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有人说：毛泽东发表的仅仅是一则文学评论，是姚文元把它搞成一个政治号召。

不错，毛泽东是说的《水浒》这本小说。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姚文元说：“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同意了、肯定了他的这种说法。

邓小平当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矛头指向。只是他此时需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不让跟着他走的人产生恐慌情绪而落荒逃跑。

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

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

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张永枚就听了五条谣言嘛！

为什么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

“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

张永枚说：“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后。”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讲话

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象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毛主席关于《水浒传》评论的发表，实际上就吹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

第二方面：一九七五年一月至八月，邓小平以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搞整顿、搞翻案。

提出所谓“以三项指示为纲”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

上次(指一九七五年三月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邓小平在中央首长接见中央读书班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第一句话是照毛主席三句话办事。这是这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一句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句话是团结安定为好。第三句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句话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不但要学理论，反修防修，而且要照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八年了”。现在是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好多事情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办，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工作要搞上去。仗总是要打的。晓得哪一天打呢？可能争取五年时间，不能说死，要是两三年打起来怎么办呢？也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能争取到五年更好。总之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第一句话。

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在这个谬论，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

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整顿工业交通

邓小平抓工业方面的整顿，发表了许多议论。他的观点、主张最后都集中到由邓小平授意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这个文件七月开始起草，八月国务院进行讨论，九月组织全国二十个重点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十月又拿到十二个省市书记当中征求意见。最后准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讨论出台。由于会议期间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议程没有进行。

下面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吕达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摘要，供参考。

《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

《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

《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

《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整顿教育

一九七五年五月以后，在教育领域就刮起了一阵阵的翻案风。七、八、九三个月达到了高潮。主帅当然是邓小平，披挂上阵的是教育部长周荣鑫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

毛泽东观察了几个月，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他指出：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

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他们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的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供参考。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

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整顿中国科学院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派到中国科学院去搞整顿。他们就科学技术战线的整顿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九月还搞出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

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后又多次修改，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未表示同意。

为什么毛泽东不表示同意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供参考。

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一

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

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

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整顿军队

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但是，邓小平、叶剑英在抓军队整顿中，塞进了许多私货。如叶剑英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叶剑英承认，一九七五年七月这次会议，就准备好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指出：“军委常委于 2 月 6 日开会，对去年 7 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六）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张爱萍上将怎么会在一九七五年成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

案风的四大金刚（万里、胡耀邦、周荣鑫）之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张爱萍表示替彭老总难受

一九六六年五月张爱萍不能接受批判彭罗陆杨这种做法

一九六六年五月军委三个高级干部联名揭发张爱萍的错误言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张爱萍被停职审查

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审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

审查之一：假党员问题

审查之二：特务问题

审查之三：通敌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张爱萍的《绝命书》

一九六八年张爱萍写给中央的两封信

一九六九年四月张爱萍“大彻大悟”

张爱萍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张爱萍说，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张爱萍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爱萍解除监护

一九七三、七四年张爱萍认为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梦呓之语！”

一九七五年张爱萍鼓吹“今不如昔”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张爱萍上将当时在公众场合还不便讲的话，由张胜先生在他的书中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一九七六年以后张爱萍大声疾呼：勿忘文革！否定文革要彻底！

对张爱萍的评语——这个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

邓小平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张爱萍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在社会主义时期，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批判邓小平的指示是不是真理？

在张爱萍看来，这些统统都不是真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他不再跟毛泽东了；在张爱萍看来，文化大革命今不如昔是真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真理，如是他紧跟邓小平了。

当然，一九八五年以后，张爱萍认为，搞军队经商不是真理，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不是真理，搞包产到户不是真理，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大概也不能说是真理，他不那么紧跟邓小平了。

（七）整顿党组织

邓小平搞全面整顿说核心是整顿党，关键是领导班子。

问题在于怎样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

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搞的那一套所谓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的作法指出：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在一次谈话中说：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們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

邓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

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可见，在整顿党的问题上，也存在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抓整顿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

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七月九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顿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邓小平要利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七月十三日，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

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当时全国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问题，这时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政治思想的重点扭转到这方面来。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样，就把邓小平的意见挡回去了。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七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8341 部队的干

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

第三方面：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下决心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政治局内部批评教育争取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再次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

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说：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向毛主席汇报时，还谈到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的问题。

我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发言后，邓小平讲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

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前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周恩来要王洪文记住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朱德和周桓（原辽宁省委书记）谈话

朱德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满意，并赞扬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

他针对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

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海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6.02.02；中发 [1976] 1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李素文主管财贸、外经等部工作的决定

1976年3月1日，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集财政、商业、外经等各部部长会议上，宣布：

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二)清华大学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右倾翻案风,中央向省常委以上老同志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起，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一千七百多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 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

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会后，清华大学贴出大批大字报。

北京大学也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实际上矛头对准邓小平。

北京和一些省市的干部、学生及群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很好。但不仅仅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

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

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

通知及附件

1975. 11. 26; 中发 [1975] 23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 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 12. 10; 中发[1975]24 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 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

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 12. 14；中发[1975]26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通报》

（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同志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

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三）中央召集各省市区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公开批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 1、阶级斗争为纲
-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的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13）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6.03.03； 中发[1976]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上报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

已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

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

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1976.03.03；中发 [1976] 5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3.03；中发[1976]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发的中发[1976]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1976.03.24；中发 [1976] 7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天安门广场事件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作了部分删节，其中包括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迟群在一次党委召开的会议上说：“跟邓小平一样的人有一层人，区别就在于职务不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

文章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捧上台。

一些人乘机造谣，说上海《文汇报》在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数日内，各地向上海《文江报》发去的抗议信、电达 400 多件，抗议电话 1000 多次。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南京市许多市民和学生进行游行集会，街道上和往来的车辆上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活动，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

同时，其中也有人以悼念为幌子，攻击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央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

从北京市派人揭下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大量是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的。

许多诗词、悼词和讲演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提出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理论路线，说什么：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摆酒重祭。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等。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四月四日

华：今天晚上研究一下。

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

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

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从 4 月 2 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 48 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观，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政治局的其他人说：

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江青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现在已经过了 12 点了，现在已是 4 月 5 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北京市是可以解决的，吴德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吴德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

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在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

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对）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天安门广场清场

吴德和倪志福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

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吴德说：政治局已决定晚 8 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吴忠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 8 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三个人当时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 8 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吴德，多次催问：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吴德，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吴德等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

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华国锋等待从听了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 10 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吴德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吴德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 11 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没有死一个人。 四月六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 04. 07；中发 [1976] 9 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

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 7 1 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

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1)(2) 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第四方面：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三个伟人逝世

周恩来逝世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代表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日、十一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周恩来同志的遗体由王洪文同志、汪东兴同志、邓颖超同志，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总理生前友好，隆重地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四万多人，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重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

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

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朱德逝世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朱德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一、为深切悼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定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九日、十日举行吊唁仪式。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自发表讣告之日起至十一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二、按照我国的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吊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 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

华国锋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〇年起，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

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对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2)）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在一九三〇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一九三四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凶狠的阶级敌人面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告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

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心情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花圈》

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参加吊唁的人们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八亿神州无比悲痛 举国上下深切哀悼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 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爱国同胞敬献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大会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致悼词

大会实况同时转播全国。首都参加大会的百万群众和全国八亿人民肃立，默哀三分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像三鞠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

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

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

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全国人民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各国对毛泽东逝世的吊唁

2012 年 8 月 19 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38 万字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第一节 学理论 抓路线 促生产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新年献词》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

批林批孔还要抓紧。

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全国军民都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析，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究，特别是对苏美两霸的相互争夺和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浙江、云南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军区、省军区党委：

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

生命安全。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中央规定：

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

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民兵组织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整顿，通过整顿民兵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

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附件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现在把这个报告，连同《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发给你们，请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具体落实。

毛主席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还再一次强调指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当前要特别学好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全党同志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困难，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附：《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概要）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

《通知》说，为了筹备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团代会筹备组，组长为谢静宜。筹备组随后于 2 月 26 日至 3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起草并讨论修改了大会的工作报告、共青团章程和研究了代表名额的产生和分配办法。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学理论 抓路线 促春耕》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深刻领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搞清楚，必将进一步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推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要看到，农村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理论学习 促工业生产》

现在还有些企业，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活动，在有些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受资产阶级侵蚀，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些同志不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不是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总想搞点“物质刺激”。

要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推动下，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要求做好工代会、团代会、妇代会准备工作的通知

1975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工代会、团代会、妇代会的准备工作。《通知》说，同意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和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讨论通过的代表产生办法和分配方案。《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加强领导，认真做好三个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合理安排对外援助的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我国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 1%，从 1963 年起援外支出开始逐年有所提高，到 1972 年、1973 年、1974 年分别上升到 6.7%、7.2%、6.3%。

中共中央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基础，有的受援国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

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四五”时期的 6.3% 降至 5% 以内，援外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 50 亿元。扣除结转因素，平均每年新提供二三十亿元。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老挝、柬埔寨 5 国援助占援外总额的比例，由“四五”时期的 70% 降至 50% 以内。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卫生战线的深刻革命——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

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是卫生战线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期以来缺医少药。做好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对于巩固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是卫生革命的大方向。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有了良好的开端，但离毛主席提出的要求还很远，必须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卫生领域里，封、资、修的影响还比较普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旧的习惯势力还严重存在，有些医疗卫生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城市的医务人员要坚持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要积极支持卫生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亿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创举。我们要具体地总结经验，从各方面创造条件，促使它成长起来。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毛主席已圈阅。

现将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即认真讨论，并迅速传达到所有工矿企业的干部和群众。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要求，要切实付诸实施。特别是要抓紧解决那些至今革命和生产都还没有搞好的单位，使他们很快赶上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6月25日至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解决西藏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西藏自治区负责人任荣等6人向中央写出《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中共中央9月8日批发了西藏自治区6位负责人写给中央的报告。

其后，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9月8日批示及西藏自治区6位负责人写给中央的报告。全区组织6,000多名干部下乡，贯彻中央批示和自治区扩大会议精神。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在前进——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十年来，西藏人民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达赖叛国集团，批判了反动的“神权论”和“天命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百万翻身农奴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农牧业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做到了粮食自给，畜牧业不断发展。工业建立了二百五十多个中小型企业。新建公路纵横千里，汽车通达百分之九十七的县。文教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近二十万学生进入大、中、小各级各类学校。一个适合农牧区特点的医疗卫生网初步形成。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藏族人口不断增加。大批民族干部茁壮成长，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百万翻身农奴真正站了起来，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巩固。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西藏各族干部和群众，要继续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是彻底改变西藏面貌，建设祖国边疆的需要，是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要努力做到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国务院直属机构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疆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前进——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二十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反修防修，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

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先进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大批成长，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各种类型的厂矿企业遍布天山南北，工业产品的自给率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比自治区成立时增长一倍多。畜牧业不断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革命文艺日益繁荣。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比自治区成立时增长近五倍。遍及全区城乡的医疗卫生网已经形成。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文字改革和新文字的推广工作成绩显著。

新疆自治区各级党委要把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教育摆在首位。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对资产阶级专政，提高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自觉性。要看到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内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搞社会帝国主义，搞侵略、颠覆和分裂活动。我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要充分认清这个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本质，坚决打击一小撮投靠苏修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驻疆人民解放军和各族民兵必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务歼一切来犯之敌。

要继续加强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新疆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加强纪律性》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已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颁发全军试行。新的纪律条令，体现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反映了我军加强革命纪律的经验包括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鲜经验，清除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纪律条令，必将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巩固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的一年。

在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周恩来最后的努力，顺利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组成了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为实现新的任务打下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狠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及各项工作的发展。

以邓小平为首的右倾翻案集团，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推翻对他们执行的错误路线的批判，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下去，把右倾翻案派拉上台。

从现有材料来看，毛泽东经过半年的观察，到这年的六月，就已经判定邓小平等人在搞阴谋。经过七、八、九三个月，掌握了邓小平集团刮翻案风的大量材料。从十月份开始反击，在清华大学批判教育领域里的翻案风。

2010年3月15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 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

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我有一个总的印象，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问题集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上。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如何限制，这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还不很清楚。主席提出的问题，大家很重视，震动很大，但认识不很深刻，还要继续学习。《人民日报》搞社论，请示主席，把主席指示综合发表，让全国知道。

主席讲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我们有经验，要研究。一个是三自一包，不限制商品交换，完全听价值规律起作用，发展下去就是高薪等等，资本主义泛滥。还有一种是完全取消商品生产。这次主席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一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是限制。为什么要限制？为什么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限制？

人大开会时，住京西宾馆代表抢购东西。百货大楼，招待代表，享受资产阶级法权，这不是中央规定，北京搞的。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学生绝食。他们实行招农，社来社去，一批学生不干，一条歪理，分配在国家机关、工厂也是为人民服务，不回农村。本来和农民差别不大，但是要求资产阶级法权。党委要本届改社来社去，他们要求下届才改，问题未解决，就绝食。

送礼这种歪风，很恼火。

两派问题，总要想办法，搞下去只能对敌人有好处，不能批资，也不能提高群众觉悟。主席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不听。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次学习运动看能否解决一下。两派搞民兵互相打就糟了。

评电影《创业》有无把握，我和江青都没有看。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重要思想根源孔孟之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是，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象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对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必要的限制。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糊涂观念，甚至把某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将长期进行下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在梦想着恢复自己已经失去的天堂；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腐蚀，除了在小生产者中和仍然保持着小生产者的习惯的一部分农民中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外，党员中的一部分，工人中的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是长期的、复杂的。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复辟将仍然是随时可能的。

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

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消失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一部分富裕的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必然严重影响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必然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矛盾。如果不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斗争，集体经济就可能变质，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在农村复辟。

在我们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在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有这些因素存在，就可能滋生资本主义，也就可能滋生修正主义。因此，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还是继续扩大它，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后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伟大实践。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5.02.18；中发 [1975] 5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这个学习可以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亲自对目前实际状况做一点调查研究。同时，要领导并帮助党员和群众学好。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进经验。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主席带信，叫我也写文章。

主席说：列宁语录要补充，改为马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登《人民日报》、《红旗》，写编者按。

很少接到画三个圈的。

新资产阶级分子背后，还有老资产阶级。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他们上台，政权就会丧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是不是这样？林立果、黄、吴、叶、李、邱，都是新资产阶级分子。

电影《创业》，江青意见，群众说好，冷它一段再写。一分为二，可以写出来，好的肯定，缺点错误指出。题材是不错的，初步感到乱。党中央用飞机送《矛盾论》、《实践论》，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再想想。文化部已通知各报不写评论。听听文化部有什么反映。我和江青的批语不要讲出去。我们积累群众的反映，先把文章写起来，不急，不一定马上就用。原来江青说，报告文学很动人，要他们看，但不要搞真人真事。历史背景要推敲，一直写到党中央。再研究，不做结论。影片乱一点，为什么从解放前写起来？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如果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有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

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这里我再读一段，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

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军队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搞好军队工作，显然关系重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剖析孔丘的“仁”》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

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当前的思想情况：

(1) 等待，主要是领导干部。群众有个“急”，希望要赶快搞。等的思想有各种原因，有的自己有点怕；有的是怕乱；有的是过去由于思想、政策界限不清楚，搞了几个月运动，落实政策要花几年的时间，如一打三反。现在有点“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情绪；还有一种认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搞一阵子，运动过去了，还是老样子，与其得罪人，还不如不讲。

(2) 党内生活方面的问题。我和春桥同志的文章都讲到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党内生活、政治生活，影响好多问题。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按

党内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办事，不能按商品交换，拿原则作交易。这对党内生活是有影响的，是阻碍学习运动的。这种思想还要深入地批判一下。

(3) 学习和现行政策的关系。这一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文章已讲了点，但只是一般地讲。现在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怕一冲击资产阶级，就违反了当前的具体政策。还有的地方，思想和理论没有搞清楚，怕一搞起来，就杀鸡、杀猪、砍树。现在 83% 的猪来自个体，公养的只占 17%。这个情况不妙，搞不好，少给 10% 的猪，就要哇哇叫了，一发生没有肉吃，学习运动就搞不下去。这种关系如何讲好，处理好，道理要讲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定要破，当前政策一定要贯彻。二者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中要处理好。物质刺激也有这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讲清楚，就会发生一种是对资产阶级不敢进攻；另一种是攻偏了。这也不行。那也要影响运动，又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结果，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是得不到解决。看情况反映，有些地方自留地有扩大的趋势，把公有的地占为已有。这个问题，政策上要讲清楚。要很细致。弄不好，又要收自留地。城市里占房子，盗窃公家材料盖房子，名曰干部宿舍，实际上是私人别墅。批判资产阶级跟政策的关系，特别是基层干部，往往搞不太清楚。

(4) 安定、团结、两派的问题。目前是不敢碰。回避一下，一段时间还可以，但长久不行。云南在京开会，浙江最近好一点，也还有问题。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基层单位就更多一点。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看材料当中，每天都要反映到头脑中来的。

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我和春桥的文章都讲了，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没有一层一层地分析。没有给新资产阶级分子下定义。没有讲跟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

有几个问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1) 银行储蓄的利息，什么性质，属于那一部分？

(2) 房子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农村造房子，自己搞木料，自己所有。

城市盖房子，会不会变为生产资料剥削手段。有的干部在杭州山上盖两层楼小别墅，整天在上面从窗户看风景，这还算是共产党员？

(3) 还有协作和非法交易的界限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不要协作不行，交换渠道要研究，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不行，有缺口就有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如何搞好协作，国家、地方、单位。这个问题搞不好，就堵不住资本主义。揪了一批，还会出问题。这个问题要研究。划清政策界限，批判资本主义但协作还要搞好。除了国家计划分配外，缺口怎么办？

现在不要再搞两派了，尤其在党委内部，要尖锐而有分析地讲一下，我也没有希望一下子解决，但要让他收敛一下。

国际形势，大动荡的局面，动荡得厉害。苏美两霸争夺，重点在欧洲、地中海、中东。现在看来，美国是个破落户。它自己不承认。实际上在越南、柬埔寨它是土崩瓦解。越南地方没有打什么大仗，但阮文绍已经土崩瓦解。施莱辛格比较有头脑，他说美国衰落了，有人要试试美国的力量（指苏）。

苏修扩张得比较厉害。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如美国在五十年代那样，手伸得很长，最后群起而攻之。现在苏修利用修党到处搞欺骗。我们同日本订友好条约，现在日本要从田中访华公报后退（不称霸也反对第三国在亚洲谋取霸权），现在不写反霸权。这主要是苏修压力。这点，我们不让步。公明党竹入，社会党左派也是支持我们写反霸的（当然苏修对社会党的控制很紧）。不写就不写，友好条约推迟几年也没有关系。

苏修对葡萄牙，通过葡修搞了许多名堂。

美国对我国艺术团访问美问题搞了文章，不去就不去，没有什么了不起。台湾是我们内政问题，不允许美帝和别人插手。

尼克松境遇很潦倒。真正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是尼克松，不是基辛格，下决心的是尼克松。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传达一下主席最近的指示（我归纳的，不是原来的），有的我们要很好研究。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是要搞资本主义。我们党五十年，有十次路线错误。其中四次跟苏联没有关系，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六次跟苏联有关系。反对我们，分裂党，都失败了，党没有分裂，把他们排斥出去了。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对立统一（用英语讲对立统一这个词），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就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

（姚：主席这段话的精神，在巡视各地时都讲过。我在文章中也引用过。争论中有一个问题，到共产主义还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有的。）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主席说，我们正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有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很完全。这些话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姚：主席这段话很重要。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问题有争论。主席明确提出平等口号掩盖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这是从商品、货币交换来的。这个不平等现在还不能解决，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的国家还是保护它，写上了宪法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还要继续搞点文章，还要逐步地去做，是长时间的事，这是公开说的，不怕明确说出来，例如编语录，公布主席指示。）

关于反修防修问题。

主席说，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姚：这是主席长期反复讲的。）

有一个批示。

（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提出穷队、富队关系问题。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农村穷队、富队有差别，有种种原因，其中条件不同，土地肥沃不同，工

分值不同，一般的一元，城郊二、三元，低的四五角，说除因阶级斗争抓得不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不够之外，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提出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应根据不同情况来考虑。)

主席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也有贫户，贫队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

(农林部正派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农林部觉得很复杂，倾向于国家支持穷队的办法，实行收购价格上的这个办法困难。

这里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穷队富队、穷户富户的关系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最近上海作了调查，寄来材料，他们的结论是贫下中农生活上升最快，但生活水平中农、富农中农最高，因为他们有技术，工分高，掌握货币最多的是地富，他们不买东西，存款。有具体的统计，不知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牵涉到对待级差地租的问题。如何看，作为研究的问题。)

关于供给制问题。

主席说，我们解放初期曾保留了两年军事共产主义，党政军实行供给制，那时这些坏事比较少（指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贪污腐化）。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不要照搬外国的问题。

主席说，南北朝有一个人，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说中国话，翻译了很多佛经。问题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指南，不是教条。中国有一个人，叫严复，引了鸠摩罗什的话，称他中国名字叫什法师。严复会作翻译，翻（天演论）说的，他不说翻译，说达旨。《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此人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赫胥黎说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者，只能认识表面，不能认识本质。赫胥黎在自然科学上是唯物主义，社会科学上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还有一个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问题。

主席说，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教条主义，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我两年没有吃鸡蛋，因为苏联人说蛋黄胆固醇多，吃了血管在变硬，后来苏联又发表文章说，多吃不要紧。总之是外国的月亮好。教育、文艺、新闻、科学、医学，都有教条主义的影响。有

经验主义的人多，不懂马列，只凭一点经验办事。我历来对经验主义没有办法，慢慢来，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许可以好一些。

（姚：教条主义主要是崇洋，包括科学界，都在里面。）

最后，讲政策。

（卫生部贺诚，写信给主席，说刘少奇、林彪都打击他，他主张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刘少奇撤了他的职，邱会作也打击他。两次打击他。）

主席说：贺诚无罪，当然应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应予推倒。“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学理论 抓路线 反修防修》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年十月，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至此，三支主力红军先后结束了战略大转移，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代一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长征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材。

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高教司的信，我有不同意见。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没有针对性，那针对什么呢？难道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有针对性了？教育战线上有争论。如对过去十七年是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有不同意见；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根本路线对不对，也有争论；对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也有争论。这些在“内部情况”上都看到一些。工人进驻学校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成绩和缺点哪个是主要的？

前些时谣言很多，包括教育战线上的。前些时说朝阳经验也不太行了。这股风究竟对准谁的呢？还有说张铁生不行，刮这种风。但主席肯定过。

我们现在一方面落实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支持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有阶级性，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但这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一回事。工资会议开了好久，讨论不出结果。主席讲，工资制度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究竟怎么搞法？学大寨有些经验，穷富队问题等。工资制度，不大好写。强调政治挂帅，总是要坚持的。

论《水浒》现在提出一些问题，有的并不难回答。如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法家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反。这可以说清楚。如我们还有民主人士，我们还搞统战；但党内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投降派，就要反对，就是敌我矛盾。

军队整顿中有的有思想波动。

理论学习实际上停滞了，提法都是三项指示，但具体工作上第一项指示抓得少，第二项也注意，第三项是抓得紧的，摆在当前的实际问题。学大寨也包含有学理论。工业就少，教育战线有争论。

贰、本节简论

在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部署了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此作为统率全部工作的纲，使全部工作都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

一连发了四个文件：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开局很好。

但是，由于张春桥在三月一日总政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当前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而江青又在四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被邓小平抓住不放，从而干扰破坏了整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部署。

实际上，在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徐景贤给张春桥的信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王洪文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一旦爬上了高位，也同样追求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他在政治上也不坚定，被捕后，在法庭上承认错误、充当证人。）经过两三年的考察，证明王洪文并不是一个符合条件的接班人。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要王洪文下去工作一段时间，由邓小平取代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王洪文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参加革命造反，不能只批判别人。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2010年3月22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第一章第三节 召开四届人大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周恩来先后同李先念、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四届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

根据毛泽东一再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讨论中，将报告拟定的交通、燃化、商业三个部的机构设置又作了调整，并决定仍设立文化、教育两部，以避免国内外不必要的议论。由此，国务院系统共设置二十九个工作部门。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
会议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要点。
会后，周恩来留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5. 01. 05；
中发 [1975] 1 号

毛主席已圈阅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

- (一) 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 (二) 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十一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继续研究十届二中全会各项议程。

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毛泽东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的大字本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整理内容如无大错，我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一读。

当日，毛泽东作了两处改动：一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如上台；二是将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词中的臭字去掉。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七日批件送全体政治局委员、修补委员传阅。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
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一九七五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

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

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的新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同国内外敌人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

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

现在提出的这个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几点：

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实行革命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分别写进了修改草案。这样，就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各个阶级在我们国家的地位。

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其中特别规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妇女的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

修改草案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写上了修改草案。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参加四届人大天津代表团讨论。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会议

通过宪法修改草案。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委首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选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现公告如下：

委员长

朱德

副委员长

董必武 宋庆龄（女） 康生 刘伯承 吴德 韦国清 赛福鼎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任命总理、部长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现公告如下：

总理 周恩来

副总理 邓小平

副总理 张春桥

副总理 李先念

副总理 陈锡联

副总理 纪登奎

副总理 华国锋

副总理 陈永贵

副总理 吴桂贤（女）

副总理 王震

副总理 余秋里

副总理 谷牧

副总理 孙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李先念谈话。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主持研究四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择问题。
会议一致认为姬鹏飞担任此职较为适当。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任命姬鹏飞为常委会秘书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主持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主持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周恩来主持审定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分工问题。
会议确定：

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
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

周恩来主持并讲话：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是周恩来完成的最后一个历史任务。此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治病疗养了。

这两个会议也完成了邓小平上台的一切组织程序。他现在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实际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可是，邓小平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完全恢复过去刘邓路线那一套。等着他的必然是失败。

2010年3月29日初稿

2012年6月12日修改

第一章第四节 毛泽东关于批修正主义的指示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走，阻力会相当大。

一九七五年三月，张春桥修改的一个文稿中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马列主义的书》军队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搞好军队工作，显然关系重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迟群传达的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讲话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

邓小平加以抵制。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一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同江青谈话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姚文元送审新华社报告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

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

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并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言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

江青就某些问题作了检讨。

会后，王洪文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他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谈话

了解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周恩来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某日，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

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

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

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

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指示

红旗杂志近期已刊载署名田春的文章，故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可不下达。

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之后，同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主持。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由中央发一文件，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

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五日，周恩来起草意见稿

周恩来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

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间内有针对性的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目的讲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全国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在上述情况下，单由红旗五期发表田春一篇文章，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恐还不够，为此，同意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

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他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

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或通电。

关于经济建设问题，不能再耽误了。

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朱穆之的请示报告

洪文同志：

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导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可考虑只传达前半部份。是否有当，请予批示。

朱穆之五月七日

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王洪文、姚文元对朱穆之报告的批示

王洪文批：“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姚文元批：“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主持。

继续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事。

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周恩来同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王洪文正式通知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的全体会议，待邓小平访法回国后再择日举行。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王洪文详细询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

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八日前后，周恩来与纪登奎、苏振华表、李先念、吴德、叶剑英等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传达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五月三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四月十三日批示的问题。经过五月四、七两晚的会谈，洪文同志传达主席的指示，说红旗五期写了文章，主席的批示不要下达了。于是我们就考虑到中央是否需要再发一个文件，从正面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在中国如何实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政策问题：（这在主席二十多年来提倡和规定的政策中已有许多），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春桥同志说，如要搞文件，就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邓注）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一九五九年后批经验主

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王洪文五月二十二日批：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

张春桥五月二十二日批：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五月二十四日批：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五月二十四日批：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五月二十四日批：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给张春桥的信

春桥同志：

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还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

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张春桥五月二十七日批：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周恩来五月二十七日批：呈主席批阅。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会议
东大厅

吴德：

主席说：我的意见。有的人不信，不相信三条。九大、十大都讲反修正主义，三条。

四人帮不要搞了。照样搞。

听过三次。四月，十二月，这次。

这次又讲。又引起注意。没有向主席讲清楚，没有在行动上实际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们讨论。

对我们每一个同志责任更加重了。

邓：

三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戒政治局同志。

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很重要的问题。告戒、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连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主席问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浅。需要好好讨论。

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历史都提反修，是否改变九、十大的提法？这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到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机床厂。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话是讲清楚。水平不够，讲不清楚。

纪律，不要送材料。

就是讲错，也有帮助。体委，十八号送材料。

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二十七日的会，没过头，没有讲。

这次会，我意见不应该把什么都讲。

这次，主席主要要我们讨论三要三不要。

重复讲。江青同志提倡论联合政府，是重要的，应当学。启发我学了改造学习、整顿三风，历史问题，五七年宣传工作会议。想想我们党，如果光有正确的风气，只有井冈山，九次决议，此外，在全国统治的是教、经，都是搞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勾心斗角，老同志可以想得到的。总结党的生活，怎样才能端正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全党，是延安整风。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对王明都要作具体分析。对四中全会。建党学说，列公也没有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对宗派主义，采取正确办法。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的不是。如张国焘，陈昌浩。非常耐心，又很严肃。才产生了七大报告。打败了日本，蒋。方针，政策，一片兴旺，五湖四海。高度统一。不是小圈子，是大圈。解放后，几次路线斗争，都是修正主义，没有宗派主义。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

马列，不搞修正。搞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政治局要注意。理论、经济，三条。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党不值钱，突击发展党。我们带头做到这一点。

先念：四月二十七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份。没有越轨。

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锡联：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讲清楚。

小平讲党的历史。大党。不能少数人，要多数人。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邓小平长谈

在此前后，与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

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东大厅

沉默，沉默，又沉默。

叶：政治局讨论批示、指示。三要三不要。我的体会：

1、56 宣传会议，批修。主要危险。五号文件以后，批资。形势很好。三月一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这个问题，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帮助我们。坚持，不是那一个人。

2、团结。不要分裂。不同于庐山。我理解：文革以来，文革许多人垮下去了。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在情况变化以后，任何组织都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分裂。

3、请示报告，严守纪律。

几乎重大的问题，

基，批，完全对的。

十一次路线，事先未请示。

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个人，组织，纪律。

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引起严重注意。

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

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背叛。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洪文：

开了三次。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1、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2，四人帮。前年十一月会议。七人小组。分组讨论。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李德生材料。其他事情也议过。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3、抓大事。并不是都没抓。政治局学习，没有提出办法。国际问题，也有该研究没有研究。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直到看到修、经验是主要的？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我揽起来，因为事情经过我的手。

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

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二十七日会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有两个保留：

(1) 形势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是好的。

(2) 十一月会议。“十一次路线”。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十一月会议。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

二十七日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

他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日晚，周恩来同邓小平以及王海蓉、唐闻生长谈

此前，还多次与王、唐谈话。

周恩来、邓小平要王、唐将江青、王洪文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六月某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

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小平：总参谋长。

毛泽东：就是这样。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
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

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周恩来对江青检讨的批示
欢迎这一检讨。

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

建议将江青的检讨信送主席批阅。

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一九七五年六月，毛泽东的一些谈话

（彭德怀的“万言书”，刘少奇的假四清、二月提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到最近“放下鞭、落下帆”、“射人不射马，斩尾不革头”都是同一货色，它们不断的变换手法，用一个倾向掩盖着一个倾向，接过革命口号，拉起革命大旗，用合法的手段施阴谋、放暗箭。一方面高喊团结，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叛党叛国，投降社会帝国主义。我们过去说有些干部“一打就倒，一轰就跑”现在慢慢我们才发现他们是怂恿人来打，鼓吹人来轰，一打一轰，把一个个炮口最后轰上中央，轰上主席。

从四届人大以来这局势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一小撮自命为共产党员的人，竟然暗中鼓吹两个议会制，党派轮流执政论，甚至于提出司法、立法、行政相立

又相持，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离开政治路线独立存在的观点。这种步步向党篡夺权力的阴谋和右派反动谬论不能得逞后，便迫不及待利用“反修正主义思潮，反封建主义意识，反资本主义倾向，批倒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把矛头对下不对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提出“在政看廉洁，在党讲纯洁”、“不问根源，不看罪行大小”。钦差大臣满天下，包青天到处是，三句话没说就拿起中央这个上方宝剑革人家的命，却偏革不了自己的命。在中央弄一弄，在地方搞一搞，搞了什么名堂？真正修正主义根子还是没有拔掉。相反地损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人人自危，革命、生产抓不起来，这一小撮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六月份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

并坚决指示各省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

在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主席一再指示：“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

（来源：《汪东兴在广州的讲话（1975年9月2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贰、本节简论

在一九七五年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中，冒出了一个“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问题。

问题的由来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总政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他说：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说“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中说：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中说：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迟群传达的江青的电话指示，江青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江青在会上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加以抵制。

毛泽东第一次干预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姚文元送审新华社报告，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

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

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仅如此，他们还抓住这个机会，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言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问题，提出尖锐质问。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毛泽东指示的范围。

会后，王洪文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他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毛泽东第二次干预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他说：

春桥那篇文章，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人多，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

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的讲话明确指出了三点：第一，反经验主义是对的，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是不对的。所以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要作自我批评。第二，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以后慢慢解决。第三，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不能看作是翻案会议。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传达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提出两个问题：

一，洪文同志传达主席的指示，说红旗五期写了文章，主席的批示不要下达了。于是我们就考虑到中央是否需要再发一个文件，从正面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在中国如何实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政策问题：（这在主席二十多年来提倡和规定的政策中已有许多），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春桥同志说，如要搞文件，就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

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邓注）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批评江青等人的会议

邓小平说：

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

三件事：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机床厂。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李先念说：四月二十七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份。没有越轨。

陈锡联说：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讲清楚。

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叶剑英说：

十一次路线，事先未请示。

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

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

王洪文说：

1、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2，四人帮。前年十一月会议。七人小组。分组讨论。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李德生材料。其他事情也议过。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3、抓大事。并不是都没抓。政治局学习，没有提出办法。国际问题，也有该研究没有研究。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直到看到修、经验是主要的？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我揽起来，因为事情经过我的手。

另外。二十七日会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有两个保留：

(1) 形势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十一月会议。“十一次路线”。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十一月会议。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四、毛泽东的结论

一九七五年六月某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毛泽东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这里，毛泽东说了三层意思：

第一层：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从表层说，是指政治局会议，批评江、张、王，把他们的问题摆开了；从深层说，也是指政治局会议，各方面的人物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是把问题摆开了。

第二层：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从表层说，是指江、张、姚、王现在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不行了；从深层说，也指过去他们反刘、林有功劳，现在反周、邓、叶，就不行了，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了。

第三层：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从表层说明，是指在政治局内部，拥护江、张、姚、王的人少了，拥护邓、叶、李、陈的人多了；从深层说，也指支持左派的人少了，支持右派的人多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从表层看，是对邓小平的支持；从深层看，是对政治局内部客观政治形势的深刻分析。

五、毛泽东发现了许多怪现象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汪东兴说（这个材料尚待证实）六月份，毛泽东已经发现了许多新问题。

毛泽东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并不是针对王张江姚这些人说的。

2010 年 4 月 5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一章第五节 《红都女皇》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香港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红都女皇》。这本书在香港影响不大，在内地却引起轰动。

据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说：

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为她树碑立传。

据知情人说，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对江青狂妄自大、到处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极，这次又让人抓住把柄，告上门来，内心的恼火和尴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的动了和江青分手的念头。

当然，毛泽东知道这并不现实，和江青离婚在政治上的影响太大，况且江青还是他手中对付党内外复辟势力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对付邓小平的时候，更是不能自乱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在政治上玩弄“阳谋”的毛决定顺势行棋，拿朱德的告状信做点文章，摆出一副要和江青决裂的架势，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为此，毛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然而，毛泽东导演的这出离婚戏并没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这样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人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所谓“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如果不是虚晃一枪的话，也是毛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否则，一旦毛回心转意，事情就只好收场了。

在后来扭转政局以后，毛泽东还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会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收工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另据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

《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

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一条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一九九二年，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内幕’。”

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情况。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二〇〇五年，《文史博览》第12期刊载了张颖的一篇文章：《红都女皇》真相。

文章说，我看到这篇文字（一九九二年，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 20 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编造谎言，真是荒唐至极。

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 1975 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在北京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 1972 年 8 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 1975 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

文章说，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她于 1972 年夏季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先后长达 60 多个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于 1977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

文章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贰、本节简论

关于《红都女皇》事件，到目前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有人认为，《红都女皇》这本书确实存在，极力吹捧江青。

有人认为，《红都女皇》这本书根本就不存在。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人们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

有人认为，《红都女皇》事件是文革中江青的反对派，故意制造出来打击江青的案件。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许多有关“文革”的史书都没有记载 1975 年的“《红都女皇》事件”。

在《毛泽东传》、《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第 13 册中根本没有收录这一“批示”。

在《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也没有提及此事。但是，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嘱秘书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出送阅。

有几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接见过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

第二，一九七五年某月，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这本书的某些内容与江青和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一致。

第三，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红都女皇》的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

至于毛泽东的批示是否存在，就只能存疑了。

编者倾向于存在过。理由是：

第一，张颖是外交部的一个司长级干部，她听说过有这个批示，这就不是一般的所谓谣言了。

第二，高文谦是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室务委员，《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范硕是《叶剑英传》的作者，他记载了此事，不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毛泽东的批示为什么后来没有落实？因为不久这个批示被毛泽东本人撤销了。事情很明显：《红都女皇》不是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写的，也不是江青指使什么人写的，与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二〇〇五年，张颖发表这样的声明：“维特克的这本书（指《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这主要是针对一九九二年，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刊登的那一篇文章来说的。

那篇文章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内幕”，是没有根据的。周恩来决不是那种搞阴谋诡计的下三流政客，而是堂堂正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红都女皇》事件不是一个政治谣言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有人窃取了江青和美国历史学家洛克珊·维特克的谈话录音资料，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以此来打击左派领导人。

这样的政治阴谋活动，在当时虽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它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也就不能公开记录入任何官方的正式文献。

2010年4月12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第一章第六节 评水浒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谈《水浒》

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浒》发表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姚文元呈送毛泽东的报告

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为执行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情：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报告。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上鲁迅评论的工作。

3，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一个规划。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459-460 页）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
1975.08.14；中央文件 [1975] 196 号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评《水浒》等问题

主席对《水浒》全书评论是这一次。

主席对出《水浒》，不满意 71 回本，把投降的东西掩盖了，金圣叹砍的。百回本除线装之外未出。

主席指示传达后，出版局震动，要他们从积极方面领会。

宋江搞修正主义过去没有提过。宋江擗晁盖于 108 人之外，所有文章都未提到过。

主席文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亲自改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姚文元报告的批示

姚文元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459-460 页）

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

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之地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

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水浒》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宣扬了投降主义路线，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请读《水浒》，请看《水浒》中的宋江。

投降主义路线

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一九七五年八月某日，晚上，王海容、唐闻生拜访乔冠华、章含之

王、唐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

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

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

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

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

关于春桥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

章含之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乔、章说：你们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汪东兴在广州的讲话

从四届人大以来这局势的变化看得很清楚，一小撮自命为共产党员的人，竟然暗中鼓吹两个议会制，党派轮流执政论，甚至于提出司法、立法、行政相立又相持，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离开政治路线独立存在的观点。这种步步向党篡夺权力的阴谋和右派反动谬论不能得逞后，便迫不及待利用“反修正主义思潮，反封建主义意识，反资本主义倾向，批倒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把矛头对下不对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提出“在政看廉洁，在党讲纯洁”、“不问根源，不看罪行大小”，它们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一小撮阶级的镇压和对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对犯有不同的程度缺点错误，而又不是坚持不改的教育。钦差大臣满天下，包青天到处是，三句话没说就拿起中央这个上方宝剑革人家的命，却偏革不了自己的命。在中央弄一弄，在地方搞一搞，搞了什么名堂？真正修正主义根子还是没有拔掉。相反地损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人人自危，革命、生产抓不起来，这一小撮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很明显，它们正在利用广大革命群众对修正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憎恶，打着反修防修的旗号，把地方上一些犯有严重错误，以致个别蜕化变质分子的问题，扩大为党内整个已受资产阶级分子腐蚀的问题，并提出“严重的问题不在被腐蚀的程度和贪污的个别罪行，而在于这是普遍性的存在。党的任务应该是毫不留情的清洗，事情的大和小，上和下的关系，应该不时去重视。性质是一样，在于处理要坚决”的论调，混淆视听，藉此又拉又打，把广大群众和干部对错误领导的善意批评和斗争，引向邪路上去反党和党中央。他们阴谋利用资产阶

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挑动事端，制造分裂，破坏生产，利用“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制造混乱，孤立中央一些坚持正确原则路线的同志，实际这样做，并不是打击一小撮，而是保护一小撮。

要理论联系实际，用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对照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抓住几个关键性东西，进行深入批判。宋江的问题主要有几点：

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出卖农民起义，在革命起义节节胜利时，暴露他的地主阶级的本性，变节投降，卖官求荣，无耻屈膝甘当奴才。看周围，往上追，追这种人今天有没有。

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性质要弄清，进一步看看十次路线斗争，是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他们之间有斗争，这性质又是什么？全国最近刮起一股翻案风，这是什么风向？不就是打倒刘少奇，“大为地方主义喊冤，打倒林彪又为刘少奇一夥叫屈”，把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派别斗争，说成是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事有没有呢？全国有，广东也有，广州也有。

擢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这事刚才谈过了，的确如主席说的有人搞鬼，不要大团结，搞小集团，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封官许愿，招降纳叛，阴谋阳谋一起来，他们架空“谁”，宋江的衣钵，共产党里头也有人接班，这不是很奇怪吗？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里头这样搞的大有人在，表现不反修不革自己的命，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他们对地、富、反、坏、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施仁慈，但对我们广大群众干部，对党内正直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同志却恨之入骨，竭力排斥打击，造谣中伤，残酷斗争，无情围攻，何其毒也！这那里是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维护修正主义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要同这一切做斗争，对照、批判、深挖，要打活老虎，别死抓死老虎，要稳、要准、要狠、阶级斗争就讲雷厉风行。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的批示

姚文元送审人民日报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拟发一短社论，引用主席一段评语，现送上，请审批。

毛泽东批示：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459-460 页）

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云。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限制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

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者就是投降主义者。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

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录音组同志的讲话

今天和同志们讲一点事情，我们党内的斗争总是曲曲折折的。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张永枚就听了五条谣言嘛！

为什么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

“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

张永枚说：“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后。”

江青说：“他们攻击我，就是攻击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的批语

改一改，

不要蹲点。

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

特别在北京，

我在北京没有去个（过）任何一个地方，

说话不要冲口而出。

不要管，

要顾大局，

不要打电话，

不要来看我，
有事写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池恒的文章《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

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作用，在正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开展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评论，可以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的重要性。通过评论《水浒》，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看一看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何破坏革命斗争、瓦解起义队伍、葬送革命事业，总结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很有教益。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对革命事业是最危险的东西。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者，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的。评论《水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斗争中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中央转发的过程来看，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有人说：毛泽东发表的仅仅是一则文学评论，是姚文元把它搞成一个政治号召。

不错，毛泽东是说的《水浒》这本小说。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正如毛泽东发出的关于学习问题的指示一样：列宁为什么说对资

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姚文元说：“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同意了、肯定了他的这种说法。

邓小平当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矛头指向。只是他此时需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不让跟着他走的人产生恐慌情绪而落荒逃跑。

周恩来虽然在重病中，听到毛泽东有关水浒问题的指示后，仍然要身边的人给他找来的关的资料，并听取各方面的反映。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这说明，周恩来并没有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仅仅看作是文学评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康生也开始政治上的“转向”，三番五次地向周恩来、邓小平，经过王海蓉等向毛泽东提出江青、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联系到前一节提到的《红都女皇》事件，说明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汪东兴五七年九月在广州的讲话，如果是真的，也多少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

2010年4月19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第一章第七节 落实文艺政策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王洪文江青对文化部电影局有关人员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的成长，我所走的革命道路就受过二个大的反面教员的教育，我童年时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我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起就抵制封建主义。

我就受了封建主义和洋鬼子二个反面教员的教育。我高小时是学英文的，不肯学，说是洋奴化，但总要打 60 分，不然毕不了业，后来才懂了是工具，想补起来也晚了，也穷了，没有钱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帝国主义这个反面教员对我教育很大，我怕当亡国奴，奔走呼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才入党。这二个反面教员，促使我走向革命。我也是属于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青年，我十五岁就被争夺，我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我学第一本马列的书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怕出问题，学习了六次，烧了六次，似懂非懂，懂了我就用，我当时就只懂得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人民的。“九·一八”后，民族爱国运动高涨，有人说学生运动是捣乱，我想不通，躲到树林里气得哭，我说不出道理，也没有人向我解释。

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不好的东西，程度不同，我在内，都有公与私的问题。公与私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私也就没有公。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青团员，一个爱国者，公在前还是私在前，我看应该是公字在前。光明面和阴暗面也是对立的统一，把祖国看成光明面大还是阴暗面大，这是原则问题，应该说是光明面大。对自己是光明面大还是阴暗面大，也要恰如其分，要经常解剖自己。

我昨天对工人谈了，解剖了自己，我这个人有私，私字有时作怪，私字当头就不那么纯了，但从我总的历史来看我基本是公字当头的。今年三个月来感冒五次，连搞几天几夜，我狠命工作，当然这样做也不对，我作为主席身边的卒子对身体应该保护使用，为革命多干几年，不应该躺下去。

资产阶级是为发财致富，成名成家，那么刻苦，我们为了革命，不要把自己当成商品，不要吃工农兵的，穿工农兵的，住工农兵的，不为工农兵服务。要学语录，一条一条学。学春桥、文元文章，春桥文章重点讲所有制，引用了毛主席在一中全会讲话，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另外，我们党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是经验主义，不学理论用什么指导？过去延安整风时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泽东对文艺政策的批评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导演张天民来信的批语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

《创业》讨论时，我说不作结论，现在照主席意见办。

什么叫调整党内文艺政策，（创业精神可以说）调整文艺政策就是逐步扩大文艺节目，活跃起来，对作家的政策。

暴露等不讲。

《海霞》可以去看看。

主席指示不只暂时，是长期的。估计到曲折性，你们先议议看，什么想法，估计会出现什么问题，可以讨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李春光贴出攻击江青等人的大字报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大字报，攻击江青等人扼杀《创业》，抵制毛泽东的指示，长期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1976年6月，李春光被隔离审查。）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388页）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江青谈影片《简爱》

《简爱》这部电影，内容是很反动的，这部小说在英国文学史的地位也不高。

但是，这部电影在制作上是严谨、细致的。从改编剧本看，除了后边简爱出走那一段有某些多余以外，其它都还是可以有所借鉴的，因为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一部一小时半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事。

导演不错，细致、严谨，给演员以充分的表演过程和作戏的机会。因此画面上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是不错的，它的画面也不乱蹦乱跳，对话比较少。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江青对墨西哥影片《在那些年代里》的补充意见

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文化部有关《人民文学》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召集文化部领导人谈话，就《人民文学》复刊一事指示：“要夺权，不要原来的班子。”

九月六日，文化部“创办《人民文学》”的报告送交政治局。

九月八日，张春桥批示：“拟原则同意”。

九月八日，邓小平批示：我赞成。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江青对北影长影等单位电影创作人员的谈话

主席说，文艺评论太少。我们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基本好，基本坏，把握住这两个大概念，这样才能繁荣文艺创作。我们不要怕评论，也不要怕人家骂。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光讲好的一面，要通过评论了解缺点和不足。在文艺评论上，主席为我们作了典范。比如最近评《水浒》，批宋江。当然这不单是文艺批评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斗争。主席对《创业》的批示，给了你们很大的鼓舞。我找你们来，也是鼓励，也是帮助。

“三突出原则”不是我提的。这一点，文化部几位同志清楚。我只讲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对立面也要写好，不能写弱了，写弱了对主要英雄人物衬托不起来，影响塑造英雄典型。

电影创作要搞民主集中制，不搞导演中心制。一个创作班子，就象下棋，有卒子，有老师，导演不懂这个不行。我们搞戏有这样的经验，既听群众的，也听专家的，不同的和反对的意见都要听。然后把好的意见留下，不好的意见排除，有些不好不坏的，可以暂时放一放。这样最后集中了，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经过充分民主以后，到了摄影棚，要听导演的。

在座谈会上，江青还谈到，她一直考虑，我们有许多新的斗争生活和革命历史应当反映，而且要反映好。并提出了几项创作任务，作了一下安排。

一、江青看了《山花》一些样片，认为有的还不错。要重拍。拍宽窄银幕两条。剧本由原作者孙谦、马烽同志提出修改方案，报文化部。文化部也要提出意见，再上报。

二、要拍个新《创业》，反映石油工人斗争生活的题材。这次搞宽窄银幕两条。剧本由张天民、孙谦两位同志和大庆创作组来写。孙谦同志完成《山花》剧本以后，投入这项工作。

三、创作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题材的故事片。张永枚同志把《八一的枪声》的文学剧本定稿，马烽同志把《山花》剧本完成后，投入这一创作。导演由崔嵬同志担任。

四、创作反映井冈山斗争题材的故事影片。王树元同志尽快完成《杜鹃山》话剧本，浩然同志完成《金光大道》小说后，投入这一创作。导演由成荫同志担任。

五、创作反映《四渡赤水》题材的故事影片。搞长征、井冈山题材的同志，也要收集《四渡赤水》的素材。另外物色编剧和导演。

江青在提出以上创作任务时，指示创作组，作好准备工作，先下去生活，回来看历史资料。同时，要带上几个有苗头的青年编剧，例如《车轮滚滚》的作者×××同志。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文艺战线继续落实、调整政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由于文化部长是于会泳，文化部由副总理张春桥分管，邓小平搞的“全面整顿”在这个战线影响不大。当然，社会上散布的各种谣言，也起到不小的干扰作用。

2010 年 4 月 2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一章第八节 农业学大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江青写给全国农业专业工作会议代表的一封信要反对那种革命生产相冲突时，“民以食为先”，抓革命应松一松；一遇灾情，农业生产跟不上时，运动先放一放的思想 and 作法。

大寨的经验是全国农业战线二十几年来与天斗、地斗、人斗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它在大寨生根发芽而在全中国开花结果；学不学大寨，走不走大寨路，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是坚持不坚持走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斗争问题。

我们不希望农业上的难题，造成苏俄变修的历史，在我国重演，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不是没有，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未尝不在身边，“让贤”就是“让权”，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什么争权夺利，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不要让利用农业作为战场，挑起对抗情绪的人耍手段、讨价还价；否则革命就要推迟几十年或一百年，损失更大。

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的讲话

现在各个方面都有个整顿问题。问题相当多，不是少，领导干部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半年来我讲的中心就是讲个敢字当头。不要怕，错了就改，要横下一条心，拚老命。

要敢于反资产阶级派性，××省如果不把×××抓起来，安定得了吗？××市如果不把×××抓起来，安定得了吗？××省的老窝子是×××，×××把×××抓起来，生产就上去了。××部，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讲不管你是六十岁、五十岁、四十岁的，老的，新的都得摸。摸一下，面貌就改变了嘛！

反对派性，你们决心下得好，要放手发动群众。

领导班子里硬是要下决心把派性搞干净。你们那里的领导班子由你们自己调整，硬是要把派性搞干净。无论如何要选择一些好的地、县委书记到省委来。

你们下决心把××的材料收集收集，回去商量一下，这个人不能当常委，他不能到丰矿去蹲点，只能搞个小矿蹲蹲，到一个小工厂去或者到一个农村去。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国内，二十五年来，尽管有几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总的是循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

过去斯大林的时候，后来赫鲁晓夫的时候，吹的很凶，本来不是第一，本来落后，要吹第一。

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学大寨提出一个问题，现在跑大寨的人不晓得有多少万罗？是跑来看风景，游山玩水，还是真正来取点经？或者中间状态，坐一次火车，逛一点地方，也取点经。

我们现在全国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你们都看了中央发的十八号文件，军队要整顿，是毛主席指示的。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是讲的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就是两条。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两个纲。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就是好多方面嘛。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现在农村有的省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垮台，有的县就百分之二十，有多有少。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是存在一定危险，这是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流毒在农村中还未彻底铲除。据说在某些地方的生产队还存在着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政策，这真是咄咄怪事！据江西同志的汇报，该省某些县份对于中央的农业政策不甚了解，对中央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的五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有所怀疑，产生这种保守作风也是阻碍农业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另外，有些同志反映中央，对于发展农业经济，依靠农业银行是否行得通？我在这里再告诉同志们，一切发展农业生产，都必须遵照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教导，不要靠农业贷款去搞生产发展。

目前，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所受到的普遍困难是多方面的：资本主义在农村十分活跃。有些地区的基层党委，对于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还存在着不重视、不努力发动群众，甚至消极抵抗。某些地区的领导还掌握在一些坏人手里。一部份同志还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热情。阶级敌人在阴沟里兴风作浪。农民还存在严重的小农经济思想，以上所讲的几项，今后在农业整风运动中必须批判和改正。

在来山西前，主席曾希望我转达他的意思：“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的伟大目标，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奋斗，期望在一九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

在发动人民群众学大寨，必须发动全民性的群众整风运动，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批斗资修主义中所激发出来的共产主义热情，引导到农业生产中去。

文化大革命后这几年中，我们的干部和党内的某些领导同志，又忘记了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已经反映到我们党内，昔阳经验证明，党内必须随时整风整党，及时把坏人及他们的代理人清除出去，确保党内的纯洁，对于那些没有革命热情的老好人，要耐心教育，对那些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必须坚决支持。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是群众运动，应该把过去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抓回，不要让资本主义歪风继续生长，城市中的劳动部门也要把过去收容的农村流散劳动力送回农村，农村中历年来存在的多分少留的经济分红政策，必须立即纠正，如果是党员带头领导分光吃净，应给以党纪处分，过去的农业生产六十条政策所规定的某些政策，主席说有修改的必要，不过还要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主席说时机成熟会在短期内订出几项新规定。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

1975.09.16；中发 [1975] 20 号

毛主席已圈阅。

“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这是毛主席批准的现阶段发展养猪业的正确方针，不能改变。

要在搞好养猪业的同时，抓好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饲养业。

对生猪实行统一收购和派购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它有利于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强城乡经济结合，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猪牛羊禽蛋等食品，要统一经营，统一调拨，统一核算。要树立整体观念，本着先上调、出口，后当地销售的原则，安排和完成购销调拨计划。要坚决纠正乱搞“协作”等不正之风。

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坚决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要充实市场管理机构，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他们的工作。严禁商贩和屠工经营肉食。绝对不准机关、厂矿、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到农村和集市采购肉食禽蛋等农副产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检查管理。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应严肃处理。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周长庚对社队企业的建议和毛泽东批示及两个附件

九月九日，浙江省永康县银行干部周长庚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信，信中反映，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有关规定未作修改，中央未明确由哪个部门主管社队企业，致使一些基层单位的党政干部对社队企业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社队企业处境困难。有的社队企业自流发展，有的社队企业走了弯路。有一些部门对办得好的社队企业千方百计要改变其体制，收归自己管辖，如企业不同意就不分配原料，不安排产品销路等等。来信“恳请党中央对这方面作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湖南等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

随信还附上了《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的抄件和 1974 年 12 月 15 日《河南日报》以《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的关于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将周长庚的信转给邓小平，并批示说，“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即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用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信印发全国参照执行。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过渡问题，中央找了十一、二个省委书记，议农业上重大问题，所有制过渡。富穷队，积累，工分制，造房，领导班子，最重要的问题是向大队过渡。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集中力量准备几年，比如五年、三年，整顿领导班子，穷队赶上去，然后较快向大队过渡，缩小差别；第二种，分期分批，成熟一批搞一批。争论对前一种，是否几年之内条件都能成熟（如农机化），对一后种，分批，拖长了怕引起波动，影响生产，杀猪杀羊。两种意见还在讨论。争论中，说穷队之所以穷，是领导班子不强，资本主义倾向大，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差别和合作化时期相比怎样？现在议，债务多怎么办？多年欠国家的，如何办？富了如何继续革命，穷了如何艰苦奋斗。主席也讲。这个问题可以写文章。

五年实现机械化问题，信心不足，人民日报社论未出，意见不统一。

实现农机化之后，仍有政治挂帅问题，否则农业还是上不去。苏修农机那么多，农业仍然一塌糊涂，先买一千万吨粮食，还要长期保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勾心斗角，有个机械化实现之后，坚持政治挂帅问题。农机如何适用？信心怎样？

主席要中央的同志多去学大寨会议，很重视，现在又找部分省委负责同志议论重大政策问题。今后要认真搞。

这五年、十年是农村发展的最关键时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搞社会主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一、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

普及大寨县，就是要使全国每个县都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安定团结，万众一心地大干社会主义，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使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

使农业现代化更有力地带动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大加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备战备荒的物质基础。

运动发展还很不平衡。全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县，学大寨还没有迈开大步，有些县根本没有上路。在少数地方的农村中。阶级敌人还很猖狂，资本主义活动还相当严重。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二、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

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大寨县目前的标准是：（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象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我们的县委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很多，性质严重，甚至坏人掌权的，是极少数。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县委领导班子还存在着“软、散、懒”的情况。一部分同志还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些实际上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

三、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省、地，县委都必须认真抓好这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地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地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由于社会主义农

业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绝大多数农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大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因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会继续产生。在城市是如此，在农村也是如此。在农民中，小生产的传统影响还存在，一部分富裕中农还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是长期的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问题。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同时要根据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各项问题。比如，收回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组织起来；把社员超过党的政策规定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收归集体；纠正分配中的不留积累、分光吃净等错误倾向。总之，必须不断地努力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批判资本主义，斗争的锋芒要对准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给予坚决打击，并且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员，教育干部群众。

对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一定要按照政策严肃处理，在经济上要他们退赔，决不能允许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逍遥法外。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凡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地方，党内往往有他们的代理人和保护伞。必须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进行整党整风。要认真整顿基层党组织和社队领导班子，使之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要学习昔阳县的经验，以思想教育为主，下硬工夫，对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进行整顿。对一部分社队中，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的问题，要有区别地认真加以解决。在整顿中，要支持好的和比较好的社队干部，使他们大胆工作，并在工作中给以帮助。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热情地进行教育，既不要姑息迁就，也不要简单撤换。要使基层干部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他们熟悉情况，对工作做出长远打算，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好。

在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应该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进行。省、地、县都要派大批干部下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对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社队，县委领导要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解决领导权问题。

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

建设大寨县，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要建设大寨县，达到高产稳产，就要全面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大搞科学种田。

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人民公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正促进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同时，应该看到，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在更远的将来，人民公社还要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再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因此，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经济，目前虽然还相当幼小，但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五、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到一九八〇年，要求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其他的县也都要建成更多的大寨式的大队和公社。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通知

1975. 10. 19；中发 [1975] 21 号

毛主席已圈阅。

现将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发给你们，望认真传达贯彻执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普及大寨县》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发出的伟大号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不仅大寨式的社队遍及全国，而且涌现出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农村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农业生产连续多年丰收，粮、棉亩产跨《纲要》的省、市、县不断增加，南粮北调的局面开始扭转。我国粮食和大部分农副产品基本上保证了国需民用，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广大农村欣欣向荣，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前程似锦。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在广大的农村和农业部门，基本上坚持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邓小平搞的“全面整顿”，在这里影响不大。

2010年5月3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第一章第九节 落实各类人员政策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包括〕？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老九不能走。

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同年三月八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写给中央《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消。”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

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周恩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专案组提出《关于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情况的报告》。

同年五月五日 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三月八日《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四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的两条批语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章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毛泽东对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问题的批示

六月六日，政治局决定：六月九日为贺龙逝世六周年举行纪念会。

六月七日，贺捷生致信毛泽东：六日接到中央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等。这样做不符合一九七四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故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同日，贺捷生写信给周恩来：如果照原来方案，将不参加这一仪式。

七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今年六月九日为贺龙同志开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事，我也知道，后因我三月开刀治疗，未再过问。此事系六月六日政治局决定，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九日，毛泽东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

九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出席并代表中央致悼词：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关于原林办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
中央：

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请讨论决定。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

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

中央：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附林默涵来信。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对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的批语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叛变自首问题的案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1975. 12. 13;中发[1975]25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发给你们，可口头传达到党员和群众。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继续落实各类人员的政策，是毛泽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抓得很紧。

2010 年 5 月 10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二章第一节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以三项指示为纲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

上次(指一九七五年三月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邓小平在中央首长接见中央读书班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第一句话是照毛主席三句话办事。这是这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一句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句话是团结安定为好。第三句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句话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不但要学理论，反修防修，而且要照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八年了”。现在是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好多事情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办，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工作要搞上去。仗总是要打的。晓得哪一天打呢？可能争取五年时间，不能说死，要是两三年打起来怎么办呢？也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能争取到五年更好。总之三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第一句话。

一九七五年九月，胡乔木说：“我已组织政研室的同志写一篇‘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这篇文章拟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如《人民日报》不发表，拟经邓小平同意后交《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

(1976年2月18日×××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授意胡乔木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组织人写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胡乔木说，这是很重要的文章，邓小平很赞成写，一定要写好。邓小平说，只要写成功……就可以作为《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

(1976年3月×××同志的揭发)

胡乔木说，我之所以要写评《水浒》的文章，是由于我不同意说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还有宋江，有些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影射邓小平，我不赞成这种说法。

胡还说，我提出要写“以三项指示为纲”和评《水浒》两篇文章，曾向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报告过，他说很好，如果写得好，可送他，还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胡还说，《水浒》的文章写了二稿，正在这时，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开始受到批判。他说“文章写好后直接呈送主席，不要送给我。”在这种情况下，写评《水浒》文章的工作，就不了了之。

(1976年2月×××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传达的

二、关于当前工作的总纲问题：

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还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强调还是按照现在的搞法，学习理论，全党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总的形势是要安定团结。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三、关于各行各业整顿的问题：

关于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是同意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又是领导班子问题。现在各方面都有个整顿的问题。问题相当多，不是少。主席七一年就谈过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整军。最近请示主席，

还有农业、工业以及其他方面，比如文艺两百万方针等也都要整顿。主席说文艺政策要调整，我们理解也是要整顿。总之，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都有个整顿问题。核心是党的整顿。党整顿好，干部政策端正了，有一个好的党来带头，其它就好办。特别强调应该多花一点时间考虑整顿问题。

现在还有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的问题，这些都要一个一个来解决。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讲话摘录

(×××传达)

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象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是哪来的。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研究工、青、妇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工会抓什么阶级斗争？工会抓阶级斗争，要党委干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工会还是抓一下工人的福利嘛。

有人问：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会为什么还没有开？

邓小平说：“这个班子不行，不认识，不了解，权被夺了。”

(×××同志揭发)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节录)》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的阶级基础，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从小生产者中、工人一部分中，干部一部分中、党员一部分中蜕变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内外勾结，贪污

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受到破坏，甚至使那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把这些阶级敌人斗垮，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在那里，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只是一句空话。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把这个主要矛盾撇在一边。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他们应该懂得，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把敌人当同志，把同志当敌人。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还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戴上“不革命”的帽子；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他们公然反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大搞形而上学，对自己全盘肯定，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全盘否定，一意

压倒，谁要是不赞成，就说谁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他们这种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一派霸权。这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 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三项指示为纲’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

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看了这几段语录，似乎无须说更多的话了。

邓小平授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的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可以算作是一篇奇文。它的前三部分分别论述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错误观点。然后，把矛头一转指向革命左派，把他们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第四部分，不加论述地引用了邓小平关于“三项指示为纲”和“全面整顿”的话。

下面摘录两篇当时发表的文章供参考。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

《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

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翻案复辟的自供状——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这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从头到尾打着“批林”、“反左”的旗号，攻击文化大革命。林彪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什么“极左”的路线，并且耸人听闻地提出，必须“彻底肃清”所谓“左”的“流毒”，“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些人由于一贯站在极右的立场上，整个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极左”。他们所谓的“反左”，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们“批林”是假，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

他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章更是集中攻击文化大革命“把党的好干部”“打下台”。

论“总纲”的文章秉承他的旨意，诬蔑群众容易盲从，乱反一气，上了“极‘左’词句”的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授意炮制这篇文章的同时，散布了这样一种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寥寥数语，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冤仇，一腔恼恨，流露得淋漓尽致。

他授意炮制的文章宣称：“必须以这三项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试问，你们现在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这岂不是说，党的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都不算数了吗？

论“总纲”的文章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而“重点”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他们疯狂叫嚷，要打倒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他们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有其反动的特定含义，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2010年5月24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二章第二节 整顿工业交通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至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邓小平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这次确定，铁路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与地方闹派性的人是相联系的，他们懂得抓薄弱环节，把铁路一堵就到北京了。你那个××市，铁路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要把铁路这条线同地方切断，把铁路上里通外线的割断。根据中央决定，铁道部有这个权。地方解决不了的，铁道部解决，调开那里，同样还在铁路，到哪里都工作嘛。这个话要讲清楚，以后就这么办。向全体职工动员时，也这样讲。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他又钻出个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

闹得厉害的人，两派的头头都要调离。××八个书记，有的不干事，有的可调省冶金局当顾问，当顾问去嘛，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快到二十年了，就没有人？没有从别的地方调。总之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社会主义等他怎么行呢？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充

分发动群众，并组织当地驻军、公安机关和路社联防组织，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保障运输安全畅通。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陶琦在交通部的讲话

前几天部里研究长江问题时，算了一笔大帐。近十年来，国家投资，人员成倍增加，但产量、吨位增长幅度小，吨·公里下降。对天津港和新港船厂作了分析，虽然产量有所上升，但与人员，设备增加数相比，也是慢的。……搞得不好，就叫鼓足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万里在铁道部的讲话

“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思想搞乱了，组织搞乱了，阶级队伍搞乱了，企业管理也搞乱了。”

“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比过去低了百分之几，低了一倍，很差劲，不象话。这一点不就表现了今不如昔吗？”

“明年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还达不到过去二十几年曾经创造过的最高水平，就太丢人了。”

“生产搞不上去，搞什么共产主义？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党委书记不抓技术教育，不抓技术培训，这个党委书记就不合格。现代化的企业，党委书记不敢抓技术教育，还算什么正确路线？……政治干部不懂业务不能做干部。”

“吉林局，《红旗》杂志上登了他们的文章，我在核心小组里讲：你看基层比我学得好。我派人下去看了，不是那么回事，是假的。你那个班子乱糟糟的，是吹牛。……大家做点实际工作，不要吹牛，要老老实实，写到做到。今后登报纸，我派人下去核实。”

“你看病为什么专门去找高级医生看病，不去请赤脚医生？我万里就是找名医到家里来看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万里向国务院汇报时的插话、

邓小平在万里向国务院汇报××铁路局情况时的插话（摘录）

（当万里同志讲到）××市委检讨很深刻，他们说，向被弄错的受害者认罪。应该平反的大概有七、八千人时）

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

（当万里同意讲到××市委搞了平反证，老工人不要时）

要在群众中宣布。

（当万里同志讲到，××市委说三月底平反问题可以全部解决时）

要借这个东风一块解决，七、八千人，八百人一批，分十批。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很快，念八百人的名字嘛，弄错了立即平反嘛。

（当万里同志在汇报全国铁路系统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时，讲到，问题多的是：××、××、××三个铁路局和四个车辆工厂，他们根本没动）

要查一查，只要是确实的，要调走，军委下命令把他（按：指部队干部）调走，铁路系统的部里赶快调，四月一日行动。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

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我看这是第一位的，资产阶级派性是第二位的。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条件就是中央支持他，省委支持他。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没有这一些，扭转不过来。只要他按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办事，有错也不要紧，工作中那有不犯错误的。

鞍钢、武钢都有派性的问题。对派性不能“怕”字当头，要采取毛主席说过的原则，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要搞就要坚决搞。

要“敢”字当头，要严格。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调出去又钻出来新的，那就再调，一年调它三百六十次，总不会吧！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六月三十日为止。从七月一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落实政策，特别是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我们说经验主义不好。可是把主义两字去掉，经验是宝贵的，不能忽视。这些工人和干部摸到的经验是可贵的。要培养多少年才行啊。这些人积极性不调动起来是不行的。

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称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嘛。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解决冶金工业问题，重点放在四个问题上，按顺序来说：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软”、“懒”、“散”。部里、省里和企业，过去和今后都免不了要在工作中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就是犯过大错误的人，现在也难免说错话，我这个人象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抓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这次中央批示的去办。不管是那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要支持你们，也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世界上那有常胜将军。我们打仗几十年，有一条经验，打了胜仗就要多敲警钟，打了败仗时，千万不能骂战士，责备下面，自己不担责任，把错误说成是省的，企业的，这样就不容易搞好，就不容易把队伍团结起来。

第二，必须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煤炭工业部搞得很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就是敢于同资产阶级的东西进行坚决地斗争。……在这里，有一点还要讲一讲，我们现在反对的资产阶级派性，与过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然形成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性质是不同的，那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要大联合。

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实际上是闹资产阶级派性。……我们要把生产很快搞上去，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第三，落实政策问题。……我们在落实政策时还要注意有一部分人，虽然没有戴上帽子，但伤害了感情，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充分的调动起来。……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调回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当然，也不能说统统都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第四，把前面这些问题，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搞好以后，紧接着还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过去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这怎么行啊。现在搞制度，宁肯要求严一些。毛主席说，矫枉必须过正。现在不要求严，制度就建立不起来。……例如不上班，就不发工资嘛。有人不工作，就叫他离开，为什么老叫他呆下去，国家还照发工资呢？

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

上次(指一九七五年三月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一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会议第一阶段：6月16日至7月1日，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第二阶段：7月2日至8月11日，分为理论、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规划、改进计划工作、轻工农林商业、文教、科技小组，进行专题研究。

国务院开了六次会，听取各小组汇报研究结果。

一九七五年八月初，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工业二十条》第一稿的会议。

邓小平在肯定“文件基本上是好的”前提下，提出要增加以下四条：第一，以农业为基础。第二，建立出口基地，引进外国技术。邓说这是个“大政策”，中央批准后就这么做。第三，强调质量第一。第四，增加按劳分配一节。另外，邓小平还批评二十六年工业生产总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二十五倍的说法不对，那时的基数太少，这样说会“产生盲目性”。还有一次在谈文件时，胡乔木说，我们反对一长制，可是现在企业存在着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说，各企业制度建立后，工代会、企业革委会就必须取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其主要内容：

1，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2，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所有企业的领导理论联系实际整顿好，改变软、懒、散的领导理论联系实际，调整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理论联系实际，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建立起一个精干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

3，整顿企业管理、严格遵守制度。所有企业，要建立起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要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

4，要落实党的政策。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错队”等帽子，一律摘掉。要信任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发挥他们的才能，不适当改行的，要加以调整。

5，对于“造反”、“反潮流”要进行具体分析。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评，反动的要顶住。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6，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生产发展。

7，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8，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起又红又能专的道路。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谷牧在全国施工企业经济核算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袁宝华在国家计委的讲话

贰、本节简论

邓小平抓工业方面的整顿，发表了许多议论。他的观点、主张最后都集中到由邓小平授意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这个文件七月开始起草，八月国务院进行讨论，九月组织全国二十个重点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十月又拿到十二个省市书记当中征求意见。最后准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讨论出台。由于会议期间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议程没有进行。

下面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吕达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摘要，供参考。

《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

《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

《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

《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2010年5月31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第二章第三节 整顿教育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教育部在朝阳农学院举办第一期学习班。

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二十四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

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教育阵地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经验。

四月举办了第二期。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次在机场送外宾，邓小平问周荣鑫：“朝农的事你知道吗？”“谁叫你们推广朝农经验的？”“迟群在朝农讲话是什么时候？”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朝服是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农业院校学生一般社来社去。林、医、师范院校部分实行社来社去。其他种类院校可进行社来社去试点。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援外工作会议上讲话
农学院都学朝阳，我不那么赞成。

周荣鑫向新华社记者转述王震的意见。此后，教育部和报刊停止宣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

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周荣鑫和教育部理论组同志的谈话

现在一讲教育好象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有没有这个倾向？

“知识私有”和商品经济有没有界限？当前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什么？大多数是愿意为工农兵服务，愿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还是主要把“知识”当商品，卖高价，待价而沽？

现在一谈知识分子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和法权观念就列了一大套。对知识分子队伍到底怎么看？如何理解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些

和工农结合得好的，能不能也算“知识私有”？知识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朝阳农学院老龚头算不算改造得比较好的？多数人是在和工农兵结合方面努力，还是“知识私有”？主流是什么？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

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走上海机床厂道路，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能不能算梯子？

特别是明确了一个观念，不能光提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究竟哪种多些？不一定是五十对五十吧。

今天说的，主要是如何正确理解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教育领域里的全面专政，是否只是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至十七日，中共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有四百多人参加的教育革命现场会

北京、辽宁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中共昔阳县委、大寨大队党支部介绍了教育革命和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经验。

周荣鑫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日，周荣鑫在教育部计划司下半年工作意见座谈会上的发言

刘××：片面性还表现在教材改革和建设上。现在中学物理教材取消了光学、声学、原子物理，都砍掉了。

周荣鑫：这些都砍掉了哪行？！都讲什么？现在就讲三机一泵。不讲光学就不要眼睛了，不讲声学就不要耳朵了。将来学生就是瞎子、聋子。

周××：现在教育革命问题多了，说几百个也有，

周荣鑫：有那么多吗？也就是一两个，还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周荣鑫：鞍钢有 4000 多技术人员，放着这些技术员不用，技术又上不去，这不是路线问题吗？

周荣鑫：教育形势不能同整个形势分开，学习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小平讲话，这是全局，它包括教育在内。一定要抓好理论学习，促进安定团结，把教

育搞上去，使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反映当前大好形势，也反映了存在问题。从四届人大以来，总的形势是好的。但铁路四个地方不通，影响全局，那些地方有派性，是资产阶级思潮，但闹的是少数人。所谓派性，就是那些人想当官。九号文件的宣传，家喻户晓。四月一日为止不改的该调的调，该撤的撤。山西王大位讲太钢调走了四十多个，电站领导班子全换。鞍钢95%老工人保了王鹤寿，站错了队，结果在档案袋里却填上参加了国民党，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铁路解决了，四大钢厂还上不去。国民经济上不去怎么谈战备。首先是人民觉悟，但还要有物质基础。毛主席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三个指示？是不是突如其来？到底为什么提三个指示？咱们同各条战线关系不多，感不到迫切性。许多事我们不用处理，体会不到，省里就觉得是大问题。毛主席指示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为反修防修提出来的，就是为批修正主义。首先不能否认大好形势，主席讲为什么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会出修正主义，这是当前主要危险。学理论这是长期的，只要是社会主义阶段，在教育战线就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教育也是这样，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教育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我们不直接管企业，我们对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反映不如别的战线强烈。九号文件下去，铁道部马上解决徐州问题；小平同志讲了话，冶金部马上开电话会议。我们体会没那么深，但离不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战线，就教育论教育不行。整个形势要研究一下，要学好三个指示，三个文件和小平讲话，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划司把计委长远规划精神和务虚会精神讲一下。讲讲精神，教育规划大家才能搞。

第三，是研究教育理论问题。既然教育战线容易摇摆，出偏差，容易用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必须要在理论上搞清楚，把教育方针，“七·二一”、“七·三〇”、“五·七”指示分分题，指定专人作辅导。形势逼着我们学理论和主席教育思想，希望各组分工，做做准备。

第四，把几个业务司组织起来，研究长远规划，同总结工作结合起来。时间也要安排一下，打破各自界限，我们是职能司，不是独立司。这是当前主要任务。国务院几个主持常务的领导都在抓。按过去的作法不成，要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对全国教育战线的工作会有推动作用。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周荣鑫在教育部计划司的讲话

我们的片面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学文化了。大学过去是工向理靠，现在是理向工靠，不是全面理解主席的教育方针。工农兵“上、管、改”大学是对的，但强调过份了，那他们本身的改造还要不要？教育战线的许多口号值得考虑，看起来很革命，弄不好同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周荣鑫在教育部普教司的讲话

以后别提七二年回潮了，不要讲打土围子，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知识私有”。

文化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为有林彪路线干扰。说教育路线十七年是修正主义统治是对的，但林彪路线干扰也不轻。他那个“最最最”最厉害了，不要忽视。但我们在这方面提得不多，这种流毒在教育路线很大。只讲十七年，不讲林彪路线不行。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甚至连社会主义觉悟都不要了，只讲劳动者，是不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不要文化，怎么行？先决条件是政治挂帅，但也要文化。

动不动就“整人”，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办法。

不要重复林彪路线的错误，不要怕。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周荣鑫对新华社记者谈话记录

总的讲来，教育革命时间不长，成绩很大，也有深度，但正因为是试验阶段，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界线不清。

文教六个部门准备讨论这样一些共同问题：（一）知识分子问题，（二）方针政策界线，（三）体制，（四）上层建筑怎样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生产力发展。知识分子问题已经讨论过，不清楚，写简报报告中央。

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知识分子问题更复杂化。学校小报批“知识私有”，北大把资产阶级法权在学校的表现归纳为好多条。反正运动一来，就是知识分子，他能有积极性？迟群同志在朝阳说，十七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经济是个破坏。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还提出，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化、经

营个体化、成果商品化”。辽宁大批“知识私有”，“智育第一”。现在思想混乱，一来运动，骂一顿臭老九，这是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现在到底是“知识私有”还是“不学知识”？到底应该怎样估计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进步很大，有很大变化，但我们对这变化估计不足。现在总讲知识分子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大学不办就是了。

文化革命前，只讲“文化”，不对，现在不讲“文化”，这就对了？我们一讲就是消灭，这一消灭就消灭到高校来了。最近报纸上有些混乱，一提就是消灭法权，消灭差别。现在，大学理科向工科靠，等于取消理科，那基本粒子怎么办？天体演化怎么办？北大把理科变成了机电系。复旦还有胆量，办了两个基础科学理论专业，但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复辟。有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一亏损，就高兴了，就再没人说我是利润挂帅了。现在有的教师实行无语教课法，上课不讲话，只在黑板上写，写完就走，因为太乱，没法讲课。去年五号文件下达后，河南有的教师自杀了。

要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批透不行。还有林彪一套形而上学影响很严重，“最、最、最”余毒影响不小，还有思想干扰。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周荣鑫在北京钢铁学院第一次教育革命汇报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周荣鑫在北京钢铁学院第二次教育革命汇报会上的讲话

一，教育革命是大革命，时间不长，变化很大，成绩很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现在还处在实验阶段嘛！旧的一套不行了，新的一套又没有。

二，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教师问题。不能一来运动就批知识分子，批得什么都不是，把知识分子都一律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批就说“知识私有”。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又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

三，办学方式要试验，从试验中找到好的办法。不能一提不同意见，就打回去，说是老框框。过去一些具体方法，不见得都错了，错在路线，首先要在路线上划清界限。

四，理科专业要搞。只搞应用科学，不搞基础科学要吃亏。基础科学是从应用科学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影响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不但要，而且要发展，根本不要基础科学是不对的。当前恢复过去老一套，完全三脱离也不行。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周荣鑫在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结束会上的讲话

北京市流传说，我讲了教育战线就是林彪路线干扰，林彪干扰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样讲法不是跟林彪一样了吗？也是最，最，最！传这些话的人，一种是无聊；还有一种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来干。要不，瞎传这种话干嘛？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

主流和支流。不能用大好形势来掩盖问题。要肯定主流，但掩盖支流，不去解决，支流也可以发展为主流。

“智育第一”问题。要搞清楚，智育第一不是不可以批，要批什么样的智育。现在批智育第一，就是课堂少讲些，就完了。

“读书做官”问题。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毕业以后，要一律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有的工农兵学员原来就是车间主任，回去怎么办？就是因为上了学回去都当工人？这不是形而上学！

“三学”问题。必须把“三学”搞好，不能“放羊”。“三学”有过头的地方。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至十一月八日，周荣鑫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

这个提纲因反翻案风的开展未及完成。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讲话摘录

现在学校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学生可以不读书了。主席说，学生以学为主。周荣鑫，你是教育部长，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你还不发表演说？我听科学院汇报上级，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三大革命运动都有你们的份。但是，现在科研工作的人也不读书了，科学家也很少到图书馆去了，不到时间就回家做饭去了，这样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吗？

就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做其它，好多人理解有片面性，搞些其他东西，占了好多时间，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

现在学校提出不读书是毛泽东思想，歪曲了毛主席有关学生负担过重、三脱离的指示。毛主席是为了使学生学习得很好，不是对青少年说过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学毛主席的书，要全面地学。

（1975 年 9、10 月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学好技术业务不能叫白专道路，占住茅坑不拉屎，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对老技术专家，如果是热爱祖国的，就让人家干，这问题也是派性在做怪。

（1975 年 9、10 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是一种形式，但绝不能看成是唯一的形式。因此科技大学一定要办好，上大学的要选一些在这方面有基础的，不能都是照顾干部子弟的。教师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又挨打又挨骂。对教师政治上没问题的要尊重，要有秩序。

（1975 年 9、10 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马克思讲，生产力就是科学，在这些方面有全面认识很有必要在本世纪走在前列很重要。

（1975 年 9、10 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学校不以学为主，要干什么？周荣鑫同志你身为教育部长，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讲？因此总的要求学校教育以学为主，如何把今后工作改变一下。

（1975 年 9、10 月在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周荣鑫的讲话

关于教育革命对外宣传不要讲的太满，现在是试验阶段。小平同志讲，教育革命不是几年可以看出效果的，我们相信我们教育革命的道路是对的。我们教育革命主流是好的，但是也不要掩盖支流。

过去，文化大革命前，大家都去搞尖端，现在又好象都不搞尖端科学了。

现在有些老教师叫他改行，没有用其所长，而用其所短。

中学的外语也不大行。、

规章制度，旧的破了，新的没有立起来，一立，老的又起来了。

我们要批智育第一，就是要批三脱离，但不是不学文化。如果批了智育第一，变成不学文化了，那就危险了。

我们教育革命，要注意全面贯彻主席的指示，不要形而上学，讲了一面，不讲另一面。学了主席的话，抓了一句就干，和另一句对着干。我这些话，你们不要回学校讲。

一九七五年十月，周荣鑫和北大中文系学员周晓红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周荣鑫听取高教司关于理科教育革命调查准备情况时的谈话

为什么这几年出这么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现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纪要的精神，有些提法、口号，有些作法背离了纪要的精神，也就是背离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纪要写得很清楚，为什么不能贯彻执行？这是个严重问题。现在还提不出答案。对执行纪要有没有干扰？干扰是什么？为什么出现这些干扰？如果不把这个根子找到，问题很难解决。不然你这里动一动，他就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是有人在这么说的。这个纪要是个标准吗！用这个纪要看看，是右还是左，要把根子找到。不从思想路线上找原因，要抓抓不起来，不从路线上抓不行。要找主席路线为什么贯彻不好？关键在领导，根子在路线。根子不在教师，恐怕也不在学校领导，根子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管教育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周荣鑫在教育部理论组汇报南开大学知识分子问题时的插话

把《园丁之歌》印一下，把《人民日报》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也印一下，看看文章批得对不对？造成了什么影响？研究后写篇文章出来。受批后，造成影响很大。学习小平同志在大寨的讲话，以《纪要》为纲，检查现状，有无背离主席路线的情况，把《园丁之歌》研究一下，问题在哪里？对照研究一下，我们的思想混乱是怎样造成的？要追根。要不，解决不了。‘七个是不是’对教育战线适用不适用？我讲的话还没有《纪要》讲得那么厉害，你们一面在搞调查，一面学习。现在《纪要》起码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认为，文件上的两个估计是全面的，当时是怎么传达的？以后又怎样？为什么不执行主席同意的《纪要》，总理反复讲过两个估计，讲得很清楚。剧本和批判文章应以《纪要》为准，要追，剧本背景写的是四年级学生，但批判的不是四年级学生。他们批判是断章取义，抽出不学文化也可以干革命来，与过去相比。看看这篇批判文章，很有意思。在某些地方、单位有无干扰？象这样严重的‘三脱离’状况有什么严重后果？宣传有关系，领导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谨慎。一批容易予头向下，整教师。这不符合毛主席指示，关键在领导，主要负责不在下边。”

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周荣鑫在讨论给中央汇报教育领域情况时的讲话
当汇报到教育战线突出的问题是片面性、形而上学，有人借批智育第一，实际上批了主席的东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时，周荣鑫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本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不管嘛！”

当汇报到有人口头上说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有的有宁“左”勿右的思想时，周荣鑫说：“实质是右的”。

当有人谈到教育战线不敢大胆试验，是一个“怕”字时，周荣鑫说：“你批，他就怕了，这几年批的厉害。”

小平同志讲，现在有一危机不读书。教师还有一个地位问题，也有一个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

一，提纲是否分四部分写；二，全教会《纪要》代中央拟一稿，附上《纪要》改稿，报中央后，争取发下去。有这样两个东西发下去，开全教会就好办了，要不日子不好混。一个是争取汇报提纲中央能够批下，一是全教会《纪要》修改稿和通知，中央能批下来，问题好办了。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周荣鑫对铁道部科教局同志的谈话

讲话不讲了，一讲就有人消毒，我对北钢讲了几句话，人家就去消毒。北京市文教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说什么只听毛主席说的，其它谁说的也不行。现在有那么一股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歪风。你们的会我不去了。高教司去听听吧！你们下去了解很好，提意见也很好。

现在不是左，而实际是右。

现在有些人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园丁之歌》荒唐到不要文化也能革命。毛主席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用到了中学生陶利身上，这怎么能行？初澜的文章是个典型，反对学文化，对教育战线影响很大。知识分子问题看成和文化革命前没区别，就否定文化革命。是右的。不看到变化，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凡是看书的，学习的，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现在文化质量不敢讲，学生生活散漫，确实有这个问题。有的学生想的就是当工人，上大学，留城里，找个好对象，这四个理想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现在学校政治工作不强，很削弱，还有的学校有派性。不消除派性，不整顿领导班子不行。学校问题不少。主要是学校的领导班子不行，还有一个上面领导也有问题。现在只讲批智育第一，不让提又红又专。现在认为学习文化就是智育第一。

学朝农应当怎么看？朝农搬到农村去是执行了主席 58 年的指示，不能说不对吧？他们以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为主课，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不能说不对吧？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实行社来社去也不能说不对吧？问题是其它学校能不能照搬照抄呢？国家那么大，各地情况不同，农业大学也有提高问题，华北农大就有条件，要提高。他们搞点提高的有什么不好呢？五年要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水平能行吗？

主席讲要多样化，我们现在是一律化。面向省市的同面向全国的学校要求就不同嘛！什么都一样，不可能，不符合客观实际。要求上有差别，是客观存在，不承认差别是睁眼说瞎话。

60 号文件主要是对农业院校讲的。那是在当时思想比较混乱情况下，积极引导学朝农。我们去掉了“战略性经验”的提法。针对当时都搞社来社去，我

们请示了三个问题：明确在校的学生不要搞；明年招来的搞，在招生时就讲清楚；分散办学问题强调自力更生，不要国家一分钱。对朝农不能全盘否定，否定是不对的。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学也是不对的。说学校是读书做官的梯子，把当干部、技术员当成做官，这不是拆梯子，是搬梯子。工人农民当干部、当技术员不是还存在梯子吗？我们现在干部、技术员是不是参加劳动？干部也能官能民。现在学生不做官，要留城。想做官的有，是几千年孔老二那里来的。这种思想不对。要教育人民能官能民，能上能下。你就是拆梯子，堵路，越讲越歪了嘛！说学校是大染缸，毕业后还要劳动锻炼二年，教育革命白搞啦？抗战时期我办了八年党校，培养出来就当县委书记。讲成绩讲一大堆，讲学校就成了大染缸，自相矛盾。技术员难道不劳动？他们工资不一定比工人高。学校就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界线不清。一方面不让搞科研，也不搞科研，不是全教会纪要不要执行了吗？现在有个不正常现象，有的学生上面放一本政治书，下面放一本业务书，人来了看政治，人走了看业务。这行吗？现在对主席指示理解不一样，有的提培养农民，农民含义是什么？有的提培养普通劳动者，不要文化一条，不要政治一条，普通劳动者意思是什么？我讲不清楚，水平低呀！我讲话有人在攻，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有一股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歪风。我不怕，就是要扭。我不怕打倒，能官能民。整顿就是把这几年的问题找找原因，这几年确实有干扰，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教育部门就是不读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周荣鑫在铁道部科教局同志汇报铁道院校会议情况时的讲话

“怎么不敢搞又红又专呢？莫名其妙！过去学校留的作业多，现在上课时间保证了，作业没有，教师一病，没人代课。过去是摧残青少年，现在是什么？现在四个钟头都保证不了，仔细分析，问题大了！光从时间看，现在似乎上课时间也不少，但自学、作业时间都没有，就差多了，过去就没有这种现象。到了快毕业时，都不上课了，全复习考试题，结果考的很好，实际不行。不抓教学中的问题，怎么贯彻主席指示？现上课还没提纲。这没把问题解决好，这问题能否抓一下。

72年的反回潮，怎么弄得那么怕？怎么弄不好，就反回潮？”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五月以后，在教育领域就刮起了一阵的翻案风。七、八、九三个月达到了高潮。主帅当然是邓小平，披挂上阵的是教育部长周荣鑫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

毛泽东观察了几个月，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他指出：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他们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的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供参考。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

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

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2010 年 6 月 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二章第四节 整顿中国科学院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邓小平对胡乔木吴冷西的讲话摘要

邓小平对胡乔木吴冷西传达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内容时，说：

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号，华国锋传达中央决定：

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到科学院工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李昌在科学院属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胡耀邦对李昌说，邓小平的意见，科学院的整顿，要放手发动群众，先搞点干部去，然后发动群众，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讲话

老中青不是简单的年龄结合，而是思想结合，优点的结合，只把三种年龄结合起来，那还是三不合，如果是三个弱点的结合，那就变成‘三摩擦’。”在谈到三个年轻干部的弱点时说：“第一他们对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熟悉或不太熟悉。第二革命经验终究不够，革命经验不足。第三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太容易，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太容易，就可能发展到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再发展就是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再发展就是狂妄，狂妄再加个人野心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走到希特勒那里去，成了法西斯。

一九七五年八月，胡耀邦在李昌办公室讲

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业生产中去？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李昌在科学院物理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这三项指示不可分，就是有些人他就要分。比如说你抓生产，他说你搞唯生产力论，那么你要钻研科学技术，是不是又是有什么个问题来了，总之各种各样，比如说你是不是搞理论风呀？又是知识私有啦，什么各种问题来了，总之说有阻力。

九号文件一下去，有些地方讲，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复辟纲领呀，因为这个地方强调了要加强业务呀！要恢复规章制度呀！有那么一些人他脑筋发热，他觉得就是一天喊些口号就很舒服，你搞个新的东西他就不赞成，规章制度他都要砸烂，好的坏的他都不管。所以他一看，他阻力很大，说这个是复辟文件。

徐州打派仗打的很凶，抓“五·一六”抓得也不少吧？大概是××，是××是××啦。徐州有个坏头头叫个顾炳华，同志们都知道，把他逮捕了。这个人非常狂妄，是个坏人，他能挑拨是非。那个徐州那个顾炳华呀，逮捕起来，他是个造反派的头头了，这个人是很狂妄的，他从马克思到主席他都批判的，而且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反动的，他就主张可以多妻制的，这么一套，乱七八糟乱搞一套，所以非常狂妄。从主席，马克思都批，这么个人，大言不惭，根本上狗屁不通，所以这个问题他就不是什么一个革命造反派内部的问题了，就是一个坏人啰，坏头头啰。

钢铁会议有名的提出了几个班子的问题，是软班子、是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是不是呀？讲领导班子的问题提出了这么个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啰。第一个是班子问题，第二个是派性问题，第三个是落实政策的问题，第四个是规章制度的问题。

建议七月一号七机部要停止闹派性，所以叫个“七一”派，是个大团结的派，是毛主席的派，是党性的派，如果你们要讲派，就是这个派。那另外一个派有没有呢？当然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如果另外有派，那就不是过去那个派了，那叫什么东西呢？那叫革命的反党派，分裂派，资产阶级的派性的派，也是资产阶级派，那是很危险的一个派了。今天呢，今天是拥护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讲党性的，讲团结的这一派，毛主席派，和不讲团结，分裂派这两大派的斗争，阶级斗争就反映这个了，再有认为自己是那一派，以那一派为代表，为头头，来伸手这个东西就不允许的了。真正闹了派性的人，那么他平时闹，只

要改正了也还是好，要坚持下去呢，这个性质现在就讲了，现在要闹派性，这个性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是修正主义。

什么叫政治纪律性呢？就是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他不执行，另外小道来的什么东西，什么口号呢，就奉之若神明，马上就搞，比如随便我们讲个问题这个知识私有，好象我们这里也闹腾了一下，没闹开就是了，这个是那个地方的中央文件提过呢？那个中央同志讲的，下达过任务，说你们要反知识私有呢？恐怕查不出来呀，但是，我们就反开了。据说是那个地方的什么报纸讲过这个话，他报纸是不是就代表中央呀，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是不是呀？中央在北京嘛！这个口号就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个知识，什么叫知识公有哇，你讲讲看，知识公有象什么样子呀？是三角形哪，是四角形，那么知识私有又是怎么个样子呀？是长方形呢，是个平形的东西呢，是个梯形，是个菱形呢！你讲讲看，谁讲的清楚啊。象这种东西搞的不好，就会引起很大的混乱。最近主席讲了，小生产每日每时要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了，这个是列宁同志讲的话啰，主席也引证过了的。有些地方他也不好好学习，他到地方上他就反对小生产，一个几十户人家，五十来户人家嘛，抄家就抄了 30 多户。一个自留地也是小生产，喂口猪也是小生产，他都抄，有些地方，把一个集市包围起来，鸣枪三下。然后大家不许动，来收小生产，你说这个岂有此理吧！这样搞下去，那不天下大乱吗？这个小生产，现在在这个里边自留地呀，私人喂猪呀，这都是农业 60 条规定的了的呀，你为什么胡搞呢？

批判理论风是不对的，我们要搞基本理论的研究，但三脱离不好，不是理论研究多了，恰恰是研究少了，错误是脱离实际，科学要有知识。所以这里叫知识私有的口号错了，因为每个同志是公家的人，干活为国家，在革命队伍中有什么公有私有，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知识无有，至于积极性不够，你调动他积极性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胡耀邦在科学院计算所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
说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实际上是受不了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李昌在科学院机关全体同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胡耀邦在科学院半导体所座谈会上插话
复旧？！你说复旧就复旧。

人都死了嘛！都逼死了嘛！还开除什么党籍。话要简单明确。原因不要去分析他，分析他反而被动。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胡耀邦在科学院印刷厂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上干校二年挨斗、搞喷气式（做喷气式动作），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胡耀邦汇报时的
插话

胡耀邦等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主持写出了《科学院
工作汇报提纲》。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是：

1，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
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2，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
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3，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必
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实践也
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
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
号。

4，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有必要从外国
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

5，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
理论与“三脱离”等同起来。鼓励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
术空气不浓和简单的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6，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充分了这个文件。他在听取汇报中多次插话。

胡：关于又红又专，现在不敢讲红专。

邓：实际上是不敢讲专。

陈：一讲就挨棒。

胡：进口资料很少有人看。

邓：各省都有（指进口资料），人不读，耗子读。

胡：每周只有四个半天工作。大家不满意。

邓：科研人员怎么会满意？不务正业，少务正业。

胡：（谈到科技人员生活时说）×××三线还有几十万人分居，都是牛郎织女。

邓：这不是一般问题，还有些高级人员的房子也被占，要修房子。

胡：（谈到落实政策时）

邓：所室领导不调整，谈落实，一个单位不把班子弄好，谁去落实？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

胡：（谈到有些人抓辫子时）

邓：辫子也确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

李：是补台，还是拆台。

邓：办法是群众运动，群众讨论。那些人他们不怕党中央、国务院，但是怕群众。不高兴你们的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分之九十五，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有人汇报上班时看电影）

邓：这一段，他们没有搞（科研），看电影，打派仗，少数人是秘密搞的，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究竟是红专还是白专？陈在世界上公认的有水平。他会数学，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爱护，赞扬。他是不是人大代表？

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比搞派性的好。

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14〕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

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现在学习理论不够。提拔干部有问题，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混乱。过去林彪只讲学习“老三篇，老五篇”，割裂毛泽东思想。罗荣桓带头反对，林就说罗晚节有问题。现在学生也不好好读书，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你周荣鑫是教育部长，你还不发表演说。搞科学研究的，也不读书，也不研究外国情况，不到下班时间就回家搞家务，这样科学事业怎么能发展呢。

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人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

毛泽东未表同意。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胡耀邦和科学院电子所党委成员的谈话

这几年有不少人盲目讲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当然对了，盲目就不对了。人家有了的，我们为什么还要从头搞呢？这些刊物有，为什么不采来，然后盲目地让我们院部定方向、任务。长期争论方向、任务，院要负责，你们也要负责。什么方向、任务？你电子所就是搞电子学嘛。长期争这个，你们有百分之七十是不对的，往上推就是了。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就是要把科研搞上去。领导班子的好坏，调整，我们当然要解决的，都为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把科研搞上去。我们抓整顿也好，调整班子也好，不是为整顿、调整而整顿、调整，我们是为把科研搞上去而整顿、调整嘛。我们的根本目标是把科研搞上去嘛。离开把科研搞上去而搞整顿要走偏方向的。这个，我说八级台风不行，要刮十二级台风。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胡耀邦在科学院感光所部分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胡耀邦的一次讲话摘要

邓副总理敢于代表毛主席说工业发展不快，农业发展不快，科学技术发展不快，国防建设发展也不快。敢不敢说出这个话，一个革命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毛泽东的战士，敢不敢面向现实，承认我们发展不快，相当落后？这么讲更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还有一种讲话，说我们好得很，一切都好啊！历史是无情的，我们应该分析：为什么我们发展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林彪、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当然，历史上的落后也是一个客观基础。

我们有两次路线斗争的惨痛经验，随便乱扣帽子，整人，林彪那一套吃不开了。但话要说回来，挨批受委屈，是有准备的。活五十年也是活，活六十年也是活，七十年也是活，我们都有脊椎骨。革命者没有骨头还行？高举马列主义，高举骨头。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胡耀邦在科学院综合考察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胡耀邦在科学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胡耀邦在科学院微生物所领导小组扩大会上的讲话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派到中国科学院去搞整顿。他们就科学技术战线的整顿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九月还搞出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后又多次修改，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未表示同意。

为什么毛泽东不表示同意呢？下面摘录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供参考。

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一

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2010年6月14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第二章第五节 整顿军队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提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这是邓小平搞所谓全面整顿的开始。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

1975.02.05；中发〔1975〕3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一）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二）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十一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常委会议。

军委常委会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对军内外一律用军委名义，不用军委常委会名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撤销新疆建设兵团的决定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中央军委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院校编制若干问题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八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后勤部关于在援外军事装备中所发现的质量问题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感到军队有相当多的问题。总之，我们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我想了一下，如果从报忧方面或者叫缺点、毛病来说，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的总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

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一个师的部队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有点“散”。所谓“散”，主要有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形成、结合起来的，有点山头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通过延安整风，应该说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那种山头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形成的。在延安整风时解决得比较好，当然不是说很容易。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经过延安整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那股劲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说支左有功，但是，在支左当中，因为那时群众分成两派，是革命队伍中的两派，不是资产阶级两派，这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部队支左，自己也

卷到里面去了。军队支左，正确的办法，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支持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军队不少人卷到派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后台，卷到地方派性里去。同时，把派性带回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两派。军队里面的派性，同地方上的性质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它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应该容忍。现在，军队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其实，那些常常喜欢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却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所谓垒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的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同志，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所谓派性，这就是最大的派性。毛主席、党中央讲，要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与资产阶级派性这个问题有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是在地方支左中形成的，带回部队，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好多派性问题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现在还有影响，少一点就是了。

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部队组织纪律性差，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个人服从组织呀，都不管这些。我很赞成荣臻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过去命令一下就动嘛，二话不说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对抗命令。派性同组织纪律性差有关。他们考虑的利益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那一派的利益，我们说它是资产阶级派性，就在于这一点。他们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现在，要调动个人可不容易。有的人说是由于某某人把他整了，受了错误的处分。有的人是这种情况，但有的人不是这种情况。原来对他的处分和批判是对的，他也说不对。现在都喜欢到大城市，特别是喜欢北京，要调到别的地方去，特别困难，说什么身体不好，要调到外地就说有心脏病，到那里去肯定要复发，可是在北京，心脏病就好了。总之，理由多得很。

所谓纪律性差，不只是组织纪律性差，政治纪律也差。毛主席、党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比如，军队同志要帮助地方消灭资产阶级派性，使群众团结起来，可是有些军队同志就是不执行这个方针。这又是组织纪律、又是政治纪律问题。

军队的领导班子，也有“懒”、“散”、“软”的问题。中央九号、十三号文件都是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嘛。因为有的领导班子是“懒”班子、“散”班子、“软”班子。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三种班子地方有，军队也有。这段时间，地方上克服这些问题比较好，地方走得快一点，军队慢一点。

有点“骄”、“娇”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军队本身就容易骄。战争年代打仗，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过去历来存在这个问题，经过克服，比较好了。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在支左中，不只是支左的人，连同支左的部队，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什么时候我们军队干部有过那么大的权力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就有这样的干部，不讲团结，不守纪律。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军内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军民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团结好的传统丧失了。浙江洞头守备二十六团，听说这个部队过去很好，在那里还受过表扬的。这次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坏，本身也不团结，还打仗，带领地方一派群众打仗。那里有两派群众组织，一个是民兵指挥部，还有个叫什么团。军队在那里带头打仗。因此，现在军民关系很值得注意，如果不注意，带坏部队战士，丧失我军的传统作风。最近，总参发了关于整顿军容风纪的指示，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根本不理，不让坐，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这个事情，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有的人还认为这无关重要，如不警觉，是很危险的，要坚决纠正。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些

问题不自觉改正怎么行呢？有的人喜欢指手划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总之，有点“骄”，有的人甚至发展到骄横。

有点“奢”。刚才上面讲到有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比如，有一个团开支的招待费有六万多元，招待什么人呢？我看无非是招待师、军、军区的首长们。这个团的干部这样就搞坏了。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策的。钱是哪里来的？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办了不少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精神。有些人违法，东西从地方上随便拿来，有的连个手续都没有，或者低价购买。赚了钱，个人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说什么，为什么他有批条子的权力，我就没有？主席指出的“五·七”道路要走，但怎么走呢？要真正按“五·七”指示的原则走。这个问题要整顿。地方企业还要上交利润，资金的积累也是国家积累嘛。我们批判苏修就是这样，特权阶层是哪里来的？如果那样搞，我们军队不是也在培养特权阶层吗？还不是和苏修一样的！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应该还嘛。有的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有的是霸占的。现在，我们不是反霸吗？这就是霸，不讲理。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去讲了。

有点“惰”。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甚至有些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惰性。地方存在“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部队也有的是。毛主席最近讲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说条件太好了，所以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种同志相当有一些，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个人也好，一个领导机关也好，就是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不搞继续革命，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是保持革命晚节，而是保持别的什么“晚节”，这有思想原因，还有组织原因。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助。“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这种现象应该纠正。中央有责任帮助各个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

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不要讲句话都怕犯错误，怕被人家抓住不得了。你写出来照着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而且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那不是“八股”？过去整风就是批判“八股”，干瘪无味。这个怕字，是为自己。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自己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

总之，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我讲的重点是报忧。部队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个方面说的不多，只讲了这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很重要。问题是部分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部队建设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的领导受到削弱，许多党委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怕字当头，不敢负责，有些领导班子存在着“软”、“懒”、“散”的严重现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教育不严，组织纪律差，事故多，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影响和腐蚀；有些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闹不团结，政策不落实，有些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作战思想不够统一，战备工作、军事训练和民兵建设都存在一些问题。部队臃肿庞大、干部超编、装备落后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林彪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有责任的。

联系军内实际，当前要注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它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干扰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

第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第三、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第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叶剑英在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

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

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讲了话，一致赞同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 386 页）

一九七五年八月七日，中央军委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关于调整配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的通知

1975 年 8 月 30 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调整配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名单如下：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田维新；
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张震、贺诚、张令彬、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孔洪珍；

空军司令员马宁，政治委员傅传作，第二政治委员余立金；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

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张池明；

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陈鹤桥；

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政治委员莫文骅；

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治委员王六生；

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吕正操；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治委员陶鲁笱；

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治委员栗裕，第二政治委员肖华；

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治委员唐亮；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治委员张春桥(兼)，第二政治委员彭冲(兼)，政治委员廖汉生；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兼)；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治委员韦国清(兼)，政治委员赵紫阳(兼)、张平化(兼)、孔石泉；

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刘建勋(兼)、赵辛初(兼)；

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一政治委员刘兴元(兼)，第二政治委员李大章(兼)、政治委员严政；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周兴(兼)、刘志坚；

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第一政治委员白如冰(兼)、政治委员肖望东；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廖志高(兼)、江渭清(兼)；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冼恒汉(兼)、李端山(兼)；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一政治委员赛福鼎(兼)，政治委员郭林祥、司马义·艾买提(兼)。

当时，总参谋长是邓小平，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干、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伍修权。

同日，中央军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任命罗瑞卿、谭政、陈士渠、陈再道、王建安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总政治部关于做好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报告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但是，邓小平、叶剑英在抓军队整顿中，塞进了许多私货。如叶剑英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离开讲

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叶剑英承认，一九七五年七月这次会议，就准备好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指出：“军委常委于 2 月 6 日开会，对去年 7 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2010 年 6 月 2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二章第六节 整顿国防科委系统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

一九七五年三月某日，张爱萍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他的那些旧部，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张爱萍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张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

他们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为什么？

他们说，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

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笏，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议，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张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张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一九七五年三月某日，张爱萍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

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

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张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 2 3 0 厂及配套的 1 3 所。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 9 9 1 年 9 月 1 0 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问他们，说我们不喝水。厕所堵了多少年，污水一直流到大门口，还是我们去了后找了些部件给换上了。暖气很多地方都没有，管子都冻裂了。”

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文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张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为坏榜样。”

张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铲除派性，收回权力。”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

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什么你管得着，我管不着？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 52 次话，去掉 8 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

张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问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啊？你们猜猜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现在两只眼睛都闭上了！我的官老爷们，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你们真的都是在修身养性吗？……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在这里叫你们一声老同志。所谓老，就是原来曾经在老五院工作过的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原则，放弃人民的利益，明哲保身，保位，保官。这种人，还要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老五院的思想、作风、干劲给我找回来！今天之前，我不管；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管了，而且一管到底！”

“发生了问题找谁？找领导！找你们干部！车间里没有开水喝，谁去打？车间主任去打！……拿桶打！”

张对工人群众说：

“我要问大家一句，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这些指示，哪一条在你们这里贯彻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 8 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你们这里贯彻了吗？毛主席在去年听了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后说，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在你们这里贯彻执行了吗？所以，是不是革命派，不在他喊什么口号。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一看，想一想，对的就跟，错的就要打倒！”

“工人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拿出杀手锏来。打谁？打对我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敌人！我们的杀手锏要直捣它

的黄龙府！叫它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奴役我们。这，就是目标！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目标！”

有人说：你张爱萍讲的是“今不如昔”，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张说：“好啊！你当面讲也行，背后讲也行，到中央那里去告状也行！”“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 5 号和东风 4 号方案论证会。

张爱萍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张爱萍的汇报。

邓小平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 9 1 5、9 1 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 6 月 3 0 日为止。从 7 月 1 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张爱萍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 7 月 1 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

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 [1 9 7 5] 1 4 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

八月三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

（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现在方针、政策很明确，就是要去干、去做。

过去怕，也有点道理，不是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就不对，但是可以原谅，因为有原因。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不改就只能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继续革命意识太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能把队伍带起来。要找有经验，比较年轻一点的，四十岁，五十岁，更年轻的也好。四十岁的干了二十多年，五十岁的干了三十多年了，要选择有能力的好好培养。

不要简单的看派性，看成是闹个人地位。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争权夺利，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阴谋诡计，拉山头，组织派别，坏人躲在后面，一串联，拉派，煽风点火，搞得厂不安宁，省不安宁。有了这种人，不调出去留在领导班子里是搞不好的。……凡是搞派性的人，必然搞分裂，从上到下，都是这样。

领导不敢管，文化革命已经九年，现在还闹派性，性质已变了，要作斗争。九号、十三号文件下达后，资产阶级派性有所收敛，公开闹的少了，但未根本解决，明不搞暗搞。在发展党员、提拔干部、落实政策，资产阶级派性都往外冒。群众说：资产阶级派性是潜水艇，平时在水下，一有风吹草动，浮到上面来了。

冶金部召开了技术人员座谈会，他们提出不要嫌弃他们。对知识分子要改造，但不要光改造，还要团结、使用他们。有个钢厂，有三千名技术干部，他们认为没起多大作用，很多技术人员不钻研技术，很少有人看书、看资料。有色金

属研究院有八百技术人员，上半年到图书馆看书的共七百人次，平均每天四人次。这种状况如不改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困难了。

提出一个问题，企业里应该不应该有总工程师？一提总工程师就是保守的象征，灰溜溜的。有的技术人员说：我们这些人，说话灰溜溜的，不顶用，工作拿不起来。这是有些意见。工厂设不设总工程师，可以研究。有人说：设总工程师就是搞修正主义，是不是有了总工程师，就是修正主义。如本质上看是修正主义就不能设；如本质上不是这个问题，总工程师既懂马列主义，又懂技术，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又红又专，为什么不能用呢？

我问过一些造反派，他们说技术没有用，我批评了他们，要他们好好学习，自己教育自己，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总有一点知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相结合，这样做老工人是欢迎的，要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要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要把知识分子叫做老九嘛！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专心致志的研究一些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保证产品质量，必须有规章制度。不是所有工厂，相当多的工厂废除了，说是管、卡、压。这是大帽子。什么叫管、卡、压？如果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能保证产品质量，这怎么能叫管、卡、压？真理过了头，就是谬误。

今后，工厂军代表要撤销。产品质量主要靠工厂来解决，靠党的领导，靠老工人、技术人员。过去靠军代表把关，军代表撤销，由三结合领导小组把关。

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李先念在会上讲话：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张爱萍的信上作了批示

《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是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

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 1 6’左派。”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深夜，张爱萍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张想：乱讲话？我讲什么了？不就是骂了那帮小爬虫吗？

张问：北京有什么情况？

陈说，说不清楚。

电话就挂断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张爱萍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专机已经派出，请到宝鸡机场乘机返京。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 6 个人，除张爱萍外，其余 5 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笱。

李先念首先递给张爱萍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

李：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

沉默……

纪：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是右派说的。

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还用我说吗？七机部问题你不清楚？

纪：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张爱萍，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张爱萍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张爱萍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四个副总理与张爱萍谈话后，鉴于张的顽固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

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邓小平说：“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张爱萍的信上作两次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75年11月26日，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1800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地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舱体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粟裕当时还在住院，他对张爱萍的夫人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据军委的要求，张爱萍的子女替他写了份检讨。

粟裕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

宋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

陈锡联看了这份检查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

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张爱萍死活不肯签。

陈锡联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张爱萍的信上作了批示。

一九七六年一月，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

在这之前，王曾找过张爱萍，一是谈上海发射卫星的事；二是谈舒龙山的事。王说你骂造反派头头都是坏蛋，我也是造反的头头嘛！

过了几天，邓小平就找张爱萍询问这件事。向邓密报的人，就是批邓联张“联席会议”的领导成员。

张爱萍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多年后，张爱萍的儿子张胜还对此愤恨不已地说：“问题是你搞科学的，干吗就非往那上挤呢？屈于政治上的压力，也无可非议，但借助政治投机，就让人鄙视。我无意否定他的贡献，但名气大，未必人格就高尚！”）

不久，张爱萍的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的303立即上报军委。

叶剑英电话：“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并下达三条指示：1. 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2. 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3. 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

聂荣臻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

张爱萍给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笏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中说：“我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凡没有经过我主持研究或未经我同意的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八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 230 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 7000 人参加。

张爱萍在大会上的检讨只有七十二个字：“去年 3 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以后，2 月 5 日，2 月 6 日，2 月 11 日，3 月 1 日，3 月 2 日，3 月 5 日，3 月 24 日，3 月 27 日，3 月 28 日，8 月 5 日……召开的批判会，张爱萍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也被列为批判重点。他也是心脏病住进了 301 医院。

国防科委革命派的领导人找他，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张爱萍对肖向荣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

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

张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一九七六年六月的一天，江渭清悄悄地对张胜说：“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

贰、本节简论

首先应该感谢张胜先生，他的大作《从战争中走来》，为人们提供了一份“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大人物、有名的四大金钢之一的张爱萍上将的生平材料。由于张胜先生与张爱萍上将的关系，这些材料应该是特别可信的。

张爱萍上将怎么会在一九七五年成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掀起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钢（万里、胡耀邦、周荣鑫）之一？一九七六年以后，他的政治思想发展又是怎样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张爱萍表示替彭老总难受

张爱萍说：“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张爱萍夫人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张爱萍说：“他对革命这样大的贡献，说了真话，结果就这样整。我觉得党内这些事真没有意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自己按原则办事。凡和我关系不大的、能不参加的活动和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对党内这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管你驴打死马，还是马打死驴的……我也帮别人说过话，那是因为有人违背了原则，我才站出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张爱萍不能接受批判彭罗陆杨这种做法

张爱萍说：

“在当时，对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社会主义时期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去反对。”“唯独使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不清，也不允许本人澄清事实，就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实问题和历史恩怨一起算总账的做法。”

“有错误就批评，有罪行就法办，先把事情搞清楚嘛！罗瑞卿是什么问题？杨尚昆是什么问题？陆定一、彭真？我不是在为他们说好话，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说好话。说是反党集团，总要有组织活动的事实嘛！还有要防止反革命政变，说的那样吓人，摆出事实来嘛！”

“过去历史上就是这样，但那是王明时期。党内过去有过，已经被纠正过的嘛，怎么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呢？”

“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文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一九六六年五月军委三个高级干部联名揭发张爱萍的错误言行

1966年5月23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

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1966年9月就开始布置收集张爱萍的言行了，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主要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鸣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18项。

几天后，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在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到处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共5万张。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的家，并将其扣押。周恩来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

1967年1月25日“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张爱萍被停职审查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个会一直延续到28日。

张爱萍首先对批判他表态：“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

界观，保持革命晚节。”然后是对彭罗陆杨问题表态。最后是对本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表态。

3月8日这天，叶群收到杨成武的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

材料列举的罪状共10条：一、反毛主席。《红旗飘飘》丛书上发表过张爱萍写的《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的回忆文章。二、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三、反林副主席。不同意在核试验基地修林副主席纪念亭。四、对批判彭罗陆杨不积极，在京西宾馆讲恶毒攻击的话。五、主张部院合并。六、主张撤销防空军和公安军。七、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每月给地主分子父亲寄钱；八、同杨尚昆关系密切；九、对批判罗瑞卿不满；十、为驻地工作人员开办食堂，笼络人心，等等。

第二天，林办又接到杨的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

叶群马上批示：“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当天，叶群的批示就传回来了。总参3月9日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很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3月10日，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的报告送至叶群处。其中写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

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

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

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1967年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

林彪批：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批：照办。

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审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

1967年6月7日，中央专案组二办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信，指控“在张爱萍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

审查之一：假党员问题

1967年9月28日，专案组印发《张爱萍专案情况汇报》（第一号）：

“一、关于入团问题……据张爱萍的同乡、同学和四川历史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张爱萍确于1925年—1927年在达县期间曾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张鲤庭、戴治安是领头的，学生中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刘灵柱、曾繁福、邓廷璧等最为积极，他们当时都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同张爱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关于入党问题……据张爱萍的一些同乡、同学和老党员、老贫农的回忆，一般都听说张爱萍于1928年在达县地区教书期间入了党，并在罗江口一带组织雇农进行过秘密斗争，有一位老贫农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给张爱萍当过秘密交通，并留下一个当时送信联络用的铜牌子（由其孙李纯武保存下来的遗物）已交我们带回。总之，所获张爱萍在达中毕业后去上海之前这段历史同张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专案组又提出《张爱萍历史上一情况》。

1967年10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

12月1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1967年12月27日牟仲宇再次被传唤。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1967年12月26日，张爱萍逮捕关押、28日的第一次审讯。

1968年1月4日，对张爱萍第三次审讯，张供称：“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我也不算是党员。”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审查之二：特务问题

1968年1月4日、6日，张爱萍专案组组长说：“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

1968年2月，彭丰根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

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1968年3月5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1933年及1937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1930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

鉴于上述情况，在后来的专案报告中就没有有关日本特务的提法了。

审查之三：通敌问题

1967年4月26日，总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

1967年6月7日，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是通过总部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一个月后，总部负责人再次催促进展。由于一直没有突破，专案组建议：“未查清张爱萍在华东通敌问题，建议逮捕原反间组成员……”

1968年3月2日，他们在上送的批捕报告上写道：反间组是“蒋匪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任命潜伏上海的特务”，“为潘汉年、扬帆收罗起来”，“张爱萍从潘扬那里接受到海军”，“给台湾蒋匪送情报”等等。

经军委办事组报中央批准，将原反间组成员抓捕归案。

1968年3月11日、12日，和6月27日开始了第26次、27次和第28次审讯。

1968年9月1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一九六八年四月张爱萍的《绝命书》

受凌辱，身名戕 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20天爬在床上写了25000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狱夜沉沉何时旦，心烦意乱不能眠，一家六口难团圆。

四十二年从党命，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泣泪于狱中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

“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

有一张是我弟弟生日那天写的：“往年生日喜气洋，十八不庆泪两行。未见三子长成人，竟然年少历风霜。”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他问自己：“但愿日出浮云散，明年今日可补偿？”可希望又在哪儿呢？人到了绝境，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殃及孩子们。忘掉我吧！他写道：

“如果家里人宣布脱离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前途。”

这些文字可能写于 1968 年的 1 月至 4 月。

一九六八年张爱萍写给中央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 8 个月了！革命 40 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 1968 年 5 月 8 日

他又写下了长达 2 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 7 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1968 年 7 月 13 日狱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张爱萍“大彻大悟”

张爱萍说：“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
么？但百思不得其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
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
邱会作。每组 6 人，共 12 人。不算毛泽东的 24 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
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 12 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
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
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
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
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张爱萍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
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
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
的口号，山呼万岁。”

张爱萍说，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
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张爱萍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
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
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
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
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
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
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去死！”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爱萍解除监护

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宣读了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张爱萍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一九七三、七四年张爱萍认为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梦呓之语！”

张爱萍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私下里流传很广的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

张爱萍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经邓小平批准，整个一九七四年，张爱萍都在福州治疗。

张爱萍读《红楼梦》还真有了心得体会。他特意把那首“飞鸟各投林”抄下来寄给张胜：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他指着这首诗说：“总有人要怎样的，你看吧，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张爱萍对送来的“两报一刊”报纸杂志从来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务员就一齐收走。张胜说，随便翻翻也好嘛，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梦呓之语！”

1974年国庆节，张爱萍回京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11月6日，叶剑英邀张爱萍去西山他的住处，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张爱萍鼓吹“今不如昔”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5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9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

张爱萍认为：“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张爱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张爱萍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这种“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还我旧时精神！”开始了他的整顿工作。

于是在他看来：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张爱萍上将当时在公众场合还不便讲的话，由张胜先生在他的书中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真的来了！

张爱萍上将多少有一点后悔，他想起了：“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并且恍然大悟：“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他在批判大会上说了七十二个字，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整顿中有什么错误。而且，他把经毛泽东 4 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一直保存着，并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一九七六年以后张爱萍大声疾呼：勿忘文革！否定文革要彻底！

1976年12月，张爱萍说：“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

1977年，张爱萍说：“不要想抬出谁来吓唬我。有些人一动就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叫你们联合起来，不要武斗，你们还不是照样打？什么毛主席说的就不能动？说这话的人，我看，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才不让动！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触动了你们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半句也不顶！”

“‘文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文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张爱萍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5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

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1984年，张爱萍纪念任弼时同志80冥寿，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八十年代中期张爱萍反对军队经商

1985年3月14日，张爱萍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

“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张爱萍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张爱萍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忿忿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关于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问题，有的大力提倡。张爱萍则坚决反对。

他说：不客气地讲当时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遍查古今中外，有哪国哪朝军队在这样大张旗鼓、大规模的搞生产经营。结果呢？经检部门最清楚，有多少干部栽倒在生产经营的浪潮里！社会最清楚，有多少人指着脊梁骨骂军队！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是“饮鸩止渴！”

“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哪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八十年代末张爱萍成了“茅坑的石头”

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张爱萍同几位将军一道上书中央，反对用武力镇压群众。

事后，张爱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说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们知道吗？”这“是表扬！又臭又硬的石头，原则性最强。”“我不光是石头，还是搅屎棍，四川人说，闻（文）不得，舞（武）不得。就是不让闻、不让舞，谁也别想摆弄我！”

九十年代初张爱萍不同意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

张爱萍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看法和别人不太一样，有些人认为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可小看，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制度的根本性问题情况，譬如说改革为谁？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这部分人是谁？

一九九二年，报纸上有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吗？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公正公平。”

九十年代中期张爱萍宣传南街村

一九九四年，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不久，有人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张爱萍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张爱萍的这封信。

7月24日，张爱萍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张爱萍的建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张爱萍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11点过了，他还要等。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张爱萍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张爱萍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

“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

人。”“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跟班劳动；报酬中等偏下；好！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 2 5 0 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有的党员，更坏！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左派杂志《中流》写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有人认为，张爱萍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张爱萍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张爱萍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谈的结果，“没有明确的态度。”

有人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张爱萍终于挤出一句话来：“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张爱萍视察南街村回京后，他就满怀热情地宣传、推介南街村；凡是有人去拜访，他就极力建议他们到南街村看看；凡是看到南街村有新变化、有新举措，他就写信或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对中国大地上绽放的这株‘豫南花’情有独钟啊！

这就有了后来 170 位将军来南街的故事。这样的社会影响，张爱萍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对张爱萍的评语——这个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

邓小平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张爱萍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在社会主义时期，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真理？

毛泽东关于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批判邓小平的指示是不是真理？

在张爱萍看来，这些统统都不是真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他不再跟毛泽东了；在张爱萍看来，文化大革命今不如昔是真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真理，如是他紧跟邓小平了。

当然，一九八五年以后，张爱萍认为，搞军队经商不是真理，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不是真理，搞包产到户不是真理，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大概也不能说是真理，他不那么紧跟邓小平了。

2010 年 6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二章第七节 整顿党组织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末，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1975.07.17； 中发 [1975] 16 号

1975年7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报告。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下发。中共中央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是同意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又是领导班子问题。

党内存在很多问题，成份、思想、作风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有部分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不纯。

现在学校提出不读书是毛泽东思想。现在连科学研究都不敢讲了。要把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搞清楚。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全党都有这个问题。

整党重点放在领导班子，党员的问题容易解决。

老干部过去犯过错误，不一定是坏事，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难得的。只要不搞阴谋诡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要用，发挥他们的作用。

特别要注意中年。无论是工厂、农村，四十多岁的人，至少有二十多年的经验，有十多年的领导经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有比较全面的经验，要选这些人。

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没有经验的，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

领导干部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只要按照主席的方针、政策、路线去做，不要怕嘛，错了就改嘛。横下一条心，拚命干。半年来，我们讲的中心是“敢”字当头，敢于反资产阶级派性，敢于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还是要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派性还得批，但也要慎重。要发动群众批派性，群众运动这点不搞不行。

现在有的地方政治上平反了，就要纳新，要提干，就是平、补、纳、提，还有官复原职，这些都要顶住。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预备会上的讲话有部分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不纯，主要是“双突”的问题，影响很大。这就涉及到新发展的党员，新提拔的干部，符不符合主席指示的五条标准。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讲话摘录

学习理论不够，提拔干部中有问题，宣传毛泽东思想观点混乱。

我从来不反对老、中、青三结合，但是不可忽视“中”。好的苗子也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否则不是爱护他，反而害了他。宁可每个台阶的时间短一点，也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来。这段，从工人、农民中一下提上来，一般效果都不好，他们工作中有困难，这样提上来，弄不好反而害了他。因此，现在军队里职务先不变，下放，一级一级锻炼，叫做“挂职下放”。

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他们根本没有经验，一律下放基层锻炼改造，以后这些人下放，统统都由省委决定，中央发的六九年那个文件（指 61 号文件规定，各级革委会成员增补、调动、撤换需报请中央或上级革委会批准）不算数啦！

青年，根据这几年的经验看，提拔太快了。效果不太理想。“火箭式”的干部。还是步骤的提拔好，和台阶一样，一阶一阶的上，不能跳着来。职务高了，没经验。上去束手无策。怎么办，不能抹掉，叫做“挂职下放”。

贰、本节简论

邓小平搞全面整顿说核心是整顿党，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在于怎样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

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搞的那一套所谓整顿党、整顿领导班子的作法指出：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在一次谈话中说：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們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

邓在省市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可见，在整顿党的问题上，也存在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

2010 年 7 月 5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二章第八节 各省的整顿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以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十万人的大会。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法办三十三三个“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 9 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报告》反映：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报告》总结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考江苏的经验，解决各地区的问题。

全国许多地区推广徐海经验。

河南“刹住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之风，把双突上来的十多万人，区别情况作了处理”。

浙江“抓了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为坏头头张永生办了审查学习班”。

“这一系列整顿，沉重地打击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帮派势力”。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人民公社社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路线觉悟普遍提高，“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工农与各大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省呈现了一片大好形势。

正当全省人民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革命运动时，以林彪、刘少奇一伙在浙江省死党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它们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

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邓小平接见×××等时的谈话摘录

找你们来，就是要象××省、××省那样，把重大问题一起拿来解决，不光是解决那三个人的问题，解决派性问题、班子问题，态度要坚决。班子要配好，才有人办事。

××省的情况你们知道不知道？大批突击提干，实际上是夺权，领导权都是人家的了，全省资本主义复辟严重得很。

××部那是最冒尖的单位，现在一搞，也理出个头绪来了，总是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总是有那么几个人要骂的，随他去骂，无非是让他骂十年。

你们军区那些人为什么不多调换一些？（×谈到×××同志的工作，希望中央找他谈谈话）要谈，要调出来，总参准备成立顾问班子，老同志调到这里来。军区的要调换，下面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也要调换。听说你们那个“×××不听指挥，……把他狠狠训了一顿后好了一点。这种人要撤，不撤也要降，不能放在那里。分区、武装部也要调换。

（×讲到×××同志时）调出来，或者退休。本来去××省是养老的，怎么又当上省委书记？

（×讲到有的把安排老干部说成是“复旧”）无非是讲这些人搞复辟，后台就是我。

××军就是七个秘书专政。

民兵指挥部，××省都解决了，你们为什么不解决？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对×××同志的谈话

（你）去了，还是搞班子，反资产阶级派性，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搞。相信你去会把工作搞好，我不怕你在工作上出什么问题，就怕你勇气不够，不大胆。靠边站了这样多年，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正确吸取，不敢大胆负责，要怕就怕你这一点。×××到××省，×××到××省也不过是几个月时间，局面就改变了，主要是大胆，不怕。现在有些干部就是怕被打倒，不要怕被打倒，不怕犯错误。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如果把工作搞好了再打倒也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提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不要顾虑多得很，怕这怕那就办不好事情，毛主席的路线就贯彻执行不了。

你去了，班子问题你考虑，关键是团结、使用老干部，解放老干部。有的人无非要说你是“还乡团”、搞“复辟倒退”等等。（×：我一安排老干部，有人就说“峨嵋山幽灵和乌山幽灵结合起来了”，搞“右倾复辟了”）他说他的，搞事情总是有人要反对，不要怕。反正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要调整，老干部要依靠。

（××同志讲到最近下边有许多政治谣言）主要是报上发表了评《水浒》的文章引起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江渭清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

中央领导同志在同我个别谈工作时，对我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

中央领导同志说，浙江如果不把翁森鹤抓起来，安定得了吗？徐州不把顾炳华抓起来，安定得了吗？七机部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就不管你六十多岁，五十岁，老的新的都要摸，摸一下就好了嘛！

中央领导同志说，要发动群众批派性，群众运动这点不搞不行。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有些省九号文件以来，一再错过了时机，没有发动群众批派性。

中央领导同志说，象翁森鹤那样的人只有那几个，只有那么一点力量，没什么了不起，可能有人支持。

当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落实政策时，平反后还要补台当委员。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政治上平反了，就要纳新，要提干，就是平、补、纳、提，还有官复原职，这些都要顶住。

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要补台，那就是补派性嘛，那怎补呢？

中央领导同志说，民兵指挥部要彻底解决问题。

贰、本节简论

关于各省的“全面整顿”情况，目前收集到的材料不多。

这里，可以把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大搞“全面整顿”的情况，简单地归纳一下。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就放手大干了。他先后又提出要整党、整顿文艺、教育、科技。他派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由周荣鑫整顿教育，李先念、万里管工交。胡乔木、邓力群主管理论工作。”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9月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整顿”。”

“为了与四人帮所控制的舆论相对抗，邓小平还组建了自己的理论班子，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来还想出版自己的刊物《思想战线》，后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未办成。”

“在全面整顿进行到一定深度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草拟一些文件，以把整顿的成果固定下来。这就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称为“三株大毒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20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

邓小平抓整顿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七月九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顿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邓小平要利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七月十三日，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当时全国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问题，这时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政治思想的重点扭转到这方面来。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样，就把邓小平的意见挡回去了。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七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人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

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8341 部队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十八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

2010 年 7 月 12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二章第九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

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批示：“同意。”

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周恩来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说：我这是最后一次与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

一九七五年七月某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

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

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

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

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

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周恩来嘱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出送阅。

一九七五年某月某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谈话

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王、张、江、姚）手里。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李天德把自己写的《献国策——致党中央、国务院》送到党中央接待站

它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超过好处。

它说：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

（李天德原在四川苗溪茶场管制劳动，事后，四川省芦山县将他判了死刑，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 20 年徒刑。）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 388 页）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该校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

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
1975.08.14；中央文件 [1975] 196 号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嘱身边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篇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书送阅。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周恩来说：我现在病中，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录音组同志的讲话

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

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受不了了。我顶嘛。说文化部是个大行帮。

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为什么主席的指示未经政治局讨论就传到下面去？个别的省委还往下传达了。

“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他们攻击我，就是攻击主席。”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

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签上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一九七五，九，二十。

躺在平板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再次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

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说：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摘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 391 页）

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向毛主席汇报时，还谈到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的问题。

我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发言后，邓小平讲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起，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责令周荣鑫作检查。

周荣鑫说：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

张春桥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迟群一九六八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摘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 393 页）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一千七百多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过去只有河南同 80% 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在国务院会议厅，邓小平找胡耀邦、李昌、胡乔木、周荣鑫谈话。

邓说：“你们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工作，不了解情况。”

对周荣鑫说：“你是教育问题。”

(1976年2月16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一是支持新生事物；一是教育革命；一是讲文化大革命成果稿。

天津讲教育一文，改了以后，还觉得不够尖锐。我的意见和教育部高教司相反。高教司认为没有针对性，要讲整顿领导班子。我认为有针对性，不是讲多了，讲得还不够尖锐。现在教育革命有一股歪风，实质是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有两种人，一种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包括批林批孔在内，是极少数；一种人是心里有气，受冲击，落实政策解放出来，应正确对待群众。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群众冲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要群众每句话都讲得那么正确，可能吗？清华正在展开一场大辩论。对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要批判，有气的要做工作。要继续落实政策。我和埃及外宾谈话，说教育革命要不要搞？如何搞？成绩和缺点，什么是主要的？在工农中招收大学生，学了回去，对不对？朝阳经验对不对？有的人骂？有什么不能学呢？朝阳经验是很好的。以学为主、学工、学农、学军，对不对？开门办学这个大方向对不对？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口号该不该批？苏修一套该不该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如何实现？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开始的，教育战线有两条路线斗争是必然的，不仅教育战线，别的方面也有。

主席最近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主席的思想本来很明确，路线是个纲，阶级斗争是个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基本路线就是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阶级斗争是纲。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九大、十大都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经验，要抓大事，抓纲，是根据主席指示来写的。不抓阶级斗争，就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就会迷失方向。根据九大、十大路线，强调三要三不要。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可能有些缺点，应该总结经验，在前进道路上逐步克服缺点。这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目的是要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斗争，但从资产阶级立场看，调整就是否定一切。和二百方针一样，不同阶级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当前，有些政策要继续落实，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但对教育（也不仅是教育）中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搞清楚。前一段传的多，比较乱。现在普及大寨县，大寨县普及了，并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建成大寨县是为了更好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更好地贯彻主席路线，不是阶级斗争消灭了。

鲁迅有篇杂文，“关于翻译（下）”，收在《准风月谈》，讲批评应该象挖烂苹果。苹果有点烂，只要不是穿心烂，就要挖掉。但有些批评家，一见苹果有点烂，就认为是不能用。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那有这个可能？鲁迅这个思想可以做文章。

唯生产力论，还是应该批。当然，生产要抓上去。唯生产力论的根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要熄灭，但他包庇他的死党叛徒，是熄灭吗？林彪也没有熄灭，搞政变，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唯生产力论就是否定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主席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还是列宁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一回事。不能用批法权思想来代替限制法权。主席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有两个意思：一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限制不行；二说是长期的。这两个意思，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都不能表达。法权思想当然要批，但限制资产

阶级法权有具体的内容在内。如体力强弱，子女多少，收入不同如何办？当然具体问题要慎重。主席几次提出要研究。要学习理论，限制法权，主席的三项指示，第一项就是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

这个问题不打个招呼，教育战线一批干部会掉下去。是有这么一点风，小道消息甚多，不能听。没有中央讨论，甚至主管同志都不知道。

这里，还是一个主流支流关系。要看到主流，肯定主流，发展主流。支流也有，要逐步解决。我们不回避问题，包括文艺政策要调整，这都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否则就会犯错误。从无产阶级立场看，是克服缺点，更好地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立场看，就会全盘否定。

讲点对立面，否定新生事物，攻其一点，夸大支流方面，是错误的。

（惩前毖后的文章）不论新干部，老干部，都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适用各种干部。主席讲过，动不动就撤职，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教育上还有一个口号：刘少奇的十七年要批，林彪的四年也要批。把二者分割开来，其实都是右的，林彪也是搞修正主义，先验论。天才论就是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错了，工作方向就错了。说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不是说学生都是坏的。如果不讲十七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那么就推翻了主席五七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然我们对知识分子政策不变。

我们历史上有经验，只要我们解决一点支流的问题，资产阶级就要跳出来。57年整风，右派出来，59年，纠正人民公社中一平二调，彭德怀出来，财经会议批薄一波，高饶跳出来。林彪垮台以后，要批极左。

有人把资产阶级的观点拣起来，如对实践，说天文学能实践吗？实际天文学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农业、手工业分工，才有天文学。工业的发展，找望远镜。微积分是否实践中来的？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实事求是研究历史。

过去有人说开门办学只管劳动，不搞文化。实际有的人有抵触，带学生只劳动，不搞文化，学农就光劳动，文化、科学都不搞。学生不准带钱，教师可以买啤酒吃。

有的刮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错了的风。教育面广，人多，影响很大，不能搞乱。

资产阶级法权，如何逐步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个问题，急也解决不了。革这个命，斗争也不是很缓和的。取消军衔，好大的斗争，还是主席下了决心。现有一千多种级别。我们还是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现在还是宣传。

教育革命要肯定，讲实践主席方针路线是对的。革命还刚开始，具体经验还不多，要不断总结，但大的方向不能动摇，基本的东西不能动摇。

我们面临两方面任务，一方面有调整，落实政策，要继续解决一些支流问题，另一方面主流对不对要辩论清楚。这个问题要恰当掌握，讲清它们的辩证关系，力求避免片面性。

有的人说现在没有文化。到底什么是知识文化？主席讲，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知识，哲学就是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念了书，不会做工、务农，不会分析问题，有什么用？这不是有知识。极而言之，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但文化稍低的劳动者和培养虽然有知识但不搞社会主义的，哪个好？我们还是要文化的，要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当然也不必这样提问题。还有一种论调说，教育质量低，有的青年吸烟等，是教育革命带来的。恐怕是不搞教育革命带来的。是否青少年比过去坏？上山下乡有很多感人的事迹。小孩不赞成你就驳你，比毕恭毕敬的好。教师队伍跟不上，小学教员工资低，这不是革命太多，而是革命不够。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

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会后，清华大学贴出大批大字报。

北京大学也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实际上矛头对准邓小平。

北京和一些省市的干部、学生及群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批语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只是“提法不妥”。

（1976年3月1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

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1975. 11. 26；中发 [1975] 23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

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这个谈话要点的下达，标志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反潮流和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批林彪以来，又一次为扭转局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管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雄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毛泽东毕竟是一代开国的元勋，而不是任曹操俯仰的汉献帝。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

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前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周恩来要王洪文记住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广大人民正在以高昂的革命斗志，进一步发扬成绩，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意义和必要性都已经有了真正的理解，对于这样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都有了正确的估计。

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一个能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原则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只有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和伟大意义，才能真正懂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如果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积极支持、热情扶植的态度。

正确对待群众，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往往是同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这一点相联系的。

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它本身也是一个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现在，在教育战线上有那么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啦，“破了不立”啦，“不讲学文化”啦，等等，想把教育拉回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老路上去。这实际上是否定这几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目的是反对“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企图复辟封资修的教育制度。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事实恰恰证明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 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 12. 10；中发[1975]24 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 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元旦发表主席诗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斗争中前进。《重上井冈山》，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继续革命的决心，无产阶级不怕一切困难革命精神。井冈山是革命摇篮。主席说，我刚上时才三十四岁。

第二首是反修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续搞这一套，搞“缓和”，土豆加牛肉，今年农业最坏，降到最低点。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已破产，土豆牛肉都没有，发表（这首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批修中前进。第二首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首很凝练，第二首通俗，口语化。我请示主席能否写手稿，主席没有拒绝。

当前，中央准备把打招呼要点，根据主席指示，扩大传达，你们明后天可接到通知。国家机关向除司局长传达之外，（要传达到）全体干部，下面传达县团外，还要传达到学校党支书、工宣队长，明后天通知。这等于到基层，现在整个形势是好的。这次教育战线的辩论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进

行的。有些问题比较明确了：一个是运动的范围，主要在教育系统，和一部分机关，如教育部，别的机关，其他地方也会波及。中央通知已讲明，清华问题不是孤立的事件。这次不搞战斗队，不拉山头，不停课，注意不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已有的经验，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些经验。

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工作，还是违背基本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宣传过，但他自己根本不熄灭，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包庇叛徒。林彪也不是阶级斗争熄灭，他谋害主席，搞反革命政变。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席在二中全会讲，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际，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后主席就一再抓这个纲，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主席又指出社会主义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在上层建筑领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教育战线，过去结论有两个估计，一是过去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政，主席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那是主席在宣传会议的结论。六二年主席又讲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周荣鑫讲，主席没有讲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主席讲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难道不包括教育？斯大林过去有错误，三六年宣布阶级消灭了，五二年有一些认识。

主席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要把这个问题的大是大非搞清。教育战线上也是如此。基本路线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清阶级斗争问题。三项指示为纲，主席不赞成这个提法。都是为纲，就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这个问题，九大十大都讲过。九大报告有很大一段，根据主席指示写的，和陈伯达有争论。以三项指示为纲，理论上不符合毛主席一贯指示，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仍是基本路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这才符合基本原理。纲的问题，在教育上就联系着要不要批智育第一。政治是统帅，以政治为纲，智育第一当然是错误的。智育第一必然不要阶级斗争，就陷入修正主义。我们教育上不是没有问题要解决，但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搞智育第一，有一系列问题要被篡改。对我们的同志要多做工作。有的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少数，多数

同志是受了些冲击，有气，不满，就要做工作。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河南做了，打了招呼，多数干部站出来，百分之八十没有被打倒。讲过错误的话，和翻案的要区别。这次层层打招呼，当然也有一个听不听招呼的问题。多数同志和刘冰有区别，刘冰翻案很恶毒，但对他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教育战线上的争论，理论上要写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驳掉一点论点。如拖四个现代化后腿。这个说法相当普遍。要分析我们讲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什么。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现在没有人讲，我们分析一下。苏联农业机械很多，现代化，但粮食没有，还要从美国进口。我们要这样现代化吗？讲清是不是拖后腿。

“今不如昔”，总说不如过去。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工业、农业、文艺，稍作调整，发展很快。最近文艺出了很多东西，很高兴。这是文化大革命成果，如无样板戏，文艺如何能蓬勃起来？

教育上的论点，也影响科研。认为质量低，也是一条。怎么说低呢，政治、文化都和过去不同了。

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是歪曲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他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主席讲，首先是包括，然后才是不能代替。包括，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制造这个论点其办法是陈伯达在庐山上用的，断章取义。怎能说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没有用呢？马列主义也吸取改造自然科学成果。如说没有用，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论反映论等，还能不能成立？开门办所，和工农结合，还对不对？还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也有争论。基础理论是从应用科学来的，公式是实践——理论——实践，不能倒过来（主席同李政道讲话）。要有有说服力的文章，讲清楚。

批派性（不写文章），也要有阶级分析，还是《红旗》过去的文章的观点，具体处理要分清两类矛盾。

老中青是主席讲的，最近又批一个报告，仍要注意三结合。换一个提法，就完全取消老中青了。

开名单，各单位老中青三个人来中央开会，议一议，就议这些，提高认识，会何时开未定。老同志经验是可贵的，有一个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新同志要帮助，有错误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席讲，老中青都要打招呼。

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思潮，得罪了大多数人。知识分子也不高兴。有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积极性都光了。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不高兴，连谢冰心，费孝通都不赞成。这次辩论的重点不在知识分子，在党内，如刘冰（本也是走资派）一样的人。他们反对教育革命。知识分子欢迎他们投入教育革命，投入运动中来。现在左派反对他，中间派知道他翻案，都和他划清界限。有一位知识分子说，过去田汉请命，周荣鑫又为我们请命，不要他请。

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反来复去。我们根据九大、十大一贯教导，进行宣传。也要搞一点学习理论，评水浒，大辩论，把生产搞好，生产上去了，搞基本路线教育，生产上去了，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抓纲，生产上去了这样的典型。批林批孔时也这样。

学校，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经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贯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二百方针，推陈出新，根本的还是抓纲。

清华、北大运动搞得很好，走上正轨，在校党委、总支、支部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搞，逐步扩大会，开一次会，训练一次干部，展开后形势很好。希望其他单位也这样，不搞无政府。

要依靠团结干群大多数，教育大多数，刘冰等人得罪大多数。主席中央讲话之前，即有人抵制。主席一讲，刘冰就很孤立。我们团结教育大多数。他们文章讲理的，比较好。

扩大传达之后，还会出现问题，一种是压得厉害的，如黑龙江大学，要封人家杂志，一种两派对立尖锐的地方，团结不好。明确在教育机关，其他也会波及。

刘少奇，四清四不清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还有七二年林彪路线是左还是右，离开阶级斗争就看不清。重新回忆，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周荣鑫讲刘少奇十七年要批，林彪的四年也要批，把二者分开。

三项指示，理论问题放在首位，我们一直提的。辽宁报告提出，提三项指示为纲，即否定理论为纲，结果必然是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路线正确 破浪前进——喜看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 12. 14；中发[1975]26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上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 1、阶级斗争为纲
-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通报》

（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同志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

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朱德和周桓（原辽宁省委书记）谈话

朱德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满意，并赞扬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

他针对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说：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摘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 393 页）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周恩来和邓颖超谈话

周恩来说：“我不能喊叫，喊叫会让人恐惧的，好像真是个投降派。我不能那样，我不愿意让毛主席在我死后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呀。小超，你可应该有主意，一些人的话是绝对不能听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气节，要对得起毛主席。我知道毛主席对我好，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我有许多的话想说呀。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听懂我的话。我怕我的话会被人误传。”

邓颖超说：“我也很多的话要向毛主席讲。但是，我也是没有机会。”周恩来说，“毛主席，毛主席，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毛主席的运动神经原病果然就治不好了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毛主席的身体……”

邓颖超说：“恩来，你安心休息吧，主席那边的情况很好。”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毛泽东与几个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总理点的将，让他主持工作，说他工作有能力，能够打开局面，现在公开批判小平同志，会对总理有刺激，你们还是慢慢地让总理自己表态吧。”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华国锋看望周恩来

华国锋是奉毛泽东之命和周恩来谈话的。他向正在输液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问道：“那么邓小平还能继续工作吗？”

华国锋说：“主席说得清楚，小平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一边检查一边工作。”

周恩来问：“主席说的是右倾错误吗？”“你看他的错误严重吗？”

华国锋说：“那就看他怎样检查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还会和你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清华大学的问题是一个右倾翻案性质问题。毛主席认为刘冰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主席。主席看起来很生气，说这个问题要通过大辩论来解决。信的错误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我早就对小平同志讲，要避免争吵。和没有水平的人争吵，自己也没有水平了。我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其实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相当难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绝对不能想当然。他就是要往是非堆里卷。这下可好了，又碰钉子了。”

华国锋说：“主席想听听总理的意见，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务院的工作……”

周恩来说：“我看还是请主席考虑吧。小平同志既然不能再主持工作，那当然轮到春桥同志了。实际上。国务院当初的工作由他主持就好了，也许就不会出现小平这次犯错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时候，我就对张春桥同志讲过，你要做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你干比其他任何同志都合适。当时是主席不同意的。主席对我说过，‘你周恩来活一天，就是你当总理。其他人谁也不能和你相比。’三月十七日，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参观全国黑画展览时，再次提出让春桥同志多管国务院工作的意见，江青也说要照主席的意

见办。我病重时，主席说只有邓小平同志还能压得住阵，老的新的都怕他，其他人不行，这才由小平同志主持了工作嘛。”

华国锋说：“我认为，主席丝毫没有怪总理的意思。主席只是让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最好能让小平同志作个检查就行了。我看问题并不很大。主席对小平的评价后来是很高的，这点我也清楚。主席在批评小平的时候，对江青同志和春桥等人也作了批评。这是主席对他们的爱护。这些我都能看得出来。”

周恩来说：“我过去是听毛主席的，现在是听毛主席的，将来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仍然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只要毛主席决定的，我就无条件地服从。这点请党中央放心，我咽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跟毛主席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张春桥来看望周恩来时，给他带来了一批材料，题目是《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当天就戴上老花镜看完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下旬，王洪文看望周恩来

周恩来说：“洪文，毛主席怎么样？他的身体好吗？”

王洪文说：“总理，你放心，主席的身体好多了。他要我来问候你，让你多加保重，留得青山在，一切都好办呀。”

周恩来说：“听说小平同志又犯错误了，我要批评他。毛主席对他是很好的，他不应该让毛主席再为他操心了。”

王洪文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批判诬告迟群的信时说：“当时要是让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就好了。”

周恩来说：“让他们暴露一下也好嘛。右倾翻案，总有一天要翻不成的。”

王洪文说：“总理，你的心情是好的，我们都理解。我们衷心希望你能恢复健康。”

周恩来说：“我早已收到了马克思的请贴。我本想让邓小平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抓好，没想到他辜负了主席和我的期望。他的性子太急了。我已经看完了《鲁迅全集》中关于评论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段落，我同意鲁迅的看法。各种版本的《水浒》我也看了，新、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传》的文章我都

看了。我同意主席的评价。过去，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些东西。在我有生之年补上了这一课，也好呀。但是，我绝对不是宋江，我不作投降派。”

王洪文说：“总理，你不要多心。主席领导的评论《水浒》，是对全党的一个历史经验的教育，不是把矛头指向你的。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这点，我请总理一定要理解。”

周恩来说：“你替我转告主席，我不能再为党做工作了。我感到有愧于党，有愧于主席。”“主席发动的评论《水浒》，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水浒》里的宋江，在招安以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原来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变了‘官兵’。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一十五县，改造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他‘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我同主席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话，你一定要转告主席。”

王洪文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向毛主席报告的。”

贰、本节简论

一、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警觉？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此时的毛泽东，很想知道邓小平的整顿的实际情况如何。他一方面通过地方上的汇报文件和人民来信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地方上的同志那里直接了解情况。”

“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警觉的直接起因是两件事：刘冰等人的信和毛远新的汇报。”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其实，局势发生陡然逆转并不奇怪。毛泽东观察邓小平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件事、两件事。

正如胡绳的《七十年》所承认的：“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情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七十年》第 456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承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

这当然与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不是一回事。而且，邓小平重点整的对象是造反派头头、江张姚王等文革派的领导干部、甚至有些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本人。

这不仅说明，邓小平在斗争中已经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而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所谓“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二、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整顿怎样评价？

从一些事情来看，一九七五年的周恩来似乎是完全站在邓小平等人一边的，譬如：

四月批评王张江姚的政治局会议，虽然周恩来没有参加，但会后他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会议进行的情况，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邓小平等人的做法；

七月，周恩来嘱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出送阅。这说明他是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事件的发展。

九月二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现在病中，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邓小平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说明他对邓小平在五、六、七、八月搞的所谓整顿是充分肯定的；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这说明他对评论水浒的宣传是反对的；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签上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一九七五，九，二十。这说明他非常警惕有人在他身后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他躺在平板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说明他要公开表示对邓小平搞整顿的支持；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这说明他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可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人不同：

一九七五年一月，叶剑英就提出：“能不能果断些，把江青这伙人赶出政治局呢？”周恩来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席对我说知道他们的历史状况，并没有说明他的态度，再说，主席既然一手把他们培养起来，是不会轻易地把他们再否定掉的。除非他们自己又犯了大错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人家有什么错误呀！主席对我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加强团结，而不是搞分裂。谁搞分裂，谁就是蒋介石。主席的这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嘛。”

一九七五年四月，邓小平对周恩来说：“我早就对江青和那个张春桥看不惯了。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我看是乘机出现的政治暴发户、阴谋家。叶帅和许多的老同志，都对他们的做法看不下去了。他们要是再反对你，我宁可再次被打倒，也要为你鸣不平。我怕什么，别说毛主席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就是身体再健康，我也敢和他们对着干！”

周恩来说：“主席说：‘小平如果真正能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在行动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那无疑是对党的事业的杰出贡献。我希望小平同志能够干几件漂亮的事情，让举世都看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要端正党的路线，真正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主席的这个期望，你可要牢牢记注呀。”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邓小平对周恩来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要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她的矛头始终是针对你的，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听到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要造舆论打倒你，都气愤得要造反。大家再也不能容忍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秀才们肆意妄为了。如果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大家就主张要采取逼宫的办法……”

周恩来说：“我不爱听这些脱离党的原则的话。这些东西，你就想也不用想。我是坚决不会同意你们这种胡闹的。本来你们的工作很好，这样下去，就会出问题。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你们考虑过吗？”

邓小平说：“大家的这种议论，也是出自对你的关心和衷心的热爱，如果不同意，大家是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同志们最为感动的，就是你对毛主席的那种忠心。你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正忠臣。”

（摘自师东兵：《闻所未闻的周恩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 and 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摘自师东兵：《陈永贵访谈录》）

这说明，周恩来的政治立场与邓小平等人有根本的区别：

第一，周恩来是坚决拥护、执行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而邓小平等人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第二，周恩来爱护、支持江青等人的工作，只是批评、纠正她们的在他看来的错误；而邓小平等人是把江青等人当作所谓的野心家、阴谋家，加以打击、镇压、消灭。

第三、周恩来是坚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路线；而邓小平等人是要架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三、毛泽东批准的“谈话要点”的重要意义

这个谈话要点的下达，标志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反潮流和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批林彪以来，又一次为扭转局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管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雄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任曹操俯仰的汉献帝。

2010 年 7 月 19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2 日修改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一节 一九七六年的形势和任务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一九七六年来到了。今天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写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吟诵毛主席的诗词，放眼祖国万里河山，纵观世界革命风云，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对夺取新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

今年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教育战线的大辩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

苏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搞“声东击西”、玩弄“缓和”骗局最起劲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是今天最危险战争策源地。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央机关原副部长和省、市、自治区原副省长以上干部的审查情况（六十一人）草稿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阶级斗争 促春耕生产》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三项指示为纲”有力的针锋相对的批判。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对推动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将起巨大的作用。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把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位置，好象只有他们才关心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丢掉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纲，篡改了党的基本路线，国民经济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反右倾翻案 促工业生产》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搞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搞清楚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矛盾性质和处理方法，分析党内产生走资派的政治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总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对于革命的领导阶级尤其重要。

要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围绕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批判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批判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有的企业联系工业战线实际，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提倡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重搞“条条专政”；反对“两条腿走路”，片面强调大的、洋的；反对“鞍钢宪法”，鼓吹“马钢宪法”等修正主义货色。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好象只有他才关心生产，只有他最热心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完全是欺骗。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把生产搞上去，要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于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就告诉我们，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搞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也好，现代化也好，都会走到邪路上去。按照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去搞，决不是发展生产，而是破坏生产；决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化”到资本主义那里去！

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设军队——纪念《五·七指示》十周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清楚地规定了我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和建设方针，重申我军不是单纯打仗的，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要求我军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阶级

斗争中加强建设。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批判资产阶级，是我军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

批判资产阶级，当前就是要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毛主席最近指自：“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长期以来，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有大量的罪行。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以“四个现代化”和“关心群众生活”为幌子，搞他那套“白猫、黑猫”的唯生产力论。他制造政治谣言，大搞阴谋诡计，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从去年夏季刮起来的右倾翻案风到最近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事件，根子都在邓小平。象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成为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我们必须集中火力，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平否定军队建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出了什么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公然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相对抗。他继承彭德怀、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衣钵，搞单纯军事观点，把我军的任务缩小为打仗一项，搞唯武器论，反对人民战争，他散布今不如昔，否定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的新功和取得的巨大进步。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记者报道《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江青对送审翻译影片的意见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的报告，现转给你们。

当前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前一个时期，有些人总是说，钢铁上不去，是由于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跟不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对于钢铁工业内部的问题，则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而这恰恰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现在，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推动下，在中央今年九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令人十分高兴的是，石油工业一直是领先高速度地发展着，近两个月煤炭生产也上去了，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都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计划水平。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欠产的状况。如果说，过去钢铁上不去是受了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的某些影响。那么，现在外部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再拿这些作为上不去的理由，那就更加说不过去了。

应当看到，大多数钢铁企业的情况还是好的。北京、上海、天津、唐山、本溪、马鞍山、大连、大冶、抚顺、西安、西宁、邯邢等地的钢铁厂和矿山，以及一批中小钢铁企业，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直很好。欠产多的，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几个大钢厂。就在这几个大型钢铁企业里头，太钢最近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群众发动起来了，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三、四月份都完成了国家计划。太钢的例子，把有些企业被外部条件掩盖着的内部问题，揭示得更加清楚了。

那些至今钢铁生产还上不去的企业，有关的领导同志应当认真地检查一下：你们那里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不是真正开展起来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地打击了？总之一句话，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不是真正落实到基层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早就指出，发展工业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这个思想，必须牢牢确立，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毛主席一九七〇年在谈到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时候还说过：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

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事实完全证明，我们许多人觉悟了，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了，按照鞍钢宪法办事了，钢铁生产就上去了。如果与此相反，仍然不觉悟，还有可能上不去，甚至还会出现新的徘徊。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已圈阅。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全国铁路系统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但是，也有个别地方、个别路局，由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比较严重，当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领导很不得力，少数人干扰批邓斗争大方向，运动没有走上正轨。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铁路作的领导，要有一名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来抓。中央认为，只要象大同市委和大同铁路分局的领导同志那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站在运动前列，带头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带头批邓，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这些路局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央重申：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要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对破坏铁路运输的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

中央号召全国铁路广大职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努力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批邓。坚守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用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迎着风浪前进——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十周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们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浪中英勇搏斗的十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斗争中阔步前进的十年。

毛主席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又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主席号召我们：“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在毛主席的号召和伟大实践的鼓舞下，我国群众性的游泳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江河湖海去锻炼，蔚然成风。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因地制宜地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泳活动和其他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革命意志，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四度，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各级党组织依靠群众，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对受难的阶级兄弟尽最大的努力进行了抢救。人民的衣、食、住、医得到了安排。被破坏的交通线路迅速修复。唐山、丰南一带的生产逐步恢复。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邓

全国情况：唐山抗震救灾对大家鼓舞大，对全国教育鼓舞，支援灾区，有地震可能的地方也吸取教训，如山东、山西。阶级斗争方面，有的地方有谣言，包括政治、地震都有，坏分子有活动。第二，有人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转变纲，去抓生产，这是个别的，属于党内的思想动态。是否仍然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唐山的抗震斗争说明文化大革命深刻意义还是相反？第三，有点忧虑，今年又是天安门事件，又是总理、朱总去世，又是地震，还会不会出什么事？天安门前和阶级敌人斗，战胜天安门广场政治地震，天安门仍壮丽，又战胜自然灾害，好的是主要的，生产好了，以自己努力把灾区损失补回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毛主席已圈阅。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中央发了慰问电，派出了慰问团，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十几万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名医务工作者，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迅速赶赴灾区，抢险救灾。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及时支援了大批抗震救灾物资。

灾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深入批邓，抗震救灾。各级领导站在斗争前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解放军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先人后己，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同自然灾害斗，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许多奇迹，取得了重大胜利。大批受难的阶级兄弟及时得到了抢救。伤员得到了妥善治疗。受灾群众的吃、穿、住得到了安排。铁路、公路全部修复通车。供电、通信线路迅速联通。灾区农村恢复了生产，正在学大寨，夺丰收。唐山地区的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开滦煤矿开始出煤，

唐山电厂开始发电。天津、北京人民坚守岗位，抗震救灾，以更大的干劲抓革命促生产。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整个灾区到处是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这一切充分证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我们的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经得起严峻考验，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方受灾，八方支援，组织起来，人定胜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要彻底战胜这次地震的严重灾害，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城镇、农村，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还要作很大努力。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实际，集中火力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革命团结，推动各项工作，发展大好形势。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学习灾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用更大的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夺取全国农业的大丰收，生产更多的煤炭、钢铁、电力、机械、化肥、医药和轻工业产品，一定要搞好铁路运输，完成和超额完成铁路运输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努力争取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努力做好支援灾区的各项工作。支援唐山、天津恢复生产的单位和承担生产、运输抗震救灾物资的工厂企业，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担负治疗伤员任务的单位，要继续努力，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反革命，对于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煽动哄抢物资、破坏交通运输，要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对其中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各级党委要检查一下今年以来的工作，按此通报精神，与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对今后四个月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加强领导，促其实现。

中央相信，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英雄的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新胜利，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九月一日在北京召开了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来自唐山、天津、北京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三千五百多名代表，带着灾区人民的深情厚意，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报抗震救灾的胜利成果，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批邓促生产》

唐山、天津等地震灾区积极恢复生产。全国许多工矿企业和农村社队勇挑革命重担，努力增加生产，弥补灾区损失，纷纷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

我们要乘胜前进，响应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学习，深入批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用更大的革命干劲，努力完成各项生产建设任务，努力完成今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巨变的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

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七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一九七六年七月，朱德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

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逮捕革命左派的政变。

2010 年 7 月 2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4 日修改

第三章第二节 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池恒的文章《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各个领域里，主要矛盾也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领域里的各项工作，都有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即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在这些领域里实行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着的争论，尽管涉及了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许多问题，而最根本的还是教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

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真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好好学习大庆和大寨的主要经验，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还有一个汇报提纲。代表科技方面一条修正主义科学路线。可以抓住根本论点来驳。如所谓马列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要有自己钻研，要有亲自试验，才能发言。那么，列宁批判马赫是不是也要有自己的亲自试验，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力学，是不是也要自己去作试验来证明？主席和杨振宁辩论，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没有所谓基本粒子。是不是也要亲自去做实验才能证明。这种论点是根本上否定自然科学方面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过去在自然科学上唯心论许多都是党员，如卢那卡尔斯基。还有一种论点著名科学家不能随便批他唯心主义，恰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很多都是

著名科学家，例如马赫，现在还用马赫数。牛顿也是有名的，自然科学上有名的，有成就的，很多都搞唯心主义。像这些很荒唐的论点，都放到汇报提纲里去了。

有一种论调攻击什么开门办所，管他开着关着，走着躺着，只要写出文章就行。

哲学上讲，三项指示为纲是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主席批判罗瑞卿时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告诉我们对折衷主义要警惕。折衷主义否认政治挂帅，要从哲学思想搞清楚、马克思主义讲全面看问题，和折衷主义要分清楚。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宣扬唯生产力论，反对从政治看问题，也搞折衷主义。列宁批判过。主席批刘少奇、罗瑞卿，也批判折衷主义（罗已解放，我是讲历史）。折衷主义易为一部分政治上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所接受。前一时期，有时分不清楚。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但和折衷主义不同。辩证法要讲党性，折衷主义不要党性。辩证法讲重点，折衷主义不要重点，抹杀重点。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折衷主义二者都要，但不讲政治是统帅。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纲，折衷主义就把它并列起来，元旦社论提法彻底变了一下，不并列。主流支流，辩证法讲都要看到，但不能用支流抹杀主流，折衷主义又把它平列起来。成绩缺点，辩证法要求首先分清西安延安，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还是三分成绩，七分缺点，折衷主义又使他混淆起来。用这样的事例把它讲清楚。折衷主义实际是机会主义。哲学上搞清楚很有必要。折衷主义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联系在一起，对立阶级之间可以调和，农民、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能调和的，折衷主义认为可以调和。

说科学院内最大危险是派性，忘记了列宁说过哲学上的党派斗争，二千年就是斗争着的两个党派。学说上也有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沈阳机电学院二张大字报，第一张说大学生和工人“划等号”，这个论点很值得注意。他们也是工农兵学员，提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要做工人贵族。工人中有一部分人不愿和普通工人划等号，要做贵族。英国工党不和工人划等号，但和资产阶级划等号。美国劳联、产联也是这样，也是和资产阶级划等号。工人贵族，不是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工人内部的代表。普通工人、农民、每天都在进步，主席讲过，人人都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每人都要改造。要做工人贵族的人放在工人之外。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从

实践论观点看，往往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如普通劳动者。领导常常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领导只有总结了群众经验，才能进步，才能带群众前进，脱离群众就一事无成。我们有些同志往往认为比群众高明。毛主席总教导我们，要做群众的小学生，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智慧和力量在几千万几万万普通劳动者之中。领导干部就是要向普通劳动者学习，总结经验才能前进。

除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为什么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抵触，主要是思想和精神状态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主席多次讲，文化大革命开始有的人就不理解，就反对。实际历史上这种事很多，如反对统购统销，五六、五七、五九、六一、六二年都有。彭德怀代表地富、富裕中农。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有。对此如何讲点思想。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存在社会上，而且存在党内。三反五反，开始就是这样。有的同志看不清或看得很简单，认为革一次二次命就解决了，实际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消灭阶级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是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多少年的战斗，老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大量小资产阶级都存在，大家不是都看到了？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有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看到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内按主席论述提的愿意改造的）还有小生产的影响，产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看不到党内还有走资派，那怎么行？二十三条就讲了，清华批刘冰，走资派还在走。问题是有的同志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一革就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反感，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感。总是要理解一点，要做工作，对有抵触的同志，要讲一讲。这个问题难写，能否写出来？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斯大林有一个错误，说阶级消灭了，生产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以后，斗争熄灭。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修正主义一套很容易接受。三和两全、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值得好好整一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辽宁青年》杂志记者、新华社记者报道《张铁生的新“答卷”》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报道《北大校园风雷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提高北京大学师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马天水徐景贤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邓小平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

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海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资料来源：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

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

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来信的批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13）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批示：退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6.02.02；中发 [1976] 1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张春桥日记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邓

国务院、军委都开过会，分别传达一号文件全文。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讲话，邓小平同志交代他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不适宜担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工作和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军委工作。

邓的错误路线就是代表资产阶级。

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政策。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引导的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不会象刘少奇、林彪那样。但有一条，要看他是不是改。过去说“永不翻案”，这次是大翻案。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说：“矛头是对着我的。”刘冰两封信都是邓小平同志送的，谁把矛头对着毛主席呢？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送了不行，第二次又送。问题一开始就很清楚。毛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要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随着清华运动的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在邓小平同志身上。毛主席说小平偏袒刘冰，就是说他是后台。

修正主义路线中心是“三项指示为纲”。他背着毛主席，不同政治局研究，国务院也不商量，不报告毛主席，自己就讲。过去毛主席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历来不抓阶级斗争，不抓纲。他不抓阶级斗争，是不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讲什么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三项指示为纲，好多文章都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都批了。他不仅有这些论点，还有教育中有的也批了，科技有些也批了，批胡耀邦、李昌，实际批邓的。他在科学院汇报会上有讲话。还有别的东西。

邓在这几个月讲话很多。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老九不能走。主席根本未讲过。是对外交部的人开玩笑讲的。邓在国防工业会上讲话，讲设工程师有一大段。他说，提不提总工程师，有的说一提就是保守落后的象征，一提就修了，总要有人员，总要有责任制，要有人签名，现在很多文件没有人签名，等等。

工业 20 条，未拿出来，此 70 条还凶，好厉害。在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所谓整顿，不是按主席路线、政策把企业搞好，而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顿的结果，在路线上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组织上大批撤换干部。结果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影响生产。铁路本来是好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撤干部，生产搞坏了。

20 条说所有一切专业队伍都撤掉，这样，理论队伍、民兵、文艺队伍，学理论等统统整掉。20 条讲总纲，抄邓的一段话，说三项指示是一切工作的总纲。照他的看法，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

邓又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既不懂政治，又不懂业务，一味整人，动不动就扣复旧保守的帽子。要把勇敢分子搞掉。邓的意思是指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所谓小知识分子，明明是他们的要大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要把革命知识分子整掉。不是讲敢字当头吗？怎么不要勇敢分子了呢？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

邓在省市书记会议上讲，要敢于整顿，不怕干扰。他半年来“突出一个敢字”。不管老中青三结合，说老虎屁股都要摸，要敢于整，就是不讲路线。

还有一个论点，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对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要落实政策，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抹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看看党的历史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是伤害了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这种说法，为历次批判过的机会主义头子翻案。老干部要一分为二，大多数要跟主席干革命的，个别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他说什么“教育危机”，不读书。他就是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的是资产阶级。

邓接见新西兰记者，谈评水浒。看看主席批水浒是何时。我感觉当时主席考虑就要批右倾翻案风了，邓要引开去。

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49年主席提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的矛盾，13年之后又提，即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基本路线、形势很快好转。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就是阶级斗争，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不熄灭，保护叛徒特务。林彪鼓吹熄灭，实际也不熄灭，搞反革命政变。邓也鼓吹熄灭，但也不熄灭，代表资产阶级翻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为什么我们有的同志对两个阶级的矛盾看不清，资产阶级还存在，人还在，心不死，不是看到了吗？小资产阶级还存在，还在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不是也看到了吗？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是也看到了吗？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存在，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使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会产生对这些看不清？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二十三号文件已讲）。民主革命之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前进，要继续革命，一部分党员则停止不前，有的后退，甚至反对革命。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公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有反感。搞合作化就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就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在党内，就是走资派。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走资派还在走。大官当然也一分为二。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大官们利益，一定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其实离解决这个问题还

很远。为这一部分人讲话，必然是走资派，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抵触。党内要长期教育，通过路线教育，使大多数人提高觉悟。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是右倾翻案的很重要原因。这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赞成，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不动法权。因此，要搞清主要矛盾。

减薪，主席带头搞过两次，阻力很大。对这种思想批得不够，限制法权后来换成批判法权思想。这个问题要讲清。有一个阶级觉悟问题。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仍要革命。总是一部分人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欢喜大人物压他们，要革命，一万年也是要革命的。这些人加起来就百分之九十以上。邓要整小知识分子。我们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往资产阶级方面推，他们不高兴。

周荣鑫、刘冰得罪多数，他们要翻案，很孤立，得罪工农兵、小官、学生，一切要革命的人，所以很孤立。

还有一个普通劳动者问题。上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农民划等号，想做贵族。普通工农每天都在进步，群众每天都在进步，往往下级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往往不如普通劳动者，因为脱离群众。

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改造，他们不要改造。实际大家都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不然也可能变坏。英国工党，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做普通劳动者就触犯有些人的利益，他们要扩大差别。写右倾翻案的阶级根源，主要就说这些，同时要体现政策。

当前主要问题还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已有的成果要翻掉，如文艺革命，教育革命，批林批孔，都要翻。进一步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刚刚提个头，有的人就很反感。有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有继续深入的问题。

主席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简明哲学史要倒读，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可读冯友兰《论孔丘》，冯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还可读《十批判书》尊儒反法部分。这是中国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主席哲学思想，矛盾论、实践论、内部矛盾问题。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这样才尖锐有力。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要用主席哲学思想去研究。

邓把农业学大寨，比为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猖狂向毛主席进攻。

部队也要一分为二，部队总有进步。林彪反党集团是少数人。但在邓眼里都是一团漆黑，什么也不行。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要老家伙出来，不讲老中青。

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如何形成，它的来龙去脉，代表什么人，如何发展？

这次大辩论的方针，仍是在学校、部分机关搞的，不搞战斗队，要有党的领导，不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也会波及全国。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打内战。现在北大清华走上正轨，有党的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不是，比较稳妥。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春桥接见于会泳的谈话

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学习和开展辩论，要真正从思想上想点主意，不要松下来，一松就要出事。柳宗元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些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如“以三项指示为纲”，关系到否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一定要搞清楚。通过对右倾翻案风的回击，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认识，对你们有多方面的意义；一、对各厂、团、校和机关等部门的思想建设有重要意义；二、对创作思想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写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艰苦、复杂、曲折斗争的作品，很重要，也很需要。现在的革命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都是直接写与阶级斗争斗争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海港》、《龙江颂》虽然写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是写与暗藏的敌人斗的。《春苗》等戏倒是写了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思想深度还是差。所以现在还没有一部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特点，党内走资派的实质和他的特点，就难以写出这方面有质量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人民有教育意义，对教育后代也有意义。当前我们对走资派还在走所作的斗争，就有教育现在和教育后代的意义。

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的精神。过去马、恩也讲过但都没有象主席提得这样明确、深刻。当初搞十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主席曾叫我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发展，

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毛主席很清楚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所以，现在看这段语录，体会很深，很有感受。要好好学习。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张铁生在太原讲话

我们党以至我们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上仍然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把党的组织路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威风扫地，正是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路线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远远没有受到批判，好多单位甚至都没有接触，理论上没有搞明白，实际上没有批判，所以，导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上不清，党的班子队伍建设不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就是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的一个变种，也可以说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又是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一个大祸根。

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打招呼（招呼，下同）会，我活了二十几年，这个打招呼会还很少听到，什么叫打招呼会呢？现在据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这个打招呼会就是给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那些还在继续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干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呼。给他们下场毛毛雨，打个予（预）防针，应当清醒清醒嘛，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没皮没脸。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在打招呼会议四川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在一次会上，我支持了张铁生。我当时不知道是远新他们抓的。

他带了四十个人去学大寨学习，路过北京，要到清华看大字报，北京市不安排。他找了谢静宜、迟群同志，她们就安排了。他到了太原，请他讲话，他点了火，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问题宜专题研究的批语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
给以解决。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检查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

报告指出：“军委常委于 2 月 6 日开会，对去年 7 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

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发展新生事物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资产阶级法权当做他们的命根子，拚命保护；把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在他们去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特别猛烈的一股风，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攻击，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的攻击。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弄清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再论孔丘其人》

在去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幽灵还在游荡吗？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其所作所为，与孔老二的行径何其相似乃尔！

今天，党内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不正是亦步亦趋地踩着孔老二脚印走的吗？他们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用折中主义的手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就是要沿着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老路，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中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

最近，苏修教育部的喉舌《教师报》就连载了一篇长文，叫做《中国学校的曲折道路》，对我国教育革命进行了无耻的诬蔑和恶毒的咒骂；苏修《苏维埃文化报》也就我国当前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发出了反华的叫嚣。

苏修《教师报》无限惋惜和愤愤不平地说，在中国解放后所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不幸被教育革命“一笔勾销”了。苏修《教师报》攻击我们的教育革命造成“学生知识水平的急剧下降”，《苏维埃文化报》则诬蔑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没有教育的教学”。

苏修《教师报》也拚命攻击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为了满足政治运动的需要”，“使学生脱离了系统的课程”。

苏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恶毒地诬蔑我们把知识青年“踢到农村”，使“青年们全部谋生计划破产”，“禁止”他们“继续学习和获得专业技能”，等等。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

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谈三项指示“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很全面，其实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看不见阶级矛盾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李素文主管财贸、外经等部工作的决定

1976年3月1日，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召集财政、商业、外经等各部部长会议上，宣布：

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我对刘少奇有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是一九六四才认清的。

对林彪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我把这个认识过程讲一下，你们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七四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

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

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在政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

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

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十几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又缺煤，又缺油，因为这都是从原油里出来的嘛。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

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后来他一个屁也不打了。这是我跟邓小平第一个回合，比较严重的回合。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这一次我说你是个原则问题，我可能在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你是个原则问题。

他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我这个方法是有不妥当的地方，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总理。另外一次，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

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

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

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不听主席的。

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

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师，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他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也不提。说是广东帮不要湖南帮的人，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要给同志们讲，我不仅对你们作自我批评，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的。我就想，在林彪问题上，我虽然是对的，但时机不对。我骂了林彪两次，骂了他，这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那时还不是时机。我因为害重病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我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天津，我给我身边的同

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呢，我再改。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主席这一总结，我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啊，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主席就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的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的。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象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邓小平从来不提批林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就斗我了。恐怕地方的同志“三十三条”都学了吧？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我记忆力都要丧失掉了，这样残酷啊。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我才干不及她们确实不及。我就是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啊，我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扩散。

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他利用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主席不是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

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

他这个会，从去年十月底开始了，是不是？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四个月了，光在政治局开会就三个来月，基本上解决战斗了，才请同志们来的呀。

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我冒叫一声，应该赔礼道歉，应该解决。另一方面，造反派同志，青年同志也应该说话，不要一下子就抓起来，对大局不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不是说不要弄清是非，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6.03.03； 中发 [1976] 4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上报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

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

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486-490 页，最后四段被中央文献研究室删节了）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1976.03.03；中发 [1976] 5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3.03；中发[1976]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发的中发[1976]3 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在教育界、科技界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而且在文艺界也同样煽起了一股右倾翻

案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妄图达到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诬蔑文艺革命搞糟了，“是路线问题”；紧跟着就有人叫嚷：“路线问题不解决，文艺要搞上去不可能。”有人还公然提出，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估价”。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制造谣言，说什么：“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还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说什么：“广大工农兵对文艺现状不满”。

他在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诬蔑这部影片是“极左”，拂袖而去。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一出笼，就指挥一些人四出活动，煽风点火，制造谣言。他们得意忘形地说：“现在正是时机”。又是召开翻案会，又是准备翻案材料，甚至诱逼文艺界有的老知识分子“上书”写诬告信，攻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诱逼未逞，居然又指令旁人代笔，如此等等，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真可谓猖狂至极！跟着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极左”的调门，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散播的是“今不如昔”的谬论，叫嚷对十七年文艺“要重新估价”。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别有用心地说什么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西风一吹，冷雨就下。于是，什么不能“一个形式，一个办法，一种调门和一个样板戏”，什么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象“紧箍咒”一样，“束缚了创作精神”等等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他们说什么，要是文艺都来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会造成“雷同”，“题材狭窄”，“人物一样”。

对文艺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通过大刮“业务台风”，鼓吹“白专”道路，极力阻挠和反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于是，“不管黑线、红线，培养出人，能搞出东西就行”等等怪论，一时颇为流行。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吗？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毛泽东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1976.03.24；中发〔1976〕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阻劝，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程越的文章《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關係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翻案复辟的自供状——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这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从头到尾打着“批林”、“反左”的旗号，攻击文化大革命。林彪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什么“极左”的路线，并且耸人听闻地提出，必须“彻底肃清”所谓“左”的“流毒”，“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些人由于一贯站在极右的立场上，整个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极左”。他们所谓的“反左”，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们“批林”是假，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

他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章更是集中攻击文化大革命“把党的好干部”“打下台”。

论“总纲”的文章秉承他的旨意，诬蔑群众容易盲从，乱反一气，上了“极‘左’词句”的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授意炮制这篇文章的同时，散布了这样一种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

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寥寥数语，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冤仇，一腔恼恨，流露得淋漓尽致。

他授意炮制的文章宣称：“必须以这三项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试问，你们现在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这岂不是说，党的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都不算数了吗？

论“总纲”的文章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而“重点”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他们疯狂叫嚷，要打倒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他们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有其反动的特定含义，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迟群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当“三项指示为纲”传到辽宁北部山区的柴河铅锌矿时，党委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坚决顶住，并作出决定：今后不管是写文章、讲话，还是上报材料，不能用“三项指示为纲”，要提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见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去年夏天，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了上钢五厂。有人问二车间理论小组的一位同志：“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到底对不对？”这位同志果断地回答道：“不对，这和毛主席历来的教导不符合。”（见五月十三日《文汇报》）上海星火零件厂一位团支部书记，在去年七月全厂干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

“‘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反对用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见四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天津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到“三项指示为纲”以后，觉得很不对味，既不向群众传达，更不去贯彻执行。当邓小平刮起攻击和污蔑小靳庄的歪风时，

党支部脚步没有乱，贫下中农腰杆没有软。他们说：“‘十二级台风’算个啥，干，和它专开对头车！”（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武汉警备区某部六连一位二十二岁的战士，去年九月听了邓小平一个“讲话”的传达，感到他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却大谈什么“整顿”，宣扬什么打硬仗就是“打钢仗”等等，是同毛主席唱反调。联系邓小平过去鼓吹的“白猫黑猫”那一套，他觉得这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毅然决然地给毛主席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见五月九日《长江日报》）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吕达的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

《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办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

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条例》一味强调“整顿企业管理”，宣扬“制度万能”，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那一套，重新拿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

《条例》还把物质刺激作为实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用金钱、物质腐蚀工人群众的灵魂，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金钱关系。

《条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的大好形势，以“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为名，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千方百计扼杀地方积极性，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

《条例》中，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主张专家治厂、技术挂帅；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所谓“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他还说什么就是白专也“应爱护、赞扬”。另一方面，邓小平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条例》说什么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诬蔑自力更生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穆青在新华通讯社全社大会上的检查

这期间记者汇报了音乐学院一张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而我由于立场的错误对它却表示欣赏，认为这张大字报问题提得尖锐，文采也好，许多观点我认为是对的。因此便指挥记者在一篇反映文化部各直属单位讨论“创业”批示的综合内参稿中，摘用了部分内容，上送文元同志审阅。后来文元同志发现这篇稿子方向不对便扣压下来，同时也扣压了类似的一批稿件。对此我十分不满，并在少数同志中间议论过。对文元同志的意图感到不能理解。还胡说什么为什么文元同志对主席关于《创业》和评《水浒》的两个批示，却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在文元同志扣压了这些稿件之后，我不仅没有觉悟，相反仍不死心，仍私自伙同李琴同志把音乐学院那张恶毒攻击文化部，攻击党的文艺政策，矛头直接指向文艺革命和江青同志的大字报，通过不正当的渠道传送出去。

关于主席评《水浒》的批示，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思想深处是担心再开展一场运动的。因此在听到邓小平向外宾作贼心虚地歪曲主席批示精神的传达后，我十分拥护。以后，我自己也传播过邓小平制造的所谓主席读《水浒》读了三个月，发表了一些感想的说法，极力冲淡和贬低主席批示的重大意义。

九月间，听到记者从大寨回来汇报后，便先入为主的认为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不妥的，不是主席的意图，新华社有责任向主席反映。供主席参阅是假，告江青同志的状是真；说维护党内团结是假，维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反击是真。目的是想在主席面前造舆论，希望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能够畅通无阻，实质上是反江保邓，其错误的性质比起刘冰的诬告信来，的确更加严重。今年三月下旬，运动形势逐渐明朗，经过学习主席的教导，我感到这一错误不能再隐瞒下去，在一次社核心小组散会后，我和朱穆之、李琴三人谈起此事，我曾主张给文元同志写信主动坦白交代这一错误，但他们都不同意。当时朱穆之说，这件事牵涉外单位的人，我们如果交代出来必然连累他们，会不会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李琴则说，我们宁愿采取被动，如果人家要交代就先让人家交代去，反正此事与批邓无关，我们被动就被动。结果不但没有交代，反而订了攻守同盟，更加加重了自己的错误。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人民日报刊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批判邓小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鬼蜮伎俩》

邓小平用折中主义和诡辩的手法，抹杀毛主席指示的阶级内容，阉割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磨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锋芒。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用这种手法炮制出来。

他们在《条例》修改稿中，把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掐头去尾，孤零零地引了这样一句话：“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去年八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邓小平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科技界那个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急急忙忙跟着摇旗呐喊，说什么：“学大寨也好，评《水浒》也好，目的围绕把科研搞上去！”

邓小平居然公开造谣说他的“全面整顿”是毛主席“同意”、“赞成”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抓住要害 深入批邓》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及《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条例》），集中反映了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铁证。

《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这篇反党文章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系列讲话，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进攻。《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条例》则是邓小平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在教育战线，从这里开始打开了缺口。

一九七六年一月，由于邓小平公开表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随之转入批判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三月，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传达到全党，成为批判的锐利武器。

批判的靶子主要是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的三篇大毒草。

一九七六年三、四月，由右派策划的一系列反革命政治事件，以天安门广场打、砸、烧等活动为标志，把邓小平推向了与党对抗的地位。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2010年8月2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第三章第三节 周恩来朱德逝世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水调歌头》：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周恩来听到这里，忽然笑了：“主席对赫鲁晓夫的气愤，连写诗时把‘放屁’这类话都用上来了。可见主席对那位苏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好。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了。昨日的是非，让后人们去评说吧。”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江青来看望周恩来。

周恩来：“主席还、还好吗？”、

江青说：“主席还好，总理呀，你就放心吧。现在教育战线的形势也很好，右倾翻案风的势头已经压下去了。”“这一切，都和总理没有任何关系，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他让邓颖超当着江青的面打开了唱机，放出《国际歌》的曲词。

“来，我们一起唱！”江青亲自打着拍子，和周恩来、邓颖超共同唱了起来。

周恩来对江青和邓颖超说：“请江青同志转告主席，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

江青说：“主席对我多次说过，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管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谣言，

主席和党中央对你都是完全信任的。我们之间的那些分歧，都让它过去吧。那不算什么。”

从这天起，周恩来的昏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晚上，从周恩来的嘴唇里听到微弱的声音，他的思维还在《国际歌》的曲谱里。那沉重而悲壮的音符，给这位已经倒下的战士以永不消失的鼓舞。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六分，周恩来痛苦地哼完了最后一句歌词，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代表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日、十一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周恩来同志的遗体由王洪文同志、汪东兴同志、邓颖超同志，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总理生前友好，隆重地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新华社报道《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四万多人，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 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

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

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朱德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一、为深切悼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定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九日、十日举行吊唁仪式。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自发表讣告之日起至十一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二、按照我国的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吊唁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 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〇年起，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对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2)）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在一九三〇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一九三四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凶狠的阶级敌人面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

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贰、 本节简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周恩来的悼词中指出：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检验，对周恩来的这个评价，仍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其中指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仍然是站得住脚的。

三十多年来，不断地有人往周恩来的脸上抹黑，把他说成似乎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赞成、拥护、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行为，都说成是“违心”的。这种宣传欺骗了不少人。

不可否认，周恩来和江青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犯过不少的错误。周恩来有时右了一点，江青有时“左”了一点。他们之间免不了会发生矛盾。毛泽东批评过周恩来（一九七三年的外交工作），也批评过江青（一九七三年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一九七五年批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但是，周恩来和江青都是真心实意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都对“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周恩来不同于邓小平、叶剑英；江青也不同于林彪、陈伯达。

中共中央关于朱德的悼词中指出：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历史也证明，对这个评价，朱德是当之无愧的。

2010年8月9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第三章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作了部分删节，其中包括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迟群在一次党委召开的会议上说：“跟邓小平一样的人有一层人，区别就在于职务不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

文章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捧上台。

一些人乘机造谣，说上海《文汇报》在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数日内，各地向上海《文江报》发去的抗议信、电达 400 多件，抗议电话 1000 多次。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南京市许多市民和学生进行游行集会，街道上和往来的车辆上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活动，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

同时，其中也有人以悼念为幌子，攻击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央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毛主席已圈阅。

(一) 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 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 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 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等。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

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

从北京市派人揭下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大量是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的。

许多诗词、悼词和讲演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提出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理论路线，说什么：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摆酒重祭。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 400 页）

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北京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 6 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人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四月四日

华：今天晚上研究一下。

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

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

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观，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政治局的其他人说：

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议。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江青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现在已经过了 12 点了，现在已是 4 月 5 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北京市是可以解决的，吴德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吴德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

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在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对）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六时开始，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的口号。一些人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的事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一言不发，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

刘传新说：

这次看：有组织的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

说卫戍区抓了人

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

打伤 168，重伤 15 人（四个战士、十一个公安人员）。

民兵 61

战士 52

公安 55

砸了两辆，烧了四辆汽车。

《新造反委员会》

放火烧房子，把自行车砸了浇上汽油烧。

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在市委广播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 38 个人。以前三天捉了 39 个，大部分都有证据。

四月三日 — 五日凌晨 26 人，

职工 16

学民 7 团员 10 人，

下乡青年 2

外地 2

帖写反革命小字报演说。

广播事业局一个人录了四盘最反动的东西。

特点：矛头集中、演说、诗词、悼词。

集中主席、集中中央，

这么多讲话文章，不提走资派，不提主席，除了攻击的手法多样，诗词、诗歌、演讲，不是青年人写的，恶毒隐晦。

不顾一切后果的法西斯的。

写血书的。

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够立案侦察的有 30 够起，反动的东西，2—4，共 340 多件，群鬼乱舞。

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今天来的这么猛反扑，出于我们的意外。

昨晚搞了一夜，原以为要喘息一下，没料到早上六点就开始了。

今天这么一搞还要防止新的反扑，

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组织三万，民兵，九个营的卫戍区。

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这些人很可能组织一些暗杀队的。

吴忠说：

准备三万民兵在两个公园。

历博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一个营。

劳动一个营。

市一个营。

卫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市区集结的九个营，多数 3、4 师，《人民日报》领导同志住地。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想喘息一下。

历史博物馆的楼、指挥部、营部，没想到他们真敢烧，从一楼点火要把人烧死。

马小六、张世忠、两个副司令、两个副局长，教训比较多。

从抓到的文字、语言、行为恶毒得很，打外国人，日本。

纪念碑上贴了一些诗词：

天颜未明心澎湃，

滚滚泪水洒襟怀。

为保总理青松挺，

准备热血喷体外。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吴德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吴德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也同意让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会议通过了吴德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华国锋说：

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与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

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

测重分工，民兵和公安分工。

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通知

1976.04.05；中发[1976]8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中发[1976]4、5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基层单位传达到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传达学习情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天安门广场清场

吴德和倪志福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

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吴德说：政治局已决定晚 8 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吴忠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 8 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三个人当时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 8 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吴德，多次催问：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吴德，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吴德等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华国锋等待从听了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 10 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吴德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吴德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 11 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

当时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没有死一个人。 四月六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开展，形势大好。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运用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的武器，把煽起右倾翻案风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本质揭露了出来。他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的反动言行，受到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的批判。“翻案不得人心”，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众矢之的，孤立得很。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春耕生产热气腾腾，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在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阻力，有曲折。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再一次教育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

和口号的阶级实质，“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要把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毛主席这些指示，是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锐利武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搞清楚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方针和政策。不学习，就会迷失方向，就会上当受骗。

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的修正主义纲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反动言行，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深入揭，深入批，我们就能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紧紧抓住这一条不放，阶级敌人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就会彻底破产。

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反击右倾翻案风既然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疯狂抵抗和捣乱。我们要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防止阶级敌人散布谣言，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政治谣言，蛊惑人心，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追查，坚决打击。

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搞串连，不要搞战斗队，不要拉山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少数听信谣言、上当受骗的人，要进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毛远新关于四月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

主席：

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 200 来人；跟着起

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 4000 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五日）就来了，提出 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

伤：168 人，其中：民兵 61 人

战士 52 人

公安人员 55 人

重伤：15 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 38 个人，前三天捉了 39 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

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年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

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五月六日三时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四月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士气大振，好，好，好。

六日十八时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毛远新的笔记

四月七日上午 8:05 — 9:15

（汇报了四月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却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分）吴德讲演等。

（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挥手）

（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

主席：叶不找。

（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所写的字迹

一 首都

二 天安门

三 烧、打

性质变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除邓小平、苏振华外，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出席会议。

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两项提议，政治局委员均未作个人发言，一致通过。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04.07；中发 [1976] 9 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

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

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 7 1 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

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1)(2) 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的批语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一九七六年四月某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

四月十三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十二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报告要进

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毛泽东划了横线并批语：第三条不好。此计不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中旬以后，全国开展清查反革命活动

北京市抓了四五万人，每一个单位你斗一个他揪一个，也搞出几个人命，冤枉了一些人，一经中央指出就很快的纠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第一，它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

第二，它充分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

第三，它又一次说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绝不会容忍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红旗》杂志刊登梁效的文章《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头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他在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立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他的指使下，教育界、科技界和某些部门的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齐跳出来，到处讲演，大肆放毒，散布了大量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他还唆使一些人写诬告信，拟“汇报提纲”，筹办刊物鼓吹他那条路线，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凡此种种，都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在邓小平授意炮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那篇文章时，他们曾得意忘形地叫嚷：“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这个“拳头”就是反革命舆论，打的目标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

件中，他们首先打出的也是这个“拳头”，不少恶毒的反革命口号同《总纲》所用的语言如出一辙。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一只黑手的操纵之下，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狂呼反动口号。他们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声嘶力竭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喊哪！喊哪！”狂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紧跟着，他们的另一个“拳头”也打了过来，那就是反革命的暴力行动：烧汽车，烧房子，挥舞匕首等凶器，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大造反革命舆论，正是他们搞反革命暴力行动的前奏。但是，他们打出的这两个“拳头”，都没有能得逞，在强大的革命舆论面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种阶级斗争动向。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又象污水似地从阴沟里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妄图利用毛主席、党中央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来贩卖他们的反动黑货。这是一种十分阴险毒辣的反革命策略。这些政治谣言，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情节之离奇，手段之卑劣，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章含之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

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写的一段话：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现在整个情况，全国部署，继续学习主席指示，深入集中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事件幕后策划者，追查反革命谣言，打击反革命。中央发的几个文件，都是主席指示精神。粉碎天安门事件，是主席亲自抓的，重大布置都是副主席定的。任命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两个决议，决定当天发表，广播，全国党

政军民拥护支持的反映全部见报，对反革命，打砸抢者，要镇压，都是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办的，非常英明正确。本期文章中有些精神也写进去了。开始北京民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般情况是可以的，但发展到要冲电台，冲中南海，还不还手？牵涉到有一部分群众怎么办？这牵涉到一个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如和国民党打仗，国民党军队士兵大多是劳动人民，打我们，性质就起了变化。敌人裹胁一批人进攻我们，我们仍不还手？不能这样。你一万人、我十万人包围你。主席看他们拿着棍子开进天安门广场，主席说好！好！好！民兵们说，拿棍子一个人顶六个人。对这些人做群众工作可以，但要你降下国旗，你不还手？真正参观的群众不会打人，要打，就是反革命暴力，打砸抢，性质就变了。你们搞反革命暴力，我们就要以革命暴力来对付，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拿起棍子，中央明确交代，可以还手。这样坏家伙就怕了。还有宣传，公布到群众，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那些谣言、煽动就孤立了。如果不是一下公布，层层传达，全国要一二十天，不知要闹多少事。从这次反革命事件看出，他们是有组织的，我们这样做，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坏家伙提，第一冲电台，第二冲人民日报，第三冲红旗。他们说他们的行动为什么不登报，就要冲。民兵组织好了，要冲是打嘛！主席说，拿起了棍子，士气大振。那天下午我就在大会堂，整个都看到了。有三种人。过路的人，吴德同志讲话后二十分钟，就退走了。其他坏人，一种围纪念碑，是打手，谁劝说，就打谁，一批人，演说贴标语。又一种人在走道上巡逻，骑自行车，看我们的动向。粉碎这一反革命事件，时间短，但作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来看，教训是很深刻的。冲到指挥部，放火烧营房，一会烧被子，摔书，烧文件。人大会堂东门，也搞得很肮脏。服务员们很坚决，说你们碰到门，就当现行反革命论处。他们没敢动。这次他们打出拥邓旗号，干反革命勾当，有的是亡命之徒，新资产阶级分子，各种坏人，高干子弟，局长、部长的儿子，姚登山的儿子，也去保卫总理去了！高干子弟一分为二，有的很好，有一些就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工农兵学员也有几个很坏的。清华开会批了几个工农兵学员，很坏。95%以上群众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暴乱的，敌人只是一小撮。最近发现国民党特务掺杂在内，从香港运宣传品。还有亡命之徒，地富反坏右。他们能搞这么多人，还是因为党内有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上台，不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要丧失，民主革命成果也要丧失，回复到半封

建半殖民地去。五星红旗就是民主革命成果，反革命要降下来。七日，上海有个家伙仍升一面白旗。你们要警惕，不能麻痹，不要看到胜利就麻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批邓，总的继续批。有这么一些思想问题：一部分人觉得批过了，继续批批什么？一种认为撤了就垮了，批邓劲头不大了。三是进一步学习主席指示，进一步批邓，如何联系更好，如何用主席指示分析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四是要不要联系实际，如何联系实际？辽宁宣传组个材料，认为要联，也会出现问题，如层层揪等，但只要领导思想明确，可以解决的。主要联系实际批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批阶级斗争熄灭论。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倾向要不要批？当然要批。坏人要不要斗？当然要斗，也要讲政策，联系批邓反对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发展。上层建筑，要大造革命舆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阵地，推动农业学大寨。批邓是长时间的任务，这一期，要有一篇讲进一步批邓，能回答一点问题，有些松劲思想。邓虽然上台只有一年，但批起来要下功夫，从理论、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还有天安门事件，还有南京等大城市的事件，联系起来，斗争激烈。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这时要暴发天安门事件？没有悼念总理为借口，也要爆发。我看，一是批邓深入了，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一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看出党内资产阶级确比资本家厉害。老的资产阶级不服气，说未参加天安门活动，你们还提新老资产阶级。这是诡辩，他们不一定到前台。北京有的工厂送花圈署名都是工人，分析一下，有的高干子弟，十年前参加联动、西纠。彭小蒙讲十年报仇，三十年掌权。科学界送的特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野蛮，骂、砸、打。七机部，外交部，广播局，说不要到天安门，有人拿起椅子就砸。主席讲过，有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说他们不问政治，这是不问政治？科研单位、特别自然科学研究单位，问题多。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师，苏修好多人都是学技术的。这些人头脑里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的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希望寄托在邓身上。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自然科学单位阻力还大，相当凶，文化大革命触动不多，四个现代化由这些人掌握能行吗？不管他有多少文化科学知识。

有人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说违背宪法。总理要经人大通过，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搞的。有的是革命委员会搞的。我们还是中共中央通过的。宪法规定党的领导。为什么资产阶级可以，我们不可以？邓开始也是先任命后通过，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是非常必要的，不受资产阶级民主束缚，这就解决了天安门事件。主席、中央决定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

主席理论问题指示还是根本，商品交换，按劳分配，等级制，这些东西，动一动阻力就很大，还没有提出限制大官们的利益呢！还没有实际限制，只是批一下，要自觉限制，阻力就那么大。我接到信说有一种论调，老革命就该拿那么多钱，还要增加，打江山时，你们干什么，在那里？用阶级观点分析，江山打下来就不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为自己了。还有什么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呢？这代表某一阶级阶层。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便拿出他那股“还乡团”的疯狂劲头，到处讲演，散布谬论，制造谣言，搅乱人心，纠集复辟势力，挥舞“整顿”大棒，推行修正主义纲领、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一时间，黑浪翻滚，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欢欣若狂，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对他们来说，这真是大难临头。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说成是“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行绝望的挣扎。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老牌的反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社会渣滓，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来闹事。他们舞文弄墨，行凶放火，又是鬼哭狼嚎，又是抽刀拔剑。究竟要干什么呢？就是妄图保护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只要看一看那些反革命分子提出的纲领、口号，就一清二楚了。原来他们的一套货色，并非自己的发明，而是从邓小平那儿搬来的，同邓小平相呼应的。邓小平

“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成了他们的旗帜；“邓记谣言公司”出来的政治谣言，变成了他们公开的反动演说、反动诗词、反动传单。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居心险恶地攻击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亦步亦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邓小平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咒骂社会主义中国是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邓小平打着所谓“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也鹦鹉学舌，叫嚷“抓不住老鼠的猫，能说是好猫？”可见，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恶性发展，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猖狂反扑，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在党内。

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麇集一起，喧嚣鼓噪，要推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他们为什么要在共产党内找自己的首领呢？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看，并不奇怪。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护走资派，维护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

一九七六年五月，迟群、谢静宜讲话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有惊人地相似之处，但形式却变化多端，敌人不会愚蠢到至今还讲那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也不会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是林彪的那个最最最，连邓小平的话如今也不会讲了，因为这些都被人们批判过了，声名狼籍（藉）了。他们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让你上当受骗。他们越是失败，就越是要疯狂的反抗，不然，路线斗争岂不是到了邓小平这里就停止了？！不会的！仍然要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

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文章讲得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黑班子。

有些人，总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别看他们现在好像挺“左”的，领导这

个，领导那个，不交待不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

（原记录稿（节录）的影印件）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新华社长沙讯（内参）

最近记者去湘潭江南机器厂采访，这个厂的工人欧阳凯主动向记者谈对运动的想法。他说了以下几点（主要的）：

（一）我不怕坐牢，我声明，我是个反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外单位搞调查时，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反中央领导同志的传单，上面就是没有提周恩来，这不是说明他有问题吗。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反的他。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反的他。邓小平上台只有几个月嘛。

（二）湖南的问题，光揪张平化有什么意思，张是个第二书记，湖南还有第一书记。可以断定，华国锋是周恩来的人。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还只是才开始，以后的事情多得很，早着哩。现在中央的领导权算解决了，中央各部门的问题，文化部、卫生部解决了，你们新华社解决了，人民日报只解决了一半，其他还没有解决，还有各省的问题。

欧阳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厂里的“湘江风雷”派头头。他在同记者谈话前两天，（约在五月十六日前后）曾到长沙，会见了省里一些原湘派的头头，如叶卫东、李敬林等人，他说，李敬林曾向他谈了对运动的想法。（完）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迟群找部份记者谈“7·1”报导清华大学的文章问题，迟群提出：

“每次来了运动，总是先整领导人，当权派，看一看是革命派还是走资派，主要是为了发现走资派，整走资派。一级盯一级，最后盯到中央、政治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一句话
国内问题要注意。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

暴风雨式的斗争

“四·五”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的建议曾作出两项决议，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指出斗争的大方向，粉碎了以邓小平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镇压了破坏捣乱的反革命份子，顶住逆流煞住歪风，巩固了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正乘着两项决议的革命东风，以实际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四·五”反革命事件，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发展，两个阶级在政权问题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它和历次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以反革命的失败，革命的胜利而告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场暴风雨式的斗争，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一个重要的课题：“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走资派仍然在走，一切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了”。

当前党内必须首先认清斗争的新动向

第一种情况是：“四、七”发出两项决议后，许多同志都只是看到眼前那个小圈子，而缺乏一个对全局、对整个形势的充分估计和认识。不少同志甚至提出：“过了这一阵子该松一口气”的论调，而想偷懒一下。

第二种情况是干部同志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怕”字当头，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敢放手支持，对社会上所出现局部的乱子，看成为天下大乱束手无策，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举棋不定，显得软弱无力，发挥不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的作用。

第三种情况是党内走资派在那个地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会与那个地区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相互勾结，压制群众中不同的意见，压制民主，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大兴资本主义之风，使那地区运动受挫折，生产促不上，真正的革命群众受压，正气抬不起头来。

现在，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把批判以邓小平为主要对象的反右倾翻案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规模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今年搞不透，明年继续再搞，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必要的话五年，十年也要搞下去”。

有人说这是“权利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

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斗争历史，就是为了这政权，为创造这政权我们流血牺牲，为保护这政权我们也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目前必须注意的是在这“反右”运动中有一股左的倾向，极左思潮正在抬头。在一些地区最近出现一股不正常的逆流，提出“无官不错，无错不反”。现在弄成县委没有一个可信，地委也没有一个可信，省委、中央除了毛主席都没有一个可信。山西省、陕西省那来的这样中央指示：“大小干部驱上楼，一个一个下楼过关检查”。

某些省市和县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镇压了一批反革命份子，粉碎了他们的破坏和扰乱，这件事放在一些出现反革命破坏事件的地方，如郑州、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方，用坚决果断的行动去处理是对的。但做为没有出现类似北京反革命事件的地方，也是一样借中央对反革命份子进行镇压的指示，乱抓乱揪。

目前一些地方控告团有些来北京向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有些通过书信或其他方式向中央如实报告那些地区的情况，这些情况中央会逐个处理。华国锋同志、江青同志等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在接见各省市有关同志、学生代表或首都参加镇压“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代表时也已经代表中央一再提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要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解决，“运动要搞下去；混进党内资产阶级异己份子要清除，地方的问题要解决，这是我们的决心，也应该是在座每一个负责同志，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决心。”

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保证反右斗争胜利的关键。

(二) 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

(三) 开展革命大批判。

(四) 落实政策，开展清查反革命。这次北京抓的人多了些，开头还不开

枪讲政策，以后就差了一些。一个北京抓了四五万人，每一个单位你斗一个他揪一个，也搞出几个人命，冤枉了一些人，还好，一经中央指出就很快的纠正，这点要当作一个教训。

（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使得功效不高，开工率不足，造成一年工业项目未能完成任务。目前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工业、汽车制造、建筑、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机械工业母床的生产只维持在前年上半年的生产指标上，这些情况都要扭转过来。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池恒的文章；《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

有人认为，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就应该没有矛盾和斗争，就应该是纯而又纯的。这是一种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天真的想法。

要不要坚持党内斗争，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与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一个原则分歧。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

我们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率领亿万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社会主义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极其重要。

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七六年六、七月，王洪文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草稿）

（二）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三）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四）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上海市委常委黄涛在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发言。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那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会议简报）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辽宁省委副书记杨春甫在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发言。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会议简报）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在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中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

八年前，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工人阶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剥削阶级垄断的文化教育阵地，揭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篇章。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的八年，是战斗的八年，胜利的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破旧立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文化教育阵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八年来的战斗历程，总结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经验，我们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尽管斗争内容十分复杂，斗争形式经常变化，但主要的正是和走资派作斗争。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极力污蔑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大好形势，攻击教育革命，胡说什么教育部门发生了“危机”。在他的指使和怂恿下，教育界也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他们叫喊：工人阶级把教育搞糟了。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居心叵测地制造谣言，挑动知识分子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此同时，他们又攻击进驻上层建筑的工宣队“不懂行”“不热心”。

为了把工人阶级赶走，邓小平还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指使人写诬告信，丑化和攻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贰、 本节简论

关于天安门事件，作为一段历史，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一九七六年发生在北京市天安门的“事件”，究竟指的是什么？

主要是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实际指四月一日至四月四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

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由此可见，所谓天安门事件并不包括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因为参加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群众，有各种政治倾向，其中大部分人是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又称四·五运动。

这种说法虽然基本上正确说明了这次事件的政治性质，但是它极力缩小了这件事的政治含义。这些人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四人帮”，而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的路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但是，这种说法回避了问题的要害，就是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打、

砸、烧事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社会治安条例的刑事犯罪活动。

三、天安门广场四月五日晚清场死了人没有？

在共产党的正式会议上，有人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人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人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人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后在全国清查反革命抓了多少人？

据张春桥七月的一次讲话说：北京市抓了五万人，批斗了一些人，死了几个人。其他地方情况不详。

五、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有何不同？

1，一九八九年四、五、六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的学生及支持学生绝食的群众，政治上是反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

2，学生是和平绝食，没有发生打、砸、烧事件；

3，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绝食违反了北京市的治安条例和戒严令；

4，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清场没有打死人，但在解放军进军天安门途中开枪打死数百人，解放军自身也遭受人员重大伤亡及武器装备损失。

5，六四事件后全国清查反革命，各省市自治区都抓了不少的人。

2010年8月16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毛泽东主席逝世

第一节 毛泽东的政治遗言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和华国锋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蓉等人。

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贰、 本节简论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除了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毛泽东传》收录以外，其他有关党史、毛泽东的正式出版物，包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加以回避。这是因为这个谈话太重要了，对政变集团维持自己的统治非常不利。

第一，毛泽东为自己的一生作了“定论”：“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第二，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这是对中国革命的高度概括：一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件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毛泽东对前一件事的评价：“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完成了三项任务：其一，与蒋介石斗争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其二，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其三，打进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任务中，党内，主要是领导集团中，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但是，作为国家统一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第四，毛泽东对后一件事的评价：“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进行了三大工作：其一，社会主义改造；其二，社会主义建设；其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概括中只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省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呢？这是因为，任何国家革命成功以后，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方面的任务和方法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很少有人懂得：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特别是领导集团内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听到这样的分析，能不叫人大吃一惊吗？党内党外、上层下层谁不在高喊“文化大革命好！”“拥护文化大革命！”呢？

第五，毛泽东交待后事：“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作为遗留任务交给下一代的也是两个：一个是国家统一；一个是继续完成文化大革命。

第六，毛泽东明确指出身后局势的几种可能性：和平中移交或者动荡中移交、甚至是血雨腥风中移交。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2010年8月23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第四章第二节 各级党和政府的吊唁活动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告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

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华大学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九日下午二时半，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共八百人参加，校党委书记迟群极其沉痛地在会上宣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哭声。全体同志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起立默哀后，校党委副书记荣咏霖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通知和吴德同志在北京市委的讲话。接着，迟群讲了话。

大会之后，校党委又召开了系党委书记会议。

下午四时，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分单位集合在一起，收听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当大家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许多人泣不成声，悲痛得昏倒在地。

收听后，各系党委立即组织大家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多工农兵学员到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好革命接班人。各单位立即挂起了悼念毛主席的横幅。大家都自动带上黑纱和白花。在悼

念活动中，全校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向江青致以衷心的问候。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心情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花圈》

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参加吊唁的人们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八亿神州，无限悲痛。五洲四海，深切哀悼。我们沉痛的心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经过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我们的党有今天，我们的国家有今天，我们的人民有今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世长存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战胜了国内外凶恶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迈开了巨人的步伐，贫困落后的、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朝气蓬勃、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一道，开展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为我国制定了革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加强了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总结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贡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特别是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

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生前谆谆教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有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更好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是反修防修的根本保证，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具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党的优良作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批邓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有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毛主席亲自创建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民。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期教导，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的一定能够达到。”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八亿神州无比悲痛 举国上下深切哀悼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 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爱国同胞敬献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大会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致悼词

大会实况同时转播全国。首都参加大会的百万群众和全国八亿人民肃立，默哀三分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像三鞠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

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

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

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期刊载的池恒

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中，贡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正确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指明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胜利三个主要法宝的原理，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 and 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写下的许多光辉著作，不仅是民主革命的根本指针，而且对我们今天的革命斗争，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能不能正确解决，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并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毛主席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任务。毛主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指出我们就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坚持唯物辩证法，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彻底批判了否认矛盾和斗争、否认革命的错误观点，一再告诫我们要树立同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的战略思想。为了战胜资产阶级，特别

是党内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伟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不断总结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实践斗争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英明决策，支持和扶植了许多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解决了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许多重大的理论、方针和政策问题。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胜利前进的道路。这个无价之宝，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它，忠实地继承它，勇敢地捍卫它。

毛主席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对整个国际形势，都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反帝、反霸、反修的一系列战略和战术。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关于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重要思想；关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的深刻分析；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伟大战略思想；关于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著名论述；关于我国永不称霸，永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关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的教导等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五十多年来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一切胜利的源泉。在今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要做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最重要的就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很好地继承毛主席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财富。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期刊载的齐永红的文章《化悲痛为力量》

在沉痛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我们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所开创的并毕生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持下去。

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

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一定要更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

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一定要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化悲痛为力量，就是要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化悲痛为力量，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开创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表现。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期刊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紧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继续战斗》

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继续战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一贯重视革命大批判，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号召工、农、商、学、兵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的教导，给我们指明了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建国二十七年来，毛主席不仅谆谆教导我们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而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大批判。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

当前，我们要继续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场重大斗争。

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大批判，不是几个回合的短期战斗，而是一项广泛的、群众性的、长期的战略任务。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邓小平垮台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于一条错误路线的批判，只打几个回合是不行的。毛主席高瞻远瞩，指出一百年后要革命，一千年后要革命，一万年以后也还有矛盾，“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贰、 本节简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悼词中这一段话，值得反复回味：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

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华国锋念了这段悼词不久，他就发动了十月政变！

2010年8月30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正

第四章第三节 全国人民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北京、上海、天津市委，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福建省委和北京、新疆、沈阳、济南、福州部队党委分别写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心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化悲痛为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持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湖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省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江苏、浙江、广东省委，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党委和兰州、南京、广州部队党委，分别打电报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韶山大队党支部的文章《韶山儿女永远怀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大寨大队党支部、全体贫下中农《红太阳永照大寨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解放军空军某部“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文章《化悲痛为力量 迎接新的战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侯隽的文章《继承遗志 永远向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我们一定要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 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青海省委和武汉、成都、昆明部队党委，分别打电报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江西省井冈山委员会的文章《井冈山人民的誓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大队党支部的文章《红日永照西柏坡》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委员会的文章《把人民公社办得更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的文章《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大庆委员会的文章《更高地举起大庆红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王国藩的文章《永远发扬“穷棒子”精神》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韶山红日永放光芒》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井冈山红旗永远指引我们胜利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的文章《毛主席永远指挥我们战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舞剧团的文章《永当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战士》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全军怀念毛主席 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延安儿女的庄严誓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在斗争中前进》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清华大学，整个校园立即沉浸在一片悲痛肃穆之中。两万多名师生员工和家属，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极其沉痛地哀悼毛主席的逝世，回顾毛主席对清华大学的亲切关怀，缅怀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他们在毛主席遗像前庄严宣誓：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誓死捍卫、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照耀我们在斗争中前进，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让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天安门前警卫连的干部和战士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聚集到毛主席遗像前，收听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他们脱帽肃立，流着滚滚的眼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警卫战士的最大哀思。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大庆工人战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大寨红旗举得更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深切的怀念 无限的崇敬》

毛主席在大跃进年代里，两次视察过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广大职工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聚集在毛主席当年视察过的炉台上，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他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继承毛主席遗志 同走资派斗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上海第一钢铁厂委员会《毛主席永远活在钢铁工人心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海军某部“洛阳”舰全体指战员的文章《永远不忘毛主席对我们水兵的教导》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广西西林县八达公社岩腊大队苗族百岁老人 杨保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苗家千万代》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李庆霖的文章《永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泽东思想在各族人民心中永放光芒》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高举毛主席点燃的革命火炬奋勇前进》

在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千万双眼睛含泪凝望北京，千万颗红心沉痛哀悼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几天来，从清晨到深夜，一批又一批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列队来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大家流着眼泪在毛主席遗像前肃立默哀，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宣誓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他老人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誓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大凌河畔，朝阳农学院从院部到热水、富山分院，从创业滩学农基地到分布在六个县的七个科教点，顿时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两千五百多名师生围聚在广播喇叭四周，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接着，大家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肃立在毛主席遗像前，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切悼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让毛主席表彰的“穷棒子”精神代代相传》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委员会的文章《把革命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大队 王玉坤 王小其 王小庞的文章《坚持“五亿农民的方向”》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钱学森的文章《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大连港务局老工人 王玉吉的文章《毛主席的恩情永不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延安市南区供销社的文章《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啊，我们世代代怀念您！》

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挺拔的苍松翠柏，静默致哀。

在人民大会堂的吊唁大厅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安卧在常青的灌木之中，面容还是那样坚毅、安详，身上还是穿着朴素的灰色服装。八亿神州，同声哀悼：敬爱的毛主席，您真的离开了我们吗？不！您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您永远活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我们世代代怀念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永远指引亿万民兵胜利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台湾省爱国同胞的文章《誓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到祖国的台湾岛上》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广州部队某团一连全体指战员的文章《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紧握手枪》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延安杨家岭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的文章《发扬延安精神 争取更大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公社委员会的文章《誓把边疆建成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郝建秀的文章《永放光芒的指路明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唐山四二二水泥厂全体职工的文章《千秋万代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冯友兰的文章《长怀化雨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痛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认真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重要嘱咐决心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去夺取更大胜利各地工农兵群众化悲痛为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批邓为动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不断取得新成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吃水不忘挖井人 世代怀念毛主席》

在全国人民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瑞金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几天来，一批又一批地来到毛主席当年亲自开挖的沙洲坝红井旁，喝口红井水，悼念毛主席。他们中的许多人，喝红井水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今天喝下红井水，就更加怀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悲痛化作回天力 双手建设新唐山——唐山丰南人民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抗震救灾大道上阔步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的关怀永远鼓舞我们为创建新北大而斗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安源煤矿委员会的文章《高擎毛主席点燃的革命火炬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登山队 潘多（藏族）的文章《继承遗志 勇攀高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天津第三发电厂委员会的文章《团结一致 努力工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广西岑溪县马路公社马路大队党支部书记 莫寿全的文章《牢记光辉批示 坚持群众路线》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黄昆的文章《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号”机车组的文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西沙自卫反击战荣立集体二等功的广州部队某部侦察队全体指战员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永远指挥我们战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委员会的文章《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坚持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 张世忠的文章《誓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战斗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湖南麻阳碌溪口公社赤脚医生 李春华的文章《毛主席支持的我们就坚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把毛主席点燃的革命火炬代代传下去》

在沉痛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广州市人民怀着万分悲痛和无限敬仰的心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毛主席当年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缅怀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表达对毛主席的深切悼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天津站职工的庄严誓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永远活在翻身农奴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香港澳门爱国同胞、台湾省同胞、海外华侨连日在港澳参加吊唁仪式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高举“鞍钢宪法”旗帜奋勇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啊，古田人民永远怀念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连日来，东湖岸畔，珞珈山下，武汉大学的师生员工怀着极大的悲痛，哀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师生员工们来到“九·一二”展览馆，肃立在毛主席遗像前默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文艺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以后，北京京剧团的文艺战士万分悲痛，许多同志不禁失声痛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舒茶人民永远不忘毛主席的恩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江西省瑞金县委员会的文章《瑞金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孙玉国的文章《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京剧团的文章《我们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哈尔滨车辆工厂委员会的文章《牢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照耀雪山草地》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矿工怀念毛主席悲痛化为千钧力》

在沉痛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日子里，淮南煤矿百里煤海，到处洒下了哀思的泪水，井上井下到处响彻着战斗的誓言。各级领导干部和英雄的矿工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以实际行动深切悼念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春苗永向红太阳》
全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遍地春苗永向红太阳。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逝世，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广大贫下中农、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陕北民间艺人 韩起祥的文章
《永做毛主席的文艺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广州造纸厂委员会的文章
《永远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光辉著作永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十多天来，极其悲痛的气氛笼罩着南京十月人民公社的十月大队。队里的青年们搀扶着老人，妇女们领着孩子，一队一队地来到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主席到这个大队视察时站过的山坡上肃立默哀，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敬和悼念的心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重要嘱咐——灵武各族人民加强学习深入批邓》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南王庄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第一师范师生的决心》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湖南省花鼓戏剧团的文章《一定要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长江航运管理局委员会的文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破浪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部的文章《毛主席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远洋轮上的钢铁誓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小靳庄人民深切怀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报道《继承毛主席遗志 攻读毛主席著作》

延安市委带领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深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我驻港机构和港澳爱国同胞继续举行追悼活动 沉痛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宁钢厂广大工人和干部化悲痛为力量 认真学习 深入批邓 勇挑重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邕江儿女永远心向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宿迁县人民以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继续深入批邓 夺取农业丰收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贫下中农的文章：《化悲痛为力量，把合作医疗办得更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供销服务社党支部的文章《照毛主席指示办就是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壮族人民深切怀念大救星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壮族山乡，桂西北革命老根据地东兰县的各族群众，顿时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北京市丰台区芦沟桥公社贫下中农的文章《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战斗不息》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永远沿着光辉五七道路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过的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在极其沉痛地悼念毛主席的日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回忆柳河五七干校八年来走过的战斗历程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卫戍区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把部队建设成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让毛泽东思想世代传下去 天津百万产业工人响应党中央号召，继承毛主席遗志，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内蒙古乌达煤矿广大职工化悲痛为力量 加强学习 深入批邓 多出煤 出好煤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永远扎根于群众之中

毛主席曾经表彰过的浙江省平阳县城西公社、宁海县越溪大队、金华县汤溪大队、桐庐县俞家大队、瑞安县隆山公社、余杭县五常公社、青田县石溪大队等七个单位的广大干部和社员，怀着极其悲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继承毛主席遗志 誓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逝世，使河南、山东沿黄河两岸的人民极为悲痛。几天来，人们仰望着毛主席视察黄河的留影，二十四年前的情景涌现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甘祖昌的文章《学好毛主席著作 万里征途不歇脚》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浙江江山县勤俭大队党支部的文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永远是我们的战斗武器》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解放军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的文章《更加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天津第二毛纺织厂老工人 李长茂的文章《最重要的是学好光辉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誓做学习模范 当好批修尖兵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理论队伍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入批邓，以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永远指引我们战斗

黄浦江水滚滚滔滔，长流不息；黄浦江两岸的上海市人民，红心永远向着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纺织女工永远怀念毛主席

在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日子里，青岛国棉六厂郝建秀小组的姐妹们眼噙泪水，臂戴黑纱，肃立在毛主席遗像前，庄严宣誓：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丢！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六盘山上红旗展不到长城非好汉

回族人民聚居的宁夏西吉县兴隆公社干部和社员们怀着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用本民族最隆重的仪式，沉痛悼念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革命重担奋力挑 万里征途大步迈 甘肃工交战线广大职工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上海自行车三厂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 认真学习 深入批邓 促进生产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总后勤部唐古拉山兵站全体指战员的文章《“世界屋脊”上的战士怀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陈保红的文章《永远发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上海京剧团的文章《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庄则栋的文章《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成长》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陕西省佳县委员会的文章《毛主席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大救星》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永远高举革命火炬——韶山人民决心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决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深入批邓铁心务农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永远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 “塔山英雄团”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批邓，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狠批三株大毒草掀起批邓高潮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广大职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京剧团《奇袭白虎团》剧组的文章《夺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吕玉兰的文章《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公社贫下中农的文章《俺们一定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韶山大队贫农社员 毛霞生的文章《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解放军坦克某师副参谋长 董来扶的文章《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把街道办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清水塘街道党支部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追忆毛主席

当年在清水塘的伟大革命实践，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深入批邓，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把边疆建成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新疆精河县各族干部群众决心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遵照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武钢建设得更好 武汉钢铁公司的广大职工，几天来纷纷来到十八年前毛主席视察过的一号高炉旁，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们久久地凝望着毛主席当年观看出铁的炉台，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化石》编辑部 张锋的文章《阳光雨露育新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林丽韞的文章《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浙江省嘉兴县南湖贫下中农的文章《南湖碧波映深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江西省兴国县长冈大队党总支、全体贫下中农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大连红旗造船厂机械车间工人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的文章《牢记毛主席的指示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荣泳霖 政治部副主任 吴炜煜的文章《按既定方针办，同走资派斗争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首都百万民兵重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斗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八亿人民的战斗步伐 悼念毛主席的悲恸泪水，化成了奔腾向前的革命波涛；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坚强决心，产生了移山填海的伟大力量。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队党总支书记 厉日耐的文章《立下愚公志 革命永向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的文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永放光芒》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原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陕西省延长县交口公社谭石原大队党支部书记 郝树才的文章《饮水思源 继续革命》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共产党庐山委员会的文章《庐山劲松万年青》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海南岛驻军某部二连化悲痛为力量 继续深入批邓 加强部队建设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大连化物所职工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誓把科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山东煤炭工业战线职工以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认真学习 深入批邓 夺得高产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天津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社员 魏文中文的文章《毛主席遗志永继承》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孙友田的文章《毛主席永远在掌舵》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金兆晖的文章《天安门前的哀思和誓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 杨旭辉的文章《我们庄严宣誓》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祖国的山山水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北京新华印刷厂委员会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源泉》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陕西省靖边县小河大队党支部的文章《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扛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公社委员会的文章《永远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山东省滕县县委书记 翟文孝的文章《更加刻苦地攻读毛主席著作》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尉凤英的文章《毛主席教育我不断前进》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江西省余江县委员会的文章《发扬“送瘟神”的彻底革命精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报道：红太阳光辉暖万家——来自唐山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李顺达的文章《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原井冈山“大井”暴动队长、大井毛主席旧居讲解员 邹文楷的文章《当好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本版编辑组的文章《化无限悲痛为巨大战斗力量》

贰、 本节简论

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痛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广大共产党员，发出了誓言：

毛主席啊，我们世代怀念您！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毛主席光辉著作永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千秋万代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社会主义革命！

继承毛主席遗志同走资派斗到底！

永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

高举毛主席点燃的革命火炬奋勇前进！

把革命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路！

毛泽东思想永远指挥我们战斗！

毛主席支持的我们就坚持！

把毛主席点燃的革命火炬代代传下去！

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尽管历史发生了巨大的曲折，他们中的多数人信守了自己的誓言，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战斗，成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复辟的最大障碍。

2010年9月9日初稿

2012年3月14日修改

第四章第四节 各国对毛泽东逝世的吊唁（上）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从早期走上革命斗争道路起一直到今天，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的业绩。

毛泽东同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英明地领导了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长期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壮大发展成为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此基础上领导党、军队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短短的时期内就使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为具有牢固经济力量和强大国防力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通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全国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整个斗争历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同志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积极支持和声援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自由、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同志一向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诚心诚意地支援我们，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

在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阻挠，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毛泽东同志为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也是朝鲜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留下的崇高业绩将与世长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人民议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唁电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悼念中国革命的战略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切胜利的鼓舞者毛泽东主席及其光辉业绩。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他同他的党和人民、全世界的战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永别了，但他及其业绩将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胜利前进、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一切伟大胜利，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和事业，同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紧密相连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一贯忠实地遵循他的革命教导，在所有惊涛骇浪中始终是胜利者，在无数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勇敢前进，打败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贫穷落后的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堡垒，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士。

毛泽东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天才业绩的继承者。他为制订、捍卫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建树了伟大的功勋。他直接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了粉碎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叛徒集团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敌人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立下了丰功伟绩。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最亲爱和最尊贵的朋友，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个国家的兄弟革命友谊和牢不可破团结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同志对我国人民和我党怀有的热爱和尊敬的崇高感情，永远不会忘记他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建设社会主义所给予的巨大的和不断的关怀。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阿革命友谊时曾经指出：“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让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国革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彻底埋葬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苏修而并肩战斗！”我们相信，这些历史性的话将永远是我们两国人民不断加强和发展阿中战斗友谊的一个巨大的鼓舞源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的整个一生及其革命活动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推翻旧制度，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的胜利的英勇斗争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和成功的革命的领袖，这一革命是人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各国人民为摆脱外来统治、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争取更加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提高生活水平，在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表明她是当代一支强大的力量，她为世界革命变革的进程，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事业，为促进和平与社会主义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罗马尼亚人民亲密的朋友。他努力发展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利于两国人民、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的唁电

作为改变了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生活的中国革命之父，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人类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们将永远铭记毛泽东主席对巴基斯坦人民的真诚和始终不渝的友谊。我们同中国人民一起深切哀悼中国最伟大和最杰出的儿子的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缅甸总理吴盛温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阁下的伟大名字和他的不朽业绩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他的不朽的思想和辉煌成就将与世长存。他的哲学和理想将激励和鼓舞将来无数世代的人类。

正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伟大和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维护了国际行为的最高准则并为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而斗争。同时，他开创了一个划时代的世界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在各国被压迫人民心中又重新燃起摆脱可诅咒的剥削和痛苦而实现灿烂未来的希望。他的不朽的榜样和教导将继续指引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和成就，并召唤世界人民以新的希望和热情为从压迫和控制下得到最后解放而斗争。

巴基斯坦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主席这位真诚的朋友，他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并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将永远怀念他这位中巴友谊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伟大的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毛泽东主席一贯关心巴基斯坦的幸福和进步，这使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巴基斯坦人民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起哀悼这位伟人的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唁电
的确，二十五年多以来，这位非凡的历史伟人对改变世界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伟大和友好的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主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性革命的开拓者，是领路人，是伟大的孜孜不倦的舵手，是他使中国有了今天。

毛主席极为了解中国人民的愿望，并善于加以引导。他成功地改造和开发了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土之一。

对于我们扎伊尔人来说，毛主席将永远是向世界开放、与我们人民真诚友好的伟大缔造者。

中国在扎伊尔作出的成就永远是友谊和真诚合作的典范。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服务于人类的漫长的一生结束了，全世界因他逝世而蒙受损失。坦桑尼亚全体人民将哀悼毛主席，因为他是世界性的领导人，他鼓舞了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我们以极大的悲痛和团结的情谊向中国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曾领导中国人民赢得自由、平等和革命进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斯里兰卡总统高伯拉瓦的唁电

毛主席是一位具有史诗般高大形象的领袖，他的名字在他生前就已为人们所传颂。

他终身鼓舞并集中体现了中国革命。对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他是给予力量和支持的可靠的源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的唁电

任何言辞也无法表达我对中国伟大舵手的崇敬的怀念心情。他生前的业绩已载入史册；在他逝世后，他的思想仍将继续指引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今天，整个阿尔及利亚同中国一样，对这一巨大损失感到无比沉痛。毛泽东主席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未停止把全部精力献给建设现代化的、独立和繁荣的中国的事业。他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榜样。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唁电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巨大而不朽的贡献不仅将为中国而且将为全世界的世代所铭记。

他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他也是为实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希望和理想而奋斗的忠实战士。

毛主席是斯里兰卡的一位伟大和真挚的朋友。斯里兰卡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铭记他对我国进步和幸福的深切关怀。我在两次访华时都荣幸地会见了她，这两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最亲切的回忆。

他的逝世的确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唁电

全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现代史上世界革命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失去了一位卓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对此感到悲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唁电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是以史诗般的长征开始的，它的胜利使贵国进入了强大和繁荣的新时代。已故主席在这个斗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将永远作为一个最光辉的篇章载入中国的史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加蓬总统邦戈的唁电

这位杰出的导师、中国的伟人、无与伦比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他将永远影响全世界各个时代的历史。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缅甸总统吴奈温的唁电

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容置疑的领袖和缔造者，受到中国人民深切爱戴，并作为当代政治家，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广泛尊敬。他为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进步的献身精神，将永垂青史。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的唁电

我相信，现代中国的伟大缔造者的逝世使世界许多地区都感到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第三世界人民为争取解放、赢得尊严、巩固他们之间自然存在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在建立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密切关系方面，毛泽东主席尤其是一位不懈的战士。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的唁电

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它的伟大人物的生平的话，那末，如果不记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和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将是不完整的。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当代的一位传奇人物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人们将缅怀他对人类争取独立和使各地贫困无权的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的斗争所作的卓越贡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乍得国家元首马卢姆的唁电

伟大的、友好的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民族领袖、革命创始人。这是全世界的损失。热爱自由的各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活动对和平共处所作的贡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唁电

杰出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把他的整个一生献给了争取现代中国的自由、独立、创建和发展的斗争，几十年来一直领导了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杰出的领袖。如果没有他，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他的逝世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而且对整个进步人类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人们将永远记得他的形象和他的业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唁电

中国人民蒙受的巨大损失，无疑也是突尼斯人民的巨大损失。损失之巨大是从这位最杰出的中国人士所完成的业绩衡量出来的。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不仅具有一个战士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和正直的品德，而且具有一位政治领袖的勇气和智慧。他成功地领导中华民族取得了最卓越的胜利，使中华民族重新赢得了在世界上的应有的地位。毛泽东主席的名字将载入史册，同许多无法想象的伟大事业的实现连在一起，如：不畏路途遥远、气候恶劣和天然障碍而进行的横越中国的长征；把广大中国人民从贫困、饥饿和社会弊病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建设一个走向努力工作、进步和正义的新中国社会。毛泽东主席恢复了中国保持自己本色的意志，正如几千年文明所培育出来的那样，也正如当今时代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毛泽东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民族依靠纪律、劳动和民族禀赋而消除了不发达状态的范例，并以此而载入史册。这是毛泽东主席在他的各位战友帮助下创造的新的入道主义。在他的居于前列的战友中间，有令人缅怀的最忠实的战友周恩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唁电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他的光辉思想和一贯行动使伟大的中国人民实现了当代最勇敢、最惊心动魄的革命。这位受到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爱戴的杰出人物不幸逝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逝世，使马里人民失去了一位可靠的、坚定的和亲密的朋友。的确，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万隆会议的崇高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同她休戚与共的各国人民一道，执行了真正的和平友好政策。毛泽东主席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业绩、他制定的原则以及他的政治家品质将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毛泽东主席将象一颗明亮的巨星，以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整个世纪。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突尼斯总理努伊拉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儿子和非凡的领袖。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为使中国得到发展和繁荣，享有尊严和独立，毛泽东主席继续进行长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为和平服务的思想和行动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孟加拉国总统赛义姆的唁电

作为历史上杰出的革命领袖之一，作为被压迫和被欺凌人民的事业的旗手和人民的组织者，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他的思想和成就使他在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榜样将继续启发和鼓舞全世界人民进行反对控制和剥削势力的斗争。他关于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将永远是孟加拉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明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尼日利亚军政府首脑奥巴桑乔的唁电

已故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通过严于律己的自觉行动成为伟大的人物。正是这种严格的思想素养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使他的品德和对人类的贡献与众不同。

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已被改造成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之一。无论有多少力量的阻挡，他的革命精神从不屈服而是勇往直前，他的革命精神不因遭遇困难而激动或恼怒，相反能战胜一切灾难。当代这位敬爱的和无与伦比的领袖的逝世不仅对你们伟大国家的人民，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损失。但是，请你务必相信，他的远见和思想鼓舞过世界人民，并将永远在中国和整个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博茨瓦纳总统卡马的唁电

毛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而且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他不仅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而且在当今充斥暴政和非正义的世界上他是热爱和平的人。他的逝世是世界各国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民的巨大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唁电

毛主席的逝世对贵国来说确实是一巨大损失。为了贵国的发展，他不倦地献出了他的全部精力。因此，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感到这一损失。毛主席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而且是团结的象征，他也确实是国家的缔造者。

他的革命思想不仅是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也是留给全世界的不朽的遗物。乌干达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哀悼已故的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的观点和思想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并将继续被国际社会、特别是为摆脱不发达状态而斗争的国家所运用。全世界、特别是非洲的自由战士们，将永远怀念毛泽东，把他看作是对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斗争的巨大鼓舞的象征，他们尤其将永远铭记毛泽东给他们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不倦支持。

已故毛泽东的献身精神和忠于职守应成为我们发展中世界的所有的人学习的典范。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克拉克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唁电

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的远见、坚韧的体力和罕见的天赋的领导人，这使他能够鼓舞本国人民和超出中国国界的各国人民。他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进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印度总统艾哈迈德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澳大利亚总督克尔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的唁电

他漫长的一生和壮丽的事业记录了许多方面的独特成就。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国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由于他的指引，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开始起重大的作用。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柬埔寨领导人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阁下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英明伟大的缔造者和领袖。他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尖锐、曲折和炽烈的革命斗争，并连续不断地夺取了辉煌的胜利，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反动资本家，于一九四九年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亚洲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又夺取了新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阁下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世界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贡献。

因此，毛泽东主席阁下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热爱和无限崇敬，而且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的衷心热爱和无限崇敬。

毛泽东主席阁下的逝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世界革命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也是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主席阁下的逝世，对我们民主柬埔寨人民和政府也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损失，因为在我们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革命斗争中，他竭尽全力、时时刻刻地、一贯地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极其有力地鼓舞着我们。当我们国家获得完全彻底的解放之后，在我们柬埔寨革命进入保卫和建设国家的新阶段之后，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阁下，又继续给予我们热情的、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永志不忘毛泽东主席阁下对我们柬埔寨革命和柬埔寨人民的最特殊的感情和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最高度地敬仰和衷心敬佩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宝贵的、典范的革命一生和最崇高的革命品德。我们怀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兄弟般的感情和爱戴，无比悲痛地向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崇高英灵鞠躬致哀。

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世界革命运动杰出的伟人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崇高英灵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越南劳动党中央、国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府会议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卓越的革命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其英勇和充满辉煌胜利的斗争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给帝国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各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大力发扬了勤劳和创造性的劳动精神，艰苦奋斗，建设祖国，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人民以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对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在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共同精心培育了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一友谊得到了日益美好的发展，正如胡志明主席所说“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越南人民永远铭记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这一充满情谊的话语。我

们越南人民无比深切地感谢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给予我们革命事业的巨大的、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历史功勋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领导中国党、军队和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把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具有先进科学、强大国防、先进经济文化基础的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也使老挝人民失去了一位一贯给予老挝革命以支持与援助的亲密战友，老挝人民永远铭记这一宝贵的恩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金日成同志到我使馆吊唁

金日成主席在毛泽东主席的遗像前肃立默哀后，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石国宝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我感到十分悲痛。不仅我一个人，我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我相信，由毛泽东同志缔造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永世长存。我们决心永远同中国人民在一起，肩并肩地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请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转达我们的哀悼。”

金日成主席在吊唁簿上题了词。题词是：“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引向光辉的胜利，对促进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对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建树了不朽功绩。“毛泽

东同志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朝鲜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都是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高贵业绩将永放光芒。”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朝鲜党和政府通过决定深切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联合决定说：“毛泽东同志是为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而献出全部精力、任何时候都诚心诚意地支援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是在为获得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争取反帝革命事业胜利的斗争中建树了不朽业绩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联合决定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时候，朝鲜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霍查同志到我使馆吊唁

霍查同志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韩波说：“我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会主席团、部长会议以及全体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对杰出的、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最尊贵的朋友毛泽东同志的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他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作出决定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决定说：为了悼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和尊贵的朋友毛泽东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宣布：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

为全国哀悼日。在全国哀悼期间下半旗志哀，并停止文娱、体育以及这一类的其它活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布迈丁主席在吊唁簿上写道：“如果我们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和争取进步的斗争所蒙受的这一损失是多么重大，我们就会深信，毛泽东由于他的思想和斗争将永远活在我们当中。他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突尼斯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到我驻黎巴嫩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老挝领导人到我驻古巴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伊拉希总统在吊唁簿上写道：“毛主席对全世界作出的最大的功绩是：他唤起了被压迫民族，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新的信心。毛泽东并没有真的去世。作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国家缔造者，他是永垂不朽的。人们将世代地纪念他。”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吊唁簿上写道，毛泽东主席“总是深深关怀巴基斯坦人民的幸福和进步。今年五月是我最后一次会见他，这再一次使我有机会

领会他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厚情谊。他对中巴友好事业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政党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的唁电

在此沉痛的时刻，我们悼念享有崇高威望的、光荣的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主席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政治家，是各个时代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位最伟大的缔造者。我曾两次荣幸地受到这位杰出逝世者的接见，体会到他对我国人民，对同我们一样为正义、进步与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怀有十分热烈的友好盛情并始终不渝地给予声援，因此我本人更加感到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秘鲁总统莫拉莱斯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秘鲁总理阿尔武卢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唁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符合第三世界要求自由、尊严和进步的愿望。他为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做了积极的努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的唁电

他的去世使人类失去了一位当代非常伟大的人物，失去了地球上最大国家的有气魄的领导人，他使这个国家在全世界赢得了今天它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毛主席将永远受到全世界的崇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布隆迪总统米孔贝罗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是无产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最忠实的战士，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人民最诚挚、最可靠的朋友。他完全无私地、忘我地以惊人的毅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全面高度发展的国家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世界革命将永远怀念他，他将永远是全世界革命者和思想家学习的榜样。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阿根廷总统魏地拉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埃塞俄比亚主席特费里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杰出和英明的领袖，他是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把它运用于全世界劳动群众的解放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历史性革命家。他的逝世使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后又领导中国人民巩固了革命成果。历史将永远铭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为了鼓舞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而作出的丰富的思想方面的贡献。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永远也不会死去，因为他的丰功伟绩将与世长存。毛主席经过漫长的征途之后可以安息了，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将把他升起的解放旗帜举得更高。

埃塞俄比亚人民同全体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一起哀悼毛主席的逝世，同时我们相信他的鼓舞人的教导已经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这种信念增添了我们的力量。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毛里求斯代理总督拉图尔—阿德里安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智利总统皮诺切特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塞舌尔总统曼卡姆的唁电

历史学家将把毛主席的一生作为一个杰出的时代载入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对人类尊严和世界和平与谅解所作贡献的史册。他的确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大领导人之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圣马力诺国家元首克莱利奥·加拉西和马力诺·文图里尼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马耳他总理明托夫的唁电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亚洲所有被压迫人民的父亲、哲学家和导师。马耳他人民认识到他是真正的朋友，是我国独立的积极支持者。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泰国总理社尼·巴莫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巴西总统盖泽尔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副主席奥谢、布尔的唁电

毛主席充分体现了他所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真理。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并列是理所当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被叙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精确的。毛主席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劳动人民的灯塔。一切革命人民从他的著作、他的业绩和榜样中受到极大的鼓舞。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也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切诚实的人都感到他的个人品格的伟大力量，同他见过面的人都知道他那种出于对人民的热爱而深厚的热忱。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斗争。一九四九年赢得解放之后，他领导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向阉割共产主义革命灵魂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他及时地分析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揭示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对世界的威胁。他发动、鼓舞并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进行了批判修正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并领导了批林批孔的斗争和反对邓

小平复辟活动的斗争。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作为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业绩将与世长存。我们在深感悲痛之际，知道毛主席的业绩、榜样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不朽的，将永远继续鼓舞和指引着为人类解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瑞典共产党主席彼得松的唁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瑞典共产党惊悉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剥削阶级的斗争。在反对各种错误潮流和反革命潮流的斗争中，他具体、生动和成功地为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已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们击退了诸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背叛性的进攻，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在毛泽东路线指引下，决定性地保卫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并朝着更大的胜利不断前进。

毛泽东主席始终领导了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领导人的背叛企图进行了一贯的不调和的斗争。苏联领导人把他们的法西斯社会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把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说成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支持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和人民要革命的斗争。因而他们为世界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指引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没有别的人能象毛泽东主席那样鼓舞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瑞典共产党是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创建的。我们一向热望，现在仍然热望把我们的党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和毛泽东主席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我们要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正确地运用于瑞典的实际。

瑞典共产党一向把毛泽东主席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之一，象敬仰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地敬仰他。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名字将同世界无产阶级的这些最伟大的领袖一起永垂不朽。

我们党将进一步努力提高我们党员对毛泽东主席所发展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认识和理解，以此来表达我们对毛泽东主席的敬意。我们要加倍努力开展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要为未来的艰苦斗争作好更充分的准备。

光荣的、英雄的、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的唁电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且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革命人民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著作具有广阔的领域，包括思想，政治，哲学，军事，文化，反帝民族解放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问题，社会主义时期坚持阶级斗争，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各个领域中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做思想准备，等等。

毛泽东同志把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相继取得民族解放革命、社会和文化革命的胜利，同时他始终向中国人民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力量不经常坚持反对一切复辟旧的封建、半封建和帝国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这些胜利就永远不能说是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通过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活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观点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

法国的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敢于造反、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教导。由一千多万学生和工人参加的法国一九六八年五一六月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具有的许多特点表明，毛主席阐述的思想深入到了法国广大人民阶层的心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徒——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年来系统地歪曲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立场，竭力诬蔑毛泽东同志。但是，他们从未得逞，因为我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越来越向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与之不可分割的毛泽东思想。

在法国——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团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他们将继续努力不懈地促进一切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们的联合，将加倍努力贯彻毛主席关于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十分宝贵的教导，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法国——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共产党人和劳动者在党的领导下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正确地继续进行斗争，反对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活动，特别是反对俄国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欧洲当前最危险的超级大国。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向你们表示最沉痛、最深切、最诚挚的哀悼。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自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的领导下，必将贯彻毛主席的英明和宝贵的教导，把巨大的悲痛化为必不可少的力量，去继承毛主席在世时在他的领导下开创的伟大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同志逝世了，但是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专政复辟、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的斗争的事业在继续。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杰出导师、历史上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是解放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漫长和曲折的中国革命的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最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他反对邪恶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伟大捍卫者，是最受尊敬的国际革命运动领袖。没有任何人曾经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对全世界千百万人民发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名字将万古长存，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我们保证发扬他的伟大的革命教导。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唁电

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和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各国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使我们感到万分悲痛。我们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全体党员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中国人民表示我们深切的哀悼。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对于各国工人阶级、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同你们、并同全中国人民一道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领导全党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率领全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制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总路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迈

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进一步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发动了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他教导世界各国人民，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并指出新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已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它已成为世界人民当今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同志一再号召各国人民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在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中团结起来。他为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道路。

毛泽东同志是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导师。我党、德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深感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人们敬仰和爱戴的毛泽东同志的不朽业绩，永远是在反对我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为实现一个独立、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德国的斗争中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我们确信，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定将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万古长存。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多米尼加“六·一四”革命运动红色路线政治委员会的唁电

当代世界无产阶级最著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了。

他的逝世震撼了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心灵，使他们都感到哀痛。

我们整个组织向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自己深切的悲痛，重申我们绝对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在自己久经考验的光荣的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倍加警惕，巩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继续全力支持全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彻底打败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当代最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主席斯泰根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和挪威劳动群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一切从事解放斗争的人民的极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奋斗终生。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其他伟大领袖和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继承者。毛泽东同志捍卫并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他的著作是共产党人和一切进行革命斗争的人们的强大武器。

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站在揭露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被颠覆，并已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专政所代替。这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把修正主义分子作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揭露出来，使各国共产党人看到修正主义分子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他们开展斗争。

五十多年来，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最前列。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了一九二一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一九二七年创建红军的工作。他领导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革命武装斗争，直到一九四九年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以来，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一九六六年他亲自发动了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继续发展和加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毛主席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领导了揭露和摧毁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反革命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的最前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站在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的最前列。他坚

决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和战斗中的各国人民，坚决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坚决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挪威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工人共产党（马列）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在挪威，修正主义的毒素深深侵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当时挪威共产主义者自己未能总结出错误的所在，未能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改组挪威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使我们能够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并胜利地解决建立我们这个新党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功绩是永存的。他的著作，同其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起，将继续指导着共产党人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当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时，劳动人民将纪念毛泽东同志并感谢他为人类的解放所建立的巨大的历史功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苏里南共产党基尔维尔德的唁电
我们对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感到万分悲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马列）主席尤哈的唁电

奥地利革命工人极其震惊地同你们一起为世界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学说的最受尊敬和爱戴的继承者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感到悲痛，他向全世界亿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群众指出通向人类光明的未来的道路。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奥地利工人、劳动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将遵循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自己和全人类的解放，并为反对由于超级大国争夺而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而斗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圭亚那总理伯纳姆的唁电

你们的共和国是在他的革命领导下孕育和建设起来的。他的智慧和领导改造了贵国各个部分，建成了一个消灭了饥饿和疾病的社会主义社会。他的英雄榜样和他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并将继续激励一切受奴役的人们，不论他们是住在大城市阴郁的贫民窟，还是在罪恶的种族隔离的集中营或是被帝国主义包围的飞地里。我们哀悼他的逝世，但是我们深信他的教导将与世长存，并为今后的世世代代提供一个行动纲领。

在漫长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极少的人被要求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毛泽东主席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的逝世，使住在我们这个行星上的大家庭不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的逝世，使世界进步力量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领导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日本总理大臣三木武夫的唁电
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阁下逝世，不胜痛惜，谨祈冥福。

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现在，日中两国关系正在发展的时候，失去了这位伟大的领导人，衷心感到惋惜。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来自中国人民大众，他使中国摆脱了昔日的屈辱，使中国恢复了历史赋予她的中心地位。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人们失去了一位非凡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他从事的伟大事业和表现出来的果敢才能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深刻。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法国总理雷蒙·巴尔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瑞典首相帕尔梅的唁电

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世界各国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毛泽东主席的重要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的思想已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当代的一位伟大政治领袖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将永远长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西德总统谢尔的唁电

毛泽东的逝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当代的伟人之一和我们永别了。毛泽东决定性地参与创造了本世纪的历史。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西德总理施密特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他将为贵国人民和世界所永远铭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瑞士联邦主席格内吉的唁电

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他给中国人民的历史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英国首相卡拉汉的唁电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把自己全心全意地贡献给他的祖国和人民。中国的复兴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杰出领导的不朽见证。

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总统利昂纳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了中国的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齐奥塞斯库同志到我使馆吊唁

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对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同志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对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齐奥塞斯库同志回忆了一九七一年他在北京同毛泽东同志的会晤。他指出，这次会晤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史上的特别重要的事件。

齐奥塞斯库同志强调指出，毛泽东主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战士，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重大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威尔科克斯同志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斯里兰卡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高伯拉瓦总统在吊唁簿上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

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吊唁簿上写道：“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世界领袖。他的逝世对世界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道哀悼他的去世。”

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对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黄明达说：毛主席的去世“对斯里兰卡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这使人非常难过。”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孟加拉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坦桑尼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加拿大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唁电

他是中国人民最受尊敬和爱戴的领袖，是我国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他的逝世使中国失去了她的真正伟大的领袖，尼泊尔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卓越人物的智慧。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尼泊尔首相吉里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苏丹总统尼迈里的唁电

在这个独特的斗争中，已故领袖把他自己深刻的思想同中国人民光辉智慧的财富结合在一起。他的宏大的但是已经实现了的目标，本质上体现了伟大中国人民各方面的才能，而且给予全世界以理想和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沿着人类通过自力更生而获得丰富经验的道路前进，并奠定了同世界上致力于人类解放、和平与幸福的许多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的新基础。已故领袖的伟大，过去是、将来也继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在智力和精神生活的表现中，在日常实践中，以及在国际关系中都忠于忘我、牺牲和谦虚的原则，这些原则的基础都是毛主席奠定的。毛主席在富裕的环境中保持的简朴精神本身就是财富的源泉，它使人类认识到人民权力的真正含义。作为一个谦虚的领袖，毛主席发现了人类真正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深刻的思想、心地纯洁以及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教导和实践来塑造革命社会的经验，对于努力在智慧、自力更生和尊重人民关于这些方面的意愿的基础上建设社会的人们是一个指南。今天全人类同你们一道为失去一位最杰出、最忠诚和胸怀最博大的领袖而感到悲痛。中国人民一向是苏丹人民忠实的朋友，他们在各方面和在每一个斗争中给予苏丹人

民以帮助和支持，并且虚心体会和深刻理解我国人民的愿望和成就。因此，我们能够一起奠定最密切关系的基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阿富汗国家元首兼总理达乌德的唁电
已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不仅是一位最伟大的亚洲政治家和一位最杰出的国际人物，而且他的名字将载入贵国的史册，贵国人民将以感激的心情永远记得他在改造你们伟大国家方面所起的伟大而积极的作用。借此机会，我还要表示我十分珍惜对一九五七年正式访问贵国期间会见已故毛泽东先生的难忘的记忆。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的唁电
正如三年前我在访问贵国时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是诗人、有预见的人和他的人民的战士，又是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领袖。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的唁电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毕生一直考虑的问题就是使中国人民在真正的社会正义和公正的气氛中享有幸福和繁荣。毛泽东主席一贯支持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从而在他们中间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在复杂曲折、艰难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同国内外、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和一个巩固的人民政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指出了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指出了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道路。通过贯彻这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中国人民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在废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

在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巩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堡垒——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的胆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从而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无私地、全面地援助各国的革命运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事业。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并以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把他的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对中国党、军队和中国人民，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对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各国革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同志极其重视我们两党之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团结和友谊。很自然，在听到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消息后，我党全体党员心中悲痛至极，难

以形容。我们定将化悲痛为力量。为了永远悼念毛泽东同志，我们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正确地同缅甸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努力。我们要团结缅甸各革命阶级、阶层和各族人民，为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缅甸而进行不遗余力的努力。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为在地球上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而斗争，在并肩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比利时马列共第一书记勒菲弗尔唁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指引中国人民走上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道路，因为毛主席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教导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时代和本国的具体条件，他善于建立起农民群众同现代无产阶级的卓有成效的联盟。他揭示了革命战争的规律并成功地运用了这些规律。他出色地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密切联系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领导中国人民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赢得解放的伟大胜利，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

毛主席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教导，总结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教训，卓越地领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中国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他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革命的发展。他率领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反对走资派、反对修正主义并使无产阶级路线取得胜利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他号召并领导群众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号召并领导群众进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他号召并领导群众进行当前这场反右倾斗争。毛主席对资产阶级代理人、

分裂主义者和阴谋家毫不留情，他善于有力地打击那些搞背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可恶的叛徒，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毛主席率领人民群众在同阶级敌人斗争的五十五年中始终注意加强全体党员和全体革命者的思想建设。没有人象毛主席那样透彻地指出，只有始终关心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才能战胜敌人和不陷入修正主义。

我们欢呼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具有原则性的外交政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揭穿了缓和骗局，揭露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活动和罪行，揭露了它们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策源地，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并站在历史发展动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一边的倾向。

毛泽东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巨人，学习他们的一生和著作，全世界革命者就有了方向。我谨代表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向你们表示我们紧密地同你们团结在一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克制悲痛，继续奔向革命的光辉未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日本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是罕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走向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的事业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革命的日本人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深切地关怀日本人民，支持和勉励日本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是革命的日本人民最热爱、最尊敬的导师。

现在，我们为失去了毛泽东同志而感到无比悲痛。但是，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坚决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您逝世的时候，我们表示决心，遵照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导，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站在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日本人民的前列进行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您逝世的时候，我们表示决心，坚决拥护您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同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毛泽东同志，在您逝世的时候，我们表示决心，坚决捍卫您树立了榜样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同第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斗争。

毛泽东同志，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我们深为震惊地获悉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铭权的唁
如同晴天霹雳，传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我们感到无比悲痛。

毛泽东主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无限崇敬和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逝世，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几十年来，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艰苦、曲折、激烈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丰功伟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席精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情况，规定了各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任务，高度地概括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者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人民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措施。毛主席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九六二年，

他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阶段中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最近，他又进一步阐明了新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根源，揭露了资产阶级存在的方式，作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逐步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措施，并把它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在这一基本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如何反修防修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凡的胆略和反潮流的精神，率领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一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针锋相对地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大大地促进了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事业，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毛泽东主席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的人民战争的道路，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北加里曼丹的胜利而奋勇前进，沿着毛泽东主席指引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为争取共产主义在北加里曼丹的胜利而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同一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一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一起，为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我们极为沉痛地悼念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他永远活在我们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心中，永远活在全世界亿万人民的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荷兰马列主义党主席霍赫和书记彼得森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地铭记在全世界工人的心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令人永志不忘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朝鲜总理朴成哲的唁电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向光辉的胜利，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朝鲜人民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不顾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重重困难，毅然决然地同朝鲜人民同生死共命运，亲自发动抗美援朝运动，把志愿军派到朝鲜前线，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成为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朝鲜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不朽业绩将永放光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唁电

我们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极为敬仰和崇敬，从我们的革命和正义事业一开始他就站在我们一边。应当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采取了这一友好的革命立场。毛主席给予从那时开始进行的革命建设工作以最大的关怀，从而为革命斗争，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提供了极为巨大的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及其革命战士一直把毛主席看作是坚决有力地支持他们革命斗争的伟大的亲密朋友。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芬兰总统吉科宁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芬兰总理米图宁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芬兰议长海勒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希腊总统察佐斯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加拿大总督莱热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唁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学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他的历史作用是，调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并带领他们摆脱贫穷、奴役、分裂和战争。新的中华民族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赞赏这种在毛主席指引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平等和集体主义创新精神。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西兰总督布伦德尔的唁电

中国现在的力量和自力更生是对毛主席的智慧和 he 毕生为本国人民谋利益的献身精神的再合适不过的纪念碑。现代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将肯定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给毛主席以特殊和杰出的地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唁电

电报说：“我谨代表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一巨大损失表示慰问和同情。” 我亲身体会过他对现代中国思想和精神的领导作用，知道他的逝世对他的人民将会有多么深刻的影响。我曾有机会在他最后的日子会见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对此我深为感激。

毛主席是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实践家和政治家。他对中国的生活所起的影响是中国漫长历史中很少领导人可以相比的。他终身致力于为中国和中国

人民洗清过去一百年里所遭受的耻辱。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留下了牢固的印记。许多领导人会把这样的成就看作自己事业的顶点。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一个起点。在以后的二十七年里，他继续为中国人民努力服务，直到逝世方才停歇。

毛泽东在一次极其著名的讲话中，谈到在追求一个理想时的斗争和牺牲。他引了一位中国作家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一生的成就决定了他的死确实是重于泰山的。我们和中国人民一起哀悼他的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比利时国王博杜安的电
人们将永远怀念杰出的毛泽东主席，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不磨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的电
毛主席的杰出人格将永远留在有幸结识他的人们的心中，他对现代中国的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丹麦女王玛尔格雷特二世的电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他永垂青史。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丹麦首相耶恩森的电
毛泽东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本世纪全世界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卢森堡大公让的电
他的逝世使人们失去了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失去了一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卢森堡首相托恩的电
毛泽东主席是杰出的政治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行动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的唁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由于这位以其智慧和丰功伟绩而创建了不朽
事业的杰出的政治家的逝世，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唁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卓越和惊人的成就并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中对
全世界作出了贡献，而毛泽东主席则是标志了并将继续标志这些成就和贡献的优
秀品质的集中象征。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在生前已经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
无私地献身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事业的一生，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毛泽东主席始
终是一位革命家。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主席就显示了高瞻远瞩的革命领袖的品
质。甚至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就立志投身于中国被压迫人
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事业。毛泽东主席当过工人、教师，他是游击战
争的伟大领袖，是哲学家和伟大的政治家。在从事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同时，
他是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

他领导中国进步势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打败了蒋
介石傀儡集团，开创了中国国家重建和发展的光辉和史无前例的阶段。自一九四
九年十月一日在他的领导下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一切领域
取得的成就确实是惊人的。

二十七年以前，中国是一个落后、受压迫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国家。今天，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繁荣昌盛、自力更生的国家。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
干练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得到发展，有利于中国人民。

毛泽东主席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新的和有目的性的民族团结感，并且
使它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进行了无私的合作。

在国际关系方面，新中国不断对世界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在维护自
由和正义事业方面起了而且正在继续起着非常杰出的作用。它对解放事业和对发
展中世界根本权利和利益的事业的忠诚，对人类的大多数是一个鼓舞。中国对非

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加强了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革命力量。

此外，中国迅速成为重要的世界强国，这对超级大国的阴谋和冒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论就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或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在毛泽东主席干练和无私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的革命榜样，对于所有进步国家和力量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赞比亚的党、政府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已经给予和继续给予的真诚的合作和援助。患难之交是真交。赞比亚从诞生以来就面临着众多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坚持支持解放斗争。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国家和人民不仅一直是赞比亚的可靠支持者，而且也是南部非洲被压迫兄弟姐妹的可靠支持者。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友好的中国人民同我们在真正致力于人类正义事业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赞比亚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哀悼毛泽东主席的逝世。然而我们相信，他全心全意致力于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事业的献身精神将继续鼓舞全世界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将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一切伟大成就的鼓舞者、自由事业的坚强捍卫者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非正义行为和剥削制度的斗争的坚决支持者而载入史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叙利亚总理赫莱法维的唁电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伟大的成就。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是支持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独一无二的人士。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民主也门领导人的唁电

在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中国人民的半个多世纪中，他的思想和教导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革命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照耀着通向自由、进步和社

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漫长的战斗经历中，从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英明的革命领导和政治路线中，找到了进行人民革命、建设新中国，实现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目标和愿望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阿拉伯也门主席哈姆迪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牙买加总理曼利的唁电

今天全世界都在哀悼一位伟大领袖的逝世。毛泽东主席是人类的巨人，他将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解放者和建设者而载入史册。人们将怀念他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剥削和压迫的坚定决心。

这位伟人是诗人，又是天才的军事家和杰出的政治家。他率领他的革命军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可称为史诗般的事件。他把失败转变为中国人民的全胜和解放。

在赢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后，毛主席又领导了新中国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发展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全世界都敬佩毛主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斐济总理马拉的唁电

他长时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身服务以及他对中国的发展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冰岛总理哈德尔格林松的唁电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毛泽东逝世了。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或精神上，他都是中国人民无可置疑的领袖。近年来他以他的行动和教导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起了大概比当代任何其他人都要大的影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荷兰首相登厄伊尔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匈牙利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利比里亚总统托尔伯特的唁电

毛主席的确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我们确信他将作为一位对自己的人民和国家影响最大的人物载入现代历史的史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美国总统福特的唁电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访问北京时曾有幸会见了毛主席。我们的谈话促进了中美关系沿着我们两国早先设想的路线发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约旦摄政哈桑·塔拉勒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约旦首相巴德兰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同党内外、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崇高的一生，为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伟大、辉煌、不朽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一整套伟大的理论和策略，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是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同志缔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缔造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了繁荣昌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激烈和长期的革命过程中，

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路线，保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使亚洲和世界的形势以及革命和反动力量的对比朝着更加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开辟了新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国防方面，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当代世界历史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关心和全心全意地支持、帮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坚决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他总结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新鲜经验，使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推动人类历史胜利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最伟大和最光辉的一生。中国人民革命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胜利，都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的，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都得到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对中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必然引起所有革命人民无法形容的悲痛。

泰国共产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泰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开展人民战争所取得的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泰国的胜利。泰国共产党、泰国人民解放军和泰国全体革命人民，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坚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广泛地联合所有劳动人民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人民战争进行到底，驱逐美帝国主义，推翻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繁荣的新泰国。泰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泰国共产党将坚持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全世

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和革命者一道，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斗争到底，推动全世界革命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向前发展。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在推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同阶级敌人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顽强地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把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这特别是对日本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发展给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同时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所有这些，对于粉碎资产阶级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阴谋，对于指明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列宁和斯大林逝世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领导作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个时期，他向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给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以无限的鼓舞，并为他们揭示了胜利的前景。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粉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的以苏联修正主

义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彻底地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同阶级敌人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一个新的阶段，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伟大的一生，是不知疲倦地献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人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是同阶级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典范。

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伟大的生平，以他为榜样，永远纪念他，化悲痛为力量，为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向前迈进。

一九六六年日本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一九六九年日本共产党（左派）的成立以及其后的发展，这些决定日本革命胜负的事件，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再次表示决心，为了在日本取得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要以毛泽东同志为榜样，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始终一贯地坚持走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全世界革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缔造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百战百胜的人民军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立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

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英勇奋战，用人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遵循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发生着日益巨大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率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原则性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哲学和文学艺术的理论以及关于当代重大问题的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各国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照耀着他们前进的道路。

毛主席作为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十分关怀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投降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大力支援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对加强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对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对加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毛主席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我国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继承我们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遗志，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必将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围，化悲痛为力

量，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为了继承我们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遗志，马来亚共产党人和马来亚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斗争，为夺取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我们要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同各国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以及各国革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共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法国革命共产党（马列）书记处的唁电

全世界各国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都为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共同举哀。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人民惊人的革命力量，指导了中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中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教益，无可估量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从新民主主义阶段直到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指出了胜利的道路。他开展并推进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的一切企图的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巩固了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挫败了资本主义复辟阴谋。

今天沉浸在哀痛中的我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革命的教益为借鉴，将化悲痛为更巨大的决心，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我们党谨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表示我们战斗的团结，并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沉痛悼念毛泽东同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的唁电

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失去了英明的领袖，他是一位忘我的革命战士，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揭露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多米尼加劳动党建党促进委员会唁电

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著名领袖、敬爱的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我们深为震惊。我们多米尼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谨向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和你们团结在一起，绝对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在中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世界革命必将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希尔同志到我使馆吊唁并著文悼念

希尔同志在大使馆对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周秋野说：“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党的同志们都对毛主席逝世感到极为悲痛。”

澳共（马列）机关报《先锋报》九月十日出版了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刊，希尔同志在特刊上发表了题为《毛主席的教导鼓舞着千百万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长篇文章。文章说：

“任何语言确实都不足以描绘出毛泽东同志的雄伟形象。”“毫无疑问，毛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并且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他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业绩震撼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这些业绩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社会主义，而且鼓舞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沿着为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前进。今后也将继续是这样。”

“他的谈话充满着智慧、鼓舞力量、谦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热情和洞察力。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他写道：“毛主席发自内心地对普通人民寄予无限信任。在他的著作中洋溢着这种信任。”

“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遗产比任何纪念物都更加珍贵。这份遗产就是献身于革命和用革命鼓舞（人民）的榜样，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方面。”

毛主席“在一切斗争中都抓住纲”。“他从来不忘阶级斗争。他理解、阐明和证实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阶级斗争。”“他很早就察觉了苏联领导集团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分子，苏联的这些人一直力图并仍在力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在中国，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斗争和反对邓小平翻案复辟活动的斗争。”“他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阶级斗争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

“毛主席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他为所有的革命者、被压迫人民和劳动人民服务。他的一生事业鼓舞着我们大家。他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教导深入中国和世界亿万人民的心里。”“在他的毕生业绩和教导——这些教导真正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世界革命人民一定会更加认真地努力把他们的本国的情况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他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英萨利副总理到我驻墨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自由查谟和克什米尔领导人到我驻巴基斯坦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马来西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赞比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里塔尼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博茨瓦纳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冈比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莫桑比克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萨莫拉总统在吊唁簿上写道：“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思想将继续鼓舞为自由、独立和正义事业而战斗的革命战士。”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几内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杜尔总统在吊唁簿上写道：“毛泽东同志是进步人类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坚定的革命家，因为他代表了进步人类，严格地忠于进步人类，直到他与世长辞。”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墨西哥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圭亚那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南斯拉夫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英国前首相希思到我使馆吊唁

希思先生面交给中国驻英国临时代办的一份公开声明说：“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方面，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起过象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起的那样大的作用。作为一位实践家和一位哲学家，他在统一中国的革命中，既提供了实际的领导，又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柱。”

声明说：“他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和他对历史的了解，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出发来考虑问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冰岛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新西兰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希腊马列主义者组织中央发表声明

“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民同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一起，怀着深切的悲痛，获悉我们时代的伟大革命领袖、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九日凌晨逝世。毛主席在其致力于使人类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事业的一生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工作，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人物，成为为了使世界摆脱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所造成的不公正、战争和数不尽的苦难而奋斗的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心目中最有才干、最受爱戴、最受尊敬的革命领袖。”

“在毛主席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象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宣告的那样，已经站起来了。在他的指引下和他的伟大的哲学和政治著作的光辉照耀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

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分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崭新的和巨大的贡献。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最近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努力。

在毛主席指引下，中国人民坚定地面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各种阴谋。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它们的霸权主义政策的斗争中已经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中国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宣布决不做超级大国，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各国人民正义事业，这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粉碎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切反华阴谋。

“全世界千百万共产党人承认，毛主席是革命理论的创立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毛主席逝世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巨大损失，由此而引起的悲痛，必将使所有的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学习光辉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发表声明

“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强大的影响铭刻在全世界千百万男男女女的心上。”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从中国的角度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的人物的纪念。当然，毛泽东为中国和中国的八亿人民创造了奇迹，但是他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形势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今天，全世界在哀悼毛泽东的去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降临的时候，全世界会起来唱赞歌，永远称颂他。”“我的思想和感情，同我的同胞一样，充满着悲痛和哀伤。”“他的谦逊和风趣，他的光荣和伟大，毛泽东的英勇无畏和胜利是最明显不过的定论。”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同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永远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我们巴基斯坦人向不朽的毛泽东致敬。”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总统府发表声明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声明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它前进的统帅和杰出的战士毛泽东的逝世感到悲痛。

“毛主席是那些用自己的斗争和思想推动他们的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的领导人当中的特别杰出者。他的原则和他的斗争将始终是指导全世界自由的人们的明灯。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由于毛主席的逝世而蒙受的巨大损失表示同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第三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和在艰难困苦面前毫不动摇的战士。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献出了一生，从而受到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爱戴和尊敬。”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从九月九日起为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正式志哀七天。”

埃及总统府的声明说：“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和埃及人民十分悲痛和惋惜地获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毛主席的逝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前进的统帅、革命的创始人和斗争的先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尼克松说：“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我们一九七二年在北京会见时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于我们两国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对于他不仅对他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在今年二月二日我最后一次会见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

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一些年以前，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历史学家将会对他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估价。毫无疑问，他只争朝夕地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样强烈信仰的原则而努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泽东的逝世使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巨人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领导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二十七年来，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受尊敬的领导人和精神的体现者。很少有人同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是如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声明说：“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她在多少世纪内所未曾取得过的国际威望和国内稳定，中国人民得益于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廉洁的和最有效的政府。我的同事和我悲痛地获悉毛主席逝世，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的深切慰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芬兰马列主义小组举行追悼大会

横幅上写着：“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永垂不朽！”

芬兰马列主义小组总书记和其他负责人分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介绍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以及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指出，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把整个一生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是世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的极大损失。他将永远为人们所崇敬，毛泽东思想将永世长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黎万余群众举行游行集会

十一日下午三时，巴黎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妇女和其他劳动人民，从“共和国广场”出发，怀着悲痛的心情，默默地缓步行进。他们胸前带着紫红色的玫瑰花，捧着镶有黑边的毛主席画像，举着大幅红旗和横幅标语。游行队伍前面，是一个大花圈，花圈的挽带上写着：“献给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一面面巨幅横幅标语上写着：“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社会主义的中国万岁！”“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雅克·儒尔盖同志、安德烈·鲁斯唐等同志走在队伍的前面。

下午四点，群众队伍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面举行了追悼仪式，向毛泽东主席遗像默哀、致敬。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法国革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在追悼仪式上分别宣读了这两个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并且以这两个党的名义献了花圈。接着，人们纷纷在悼念簿上签名、题词，并且献了鲜花，表示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追悼会一直到五时半才结束。

九日，法国《红色人道报》和《人民日报》的三百多名代表，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门前，极其沉痛地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他们举着三十多幅镶着黑边的毛泽东主席的大幅遗像，含着泪花，向毛泽东主席默哀、致敬。《红色人道报》

政治负责人雅克·儒尔盖代表《红色人道报》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送交了唁函，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九月十日，由马克斯·克吕佐率领的法国革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团，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表示深切的敬意。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合国一些会议上表示哀悼

伊拉克代表说，毛主席的思想教导改变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使大家不再用老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命运。

阿尔及利亚代表说，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是鼓舞人民力量的源泉，是无价之宝。觉醒了的人民可以为自由而移山倒海。

斯里兰卡代表在发言中称颂毛主席高瞻远瞩，出于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领导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南斯拉夫代表特别指出，毛主席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平等和正义的原则，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伊朗代表说，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伟人”，他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得到正义。

巴基斯坦、贝宁等国代表在发言中说，毛主席最了解和关心第三世界人民，他将永远活在世界人民心中。

第二委员会主席、委内瑞拉代表安德烈斯·阿吉拉尔在他主持的非正式协商会议上致词，对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表示极为悲痛。他说，毛主席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毛主席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毛主席的一生对人类作出了杰出贡献。海洋法会议主席阿梅拉辛格、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伯纳德·朱利塔以及海洋法会议秘书处许多工作人员也都纷纷向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沉痛悼念。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会议开始时，各国代表起立，为毛泽东主席逝世默哀。

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发言说：“我们深为悲痛地获悉毛泽东主席逝世的不幸消息。”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

他对人民群众的自由和各国的自由所作的贡献，给全世界一切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留下了最伟大、最鼓舞人心的影响。他的教导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指引和激励了世界上许多正在斗争的人民。”他说：“毛主席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一生和他的著作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性。”“失去这位伟大的世界领袖，不仅在不结盟国家中，而且在全世界，人们都会深深感到是个损失。因为毛主席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他既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作家和诗人。”他说：“毛主席通过他巨大的努力和英明领导，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将在今后的世世代代指引着我们。”

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代表非洲国家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哀悼。他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勇敢的革命家和导师，他的思想是永存的。

阿富汗代表发言，代表亚洲国家对中国人民致意。他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对全世界都有影响。毛主席倡导的自力更生精神对第三世界是巨大的鼓舞。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发言，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向毛主席致敬。他说，毛主席的逝世，使世界丧失了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主席倡导的自力更生精神正鼓舞着第三世界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我悲痛地获悉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这对中国人民确实是一个巨大损失。已故的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提高本国人民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智慧和远见领导他们在实现繁荣和富强的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将记载他是一位曾鞠躬尽瘁为祖国服务的不可朽的领袖和哲学家。

正在寻求自由的世界各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事业的正义立场，特别是他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有权消除以色列侵略痕迹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埃及总理萨利姆的唁电

世界和中国失去了一位具有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罕见才能的世界领袖。他的言行已经成为伟大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自由战士的一盏明灯。我和我的同事们——埃及政府成员同你们分担因失去伟大领袖而产生的悲痛。我们认为毛泽东主席不愧为第三世界的一位领袖，他以自己的政策、作风和学说，为国际外交关系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业绩和学说将永远是全人类的珍贵遗产。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刚果总统恩古瓦比的唁电

刚果革命者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不幸逝世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无限悲痛。毛泽东主席的业绩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越了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国界，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

毛泽东主席从发动民族解放斗争、长征直至逝世，为把中国人民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使中国人民逐步获得幸福和社会正义而一直坚定、顽强地奋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不想回顾由于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的英明远见和坚韧不拔精神，革命中国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所写下的光辉篇章；我们只想提及坚定的中国人民经过令人钦佩的不懈努力，不久前在外交上获得的胜利，我们指的是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尽管遭到帝国主义的否决，但是毛泽东的伟大人民中国的威望日益提高，从而使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正义得到了伸张。这是为了承认旨在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并有利于刚刚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年轻国家巩固独立的积极对外政策的功绩。毛泽东的中国向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的和正在继续提供的真诚、有效和无私的援助表明，今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在非洲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说昨天还有不少非洲国家因为受帝国主义反动宣传的毒害而产生错觉、一想到“黄祸”就发抖的话，那么在今天，由于一国人民和一位伟人的积极外交，中国人民已成为第三世界人民的真诚朋友。刚果人民将永远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如此良好的合作。

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毛泽东主席以坚强的毅力同中国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他以同样的毅力勇敢地同疾病作斗争。这位非凡的英雄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对于刚果和世界革命者来说，毛泽东主席永远是革命的不朽形象和象征。他的思想也将与世长存，帮助我们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刚果人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简单的合作关系而达到了革命的战斗团结和兄弟情谊的高度。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多哥总统埃亚德马的唁电

中华民族导师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毛主席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他作出了重大牺牲，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不发达状态和国际帝国主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的唁电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沉痛悼念这位社会主义革命之父，他们必将继续永远高举孜孜不倦的长征领导者的旗帜。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定将永远缅怀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了他们的事业，为了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关系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贵的朋友，他始终致力于和谐地发展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兄弟般的、真挚和卓有成效的友好合作关系。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马尔代夫总统易卜拉欣·纳西尔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加纳国家元首阿昌庞的唁电

这一杰出的世界领导人逝世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和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起感到悲痛。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智慧和渊博的学问。对此，人们可以滔滔不绝地加以赞扬，然而，在这万分悲痛的时刻，我们只能很快地想到那些最易于确认的领域，正是在这些领域，他的伟大贡献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现代世界各国的思想和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指的是他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的革命热情。这支军队现在不仅是保卫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可靠保证，而且是国家进行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而为人们所怀念，他熟练地掌握了党的方向和政策，掌握了这些方向和政策同国家利益的相互作用。毛泽东主席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正是他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当选为主席。他是革命领袖和理论家，他的扎根于农村的勤俭和自力更生理论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哲学。他的大量著作将继续激励一切正在为争取人类尊严、发展和进步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他是一位能洞察未来的人、学者——哲学家、军事战略家和非凡的世界政治家。毛泽东主席号召他的人民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一生实践了这个教导，从而改造了中国社会，把中国变成为今天的世界强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上沃尔特总统拉米扎纳的唁电

我们相信，这位长征人物的逝世，将在全世界使人们感到悲痛，因为他的名字不仅与英勇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永远连在一起，而且与所有被压迫和热爱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连在一起。毛泽东主席是战后和现代史上罕见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英明地、坚定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使中国革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领导人。他毕生是一位活动家和卓越的思想家，他给人类留下的大量、丰富的著作，将指导世世代代。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叶海亚·佩特拉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阁下是新中国主要的缔造者和建筑师，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亲自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马来西亚建立友好关系，马来西亚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这一贡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马耳他总统马莫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袖，他为推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马耳他政府和人民失去了一位真诚的伟大朋友。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唁电

我们认为，毛主席的逝世使人们失去了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之一。这些领导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他们深刻理解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并且以卓越的智慧领导了他们的人民。他们为捍卫人类的尊严作出了贡献，并为奠定和平与世界安全的基础进行了斗争。

中国复兴的推动者、中国的毛主席的光辉，将永远是中国人民争取发展和谋求幸福的一盏指路明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的唁电

这位当代历史性的伟大人物改变了世界事件的进程，引导他的人民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先锋，使新中国成为一个和平的现代化的工业化强国。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是非洲各独立国家人民、尤其是赤道几内亚人民的始终不渝的朋友。他的逝世使我们极为悲痛。伟大的毛泽东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领导中国人民的英明政策是永存的。赤道几内亚人民完全相信，并且深信，亿万中国人民定将继续执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的政策，继承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缔造者的事业。伟大的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直到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的唁函

这封由团长尤素福·阿吉托罗普同志签署的唁函说：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毛泽东同志的学说，即毛泽东思想，鼓舞和指引了全世

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真正的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斗争。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亚洲和世界的面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粉碎了各个叛徒集团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不可估价的新鲜经验。

在国际范围内，极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毛泽东同志发动和开展了揭露和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界限，加强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团结，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进。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竭尽全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和人民。

毛泽东同志在他整个革命活动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立下的功绩是无法估量的，是永存的。”

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总结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过去的斗争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印度尼西亚革命所必须走的道路，规定了在党的新的三面旗帜下要执行的各项任务。

在这悲痛的时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下定决心，要永远忠于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更加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决心加强团结，全心全意为争取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终身。

毛泽东主席培育和领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团结的关系，一定会继续发展、日益巩固并万古长青。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对全体中国人民，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衷心热爱他的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损失。我们衷心地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且向他的家属，特别是向江青同志，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我们确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永不变色的革命堡垒，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将永远活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毛泽东思想将继续成为鼓舞和武装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北斗星！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美国十月同盟（马列）主席迈克尔·克朗斯基的唁电

语言无法充分表达我们对我们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的逝世所感到的悲痛。他毕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的著作加深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解放的科

学。毛泽东主席在一生中，不仅为中国的解放，而且也为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获得解放而斗争。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他组织、建设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十五年中指引它开展了十次重大的反对各种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当前反对邓小平右倾路线的斗争。

他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起了推进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毛泽东领导开展了揭露和粉碎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他为革命战士指出了前进的道路——阶级斗争的大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宝库的重大贡献，是指导各国共产党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沿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路标。

悲痛激励着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加紧学习和工作。我们在进行革命中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将化悲痛为力量，加强革命团结，实现毛主席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指导我们发动争取实现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伟大遗教。毛主席的逝世比泰山还重，他的遗教永不磨灭。

谨向江青同志和毛主席的其他亲属表示慰问。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葡共（马列）中央维拉尔的唁电

这位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事业的继承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人将永远活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心中。全世界共产党人把他看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争取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导师。他的逝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对世界所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类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取之不尽的教导的源泉，它加强了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最富于进攻性和侵略性的超级大国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战斗团结。

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悲痛消息传遍五大洲，必将化为力量。我们相信，世界各国人民的共产主义事业和反霸事业必将取得新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必将激励着每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身心，葡萄牙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阿根廷共产党（马列）的唁电

唁电说：我们亲爱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革命者和各国人民深感悲痛。

唁电说：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中国解放的时期，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在着手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任务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又卓越地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使我们亲爱的中国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开始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和坚持革命旗帜的典范。

唁电说：毛泽东同志以他的思想和领导中国人民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威力，并证明人类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和正在为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可靠后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是指导这一斗争进程的参谋部。

唁电说：毛泽东同志对革命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对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革命发展的贡献。向全世界揭露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所扮演的反革命角色，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贡献。当以赫鲁晓夫为头子的修正主义司令部宣扬“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阶段已经熄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存在着形式不同的阶级斗争，勇敢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祖国恢复了资产阶级专政，企

图使各国人民和无产阶级脱离革命道路的困难时刻，毛泽东同志担当了世界革命的引路人。

唁电说：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留下的教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因为这些教导是同历史和人类的前进相适应的。

唁电最后说：阿根廷无产阶级和人民对于这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深感悲痛。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越来越高地举起我们已故的伟大领袖的旗帜，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毛泽东同志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穆罕默德·杜哈代表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的唁函

唁函说：“我们对中国人民衷心敬爱的领袖、全世界人民衷心敬爱的战友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深为悲痛。”

唁函说：“毛主席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卓越的领袖之一。在他的领导下，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今天建立了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被欺侮的人民的斗争中，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上，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

唁函最后说，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誓在革命的不妥协的斗争道路上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英明导师和领袖。他是人类获得新生活的伟大预见者并对此作出贡献的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我们衷心地表达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希腊工人阶级、革命青年和劳动人民的深切悲痛和我们的最深切哀悼，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战斗的慰问和共产主义的团结。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毛主席的事业照耀着我们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丹麦共产主义联盟（马列主义者）主席贝·斯科科萨的唁电

电报说：“我们沉痛地获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同志逝世。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是全世界革命运动和全世界人民的极其巨大的损失。”

电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期历史中，领导了反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伟大领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赢得了更加伟大的胜利。

“阶级敌人多次企图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更为艰巨的两条路线斗争，粉碎了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

“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同修正主义者和新的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进行了长期的和十分艰巨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对全世界革命者的巨大鼓舞。”

电报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运动和全体共产党人的巨大损失。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的极其显著的明证。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深切悲痛。但是，世界人民、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将把深切的悲痛化为新的力量。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将把悲痛化为新的力量，以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苏发努冯主席在吊唁簿上写道：“我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政府和全体老挝人民，沉痛悼念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伟大的领袖，老挝人民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我们向一贯给予老挝人民革命斗争以支持和援助的毛泽东主席表示最深切的感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意共（马列）等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福斯科·迪努齐和意大利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一起来到中国大使馆。他在悼念时说：“我党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党员对毛泽东同志逝世感到极为悲痛”。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是一个巨大损失，但是我们要遵照他的教导，化悲痛为力量。对于我们来说，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死，他永远同我们战斗在一起”。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冰岛共（马列）等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拉伯也门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哈姆迪主席在毛主席的遗像前默哀，并在吊唁簿上题了词。他写道：“我以也门人民的名义，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我们和友好的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一起承担这一巨人逝世的巨大不幸。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了斗争，作出了牺牲。我再次以也门人民的名义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极度的悲痛，我深信中国人民将继续前进，更加坚强。”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民主也门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鲁巴伊主席和伊斯梅尔总书记向毛主席的遗像默哀后在吊唁簿上写道：

“我们以民主也门人民、统一政治组织民族阵线和政府的名义，以沉痛的心情向中国大使馆、在民主也门的中国同志，向友好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衷心的哀悼，哀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逝世。”“对于这一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同中国人民一样悲痛。”他们还写道，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将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继续前进。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牙买加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发表谈话

“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我曾两次有机会会见毛泽东主席”。 “尽管他高龄，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的思想敏锐，具有伟大的智慧”。蒙博托总统强调说：“我相信，伟大思想家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将继续影响世世代代的历史”。他说：“我是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来怀念他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国家，他以智慧、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引导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声明说：“世界上许多小国能够同中国保持平等的友好关系是毛泽东主席为世界和平建立的功绩之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主席在他的一生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当代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埃塞俄比亚人广泛阅读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发了象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制订了革命的纲领。”“毛泽东思想还激励着埃塞俄比亚的被压迫群众在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声明指出：“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伟大作用以及他给世界被压迫人民和革命力量留下的革命遗产使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列。”

声明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毛主席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以毛主席为榜样并严格遵循他的教导，已经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伟大成就。毫无疑问，埃塞俄比亚的被压迫群众将从毛主席所树立的光辉榜样中得到教益，将从中国人民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警惕性中得到教益。”声明说：“自从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今天中国为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声明说：“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教导和他的战斗热忱将永远象明星一样，指导着世界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群众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福特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以他的行动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国家的发展的领导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同美国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比较积极的时代。我相信，毛主席帮助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改善的趋势将会继续对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荷兰议会和政府举行悼念仪式

冯德林议长在悼词中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学者和战士。他在多年中是现在人口已达到八亿的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每一个人，不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会为他的勇气和毅力而深受感动。”

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向议会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这位外交大臣接着说：“中华民族失去了象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和政治家，但即使在他逝世后，他的著作也会使他永生。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

毛主席是本世纪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将作为一位具有伟大远见的人和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思想家而为人们所铭记。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与伦比的成就的纪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各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盛赞毛主席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立下丰功伟绩

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不幸消息震撼了全球。从太平洋、印度洋到大西洋，从亚非拉到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和悼念。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纷纷为悼念毛泽东主席发表谈话、声明，发出唁电；许多国家的政府，把毛主席逝世当作国哀，决定举行全国悼念活动；许多会议，一国的或国际的，临时中断了既定的议事日程，哀悼毛主席逝世；许多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正常的节目，许多报纸和通讯社，压下了其他的新闻，为毛主席逝世的新闻报道让路，连续地、突出地、大量地报道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哀悼和吊唁活动，并且发表和转播了大量赞扬毛主席和介绍毛主席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其反应之强烈，阶层之广泛，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为了表示对毛主席逝世的沉痛哀悼，许多国家的政府，决定全国下半旗志哀或举行悼念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朝鲜、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埃及、坦桑尼亚、突尼斯、刚果、加蓬、塞拉利昂、加纳、贝宁、赤道几内亚、扎伊尔、苏丹、马里、索马里、乍得、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约三十个国家宣布全国下半旗志哀，其中朝鲜、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塞拉利昂哀期长达九天。朝鲜党政领导机关联合决定，为对毛泽东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定九月十日至十八日为全国哀悼期；在哀悼期全国一律下半旗；十八日下午四时，全国人民除不能中断工作者外，全部就地肃立三分钟志哀，有汽笛的单位鸣笛三分钟表示哀悼；这一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和政府决定宣布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为全国哀悼日，下半旗志哀和停止一切文体体育活动。民主柬埔寨政府决定，从九月十二日到十八日向毛泽东主席志哀。刚果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机构十日举行会议，就毛泽东主席逝世在刚果举行全国哀悼作出了五项决定，其中规定今后每年将在毛主席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不少国家的政府还为毛主席的逝世发表公告。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九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委内瑞拉全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志哀三天。

为了对毛主席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许多国家的政界人士、著名人士和各阶层的劳动人民当获悉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络绎不绝地到我国驻各国大使馆吊唁，并送了花圈、花束；他们接连不断地打来慰问的电话。唁电、唁函象雪片般送到中国大使馆，发往中国的首都北京。截至九月十四日止，已有近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向我国首都发出了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唁电或唁函；已有七十五个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唁电或唁函；已有六十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我驻各国使馆去吊唁。在坦桑尼亚，十日这天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许许多多当中，有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师生员工约四百人，他们集体前往，并在毛主席遗像前宣读了他们的唁电。在日本，从九日到十日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在西班牙，两天中有八百多人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有一家劳动者全家六人前往吊唁，一边痛哭一边唱国际歌。

九月十一日，法国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妇女和其他劳动人民一万多人，在巴黎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举行游行，哀悼毛主席的逝世，游行者到巴黎公

社社员墙前面举行了追悼仪式。在亚的斯亚贝巴，十几万人民群众在举行庆祝埃塞俄比亚革命两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时，为毛主席逝世表示哀悼。两地的游行队伍都高举毛主席的遗像和纪念毛主席革命业绩的巨幅标语。危地马拉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九日宣布，为毛主席逝世志哀三天，并将举行关于毛主席生平的一系列报告会。这些情景充分反映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和崇敬。

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都开展了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活动。九日，联合国下半旗志哀。联合国安理会十日开会时，安理会主席致悼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与会各国代表都发表讲话表示哀悼。会议还为毛主席逝世发出唁电。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一些其它机构，以及海洋法会议所属的各委员会都在它们举行的会议上为毛主席志哀。在海洋法会议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哀悼毛主席逝世。许多代表说，毛主席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损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损失。海洋法会议在九月十三日召开了特别会议悼念毛主席，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委员会会议，十日一致通过决议，对毛主席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常驻代表十日举行会议时，在总干事姆博建议下代表们肃然起立，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默哀。

连日来，各国通讯社都迅速、大量地报道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和各国人士对毛主席的赞扬和评价。不少通讯社在我《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公布后几分钟就摘发了消息，随后连续大量报道了详细内容或全文转发，并发表了评论和介绍毛主席生平的长篇报道。德新社在播发各国政界人士对毛主席评价的综合报道中说：“在宣布了中国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以后的几个小时内，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如潮水般涌来”。

同样，连日来全世界各国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都大量报道有关毛主席的消息，不少国家的电台、电视台中断原定节目，改播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随后大量播送有关毛主席革命活动的剪辑、照片和电视纪录片。许多报纸，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都以通栏标题和整版篇幅刊登有关消息、文章、社论和毛主席照片，有的国家的报纸一天用十多个版刊登消息、文章和照片，高度赞扬毛主席以毕生精力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

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追念毛主席光辉的革命活动，重温毛主席的教导，从中汲取力量和信心，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奋勇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佛得角总统佩雷拉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唁电

毛主席以他的哲学思想和革命精神缔造和创建了现代中国；他以他的工作赢得了历史上一位伟大领导人的地位。毛主席是一位光辉的世界性人物，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损失，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佛得角总理皮雷斯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挪威首相努尔利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几内亚比绍国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布拉尔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逝世使国际工人阶级、友好的中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战士。中国在令人缅怀的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获得了解放，这无疑是对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的巨大贡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的唁电

由于他的逝世，失去了本世纪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他创建了一个新的中国，并使她在世界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请你也向他的夫人江青女士转致我的哀悼。请你相信，在这悲痛的时刻，我们大家都真诚地分担中国人民的哀痛。我也相信，已故主席的形象将永远成为他的人民的典范和方向。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西班牙首相苏亚雷斯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不仅是贵国的、同时也是全世界的一位伟大人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朋友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革命
战士。他的伟大思想和业绩将铭刻在人们心中，并将载入史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唁电
对中国之父、第三世界的领袖和世界被压迫和受殖民奴役人民的解放斗争
的坚强支持者的逝世，我谨代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并
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衷心的哀悼和惋惜。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是中国的巨大
损失，也是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和所有进步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巨大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达科斯塔唁
这位伟大历史人物不仅使中国强大起来，而且给被压迫和被剥削人类提供
使他们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引着反对剥削的各国人民的斗
争。

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的唁电
世界将怀念他这位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的
高尚的历史性政治家。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巴拿马政府首脑托里霍斯的唁电
我一直深切地希望能有幸认识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他知道如何使自己的
人民享有尊严和免于饥饿。

中国向人类贡献了她的一位最伟大的人——毛泽东，他的遗训将永世长
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把他的整个一生贡献于建立一个新中国。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激励今后的世世代代，并保证他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半个多世纪来他的献身的领导使他赢得了本国人民的热爱和全世界的尊敬。他为增进国际了解和促进世界和平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将永远为人们所记忆。在联合国，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同其他国家一起帮助建立一个对于大家都更美好的世界。在执行这项任务方面，世界现在失去了毛主席的伟大智慧和经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唁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领袖，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党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国内各个反动阶级的长期艰苦斗争过程中，赢得了中国革命的光辉胜利，鼓舞着全世界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深信自己有能力摆脱压迫和赢得社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证实毛泽东同志是人民战争最卓越的理论家和战略家。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成就，是同他在解放以前和以后一系列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特别是近年来反对以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为头子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在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的领导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是革命思想的巨人之一。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民族解放斗争和建党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便防止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复辟的这一理论的贡献。

象列宁生前一样，毛泽东同志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以反击自赫鲁晓夫以来以苏联共产党的叛徒们为首的修正主义的进攻。在这方面，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和实践的领导者。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他亲自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证实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他出色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导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的目的，同世界革命的其他伟大导师和领袖一样，是谋求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从未忘记强调人民群众在创建和变革社会中的作用，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参加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世界工人和被压迫人民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和被信赖的同志、导师和领袖。在悼念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们将在他的革命路线和教导的指引之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进行未来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任何人比毛泽东本人更好地运用这句话。

他从群众中汲取了力量和智慧。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工作献给了群众。

第四章第四节 各国对毛泽东逝世的吊唁（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德共（马列主义者）主席奥斯特的唁函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不朽的业绩就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于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英雄的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都是不可估量的、沉痛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把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引向胜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具有坚定原则性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并使她成为他们斗争中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具有高度原则性的斗争，为各国共产党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并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唁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唁函说：“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曾经是最落后、最贫穷的中国，今天已经变成伟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革命的堡垒，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热爱和支持，在各国人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尊敬和同情。这就光辉地证明了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叛变，反对他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坚定不移的斗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阶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此，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将永志不忘。”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击溃了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群众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程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蜕变和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回击反革命的任何进攻，捍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唁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和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苏联及其他一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蜕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个问题对工人阶级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当前，在反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他一贯鼓励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进行到底。”“今天，全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坚决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日益清楚地认清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而产生的战争危险；今天，俄国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在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具有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越来越被识破，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发展、壮大。这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事态发展，是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逝世了，然而他的事业是不朽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一样，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永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胜利斗争中的指南。

“全世界共产党人、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将忠于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思想，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当高山轰鸣出那不吉的音讯时，静静的泪水浸洗着溪谷。

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失去了自己事业的宝贵战士，这一损失带来了难以忍受的苦痛。

这一损失之巨，非言词所能估量。中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了一个毛泽东，这一力量照亮了世界。战斗在高涨，他的丰富思想作为进军队伍前面的大旗在飘扬。

他的遗范竖立着许多丰碑，它们比花岗岩更坚实，垂久性非困难或危险所能亏损，生命力非死亡所能压倒。一切为反对剥削和压迫而斗争的人们，都能从那里找到手段和方法，找到征服困难和危险的勇气，找到坚持到工人阶级胜利的信心。对于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正在进行的伟大战斗，即巩固工人阶级统治和防止苏联式倒退的战斗，我们信赖受到他的思想哺育、在他领导的战斗中经受锻炼的革命接班人，将克服一切障碍，并且以他的名义引路前进。

我们的悲痛，同他的夫人和家属的悲痛，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悲痛，汇合一起。我们保证继续进行斗争，直到从地面上永远扫除变人类劳动为私人利益的条件。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政治局梅德尔纳赫的唁电

卢森堡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无产阶级以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感到震动。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功地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是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不倦的战士。他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之后，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还会毫不减弱地继续存在。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由他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西欧以及卢森堡的许多革命者摆脱修正主义，坚决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对正在进行反对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突出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对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进步人类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确信，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将把他们的深切悲痛化为力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卢森堡共产主义同盟向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将在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把毛泽东同志当作榜样。

世界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逝世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将与世长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圣马力诺共产党（马列）政治局的唁电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业绩和教导是永垂不朽的，在争取解放、独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人民斗争中是永世长存的。我们谨向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哀悼。我们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此悼念毛泽东同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马列）共产党中央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感到无比悲痛”。

电报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于革命斗争的巨大贡献使他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一样，名列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领袖的行列之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冰岛共产主义统一联盟（马列）中央主席古德蒙松的唁电

电报说：“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英明无畏的共产党人的最优秀的榜样”。

电报说：“在我们争取冰岛实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所发动的斗争和他的著作，是我们汲取知识的宝贵的源泉，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著作将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一起永世长存，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

电报说：“我们知道，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将不遗余力地继续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去夺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在这一斗争中，你们将得到我们最完全的支持。”

电报最后说：“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塞拉利昂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史蒂文斯总统在吊唁簿上写道：“毛主席的逝世是全世界的极大损失。”随后他对中国大使宗克文说：“我同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一起，为毛主席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极大损失，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损失，特别是塞拉利昂的极大损失。我一九七三年访问中国时，荣幸地在到达北京不久就见到了毛主席。我还看到了从那时以来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菲律宾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索马里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西亚德总统在毛主席遗像前默哀后，对中国大使张世杰说：“毛泽东主席将不仅作为中国的一位先锋，而且作为当代的一位伟人被人们铭记在心。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政治家。”他说：“我们深信，伟大中国人民的儿子将继续根据他的思想去行动。中国人民将继承毛泽东主席留下的事业。”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马里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澳大利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美国官员和各界人士到我联络处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刚果总统恩古瓦比主持追悼大会先后发表讲话和《告全国人民书》

他在讲话中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继承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并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伟人”。他说，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他的革命业绩和思想“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者、特别是对刚果人民来说，将永垂不朽”。

《告全国人民书》说：“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的不幸逝世在我们心中引起无比的悲痛。毛泽东主席的业绩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出了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国界，在全世界得到了承认。”

《告全国人民书》说，“毛泽东主席从发动民族解放斗争、进行长征直到逝世，始终坚定地把他和人民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中彻底解放出来，为把人民逐步引向幸福和社会公正而奋斗。”“中国人民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外交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历史的每一个重大时

刻都有他的光辉业绩。”

《告全国人民书》说，“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耳边又响起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对我的充满智慧的谈话。”“他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这是非凡的英雄的形象。”

《告全国人民书》说：“对刚果和全世界革命者来说，毛泽东主席永远是革命的形象和革命的不朽象征。对我们来说，他的思想将与世长存，并将继续指导我们的革命行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刚果领导人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举行静默游行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发表谈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驻日内瓦的一些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到我代表处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的光辉业绩鼓舞世界人民胜利前进 各国人民和舆论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

朝鲜《劳动新闻》九月十日的社论写道：“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他的革命活动，是把一切全都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争取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同一天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不朽的光辉业绩“将成为鼓舞一切革命者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争取真正的民族与社会解放斗争的伟大源泉”。

许多国家的评论着重指出，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

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在就毛主席逝世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谈到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声明说，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发生的任何变革都具有世界意义。声明强调，特别是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崭新的和巨大的贡献”，“并为人民所进行的争取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最后从地球上消灭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开辟了新的天地。”声明说，“全世界千百万共产党人承认，毛主席是革命理论的创立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芬兰马列主义小组执行委员会九月九日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第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的人。他几乎在各个方面为发展马列主义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声明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动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们揭露了赫鲁晓夫蛊惑人心的宣传，并且详细阐明了自赫鲁晓夫当政以来在苏联开始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特征。他们在国际范围内揭露了今日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侵略性质，并告诫人们警惕它发动战争的越来越大的危险。”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联盟全国委员会九月十日就毛主席逝世发表声明说，“毛泽东写下的世界历史的不朽篇章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鼓舞着全世界千千万万被剥削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展开的殊死斗争。”菲律宾《每日快报》十日的社论指出，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同现代修正主义所作的斗争，无疑将不仅为中国人所铭记而且为所有的人所铭记。

各国舆论在谈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的时候都一致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九日的社论说，“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

命家。”他“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并把她建设成为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强大而可靠的基地”。

叙利亚《复兴报》十日写道，毛主席“将自己的生命同亿万人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毛主席的经历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成功的历程。”摩洛哥电台九日发表评论说，“毛泽东这位光辉人物的一生，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和现代史上起了突出的作用。”“毛泽东的名字将同现代史上的伟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永存。”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九日说：“翻开中国近代史，很显然存在着进行革命的必然性。但是，可以说，如果不以毛主席为核心，就不可能使新的革命获得成功。”“中国革命，不是靠高性能的武器和丰富的物资取得成功的，而是靠质量差的武器和在缺乏物资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这不能不说，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起了伟大的作用。而且为了持续这种革命精神，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连续的革命，这是新中国壮大发展的原因。”

德新社九日评论说，中国的变化“将永远同毛泽东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新中国，“人民公社真的移了山，迄今被认为不可驯服的河流被驯服了，沙漠得到了灌溉，海上钻井从海里取得了石油。从雷达到运载火箭，从原子弹到卫星返回，这一切人民共和国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取得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失去了伟大导师毛主席而沉痛哀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评论指出，毛主席的不朽功勋和他的光辉思想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九日就毛主席逝世发表的公告说，毛主席“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伟大作用以及他给世界被压迫人民和革命力量留下的革命遗产使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列。”“他的教导和他的战斗热忱将永远象明星一样，指导着世界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群众前进。”

坦桑尼亚《自由报》九月十日的社论说：“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比任何别的人都大”。“在他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帮助他们从奴役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对世界上许多人说来，毛主席的名字就意味着解放。”

毛里塔尼亚《人民报》九月十日在社论中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毛泽东主席的

英明领导下中国始终“把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在第三世界正需要从他的智慧和他的无与伦比的经验中受到教益的时候，他的逝世使人感到极为悲痛”。

扎伊尔通讯社和扎伊尔《埃利马报》、《劳动报》九月十日分别发表社论，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而悲痛”。扎伊尔通讯社的社论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已经成为所有为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榜样。”《埃利马报》的社论写道：毛主席“无私地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世界上正义、和平和自由的事业。这就使他的一生赢得了各国人民衷心赞扬、崇敬和爱戴。”

墨西哥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坎塞科说，毛主席的逝世，使“中国和第三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领袖”。

马里《发展报》十日的社论说，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他的人民和所有被压迫、受凌辱的人民，因此，他的奋斗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巴基斯坦《东方报》九月十日的社论说，毛主席“不但使中国获得了新生命，而且教会整个第三世界懂得了新的生活道路”。社论说，毛主席的思想和教导将“永远放射光芒”，他“所开拓的道路将引导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争取和平、进步和繁荣的斗争”。

《巴基斯坦时报》在社论中写道，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影响最大的、最足以表现人类的力量和创造性的，就是毛泽东”。毛主席的思想“照亮了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道路，教会了小国站起来坚决战斗，唤起了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的觉悟”，使他们看到了“依靠自力更生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尼泊尔前首相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发表声明说，“毛主席是世界被蹂躏、被剥削人民的伟大领袖。”

叙利亚《复兴报》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毛主席的思想“丰富了人类的思想，他的计划和指示影响了渴望自由和解放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毛泽东的逝世使世界人民失去了思想家和领导者。”

苏丹电视台在九月九日晚上的特别节目里发表评论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毛主席点燃的火焰将永远照耀着中国和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

敬爱的毛主席与世长辞了，但是，人们都感到，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永

远活在各国人民的心中。斯里兰卡《人民力量》周刊的社论说，“毛主席以无私、忠诚、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献身的革命事业，不仅永远活在八亿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也活在四十亿世界人民的心里。”

菲律宾《每日快报》十日的社论说，毛主席的“言论和业绩使他永远活在全人类的心中”。

苏丹《天天报》刊登了一首题为《毛主席还活着》的诗，体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情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诗中写道：“毛主席没有去世：他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劳动者的心中，他的精神正飞越各地的工厂、田野、乡村。”“毛主席没有去世：他的思想永远不灭，永远不灭，它是自由的火炬、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贝宁总统克雷库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是献身于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完全彻底解放的正义事业、刻苦工作、顽强斗争、高瞻远瞩、坚韧不拔、满怀激情从事革命的永不磨灭的光辉榜样，是谦虚谨慎、坚定地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一贯地有效支持第三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光辉榜样。贝宁人民在其先锋队——贝宁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政党和运动一起，必将从他的堪称典范的一生中汲取正确的教益，把悲痛化为更加彻底、更加深刻的革命行动，完全独立地、负责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原则和毛泽东主席的教导。进步人类光荣的儿子、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的光辉形象永垂不朽！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敬爱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永垂不朽！

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不朽革命事业的天才继承者，让我们沿着毛泽东所继承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光辉大道前进！为革命，时刻准备着！斗争在继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南斯拉夫议长格里戈罗夫的唁电

我们悲痛地获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建设现代中国的不知疲倦的战士毛泽东同志逝世，他为争取本国人民更美

好的未来的斗争贡献了自己的整个一生。毛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使世界失去了一位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意义的人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冈比亚总统贾瓦拉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逝世对中国人民必然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和悲痛的损失。由于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和我本人对毛泽东主席的回忆，这一巨大损失使我和冈比亚人民深感悲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南联邦执委会主席比耶迪奇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圭亚那总统阿瑟·钟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他从年青时代起就为争取祖国的完全解放英勇斗争，后来又不断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充满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强大和受尊敬的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一切将使他永远为人们所怀念。他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对世界事务的无私贡献将在史册上永放光芒，他的献身精神将鼓舞着以后的世世代代。毛泽东主席对人类前途的预见是独特的，他的远见和智慧将继续影响整个世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的唁电

他以无与伦比的优良品质、高瞻远瞩、献身精神和智慧为中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使中国人民恢复了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他不仅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战略家和英雄，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他孜孜不倦地长期努力奋斗，他也是一位最能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和平和正义事业的政治家。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科摩罗主席穆鲁瓦维利的唁电
整个第三世界失去了一位起了历史性作用的导师，但是他的榜样和教导将永世长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冰岛总统克里斯蒂安·埃尔亚恩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苏里南总统费里埃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爱尔兰总统凯布霍尔·厄道莱伊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厄瓜多尔最高执委会主席波维达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苏丹副总统兼总理巴克尔的唁电
他是中国人民的最高革命领导人，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和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哲学不仅对全人类有着永久的影响，而且激励人们去改造世界和社会条件。由于他的贡献，中国人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杰出和享有崇高威望的民族之一。毛泽东主席和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已经向全世界证明，在追求真理和履行合理的义务过程中，人的意志能够创造、保持和发展适当的生活条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玻利维亚总统班塞尔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
唁函说，“世界上最大民族的领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革命家、理论家、革命战争的战略家，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者和建设者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思维停止了活动。一位具有伟大精神和革命业绩的人物逝世了。这是中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沉重而悲痛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波兰共产党、波兰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革命哀悼。”

唁函说，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毛泽东，在两代人的时期内，不屈不挠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革命洪流的前列。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制订了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总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指引最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直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对卡尔·马克思关于‘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理论上的天才发展和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胜利实现。这个把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历史性的一步，转变成为宏伟的壮举，并成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走上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团结的道路，这使毛泽东与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并列在一起。”

唁函说，“毛泽东思想同任何停滞不前都是格格不入的，他的整个一生都忠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右倾机会主义势力进行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是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最突出的表现。毛泽东首先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集团，并站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毛泽东保卫了中国共产党，使她免遭资产阶级蜕变，保卫了中国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专政免遭变质。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高高举起被赫鲁晓夫一类共产主义的叛徒们所抛弃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唁函说，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并有力地打击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社会帝国主义集团。“毛泽东提高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和反抗精神。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加强和

锻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唁函说，“毛泽东逝世了，他留下了要在中国和全世界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遗训，留下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革命团结以及沿着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新胜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我们将怀着革命的荣誉感来完成这项任务。”

唁函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党及其强大的、经过阶级斗争考验的老、中、青三代革命干部和不可战胜的人民革命军队，具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进一步巩固作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堡垒的无产阶级专政。伟大的中国人民将象保护眼珠一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团结在光荣的党的周围，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向共产主义迈进。

唁函说：“毛泽东亲自关注波兰的十二月事件和六月事件的进程，高度评价波兰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波兰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将怀念毛泽东，并从他一生的历史中吸取鼓舞力量，为争取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继续斗争。

“毛泽东逝世了，但是他的创造性的一生的事业永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书记处唁电电报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失去了自己最杰出的领袖。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领导中国人民排除重重艰难险阻，粉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一切进攻，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述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并将这一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以运用。”

电报说：“毛泽东主席总结了中国的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大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毕生都在同各种机会主义，特别是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修正主义背叛之后，正是毛泽东思想再一次给世界无产者和各国人民以勇气，并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电报最后说：“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要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永远不要脱离群众。在我国开展阶级斗争，是我们为从事和继承毛泽东主席的事业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芬兰马列主义小组执行委员会的唁电

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贡献了自己的整个一生。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当代革命中很多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同志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为源泉，在各个主要领域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为反对机会主义潮流而斗争的党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中国红军的缔造者，发展了中国红军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了中国红军进行英勇斗争。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引下，中国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拿起武器，在革命的人民战争中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中，毛泽东同志在继续革命的斗争中，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的、日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摧毁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和邓小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划时代的反对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在修正主义背叛后重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对外政策赢得了巨大的尊敬。毛泽东同志在揭露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方面的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家和工人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者，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革命者的重大损失。

我们代表芬兰共产党人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我们将永远纪念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不朽的毕生工作。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则运用于

具体实际。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阿根廷革命共产党总书记伊鲁斯塔的唁电

对于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悲痛。我们举着战旗志哀，宣誓要为保卫毛泽东为之献身的无产阶级事业和学说而战斗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中央唁电

电报说：“毛主席的逝世，对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对加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都是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他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且通过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原则。他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电报说，他站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前列，坚定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真正的马列主义力量，同修正主义及其头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毛主席从曾经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实总结出重要的教训。

电报说：“他领导和参加了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人民所有的伟大战斗。”电报说：“毛泽东发动和亲自领导了党内多次政治路线斗争。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动员起来，反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影响。在毛主席领导下发动起来的批林批孔和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作出了巨大贡献。”

电报说：“毛主席的一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生动的榜样。他始终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反对资本主义；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支持一切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而斗争的人们。

“毛泽东同志作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领袖之一，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起，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电报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榜样和革命路线的鼓舞下，必将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书记施米勒尔唁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指出：“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现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这一预言已经变为现实。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国各族人民，把原来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落后的中国，通过革命变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给予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以有力的打击，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创建了一个坚强的堡垒，并激励各国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始终不渝地加强同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中的团结。毛泽东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并发挥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按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粉碎了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进攻，建立了强大的新中国。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击退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道路”、“阶级斗争熄灭论”等一切修正主义谬论，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使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工人阶级解除武装。

社会主义的苏联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暂时攫取了政权。“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国际无产阶级要想在最终摆脱剥削和压迫的道路上不遭受严重挫折，就永远不应忘记这个重要的教导。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和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阴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课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更好地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

毛泽东主席曾发出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这一号召定将实现。

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将把对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深切悲痛变为革命的力量。毛泽东主席以他的学说和业绩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说、他的榜样、他的功绩将永远留在工人阶级的心里。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组织中央领导机构的唁电

电报说：“我们怀着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逝世时所表现的那种悲痛心情，谨就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保卫者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向你们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电报说：“我们要历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战场上和世界舞台上所取得的一切丰功伟绩，那是永远说不完的，因为他把自己漫长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不论在任何时候，在国内国际上的任何政治关头，他都善于给中国党、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出正确的方向。”

电报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创造性地、生动地、无与伦比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宝库。毛泽东同志在思想、哲学、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组织等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确立、发展和建设共产党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捍卫、

巩固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不朽的历史功勋。”

电报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马列主义之所以正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革命之所以正在所有国家蓬勃发展，修正主义之所以声名狼藉，遭到失败，并在同帝国主义一起走向崩溃，这都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当修正主义刚一出现，毛泽东同志就识破了它的资产阶级本质，并用马列主义的无情的铁锤予以迎头痛击。”

电报最后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革命的动力和决心，要象毛主席那样，把我们的一生献给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使意大利也取得英雄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那种成果。”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布隆迪领导人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米孔贝罗总统对中国大使说：“毛主席逝世不仅使中国人民感到非常悲痛，同时也使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感到非常悲痛，他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毛主席逝世了，但是，他的光辉思想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将永世长存。愿这座灯塔永远照耀着全世界革命人民争取从一切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道路。”米孔贝罗总统还表示：“我对中国人民的享有威望的领袖和伟大思想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切的悼念，他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同志不仅对本国人民，同时也对第三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使中国人民团结，并且用革命思想武装中国人民，这种思想使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的逝世使我们深感悲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埃及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马达加斯加领导人表示诚挚的哀悼

拉齐拉卡总统说，获悉毛泽东主席逝世，深感悲痛。“中国共产党失去了

自己的伟大舵手。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马达加斯加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马达加斯加革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盟友。世界革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的确，他是属于全人类的。他虽然逝世了，但是他的活动在我们地球上已留下并将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著作和思想将永世长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苏丹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中非共和国领导人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泰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加纳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阿昌庞主席对中国大使杨克明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沉痛哀悼。他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实际上使全世界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他还说，毛主席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和主张将继续鼓舞人们去争取更大的经济进步和反对世界压迫者。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缅甸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乍得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富汗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印度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卢旺达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尼日尔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斐济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西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特费里主席在群众集会上悼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举行全体特别会议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赞扬毛泽东主席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长篇报道：毛主席的光辉业绩鼓舞世界革命人民前进

皑皑珠穆朗玛峰肃立默哀，滔滔太平洋呜咽不止。

一个令人无比悲痛的消息，震动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全中国人民，为失去自己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无限悲哀。

全世界革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沉浸在悲痛之中。

在北京，跟毛主席握过手的八十多岁高龄的英国专家史密斯，泪水盈眶，语音颤动地说：“快！给我工作……让我用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在北京实习的六名埃及小朋友难过得哭了。她们用灵巧的小手制作花圈，从黄昏直到凌晨，那片片洁白的花瓣，倾注着她们对毛主席的深情。

在上海，两次见过毛主席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含泪疾书悼文，字字句句寄托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哀思。

在韶山，正在那里访问的东帝汶战士在毛主席遗像前发出庄严誓言：“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把人民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在大连、青岛、新港、黄埔，一艘艘外国轮船，降了半旗；许多海员噙着泪水，低着头，默默悼念……。

在这悲痛的时刻，五大洲有多少国家作出决定，以种种方式悼念毛主席。在兄弟邻邦朝鲜，城乡各地下半旗九天，并在十八日鸣笛志哀。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在罗马尼亚，工人、农民、学生，纷纷对毛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柬埔寨、越南和老挝，各地群众沉痛悼念毛主席。非洲的自由战士从内心深处流下了悲痛的眼泪，握枪志哀。在拉丁美洲，有一个国家的剧团连续三天在演出前举行仪式，全体演员捧着毛主席遗像登上舞台，宣读悼词，五百名观众起立默哀。在法国，成万劳动者举行集会，并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在美国，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我国联络处，哀悼毛主席。在西德，汉堡、慕尼黑的劳动者抬着毛主席遗像举行火炬志哀游行。在波兰和匈牙利，不少群众自发地到我国使馆吊唁。千万封唁电唁函，以最快的速度，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从地球的各个角落飞向北京。这几天，世界各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发表了无数的评论、文章和报道，悼念毛主席，颂扬毛主席不朽的革命业绩。

亚非拉国家的报刊写下了这样感人的语言，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和爱戴：

“对当代的命运影响最大的、最足以表现人类的力量和创造性的，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不仅载入中国人民的史册，而且载入全人类的史册。”

“毛泽东的名字，他的业绩和思想将是永存的，各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标志我们时代的非凡的人物”。

“毛主席不仅永远活在八亿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也活在四十亿世界人民的心里”。

世界革命人民怀念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永远鼓舞着世界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标志着我们失去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巨人。不同的人和国家可以按各自的政治观点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他的不朽的品质。

他是人民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古往今来的伟人。他把中国锻造成为一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国家，并以他的智慧、胆略和自我牺牲精神领导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

世界上许多小国能够同中国保持平等的友好关系，这是毛泽东主席为世界和平所取得的成就之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伊拉克总统贝克尔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土耳其总统科鲁蒂尔克的唁电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逝世，使国际政治舞台失去了它的最杰出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努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各国带来新的生活方式，给本世纪留下了印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唁电

已故毛主席是一位杰出的、老一辈的政治家，他以献身精神，光荣、庄严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他的领导鼓舞了英雄、伟大的中国人民；由于他，中国才得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毛主席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崇敬。

毛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乃至全世界失去了一位老前辈的伟大政治家。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黎巴嫩总统弗朗吉亚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几内亚比绍部长会议主席门德斯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希腊总理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不丹国王旺楚克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瑞士共产党（马列）中央的唁电

电报说：“我们党和瑞士人民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光荣的中国人民心连心，深切感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是无比巨大的损失。”

电报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争取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的贡献指引着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电报说：“毛泽东同志对当前世界的分析无可估量地加强着各国人民为夺取独立、自由和革命、为反对世界最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两个超级大国而斗争的世界潮流。”

电报说：“世界各国人民都热爱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瑞士人民谨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哀悼，他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旗帜。”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的唁电

电报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使我们深为悲痛。”

电报说：“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史诗般的革命斗争的伟大领袖，是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领袖。他在反对一切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培育了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主席为各国人民指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争取独立自主的英勇斗争的道路。他亲自领导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培育了新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在世界上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电报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斗争的一生中所形成的思想，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思想、他的一生和业绩所提供的榜样与教导，是我们的财富，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手中克敌制胜的武器。”

电报说：“毛泽东同志的业绩所留下的巨大财富必将永世长存，结出硕果，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必将在各国人民斗争中诞生。”

电报说：“对毛泽东同志的悼念，能鞭策我们在现实中更多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鞭策我们在阶级斗争中以更大的决心和责任感努力奋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中央的唁电

电报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逝世，无疑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心中。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消灭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斗争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的名字永远同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建设社会主义连在一起。”

电报说：“毛泽东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在唯物主义哲学、军事理论、人民民主政权的论述及其它重要问题上所作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贡献，对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不可替代的指南。我们将永远牢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决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

在运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给予我们生动的、重要的教导。”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瑞典马列主义斗争联盟中央的唁函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在漫长、峥嵘的岁月里深受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爱戴和崇敬的领袖。”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曾提醒各国人民注意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资产阶级篡夺政权的后果，还要注意当前苏联领导人对世界人民和世界和平所造成的威胁。”

唁函还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引起了深切的悲痛。在中国和全世界，人们将缅怀和称颂毛泽东和他的丰功伟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加拿大马列主义“在斗争中”组织唁电

电报说，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电报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在领导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主席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将继续成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指针。”“毛主席作为典范的战士、伟大的理论家和导师将永远活在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有无产者和各国人民的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唁
不管各国负责人对发展自己的国家、对国际合作所作的选择如何不同，大

家都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悼念这位世界历史伟人。

长征的卓绝经历对全人类来说，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凭着毅力和信念达到目的的榜样。毛泽东深深热爱自己的国家，因此他能战胜外国的占领，实现祖国的统一，并使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迅速向前迈进，今天进入了世界各国的最前列。祖国是他赋诗的源泉，使他居于文学家和活动家的前列。

我本人极其高度地赞赏他对大地和农民的酷爱以及他的现实主义态度。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塞内加尔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法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马达加斯加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加蓬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摩洛哥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几内亚比绍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叙利亚领导人到我使馆

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尼日利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科威特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意大利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永远活在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尔巴尼亚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主持大会。

谢胡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说：“党中央、人民议会主席团、部长会议和地拉那区党委今天组织这个大会，悼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最尊贵的朋友毛泽东同志。”

谢胡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使世界上一切进步人民和革命者感到无比悲痛，因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天才业绩的继承者。

“毛泽东同志对加强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曾经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钢铁般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友谊是与世长存的。对于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我们今天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分担深切的悲痛，并向他们保证：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

尼亚共产党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期望的那样，正如霍查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正如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不管在困难的日子里，还是在美好的时刻，一定同他们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将铭记在我们心中！”

接着，谢胡同志宣布，全体肃立为毛泽东同志逝世默哀三分钟。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希·卡博在会上致悼词。

卡博同志在悼词中说：“毛泽东同志逝世带来的巨大损失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兄弟的中国人民感到难以形容的悲痛。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也沉浸在这种难以形容的悲痛之中，并以崇敬的心情十分沉痛地悼念毛泽东主席，缅怀他的光辉业绩。毛泽东主席及其光辉业绩永垂不朽。”“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整个革命的一生、全部精力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彻底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进步事业、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爱好自由的人民的事业以及共产主义事业。”

卡博同志在悼词中详细地回顾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赞颂他根据中国具体条件，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性功绩。接着，卡博同志说：“半个多世纪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可靠地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给它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在反对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中，把党培育和锤炼成为一个新型的革命的党。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鼓舞者和领导者：这场革命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卫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动员了亿万劳动群众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成为对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的一所大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革命对反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革命路线对刘少奇及其同伙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卡博同志还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粉碎林彪、邓小平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斗争。

卡博同志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中国广大人

民群众热烈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粉碎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推行修正主义的卖国贼和叛徒们的企图，不断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周围。

卡博同志说：“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思想和天才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具有重大价值的创造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战士。他在揭露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建树了特殊的功勋。当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发动中国共产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这一巨大危险进行斗争并揭露了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行动。“生活证明了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正确性。”

卡博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受到各国人民、世界马列主义的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巨大热爱和崇敬。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帝反殖斗争问题的著作，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反对它们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对于开展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都是具有巨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学说。”

卡博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和恩维尔·霍查同志是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伟大的、兄弟的革命友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紧密团结的鼓舞者和缔造者。这种友谊和国际主义团结是牢不可破的，是经历过一切考验的。”

卡博同志说：“在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由于失去了自己伟大和尊贵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而感到十分沉重和极其悲痛的时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全心全意地同他们站在一起，并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共产主义团结的感情。

“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完全相信，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鼓舞下，以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斗争和崇高的革命品质为榜样，必将化悲痛为力量，为坚定地继承和发扬他的光辉的革命业绩，为更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加倍奋斗，夺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加宏伟的胜利，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破坏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任何阴谋。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沿着毛泽东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并必将进一步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和威望。”

卡博同志最后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同样相信并且保证，阿、中国际主义友谊——它有益于我们两国人民，有益于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必将日益加强并得到锤炼。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追悼大会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民主柬埔寨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波尔布特总理致了悼词。

波尔布特总理说：“我们大家怀着无比悲痛和怀念的心情，来到这里举行群众大会，向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人民的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杰出导师、柬埔寨人民亲密和热情的战友——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崇高英灵，表达我们无限热爱和崇敬的革命感情。”他说：“毛泽东主席阁下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为中国的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具有深刻而激烈的革命斗争意义的一生。”

波尔布特总理在悼词中回顾了毛泽东主席光辉的革命的一生，介绍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说：“这些伟大的胜利是在毛泽东主席阁下坚强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取得的结果。”

他说：“在毛泽东主席阁下英明正确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为现代世界革命运动树立的最优秀、最珍贵的典范。毛泽东主席阁下把这些经验总结成为对当代和将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有价值的马列主义文献，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阁下

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及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中农村和城市的作用、人民战争、中国革命的文学艺术、文化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论述，胜利地经受了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考验。这些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生动的文献，是不朽的文献。

“毛泽东主席阁下对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建树了丰功伟绩。他是国际革命运动中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一位杰出的导师。”他赞扬毛泽东主席在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和革命新阶段中给予柬埔寨人民的巨大支持和鼓舞。他说：“毛泽东主席阁下的逝世，对民主柬埔寨革命组织、人民和政府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损失。”“柬埔寨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阁下对柬埔寨革命和柬埔寨人民所怀有的最特殊的感情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柬埔寨人民无限敬仰和衷心敬佩毛泽东主席阁下高贵的、典范的革命一生和崇高的革命品德。柬埔寨人民怀着最深厚的革命兄弟感情无限悲痛地悼念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崇高英灵。”

波尔布特总理说：“由于柬埔寨革命组织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两国人民坚定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在真正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尊重各自的主权和独立自主、绝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所以在柬埔寨革命组织领导下的柬埔寨人民，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阁下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共同巩固和发展了柬埔寨革命组织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牢固的、美好的伟大战斗团结和兄弟革命友谊。正是基于这样牢固的基础，所以，仅有八百万人口的柬埔寨人民和多达八亿人口的中国人民之间才有如此非常美好的革命团结和友谊。”“柬埔寨革命组织、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革命军，将继续坚定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站在平等、相互尊重、尊重主权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的牢固的原则立场上，巩固和发展柬埔寨革命组织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柬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战斗团结和伟大的革命兄弟友谊，使之更加美好。”

波尔布特总理说：“虽然毛泽东主席阁下同中国人民和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永别了，但是，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名字和他的革命思想，象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是指引革命道路的明灯一样，将永远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盏明灯。“在这无比悲痛和怀念的时刻，柬埔寨革命组织、柬埔寨人民、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革命军，怀着最深厚的革命情谊，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人民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运动的杰出导师、柬埔寨人民亲密和热情的战友毛泽东主席阁下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罗马尼亚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格·勒杜列斯库同志致悼词。

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光辉战士毛泽东同志和罗马尼亚人民永别了。“在这令人震惊和沉痛的时刻，我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劳动人民同中国人民同样感到难过。毛泽东将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光辉的人物之一、现代中国之父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都强调指出了他的杰出品格和他的革命事业的宏伟规模。我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追悼、怀念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一位伟大而忠实的朋友。他特别珍视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与合作的事业。齐奥塞斯库同志所致的唁电，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对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极为深切的哀悼，并表示相信：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团结将继续加强和日益发展。”

勒杜列斯库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一生，他的事业是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事业。他的整个一生和革命活动同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光辉战斗历程交织在一起。

勒杜列斯库同志在叙述毛泽东主席光辉的革命历程及其历史功勋之后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数千年历史的一个转折，在中国人民面前打开了新生活的前景、尊严与进步的前景。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与民族独立、争取更加美好生活的斗争产生了强烈影响。在今天，八亿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对世界力量对比，对当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整个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和活动不仅是同党的创立，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是同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连在一起的。”

勒杜列斯库同志接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二十七年，就向世界展现了一幅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图景。它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为实现党和国家所确定的目标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中国人民所有这些伟大胜利，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以其理论著作而在社会政治革命的科学方面成为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毛泽东同志看到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社会力量，他总是经常地强调团结的巨大作用，不断号召人民在斗争中团结起来，为革命的胜利以及建设新的制度而奋斗。”

勒杜列斯库同志指出：“众所周知，人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她是当代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斗争的一支强大的力量，是为保卫和平、倡导各国人民争取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神圣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为利用本国资源以利于自身的发展而斗争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勒杜列斯库同志沉痛地说：“罗马尼亚人民已经失去了毛泽东同志这样一位伟大和忠实的朋友，一位为发展罗马尼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而努力的积极战士。”勒杜列斯库同志在谈到罗中友好合作关系时说：“这种关系始终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权利平等、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的。”“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会晤和会谈，对建立这种相互关系的牢固基础，对全面发展扩大这种关系作出了重要的决定性的贡献。”

勒杜列斯库同志说：“罗马尼亚人民从内心深处分担中国人民由于自己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所感到的巨大悲痛。罗马尼亚共产党人表示相信，罗中的友好与合作将不断地得到发展。”

勒杜列斯库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个扎根于民族现实之中的、紧密联系群众的、拥有许多经过战争锻炼的革命干部的坚强的党。中国劳动人民响应党关于化悲痛为力量的号召，决心继承自己领袖的遗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在加倍努力，以争

取新的成绩。罗马尼亚人民衷心祝愿中国劳动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勒杜列斯库同志最后表示：“毛泽东主席的心脏虽然停止了跳动，但是正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永远是朝气蓬勃、不朽和战无不胜的那样，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科威特国埃米尔萨巴赫的唁电

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我代表科威特政府和人民对这位中国的伟大领袖和政治家逝世的不幸之事表示最诚挚的慰问。全世界都对他的逝世感到悲痛，他在世界史册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人类将永远缅怀这位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科威特科威特国王储兼首相贾比尔的唁电

毛主席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他的祖国的幸福，他的伟大活动广泛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的悲痛感情将超越中国的国界。特别是阿拉伯民族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已故领导人对阿拉伯正义事业的坚决支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唁电

他是本世纪的巨人之一。他改造了中国，从而改变了亚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一个巨大损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瑙鲁总统德罗伯特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叙利亚议长哈拉比的唁函

他的名字将永远是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暴虐和剥削的斗争的象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日本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日本众议院议长前尾繁三郎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泰国国民议会议长乌泰·屏猜宗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参议院议长范范尼的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智利革命共产党中央的唁函

唁函说，我们深为震惊和沉痛地获悉国际无产阶级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的噩耗。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一天，给我们党，给所有的无产阶级战士，带来了巨大的悲伤和不幸。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他的功绩和杰出的地位将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朽事业一起，作为人类历史进步的突出代表而永存。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丰富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学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体现了这一学说。毛泽东同志不仅正确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社会实际，以中国人民丰富的和极其广泛的革命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而且他对当代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指出了当代革命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和极其广阔的前途。这一切，对正在为争取解放、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所有革命者的心灵里和脑海中，我们要虚心地学习他充满尊严的榜样。他不朽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智利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心中，他们以毛泽东同志亲自巩固和发展了的共产主义伟大原则和理论为指南，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进步和幸福进行着斗争。唁函说：智利革命共产党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同志给予我们的鼓励，他鼓励和亲切地帮助我们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们自己的实践相结合，以便在我国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文琴佐·卡洛的唁电

电报说：“我们满怀悲痛的心情，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向你们表示最深切和兄弟般的哀悼。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意大利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深为震惊，无比悲痛。”“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的著作和思想，为我们留下了珍贵遗产。这些遗产对国际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都具有普遍意义。”电报说：“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百战百胜的领袖，他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毛泽东主席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晚年又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席密切联系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创造性的思想，并使群众出色地掌握了他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主席把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电报说：“毛泽东主席始终同马列主义、国际工人运动的敌人和叛徒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电报说：“我们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意大利也取得胜利而奋斗。我们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于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谊。这一切把我们同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西班牙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唁函

唁函说：“国际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逝世了，他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以其巨大的革命智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和对群众坚不可摧的信念，划出了人类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

唁函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在新的条件下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引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已经成为人类科学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是我们手中的为争取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不可估量的武器。”

唁函最后说：“我们全党和西班牙各族人民，同中国共产党和兄弟的中国

人民一起，悼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悼念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领袖，我们与你们同样悲痛。”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尔特·林德纳的唁函

同志们，我们同你们一起为毛泽东同志逝世这一极为重大的损失感到悲痛并分担你们的哀伤。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使中国人民，而且使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你们失去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卓越的领袖和导师。

在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壮大也是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方面的光辉榜样以及由毛泽东同志发起和推动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的历史性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及其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全世界以及奥地利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此，我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毛泽东同志并对毛泽东同志和曾以他为首的党表示最大的感谢。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受到更大的震惊，因此我们的悲痛就更大，我们的同情就更为深切，我们也就更加愿意向你们的党和你们的人民表示革命的团结。同志们，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同中国人民一样，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地、为奥地利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解放，为中国和奥地利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而斗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众议院议长英格拉奥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乔森潘主席农谢委员长波尔布特总理到我使馆吊唁

波尔布特总理对中国大使孙浩说：“我们怀着无比悲恸和痛惜的心情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代表柬埔寨革命组织、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革命军，对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

的杰出导师，柬埔寨人民最亲密和热情的战友毛泽东主席的崇高英灵表示无限的革命爱戴和敬仰。”

他说，“虽然毛泽东主席与中国人民和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永别了，但是，毛泽东主席的名字和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活在中国革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扎伊尔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贝宁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克雷库总统在吊唁簿上写道：“我们以贝宁、贝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贝宁革命军事政府的名义，对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贝宁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各革命政党和革命运动一道，保证坚决把这悲痛化为更经常和更深入的革命行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教导，并且独立自主地以负责的精神把这些理论运用到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去。”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塞浦路斯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上沃尔特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里求斯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伊朗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尼泊尔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伊拉克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欧革命人民和朋友集会游行悼念毛泽东主席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电 法国法中友好协会九月十七日晚上在巴黎举行了有五千多人参加的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参加大会的人中有：法国前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前议员伊雷娜·德利普科夫斯基夫人、《红色人道报》政治负责人雅克·儒尔盖、前法国驻中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荷兰著名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斯、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以及法中友好协会一些领导人。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赞朱黎青和其他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追悼会。

法中友协执行主席夏尔·贝特兰主持追悼会。追悼会开始时，全体起立默哀。接着，夏尔·贝特兰发表了悼念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和了解毛主席的业绩的世界各国人民极为沉痛。”他说，“由于法国和中国之间友谊的发展，在法国，毛主席的逝世引起特别深切的悲痛”。夏尔·贝特兰强调说：“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的思想流传下来了，并将永世长存”。他说，毛泽东思想将继续指导中国人民的行动和斗争，“中国人民将把毛泽东为之献身的事业继续下去，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莫里斯·舒曼、艾蒂安·马纳克、韩素音、法中友好协会总书记埃莱娜·马纪樵夫人等人也在追悼会上讲了话。

在追悼大会上还朗诵了毛主席的著作和诗词。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电 瑞典共产党一千二百名党员和群众九月十七日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游行和追悼会，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参加游行的人在议会前广场整队后，向追悼会会场前进。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是毛泽东主席的遗像。游行者举着红旗和火炬，缓慢地穿过市区。乐队奏《国际歌》。追悼会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巨幅遗像。两旁分挂着两幅巨幅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化悲痛为力量”。

追悼会开始，全体肃立默哀。瑞典共产党主席罗兰·彼得松在会上致悼词。他说：“毛泽东是我们时代的列宁。他在各个领域中都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了界线，坚决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当前世界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与世长辞了。我们感到最深切的悲痛”。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正确的和强大的武器。让我们在建设瑞典共产党的斗争中，在为瑞典（建立）社会主义作准备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努力掌握它。”彼得松主席最后高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永垂不朽！”

瑞典共产党第一副主席本特·林德克维斯特在会上讲话中指出，瑞典共产党缅怀毛主席，就要更好地学习他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以及他的革命外交政策。他说：“我们将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造世界的武器。”

瑞典共产党第二副主席克拉斯·博雷尔以及红色青年和火炬社的代表，也在追悼会上讲了话。会上还朗诵了毛主席诗词。

追悼会结束时，全体起立，齐唱《国际歌》。

新华社罗马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电 意大利群众一万多人九月十六日晚间抬着毛主席遗像，高举火炬在罗马庄严地举行游行，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参加游行的有职工、青年学生和市民。有的人还怀抱或肩负着孩子参加了游行的行列。

晚上七点多钟，游行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出发。队伍以一面中国的五星红旗为前导，接着是一排挂有黑纱的红旗，然后是毛主席巨幅遗像。游行者高举无数火炬和数百面挂有黑纱的红旗。有的人还举着写有毛主席语录的大型横幅。他们不时高呼：“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毛泽东万岁！”“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口号声和国际歌声响彻街道上空。

游行队伍走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前时，旗手把红旗向前倾斜致敬，其他的人都举拳致意。接着，游行群众的代表进入中国大使馆，沉痛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游行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结束。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讯 哥本哈根消息：丹麦—中国友好协会九月十四日在哥本哈根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深切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参加追悼大会的丹麦各界人士共八百多人，其中有丹麦外交大臣克努兹·安诺生、丹麦—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佩尔·芬伯和副主席阿克坦诺以及丹麦—中国友好协会前主席保罗·汉森等。中国驻丹麦大使岳良应邀参加了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和隆重，深色幕布的正中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遗像。会场里安放着白色鲜花组成的大花圈，挽联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追悼大会在哀乐中开始，全体与会者肃然起立表示哀悼。在追悼大会上朗诵了毛主席的著作和诗词。

安诺生外交大臣致悼词说，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智慧、勤劳的中国人民作出了奇异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全世界许多人中引起了注视和向往”。安诺生说，毛泽东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是世界历史上成就最大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共同财富”。

佩尔·芬伯在悼词中说：“中国人民以毛泽东为导师和鼓舞者已经焕发出了他们无穷的创造力。”“我们确信，中国人民在继续建设新中国中将化悲痛为新的力量，丹中人民之间的友谊将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加强。”保罗·汉森在会上也致了悼词。

参加追悼大会的丹麦朋友有工人、学生、职员和教师。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青年人；有的全家扶老携幼而来，有的残废者坐着手推车远道赶来；有的送来悼念的花束，有的胸前佩带着白色的鲜花。他们面色悲伤，心情沉痛，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逝世的深切哀悼。

追悼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中结束。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电 瑞士伯尔尼瑞中友好社九月十五日晚在瑞士首都举行追悼会，沉痛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约有三百人参加了追悼会，其中有的人来自苏黎世、拉绍德封和洛桑等地。追悼会开始时，全体起立为毛主席逝世默哀一分钟。会议主席玛格丽特说，瑞士人民今天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同情，追悼毛主席逝世。她说，我们悼念毛主席，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同时我们深信，毛主席的遗训将永远教诲后人。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介绍了毛主席伟大的革命一生，特别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次路线斗争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她表示相信：中国人民将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继续革命。中国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超级大国。

沃州法院法官皮埃尔·罗贝尔·吉耶龙说，毛主席在许多方面都是伟大的。毛主席的事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世界人民的事业。他不仅对中国人民作出了贡献，也对世界人民作出了贡献。他指出，毛主席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但中国人民将继承毛主席所开创的伟大事业。

妇女活动家布里代尔夫人高度评价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重大意义。

对华友好协会的代表雅克在会上生动地讲述了他在中国时亲身感受到的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动人事例和情景。

洛伊斯·斯诺夫人给追悼会发了电报。电报说，世界失去了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教导仍然留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阿拉伯也门总理加尼的唁电

这位伟人在建设他的祖国中所留下的辉煌成就，以及他的照明道路的洞察一切的思想，能够使你们承受这一巨大的不幸，在各种事变面前坚定不移，沿着这位伟人所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刚果总理戈马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形象和品格，以及他对世界的深刻和英明的见解，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主席光荣和堪称典范的活动是与世长存的业绩，对子孙后代来说是吸取教益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伊朗首相胡韦达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伊朗参议院议长埃马米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黎巴嫩总理卡拉米的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使人类失去了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伟大业绩给本世纪以深刻的影响。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东帝汶总统阿马拉尔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突尼斯国民议会议长莫卡德姆的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发表声明

声明说：“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世界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离去了。“毛主席是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经过入侵和战争的蹂躏之后，进行重建时的建筑师和鼓舞力量。

弗雷泽总理在声明中谈到他今年六月对中国的访问时说，他所看到的新兴的中国就是毛主席的纪念碑。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家。正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于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辉灿烂的解放的新

日子。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同志英明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正是他及时地发动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短时期内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中国变成了在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世界的不朽贡献。毛泽东同志虽已逝世，但他留下了他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而这是中国人民在今后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的战无不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毛泽东同志站在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斗争的最前列。毛泽东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和胆略，及时地向全世界人民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大的威胁。他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热情地支持各国劳动人民的一切正义斗争，热情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切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他高度信赖世界各国人民，并寄希望于他们。为促进第三世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的大团结，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对世界形势的敏锐分析具有极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五十多年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各方面都作出了不朽的新贡献。他全面地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思想 and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汲取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教训，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指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在各个革命阶段，在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不懈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对于建设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系列原则。通过揭露和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毛泽东同志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他赢得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将永远铭记在他们的心中。

虽然中国人民今天失去了自己爱戴的领袖，但是我们深信，他们将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继续沿着毛泽东同志指明的光辉道路前进，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在菲律宾向伟大的毛泽东鞠躬致敬。我们将在心中永远怀念和珍视毛泽东同志对菲律宾人民的正义革命事业的热情关怀。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勇气，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高举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我国的人民民主革命，排除万难，为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胜利前进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永垂不朽！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福斯科·迪努齐的唁电

电报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由于失去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沉浸在无限悲痛的时刻，我们怀着与你们一样深切悲痛的心情同你们站在一起。”

电报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革命者和各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毛泽东同志的业绩是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属于全世界人民，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斗争事业的。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电报说：“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的毅力，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粉碎了从陈独秀到王明之流的各种右倾和‘左’倾路线。由于毛主席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解放了中国，建立了人民政权。”

电报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

复辟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根本性的贡献。”

电报说：“毛主席号召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及他发出的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动员了中国党和中国人民进行反对林彪和邓小平反革命路线和反革命阴谋的斗争，使中国无产阶级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进一步认清了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电报最后说：“在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而使战争危险增长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国际主义教导把我们牢固地团结在一起。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永远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胜利属于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注定要失败。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时，人们也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业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英共（马列）中央主席伯奇的唁函

唁函说：“英共（马列）中央委员会获悉毛主席逝世深感震惊和悲痛。英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全体同志和全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兄弟般的哀悼。”

唁函说：“今天，五大洲的革命者感到极大悲痛，但同时也下定了新的决心。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仍将指导和照耀未来长期而艰苦的岁月，在这岁月中将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并摧毁它。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决心，象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决心一样，决不动摇。这样我们就能象毛主席在一首光辉的诗词中所说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几内亚比绍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坦桑领导人到我使馆和领事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博茨瓦纳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塞拉利昂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喀麦隆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乌干达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领导人等到我驻黎巴嫩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丹麦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芬兰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荷兰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比利时领导人等到我使

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德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英国官员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朝鲜人民怀着悲痛心情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毛主席为世界革命建树不朽功勋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电 朝鲜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深切哀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

连日来，平壤市和共和国北半部到处都沉浸在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之中。金日成广场四周的高大建筑物上和朝鲜各机关、工厂、企业、商店、学校以及城乡居民的住宅一律降半旗志哀。九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当北京百万群众隆重举行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开始时，朝鲜首都平壤和各地汽笛长鸣，车辆停驶，行人就地肃立，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志哀。这一切都显示了朝鲜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高度尊敬和爱戴，表现了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极为深厚的国际主义感情。

八天来，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有六百多人到位于开城市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住址，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哀悼。他们臂带黑纱，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毛泽东主席遗像前肃立默哀。许多人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九月十一日，金日成主席的夫人、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圣爱同志等来到中国大使馆，代表朝鲜妇女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她沉痛地说：“毛泽东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留下的崇高业绩永远活在我们朝鲜人民和朝鲜妇女的心中。”

到大使馆吊唁的各界代表在毛泽东主席遗像前敬献了花圈，黑色挽带上用白字写着：“悼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许多代表沉痛地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祖国解放战争时期，高举抗美援朝的旗帜，派出以中国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我国军民共同打击美帝侵略者，用鲜血支援了我们。”“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战后恢复、建设时期，从精神上、物质上继续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毛泽东同志一贯支持我国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给予了我们巨大鼓舞。”“毛泽东同志越是在我国困难的时候，越是给予我们各种支持和援助。对此，我们永志不忘。”前来吊唁的朝鲜各界群众一致表示，决心继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由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革命团结。

九月十四日，金日成综合大学四百多名师生举行了毛泽东主席追悼会。清川江火力发电厂、鸭绿江轮胎厂等单位也都分别举行了追悼会。

到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收到了朝鲜各界人民群众发来的唁电、唁函共五千二百多封。这些唁电、唁函有的来自朝中边境的鸭绿江畔，有的来自朝鲜军事分界线的前沿阵地，有的来自西部地区的辽阔平原，有的来自朝鲜东海岸的咸兴、清津等工业城市。这些唁电和唁函充分表达了朝鲜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心情。唁电和唁函一致赞扬毛主席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树的不朽功勋，热情歌颂毛主席为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友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坚信中国人民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继续奋勇前进。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赞比亚、赤道几内亚、贝宁隆重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萨摩亚各界人士和华侨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 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日本人民和朋友深切悼念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永放光芒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人民深切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伟大贡献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苏联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古巴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根廷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保加利亚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智利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多哥官员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官员和各界人士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加拿大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挪威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荷兰一些马列主义政党

和组织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西·彼德森，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基·德·布尔，以及许多友好人士最近先后到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沉痛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许多民族解放组织、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等的唁电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许多国家政界知名人士等的唁电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布尔的唁函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是深受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卓越领袖。他的一生是同中国人民及其光荣的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血肉相联的。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反对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和不断的斗争中，党已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贡献。”

唁函说：“毛泽东思想是对全世界马列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朽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际无产阶级、各国革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哥伦比亚马列主义联盟全国领导委

员会的唁函

唁函说，我们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

唁函说：“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是一位富有气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伟大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农民和人民的武装斗争，为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胜利指出了光辉的道路。”

唁函说，在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主席坚定地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主席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展示了新的美好的前景。他亲自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唁函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领导中国人民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提供了国际主义的支持。同时，他同以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种复杂和艰巨的斗争中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当前真正的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就是在他的英明指导下出现并获得巨大发展的。”

唁函说：“毛泽东深刻地研究了当前世界的各种矛盾，指出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对象。他和中国人民一起站在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民族和国家的一边，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展开斗争”。

唁函还说：“毛泽东主席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光辉事业，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他的思想已成为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化悲痛为力量，把世界革命推向前进。”

唁函最后说：“我们和所有的哥伦比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一定坚持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党，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道路。我们一定要学习我们亲爱的导师毛泽东主席革命一生的光辉榜样。”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旅美爱国华侨、台湾同胞和美国友好人士举行毛主席追悼会

毛主席推动了人类历史前进

台湾同胞表示决心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奋斗

旅居美国的爱国华侨和台湾同胞，以及一些中国血统的美国学者和美国对华友好人士共二千二百多人，九月十九日下午在纽约隆重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会场庄严肃穆。会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大幅遗像，台上安放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追悼会在哀乐声中开始，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

中国血统美籍学者王浩教授致悼词。他说：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人类解放事业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今天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他。

王浩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团结，促进了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但是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他说，在悼念毛主席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实际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热情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中国血统美籍学者杨振宁教授在讲话中说，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美国朋友苏珊·沃伦在讲话中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世界人民来说，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他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特别是他的教导，已经指明了道路——这些教导已经在“全世界受苦的人”心中激起了建立一个新的和公正的世界的希望。

赞比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吉布森·罗伯茨·津巴应邀在会上讲话。他赞扬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英明领导和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热情关怀。他说：“毛泽东主席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事业献身和自我牺牲的光辉榜样。”

曾经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的台湾同胞潘家牛在讲话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非常关怀台湾省同胞。“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永远遵照毛主席指明的斗争方向，为台湾省的解放、中国的统一和人类历史的前进而奋斗。”

老华侨陈金坚在讲话中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广大海外华侨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将牢记毛主席对华侨的爱护和关心，积极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九月十八日，在华盛顿也举行了毛泽东主席追悼会。追悼会由李振翩教授主持，任之恭教授发表了讲话。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等城市的几千名华侨，也分别在九月十七日、十八日和十九日举行了追悼会，沉痛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许多华侨在追悼会上表示，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解放台湾，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

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许多旅美华侨和台湾同胞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络绎不绝地前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吊唁。他们当中有在美国各行各业谋生的工人、店员、海员；有侨居国外多年的老人；也有在国外出生的年轻一代。当他们肃立在毛主席遗像前默哀时，心情十分悲痛。有的泪盈于睫，有的掩面呜咽，有的失声痛哭。

许多不能参加吊唁的华侨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发了唁电、唁函，有的还献了花圈。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唁函

唁函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消息，使我党全体党员、我国人民群众和整个进步人类深为震惊。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同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感到深切的悲痛。”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五十五年来，以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主义，根据这一整个历史过渡阶段始终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况，制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极为重要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手中的极为强大的思想和政治武器，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强大的武器和指针。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各种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同修正主义，进行了持久不息的原则斗争。毛泽东同志揭露了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为首的修正主义蜕化集团把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苏联变成了同老牌帝国主义一样掠夺、扩张和剥削成性的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各国人民所坚持的斗争的一个非凡的贡献。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毕生不仅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方面，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到关于党、革命、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发展和加强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创立的革命学说，使它成为今天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唁函说，最近举行的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指导我党行动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旗帜的指引下，开展当前的政治活动，引导洪都拉斯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消灭封建残余，并为将来在洪都拉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唁函最后说，我党将永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革命榜样，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领袖的高贵品质，同英雄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同全世界工人、农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一定把对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深切悲痛化为巨大力量，为争取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展革命斗争。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

表示深切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埃塞俄比亚第一副主席发表讲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德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澳大利亚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表示深切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表示沉痛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一些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人或他们的夫人等致江青同志的唁电或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夫人、知名人士致江青同志的唁电或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唁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旅居日本、蒙古、英国爱国华侨隆重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 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永世长存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幕 一些国家代表发言深切哀悼毛主席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挪威希腊荷兰人民举行活动深切悼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萨摩亚各界人士和华侨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 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日本人民和朋友深切悼念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永放光芒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一些国家友好团体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会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牙买加争取民族解放青年力量领导人表示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表示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许多国家外长的唁电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苏里南人民党主席鲁宾·李宝三唁电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失去了一位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他毕生致力于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万古长青！毛泽东主席将永远活在人

们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奥地利马列主义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施特罗伯尔的唁函

唁函说：“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全世界亿万争取自由、进步和社会正义的人们最衷心地崇敬和爱戴的毛泽东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代人类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这一噩耗使我们内心深处感到十分震惊。”

唁函说：“对于我们来说，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袖，而且是在种种最艰难的情况下能够为包括我国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在内的整个世界革命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指出明确方向的可靠的思想领袖。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作的各种指导和指示，他的讲话和著作，他在政治、哲学、历史、军事、策略和战略等方面的所有学说，是我们和世界一切真正革命者在斗争中得到革命认识和正确方向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这些学说将是永存的”

唁函说：“我们将遵照永世长存的毛泽东学说进行工作和斗争，更加深刻和认真地学习他的著作，更加坚定地把他的指示变成实际。”

唁函说：“我们将把我们的全部悲痛和哀伤化为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定地反对修正主义、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给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有力的打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欧洲重离子核物理会议中断会议表示诚挚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会议表示深切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深切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中友好团体和日本各界人士深切悼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表示深切哀悼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欧一些国家人民和旅居丹麦的华侨深切悼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苏丹领导人和群众到我使馆等吊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一些国家的军方、政府部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的唁电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的衷心热爱和无比崇敬 世界各国和人民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坦桑尼亚、刚果、几内亚人民和朋友深切悼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威尔科克斯同志在新西兰举行的毛主席追悼会上致悼词

威尔科克斯同志致悼词说，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是整个历史上的伟人之一。威尔科克斯同志代表新西兰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出的贡献是不朽的，它将继续鼓舞和指导全世界人民为争取人类解放而斗争。毛主席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领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在中国革命不断取得光辉胜利的过程中，全世界人民受到鼓舞，并且增强了自己有能力摆脱压迫、赢

得社会主义的信心。正是在斗争中毛主席成为最杰出的理论家和人民战争的战略家。他洞察到在对阶级敌人取得初步胜利后，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并且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积极地因势利导。因此，在中国，他防止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之所以能够对苏联修正主义展开正确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亚洲国家人民举行各种活动沉痛悼念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永远照亮革命人民前进道路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分别发来唁电或唁函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讯 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最近分别打电报或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及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这些唁电和唁函赞颂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他们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发来唁电或唁函的有：乌拉圭革命共产党，多米尼加无产者之声中央局、红旗中央委员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留尼汪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政治局，重建德国共产党工人联盟执委会，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新团结》中央委员会，荷兰马列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共产主义工人组织中央委员会、布雷达共产主义小组（马列）中央委员会，瑞典争取共产主义统一组织执行委员会，意大利争取马列主义者联合协调委员会，意大利争取社会主义劳动者运动中央委员会，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央委员会，英国共产主义团结协会（马列）全国委员会和美国马列主义党组织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英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全国

委员会的唁函

唁函说：毛主席“在反对中国国内和全世界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持不懈地捍卫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唁函说：“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美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两个超级大国的日益壮大的斗争的强大堡垒和忠实支持者。”

唁函说：“我们深切哀悼毛主席的逝世。”“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坚持工人阶级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心全意地投身到今后国际工人阶级的光荣的、激烈的和胜利的战斗中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秘鲁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唁函

唁函说：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英勇的中国人民，他亲自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事业，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引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唁函说：“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毛泽东主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不仅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且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政治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确保它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唁函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命地打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阴谋，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幻想遭到破灭。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他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在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因而，他的政治思想光彩夺目，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我们坚信，它必将继续照亮中国革命的道路。”唁函说：“毛泽东同志也热爱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他在地球上亿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心中也深深地扎下了根，因而他的思想不仅是英勇的中国人民的财富，而且已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财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学生，一句话，全体劳动人民，都渴求和掌握他的不朽的理论著作。因为这些著作适应了革命的需要，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是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挽回的

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全世界所有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一个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唁函说：“我们向你们重申兄弟的革命友谊，重申我们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决心。”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载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萨莫拉的唁函

唁函说，“我们怀着最深切的悲痛，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无产阶级的无可争议的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解放了人类的四分之一，从而开创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历史的新时代。”唁函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行动和革命思想，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不可战胜的神话遭到彻底的破产。中国革命的道路，鼓舞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坚决反对他们的压迫者。正确运用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教导，已使很多国家的人民取得了胜利。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和人民，如玻利维亚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正在向同样的历史目标迈进。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所给予的坚决的、兄弟般的和革命的战斗支持，也是他一生中伟大而光荣的业绩。他号召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正在为争取解放、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发出的号召，它将永远铭刻在第三世界人民心中。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新条件，领导中国人民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揭露并战胜了干扰中央正确路线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毛泽东同志依靠群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治原则。用这些理论和原则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率领全党和全中国人民，一定会使中国革命稳步地和正确地沿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迈进”。唁函说：“世界无产阶级将永远记得，是它的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站在世界革命运动的最前列，坚决反对了现代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进攻。”唁函说：“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不妥协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新沙皇的修正主义，这

是他对我们的无法估价的教育，是他留给全世界人民和革命者的伟大遗产的一部分。”

唁函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毕生直接参与革命实践，以卓越的贡献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思想就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一起，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为争取社会和政治解放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革命武器。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自豪地宣布并坚持，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自己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只要我党创造性地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玻利维亚革命的具体实际，就一定能领导我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其在本国的走狗。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伟大贡献，是对玻利维亚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大援助，玻利维亚共产党人一定会把这个伟大贡献看作我们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而加以捍卫和发展。”

唁函说：“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和玻利维亚人民对毛泽东同志感到格外亲切，对他特别感激。在同压迫我国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这些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对我们提供支持和声援，这使我们永远感激不尽，这种感激之情将永远留在玻利维亚人民心中。”唁函最后说：“我们表示革命的决心，对他的最好的悼念，就是坚定不移地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想，尤其要在我国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想，这些革命理想是他对世界各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珍贵的遗训。”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举行追悼毛主席仪式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非国家人民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 毛泽东思想永远鼓舞非洲人民战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拉伯各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是争取自由和解放人民的伟大导师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各国群众团体发来唁电或唁函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朝鲜《劳动新闻》和民主柬埔寨电台发表文章悼念毛主席

朝鲜《劳动新闻》九月十日发表社论，深切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社论说：“朝鲜人民获悉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悲痛消息后，现在，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起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社论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且对朝鲜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都是巨大的损失。”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之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外来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革命烈火中创建了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反对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者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使它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社论说，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粉碎了钻进党内的反党的反革命分子，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舞和引导人民走向胜利。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积极支持和声援其他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争取自由、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同志确实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了国际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献出了他自己的一生。”社论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他的革命活动，是把一切都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争取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把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

斗争。他总是教导中国人民，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要积极支持和帮助我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并就此进行了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的祖国解放战争最困难时刻，高举抗美援朝的旗帜，把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派到朝鲜前线。这是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生动典范。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的党、政府和人民，积极支援我国人民的战后恢复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一贯地支持和声援我国人民争取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社论说：“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在加强朝中两国人民之间伟大的战斗友谊和团结方面建树的不朽功绩。”

社论说：“我国人民今后仍将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同中国人民紧密携手，永远并肩战斗。”

社论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的最亲密战友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和他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建树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民主柬埔寨电台九月十三日广播一篇文章，深切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文章介绍了毛泽东主席的伟大的战斗的一生，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丰功伟绩。

文章说：“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它使得亚洲、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局面发生了本质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章指出，在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英明、最坚强的领袖。他总结了国内革命和世界革命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发动的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地战胜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文章说：“在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改变了中国过去受人奴役、在各方面都十分贫穷落后的面貌。”

文章说，“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声誉和威望，中国人民的朋友遍天下，特别是遍及第三世界。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八亿多中国人民的伟大和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事业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贡献。”

文章最后说：“战友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世界革命运动的杰出英雄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阿《人民之声报》和罗《火花报》发表编辑部文章 毛泽东同志的光辉业绩永世长存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九月十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光辉业绩将成为各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伟大的鼓舞源泉，他的业绩永世长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业绩是不朽的》。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者，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活动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献给了英雄的中国人民长期的传奇般的斗争，献给了取得对国内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胜利，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建设。”

文章说：“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而有远见的领导，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巨人，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堡垒，成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捍卫者和鼓舞者。”

文章指出：“毛泽东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不朽理论和业绩的继承者，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立下了丰功伟绩。”

文章强调：“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场革命击败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叛徒和苏修间谍林彪的反革命阴谋，它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使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妄图颠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胜利成果、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奢望和努力遭到破产。“中国亿万群众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投身于

反对妄图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投降主义路线的坚决的阶级斗争。“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具有崇高声誉和国际威望的国家。它为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事业，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同美国和苏联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霸权和侵略政策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社会主义中国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享有威望和受到尊敬。中国人民的这种威望和受尊敬地位是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和革命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恩维尔·霍查同志说过：‘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上所取得的光辉胜利，是伟大的久经考验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生动体现’。”

文章说：“在这沉痛的日子里，我国人民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一种珍贵的、永恒的友谊把我国人民同兄弟的中国人民连结在一起。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伟大的战斗友谊，是由毛泽东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缔造和锤炼的。”

文章最后说：“毛泽东同志的业绩是不朽的。他的业绩将成为一切革命者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争取真正的民族与社会解放斗争的伟大的鼓舞源泉。“中国人民光荣的儿子、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敬爱和最尊贵的朋友毛泽东同志及其业绩永世长存！”

罗马尼亚《火花报》九月十四日发表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地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文章说：在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时候，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全体人民，向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争取中国人民民族与社会解放、争取革命胜利和在中国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革命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悼念。

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他所进行的长期革命活动，是同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为争取实现中国人民的夙愿所进行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历史的事实。”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伟大史诗般的万里长征、制定战术和确定战略目标方面，在组织和坚定地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为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文章在叙述中国人民艰苦而长期的革命历程之后说：“今天，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八亿中国人民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对整个国际生活的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将永远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和革命活动联结在一起。”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在制定建设新制度的方针方面，在奠定理论基础和具体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撰写了包括多方面革命思想的理论著作的毛泽东主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是罗马尼亚人民伟大和亲密的朋友，他为发展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而作出了努力。”

文章说：“对于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权利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关系的发展，我们给予高度评价。”

文章接着说：“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会见和会谈，为这种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一九七一年，尼·齐奥塞斯库同志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在罗中关系史上写下了历史性的一页。同毛泽东同志会谈的卓有成效的结果为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此外，还就此机会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罗中联合公报。”

文章在概述了近几年罗中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的发展之后写道：“今天，当兄弟的中国人民由于他们的光辉领袖逝世而悲痛的时候，罗马尼亚人民从内心深处分担他们的巨大悲痛，认为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而且对于罗马尼亚人民自己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文章说：“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人民决心要尽一切努力继续进一步发展罗马尼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多方面的合作关系，相信这将有利于我们两国进一步繁荣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对实现毛泽东同志为之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社会主义、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与进步的理想也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文章最后写道：“近几天来，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而表现出感人的意志，正在化悲痛为力量，奋发忘我地工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在建设幸福繁荣的生活中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的可靠保证。罗马尼亚人民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取得这些成就。”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照耀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加拿大一些城市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美国十多个城市举行各种活动深切悼念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是鼓舞革命人民斗争的巨大力量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极其沉痛地哀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世界革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深切悼念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将继续指引着国际无产阶级运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人民之星》、《长周新闻》发表社论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

《人民之星》九月十六日发表的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社论强调指出，在日本，结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向广大工人和人民传播毛泽东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社论说：“在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夺霸权遍及全世界并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毛泽东思想生动而具体地指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巩固自己的队伍，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方向。”

社论说：“我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为了学习他们在各自的革命具体实践中所表明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为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方法，具体研究日本的现状和日本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日本革命的问题。这

是为了通过艰苦奋斗顺利地实践党的路线和政策，并使党的路线和政策更加丰富地发展。这就是说要一步一步地争取实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伟大真理：‘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

《长周新闻》九月十五日的社论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照亮了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取得解放的道路，并且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社论说：“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揭露、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反修斗争，给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促进了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蓬勃发展，强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社论说：“毛泽东主席一贯根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毛主席把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社论说：“广大的日本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宣誓：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伟大的一生，并以他为典范，永远纪念他，而且化悲痛为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前进。”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西欧许多马列主义政党、组织的报刊著文深切哀悼毛主席 毛主席对国际共运、反帝反霸事业作出伟大贡献

西欧许多马列主义政党、组织的机关报刊发表社论、文章，出版特刊，印发传单，对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这些报刊指出，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失。它们高度赞颂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和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并且特别指出，毛泽东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这对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

法国《红色人道报》政治领导人雅克·儒尔盖九月十一日发表文章说：“毛泽东逝世了。他是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的宏伟业绩在继续，永远生机勃勃，万古长存。”文章说，毛泽东主席发动了自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以来，规模最大的思想政治斗争，反击正在苏联泛滥成灾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的一生，始终和他伟大的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溶合在一起，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密不可分，他的一生现在和将来也必然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伟大历史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章还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的教益和普遍的历史意义，它们是各国人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武器。

法国革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人民日报》九月十日刊登了这个党的总书记马克斯·克吕佐写的社论。社论说：“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已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改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毛泽东阐明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将继续，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发生蜕化变质的可能的原因，从而回答了对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而感到震惊的世界无产阶级提出的下述问题：这是怎么可能的，怎样来避免？”

意大利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新团结报》九月十一日为毛主席逝世出版了六个版的专刊，还印发了各种传单。传单写道：“毛泽东仍然活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斗争事业中。”“他的著作和他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根本贡献，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反动派的强大武器。”

意大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组织中央领导机构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在九月九日印发传单《致意大利无产阶级书》说：“他的业绩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将照亮新的几代人走向最终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的道路”。《致意大利无产阶级书》说：“他发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组织形式的整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毛主席通过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一个巨人一样制止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泛滥。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将成为我们党的路线的一部分”。

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机关报《红色论坛》为悼念毛主席逝世出版特刊。特刊上发表的一篇公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通过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再一次指明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遵循的道路。通过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揭露，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发展。公报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但他的思想继续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这家刊物在九月十五日还发表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泽东思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捍卫这个遗产”。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损失。但他的逝世激励我们更积极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争取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激励我们团结荷兰的所有马列主义者建设一个新的共产党。毛泽东同志逝世了，但是他的思想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他的思想将被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民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是永生的。”

瑞典共产党机关报《星火》九月十七日出版了一期特刊。特刊登载的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思想——一切被压迫者的武器》的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它能够把当代的世界矛盾分析得一清二楚。

丹麦共产主义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九月十五日一期刊载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文章说，这一发展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德国共产党（马列）机关报《红色的早晨》九月十日为毛主席逝世出版《号外》。《号外》刊登的《红色的早晨》编辑部按语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以加倍的努力为工人阶级和我们东西德全体人民的解放，为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社会主义的德国而奋斗。”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的报刊发表悼念文章 毛主席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人民新报》、《工农战报》、《无产者》发表唁函和文章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人民新报》社九月十一日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巨大的损失。全世界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感到无比悲痛。”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把整个一生完全献给中国人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奋勇前进。”

唁函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教导：‘只要真正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再次表示决心，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世界革命的战略方针，同广大日本人民一起，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坚决斗争，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坚决斗争，防备两个超级大国挑起世界战争的危险，为日本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人民新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文章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改变了世界上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开辟了世界革命的广阔道路。”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作出了系统的解答，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照亮了反对修正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使人类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文章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同现代修

正主义、宫本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文章说：“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正处于世界大动荡的形势之中，革命的因素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特别不能忘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将引起世界战争这一形势，要为发展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尤其是要为发展反对苏美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而斗争。”

《工农战报》九月十五日刊登的文章说，日本人民不能忘记的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对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深切的关怀和希望。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导中国人民，奠定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革命友谊的基础。这是对日本人民的最大的鼓励。”

文章说：“自从以苏修集团为头目的现代修正主义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毅然地反对它，并且胜利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此受到了鼓舞，蓬勃地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把中国人民作为战友，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文章说：“现在，伟大的导师同我们永别了。这对日本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全党同志必须化悲痛为力量。”

文章指出，要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鼓舞下，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争取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发展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反对挑起世界大战的阴谋的斗争。

文章指出，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反对美苏两个帝国主义的控制、干涉和恫吓，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而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无产者》半月刊九月十日发表文章说，由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都处于悲痛之中”。

文章指出，必须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日本革命的胜利，为世界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苏里南总理阿龙发表谈话悼念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巴拿马首都各界集会深切哀悼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极其沉痛地哀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

唁函说：“我们深切悲痛地获悉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袖、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人物毛泽东同志逝世的噩耗。巴西革命者认为，他是我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不倦的战士，他的逝世，使巴西革命者十分悲痛。”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与中国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在与强大的敌人斗争的漫长岁月里，领导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努力发展壮大共产党，并在斗争的烈火中，创建了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他战胜了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设下的重重障碍，使广大群众的宿愿变成了现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终于掌握了政权，国家获得了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开创了英勇的中华民族发展的新阶段。”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制定和提出了建设新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指出只有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路线进行斗争才能夺取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起亿万人民，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尖锐矛盾，打败了机会主义逆流。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暴露出来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他号召全世界革命者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展开坚决的斗争以粉碎赫鲁晓夫的背叛行径。他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实质，指出他们的主要代表是今天以叛徒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联集团的成员。强调指出苏联在这种新的倾向下，已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样，毛泽东同志不仅为革命派，而且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各个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善于把无产阶级学说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从实践中发现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去夺取胜利。他以独创的贡献，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援助了争取解放的各国人民。中国人民的胜利是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的胜利。他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位伟大的导师”。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是始终不渝的国际主义者，忠诚而坚定地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他经常发出富有威望的声音，谴责侵略和反动暴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揭露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每当需要的时候，他总是给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以慷慨的援助。”唁函说：“巴西共产党引为自豪的是，它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坚决的支持和宝贵的教导。”巴西共产党刚刚重组，就得到这位无产阶级的世界领袖的支持。我们将永志不忘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的鼓励和信任。唁函说：毛泽东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事业和业绩是永存的。“他的思想将继续光芒四射，生气勃勃，照耀着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道路，指引社会主义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建成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达到共产主义光辉的顶峰。”

唁函最后说：“巴西共产党和人们一起，沉痛悼念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世界革命的领袖。”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海地劳动党的唁函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使当代失去了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此，他的逝世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而且在为赢得民族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全世界无产者和各国人民心中，引起了悲痛。”

唁函说：毛泽东同志逝世了，但他留下的业绩和思想，必将成为海地劳动党和各国革命者的指南。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同各种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和尖锐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教导海地劳动党和全世界的革命者，要想战胜国内和国际的敌人，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党，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他还教导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

唁函最后说，海地劳动党重申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创造性地应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以此表示对毛泽东同志的悼念。海地劳动党庄严地保证，要把海地人民和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非洲人民深切悼念毛主席毛主席指引第三世界斗争方向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拉美舆论赞颂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卓越贡献 毛主席的光辉业绩传播四方永垂不朽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拉伯国家舆论深切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鼓舞被压迫人民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孟加拉国一周报撰文颂扬毛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世界革命人民赞颂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表谈话 赞扬毛主席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委内瑞拉群众和华侨集会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非洲许多国家报纸通讯社和电台发表文章和评论 毛主席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指明了道路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舆论界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写下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各地各界人士继续举行集会和其他悼念活动 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放射出灿烂光芒

日本共产党（左派）山口县委员会代表渡边祯二在悼词中赞扬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表示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为日本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日本各界人士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国民追悼会”

黑田寿男说：“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以他整个生命完成的革命大业和为这一革命大业奠定了基础的创造性理论，为全世界广大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并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黑田说，毛主席“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将来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不断地寄予深切的关怀。”他说：“日中两国政府曾经发表联合声明，约定要缔结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霸权条款在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毛主席在世时，未能看到这一条约的缔结。”黑田说：“由于超级大国采取危险的霸权主义行为，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日中两国人民紧密地携起手来，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这是当务之急”。当前我们必须“毅然地同超级大国的威胁和阻挠进行斗争，掀起国民舆论，迫使日本政府在缔约问题上下决心。”

中岛健藏说，“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实践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的觉醒，使全世界为之瞠目。”中国人民的变化“给我们日本人的认识带来了革命。这种变化，都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岛说：“日中关系怎样发展，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态度。”“人民之间的往

来，将根据以往确立的原则和积累的经验，更加向前发展。”冈崎嘉平太说：毛泽东思想给予“世界上正在摸索前进方向的人们以光明和指针”。毛主席的哲学，“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一定会被地球上无数的人们所传颂和继承，必将更加增辉，永放光芒。”

市川诚说：“在毛泽东主席永放光辉的业绩中，我们日本人民不能忘记：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一九七二年九月发表了旨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从这以后，“日中两国关系稳定地向前发展，对亚洲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决心让子孙后代正确地继承日中友好事业，发展日中两国的和平关系，以建立日中两国间的永久和平。”

川濑说：“毛泽东思想体现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层的愿望。目前，反对霸权主义，要求独立与平等的声浪席卷第三世界和全世界各个角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川濑最后说：“无限相信人民、无限相信人民的创造性的毛主席，也相信人民的力量会给未来的日中关系和世界人类的前景，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时代。”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马来亚解放区军民和“泰国人民之声”沉痛哀悼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指引世界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九月三十日广播，马来亚共产党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人民，连日来举行各种活动，沉痛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广播说，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月九日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革命群众组织发出公告，决定从九月九日至十八日为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不幸逝世志哀。

广播说，“在中央机关和边区我军各支队，在哀悼期间，都设灵堂，挂毛主席遗像，并敬献了花圈。”“各支队、各突击队的全体战士多次在清晨或晚上集队，在毛泽东主席遗像前默哀致敬。”

广播说，“九月十八日晚上，我党各单位，我军各支队、各突击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都隆重举行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或追悼仪式。”“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各单位按具体情况，在群众中普遍举行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或其他形式的追悼活动。许多群众参加了追悼大会，有的群众还带着子女一起来

参加，对毛主席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广播说，在深切悼念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时候，全体同志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树的丰功伟绩，缅怀毛主席对我国革命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支援。“全体同志一想到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和我们永别了，都感到无比悲痛，禁不住热泪盈眶，许多同志泣不成声。”广播说，“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但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世长存。最敬爱的毛主席永远活在我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指引我国和世界革命人民胜利前进的明灯。”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九月十三日广播一篇社论，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社论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人类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他半个多世纪的斗争生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榜样。”

社论说：“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不仅使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悲痛，也使泰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感到无比悲痛。虽然毛泽东主席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思想永垂不朽。泰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毛泽东主席在激烈和复杂的长期斗争中，不断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社论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指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方向的光芒万丈的灯塔，是给人类的宝贵遗产。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将以坚定的信念继续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一定要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战斗，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群众沉痛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为世界革命作出伟大贡献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联盟十月一日晚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了有五百人参加的悼念毛泽东主席的集会。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卡梅洛·拉沃里特在集会上讲说，毛主席为中国历史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他以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在他的领导下，在中国结束了压迫和奴役。他还颂扬了毛主席坚持反

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亲自发动、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业绩。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人民和阿拉伯报刊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永远活在第三世界人民心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阿拉伯国家的报刊连续发表评论和文章，颂扬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非洲五国领导人撰文回忆同毛主席亲切会见的情景 毛主席非常关心和支持非洲人民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非洲国家的舆论在悼念毛泽东主席时，高度颂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大洋洲、北美、西欧马列主义政党、组织的机关报刊悼念毛主席 毛主席为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周报九月二十日发表的题为《新西兰工人如何从毛泽东的教导中得到教益》的文章说：“对新西兰工人有直接影响的毛泽东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对各种机会主义进行的重大斗争。”“毛泽东毕生从事的反对机会主义、捍卫工人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斗争，使他识别和揭露了苏联的机会主义及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修正。如果不是进行了这种揭露，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包括新西兰在内——就会比已发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地被修正主义者引入歧途，迷失方向。”文章强调指出，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极其重要。文章说，毛主席的分析“使中国党能够在

资产阶级路线一冒头的时候就同它战斗，从而使党更加巩固。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使中国工人阶级得以保持它在一切领域里的领导权。这对新西兰共产党也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先锋报》十月七日刊登一篇题为《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遗产》的文章，赞扬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真正巨大的贡献。他的著作确实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的分析，特别是关于苏联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发展的分析，是同马克思、列宁对当时的机会主义进行的伟大斗争一脉相承的。”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剖析了修正主义的谬论并在世界范围内予以揭露。这一贡献的伟大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的。”文章最后说，毛主席“号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推动人们更好地干革命和为人民服务。我们也要更加努力地、把为毛泽东主席所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澳大利亚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为澳大利亚人民服务。”

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机关刊物《锻炼》双周刊九月二十三日出版了追悼毛主席的特别增刊。增刊说：“毛主席整个一生同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毛主席一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他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著作和实践活动仍是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珍贵指针和光芒四射的灯塔。”“以他的一生为榜样来学习，深入研究他的著作，是加拿大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的一项基本任务。”

美国十月同盟（马列）机关报《号角》周刊九月二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千百万人热爱毛主席，遵循他指明的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的光辉路线”。文章赞扬毛主席“亲自指引中国人民通过革命的每个阶段，并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各种类型的机会主义的生死斗争中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领导。”文章指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是他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教导。“在反对中国国内的走资派和反对以苏联为头子的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都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是‘纲’。”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促进和深入发展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答了以前还没有答案的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实质问题。”

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革命》最近出版专刊指出：“正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当代世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锻炼出成百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这就使工人阶级能够在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阔步前进”。专刊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和引路人。他的丰功伟绩与世长存。”

葡萄牙共产党（马列）机关报《人民团结报》第八十八期刊载了葡萄牙共产党（马列）总书记埃·维拉尔写的悼念毛泽东主席的文章。文章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文章说，“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彻底驳斥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使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免遭践踏。在这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不仅批倒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腐朽‘理论’，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但是，毛泽东所展开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的结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辉煌，使人们对马列主义的诬蔑者更感到荒谬可笑。”“由于有了伟大的毛泽东，并且在他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所表现的勇气和决心的榜样的鼓舞下，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才得以在全世界创建并发展起来。”文章最后说：“他的教导将继续指导世界无产阶级，他的不朽业绩将永远留在各国人民的心坎里。”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机关报《光明和被剥削者》九月十六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向全人类揭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充当的战争贩子和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主要危险的角色，是他指明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法西斯式、希特勒式专政的特征。”“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排列在一起。对于全世界革命者来说，他没有去世。他的教导是永存的。”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十月》在最近一期的增版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样继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继续革命。他教导我们，必须在共产党内进行无产阶级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以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领导了

反对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从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指导着我们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即反对在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反革命蜕变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共产党向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蜕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问题。”文章赞扬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伟大战略思想。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研究了世界革命因素和战争因素的增长。毛泽东主席近几年来强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这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特别是苏联的侵略性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同志向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指明了最大的敌人——苏联和美国，他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业绩，是我们进行反对这两个敌人的斗争的指南。”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机关报《阶级斗争》九月十四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以一座红色堡垒出现，对世界革命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她将永远是当今世界和未来的一座社会主义的灯塔。”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拉美一些国家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机关报悼念毛主席 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把革命进行到底

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色祖国》的专刊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像。专刊还刊登了毛主席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毛泽东主席逝世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函。专刊还以《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和领袖》为题发表文章，悼念毛泽东主席。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有远见的革命引路人和非凡的诗人、组织者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这段话完全也适用于毛泽东主席。文章在回顾了毛主席光辉的战斗历程后指出：坚持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就是我们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中国和世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最好的悼念”。

多米尼加“六·一四”革命运动红色路线机关报《为人民服务报》的专刊，以八版篇幅发表了悼念毛主席的社论和诗文，刊登了毛主席各个时期革命活动的

照片，报道了多米尼加各地人民群众和革命组织悼念毛主席的活动。这期专刊的社论写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卓越地发展和丰富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继承下来的思想，他的政治思想指引了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我们所有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其他反帝战士，有更大的理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所蒙受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而感到万分悲痛。”社论强调说，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领导下，必将巩固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并且继续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并肩前进，直到彻底打垮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世界一切反动派”。这期专刊还全文刊登了毛主席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发表的《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并加按语说：“我们重新转载的毛主席声明，过去和现在都是对多米尼加人民武装抵抗美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斗争的一个巨大的鼓舞。”

哥伦比亚马列主义联盟中央机关报《新民主》的文章说，毛泽东主席“给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留下极其宝贵的革命遗产：他的思想——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在引用了毛主席关于建党、批判修正主义、武装斗争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方面的教导后指出，“毛泽东主席非常热爱人民，非常相信人民。我们哥伦比亚革命者应该遵循这一马列主义原则。只要我们相信群众，正确地发动群众，我们就将取得巨大胜利。”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许多战略主张对哥伦比亚也是有效的。“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毛泽东的战略路线，从而深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文章说，“我们哥伦比亚革命者和人民在反对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将继续同中国人民和世界其它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哥伦比亚人民深入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其它反动势力的斗争，这“将是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的最深切的悼念”。

贰、 本节简论

世界各国党政领导人和革命人民在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对毛泽东主席

在世界历史上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

毛主席充分体现了他所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真理。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并列是理所当然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被叙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精确的。毛主席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劳动人民的灯塔。一切革命人民从他的著作、他的业绩和榜样中受到极大的鼓舞。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也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指引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没有别的人能象毛泽东主席那样鼓舞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一向把毛泽东主席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之一，象敬仰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地敬仰他。毛泽东的名字将同世界无产阶级的这些最伟大的领袖一起永垂不朽。

毛泽东同志在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进一步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发动了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他教导世界各国人民，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并指出新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已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它已成为世界人民当今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同志一再号召各国人民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在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中团结起来。他为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道路。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其他伟大领袖和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继承者。毛泽东同志捍卫并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他的著作是共产党人和一切进行革命斗争的人们的强大武器。

毛泽东同志是罕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走向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的事业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

毛泽东主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无限崇敬和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逝世，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无

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关心和全心全意地支持、帮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坚决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他总结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新鲜经验，使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推动人类历史胜利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推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同阶级敌人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整个斗争历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同志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积极支持和声援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自由、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作为改变了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生活的中国革命之父，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人类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正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伟大和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维护了国际行为的最高准则并为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而斗争。同时，他开创了一个划时代的世界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在各国被压迫人民心中又重新燃起摆脱可诅咒的剥削和痛苦而实现灿烂未来的希望。他的不朽的榜样和教导将继续指引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和成就，并召唤世界人民以新的希望和热情为从压迫和控制下得到最后解放而斗争。

毛主席是一位具有史诗般高大形象的领袖，他的名字在他生前就已为人们所传颂。他终身鼓舞并集中体现了中国革命。对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他是给予力量和支持的可靠的源泉。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巨大而不朽的贡献不仅将为中国而且将为全世界的世代所铭记。

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它的伟大人物的生平的话，那末，如果不记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和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将是不完整的。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当代的一位传奇人物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人们将缅怀他对人类争取独立和使各地贫困无权的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的斗争所作的卓越贡献。

作为历史上杰出的革命领袖之一，作为被压迫和被欺凌人民的事业的旗手和人民的组织者，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他的思想和成就使他在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榜样将继续启发和鼓舞全世界人民进行反对控制和剥削势力的斗争。他关于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将永远是孟加拉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明灯。

毛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而且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他不仅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而且在当今充斥暴政和非正义的世界上他是热爱和平的人。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的观点和思想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并将继续被国际社会、特别是为摆脱不发达状态而斗争的国家所运用。全世界、特别是非洲的自由战士们，将永远怀念毛泽东，把他看作是对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斗争的巨大鼓舞的象征，他们尤其将永远铭记毛泽东给他们的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不倦支持。

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的远见、坚韧的体力和罕见的天赋的领导人，这使他能够鼓舞本国人民和超出中国国界的各国人民。他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进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

毛泽东主席阁下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世界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贡献。因此，毛泽东主席阁下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热爱和无限崇敬，而且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的衷心热爱和无限崇敬。

毛主席对全世界作出的最大的功绩是：他唤起了被压迫民族，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新的信心。毛泽东并没有真的去世。作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国家缔造者，他是永垂不朽的。人们将世代地纪念他。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政治家，是各个时代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位最伟大的缔造者。

毛泽东主席是无产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最忠实的战士，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人民最诚挚、最可靠的朋友。他完全无私地、忘我地以惊人的毅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全面高度发展的国家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世界革命将永远怀念他，他将永远是全世界革命者和思想家学习的榜样。

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永远也不会死去，因为他的丰功伟绩将与世长存。毛主席经过漫长的征途之后可以安息了，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将把他升起的解放旗帜举得更高。

历史学家将把毛主席的一生作为一个杰出的时代载入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对人类尊严和世界和平与谅解所作贡献的史册。他的确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大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从中国的角度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的人物的纪念。当然，毛泽东为中国和中国的八亿人民创造了奇迹，但是他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形势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同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永远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毛泽东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不幸逝世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无限悲痛。毛泽东主席的业绩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越了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国界，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

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一些反毛小丑不断地制造诽谤伟大领袖的谣言，蒙蔽

了一些无知的青年人。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揭露反毛小丑的攻击，教育那些受蒙蔽的青年。

2010 年 9 月 9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五篇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八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五篇目录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目录

概 述	4
第一章 十月政变	32
第一节 元老派的预谋	32
第二节 新贵派的阴谋	40
第三节 江青等的活动	52
第四节 十月六日政变	62
第五节 通过四项决定	67
第六节 企图稳定局势	76
第七节 发动三大战役	80
第八节 清理帮派体系	97
第二章 召开十一大	115
第一节 邓小平复出	115
第二节 十届三中全会	124
第三节 召开十一大	129
第四节 真理标准讨论	135
第五节 清理帮派体系	167
第三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	167
第一节 中央工作会议	167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	176
第三节 理论务虚会议	181
第四节 解决帮派体系	190
第四章 十一届四、五中全会	204
第一节 七九年国庆讲话	204
第二节 为刘少奇翻案	209
第三节 审判江青等人	215
第四节 清除五员干将	226
第五章 十一届六中全会	231
第一节 历史问题决议	231
第二节 华国锋下台	246
第三节 邓小平批毛	251
第四节 审判各地骨干	255
第五节 清理三种人	264
第六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80

第一节	河南省	280
第二节	湖北省	306
第三节	云南省	319
第四节	四川省	333
第五节	重庆市	349
第六节	山东省	361
第七节	浙江省	366
第八节	黑龙江省	374
第九节	河北省	380
第十节	安徽省	387
第十一节	湖南省	393
第十二节	江西省	40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五篇概述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概述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大体上也经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十月政变逮捕了中央左派领导人，成立了以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汪东兴为副主席的新的“党中央”，从而使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政变活动

1，元老派搞政变的预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林彪事件是文革派内部一场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造成了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他们开始通过个别串联，酝酿发动政变。

第二个阶段，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左派江青等人有所批评，这是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邓小平、叶剑英利用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个别串联、打招呼，布置发动政变的基本骨干力量。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核心、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人，一方面积极在元老派中进行串联，制定政变方案，组织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加紧与新贵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联络，抓住了华国锋，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了。

2，新贵派的阴谋活动起了主导作用

在十月政变中，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是四个核心的人物。叶剑英是掌舵的，李先念是联络的，华国锋是掌印的，汪东兴是掌刀的。

华国锋没有叶剑英代表的元老派撑腰，他就不敢发动政变；华国锋没有汪东兴代表的中南海警卫人员执行，他就不可能实施宫廷政变。

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已经逐步卷入了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成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先锋。当他发现毛泽东开始追查事件的真相以后，就马上伪装坦白交代、悔过自新。当时，毛泽东为了教育挽救其他犯错误的干部，就拿他当一个肯承认错误的典型，并相信只要他在世汪东兴就不敢造反。

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汪东兴在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就重新开始他的阴谋活动了，反复劝导华国锋搞掉政治局中的左派领导人。这时，华国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但是，汪东兴敢于对华国锋说这样的话，也说明汪东兴对华国锋其人是深知的。华国锋对汪东兴的这些阴谋活动，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揭发，也就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他表面上温顺恭敬、老实厚道，实际上反对文革，权欲极强。

逮捕中央左派领导人的方案、时间，都是经过华国锋同意的，因为他是掌印的嘛！但是，这些都是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做工作才同意的。如，开始，华国锋偏重于采取合法程序，召开中央全会解除左派领导人的职权，后经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提出：政治局会议上有可能取胜，但在中央全会上则胜算甚小，最后决定采取非法的程序，不经中央全会也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用军事暴力加以逮捕。又如，实施的时间，原来议定在十月中旬，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制造、谎报政情、军情，华国锋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下，慌忙决定在十月六日动手。

新贵派中有一个吴德，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了政变的策划，还实施了对迟群、谢静宜等人的逮捕。

新贵派中还有一个陈锡联，在政治局中此人掌握兵权。他也想积极向政变派靠拢，但并未被纳入核心圈子里。

华国锋把陈永贵也看作是自己的人，事前向他透露过一些消息。陈永贵也把自己当成了政变派，兴奋过好一阵子。

3，左派领导人在等待中渡过

江青等人一心想着等待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告一段落以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在两个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之间明确分工：华国锋管政

府工作，王洪文管党的工作。把江青选进政治局常委会，让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参加政治局的工作。让叶剑英、李先念继续休息，正式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左派领导人都是“三要三不要”的“模范”，他们不敢有任何违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非组织活动，也没有任何防范政治风险、军事政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应对措施。

4，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中南海实施军事政变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王洪文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张春桥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怀仁堂正厅，姚文元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宿舍楼，毛远新被逮捕。

1976年10月6日，在宿舍楼，江青被逮捕。

晚九时三十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

1976年10月7日，吴德等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5，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十一时，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者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

经过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剑英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结束。

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这一场揭批战争分为三大战役进行。

1, 第一个战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文件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歪曲割裂。下面只举两例：

第一部份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其中说：

“四、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四人帮”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 “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请问：在酝酿期间，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有自己的意见，经过商量以后，派了一个代表向党中央主席报告，这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第二部份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

“四人帮”利用报刊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

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张春桥提出经验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这个论断，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提出来的。张春桥在讲话中谈了自己的体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并直接向毛主席“请教”。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这怎么就成了““四人帮”却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们这样搞的政治目的，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呢？

特别值得注意是通知的下面这一段话：“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请问：经过三十四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段话究竟是在为什么人画像？

2，第二个战役：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

文件说：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捕风捉影。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原来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他根本从来就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过，何来“叛变”呢？又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根据何在呢？

根据之一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原国民党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在一份证明材料中说：“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份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

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但是，南京市军管会一九五二年对徐伯璞的判刑决定书中只说：徐伯璞“一九三三年春在正谊中学时，将领导学运的郑某等六人开除学籍。同年三月廿日勾结伪法官逮捕领导学运的程路汉非刑拷打并判无期徒刑，后程死狱中。”并没有说这件事就是张春桥告密的。那么，按照政变后为刘少奇等人平反决定的思维模式，徐伯璞在一九七七年写的证明材料，也可能是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下编造出来的，不足为凭。

根据之二就是：张春桥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摹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问题在于：“华蒂社”本身能否定为“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虽然“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主编的李树慈是复兴社分子，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并且，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的《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华蒂社”本身就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马吉峰，也是在“华蒂”快垮台时，才知道“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

请问：张春桥参加了这个“编文艺刊物”的组织，就能是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吗？

根据之三是：“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

崔万秋是复兴社的特务，并主编《大晚报》的文艺副刊《火炬》。它是中左面貌出现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用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评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回答了张春桥的批评。张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了信。鲁迅逝世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大晚报》和

《热风》上发表了《鲁迅先生断片》、《速写红萝卜》等文章。这些情况并不能证明，张春桥是复兴社的特务，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是文化特务活动。

根据之四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这件事说明：张春桥当时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与共产党组织也曾有过某种接触和联系。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他没有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他父亲的同事复兴社特务分子赵福成的家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去延安。没有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潜入延安的。

关于江青的自首叛变问题，文件说：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可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实际上，这也就间接地证明，所谓江青“自首叛变”问题，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栽赃陷害。

3，第三个战役：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

文件说：现在，应当以华国锋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同志的闭幕词为指导，结合传达“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关于第一部份，文件指出：“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造的假命题。查遍文件列举的所有证词，都找不到任何左派领导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江青说过：“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是民主派”。这也不等于说老干部都是或就是民主派呀！“民主派发展成走资派是必然规律”。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仍然坚持民主派的立场就必然发展成为走资派，这也不等于说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呀！

至于文件列举的其他左派领导人说的反对走资派的话作为证据，正好暴露了文件的作者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本质。

清理帮派体系骨干分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政治活动的骨干分子。这次清查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基本结束。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镇压革命左派的运动，公布的材料极少，这里收集到的也仅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部分。

据 1981 年 1 月 5 日，河南省委书记胡立教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 1700 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 5 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

1983 年 11 月，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 4248 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已处理 4202 名，其中判刑 51 人，受各种处分 2025 名。(开除党籍 323 人，留党察看 493 人，撤销职务 452 人，警告、严重警告 347 人，开除公职 20 人，开除留用 140 人，其它处分 250 人)，免于处分的 2020 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 107 人。”“突击发展的党员，有 10 万 6 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 1967 年到 1976 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 13 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 80%。

二 00 六年九月九日，湖北的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 XXX 的信中指出：湖北的当权派“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 96 个月，受害人 29127 名。”

更多的情况尚待各地揭露。

完成组织程序，巩固既得利益成果

1，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七七年三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

新贵派的算盘是：利用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进一步巩固华国锋在中央的地位。同时，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采取拖延战术。

元老派的打算是：利用新贵派想在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的时机，必须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两个决议必须同时通过，或者同时否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汪东兴、华国锋（3月14日）就先后在会议上放风，反对邓小平复出。

元老派随即进行反击，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支持邓小平复出。其他元老派大佬纷纷表态拥护陈云的发言。

一场火并即将爆发。

新贵派分析形势，不敢冒险，只得妥协退让，提出：邓小平复出必须公开声明：承认一九七五年有错误，接受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样既为邓小平平了反，又维护了他们的两个凡是形象。

元老派为了达到邓小平复出的目的，也只得作一些让步：这就有了四月十日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的信。其实，这个表态也是表面的、暂时的。邓小平在私下对他的亲信们一再说明，一九七五年他没有错，新贵派提出两个凡是错了。

2，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

十届三中全会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通过的关于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这是华党中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镇压左派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决议，是元老派、新贵派联合行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证。

二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元老派支持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在八一建军节的讲话中，高呼：英明领袖华主席！而且给华国锋封了“四个好”：好学生、好接班人，好领袖、好统帅。

三是：新贵派同意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重申：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他的话既是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说的。这样，邓小平一上台，就把元老派与新贵派的政治分歧公开地摆在面前。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一上台，就把非难、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

3，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华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华国锋在报告中正式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历史证明：一九七六年的十月政变确实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抓纲治国时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开始。

第二，华在报告中解释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

历史证明：革命人民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们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革命左派中的骨干分子。邓小平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抓阶级斗争比谁都厉害，重点对象是革命的工农大众。

第三，十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可以看出是元老派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中共中央正副主席共五人，即政治局常委会，新贵派仅占两人，虽有主席一人，但他并没有最后决定权；元老派却占三人，如果常委会票决，元老派肯定是多数。政治局的构成就更无须多说了，元老派占据了绝对多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副主席共六人，除主席是华国锋外，其他五席均为元老派占据。

从十一大召开以后，新贵派就开始走下坡路，华国锋的主席梦就基本上结束了。元老派一步步的紧逼，牵着新贵的鼻子走，通过所谓平反，一个一个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也一张一张地揭新贵派披着的“两个凡是”的画皮，权力重心也一步一步地转移到邓小平手上。

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即拨毛泽东思想之“乱”，反修正主义之“正”。

批判两个凡是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两个凡是”的说法。因为这是要等待条件成熟。

到 1878 年 5 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五届一次会议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一直到六月六日才结束。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

“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14 页、119 页）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一九七八年七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要讨论什么理论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批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专门加的一句话，全

段话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领导层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或反对这个观点。双方不是在哲学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不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而是政治上的斗争。

这一场政治风暴意义重大：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

但是，在右派看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可惜它没有把这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扭转过来。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他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说：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也作了《我的初步检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

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这样一来，新贵派就把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假面具撕下来了，把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假面具撕下来了，他们与右派是一丘之貉。

这样一来，元老派也把他们的政治立场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说反对的只是所谓的四人帮，他们现在要翻的这些案，难道都仅仅是四人帮决定的吗？不是还有林彪、陈伯达吗？不是还有康生、谢富治吗？不是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吗？

新贵派的主席、副主席在全会上作了检讨，汪东兴还提出辞去他的一切职务，虽然这次全会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新贵派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基本上垮掉了。元老派等待着一步步地收拾他们。

2，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结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胡乔木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号称党内的大理论家、毛泽东主席的多年秘书胡乔木要推翻毛泽东思想的一篇谈话。

1，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理由是：

第一，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这个话是完全站不住的。一个口号，无论最先是谁提出的，只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决定，就应该承认。

第二，它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是完全错了。

第三，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看来，捏造出这个所谓的反动公式，胡也有一份功劳。在他看来，老干部中没有民主派，民主派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也不会变成走资派。

2，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理论，他的理由是：

第一，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他说得似乎理直气壮，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到了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也还会有存在，甚至到了它的末期阶段也还会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残余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存在的形态是不同的，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逐步消灭的过程。

第二，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是自打嘴巴！你们自己不是提出什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你们承认有，那你们承认不承认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但不等于说只有完全消灭了阶级才算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需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还要经历若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3，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所谓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残余形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完整的、极端的形态；这种阶级斗争当然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胡乔木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污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实际上是为据有关人士掩盖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的残酷阶级斗争。

第二，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真想不到这种胡说八道是从胡乔木这位大理论家口中说出来的。没有了阶级斗争，社会发展怎么就会没有了动力呢？事物本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的阶级矛盾消灭了，社会的其他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中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4，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一矛盾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

可是，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胡乔木先生为什么要掩盖呢？

第二，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

看来，胡乔木先生确实长着一颗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在他看来：抓主要矛盾与抓建设现代化，两者是绝对对立的，抓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他们口头上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5，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党内路线斗争教育的指示，其理由是：

第一，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第二，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第三，是否一定要把某几次斗争指定为路线斗争，并且一定要一次又一次地排列起来？

第四，这样是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会不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

一九三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三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很全面，刘少奇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只到主要方面和原则斗争。

路线斗争是党内斗争中最高的部分，当然不是全部。

党的历史是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历史，其核心部分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强调对高级干部进行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育，在多次谈话中讲到了建党以来党内发生的几次重要路线斗争。这怎么就“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呢？反过来，人们看到：一九九一年，胡乔木在美国大讲建国以来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那才真正是歪曲党的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向美国帝国主义献媚。

（四）召开理论务虚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会议是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很敢讲话”的意见召开的。

这次开了 80 多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少数。

另一种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时期的功绩，但要批判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这是多数。

还有一种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也是少数。

有人说，中国本来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中国实际，是搞空想社会主义。

有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毛泽东还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共产党搞阴谋，“引蛇出洞”，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刮“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人说，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搞越“左”。

有人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文艺界已经滚到修正主义边缘，完全是一种“左”的估计，这时搞的文艺界整风以及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搞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有人说，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十分错误，应该彻底否定。

等等，等等。

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 173-174 页）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这里是说，这个时候就公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陆定一在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的文章），太早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还接受不了，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由此可见，当时出现的这类“四反”的东西数量之大、影响之广。

面对着党内外刮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邓小平不得不重复提出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他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反对“主张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撇开党委闹革命”；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反对“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1977 年 7 月恢复工作，1978 年 5 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 1979 年 3 月召开所谓理论务虚会。前一次是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后一次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造成了党内思想大混乱、社会上风气大败坏。

（五）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的七九国庆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他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这一讲话着重讲“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真正属于林彪、“四人帮”的东西不多。

第三阶段：一九八〇年一月至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的平反翻案，另一方面又制造大量的新的冤假错案。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已经平反的案件

1，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

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翻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案。

2，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 1)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 2)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 3) 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 4)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 5) 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 6) 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 7) 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3，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4，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5，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6，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7，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二)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关于刘少奇的历史上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搞清楚。除非发现新的证据，人们只能存疑。

刘少奇三次被捕问题，肯定他叛变的根据不是很充分，特别有一些是事后人们的证词，这些人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又可以翻供。否定他叛变的根据也很不足。

至于刘少奇在建国以后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他的亲属，都已经公开承认；刘少奇执行的是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这说明，毛泽东关于在党内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的判断是正确的。

审判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一年，曾经有过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据它所犯的罪行，当时已经作出了处理。至于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华国锋、邓小平打成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十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本庭经过四十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没等念到“缓期二年执行”等段落，她就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其他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

（四）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把邓小平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这个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讲话，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主要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他在一九六七年作过“检讨”，显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他企图“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这一次，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贯彻执行。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正确内容的思想；而他认为是错误内容的思想，他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他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实际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过去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里所谓“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也是指毛泽东搞“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等等。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这个报告大肆鼓吹“反封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

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写信，说不能这样宣传“反封建”，不能宣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说，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又找陈云，陈云批了一段话：“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如果宣传上不注意，经济上不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充分利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建主义势力”集团。邓小平吃了这个苦头，再也不提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了。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重点是讲文化大革命。

第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其一，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与“各级领导干部”划等号吗？；“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是否也存在像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人？能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受教育与受打击有没有区别？能说“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了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被“打倒”了，还是“重用”了？

其二，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一个运动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能与整个运动划等号吗？在土地革命中也有过“打倒一切”的错误，能说土地革命是错误的吗？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错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要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并提？他们之间难道说没有区别吗？另一个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有那些是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的？批判江青的这些“罪行”，是不是实际上要批判毛泽东？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

邓小平把它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这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李维汉）给他提供的建议。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坚持批下去了呢？

第四，关于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问题。

邓小平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违心的”，除非周恩来本人有过声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说这样的话。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的检讨、一九六八年的自述、一九七二年的信，除非他自己声明他当时说这些话是违心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替他说这样的话。何况，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

过：“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摘自权延迟：《毛泽东与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说成是为了保住自己，这究竟是对周恩来的“抬高”，还是“贬低”？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这些话说明，当时在四千人的讨论范围内，有的人不同意在决议中提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的人甚至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更有甚者，有的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由此可见，在错误思想的鼓动和诱导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混乱。这一些人政治上太幼稚。他们根本想不到：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仅会脱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而且也会彻底否定他们自己。

邓小平究竟比这样一些人要高一筹，他看到了这种危险。要肯定毛泽东思想、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但又要说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邓小平的这些话说明：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口号上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一直坚持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十年，邓小平是基本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此时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认为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已经形成，因此错误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其一，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这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是局部的否定，而是全盘否定。

其二，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这一点，站在相反立场的人也可以同意。只是它不是“耽误”而是教育了不止一代人；它使革命的、民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广为传播。

其三，健康的方面是“二月正流”。这一点说明邓小平在改写党史。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转达陈云的一点意见：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陈云的这个点子的确很高明。本来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什么要写解放前的党史呢？因为只讲建国以来的历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要说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有多么大，实在难说。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一看，就会看出，决议对毛泽东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的思想上通不过。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历史，就会使人感觉到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肯定很充分。所以邓小平很乐意地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又透露了讨论中一些高级干部的更为混乱的思想。所谓“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糟透了，只有错误，没有任何成绩”来说的。邓小平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包括有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透露了，决议在四千人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

一种倾向是，这个决议不要急于搞，搞得不好、搞早了，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另一倾向是，这个决议草稿对毛泽东的评介还是太高了。应该说：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他为了争名夺利、耍权术必然要犯的错误。

第三种倾向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的主张。

看来，在高级干部中，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第一点是打马虎眼，不说是路线错误，实际的具体内容就是路线错误。第二点是策略，先放手让大家议论，扩散到党内外，再收回一些。第三点是实质，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压制“‘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第四点是未来，对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要采取新的态度和政策。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急于要搞这么一个决议的真意了。这个决议出来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发表的“非毛化”的东西，一点也不见减少；只有左派被真正的“框住”了，他们的意见再也不能公开发表了。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不仅根本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断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搞的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这到底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科学评价”，还是搞“非毛化”？

2012年8月21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30 万字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一章 十月政变

第一节 元老派的预谋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王震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

他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

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有几位老将军在医院里，找到他，请他向叶老师反映对形势的看法。

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叶剑英在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在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

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重病期间，聂荣臻从城内搬到西山，住在叶剑英附近。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他们多次议论：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

“投鼠忌器，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得想个办法。”

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有一天王震来到聂荣臻家，在谈到“四人帮”时，王震气愤地说：“我的头发、胡子不剃了，什么时候粉碎了‘四人帮’，再剃！”聂荣臻的心情跟王震一样。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胡耀邦访问邓小平。

胡耀邦提到中国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邓小平说：“现在不好讲了，新的接班人还是要继续批我的，但是他不会长期地待下去的，他和那些人的矛盾马上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再看看下一步的发展吧。”“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某日，邓小平催促叶剑英赶快行动。

这一天，邓小平接待王震来访，告诉他许多“酝酿行动”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叶剑英，说：王震马上要过去，再催催那件事。

叶剑英主动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被剥夺的军队领导权，继续与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部门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并亲自查看重要军事设施，预防各种不测。

他特意找《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了解情况，嘱咐“班子要团结，头脑要清醒，坚守舆论阵地。”

叶剑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有些人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

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

他邀请乌兰夫前来就国内形势问题征求意见。两人谈得很深，乌兰夫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告别时一再嘱咐他身负国家、民族重托，要多多珍重。叶剑英送他到门口握别，流下了热泪。

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

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

叶剑英沉思片刻之后，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动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

叶剑英又去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叶剑英反映情况，表示对形势的关注和忧虑。

一天晚间，叶剑英和女儿楚梅邀请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同叶伯伯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形势刚有好转，又挨批，不可理解。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

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

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

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汪也正在酝酿此事。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他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他还对杨成武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他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 2 号楼、城内后海小翔凤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

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冲突无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驱车绕道上山来会叶剑英。

警卫通报后，叶剑英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他能来，迎到走廊里说：“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说：“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谈起来。

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

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叶剑英说：“你说，他的办法（指在中央全会上上解决‘四帮’的问题）好吗？”“根据和大多数同志商量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三个方案：

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这四个人的职务；

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他们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

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的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究竟哪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易于取胜，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李先念说：“我倾向于第二个方案。”

叶剑英说：“不知国锋同志同意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李先念说：“他对江青一伙还没有真正认识透，也可能还有幻想。不过，等政治形势进一步发展下去，我断定他的主张一定会和我们接近的。”

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订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

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邓颖超访问叶剑英。

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叶剑英接沈阳沈阳军区打来的电话：有人要带坦克师向北京逼进。

叶剑英打电话将此事告诉聂荣臻，并要聂命令军委办公厅，把今天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向华国锋汇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叶剑英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要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李先念赶到叶剑英处。

李先念说：“华国锋催你赶快动手”“《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讨伐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文章，他断定矛头是对着他来了，急不可待地要你快些动手。”

叶剑英说：“他想让我一个人决定时间，不，我要和他一起研究，他必须亲自出面指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事已至此，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

当即约好，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在另一个地点碰头。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在碰头中，叶剑英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决定五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 6-7 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经过商议，决定 6 日晚上 8 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 10 天再动手的方案。

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

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贰、本节简论

元老派搞政变的预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林彪事件是文革派内部一场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造成了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他们开始通过个别串联，酝酿发动政变。

第二个阶段，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左派江青等人有所批评，这是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邓小平、叶剑英利用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个别串联、打招呼，布置发动政变的基本骨干力量。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核心、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人，一方面积极在元老派中进行串联，制定政变方案，组织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加紧与新贵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联络，抓住了华国锋，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了。

其实，反文革的政变活动，此前还有过两次：一次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大闹怀仁堂”，那是一次遭遇战，事先没有经过周密的策划，遭到迎头痛击。另外一次是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以及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发动阴谋杀害中央领导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很快就败露了，导致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

所以，十月政变的发生，与文革左派领导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活动，没有必然的联系，一切所谓文革左派领导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抢班夺权活动，都不过是制造出来的借口，因为这次政变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就开始策划了的。

2010 年 9 月 2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5 日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 新贵派的阴谋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七月，汪东兴故意多次找华国锋谈心，

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

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

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

华支支吾吾，没敢回答汪。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深夜，叶剑英走访汪东兴。

叶剑英说：“我和老同志们议论了一下，认为现在到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汪东兴说：“在这些问题上，我坚决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剑英说：“你要考虑一个完整的方案。”

汪东兴说：“这还须从长计议，范围无论如何不要大了，但一定要有华总理指挥，而且要绝对保密。”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汪东兴向华国锋“汇报”工作。

汪东兴说：“我建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一下毛主席的文件保管保管问题，不能容许江青凌驾于中央头上。”

华国锋说：“政治局其他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华国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和汪东兴等人开碰头会。

江青提出：郑重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我和远新整理。

汪东兴表示反对。张春桥、王洪文表示赞成。

华国锋说：“文稿先由办公厅封存，将来再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应该听取广泛的意见，不然会出差错的。”

随后，华国锋让汪东兴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华国锋连续接了毛远新、江青的电话，接着又接待了张春桥，都是谈关于毛远新的去留问题。

紧接着李先念来访。

李先念说：“王洪文最近到上海，你知道吗？”

华国锋说：“他跟我说了，有什么情况吗？”

李先念拿出一叠材料：

一份是，王洪文在上海接见部分军队干部的讲话。王说，赫鲁晓夫可能在中国上台，要求军队听从上海市委的安排，尽快把上海民兵按正规军队的要求武装起来，发枪、发炮、发一切战备物资，以应付突然事件。其中有发放武器的具体数目和时间。

一份是，最近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清华大学写作组整理的几位中央领导人的罪行材料，名列前首的正是华国锋。

华国锋看完后说：“他们整来整去，真要整到我的头上了！”“其实，毛主席的手令是写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大胆地干吧，你办事，我放心’。老人家还亲笔给我写到了纸上。”

李先念知道这是中央工作中正常的几句话，但在这时，可以发挥原子弹一样的作用，他说：“这可是我们讨伐‘四人帮’名正言顺的圣旨。”并说“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华国锋说：“我考虑得差不多了。我们分头准备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南海值班的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找到李先念，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华国锋说：“我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

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

式、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和华国锋在玉泉山，叶的新家谈了第一次话。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

叶表了态：「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华国锋在国务院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约李先念、吴德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吴德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吴德说：当然知道。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他们认为：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他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吴德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 5 点，认识一致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七日，华和叶一起到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这次三个人开门见山，就谈如何解决四人帮。

华国锋还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汪东兴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

叶起先只是听，看到汪的决心很大，非干不可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说，「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以快打慢。具体怎么办，东兴你自己决定，我们用不出力，但我们做你的后盾。」

华看叶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叶还建议事情成功后可由元老派的一些人出面帮助维持局势。

三人商议后，叶就去向许多中共元老们吹风，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要苏振华、秦基伟、耿彪等人和他保持联系。元老派的人早在毛病重期间就埋伏在上海，现在更加密切注意上海方面的动静，作好了各种准备。即使汪东兴不发难，早晚元老派也要利用民心 and 文革派最后摊牌。现在，各路人马开始秘密行动起来，互相串联，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家庭开始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再是以前无目的地空发牢骚而已。

但是，叶虽然和他的老朋友们谈论四人帮如何如何不好，以及如何如何对付四人帮等等，却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三人协议的事，更没有提到汪东兴即将行动。李先念虽然先前给华国锋传过话，知道要解决四人帮，会有大变动发生，但这时也不知汪东兴的具体政变计划。叶、华和汪三人最担心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江青他们跑到上海去。

这时，姚依林悄悄地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手下有一个小组。他们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文革派偷听。后来他对自己家人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在十月六日之前，他都不知汪东兴即将发动政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华国锋派汪东兴到叶剑英家传达他关于二十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意见。

汪东兴说：“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的问题，算是一次火力侦查，摸摸底。”

叶剑英说：“好，让双方都来一次预演吧”。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江青提出：“要加强中央集体领导。”

张春桥说：“要考虑江青同志的安排，要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

王洪文说：“要让毛远新留下来。”

叶剑英表示反对让毛远新留下。

华国锋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姚文元表示毛远新不能走。

江青说毛远新必须留下。

张春桥说：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

几个政治局委员同意张的意见。

李先念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李德生同意华、叶、李的意见。

汪东兴同意华、叶的意见。

张春桥再次提出：“要让江青进进常委班子”

叶剑英反对。

王洪文赞成。

李先念反对。

姚文元赞成。

双方坚持不下，有人建议暂时休会，华国锋建议叶剑英、李先念可以先走，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吴桂贤、陈永贵等人也跟着退席。留下的人继续继续讨论。

华国锋说：“现在双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些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所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我宣布散会。”

华国锋说完扭头就走。汪东兴跟着华国锋离开会场，其他委员纷纷离开。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人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座谈会。

会前，姚文元在给新华社的指示中称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毛主席遗志，遵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

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作的总结讲话里，只字不提“按既定方针办”。

散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又到国务院小礼堂旁边的休息室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华国锋到吴德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他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吴德考虑：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吴德：“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吴德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华国锋接见叶剑英，两人密商将行动时间提前。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叶剑英走访汪东兴，通知他作好提前行动的准备。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或四日，吴德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

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吴德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吴德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吴德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吴德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忠告诉吴德，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吴德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你负责，你去找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

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吴德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吴德的住处具体商

吴德踏进家门，吴忠已在他家中等候。他们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

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他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吴德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

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华国锋又找吴德去到他的住处。

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吴德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吴德同意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后来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华国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汪再也睡不着了。汪找来他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李鑫曾是康生的秘书）。汪要求李鑫告诉华，说李得到的情报，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带。

李有点吃惊，他担心这样说了华会不会不相信，以后又怎么办？江青、张春桥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搞军事政变不是把他们自己给陷在里面。这样瞎编是不是有点过份？

李正在想，汪一句话，「这你不用管」，把他压住了。

凌晨，汪和李一起去见华。李汇报了汪指使他说的事。

汪等李先走了才对华说，「现在这个形势，不动也得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华国锋还有顾虑，「万一其它政治局的人反对怎么办呢？」华指的是纪登奎、陈永贵等中间派的成员。

「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汪突然大声把华吓了一跳。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华国锋看到叶、聂送来的有关坦克师师调动情况以及张春桥、王洪文打部队一些负责人谈话的情况，当即前往医院找李先念。

华国锋说：“请你马上转告叶剑英，让他马上决断，我听他的。”

李先念说：“你看一下今天《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既然你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你给叶剑英同志写个便条，我给你送去，让他组织力量。”

华国锋写道：

剑英同志：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迫在眉睫。事情太紧急了，一切由你下决心办。

华国锋

并说：“告诉叶帅，你们需要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我听你们的。”

李先念说：“不对，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你出头带领我们一块干，就是你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华国锋分别找汪东兴、吴德讨论研究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准备情况。

10月4日5点多钟，华国锋要吴德马上到他那里。

吴德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他们商定：

-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解决。
-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华国锋要求吴德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陈锡联带队到唐山慰问参加抗震救灾部队和医护人员提前回到北京。他说：“我到唐山看到《光明日报》的文章，马上赶回来，下飞机直上到华国锋家里，讲《光明日报》文章的事，并说‘四人帮’准备好了，不能等他们来抓我们。还提醒他，王洪文家里一直藏著枪。”陈锡联把他的看法又告诉了李先念。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晚上，汪东兴又去华国锋处。他要继续给华压力，直至华下决心为止。

深夜，已经疲惫不堪的华国锋对汪说，「不是我想这么搞，实在是他们逼得我这么搞。」

华不敢说汪东兴逼他，只能说「他们」，好象是「四人帮」。这样终于同意了汪东兴具体制定的方案。行动时间是十月六日晚上，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汪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在碰头中，叶剑英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

经过商议，决定五天后动手。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 6-7 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十月六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叶剑英下达指示：

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飏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经过华国锋的个别谈话，陈永贵事先已经知道将要采取的行动。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贰、本节简论

在十月政变中，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是三个核心的人物。叶剑英是掌舵的，华国锋是掌印的，汪东兴是掌刀的。

华国锋没有叶剑英代表的元老派撑腰，他就不敢发动政变；华国锋没有汪东兴代表的中南海警卫人员执行，他就不可能实施宫廷政变。

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已经逐步卷入了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成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先锋。当他发现毛泽东开始追查事件的真相以后，就马上伪装坦白交代、悔过自新。当时，毛泽东为了教育挽救其他犯错误的干部，就拿他当一个肯承认错误的典型，并相信只要他在世汪东兴就不敢造反。

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汪东兴在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就重新开始他的阴谋活动了，反复劝导华国锋搞掉政治局中的左派领导人。这时，华国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但是，汪东兴敢于对华国锋说这样的话，也说明汪东兴对华国锋其人是深知的。华国锋对汪东兴的这些阴谋活动，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揭发，也就是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他表面上温顺恭敬、老实厚道，实际上反对文革，权欲极强。

逮捕中央左派领导人的方案、时间，都是经过华国锋同意的，因为他是掌印的嘛！但是，这些都是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做工作才同意的。如，开始，华国锋偏重于采取合法程序，召开中央全会解除左派领导人的职权，后经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提出：政治局会议上有可能取胜，但在中央全会上则胜算甚小，最后决定采取非法的程序，不经中央全会也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用军事暴力加以逮捕。又如，实施的时间，原来议定在十月中旬，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制造、谎报政情、军情，华国锋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下，慌忙决定在十月六日动手。

华国锋的这种傀儡式的作用，在政变后，特别是邓小平复出后日益明显，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被元老派完全抛弃。

新贵派中有一个吴德，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了政变的策划，还实施了对迟群、谢静宜等人的逮捕。

新贵派中还有一个陈锡联，在政治局中此人掌握兵权。他也想积极向政变派靠拢，但并未被纳入核心圈子里。

华国锋把陈永贵也看作是自己的人，事前向他透露过一些消息。陈永贵也把自己当成了政变派，兴奋过好一阵子。

2010年9月27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第一章第三节 江青等人的活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家要坚定、镇静，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破坏和捣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晚七点多钟，王洪文安排专人值班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米：王洪文让廖带他到中南海值班。

廖祖康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

米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

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米即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江青、毛远新要看毛主席的文件汪东兴不给

主席逝世后，江青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张玉凤。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张认为这不合组织手续，推说原稿不在我这。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张要，张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汪来后，张报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远新拿走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的二次谈话记录稿。

汪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说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和十日，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和省知识青年办公室讲话说：现在，我们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翎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军队充满了担心。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张铁生的讲话记录送给毛远新。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迟群、谢静宜用清华、北大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信。

江青同志：

呈上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给您的信。

我们也一定保持清醒头脑，狠狠批邓，准备应付各种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

小谢、迟群

12/9 1976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姚文元不断地给新华社打电话，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中央报刊要把它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王洪文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洪文同志说：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

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〇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〇〇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〇〇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个武装集团。什么叫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今年六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

八月下旬以后，发了各种枪、炮七万四千余件，弹药一千万余发。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了 8 月间丁盛（南京军区司令员）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远新给宗明兰等人的回信

建议同志们认真学习近年来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近一年来，主席指定我给他担任联络员的工作，主席逝世后，我这个小传令兵已申请归队，我的岗位在沈阳，估计会得批准的，到沈阳再见。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布置新华社给江青写信。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不会甘心失败的，总会有人抬出邓小平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江青：

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我挺得住。我昨天看了一个文件，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三天三夜不吃饭，他们怕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不要效儿女感情，哭哭啼啼，……你们要斗，我还能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吃午饭时的谈话

江青说：

主席逝世后，有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怕地主往回要地，要房子。藏族怕达赖回来，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请大家转告同志们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

对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人打你，你也要打他，有人也想打我，咱们是同病相怜。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给他们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邓小平在全国造我的谣，把谣造到主席头上了。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搞掉不行，就采取软禁的办法。清华大学是发难地，他们去年夏天告迟群、小谢的状。主席和我没有告诉小谢，主席指示了，还有人告状。在斗邓小平的时候，还往上递材料。

我是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但我毕竟还是执行主席路线，捍卫主席路线的。他把我看成眼中钉，见面就批我，有的话不是我说的，也要安在我头上。主席经常批我，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主席是亲者严，疏者宽，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很激动）不过我现在也过来了。

现在有坏人在主席生病治疗上作文章，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亲眼看见了，说主席那么健康，怎么突然逝世了，说有人搞阴谋。这是挑拨，治主席的病还不是我主持。主席病重时，托附了四位领导同志看护，没有告诉我。医生护士他们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我要感谢他们，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们，感激不尽。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苹果我吃。但是，用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带票子回去。

（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吃。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他的秘书肖木去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江青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讲话

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30日）后（1日）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29日）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

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

比较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局是最差的，三十三条语录只学了三条就不学了。政治局有时连会也开不起来，开会也净是吵架。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怀疑主席。

“全面内战”是走资派挑动的，说是抢枪实质上是发枪嘛。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 继承毛主席遗志》

只有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当前，要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抓住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拍了标准像。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迟群给毛远新的信

送你看一个反动传单，这是我第一次增加了点知识。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宗明兰同志放的那一炮如果把这句话的辩明关系讲进去，无疑将是画龙点睛。

上次谈话，很受教育，什么是继承主席遗志，这就是。不理解主席思想，讲继承主席遗志，岂不是空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就明白地流露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恐惧与仇视的心理。它恶狠狠地攻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长期纠缠于……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什么“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并扬言要这些人“悬崖勒马，立即回头”，否则就要以“反革命”论处。

党内资产阶级一些人称邓小平是精明强干的有经验的实干家，不是偶然的。他早就同刘少奇一起举起了修正主义黑旗，同党内外资产阶级势力有着长期的多方面的深刻联系，对资本主义制度之“礼”颇为熟悉，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方面，颇有“经验”。这种“经验”具有配套成龙的特色，成为邓小平克己复礼的资本。

贰、本节简论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可是，直到一九八一年四月审判江青集团，查出来的江青等人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五日的活动，就只有这么一些。这些恰好相反，不但不能证明“四人帮”在“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而是证明了“四人帮”对阶级斗争缺乏应有的警惕，实际上是束手待毙。

就拿华国锋宣布的两条罪状来说：

一条是：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作为证据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10月6日，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一九七六年十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得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对莫艾的审查结论是：《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作为当时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的主要根据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一条是：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而在上海建立民兵组织并配发武器，则是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进行的一项武装建设。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这项建设。怎么能证明这就是在“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呢？

2010年10月4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第一章第四节 逮捕江张姚王毛

壹、本节概述

一切准备就绪。华国锋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即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所谓“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逮捕中央五位左派领导人。

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时间定在 10 月 6 日晚 8 时。

“会议内容”，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

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到场，通知他参加修订文献，列席会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七点多，华国锋派耿飏带领部队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是根据目击者记录的时间，耿飏本人的回忆是晚上十点左右）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点，华国锋通知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叶剑英就坐，事先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宣布，由汪东兴组织执行。

1976 年 10 月 6 日，王洪文被逮捕。

华国锋当着王洪文的面，宣读了中央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宣读完毕，王洪文突然大叫一声，挣脱警卫员的手，伸开双手，扑向五六米外的叶剑英。就在他冲到离叶剑英只有一两米远的地方时，中央警卫局的战士猛冲上去，把王洪文扑倒，死死摁住，给他戴上了手铐。

王洪文被捕后，对他的监管也最严。当天，王洪文被押进中南海地下室，他的情绪很激动，口中骂个不休。后来，他也不骂了，一副沮丧的样子。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被逮捕。

张春桥到达后，在怀仁堂门口，他的随员被引领到值班室，只有张春桥一人进来。他走进怀仁堂正厅东南门时，早就埋伏好的徐金升、纪和富从左、右两侧立即扑上，把他两臂扭住，将头按下。蒋廷贵、任子超也上前帮忙。张春桥一见势头，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接着就被行动小组扭送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弯腰低头站立。华国锋对张春桥宣布道：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行动组成员立即把他押到东饮水处，蒋廷贵给他戴上手铐，出东门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去地下工程的隔离室。

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被逮捕。

大约晚八点二十多分钟，姚文元进了怀仁堂。姚文元一进门，早已埋伏在门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像猛虎扑食一样，立即上前把姚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架在武健华面前。武健华立即向他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关于隔离审查他的手令，内容和前面的基本一样。姚文元一听，一面挣扎，一面喊叫：“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武健华大声命令：“带走！”行动组员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姚文元仍大喊大叫：“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警卫员：“小朱快来

呀！”张云生、高风利把姚文元押上了红旗车，驶向地下工程隔离审查。路上姚文元仍高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高风利用手帕堵住了他的嘴。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点，张耀祠负责在江青、毛远新住处解决。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处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轿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

九时三十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吴德等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中央决定把“四人帮”押送秦城监狱交由公安司法机关拘捕关押。

至此，王、张、江、姚被关押在中南海地下室六个月零四天。在这么长的看押时间里，住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差，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也不能洗澡。

贰、本节简论

华国锋、汪东兴在毛泽东逝世后，迅速倒向元老派一边，逮捕江张姚王毛，实际上就是背叛毛泽东身前的政治安排，抢班夺权。

两个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擅自作出决定，逮捕另外一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一位毛泽东生前的联络员，这种行为完全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十月六日这一天，虽然没有开一枪，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是，它是通过武装部队采取行动来完成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军事政变。而且，从全国范围来说，为了镇压所谓“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反抗，究竟杀了多少人？逮捕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个数字。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华国锋上台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他下台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政变领导人的所作所为，绝不单纯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翻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2010年10月6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5 日修改

第一章第五节 通过四项决定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十一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地点：玉泉山叶剑英住所。

出席者：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

叶剑英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
华国锋说：

“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 8 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时，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

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叶剑英讲话：

“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

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 1974 年、1975 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

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

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汪东兴也作了发言：

“四人帮”在主席逝世后一段时间以来准备发动兵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 79 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 20 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 he 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

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 10 月 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 日见报。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成员有于桑、严佐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 10 月 7 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 10 月 6 日晚 10 时开到 10 月 7 日清晨 4 时多，历时 6 个多小时结束。

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叶选宁去看一些老同志。

陈云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

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华国锋说：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叶剑英说：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

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

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第一着棋，是 1974 年、1975 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编者按：吴德的回忆证明，毛泽东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说逮捕中央左派领导人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这不仅是歪曲，甚至是捏造。这种骗人的把戏很快就被人们看穿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四项决议：第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第二，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第三，原则通过了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第四，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第一项决议是事后追认。

第二项决议是论功行赏。但也是责任到位。华国锋也有点自知之明，他知道：搞倒左派领导人靠的后台是元老派，所以他先提出来由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叶剑英老谋深算岂肯坐上这个火炉：第一，搞垮左派领导人就是要利用华国锋这个第一副主席的牌子，抓起来仅仅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如何稳定全国；第二，采取非法手段一举逮捕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历史责任，还得由华国锋来承担；第三，不担任中央主席就可以避免承担争权夺利的罪名。所以由他提出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得到了新贵派们的一致拥护。

四项决议是抓举旗帜。这样可以避免承担反对毛泽东主席的罪名。

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这就预示着全国范围内的镇压、打击、清理革命左派的运动即将展开。

2010年10月7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第一章第六节 稳定局势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凌晨，中央秘书局打电话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上午 8 时 3 0 分，华国锋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五号楼，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了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到京，入住京西宾馆。

当天中央领导人没有找马天水来玉泉山五号楼谈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至八日晨，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黄振华、吴桂贤等，接见了山东、湖北、江苏、上海和南京、济南、武汉部队的领导人，华国锋讲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上午，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被召来京，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他们表示衷心拥护，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会上，着重同他们研究了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

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马天水听后，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马天水的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批判。周纯麟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司令员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

一九七六年十月某日，马、徐、王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

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的各项重大决定，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

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根据上海形势，中央政治局及时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上海工作，同去的成员有中央小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等。

1976年10月25日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别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1977年1月19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组成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上海新市委领导班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至十四日，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成立了以华国锋为领导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至十四日，华的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

华国锋在讲话中列举了许多所谓的事实，说“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不仅把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拉扯进去，而且许多问题都是歪曲事实。后来经过一些笔杆子的炮制，才凑成了三批材料。

陈永贵在华国锋讲话时插话：反法权，她的法权最大，一个专列七个车厢。那天主席病重，她坐车回来，从山西到石家庄，打了七个小时的扑克，谈笑风生。郭风莲同志要扶她上车，她说：你没有资格扶我，你是听邓小平的。

陈锡联在华国锋讲话时插话：《光明日报》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讲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是谁是很清楚的。四人帮砸不烂不行，筹备四届人大不是主席指示也成问题。

李先念在华国锋讲话时插话：共产党员给主席去信，反映一些问题是对的，象新华社朱穆之等三人给主席写信，反映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期间的讲话和问题，批判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朱穆之是中央委员，追悼会把朱的名字也划掉了。

叶剑英在讲话中，把所谓的“四人帮”说成是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次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掉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我们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但应该看到，这还是初步的胜利。今后除了从组织上做好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特别是思想战线各部门，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打招呼的重点是解决上海市的问题。开始马天水听后，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后来也只能顺水推舟。王秀珍在会上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许世友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各种人物在这些会上都争相表演，应该把他们记录在案。

2010年10月12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第一章第七节 揭批的三大战役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目 录

第一部份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

一、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2)

1. 在“四人帮”策划下，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反党讲话 (3)

2. 王洪文、江青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 (4)

3. 刘真、刘玉庭同志的揭发 (5)

4. 王洪文亲笔写的承认“一·二四”、“一·二五”大会是背着毛主席召开的检讨提纲 (7)

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继续进行篡党篡军的阴谋活动	(8)
1. 江青、姚文元授意写文章攻击周恩来总理	(8)
2. 张春桥、江青等阴谋整军队, “放火”, 夺权	
(9)	
三、“四人帮”反党乱军, 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处理党政军重大问题	(10)
四、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 “四人帮”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6)
1. “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 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 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16)
2. 王洪文亲笔写的一个没有送出的检讨稿	(18)
3. 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写信给毛主席, 公然伸手要官要权, 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20)
4. 江青再一次向毛主席伸手要官, 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21)
5. 江青的反动诗	(22)
五、“四人帮”对待毛主席的批评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态度	
(23)	
1. 王洪文给江青的亲笔信	(23)
2. 张春桥亲笔写的自我表白	(24)
3. 江青欺骗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亲笔信节录	(25)
六、“四人帮”的合影	(27)
第二部份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 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 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	
一、张春桥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罪证	(30)
二、江青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罪证	(31)
三、姚文元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罪证	(32)
四、“四人帮”利用报刊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 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33)

- 五、“四人帮”扣压、对抗毛主席的批示
(34)
- 第三部份 “四人帮” 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图取而代之，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罪证
- 一、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为上台主持中央工作私自准备的报告稿 (36)
- 二、张春桥亲笔写的阴谋篡党夺权的自供状《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有感》(39)
- 三、“四人帮”授意上海市委批判中央领导同志
(41)
- 四、“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在批邓问题上另搞一套.....(45)
- 五、“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48)
- 六、迟群、谢静宜的反党讲话(52)
- 七、张铁生的反党讲话 (54)
- 八、“四人帮”策动上海黄涛、辽宁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发难，向党中央猖狂进攻 (56)
1. 黄涛、杨春甫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 (57)
2. “四人帮”幕后操纵会议、向党进攻的罪证选印
(59)
3. 上海市工交组李家骝、范崇星同志的揭发 (64)
- 九、“四人帮”私自搜集和整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66)
1. 王洪文擅自调阅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工办等单位的档案材料 ... (66)
2. “四人帮”私整的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
(67)
3. “四人帮”利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搜集的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69)
- 十、“四人帮”利用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72)

十一、“四人帮”拟定的全面夺取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大权的狂妄计划……	
(74)	
第四部份 毛主席重病期间和逝世以后,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 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证	
一、“四人帮”对毛主席毫无感情, 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	
(77)	
1. 在毛主席病危时江青外出游山玩水, 恣意取乐 ……………	(77)
2. 毛主席刚逝世江青外出游说放毒, 吃喝玩乐 ……………	(79)
3. 周金铭同志的揭发 ……………	(80)
4.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王洪文钓鱼、打鸟取乐 ……………	(81)
5. 医务人员对江青、张春桥迫害毛主席的揭发 ……………	(82)
6. 在毛主席病中, 江青向毛主席伸手要钱 ……………	(85)
7. 在毛主席逝世前五个多小时江青窜到新华印刷厂搞阴谋 ……………	(88)
二、毛主席刚逝世, “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 ……………	(90)
三、江青盗骗毛主席的文件 ……………	(92)
四、江青为实现她当党中央主席的野心大造舆论 ……………	(95)
1. 江青冒充毛主席、党中央的代表, 招摇撞骗, 捞取政治资本 ……………	(95)
2. “四人帮”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给江青写“效忠信” ……………	(96)
3. 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的反动信 ……………	(97)
五、王洪文私拍的准备上台的“标准像” ……………	
(98)	
六、“四人帮”制造谣言, 刮阴风, 烧阴火, 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	(99)
1. 王洪文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在平谷县的反党讲话节录 ……………	(99)
2. 江青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在清华大学的反党讲话节录 ……………	(100)
3. 迟群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清华大学的反党讲话节录 ……………	(100)
4. 张铁生的反党讲话节录 ……………	(101)

七、“四人帮”阴谋镇压和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102)

八、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造舆论 (104)

1. 王洪文、江青亲笔记录的毛主席指示(104)

2. 姚文元将他们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塞进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 (105)

3. “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106)

4. 光明日报刊登的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07)

九、“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08)

1. 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是“四人帮”长期苦心经营，早就预谋策划的产物.....(108)

2. 徐景贤的两个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 (111)

3. “四人帮”突击发放武器弹药、调集物资
(112)

4. 准备武装暴乱使用的电台、通报暗语、呼频表 (113)

5. 反革命武装暴乱兵力部署图 (114)

6. 朱永嘉关于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交代 (115)

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

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

目录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历史罪证

一、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 (2)

1. 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充当特务..... (2)

2. 张春桥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	(5)
3. 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到上海, 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指使下, 从事文化特务活动·····	(10)
4. 张春桥隐瞒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混进革命队伍·····	(18)
5. 张春桥混入革命队伍后, 长期隐瞒他的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社会关系	(27)
二、张春桥伪造入党历史·····	(28)
三、张春桥隐瞒官僚、地主家庭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	(30)
1. 张春桥长期隐瞒官僚、地主家庭·····	(30)
2. 张春桥长期包庇他的反动父亲张开益·····	(33)
四、张春桥包庇他老婆、叛徒特务文静·····	(35)
1. 文静是叛徒、日本特务·····	(35)
2. 张春桥长期隐瞒、包庇文静的叛徒特务问题·····	(37)
3.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叛徒特务文静	(41)
叛徒江青的历史罪证	
一、江青一九三四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叛变·····	(46)
二、江青与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关系密切·····	(53)
三、江青积极从事拥蒋活动, 为国民党效劳·····	(55)
四、江青与徐明清长期互相包庇她们的自首叛变问题·····	(58)
五、江青包庇她哥哥、特务反革命分子李干卿·····	(60)
六、江青隐瞒地主家庭·····	(65)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罪证	
一、姚文元长期包庇他父亲、叛徒特务姚蓬子·····	(69)
1. 姚蓬子是个有严重罪行的叛徒、特务分子·····	(69)
2. 姚文元长期隐瞒、包庇姚蓬子的反革命历史·····	(72)
3. 姚文元包庇姚蓬子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勾结·····	(75)
4. 姚文元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包庇叛徒特务姚蓬子·····	(76)
二、姚文元是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乾儿子·····	(78)
三、姚文元隐瞒地主家庭·····	(80)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	

- 一、王洪文为自己大搞树碑立传活动…………… (84)
- 二、王洪文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 (87)
- “四人帮”相互包庇，大量销毁他们反动历史材料，残酷迫害知情人的罪证
- 一、姚文元密藏有关张春桥和文静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 (95)
- 二、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等人残酷迫害揭发他历史问题的革命群众…………… (96)
- 三、王洪文、张春桥收缴、密藏江青的历史材料…………… (97)
- 四、江青勾结林彪叶群吴法宪等查抄、销毁有关她政治历史材料…………… (99)
- 五、江青查找审讯过她的国民党特务赵耀珊（黑大汉）的下落，妄图掩盖她自首叛变的罪恶历史…………… (103)
- 六、江青为掩盖她的丑恶历史，勾结林彪、陈伯达、叶群、张春桥等残酷迫害知情人…………… (104)
- 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其党羽收缴、销毁叛徒特务姚蓬子的材料，包庇姚文元…………… (110)
- 1.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收缴总政保存的有关叛徒特务姚蓬子的材料… (110)
- 2. 张春桥和“四人帮”的党羽在上海收缴、销毁有关叛徒特务姚蓬子的罪行材料…………… (112)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

现在，应当以华国锋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同志的闭幕词为指导，结合传达“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目 录

第一部份“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四人帮”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一) 张春桥鼓吹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二)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鼓吹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二、“四人帮”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

(一) 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二) 公安部尹肇之等同志的揭发

(三) “四人帮”指使其在公安部的党羽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

(四) 施义之在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议期间的反党讲话

(五) “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背着华国锋同志炮制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

(六)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对中央和地方党委负责同志搞反革命侦察

三、“四人帮”煽动揪“军内走资派”，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

(一) 江青、王力、关锋等人伙同林彪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

(二) 江青组织“炮队”，“放火烧荒”，反军乱军

(三)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军乱军的部份罪证材料

(四) 徐海涛反军乱军的发言提纲

(五) 陈亚丁大肆鼓吹写揪“军内走资派”的文艺作品

(六) 徐景贤、王秀珍、丁盛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

(七) “四人帮”力图把他们控制的民兵组织，变为所谓“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八) 张铁生污蔑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

四、“四人帮”操纵舆论工具，推行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大肆煽动揪所谓“走资派”

(一) “四人帮”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二) “四人帮”恶毒影射攻击华主席

(三) “四人帮”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

五、“四人帮”策划炮制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

(一)“四人帮”与其党羽于会泳等人策划炮制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

(二)“四人帮”炮制《反击》等反动电影的有关材料

(三)“四人帮”在“写与走资派斗争”问题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在“四人帮”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反动号召下，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反击》式的反动作品

六，“四人帮”力图把他们控制的学校，变成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工具

(一)北京大学党委的揭发

(二)清华大学党委的揭发

(三)“四人帮”鼓吹把学校办成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专业”

(四)“四人帮”打着“开门办学”等旗号，煽风点火，反党乱军

(五)迟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反党讲话记录

(节录)

七，“四人帮”煽动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所谓“走资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一)王洪文在经济建设部门煽动揪所谓“走资派”

(二)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反动日记

(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指使其党羽金祖敏收集黑“材料”，攻击工业交通各部

(四)江青指使谢静宜、迟群收集整理外贸系统的“材料”，诬陷邓小平同志和外贸部门

(五)“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七机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

(六)“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冶金部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篡夺领导权

(七)“四人帮”及其党羽在铁路部门层层揪所谓“还乡团”、“走资派”，篡夺领导权

(八)“四人帮”及其党羽层层揪所谓“走资派”，严重破坏农业生产

(九) “四人帮”及其党羽在科技部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严重破坏科技事业

八、“四人帮”妄图篡改毛主席规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路线

(一) 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

(二) 反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三) 依靠新老反革命分子，推行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第二部份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对抗毛主席对王张江姚搞“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批评

(一) 毛主席对王、张、江、姚的批评

(二) “四人帮”抗拒毛主席、党中央批评的有关材料

二、对抗毛主席关于缺少文艺作品，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

(一) 毛主席关于缺少文艺作品，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

(二) “四人帮”对抗毛主席批评的罪证

三、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一) 江青同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的来往电话记录

(二) 江青、姚文元在陈亚丁等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给江青信上的批语

(三) 江青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给姚文元的电话记录

(四) 于会泳、浩亮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给江青的报告和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批语

(五)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记录（节录）

(六)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份人员的谈话记录（节录）

(七) 刘庆棠的揭发交代

(八) 光明日报社的揭发

四、攻击毛主席肯定的电影《园丁之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一) “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罪证

(二) 湖南省委的反击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三) “四人帮”的反扑

(四) 张平化同志的揭发

(五)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党委的揭发

五、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公开放映的电影《海霞》

(一) 于会泳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江青的电话记录

(二) 江青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予会泳的电话记录

(三) 于会泳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给江青的电话记录（节录）

(四)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记录（节录）

(五) 于会泳等人炮制的攻击《海霞》的文章和姚文元的批注

(六) 于会泳的交代

六、蓄意歪曲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大肆宣扬“宋江架空晁盖”，污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一) 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评《水浒》的指示全文

(二) “四人帮”歪曲毛主席关于评《水浒》指示的有关材料

七、攻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一) 新华社的揭发

(二) 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六年五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三) 两校“大批判组”编辑的《邓小平言论摘编（初编）》（节录）

(四) 《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节录）

(五) 《文汇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发表的《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节录）

八、攻击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一)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二) 大寨大队郭风莲等同志的揭发

(三)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记录（节录）

(四) 姚文元审定修改的梁效、任明的一篇反党文章（节录）

(五) 姚文元在《论总纲》一文旁所作的反动批语

- (六) 上海机床厂董焕章等同志的揭发
- (七) 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谈话记录（节录）
- (八) 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揭发
- (九) 上海铁路局刘白涛同志的揭发

九、攻击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 (一)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给《红旗》杂志社的电话记录
- (二) 姚文元砍掉华国锋同志报告的一九七五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目录原稿
- (三) 《红旗》杂志社林兆木的揭发
- (四) 姚文元删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普及大寨县》
- (五) 人民日报社李克林同志的揭发
- (六) 上海市农业局董家邦同志的揭发
- (七) 徐景贤的揭发交代

十、反对毛主席关于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船舶的指示

- (一) 关于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的问题
- (二) “四人帮”污蔑买船是“假洋鬼子”
- (三) 关于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问题

十一、反对毛主席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攻击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 (一)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在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文上所作的反动批注的影印件
- (二)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谈话记录（节录）的影印件
- (三)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 (四) 《文汇报》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 (五) 《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 (六) 广播事业局的揭发
- (七)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

十二，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

（一）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二）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

（三）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

（四）江青出卖党和国家重要机密，送给美国人维特克的军事地图等材料的影印件

（五）国外出版发行的维特克写的《江青》的影印件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共产党中央作出分三个战役揭批“四人帮”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个战役，着重从政治上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歪曲割裂。下面只举两例：

第一部份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证。其中说：

“四、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四人帮”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向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请问：在酝酿期间，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有自己的意见，经过商量以后，派了一个代表向党中央主席报告，这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疯狂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第二部份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

一、“四人帮”利用报刊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张春桥提出经验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这个论断，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提出来的。张春桥在讲话中谈了自己的体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并直接向毛主席“请教”。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这怎么就成了““四人帮”却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们这样搞的政治目的，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知的下面这一段话：“证明“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证明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

请问：经过三十四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段话究竟是在为什么人画像？

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这就是所谓第二个战役，着重从组织上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通知明确地作了结论：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

这份材料列举了许多所谓的罪证，三十四年后的今天，人们读起来只能给它四个字的评语：捕风捉影。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原来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他根本从来就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过，何来“叛变”呢？又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根据何在呢？

根据之一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原国民党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在一份证明材料中说：“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份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但是，南京市军管会一九五二年对徐伯璞的判刑决定书中只说：徐伯璞“一九三三年春在正谊中学时，将领导学运的郑某等六人开除学籍。同年三月廿日勾结伪法官逮捕领导学运的程路汉非刑拷打并判无期徒刑，后程死狱中。”并没有说这件事就是张春桥告密的。那么，按照政变后为刘少奇等人平反决定的思维模式，徐伯璞在一九七七年写的证明材料，也可能是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下编造出来的，不足为凭。

根据之二就是：张春桥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摹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问题在于：“华蒂社”本身能否定为“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虽然“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主编的李树慈是复兴社分子，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并且，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的《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华蒂社”本身就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马吉峰，也是在“华蒂”快垮台时，才知道“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

请问：张春桥参加了这个“编文艺刊物”的组织，就能是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吗？

根据之三是：“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

崔万秋是复兴社的特务，并主编《大晚报》的文艺副刊《火炬》。它是以中左面貌出现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用笔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评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回答了张春桥的批评。张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了信。鲁迅逝世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大晚报》和《热风》上发表了《鲁迅先生断片》、《速写红萝卜》等文章。这些情况并不能证明，张春桥是复兴社的特务，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是文化特务活动。

根据之四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这件事说明：张春桥当时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与共产党组织也曾有过某种接触和联系。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他没有住在自己家里，而是住在他父亲的同事复兴社特务分子赵福成的家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去延安。没有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潜入延安的。

关于江青的自首叛变问题，文件说：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可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实际上，这也就间接地证明，所谓江青“自首叛变”问题，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栽赃陷害。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这个所谓第三个战役，就是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

《材料之三》的主题是，集中揭露“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罪恶活动。这个材料共分两部份。第一部份，集中揭露“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二部份，选择党的十大前后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揭露“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关于第一部份，文件指出：“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造的假命题。查遍文件列举的所有证词，都找不到任何左派领导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江青说过：“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是民主派”。这也不等于说老干部都是或就是民主派呀！“民主派发展成走资派是必然规律”。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仍然坚持民主派的立场就必然发展成为走资派，这也不等于说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呀！

至于文件列举的其他左派领导人说的反对走资派的话作为证据，正好暴露了文件的作者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本质。

2010年10月13日初稿

2012年3月15日修改

第一章第八节 清理帮派体系骨干分子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于会泳嗅到“四人帮”“出了事”的征兆后，打电话，到处探风摸底。

八日早，一个骨干给他们报告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于会泳等人抱怨“四人帮”没有抓到枪杆子，“动手晚了”。于会泳说：“有枪还能对付一下。”

于会泳和另外两个人进行了七、八个小时的密商，又和第二把手单独密谈，策划应变。他们说“我党多灾多难，还会有反复”，说“历史上只有叛军而无叛郡”。于会泳还以“我们都病了”的暗语，向上海报警。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下午三点，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朱永嘉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

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七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

另外王秀珍还要金祖敏的秘书缪文进（金）去北京打听消息，并约定暗号，如果情况严重，就说心肌梗死，同时王秀珍还对公安、民兵作了部署，准备反革命的武装暴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晚上，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

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

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两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朱永嘉去准备。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

一、现在开始作武装起义的准备；

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

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

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以后，朱永嘉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文化部艺术局召开千人大会，在会上高喊“向江青致敬”。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晚，在上海的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召集部份人员开会

这时，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是出事了，于是又重新提出八日晚上那个方案，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出动民兵保护报社电台，封锁交通要道，港口只要沉一条船就能把航道堵住，机场去几辆大卡车，便能封住跑道，还问了全市煤、电、粮的情况。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国京剧院的骨干举行会议，认为逮捕四位领导人是“鸿门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湖北省委向省直機關傳達“四人幫”被抓

胡厚民私下說：“我作好了坐牢殺頭的思想準備。斷定這是一次右派政變。”“同志們準備迎接最艱苦的風浪，已經是考驗同志們的時候了。”“你們以後不要亂跑了，特別是不要到上面頭頭這裡來，把毛主席給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憶一下，自己領會就行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谢保安听到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的消息

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

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云南省黄兆其得知逮捕四个领导人的消息，十三日、十六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

黄兆其认为这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

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

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 X X X 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志“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消息后，认为是“右派政变”，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动向和行动计划。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起义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迅速返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人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人，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

“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起义的动向，

黄兆其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意见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十一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十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军用手榴弹四枚。十七日、十九日，何立宽又要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十月十五日下午，刘光兴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认为逮捕“四人帮”是“右派政变”。

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

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十六日下午柯平等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

十七、十八日，刘光兴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

十月十八日，晚，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行动计划。

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二千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还由涂晓雷等写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旬，‘工農兵’頭頭研究決定，對造反派的主要頭頭要抓起來辦學習班”，“交代問題”

“武昌（漢陽）以武重、武鍋、武船、漢軋的同志為主”，將“夏邦銀、朱洪（鴻）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勛等人抓起來”。“其目的有三點：1. 掌握‘四人幫’插手湖北、武漢的情況和（有）牽聯（連）的人和事；2. 三鋼頭頭打、砸、搶、抓、抄的罪惡行為；3. 湖北、武漢個別領導幹部與‘四人幫’的牽聯（連）和支造的事實真相”。

（汪揚（長江儀表廠工人，百萬雄師 Z 口區宣傳部副部長，1977 年提拔為武漢復印機總廠副廠長，後調市經委並提為正處級）披露：《波瀾歲月》179 頁至 183 頁，自費印刷，2003 年）

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萬雄師”極少數骨干分子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眾組織“工農兵”非法關押一個多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胡厚民被關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 45 號看守所。

一同關押的还有楊道遠、夏邦銀、朱鴻霞。原來因“北決揚”案件被抓的人也都關關在這裡。

一九七六年十月，谢保安挨整的经过

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一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

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

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复杂无比。

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先生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叁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

等到叁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播，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项目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查，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蘄，到处批斗。

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帶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

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我关在一个 12 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

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 287 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先生级别蛮高，一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 9 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一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一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付廉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 224。

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 9 个月，很容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荇，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10 月 27 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

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 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夏、朱、胡、张 4 人逮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马天水的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王秀珍的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马天水《我的补充揭发交代》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揭批查运动

‘四人帮’被捕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头头王知常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甚至企图搞武装活动。这些头头被软禁起来。1976 年 10 月中旬，朱永嘉带领一个代表团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回国后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1976 年底到 1979 年，写作组受到两年多的清查。第一批是车文仪来清查，他是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兼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工作组长。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据说是因为太‘右倾’，所以就换了工作组。新来的负责人是王素之，《解放军报》调来的，他接替组长，后来，王素之走了以后，又换成了上海市委工作组，后来是姜丕之做组长，姜丕之本来是一位老干部，原来是哲学组的资深成员，但姜也被认为是‘右倾’，又被换掉了，最后是夏其言，他来了之后就一直负责清查，

直到工作结束。当时冯岗是他的副手，他们两人一起负责清查工作，一直到最后做结论。

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 89 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

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

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 16 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的时候，王素之还是动员大家批判、揭发、交待自己的问题。

夏其言和冯岗来了之后，工作做得很细致，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一个一个通过。当时的政策是分三档，第一档是逮捕，第二档是三种人，作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第三档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犯有第三种属于内控对象，出国就不可能。

按两类矛盾来分，像朱、肖、王被视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头目，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如朱永嘉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了 5 年，1982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后因身体不好，于 1988 年被提前释放。胡锡涛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1973 年 4 月调入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作为“三种人”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大量的成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揭发朱、肖、王的问题，一方面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开始搞‘清查’运动的时候，除了朱、肖、王(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当时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是核心，被抓起来了之外，其余的人，有些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有些人作为一般政治错误，有些人不作政治错误处理。

在文艺组，当时组长陈冀德、姚汉荣、非党的还有刘景清、高义龙。给徐缉熙、余秋雨等等的结论、就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还有两个是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他们当时是莫名其妙被调进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清楚了就没事，他们在运动中是被清查组依靠的对象。

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清查结束以后，余秋雨回到学校，身上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虽然不予追究其他责任，也不限制使用，但学校规定，有类似经历的人两年内不准给学生上课。没过多久，一场复查又开始了。

到了八十年代初，新市委成立以后，认为当时匆匆忙忙地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清查不够细致，有些人处理得太轻，有一些做坏事的人漏网。市委召开了会议，对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进行复查。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

一九七六年十月，安徽揭批查运动

中央认为，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运动冷冷清清。1977年6月，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派顾卓新、赵守一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放手发动，排除干扰，清查处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7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结合揭批查部署全省的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

至1982年，全省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清理出“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540人，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调整。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

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

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毛泽东汇给的 300 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 210 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白云“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 1700 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 10 多里去探望。2004 年 2 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消息中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外电传闻：福建出现“四人帮”打游击的歌谣和标语在福建占据了一部分过去内战时代的游击区据点，要立组党中央，自称工农解放军，人数不详，大批人民解放军奉命深入山区、海岛和渔村扫荡，福建各地军队调动频繁。

福建游击区的歌谣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向前进，
反对翻案右倾！
工农兵！
联合起来向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打倒邓小平！
打倒邓大平！

打倒华大平！

打倒叶大平！

福建武装游击区有以下一些标语：

打倒新兴走资派！

打倒大走资派！

和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争到底！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走资当权派拉下马！

福建的工农解放军发表战讯说：

甘心为资产阶级送死的敌人，在福建，至少有五个高级反动军事头头为工农解放军击毙。

工农解放军号召学校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号召“工农不打工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工农解放军联合起来，打倒反动的法西斯政权”。

一份油印品说：叶剑英两手沾满血腥，扼杀中国革命，屠杀中国人民，叶剑英是老牌特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广东中山县开展揭批查运动

自 1977 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县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了 2500 多场，参加人数达 403200 人次；开辟批判专栏 2300 多个，写了批判文章 325400 多篇。

全县从 1977 年 5 月 16 日开始，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展开了清查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从 1977 年 5 月 16 日至 1978 年终），清查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章含之就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所写的交待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武汉市打着“工农兵”（改头换面的百万雄师）旗号的一些人到处抓人，游斗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沈复礼、王锦铭等人被抓去，五花大绑地站在敞篷汽车上，颈项上挂着“四人帮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游街。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不愿受辱，由妻子带着到她的亲戚、朋友家，躲藏，暂避风头。在逃难期间，吴焱金什么人也不见，什么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只是埋头看书、倒头睡觉而已。尽量不在一个地方呆长了。一共

逃亡 40 余天，给掩护他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有位同事家的女儿因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焱金”，并拒绝主动揭发交待，在“说清楚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抓纲治国”运动中被开除团籍。

“我于 1977 年元月 5 日到了市革委会，立即进了市革委会专门为我举办的“学习班”。所谓学习班，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是强迫限制被办学习班对象人身自由的监狱，被办学习班的对象如果因文革问题判刑以后可以折抵刑期。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它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我的学习班场地就设在我和谢滋群的办公室里，这两个办公室分别有 100 多平方，这是原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领事馆的红瓦斜顶三层楼房，外形类似现存的武汉市外办的楼房。文革后被拆掉，重建了现在的市长办公楼。学习班由某处长主持，我已记不得他姓甚名谁，副手是城建委干部吴青华，因此人整我最凶，故至今未忘其名。还有许多监督看管我的人则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学习班刚开始是走读，白天交待问题，还可以每天晚上回家。当时，我妻子胡瑞玲因大量吐血，正在医院住院，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癌。不久，学习班改成隔离审查，我不仅不能回家，也不能会见亲友，我妻子的病情确诊是大叶性肺炎，已经排除了先前怀疑的肺癌，但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我并不知道。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 40 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联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 40 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他们多是妻子的亲朋好友，我无端出卖他们我还是个人吗？今后还能面对社会和他们吗？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所有和我有牵连的人都会立即失去自由，和我一样被关押

起来，被迫交代和我接触的点点滴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大，甚至超过我在文革中干过的每一件事，这是打死我也不能说出去的。于是，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 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 年 5 月 22 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恋，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据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就完了。

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不得已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出新招，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这期间，我告诉妻子自杀的原委，妻子埋怨我，说这种事即使说了也没什么，为此牺牲自己不值得。后来我交待了避难四十天的经过情况，他们派人详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上纲上线的事，便再也不问我外出避难 40 天的事了。反过来要我交待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外出避难 40 天的事交待了后，虽然对当初保护过我的人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但我至今仍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一顶到底呢？在医院里，专案组的人还经常用“你想不想治病”来对我进行威胁，但我已经到了这种状况还怕什么

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全力进行认真治疗，使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严重后遗症，至今头疼、腰疼、膀胱疼，不能正常大、小便，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病房当时有位姓喻的女医生是对我十分积极治疗的，但没有几天就不让这位医生在病房出现了。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一直进行到大约 11 月份，我终于有一天拄着双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医院转悠活动一下。我看到整个医院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打倒吴焱金！”“吴焱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搞笑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也不少。

我知道医院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但我病得如此严重又能送到哪里去呢？这一天很快来到了。1977 年 11 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 28 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更可笑的是夏菊花也上台控诉我，这完全是专案组故意搞的。因为我在学习班说过：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夏菊花说成百万雄师头头，到处抓她去批斗，我很反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杂技演员罢了，不能因为王任重的文章说她是“一朵红花”就整她。有一天工造铁军的小青年居然自作主张将夏菊花抓来关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我闻讯后立即去和夏菊花谈了话，并当即派人送她回去，她当时很感激。后来她和我街坊、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在部队当干部的儿子结婚，我路过她家，她经常在门口和我热情地谈话。今天专案组特地安排夏菊花上台控诉我，显然是想用事实来反驳我的说法。这些篡改历史的人也是太可笑了。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另一说，1977 年 1 月底），江西省某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

在开评审小组会时，“犯人”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同文中也对邓小平“颇有不敬”。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这样，就在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政治活动的骨干分子。这次清查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基本结束。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镇压革命左派的运动，公布的材料极少，这里收集到的也仅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部分。

据 1981 年 1 月 5 日，河南省委书记胡立教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 1700 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 5 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

1983 年 11 月，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

“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 4248 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已处理 4202 名，其中判刑 51 人，受各种处分 2025 名。(开除党籍 323 人，留党察看 493 人，撤销职务 452 人，警告、严重警告 347 人，开除公职 20 人，开除留用 140 人，其它处分 250 人)，免于处分的 2020 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 107 人。”“突击发展的党员，有 10 万 6 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 1967 年到 1976 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 13 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 80%。

二 00 六年九月九日，湖北的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 XXX 的信中指出：湖北的当权派“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 96 个月，受害人 29127 名。”

更多的情况尚待各地揭露。

2010 年 10 月 1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5 日修改

第五篇 文化大革命被结束

第二章第一节 召开十一大 邓小平复出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去李先念住处谈话纪要

李：有现成德才兼备的，还是把邓老搬出来吧，这个人我和叶帅是了解的，心直口快，有心机，没有野心，忠心有余，完全可以胜任的，四人帮整得他够呛，明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偏说是大野心家，阴谋家，什么最大的走资派，直到现在他恐怕还有气，总理死后，差点气死他呢！

叶：他和我，先念差不多，气可大呢？

华：邓是很能干的老同志，差不多都对我讲此事，邓颖超同志有次对我说：还准备批邓吗？我看这个人靠得住，可以用。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去医院看望刘伯承时的谈话

华主席去看刘伯承时，邓小平也去看刘伯承，华一进屋，邓对刘老说：“华主席看你来了。”

华主席坐下后，邓说：“华主席，我该走了！”

华主席说：“邓老，你不要着急嘛，咱们和刘老在一起谈谈嘛！我还能赶你吗？”

刘老说：“对，对，对！现在四人帮的时代消失了，我们还要团结起来打仗嘛！我 82 岁的人了，这几年来，我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痛快，要是陈老师、朱老师、贺老师今天也在，那也会高兴得扭秧歌呢！”

邓小平说：“就连我这个老走资派也是欢迎的，高兴的，支持的”。

华主席笑着说：“邓老话差点，走资派是四人帮搞的，我和毛主席事后才知道，有缺点错误，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四人帮以中央办公厅名义篡改毛主席指示，想搞他们那一套，把你搞成这个样子，连总理也让他们气死了，还在邓颖超身上下功夫，逼着她要周总理的材料，邓也差点被他们气死了，邓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这样下去要气死好多人，我告诉她要顶住，坚强的活下去，我就不信，这股风还能把地球刮毁，人民也不会让他们安宁的。”

华主席又说：“刘老、邓老，你们还有经验的，你们对今后有什么看法？”

邓老说：“首先抓农，轻为重点，重工业也要抓的，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我还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的那几句话，农民吃不饱肚子，粮食是生产不出来的，实现农业机械化也是空的，只有这样，才能站住脚，才能巩固政权。”

刘老又说：“有一条要求，我今年是 82 岁的人，身体又不佳，早晚是要死的人了，我死后，要邓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我什么也不要，我和邓小平共事快 50 年了，我是了解他的，他这个人有真心，没有坏心，有忠心，无野心，如果不是小平主持这个会，那我也不用八宝山，叫孩子们把我拉到野地随便丢掉就行了。”

华主席看看邓小平笑了笑。

邓说：“刘老不要这么说，华主席那么忙，不要再添麻烦了，我是犯了错误的人，今后还要批邓嘛！”

华主席笑着说：“邓老气还没有消净呢。”又说：“这个要求叫政治局讨论。”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王震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讲话

我们拥护华主席，他是我们英明的领袖，我很同意叶付主席对他的评价。华主席是英明的，叶付主席也是英明的。华主席有丰富的经验。“台阶论”是邓小平的提法，我赞成“台阶论”，你们赞成吗？邓小平如果不在地方工作，也是一位老帅。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日，李先念陈云谭震林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李先念副总理说：

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陈云副委员长（12月2日在小组会上发言）说：

讲三点意见：一、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件事的意义重大，只有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和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的地位这两件事可以相比。二、要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还要做很多工作，做长期工作。这是因为我国有八亿人口，要使人人明白是不容易的事。有些人思想上不明白，江青是主席的夫人，她怎么会反对主席呢？因此要很好地揭发，很好地宣传。三、人大常委会有不少年轻同志。刚才许多同志都讲自己受了“四人帮”的影响，犯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谭震林副委员长（12月2日在小组会上发言）说：

为什么主席夫人会反对主席呢？其实，主席早就和她决裂，同她分开了，毛主席看了江青同威克特夫人的谈话以后，就写了分道扬镳的指示。当时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也患了重病，没有实行。开始，邓小平是批了“四人帮”的。所以，江青说她在政治局挨了斗。但是碰到了困难，“四人帮”不承认错误，邓小平就没有坚持斗争，说“算了吧”！主席批评邓小平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指他没有坚持同“四人帮”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就决定了让华国锋同志作接班

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十月六日解决了“四人帮”。告诉同志们，如果迟一下也不行。他们已计划好十月七日在长沙举行百万人大会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华国锋同志，接着就在上海响应，然后“四人帮”在北京夺权。然而华国锋同志机敏地，果断地采取措施，不费一枪一炮，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阴谋。当时的情况真是千钧一发呀，事实充分证明了华国锋同志确实是我党的英明领袖。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通知（概要）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王震对科学院吴有训郁之等人的谈话

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就要狠狠地批，金主席访华时，是毛主席让小平同志接待的，小平同志和他举行了会谈，又陪金主席访问了南京，金主席对此很感谢，张春桥访朝时，金主席为此几次提到小平同志，让他回来向小平同志问候，可是张对此拒不答礼。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取消 1976 年 2 月 2 日作出的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决定，决定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负责主持，陈锡联协助。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一九七七年三月某日，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1975 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摘要

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 （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 （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的通知

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好的，同志们看了这两封信会高兴的。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邓小平与方毅李昌的谈话

《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按勉强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四人帮”恶毒诬蔑说是“三株大毒草”之一，邓力群那篇文章写得不错，是个鲜花。

中国在清朝时期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闭关自守。同江青吵架是从“风庆轮”吵起来的。吵得很厉害。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领导人谈科学教育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邓小平接见邓力群王震时的讲话

最近有两个同志来看我（汪东兴、李鑫），我讲两个“凡是”不行，按两个“凡是”就说不通，如何为我翻案，也说不通。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等问题，主席在这个地点、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另外的时间，另外的条件下不行么。

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只要自己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克思都犯错误，不然草稿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证明原来的不那么准确。这就证明马克思自己也犯过错误，不是都对。一个人说的话，做的事都绝对正确，没有那么回事，主席对我说：“你这个人是三七开，一个人一辈子能三七开就不错了。”又说自己“死了以后，后人能做三七开的结论就很满意了。”这个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是一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象毛主席那样说。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我对那两个同志说：我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过去说高举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学习、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七五年我曾对罗瑞卿说：过去林彪抓“老三篇”，要批评他，那是对毛泽东思想庸俗论，那是没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来看。

工作问题，我出来工作是定了，总之，继续当大官。至于分什么工作？军队是要管的，有人要我继续管外事，我不想干了，太累。当然重要外事活动来访还要参加一下会谈。现在我有兴趣抓一下科技教育。

我这个人有话就说，在毛主席面前也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身上也长了几根刺，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以后还要说，不管听不听。

《论总纲》我确未看过，我看很尖锐，不是毒草，是香花。

（《提纲》）科学院的，不是过头了，而是不够，现在看来有些东西要写进去。

《二十条》我过去未看过。三篇东西都有缺点，但香花不是无缺点的。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贰、 本节简论

十月政变以后，邓小平问题就成了焦点。对这个问题，元老派与新贵派是有分歧的。

邓小平本来是元老派的一面旗帜，批邓以后，这面旗帜被拔掉了。地下的一切政变活动只能以叶剑英为中心来进行。在政变活动中，他们虽然不敢也不需要提出反对批邓的要求，但实际上只要政变一旦得手，他们就要把邓小平抬出来。

新贵派为了给自己涂上保护色，一定要继续打起批邓的旗号，划清与右派的界限，同时他们也担心邓小平一旦重新上台，自己的地位是否能坐得稳。

十月六日政变得手以后，十月十日邓小平就写信向华国锋表示支持，甚至说出“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样迷惑人的话来。对照他在私下与人说的话，完全是两副嘴脸。

十月二十日，李先念就公开向华国锋提出“还是把邓老搬出来吧”！叶剑英立刻附和。此前，还有邓颖超就向华国锋提出过：不要继续批邓，这个人可以用。此时，华国锋还不敢也不肯明确表态，而是虚与委蛇。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去医院看望刘伯承。你说巧不巧，恰好这一天邓小平也去看望刘伯承，而且早到了。

刘伯承说：“现在四人帮的时代消失了，我们还要团结起来打仗嘛！”

邓小平说：“就连我这个老走资派也是欢迎的，高兴的，支持的”。这实际上就是将了华国锋一军，你华国锋不是说要继续批邓吗？

华国锋说：“走资派是四人帮搞的。有缺点错误，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四人帮以中央办公厅名义篡改毛主席指示，想搞他们那一套，把你搞成这个样子。”华的这一表态，既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又把责任推到了左派领导人的身上，实际上向元老派表示了让步。

刘伯承趁机提出：“我死后，要邓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是小平主持这个会，那我也不用八宝山，叫孩子们把我拉到野地随便丢掉就行了。”邓小平如果不重新上台，怎么能主持他的追悼会呢？这实际上又将了华国锋一军！

华国锋回答说：“这个要求叫政治局讨论。”这就承诺了在政治局讨论邓复职的问题，实际上向元老派表示了再让步。

但是新贵派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仍然是顾虑重重，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

从以上种种迹象说明，元老派的十月政变的目标是两项：一是逮捕左派领导人，二是拥戴邓小平复出。他们在逮捕左派领导人之后，就有计划、有步骤、相互配合的发动了拥戴邓小平复出的攻势。虽然这次没有成功，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取消 1976 年 2 月 2 日作出的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决定，决定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负责主持，陈锡联协助。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表明军队的领导权正式转移到了元老派的手中。

一九七七年三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召开十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

新贵派的算盘是：利用十届六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进一步巩固华国锋在中央的地位。同时，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采取拖延战术。

元老派的打算是：利用新贵派想在十届六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的时机，必须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两个决议必须同时通过，或者同时否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汪东兴、华国锋（3 月 14 日）就先后在会议上放风，反对邓小平复出。

元老派随即进行反击，陈云作了书面发言，支持邓小平复出。其他元老派大佬纷纷表态拥护陈云的发言。

一场火并即将爆发。

新贵派分析形势，不敢冒险，只得妥协退让，提出：邓小平复出必须公开声明：承认一九七五年有错误，接受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样既为邓小平平了反，又维护了他们的两个凡是形象。

元老派为了达到邓小平复出的目的，也只得作一些让步：这就有了四月十日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的信。其实，这个表态也是表面的、暂时的。邓小平在私下对他的亲信们一再说明，一九七五年他没有错，新贵派提出两个凡是错了。

最后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达成了妥协：元老派支持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新贵派同意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实行了“双赢”。

2010年10月16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第二章第二节 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叶剑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战斗，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深信，经过这次会议，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揭批“四人帮”，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必将出现一个新高潮，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

最重要的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党的团结更加坚强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更加提高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振奋起来，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

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辽宁省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斗争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议，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

（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同林彪一伙勾结在一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十大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他们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阴谋组织自己的“内阁”，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先后确定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仇视，疯狂反对，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他们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和各种渠道，煽风点火，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竭力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造成全国性的经济瘫痪。他们推行“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妄图把全国的局势搞乱，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伪造毛主席指示，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进行一系列的罪恶活动，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在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政变阴谋以后，他们密谋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也迅速遭到彻底的破产。

（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他们根本否定毛主席对我

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精心炮制出一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否定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疯狂地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他们招降纳叛，任人唯亲，结帮营私，结帮篡党，残酷迫害革命的老干部、中年干部、青年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们肆意摧残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发展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他们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崇洋媚外，卖国投降，里通外国。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他们推行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中央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审查。根据王张江姚专案组调查核实的大量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济南就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张春桥在上海继续从事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抗日战争开始后，张春桥隐瞒了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混入党内。江青一九三三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叛变出狱后，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一九三七年，她隐瞒了地主家庭出身，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反革命历史，重新混入党内。

姚文元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是罪行严重的叛徒特务姚蓬子的儿子，又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姚文元长期向党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问题，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竭力包庇叛徒特务姚蓬子，并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姚蓬子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姚文元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王洪文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疯狂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他利用职权，贪污盗窃，

侵吞国家财产，生活腐朽糜烂。他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四人帮”为了掩盖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互相勾结，利用窃取的权力，大量收缴、销毁有关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残酷迫害知情人，杀人灭口。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的一次谈话

我在今年 4 月 10 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文化部关于恢复上映有邓小平同志形象的影片及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词句的影片处理意见的通知

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叶剑英在建军五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当前，我国形势一片大好。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九个多月来，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反对和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国民经济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局面。最近，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准备。我们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全国各族人民热情赞颂、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

贰、 本节简论

十届三中全会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通过的关于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这是华党中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镇压左派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决议，是元老派、新贵派联合行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证。

二是：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重申：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他的话是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说的。这样，邓小平一上台，就把元老派与新贵派的政治分歧公开地摆在面前。

叶剑英可能是高兴过了头，他在八一建军节的讲话中，不仅高呼：英明领袖华主席！而且给华国锋封了“四个好”：好学生、好接班人，好领袖、好统帅。这样一来，搞得他自己以后非常被动，进退两难。

2010 年 10 月 1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6 日修改

第二章第三节 宣布文革结束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会议选举二百二十三名代表组成这次大会的主席团。华国锋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兼主席团秘书长。预备会议一致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次大会的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会议一致通过了汪东兴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九月十一日，他们背着党中央，私自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他们公发动员和秘密串连，要人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洪文私拍了上台时要用的“标准像”。他到处活动，制造谣言，刮阴风，烧阴火，煽动反对党中央，并且准备要庆祝他们上台的“盛大节日”。十月初，张春桥在亲笔写的提纲中，提出了要“镇反”，要“杀人”。他们在上海突击下发了大批武器弹药，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更为险恶的是，他们伪造一个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塞在党报社论中发表出去，接着就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而对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却拒不宣传。当党中央在十月二日戳穿了他们的伪造之后，他们竟在十月四日抛出所谓《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公开发出了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他们果然要闹事，要政变了。在这个万分危急

的时刻，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实现了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遗愿。

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

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首先，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少数地区和部门领导仍然落后于群众的情况，必须迅速改变。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肃清其流毒，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共十一大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

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一月，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任国务院代总理。同年四月，毛主席又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把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交给了华国锋同志。党中央设立第一副主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是毛主席针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作出的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华国锋同志一贯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华国锋同志既有长期的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又有中央领导工作经验，他联系群众，处事持重，英明果断，善破善立，具有全面地领导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工作的才能。在“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在我们党和我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华国锋同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就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一致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这个决议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致拥护和赞同。

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今后，如果国内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我们就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运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动员全体人民，实行大民主，革走资派的命。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二百〇一人；候补中央委员有一百三十二人。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
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于八月十九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 乌兰夫 方 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先念 李德生 吴 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
发 陈永贵 陈锡联 耿 飏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 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陈慕华（女） 赵紫阳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同意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胡耀邦就吉林省单奎章迫害知识分子一事的批示

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
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
“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抗敌演剧队的性质及其他几个问
题的通知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罗瑞卿在北京卫戍区《关于抢救贺龙调查报告》上的
批示

贺龙同志是一个方面军的领袖（毛主席生前原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亲自听到
过），竟被林彪、江青、吴法宪、黄永胜、叶群一伙活活害死。这些执行他们旨

意的人，不仅全部逍遥法外，而有的还升了官，这是很不正常的，很不公道的。此件所述有牵连的人，必须一个一个要他们交待清楚，并按其情节轻重或有无罪行的酌处。

贰、 本节简论

紧接着在八月召开的十一大，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但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在报告中正式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历史证明：一九七六年的十月政变确实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抓纲治国时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开始。

第二，他在报告中解释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

历史证明：革命人民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们抓阶级斗争，重点对象是革命左派中的骨干分子。邓小平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抓阶级斗争比谁都厉害，重点对象是革命的工农大众。

十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可以看出是元老派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中共中央正副主席共五人，即政治局常委会，新贵派仅占两人，虽有主席一人，但他并没有最后决定权；元老派却占三人，如果常委会票决，元老派肯定是多数。政治局的构成就更无须多说了，元老派占据了绝对多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副主席共六人，除主席是华国锋外，其他五席均为元老派占据。

从十一大召开以后，新贵派就开始走下坡路，华国锋的主席梦就基本上结束了。元老派一步步的紧逼，牵着新贵的鼻子走，通过所谓平反，一个一个地翻文化大

革命的案，也一张一张地揭新贵派披着的“两个凡是”的画皮，权力重心也一步一步地转移到邓小平手上。

2010 年 10 月 1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6 日修改

第二章第四节 批判两个凡是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 16 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晚，吴冷西（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东兴打电话给张平化

汪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张说：“不知道。”

汪说：“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张说：“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社论或中央指定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不过这么重要的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送审。”

汪说：“你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说：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

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辑熊复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119页）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党报要有党性，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宣传上的不足之处，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写的），他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文章说青年在错误路线

干扰时就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说没有什么窍门避免这种遭遇。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人民日报在报导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的标题是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述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

《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长江日报还在批极左，主席说过：什么极‘左’，右得不能再右嘛。

汪东兴还专门请已经调到外交部的前任《红旗》总编辑介绍了国外对中国的议论，特别强调，国外说中国在搞“非毛化”。一些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八日，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这篇文章是经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的。这实际上也是军方再一次正式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罗瑞卿在总后勤部关于靳来川等利用医疗手段将贺龙致死的调查报告上的批示

鉴于此案涉及范围广，人员多，建议由总政组织专人协同总后进一步查明真相，向军委做出报告。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待全案查清后再做决定。

一九七八年七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汪东兴在山东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的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

周扬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一九七八年七月底，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

吴冷西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

吴冷西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八月，张平化到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说：

学《实践论》，这就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其中的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现在国际上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都说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悄悄地改变毛主席路线，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一种恶毒的诽谤。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指示

一些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对于这类冤错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一一甄别，抓紧纠正。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陆定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申诉信摘录

我的冤案应该平反，我应该释放出狱。

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和文化部党组关于晋剧《三上桃峰》事件报告的批示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等人，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期间制造了所谓《三上桃峰》事件，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文艺黑线回潮”，这是“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128页）

这个讲话不仅明确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进行批判，而且语气严厉，提出了谁是真、谁是假的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再一次督促各省领导人表态的努力。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汪东兴批评贾庭三，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照本本办事。

林乎加说：“群众提出要了解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一九七八年九月份，邓小平视察东北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邓小平同鞍山市委谈话，说社会主义要表现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是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当然这个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

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的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写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

对此，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熊复又特别向汪东兴请示怎么办，后来他告诉红旗的人：“汪副主席讲，只好如此。”在《红旗》第十二期上，才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各省和军区纷纷表态，表示支持邓小平。

其时间顺序如下：

1， 新疆——汪锋、2， 福建——廖志高、3， 广东——习仲勋、4， 浙江——铁英、5， 江西——江渭清、6， 河北——刘子厚、7， 青海——谭启龙、8， 内蒙——王铎、9， 宁夏——霍士廉、10， 四川——赵紫阳、11， 湖北——陈丕显、12， 天津——陈伟达、13， 江苏——许家屯、14， 广西——乔晓光、15， 贵州——马力、16， 山东——白如冰、17， 山西——王谦、18， 甘肃——宋平、19， 上海——彭冲、20， 吉林——王恩茂、21， 西藏——任荣、22， 河南——段君毅、23， 湖南——毛致用、24， 安徽——万里、25， 北京——林乎加、26， 沈阳部队——李德生、27， 广州部队——许世友、28， 兰州部队——肖华、韩先楚、29， 南京部队——廖汉生、聂凤智、30， 成都部队——吴克华、孔石泉、31， 昆明部队——刘志坚、32， 新疆部队——刘震。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毛

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两个凡是”的说法。因为这是要等待条件成熟。

到一八七八年五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三日，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一直到六月六日才结束。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

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14 页、119 页）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一九七八年七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一九七八年九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要讨论什么理论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批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专门加的一句话，全段话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领导层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或反对这个观点。双方不是在哲学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不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而是政治上的斗争。

这一场政治风暴意义重大：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

但是，在右派看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毛泽东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来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可惜它没有把这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扭转过来。

2010年10月18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第二章第五节 清查帮派体系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国务院批准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关于涉及“四人帮”反党集团图书处理工作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奋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贾启允同志既不按照中央（一九七六）十六号文件办，也不向省委传达华主席对云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对他本人的批评，又另搞一套，捂盖子、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贯落空，所有这些都遭到全省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去年十二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同志批评和斗争，才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始好转。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听取义乌工作汇报并作指示：关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人物，要统一按照最近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里面所指出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等九种人，要统一口径来讲，来作阶级分析，这样，阶级阵营才能分清。

一九七七年六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洗恒汉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

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1976年九月以后，叶剑英曾经两次指示洗恒汉，让洗给青海的领导人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洗恒汉思想不通：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

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冼恒汉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他们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赵永夫获释时间不详，平反结论说：他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 1987 年 10 月 19 日逝世。）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八日和九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冼恒汉的批评。

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冼恒汉、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 月 7 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冼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6 月 9 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冼恒汉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

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

（洗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

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

（洗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

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

（洗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

（洗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

（洗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

（洗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

（洗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洗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洗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洗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洗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洗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当然，对洗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洗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洗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洗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

（洗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师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

……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洗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

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

（洗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洗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洗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洗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

（洗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

（洗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洗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 0 4 厂”、“4 0 4 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

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 1 9 7 6 年 4 号、5 号文件精神办。

(洗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并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洗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洗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洗恒汉同志，对洗恒汉同志是爱护的。

(洗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最后，中央的结论是：“洗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洗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洗恒汉当场表态：完全拥护。

中央决定后，洗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 3 0 1 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发出：“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一九七七年六月，韩先楚、肖华、宋平回兰州后，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洗家帮”、“西北帮”等活动。

洗恒汉被扣上“‘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

在“结论”中强行划定的所谓“洗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支左”的人员。

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洗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他们被定为“洗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例如：

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

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蔺进生和曾给洗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洗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

军区副政委高维嵩，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洗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

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 1985 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军区副司令员，贺龙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一九七七年七月，湖北全省作为“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审查的达 800 馀名，多数是各地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拘留的，而且长期未进行认真审理，有的地方还提出继续拘留审查的要求。此外，在全省还有 2 万多名干部在学习班，其中科以上干部就有 1.8 万人，而且学习班基本上搞的是“五不准”（即不准回家，不准通电话，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互相之间交头接耳）。在学习班工作的人员也较多，工作人员与被拘人员人数比为 3：1，有的地方甚至达到 4：1。

到 1979 年底，全省共清查对象 27868 人，查清 26217 人。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七月，山东省郯城县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到 1978 年 4 月结束。经过清查，全县参与帮派体系活动搞篡党夺权活动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 149 人，对 13 人采取了组织措施，其余 136 人解脱。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谈清理工作

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 义乌县委向金华地委、浙江省委作出《关于义乌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主要骨干分子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

《报告》称：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查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中，义乌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此基础上，于 5 月中旬起又发现和揭露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挂帅人物和主要骨干在去年 10 月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妄图同杭州、金华的帮派体系串通一气，配合上海，策划搞反革命武装暴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该案几经反复，时间长达 5 年，共株连 216 人。后经复查予以平反。

一九七七年十月，外电传闻：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一九七七年十月，于会泳在审查中“胡言乱语”

于会泳被捕后，许多次作出交代，神经有了问题，在狱中胡言乱语，说出了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和“四人帮”有关。他特别说到，他的一切，都是奉吴德之命。

于会泳的“胡言乱语”中，后来居然又提到了华主席和汪副主席。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处决四人帮在湖北的四个黑干将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突然被免职审查，兰考同时暂划商丘地区管辖，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在第三个战役中，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查清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绝不能走过场，绝不可心慈手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江苏省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判处死刑。

1977年初，赣州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

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年4月，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根据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1977年12月8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

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一九七八年一月，外电传闻：四人帮罪犯公审游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有的单位甚至还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必须一一查清。我们就是要除恶务尽。在如此深刻的阶级大搏

斗中，把蛇一样的恶人轻易放过，让他们找到某些避风港，隐藏起来，就会留下后患。

冶金部是运动搞得比较好的部门，他们保持清醒头脑，通过检查、总结、评比，看到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虽已基本查清，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还需要深入追查；同时，还有个别单位，问题不明不白，如不加强领导，运动很可能走过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响亮地提出不能轻易敲“平安无事”的锣，不能煮夹生饭，不能草率收兵，决心把清查工作搞到底。科学院在斗争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了一些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的问題，派出调查组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单位的运动作了专门的部署和动员，对它们的清查工作既提出了时间的要求，又提出了检查验收的质量要求。

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的急先锋。

有一个地区，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揭批查的阻力很大。地区党委内有的人采取躲、拖、捂的手段，“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甚至想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这样，运动中就出现了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一九七八年二月，杭州处决反革命政治集团成员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江苏省南通地区和南通市长期捂盖子，保自己，清查运动进展缓慢。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整一年，南通地区的清查工作一直按兵不动。中共江苏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区主要领导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去年九月，没有查出一个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后来，省委派负责同志去进行调查，对南通地委提出了批评，他们才勉强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中找了五个清查对象。这些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我们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等等。一句话，这里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世外桃源”，“四人帮”对这里没有干扰破坏，无须清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赣州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坚持批评华国锋判处死刑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口号。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

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报道：贯彻执行华主席指示，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急起直追全国形势 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

文化部前一时期的领导人违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画框框，定调调，捂盖子，压制群众斗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批斗于会泳的七千人大会上，还不让喊“打倒于会泳”的口号。由于原部领导人的错误，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文化部的运动成为不熟不透的“夹生饭”，使文化部成了清查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落后单位。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 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二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调整和加强后的天津市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天津的干部、群众一再等待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觉悟，要他们和“四人帮”划清界限，说清问题，争取主动。但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拒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在他们的压制下，天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难以发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冷冷清清。

天津的某些负责人却要弄手段，一再開脱自己。说什么对江青“早有戒心”，同江青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密谋和勾结”，妄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华主席曾针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严肃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警告他们不要捂盖子，不要与群众对立。对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有的隐瞒、封锁；有的取其所需，任意歪曲和篡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打保票，说什么“天津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并且以种种“理由”掩盖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为了将运动草草收兵，去年四月清查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散布“清查工作成绩很大，七月份告一段落”，七月份又说：“基本上查清了，到年底可以结束。”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华主席、党中央说：“天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很快”，“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

从今年春节到四月下旬，他们关起门来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五万八千多字的“检查”稿，以征求意见为名，企图拉一部分人保自己过关。

党中央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的领导核心。天津市委在各系统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市有十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新华社报道：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狠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整顿

省委在解决黔东南问题时，根据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五名州委领导成员，按其错误的轻重程度和检查态度，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有的调离，有的留下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有的继续帮助他检查交待问题；同时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调到或提升到州委主要领导岗位。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黔东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海军各部队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就是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乐山地委认真抓好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清查工作

西南交通大学是铁道部所属的一所学校，学校主要领导成员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心慈手软；另一个主管清查工作的领导成员和本校的一名帮派骨干有牵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批。地委指示校党委对那个帮派骨干进行点名批判，他们却不揭不批，放他到外地探亲，清查工作一直搞不起来。地委将这个学校的问题向铁道部和省委作了汇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铁道部很快派出

工作组，同地委一起调查研究，帮助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成员提高认识，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调整充实了运动办公室；对那个帮派骨干，采取坚决措施，作了严肃处理。

重庆钢铁公司乐山粘土矿的党总支书记，前几年投靠资产阶级帮派，同矿上一些人相勾结，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拚命捂盖子，对揭发他的干部和群众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清查。今年五月，地委和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粘土矿，停止了矿党总支书记的工作，夺回了运动领导权。

原地区革委会有一名副主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资产阶级帮派勾结，大闹地委，妄图夺权。一九七五年整顿时，把他调到外地去了。一九七六年“四害”猖獗的日子里，他又多次窜回乐山插手运动，煽动群众大搞“层层揪”。在清查中，群众揭发了他大量的问题。地委经过调查核实，然后将材料转到他所在的单位。

嘉乐造纸厂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七五年从云南调来的。这次清查中，云南转来材料，揭发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牵连。地委派人两次赴云南把问题查清落实。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夺回运动领导权，扫清揭批查障碍，武昌造船厂迅速改变面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便改变手法，以攻为守，伙同这个厂的帮派体系篡夺了运动的领导权。不经过党委讨论，私自指名由帮派骨干组成材料组，让帮派人物控制清查大权，使清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根据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情况，上级党委撤销了原厂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责令其检查交代问题，对帮派体系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把“四害”横行时“双突”钻进厂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闹而优则仕”的人物坚决拉了下来，按照毛主席接班人五条标准，对那些坚决顶住“四人帮”压力，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厂党委主要领导力量，这样有力地加强了党委对清查工作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军区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报道：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天津市委从现在起，决心到年底，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把严重的打砸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把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做完，对区、局、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初步的整顿，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部署，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加快运动的步伐，迅速改变天津揭、批、查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状况。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河南省委决定以反革命罪逮捕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1978年10月10日左右，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把张钦礼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在前进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了。

由于市委领导没有抓紧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同全国先进省市相比，有很大差距。总的说，北京是落后了。

这次会议要求从市委机关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清查，彻底查清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抓住林彪、“四人帮”危害最大、流毒最广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批判。对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等的罪行，“洪广思”写作班子的问题，第三次理论讨论会问题，“反右倾回潮”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问题，统统公诸于众，在全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高潮。

近年来北京的各种犯罪案件有所增加，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大家很有意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

前一段，由于市委没有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

要把清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凡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未认真搞过清查的单位，要安排一定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清查正在进行的单位，要抓紧调查核实，尽快查清。清查基本结束的单

位，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检查验收。同时，要结合清查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开展“双打”斗争。市委强调，各条战线、各个单位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石油部在抓好揭批查斗争中，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石油部党组把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集中起来，召开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

这些同志集中以后，一怕隔离审查，回不了家；二怕挨批挨斗，下不了台；三怕再算老账，没完没了；四怕追究罪责，定成帮派；五怕重聚一起，又犯错误。

原一号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石油部机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审查以后，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臭名远扬，政治上完了，没前途了”，情绪一直很消沉。参加座谈会后，他有三件事没想到：一是叫他当召集人，他很惊讶、兴奋。二是让他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感动地说：“这是政治上的很大信任，很大荣誉”。三是部领导在他主持起草的揭批计划上作的批示中称他是同志，希望他立新功，他很受鼓舞。从此以后，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每次讨论，他带头谈思想，谈体会，谈教训。他自动和话剧《丹心谱》中的庄济生对比，说“庄济生从政治野心发展到出卖灵魂。我的私心也很重，造反做官，干的想的都是权。”在准备批判石油部那个代表人物时，他反问自己：干了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坏事，并要求其他同志也这样做，在斗争中自觉革命。有的同志想把自己的问题讲得轻一些，他当场指出：不能回避错误事实，对抗过周总理、反对过大庆红旗的问题，要敢于承认。他的态度一明朗，大家顾虑也就少了。而他的转变，对其他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家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生动地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乘革命洪流，驾个人小舟，结果迷了向，触了礁。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造反吃香”，“造反做官”。自以为一贯正确，掌权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自己身上。那时听到王力讲“二十几岁也可当部长，有权多威风”等黑话，就感到特别舒服。

犯了错误以后，个人主义又表现为悲观失望。觉得今生今世被林彪、“四人帮”毁了，组织上不再信任，群众也不会谅解，前途渺茫。个人主义使人犯错误，个人主义又使人摆脱不了错误。不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不可能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志们普遍反映，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把自己从个人主义污泥里解放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批运动越深入，越要重视团结大多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重要指示 决心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提高抓纲自觉性力争建设高速度

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一批双打三整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

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深入揭批“四人帮”，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才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领导要提高抓纲的自觉性，克服松劲自满情绪。要把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对那些至今没有很好清查，是非不清，林彪、“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单位，要派得力的工作组去搞好揭批查；要继续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联系起来。要抓住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抓纲大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
与会同志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围绕内蒙古这些年来的一些大事，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并讨论了周惠同志提出的关于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措施，即：初步调整、充实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党委重要部门的工作班子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后，也酌情作适当调整；在深入进行“揭、批、查”的斗争中，要处处考虑大局，照顾大局；问题一定要解决，团结一定要达到，夺取这场斗争的全胜；强调这场斗争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斗争目标要集中，不得分散；坚决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报报道：长江航运管理局党委透过沙市港的装卸质量问题，寻根究底，抓紧清查和“双打”，解决了这个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长期捂盖子的问题

鉴于沙市港问题的严重性，长航党委立即派出检查团到港解决问题，把原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揭开了。同时，对清查和“双打”进行补课，把“老虎”、“双料货”一个个地挖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五条标准

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分清了路线是非。批臭了资产阶级派性，增强了团结，保持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开始恢复毛主席为我党我军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按照军委会议关于配备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规定，对班子进行了调整，并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了初步整顿，基本上改变了软懒散的状况。

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群众所造成的冤案、错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决不意味着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肃清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临洮县委对犯错误干部一看二帮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抓住林彪、“四人帮”在临洮影响最深的问题进行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干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做好受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帮助临洮县委揭开盖子。临洮县委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冤屈的近六千名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有的过去捆绑打骂群众，积怨甚多，等着挨整；有的认为运动一来总要整掉一批干部，当基层干部反正没有好下场，想撂挑子不干了。

一九七八年，山东省运河地区一级组织了 2480 余次大型控诉会议，对 311 名造反派干群进行了轮番批判，对其中 3 人分别判了死缓和无期徒刑；6 人开除党籍；

8 名地区干部撤职、16 名免职；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 51 人；责令检查交代问题的 93 人。同时，运河地区还对高校记录在案的 27 名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进行审查。（据 2000 年运河地区官方公布的材料）

一九七八年 2 月 23 日，浙江省平阳县成立“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办公室，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池方清兼办公室主任。抽调 3759 人，组成 342 个工作队，进驻 32 个公社 446 个大队，120 个企事业单位，处理集体分配和非法建房工作，整顿企事业及市场。3 月形成“一批双打”高潮，至 5 月底，全县查清了 20 起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6 起重大“打、砸、抢”案件，3509 起经济案件，196 起集团性案件，清查出赃款 358.77 万元。8 月，召开处理大会。

3 月 7-15 日，为开展“一批双打”运动，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张维森作动员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学习县委《关于改进作风、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带头洗手洗澡，轻装上阵，搞好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工作。

4 月 15 日，县机关通过揭批查运动，清查了同“四人帮”反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据统计列为审查对象的共 115 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 14.84%。其中帮派骨干 8 人，严重政治错误 19 人，政治错误 36 人，说错话做错事 52 人。犯有其他错误和罪行的清查对象共 217 人。先后逮捕 28 人，拘留 22 人，隔离审查 26 人，停职交代 31 人，不让参加领导活动 17 人。

贰、 本节简论

十一大以后，邓小平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布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否定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大造舆论，为下一步推翻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各种案件作准备。

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仍在那里“抓纲治国”，狠抓对左派骨干分子的斗争。这当然也受到元老派的支持。但这方面的情况，秘而不宣，极少在媒体上公开披露。这里收集到的仅仅是报纸上公布的一点点有关信息。

2010 年 10 月 19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6 日修改

第三章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要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华国锋在开幕式上讲话，宣布会议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之后，有三个议题：一，讨论农业问题；二，讨论两年计划问题；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没有肯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谭震林在发言中提出，要先解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 1，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 2，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
- 3，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
- 4，要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
- 5，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
- 6，要批判康生，等等。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王首道、肖克、杨得志、陈丕显等在发言中，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六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这样一来，会议的议题就完全摆脱了华国锋定下的框框，按照邓小平等人预先设定的轨道进行。陈云提出的议题讨论了近半个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 5，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 6，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 7，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 8，撤消中央专案组；
- 9，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批判是合理的；
- 10，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对日本来宾的谈话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最近，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

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中国，人人都懂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胡绳在中央工作会议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胡绳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人的批驳。批评他（和接着出来发言的吴冷西、熊复等人），说他们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

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胡绳给在实践问题上发过言的同志扣上“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的帽子，他不仅是批评各省的第一书记，而且是批评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讲话。实际上是胡绳等人，他们自己反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见，才真正是“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张平化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发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我到中央机关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总觉得这样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有人批评张平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听？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吴冷西又发言

他在电话中讲了四条意见：

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

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有人发言批评了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那篇文章明明

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人提出，就拿吴冷西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的电话纪录是可信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熊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

“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要对毛主席倒三七开。这个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内容，直接或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

“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处理问题。”

“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一些人对熊复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人说，他们这些同志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有的人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李鑫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说：“《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我负责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负有重大责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吴冷西同志又作了书面发言，

他在“电话四点意见中没有肯定文章的正确方面，只说到这个原则没有疑问，而

对文章中不同意的某些论点加以引伸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持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主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却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单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五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五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论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

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我的初步检讨》

〔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印发〕

我在 1976 年 11 月间中央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小平同志 1975 年和“四人帮”的斗争问题上，曾说过贬低小平同志的话，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是错误的，在此谨向小平同志表示歉意。1977 年 1 月间，我在处理国务院办公厅理论组写的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上也有错误，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 2 月 7 日《学好文化抓住纲》的那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产生以上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思想上存在形而上学的东西，有时看问题片面、主观；对实际情况、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了解不够，观察不深。在工作作风上有时也存在着简单急躁、不够谨慎的错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诚恳的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会后，我当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摘要

〔注：汪东兴在书面发言中恳请中央免除他的一切职务〕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对我提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我表示欢迎，诚恳接受，欢迎同志们继续批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

今后，我要读点书，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总结经验教训。特别要注意谦虚谨慎，维护党的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些人对汪东兴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一九七七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后，华国锋很快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东兴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些人提出，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没有列入关于真理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他们没有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等人决定召开理论务虚会，要在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结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起主导作用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 5，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 6，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 7，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 8，撤消中央专案组；
- 9，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批判是合理的；
- 10，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到整个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们之所以没有提出刘少奇的问题，一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会把元老派的政治立场全部暴露无遗；二是因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他们需要准备的资料。

二，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他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说：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

处理，没有顾上看。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也作了《我的初步检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这样一来，新贵派就把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假面具撕下来了，把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假面具撕下来了，他们与右派是一丘之貉。

这样一来，元老派也把他们的政治立场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说反对的只是所谓的四人帮，他们现在要翻的这些案，难道都仅仅是四人帮决定的吗？不是还有林彪、陈伯达吗？不是还有康生、谢富治吗？不是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吗？新贵派的主席、副主席在全会上作了检讨，汪东兴还提出辞去他的一切职务，虽然这次全会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新贵派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基本上垮掉了。元老派等待着一步步地收拾他们。

2010年10月20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第三章第二节 大规模的平反翻案

第二节 大规模的平反翻案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

上海市委认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窜回上海，到二月五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从上海打开缺口，进行全面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胡乔木在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它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

“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一矛盾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否一定要把某几次斗争指定为路线斗争，并且一定要一次又一次地排列起来？这样是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会不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胡耀邦在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我们在开会期间向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央批了。

关于陆定一同志。中央已经把他接回来了，住在北京医院，身体很好。他在长期主持中宣部的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在遭受迫害的十几年里，表现也是坚强的，很好的。前几年在“四人帮”的陷害下，他被扣了三顶帽子：特嫌、阶级异己分子、反共老手，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到全党。现在，中央组织部正在复查这个结论。要等中央批准复查报告以后，他的名字才能见报。

理论工作务虚会，向中央请示了一下，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同意，拟于最近召开。前天部务会上商定，准备分两段开：先是中央的一些单位参加，一百人左右，各省要求派个代表来也可以。一月十八日就开，开到二十七号，春节休息。这一段开二十天，春节前十天，春节后十天。到二月中旬，请各省再来二百人，中央一些单位也再扩大一些，共四百人，再开十天左右，到二月底开完。前一段以小组会为主，后一段以大会为主。后一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要请主席、副主席讲话。这是大体上的计划。要下这么个决心：以理论工作务虚会为起点，今年一年，再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就要开始考虑，经过调查、研究，还有哪些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了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党内外、人民群众中最紧迫地需要继续澄清问题。我们设想，一九七九年内，还要写出那么五、六篇，七、八篇或者上十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来。

今年中央一级配备、组织二十个左右的理论班子。比如中宣部还没有这样的班子，要筹建这样一个一班子；工、青、妇是不是联合起来搞一个班子，编制还是在各家。党的群众运动，有共同的规律。总之，大约有这么一些家：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文化部、中央宣传部、计委、红旗、工青妇、政法、外事。还不算军队。

天安门的游行，云南七万知识青年的罢工，都是香港报纸的头条消息啊。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七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七万人中，四川三万多，上海三万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农场没有办法，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

北京的民主墙上，发现另一方面的现象，比如，有个“人权同盟”，发了宣言，还和外国人谈了三四个小时，那个“人权同盟”，有十九条纲领。贵州有个启蒙社，有三个人常驻北京。据说这三个人的父亲都是被镇压的，这三个人也跟外国人挂上了钩。

“咦！为什么这次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前的矛盾中，什么是基本矛盾呀？什么是主要矛盾呀？”我觉得这些东西弄弄清也好，一下子弄不清，也不妨碍我们的伟大事业奔腾前进。有些东西必须弄清楚，有些不带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过于纠缠。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公安部关于撤销几个错误文件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中发[1978]78号文件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公安部转发中央同意的《建议中央撤销两个错误文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发[67]19号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谢富治炮制的“公安六条”）。林彪、“四人帮”以此恣意打击迫害了大批革命老干部和革命群众，造成了许多冤假错

案。

二、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中发 [68] 142 号中共中央文件《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即“五·一三报告”）。这是康生、谢富治授意炮制的一个假报告，对砸烂公安工作特别是侦察工作起了极恶劣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彭真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中央决定，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同意外交部《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公安部关于撤销所谓“苏修特务”和“苏特问题”材料的通知

对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用公安部专案办公室、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名义发去的有关“苏修特务”、“苏特问题”等名单和材料，请予以撤销，清理销毁。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一九七三年中央十号文件，认为 1972 到 1973 的海军“四·五”会议是错误的。肖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贼船”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贰 本节简论

反文革派所要做的，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一切人和事，都要翻过来。这里收集的仅仅是在中央报刊上公布的一部分。

这里值得一提是号称党内的大理论家、毛泽东主席的多年秘书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一篇翻案的谈话。

一，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理由是：

第一，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这个话是完全站不住的。一个口号，无论最先是谁提出的，只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决定，就应该承认。

第二，它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是完全错了。

第三，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看来，捏造出这个所谓的反动公式，胡也有一份功劳。在他看来，老干部中没有民主派，民主派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也不会变成走资派。

二、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理论，他的理由是：第一，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他说得似乎理直气壮，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到了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也还会有存在，甚至到了它的末期阶段也还会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残余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存在的形态是不同的，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逐步消灭的过程。

第二，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是自打嘴巴！你们自己不是提出什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你们承认有，那你们承认不承认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但不等于说只有完全消灭了阶级才算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需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还要经历若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三、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所谓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残余形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完整的、极端的形态；这种阶级斗争当然仍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胡乔木们口头上否认阶级斗争，污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实际上是为据有关人士掩盖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的残酷阶级斗争。

第二，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真想不到这种胡说八道是从胡乔木这位大理论家口中说出来的。没有了阶级斗争，社会发展怎么就会没有了动力呢？事物本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的阶级矛盾消灭了，社会的其他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中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四、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论，其理由是：

第一，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一矛盾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

可是，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胡乔木先生为什么要掩盖呢？

第二，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

看来，胡乔木先生确实长着一颗形而上学的脑袋瓜子，在他看来：抓主要矛盾与抓建设现代化，两者是绝对对立的，抓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他们口头上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问姓社姓

资，实际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五、胡要推翻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党内路线斗争教育的指示，其理由是：

第一，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第二，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第三，是否一定要把某几次斗争指定为路线斗争，并且一定要一次一次地排列起来？

第四，这样是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会不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

一九三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三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很全面，刘少奇对党内斗争的解释只到主要方面和原则斗争。

路线斗争是党内斗争中最高的部分，当然不是全部。

党的历史是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历史，其核心部分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强调对高级干部进行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育，在多次谈话中讲到了建党以来党内发生的几次重要路线斗争。这怎么就“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呢？

反过来，人们看到：一九九一年，胡乔木在美国大讲建国以来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那才真正是歪曲党的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向美国帝国主义献媚。

2010年10月22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第三章第三节 召开理论务虚会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天安门的游行，云南七万知识青年的罢工，都是香港报纸的头条消息啊。世界上六大洲，有五大洲广播了。我们的负担也很大，中央在操心哪。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七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七万人中，四川三万多，上海三万多，北京二、三千人。

北京的民主墙上，发现另一方面的现象，应该如何对待好？比如，有个“人权同盟”，发了宣言，还和外国人谈了三四个小时，那个“人权同盟”，有十九条纲领。贵州有个启蒙社，有三个人常驻北京。据说这三个人的父亲都是被镇压的，也可能镇压错了，这三个人也跟外国人挂上了钩。

一，会不会有些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

二，有没有混进一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的人？

三，有没有这样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小青年，认为宪法写了集会结社自由，想出风头。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是马列主义者或者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前进。但也有些人，不想往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而是向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道路上走，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把这些人抓起来不好。现在不要抓，将来也不要抓。他们把民主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个人第一。不生产，不劳动，满腹牢骚。这种人的前途有两条：一条，接受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民；另一条，也有可能发展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反社会主义。

四，少数人，千分之一、二，万分之一、二，他确实受了委曲，背了冤枉，这一定要平反；但平反以后，往往要求更高。这些人多年上访，不愿搞生产，流浪成了习气，乘车不买票，到处找饭吃。我去年一年亲自处理了几百人，确实发现有些人要求太高。比如有一个人，也平反了，也道歉了，工资也补发，他还要求调京工作，我没有答应他。有的要求把给他带帽子的人抓起来等等，要求很高。其中还发现有反过来诬告别人的。

五，精神上有病态的。

党中央已经讲了好几次了：离开社会主义建设，搞一刀切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今后不搞了，因为搞一次就失败一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搞什么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刀切，这是不行的。中央这样反复声明了，你还不解放思想，那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会议是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很敢讲话”的意见召开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胡耀邦、周扬、黎澍、许涤新、宦乡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

胡耀邦说：

会议大体上分两段开。

第一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一百多位同志参加，各省市也派来一位联络员。会议从今天开始，开到二十六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着开，开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几天后，进入会议的第二段，拟用中央的名义召开，再开十天左右。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扩大到四五百人。

第一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段以大会为主。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作报告。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我们建立了一个十一人的领导小组。同时还邀请了二十一位长期在我们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请他们作指导。

在我们这个会的同时，还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能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收到上下呼应、互相交流的效果。

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参加。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

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象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

去年党内有那么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办”；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

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历史学家黎澍说：

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藉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

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说：

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的联合发言。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

吴冷西说：《真理标准》一文“很坏很坏”

汪东兴极力维护“两个凡是”

罗瑞卿支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邓小平在东北阐明什么是“高举”

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胡耀邦提出三个不管”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吴冷西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

华国锋作自我批评

推行“两个凡是”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第一、阻碍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第二、阻碍广大群众要求悼念周总理

第三、阻碍天安门事件平反

第四、阻碍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中央工作

第五、阻碍悼念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

第六、阻碍大量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

第七、利用起草文件，制造错误理论

第八、保护康生

第九、阻碍揭批四人帮

第十、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多次同小平同志作对，不同意中央的大政方针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象的通知

《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报告中，讲了：

一，形势和任务：总之形势很好，解决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而任务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其中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作了很高评价。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说，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他还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了对比，说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他这时还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

怎样才不是“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讲了几个理论问题：

（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我国目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可以继续研究”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他说：“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四）党的十一大路线

邓小平认为，十一大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说：“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由历届

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邓选二卷 158-184 页）

经过这样一番阐述，邓小平所坚持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究竟是什么，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贰 本节简论

这次开了 80 多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少数。

另一种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时期的功绩，但要批判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这是多数。

还有一种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也是少数。

有人说，中国本来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中国实际，是搞空想社会主义。

有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毛泽东还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共产党搞阴谋，“引蛇出洞”，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刮“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人说，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搞越“左”。

有人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文艺界已经滚到修正主义边缘，完全是一种“左”的估计，这时搞的文艺界整风以及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

命的前奏。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搞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有人说，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十分错误，应该彻底否定。

等等，等等。

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 173-174 页）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这里是说，这个时候就公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陆定一在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的文章），太早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还接受不了，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由此可见，当时出现的这类“四反”的东西数量之大、影响之广。

面对着党内外刮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邓小平不得不重复提出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他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反对“主张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撇开党委闹革命”；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反对“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1977 年 7 月恢复工作，1978 年 5 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 1979 年 3 月召开所谓理论务虚会。前一次是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后一次直接向毛泽东思想进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造成了党内思想大混乱、社会上风气大败坏。实践检验证明了什么？

2010 年 10 月 23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6 日修改

第三章第四节 彻底解决帮派体系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新华社报道：三中全会决定，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为了保证这个转变顺利实现，我们一定要把揭批查的群众运动结束好，做到善始善终。

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做到了以下六条：第一、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第二、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第三、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了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有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同时帮助那些在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犯过政治错误的干部，使他们认识并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第四、由于林彪、“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大批冤案、错案、假案，已经和正在积极地进行平反、纠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五、遭到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第六、实现了安定团结，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也还有不少遗留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至于那些落后的地方和单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应该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摆在第一位。

一九七九年初，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谢某回去看最后一眼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

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

我在 1979 年 7 月 4 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 1978 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 5 平方米，散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 100 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

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揭批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河南那几个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人物，真是“风、捂、溜、震”兼备。在“四害”横行时期，他们看风使舵，紧跟林彪、“四人帮”；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当群众起来，冲破一个个障碍时，他们舍车马保将帅，趁机溜掉；当揭批查斗争刚刚走上轨道，取得一定进展时，他们又背后“一刀”，散布什么“扩大化”了。

派段君毅、刘杰加强河南省委领导。

一九七六年三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期间，江青向他们在河南的那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了“路线交底”。三月二十七日，那几个主要人物借汇报河南工作之机，面对面地恶毒攻击邓副主席。此后，王洪文主动登门看望，谈了几个小时，并在一起喝酒、吃饭。王洪文撑腰打气地说：“中央（“四人帮”）支持你是没有问题的。”天安门事件以后，江青说：“他不比别人矮半截，腰杆要硬。”张春桥则说：“我们特意给他一把尚方宝剑，非杀一批不行。”在“四人帮”的指使下，那几个主要人物把郑州、洛阳、开封等地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鞍钢做好揭批查收尾工作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报道：汪锋说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把揭批查运动抓紧搞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由于运动开展较晚，“双打”斗争才开始不久，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对于罪行严重、有民愤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一定要狠狠打击，一切冤案、错案、假案一定要彻底平反、纠正，县以上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好。对少数问题严重、阻力很大的单位，一定要下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揭开盖子，改变落后面貌。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最近，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原兵团三级干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胆拨乱反正，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分清了路线是非，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全兵团性的重大事件，搞清并平反、纠正了师以上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查清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师以上主要负责人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委对全省搞好揭批查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最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宣布：现在浙江全省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对揭批查运动中遗留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组织一定的力量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

这次运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极少数民愤很大、作恶多端、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打砸抢骨干分子，民愤很大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异己分子。对这些坏人，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按照罪行的轻重和悔改态度，给以党纪国法制裁。

对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而没有讲清楚的，一定要讲清楚。有的领导干部犯有错误尚未作自我批评，群众有意见的，可以采取整风的办法解决。在揭批查中，严重违反政策的，要坚决纠正。有些罪证确凿已定性的帮派骨干妄图翻案的，要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

前一段，浙江省委已经为一些全省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去年召开省党代会以后，又处理了二十多件有影响的大案。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杭丝联”党委帮助犯错误职工提高认识，杭丝联”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一个单位。在林彪、“四人帮”和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一伙横行时，厂里有不少人跟着他们参与了一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了政治错误，有的甚至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翁森鹤等一小撮坏人受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惩处，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也受到了审查。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 100 多万人的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平反仪式由邓小平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

1979 年 1 月 24 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就在同年，那个因舍身为信阳人请命而闻名全国的兰考县长张钦礼却被逮捕判刑 13 年，罪名是迫害老干部。人心是公道的，当 2004 年 4 月 7 日，张钦礼去世回兰考安葬时，兰考县万人空巷，无数群众沿途祭拜，很多人跪地泣不成声，场面十分震撼。

1960 年 2 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派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信阳的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 100 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文革开始后，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进行残酷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惨遭迫害，不久“含冤”而死，年仅 52 岁。

上世纪 60 年代河南两个名人，一个是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一个是原兰考县长张钦礼，在河南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张钦礼挺身而出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结果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

一九六〇年十月当他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之际，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总理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进京反映真相，几经周折，周总理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接着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进行了批示，吴芝圃被停职反省，一大批信阳浮夸干部遭到逮捕，张钦礼得到重用升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共甘肃省临洮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这些干部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在路线问题上跟着原县委几个负责人确实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八十六名犯有错误的干部，自觉检查的就有七十九人。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道：杭州钢铁厂的大好局面是怎样来的？

目前，全厂已有三百七十五位同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了政策。

厂党委副书记、厂长陈阿定在“四害”横行期间，曾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作过许多斗争，但是，他在被提拔到厂党委担任领导职务之前，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部分群众对他有些意见。在原党委书记李克昌等同志的鼓励下，陈阿定同

志大胆地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新华社报道：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大会，对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分子胡勇、章伯森进行了组织处理。胡勇罪行严重已逮捕法办。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马文瑞：关于揭批查运动补课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
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召开陕西汇报会议，并发了 46 号文件，指出了陕西问题的症结所在，检查纠正了省委在领导运动中的错误。

今年一月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和三月初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鉴于我省是个“灾区”，省委前主要负责同志在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长时间盖子没有揭开，运动起步晚，遗留问题多，许多重大是非没有分清，许多地方和单位运动搞得不深不透的情况，决定我们在转移工作重点过程中，必须搞好揭批查运动的补课。

据初步统计，已解决的“三案”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今天会上，李尔重同志宣读的关于撤销一批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文件和负责人讲话的情况报告，关于拆除“四八”烈士^⑤陵园的情况报告和“七十三号”迫害老干部问题^⑧的调查报告；常黎夫^⑦同志宣读的关于陕西地下党和地下工作者遭受诬陷迫害的情况报告，关于米脂县的所谓“支左红旗”^⑧的调查报告，关于围打佳县事件的调查报告等问题。

绝大多数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基本搞清，百分之七十以上已经解脱或做了必要的处理。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江津地委认真做好犯错误干部的转化工作

地委分两期组织全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学习，帮助他们转变思想和立场。

永川县有个公社干部过去是个派头头，在清查中认账不认错。经过学习和批判，他转变了思想，痛心地说：过去我把“四人帮”当左派，把谬论当真理，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围攻地委书记，揪斗所谓走资派，弄得工厂不冒烟，农业生产大减产，影响了人民生活，给国家制造了困难。粉碎“四人帮”后，全地区形势大变，粮食增产，市场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事实证明，如果让“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必然亡党亡国。我们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跟着“四人帮”胡作非为的捣乱派。

对极少数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帮派骨干分子，在进行揭发

批判后，除了个别民愤很大的人要坚决法办外，只要他们老老实实认罪，彻底揭发交代问题，有悔改表现，就先下放到基层劳动，给予改造的机会，过一段时间，视其表现，再作处理。地委还对极少数错误严重而又无理取闹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警告他们如果再不改正，就加重处分。对于那些因错误严重，一时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地委一面做群众的工作，一面让他们到基层参加劳动，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取得群众谅解，然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伊克昭军分区党委主要干部带头批判极左路线党委副书记、政委纳木，是个蒙古族同志。他在内蒙古的三大冤案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运动中，都无辜地挨了整。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切实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陕西加紧揭批查补课落实政策

省委有步骤地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把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打砸抢首恶分子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同时，还按照党的政策，对少数民愤大、案情重、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使国家财产受到极大损失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依法予以惩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万里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联系安徽实际，指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正确思想路线，一切工作才能顺得进行

前一段在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有些事要求急了一些，宣传上有不够谨慎的地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少数人思想混乱，特别是少数青年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另一方面，当前又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有人抓住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大惊小怪，牢骚满腹，埋怨不休，甚至进行攻击党的路线“右”了，攻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偏”了。（(1)(4)）

这种思潮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很容易迷惑人。对此必须引起充分注意，继续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散布极左思潮的，有的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有的是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原则进行反攻的人，还有不少人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也就是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反映。

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又展开了一场震动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

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正当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的特征就是主张一切都从本本出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出发，认为只有上了本本的才算数，不承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承认在新的情况下，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下，需要研究新的问题，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而是一切只能照搬照套。

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上海柴油机厂党组织帮助党员总结历史教训

上海柴油机厂是一家拥有八千八百人的大厂，共有一千一百多名党员，二十五个党总支和支部。王洪文自任这个厂的革委会主任达九年之久。

对冤假错案和受迫害的一千多人陆续给予平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连续举办了五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和两期党支部书记学习班。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排除干扰，坚持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

有少数受审查的干部表现不好，对自己的问题缺乏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错误属实，原已承认，现在又矢口抵赖，拒不认账；有的无理狡辩，硬要把严重政治错误说成只是一般说错话、做错事，百般为自己开脱；有的在解脱以后，不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借故拒不上班；有的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要组织上向他说清楚，给他“落实政策”；还有的拉拢一些人找组织无理纠缠，或者对一些认错态度好、认真悔改的同志冷嘲热讽，找清查积极分子的办案人员进行挑衅、要挟。

一个犯错误的人，在检查、认识错误的过程中，有时出现反复，这是不奇怪的。这次受审查的人员中，也有少数人或者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较深，至今糊涂观念不少，是非界限不清；或者由于私心杂念较重，护短怕痛，患得患失，总想把自己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思想上也曾出现反复。

需要注意的是另外的极少数人，他们大多是曾经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现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其中个别人本来就是林彪、

“四人帮”的帮凶、余孽。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们错误估计形势，同社会上刮起的那股错误思潮配合起来，利用我们党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和落实政策的机会，兴风作浪，妄图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切成就，否定三中全会。有人说什么“我是执行问题，不能算我的账”。理由是他们当时是按照文件办事的，现在党中央已经撤销了这些文件，他的错误也不能算了，应当“一风吹”。有人强调他参加工作多年，不应该因为一段时间里搞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而处理他。

有人责问：为什么过去要批判我，应当给我说清楚。

有人抓住清查工作中某些个别缺点，想否定对他的审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犯了错误切不可讳疾忌医》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上海《文汇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极左流毒》

这种持反对态度的人，实际上仍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面上说维护旗帜，实际上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贯彻执行。在他们看来，是“偏了、乱了、糟了”。他们在今年春天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似乎是“丢纲丢线转了向”，看党的各项现行政策就觉得这也“偏”了，那也“右”了，看形势也就觉得不那么好了。有关农村政策、企业有一定自主权的政策、在教育战线上实行“择优录取”的政策，怎么能够说我们党的现行政策“偏”了、“右”了呢？一想到“现在做的是过去被批判过的”，就感到“吃不准”了。

前一时期出现的两种错误思潮，一“左”一右，实质上都属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克服派性》

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还没有解决；他们挑动和制造的派性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危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少数坚持闹派性的人，现在变换手法，继续进行活动，干扰以至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的活动虽然转向隐蔽，但在许多问题上仍有所表现：如在领导班子内，拉山头，搞圈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吹捧符合自己派性利益的领导干部，反对、诽谤、诬告按党的原则办事的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实用主义

态度，从派的利益出发，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在清查工作中捂盖子，抵制清查，包庇有问题的人，或者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转嫁罪责，甚至把一些坚持正确路线，抵制“四人帮”的好干部打下去；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对同派的人搞一风吹，处处从优照顾，对原来不是一派的故意拖延刁难，不给解决；在安排干部、发展党员、选举、招工、评奖、提级、调工资、分房子、发补助等问题上，都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一切从派性出发。这些派性严重的人，以派的利益代替党性原则，认派不认党，亲派不亲党，跟派不跟党，对党离心离德，对同派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甚至随意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坚决支持打击帮派势力的翻案活动

有人提出“如果定我为人民内部矛盾，怎样检查都可以”。

有人说：“我说不清楚由我儿子说清楚，儿子说不清楚由我孙子说清楚，在外边说不清楚到监狱里去说”。

有人否认已经交代过的材料。

有些人采取一致行动对抗清查工作。向他们核实材料，他们都说不知道，要他们写证明材料都不写，让他们下去劳动锻炼都不去，调换他们的工作都不走，反而提出要领导上说清楚为什么要审查他们。

有的人拒不认错。他们不但不在结论材料上签字，而且让自己的家属四出告状。有一些人，用泡病假的手法，同做清查工作的人进行“合法”斗争。他们小病大养，无病装病。找他们核对材料，他们就说“身体不好，想不起来了。”

有的到处写信，说清查工作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做清查工作的人执行的是“四人帮”的路线，甚而说：“我们只知道有人借搞清查要篡党夺权”。要求给他们平反。

还有的人说：“十五年后再见分晓！”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在召开的两次清查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对这些翻案活动，必须坚决进行斗争，决不能心慈手软。呼和浩特铁路局就处理了两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开除党籍和公职，经过法律手续逮捕法办；另一个是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下放基层劳动改造。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整整等待三年，他们还不认罪，真是岂有此理。自治区党委完全支持

铁路局等单位对大搞翻案活动的人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坚决消除派性，促进安定团结，中共淮北市委抓紧党员轮训收到显著效果

由于揭批查运动没搞彻底，去冬今春，有的清查对象又借发扬民主企图把市委搞瘫痪，把主要负责同志整倒。问题暴露在社会上，根子在党内。闹得最凶的是市直机关一些单位，出头露面的是少数党员，组织策划的是个别领导干部。

前一段，由于“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一部分党员思想比较混乱，在许多问题上分不清是非，或者对党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措施不理解，甚至抵触；或者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谈解放思想。

淮北市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公安局宣布：兰考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他的家，抽屉、衣兜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 1 2 0 0 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 3 2 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

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法院判处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 13 年徒刑。紧随张钦礼被捕，被判，兰考的“清查对象”中有 50 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 79 年 12 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

贰 本节简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决定：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它又强调：一定要把揭批查的群众运动结束好，做到善始善终。还有不少遗留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至于那些落后的地方和单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应该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摆在第一位。这实际上就是元老派接过新贵派举起的大刀或大棒，对文化大革命革命左派继续彻底地进行镇压。

邓小平派段君毅、刘杰加强河南省委领导，使河南省成了全国镇压文化大革命革命左派的重灾区。

汪锋到新疆说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把揭批查运动抓紧搞好。

前一段，浙江省委已经为一些全省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去年召开省党代会以后，又处理了二十多件有影响的大案。铁瑛最近宣布：现在浙江全省揭批查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对揭批查运动中遗留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组织一定的力量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这次运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极少数民愤很大、作恶多端、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打砸抢骨干分子，民愤很大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异己分子。对这些坏人，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按照罪行的轻重和悔改态度，给以党纪国法制裁。杭丝联的翁森鹤等人受到了惩处，一些所谓犯错误的人也受到了审查。

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大会，对四人帮在湖南的所谓帮派骨干分子胡勇、章伯森

进行了组织处理。胡勇被逮捕法办。

陕西省委宣布：鉴于我省是个“灾区”，省委前主要负责同志在领导上的严重错误，长时间盖子没有揭开，运动起步晚，遗留问题多，许多重大是非没有分清，许多地方和单位运动搞得不深不透的情况，决定我们在转移工作重点过程中，必须搞好揭批查运动的补课。据初步统计，已解决的“三案”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绝大多数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基本搞清，百分之七十以上已经解脱或做了必要的处理。

万里在安徽说：前一段在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有些事要求急了一些，宣传上有不够谨慎的地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少数人思想混乱，特别是少数青年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当前又出现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有人抓住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大惊小怪，牢骚满腹，埋怨不休，甚至进行攻击党的路线“右”了，攻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偏”了。

反文革派、政变派、翻案复辟派对文化大革命左派镇压打击，不可能不引起革命派的激烈反抗。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也不得不承认存在着这种反抗：有人说什么“我是执行问题，不能算我的账”。理由是他们当时是按照文件办事的，现在党中央已经撤销了这些文件，他的错误也不能算了，应当“一风吹”。有人强调他参加工作多年，不应该因为一段时间里搞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而处理他。有人责问：为什么过去要批判我，应当给我说清楚。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的讲话也透露存在着这种反抗：有人提出“如果定我为人民内部矛盾，怎样检查都可以”。有人说：“我说不清楚由我儿子说清楚，儿子说不清楚由我孙子说清楚，在外边说不清楚到监狱里去说”。有人否认已经交代过的材料。有些人采取一致行动对抗清查工作。向他们核实材料，他们都说不知道，要他们写证明材料都不写，让他们下去劳动锻炼都不去，调换他们的工作都不走，反而提出要领导上说清楚为什么要审查他们。有的人拒不认错。他们不但不在结论材料上签字，而且让自己的家属四出告状。有一些人，用泡病假的手法，同做清查工作的人进行“合法”斗争。他们小病大养，无病装病。找他们核对材料，他们就说“身体不好，想不起来了。”有的到

处写信，说清查工作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做清查工作的人执行的是“四人帮”的路线，甚而说：“我们只知道有人借搞清查要篡党夺权”。要求给他们平反。还有的人说：“十五年后再见分晓！”

而他们对待这些敢于反抗的人，唯一的处理方法就是更严厉的镇压。呼和浩特铁路局就处理了两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开除党籍和公职，经过法律手续逮捕法办；另一个是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下放基层劳动改造。

2010年10月24日初稿

2012年3月16日修改

第四章第一节 十一届四、五中全会 七九年国庆讲话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邓小平关于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邓小平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要点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

全会增补王鹤寿、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蒋南、薄一波为中央委员。

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中央委员彭真为政治局委员。

讨论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一，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其中说，

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我们在巨大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存在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是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

二，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

“在思想上，

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

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也就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因而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

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那种极端荒谬的假社会主义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

他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他们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把几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辛勤

劳动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一笔勾销。

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

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这一小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聚集和滋长，正是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这一切就形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镇压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造成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

在经济上，

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并且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一系列破坏生产的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积极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

他们任意歪曲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原意，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他们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

这一切，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

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的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

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

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在组织上，

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

他们实行的以派为标准的组织路线，他们挑起的分裂党、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我们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

他们口头上也讲讲社会主义，那是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绝大多数人长期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他们口头上也讲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领导，那是他们的反革命帮派统治；

他们口头上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

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贰、 本节简论

叶剑英的七九国庆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的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他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这一讲话着重讲“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真正属于林彪、“四人帮”的东西不多。

这个讲话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奇怪

的是,为什么以后还要反复地讲,而且还要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专门成立一个决议起草小组,还要经过四千人范围的讨论、四十人范围的讨论、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以正式通过呢?这一方面说明很“慎重”,另一方面说明也很“艰难”。要把少数人的结论为党内高级干部的大多数所接受,特别是为全党、全国人民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叶剑英的讲话出来的时候,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2010年10月25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第四章第二节 为刘少奇平反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平反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公开宣传问题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1980年2月29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〇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盗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三) 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四) 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

加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六日下午，华国锋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聪明正副会长访华团时，古井喜实很有兴趣地向他询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情况，并指那张报纸问：“当时的真相是这么回事吗？没有出入吗？”

华国锋说：“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我党的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的长篇文章，

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为‘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

名。”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的文章

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受党中央的派遣，在反动势力十分疯狂、环境十分恶劣的东北，同其他同志一起，发展革命斗争，艰苦卓绝，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刘少奇同志是被捕过，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反动派的法院只得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党、团省委遭到的大破坏，是由于当时在团省委工作的杜兰亭被捕叛变而造成的，刘少奇那时已由党中央调回到上海工作。林彪、江青等一伙用移花接木、逼供伪造等卑鄙手段，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完全是蓄意栽脏。”

从四月份起，《人民日报》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容混淆》、

《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

薄一波的文章《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要求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社论。

社论说：“对刘少奇同志作不公正的判断和小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扯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曾经进行得非常广泛，非常持久。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既然是假的。就必须宣布是假的。如果中央明知是假的，由于计较暂时的利害得失，秘而不宣，不予以平反、不予公开平反，那就背离民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信于全

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中央宁可承担可能由此产生的某些风险，也不能不下决心为刘少奇平反……”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中共中央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

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出席。

华国锋宣布追悼大会开始。

邓小平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刘少奇同志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敬爱的刘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难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贰、 本节简论

关于刘少奇的历史上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搞清楚。除非发现新的证据，人们只能存疑。

刘少奇三次被捕问题，肯定他叛变的根据不是很充分，特别有一些是事后人们的

证词，这些人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又可以翻供。否定他叛变的根据也很不足。
至于刘少奇在建国以后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他的亲属，都已经公开承认；刘少奇执行的是一条与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这说明，毛泽东关于在党内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的判断是正确的。

2010 年 10 月 2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四章第三节 审判江青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邓小平华国锋在胡耀邦汇报两案审理工作时的讲话

〔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两案审理工作，邓小平、华国锋讲话摘要〕

邓小平：

……应该判刑的人中，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人的多少、判几个人要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判，按集团案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要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小的罪行不一定写那么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华国锋：

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对于两个案子，不管判刑也好，党纪处分也好，总的精神要把我们党的传统发扬起来，就是要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站得住脚。

将来究竟用什么方式审判？审判的时候，这个情况我们再研究。审判时，这些人可能胡搅蛮缠。比如江青，她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中央的一些同志。

当然，我们不怕这个……但为审判效果好，要仔细想一想。

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就是在审判之前，估计到张春桥会怎么样？姚文元会怎么样……以便好好对付。

胡耀邦说：

我们起诉，就是要起诉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这是由头。

一九八〇年三月某日，彭真关于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两案审理工作的讲话

〔彭真：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

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是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苏联在证据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只靠口供，搞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办这个案子同审理其他案子一样，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判。

公安部要打头阵，检察院是第二道程序，法院出来就扎实了。起诉书要拿到书记处讨论，要报中央常委批准。一定要搞好预审，时间不要限制得过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不要过早登报。

假定“四人帮”罪行有一百条，挑最重要的上二、三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要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从公、检、法的角度可以管，但情况不熟。彭冲同志也刚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抓到底。

……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

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林彪、“四人帮”他们搞专案，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我们不能这样干。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历史是指这个人一贯表现怎样？现实是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有个外国人讲，中国人非常怪，好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就是好，坏的占百分之四十九就算坏。这样复杂的案件，不从事实出发怎么行。希望你们搞案子的同志，要很好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篇文章，要有这样的认识论，我们党如果能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观点办事，我们党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要有个专门班子看原始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时可以当顾问。

必须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讲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几十年以前的事，谁能看得那样准？有一年在怀仁堂，×××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讲这玩艺。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次，江青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庭审江青“长沙告状”。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

庭审一开始，法庭上就宣读了张玉凤揭发的王洪文和毛泽东谈话时王洪文说的一段话。然后要王洪文作证。

王洪文说：“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的建议是我提出的。江青只是提出要我赶在邓小平到长沙之前去。”

江青说：“王洪文只讲了一句实话，这就是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的建议是他自己提出的。其余都不是真的。”

接着法庭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出庭作证。王海容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这时，公诉人要发言，审判长点头允许。公诉人江文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挠邓小平聘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

当法庭宣布暂停以后，江青坚决要求讲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第三次，庭审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法庭出示证据：第一件是一九六八年初专案组写给中央的报告，上面有谢

富治二月二十六日的一段批语。第二件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青写给专案组的一封信。第三件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江青给北京京剧团讲话的一段录音。第四件是一九六七年江青批准关押的十一人名单。第五件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江青批准逮捕刘少奇厨师的报告。法庭按照中央的意图，就是要证实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是江青直接搞的。

江青回答说：“不错，我是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是，我是受中央的委托而参加的。是毛主席，还不仅仅是毛主席，还有周恩来等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而参加的。而且，我当时只是一个助手。不能说，专案组的一切工作都是我直接指挥，事实上也不是。”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法庭继续调查江青“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

“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

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

江青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第五次，江青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法庭调查首先提出江青通过张春桥要郑君里交出江青三十年代的信和照片问题。其次提出了赵丹和夫人黄宗英被抄家和受迫害的问题。第三是关于迫害三十年代的女佣人秦桂贞的问题。

这次法庭调查出庭出庭作证的人有：江腾蛟、黄晨（郑君里夫人）、吴法宪、秦桂贞等等。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六次，庭审江青“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一件是江青要求康生送给她一份诬陷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

第二件是江青诬陷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是叛徒特务。

出庭作证的人有廖沫沙。

江青对廖沫沙说：“我知道你是个叛徒，就是个特务。”

江青对法庭说：“你们为什么让这样的流氓和无赖跑到这里来作什么证？他就是叛徒，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你们也是叛徒的同伙！”

审判长曾汉周说：“不允许你在这里辱骂证人。”

江青说：“我就是讲话，廖沫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敌人，是在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无耻特务！”

曾汉周下令：“将江青押出法庭。”

接着出庭作证的人还有王昆仑。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七次，庭审江青“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还没有宣布调查开始，江青就提出了抗议：“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江华：“可以，你问吧。”

江青说：“法庭是不是刑场？”“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

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主席时，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

江青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这次法庭调查提出江青诬陷王昆里通外国、诬陷孙瑞是特务、诬陷刘白羽是叛徒、诬陷陈荒煤叛变，还诬陷时传祥是工贼粪霸。还诬陷阿甲和林默涵是反革命。在江青的煽动下，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遭批斗致惨死。

出庭作证的人有时传祥的儿子、阿甲。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八次庭审江青，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江文发言，他说：“经过第一审判庭的六次法庭调查证实了本厅指挥被告人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罪证是确凿的。其主要犯罪行为有……”。

接着江青发表辩护词：

她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她继续说：“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

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她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

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与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她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下，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

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江青的辩护词，讲了近二个小时。

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九次庭审江青，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二十四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拿起了一叠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

“项庄舞剑，意有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动。穷凶极恶，大现（显）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隐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只手难掩天下耳目，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辈（能）。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我）人民大众（的）英雄……”

审判长曾汉周说：“被告人江青，你在法庭上继续攻击和诬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不准你继续散布这些违反法庭审判规则的言论。本庭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

江青大声抗议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么一手。你们就是害怕我讲话，就是不让我讲话，你们就是想法子不让我讲话……”

她的发言，遭到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现在，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你们这个法庭根本就不敢把事情真相讲清楚。华国锋和邓小平对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有过赞扬的话。当初他们对刘少奇采取的是和我一样的态度。他们的一些表态和检查就在我的保险柜里，你们可以去拿嘛。为什么你们不敢把他们传过来对证。我要和华国锋对证。他就是新的证人，你们……”

审判长打断江青的话说：“法庭已经传唤了证人作证……”

江青打断审判长的话说：“你们完全是假的，为什么我要的证人你们不让出庭？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骗人的！”

曾汉周：“法庭将追究你新的犯罪。”

江青说：“那就让我多长几个脑袋，割了算了嘛，我在这里……”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话，宣布：“现在我宣布，本次开庭全部结束，把被告人江青押出法庭！”

就在江青身后法警突然出现，将江青双臂反扭，连拉带推，押出了法庭。

一路上，江青不断地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第十次，江青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本庭经过四十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江青没等念到“缓期二年执行”等段落，她就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两名法警扭住江青，强行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她还要挣扎，大声抗议。审判长立即下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早已等候在江青身旁的两名女法警，冲过去将她的肩膀一架，连推带掇，一阵风般地将她押了下去。

其他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

贰、 本节简论

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名不副实。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林彪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已经作了结论和处理，何须再审。

对江青等人的审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参与审判这个案子的人，成了历史的罪人！

2010年10月27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第四章第四节 华的五个干将被辞职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史委员会

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

一九八〇年二月，陈云谈免除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人职务

〔地点：人民大会堂。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书记职务；同时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召开中共中央十一届五次全会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五届五中全会上，讨论成立中央书记处问题的发言：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各项决议

通过了召开十二大的决议。

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会议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全会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十一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请求辞职的决定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九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〇年四月，五届人大十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原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决定王任重不再兼副总理

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提请人大会议审议 华国锋不再兼任总理 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 李先念 陈云 徐向前 王震 王任重 不再兼任副总理 陈永贵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宣布，他已向中共中央提出并经中共中央决定，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提议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这两项建议都提请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

华国锋说，中共中央同时决定，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党内的五位老同志——邓小

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都不再兼任副总理；王任重已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现在一并提请大会审议。还有，陈永贵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已经中共中央同意，也请大会予以审议。

他说，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是改革我国的政府领导制度的一个良好开端。华国锋受中共中央委托，对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作了说明。

他说，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若干重大的措施，如努力吸收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各级领导工作，加强集体领导，废止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这些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加强和改善政府的领导工作。

他说，为了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和兼职过多，为了把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中共中央决定，党委第一把手一般不宜兼任省长、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县（市）长，以便这些同志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党的重大问题，使国务院以下各级政府能够建立起从上到下的完善有效的工作系统。

华国锋说，根据以上的原则，我向中共中央提出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提议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认为，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是适当的，是可以信赖的。

他说，我们相信，通过这次调整，必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政府的领导，提高政府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关于接受陈永贵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的决议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0.09.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接受陈永贵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贰、 本节简论

新贵派的命运在他们参与发动十月政变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自以为打

倒了左派领导人，自己就坐上了统治地位的顶层；实际上，他们是为自己掘好了政治上的墓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新贵派还只是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只过了一年多，一九八〇年上半年的五中全会上，新贵派的四员干将被“辞职”，胡耀邦、赵紫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成立“书记处”，华国锋就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名存实亡的傀儡“主席”。

关于纪登奎等人“辞职”的情况，纪登奎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1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牙利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

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五中全会没有提到陈永贵辞职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涉及到“农业学大寨”。如果要陈永贵“辞职”，人们就会问：是不是要否定“农业学大寨”。

陈永贵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

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

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

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到了一九八〇年九月，陈永贵也被“辞职”了。

2010年10月29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第五章第一节 十一届六中全会 历史问题决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

对前三十年工作的批评

1， 一九五七年反右，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2， 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

3， 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

4， 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

5， 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6， “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修改宪法，把它取消。

7， 干部的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

8， 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一九八〇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九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国际上很关心，左派党很关心，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

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一向搞鬼，原来在铁路总工会的时候就搞鬼，后来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

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好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一九五九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一年，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

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不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日，邓小平对外宾说，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吃的就是“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二卷 312 页）

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谈话：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二卷 314 页）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选二卷 315 页）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要给人一个很清楚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要恰当。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办。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

这个讲话，经修改后，于八月三十一日通过。

经过修改后的讲话中说：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为表明民主集中制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

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

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不定期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里的专制主我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的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20-343 页）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说：

毛主席，他在一生的后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和国家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的后期错误。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到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我们

干部职务终身制。他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塑像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已建成的钢筋水泥塑像或其他坚固塑像，没有必要一下子全部毁除。现在有一些地方为了塑像的问题引起了争端，中央希望凡是有争论的地方，一概不要拆毁。其他有影响的纪念性建筑物，如需要封闭、拆除、或改造，也一定要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陈云说，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他说，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他还说，多年闭关自守。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转达陈云的两点意见：

一、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二、建议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讨论中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三卷 263 页）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人们怀疑我们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搞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

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第三，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还是-----？）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

第一，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分寸掌握得好：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第二，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

第三，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应该提到华国锋的名字。因为去年十一月政治局的决议是正确的，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变动；现在的政治动态也是必要的。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第四，决议不涉及小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贰、本节简论

把邓小平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这个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讲话，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主要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他在一九六七年作过“检讨”，显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他企图“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这一次，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贯彻执行。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正确内容的思想；而他认为是错误内容的思想，他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他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实际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过去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里所谓“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也是指毛泽东搞“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等等。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这个报告大肆鼓吹“反封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写信，说不能这样宣传“反封建”，不能宣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说，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又找陈云，陈云批了一段话：“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如果宣传上不注意，经济上不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充分利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建主义势力”集团。邓小平吃了这个苦头，再也不提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了。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重点是讲文化大革命。

第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其一，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与“各级领导干部”划等号吗？；“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是否也存在像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人？能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受教育与受打击有没有区别？能说“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了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被“打倒”了，还是“重用”了？

其二，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一个运动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能与整个运动划等号吗？在土地革命中也有过“打倒一切”的错误，能说土地革命是错误的吗？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错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要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并提？他们之间难道说没有区别吗？另一个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有那些是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的？批判江青的这些“罪行”，是不是实际上要批判毛泽东？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

邓小平把它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这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李维汉）给他提供的建议。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坚持批下去了呢？

第四，关于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问题。

邓小平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违心的”，除非周恩来本人有过声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说这样的话。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的检讨、一九六八年的自述、一九七二年的信，除非他自己声明他当时说这些话是违心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替他说这样的话。何况，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过：“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摘自权延迟：《毛泽东与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说成是为了保住自己，这究竟是对周恩来的“抬高”，还是“贬低”？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这些话说明，当时在四千人的讨论范围内，有的人不同意在决议中提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的人甚至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更有甚者，有的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由此可见，在错误思想的鼓动和诱导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混乱。这一些人政治上太幼稚。他们根本想不到：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仅会脱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而且也会彻底否定他们自己。

邓小平究竟比这样一些人要高一筹，他看到了这种危险。要肯定毛泽东思想、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但又要说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邓小平的这些话说明：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口号上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一直坚持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十年，邓小平是基本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此时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认为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已经形成，因此错误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其一，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这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是局部的否定，而是全盘否定。

其二，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这一点，站在相反立场的人也可以同意。只是它不是“耽误”而是教育了不止一代人；它使革命的、民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广为传播。

其三，健康的方面是“二月正流”。这一点说明邓小平在改写党史。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转达陈云的一点意见：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陈云的这个点子的确很高明。本来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什么要写解放前的党史呢？因为只讲建国以来的历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要说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有多大，实在难说。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一看，就会看出，决议对毛泽东持基本

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的思想上通不过。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历史，就会使人感觉到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肯定很充分。所以邓小平很乐意地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又透露了讨论中一些高级干部的更为混乱的思想。所谓“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糟透了，只有错误，没有任何成绩”来说的。邓小平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包括有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这个讲话透露了，决议在四千人讨论、四十人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

一种倾向是，这个决议不要急于搞，搞得不好、搞早了，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另一倾向是，这个决议草稿对毛泽东的评介还是太高了。应该说：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他为了争名夺利、耍权术必然要犯的错误。

第三种倾向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的主张。

看来，在高级干部中，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第一点是打马虎眼，不说是路线错误，实际的具体内容就是路线错误。第二点是策略，先放手让大家议论，扩散到党内外，再收回一些。第三点是实质，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压制“‘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第四点是未来，对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要采取新的态度和政策。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急于要搞这么一个决议的真意了。这个决议出来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发表的“非毛化”的东西，一点也不见减少；只有左派被真正的“框住”了，他们的意见再也不能公开发表了。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不仅根本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断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搞的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这到底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科学评价”，还是搞“非毛化”？

2010 年 11 月 3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五章第二节 华国锋下台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思想上的“核心”，组织上，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一九八〇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这样一来，华国锋这位“英明领袖”、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至九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九日，应邀到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

一九八〇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六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指出：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以后，参加这一会议的一些提出，华国锋同志不适宜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过程中，一些人提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头两年工作，犯了重要错误，要求中央调整他的工作。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时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大会还同意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议。（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十二月五日）

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二十一人（刘伯承、聂荣臻因病未参加，陈永贵、赛福鼎未通知到会）；候补委员一人。中央书记处书记七人列席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到会的二十九人都讲了话。

第一次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根本任务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他在过去四年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

他阻碍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他热衷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

他对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以上四条“重要错误”中，主要的是第一条。

会上，华国锋要求辞去现任职务。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

1， 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2， 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三卷 272 页）

3， 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同时，会议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进行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他为中央副主席。

贰、本节简论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从一九八〇年开始，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和让华国锋“辞职”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相互作用的。只有肯定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完全错误”，才能证明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是重要错误；反过来，要华国锋“辞职”，同逮捕“四人帮”一样，又可以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以上两项过程，从而标志着邓小平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驳乱反正”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

关于华国锋，还可以多说几句。

建国以后，华国锋南下到湖南，从县委书记干起，继而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文革以后，华国锋一直不表态，后来中央点名，湖南造反派把他拖出来，结合进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后又调到中央工作。

华国锋与纪登奎、吴德等人类似，在文革中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人在曹营，心在汉”，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恨不起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爱不起来。表面上忠厚老实，内心里藏着“入党做官，向上爬”的思想。为了应付环境，采取两面派的作风，表面上紧跟革命左派，暗地里与右派勾搭。特别是当上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中央的当然接班人。其实，很明显，毛主席只是把他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安排，不可能把这样一个中间人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一切以争夺权位为中心，把中央政治局中的左派领导人视作自己争夺权位的最大障碍，在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支持下，迅速与元老派结成联盟，阴谋采取军事政变的不正当手段，逮捕了中央左派领导人，并自封为中央主席。

华国锋自认为他的手段很高明，在左右逢源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其实，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派官僚阶层，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提升到中央领导机构和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一旦无产阶级革命派被打垮、被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新贵派官僚阶层生存的社会政治基础也垮掉了一大半。

元老派们为了实现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最好的策略是打着一块合法的招牌。当华国锋提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之后，他就成了元老派争取的首要目标。但元老派与新贵派实行政变的根本目的不同，他们不仅是要争夺权位，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十月政变以后，华国锋一方面醉意于成功的美梦，一方面高喊着“抓纲治国”的口号，抡起专政的刀斧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砍去。而走资派们却忙碌于：思想上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政治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子，组织上抢各级各部门的位子。用了仅仅四年的时间，邓小平就再一次实现了和平演变，把新贵派彻底赶下了台。华国锋虽然沦落到如此下场，但他对自己参与发动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及其后镇压革命派的罪行，至死也没有任何悔改之意，真正做到了死不悔改！

2010年11月4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五章第三节 邓小平继续批毛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陈云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卷三 274 页）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胡耀邦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我们党的一致看法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一场灾难，这十年使我国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党组织都遭受很大破坏。我们实行的改革是两个方面的。第一是政治方面，主要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恢复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第二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重要的是进行经济调整。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说，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三卷 246 页）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们干了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毛泽东——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

的规律办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三卷 115 页）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三卷 134 页）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左”的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三卷 136 页）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三卷 141 页）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三卷 155 页）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邓小平说，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三卷 157 页）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最根本的一条教训，还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

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穷。（三卷 223 页）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三卷 227 页）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邓小平说，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三卷 234 页）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客人说，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搬弄外国的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思想上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中国党的错误，从一九五七年起主要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三卷 237 页）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派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三卷 253 页）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就整个政

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三卷 264 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邓小平说，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三卷 266 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卷 269 页）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三卷 271 页）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的。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

贰、本节简论

邓小平等人对建国后三十年的批评，并没有到历史决议为止。

按照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邓小平的说法，不仅是四人帮，还有毛主席都是要搞贫穷的社会主义！有多少人会相信这种话！

党内的极右派企图在适当的时机，作出一个更彻底的否定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决议，近三十年来，他们从没有停止过这种努力。

2010 年 11 月 5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五章第四节 审判各地区的“帮派骨干分子”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黄兆其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据载：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黄兆其被公安人员带着与赵健民在贵阳市宾馆相见。黄兆其告诉赵健民：“您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当时，我们八派的几个负责人可以随时去中央文革汇报工作，主要是向康生汇报。又说：我不知道划线站队中死了那么多人。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赵健民说：文革，是全国人民一声灾难，云南是重灾区。您，我，都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吸取教训。）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刘殷农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涂晓雷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胡延观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刘光兴反革命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拾贰年，剥夺政治权利叁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何立宽反革命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声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湖南省宁远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大学助教，中学教员，“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一中革委会副主任。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离职审查，同年十月十七日拘留，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叶卫东犯有下列罪行：

-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 二、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唐忠富反革命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小文化，一九四八年一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南运输公司通讯员，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移交我院起诉。

现审查查明，被告人唐忠富犯有下列罪行：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本庭确认，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指挥镇压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张厚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曾任邵阳地委副书记，邵阳地委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依法逮捕，经长沙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人张厚犯有下列罪行：

综上所述，被告人张厚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被告人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向被告夏、朱、胡、张送达起诉书副本。除被告人胡厚民拒不接受外，其余三名被告人均已接受，并办理了法律手续。朱、张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夏不要律师；胡厚民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

七月一日律师去见胡厚民时，他说“我不能让他们演双簧，对不起，谢谢律师先生！”

五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却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怪哉！先将原物奉还，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七月九日至二十一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共进行法庭调查十九次，其中有关夏的四次，有关朱胡张的各五次。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朱夏态度比较好，基本上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朱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在回监所途中看到新华路北湖一带建了很多新房子。他说，这两年发展真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不知道还要不要我参加建设。朱对管教干部说：不错，法庭很文明，我原以为要拷上去、拷下来的。生活也不错，吃了两个面包。

夏第一次受审后说：“开庭的方法很文明，起诉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我应该认罪。”“刚接到起诉书的时候有抵触情绪，看守所干部跟我谈话以后，感到主要事实是对的，枝节也没有什么必要辩了。人总是在变的，经过这段时间一想，就想通了。”夏还对管教干部提出：“我在法庭上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指出来，我好注意。

被告张立国在第一次受审前，律师同他谈话，要他遵守法庭秩序，张当即作了保证。但在出庭受审时，态度却反复无常，对被指控的十九条罪行中的十条进行辩解，对法庭的审问，时而回答“这不是事实”，时而称证人是“有意作伪证”。

回监后，张竟说：“法庭出示的证据不公正，只出示公诉人的证据，这个证据都是由公诉人任意取舍的”，“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

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张先后两次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企图自杀，被值勤民警及时发现制止。法庭调查后期，张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承认部分犯罪事实。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监所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因此，他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故意称公诉人为“原告先生”，称审判员为“法官先生”，称书记员为“书记员小姐”。当法庭调查他策划一九六七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胡厚民连续开庭两次进行辩论，被告人夏、朱、张均一庭辩论完毕。

被告张立国、朱鸿霞既自己辩护，也委托了律师辩护。

张立国在替自己辩护时，只承认自己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而不承认犯有颠覆政府罪，并对被指控的八条犯罪事实进行了辩解。律师在为张立国辩护时提出，第一，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案件发生在十年内乱期间，这一历史背景法庭应予以考虑。第二，起诉书指控张立国的犯罪事实中，有三条不能由张负主要责任：一是一九六七年五月指使编造武汉军区陈再道的材料问题；二是一九七四年三月抢走武汉市委机要档案材料问题；三是一九六九年三至五月的“反复旧”问题。第三，被告张立国归案后，认罪态度有反复，但在法庭调查后期基本上能老实认罪。以上三条，提请合议庭评议时予以考虑。被告张立国在最后陈述时说：十年内乱中我

犯了罪，但我也是受害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恳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我的一贯表现，考虑我还年青，考虑我上有老下有小，给予我从轻判处。

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公诉人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胡厚民的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它）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一九七〇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

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胡厚民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

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一审宣判：

判处涂烈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判处万里浪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蔡方根、陈全生、蔡松林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张羽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魏厚庆、曾凡珩有期徒刑各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贰、 本节简论

一九八二年，政治上的复辟基本完成了：对中央左派领导人进行了公开审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彻底否定，对建国以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批判歪曲。

这个时候，该轮到处理各地的左派骨干分子了。这些人已经被他们在监狱里关押了六年了。

这里收集到的只有几个省的部分材料，希望各地都能把相关的审判材料拿出来晒晒太阳，让大家见识一下。

特别值得敬佩的是，一些同志在监狱里、法庭上作了坚决地斗争，如湖北的胡厚民，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中说：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回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一个号称是“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居然对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实行专政！

2010年11月6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第五章第五节 清理三种人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山西省委严肃处理诬陷迫害李桂花事件 开除宋莎荫、王祥云党籍并建议司法机关追究王祥云的法律責任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谈防止“震派”等人物钻进领导班子

要防止在十年动乱期间的那些“震派”、“风派”、“闹派”人物钻进各级领导班子。现在有的单位，尤其在基层还有派性，厂长、所长、书记被他们缠着，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他们说了算，名无山头暗有礁，影响选拔干部。对于这些人我们不放心。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使用，必须坚持党的政策，一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二要经过实践考察，真正改正错误，得到了群众谅解才行。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了“文革”中那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王洪文。

这时，邓小平便插话道：

一九七五年他（引者注：指王洪文）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陈云文选》第三卷，三〇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陈云说：

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

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

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我们军队有这个问题。尚昆同志讲了，有的团的干部、有的营连干部，那种思想状态、政治观点是不好的，应该看得清楚。相应地，好的也应该鉴别出来。我曾经建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现在还请各路“诸侯”，每一位选十个人，搞出一个名单。光在座的六十几个人，就可以提出近千把人的名单。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总之，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我们有好多事情就是做得比较晚，现在耽误不得。关于体制改革问题，我就讲这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说：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1982. 12. 30；中发 [1982] 55 号

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

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
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
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给以改正错误，
弃旧图新的机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李锐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在贯彻学习中央 55 号文件精神时，组织力量认真调查了本
市“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七起后果严重、群众反映大的事件，取得了较大突破，
从已查清的四起事件看，每起事件中都有“三种人”，初步认定的有十一人，其
中有县团级干部二人，科级干部三人。北京市有一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是个当
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就在这个区上学，多年来无人反映他的问
题，已被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这次到他上过学的学校调查发现，因为他一直在台
上，受害人对他的问题不敢讲，通过做思想工作，被害人才解除了顾虑，扒开衣
服，身上露出累累伤痕，揭发了那位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去
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时，有个新提拔的年轻副部级干部，提拔后才发现原
来是某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问题严重。他曾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说：“我要从夹
缝里钻上去。”粉碎“四人帮”后，他果真通过关系，把他的文章登于“内参”，
因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欣赏，但他的问题很快被中央发现了。

河北省肥乡县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趁召开县党代会的机会，
互相勾结，挑起派性，把党代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中，使坚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
路线、方针、政策的县委书记落选，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例证。

在一些省、市，有的“三种人”公然破坏清理工作，散布诋毁清理工作的言论，
谩骂、攻击、威胁搞清理工作的同志。有一个省的农业大学，有人匿名给负责清
理工作的组织部长写“规劝信”，说什么“奉劝你不要办坏事。不要害人，否则
你将自食其果，还有一个省有这么一个人，帮派思想严重，在这次机构改革中，
利用一份反映当地派性严重情况的内部材料借题发挥。私自翻印散发，带人冲击
新市委常委会，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山东有一个市的水利指挥部的副指挥，“文化大革命”中打过很多人，问题严重。
对这样的人，党委却不愿清理，想等机构改革时调下来算了。

现在就有些“三种人”公开向揭发人和搞清理工作的同志说什么“我们后期会有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清理‘三种人’多则五年、少见三年，非翻过来不可。”

原清华大学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编造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同志的材料，多次带人揪斗部队领导干部，抢枪，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损失。象这样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由于他善于钻营，隐瞒了自己的问题，新单位不了解他的历史，一再被提拔重用。直到中组部将群众来信转去后，有关单位派人进行调查，才对他作了免职处理。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锐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第四，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纯洁组织是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目的。“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三种人”中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确定是否“三种人”，要既严肃又慎重。对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要作历史分析。凡是有争议的，应报上级党委讨论决定。“三种人”，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

至于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和问题，除“三种人”外，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对于一般性的错误，在这次整党中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对于有严重错误的人，凡属没有作结论和处理的，在这次整党中要作出结论和处理，凡属已经作了结论

和处理，又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不再重新处理。顽固抗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在经济上和其他刑事问题上严重犯罪的人，以及其他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都必须开除出党。对开除了党籍的人，凡是还可以当干部的要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不能当干部的也要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以出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改造，帮助他们进步。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文化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关于“三种人”，很多地方都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反复很多，情况很复杂，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各有各的理解。这个问题，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办起来也很好办。这里面是讲了造反起家嘛，是跟着林彪、又跟着“四人帮”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一段反，后来被打下去了，或者有一段时间他闹腾得相当厉害，后来变成逍遥派了，他没有起家嘛！关于帮派思想严重，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能思想“左”得不得了，后来他观察一下，觉得这样不行，思想变了，这怎么叫帮派思想严重啊？紫阳同志有个意见：十年中间各种人都有变化，有的是越变越坏，有的是时好时坏，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一直坏到底的，和中间有变化的，政策上要有所区别。我同意这个意见。

“三种人”中间，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老干部中间，谢富治是我过去最信任的一个，如果不死，还不是“五人帮”？耀邦、紫阳同志都讲过，康生还不是造反起家！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各地还有些老干部可以说是“三种人”。总的说，老干部在“三种人”中是少数。

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在那种情况下，不能不随声附和说几句违心的话的人，是大量的。

“三种人”容易辨别，实际上，其中多数人的政治面貌，我们也都清楚。其中多数是年轻人。那个时候二十多岁，现在呢，大概是三十八、九岁，或者四十多岁。这些人能量很大，善于拉帮结派。吹捧迎合，改头换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旧社会里面那一套全学会了。林彪提倡那一套，“四人帮”也提倡那一套。这些入中间有的确实有点本事，能写能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会讨人喜欢，也会办事，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他们的基本状况是潜伏下来，隐蔽下来。这些人可厉害呀，手段多的很。他们改换面孔以后，就欺骗了一些人，包括群众，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恐怕是一年以前吧，上海有个材料，反映上海一些造反派

头头，表现很坏的人，现在有的成了我们高级干部的女婿或者媳妇，有的还成为高级干部的秘书。我们有些老干部喜欢这种人，欣赏这种人，甚至重用这种人。他们中间，有的得到了提升。有的还在打打华国锋的旗帜，在这旗帜下面聚集他们的力量。有的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整党中包庇重用“文革”期间有严重问题的人，刘鹏被清除出党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牧车辆制造总厂党委书记、厂长刘鹏在整党中包庇、重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严重问题的人，经查明，刘鹏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中共齐齐哈尔市委最近决定把他清除出党，市政府决定撤销他的厂长职务。

这个厂宣传科的一名副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头头，曾捏造罪名，栽赃陷害干部，搞刑讯逼供、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在1978年的“揭批查”中，群众对这个人的问题就有揭发。1980年市委整党工作组进驻厂里搞整党试点时，刘鹏等人却指派这个人任整党办公室副主任。整党工作组经过调查，向厂党委提出应该免去这个人整党办公室副主任和宣传科副科长的职务，刘鹏表面上同意，背地里却避开整党工作组。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把这个人安排为厂长办公室副主任。后来整党工作组再次提出应免除他的行政领导职务，刘鹏又以材料有“水分”为理由，坚持顶着不办。在刘鹏的袒护下，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1982年还晋升了一级工资。

这个厂有一名厂党委委员、副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齐齐哈尔和平机械厂任厂党委组织科副科长，犯有严重错误。整党工作组和上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经过调查，一致认为这个人问题严重，态度又不好，应免去他的党政领导职务。刘鹏却让这个人当了厂长助理。后来，当市领导来厂检查处理情况时，刘鹏当面说谎，隐瞒了这个人任厂长助理的事实。

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通过调查发现，刘鹏包庇、重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不是偶然的，刘鹏本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齐齐哈尔第一机床

厂设计科当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主任时，就直接策划制造冤假错案，先后揪斗、关押、毒打过 1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并且抄了他们的家，有两名工程师被迫害致死。齐齐哈尔市委和市政府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对刘鹏进行了严肃处理。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人民日报转载云南日报评论员文章《两派造反组织都是错误的》

今天，要根绝派性，就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指出：两派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应该彻底否定。两派没有谁高谁低、谁是谁非的区别。

因为，两派都是“文革”的产物，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行动的。两派的思想路线，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都是眼睛盯着对方，标榜自己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两派都是高喊“造反有理”，造“走资派”的反，踢开党委闹革命，都是为了夺权。

因为，两派都是竭力争取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只要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对本派一句肯定和赞扬的话，或者有利于本派的片言只语，马上成为“特大喜讯”，大字报满街贴，传单满天飞，以此来攻击和压倒对立的一派。

因为，两派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攻过来，我攻过去；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分裂干部、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开始是嘴斗、笔斗，后来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造成惨重后果。

因为，派斗的结果，都是领导干部遭殃。有人说什么“一派是造‘走资派’的反的，一派是保老干部的”，这不符合“文革”的历史真相。谁都知道，当时的两派对领导干部都是有打有保，你打谁我就保谁，你保谁我就打谁，或者是对有些领导干部两派都揪斗、都要打倒；两派都不打的领导干部是极少数。

因为，两派都有极少数坏人干坏事，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其中有的成了帮派分子，有的是“三种人”。说我省揭批查只清一派的不清另一派的，或只能清一派的不能清另一派的；说帮派分子和“三种人”只是一派有，都是错误的。

当然，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并不等于说参加两派的人都是错误的。曾经参加过两派的人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其中许多人对“文革”逐步采取怀疑、观

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他们对派性也是厌恶的，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两派中的坏人都是极少数，但他们人数虽少，所起的坏作用却不可低估，这些人也最想钻派性的空子，利用派性掩护自己。

彻底否定两派造反组织，是克服派性的“釜底抽薪”办法。根绝派性一定要彻底否定两派，这也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原载 5 月 3 1 日云南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道：绝不能让“三种人”留在领导岗位继续掌权 云南省委、省政府整顿被搞烂了的曲靖化肥厂，严肃处理为非作歹的头头 这个厂原来的五名党总支委员中，有四人有严重问题。苗兆太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由一名普通干部一跃而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和农水局副局长，后来调到曲靖化肥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在“揭批查”中，他不但没有受到清查，反而被提升为厂党总支书记。副厂长吕建国、厂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周郁文，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曾经用残酷手段打伤打残干部群众多人。厂长吉学美自 1 9 7 5 年以来，先后利用招工、转正、调动工作的权力强奸过女工五人。

一九八四年六月，上海杨浦区的““清理三种人”运动

1977 年 11 月 18 日，清查工作在全区推开。经广泛发动和深入清查，基本查清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全区确定清查对象 57 人(其中区委、区革委会机关有 15 人，包括区委副书记 3 人、区革委会副主任 1 人)，其中作“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错误的定性结论处理的 13 人，作为说错话做错事予以解脱的 44 人。

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参与夺权、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打砸抢分子也进行了清查。对 31 名犯有打砸抢问题的人进一步核实后，作定性处理的 15 人，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 7 人进行拘审，8 人给以行政处分。

1978 年底，全区清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击入党对象，经审查在 1983 年 6 月前被清除出党或取消党员资格的有 53 人。

将 21 名通过造反夺权或以“三工”（工总司、工宣队、工人代表）名义进入区级机关和工作部门任领导的，调回原工作单位劳动或工作。

1984年6月，区委根据市委关于迅速、深入开展核查“三种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工作，被定为“三种人”的17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13人；上述两项130人中有党员93人，占党员总数的0.4%。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1984.07.31；中发[1984]17号

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清查打砸抢分子，以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中，都清理出一些“三种人”。目前，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发[1982]55号文件）的规定，正在进一步开展清理工作。现就清理“三种人”的若干问题，作以下补充通知。

一、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

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因此，既要坚决清理那些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还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

二、要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区分的根据主要是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或罪行的事实以及情节、后果的严重程度；是在“一月造反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几个关键时期屡干坏事，还是在一时一事上干了坏事、是主要责任者，还是非主要责任者、是有政治野心，品质恶劣，投机钻营，还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要就以上几方面的情况，联系其历史和现实的表现，严肃认真地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考察，确定所犯错误的性质。既不要漏掉“三种人”，也不要把非“三种人”定为“三种人”。

被列为核查对象，经查证核实确属犯一般性错误的，要及时向被审查的同志说明其问题已经查清，必要时还可在适当范围宣布审查结果。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专案”中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或蓄意诬陷，制造假材料，迫害干部、群众，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人，以及对造成上述错误或罪行负有直接责任的决策人，应根据他们犯错误或罪行的具体情况、责任的大小，以及认错认罪态度的好坏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有的定为“三种人”，有的定为犯严重错误。

对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专案”中有过一般过激行为，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四、对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操纵指挥的写作班子中，组织或炮制反动文章、作品，搞乱全国局势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成员；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动思想，粉碎“四人帮”后又反对或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或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攻击党的领导的人，都应定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对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动思想，有意歪曲事实真相，写文章、作品，搞乱全国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局势，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要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事实、情节以及认错态度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有的定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的定为犯严重错误。

对一贯写坏文章和在一段时间、一个问题上写了坏文章，但是后来的确觉悟了，没有再作危害党、危害人民的事情的，应加以区别。

对只是按照当时中央文件以及中央或省一级报刊的观点，写以错误文件、文章、作品，传播过错误观点的，不作为问题提出。

五、“三支两军”人员中，凡亲自或指使他人搞诬陷，搞刑讯逼供，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凡蓄意谎报情况，致使领导机关判断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凡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者，均应由其原所在支“左”单位的党组织负责将他们的问题查清核实，将材料转给有关单位，由这些单位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规定作出结论处理。

在部队犯有“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现已复员、转业的人员，原所在部队应将查实的材料转给他们现在所在单位的上一级党组织，并由这些人员现在所在单位作出结论和处理。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年龄未满十八周岁的学生红卫兵中，有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犯了错误，包括“破四旧”中群众性打人致死一类的严重问题，后来承认了错误，确有认识，现实表现好的，不作为问题提出。

对极少数品质恶劣，手段残忍，致死人命的；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以勒索抢劫财物为目的行凶杀人的；以及有其他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的人，都应把问题查清并记载下来存入本人档案。已经入党的，应开除党籍或不予登记。凡已经作过处理的，原则上不再变动。

七、犯有“三种人”的错误和罪行，现已离休或已达到离休年龄的老干部，凡在历史上曾经为党、为人民作过贡献，对所犯错误做了检讨，不再搞派性活动和包庇“三种人”的，处理可以适当从宽，可以保留其党籍。态度恶劣的要从严肃处理。

八、“两案”受审查人员，凡按中央审理“两案”的有关政策作过处理的，在这次整党中一般不再重新结论处理。

结论处理后又发现属于“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的，或明显有这类问题，没有结论处理的，应作出结论处理。凡事实确凿、定性准确，结论处理后本人拒不认错、表现恶劣的，要从严肃处理。

凡犯有罪行，处理时决定免于起诉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确已丧失或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在整党中应开除出党或不予登记。

九、《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的“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是指那些犯过“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后来觉悟了，转变了，粉碎“四人帮”后能主动如实地交代问题，认真检查错误，并且不隐瞒别人的问题，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历史和现实表现好的人。

对犯有“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在整党中能够主动交待检查，并且也不隐瞒别人问题的人，可在党员登记时予以缓期登记，以观后效。

十、中央在地方的企事业单位，凡党的关系在地方的，清理工作由地方党委负责。中央有关部委要协助地方党委搞好这些单位的清理工作。对定为犯“三种人”错误或罪行的人员的结论和处理，由地方党委统一审核，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批。被列为核查对象的，在问题没有查清以前，不得调出所在单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单位和群众组织，单独或跨地区、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类造反组织的人员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用某报某刊等名义派到各地各单位的“记者”中，凡属犯有“三种人”的错误或罪行的，原驻在地或驻在部门的党组织要主动将这些人的问题向现在所属单位或原所在单位反映，协同查清。

十一、对“三种人”进行组织处理后，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使他们切实做到不再进行派性的串联活动或其他的反党活动。他们中凡有条件工作的，要分配适当工作；有专业特长的，要注意发挥其一技之长，但不得在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工作。在确定和晋升学术、技术、业务职称时，如学术、技术，业务条件合格，应不受影响；在分配住房、困难补助、发放奖金等生活福利方面，也不要受影响。对定为“三种人”的，不得株连他们的亲属。

十二、第一期开展整党的单位，绝大多数是党、政、军的高级领导机关或要害部门，清理“三种人”工作尤为重要，务必加强领导，切实搞好。各级党组织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的方针和政策规定的精神，积极负责地进行工作，妥善地解决好清理“三种人”工作中的问题。清理工作要抓紧，但是不要赶进度，事实一定要查清，定性一定要准确。清理工作一时结束不了的，在本单位整党基本结束后仍可继续进行。

对“文化大革命”中问题严重，现在清理工作又很不得力的地方和单位，有关上级党组织应当派出得力干部，协助他们切实抓好清理“三种人”工作；少数单位领导班子确有严重问题的，必须首先调整、整顿好领导班子。对有意保护或包庇“三种人”的，或利用派性整人，搞诬告陷害的人，经查实，都必须严肃处理。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溪溥的文章《认真肃清“左”的思想影响》

从陕西省前一段整党的实践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能否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关系这次整党成败的大问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搞好清查“三种人”工作的前提。

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

在整党中，我们强调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清理“三种人”。这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健全我们党的关键所在。

“三种人”靠“文革”起家，“文革”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从来认为“文革”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则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听说彻底否定“文革”，有的“三种人”突然改变腔调，说“文革”是错了，我按照“文革”的一套办，还能不错？谁叫发动这么一场“文革”！

说得多么轻松！这不是以否定“文革”为名，行一笔勾销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责之实，以便溜之大吉吗？

“三种人”是“文革”的产物。从这个意义说，他们的罪行，确实离不开“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是，“三种人”并不是“文革”的“随大溜”者，他们是在“文革”中推波助澜的“乱世英雄”。他们参加“文革”是怀着私心、野心，真刀真枪、死心塌地造反的，干坏事有发挥、有创造，破坏性极大。而且，这些人往往是“十年一贯制”的“死硬派”，有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坚持极左的一套，明里暗里同党、同人民对着干。

黑龙江省伊春市有个帮派头目王福绵，“文革”中曾用烟头烧脖子、用硬币刮肋条等酷刑摧残人。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办《民音》报蛊惑人心。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拉帮结派。1982年伊春市委进行机构改革，王福绵一伙扬言“成立两套班子和市委干”，先后到五个区、十六个单位，纠结三十余人，张贴大字报、小字报，冲击机关，扰乱会场，搅闹法庭。类似王福绵以及报纸最近揭露的湖南邵阳的王安义这样的人，劣迹昭著，罪行累累，能把他们的罪恶同在“文革”中犯有一般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等量齐观吗？能说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就认为他们情有可原吗？当然不能。

“文革”是要彻底否定的，“三种人”是要坚决清理的。不坚决清理“三种人”，对“文革”的否定就不能说是彻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部门、地区和单位，有的“三种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还在受到庇护，甚至被列入“第三梯队”，受到重用。随着整党的进展，应当把坚决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来了。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中央组织部动人事部关于犯“三种人”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人如何参加工资改革的通知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陈野苹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薄一波在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闭幕时的讲话第四点，关于清理“三种人”的工作问题。

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提醒全党：对“三种人”，“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去，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又说：“最危险的是‘三种人’。”“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因此，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搞得好不好，是衡量整党工作走不走过场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三年半整党中，全党动员了二十万人专门搞核查工作，大家克服种种困难，排除种种阻力，辛辛苦苦做了大量工作，同其他整党工作一样，是有成绩的，对成绩一定要充分肯定。这次全国共清出了五千多“三种人”。还清理出四万多犯严重错误的人。这就是成绩嘛。但是，这个数字是大是小，是否符合实际？还需要请同志们认真想一想，看一看。核查工作遇到的情况很复杂，难度很大，取得现在这些成绩，的确不容易。但也应看到，不少单位在查处中确实存在偏松偏宽的情况。有的“三种人”至今还占据着领导岗位。这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事例作根据的。小平同志把这叫做隐患。浙江省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就说过，有的地方把“三种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人，把犯严重错误的人定为一般错误。既然定为“一般错误”就用起来、提拔起来了，而且有的在短短几年内，一级一级往上提，甚至提到了高级领导岗位。我看这种现象，大概不是一个地方和部门存在。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从全党来说，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还没有完，还不能与整党同步结束。各级党的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认真查处，不可留下隐患。这次会上不少同志指出，对这个工作的进展不要估价满了，否则容易丧失警惕。

贰、 本节简论

从一九八二年召开的十二大开始，在大规模公开审判各地革命左派骨干分子之后，又开始在现有的领导班子中清理所谓的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了。

“经过三年多的整党，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整党前处理了约 4 0 万人的基础上，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又清理出“三种人” 5 4 9 9 名，犯有严重错误的有 4 3 0 7 4 名。”

毛主席领导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厉害了，在共产党内、人民群众中培养起来的革命造反有理思想和革命造反分子，怎么批判、镇压、清理也搞不彻底，真叫走资派们伤透了脑筋。

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六章第一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河南省

壹、本节概述

一九九二年七月，赵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全省五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了清理。”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已处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名。(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107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70%，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降职2人。

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

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 5 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厦职的寥寥无几。县级副职被审查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这里，需要说明，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老同志。

在揭批查中，许多地方、单位仍然沿袭“文革”中“上挂下联”那一套，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因上、下级工作关系受株连、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数量更多。群众反映：河南搞揭批查是“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 10 万 6 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 1967 年到 1976 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 13 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 80%。中央组织部 1978 年 12 月向全党发了《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制订了统一的政策。如果河南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怎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结果？

1981 年 1 月 5 日，省委书记胡立教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到揭批查时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 1700 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 5 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焦作市，判刑 96 人，却抓了 318 人，劳教 37 人，抓一两年放的 185 人，死亡 11 人。究竟抓了多少人，有的说有四千多，有的说有七千。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之多。这里面，确实有些人是应该抓、应该判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犯有一般性错误，不应该刑事处理的。

揭批查时，许多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大都诚恳地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许多同志的审查，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给他们作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有许多是假案、冤案。例如：

原许昌地委书记纪忠良同志，文革中，本来是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叶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的，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件正常的工作，而且是办了一件好事。揭批查时，却被说成是“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叶县剿段匪案”，硬是把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说成好人，将纪忠良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审判时，在法庭辩论中纪和律师已将其“罪状”全部驳倒，却硬是给纪忠良同志判了 10 年刑。

平顶山市委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法办，登了河南日报，上了电视，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所称被打的同志，也矢口否认许打过他。经过调查，省委承认搞错了，并对他说：“你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后来却又判了六年刑。

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委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判 10 年徒刑，罪状骇人听闻到离奇的程度，因此案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大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事。

文革中，群众组织发生打人的事，有的同志根本不在场也不知情，也以“策划”的罪名判了刑，这样的情况相当多。等等。

1979 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 1980 年元月 1 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手脚”，就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夕，公然对抗党中央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79]64 号文），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在全省大搞“突击判刑”。为阻止这些人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该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和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压给县区级法院判决。这次“突击判刑”，全部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审判时，既不出示证物，又不准本人申诉。有的没有起诉书：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材料：有的人法院已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但已关押三年多了，说：你如果不上诉，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上诉，十天内提出，然后在监狱里等着。平顶山市委付书记钮保华，判刑 8 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

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顺手在 8 字前边加个 1 字，改为判刑 18 年；平顶山市委付书记晁思忠判刑 13 年，晁问：为什么判我 13 年，法院说：钮保华判 18 年，项玉田判 12 年，你取个中间吧。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照原来担任职务高低来确定的。由于时间十分仓促，“判刑”进行的十分草率，洋相百出，形同儿戏，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尊严。

事后，当有的家属向法庭审讯人员询问时，审判人员竟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他没有问题，不应该判罪。但这是省委指示，我们不过是奉命办手续”。还说：“你不用上诉，上诉也没用，这都是省委领导定的”。

据反映，这次“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 2400 多人。这样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却既没有省委、政法部门的文件，也没有领导人讲话，是赵文甫、丁石、李蔚几个人直接向各地、市政法部门负责人个别交待的，行动十分诡密。究竟是经省委研究决定的，还是他们背着省委搞的，不清楚。

在“突击判刑”前，省公安厅的同志曾向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戴苏理书记反映：在省看守所关押的省直机关抓的 100 多人，经审查，有 90% 以上是不该抓、不该判的。当时，戴苏理说：“不要说那么多吧，我看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该抓是有的”。省委领导明明知道有那么多冤案，为什么不但不纠正，反而硬着头皮强行判决呢？

省委有的领导同志还宣扬说：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

“突击判刑”，是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一个典型，和赵文甫直接有关，他应负主要责任。这和赵文甫文革前反右派搞翻番，（注：58 年春，反右派已告一段落，赵文甫下去检查，认为不彻底，要补课，结果，在本来已经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反右倾在河南打二十万“小潘复生”的极左搞法，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赵文甫泄私愤、搞报复的一贯思想作风的故伎重演。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并党中央的一封信》

清查的面搞大了，处理得重了。尤其是一批为党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被冤枉了。

揭批查扩大化的后果，严重影响河南党的团结，干部队伍思想上结的疙瘩很大，隔阂很深，心不齐，气不顺，政不通，人不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政治关系没有理顺，是河南工作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二〇〇〇年八月，一丁：《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

从1977年到1983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击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

1983年11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份的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份250人）；免于刑事处份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份的107人。

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1954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1983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97年6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栖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1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2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

党察看 2 人，撤职 6 人，严重警告 1 人，批判后离休 4 人，降职安排 2 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 1 1 8 人（缺焦作），批判处份 9 7 人，占 8 2、3 %。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 7 人，判刑 1 7 人，开除党籍 4 人，留党察看 9 人，撤职 1 8 人，严重警告 4 人，批判后令其休息 2 8 人，降职下放 1 0 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 5 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9 8 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

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 1 9 6 7 年 2 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 2 0 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二 000 年十一月二日，杨止仁：《关于文革问题的一封信》

一、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河南文革一开始，我首先听到郑州大学一部分学生因贴出批评校党委转移大方向，点批“反动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的大字报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并操纵一部分学生保党委，贴出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

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字报，使学生分裂成为两派相互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后，仍继续维护校党委，压制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逼得一位学生领袖跳楼身亡。其它几所大学也相继发生类似情况，不久，运动波及工厂和省直机关。省委机关一些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打字员、女保育员起来向省委、省委办公厅领导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许多次批斗打骂，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进食堂吃饭，经常在食堂门口围攻他们，往脸上吐痰。罚他们扫院子、清厕所。与此同时，省直各机关都打了一大批“反革命”、“黑帮”、“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小三家村”等等，给他们戴高帽子，脱赤脚、脖子里挂着鞋子，在近四十度的阳光下和滚烫和柏油马路上，伴随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和沉闷悲怆的锣鼓声，被各单位的领导人率领着臂戴红袖章的人押着游街示众。我爱人 1950 年元月参加革命，很早加入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只因出身地主，在赶地主婆时，一个政治扒手硬是造谣说听见她骂革命群众滚回去，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拉入戴高帽游街的行列。当时整个郑州市各街道成群结队，涌满了被街示众的“反革命”队伍，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爱人回到家时，脚被炙热的柏油马路烧伤，加上强迫行走在一处堆满碎玻璃渣的地面上，双脚血迹斑斑，我给她将刺进肌肉的玻璃渣一点一点挑出，用酒精消毒包扎好。在她脚疼得不能走路的情况下，仍强迫她挖土方，进行劳动改造。

1967 年 2 月省军区介入，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并操纵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大肆逮捕二七公社各组织的领导人。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造反派头头被关进监狱，把支持二七公社的省委领导人纪登奎也监管起来。各单位都对加入和支持二七公社的人员进行清查批斗，限制人身自由。一部分坚持战斗的二七公社成员被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围攻，开始发生武斗。特别在毛主席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把两派群众组织搞颠倒了，把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并提出要让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汇报时，省军区和后来被中央文件正式定为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赵文甫，以及河造总、十大总部的头头共同策划，要在向中央汇报前，尽快把二七公社全部消灭掉，造成既成事实，使支持二七公社的刘建勋、纪登奎成为光杆司令，无法作为一派的领导干部向中央汇报。在这

一决策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了，在省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下，十大总部、河造总出动数百辆大卡车，头戴钢盔、柳条帽，手持大刀长矛，在郑州市口行示威，声言要血洗二七公社，动用吊车、推土机围攻二七公社被迫退守的几个据点，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烧毁国棉六厂大楼，许多二七公社成员惨死在血泊中，受轻重伤的不计其数。在郑州市大街上，随时可见围攻毒打二七公社成员的事件，甚至有人喊一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认为是同情二七公社也立即遭到毒打，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在实现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以后不久，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军区第一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借军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政，又将二七公社一派从新建立的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整下去，很多人又挨了批斗。并将矛头指向省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对纪登奎的夫人王纯以反军罪名批斗数十场。

1975年初邓小平一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进行全面整顿，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整顿实际是全面翻案，又一次整造反派。河南许多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再次挨整，有的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锻炼。

尽管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述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在毛主席逝世后，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中央提出“像打日本鬼子一样打国民党一样”的口号，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实为彻底围剿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毛泽东同志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为邓小平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障碍。

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我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2年参加工作的老红军）、唐岐山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后到郑州铁路局当八级老技工，文革中铁路局造反派领袖、后当选为九届、十届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周民英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首当其冲。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6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和也听

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里。姚还没有呈送到毛主席手里，就被逮捕抄家，该内参被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的主会场 12 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

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仍给我结论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董万里同志，却因未得到及时治疗，于 1977 年 10 月 3 日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周民英因为新华总社坚决不同意河南省委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

二、我对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逐渐激化不可避免的一场决战。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同志立刻敏感锐地嗅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要翻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各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泽东同志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法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已严重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来。所有这些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也曾设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后来经过深思改变了这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 1942 年整风是根本不同的。

我也曾想若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后来感到也不行。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

我正是通过对以上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和再三思考，才感到 1966 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三、对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客观现实是我们的老师、老将、老总们在文革中有几个表示拥护、支持愿意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继续革命呢？相反他们几乎都站在了对立面，对运动进行百般指责，强行反对，毛泽东同志自然是无法用他们的。

对于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始终是非常信任重用的，而周恩来同志也是始终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心一意协助毛泽东同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

至于林彪，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压根对他只不过是利用。“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那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并不能表明毛泽东同志真正心意。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并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林彪的。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等人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狱中和受审的表现看，除姚文元受私念驱动表现不够好，江青、张春桥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尽管江青有许多曾被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错误、弱点和被人们指责的一些问题，但就江青的大节，她至死是忠于毛泽东同志、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我们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我们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

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泽东同志，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都将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她和杨开慧同志一样是不愧于毛泽东同志夫人的称号的。

四、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产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在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段时期，而这恰恰也是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 B52 旗帜打击 B52 力量”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接受的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说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流着热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青春的宝贵生命。

从河南情况看，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一个坏人，这并不稀罕。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但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规模武斗这样的事，主要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

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和各级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至今仍然是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力量。

五、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毛泽东同志对文革的估计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

我认为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文革是胜利了。

许多同志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失败了，一方面是对文革中出现的那三分错误看得太严重，对其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认识。另一方面是没有如实地看到文革取得的上述伟大成果。同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巩固文革的胜利就逝世了。

修正主义重新上台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文革的成果全部葬送了。而且，它已经不仅仅是推翻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且，实际上也推翻了建国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目前我国已不仅仅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复辟。我们能够因此认为我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华国锋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他在毛主席逝世后被修正主义的旧势力吓倒了，为保住他的“英明领袖”的挂冠，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才导致修正主义重新上台，葬送了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华国锋是葬送我国几千年革命成果的千古罪人。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摘录

1979 年底到 1980 年初，短短几个月，238 名运动案从全省各地被押送到这座监狱，一进门，他们就把自己的正式态度一一登记在案，其中一名认错，其余全部不认罪，“谁有罪”？！或者用洛阳一位学生领袖签在判决书上面的话：“我们是你们的罪人，而你们是历史的罪人”。当漫长的监狱生活开始后，为了促进学习，我们相互告诫自己，“我们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在将来的岁月里，如果历史再一次给了我们机会，而我们不能尽到责任的话，我们将对历史认罪”！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至今，我们还没有忘记。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日，郜国荣：《关于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出现的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

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突击抓捕，突击审判的错误政策，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判刑近万人。量刑轻重以革委会职务高低排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隔离审查、批斗处分者高达数十万人。河南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抓捕依据之误，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足令人瞠目。

抓捕罪名随意更改，上诉二审强硬驳回，有的人以反革命罪被捕，定案却以诬蔑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的诽谤罪判刑；有的以打砸抢偷偷罪被捕，定案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抢夺公章罪判刑；有的以反革命暴乱集团罪被捕，但却缺乏反革命的罪行证据。主要是文革造反派头头，可以说无一人幸免。判刑之重，加刑之随意，令人不可置信。我们含泪于万千冤案中仅举几例：

（1）周口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宝安，以反革命打砸抢罪被判刑十年，服刑期间因一句话又被加刑七年，合并执行十七年。单独关押镣铐锁身五年半。

（2）焦裕禄的好战友、党的好干部、兰考县人民的模范书记张钦礼，以煽动兰考文化大革命罪被判刑十三年，出狱后贫病交加，含冤病逝。各界人民送葬队伍超过十万人。兰考人民“哭声直上干云霄”。宏大场面，感人的情景，连新闻录实记者也不禁弹落敬佩之泪。

（3）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八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在 8 字前加个 1，改为判刑 18 年。平顶山市委副书记晁思忠，判刑 13 年。晁问，为什么判我 13 年？法院说：钮保华判 18 年，项玉田判 12 年，你取个中间吧。

时任中央主席职务的华国锋关于“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查到底，不能留有死角和漏洞，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的讲话，是造成河南乃至全国文革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

《张钦礼在“揭批查”中》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

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杨捍东谈揭批查》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

24 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兜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

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 1200 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 32 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

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

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判了我 5 年徒刑。

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

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那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

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

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

二〇一〇年四月，杨止仁：《痛悼梁心明同志》

1947年，解放区贯彻刘少奇主持的土地会议精神，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中，梁心明同志因说过有些地方不给地富分田或少分田分坏田，还不准群众给地富讨饭吃，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是逼地富投靠还乡团，不利于对敌斗争。我们是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制度，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富阶级的人。被上级错误地整成包庇地富丧失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直到1982年，许多老同志为他鸣不平，他的老战友高扬同志（原河北、吉林省委书记、化工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他说，你历史上受的处分是个大是大非颠倒黑白的路线问题，要弄个明白。应找中央组织部给以解决。梁老才写申诉呈宋任穷，经中组部复审，彻底平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梁心明同志在吉林工业大学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反和批判资反路线的群众，并妥善正确处理两派群众的矛盾，引导两派群众联合团结起来夺权。军宣队进驻后，支持方向错误的一派，对梁心明同志进行残酷迫害，长期不分配工作。

梁心明同志被迫申请组织调回原籍，任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郑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梁心明同志在“清查运动”中又一次受到了批判和不公正待遇。

1982年9月离职休养。

他写于 2000 年完稿于 2003 年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贡献》一文，约六万字。扼要深刻叙述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和重大贡献，是一篇很有助于人们学习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光辉理论的重要著作，曾由“毛泽东旗帜网站”作为重要论文印成专册发给全国读者。

他以党民声的笔名为工人阶级撰写的《工人阶级的呼吁》一文中，大声疾呼：“在 21 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情和毛泽东时代大不相同，不是热烈欢庆，而是满怀激愤地大声呼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坚决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使已经站立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再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党政腐败已发展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为什么屡禁不止，越反越腐？两极分化已发展到触目惊心世界之最的程度，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熟视无睹？不加过问？贪污腐败，赌毒黄拐，凶杀抢劫种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沉滓泛起，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工农大众已完全落回到雇佣奴隶地位。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大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几人相信？”“把工人农民逼到无法生活的地步，还不准上访，许多上访者遭抓捕。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也常常被警方驱赶抓捕，这还叫什么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工人阶级高呼：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共同富裕，不要两极分化；要真共产党，不要假共产党；要当国家主人，不当资本奴隶！”

2001 年，梁心明同志写了个六百字的《八问各级领导》：一问党政腐败已到天怒人怨地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请问上梁不正在哪里？二问百万千万亿万富翁遍布各地，为什么不敢承认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三问国有企业长期大面积亏损、破产、倒闭，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是何原因？对于这个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听见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党全国人民做过严肃认真的交代？四问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大力推广承包制是谁提倡的？结果如何？党内总结过教训吗？五问九十年代从上到下刮起招商引资滚动战略，大上项目之风，造成了多大恶果？六问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领导阶级，可现在变成任人宰割的奴隶、讨饭阶级，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讲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吗？七问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工农创造的，他们得到的回

报是什么？八间市场繁荣、两极分化，少数人富得流油，多数人穷困发愁，这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

关于党的十七大，梁心明指出：“十七大党章正式写入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而且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在实际上同十六大的提法有所区别和批评。但是讲了那么多，没有讲一句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并且仍然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中国和世界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只要有矛盾就有斗争，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我们一边，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一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

梁心明同志在评说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时指出：“这种宏观调控，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矛盾。旧的矛盾暂时缓解一些，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堵不胜堵。根本问题是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滋生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为借口实行的改革开放，是招商引资把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革开放，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现在的实际结果已经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再也欺骗不了人了。我们必须彻底批判清算这条道路，。”

关于三个代表，梁心明同志指出：“抛开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讲代表先进文化；抛开阶级分析，讲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抛弃的实质是三个否定，即：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再强调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一个新社会阶层，否定它是新资产阶级；否定劳动价值论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公开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已经过时；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没作任何说明，就删除了原来党章上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条文。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范畴被打入禁区了。可是宣传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把党的性质赤裸裸改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据此规定不愿意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

梁老在笔记本中对赵紫阳等人的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真面目都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和怒斥。赵紫阳说的更清楚：“所谓改革开放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发展经济。不要考虑什么民族资本外国资本了，中国人多资源少，不融入外国资本，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梁老的笔记本上用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万里这个极其恶毒的反党反马列毛主义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特别揭露了他迫不及待地要清算毛泽东思想，欲从天安门上撤下毛主席像，取消毛主席纪念堂的反革命罪行。指出“万里这个人从真正意义上讲，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混入我党内最顽固的走资派。”

梁心明同志 2006 年撰写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国有企业必须重振雄风》，被当时《神州强国人才大辞典》编委会举办的神州强国人才优秀文献（作品）评选活动中评为特等奖。

梁心明同志的长篇叙事体小册子《留给后代的故事》也约六万字，他用生动的笔触，扼要叙述了他一生坎坷不平的革命战斗历程，是革命者和青少年的一本很好的革命政治教材。小册子最后的简短结束语中说：“我一生坎坷多难，有人认为是我心眼太死造成的，很多同志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其实对于个人得失我都不在乎。一个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真正共产党人，应当把这种坎坎坷坷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风风雨雨，因而更应感到革命者的责任重大，更应坚强地同一切错误东西斗争到底。”

《中流》、《真理的追求》被停刊，巍巍同志被隔离审查，梁心明同志对这一赤裸裸地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搞全民党的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坚决支持大力宣传推荐《中流》、《真理的追求》的继承者孙永仁、时迈同志主持的《毛泽东旗帜网站》和《毛泽东旗帜文萃》的发行工作，坚决支持巍巍同志和肖衍庆同志主持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坚决

支持《主人公论坛》、《中国工人研究网》、《乌有之乡网》等革命和进步网站的工作。

我们完全可以说梁心明同志的一生，是真正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大无畏的一生。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直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帝、官、封、资、修斗争了整整七十三年，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未松懈过斗志，一直忠心耿耿坚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高尚最宝贵的革命品质。我们要以切实学习梁心明同志的这种革命品质，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战斗精神，把反帝批修灭资兴无的伟大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以告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在天之灵，告慰梁心明同志的忠魂。

二〇一〇年七月九日， 红旗渠惨遭破坏及林县大冤案

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在毛主席去世后受到了排挤和迫害，红旗渠也被否定，灌溉发电功能严重受损。

打击迫害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的帮派势力是文革期间被走资派操纵的势力，他们文革期间打着造反派的名义搞打砸抢行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修建红旗渠。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上台掌权破坏红旗渠，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迫害修建红旗渠的功臣们。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过程来看，河南省有三个“第一”：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表明态度支持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名列“第一”。

在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镇压、打击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数之多，处理之严，判刑之重，在全国名列“第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河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在全国名列“第一”。

向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 年 11 月 8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六章第二节 湖北省

第二节 湖北省

壹、本节概述

胡厚民在狱中坚持斗争

胡厚民 1964 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只得从命。1983 年元月 20 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 年 1 月 17 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 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 20 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祇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 12 年。——钟逸注）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 1983 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墙，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 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

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 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 年 9 月，76 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 4 年零 9 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 1976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992 年 3 月 9 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 年 10 月 31 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 53 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吴焱金在看守所作打倒华国锋的演讲

当时监号内张贴的监规落款仍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制定”，我对干部（犯人对看守的称呼）说：“你们既然仍承认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为合法政权机关，那么以篡党夺权的罪名关押我就是非法的。我当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我没有夺谁的权，是别人夺我的权，我决不会遵守什么监规。”我曾写下打油诗道：“监规上书革委会，要我遵守理太亏。若还承认革委会，你就要听我指挥。究竟谁夺谁的权，哪个错来哪个对。除非主席亲口讲，我已不知该听谁。”

我不守监规的表现是，画上大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张贴在监号内，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大声朗读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我在监号的墙壁上刻满了我写的各种打油诗，例如：“慷慨赴死固可赞，事到临头并不难。最怕坐牢人有病，不死不活长期关。”“我只服从真理，决不屈从压力。”

“烈士是刽子手成全的。”“本是平常老百姓，党有号召即响应。一心紧跟毛主席，十年奔波干革命。光明磊落心无愧，热血满腔天作证。忽报‘元凶’就是我，冤狱五载何处申？”“自遭冤狱愤慨多，无处申诉闹一所。墙上刻满打油诗，对窗高唱《国际歌》。吟罢唐诗背宋词，绝食抗议免吃喝。演讲打倒华国锋，半月隔音室内过。”在看守所，我以写打油诗消磨时间，某虽无才，写打油诗却是信手拈来，刻在墙上的、写在纸上的、写在开水桶上的总共有 1000 多首，虽然诗歌的艺术水平不怎么样，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牢房生活和当时的心情，恐怕不是那些大作家们闭门造车能想出来的。我走出看守所时，片纸未能让我带出，我创作

的那些打油诗是被抄去作为罪行存档，还是被看守所人员当废纸扔了，至今不得而知。现将我在看守所写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打油诗摘抄几首：“舍得一身剐，什么都不怕。无私心自宽，有理走天下。”“看破红尘万事休，无私无畏即自由。粉身碎骨折磨够，不过洒血抛头颅。要杀要剐宜趁早，从重从快快动手。纵然有理无处讲，砧板上面一块肉。”

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华国锋署名的长文《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一看就大骂华国锋是骗子，是两面派、阴谋家。我心想，我从未反对过华国锋，在批斗逮捕大会上却将我扣上反华主席罪名，我今天干脆大反特反，大不了将我拖出去枪毙。于是我在全看守所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以最大的声音作打倒华国锋的讲演，大骂他是叛徒、骗子、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这一下不得了，干部带领枪兵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牢房，一拥而上，把我丢进隔音室监禁，再也不怕我闹事了。

这天来了一位市公安局孔副局长，人称孔铁嘴，找我去谈话。我不但绝不承认我在看守所演讲有错，还说关押我也是非法的、错误的。我跟毛主席太紧，你们却污蔑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从没有反过华主席，你们非要给我扣上反对华主席的帽子，那我今天就真的反了华主席，让你们按这个罪名给我定罪好了。我多次见过毛主席，我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毛主席批准的，为什么不说我是毛主席帮？我多次见过周总理，一块吃饭、喝酒、看电影、照相，为什么不说我是周总理帮？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把我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我身体有病为什么不给我治病？你们说我有罪为什么不公审？……我侃侃而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孔副局长不耐烦了，一挥手，枪兵不送我回隔音室，却将我送回原监号。我拒不检查，也被强行解放了，以后对我提起公诉时也不提我在看守所公开大反华国锋的事，因为华国锋那时已经被撵下台了，成了又一次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吴焱金笑评当年判决书

26年前，当法官将判决书交给我时，我看都没看，当场撕得粉碎，以表达我的愤怒。2004年因为要解决“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养老生活费，省政法委必须审核当年法院对我的判决书，没有判决书，无法认定我是“两案”人员，拿不到生活费。我只好到原审判单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了当年

的判决书，证明了我“两案”人员的身份，才领到了养老生活费。

说起“两案”人员，也挺有点意思，当初我们竭力辩解，想与“两案”人员分开，证明我们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联系，我们参加文革只是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而已。但当局硬要说“你们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有思想联系”，一定要将我们打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只好认了。久而久之，我们觉得这顶帽子也不错，感谢当局高抬了我们，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最忠诚的学生和夫人江青组成反党集团，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一般人够得上这个档次吗？所以，我一直不对“两案”人员的帽子表示异议，相反觉得这顶帽子挺好，戴上这顶帽子，与毛主席更近了。当年参与审判“四人帮”的律师不是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是“五人帮”吗？审四个人实际上是审判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已是现在不再质疑的世界公论。

可偏偏刘祖平那些人不知怎么想的，跑到省委去闹：我们不是“两案”人员！这次省政法委立即采纳刘祖平的意见，发文将我们改为“‘两案’被审查人员”，彭祖龙气得大骂刘祖平是“蠢货”。这么高档次的帽子为什么要摘掉呢？刘祖平等入见省政法委如此听话，以为省里对自己是“言听计从”，又得寸进尺提出要彻底平反，这可是超出了省政法委的权限。虽然这个要求合理，中央不开口子，省里岂敢自作主张，只能说刘祖平等人的想法不合时宜，太天真可爱了。

一般人大约很忌讳谈坐牢，更不愿让人看判决书，似乎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些人则不然，我们问心无愧，光明正大，顶天立地，无事不可对人言。当局为整我们动用了全党、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全部社会资源，残酷折磨人的非法隔离审查，挖空心思编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们的家抄空了，祖宗三代查遍了，亲朋好友查遍了，连丈夫、妻子、儿女都要强迫揭发、交待。如果用当时整我们的方法清查如今的腐败官员，大家想想会是什么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还用我多说吗？

今天重读二十六年前的判决书，我不但毫无当年的愤怒，只觉得好笑，越看越乐。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我的第一条罪状是参加毛主席号召的一月夺权，我不过参加了一次会议，吵了架，夺权流产。这一条，矛头是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当年邓小平替刘冰转信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毛主席大怒：“告迟群、小谢，矛头是对我的。”明目张胆否认

毛主席直接支持的“一月风暴”，矛头不是指向伟大领袖又是指向谁？还用我辩护吗？

第二条罪名是：污蔑七二〇为“严重政治事件”，在《六二四战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诬称武汉军区搞了“反革命暴乱”，煽动同伙把所谓“党、政、军”内走资派及公检法，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在小报上的文章与 1967 年 7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提法完全一致，当时全国军民也是这么跟着表态的。硬说我小报的一篇文章“致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实在是牵强附会，难道我的一篇短文比中央的指示威力还大，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欲加之罪，也太缺乏法律根据和事实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连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也不承认我迫害过他们，相反的百万雄师司令俞文斌在 1972 年出狱后曾带领几个头头亲自登门看望我，对六二四屠杀工造总司群众表示道歉，并对我们在七二〇事件后没有对百万雄师群众进行报复表示感谢。只是当时在我心中由于六二四血案这道坎过不去，对俞文斌等人非常冷淡，没有说一句原谅他们的话。三十多年后，俞文斌见到我说：“我们对你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你是个老实人。可是当年我们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你一言不发，搞得我们下不了台。”

第二条罪状也不需要驳，因为当时对武汉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表的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1967 年 7 月 27 日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明确提出“四个一小撮”，当时解放军大游行也喊了这种口号，偏偏我在小报写一篇感想就成了罪状，我可没有中央的调子高。为什么不批中央而扣我罪名呢？恐怕至今也找不到我迫害任何人的证据，相反跟我造反的群众被无辜屠杀二十八人，杀人者竟成了有功之臣，活着的被封官晋爵，当上局长，死了的被平反昭雪等等，这又是哪一家的法和理呢？

第三条罪状是领导“反复旧”。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亲自解决此事，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五二七指示》的文件，我为此作了数不清的检讨，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到这里升了级，成了颠覆政府的罪状。大家知道，所谓颠覆政府，应该是指颠覆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我是红色政权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巩固红色政权。究竟是谁颠覆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还需要我说吗？如果我真的颠覆了无产

阶级政权，早该成当局的大英雄了。

第四条罪状是批林批孔搞“放、平、补、提、纳”。这也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当时的实际的。省、市委当时都在转弯子，主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放人、补台都是省、市委决定的，我们作为文革中一直被打压的人，当时提这些要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如果我们真的“夺了权”而且“横行十年”，还用得着为被抓、被整的战友去要求省、市委“放、平、补、提、纳”吗？只能说明我们当时也是被整肃、被打压的弱势群体。

最后一条罪状是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更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可以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参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我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联系实际，促省、市委转弯子的，省、市委后来也开始转弯子，还在襄樊召开转弯子经验交流会。不仅如此，十月政变后，华国锋为了掩盖自己反对毛主席的罪恶阴谋，稳定局势，不是仍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甚至在逮捕我的百万人大会上不是仍在高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何罪之有？至于说我污蔑给周总理献花的群众是反革命，完全是没有证据的不实之词，相信当局到今天也不可能拿出真凭实据。

我当时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事后，审判长成厚胜对我说：“这都是全国统一定的，你要想辩明造反派无罪，除非四人帮无罪。”一语亮出了底牌：无罪也是有罪，这是政治需要。

谢保安说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

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我在 1979 年 7 月 4 日被放出来。

老曹说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最后基本上是当权派按照政治需要瞎编一气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判的刑，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进行政治迫害。胡厚民被判刑 20 年，朱鸿霞、杨道远、夏邦银、张立国、吴焱金、李想玉、严常等人被判刑 7 年——15 年，我被判刑 5 年。

1980 年 9 月 16 日，曹××“打砸抢一案”一审由青山区法院以“不公开开庭”审理，还不许我请辩护人。1980 年 9 月 24 日完成法律文本。青山区法院将判决书送达我手中是 1980 年 10 月 10 日，这中间放置了半个月。送到我手中，要我签字。我签字如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违背事实与中央精神的判决与量刑，理当不服，拒绝签字。”不知道青山区法院是不是办过这样被犯人拒绝签字的案子。堂堂法院也太失威信，很不光彩。在我上诉 12 个月内对我不理不问后，突然于 1981 年 1 月 10 日下午对我送达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落款日期为 1981 年 11 月 3 日)，将原定我“打砸抢”的罪名改为“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 5 年。我签字为：“不服，冤案。曹××”。1981 年 11 月 17 日，青山区法院又将一审判决通知书送到我手中。他们荒唐到不公开开庭，一审检察院也拒绝派人参加，竟然没有公诉人出庭，法院不许我请辩护人，剥夺我的人权，二审连过场都不走，拖了一年，因我已被关押了 5 年，就判决 5 年，将我赶出看守所。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这就叫依法办案？不知道是依了哪一个社会主义的刑法，肯定不是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办案人员怎么会不知道，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1979 年 7 月 1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文革中，1974 年四届人大通过的法律是保护人民有“四大”的自由，我在文革中所有行为，除了判决书上栽赃我的指挥武斗、指挥抢枪、老干部办学习班时挨打之外，当时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不得判我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我是无罪的，为什么有法不依？我要问，在文革

六一七武斗和五二八抢枪开枪打死人事件中，究竟是谁有罪？为什么真正的罪犯被奉为英雄，逍遥法外？遭到屠杀的一方相反有罪？我拒绝签字，法院竟奈何不得，法律已失去了尊严。

法院就这样解除了对我的非法关押，我走出了看守所，回到家里。也是在同一天，湖北省委和**违背中央的 1982 年 9 号文件对“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人员安置回原单位就业的精神，将我开除公职。他们心虚，他们怕我回到**后，万一有风吹草动，**又是我的天下，他们知道自己是斗不过我的。我坐牢、被开除公职不是我本人有错，不是我本人无能，不是我跟错了人，而是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人否定了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胜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这一代人因听了毛主席的话，因跟着共产党投身文化大革命，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拼死战斗，坐牢，开除，我不后悔，不惭愧。我吃了苦，但感到光荣。我才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是革命造反派的头头。

我高傲地回到了社会。我见到了任何人，从来没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付廉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荇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荇，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 月 27 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 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

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董明会出狱后参加了原造反派头头的聚会

2000 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 20 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吴焱金说文革不能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未曾亲身经历的同志很难理解当年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仅就一些同志的议论发表一点浅见。

一. 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斗私批修、触及人们灵魂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中干的第二件大事，当然不能用简单的权力斗争来解释。如果是权力斗争，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无人敢挑战和能挑战的，毛主席和刘 xx 如果不是路线上的根本分歧，是不需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仅仅是打倒刘 xx，毛主席说过：“我只动小指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于国际国内强大的修正主义思潮这个大环境大气候是分不开的。面对苏联修正主义和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毛主席义无反顾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斗倒极少数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不改变颜色。

假如毛主席不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内走资派就没有分歧了，毛主席个人的权力会很稳固，不用担任何风险。但那就不是大智大勇，令帝修反闻之色变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了。之所以成为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人，就是他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无私和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向一切反人民的思潮和势力作斗争，他坚持治吏而不是治民，这在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强大的封资修习惯势力，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斗争，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试图解决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的一系列巨变，充分说明毛主席不是杞人忧天，不是简单的权力之争。只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我们跟不上他的思想，没能深刻理解他的担忧和英明预见。

1976 年，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是多么深刻和一针见血啊！

二. 难以撼动的官僚既得利益阶层

有同志说：“那么多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怎么会成了走资派？”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正在这里。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些同志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

愧英雄的称号，但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要吃败仗。”“解放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这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英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却又以共产党和老革命自居，帮助这些同志提高思想认识不是简单教育可以奏效的，必须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加以识别和提高。毛主席在文革的整个过程都是强调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对广大干部甚至走资派都是从路线教育出发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指出了走资派的反抗方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生产压革命”，实践证明，走资派和坚持错误路线的当权派自始至终都是用这些方法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由于继续革命触动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和切身利益，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未能有效地争取和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加上军队仓促上阵，普遍并不支左，广大干部的思想转化更无从谈起，一些在群众运动中有所转变和提高的干部很快又缩回去了，甚至总结出：“宁可犯政治错误，也决不犯组织错误”的法宝抱团对待文革。

历史上，帝王反贪，想触动官僚集团也是很难的，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惨遭失败就是明证。同样的，文革也难以撼动官僚利益集团。作为反思，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在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上还是做得不够的。需要说明的是，除上海外，造反派是从未取得实权和支配权的，很难做这样的工作。加上军人长达五年的介入，造反派是没有发言权的。

三. 为什么那么多工农大众成了保守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级领导就抢夺文革领导权，纷纷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官办“红卫兵”组织，在社会上大扫四旧，大抓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权威；在单位里大搞反右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句话，是按照传统思维和方法搞阶级斗争的，矛头向下整群众。除少数走资派蓄意对抗中央，有意转移大方向外，多数干部是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自居的，参加整群众的积极分子也认为自己是听党的话，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他们认为听党组织的话就是听党的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们从未想过培养自己的领导会有什么路线。方向问题。这些群众的基本特点就是

永远听领导的话，做梦也不曾想到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在运动初期，中央提出打倒刘邓陶王，这些群众还是与中央保持一致，都举手拥护的。但到各地方，各单位势力范围内，矛盾立刻尖锐化，当权派凭借手中的权力，迅速扶植保守势力对抗群众运动。若不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广大工农兵那么多优秀同志成了保守派。正是这么一大批群众缺乏路线觉悟和造反精神，很容易被打着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利用。以至于当文革被否定，造反派被镇压下去，资本主义复辟非但没遭遇强有力抵抗，反而在欢呼声中顺利进行。直到国有资产被侵吞，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三座大山压在头上，他们才恍然大悟，可为时已晚。

武汉最著名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一位头头说：“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搞对了，假如再搞文革，我参加造反派，跟毛主席干革命。”三十多年后，两大派幸存负责人多次聚会在一起，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是现实教育了他们。

四. 造反派严重不纯吗？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觉，也是长期妖魔化的结果。事实上，当年造反派头头都是斗争中涌现并公开露面的。处在风口浪尖的造反派（特别是头头）是受到各方面监督的，不仅四面八方千万双眼睛盯着他们，当权派随时可抛出档案资料置造反派于死地，造反派头头本身不过硬是绝对不行的。例如：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钢工总”，七名勤务员，六名是共产党员；“长办联司”主要负责人顾建棠是1953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干部；学生组织“钢二司”主要负责人杨道远不仅是共产党员，也是该校大红人；“新华工”、“新湖大”主要负责人郭保安、张维荣、彭勋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为不让走资派抓辫子，对参加造反派的阶级成份也是十分注意的。

至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只清查造反派，不触动任何一个保守派成员，不仅不能说明造反派内坏人多，恰恰说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和反攻倒算。这些必须站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才能看的准，说得清。实践证明，“五、一六”是借题发挥的特大冤案，湖北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分子六十五万，最后无一人是“五、一六”成员。

今天，我们特别要强调“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湖北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湖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湖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湖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1月10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第六章第三节 云南省

第三节 云南省

壹、本节概述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八日，周金昌等：《二十八年的冤案何时了》

对“八派”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报复。如：玉溪地区、江川县民政科长杨秀杰，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9年入党，任教导员，在吕梁、淮海、渡江战役中，荣立两次大功。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抛尸荒野，不准收尸，现尸骨未存，真惨呀！

江川县第一中学体育教师罗庆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连长，1959年进军西藏平叛，荣立三等功，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处死刑。于1978年9月19日被枪决。

全国开国特级战斗英雄，涂勋（女），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投入劳改。

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县小学老师罗庭祖，1978年4月21日，县委常委决定，写了判决书，盖上县委公章，以反革命，判刑6年。刑满出狱，户口被注销，成为无国籍的人。

志愿军老兵，三级残废人，黄俊杰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以“打砸抢”被判刑劳改。

云南省井备区宣传科长黄继刚，参谋韩清奎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劳改。

大理州13个县市革命会付主任、季振华、周金昌、卜里昂、赵嘉品等13人，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

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兵，李树林，在战争中荣立五次大功，在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中，以反革命被判刑5年劳改。2001年10月5日到北京上访申诉，却遭到公安人员跟踪、盯梢，在昆明火车站堵下，带到大观楼派出所审讯，时间长达23小时才放出。

昆明铁路局的刘绍祖，194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排长，转业铁路局医院任政工主任，在云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 7 年，出狱后，妻离子散，单位不安排生活出路，饿死在家中，七、八天后，邻居发觉有一股臭味，报警，打开门一看，人们都惊呆了：脸上、鼻子、耳朵和脚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日，林进良等十六人：《云南省思茅市“揭批查”运动中的特大冤案》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批判斗争的就有 150 万人-（约为文革中参加这个群众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15 万人，抓捕判刑和劳教的约五十万余人。县团以上干部为 7549 人。

例一，思茅地区景东县为例，全县被批斗人数为 3100 多人，被打伤致残的 1000 多人。从县到生产队撤换干部 1000 多人，抓捕 125 人，由公安、警察、专案组将受审人员五花大绑押到 14 个公社巡回游斗 108 人，正式判刑 53 人，在批斗大会上活活打死 4 人，残酷折磨致死 9 人。

例二，思茅是行署所在地，文革中只不过是普洱县辖区的一个镇，人口不足二万。当时一口气就抓了 103 人，判刑 52 人，逼死 8 人。

例三，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廷祖，被普洱县常委会用 55 个字，以反革命罪判了 6 年刑，出狱后，不给落户，成了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云南清查“四人帮”迄今为止，派了数万干部，折腾了 28 年，在你们认为这个“体系”中一个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也没查出来。鲁瑞林将军是你们认定的黑后台，还捏造了一个一·二四假案陷害他，可中央认为是假案，为他平了反。朱克家你们认定的是这个“体系”的首席代表，目前重新入了党，在恩洪煤矿任部门经理。

50 年代原云南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写了一本《紫苑随笔》有这样一段话：“组织了几万干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一个真帮派体系也查不到，查了 15 年却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执行的是‘党内分裂向后看’。”他们对上不听招呼，听了传达拒不执行，对下，对伤害的同志，又封锁消息，也不平反，直至今日”。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将军在《西南三十年》中写道：“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

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就必然在揭批查中发挥其破坏性和影响-作用……”

景洪县小勐养农场×××党委书记，在解决揭、批、查蒙冤坐牢释放回来安置就业的人员会上讲：过去我有派性，抓你们时巴不得枪毙，才解心头之恨，现在看来错了，司法上的事，我无权解决，现在回来了，同等工龄，别人拿多少，给你们拿多少。

思茅地区主管政法的×××副书记，1998年当听完受害人×××陈述当时揭、批、查时阴风熠熠、杀气腾腾的状况后，感叹道，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啊。”“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不几天他就为这个受害者签发了改判文书。

×××民警，她负责监控×××受害者，2004年8月15日为这个受害者送去了水果、月饼，见面后讲道：×大爹，我也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人家上面叫我来看着你，请你理解，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饭碗也会丢的啊！

思茅地区原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一天与受害人×××不期而遇，他深切地握着手说：这些年你受苦啦，那时人家李德云（组织部长）想抓谁，就抓谁，哪个还敢说个“不”字，就连张文英（地委书记）也讲，老史啊全区凡公社以上一派观点的已经抓了2000多人了，这样搞下去，以后怎么交待！

二〇〇六年三月，云南省一百零七人给中纪委的《投诉状》

投诉人符合法定申诉条件，因不服28年前的冤假错案，分别强加给投诉人的“四人帮黑爪牙、日伪汉奸”（即：杨秀杰的罪名），“现行反革命”、“打砸抢”、“推行林彪划线站队反动路线”、“严重违法乱纪”、“仇视社会”、“行凶打人”（详：证据2）等等罪名，而被处以刑罚（其中杨秀杰、罗庆明被云南省玉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四人帮黑爪牙、日伪汉奸”“反革命、伪军官”“划线站队残害群众”罪，枉法判处死刑并剥夺上诉权而在上诉期内残遭枪杀；详：证据1），故分别向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多次个案提出申诉。

投诉人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前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其余的也是积极向上的青年。历史进入那急风骤雨般的时代，“文革”在全国大地上展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毛泽东主席又带头贴出《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次接见千余万红卫兵，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以批判“资产反动路线”为中心的工作会议，《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引自《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第13页，以下简称《康与赵》；详：证据5），社论指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什么反对不得批判不得？为什么群众一批判一反对，就是反党反党中央？劝同志们不要听这些老爷们的胡说！投诉人就是在这历史的环境下参加“文革”的。

投诉人中按文革《十六条》规定和中共中央在“文革”各时期的决定、指示、文件，和按为宣传、贯彻这些决定、指示及文件由人民日报发表相应的社论精神，对某级党委中的领导乃至省委中的领导人有意见，写了大字报或写了材料按合法渠道交上级党委或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或人民日报驻昆明记者的向上反映的行为，是宪法保护的合法行为！证据2中的判决将此合法行为认定为“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篡党夺权”，是违宪违法的！因为个人不等于组织，地方组织不等于全党和中共中央！因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六条》、中共“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政治报告》关于对“文革”的决议，在当时是合法并应贯彻，因为宪法确立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投诉人的行为是为维护75年《宪法》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符合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以利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规定。因此，不顾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历史政治环境，和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硬要将“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罪名强加投诉人的多数（占80%），是违法悖情悖理的。

被告人从1976年底开始领导“揭、批、查”运动，就是“以人划线”（即：以王必成、赵健民，和以各单位参加过“砲派”的在各单位党委任职的领导划线，凡“保”的是正确派，凡有意见或反对的即是“邦派体系”、“篡党夺权”；这与1957年反右派时，凡向所在单位领导提意见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啊！）“依靠一派，镇压一派”，于是投诉人就先后被所在单位或“隔离审查”

或名为参加学习班实为“隔离审查”而被非法拘禁了。于是投诉人被架喷气式或五花大绑在大、小会上任人批斗、毒打、侮辱、咒骂；有的被挂黑牌游街、游乡、游村，警车广播开道；有的被带上手铐、脚镣拉到大会上批斗……。经过如此的“发动群众”，由各单位对立情绪很大的“砲派”或倾向“砲派”（少数）的人组成“专案组”。“专案组”用指供、诱供、逼供甚至刑讯逼供之非法手段，逼投诉人“交待”、“揭发”问题，证据 2?——这些判决书中采信的“同伙交待”就是用这种法西斯审查方式取得的。这是私设公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否则，被告人必须解释云南各单位“隔离审查”的行为是否违反 75 年《宪法》第二十八条二款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之规定？！“隔离审查”投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少则半年、多的 3、4 年，后来法院将隔离期折抵刑期（详：证据 2），是合法或是以权压法？！哪部法律规定各单位（非司法机关）拘禁公民，私设公堂是合法的？用反宪法、反法律的手段审查投诉人并科罪处刑，是对人权和法制的践踏！总之，案件从审查到起诉、审理程序都是严重违法的！

凡 1980 年前判刑的，都是未经公开开庭审理即下判决（非法剥夺了被告人的诉权），是以未经质证的无效证据支持下判的，如：证 2-2、3 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上山打游击”、“阴谋策划反革命应变活动，妄图上山打游击”等的事实，后被否定就是证明；II 公诉人都未出庭；III 单位“专案”人员参与案件审理；IV 案件经办法官都是“砲派”或倾向“砲派”观点的，显然影响公正判决，如：证 2-3《判决书》（83）复刑复字 111 号，法院确认：A“在‘文革’期间，组织带领职工冲击市委机关”认定为构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B“在市党干会上诽谤重机厂领导同志是‘还乡团’团长”等，构成诽谤罪。先不说“还乡团”一词来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同年 2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

依据 75 年、78 年《宪法》规定，国家审判机关是人民法院。主体不合法的中共普洱县委，施行不须犯罪事实，不须法律依据，对参加，“八派”的该县小学教师罗庭祖，按奈不住派性的愤怒，就亲自出马下判决，“判决书”全文如下（详：证据 2-1）：

对反革命犯罗庭祖的处理决定

经县委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会议决定：对现行反革命犯罗庭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陆年。

中共普洱县委员会

(印)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此“判决”不仅使罗庭祖失去六年的自由，出狱后还遭到吊销户口，失去在中国大地上合法的生存权，用罗本人的话说“被开除了国籍”，至今罗身罹绝境，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判决”中还恬称“依法判处”，如此横行恣肆，真是无法无天，令人发指！在查遍封建时代的明、清历史，像这样的司法行为是绝无仅有的。透过罗庭祖案，可窥被诉人领导的“揭、批、查”运动的一斑，也反映出投诉人所受的苦难。

受害者杨秀杰，山西屯留县人，1946年参军，49年入党，在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从战士提升至连长，1963年以13军123团营教员的军职转业到云南江川县工作，64年任县民政科长。“文革”开始他就被当地“砲派”打为“走资派”，被戴尖尖高帽与县委书记一道被批斗。68年又被江川“砲派”关押在江川县江城镇，后又转移至县人委办公室达半年之久。县革委成立，他被“结合”进县革委任常委。可是，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却被“砲派”诬为“四人帮黑爪牙”、“日伪汉奸”、“历史反革命”而被捕，他在受尽折磨后，玉溪地区中级法院法院胆大妄为地枉法判处死刑。在中共江川县委领导下，为使杨秀杰被枪杀，公然强令县干部、群众签名、盖章、盖手印：“要求枪毙杨秀杰”：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的干部，若不签名盖章就视为与反革命划不清界限，遭大会点名小会批判；家在农村的，凡不签名盖章就不分口粮和现金，……。这样，在虚假的“民愤极大”、“万民签名要求”下，杨秀杰被判“死刑”。

受害者罗庆明，江川县第一中学教师，云南昆明人，解放前任过国民党军校教官（文职），1949年跟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随军进驻西藏，在平叛中荣立三等功。然而，在“揭、批、查”运动中被“砲派”污为“历史反革命，伪军官”同杨秀杰一样，被捕后受尽肉刑，被游街批斗，被打得体无完肤，无法站立，惨不忍睹。同样，在中共江川县委领导下，为了枪杀罗庆明也是逼农民签字，制作轰动全县的“万民册”，造成“民愤极大”的假

象。于是罗庆明也被玉溪中级法院枉法“判处死刑”。

该法院向杨、罗二人宣布“死刑”的第二天，1978年9月19日杨、罗二人就惨遭杀害，非法剥夺了杨、罗二人及其家属上诉权。这哪里是执法，是谋杀！杨、罗二人被杀后，法院不准家属收尸，不公布判决书，还逼迫家属离婚“否则就要斩草除根”；至今法院仍不将判决书给受害者家属！（详：证据 1-1、1-2）。这血淋淋的事实，竟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云南大地上，是在被告人领导“揭、批、查”运动。

大型企业昆明重机厂的“砲派”头头褚英豪，其在 1967 年 12 月“文革”中多次私设公堂，主持审打干部和群众十多人，其中厂党委付书记尚开基被毒打致重伤，该厂“八派”张自荣被铁棒打断手、脚后，被拉到重机厂后山遭枪杀，全身被打成蜂窝状，暴尸荒山，惨不忍睹（详：证据 14）。在“揭、批、查”运动中，由于他“揭、批、查”“有功”，从一般干部提为办公室主任，他利用职权大肆迫害大批参加过“八派”的干部和群众，连 68 年后进厂未参与重机厂“文革”两派的复转军人以及从东北富拉尔基重机厂调到该厂的干部，也被他打成“四人邦”“邦派骨干”、“邦派分子”，并用刑讯逼供、迫害家属的恶毒手段，蓄意制造昆明重机厂“邦派体系密谋武装叛乱，图谋上山打游击”的大冤案（详：证 2-3），使该厂一百多名干部、职工惨遭迫害，其中 22 人被以现行反革命逮捕，高级工程师张大吉被逼自杀身亡。在褚等一伙“砲派”头头的密谋下，重机厂党委 60% 的常委、70% 委员、80% 团干部被打为“邦派骨干”、“邦派分子”，惨遭迫害。以上事实证明，褚英豪就是一个负命案的恶人！然而，被告人“以派清派”，使褚英豪得以飞黄腾达，从文革前的一般干部被提升为中共昆明市委付书记、昆明市常务付市长。这一倒行逆施，激起重机厂广大职工的强烈不满，纷纷举报。褚却加以压制。被告人鉴于群众的压力，于 1984 年 9 月 4 日“免去”褚中共昆明市委付书记的职务，9 月 10 日昆明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免去褚的副市长职务（详：证据 14）。此事《云南日报》、《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可是，1985 年 7 月，“文革”参加“摧资兵团”的普朝柱被提升为省委书记，对褚英豪这么个恶人，不仅不依法立案审查，依法公正处理，给全省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反而将褚英豪又提升为云南省化工厅厅长、省人大常委至退休（详：证据 14）。

大型企业昆明机床厂“砲派”头头 x x x，1968 年将女工 XXX 双脚打断致残，指挥武斗等等恶迹，却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而入党，被提升为付厅级付厂长至退休。

“砲派”大派“专案组长”黄维彬，从一般干部提升至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纪要》制定者之一；

原省委常委常务付省长、现省人大常务付主任刘绍尧，是云南大学“砲派”“文攻武卫”负责人，也是从一般干部提升起来的。

省革委付主任、女英雄徐学惠，因是“八派”推荐以英模代表结合进省革委，即被罗织罪状定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安排一般工作”。

民兵英雄藏族干部、中共云南省委付书记七林旺丹、全国劳模、省委常委赵学全，因参加过“八派”或倾向“八派”，统统被免职。

二 00 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省一百零七人《请求撤销《云办发[2001]11 号文件》的报告》

从 1976 年底到 1983 年云南省委领导的揭批查运动，将云南“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云南帮派体系”全省上下层层清查，抓捕判刑。同时制造了以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为首的“武装叛乱”“武装夺权”“上山打游击”的假案，从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到战士，地方老干部到民兵组织都被“涉案”。云南揭批查受清理审查进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批斗的 150 多万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的 15 万多人；被判刑入狱的 5 万多人，判处死刑 2 人，审查期间捆绑吊打、刑讯逼供，被打死，逼死的千余人。

昆明市寻甸县 13 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全部以“四人帮”帮派骨干篡党夺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两个农民生产队长也以篡党夺权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全县判了一百多人。

处在高黎贡山里的腾冲县桥头生产大队，揪出了“农民四人帮”，分别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生产队长和大队信用社会会计。回民马天祥以“阴谋篡夺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 14 年，妻子被逼疯，女儿被拐卖，家破人亡。

昆明市禄劝县屏山镇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被审查批斗，一名被判刑。生产队长 23

人被关押，数百名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更为荒唐的是，凡被批斗者，人人罚款 100 元，由县委副书记罗应祥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收罚款。

云办发 [2001] 11 号文件统治下人权被肆意践踏，在云办发 [2001] 11 号文件笼罩下的云南大地，依法申诉的公民却成了公安机关的专政、监控对象。

①按申诉上访名单“照单请客”被公安局传唤到各地派出所威胁、恐吓进行审问、笔录，强行在笔录上按手印，更不能容忍的是要被传唤者站到派出所的墙边，象小偷、刑事犯罪嫌疑人一样，强迫照相……人格受侮辱，人权尊严被肆意践踏。遇重大节日、活动、警察、保安人员监视居所，最长达 8 天 8 夜之久。

②在云南申诉无门的状况下，派代表到北京上访，公安警察围追堵截，把上访者从飞机上、火车上拦截下来，关押（称置留）非法搜查行李和随身物品，非法审讯，并强迫照相，使 70 多岁的李树林同志身心和经济受到摧残和损失。

③要求省委撤销云办发[2001]11 号文件，在省委信访室门前，遭警察施暴，将 80 多名 70 岁左右的法定老人，强行推、拖、扭、抬、丢上警车，拉到昆明市体育馆关押。郭继忠当场被扭伤腰，不能动弹，送往医院。膀胱癌患者王伟被强行扭、拖丢上警车受伤，当晚大量尿血，病情恶化，现已去世。十多人老人被扭伤手臂，撕烂衣、裤，扭烂手表。警察对风烛残年老人施暴的 2006 年“3.21 事件”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④为避免老年人再受类似“3.21 事件”的伤害，便采用书面请求省委、省政府、省信访局长预约接访，由 5 名代表参加、时间地点由领导决定。几十次“预约接访报告”石沉大海，有序上访遭无理拒访。2007 年 1 月 11 日，派信访代表到省委信访局讨个回应。70 岁左右的老人们有序地坐在信访接待大厅等候领导来接待代表。省委又下令出动防爆警察 100 多人，多辆警车，到信访接待大厅抓人。老人们手挽手含泪高唱《国际歌》，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抗议和阻止警察抓人，警察两次冲散人墙，冲进接待大厅，将冲击倒地的 9 名老人（其中三名老妇）拖、扭抬丢上警车，拉到市西山区公安局关押，一天不给吃饭……。

从 2006 年的“3.21 事件”，到 2007 年的“1.11 事件”，中心议题是要求省委听取撤销云办发[2001]11 号红头文件的报告和诉求而遭到残酷镇压的。

2006 年 3 月中组部、中纪委派巡视组到云南，云南省揭批查受冤者 3000 多

份申诉报告寄到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向申诉人承诺：“把情况带到北京汇报，研究解决的办法”。2006 年 4 月就“要求撤销违宪违法的云办发[2001]11 号红头文件，向中纪委写了《投书状》有 107 人签名，也给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寄了《投书状》，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2006 年 5 月，胡锦涛总书记到云南考察，巡视组长祁培文和省委书记纪白恩培向胡总书记也汇报了上述情况。

2007 年 7 月，老人们进京上访，五位同志被抓回（一人在京 2 人在途中，2 人在昆明）被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 15 天。

在云南，违宪违法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红头文件”，公民投书控告，胡总书记不管，党中央不管，全国人大不管。老百姓维护宪法和法律统一、尊严、权威，维护自身人权，在中国到底由谁来管？？？问苍天，天不应，问大地，地不答。“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在哪里？？？到何处去寻找？？？

二 00 八年三月七日，李树林等人致全国“两会”的公开信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以安平生、王必成成为书记的云南省委，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把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农民，打成“‘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作为敌我矛盾，动用专政工具判刑处罚，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

云南揭批查运动自 1976 年末到 1983 年，计：被不准上诉名为处死实为谋杀 2 人；被判处刑罚入狱 5 万多人；受党纪、政纪、行政开除公职处理 15 万余人，受审查、批斗的 150 多万人，审查期间被打死、逼死千余人。其面之广，其数之巨，堪称全国之最！

云南以安平生、王必成主政的省委，站在资产阶级的派性立场，利用掌握的权力，违背 1975 年、1978 年《宪法》，所搞的揭批查运动，以决计问罪在先，锻炼周纳罪状在后的法西斯手法，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冤假错案，云南冤狱遍地、一片白色的恐怖。派性既得到利益集团弹冠相庆，加官晋爵。

在其他各省传达贯彻中发[1982]9 号文件的消息，使云南的蒙冤者们，窃窃私语、偷偷议论，传播该文件的精神，希望能纠正云南揭批查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

当国保部门侦得上述私语行为，云南省委再次下令，再用刑罚镇压的手段，对付私议传播该文件的人们！

原云南省交通厅的张显忠、傅觉悟，原昆明市委宣传部的王海泉、昆钢的董时汉，×××的家属陈建英等，都因偷偷传播中发 [1982]9 号文件精神，被以“现行反革命”、“泄密”等罪名抓捕入狱。

云天化的钱厚源因传播了该文件精神，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其高大的身躯被压弯投入囹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保山地区干部滕少清，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保山地区在揭批查中违法、违纪的实际，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公安厅的张××和省纪委的贾××，冒充是“中央调查组”找滕少清调查落实所反映的问题，滕将时任保山领导搞揭批查违法、违纪的问题一一汇报。这次谈话成了他“攻击”领导的“交待”证据。1982年11月2日，滕少清被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云南日报》为此还在头版发了专讯：“坚持邦派立场，攻击清查工作，诬告陷害领导，保山地区邦派残余分子滕少清被依法逮捕”，并配发短评——《保持应有的警惕》。滕少清在狱中受尽折磨，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逼供、诱供、指供。保山地区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对其起诉，最终还是于1983年4月28日，以“诬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为“(1983)保地法判字第04号”。

全省在同一时期，因同一问题被抓捕的都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竟达千余人。这些人被关押的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达三年多。

云南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动用专政工具、舆论工具，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对付传播该文的这群被压在社会底层的没有法律，没有人权尊严的过着苦难生活的人民——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革命者——是为了维护揭批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法纪何在，天理何在？以上事实说明，云南的揭批查，是见不得阳光的！把持省委大权的宗派利益集团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欺上压下，有恃无恐的独立王国。

中发[1982]9号和云办发[1982]26号文件关于“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确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的规定，若执行可缓解政策相对人的处境。当时我们的年龄都在35-45岁之间，具备就业条件，有的具有专业知识，一技之长，安置就业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云南既得利益集团，对坚强地活着出狱的人，是最大的“心病”，必须置于死地而后快，怎么能给“安排生活出路”呢？所以出台云办发[1982]26号文件是作秀，完全是应付中央。云南省委自己出台的文件，自己也不执行，省委、省政府机关被判刑的几十人，一个也没有“安排生活出路”，连昆明市委也不执行云办发[1982]26号文件，全省各地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宪法》给我们就业的权利以及……，统统被剥夺殆尽，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单位当然拒绝安置了，其他单位又不敢收“帮派人物”！这是云南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被政治和生活所逼，我们不断在属地各部门申诉上访无果的情况下，被逼进京上访，为此又被监控、被行政拘留，哪有人权！云南公权力侵权是公开化“合法化”，维权者受打击镇压，云南当局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和法律，……。我们曾多次到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上访，送报告，云南省委、政府、人大领导们 20 多年来，对我们从来是不屑一顾，视同无足轻重的客体，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被剥夺者“恩赐低保”，甚至附加“不得申诉上访，否则立即取消低保”的政治条件。即使这样，全省绝大部分的受害者至今连低保也没有。逼得原永善县农业局长投了金沙江，临沧邮电工人上吊自尽，昆纺工人饿死昆明街头，原铁路局转业干部刘绍祖病饿死于家中，老鼠啃吃了他的眼、耳和手趾、脚趾……2008 年元旦去世的刘荣光同志，都是贫病交加、无钱治病、惨死在家中无人过问。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却是 21 世纪云南大地上“和谐”的现实！

我们这些老年人中，有参加抗日战争，打击日寇的老八路，有参加解放战争，为新中国建立打过仗，负过伤的老干部；有抗美援朝，保卫祖国援越抗美，保卫边疆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改天换地的工人、农民。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那时，我们为了国家的发展，在国家高积累，个人低收入的创业环境中参与共建几十年。

云南省委、省政府 26 年来漠视法律、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 号文件，因而省高级法院对公民依法申诉，明目张胆答复“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法外野蛮律条，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难道不要过问和追究责任吗？，用牺牲《宪法》的尊严、中央的公信力、公民切身权利作代价维护的“稳定”，

能“和谐”吗！？

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李树林等人《关于将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和云办发[1982]26号文件纳入“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报告》

为什么云南把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封锁起来？26年不贯彻执行？这是明目张胆地公然对抗、蔑视党中央的领导；对五万多人的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问题、权益问题，居然可以26年不予理睬，是人民政府、人民公仆吗？

“给出路”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过去，对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清皇朝的遗老遗少都要给生活出路，当今的腐败分子出狱后，不但给生活出路，还给特殊的住房和照顾，为什么对参加“文革”的干部群众，不但无罪判刑，而且刑满后几十年不给生活出路？揭批查运动是云南历史上受冤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受迫害时间最长。“一朝被判（枉判），终身受罚”的封建专制暴政。至今还在施行着。这与依法治国、民主政治的十七大精神是极不对称的，应该解放思想，废除了吧！我们的当务之急：要吃饭！要生存！要治病！要住房！我们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宪法、法律和党中央政策给我们权利被省委和政府非法剥夺了，现在应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真正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依法按政策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时刻了。

玉溪市原文化馆馆长李懋功，1943年入党，揭批查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7年，现已82岁高龄，以每月175元低保，既不够吃饭，更谈不上治病吃药。

昆明市木器厂电工王福生被定为反革命判刑12年，现已78岁，以每月170元低保，何以生存？

昆明市原重工局副局长贺聪，每月到居委会领200元低保，10年不变，这是200元的十年“死缓刑”。

“农民四人帮”是云南揭批查的特色，刑满回农村后，有的不给落户，有的不分土地，昆明市寻甸县就是其中一例。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云南省是“揭批查”运动的重灾区之一。在新的革命时期，云南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云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云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云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11 月 1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六章第四节 四川省

第四节 四川省

壹、本节概述

二〇〇七年二月六日，《四川自贡冤案——为什么四川自贡 260 余人的“反革命”案不能平反？》

在 1979 年的四川自贡市，当时城镇人口只有 30 万，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竟然将 300 多人打成了反革命，被治罪判刑的达 260 多人。

刘世忠；系自贡市建设银行革委会付主任；是赴朝的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多次受到表彰，被 15 军评为模范共青团员。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 年由军官转业到地方工作。因参加文化大革命，1977 年以现行“反革命”被抓，关押两年后又以“侵犯人身，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 7 年。可刑满后，又以要稳定社会为由又强行多服一年徒刑。

罗德祥，烈士家属，在中印自卫战中负伤的伤残军人，退役后在自贡公共汽车公司工作。在文革期中是该单位的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付主任）。1977 年以现行“反革命”被捕，1979 年以“扰乱社会，打砸抢罪”判刑 7 年。

李丹祈，自贡市贡井区医院医生，就因为在文革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群众组织的头头，1967 年被打成“反革命”入狱，1970“一批双清”中被隔离批斗，1977 年又以“反革命”被捕，1978 年以思想反动书写“反动诗词”的现行反革命判刑 15 年，1980 年改判“打砸抢罪”9 年。

惠大铭；14 岁参加工作。系自贡市公共汽车公司党委书记（在这岗位上 10 几年）和革委会主任。1967 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1970 年“一批双清”中被隔离批斗，1977 年被自贡市委点名批判又隔离，1978 年又以复辟资本主义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1979 年以“破坏生产，破坏机关正常秩序罪”被判刑 5 年。

杨远祥；本是东方锅炉厂一般的群众，只因父亲有历史问题，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忠心耿耿跟党走，无限热爱毛主席，1967 年三月黑风就以现行“反革命”逮捕，同年四月被释放 1970 年“一批双清”又被批斗，1977 被当作了东

锅厂的“四人帮”来隔离批斗，同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1978 年底以“反革命罪”判刑 7 年，后又在 1983 年（从判决书的日期知道是 1979 年就改了）以莫须有的“侵犯人身权利罪”改判 4 年（已服刑 5 年）。

陈国荣；是邓关盐厂干部，是文革中该厂群众组织的头头，1967 就以反革命被关押，1970 年又被隔离批斗，1977 年的“揭批查”运动中受到隔离批斗后，又以“反革命”被抓入狱，1979 年又巧妙利用新刑法中的罪名“妨害社会秩序罪”判刑 3 年。

钟墨琴；自贡油毡厂干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1967 打成“反革命”被抓，1970 年被隔离交待，1978 年以现行“反革命”被捕，1979 年又换成“侵犯人身权利罪”判刑 3 年。

郭发明；自贡市人民政府沙湾招待所付所长，文革初 1967 年被打成“反革命”抓入看守所，1978 年以“反革命”罪判刑 7 年。尔后，1979 年改为“诽谤罪”改判 3 年。这都是一个应付的圈套，1983 年才给本人见面。按改判书已多坐 4 年牢。

罗德良；自贡钻井队的普通工人，因文革中很积极，1970 被关押审查，1978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1979 年又以“侵犯公民自由罪”被判 6 年。这个毫无事实，连所谓的受害人自己都否定了的“依据”也拿来定罪，真是荒唐可笑。

颜家正；由西藏部队复员回自来水公司，只因被选为了该公司的革委会付主任，1978 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抓入监狱。后来，以破坏生产罪判刑 7 年。（把在电力部门的停电原因使生产停产也算到了他的头上，就是这样治他罪的。）

邓明启；自公交司的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只不过是一个小青年，因家庭出身的原因，1978 年被定为阶级报复现行“反革命”入狱，1979 年以“打砸抢罪”判刑 5 年。

周兴华；自贡市自流井盐厂工人，只因在文革中当选为自贡市总工会付主任，1977 年在“揭批查”运动中的他被批斗会上时，顶撞了那位批判者：你的问题是四清时定的与我无关。就这样以“破坏了揭批查运动”被抓判刑。

金道渠；原在自贡市农机站工作。因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1967 被打成了“反革命”。1970 年又被以“现行反革命”抓捕判刑 5 年，服刑两年半平反。1977 年以“现行反革命”逮捕，尔后以“侵犯人身权利罪”判刑 3 年。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日，《再次控告中共自贡市委制造 260 余人“反革命”冤案，拒不纠正——数十处沉冤者的血泪控诉》

自贡市委将历史上“揭批查”运动的路线斗争，搞成抓“反革命”运动，又变成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制造了伤害成百上千的大冤案，虽经我们上访党中央和四川省委，上级已将党中央信访局和省委信访办有关纠正这一历史冤案的指示，转达到了自贡市委，可自贡市委收到中央和省委指示后，仍然顶着不办、不纠，坚持其所犯错误。

二〇〇七年十月，寒心：《四川自贡冤案》

（一）沉冤者的血泪控诉——评中共自贡市委滥用权利迫害群众的真像

自贡市委（1977）34 号文件，圈定刘世忠，陈国荣，邱敬华等 10 名“现行反革命”。自贡市委政法党组（1978）15 号文件圈定杨远祥、惠大铭等 11 人为“现行反革命”

（二）历史不容篡改、歪曲：略谈四川自贡造成一批冤案的历史根源——评中共自贡市委滥用权力迫害群众的真象

早在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一开始，自贡的当权者感到，大难临头，为了保自己，躲在幕后，挑动群众，混战一场，借以蒙混过关。首先，找替罪羊，乱点名，乱批斗，把斗争矛头对准了一般干部和群众。比如，当时的“自贡日报”就把普通编辑和记者打成反革命“三家村”；只有五人的自贡市文联，被打成“贝多芬俱乐部”。其中一人反水，另四人打成了反党、反革命。当然，还不止这些。其次，是大搞“红色恐怖”出钱出力，蒙蔽群众，组织保他们的“保皇势力”。在此基础上，不仅是任意揪斗群众，而且大搞“打砸抢”任意抄别人的家，如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候策名等人的家，就是他们指挥抄的，同时还逼死人命，如当时的民主党派副市长罗筱元，就是被揪斗逼死的。可以说被他们整的人，没有当时文件指出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就是这样蓄意歪曲斗争大方向，混水摸鱼，大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制造了害人听闻的历史参剧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下，群众才起来，抵制和批判他们镇压群众的罪行，造了他们的反，自发组织了各种造反组织。这就是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如骨，造反派的起因。可是不到半年时间的一九六七年，全国刮起了“二月逆流”，自贡的“三月黑风”，他们又披挂上阵，把成千的“造

反派”抓入监狱，强迫成千的人认错请罪。“三月黑风”历经 2 个多月被粉碎后。他们受到应有的批判，又装着一副认罪改过自新的面孔，装死躺下，以求一逞

一九六八年自贡也相应的建立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真正的权力中心，已转移到军队代表手中，随着贯彻落实“解放干部”政策时候，他们又痛哭流涕，不断检讨，不断认罪，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当他们恢复工作，重新粉墨登场后，早已忘记墨迹未干的检讨。又大打出手，大力推行林彪反党集团在四川的黑干将梁兴初、谢家祥搞的“一批双清”任意揪斗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使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以办学习班为名，被揪斗关押的人也成百上千。

一九七二年“三结合”革委会中，军队回营，群众代表已被扫地出门，三结合已是单结合了，权利又回到他们手中。对中央（72）14 号文件指出、纠正，梁、陈、谢严重的方向错误和路线错误，他们顶着根本不执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群众的推动下，在上级的干预下，才不得不在“一批双清”运动中，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已判徒刑的钟云奎、付永修案件重新审理。由自贡中院作出了推倒不实词，宣布平反，无罪释放的判决书。白纸黑字，还历历在目。到了“揭批查，他们不仅将这二人又抓去判了徒刑，这种一罪数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不是在开法律的玩笑吗？更为可笑的是，为了欲盖弥彰，嫁祸于人，玩起了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把戏，法院公然把他们干的翻案之事栽在群众头上。在被治罪的几个人“判决书”中，竟写上为罪犯钟云奎，罪犯付永修，翻案的罪责判词。这不是十分荒唐的怪事吗？

以后的“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也是在他们一元化领导下层层贯彻的。

到了“揭批查”、“两案两清”摇身一变，又成了革命的动力，利用种种的权力，把他们的罪恶也强加在群众头上，经过精心密谋策划，阴险毒辣，坑害无辜，毒汁四溅的阴谋出笼，以中共自贡市委大批判组（请注意这是用组织名义）抛出了一个转移目标，镇压群众的纲领。

公然声称：“自贡存在一股‘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一套完整组织系统的帮派势力。有老板、司令、军师、秘书长、参谋团”。这种危言耸听，是令人多么目惊心。到底，这个组织在哪里？有什么计划？搞了什么样的策略？谁是老板？谁是司令？谁是军师？谁又是秘书长？参谋团有多少人？为什么事

过几十年，不给全市人民一个交待？

还说：这个帮派体系提出了一个以“篡党夺权为目地的行动纲领。就是放人、纳新、提干”。不说编造的所谓行动纲领，是多么滑稽可笑。就是说所谓“放人、纳新、提干”也是当时由上而下贯彻的中央指示，而执行者本是他们自己，这一点，他们是心中有数，他们的矛头所指是在整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还一本正经的说：“统一指挥帮派活动”中“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文班子，有打磺枪的武装子”试问，这个统一指挥者是谁？这文、武班子有多少人？造了什么样的反革命舆论？还在那里搞了“打砸枪”？总得拿出实事出来呀！

更有甚者，把一个自幼参加红军，文革受到批斗，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打成“卖身投靠的老干部”。试问，他的身卖给了谁？又投靠在那一个旗下？

还有，天方夜谭之说：“我市的帮派势力”甚至察看地形，拼凑反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这是多么令人恐惧，多么可怕的图景，试问，反革命力量拼凑多少？武装暴乱的武器在哪里？

在自贡就出现了，以“帮派份子”被隔离关押遭批斗；又以批“反革命份子”抓进监狱；在以“刑事罪犯”被判判劳改。各种离奇古怪的事不断发生，造成蒙冤受害者达 200 多人的悲惨局面。

（三）长期背离党中央政策的地方党组织——评中共自贡市委滥用权力迫害群众的真像

（四）略谈四川自贡造成一批冤案原因和纠正阻力何在——评中共自贡市委滥用权力迫害群众的真象

自贡的冤案，一拖几十年，搞得又浑又暗十分复杂。通过现象归纳起来，就是简单的几条：一、自贡领导搞“揭批查”运动的人，本身是不干净的；二、整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没有搞出一个合格的“帮派分子”；三、抓了 200 多名“反革命”，还没整出一个真“反革命”；四、受害人要求执行党中央政策为什么那样难。

“揭、批、查”“两案、两清”是“英明领袖”发动的，继后是“总设计师”主导的，好像是一个“禁区”。

自贡法院当局，故意歪曲，篡改政策法律的明确规定，打着执法的旗号，行贱践法律之实。有一张判决书，他们是这样写的：“被告一九六七年以来，紧跟“林彪四人帮”大搞打砸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另一张判决书他们也是这样写

的：“被告积极参加‘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以“‘反革命打砸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当时历史条件，客观环境，所罗织事实依据存在与否？试问：“林彪”“四人帮”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中法刑上字（79）第 56 号判决书写的是：“强迫市委释放罪犯钟云奎，严重地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另一判决书中法刑字（79）第 1 号写的是“以钟云奎，付永修两个案件为突破口。”“严重破坏了领导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这种黑白不分栽赃嫁祸于人，就符合事实吗！首先，钟、付二人的冤案（事实上，这样的冤案还有很多，只是自贡当局阳奉阴为，百般抵赖，不少无辜者没有得到昭雪。）是受“一批二清”迫害的。为他们翻案主要是中央（72）14 号文件，不仅是群众反映，而且当时省领导赴苍壁，秦传厚等人也干预过问，明确表示了平反意见的。自贡法院为什么要搅浑水，矛盾往下指，不往上面说呢？其次，要说翻案也是自贡法院干的，为什么要推卸责任，诱过于人呢？钟云奎的翻案是：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中法刑申（73）第 71 号，作出了：一撤销一九七二年四月六日公军法字（72）第 85 号判决书；二、钟云奎现刑反革命罪不能成立，予以平反。付永修的翻案是：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法刑审字（73）条 83 号裁定书：一、撤销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军法字第（71）第 173 号判决书；二、给付永修平反释放。到底是随在翻案，不是很清楚了吗？这白纸黑字他们都要公开赖帐，还把责任栽在老百姓头上，老百姓有那样大权力吗？再次是自贡法院还不断翻烧饼，本来钟、付二人已证明是无罪的，已平反释放了。到了“揭批查”，钟、付二人又戴上“反革命”帽子又抓入监狱，又以自法刑字（79）53 号判决书，判处钟云硅侵犯人身权利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 8 年；以郊法刑字（79）第 56 号判决书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判处付永修有期徒刑 4 年。所罗列的所谓犯罪依据都是原来的老问题，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老百姓的权利被非法掠夺了吗？他们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底要干什么？

一工人判决书上说他打了干警某人，经查询干警本人说：“不知道有此事。”很多工人都证明此人，从未打过任何一个人，可是法院却以侵犯人身权利罪判刑 6 年。

还有一位“文革”中批判了本单位当权派，公开写了几张大字报，向市领导提出不同看法的意见，就以侵犯人身权利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 7 年。

在“揭批查”中当局组织的批斗大会上，被批斗者，对揭发人的不实之词当场顶了回去。于是立即升级，以反革命逮捕入监狱，长期关押，实在找不到罪证，又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三年。

自来水公司，为增加供水地区，进行水网改造工程管道，进行正常排空试压。而且生产记录簿上都作了明确记载，法院当局公然发出自法刑字（78）第 43 号判决书，以破坏生产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有一案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后来又改为“诽谤罪判徒刑三年。

有一案于 1977 年 11 月以思想反动、书写反动诗词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又改为打砸抢罪判徒刑 9 年。

有一案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后改为破坏社会治安罪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有一案于一九七七年以发表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 7 年，后改为侵犯人身权利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1968 年该厂一工人说，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自杀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坐飞机到台湾去了。在学习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追查这种政治谣，这本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客观情况，作为该厂领导人，要这位工人把事情讲清楚，也没批斗他，又没宣布隔审查，结果这个工人说不出原因，心中害怕，第二天就自杀了，法院却判该厂领导致死人命罪，判有期徒刑 5 年。

一份判决书，该改判发文编号自刑申法（79）第 78 号，发出落款时间是 1983 年 5 月 3 日罪名由“反革命打砸抢罪”改判为“破坏社会治安罪”刑期由 12 年改判为 6 年。

另一份判决书，该改判发文编号自刑申法（79）第 115 号，发出落款时间是 1983 年 4 月 3 日，由“反革命恶毒攻击罪”改判为“诽谤罪”刑期由 7 年改判为 3 年。

有一人改判为刑期 3 年，实际上已服刑 6 年，劳改单位减刑 1 年，实际上就多服刑 4 年，这 4 年依据法律规定应该赔偿的，自贡法院当局为什么不理呢？

自贡市委及司法机关，明明已经发现错拘、错捕不是立即释放，而是长期关押，千方百计要证明自己抓得对，抓不住这个问题就抓那个问题，抓不住大问题，就

抓小问题。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为了隐瞒自己的违法真象，为了树自己的权威，恃仗手中的权力，用合法执法的身份，任意贱踏政策和法律。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用高压、强制的手段，恣意剥夺受法律保护之公民正当之权利，把无辜百姓当成羔羊，任由宰割。给无辜百姓造成深重之灾难，带来了三十年之悲惨命运，也是“依法治国”在自贡之悲哀。

由于受到不公平之待遇，有不少人，已在贫疾交加中，含冤悲愤之死去。有家属子女受到珠连，死者离世后，气愤之把遗留之判决书等文件都连同一起烧了，以免影响今后。还活着之人，生存权都被剥夺，成了草根之下之草根，弱势群体中之弱势群，无生活来源，无医疗保障，有的没住房。他们已是垂暮之年，靠什么生存，得以苟延残喘，靠妻儿养活，靠卖老命得以生存，能说这公平吗？

二〇〇九年五月三十日，张闯“反革命案”申诉状

1975，9.11 我就被省公安厅特捕了。罪名也与时俱进，一会是邓之社会基础，一时又是四人帮之爪牙；一时是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之反革命首犯，受四川日报大批判。一会儿又是释放在押犯之现形反革命分子。真是嘴有两块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申诉了 30 多年，去年才有两个相互推诿之川渝高院之回答。由此可见，清理反革命帮派体系之实质，不过是走资派之反攻倒算。我被定为反革命帮派，并不意外。

申诉人被指控有四项罪名

第一项罪名是在 1972 年 10 月煽动艾明辉“成立反革命组织”。在一审判决书中，称其“思想极端反动，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妄测形势，搞反革命组织和武装”，“后来艾明辉等人确实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中国劳动党’”（见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将这一段取消，变更为“张闯在成都与艾明辉等召开密会，煽动艾明辉成立反革命组织”，且没有说反革命组织是什么。我们先说张闯等人是否成立了“反革命组织”。据申诉人回忆，他们确实成立了一个叫“马列主义研究会”之学习小组，其主要成员包括后来以经商而颇为闻名之牟其中，以及刘忠智、魏庆江等。根据《人民日报》1999 年《大地》栏目 12 期之资料，当时这几个对政治抱有很大热情之青年，从对文化大革命幻灭中转向对历史与现实之思考，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他们时常聚集到一块儿，学马列，谈政治，热衷分析当时之国内形势。正当他们满怀雄心壮志时，从成都传

来消息，说是广州有一位名叫李一哲（实则是几人）的青年写了一篇震惊华夏的奇文《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张闯、牟其中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弄来了该文，大伙一起研读，一起转抄。受该文的启发，热血沸腾的刘忠智花七八天时间，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与此同时，牟其中也写出了《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和《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两篇文章。可大大出乎张闯、牟其中等人意料的是，‘马列主义研究会’日后会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其首犯就是张闯。正当他们四处宣传他们的‘杰作’之时，‘厄运’已悄悄降临了，后来的结局众所周知：张闯和牟其中被内定判处死刑。”（《人民日报·大地》1999.12，东方明、肖蓉《万县人评说牟其中》）牟其中在1979年12月31日被释放，其他人在其后也全都被平反，只有张闯因还有其他问题于同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但对此事仍以“搞反革命组织和武装”而定罪，只是一审称其组织是“中国劳动党”，二审则未表明是何组织，因为张闯等人以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而被逮捕追究是众所周知的。一审法院的判决就是以此作为张闯反革命案的第一大罪而作出的，二审也没有予以纠正。

这里有必要弄清楚张闯等人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学习小组是否构成犯罪，以及依据什么法律来确定的问题。根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第98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它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由多人勾结起来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犯罪组织。参加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目的。根据此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张闯等人是不能以此定罪的。同属组织者的牟其中等人被释放，也说明了这一点。因《刑法》要到1980年1月1日才生效，而一审判决是在前一天作出的，似乎此案不适用《刑法》；但是，由于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其生效要到1980年1月1日《刑法》实施以后，所以我们认为，此案是应当适用《刑法》的。如果依《刑法》不能认定张闯等人构成“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那么两审的裁判就是错误的。

申诉人被指控的第二项罪是在1974年3月与刘秉新等人密谋策划强行要求万县地委释放在押案犯。一审判决书称，“张闯亲自出面围攻地委负责人”，“在万县地区掀起了一股打开监狱释放案犯的恶浪，破坏了安定团结局面，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也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其时张闯只是科委的一个工作

人员，怎么可能去释放在押案犯呢？一审判决后，张闯以此上诉，二审称是他“煽起了要求放人的恶浪，并非指张闯本人到看守所放人”，“事实上也证明了被告在放人问题上起了主导作用”（但却没有相关事实材料，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以此维持对原判的认定。而实际上，此次释放在押人员是由万县地委决定、并经当时的四川省委政法委书记赵苍璧批准的，赵苍璧后来还担任过公安部长。而放出来的人都是被错误关押，后来都平了反，其中被以“叛徒”罪名关押的王汝章后来做了万县地委科委主任，以武斗而被关押的王杰成了万县地区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在张闯 1975 年 9 月被抓捕时，预审人员还说，“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放人的功劳是苍璧同志的。”此事后来又经过两次反复，最终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张闯就是在第一次反复中被当作“起了主导作用”而被定罪的。在这项罪名上，张闯无疑是冤枉的，应当予以撤销。

张闯被指控的第三项罪名，是 1974 年 5 月参与其同伙召开的密会，策划破坏四川省革委召开的八次全委会，将自己的“签到卡”交给康某某，使其混进会场，推倒桌子，使会议遭到破坏。申诉人认为，这项罪明显有“文革”时期无限上纲的意味。会议的当天张闯还作了长篇发言，怎么可能去策划“破坏”呢？把它作为一项反革命罪，纯粹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因为康某某之前也是四川省革委会成员，张闯才把签到卡给他。后来康某某同与会人员发生了争执，打翻了茶杯，在当时的各种会议上，这种争执是经常发生的，很多时候争执到互相指责对方为“反革命”，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会议继续开下去，但后来却将此事定性为“破坏四川省革委召开的八次全委会”、定性为“反革命”。这里，不排除有将个人恩怨上升为敌我矛盾的作法，未脱离“文革”时期派性斗争的残余。给张闯安上“策划破坏”的罪名，更属牵强。如果不是一审不依法认定，这是不可能定罪的。

张闯被指控的第四项罪更具有任意性：一审判决书称，1975 年 3 月，张闯“错估形势，更加野心勃勃，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恶毒咒骂，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同年 8 月，张闯在听了敌台的大量政治谣言后，更是蠢蠢欲动，决定派人去上海、江浙一带，妄图投靠‘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共谋篡党夺权，以达到其反对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这样的定性对于一个地区的科委工作人员来说也太夸张了，二审裁定

将第一个行为取消，也取消了“妄图投靠‘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共谋篡党夺权，以达到其反对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等重大罪行，只表述为：“1975年8月张闯又利用收听敌台的政治谣言，妄测形势，决定派人到外地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如果此罪成立的话，按照一审的定性，将张闯处以极刑都是可能的；但以二审所述，则为“犯罪预备”，没有实际行为。两审裁判对事实的认定有如此重大的不同，但对定罪和量刑却无变化，这不能不说具有极大的任意性，根本没有体现法律的因素。实际上，这项罪名是强加的，如果严格依据法律，是不能成立的。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八日，布衣山人《关于对全国性“揭批查”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的揭露倡议》

当时只30万城镇人口的四川省自贡市，据不完全统计，在“揭批查”运动中就有260多人被无辜判刑，还不包括被株连批判及隔离审查者。就连当时的四川省革委副主任、32111钻井队的灭火英雄，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模范彭家治，也被弄到全国石油系统进行残酷游斗，将他打伤致残，再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年，且屡经申诉，多年上访，均不闻不问，置诸不理。更多的冤屈者，受制于上访费用的拮据，或者贫病交迫的无奈，或者老态垂危的绝望，或者行将就木的孤寂，已经无力上访甚至连基本的口述笔援能力也失去了。有的甚至在30年上访渴求中，早已抑郁而终，甚而愤懑身亡，含冤而死。乌乎，人权乎，公理乎，孰能哀莫胜于此耶。

文革是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是在拥护共产党，紧跟共产党的前提下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也是为文革时期所肯定和表彰的，也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赞扬和支持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的人民行为和造反行动（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毫无疑问，是符合当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是不但不违宪不违法，甚至为党的九大、十大所明文阐明是“革命”的，而且还是属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甚至连邓小平先生也当时白纸黑字的肯定这一伟大史事，并庄严向全国人民宣告：对文化大革命保证“永不翻案”。这是任何经历过那段历史时期的人们都无法抹杀的。而今，同一个共产党，也是同一个邓小平，现在说文革搞错了，是一场浩劫，那么，“浩劫”也罢，“灾难”也罢，试问，这个“错误”及“灾难”和“尊旨”参加文革的亿万人民群众（包括他们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又

有多大的政治关连呢？历史责任（如果说有“责任”的话），执政党、发动党不去承担，却推委或转嫁在当时就要求对他们“要高抬贵手”的造反派身上，这在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上，说得过去吗？

对一个起源于草根民众的群体性的大派别，不无赤子之心的“党国子民”，竟然进行了长达多年之久的政治剿灭，用了近 30 多年时间进行歧视性渲染，时间持续之长，司法无据之滑稽，受害人众之巨大，直接间接恶果之惨烈，公理和道义之如此乖谬，可以说是建党、建国以来的第一笑话，第一闹剧。也是亘古及今第一冤案，第一奇案。如果说对毛泽东的妖魔化，还不足以、也不敢从根本上渲仇泄愤，而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可以说数十年来动员了所有政治资源和媒輿力量，以尽鞑伐，反复鞭笞，把官仇和私怨通通的一股脑儿的砸在了他们身上，甚至砸向和株连到他们的亲属儿女上（不准入党提干，不准参军入伍，不能进入国家某些公职部门），真是黄天在上，公理何求？是可忍，孰不可忍！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自贡老人 XXX 等《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学《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悟暨给自贡市四大班子领导的公开信》

所谓“三不”规定，实际是一个“全国揭批查运动总结会议纪要”之后，2001年7月19日中纪委以中纪发[2001]第12号下发的一个通知。放在阳光下看一看，它于党纪国法不符，直悖 82 宪法、违反党章；直接阻止与破坏了中发（79）第16号、（82）第9号、（83）第9号……等多个纠正冤假错案及处理文革运动的善后问题的一系列文件、法规；它，严重导致了全国揭批查运动中出现的大批冤假错案 30 多年得不到纠正，有损于党的尊严与威信，干扰了社会稳定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而封杀了信访、导致全国群体事件急剧上升……这种政出多门不仅荒唐至极，是党规党法从来都不允许的！

二〇一〇年四月一日，谢英富：《中央早有文件，四川宜宾文革错案何日得平反》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与时俱进”是无可厚非。但历史事实是任何朝代、任何人无法颠倒和篡改得了的，一个执政党有无能力执政，首先是政令畅通，要政令畅通必须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响应，即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共产党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取得执政地位，是共产党代表人民意愿，以为人民谋福祉为宗旨的执政纲领深得人心，受全国人民拥护，与人民形成鱼水关系，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拥戴才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而成为执政党

的，故历朝历代都将拥护者称作顺民（好民），将反对者才称作刁民（屁民）。不知是时代发展太快，还是愚民跟不上形势变化，故对当今好多事情难予理解，如坠烟海，找不到北。

如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一致通过而发动的，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文号号召全民踊跃参加的，就此而论，不管它“功过是非”，对与错，无论如何都轮不到老百姓承担责任，特别是 1976 年 9 月后，中共中央还公开承担了此责，按理说更不关老百姓的事了，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只能由党买单，何以要在全中国大肆抓捕无辜的人民群众？何以要支一派镇压另一派？特别是四川的宜宾，（原宜宾地区）早在 1970 年初，把宜宾地、市、县三级“革委会”主要成员召进京参加“学习班”之际，宜宾在“军管会”支持下，宜宾地区全部“革委会”均推倒夺权（包括基层）由不同观点的另一派掌权（特别是开启宜宾武斗先河的一派）抓捕镇压另一派人民群众及干部。（更何况 70 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学习班作了重要指示：对革委会只准补台不准拆台，更不准推倒重来。这是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指示的）特别是在北京学习班学习，当权派报中央批捕谢某遭拒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亲自向宜宾秘密指示：等回宜宾再收拾谢某。宜宾军管会硬是等学习班结束在宜宾火车站车箱内将谢某秘密抓进公安局黑牢关押（无任何手续）这不仅在全川或许全国都罕见吧！为什么？为什么？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谢英富：《我为什么至死都要申冤》

我是为响应中共中央全会号召参加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不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更不违条犯法。1970 年到中央学习班学习“地方权力”想迫党中央批准抓捕我遭拒，堂堂中国空军司令吴法宪竟向“宜宾权力”亲下密令：“等回宜宾再收拾谢英富”。1970 年 9 月学习结束回宜，“军管会”硬是在火车站车厢内将我秘密抓进公安局黑牢关押，经一月策划后于拾月召开所谓万人公捕大会宣布逮捕。（反革命）就在上万人的大会上当局叫上台揭发控诉我的共产党员当众向当局领导严正声明：稿纸是你们写好硬要我上来念的，我是组织服从，但决不是我对谢英富的揭发控诉，今后概不负责。

70-71 年地方当局想借“一批双清”和“一打三反”两次判我死刑，都遭到四川党政军一把手张国华（原解放西藏的十八军军长）拒批。“9.13”事件后判不死我了，当局亡我之心不死想黑整死我，唆使武装看守私提我来捆吊在屋

檐横担上，脚尖着地，脰上吊个几十斤重石锁，棉衣包头再用冲锋枪托打我头部致（昏）死。我命大三天后醒转来。当局无奈竟长期关押我九年多，罪名从“反革命”变“五一六分子”，又变“林彪的社会基础”再变成“四人帮”爪牙，直至 1979 年末，眼看新刑法要实施了，在“突击判刑”大潮下，竟以 1978 年中央 48 号文件的“打砸抢”判我拾五年重刑。（78 年 48 号文件判 68 年所谓的犯罪）严重违反“朔及力”的法律规定。

我响应执政党号召，参加文革是实，被选为头头，当了市革委常委，城区公社系统革委主任，我活该受苦落难。可怜无辜家属和子女受株连，房产被抢占，养不活 4 个子女都只好把一女抱给他人抚养。

1985 年出狱，地方当局不管，申诉无处受理，又拖累年近半百的家属。真无人管我吗？八十年代中央三令五申“复查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宜宾竟不复查我这个大案要案，好像我不存在了。可是“学潮”在追查我的行踪；“法轮功”又追查我参与否；连 2002 年拆迁均因我“大反革命”的历史“拆迁公司”也敢逼迁欺诈我，国庆 60 周年因我有“不良记录”地方对我严防死守，不许进京。至今“街道办”都在安排专人监视跟踪我，我想安静的自生自灭的权利都没有，我能不申冤讨清白行吗？

现在太平盛世，大讲依法治国，都在高呼中国共产党英明，我都同意，我也希望和谐。可是地方当局在干什么？按党的“政策层面”中央那么多文件强调“认真复查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特别是中央（79）96 号文件强调的“决不要使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冤沉海底”。宜宾是四川的重灾区（在全国可能也算得上吧！）我的问题也该讨回清白了。按国家的“法律层面”应“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事实和在哪？判决上定的三大主罪之主要当事人不仅证明不属实，反而揭露了地方当局当时想以“逼供信”迫他们招供好嫁祸于我的内幕。特别是我第一主罪的当事人张志荣年近九旬住孤老院，自己的冤都不申了要为我喊冤说明了什么？他认为我太冤了，我根本不在现场的事硬栽到我头上，连累家属子女太不幸了，竟敢为我证明。

现我没有生存权，也没有人权，连死都死不起了，我只能告御状，客死他乡心也甘！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刘金华：《刘金华是什么人》

刘金华是什么人？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工人，文化大革命中是十多万众“WT 革命造反军”的一号勤务员，WT 工代会主任。“二月镇反”就坐牢，一直处在风口浪尖。文化大革命后被赵紫阳点名批判，最后以“积极策划全川性反革命武装应变活动”罪判刑 17 年。下面抄一段法院判决书：

“被告刘金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自成体系，冲击区委地委，围攻揪斗各级领导，大肆为何嘉陵*、刘国文等反坏分子翻案。批林批孔以来，紧跟‘四人帮’，上蹿下跳，网罗党羽，阴谋篡党夺权。进驻地委，妄图夺权。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更加快篡党夺权阴谋，多次与宜宾、温江、成都等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密谋、勾结、窥测形势，无耻吹捧‘四人帮’，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积极策划全川性反革命武装应变活动，妄图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情节恶劣，依法判处刘犯金华有期徒刑十七年。”

尽管判决书曲解事实（我只说三点：1、“三结合”建立革委会时，我主动提出不进入革委会，并到各地做群众的说服工作。当时的情况是，我不开口，革委会就不要想建立；我一个通知，在“清队”中各单位革委会未经工代会同意的被揪斗的造反派负责人立即解放。2、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成绩显著使得当时在四川工作的前抗美援朝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两次来看我，文革后的轻工部部长康仲伦连说这是“一场革命”。3、我对法院、省委和中央讲：谁要指得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自己、家人和本派谋私利，即使是私下密谋的，我都服罪），但可以说明我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践行者，是可以为革命献身的革命者。

我从没有服罪。劳改农场多次提出给我减刑，我拒绝服罪，不接受减刑。因为服罪是减刑的前提。我也不接受改判，我的态度是：要么平反，要么坐穿牢底！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四川省自贡市部分文革老人再次恳请认真执行中共中央（82）9 号文件——给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公开信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理应受到《宪法》的保护。我们本是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分子、英雄模范，我们热爱中国，为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过辛勤劳动，出过力、流过汗、甚至流过血。出于对毛主席、党中央的热爱和拥护，听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对与错责任不在我们，凭什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以莫须有之

罪判刑劳改？！进而剥夺了工作和生存的权力？！现在已是耄耋之人了，生活无保障，生病无钱治，居无住所，在贫病交加中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这公平吗？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川省也是“揭批查”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四川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四川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四川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四川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1月12日初稿

2012年3月18日修改

第六章第五节 重庆市

第五节 重庆市

壹、本节概述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四日，重庆市文革“两案”涉案人员人信访代表曹明忠、苏忠联、雷忠武、唐仁义、牟成彬、袁世勋、周绍华等人《要求重庆市委落实中央文件的报告》

落实文革“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相关政策，不是争论是非功过、翻旧帐，因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讲落实政策，无非就是解决生存问题，有饭吃、有住处、病了可以治疗就可以了。我们这些人小的 60 岁左右，岁数大的已经 70 多岁了，当年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已经成为两鬓斑白的老年人、衣食无着、贫困潦倒的弱势群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平心而论，当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参加文革，内心是拥护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为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而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全身心的投入运动的，如果他们有半点私心杂念，早就成了百万富翁。而几十年来，他们却遭遇如此不公正待遇，真让人心寒。

黄廉：我始终保持自己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我们是突然得知毛主席逝世的信息的，感觉到就好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市委要我和周家喻抓悼念工作，各个单位都设灵堂开悼念会。我回到木材公司去检查悼念活动，书记和副书记陪我入灵堂做入党宣誓仪式，回市革委会向鲁大东作了汇报，他听后好像受到莫大的打击，冷若冰霜，心不在焉地问我吃了饭没有。

下去看到有些群众在悲恸之中哭得昏过去了，有个别干部却在一旁风言风语，说死都死了，哭有啥子用，以后叫你们知道厉害。中央 9 月 18 日追悼会过后，花圈摔得到处都是，干部根本就不安排收拣。9 月 22 日我到成都找赵紫阳，问鲁大东为什么那么敌对，赵紫阳说你还是要着重把计委工作搞好，与鲁大东搞好关系，他还说出现那些情况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嘛。我 26 号回重庆，整个城市一片悲伤，国庆节也没有怎么庆祝。每天从大参考看，中央也有些不正常，我分明看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暗的东西压抑着，看够了那些老两面派的表演，很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十月八号就有群众来找我，说听到国外广播，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重庆大学传说出了大事，到十号的时候，政变谣言已经满街都是了。

18号中央17号文件传达下来了，在市人大礼堂传达文件的时候，我坐在主席台上，念到华国锋任职时，满场掌声，周家喻拍得懒洋洋的，我双手抱胸，没有鼓掌。结果下面就有人喊起来“把黄廉拉下来”，官场上的积极分子们不放弃任何表现政治正确的机会。鲁大东的风度又回来了，他走到我的背后说等下出场你坐我的车，我跟本就不理。会一散，我从主席台背后走，官员们蜂拥而来要在我身上有所表现，我表面上装着无所谓，思想上体验到了一个政权将要覆灭的强烈感受，原来政权中间的聪明人，要抓住一切机会，踩着别人的鲜血爬得高一点，很显然就是他们要表现自己的好靶子。每个人都在一霎那间都理清了思路：自己要为将来的升迁准备一点政治资本。到市委一号楼之后，钱敏说先去吃饭，鲁大东走过来问你事先晓不晓得，我反问他，他说不晓得，我说你跟邓小平那个好，他事先没有告诉你呀。

积极分子庆贺的鞭炮声不断，我住地对面是常规兵器办公室，晚上楼顶架起几挺高射机枪，对天射击整夜代替鞭炮。也有人敲锣打鼓表示他们很开心，第一批上街游行的是文化界的学校，我穿个军大衣，戴上棉帽子，把整个的游行队伍看完。我回到宾馆跟总服务台的寇玉林说，前几天还在毛主席遗像前哭得天昏地暗的人、举手发誓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寇玉林说你讲话要小心，周围搜集情况的人多得很，鲁大东已经布置了公安局。

我从宾馆回到木材站，很多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大概就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变化吧。长安厂来了几个工人找我，说忍了吗？上山吗？有什么办法？也有人说要到体育馆去集合，准备上山打游击，我要他们不要冲动，造反派中间一片心事浩茫，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共产党的未来演变感到忧患万分。有人打电话给13军，回答说是“一级战备”，放假都没有了；打电话去民兵指挥部问李木森，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他来了还不一定走得脱等讥笑言语，可以想见搞修正主义政变好容易了。有个军队的官员跟我开一个苦中作乐的玩笑：你想跑吗？我建议你到尼泊尔，他说他们曾经在边境驻防，可以叫边防军放我通过边境，我说我去尼泊尔干什么。

10月20日我去市委，当兵的拦住我不让进，说里头的领导在开会，我说我

就是领导，他说大东同志让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看见公安局的几个人夹着材料匆匆离开了，大概是因为我回来了，就提前结束会议了。鲁大东问我这几天怎么没来，说这两天你们大概都很忙，真是说不出的和颜悦色。下楼梯的时候碰到常委蒋良志，他要我去宣传部门口看大字报，主要意思都是黄廉周家喻要老是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我说是不是要转回文革初期那样，由我们来当走资派挨斗，有个干部说恐怕还要恼火哟。

那个时候很多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思想一片混乱，老是希望出现奇迹，传说也是千奇百怪，有说丁盛要搞事，有说上海要怎么样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来木材站来的人多了，我就回大坪家里去。看见兵器办公室的人朝天鸣枪当鞭炮，还传达了叶剑英“大吃大喝吃吃吃”的指示，我说你们也太浪费了吧，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自由了，你们还想批判我？

11月8日鲁大东喊我去市委办公厅会议室，鲁大东这一次得意忘形的样子也不想掩饰了，他把双脚翘在茶几上说，17号文件下达之后已经半个月了，你要好好思索自己的问题，你跟四人帮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说你当初反对过中央文革了，是靠都靠不拢吧，你现在是不是落伍了。他说文件下来半个月了，你还是这个思想，觉悟很差，态度很不对头，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带上用具去开会，会上你要表态的，今天我跟你谈话，是代表党组织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跟你谈的，你要认清形势。

14号那天市委来了辆小车，我妻子问我还有什么会要开，我说此去恐怕不再回来了。我到达之后，鲁大东、徐庆如、钱敏都在，鲁大东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跟你宣读个文件，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四川的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从文到之日起，停止工作，不接电话、不会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清与四人帮的关系和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解脱。钱敏说你把与王张江姚的关系说清楚，取得党的谅解，我说你们的级别比我高，经常去北京开会，你们与四人帮的接触和联系比我多得多，需不需要也说清楚。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鲁大东、钱敏和徐庆如都起身走了，屋子里剩下的就是保卫人员了，我起身去卫生间，就有两个保卫人员随行，过了一会军用吉普车就把我送回木材公司，一进大门，三个解放军战士就站在门口设岗，民兵参加值勤的就更多。三楼的一个房间，门窗已经被他们用厚木板加固钉死了，改造成临时

的监舍。他们告诉我就是这里了，里面有四张铺，一个床是新铺盖，这是为我准备的，其他三个床都是监视人员从自家带来的。政法学院的一个主任柳传成说，他是市委“清查组”派来的，我和公安局的杨孙两位处长，在这里陪你学习，每天负责收集你的交代材料，我们早上 8:30 开始，下午是接待外调的时间，晚上 6:30 休息，去厕所解手要有人陪同；天气冷的时候，有人会给你送东西，本单位已经管不了你。我想要给周家喻家里打了个电话，看他是不是也被隔离起来了。这一个电话还没有打出去，门口又给我加了两个岗哨。经常有人冒充外调人员来找我谈话，本单位也有不少人走到楼梯口来看，由于隔离措施很得力，一般人无法接近我。

12 月份就把我转移到五招待所去了，看守的卫兵就换成军分区一个排的正规军了，还有民兵，吃的东西拿进来需要经过检查。其间除了跟他们吵架之外，几年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跟他们写，也几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有时我从缝隙里看到换岗人员往弹夹里压子弹，就不禁想起毛主席说“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978 年开始，我和周家喻就到各个单位轮流接受批斗，建设厂、重钢、二钢、望江厂、江陵厂，大型企业几乎无一遗漏，每到一个工厂，本厂的头头就被拉上来陪斗，开始的时候我的职务还没有撤，批斗的时候还有坐着的待遇，后来越斗规模越大，在区里乃至川东都主持大型批斗会，公安局还接上大喇叭进行广播。有一次是弄到捍卫路科技情报所礼堂接受全市财贸系统的批判，出场批判我的基本上都是“倒戈人员”，没有倒戈的，就在台下站成一排，还要他们低头弯腰。出来揭批我的，是一位银行的女士，在十一年前是请我去作报告的长辫子姑娘，她的发言稿也许有一点言不由衷吧。在特钢批斗会上，陪斗的有王敢斗同志，他昂着头、瞪大眼睛的不屈形象，确实配称“敢斗”的勇士，看到许多同志的遭遇，我回去之后彻夜难眠。

在物质局批斗的时候，我要炊事员给弄点肉来吃，他用个大碗给我装饭，底下全是红烧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他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夫人给抓了，太不象话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很暖和，工人同志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以后每到一个单位，我就要炊事员弄好菜来吃，在南岸区批斗完吃饭时被人问起，炊事员回答说黄廉的伙食费是每餐一块钱，又公然给我舀一大碗羊肉汤。以后就

得了经验，要主动跟炊事人员打招呼。在几次批斗的时候，有人假装跑上来质问、抓扯，暗地里趁机给我塞鸡蛋、纸条，有一次一个纸条上说：主席说他一生只干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一个是发动文革。我们才知道群众虽然不说话，但是心里还没有服气，以后他们就不让那些对我们很“气愤”的人随便上台来了。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

在重庆大学批斗完之后，很多人跟在我们屁股后头撵，广播上喊：对于四人帮的黑干将，大家要拿出仇恨精神来，不要去看稀奇，你们跟着他们两个追赶什么。这个时候才跟周家喻接上头，知道他也在五招待所二楼，我在三楼，袁金梁在一楼，大家都关押在同一个招待所。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和周家喻一同被押出去批斗，有时候是三个人一起，甚至我已经被关进看守所了，还从监狱压倒物资局拍批斗电影。峨嵋厂拍过一部电影《铁证如山》，是在人民大礼堂批斗时取的镜头，我押出去的时候，看见刘结挺带一个氧气包挨批斗，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极差；那个会很大，在全川广播了，批斗会宣布正式逮捕，公安厅说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对黄廉周家喻执行逮捕。

在拘押审查期间，尽管十分困难，我仍然坚持每月按时缴党费。在宣布逮捕后的某一天，看守来请我出去签字，说你们木材公司党委通过：不承认你是党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入党和开除党籍，都有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家家酒”吗？他们根据什么来承认，又是根据什么来不承认的？这样的搞法是极端不严肃的，是糟蹋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另外一个看守也说，哪有通过了入党之后又不承认的，这是他们为了打击黄廉。我说你给我退回去，还请转告他们：黄廉不但不签字，还抗议他们这样无知行为。

在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半之后，等到邓小平他们推翻了四届人大的宪法，又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了一套法律来整治我们，即便是按照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也是

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因此他们就公开进行枉法裁决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1982 年进行公开审判，那天我一出监狱就看到摄影机，到会议室之后，检察员给我念起诉书副本，说公安局已经结束了侦察。正式开庭是 82 年春节假期过后了，那个时候我身体已很不好，他们送我去三医院看病，碰到一个熟人问为什么这么瘦，医生说为什么瘦，贫血、身体不好。我坚持不肯让他们抽血，也就算了。公开审判一直进行了五天，常常上午是周家喻，下午是我。开庭回来之后有加菜，碗里有十几片油炸的肉，他们要我在法庭上听话些，说审判完就好了。第一次审判是在政协礼堂，这个时候出门已经是正式的囚车了，我看到从监狱出来到礼堂，2000 多米长的街道全部戒严了，机枪架起，阵仗很是吓人。把我押到被告席要我坐下，我就要站在那里，看台上坐的是些什么人，每个人的前面都有牌子，只有一个女人前面没有牌子，审判长介绍的时候也没有介绍她。庭长宣布开庭，宣布一下就往对面的楼上看一下，估计是有个什么领导在楼上坐着。然后庭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我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我弄来干什么？下面哄堂大笑。他们气得脸色发青，耐着性子跟我解释这是法庭程序，我说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才回答，他说你讲。我就问，那个女人面前没有标牌，她是什么人？是刽子手吗？法官气得要命，说我咆哮公堂，要罪加一等。

公诉人据说是重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姓雷的，在那里选读起诉书，说我跟随四人帮颠覆政府，这遭到我的严厉驳斥。我说我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自己就是政府组成人员，自己颠覆自己吗？公诉人说提出抗议，说黄廉十分嚣张。我说：什么叫嚣张，我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而且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杀人放火，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把我关了五年，你们自己才是违法乱纪。然后他们就放幻灯片，说黄廉在建设厂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你们多数人自己就曾经亲自参加过，这么快就忘了吗？上午搞了两个小时就休庭。

下午是证人出庭，石有中出来作证，说黄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动员我们准备 500 辆卡车、5 万斤粮食，准备上山打游击，问我是否事实？我说没有听清要再说一遍，他刚刚开始再说，我就说：石有中，你怎么这样卑鄙？他就再也说不起话，当时就想走掉。人看来不能干违心之事，干了之后，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

的，这个人最后在精神上就垮下去了。

法庭又说我犯有反革命杀人罪，我就说请问审判长，有谁被我杀？动机是什么？死者是谁？在什么地点被杀？杀人工具何在？凭据何在？你这样的法官判案，冤案都不知道有多少？王旭说：黄廉，是你在审你，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说，那还问什么，你不就是要把我问成一个反革命吗？僵持完了又休庭。我回监狱之后，说我咆哮公堂，这次加菜没有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老实把加菜送来，明天我就不出庭了，最后他们只好又端来了。

最后一天，我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提出的三个问题，说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庭的证据，文字和措辞的捏造改变不了铁一般的事实，完全不能证明我有罪，我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你们说我拥护四人帮，当时谁不拥护中央？有些人比我的级别高，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直接执行他们的指令，你们怎么不追究？就算你们已经证明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因有关系而定罪；文革中间是有严重的派性，问题主要在于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组织搞抄家破四旧，形成打砸抢，毛主席宽容了他们，我自己就是他们资反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在文革期间屡遭迫害，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后得利的是你们干部，我们造反派只有血泪的付出；在你们所谓的粉碎四人帮过后，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调查和事实，也是你们以捕代审关押我五年，是你们违法还是我违法？我是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没有任何手续就抓，是你们政变还是我政变？文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并发动的，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潮流，如果有错误也只能是中央负责，追究了江青还要抓群众，中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看世界上哪一国都没有这个道理！你们说仅仅是几个小丑就搞乱了几亿人口的国家，真是笑话奇谈；你们又把武斗的责任堆在我极力反对武斗并带头执行九五命令的人身上，你们是没有分清到底是谁在制造派性、挑起武斗。我根本无罪，你们是在闹一个历史的大笑话，我永远都不会服，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末了我就喊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资反路线要永远造反下去，警察不让我喊，拼命地用劲把我撑下去，把我的肩膀都弄痛了，第二天宣判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旭草草宣布判处我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限制我在 10 内向省高院上诉。我说我不服，我将向人民上诉。审判长站起来大吼：将罪犯黄廉押入监狱服刑。

回到看守所，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同时我开始讥笑自己：我真的读懂了《法兰西内战》吗？真的理解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吗？真的懂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真谛吗？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奋笔写下了自己的上诉状。上诉到省高院被驳回，省里面派高院副院长赵立三来与我见面，他说黄廉，我看你还有点理论素养，上诉是没有用的，你的案子不是重庆中院和省高院能够定的，我看你还是平静下来吧。然后就把我转移到大竹四川省第三监狱关押，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胡风，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把监狱进行了一番整顿，把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有的到南充，有的到重庆。那个时候刘张还关押在那里，刘结挺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张西挺的穿着就像是叫化婆，他们就与我隔墙。我想去劳动，监狱方说没有劳动的条件，也不会让你与犯人接触的，要我看报学习，交代我不要去高墙边，不要去接触武警。监狱政委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不要用减刑来吸引我，你们愿意关押好久就关押好久，最多牢底坐穿，我只要求他在生活上不要搞阴谋，不要法外加刑，对我的枉法判决已经是变相的杀害，不要再搞法外执法，这就是我的希望，还要他们别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需要写信，而且我告诉他们不可能 100% 服从他们的。

两年之后，一家香港的杂志发表了我在狱中的情况，甘肃一家名为《驼铃》的杂志转载了。上面来审查，搞了很久。大概是 87 年还是 88 年的时候，监狱政委喊我去办公室谈话，说减刑你不想要，我们帮助你和刘张报了保外就医，报到中央领导乔石同志那里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让他呆在那里吧。我们准备叫你去一队给犯人讲一些哲学、爱国主义教育什么的，帮助监狱做点工作。

在大竹监狱，我每天撕下一片日历，白天等黑夜，黑夜盼黎明，熬过了十多个春秋。当我撕下 1994 年 11 月 13 日这一页时，晚上我就去办公室喊教导员，说我的受刑期满了，明天我要出去耍。他说今天已经通知了，省里有个司法厅的曾副厅长要见你。我把书籍捆好，找出来唯一一件没有打补丁的中山服穿上，狱政科写了个释放证和户口转移证，还发了 100 多块钱的路费补助。王政委说对你的人格素质，在我心目中间不同于其他的人，希望你明天不要喊记者来录像，也不要来车队，不要放鞭炮，给我们监狱留一个面子，你的案子是上面定的，我们只是执行者；免得附近老百姓来看，又说大足监狱关错了一个好人，现在才放出来。我说王政委，我在这里，你们管理上也还合理，十多年来也没有弄死我，明

天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提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

王政委说我提前一天放你出去，这点权力还是有的，当天晚上我一出去就看见了来接我和摄影机，大概有十来个单位，他们就住在荷花池宾馆，我住到 13 军炮团的招待所去，在我被隔绝 18 年之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招待所里面已经有了大电视机和席梦思床。第二天早上几个人非要拉着我再从监狱门口走出来，照相摄影，这样十几台车就从大竹出发回到重庆。派出所先不给上户口，经过了几次斗争才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要在花甲残年去适应这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自谋生路了。

二〇一〇年六月，黄廉的《最后陈述》

周洪亮同志，以及各位相关领导同志，信息已传达到我耳中，我思考再三特回此信望呈薄熙来书记为感！

你原为市委信访公吏岗位的老职员，我也愿意与君谈谈相关老人于事宜，材料我没有准备。更没有委派什么代表与你们纠缠。若有人在你们面前称他们是代表！那是不属实的言辞。

在此我慎重告知社会各界：

1) 自中国出现镇压造反派的大清查后，我和一大批毛主席的追随者们从此对邓氏集团所做的一切从来不抱奢望和幻想。反正都是菜板上的鱼了，任他们宰吧！无非是家破人亡倾其性命。这一点社会各界有证；有评；有论。

2) 我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受刑十八年中没有写一个字的材料，倒是认真的写了十八年的抗议书和申诉状，写累了，写厌了也写烦了！

3) 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各路英雄我最崇拜的是毛主席以及培他养出来的张春桥，江青他们才是我心中的楷模！也许我今生就这么个观点了吧。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林彪；陈云等等他们缔造的这个共产党我发致内心的信了追随了，好事，坏事都跟他们干了我也敢作敢当，也算自作自受吧，总之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4) 自毛主席谢世之后华国锋叛变，邓氏等人不尽情理也太不厚道，特别是一大批；老同志；老红军；老党员在邓氏等人的封官；加薪小恩小惠威逼利诱下帮着邓氏起哄，搞了许多不通情理，不尽人味的事情，如“中国特别法庭”这本是没有国家立法知识和法律常识的领导集团搞出来的“人间喜剧”和“政治闹剧”也

是疯狂的玩权大报复演绎出来的历史丑闻！邓氏一伙把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丢尽了。特别是鲁大东，赵紫阳等人在四川在重庆疯狂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制造了大量冤案，后来陈云等党内元老感到事后问题比较严重，不好对后人交待。便亲自主导出台了遮羞布似的中共中央（82—9）号文件想挽回一点我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丢失的面子，想不在永远丢人丢下去。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邓氏等人就是知错不改，决心把坏事干到底。蓄意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深埋下更多怨恨的种子。时过这么多年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在重庆始终束之高阁至今还羞羞答答。

5) 在我受刑十八年后饱含痛苦在贫病交加中流浪乞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总算找到了党内一些有良知；有党性；有同情心的同志。他们把全国其他地方落实中共中央（82—9）号文件的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告诉了我，我忍着饥寒将这个文件精神传递给了邓氏以及鲁大东在重庆的继承人，希望諸公发点人性善心或者讲点党性什么的。让我有一丝生存的空间。可万万没有想到中共中央（82—9）号文件在相关部门非但没有落实还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特殊”的机构和部门。我等又重新陷入了新的陷阱和复杂局面相交织的困惑之中。又是十多年在生活无助贫病交加中苦苦挣扎。

6) 更不尽情理的是重庆市民政局落井下石克扣我的革命军人优抚补助金。我是1949年11月28日在重庆求精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入伍参加革命。曾在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担任过侦察兵。复员回重庆后在市商业局木材公司担任宣教干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在“邓公”主政以来各届当权者都忠实的执行着他的高压政策使我们这批“两案”服刑人员成为无住房；无生活来源；无医疗保障；无工资待遇的四无人员。十余年来党，政下达的公文市民政局不给我们见面，还无端克扣政府发放的部队人员回地方后的优抚补助金。他们这样做你说公平吗？另有些官员说我们这些人是无状可告，无理上访，非法上访！

7) 自薄熙来同志到重庆主持工作以来掀起了打黑除恶，重树老百姓的精气神的一系列举措，观察这些实事变化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真希望薄书记能象重拳出击打黑除恶那样 争取主动，做好细致而有效的工作解救我们这批生存在倒悬之中的老人。也希望重庆市委，政府重新拾起中共中央（82—9）号文件，重新研究方案能象湖北省，江西省，河南省等地党委，政府那样客观公正的处理好“两

案”遗留问题。

8) 薄君若能直面我党近几十年来走过的弯路，用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气概和仁爱博大的胸襟伸出你的手救救这些老人吧！这将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大幸！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9) 以上的这番陈述也是我黄廉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不管諸公对我以上的陈述有什么看法，或认为不妥那也仅此一次了！希望諸公在“闷声大发财”的同时也认认真真思考思考我陈述的事情吧。

一位风烛残年的多病老人黄廉在有生之年对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以及重庆社会各界的最后的陈述。

2010 年 6 月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重庆市也是“揭批查”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重庆市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重庆市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重庆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重庆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 年 11 月 13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六章第六节 山东省

第六节 山东省

壹、本节概述

革命派反对反革命政变

当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运河的时候，中共“十大”中央委员，运河电机厂工人张××立即发表谈话：“我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能参加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开天辟地没有的事，这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会实现。毛主席给了我这份权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了我这份权力。想不到主席尸骨未寒，反对毛主席的人就发动政变篡夺政权，这还有什么公道可言？你们如果有道理，为什么不召集中央委员开会，让我这个工人委员也听听你们的谬论，让我也发言的机会。你们不敢，你们心虚理亏，你们这样做比法西斯还霸道。”当然，这席话招来的是杀身之祸——比死还难受百倍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残酷折磨。

兖州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是位老党员，全家都是为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人、干部、军人。就是因为他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母、兄弟、亲戚都受到株连，本人被非法开除党籍。他是在隔离学习班听到反革命政变的正式消息的。当然传达者是兴高采烈宣读逮捕“四人帮”的文件，而他听后却心如刀绞，立即挥笔写下四句诗：“政变屠刀裂长空，万千人民苦无穷。人间自有正义在，尔曹难挡水向东！”

一位农机站站长因为反对反革命政变，身陷囹圄，并被栽脏诬告，摧残得苦不堪言，被逼得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他生前含着血泪写下五绝一首，以明心志：“悲中听枪声，我哭豺狼醒。挥泪祭领袖，昂首踏征程。”

曲阜县陈庄大队的陈以梅，是位钢筋铁骨的农民英雄，在五十年代就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曾高度评价陈以梅狠抓阶级斗争，带领广大社员发展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模范事迹，并题词：“搞农业，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以梅一直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时，陈以

梅被党中央邀请参加座谈会，与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交谈，受到中央领导人的赞扬，所以运河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健康发展，与陈以梅有极大关系。当听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陈以梅气愤极了，逢人就骂，遇人就讲。好心人劝他注意点，别让当局听到。陈以梅正气凛然地说：“为了捍卫毛主席他人家的革命路线，我就拼上这把老骨头。”反革命政变者很快下令逮捕了陈以梅。在狱中，陈以梅宁死不屈，严词怒骂当权者，把审判他的人驳得哑口无言。反革命专政机关恼羞成怒，每天都给他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有病也不让治。最后判处陈以梅死刑，后来实在拿不出任何罪证，又改判无期徒刑。七十多岁的陈以梅已经被疾病，被酷刑折磨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夙愿，把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给了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陈以梅逝世后，陈庄大队的贫下中农痛苦流涕，运河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肃然起敬，善良的运河人到处传诵。陈以梅永远活在运河地区革命人民心中。

一位老三届的学生还把他写的一首诗在会上朗诵：“秋雨秋风悲哀凝，今年月圆人无情。漫天思念弥环宇，马恩列毛一体同。白花黑带尚无痕，又闻屠枪向天鸣。江张铁骨世人仰，沉默怒斥皆雷惊！”

运河地区的揭批查运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后，运河地区一级就组织了 2480 余次大型控诉会议，对 311 名革命造反派干群进行了轮番批判，对其中 3 人分别判了死缓和无期徒刑；6 人开除党籍；8 名地区干部撤职、16 名免职；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 51 人；责令检查交代问题的 93 人。同时，运河地区还对高校记录在案的 27 名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进行审查。在排查所谓“三种人”时，运河地区一级有 812 人受到清查，立案的 111 人，定为“三种人”的 6 人，严重错误的 65 人，一般错误的 40 人。

运河地区所辖各县区的揭批查运动

曲阜县 68 人，定为骨干分子 2 人，严重错误 3 人，

泗水县 64 人，召开万人以上大会 33 次，中小型的会 5300 余次，

邹县 75 人，

鱼台县 12 人。仅有 30 多万人的鱼台县就开了 1.4 万多场，6 万多人被逼着发言；

金乡县召开大型会 300 余次。

运河地区的部队也处在清洗之中

上自运河军区副司令，各县武装部长，下至一般战士，只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支过左的，造过反的，都成了清查对象。

滕县武装部副部长、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张××，因为支持滕县的革命造反派，就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运河地区各县市及滕县各公社轮番批斗，最后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开除军籍，遣送回山西省原籍劳动改造。

支左模范，六一八九部队的一位连长王××，以“四人帮”的小走卒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山东文登老家，最后又逼得跑到东北当了“盲流”。

运河地区革命人民不会忘记十年文革的光辉历史，不会忘记大救星毛泽东现在，英明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党中央又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这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震撼着运河人民，也考验着运河人民。新的阶级大搏斗残酷地摆在运河人民面前。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清楚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以 B、D 为首的运河地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紧跟北京的反革命政变者，恶狠狠地向革命造反派举起屠刀。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造反革命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用对待恶霸地主和蒋介石匪帮的手段迫害广大革命干群。他们办的学习班就是阎王殿、黑地狱；他们大喇叭广播的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他们大会小会进行煽动：“有仇的说仇，有冤的诉冤。”“要象打黄世仁、南霸天一样来进行清查斗争。”；他们给革命造反派制造了莫须有的罪状，罗织了“三皮虎”的罪名——政治的、经济的、作风的。

善良的运河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人民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卑鄙可耻。

当运河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的时候，运河县人民医院的革命职工，最先想到用向党中央写信的方式，表达对恩人毛主席的哀思，表达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封信，虽然被政变的刽子手们称为效忠信，写信的人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光明磊落，始终没有低下高昂的头，始终认为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向离开了革命人民的亲人毛主席写信表决心，是革命造反派的份，虽有法西斯的屠刀放在脖子上，仍然面不改色，英勇不屈。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的运河，逐渐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多少人在被隔离审查？有多少人进了全日制、半日制，各种名堂的讲清楚学习班？有多少人被拘

禁、被逮捕、被判刑？有多少人被游街，被拉到运河地区十二县市巡回批斗？有多少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背乡离井，去当“盲流”？谁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时，如邓小平自称的还乡团一样，见了革命造反派就杀气腾腾，知道谁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了走资派的反，就成了“跳高分子”，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得牙痒痒，就要对他进行打击，进行报复，就要对他进行算账。所以运河地区革命造反派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无一幸免，没有一个逃过这场反革命政变带来的大清查大报复的劫难。出门在外，言谈话语，人际交往，都忌谈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更不敢说自己造过反，因为所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言论、思想都成了罪恶，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浩劫。

运河地区革命人民不会忘记十年文革的光辉历史，不会忘记大救星毛泽东。每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纪念日，每年的九月九日毛主席的忌辰，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的诞辰，运河的一部分革命同志都自发地组织起来，采用聚会的形式，到运河市中心毛主席塑像前，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进行演说，写出诗文，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讴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的伟大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文件，毛主席像章，毛主席画像，革命造反派油印的传单，都珍藏起来，躲过政变者一次次大搜交的反革命行动，像传家宝一样，向知心的同志和战友展示，向子女进行教育，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保存下来，传递下去。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山东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

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山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 年 11 月 15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8 日修改

第六章第七节 浙江省

第七节 浙江省

壹、本节概述

以李显通是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

我叫李显通，今年 65 岁，是毛主席逝世后浙江省揭批查扩大化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我原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原杭大外语系）67 届毕业生，1968 年 3 月 18 日被周总理任命、经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浙江省革委会常委（详见中共中央中发[68]47 号文件），并兼任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6 年 11 月 21 日，以铁瑛（原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1976 年 4 月谭启龙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为省委书记的浙江省委个别领导为了彻底推翻周总理对浙江文革中的很多重大处理决定，并利用揭批查公报私仇，在全省首先将我隔离审查和批斗。他们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们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时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原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鲁迅先生的胞弟）是我的叔叔辈。早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总理曾当着南萍、陈励耘的面委托周建人老人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并指示南、陈将张永生推荐为“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陈励耘为了讨好张春桥，把张永生的名额让给了上海的于会泳或陈敢峰。在“揭、批、查”中，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后因整人有功而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文泉（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曾一再要我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并进行过什么谈话？”等等问题，而原省公安厅某处处长、专案组成员潘文彪（文革前因与台湾派遣特务小姨子轧拼头而被江华开除出公安队伍）更是咬牙切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红卫兵、红卫兵，整个

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并说什么“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李显通五年徒刑

我本人于 1979 年 12 月 27 日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程序下被西湖区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了五年徒刑（详见杭西法刑字[79]第 74 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李显通反革命一案的刑事判决》及杭法刑上[80]74 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决书》复印件）。

《判决书》所列罪行如：“炮打省委”、“揪斗革命领导干部”、“阴谋夺权”等都属于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省委派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以及回杭后谭启龙主持、铁瑛在主席台上压阵的汇报会也被说成是“乘机大做反革命黑报告”的“反革命”行动；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 1974 年，抵制由王洪文直接控制并一手举办的所谓解决浙江问题的学习班（有背于周总理对浙江问题的处理精神）也作为我“干扰、破坏中央对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条主要罪状！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正是这一纸判决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妈为此哭瞎了一只眼睛。我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1981 年 11 月 20 日我从监狱出来后几年不给安排工作，后在我再三要求下总算安排我在杭大教材科工作，但不到一年即于 1985 年 4 月突然通知我去杭州农药厂总工办搞翻译为名，说是发挥我一技之长，实际上给厂里布置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准加薪、不准评定技术职称、不准调离农药厂。从此以后，职工加工资、评定技术职称都没有我的份；旅游学院借用我去上课也得不到允许；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到省安全厅布置的线人密切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甚至连我在业余学校上外语课的教学活动也被禁止，而且还株连了我们的孩子和亲属。

将张永生判了无期徒刑并送往青海大漠服刑长达三十年之久

铁瑛在浙江“揭、批、查”过程中任意践踏人权的情况尤为严重。在对待张永生同志的问题上充分表现出铁瑛的为人及其残忍的本性。1967 年 7、8、9 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浙江萧山、诸暨铁路沿线被省军区个别人挑动农村民兵神枪手武装控制各个火车站，为了让毛主席的红色列车安全通过，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铁道部和南京军区都分别下达指令要省军管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好萧山、诸暨的问题。当时省军管会委托张永生去现场指挥，结果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成功地解决了两地的问题，事后周总理将具体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当时就很高兴地称赞张永生是个难得的将才、帅才。铁瑛等人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几次要翻案，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并再三警告以后不许再提萧山和诸暨的问题，谁提谁就是反革命。南京军区炮兵学院政委陈德先以身试法重提这个问题，结果得了个反革命的可悲下场。省革委会成立后，张永生当上副主任，每次开会，铁瑛碰见张永生时总是先立正，然后敬个军礼并叫声“首长好”。这种情况我亦见到过多次。可是 1972 年铁瑛当上了省委副书记后，多次与谭启龙一起对张永生同志进行一次次政治陷害：

1972 年的“批林整风”运动，铁瑛“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1975 年 7 月谭启龙和铁瑛以省委的名义对张永生同志列了所谓“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张春桥对抗江青”，“反对和阻挠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突击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让臭老九骑在省委头上拉屎拉尿”等罪名上报中央要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监督劳动，后因毛主席亲自批示“老九不能走”，谭、铁的阴谋未能得逞。

同年 10 月，谭、铁又与纪登奎串通一起以省委的名义造谣说张永生“在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权盗窃国画库 400 幅国画”，并以这样的罪名给中央打报告，将张永生调离浙江。这个报告按纪登奎的主意台头只写党中央，不写毛主席，这样纪接到后以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强行把张永生押送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穷棒子）大队，在民兵的武装看押下劳动，并被折磨得半身瘫痪。此事被毛主席发现后亲自给张永生同志平了反，而对谭启龙则作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北京接受审查的处理。主席当年的批

示是：“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6 年底开始的“揭、批、查”中，铁瑛便抓住机会，向中央打报告把张永生从北京押回浙江，关进死牢，然后罗织罪名，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欲把张永生置于死地而后快，完全置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而不顾抢在新刑法实施前夕先宣判后办理判决手续，不仅将张永生判了无期徒刑，而且毫不顾忌地把他送往青海大漠服刑，一关就长达三十年之久，创下了世界政治犯关押时间之最的历史记录。

浙江省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

自 1976 年 11 月到 1980 年 2 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

杭州地区的揭批查运动

省城杭州，一个不到二千人的杭州机床厂在揭批查中就有三人被逼致死，一人被逼疯，三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三十八人；另一家仅有三百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三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十六人被无辜关入土牢。丽水地区制造的“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

丽水地委副书记、专员邹宗仁在“揭、批、查”中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最为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邹宗仁本来就是丽水地区派性十足的一派头头，一上台就大搞派性，压一派抬一派，一派做官，一派坐牢，不仅把地区机关和丽水县二级干部群众任意判刑、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降职、坐牢达二百多人，而且无中生有地编导了一桩以原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何纪明为首的所谓谋杀五位退伍军人的谋杀集团案。他们先树敌，后围剿，冤案从三人开始，蔓延扩大到一千六百多无辜群众，仅“杀人凶手”就遍及五个自然村农民及部分厂、矿、企事业职工一千二百多人；“抓人”、“抬尸”、“运尸”、“抛尸”二百多人；“外围站岗”、“值班”一百多人；“策划指挥”三十六人，其中涉及地级领导五人，县级领导四人，科局级领导三十余人。审查中刑讯逼供致死五人，被逼致

死七人，神经错乱三人，致伤不计其数，关押判刑三十一人，其中死刑五人。军分区司令员何纪明以“谋杀集团首犯”被隔离，因不堪受此凌辱陷害而自杀，为此惊动了中央军委，当中央军委会同南京军事法庭来丽水查核此案时，发现是桩冤假错案，并向省委作了回报。但丽水专案组在铁瑛的支持下对此置若罔闻，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群众，甚至对专案组内部的不同意见者也横加迫害，真是狠毒之极！

金华地区的揭批查运动

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 202 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 662 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 7 个“反革命罪”。与此同时，金华地、县有 190 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 4 人被判处了死刑。

台州地区的揭批查运动

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十一人被逼死、二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三千二百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至于其它形式被整的人数就无法计算了。

临海县的揭批查运动

临海县在那次运动中被逼死的有二十人、被判刑的有四十六人；

黄岩县的揭批查运动

黄岩县当时有二十人被逼致死，三十八人判了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

仙居县的揭批查运动

仙居县被逼死二十二，被判反革命罪三十八人；

玉环县的揭批查运动

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四人，判刑三十九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四十四人。应四官被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二百九十八次之多。并被定

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

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他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桐庐县原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荣被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

姜汝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

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哲学家江山县原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莫登旺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省城杭州，市城乡建委有位 1949 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政工干部，名叫莫登旺，1977 年 12 月 2 日被“中共杭州市委”以所谓“上山打游击”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然后，指派六个人对他实行 24 小时轮番审讯，连续搞了七天七夜一无所获。在关押了三年后“中共杭州市委”下达文件判处他为“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七年”。莫登旺在狱中收到“杭州市委的判决书”后感到十分惊讶！中共杭州市委个别头头竟然以权代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周后，中共杭州市委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即指使西湖区法院出面把“现行反革命”案由改为“打、砸、抢”，七年刑期不变下达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并指派市公安局刑警何进人、孔万祥向他强行索回杭州市委的政治判决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事人的拒绝，此时何、孔二人恼羞成怒，大打出手，把莫登旺的左眼打得当场失明，抢走了市委的现反判决书。同年 6 月 10 日，市公安局何进人、孔万祥闯入莫登旺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实行抄家，从晚上七时翻箱倒柜，甚至连墙壁都被凿穿直到次日晨七时找不到“黑材料”却将家用电风扇、自行车、各种家具、手表等私人财产 66 件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其中连三岁小孩子吃的麦乳精、奶粉、白糖、饼干、香糕、味精、茶叶等都被拿走，至今仍未归还，可见他们对法律的践踏到了何等的程度！这哪有一点像共产党的样子！？

浙江省各地枪毙了不少造反派头头

铁瑛在揭批查中草菅人命，捏造罪名，还直接指使各地县枪毙了不少造反派头头：

如

台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

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

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

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

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

温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

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他们要接受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浙江省也是“揭批查”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浙江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浙江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2年3月18日修改

第六章第八节 黑龙江省

第八节 黑龙江省

壹、本节概述

范正美忆“揭批查”

中共中央于 1976 年 11 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1 月 9 日至 14 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

20 日至 24 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

28 日至 30 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12 月 3 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

1976 年 12 月 30 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

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1977 年元旦，特别是 3 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1977 年 4 月 5 日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

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的。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

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 301 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

直到第三天，省文教办副主任、二把手张双城才出面，十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是给我办“学习班”，帮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我配合云云。

1977年5月，在全省地、市负责人会议上，刘光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深入揭批毛远新。把毛远新当作东北“太上皇”，我觉得这是明晃晃地直接对着毛主席去的，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这么做。认为这哪里是批“四人帮”，而是直接批毛主席。

7月1日至5日，省委召开揭批查会议，部署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帮派体系。

9日，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线广播大会，拉出来批判的有张洪池、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还有我和宋振业等人，在台上站了两排。在这次揭批大会上，给我们几个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战线(即张为黑龙江、牛为财贸战线、陈为团省委、聂为工会、张为省委机关、刘为农口、我为教育、宋为体育)上的“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对我们每个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内容是：对牛陈聂张刘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联、揪斗老干部、冲击省委机关，对我和宋振业的指控是，在教育、体育战线上忠实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对我们这几个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对邓小平、攻击华国锋。在这次揭批大会上，令我吃惊的是两件事，一是批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第一个黑爪牙是张洪池。把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我感到实在牵强附会。因为着实毛远新是反对他们的。

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拉我们到本行业的一些单位游斗，接受部门和行业的批判。我被先后拉到哈师院、黑大、哈医大、哈三中、哈一机厂等处批判。

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

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

“学习班”是地道的“看守所”。我不能与家人见面，也不能打电话、写信，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看守一天两人，由各大专院校抽人，不断更换，每人每次一两个月不等，个别的也有长达半年之久的；多数是工人，也有的是教职员。一开始是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的两名工人，以后又换上了哈工大、哈建工、黑大的工人、老师、实验员。他们和我同住同吃同活动，形影相随。

对我的隔离审查，或者说，“学习班”实际是四种方式：拉出去接受揭发批判；强制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受专案组训诫；接待外调。

我采取按提出的题目和具体要求写交代、检查和证言材料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交代和证言材料都是一次清，不留尾巴。因而，我的“闲暇”时间很多。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打发我的“业余时间”。我觉得，我以后的半辈子只能靠知识为生。于是，我订了计划：一是自学英语；二是通读马恩列斯选集和毛著；三是通读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四是写诗填词。

1977年9、10月间，省里召开全省运动会，体委招待所要住运动员，就把我从三楼挪到一楼一间清扫员放工具的小仓库里，外面有一间可以住两个人的大一点的房间，作为看守住屋。我住的这个里间，仅能容一张单人床，床是被强挤压放进去的，两边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划痕，紧靠床边摆一张学生单人课桌，供我写材料用，开门不是碰床就是触桌，只能容纳一个人。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100人，根据李力安1999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663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

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

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

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

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

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

到1978年12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1978年12月30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20个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43人，因事缺席4人，到会39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贰、 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

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黑龙江省也是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在新的革命时期，黑龙江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黑龙江省的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2年3月19日修改

第六章第九节 河北省

第九节 河北省

壹、本节概述

叶颖芬被免去沧州地委常委的职务，去孟村回族自治县任县委副书记
1979 年，是我被选为河北省省委员、沧州地委常委、南皮县委常委的第九个年头儿。

就是在这一年，我被人告了！而且是列有三十条罪状（给我罗列了大小十几条罪状，什么“流氓”、“破鞋”、“打砸抢”、“四人帮”、“杀人犯”、“贪污狂” 杀了三个人等等）的二百多封告状信直达全国人民。听说，邓小平有批示，中央办公厅有批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有批示，河北省委有批示。可谓通天大案！

在这个关于我的通天大案还没“验明正身”的情况下，上级组织就作出了决定，免去我沧州地委常委的职务，去孟村回族自治县任县委副书记。

1979 年 12 月 28 日，我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和照看孩子的老母亲，由沧州去了孟村回族自治县。

叶颖芬被审查四个月结果是诬告

我到孟村不久，省里决定，在沧州举办一期省、地、县三级纪检委干部培训班，共计四十人，以我这个被告到中央的通天大案的案例做教材，展开对告我的三十条罪状进行调查。从我懂事起，查到 1979 年，一条一条地查，一事一事地追，涉及到哪里，查到哪里；涉及到谁，查到谁。这四十个参加培训的省、地、县的纪检干部，整整查了四个月。

（1980 年 5 月）沧州地区纪检委书记陈风格同志找我谈话。他说：“颖芬呀，你这个专案，从中央到省地都非常重视，因为你是省委委员，又是地委常委，为你这个案子可真的下了力量了。审查结果是：事实不存在。告你的人，我们找了他多次，他一再地向我们承认错误，最后他都向我们下跪了。他说，他们对你有意见，想把你告倒，告状信里的那些事，都是他们造的。他们说他们错了，保证以后不再给各级领导添麻烦了。颖芬呀，我代表地委向你征求意见，现在审查组对你的审查结果出来了，地委也做了结论，你对告你的人还有什么要求吗？”

叶颖芬再次被审查四个月结果仍然是诬告

（1980 年 7 月）当时地纪检委的一位副书记找我谈话说：“颖芬，上次专案查清了你的问题，在告状人那里摆不平，人家有意见，所以组织决定，那次专案组调查的结果不算了，重新组织第二次专案组再调查你，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这可是省里要结果的案子！”

从此，我又陷入被审查的冤案之中。

这一次查了九个月之久。在这九个月中，第二次组成的专案组几次地追到孟村，让我交待问题，有时把我叫到沧州进行讯问。他们有时还向我拍桌子，像审讯罪犯似的，声音严厉，话语难听，逼着我承认告我的三十条罪状。他们说，你必须承认，不承认就过不了关！

第二个专案组，经过九个月的方方面面的调查，又得出了结论：事实不存在。

（1981 年 4 月）我就主动找到了当初通告我要对我进行第二次调查的地区纪检委副书记，我说：“这次，我的问题查清了吗？查出了哪些问题？组织上对我怎样处理？”

他答复我说：“这次查的结果还是跟上次一样，没问题。要是有问题，不早找你了吗，不会等你来找我们。”

我说：“这次我可不再原谅告我的人了，他们一次次地诬陷我是犯罪的，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

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组织上也未对这次对我的审查做任何结论。

叶颖芬被免去一切职务，停止工作，停发工资，注销全家户口，限 20 天内离开沧州

1981 年 12 月 19 日，沧州地委召开了全区由公社书记以上党政干部参加的几千人的三级干部落实政策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有一个人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矛头直接指向我，给我罗列了大小十几条罪状，什么“流氓”、“破鞋”、“打砸抢”、“四人帮”、“杀人犯”、“贪污狂”等等

在大会上对我进行了处理。免去我的一切职务，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公安局要注销全家户口，限 20 天内离开沧州。不仅如此，还诛连到我爱人。当时我爱人在沧州电力局物资公司任副经理，也被免去职务，要他回家当社员种地。

1982 年 1 月 8 日下午 3 点钟，当时我在沧州市南陈屯公社任代理副主任，正在

南陈屯村下乡，公社派人把我叫回了机关。我以为公社里有什么事情要开会，可我一进公社大门，就发现情况不正常。当我走进公社办公室时，发现区里和公社里的有关领导都在那里，并且都用异样的目光瞅着我，我顿时觉得准是又是关于我的问题。可是我想，我由一个地委常委、分抓农业的农办主任，一下子被处分成一个郊区公社的代理副主任，还不行吗？还要怎么处分我？我果然没有想错，一位领导对我说：“叶颖芬，你先看看这个通知吧！”

说着，把一个红头文件放到了我面前。我立刻把目光投到那份文件上，只见上面写道：经 1981 年 12 月 10 日市委讨论决定，免去叶颖芬同志南陈屯公社代理副主任职务……”

看到这里，我向在场的领导问道：“免了我的职叫我干什么？是在公社当一般人继续上班，还是组织上另有安排？”

一位领导说：“从今天起，公社里就不再为你安排工作了，你也不要再来上班了。”

我说：“叫我到哪里去，有个意见吗？”

这时又一位领导说道：“我刚才给区里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说，叫你哪里来的哪里去，这就是说，叫你回原籍去当社员。”

我正愣怔之际，公社的张会计来了，说：“刚才区委派人来通知了，不叫再给你造工资表了，说停发你的工资，造上去上头也不批。”

这时，又一位领导说道：“文件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职务免除了，工作停止了，自然工资就不会再发了！”

我说：“这是为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1982 年 1 月 30 日（农历正月初七）晚上七点钟，我去了一位有关领导同志的家里想问问他，组织上为什么不相信 1980 年上级组织部门对我的所谓 30 条罪状的调查结论？为什么凭着一个干部的发言就对我作了处理？

没想到这位领导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找我我正要找你去呢！”接着，他郑重其事地为我列出了十大罪状。接着他说：“说句真的，以上说的你这些，就看你检查不检查，我们处理你也是根据你的这些罪恶，你只有老老实实检查才有出路。我们地委定了，叫公安局注销你一家的户口，限二十天让你拔锅揭席出沧州，你要端正态度，正确对待，不然是没有好下场的。”

当时我说：“部长，这十大罪状，完全是诬陷！如有一条是真的，我可拿生命担保，

我要求组织上彻底查清，做到实事求是！”

他说：“你别说了，说什么也没有用，只有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在这时，又有人背地里对我说，说我是杀害三条人命的罪魁祸首，组织上要枪毙我给人家偿命。

叶颖芬陷入困境

我当时还没有离开沧州，生活异常困难，在最艰难的时候，两碗玉米面，二斤白面和四角钱。没有办法，我去地里寻野菜拣柴禾，就这样，全家五口人活了二十多天。

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让丈夫向法院提出和我离婚，我宁让家破，也不能让人亡。

叶颖芬第一次到石家庄讨饭上访

1982年3月7日的早上，我终生永不会忘记的这一天，永不会忘的这个早上。就是在这一天，就是在这一天的早上，我什么也没带，只身一人，抱着两岁的儿子牛牛离开了家。

偷偷地上了开往石家庄的火车。

石家庄，我并不陌生，以前开会，办事经常来这里。可眼下，它对我似乎是异样的生疏。我去哪里呢？一个孤独流浪的女人。我只好留在候车室里，迎着一束束投来的惊疑的目光，卷曲着身子熬过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白天，我出去讨要，讨到吃的就随时充饥，讨到零钱，就攒起来买笔买纸。天黑了，就躲到候车室的角落里，写上访材料。就这样，我开始了为时近一年的石家庄上访的日子。

找了几个月的时间，省委决定让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给沧州地委，让沧州来人接我。沧州地委接到电话后，派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的一位同志来石家庄接我。

回到沧州后，当时的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说：“叶颖芬，你去石家庄上访你那是去向省委告沧州地委的状！你沿街要饭，你住火车站候车室，你那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你去告状是谁支持你的？你到石家庄后找的谁？他又跟你说了什么？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交待不清就是对党的不忠！对党不忠，就不会轻饶你！叶颖芬，你不是去告状吗，你就去告吧，一会儿我就给沧州市打电话，还是继续不给你饭吃！你犯罪，就要惩罚！你杀人，要偿命！你，你太坏了！”

我说道：“×部长，我在石家庄沿街要饭，是为了求生存，为了活着。如果说，

这是给共产党抹黑的话，我看这抹黑的不是我，而是你！国民党战犯，坐监狱的还给饭吃呢，为什么我这个曾是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河北省委委员、沧州地委常委叶颖芬就不给饭吃呢？要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误，那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们一次次地组织调查，调查出什么来啦？为什么不公开对我的调查结果？退一步说，即使我犯了错误，不给饭吃，这合情吗？合理吗？合法吗？死刑犯在临刑之前还给饭吃呢？我的罪重到什么程度？世界上罪重到什么程度的人不给饭吃？有先例吗？再说我告状，我告状是为了说清我的问题，是我觉得我没有犯那些诬告我的人所说的那些错误！上访犯法吗？告状犯法吗？”

他大声说道：“叶颖芬，你不讲理！你不老实！没有你的好下场！”

说完，他把我带到当时的地委书记那里。

书记说：“叶颖芬，好你个造反派头儿！‘打砸抢’分子，你的犯罪事实是真的！这些事实，你告状是告不没的！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才是你的出路！”

叶颖芬第二次到石家庄讨饭上访

我第二次返回石家庄，又过上了沿街要饭、上访的日子。

我强支持着 80 斤重的多病身子，一天一天地煎熬着。说实在的，我当时要不是信念坚定，早就寻死了！

又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省委又研究了我的问题，决定责成沧州地委，组织专门班子，把我的问题彻底查清楚，把调查的结果汇报省委。

为这事，省委领导同志专门把沧州地委的两位书记叫到省里进行交待。

沧州地委又组织三次调查仍然是查无事实

沧州地委的两位书记回沧后，组织了专案组，对我的问题开始了调查。结果，地委组织部根据诬告者提供的关于我的所谓的十大罪状，一条儿也没有落实。地委的有关领导说，这个专案组是站在叶颖芬一边儿的，所以才调查出那个结果，这次调查不算数儿！于是，又调换人员重新组织专案组，重新展开调查。重新组织的专案组，进行的重新调查，结果仍然是：查无事实。地委还不同意，又组织了第三次。结果，第三次组织的专案组又把调查结果交给地委了，结果仍然是：查无事实。

叶颖芬被下放监督劳动

地委没有再组织第四次调查，把我叫去，对我说：“你的问题已查清。要按人家

告你的，你确实该枪毙!但通过查证，你杀人的事不存在。但你有别的事，地委决定不让你回家种地去了，但你的工作不能在沧州，让你自己去泊头，不去就处分你!”

我说：“那就等我的问题彻底弄清楚，我带着结论去泊头吧!”

地委的这位领导说：“你的问题两年也解决不了，你不走，什么时候也不给你解决!你走了，叫反你的人来个彻底胜利，落个把你赶跑了，有什么不好的?”

1982年，我背着特大号的“黑锅”来到泊头被监督劳动改造。基层领导把我安排在地口王村的一位老太太家里。我除了一个铺盖卷和洗漱用品外，什么也没有，只让每天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

后来，泊镇农林局的有关领导见我老实，又是个干事业的人，就偷偷地把我借到农林局的畜牧口上去帮忙。

不准许叶颖芬进行党员登记

1985年，沧州地区开展整党，清理党员队伍。当时，我仍在泊头被监督劳动改造，就参加了泊头市农林局党支部整党。整党开始，泊头市委按照沧州地委的意见，把我当成了整党的重点，给我成立了专案组，让我写检查、作检查，然后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给我罗列了一大堆“罪名”，不让我过关。到了整党后期，党员进行登记，结果，其他党员都登记了，就是不让我登记，说我不是合格党员，泊头市委、沧州地委都不让我登记，我成了一个“党外人士”。不让进行党员登记，不少党员和群众有意见，他们认为我符合一个中共党员的标准。于是，我参加整党的泊头市农林局党支部的全体党员一致向支部要求，支部向泊头市市委、沧州地委整党办公室写了报告，全体党员在报告上签了名，请求让我进行登记。最后，泊头市委遵照沧州地委的意见，仍不让我进行登记。原因是，我不具备中共党员的条件。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河北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河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河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河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 年 11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9 日修改

第六章第十节 安徽省

第十节 安徽省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七年底安徽省委对梁守福进行停職審查并大会批斗

大約七七年底，我要求對我停職審查。時隔不久，省委指示對我進行停職審查。隨後，對我在系統內進行大會批斗。批斗大會可能是七八年元月召開的。我記得，天氣很冷，沒有厚棉衣，愛人請她中學同學，給我趕做一條棉褲。因為會場肯定設在省無線電廠禮堂。舞台后面窗子上的玻璃是壞的，我在台上站或坐幾個小時沒有棉衣是不行的。大會開始后，把我叫到台上，左側放一張凳子。騰野翔示意要我坐下，這些做法比文革初期文明的多。批斗會剛開始時，禮堂里的人擠得滿滿的，外面還站了許多人。隨著批判我的人數增加，聽眾卻成反比例的減少。下面的哄哄聲，隨著批判人數的增加而增加。當第三個人發言時，下面的聽眾最少走掉三分之一，而喧嘩聲比擴音設備的聲音還大。騰野翔幾次打斷發言，制止台下說話，結果下面說話的聲音比騰的制止聲還大。到第四個人發言時，聽眾最少走掉一半，但說話聲音并未降低，反而更大。我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差點笑出來。第四個人講到一半時，會場秩序已亂得不像樣子，騰野翔宣布散會。大會本來安排八個人發言，結果只有三個半人發言就草草收場。會場的人越來越少，我以為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搞點無政府主義，提前回家燒飯。我到工廠大門口時，發現自己的判斷完全錯了。離開會場的工人沒有走，聚集在大門外等著送我。大約有二、三百工人、技術人員，一直把我送到現在紅星路的西頭。當時這裡還是個很窄的小巷子，人多走不過去，否則他們會把我送到家門口。一路上，他們安慰我，勸我多保重，想開些。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聽批判往外跑？他們回答的很干脆：“他們的批判，還沒有你自己講得好。”對我的半場批斗會，換來這麼多人的真情送別，我感到很欣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梁守福被要求寫出反對林彪反對康生反對十二軍的材料

大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我被喊到一間專案組辦公室，來找我談話的是清查辦的沈某某和一個見面認識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他大概是省直黨委的某個處長。

沈說：“我就不介紹了，大家都認識。我們今天來想請你寫個材料。”

我問：“寫個什麼材料？”

沈說：“寫一些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怎樣反對林彪；反對康生；反對十二軍；怎樣保護老干部的材料。寫這些材料，對你來說並不困難，這是人所共知的，實事求是地寫。寫好后給我們。然后清查辦在這個材料上附個意見，請萬里書記“特批”一下，你就沒有事了。”

來的另一個人，未作補充說話。但我也未立即表態。沈看我沒有馬上表態，又補充說，你先考慮一下，過几天我們再來。然后我們又扯了些無關緊要的話，他們就告辭了。

沈等的談話，對我產生不小的沖擊，他們不是代表個人找我談的。而是代表省清查辦來找我談的，我該怎麼辦？我寫了這份材料，萬里書記肯定會“特批”，我至少可以馬上“解脫”，說不定還有個更好的仕途。因為文革中有這樣優秀的造反派頭頭還不多，說不定成為一個好的典型。但我也不斷地問自己，我真的反林彪、反康生、反十二軍嗎？我認為自己當時沒有這樣的膽量，即使有這樣的膽量，也沒有反他們的證據。我說出不同意見，那是因為出于對黨的信任和忠誠。批我所謂炮打“三紅”，那是用來批判我和自我批判時帶的帽子。如果真抓到我反他們的真憑實據，誰也保護不了我，肯定是個現行反革命。我不能欺騙自己，更不能欺騙歷史。

另外，我又考慮到自己被“特批”以后，說不定還能搞一個什麼官干干，但那時已有人因為文革被抓，不被抓的也未松綁，我是他們的總頭頭，我沒有事了，他們還有事，別人怎麼看我，歷史怎麼看我。如果，真的被安排在某個位置上坐著，我能心安理得嗎？經過几天的反復思考，我自知自己不具備做官的素質。我的個性決定了我只會昂首挺胸走路，這樣走路的方式，適于走下坡路。彎腰低頭走路的方式，適于走上坡。我學不會，萬一上高了，我的走路姿勢會讓我跌的更慘。還是不做官，做民好，這樣心理更平衡，做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決定放棄這次被“特批”的機會，決定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句號。

几天后，沈他們兩個又來找我，說話的地點在老地方。

沈說：“怎麼樣？考慮好了沒有？如果材料寫好了，我們就順便帶回去。”

我回答道：“我經過反復思考，這個材料我不能寫。我沒有反過林彪。我對他的

《再版前言》中的天才論有不同看法，這是個理論問題，不是對林彪個人有什么懷疑，提不同看法，不能說成反。對康生的問題，我對他本人處理安徽問題有看法，在不同的場合下，說了他不少壞話。在清查“五·一六”時，真有人想把我搞成“五·一六”，苦于找不到我反康生的真憑實據。如果他們找到我反康生的材料，我就是“五·一六”分子。我不是“五·一六”分子，說明他們沒有找到我反康生的證據。這個邏輯應該成立。不能康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時，我說我沒有反康生；康生成了托派，我又說我反康生。我成了什么人？我更不願意把我的什么材料弄到中央去。我不願意在背后有人看不起，恥笑我是個兩面派。對十二軍，我從未反過。他們把我對十二軍的一個團副政委處理問題不公正，說成反對十二軍，那是他們的事。我在行動上是支持十二軍的。我怎么能說反十二軍呢？至于保護老干部，我的確拚著命來保護了一大批老干部，包括李葆華。但我沒有保護所有的老干部，持不同觀點的不少老干部，我就沒有保護他們，甚至還反對他們。我說的都是事實，是心里話。我非常感謝你們的好意，也感謝萬里書記給我一個機會。但我自知自己不是一塊當官的料，我只想到大學或中學去教書，或者到那個研究機構干點技術工作，搞情報資料翻譯也行。”

他們看我說話這樣堅決，再也沒說什麼，就告辭了。

我放棄了萬里給的“特批”機會，我心里既感到一種輕鬆，也說出了自己心里想說的話。但也感到一種壓力，不知他們會怎么想？會不會認為我思想頑固不化？給梯子不下，是一個死不悔改的造反派？這個疑慮最好讓以后的事實來回答。

一九七九年八月梁守福被下放到淮南勞動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省委常委劉廉民、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史鈞杰、省直黨委書記陳云亭、省工交辦主任盧榮景、省電子局黨組書記騰野翔，還有兩位女同志作記錄。在省委北樓某個會議室共同找我談話，真可謂“四堂會審”。

劉廉民主持會議。他開始說，今天請梁守福同志來，是傳達省委八月二十三日晚的有關會議精神。省委常委認為：“經審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組織上和“四人幫”沒有任何聯系；同宋佩章、郭宏杰、吳從樹、李定山，也是一般的工作關系；沒有參與指揮任何武斗事件。但你作為主要頭頭，應負領導責任。梁守福同志的問題，是積極執行了“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執行也是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因此，省委決定你到淮南勞動一個時期。要帶臨時組織關系，

好好過組織生活。我已同淮南市組織部聯系過了，他們把你安排在淮南化肥廠儀表車間。他們很歡迎你到淮南去，并已同淮南化肥廠聯系過了。梁守福同志還有什么意見？”

我說：“我服從省委決議。但有兩點要求：第一點，我是不是可以繼續留在省無線電廠勞動？因為去年我已在廠里勞動一段時間。如果到淮南去勞動，家里有一定困難，上有老，下有小。第二點，我希望省委給我做個正式結論。免得以后再來運動，老翻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舊賬。”

劉廉民先回答我的第二個要求。劉說：“要不要做結論，看你到淮南勞動鍛煉的情況。勞動鍛煉得好，也可以不作結論。”

對我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劉說：“我把你的要求向省委常委反映。”

接著又改口說：“對梁守福同志提出繼續在合肥勞動鍛煉的問題，是不是我們就在這里討論一下？”

會議沉默一會，陳云亭發言說：“梁守福在合肥熟人太多，影響又大，干擾也大。到淮南去對他勞動鍛煉有好處。”

會上沒有人對陳云亭的意見發表看法，等于默認了。

這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史鈞杰發言了。他說：“我原來不在安徽工作，來安徽后，不少老同志向我談到過你。認為你年紀輕，身體好，有能力，又懂業務。你相信黨還是會用你的。你先到淮南勞動一段時間，結論的問題，劉廉民同志已經說過了，可做可不做。看你鍛煉的情況再說。”

根據當時的情況，我要求在合肥勞動鍛煉是行不通。最后表態說：“我服從省委決定，到淮南勞動鍛煉，但我不想到淮南化肥廠，我不是學化工的，對化肥不懂。我是學無線電技術的，最好到無線電廠勞動鍛煉。這樣可以發揮我一技之長，給黨多做點貢獻。”

這次劉廉民再一次做我的工作，他說：“淮南化肥廠條件好，宿舍、生活、工作，都給你安排好了，廠黨委還為你專門開了會。你的工作，安排在儀表車間，不給你安排夜班”。

但我堅持到無線電廠去，最后，省委同意我的要求，到淮南無線電三廠勞動鍛煉。一九八三年底梁守福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一九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會上陳云提出全國清查不徹底問

題，他的兩句話，比小人物講一萬句還頂用。于是，在全國又掀起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次是逆向地整黨內、黨外的造反派。

我當然是首當其沖，在劫難逃。于是，安徽省在中央工作組的指導下，對我做出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理決定。這個內容在《安徽日報》刊登之前，省委還派人找我核對名字，我到底是叫梁守福還是叫梁守富。他們搞不清，我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句：“我檔案里的名字是哪個，你們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嗎？”他們說：“再調檔案查來不及了，明天就要見報”。我說：“既然你們如此倉促，連我的檔案都沒看過就給我下結論，我看你們也是奉命辦事，我就告訴你們，我的名字叫梁守福，是幸福的福，不是富貴的富。”

還有一點，我要提醒讀者，前面我說過，我的組織關係和工資關係都已轉到淮南，我是淮南市的一名普通黨員和普通職工。結果對我的組織處理決定是由省電子工業局黨組做出的，與當時黨章的要求是否符合？

另外，我當時還是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并未換屆，又不通過任何法律程序就罷免了。

一九八四年的元月二十一日，我和三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起上了《安徽日報》的頭版頭條，我被開除黨籍的規格上升了，與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們平起平坐。

胡劍清一生最大的希望是看到毛主席路線的回歸

胡劍清，老知青，文革期間在豐縣下放，1964 年入黨，紅衛兵小將，文革結束後，被開除黨籍。

他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毛主席的忠實學生和追隨者。他一生最大的希望是可以看到毛主席路線的回歸。

在他重病期間，他看到了烏有之鄉，帶給他最後的歡樂。

2010 年 4 月，在他最後的時間里，想去北京看看毛主席，去烏有之鄉看看那些為真理而奮鬥的青年。由於病情惡化，沒能如願。他的兒子胡光明替父親去了北京，看了主席，去了烏有之鄉，並帶回來了烏有之鄉書籍，拍攝了一些照片。胡光明說：他使我領略到了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最偉大的人是毛澤東，使我領略到了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最缺乏的是什麼，是信仰，是一種為民族奮鬥的

信仰。

贰、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安徽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安徽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 年 12 月 3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19 日修改

第六章第十一节 湖南省

第十一节 湖南省

壹、 本节概述

二〇〇六年，杨大庆《湖南的“清查‘四人帮’”运动》（摘录）

湖南的“清查”起于 1976 年 10 月下旬，至 1977 年春进入高潮，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前，它一直是湖南的中心工作。其内容和形式都直接与文革接轨。

第一，如文革中多次运动一样，中央此次又没有总揽全局的指导性文件，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什么是“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什么人该“讲清楚”，全由各地、甚至各单位自行其是。于是，冲击省委固然是“人和事”，给什么级别也不够的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贴大字报也算是“人和事”；中央委员、省委常委固然要“讲清楚”，无职无衔、非党非干的普通群众也有人要“讲清楚”。有的单位“讲清楚”会（实际是批斗会）一直开到了生产班组。

当年“四人帮”的罪行之一是“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代理人”，此刻却是“层层揪‘四人帮’，处处抓人和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完全一副“宁可错整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派头。

第二，群众运动、大哄大嗡，目无法纪、任意胡为。由于一味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实际是运动群众）、强调保护并不存在的“群众积极性”，“越左越革命”、

“左比右好”的极左思潮再一次大肆泛滥；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政策意识、法制观念全被冲破。抓人抄家、揪斗游街、殴打辱骂、人格侮辱一类行径大面积发生。虽规模尚比不上文革初期，但性质更为恶劣。因文革初的无法无天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组织所为，而此时的侵犯人权却是由党组织的默许、纵容、指使甚至组织而发生。如从党政机关到区街小厂，层层都私设公堂，抓人关人全凭党委、支部一句话；再如带队抄家抓人的不但有为数不少“根正苗红”的支部书记、保卫干部，还有个别受党教育多年，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均不低的老同志（如长沙的南区区委书记刘克顺）；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某些恶性的打人事件竟发生在的党组织、甚至市委的眼皮底下。当年长沙的“清查”对象中有两个“态度恶劣”的

典型——张楚鞭、罗霞凝，二人遭受的皮肉之苦也最多。张在市委于市体育馆召开的对其实施“拘留审查”的万人大会上桀骜不驯，押送的民兵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用冲锋枪枪托对其猛砸。罗则在局、厂党委召开的批斗会上挨打后用脚还击（手被铐住），结果遭至更猛烈的毒打，满嘴牙齿全被打落。

第三，以派划线、厚此薄彼。同样的行为为不同的派别所为则结论完全相反。如邵阳的“高司”派头头王安义在“批林批孔”中拉起队伍，与“工”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当年8月1日晚，“高司”派拦截邵阳市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周剑波（该地“工联”头头）乘坐的汽车，周鸣枪示警，误中一朱姓“高司”派成员，造成死亡。王安义先是陈尸于地委大院，继而就地搭起灵堂强迫地委书记李哲多次跪灵并批斗，闹腾了近一年。也许是受这次斗争胜利的鼓舞，王安义1976年劲头更足。他将队伍拉到长沙寻衅闹事，杀进省委大院并在大礼堂内安营扎寨，准备长期盘踞，后因毛泽东逝世方收兵。

再如1976年10月17日，“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已传开，“工”“湘”派大势已去。长沙船舶厂“高司”派头头郭松元带人封省、市总工会。在省总工会，他们先是殴打刘正良（省建六公司工人、全国劳模、“工联”成员、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王桂生（与刘属同一单位、同一群众组织、时为省总工会写作组负责人），继而又围攻前来办事的许新宝，闹得鸡飞狗跳。恰在现场的省委常委刘玉娥却不加制止，只满面笑容地喊了一句“同志们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啊！”便扬长而去。把个陈郁发（省总工会副主席、老干部）急得满头大汗，拽这个拉那个，一个劲的嚷嚷“大家要相信省委！要注意政策！”直到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游碧竹带省委保卫部人员匆匆赶到，直斥郭等人的行为“是错误的”，局面才得到控制，许新宝得以脱身。

此类事件若是“工”“湘”派所为，肯定是“冲击党政领导机关”；可是发生在“高司”派身上，却成了“与‘四人帮’作斗争”，真令人不可思议。

第四，虎头蛇尾、草草收兵，组织处理草率。

湖南的“清查”系何时结束，查不到确切日期。反正自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对相关人士的处理之事时有所闻，说这场运动长达八年大概不会错。但若问如此长的一场运动战果如何，答案却十分模糊。湖南有哪些“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湖南文革中特别是1974——1976年间哪些事件是在“四人帮”的直接组

织、指挥或操纵下发生的？那些人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湖南有没有黄金海、陈阿大式的“四人帮”小兄弟？全然没有交代。而每次运动都不可避免的对人的组织处理，则大多无理无据，漏洞百出。

此次给运动对象结案时分成四类：一、“三种人”，属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二、“犯严重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需作组织结论、给予相应处分；三、“犯政治错误”、亦属人民内部矛盾，只作组织结论、不给处分；四、“犯一般错误”、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作结论、不给处分，本人所写交代材料退还本人、他人对其的检举材料当面销毁。

对“三种人”中央另有规定，此处不议，只说属“人民内部矛盾”的三类。

先说“犯一般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年文革，谁没喊过“打倒刘少奇”？谁没犯过“一般错误”/因此，犯“一般错误”实际上是没错误，纯属错整，应该甄别平反。而“不作结论”云云，不过掩耳盗铃而已，根本不能体现什么政策水平，更不是什么宽大为怀。因为这些人中不少既非党员也非干部，其行为根本不受党规、党纪约束，即使违法也只需对法律负责，你共产党凭什么给人家作结论（据说省委办公厅发过一个文件，对这些人中因被“清查”而耽误了升级、调工资的要给以补偿，但既未见传达也未见执行）。

再说“犯严重政治错误”和“犯政治错误”，其间界限也颇让人费琢磨，最明显的标志乃前者多被“拘留审查”（即被关进公安局的看守所）、而后者只是“隔离审查”（类似今日之“双规”）。但如论“错误”性质与情节，二者大多区别并不大。只不过前者有的被某大人物点过名、有的为某些领导人所痛恨、有的则“态度不好”——由于没有确定的标准，竟出过某些基层单位为把被书记看不惯的人“拘留审查”而去找公安局“开后门”的怪事——这就颇有点倒因为果的意思：因为你被“拘留审查”过，所以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真可谓“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而且这“拘留审查”本身也是件说不明、道不白的糊涂事。它是组织措施还是专政手段？若是组织措施，把人关进看守所依据何在？若是专政手段，为何施于人民内部？

与此相关的，是这批人的党籍处理问题。众所周知，这些人中不少在“批林批孔”中进入党内，虽“清查”时被称为“突击入党”，但当时却是程序合法、手续健全的。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被请进党内的。如张楚鞭，就是一位与其素不相识

的上级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手持介绍信来到其所在党支部，主动要求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此时这些人留在党内，令不少人于心不甘且于心不安；但若将其劝退、开除，又等于承认其当时的入党为合法，于己脸上无光。于是便制造出一条在党章上没有，于党规、党纪无据的“党籍不与承认”。这在中共的组织史上不知是不是个“创举”，只可惜它没有给落实这个“创举”的人带来丝毫自信，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词穷理屈。此中某些花絮性质的小事件，就颇耐人寻味。

如长沙湘南冶炼厂的工人刘京东文革初期是“工”派的红卫兵组织“8·19”的骨干，“批林批孔”时任团市委“运动办”负责人，并因此而入党。遭“清查”后党票被收回，刘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可接待他的一位副书记却推得一干二净：“对你的处理是市委的意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如果市委说搞错了，我们明天就给你平反。”

再看某科级企业的小头头接受处理后与有关人员的谈话，则更有意思：“这（即党籍不与承认）算不算处分？填表（即当时尚有一定作用的《登记表》之类）时要不要如实填写？”

“不是处分，不要填写。”

“那这十来年你们年年催我交的党费总该退给我吧！”

“不退。”

“为什么？”

无言可答。

“那我自己写的入党申请书和党员登记表可不可以退？”

“不退。”

“为什么？”

“要进档案。”

“我连党都没入过，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进档案？”

又无言可答。

当然，“清查”运动的战果虽不显著，但效果却很显著；那就是“高司”派成了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一家独大。在省委，万达、孙国治势焰薰天，说话、办事分量极重；在长沙，李照民名为二把手，实际是权力中心；在基层，王安义、叶琦、王吉贤（中南矿冶学院工人、该院“高司”的工人组织

“红卫队”头头)得到起用。某些单位甚至给十余年前受过冲击的“高司”派人员发起了“慰问金”、“营养费”。而因负有命案时尚在押的“红色怒火”头头曾有根，也在死于监所后倍享哀荣。

1979 年春天，不少“高司”派成员冲进长沙市公安局大院，占据大礼堂为刚死的曾设灵祭奠。公安局大门洞开、任人出入，哀乐声、鞭炮声数日不绝。出殡之日，又在市中心五一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参与者、围观者不下万人，交通为之断绝。可令人震惊的是，对如此藐视法律尊严、挑战专政机关、破坏社会安定的行为，省、市委竟不闻不问；而不少在职的领导干部则对此公开深表同情，甚至通过各种方式送花圈、致悼念，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

然而就在“高司”派风光无限、踌躇满志之际，他们却发现自己跑到了终点。从 1982 年秋起，“整党、清理‘三种人’”、“否定文革的教育”、机构改革相继开始。1983 年春，以刘雪初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前来解决湖南问题。其尚方宝剑之一便是“(‘工’‘湘’与‘高司’)两派都是造反派，都是错误的。”于是，“高司”派头上“一贯正确”的桂冠被摘除，万达退居二线、孙国治调往河北、李照民调往株洲，王安义被当作“三种人”拉下马、段远来(常德“高司”派头头、时任常德卷烟厂党委书记)因负有命案被处决。至此，困扰湖南政局十余年的派性问题基本解决。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湖南省邵阳市文革”两案”人员

饥 三十年数万次要求湖南省党政领导干部执行中央(82)9号文件
给生活出路被拒绝，导致我们无生存权!!!

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工农商学兵干成员，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是先进工作者、有的是劳动模范、有的是三好学生、有的是五好战士，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流了汗!洒了血!立过功!得过奖。事实证明：我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热情的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历史又一次证明：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湖南省趁毛主席逝世和大清查运动之机，大搞扩大化和报复行动，违反中共中央的清查范围和处理对象的规定。中共中央中发[82]9号

文件规定：“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9号文件第6页第7行）。但湖南省把清查范围扩大到学校、工厂、农村生产队。把打击对象扩大到无辜的学生、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罗织各种莫须有罪名，对广大的工农商学兵干成员，进行一系列的残酷惩办。有的被批斗，有的被毒打，有的被关押，有的被开除党籍干职，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逼死。把我们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毁于一旦。

中共中央对这场清查运动所出现的错误，都很清楚，并严肃的指出：“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实错了的应予纠正，定性不当、处分过重的要降下来，判刑畸重的可在适当时机酌情改判”（9号文件第10页第6行）。对被受处分的人员要“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的工作或进行适当安置。”（9号文件第8页第12行）。对被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9号文件第9页第6行）。但湖南省党政领导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发[82]9号文件。故导致我们病的病，残的残，死的死。现幸存下来的人不多了，已到了古来稀年代，而且一无社保、二无医保、三无住房，落到了一个老无所养，老无所靠，连生存权都没了！事实证明：我们才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受害的人们。而且是历史上受害时间最长、受害程度最惨剧的人们。

据此我们请求中共中央督促湖南省党政领导认真执行中共中央中发[82]9号文件，解决好我们的生活出路和给予我们的生存权。像共产党过去对待地主恶霸与贫农一样分田分地、像对待右派一样二十年平了反、像对待国民党战犯一样给生活待遇。所以我们要求在政治上不歧视，在生活上给出路，彻底解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逼害。

中发[82]9号文件确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9号文件第5页第14行）。而湖南省不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而是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来惩办我们仅政见不同的人民。历史证明湖南省党政少数领导人是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书上签名以及向全世界发表《中国人权白皮书》。这些响亮动听的词句，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但湖南省党政少数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至今

没有给我们生活出路就是一个铁证!!

我们在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的情况下，迫使我们多次上京诉求解决生存问题。国家信访局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访复字（2011）5979 号信函指出“你们来访反映的问题，将转送湖南省信访局协调处理”。但至今无“协调处理”的踪影。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阳光艳：《沉痛悼念益阳资江闪电革命造反纵队司令郭光保同志》

郭光保、何艳香同志和我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响应党中央、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走到一起，成了生死之交的异姓三兄弟，我们三人在社会上的总称叫“阳光艳”，根据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我们和益阳市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龚正恒、陈中玉、刘桃英、王金莲等组建了益阳市第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益阳资江闪电革命造反纵队”，郭光保同志推选为纵队司令。一年后这支队伍遍及全区各县，人数发展到三万之众。以郭光保为头的领导层，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文斗不搞武斗，步步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畧部署，深受群众的好评。因此在组建地市县“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时，通过推荐和严格审查，“阳光艳”三人同时当选为益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郭光保同志任人保组付组长，负责全区公检法的相关工作。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三十岁的郭光保同志，参加了党的九大，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亮点，也是我们兄弟的光荣和骄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文革中我们有缺点和错误，但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万分悲痛，乌云压城，风云突变，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否定了。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成了“审查”对象，地委成立了“阳光艳”专案组，几年的审查，我们反省检查、挨批挨斗，但这些打击和磨难，郭光保同志始终没有动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没有动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没有动摇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自觉参加”文革”，我们从不后悔，郭光保同志在病中，同样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面对社会上一股反对污蔑丑

化毛主席的歪风邪气，面对党内一小撮贪污腐败分子，面对美帝日本越南在中国东海南海的横行霸道，他义愤填胸，多次万分感慨地说：要是毛主席健在，谁搞贪污腐化，就把他送上断头台！谁敢辱我中华，就叫他有来无回！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怀化市（原黔阳地区）文革人员：《赴省要求解决生活问题的报告》

我们是 66 年文革时期的文革案，因响应毛主席、共产党中央的号召，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 年 10 月后秦永桥在我地区煽动发动和刮十二级台风的资产阶级右倾翻案运动，煽动数十万农民进城，我们被清理，将我们定为了打、砸、抢、反革命等罪名成了现在的文革案，我们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等处分，文革前，我们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人、学生，我们是最坚决、最积极、最拥护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由于共产党两条路线的斗争，导致了这些人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成了现在文革案人员，文革到现在已经 40 多年了，我们最小的（当时的红卫兵也有 60 多岁了，大的有 80 多岁了）现已是白发苍苍年老体衰的老人，被丢在社会 40 多年没有作任何安排，有病无钱医治，生活没有来源。只为生存而求助于共产党和政府。

中央对“两案”人员曾有“应安排生活出路的政策”，1982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2）9 号文件批转了《第三次全国“两案”审查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报告》文中明确规定“凡清理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而我们这些不该判刑的而被判了刑的，就更应该解决养老金问题和医保问题，上海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全部解决了“两案”人员养老问题，湖北省在 2005 年也全部落实了中央关于“两案”人员的政策。江西省 2009 年“两案”人员的养老问题也得到解决。今年 5 月份云南省“两案”人员的养老金都已解决，但在我们湖南省还没用一点动静，我们多次上访地、市、省都没用回复。故再次申报，望湖南省党委、省政府关爱民生，给我们这些被折磨和被报复了 30 多年的人群，给一点人道主义的关爱和共产党的温暖！

现我们将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等对“两案”人员落实生活出路的文件复

印件附后，请参照办理。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宋安：《打成反革命杀人犯，出狱之后又继续报复》

我叫宋安，1966年本人18岁时在安江纱厂工作，为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捍卫红色政权，结果被冤、假、错案强行打成反革命杀人犯，本人纯粹属陷害40余年。本人原出狱之后，原单位不接受，自己托朋友师傅们帮忙，给我联系工作单位，自己当时想，不管案情冤、假也罢，只要有了工作，就安心的去做，再也不参加任何运动，吸取被害得教训。

1979年9月，本人在王振和师傅们的帮助下，在洪江市塑料二厂找了一份工作，当时，我同塑料厂领导有约策合同，厂方领导讲，只要我能设计生产出元桶布，我们厂就按五、六级技术工定，且定为正式职工。结果我在79年底全部改好40余台织布机生产元筒布。81年单位派厂政工股唐股长到安江纱厂调档案，结果遭到安江纱厂党委会谢副书记的反对、压制。他对派来调材料的唐股长讲：定为6级安排级别太高，只能作为二级技术工安排，我们才能出示档案。你们回去同他讲，否则我们无法给予解决，造成我无法接受，单位领导不好对我作出决定，只是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安纺领导的意见，我无法接受，只好离开而之。

1982年8月邵阳市洞口县高沙塑料厂派人到安江找我，同样是解决织布机生产元桶布的重大难关，贵厂厂长蒋丁寿及有关领导亲自到我家，在安江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我才从浙江回来，他们同样对我讲，只要生产了元桶布和设法买到20余台旧织布机，他们一定设法找纱厂调出档案材料，定为6级技术工。83年上半年24余台织布机全部投入生产元桶布了。我在厂里工作了几年，85年5至6月份，厂里同县工业局的同志与厂秘书胡邦忠同志亲自到安江纱厂党委调本人档案材料，同样遭到了谢交庭的严厉制止，认为级别太高，根本不给材料，并将他们轰出党委会。第二次洞口县经委派人到纱厂协商，同样碰了一鼻子灰。无法将本人档案调出来，造成我永远无正式工作单位。如果不是这种共产党执政，我也不会现在无社保、医保等基本生活保障。如果当时无破坏、无捣乱，我如今安心、快乐的度晚年，又何必一把年纪了还来找政府麻烦？请你们想一想，他们代表单位党执政者，利用职权，不按党政策文件办，损坏党的形象，同那些日本军国主义和汪精卫集团又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一丘之貉。要我如何来相信共产党？真是无稽之谈。

贰、 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湖南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湖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 年 12 月 3 日初稿

2012 年 8 月 3 日修改

第六章第十二节 江西省

第十二节 江西省

壹、 本节概述

江西井冈山：《控诉江西走资派在文革后对造反派红卫兵惨无人道的迫害》

76 年后整人的残酷性：

“靠造反起家的”、“坐火箭上去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三种人”、“野心家”、“帮派份子”、“打砸抢份子”、“反党乱军份子”、“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绝不姑息”，“绝不心慈手软”……，这些恶狠狠的语言，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口头禅，常见于报纸、电台。这是还乡团的口吻，这是奴隶主报复奴隶的心态。将人往死里整，不给人以生的希望，不给人以改过的机会，是法西斯匪徒对付犹太人的政策。

“江西的 78 年冬天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警笛长鸣，抓人的警车呼啸而过，大街上将判“反革命”罪的人游街示众；各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各单位均有自己的隔离室，每个单位都成立了清查小组……；从 77 年开始陆续在枪毙人，南昌铁路局、洪都机械厂都有人被判处死刑。

“翻开并未远去的清查“三种人”的历史，人们清楚地看到，权力一旦被仇恨主宰，理性便失去存在空间，取而代之的定是兽性的疯狂报复。江西清查的头两年，全省杀了多少文革“三种人”，不得而知，仅南昌市随便数数就有十几人；大约在 78 年有四个重要人物“汪、汤、陈、孔”的死刑判决在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许多“重要人物”被单独关押，有的被关在只有 3 平米的小间，几年不得与亲属见面；江电革委会付主任汤铸的家属被赶出单位宿舍，母女在楼梯下住了两年；更加骇人听闻是，南钢革委会付主曲凤亭同志被关在特制的铁笼之中，深藏在 10 多米深的防空洞里，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走资派不是大城市、中心城市才有，狭嫌报复也不是个别地方发生。文革之后的清查扩大化弥漫全省，打击面之广、下手之狠令人发指。在此仅举一例，地属抚州专区的德胜关垦殖场，总共二千多职工，就这样一个地处边远的小小单位，最终被判刑的竟有 29 人，其中死刑、死缓、无期各一人，其余 20 年以下不

等。仅此一斑，可见全豹。

“被清查人员的家属，同样要受到清查，有的被株连判刑，南昌市机关干部陈某某被捕，妻子也被株连入狱，留下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靠捡白菜帮子度日。母亲在狱中为孩子缝补衣服，尽最大的可能为抚养孩子做点事情。以上 78 年前，造反派红卫兵所遭受的迫害。

那么 78 年后又如何呢？

走资派“狠抓阶级斗争”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突然宣布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笔者坐在牢里还真的狠狠地高兴了一把。我和地、富、反、右被“阶级斗争”这个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一路走来，最后走进监狱。我以为他们来解救我们了。直到 83 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十二年徒刑时，笔者才从梦中醒来，我和地、富、反、右原本不是一类。我是奴隶阶级，地、富、反、右是奴隶主阶级，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他们才是同类。所谓“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就是再也不斗地、富、反、右了，当然更不准斗党内资产阶级了；“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并不等于不整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党内走资派一向是抓级斗争高手，阶级斗争那根弦比谁绷的都紧，只是不准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只准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而已；“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是个烟幕弹，在烟幕弹下“打枪的不要，偷偷地干活”。

走资派斗地、富、反、右斗了三十多年，蓦然回首地、富、反、右竟是自家人。再也不斗地、富、反、坏、右了。这不是“良心发现”，也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共产党中的叛徒、走资派投怀送抱，悔过自新，向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献媚邀宠，做为入伙的见面礼，就是将革命者的头卢献上。

78 年前还仅仅是抓人关人，最后定案以及对“三种人”的无穷尽的迫害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中全会后，有多少人被判徒刑、有多少人失去公职和党籍、有多少失人去了加工资的机会、有多少人失去入党、入学、入伍的机会，我们无从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装模作样的下达了一个 82 年九号文件，实质只是做个姿态，从来就没打算施行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南昌就有这样一个造反派，是个女同志，手无缚鸡之力，文革中未动过任何人一指头，被关押后，为了家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为了抚养七十多岁的高堂老母，跪求报复者“网开一面”，求“大人不记小人过”，

答应再也不“造反”了，报复者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照样判她七年徒刑；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国际上还有个优待俘虏的日内瓦公约，而 78 年后的所谓揭批查运动完全违背了这一切，受害者连个俘虏的待遇都闹不到，你就是跪地“投降”了，人家都不要你；

握有大权者想要治你罪，你就是作一千遍一万遍的检讨，都没用，“检讨”算个屁，你这不是夺人家的“专利权”吗？

国家规定复盖面为 70%，全厂评完工资后，除了“三种人”外，所有职工都加到了工资，还剩下 700 个指标反还给国家。问：南钢的“三种人”有多少？我的答案是 1900 名“三种人”，占全厂职工的 47.5%，这是一个含有“三种人”血和泪的算术题；

南昌市自来水公司职工沈天敏同志 78 年后，因为被划为“三种人”，三次没有加到工资，非三种人的工资由 30-40 元都加到 100 多元，而他的工资仍是 40 多元，随着工资的上涨，物价也跟着上涨，没有加工资就是减工资，无法生存，只得自己到外面谋生路，其单位依此为由，开除其公职。现在年老，无力谋生，成了老无所养者，八十年代全国职工加工资不止三次，三种人不给加工资者何止沈天敏一人；

南昌华安内衣厂革委会付主任、九大代表李冬根同志，被判七年徒刑，九十年代患脑溢血而半身不随，十几年来靠捡垃圾度日，最近才得到了政府一点生活补贴；

78 年后的今天，还有一大批七十岁左右的文革老人没有生活着落，而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党和政府给两案人员的补贴也没有他份，如：

南昌电机厂革委会付主任赵万杰同志，年近七十，78 年后被关押五年，释放后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于 2004 年患脑中阻，瘫痪卧床已七年，靠老伴 1000 多元退休金维持生命，每月要付房租 500 元，医疗费毫无着落，实际就是坐家等死。

78 年后的今天，文革的“十字架”仍背在受害者的身上，当局仍然将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当成了最大的“心腹之患”。笔者 88 年释放，98 年要出国旅游，在填写的《出境申请审批表》上（见附件），专政机关将我划为“政重人口”，即：“政治重点监控人口”，这表明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人权遭到公然侵犯，这表明

我的“刑期”并未结束，我的“附加刑”至今还在执行。这种蔑视公民权利的做法，法律根据是什么？

这种被监控的“政治重点监控人口”不光祸及本人，是对所有的文革老人的迫害，人走到哪，它跟到哪，如：已经迁居上海的汤铸同志，就常被专政机关“请去喝茶”，实质是提审和监控；

还有政治审查制度。附件中当局的批语，让我知道我 78 年后的噩运并未有结束。“政审”像“冤魂”一样时时刻刻缠绕在我们这些文革老人及其后人的身上。

二 00 八年三月四日，XXX《给**书记的一封信》

***书记：

我叫****，原系南昌****职工，因参与‘文革’，被南昌中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附加三年剥夺公民权。于 90 年刑满释放。原公职、工龄等一撸到底。现年 70 岁整，已年过古稀，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已于九十年代中期因年迈多病而失去从业能力，十几年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坐吃山空。就我现在的处境，说不定那一天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就只有等着往火葬场拖的份了。

然而近日社会上盛传：文革后的两案人员（如涂烈、万里浪等）原省革委主任、常委生活出路问题都已经解决……。这又燃起了我的希望。看来党和政府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我在文革中也是省革委委员之一，我有理由相信：主任、常委能解决生存问题，那么与其同案的委员和一般群众也应该能解决，党和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传言：上述两案人员生活出路的解决是走了‘门路’的。不知是真是假？也有人为此走访了有关部门，答复说那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我以为解决两案人员的生活出路是比较严肃的党的政策问题，早在 1982 年中央有九号文件，江西有十号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我们这类型人员是不该判刑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可是由于江西的派性严重，使党政策得不到落实，一直拖到现在。据说当时省委书记白栋材同志也认为对我们这些人员的处理过重了，为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的解决，他曾有个批示，并得到两任前书记毛致用和***的认同。此后就不知被什么部门给卡住了。现在白栋材同志还健

在，你不妨问问他。

现在党和政府十分关注民生问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已写进十七大报告，希望党的政策在我的身上能得到落实。

此致

敬礼！

原南昌*****员工***** 2008.3.4

贰、 本节简论

尽管受到复辟派的残酷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埋葬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九十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复辟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在新的革命时期，江西省的被打击的原革命造反派，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了艰苦的努力、不懈的斗争。

在新的革命时期，江西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的共产党员（其主要成分是在揭批查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反复辟、反腐败、反卖国、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捍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捍卫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

向江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

向江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2010年12月3日初稿

2012年8月3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六篇 目录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开辟革命征程

目录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第二章 文革后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 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征程

第一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国际环境——外部矛盾

第二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性质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

第四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方向目标

第五节 问题讨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开辟革命征程

概述

本篇试图总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探寻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壹，关于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这里只列举了四个方面：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同右派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走过来的。

大的斗争经历了八次：

第一次，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同彭罗陆杨的保右反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

第二次，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次，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同叶剑英、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的斗争，批判二月逆流；

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同林彪分裂活动的斗争，这一次没有识破林彪的阴谋，错误处理了“杨傅余”事件；

第五次，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同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斗争，开展批陈、批林运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第六次，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第七次，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同邓小平、叶剑英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八次，一九七六年九月，同华国锋、叶剑英的军事政变的斗争。

前七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八次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失败了。

每次斗争出场的人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站着一个强大的势力，这其中有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书记，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

(二)右派势力的社会基础

右派势力为什么如此顽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的。

1, 从经济基础来看：

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2, 从上层建筑来看：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3, 从共产党内的情况来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许多人都是抱着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牢固。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

给他带来某种利益, 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 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 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 对不起, 让别人去干吧, 我已经到站了, 该下车了。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 这些人又不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相当大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官僚特权思想, 对群众起来批评自己, 抱着强烈的抗拒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 一是不满意, 二是要算账, 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4, 共产党内右派势力的阶级属性

右派势力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

右派势力还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 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 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三) 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对右派势力的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1, 建国以来党内的矛盾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2, 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对走资派和复辟危险的认识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右派势力代表着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 发动猖狂的进攻。右派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党内的也是社会的主要危险。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党员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 是社会的也是党内的主要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右派势力的斗争, 焦点在于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到人民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上海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形式, 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权力夺回来了。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中，还进来了个别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进来了一些没有基本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发起新的进攻，夺取新的权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右派的一次次进攻，保持着高度警惕，每次都即时打击，并取得了胜利。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非常不利。由于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对右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导致斗争的失败。

二、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一）中间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起过一定的有益作用

这里所谓的“中间派”，指的一批文革前犯有走资派错误、文革中逐渐转变立场拥护文化大革命、并参加革命委员工作的领导干部。

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表示过拥护文化大革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有的人甚至政治立场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二）中间派的右翼在紧急关头与右派合流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中间派的右翼为了夺取权力，阴谋把革命派打下去，与右派合流。

（三）中间派右翼在政变后形成的新贵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成果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主持逮捕、清除、批判、审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革命派。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同意为叛徒、特务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平反。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同意审判所谓的江青反革命集团。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同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新贵集团中的一些人至死都不肯承认叛变革命的罪行。

（五）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与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团结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表示悔改以后，把他们结合到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选进各级党的委员会中，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绝不是像后来右派宣传的那样——毛主席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不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也无权决定谁继任中央主席），而是作为一个过渡步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由右派转为中派，应该说对革命派更为有利。但为什么不直接转到革命派的手中，如王洪文或张春桥甚至江青？这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因素。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派右翼突然倒戈，迅速与右派合流，这恐怕是革命派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缺乏这方面的警惕，结果在突然袭击来临时只能束手待毙。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革命的人们应该牢记不忘！

三、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多次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 1，运动初期，极左思潮漫延，形成一股打倒一切的风潮
- 2，运动兴起，群众组织中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 3，运动转折，一些人提出“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斗争矛头发生了转移
- 4，运动深入，一些人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抢夺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 5，革委会建立以后，一些人提出“反复旧”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委员会

（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社会基础,是由于在造反派中各种市民、游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三) 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1,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每一个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一场斗私批修的大革命,否则,你就当不好革命的动力,也当不好革命的对象。

2,从领导干部来说,并不说凡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从群众运动来说,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的时候,不可能等到对每一位领导干部作出结论以后,才允许群众揭发批判。只能是在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再作出结论。群众提出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有些可能是部分错误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作为组织来说,要经过调查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作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来说,也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批评。这就是要斗私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破除私心杂念,只有批修,才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正确态度,很快由“对象”变成了“动力”,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老是与群众闹对立,最后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3,从群众来说,并不是说凡是群众就是天然的革命派、造反派。

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起来造反的人看不惯、甚至于反对。

参加造反的人也需要作阶级分析:有的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的人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造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造工人阶级的反,有的人站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反。这后面两种当然是极少数。

即使是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人，也难免带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甚至于恶性膨胀。

这种“全身浮肿，头脑膨胀”的情况，不是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他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距离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要求，还相当远。而他们自己恰好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清除头脑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四、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一）对错误思潮的处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一九六九年，把王、关、戚与“五·一六”联系起来，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化，由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2，后来，又把杨、余、傅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这就更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一九七〇年三月，又加了一个肖华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

4，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运动由清查“五·一六”组织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转向清查重大反革命事件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且，这些所谓的“重大反革命事件”，除了中央定的“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外，其它都是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自己说了算。这样，把群众性的极左的、盲动的、无政府主义事件，看成了反革命事件；把有关的甚至无关的责任人，看成了“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把参加了有关活动的人，当成了嫌疑犯。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因这两件事，作为清查对象的、进“学习班”的、受到“帮促”的、被“揪斗”的有成千上万的人。

5，1970年11月，蒯大富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出席代表会，清华大学党委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而且发展了几百人。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打算放他回去，后来一直拖到一九七三年才把他放到北京市的一个工厂监督劳动。

（二）清查“五·一六”运动，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1，混淆了大是大非，把群众的造反行为，作为反革命行为，造反有理变成了造反有罪。

2，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3，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4，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舆论：参加造反、支持造反都不会有好下场！造反派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甚至倒向右派一边。

5，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右派又抓住这些所谓反革命事件，栽赃到左派领导人身上，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贰、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

一、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1，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早已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消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搞垮以后，正在逐步恢复。

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它们曾经预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很快就暴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

当前的世界形势仍然是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的两霸在苏联瓦解之后，只剩下美国一家独霸世界；第二世界增加了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巴西；第三世界仍然处在分裂混乱状态，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2，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

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国家。

3, 当前的中国在外存在着复杂的的矛盾, 包括与美国的矛盾、与第二世界各国的矛盾、与第三世界各国的矛盾、与周边各国的矛盾, 等等。

其中主要矛盾是中国与美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是中国各族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

4, 当前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相互联系的

从世界范围的人民革命来说, 头号的敌人无疑是美国帝国主义, 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它支持各国的反动派, 镇压一切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一切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

从一国人民的革命来说, 头号的敌人是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 除非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出兵, 侵占本国的领土, 支持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 剥削压迫本国的人民, 镇压人民革命, 促使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使它们自己成为被侵略国家的头号敌人。

中国人民的革命与世界人民的革命是相互联系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1, 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包括以下几种: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是指那些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演变而来, 挂着“国有经济”招牌, 具有垄断性、收益特大的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这些国企实际掌握在官僚、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中, 他们不仅享受高薪、股权, 而且可以运用这些资本谋取私利。这种经济既为其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服务, 又与其他经济成分争利。在现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2) 民企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是由民间人士举办的中小型企业。在现阶段, 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 对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 它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一起, 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3) 外来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外来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的“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机构。

第二，外国垄断资本实体经济企业，以各种形式大批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特有的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和中国政府给予外资的特别优惠条件，以及它们本身具有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不断进行参股控股，由产业并购而产业替代，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优势地位。

第三，中国工业产品销售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66.9%，超过那些国民经济立足于外贸的国家和地区。

外来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就业的好处，但是也挤占、甚至在某些行业垄断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4) 农村和城市的小私有经济

这种个体小私有经济正在日益分化，其中大多数日趋贫困破产，极少数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2、当前中国社会由以下几个阶级构成

1)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中包括：

a, 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党政军的官员）。

他们是由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和美帝从内部摧毁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演变而成的。所以，它的行动多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手法进行。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他们具有极大的买办性，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b, 国企资产阶级

国企资产阶级是管理“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实际所有权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c, 民企资产阶级

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是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国退民进”、“招商引资”、“能人创业”等政策，官商勾结，扶助起来的，和官僚资产阶级一起摧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生俱来就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也十分突出，臭名昭著的“黑”字号煤窑砖窑和包身工，都出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里。 现中国民企资产阶级无论人数和经济实力都远远大于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其中很多人都已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不少人已经开始以专家身份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权机构。 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权益上，官僚资产阶级对民间资产阶级主要是扶助，利用，勾结，但也有限制侵害的一面。民间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依赖，利用和勾结，但也有抵制争夺的一面。 d, 外来资产阶级

外来资产阶级包括港澳台来大陆投资的资本家以及其它国家来华投资的资本家。

e, 买办资产阶级

他们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f, 黑恶资产阶级

他们打着合法企业的幌子，实际干着非法的活动——贩卖毒品、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赌博、走私、欺行霸市、打家劫舍，等等。

2)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中包括

a, 现代产业工人

b, 公司职员

c, 农民工

3) 农民及个体劳动者阶级

其中包括

a, 农村个体劳动者

b, 城市个体劳动者

4) 知识分子阶层

其中包括:

a, 官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b,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c,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d, 劳动知识分子

e,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3,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

1) 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 包括地区矛盾、民族矛盾、生产矛盾、需要矛盾、阶级矛盾等等。其中主要的是阶级矛盾。

2)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3)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 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4,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 国家的统治阶级变了

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都成了被统治阶级。

掌握国家政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政权的组织形式没有变, 但是它的功能变了, 它不再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服务, 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3) 现今社会的统治思想变了,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叁、当前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 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个体劳动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军。

四、革命的任务分两步走：第一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第二步，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五、革命的形式包括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迎接政治斗争的新高潮，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

六、革命的政策既坚定又灵活：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2012 年 8 月 22 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11 万字

第六篇第一章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同右派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走过来的。

大的斗争经历了八次：

第一次，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同彭罗陆杨的保右反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

第二次，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次，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同叶剑英、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的斗争，批判二月逆流；

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处理“杨傅余”，开展反三右（右倾翻案、右倾复辟、右倾分裂）；

第五次，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同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斗争，开展批陈、批林运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第六次，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第七次，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同邓小平、叶剑英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八次，一九七六年九月，同华国锋、叶剑英的军事政变的斗争。

前七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八次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失败了。

每次斗争出场的人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站着一个强大的势力，这其中有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书记，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

二、右派势力的社会基础

右派势力为什么如此顽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的。

（一）从经济基础来看：

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

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实行的是商品制度。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九七五年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从上层建筑来看：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

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三）从共产党内的情况来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许多人都是抱着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牢固。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这些人又不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

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相当大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官僚特权思想，对群众起来批评自己，抱着强烈的抗拒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四）共产党内右派势力的阶级属性

右派势力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

右派势力还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右派势力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经常地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你要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他说这是反对党的领导。你要放手发动群众吗？他说这是搞无政府主义。你要夺走资派的权吗？他说这是反党篡权。

三、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对右派势力的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如果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能够识破右派势力的真面目，把它们孤立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但是：

（一）建国以来党内的矛盾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 1，一九五〇年，老区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了合作化的苗头，刘少奇反对山西省农村出现的生产资料入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
- 2，一九五二年，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 3，一九五三年，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错误口号；中央召开财经会议；
- 4，一九五四年，高岗、饶漱石集团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企图夺取更多的权力；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 5，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大砍合作社，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 6，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及波匈事件，国内右派蠢蠢欲动；中央报刊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7，一九五七年，右派利用共产党整风，发动猖狂进攻，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党反击右派；
- 8，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批评一九五六年刘少奇等人刮起的反冒进风，树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刘少奇鼓吹共产风、冒进风；
- 9，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纠正共产风、冒进风，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乘机向党发起进攻；
- 10，一九六〇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应该是生产小队，解决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问题，并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三年调整；
- 11，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鼓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困难还没有到底，经济上要退够，在农村搞包产到户；
- 12，一九六二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注意阶级斗争，反对包产到户，
- 13，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14，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反对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提出党内外矛盾交叉，在社教中搞神秘主义、人海战术，毛泽东主席提出主要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5，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1，建国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经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等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思想上提高了觉悟，对共产党的领导更加拥护，对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更加信服。

2，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农村刮共产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经济困难，这些事情，使一些人受到了伤害，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这些错误大都迅速得到纠正，得到群众的谅解。

3，一九六三年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开始认识到在共产党内存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一般都以为这就是指那些贪污腐化分子，很少人能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对走资派和复辟危险的认识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及劳动群众都是积极拥护的。

但是，具体到各单位，当党委或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群众中抓“右派”、抓“小三家村”时，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拥护（这些人大多是党员、团员、和团结在原党委周围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往往是多数；一部分人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政治运动中过去受到过打击或将来可能要受到打击的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这部分人往往是少数。

2，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各个单位出现的上述分歧进一步发展，成为对党委、工作队及在它们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态度问题。一部分人拥护，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工作都是对的，认为应该相信党委、相信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相信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被认为是“保守派”。一部分人反对，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打倒三相信”的口号。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造反派”，被认为是“右

派”、“反革命派”。

3，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于各单位的党委、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都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进行工作的，并且受到上级党委及其领导人的支持，这就涉及到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委的党委及其领导人的责任问题。造反派主张对它们应该“炮轰”，揭露它们的错误，要它们承担责任。保守派认为“炮打”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炮轰。

4，一九六七年一月，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纷纷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结合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军队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经党中央批准，代替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这时，在党员和劳动群众中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5，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领导层中发生了“二月逆流”，在它的影响下，一些省市的军区支左发生了偏差，把某些造反派打成了反革命，大规模逮捕人，甚至开枪打死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群众中又发生了的分裂。一些原来的造反派组织拥护军区支左，当然也包括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拥军派”、被称为“保守派”。另一些组织反对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造反派”，被称为“反军派”。

6，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底，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两派对立的组织终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以后，中央作出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的决定。为了巩固革命秩序，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没有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乘机对原来的造反派进行打击，形成一种“造反无好人”的社会舆论。

8，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有扩大化的倾向，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乘机对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进行打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左派的革命造反活动说成是反革命阴谋活动，在群众中形成一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社会舆论。

9，一九七〇年九·一三以后至一九七三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又乘机打击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把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都说成是与林彪、陈伯达有牵连的反革命活动。

10，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中央的一些单位和部门，利用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全国大搞批极左思潮，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极左思潮。造成一种反左不反右的社会风气。

11，一九七四年，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各地的革命左派奋起批判九大以后对革命左派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要求恢复革命左派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右派加以抵制，污蔑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批“周公”。

12，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搞“全面整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十一月，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影响到全国。

13，一九七六年，中央号召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左派拥护，中派观望，右派抵制。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右派组织的，真正参加闹事的人只有一小撮。

小结：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右派势力代表着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右派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党内的也是社会的主要危险。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党员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是社会的也是党内的主要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右派势力的斗争，焦点在于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到人民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上海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形式，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权力夺回来了。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中，还进来了个别死不悔改的

走资派，还进来了一些没有基本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发起新的进攻，夺取新的权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右派的一次次进攻，保持着高度警惕，每次都即时打击，并取得了胜利。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非常不利。由于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对右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导致斗争的失败。

2011 年 1 月 25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一章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一、中间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所谓的“中间派”，指的一批文革前犯有走资派错误、文革中逐渐转变立场拥护文化大革命、并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工作的如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陈锡联是文革前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华国锋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表示过拥护文化大革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当选第九届、第十届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有的人甚至政治立场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如华国锋，一九六七年在湖南的两派斗争中，虽经造反派多次做工作，他始终保持沉默。只到中央点名让他去北京，他才在上去北京的飞机前，发表一纸声明支持造反派。调中央工作后，他表面上紧跟革命派，其实内心对江张姚王等人“恨得要死”。

如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他“人在曹营，心在汉”，对文化大革命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

如汪东兴，虽然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但一九六九后陷入了林彪反党集团，犯了严重错误，经过毛泽东的教育挽救，他自己作了假检讨，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仍然是站在右派一边的。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又几次批评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华国锋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革命派保持距离，向

右派靠拢。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向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人打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他们几个人就搞假批判。

一九七六年一月，经毛主席提议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形式上看，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权由右派手中转到了中派手中，但此时的中派，已经由原来的表面上的中左变成了实际上的中右。

二、华国锋集团在逮捕革命派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华国锋集团为了夺取最高权力，阴谋把革命派打下去，与右派合流。

华国锋集团由于得到元老中的右派支持而感到自己有成功的把握。

华国锋集团具体组织和实施了对江张姚王毛等人的抓捕及对各地各部门的革命派骨干的镇压。

有人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

就这场反对革命派的军事政变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元老中右派势力如果没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想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都只能是非法的，困难重重；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就可以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就顺利得多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如果没有元老中右派势力的支持，他们就会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夹攻，也绝难成功。政变成功以后，华国锋首

先提出请叶剑英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华国锋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成果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口头上他也表示要继续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实际上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上也起了极其重要的恶劣作用，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华国锋主持逮捕、清除、批判、审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革命派。

华国锋同意为叛徒、特务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平反。

华国锋同意审判所谓的江青反革命集团。

华国锋同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华国锋集团中的一些人至死都不肯承认叛变革命的罪行

一九九九年，华国锋在与人谈话中还坚持认为，他一九七六年发动十月政变是完全正确的。二〇〇七年，他还出席了执政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吴德死后，根据吴德口述整理出版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出版，表明了他死不悔改地坚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立场。

五、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与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团结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表示悔改以后，把他们结合到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选进各级党的委员会中，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绝不是像后来右派宣传的那样——毛主席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不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也无权决定谁继任中央主席），而是作为一个过渡步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由右派转为中派，应该说对革命派更为有利。但为什么不直接转到革命派的手中，如王洪文或张春桥甚至江青？这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因素。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派突然倒戈，迅速与右派合流，这恐怕是革命派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缺乏这方面的警惕，结果在突然袭击来临时只能束手待毙。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革命的人们应该牢记不忘！

2011 年 2 月 1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一章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多次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一）运动初期，极左思潮漫延，形成一股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党内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一股极左的或形左实右的思潮，有人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陶铸鼓吹“除了毛主席，一切人都可以炮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接见革命师生的讲话中提出：要防止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些地方的走资派又利用这一口号打压造反派，攻击他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再次发动“抓黑鬼”运动，把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一些地方的走资派煽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反对起来造反的学生。

（二）运动兴起，群众组织中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等地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二月，右派在中央及各地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在各地的夺权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军队支左人员，联合一部分造反派，攻击、镇压另一部分造反派。加之，在造反派内部由于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唯我独革、以我为中心，造成造反派内部分裂，逐步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三）运动转折，一些人提出“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斗争矛头发生了转移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外语学院、钢铁学院极少数人成立“五·一六兵团”，不时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群众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以此为开端，许多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参加的有四千多个组织 20 多万人，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中央报刊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人号召搞“第三次大串连”，到南京等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枝弹药。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七千多人，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火烧了英国代办处。

（四）运动深入，一些人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抢夺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一九六八年六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一些人破坏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武器，杀伤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群众组织头头下令，对开进该校的工人宣传队开枪，打死工宣队员三人，打伤多人。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山西省的太原、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一些混在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发布的历次通告，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冲击军事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指战员；破坏交通，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和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抢占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用武力抢占地盘，残害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制造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

（五）一些人提出“反复旧”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支持下，山东省一些地区开展起了“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部队的领导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湖北、湖南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领导人，也搞起了“反复旧”运动。

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

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如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严重地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多中心论”和“以我为中心”。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人民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种无政府主义既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也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因此，必须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社会基础，是由于在造反派中各种市民、游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三、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

动力是工人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每一个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一场斗私批修的大革命，否则，你就当不好革命的动力，也当不好革命的对象。

从领导干部来说，并不说凡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从群众运动来说，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的时候，不可能等到对每一位领导干部作出结论以后，才允许群众揭发批判。只能是在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再作出结论。群众提出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有些可能是部分错误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作为组织来说，要经过调查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作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来说，也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批评。这就是要斗私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破除私心杂念，只有批修，才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正确态度，很快由“对象”变成了“动力”，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老是与群众闹对立，最后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从群众来说，并不是说凡是群众就是天然的革命派、造反派。

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起来造反的人看不惯、甚至于反对。

参加造反的人也需要作阶级分析：有的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的人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造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造工人阶级的反，有的人站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反。这后面两种当然是极少数。

即使是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人，也难免带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甚至于恶性膨胀。一个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原造反派头头在总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

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 22 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 年 5 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 月 29 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我恨懊悔，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嘛。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呢，北大 3 月 29 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 年 4 月 23 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 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

就去攻数学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何时发表的？）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表面上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一个楼，是二层的，地面距楼顶有 8、9 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绑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两个人当场死了，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 年 5 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角上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地道战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拿来炸药，一炸就给他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

要的人。当时不攻其中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的任城中，刘杰长，陈继发这几个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张武斗。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的很。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这种“全身浮肿，头脑膨胀”的情况，不是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他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距离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要求，还相当远。而他们自己恰好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清除头脑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2011 年 2 月 2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一章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对错误思潮的处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在思想教育，对造反派犯错误打击过重，削弱了文革的社会基础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经毛主席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审查。这时，仍然是作为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讲话中指出：要反对从极左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要揭露“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一九六八年，出现了“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嫌疑人涉及到一些中央级的领导人，又出现了“杨傅余事件”。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指出：“‘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说：“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

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这时就把王、关、戚与“五·一六”联系起来，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化，由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展不到半年，毛主席发现了问题。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指出：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这个通知首先肯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在黑后台中又增加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另一方面通知又着重指出：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与“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这个通知发出以后，一些单位的清查运动实际上就停下来了。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根据有人反映情况，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意见，中央又开始狠抓清查运动，以北京为重点，在全国铺开。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这就是说，运动由清查“五·一六”组织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转向清查重大反革命事件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且，这些所谓的“重大反革命事件”，除了中央定的“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外，其它都是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自己说了算。

这样，首先在指导思想虽然强调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具体指导上仍发生了错误：把群众性的极左的、盲动的、无政府主义事件，看成了反革命事件；把有关的甚至无关的责任人，看成了“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把参加了有关活动的人，当成了嫌疑犯。其次在具体执行上，虽然是强调了依靠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但是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中，都混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怀有敌对情绪的人，如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利用清查运动对革命派进行打击报复。再次，此时，中央领导的主要注意已经转向对付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放松了对清查工作的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清查运动又进行了一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说：

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北京市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 1052 人，在一段时间里 20 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 283 人，占职工总数 27%，占在职干部 43%，占党员 28%，占老工人 26%，搞过揪斗、“帮促”的占 60%。

面宽的有的到了 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

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是“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

吴德说：围困中南海，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只有 30 几个人。火烧英代办处，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只有十几个人。可是因这两件事，作为清查对象的、进“学习班”的、受到“帮促”的、被“揪斗”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

下面是原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谈他在清查五·一六中的情况：

1970 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 年 11 月，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做工作，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嘛。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里边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所有干的坏事都是我指挥办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给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 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 73 年才让我去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全国各地情况类似，都列出了本地的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清查。涉及到的人，据说有数百万。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告状。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的左倾盲动行为，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

第二，混淆了大是大非，把群众的造反行为，作为反革命行为，造反有理变成了造反有罪。

第三，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四，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五，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舆论：参加造反、支持造反都不会有好下场！造反派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甚至倒向右派一边。北京一所大学的原造反派头头说：挨了整后，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形色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对“四人帮”把我们当替罪羊，用完了一脚踢开的作法深恶痛绝，对文革中被整的人特别是老干部十分同情，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和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我们不应当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再反对邓小平。当时正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了“三株大毒草”后，认为老邓说得对，说得好，便搞了一套拿回了 7 3 8 厂传阅，并主动交给一个当官的看。

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被严重地削弱了。

第六，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右派又抓住这些所谓反革命事件，栽赃到左派领导人身上，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2011 年 2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一九七六年以后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以下从中国社会几个方面的变化来说明。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经济边缘化

GDP 的高速增长被看作中国市场化转型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据。然而，众所周知，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而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在此或许需要首先简述如下常识，即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在统一的国际劳动分工上，其中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在西方公然的殖民掠夺停止之后，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国际劳动分工有效地维护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分工。长期发挥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分工劣势之中，没有也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分工链条上。几百年来的经济史表明，无论如何起劲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鲜有成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它们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动摇自己的优势地位。

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意义在跨越常规，为尽快摆脱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当高的持续增长，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到改革前夕，中国已经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许多边缘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超常规”发展战略使中国在建国后短短十几年就拥有了核武器，成为多年来世界核大国中唯一的低收入国

家, 在科研领域也推出了世界级成果。因此, 尽管人均收入水平类似于其他边缘国家, 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却类似半边缘国家, 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例。与同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印度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超出印度, 不但人均收入超过印度, 工业化程度更是远远高于印度。改革后, 中国开始把追求 GDP 增长放在首位。为此, 中国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 包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 建立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 大量引进外资, 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1980-2005 年, 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 15.6%, 大大高于 GDP 增长速度, 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结果, 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 1980 年的不到 1% 上升到 2005 年的大约 7%, 在全球排名从第 22 位上升到第 3 位。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 到 2005 年, 外资在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税收总额、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等方面已经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 支撑着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

按照外贸占 GDP 的比重衡量, 目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明显外贸导向或外向型特征, 被认为严重到患上了“外资依赖症”的地步。经济史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要对外开放并不难, 因为强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本国经济开放度, 而相对弱小的国家则通常难以抵御内外压力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 不得不打开国门。但是, 对外开放程度并不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无论美国还是日本, 它们目前的开放程度都大大低于今天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很大差别, 甚至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其经济反倒是高度开放的。需要分析的是, 外向型增长模式是否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是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 还是越来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 判断一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 有一个简单标准可做参考, 那就是该国基本出口产品的结构或类别。有研究用出口商品构成衡量国家的生产力, 发现它与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例如, 富国的出口产品往往类似其他富国的出口产品, 即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但也有例外。如果出口产品的结构高于人均收入通常预示的水平, 说明该国生产力超过人均收入水平通常达到的水平。有研究表明, 1992 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类似于人均 GDP 比中国高 6 倍多的国家, 表明中国拥有强大的产业能力, 生产力表现出半边缘国家的特征。

然而，这个优势在改革中不是保持或扩大，而是逐步缩小了，尽管与类似人均 GDP 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仍然要好一些。

中国产业优势逐渐下降的时期，正是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强调运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期。为了保持价格优势，以便充当外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中国竭力维持低工资。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在国内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世界市场则难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产品进行恶性竞争的陷阱。中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所谓“竞底”或“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各国比的不是谁生产力更高，产品科技含量更多，人力资本更雄厚，而是比谁更次、更糟，更能苛待本国劳动力，更能容忍对本国资源环境的破坏。事实证明，这种朝向工业文明底线的竞争不但不能提升一国的地位，不能使之迈上一个台阶，反而使之陷入不发达陷阱难以自拔。如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国内市场同样充斥着外国品牌的各种产品和消费品，许多原先著名的国产品牌大多已销声匿迹。中国可以大量出口，本土产业却不能制造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的产品，“有出口而无产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GDP 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增加，但经济总量与工业化/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概念。一直到 1820 年，即西方工业化开始后二十多年，中国的 GDP 仍占世界 50% 以上，是整个欧洲的 1.22 倍，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欧洲，出口制造品世界第一，当时的世界上充斥着“中国制造”。但那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弱国，抵挡不住西方的侵略和打击。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但经济结构恶化，对外依附性增加，国内消费规模得不到相应扩大甚至相对萎缩。在某些方面，其日趋边缘化的增长模式与成功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例如日本。

经济结构趋向边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是拉近了与“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的距离。

二、资源环境恶劣化

1、高速度、高能耗的发展，加剧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从总量上看是资源大国,但从人均资源上看则是资源小国。国际上认为直接关系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有四大资源,即土地、淡水、森林、草地。我国人均土地为世界人均量的 1/3,人均淡水量为世界人均量的 1/4,人均森林面积为世界人均量的 1/6,人均草地量为世界人均量的 1/3。此外,45 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多数相当世界平均量的 1/2 上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高出经济合作组织 30 个国家平均值的 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 2 至 3 倍。这一低一高,加剧了我国资源短缺与经济发

展的矛盾,形成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凸显了节约自然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国消耗的原油约有 50% 依靠进口。我国作为世界产煤第一大国,一向是净出口的,但 2007 年第一季度出现了煤净进口的现象。这种现象要经过努力才能改变。

顺便说到,前几天报纸上有这样一条短讯:一个日本学者就“中国的资源总量与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问题问了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竟无一人能准确地回答出来。但同样就日本的此类情况问及日本人,就连小学生也能给出准确的答案。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人民日报》2007 年 4 月 9 日)

2、高速度、高污染的发展,使 GDP 的增长大打折扣,并且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损害人民健康。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而环境保护工作严重滞后,因而产生了大量污染。在全球 20 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占 16 个(《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4 日报导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关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还缺乏全面而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许多学者和有关机构作了大体的测算:

——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政策研究中心孙炳彦在《90 年代初期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和思考》一书中测算:1990、1992、1994 年我国污染损失分别占当年 GNP 的 7.4%、6.9%、6.5%。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求是》杂志 2000 年第 3 期发表的文章称: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的大气污染、河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 GDP 的 4%—8%。

——据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测算,1993 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 GDP

的 3.16%，生态破坏（森林、草原、农田、水资源、湿地、土壤侵蚀、人为灾害）占到当年 GDP 的 6.87%，两项合计损失占 GDP 的 10.03%。

——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 1997 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 GDP 的 7.7%。

——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4 年全国污染损失占当年 GDP 的 3.05%。但并未包括自然资源核算，环境成本中也未计入生态破坏损失，即使环境污染损失，其内容也是不全面的（《人民日报》2007 年 3 月 28 日）。

高污染的后果包括致人疾病甚至早亡。据媒体报导：“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报告近日完成。这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 75 万人早亡，主要死因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该报告是世界银行花费数年时间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完成的。世界银行的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每年有 35 万至 40 万人早亡，每年还有 30 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早亡。另外，还有 6 万多人因水质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4 日）。

又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07 年 7 月 17 日公布的、经过 18 个月的调查写成的首份《中国环境绩效报告》中称：“预计到 2020 年之前，空气污染会导致中国 60 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 2000 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 万例慢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这可能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13%”（《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18 日）。

上述资料，由于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的不同，所得数据不尽一致。但大体可以看出，污染损失占 GDP 的比例在 3%到 8%之间；生态的损失所占 GDP 的比例 6%到 7%。如果再加上由于污染而使人患病、早亡的损失，比例就更高了。如果从高速增长 GDP 中，扣除实际存在的、巨大的环境代价，那就不是发展的高速度，而是低速度。

环境资源问题。我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却高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30 个国家平均值的 20%；资源供应紧张，所需石油约 50%依靠进口。目前世界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中国就占 16 个。据测算，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 GDP 的 3%到 8%，生态破坏（草原、湿地、森林、土壤侵蚀等）约占 GDP 的 6%-7%。两项合计约占 GDP 的 9%到 15%。大气和水质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损害居民健康，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据世界银行估计，

中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早亡 75 万人。据经济合作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损失占 GDP 的 13%。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还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这些事实说明，如果扣除环境损失的过高代价，GDP 的增长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有的甚至是得不偿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中国环境绩效报告》中还指出：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在迅速赶超德国、日本和美国，但中国的环境标准常常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该组织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备忘录，并在《报告》中给中国提出了 51 项建议，其中包括把中国的环保总局升级为“部”。

3、高能耗、高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私有化是其深层次的重要原因。

高能耗、高污染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问题的解决又如此艰难？人们指出了许多原因：思想认识上重速度轻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行业结构不合理、政绩考核不全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有法不依而又监督不力、等等。这些原因确实都是存在的。针对这些原因，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政绩考核办法、加强宏观调控、加大执法力度、等等。这些措施确实也是必要的。

但是，为什么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收效不大？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屡禁屡犯？究竟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这就不能不涉及这些年来私有制经济的大发展问题。上面列举的形成高能耗、高污染的种种原因，归根结蒂，主要是追求高额利润问题，而追求高额利润正是私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为什么思想认识不到位？为什么行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为什么有法不依？都与追求高额利润密切相关。例如：2006 年原来国家要求 GDP 增长 7.5%，能耗降低 4%；但执行结果，GDP 增长 11.1%。而能耗仅降低 1.33%，而在 GDP 增量中，高耗能行业也就是高利润行业的贡献在 60% 以上，“这必然导致能耗整体处于高水平上”（参看《人民日报》2007 年 7 月 13 日：《节能降耗任重道远》）。

私有化导致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建的私营企业，大多数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特别是小钢铁、小水泥、小炼钢、小煤窑等等，污染程度特别严重。国家多次下令关闭这些小企业，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下，往往明停暗开、多次反复、进展缓慢。

2011 年 3 月 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一九七六年以后，大肆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理论

他们大讲“经济人假设——人性自私论”，说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违反人的本性，注定要失败，但极力回避苏联建国后半世纪依靠公有制使经济落后的沙俄变为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半世纪主要依靠公有制使经济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大大缩小的事实。

他们大讲国有经济“产权不明”“产权虚置”，只有卖给个人，使“产权明确化”才能旺盛发展，但极力回避俄罗斯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造成国民经济大倒退的事实。

他们大讲“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只有私有化，由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才能提高效率，但极力回避 1952 年到 1998 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大大高于非国有企业、大大高于“世界 500 强”的事实。

他们大讲“靓女先嫁论”“冰棍论”，以“靓女”要老化、“冰棍”要融化为“理由”，要把国有企业尽快贱价卖给或者白送给本企业的厂长、经理或中外资本家，把全民所有的财产转化为个人的财产以“深化市场化改革”，

有的地方政府官员还大讲“放手、放心、放胆”地扩大私营经济，东北某省省长甚至鼓吹“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换位”(《经济日报》2006 年 6 月 1 日)。

一些人认为应当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行业和领域，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依法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开采权，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甚至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方针，国家要从减税、出钱、

让利以及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大力支持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对国有企业进行并购、控股、参股,做到国退民进。

有些人主张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不体现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即比重在 50%以上,而主要体现在它的控制力上。

他们鼓吹“股份制是国有制经济最好的实现形式”,因为在股份制企业,国有资本既可以绝对控股,即占 50%以上;也可以相对控股,国有股只要占到 20%到 30%,就可以控制 70%—80%的私人股份,从而扩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

他们还大力宣扬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扩大控制力,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发展。因此,国家计划(或规划)中不必列入公私经济比重的指标,国家统计局也不必统计和公布公私经济所占比重的全面数字。

二、一九七六年以后私有化的进程

(一) 私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近十年来,大批国有企业被贱价甚至“零售价”出卖(包括 MBO),从而变成私营企业。推行国企股份化,实际是把国有企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国有控股、私资参股)。集体经济更受到多方挤压而被边缘化或私有化。据国家统计局 2005 年经济普查所得的数字,在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中,从 1996 年到 2004 年,公有资本所占比重由 83.3% (国有占 58.6%,集体占 24.7%) 下降到 56% (国有占 48.1%,集体占 7.9%),减少 27.3 个百分点;非公有资本(国内私营和港澳台、外商资本)由 16.7%上升到 44%,增加 27.3 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的就业人员,在由国有、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由 1.5 亿人减少到 5020 万人,仅剩三分之一,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 83.8%下降到 29.8%,减少 54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由 43.4%下降为 18.4%,集体企业由 40.4%减少到 11.4%。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一个雇佣劳动者占多数而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占少数的社会基础,能够长期支持住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吗?

又据全国工商联在 2006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

析报告》提供的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推算，2000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 42.4%，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为 12.6%，二者之和占 GDP 的 55%。2005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约 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 15%-16%，两者之和约为 65%。”（《中华工商时报》，2006 年 3 月 4 日）。这就是说，“十五”期间“民进国退”的结果，前者进了 10 个百分点，后者退了 10 个百分点。须要说明的是，这个《报告》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扣除集体经济 GDP 中所占的比重（估计约为 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私资部分的比重（估计至少 4%），则非公经济 GDP 所占的比重约为 61%，公有制经济 GDP 所占的比重约为 39%。这就是说，公私经济比重大体上是“四六开”，而且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下降。

据有些专家估算，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 40% 左右，加上外资企业，则非公有制工业的增加值就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陈全生、陈永杰，2005，2）。另一位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6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 2004 年《统计公报》中提供的工业部门“规模以上”（年销售收 500 万元以上）各种所有制企业增加值数的数字，加以必要的补充和调整，估算全国工业增力口值中，私有制经济大体占 62%（个体私营占 38%，外资占 24%）；公有制经济大体占 38%（国有经济占 32%，集体经济占 6%）（史正明，2005，3）。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工业部门，占居优势的已经不是公有制经济而是私有制经济了。

关于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公私经济的比重，有的学者估算，非国有经济大致占我国国民经济的 2 / 3（吴敬琏，2003，11）。有的民间组织负责人估算，目前已形成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05，2）。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估算，目前个体私营所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1 / 3 左右（2005，2）。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没有提到外资经济。如果加上占国民经济 13% 强的外资经济（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取得的 2001 年资料：外资实收资本占全国各类单位实收资本总量的 13.32%），那么，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 46% 强（33%+13

%强)。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私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更大幅度地超过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据《中国信息报》(国家统计局主办)2005年6月14日报导,自从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出现了“政策助跑,全面发力,个体私营经济冲上快行道”的新局面。个体和私营经济增长速度,由2月份的13%跃升为3月份的23%;以后的4月、5月,又进一步提高到24.7%和26.6%。同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14.7%、16%、16.6%的速度相比,3月份高出8.3个百分点,4月份高出8.7个百分点,5月份高出10个百分点。有的专家估计,现在不仅在工业部门,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也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了。

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

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与68%;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

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特别重要的部门进军。

1, 当前各种所有制的资本的结构

表 1 企业法人来自各种所有制的实收资本

所有制	2001 年		2004 年		增减	
	万亿元	%	万亿元	%	万亿元	百分点
国家资本	7.5	1.5	54.4	11.3		
集体资本						
		8.7				
	1.4					48.1

	7.9	+ 1.2			
	- 0.1		- 6.3		
	- 3.4				
	公有制资本		9.0	65.7	10.1
56.0	+ 1.1		- 9.7		
	私人资本				
	港澳台资本				
	外商资本		2.5		
	1.1				
	1.1		18.4		
	8.1				
	7.8		5.1		
	1.3				
	1.6		28.0		
	7.3				
	8.7		+ 2.6		
	+ 0.2				
	+ 0.5		+ 9.6		
	- 0.8				
	+ 0.9				
	私有制资本		4.7	34.3	8.0
44.0	+ 3.3		+ 9.7		
	合计		13.7	100.0	18.2
+ 4.4	——				

注：本表来自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二、三产业）的材料，其中未包括二、三产业中 3332.9 万个个体经营户的资本。

从表 1 可以看出：公私经济实收资本比重，2001 年为 65.7：34.3；2004 年则变为 56：44。这三年，国有资本的绝对值是增长的，但增长速度比私有制慢；集体资本绝对值则是减少的。因此，公有制资本比重减少 9.7 个百分点，平

均每年减少 3.23 个百分点。

关于 2005 年和 2006 年公私经济资本变化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只提供了固定资产变化的材料: 2005 年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及国家控股参股等混合经济、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3.6%, 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0.6%, 后者为前者的 1.72 倍; 2006 年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1.6%, 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5.3%, 后者为前者的 1.63 倍。这说明, 私营经济固定资产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公有经济固定投资增长幅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并不是全部资本增长额, 但它是投资额增长主要部分; 而且统计部门提供的上述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数字中, 还包括了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私有部分未曾剔除, 但是大体看来, 还是可以反映公私资本变化的基本趋势的。由此, 可以判断, 2005 年和 2006 年私有资本比重增长的速度, 明显高于前几年平均每年增长 3.23 个百分点。按每年增长 4 个百分点测算, 2005 年公私经济的比重是 52: 48, 2006 年公私资本的比重是 48: 52。这是二、三产业的情况。

关于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其 2005 年的 GDP 占全国 GDP 的 15.8%) 的数字, 不在这次经济普查范围内。所以无法将第一产业各种所有制的数字补入经济普查所得的第二、第三产业的资料。

2, 当前各种所有制从业人员的结构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说明: 从 1996 年到 2001 年, 在二、三产业中由国有、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 由 15281 万人减少到 5020 万人, 减少三分之二, 占二、三产业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由 83.8%, 减少到 29.8%, 下降 54 个百分点。其中: 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由 7916 万人, 减少到 3102 万人, 所占比重由 43.4% 下降到 18.4%, 下降 25 个百分点; 集体企业由 7365 万人减少到 1918 万人, 所占比重由 40.4%, 减少到 11.4%, 下降 29 个百分点。经济普查资料还说明: 2004 年末在我国私营、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员达到 7636 万人, 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 45%, 1996 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就业人员 696 万人, 年均增长 17.8%, 其中私营企业就业人员 5305 万人, 占 31.4%, 1996 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 560 万人就业, 年均增长 26% 以上。

上述数字表明: 2004 年在第二、第三产业中, 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

员占 29.8%，在私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 45%，两者相加为 74.8%。那么，其余 25.2%的就业人员是在什么样的企业中就业的呢？回答是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中就业。在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中，对这类企业的人员没有按所有制性质划分。我认为，这部分人员可以按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同所有制资本所占的比例来划分。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 年公有制企业的实收资本占二、三产业全部实收资本总数的 40.4%，私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占 34.6%，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占 25%。从前面第一节表格中所列的各种所有制资本所占比重，减去本节所列的相应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即可得出各种所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以推算出：公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 15.6% ($56\% - 40.4\%$)；私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 9.4% ($44\% - 34.6\%$)，两者合计为 25%，与本节所列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就业人数占 25.2%的数值十分相近。现在，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就业人员按上述资本比例划分（略作技术性微调，将 15.6%和 9.4%各加 0.1%，使二者之和与 25.2%相一致），再分别与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相加，即可得出：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员比重为 45.5% ($29.8\% + 15.7\%$)；私有制就业人员比重为 54.5% ($45\% + 9.5\%$)。这是 2004 年的数字。

那么，2005 年和 2006 年公私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是多少呢？从上述资料中看出，从 1996 年到 2004 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由 83.8%减少到 29.8%，下降 54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 6.75 个百分点。按照每年继续下降 6.75 个百分点测算，则 2005 年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38.75% ($45.5\% - 6.75\%$)，私有制经济人员为 61.25% ($54.5\% + 6.75\%$)；2006 年前者为 32%，后者为 68%。

3, 当前各种所有制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所占比重的结构

全国工商联于 2006 年 3 月初发布了《‘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报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调查数字推算，2000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为 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 12.6%。二者之和占 GDP 的 55%。2005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为 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 15%—16%，两者之和约为 65%（《中华工商时报》，2006 年 3 月 4 日）。从 2000 年到 2005 年，民营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2 个百分点。

该《报告》说明，其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 2005 年民营经济的 GDP 所占的 65% 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 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 4%），则非公有制经济 GDP 中所占比重为 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 GDP 所占比重为 39%。按照上述每年民营经济增长 2 个百分点测算，2006 年公私经济 GDP 的比重为 37：63。

综上所述，2006 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

- 1、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8%与 52%；
- 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2%与 68%；
- 3、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与 63%。

所有制结构问题。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的数字。据全国工商联 2006 年 3 月初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字：2000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为 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 12.6%。二者之和占 GDP 的 55%。2005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为 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 15%-16%，两者之和约为 65%。这五年中，民营经济比重增长 10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2 个百分点。该《报告》说明，其所称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 2005 年民营经济的 GDP 所占的 65% 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 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 4%），则私有制经济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为 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 GDP 所占比重为 39%。按照私营经济每年增长 2 个百分点测算，2006 年全国 GDP 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 37%与 63%。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04 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 15.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第 505 页资料计算）。这一比例比建国之初的 1949 年国有工业占 26.2% 的比例还要低得多。这说明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并向电力、铁路、邮电、

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到 2010 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上达到了三七开，即公有制经占三成，私有制经济占七成。

（二）国家所有制已经变质成为官僚资本所有制

现在统计部门常常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捆在一起作为一个指标，列入国有经济。国有控股、私人参股的企业（包括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实质上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有资本可以控制参股的私人资本的使用方向，但并没有改变参股资本家对其资本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这就是说，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部分资本的私有制性质。可以看出，这些论者试图用“控制力”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概念，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概念，用国有控股企业的概念取代或混同国有企业的概念。从实际情况看，事情往往并不到此为止。接着，主管者往往又提出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股要“减持”，三减两减，往往用不了多少时间，原来的国有控股企业就变为私人资本控股了，有些甚至减持为零，变为纯粹的私营企业了。

现中国挂着“国有”牌子的经济成分，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看，都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而只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从国家政权这个层面上来看，现中国的国家政权早已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工农群众直接参与管理，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科研”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领导的，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国家的一切大权包括挂着“国有”牌子的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完全掌握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工农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被打翻在地，成为被剥夺、被压迫的“弱势群体”。所以，挂着“国有”牌子的经济成分当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从企业这个层面上来看，现中国挂着“国有”牌子的企业，都是规模大、利润高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企业，这些企业早已背叛了《鞍钢宪法》中“党委领导，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企业的领导管理，变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们的子女、亲

友担任主要领导，管理职务的权门领导，“精英”管理，执行发展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工人群众和下级职员成为被剥夺了在企业里一切权力，只不过是供他们剥削的雇佣奴隶。这些企业里的工人群众之所以还反对改变“国有”牌子，不是由于它是什么“公有制”，而是由于如果它还挂着“国有”的牌子，它就难以取消工人群众原有的一些集体福利。当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放松对工人群众的剥夺，他们正在以各种借口逼迫正式工人下岗，而雇用工资低且不享有集体福利的农民工。 第三，从生产关系这个层面来看，

(1) 生产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主要因素；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有巩固和破坏的反作用，后两者（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之间也有相互影响的作用。

(2) 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劳动群众，上级与下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社会分工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必须是平等一致的同志式关系，而无尊贵卑贱之分。如果这种同志式关系受到损害或破坏，各级领导干部、脑力劳动者成为高踞于劳动群众、下级和体力劳动者头上的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享有特权的阶层，而劳动群众、下级和体力劳动者则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那么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就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前一种人手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要变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中，特权阶层中那些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同路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在国内资产阶级复辟愿望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下，就会成为修正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提倡者，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

(3) 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消灭了生产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脱胎出来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程度，人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不计报酬的劳动的水平。因此，在分配领域里还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而不顾个人的实际需要的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分配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分配制度。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把这种分配制度，叫做分配领域内的“资

产阶级法权”，按照这种分配制度，工资待遇，等级悬殊；上下尊卑，界限森严。如果不加限制，必然要“从各个方面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一致的同志式关系的建立，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

现存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资金还是国家所有，但多数国有企业中，工人阶级已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在经济上，广大一线职工的工资与“高管”的工资相差悬殊，工人与企业之间完全成为雇佣关系，工人随时有被“炒鱿鱼”的可能；在政治上，工人对企业管理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即“政企分开、产权明确、权责合理、管理科学”，全盘照搬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套办法，根本没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条。因此，这样的国有企业可说是已发生了质变。

三、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从改变经济计划开始，逐步转向了由所谓“国退民进”引导的产权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私有经济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从而具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产权改革开始成为改革的重头戏。产权变动的趋势表现为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质上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300 多万个中小型国企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几乎完全退出了舞台，县级和以下行政地区已经看不到国有企业的踪影。2000 年到 2005 年，二级以上国企由 23 万家减少到 12 万家，省属国企中 90% 已完成改制。

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家统计局等 8 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联的研究，截止 2005 年底，私有部门在中国 GDP 中的比重已经达到 50%，如果把外资统计在内，广义上的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 65%；2005 年底，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 70-80% 的收入来自这些所谓民营企业。（5 黄孟复、胡德平主编：《2006 年民营经济蓝皮书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年》计算，2004 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 另外还有资料表明，中国私有经济的比重目前

占 GDP 的 2/3 甚至更高,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2007 年 3 月 16 日,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物权法》, 国外很多人将此举看作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一个里程碑。

在私有制重建之前, 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改革的最初对象是集体的经济计划体系。随后, 改革的市场取向越来越突出, 从不断降低经济计划的作用, 相应扩大市场力量, 到完全放弃经济计划, 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制度。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 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如果说, 商品化程度是市场化最重要的标志, 那么, 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 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 而且,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购买力。这些领域的高度商品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发达国家, 政府通常限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或市场化。例如, 它们大多倾向于把教育、医疗作为公共产品, 通过社会化方式统筹提供, 而不是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买卖。在今天的中国, 市场可以说无处不在。市场经济的种种要件,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片空白, 到如今无不繁荣昌盛。从广告、股票、期货、保险、消费贷款、彩票, 到相应的从业人员如广告商、经纪人、“黄牛党”等, 可谓应有尽有。政府在改革期间公开提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口号, 把“效率”即“利润”置于社会公平之上。相比之下, 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更愿意强调后者, 至少表面上不能不考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普遍要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中国政府不但强调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 而且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到 2008 年 2 月末, 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 77 个国家的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 由于中国的工会力量薄弱, 劳动立法滞后、不完善以及实施无力, 难以对资本形成必要的制约, 因此, 当今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不如资本家的利润那样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 而劳动者却常常劳而不获, 以至劳工在不得已情况下, 甚至采用自杀或自杀相威胁讨要应得的工钱。这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的公然掠夺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流行, 但

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则比较普遍。中国当前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权钱交易盛行。在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似乎远比所谓“公平交易”更能克敌制胜。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资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无论怎么看都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化的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在一些人看来，存在这些现象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级阶段，而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事实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体制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时也更无序、更脆弱。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较低，而政府管理和调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干预，或者干预效率更低。中国建国后建立起一个强政府，尽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能力在市场转型中日趋削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越来越带有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四、经济格局已经由自主经济变成了殖民经济

1、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加快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2万亿美元，顺差1020亿美元，2006年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顺差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实际利用外资，1978年到2005年累计达8091亿美元。2006年又实际利用外资735亿美元。这些都促进了我国GDP的快速增长。

2、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偏低；对外技术的依存度过高，自主创新能力偏低。

首先是对外依存度过大。2005年进出口总额相当我国GDP总额的63.6%，2006年进一步上升。这个比例较之美国、日本这样的外贸大国18%-20%的外贸依存度，都大大超过了。相对之下，我国的国内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支出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偏低，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年为62%，1995年为57.5%，2005

年为 52.1% (其中政府消费 14.1%, 居民消费 38%)。居民消费比例偏低, 是同我国贫富悬殊、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密切联系的。

再看看国际上的统计数字: 2005 年世界平均的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构成的 75.2% (其中居民消费占 62%), 发展中国家消费占 72.2% (其中居民消费占 58.9%)。由此可见, 我国的消费比例特别是居民消费比例, 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现在,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时又是国内消费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这种现象是很不健康的。有一家国外媒体说: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内消费、投资、净出口), 在中国是“两匹壮马(投资、净出口)配一匹瘦驴(消费)”, 并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存在某一天会翻车的危险”(《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23 日载香港《亚洲时报》文)。2007 年上半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是好消息, 但要大幅度提高国内消费比例, 还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个问题, 是对外技术依存度居高不下。过去原想引进外资可以做到“以市场换技术”, 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在引进外资的企业中, 我方通过“技术溢出”(FDI) 获得了一些浅层次的技术和某些经营管理经验, 但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核心技术。目前, 我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 50%, 而美国、日本仅为 5% 左右。我国大约 90% 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 60% 来自外国投资的企业。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人士说: “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 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 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 “所有这一切, 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 20 美元, 但中国只能得到其中的 35 美分。”(美国《纽约时报》2006 年 2 月 9 日文, 载《参考消息》2006 年 2 月 11 日)。由于我国劳动力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 所以外商获得超常的高利润, 而且这种高利润还在不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2006 年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26.7%, 而同期其增加值的增长率为 16.9%。

3、若干地方的“外资饥渴症”和“洋腐败”, 损害了国家利益, 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达到更高的 GDP，提出所谓“不问所有，只问所在”的原则，患了“外资饥渴症”。他们往往向外资低价出售土地，不惜损害农民利益。某些人收受外商贿赂（包括由外商安排其子女出国等多种好处），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商违法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跨国企业在我国的行贿事件一直在增加。我国 10 年内至少调查了 50 万件腐败案件，其中 64% 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这种“洋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检察日报》2007 年 1 月 2 日）。

对外资的依赖，引起了包括爱国私营企业家在内的广大经济界人士的不满和反对。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中华工商时报》以《警惕外资依赖症》为题，发表署名文章说：“目前，江苏经济的主力是外资投入，一家跨国公司到江苏来设厂，产值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经济指标迅速就能得到提升，所以各级政府都乐意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政绩，也因此招致了‘苏州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对本土企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的指责。长三角一些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做好，又不相信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追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与‘内资歧视’，将好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外资企业，导致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冲破，结果是加重了本土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江苏本土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发展举步维艰。”该文还说：“随着外资依赖症的日益明显，江、浙地区的许多企业技术进步、自主研发的积极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化。例如浙江省的模具业曾经被日本企业纳入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技术转移。但就在当地企业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中华工商时报》2007 年 7 月 17 日）

我国引进的外资企业，长期来让他们享受着低税率的“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 15%，内资企业名义税率 33%。这种对民族经济的自我歧视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当 2005 年我国政府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时，在中国的 50 家最大跨国公司竟然联合上书中央，反对取消这种不合理的低税率优惠，公开抛弃了他们一贯高唱的外国企业要享受与国内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口号。经过几年的反复讨论，终于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上通过了中外企业统一税率为 25%的《企业所得税法》，但如何贯彻落实，尚待今后努力。

4、外资大举并购我国优秀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使我国国民经济面临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外资对我国从合资、合作到独资建厂，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他们的要求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 15%。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他们对我国的一般国有企业拼命压价，对好的国有企业则不惜高价收购。一些跨国公司认为，现在是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好时机，收购价格正像中国的劳动者的工资那样，远远低于欧美；还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销售网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渠道以及品牌，再加上外商的资本和技术，就可以逐步实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

最近一个时期，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其矛头直指产业控制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资并购重点转向我国重要行业的排头兵，抢占制高点。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具有明显的操控中国市场的战略指向。例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轴承行业的西北轴承公司，油泵油嘴行业的无锡威孚有限公司，齿轮行业的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有限公司等。这些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重组。

第二，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 1995 年开始与徐工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已并购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美国这家公司的这一布局得以实现，就可能“通吃”我国工程机械行业。

第三，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出现了联合行动，既有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投资公司或基金的配合。

据有关研究部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

许多产业排名前 5 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

在钢铁行业，产能规模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米塔尔公司和阿塞洛公司，目前都已完成了它们在中国的并购布局。2005 年 7 月，米塔尔以 26 亿元收购华菱钢管 37% 以上的股份；2006 年 2 月，阿塞洛以 20.86 亿元收购莱钢 38.41% 的股份。阿塞洛虽然没有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已经与莱钢的另一大股东集团的股份持平。有消息指出，米塔尔、阿塞洛等已广泛接触国内地方钢厂等二线企业，如包钢、昆钢等，大有“将并购进行到底”的势头。

在机械行业，2005 年 10 月，国际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美国凯雷集团，宣布以 3.7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这是国际投资基金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股权的第一例。徐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徐工机械则是其最核心的企业。又如：大连机电厂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是国内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1996 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 3 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一半以上职工失业，技术平台瓦解。再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居国内市场的 95%。1997 年以它的优质资产与美国一公司合资，7 年后被美国公司全部收购。从此，中国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技术平台瓦解，农业大国中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市场被美国公司垄断。再如：中国化工机械制造的设备生产基地和龙头企业锦西化机，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制造、维修技术，2004 年全集团盈利 800 多万元。2005 年，在葫芦岛市政府的主导下，锦西化机与德国西门子合资，丧失了对其最大且唯一盈利的分厂的控制权。从此，国内大型化肥设备制造、维修依靠的对象变成了外国公司。

在水泥行业，并购风潮也不断涌起。2006 年 1 月 6 日，海螺水泥发布公告称，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亚洲有限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分别买下海螺集团持有的海螺水泥 10.51% 和 3.82% 的股权；3 月初，世界第二大水泥企业瑞士豪西蒙公司宣布，以 1.25 亿美元接下华新水泥为其定向增发的 1.6 亿股，如若审批通过，豪西蒙在华新水泥的股权将由原来的 26.1% 增加到 50.3%，从而实现对华新的绝对控股；4 月 18 日，世界水泥业老大拉法基公司一举收购了贵州本土 3 家大型水泥厂，此外拉法基公司还控制了四川双马 89.72% 的股权。外资在我国水

泥行业的并购及参股已到了全面开花的地步。我国前五大水泥企业,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 4 家企业均被外资并购。

在流通行业,2005 年商务部共批准流通行业外资企业并购项目 24 个。其中,上海永乐电器公司一次性向外商转让 61 个店铺;英国 TESCO 公司在境外收购了我国内“乐购”25 个大型超市 50%的股份。

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如果发生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大量并购,势必对我们民族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形成遏止,对我国的某些幼稚的新兴产业更会形成“封杀”的威胁,从而危及我国经济的独立自主,面临附庸化的严重危险。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如果我国的一些关键装备部门包括轴承、齿轮等骨干机械企业被外资并购,还有可能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承耀研究员在总结这些事件的共性时说:我们要“利用外资”,结果反而“被外资利用”;企业往往“拱手相让”,合资成了“外商与官员的双赢”。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等专家尖锐地指出:各地正在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革的主要途径,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短期政绩,其主导的这类合资与引进技术没有必然关系;相反,合资后由外方控股,原有的研发队伍和技术积累将会大部分解体、流失(引自《半月谈》记者周盛平、赵文:《受制于‘外’,中国企业入骨之痛》,见该刊 2006 年第 3 期)。

在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投资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过低和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问题。2005 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 64%,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 18%-20%的对外依存度。同年,我国国内消费只占 GDP 支出构成的 52%(其中除政府消费外,居民消费只占 38%),明显低于 1980 年国内消费支出占 65.5%(其中居民消费占 50.8%)的比例,这说明,GDP 这块“蛋糕”切给居民消费的比例比过去明显地变小了。同国际上比,更是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支出平均比例 72.2%(其中居民消费占 58.9%)。这种很不健康的状况是同我国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问题密切联系的。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

只有 5%。“以市场换技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患职业病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建厂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已经或正在为外商并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 5 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这一过程中，“外商与贪官双赢”现象所在多有。我国 10 年内调查的 50 万件腐败案件中，有 64% 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检察日报》2007 年 1 月 2 日）。这说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光武教授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大循环；其中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存在着中心与外围的差别，其结果必然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应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辅，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内向型经济服务，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抗拒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见《21 世纪中国的战略选择》第 2 页，西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六、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

关于我国最富人群与最贫穷人群的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财产最多的 20% 的人口拥有 59% 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 20% 的人口只拥有不足 3% 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 21: 1。又据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 10% 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45%，而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 1.4%。”（该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 3 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比例约为 32: 1。

贫富分化的现象明显地表现为基尼系数的变化上。我国 1984 年基尼系数为 0.24（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报导）。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

特别是 90 年代初以来, 基尼系数迅速增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主持的抽样调查材料: 1994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34 (李强《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分析》, 载《科学导报》1995 年第 8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美国福特斯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赞助下进行抽样调查的材料: 我国 1995 年基尼系数为 0.445 (经济所课题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财经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同志所说的数字: 我国 1994 年的基尼系数, 按人计算为 0.434, 按户计算为 0.445 (见《中国信息报》2001 年 3 月 10 日对该报记者的谈话)。

——社会学家周景彤测算的我国的基尼系数: 1996-0.424, 1998-0.456, 1999-0.457, 2000-0.458 (见《经济日报》2001 年 8 月 30 日, 周景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

据 世界银行测算, 中国基尼系数, 1998 年为 0.403, 2003 年为 0.447。该行最近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 年》测算, 我国 2004 年的基尼系数已达 0.469。这一报告中列举的各国基尼系数见表 4。

表 4 中国与若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较

国家	年度	基尼系数	国家	年
中国	2004	0.469	美国	2000
印度	2004-2005	0.57	巴西	2004
印尼	2002	0.343	保加利亚	2003
日本	1993	0.249	法国	2000
韩国	1998	0.316	德国	2000

伊朗	1998	0.43	意大利	2000
0.36				
泰国	2002	0.42	荷兰	1999
0.309				
埃及	1999-2000	0.344	俄罗斯	
2002	0.399			
南非	2000	0.578	英国	1999
0.36				
加拿大	2000	0.326	澳大利亚	
1994	0.352			

注：世界银行编《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第60页。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从上述数字看，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现在我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

近十多年来，随着所有制公退私进的发展，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据现有材料，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1995年已高达0.445（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1999），2004年又扩大到0.465，2005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2005）。这样严重的贫富悬殊，显著地超过了国际一般公认的0.4的安全警戒线，不仅高于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高于印度、印尼、埃及、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资料）。一方面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纷纷涌现；一方面是工人农民的大部分相对贫困化和部分的绝对贫困化。这种状况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全国工商联关于工资情况的调查，私营企业雇工的月均工资，上世纪末相当于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3%，2003年降到55.1%，差距更大了。

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据我国有关学者和学术单位调查测算，我

国 1985 年为 0.24, 1995 年上升为 0.434 (或 0.445), 2000 年又上升为 0.458。据世界银行测算, 中国基尼系数 2004 年进一步上升为 0.469。1995 年及以后的基尼系数, 越来越大地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 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关于我国富有人群与贫穷人群的差距,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04)》指出: “最高收入 10% 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45%, 而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 1.4%。”这就是说, 两者的比例约为 32: 1。新资产阶级兴起, 工人阶级不仅经济上贫困化, 而且政治社会地位大大降低。据上海市关于居民就业意愿的调查, 愿意做工人的只占 1%。近年来, 国家在二次分配 (财政分配) 上采取的对贫穷居民的各种补助措施, 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的作用, 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悬殊的状况, 何况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这说明, 我国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现在, 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 而是更远了。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上述变化, 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极少数人短期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工人、农民大部分相对贫困化 (绝对值有增长, 但幅度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 小部分人人绝对贫困化。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以 0 为绝对平均, 1 为绝对不平均, 一般以 0.4 为安全警戒线) 来看, 从 1985 年的 0.24, 上升为 1995 年的 0.434, 2004 年的 0.469, 已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 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 我国最高收入 10% 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45%, 而最低收入的 10% 的穷户的财产仅占 1.4%, 两者比例约为 32: 1。国家在二次分配 (财政分配) 上采取的对穷者的各种补助措施, 虽有一定缓解作用, 但不可能根本改变贫富悬殊的格局, 何况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扩大。

我国公私比重和分配格局的上述变化, 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形成的基础上于二十几年的短期内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与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官商勾

结、贪污渎职是密不可分的。有关方面总结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五个主要方面”和“职务犯罪十大特征”(见本文收入分配的部分),有助于了解我国新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腐朽现象。

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

改革以来,尤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人口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中国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没有发生革命、没有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面貌在不到 20 年时间发生如此巨大改变,的确不同寻常。很多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有关改革的正义性问题不时被提了出来。放眼世界,人们很容易发现,如果说中国贫富分化的速度异乎寻常,那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高度不平等状况则完全不是特例。无论经济水平如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都比市场经济国家更平等。当今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南非。发达国家中,既有贫富差距很大的例如美国,但也有更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例如北欧和欧洲实行福利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样说来,没有如此明显的收入差距,中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多大?不同来源提供的具体数字不太一样,但有几点不存在很大争议:第一,按照通用的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属于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第二,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惊人;第三,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世界组织以及各种研究都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有研究表明,自 1992 年以来,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一直等于或者大于 0.4,2004 年达到 0.4418。20 亚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位居亚洲第二,超过了除尼泊尔之外所有亚洲国家。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2006》显示,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 94 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 29 个,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尼系数比中国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0.2-0.3,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类似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那时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差别,根源主要是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改革后,无论城乡还是城乡内部的收入差

别都显著扩大，推动整个国家贫富化加剧。1978 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比例为 1 比 2.57，到 2004 年已经扩大到 1 比 3.21。在城镇人口中，1997 年最低与最高收入差距是 4.22 倍，到 2004 年，两者的差距拉大到 8.87 倍，7 年扩大了 1 倍多。²² 据称，鉴于富裕人口的收入中通常相当一部分属于黑色和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很可能比显示出来的更大，城镇人口高低收入估计可能高达 12 倍以上。在世界银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国家排位中，2005 年中国在 120 个国家中排第 85 位，在中国后面只有 35 个国家，其中 32 个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大于所有已经转上资本主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休克转型中以造就金融寡头著称的俄罗斯，也大于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依然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问题不是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发达国家，而是在贫富差距上赶上世界上两极分化最极端的国家。

收入不平等导致两极分化，中国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分化不亚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上不存在一个富豪阶层，从各级政府干部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从大小企业管理者到工程技术权威，从各类专家学者到著名文艺体育界人士，这些传统上被视为社会精英的阶层，当时却并不拥有传统上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财富，基本上是有名望而无财富。社会“精英”的这种状态堪称中国特色或社会主义特色，在任何“正常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后，一个新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重新崛起，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与世界上流社会的接轨。这个新富阶层在财富水平、消费模式、生活方式、趣味爱好以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世界各国的上层越来越接近，而与本国的工农劳动阶层越来越疏离，虽同为国人却实际上形同路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2007 年，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这个所谓“中国新社会阶层”大约有 5000 万人，在中国 13 亿人口中不足 0.4%。尽管如此，就绝对数量来说，中国的新富阶层人数已然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中等大国。这个比例极小而绝对数庞大的新富阶层拥有巨大消费能力，成为国际奢侈品销售商的新宠。改革近 30 年来，中国人均财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只不过是美国人均财富的 2%，但中国近年来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第二。

中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数字, 2006 年,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 11,759 元 (大约相当 1500 美元), 同期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更是只有 3,587 元 (不到 500 美元)。就在这样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 中国却造就了世界级的巨富。在《富布斯》2007 年身价十亿美元以上的全球 946 名富豪榜上, 中国大陆与巴西和西班牙一样, 各拥有 20 人, 超过法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另据统计, 2007 年中国已成为亿万富豪人数第二多的国家, 仅次于美国。美国《富布斯》杂志 2007 年 3 月 8 日发布, 上榜者分属于 55 个国家/地区, 其中美国人最多, 高达 415 人, 其次为德国 55 人, 以盛产暴富寡头著称的改制后的俄罗斯位列第三, 印度以 36 人上榜名列第四位, 第五位和以后依次为英国 29 人, 土耳其 25 人, 日本 24 人, 加拿大 23, 香港 21, 台湾 8 人。

全球最大富翁榜上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有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也有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下的人口大国例如印度和中国。在市场经济中,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实力根本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 但弱国穷国照样能够出产超级富豪, 少数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逊色,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无疑, 中国在这个领域中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迅速接轨。富人阶层的另一端是贫困阶层或所谓“弱势群体”。他们中除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边缘人群例如乞讨、流浪者之外, 主要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广大劳动者。也可以说, 除了比例极小 (尽管绝对数量可观) 的暴富阶层以及大约 15-20% 的所谓中产阶级之外, 其余人口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态虽然并不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弱势, 那就是, 相对于有产者特别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大资本家阶级, 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处于绝对劣势, 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缺乏在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等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富翁群体一样, 弱势群体也是改革后出现的“新兴”阶层, 是社会分化硬币的两个方面。这个“新兴”群体的出现在农村与解散集体经济、重返个体生产有关, 而在城镇, 则是企业改制或私有化的直接后果。企业改制导致国企纷纷败北, 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或者关闭或者转为私人所有, 导致职工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 大量劳动者失去工作, 流向了社会底层, 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下岗失业职工为主体的城市弱势群体。他们丧失了原有就业提供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 社会地位越来越向原来就缺乏这些保障的农村进城劳动力靠拢。这个群体距离赤贫往往只有一步之

遥。改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收入分配仍然比较平等，经济的快速增长显著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到 20 世纪末彻底消除贫困人口的政府目标宣告破产。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2006/07 年，中国贫困人口仍有 4800 万，其中农村 2600 万，城镇 2200 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3.7%。由于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很低，远远达不到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人均日生活费 1 美元的水平，中国的贫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种高度贫穷。如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约为 1.35 亿，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2006 年 12 月 1 日，世界银行专家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在 2001-2003 年期间，中国经济以接近 10% 的速度增长，但 13 亿人口中最贫穷的 10% 人群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 2.4%。还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再次表明，人口的收入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水涨船高。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据说全球还是第一次记录到。这也许算的上中国改革创造的另一个“奇迹”。经济增长与贫困共存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顽症。例如，在人均收入大大超过中国的拉美地区，早就存在这种所谓“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困现象恶化。看来，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是否增长，都必须接受社会两极分化这个后果。

由于财产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必然出现生活的两极化。一方面，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仅享受着住豪华宅、吃豪华宴、坐豪华车、穿名牌服等等超乎常人的生活，而且若干人豪赌、嫖娼、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挥金如土。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虽居世界第 4 位，但每人平均国民总收入尚居世界第 128 位的情况下，我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三大国，并正向第一大国迈进（奔驰车销量已占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众多的劳动人民处于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困境中。有些贫苦居民为生计所迫，卖血、卖淫（估计全国至少 500 万人）、卖器官、当包身工、自杀甚至铤而走险。全国每年“群体事件”数万起，刑事犯罪层出不穷。

各方媒体对上述情况有种种评说：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4 年 2 月 27 日报道：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研究人员说，在共产主义制度实行了 50 年之后，现在中国城市的富人与农村的穷人间

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一家主要研究机构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说，城镇居民的收入目前是农村居民的 3 倍。如果将非货币性因素——如只有城镇居民才能享受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好处——考虑进去，城乡收入的差距将达到 6 倍。令政府感到不安的是，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改革已经将很多人抛在后面。这些人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美国《纽约时报》2004 年 2 月 29 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 80 万美元，四周有围墙，还有 24 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危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以上两条均见 2004 年 3 月 3 日的《参考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2006 年 2 月 26 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2003 年 7 月 3 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今后将接纳私营企业主加入它的队伍。这一宣布是共产党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方面，它的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构成成分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过去 22 年中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在宣传的一个理论——被称为‘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已经认真地为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我国国内的媒体上，对于目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收入不均等是发展的动力。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

有人说：“现在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看上去好象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

有人说：目前存在部分居民收入悬殊问题，但不存在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应当由国家财政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拨款来解决，不应当涉及企业所有制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国家管公平，企业管效率。

有人说：每人平均 GDP1000 美元——3000 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必经的“事故多发期”。等到我国人均收入再提高，度过了这个时期，贫富悬殊情况就会自行改变。

有人说：根据“库兹涅茨定律”，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必然提高；再上升到高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又会降下来，全部过程是“倒 U 型曲线”。我国目前正处在“倒 U 型曲线”曲线的左侧（上升），等达到高峰后就会由右侧下降。

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改革的结果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私有制所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甚至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就造成了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或者由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变成私营企业的雇佣奴隶，大批农民失地，官商勾结，贪污腐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反思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

2010 年 06 月 13 日 07:49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陈筱红

在中国，追求新贵族的生活方式现在需要 1.1 亿元，比去年提高了 22%。昨天，胡润发布了其最新的“2010 胡润富豪消费价格指数”，其消费价格指数为 11.3%，去年同期则为 4.6%；这意味着，现在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进入中国的精英圈。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已拥有 87.5 万个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 6.1%，其中包括 5.5 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 7.8%。

2011 年 3 月 1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概况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修正主义，这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社会制度、政权性质、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主导权四大领域中坚持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四大领域的斗争都是全局性的、主导性的斗争，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只限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

回顾一九七六年以来的历程，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右派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了中央领导层中文革左派领导人。

一九七〇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右派领导人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文革的骨干力量，而且在领导层中清除了在文革中提升上来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公开审判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文革大革命，否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八十年代，社会上就有了所谓“解冻社”，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个“中国人权小组”，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上海有个“民主讨论会”，鼓吹“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90 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又以新的形式（除了从外部进攻以外主要从内部进攻）出现，而其深度又大大超过以前，斗争的后果更是令人震惊。睁开眼睛看看当前的实际情况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资本主义（中

国的和外国的)私有制所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资产阶级理论和修正主义所取代;新资产阶级已经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其力量日益膨胀。

近年来,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当中,出现了大同小异的两种观点:一种主张推行野蛮的资本主义,公开宣称贫富差距拉大是“前进的动力”,贪污腐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滑润剂”,等等。这种观点当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另一种观点是推行文明的资本主义,主张在收入的再分配(财政、税收、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资金等)中给人民群众、包括农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程序上加以规范,不要让个别资本家独占,要照顾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等等。

资产阶级提出新的政治要求

2006年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召开的、若干“主流派”学者参加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称为“新西山会议”)。与会人士声称:现在经济改革“大局已定”了(当然他们还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即私有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今后重点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人提出了下列的政治纲领(会上无人反对):

——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因而是非法的,要求“共产党分成两派”,最好是实行“多党制度”,效法“台湾模式”;

——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代会“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具有“反议会性质”,要求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度;

——取消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剥夺共产党的军权”;

——实行个人自由:要给他们以“真正的个人自由”、“言论自由”;但同时又主张“不要争论”,不准人民对他们提出不同意见。

这种新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向《宪法》、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挑战,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12月,又有些人采用一种比较隐蔽的手法,妄图在新的伪装下实现上述主张。有一篇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文中歪曲客观事实,说什么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胜利了”,欧盟的15个国家中已有包括英、德、法国在内的13个国家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甚至说美国只要民主党执政,也就“赤化”了。文中还用断章取义、肆意篡改的手法,

胡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已经否定了他们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主张。文中竟然把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的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硬说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诬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一是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反对共产主义作为科学思想体系和理想的社会制度。这就彻底暴露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思想不是要“救中国”，而是要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某些缓解社会矛盾的改良主义主张，也只是为了充当资本主义的“医生和护士”。最近已有许多人写文章批驳这种假社会主义。应当说，这种违背我国宪法、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荒谬言论，同样会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

二、国体的变化

（一）人大、政协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

1975 年四届人大，代表共 2885 人，工农兵代表占 67.95%；1978 年五届人大，代表共 3497 人，工农兵比例为 61.68%；1983 年六届人大，代表共 2978 人，工农兵比例 35.57%；1988 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 2970 人，工农兵比例 32%；1993 年八届人大，代表共 2978 人、工农兵比例 29.6%；1998 年九届人大代表共 2979 人，工农兵比例 27.8%；2003 年十届人大代表共 2985 人，工农兵比例 27.4%。现在的比例，只会比 2003 年更低。

据《中国统计》2007 年第一期有关文章指出：“统计数字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从 1980 年初到 1990 年代末，工人代表的比例从 27%降到了 11%，农民代表的比例从 21%降到了 8%，而干部的比例由 13.4%升到了 33.2%。这使得强势群体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优势，而弱势群体无法与之抗衡，制约能力由此被大大弱化了。”（见李鸥《和谐取决于结构》一文，载该刊第 45 页）

十一届全国人大安徽团 114 名代表构成比例：各级官员为 52 名；文教卫界别为 26 名；企业家界别为 35 名 农民界别为 1 名，工人界别为 0

何帮喜（安徽希玛欧美佳装饰材料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安徽企业商

会会长，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如何成为全国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2000 年，周光全带队到北京招商时与无为县在北京创业人员何帮喜相识。期间，何谈到准备回家乡投资，周表示欢迎。2001 年底的一天，何帮喜到周光全家以看望周母的名义送给周 5000 元人民币，并请周对其 2002 年回来投资，搞地办企业给予关照，周答应。2002 年上半年，何帮喜在无为县二坝经济开发区征地办企业，认为该县提出地价每亩 2 万元的价格太高，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无为县县长在地价上要给何以优惠。同年 7 月 12 日，二坝经济开发区以每亩 1.4 万元的价格与何帮喜签订了 87.63 亩土地转让合同。

2002 年 9 月 29 日，何帮喜在无为县注册成立了安徽希玛伟业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年 10 月，何帮喜以扩大企业知名度为由，请周帮忙将其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周答应。同年 12 月 2 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何帮喜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后经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何落选。但当选为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为对周光全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想继续得到周的关照，何帮喜于 2003 年 5 月份的一天，在北京送给周 4000 美元，周收下。2003 年 8 月，何帮喜在无为二坝经济开发区征用的土地上开始兴建装饰材料厂，何要求安装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而供电部门认为没有必要。何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巢湖供电公司总经理满足何的要求。2003 年 8 月 25 日，巢湖供电公司为其安装了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

2003 年 9 月份的一天，何请被告人周光全为其在北京的保龄球生产基地迁到巢湖，需要征地之事给予关照，周答应。同年 9 月，周光全与何帮喜以及时任巢湖开发区主任徐某等人出国考察，在上海浦东机场，何送给周 2000 美元，周收下。出国期间，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将何帮喜的保龄球生产基地争取到市开发区。关于地价问题，巢湖开发区主任提出每亩地的土地出让金 2 至 3 万元，何帮喜提出 180 亩地，土地出让金 200 万元；为此，双方僵持不下。后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为留住名牌企业，按何的条件办。2003 年 11 月 18 日，巢湖市开发区规划土地局与何帮喜签订了 180 亩土地(200 万元土地出让金)转让合同。何帮喜为表示感谢，在 2005 年、2007 年春节期间的，各送给周光全 3000 元人民币，计 6000 元人民币，周均收下。

何帮喜于 2003 年初在周光全的帮助下，“当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后，又

攀上了安徽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某主要领导，并很快取得了对方的认可。这位领导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将在北京的一些安徽籍的重要领导，向何邦喜一一引见。2006 年上半年北京安徽企业商会成立时，由于上述领导的极力推荐，何邦喜涉嫌被安徽省驻京办直接“内定”为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2008 年 1 月安徽省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此领导也为了给何帮喜增加选票调动了诸多人脉关系。

何帮喜终于在 2008 年 1 月“升格”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1 年 3 月 4 日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 38 名全国人大代表都是亿万富翁，要比美国国会最富有的议员还要富有。想问全国人大在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将采取怎样的措施？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对这个数据回应，“我也感到钦佩，你做了那么多调查研究，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说的 38 名亿万富翁代表的情况是否真是如此。”

不过他强调了宪法对人大代表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对于贫富差距问题，李肇星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全国人民逐步都过上小康生活。但现在确实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别、存在着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

他表示，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但是富人必须依法致富。“我已经发现有许多这样的好公民，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变富了，不仅严格遵守法律，而且还慷慨地做一些公共事业，比如扶贫、建立希望小学、救灾等等。”

（记者杨华云）

调查

胡润：代表委员中有 156 位亿万富豪

胡润富豪榜统计去年富豪参政情况，称所占比例下降

胡润富豪榜从 1999 年发布首届榜单开始，就一直统计拥有政治身份的富豪数量。昨日，胡润表示，去年 1300 多名富豪中有 156 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印象是，比较大的变化出现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之后，2003 年上榜富豪

100 人，其中政协委员有 23 人，人大代表是 11 人。”胡润表示，随着中国的亿万富豪群体急剧扩大，这些年来拥有政治身份的富豪绝对数量是增加的，但占据富豪榜的比例却是下降的。

胡润对于越来越多的富豪拥有政治身份表示：“这也反映了民营企业更多受到政府的认可。”在去年 10 月发布的 2010 年富豪榜中，1300 多名财富超过 10 亿人民币的富豪中，共有 167 位富豪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包括 80 位全国人大代表和 76 位全国政协委员。除此之外，部分富豪拥有多重政治身份，例如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工商联常务执委。其中，大连万达老总王健林拥有政治身份最多，他既是全国政协常委，又是党的十七大的代表，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2010 年胡润百富榜共有 1363 名富豪上榜。（记者张奕）

“当人大代表跟钱没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认为，之前专家也曾经讨论过“企业家当人大代表”的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里不存在企业家不能当人大代表的规定。

“对于代表的身份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只要符合法律程序就能当代表。”程湘清表示，人大代表无论挣多少钱，只要是靠劳动正当得来的，就会受到法律保护。“当人大代表跟钱完全没关系，关键是这个人是不是有责任心和民主法制意识。”程湘清认为，人民群众选举人大代表时肯定不会因为对方是富人就投选票，而是会考虑对方是否能替百姓说话，能帮百姓真正办事的人。（记者 杜丁）

“参政议政跟贫富没有关系”

这个新闻我也看过，对于富豪代表或委员参政议政，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上的群体都应该有代表在人大和政协里，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这跟是否贫富没有关系。作为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应该能使各方面的代表委员有正常表达自己真实诉求的机会。

人大代表是选出来的，政协委员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等推荐，然后进行协商才产生的。对于是否富豪并没有名额规定。当然，我们在选举代表、推荐委员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性，要注意他们之间合理的人员结构和合理的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张皎（记者 汤旻）

（二）基层政权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

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较多的财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2004年初，《重庆日报》记者写道：“‘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到来。”该记者报导了重庆市北渝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6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65%。（见《商界》2004年第1期）。又据中央电视台在一个以《村官的价格》为题的节目中报导，河津市下化乡老窖头村村民王玉峰为拉选票，发给选民共计223万元现金。后被人揭发，才被依法没收。还有一篇题为《600万元选出高价村官》的电视报导。村官本来是基层的小小“芝麻官”，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价贿选？主要是可以从征地和乱收费中捞取钱财（见《中国电视报》2002年2月2日）。

三、政体的变化

（一）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确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以共产党执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是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中国内部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要求实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似乎并不能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以政治体制的多样化特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大选的所谓民主制，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君主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大选民主等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所谓真正的民主国家大致只有它们自己，其他国家最多只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否则便是“混合体制”或甚至“集权国家”。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排名机构把中国归入非民主国家，顶多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他们的所谓民主制有所不同。8

其次，中国目前虽然维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不再主张“共产”即公有制，而是以发展经济为己任，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政府也不再直接组织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于市场，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调和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再次，在国际舞台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改变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打算和不愿意按照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行动，而是努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冲破这种国际秩序设置的障碍。改革后的中国政府则逐步接受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热衷于与世界“接轨”，遵循现有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最近一些年，中国开始提出愿意做“负责任的大国”，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负责任”，即不会做破坏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反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斗士，变成了它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认可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总之，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即使如此，国内外一些势力仍然对中国政治体制表示特别“关注”，念念不忘施压促变，要求中国转向所谓民主制。事实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共产党这个字眼过于敏感。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而不是一般的所谓一党专政。因此，尽管改革后的中国把西方大国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也早已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但由于中国名义上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这些势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彻底消除“共产党因素”而后快。

有人提出了一个富有洞见的新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打压和试图和平演变的目标，准确地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因素”。所谓共产党因素，就是试图在全人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它把跨国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人类实现大同作为自己的目标。拿民主说事，不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二）政府能力弱化

政府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膨胀。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大幅

度增加,以至官员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还多。同时,行政经费出现惊人增长,1978年到2003年,中国GDP增长了31倍,年均增长1.2倍,而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

1986年到2005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6倍的情况下,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23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变成了一个成本昂贵、资源耗费越来越多的政府。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改革后立法突飞猛进。法律虽然多了,法律法规得不到切实执行却越来越变成寻常之事。

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导致社会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镇的防盗门窗成为大众自我防护的无奈选择,也显示了公众对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从庄严承诺的大政方针到政府限期目标,政府越来越说得到却做不到。政府甚至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员。改革以来,官场和官员腐败不断升温,以致中国由一个清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国际透明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早在1995年已经成了极端腐败的国家之一

(三) 官员贪污腐化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于2008年初宣称:过去五年中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18万件(平均每日近100件——引者注)、20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35人,地厅级官员930人,县处级官员12964人。(新华社2008年5月18日电)又据媒体报道,经过对近年来3000多起典型贪污等职务犯罪案例的研究,发现具有十大特点:一是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二是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三是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四是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五是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六是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七是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八是金融腐败(团伙作案、携款潜逃、利用高科技手段);九是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帐);十是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检察日报》2007年3月27日)

当今中国腐败之烈,不仅为国内人民深恶痛绝,而且在国际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最近,“国际追踪”网站宣称:中国索贿案居世界第三位,85%的索贿案与政府工作人员有关,其中11%与司法人员有关(《参考消息》2008年7月18日)。

三、执政党的变化

到 2002 年的十六大，党的性质却被改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成为“全民党”（人民和民族中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并据此规定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份子”加入共产党。这就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建党以来一贯明确坚持的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这个大转向是如何造成的？应当如何对待？这里有必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当前却存在着马列主义伟大旗帜被淡化、架空、回避、篡改和否定的严重问题。例如，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删除了十五大党章中关于马列主义的下列重要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又如，有的领导人宣扬“共产主义渺茫论”，回避或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科学理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和行为，就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的共产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就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靠近一步。再如，有的领导人只提“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而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员“精英学者”肆意歪曲篡改马列原著，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并宣扬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对于这些反对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倾向，必须进行批判和纠正。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自从党的七大以来就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旗帜。但是，当前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存在着被淡化、架空、回避、篡改和否定的严重问题。有的领导人讲到党的指导思想时，既不提马列主义，也不提毛泽东思想。有的领导人有时也讲毛泽东思想，但不讲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架空和歪曲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指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9 页）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一理论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告诫全党继续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特别要警惕和坚决防止资产阶级分子篡夺党的领导权、进行“和平演变”，以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已经被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和解体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也被我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许多事实所证明。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空前大变化，不是证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尚未解决，“继续革命”不可避免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决不能丢掉它的核心和灵魂。否则，就是假高举，而不是真高举。对于邓小平理论应当如何看待？它能否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须要认真地加以分析。从实践的检验来看，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言论中，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两种观点纷列杂陈，往往自相矛盾，因而不能构成系统的理论。他本人也从未承认过有个“邓小平理论”。例如，邓小平一方面受中央的委托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另一方面又否认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宣传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如，他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失败了”、“走了邪路了”，另一方面，又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作为一个“大政策”，特别是允许一些干部及其子女（大部分是中共党员）下海经商，让共产党员去当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再如，他在 1992 年“南巡讲话”中一方面讲要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止二十年，另一方面又要求长期反“左”为主，并认为经济领域只能反“左”不能反右，为推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诸如此类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形成这种混乱状况，从思想方法上讲，就是他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以资产阶级“有用即真理

“的实用主义，混淆和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科学命题。总的看来，邓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错误的东西更多些，这些错误思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对邓的全部言行究竟如何评价，可以从长研究。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用含混词句包装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在前面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一节中已经说到，“三个代表”是为了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允许资本家、入党而提出来的。这种“重要思想”，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代表先进文化；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三个抛开”的理论基础是“三个否定”。一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位核心领导人一再强调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个“新社会阶层”，否认它是新资产阶级；二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公开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三是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他所主持的十六大，在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删除了原来《党章》中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条文。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基本上被打入禁区了。然而，为了蒙蔽群众，他还宣称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十分明显，他用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用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阶级，“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哪里是什么“发展”，分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头彻尾的背叛！

为了把“三个代表”跟“全民党”一起强加给十六大，这位核心领导人除了采取前面说过的践踏《党章》、压制反对意见的几种手段之外，又加上了两种手段。一是在 2002 年 7 月 23 日由主管机关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把“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为党政干部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如果你敢于无视或反对“三个代表”，不乖乖地遵照实践，就让你得不到或者丢掉“乌纱帽”和“饭碗”。二是由中央重要干部出面，在媒体上宣称：凡是不积极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员不能当选为十六大代表，从而为“三个代表”在十六大的通过提供了最牢靠的“组织保证”。应当指出，这一切都是在“三个代表”未经党代会批准、更未写入《党章》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又一次对《党章》的大践踏！正是在这样的非法手段

的操控下，“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十六大党章。 “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的结果如何呢？一是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先进生产力，推动了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先进文化，推动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的空前大泛滥；三是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推动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这三项结果的事实说明：“三个代表”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历史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

总之，从“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目的”、“三个抛开”、“三个否定”和“三项结果”来看，它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时期以来，一批“精英学者”主要宣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成为践行“三个代表”思想、推行私有化的有力助手。但随着私有化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凸现，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于是，他们改换了另一种形式，即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把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奉为圭臬。这种假社会主义一出台就遭到相当强烈的批判。他们见势不妙，正在转向第三种形式，即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护下，以反“左”、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或者宣扬“民主”“自由”具有“普适价值”，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一是必须坚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二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两条，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照妖镜。不论什么人，不论怎样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来伪装，只要用这两面照妖镜照一照，任何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谬论立即原形毕露，无处躲藏了。

（1）新资产阶级的兴起，要求进入执政的共产党。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从 1995 年到 2005 年这十年间，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的户数从 66 万户增至 430

万户，增长 5.5 倍；雇工从 822 万人增至 4715 万人，增长 4.7 倍，资本从 2262 亿元增至 61331 亿元，增长 26 倍。2005 年的新资产阶级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相比，户主数相当那时 16 万人的 26.8 倍，雇工数相当那时 250 万人的 18.8 倍；资本额相当那时 24 亿元的 639 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新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要求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实现这一要求，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钻进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来阻挠和改变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2）大批有权势的党员变成资本家而仍然保留其党籍，推翻了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的根本原则——对《党章》的第一次大践踏。在改革中，大批国企实行经营者购买（MBO），“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大批官员子女、亲属和其他干部下海去当资本家。这部分人是新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势的群体。按照我们党建立以来的一贯原则，这些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党员是应当“无条件开除其党籍”的。但是，这批党员却是按照党的指示进行改革、争当“先富”的积极分子，其中不少是中高级和最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和亲属，权势大，根子硬。于是，在 1989 年 8 月中央的有关文件中作了原则性的重大退让，规定这些人“在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平等对待工人、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发展生产或公益事业的条件下，仍可保留党籍。”十分明显，这只是一个守法资本家的条件，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而这个规定却默许了他们可以不放弃剥削，这就违反了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的规定，是对党章的公然践踏。这个错误的规定，铺平了“党员变老板”的道路，实际上也为“老板变党员”埋下了伏笔。

（3）不仅党员可以当资本家，而且资本家可以当党员——对《党章》的第二次大践踏。前面已经说到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从 1993 年的 13.1% 上升到 2001 年的 29.9%。据调查，在资本家党员中，党员变资本家的占 78.6%（其中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高管”收购公有企业的占 43.4%，官员子女和其他党员下海经商的占 35.2%）；资本家变党员占 21.4%（《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2002）》）。所有这些事，都是在党章规定不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条件下干出来的！

（4）为资本家入党抛出新的“立党之本”，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蛮横地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对《党章》的第三次大践踏。资本家在党内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但这与党章特别是党的总纲所阐述的理论相抵触，名不正，言不顺。于是，

一位核心领导人在 2001 年初抛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且自封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以个人的讲话取代原来的立党之本——党章。不久，这位核心领导人在 2001 年 7 月 1 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又提出两大论点：一是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不是新资产阶级，根本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二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剩余价值论）只能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解释当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来，中国私营企业主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摘掉了，“剥削者”的帽子也摘掉了，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作为“普通劳动者”入党了。这位核心领导人一方面组织一批“理论精英”大力宣扬，说“七一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突破”，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另一方面，动用行政手段从多方面压制反对意见。一是对上书反对的老干部、老战士施加政治压力，有的人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权；二是对不赞成资本家入党的某些省委领导人提出警告，如果不能与中央（实际是领导者个人）保持思想一致，就要“调整”工作岗位；三是不经正常程序，粗暴封闭敢于宣传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入党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以此惩一儆百，使全国所有主流媒体噤若寒蝉。这种做法不仅践踏了《党章》，而且践踏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从而充分暴露出他理屈心虚的精神状态。

（5）违背全党意志，半明半暗地把一些资本家抬进党的十六大庄严会堂——对党章的第四次大践踏。关于十六大让资本家作为代表参加大会的情况，官方主要媒体均默不作声，而由个别次要的官方媒体吹风。如《中国青年报》2002 年 10 月 28 日透露：“十六大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并列举了其中四位资本家的姓名及其企业名称；还说：“福布斯杂志刚刚公布了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名的 100 名富豪名单上，有 3 位名列十六大代表之中。”并赞扬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突破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及时团结、整合了各种新生社会力量。”这位核心领导人用这种非法手段抬高资本家的地位，就是为了进一步显示：资本家入党已经成为“铁定”的既成事实了！《党章》早已成为废纸、不值一顾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大通过了修改党章、改变党的性质、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决议！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党的性质的改变起源于经济的私有化。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总要变。新兴的资

产阶级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党外兴起的资本家；一部分是党内利用权势兴起的资本家，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改派”）。这两个部分密切结合，浑然一体，而后一部分起主导作用。他们在党内大权在握，目无党章党规，并利用我们党缺乏民主监督的缺点，一步一步地摧毁了建党的根本原则。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改变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然随之改变，不管用什么外衣加以包装，都改变不了问题的本质。

新资产阶级进入了执政的共产党内，使共产党发生了部分质变。

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1995 年为 17.1%，2000 年为 19.9%，2001 年为 29.9%，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尽管当时的党章是不准许资本家入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准许资本家入党后，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到 33.9%（2004 年），

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共产党是我国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资本家必然要求进入共产党内。根据全国性抽样调查，早在中共党章尚未规定允许资本家入党之前，1993-2001 年私营企业主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已悄悄地由 13% 上升到近 30%。

表 3 1993-2001 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

（以私营企业主为 100%）

年份	1993	1995	1999	2000
2001				
有效样本（个）				3060
3258				
党员人数				609
972				
党员%	13.1	17.1	18.1	19.9
29.9				

资料来源：①1993、1995、2000 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75 页。②1999 年数字见《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 年》第 107 页。③2001 年数字，见《2002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 年 2 月 26 日。④历年抽样调查的样本

是从全国各地区的私营企业中随机抽样而得的。

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 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 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 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 21.4%，大体是“倒二八”。

自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份子可以入党之后，“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私企大发展，老板变党员”的做法公开合法地推行。据全国工商联调查，2005 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达到 33.9%。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一下子涌现了无数的红顶商人、红色资本家。凭着他们的财富和实力很快地进入了要害，成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或核心人物。紧接着便是要求私营企业成立党组织，有政治眼光的私营业主马上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纷纷竖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成立了党支部或党委，自己或者自己的代理人自然就成了党委或支部的一把手。党组织进军私营企业，或者说私营企业成立党组织，本来是一件好事，党可以像以前那样，组织工人群众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同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作斗争，维持社会公正公平。然而，事情恰恰相反，私企的党组织往往成了资本家的保护伞，他们是在为资本家保驾护航，党组织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可以披着共产党合法的外衣，来对工人阶级实施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首先，私企的党组织事实上是资本家把持着的党组织，他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从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形，至少有以下这些方面能说明私企党组织已经被资本家所把持。

1，所有私营企业党组织均是在业主的主动要求和亲自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其主要负责人没有哪一家是普通工人党员或工人党员推选的代表在担任，都是企业老板或者是老板指定的代理人担任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这些人领导的党组织自然就不可能代表广大的工人群众。

2，再看党员的比例，私企中发展党员往往是看这个人是否对老板忠诚，是否肯为老板的事业做贡献。所以，私企发展的党员往往是管理层的较多，普通工人就要看出于某种需要，有时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或者是普通工人为老板，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既然结构决定了向心力，所以，这个组织便成了老板的帮手和

工具。党组织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3，组织活动和组织教育，每次的组织活动无非就是一次老板的工作会议，都是谈如何来加快企业的发展，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让职工为工厂多做贡献，如何来取得更大的利润等等。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早就扔到一边去了，因为这不符合老板的利益。所以，现在私企的党员，有几个是真正地接受过党的正规教育？有多少年没有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有哪家私企的老板（党组织的负责人）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4，私企党组织已经为资本家独家操持，为资本家独家服务。不信，你可以在资本家的工厂内让一名普通的工人党员组织申请另外成立党组织，独立开展活动，你看有谁敢答应你，不给你扣个分裂党组织的罪名，就算是幸运的了。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有很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可以被资本家用来更好地统治和奴役工人阶级，为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

1，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长期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铁的组织纪律，就被资本家所利用了，他们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工人劳动，为他们卖命，谁要是反抗，就说你违反纪律，自由散漫。工人阶级只能忍气吞声地为他们卖命。

2，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资本家利用这条组织原则用于压制不同声音，谁要是想替工人讲话，他就会用党的组织原则来排斥你、压制你。到时候你必须服从，因为你是少数、是下级、是个人。所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不到保障。至于他本人有没有服从哪一级，只有他自己知道。

3，中国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一点，资本家也利用的特别好。一方面，他们自己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另一方面，他们让工人阶级过猪狗不如的生活，谁要是敢有怨言，他们就会扣上丢掉党的优良传统的帽子。工人阶级只能安分守己的过这种生活。

4，中国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资本家可以永远的批评你，永远地教训你，让你永远做自我批评，永远站在被告席上，让你永远有一种负罪感，以至于将自己的贫穷也认为是自己的罪恶，而他们，则不管何时何地，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工人阶级生来就是贫穷、天生就有罪。

这就是资本家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利用工人阶级对党的感情和信赖，来迷惑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上当受骗，沦为他们统治和奴役的驯服工具。

更令人发指的是，资本家一方面在利用共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又在拼命地毁坏党的信誉，动摇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最后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罪恶目的。他们除了使用上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奴役工人阶级以外，还利用党组织直接和工人阶级制造矛盾、制造对抗，这样的事例很多。一般，工人阶级在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压榨进行抗争时，他们会用党的一些理论和上级党组织的一些说法来对付你，让你觉得似是而非，无法和其做进一步的争论而就此罢休。当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或者发生了工伤死亡等事件，甚至出现反抗引发的群体事件、暴力事件等等，资本家会利用企业的党组织、工会、妇联等组织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甚至充当打手，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工人群众由于在事件中直接面对的是政府或者是企业的党组织，他们就会把愤怒和仇恨直接对准党组织和政府，引起人民群众的党和政府的不满，加上国家和政府有时候处理不当，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会进一步的激化和加深。而资本家则躲在后面偷乐，因为不但伤不了他们，反而挑起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矛盾，这是他们做梦也在想要得到的结果。

善良的人们，不要以为资本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真正的爱党、爱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也绝对不会，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死对头，他们和共产党有食肉寝皮之恨，他们就怕中国的劳苦大众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带领下，推翻他们的统治和奴役。所以，他们是另有目的的，他们入党，就是要为了混入党内，控制和改造共产党，将共产党改变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党，为他们服务。现在，他们利用共产党、披着党的外衣来剥削和奴役工人阶级和中国的劳苦大众，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党群矛盾，制造对立对抗，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最终推翻共产党，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但推翻共产党他们自己不敢而且也做不到，只有毁坏了共产党的形象，让工农群众自己来放弃他、背离他，最后推到他，这就是苏联共产党灭亡的前车之鉴。这就是资本家入党，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险恶用心。

2011 年 3 月 2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社会保障体制从有到无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就业方面，国家保证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工作/劳动岗位，从根本上保障了全社会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种不允许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后来被不无贬义地叫做“铁饭碗”、“大锅饭”的制度，是当年中国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改革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这就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人口“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根据 1951 年初政府公布实施的《劳动保险条例》（1953 年修订）建立的城镇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中国还在全国实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在经济水平依然低下的条件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全国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决被认为低收入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曾经被有的国际组织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是，促进中国人文社会超前发展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效仿的。这一点，也为中国转上市场经济之后自身的实践所证明。

中国在转上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劳动者重新变成了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虽然政府设立了一定的救济、补助机制，但劳动者从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结果，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工作的劳动力随时面临失业从而面临丧失生活

来源的威胁，而失业的劳动力则已经丧失了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

在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瓦解，新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城镇，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原来由这些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随之消失，只有政府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还能继续享有原来的基本社会保障。纷纷建立的各类私营企业在政府不加强制的条件下通常不遵守《劳动保险条例》，导致作为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社会保障基础的条例实质性死亡。在农村，集体体制转变为个体农户经济。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原先依附于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以及五保户制度也同样瓦解了，农村人口仅有的集体福利荡然无存。比较改革前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全国人口；标准明确，全国大致统一；单位主管，贯彻有效；在城镇，完全不需个人付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需要极少量个人付费。不足的地方是，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程度和保障项目上远远不及城镇人口，尚未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城镇不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此外，与劳动单位挂钩的体制导致社会化程度较低。改革后，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从有到无，支离破碎，人口覆盖范围急剧缩小，大多数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结果，保障程度和项目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显著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

总之，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

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到 2006 年，全国还只有 25% 的劳动力享有养老保险。广大农村劳动力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养老保险。1 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更低。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导、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业/私人保险，而它们的对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数人。当个人财力不再能解决生老病死、上学升学等问题的时候，人们只好求助于所谓“好心人”，寄希望于他人怜悯出手相助，这就产生了重建所谓慈善事业的需求。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后，经常性的社会募捐不但用来应对突发灾难，而且成为解决常规发展问题筹集资金的手段，例如用

来资助教育的“希望工程”。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并成为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后的“新生事物”，在“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尚且能够提供社会保障，而在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今天反而丧失了这种能力。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而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在改革前后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但由于前一个时期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前的中国却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原有的制度特色逐渐丧失，在经济、政治、社会保障体制上与其他低收入市场经济国家日益趋同，越来越难以发现与它们之间的差别。

二、人文社会发展滞后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巨大进步，得到了世界公认和赞扬。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中国几乎所有社会人文指标的进步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包括人均寿命、普及教育、减少文盲、婴幼儿死亡率等等。到改革前夕，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十分接近中等收入国家。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 22 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 51 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1960-1980 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 GNP 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 49 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

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改革 30 年, 中国的 GDP 高速增长, 2004 年人均 GDP 相当于 1978 年的 10 倍多。中国无疑比过去更富有了, 总体生活水平更高了, 按常理推测, 中国的人文社会发展将在原有基础上出现更大跨越。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 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超前性越来越小, 即越来越接近其经济水平, 另一方面, 在某些人文发展指标上, 例如在人均寿命增长方面, 中国近年来的进步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领先者落到了后进行列。从人文社会发展的总体进步来说, 中国的表现不但与 GDP 快速增长不相称, 未能体现“增长促进”的效果, 而且,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崩溃, 连原有的“支持导向”优势也丧失了。1949 年到 1978 年的 29 年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68 岁, 增加了 33 岁, 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达到了当时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后, 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大为放慢。1982-2002 年的 20 年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 2.9 岁, 不但低于亚太地区的 4.0 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5.4 岁、南亚的 8.9 岁、中东和北非的 9.1 岁, 而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 3.9 岁。比中国表现更糟的只有两个地区, 即欧洲和中亚(增长 0.3 岁), 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减少 2.5 岁)。这两个地区不但没有能与中国一比高下的 GDP 增长, 相反, 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处于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欧洲中亚地区由于俄罗斯转型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导致人均寿命大幅度下降。

婴儿死亡率是人文社会发展另一个重要指标。1990-2003 年期间, 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在高收入国家平均为千分之 3 (从 8 下降到 5, 为 2002 年数字), 中等收入国家为千分之 12 (从 42 下降到 30), 低收入国家为千分之 15 (从 95 下降到 80), 而中国仅为千分之 9 (从 39 下降到 30)。从这些数字表明,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 1990 年好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到 2003 年则与之拉平, 进步速度明显放缓, 进步速度更是远远落在低收入国家后面。中国的表现似乎只好于高收入国家, 但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已经非常低, 继续下降的空间非常有限, 并不具有可比性。同一个来源数据还表明, 在这一期间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 中国的进步落后于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 包括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以及南亚, 与中国相当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其他健康的指标上存在类似趋势, 例如疾病和传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发病率、

高自杀率等等。1975 年, 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 1% 的卫生资源, 解决了世界人口 22% 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 21 位。20 多年过去了, 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 191 个国家中的 144 位, 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 188 位, 全球倒数第四。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疗领域改革的市场化导向, 政府大规模削减医疗投入。有医疗权威人士指出, 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 GDP 的 10% 以上, 就连在发展中国家, 巴西为 7.9%, 印度为 6.1%, 赞比亚为 5.8%, 而中国只为 2.7%, 而且, 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逐年减少。1985 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 38.58%, 1995 年为 17.97%, 2000 年以后只剩下 15%。相反, 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 1985 年为 28.46%, 1995 年为 46.40%, 2000 年以后一直接近 60%。

改革期间中国的教育进步同样不符合预期。新中国建立时,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国家, 人口文盲率超过 80%。经过不到 30 年时间, 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努力普及教育, 到 70 年代末, 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 16.4%, 在农村下降到 34.7%。这是一个骄人的进步, 因为在同期, 印度的城市和农村文盲率分别高达 34.9% 和 67.3%, 埃及分别为 39.7% 和 70.6%, 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的巴西分别为 16.8% 和 46.3%。中国普及教育的成就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 走在了它们的前面。基于建国后扫除文盲的速度, 人们本来期待,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 国家拥有更多财富, 彻底扫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 30 年来, 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标屡屡以失败告终, 大学生比例提高, 但普及教育的脚步显著放慢了。2005 年, 根据当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中国 6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达 10%。这个数据印证了另一个来源提供的信息: 据中国教育部高官透露, 截至 2005 年底, 文盲总人数达到 1.16 亿人, 占世界文盲总数的 11.3%, 仅次于占世界文盲总数 15.0% 的印度。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教育原来取得的优势正在大大缩小, 尤其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间, 一方面是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了, 另一方面却有 1 亿多人仍处于文盲状态, 得不到基本教育, 表明中国越来越回归一般发展中国家教育不平衡的状况。也正

如在其他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样习惯性地被归结为经费不足。但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政府却能够组织数次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使文盲率显著降低。有人警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无法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 2015 年实现一半文盲脱盲的目标。国家的发达程度最终反映在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上。改革后，中国的变化轨迹表现为优势逐步丧失。诚然，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总体水平尚不处于明显劣势，但与 GDP 高速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相比明显滞后。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不但难以建立“支持导向”的人文社会发展模式，而且，由于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从而必然严重阻碍人文社会的相应进步。

三、大学美丑分界线

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运动、五大歪风。

所谓三大运动：一是从 1993 年开始的合并运动，第一所合并的大学是南昌大学，先后由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南昌大学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 年错误的把南昌大学取消了，江西为了建设自己的名校，合并后顺利的进了“211”工程，从而掀起持续至今的合并运动。

二是“建一流大学”运动。1998 年 5 月 4 日，时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家领导人号召要建设中国若干所一流大学，从此开始了千军万马争一流运动。什么世界一流、中国一流、中西部一流、东部一流……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三是 1999 年开始的扩招运动。1999 年扩招了 52 万人，相当于增加了 52 所万人大学啊，不得了。当年的扩招率好像是 49%，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纪录，重复了 1958 年“大跃进”的错误。

五大歪风是什么呢？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三是浮夸，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风是不见其形只见其影的东西，它们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每当我看到这些情况，就痛心疾首，没有办法啊！尽管他们没有说是运动，但按照运动特征看他们地地道道是在搞运动，是以运动的方式指导高等教育。从 1993 年到 2003

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学最烂的时候，合校、建一流、大学扩招、大专升本科、乱改名、大建楼堂馆所等，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大学之丑归纳起来就三个字——乱、脏、臭。

乱——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现在大专、专科院校也都成为大学了，它们都只是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没有资格成为大学，从本质上亵渎了大学的真谛。大学之乱，怎么个乱法？请看：独立学院不独立（他是二级学院，但又不隶属某大学，说它独立吧，又要接受母体大学的限制。）、成人教育没有成人（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变相搞文凭教育赚钱。）、函授学院要面授、自学考试要上课（集中阶段上课，考前搞串讲，实际上是变相漏题。）、普通大学乱篡位（很多地方大学也要搞一流大学，也要建研究型大学，大量培养研究生。）、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搞应用型研究，办培训班、办分校、搞开发区等。）。

脏——肮脏，个别导师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潜规则，院长上妓院，大学教授组织换妻俱乐部，这不肮脏？博士生导师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潜规则：学生只能输不能赢，简直是斯文扫地！

臭——经济腐败、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还不臭吗？而且现在经济腐败、学术腐败暴露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都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有保护伞。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同是做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应用研究院，基本上没有在报纸上被披露学术剽窃的。很显然，学术剽窃具有高等学校的特征性，这就与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教育部对学术腐败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我所谓的臭是什么呢？铜臭，衙门臭。用这两个臭来概括现在的大学很形象，铜臭不用说了，一个知名作家在某重点大学兼职3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说这个大学就是一间大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在赚钱，作家的眼光是敏锐的，洞察入微啊。后来，他又自费到俄罗斯考察月余，俄国人告诉他，现在的俄罗斯只有莫斯科大学和圣女公墓是干净的，而我国像莫斯科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没有了。

有人形容，中国面临教育灾难。是不是灾难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内的人往

往由于本位主义或是利益所限，当然他们不可能看到问题之所在。但是，危机是客观的，真正热爱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实事求是的做出评价。教育灾难是个笼统的概念，承认危机也不甚什么可怕的事。灾难也就是危机，包括哪些方面呢，人们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现在有句话，挨骂的最多的是大学，其次是中学，小学骂的人少。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现在的素质教育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自我安慰，宣传秀，实际上还是应试。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说，光骂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人们并不是光骂，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可是你们充耳不闻嘛！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所以我说现在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教育部到民众都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现在的大学教授们、院长们也还是考虑择校啊，据说某大学四个教授常年雇一个小轿车，把孩子送到市内上重点，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为什么现在公务员热，70%的博士都在官场，是学而优则仕的反映。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学习目的极度的功利化，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等，广义上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欧美国家的教育，教学生会提出问题，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学会质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要求学生考高分，注重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的，我们应当深刻的反思，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大学合并运动就是逼良为娼，我的观点是：强强合并是不可取，强弱合并似可虑，弱弱合并有其需。当初，合并运动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造学科齐全的航空母舰。但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就没有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所以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搞强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大学太多了不好管，合并了以后好管，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合并前中国 890 多所大学，不是太多，美国有 4000 多所大学。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大了好管还是小了好管呢？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明明是强词夺理嘛。功利主义的思想诱导人们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合并以后就进“211”工程，不合并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比如说在贵州，新贵州大学是 7 所大专学校合并起来，合并之前进不了“211”，合并之后就顺利进了，而且 7

所当中合并了 4 所专科学校，这就戳穿了“强强联合”的谎言。

在汉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 30 年。许多人尚没有意思到，中国大学的危机，二三十年后将更为严重，因为 3 个因素的影响将是持久的。一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好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到几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质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至少是 50 年，1951 年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至今尚没有完全消除就是证明。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 2500 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 年，中国 957 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 657 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我们的大学更像一间公司，无论好坏。这间公司是怎么做市场的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有幸连续看过这十多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定会晕掉。十多年来风水轮流转，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如果大学是公司，那它们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iPhone 流行时就做 HiPhone，什么流行就一窝蜂仿它、山寨它、做滥它。早些年流行经济类专业，各个大学学院纷纷开设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后来又流行法学，人人都想着进公检法，过“律考”；接下来是工商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等市场管理专业；没几年风头又转到了 IT 行

业，于是计算机类学科汗牛充栋；然后是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挤破了头，连工科院校都敢设影视学院；最后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艺术品投资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等面向新时代的专业热得烫手。看看十多年来的大学热门专业，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走向。经济数字虽然高亢，可经济学的学生大多不过在当会计和营业员。“律考”通过率低得可以媲美公务员考试，而公检法早就人满为患，没有后台你想都别想。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搞传销，学计算机的在网吧里当管理员。学表演的如今连潜规则都不一定捞得上了，转年又有一茬水灵的新人。播音主持、影视编导想去电视台？你等着去当栏目聘的编外民工吧。物流管理去快递公司，电子商务在淘宝卖外贸货，动漫设计的要么在熬命，要么在画山寨动画。唯有房地产红旗不倒，如果你运气好早点去卖楼，你就算赢了。

十多年的大学专业热潮，每一次大学里的专业热潮之后都预示社会上这个行业的烂掉。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当下最热的专业，等你毕业的时候一定会烂掉，中国的大学有这个能力。因为它们是山寨公司，它们看重的是“快速反应能力”，谁能短平快地抓住热点，大量吃进原料囤积，迅速做出仿版，就算战略上的成

功。这间公司是怎么做运营的

你总算入学了，来到学校之后你才发现，你所在的校区居然离照片上那个著名的学校大门有几十公里远。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在挂着一个城市名前缀的校区里，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和本校相距上千公里，要用谷歌地图才能览其全貌。

现在的大学流行开分公司，所有大学都到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于是称作大学城。整合资源、辐射效应、集约模式、融资管理、引领发展、促进转型，这些在大学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就如同商业教科书。大学既然是一间公司，大学城自然应该是一盘生意，这盘生意的体量大得惊人，占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建筑面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平方米，投资金额是天量，流水账目自然也是天量。

有知名大学的生意好做，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有新招，便由政府出面撮合当地二三流学校与外地知名大学联办分校。对于当地来说，可算得上是招商引资，对于外地大学则算是拓展业务。负责一点的，隔三差五有本校教师飞行执教，算是连锁经营；不好的则是自生自灭，留个招牌而已，只能算是授权加盟。

有分自然有合。大学公司的生意还有一种是兼并。院校合并算是我国教育界的一项

盛事，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理工大学有人文学院，科技大学有影视学院，更不用说如今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合并风潮据说目的是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加强学科水平，为合出几所世界级大学而努力。最高目标自然是全国合为一所大学，如此一来，世界大学排名榜必然会有一所仰之弥高的中国大学，再不济，学生人数也是世界前列。兼并重组到最后，难道就是公司运营手法的尽头了？不，大学们不久后一定会发现资产剥离、拆分上市其实是资本运营的更好办法，这样合并的大学又可以拆开来各自挂牌，再来一次资产评估、征地搬迁、结构调整、资源重组、院系学科调整。这间公司的收入与支出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大学这间公司运用了如此多的手法，最后它的资产负债表却如此不堪入目。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 4000 亿到 5000 亿元之间。这真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噩梦。但好在大学这间公司，有着不同凡响的翻身策略：“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以平价征得的教育用地，再以数十倍的价格拍卖出去，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别家公司负债搞到破产，大学这间公司负债还会微赚。也有大学校长提出，因为“大学不印钞票，也不卖产品，大学的主要产品是人才，但是大学人才送出去是不收费的……培养的人才是无偿供应给社会的”，所以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有总经理如此，董事局主席当笑而不语。大学固然不印钞票，可学生们的钞票却是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大学这间公司的生产方式本来就特殊，先收钱，后办事，赢得口碑继而趋之若鹜。如果，学生进大学要交学费，毕业后有公司买走还要花钱，如同机场高速公路一样，进出都收费，那真算是一大经营创新，世界企业史的一朵奇葩了。大学这间公司美妙的地方是，它的收入既来自政府拨款，又来自学费等自创营收，它的产出既算是公共服务，又算是商品。这样哭穷、赖债时两头都有道理，排列组合一下有不少选择可用。所以我们看到，既有校长呼吁增加拨款，又有校长抱怨学费太低，硬件不够时怨钱少，就业率低时怪社会，负债时它说自己公共服务，收钱时它又成了产业经营。当然，最美妙的还在于，它永远不用对资产负债表负责，永远不用对股东负责，

永远不用对产品质量负责，永远不用对客户负责。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已经为这间公共服务公司缴过税，再为子女入学向这间经营性公司交一次费，然后毕业就业再由自己解决，最后它负债还要所有人一起承担。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它的账单。大学的企业文化没有哪间公司的新闻比大学这间公司更像娱乐新闻了。这里有学术抄袭，从博导到校长，学术抄袭新闻的频发程度比起音乐圈歌曲抄袭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男女关系的潜规则，从艺术院校到外语院校，年龄跨度、爆料程度比起影视圈来也不遑多让。这里有骂战，有炒作，有勒索，有杀人，有指桑骂槐，有暗箱操作，这里不仅有情色故事，居然还有推理小说。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新闻总是能上网站新闻头条——猛料迭出，随便拎个元素出来就是上好的标题。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一间公司做到整条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都有新闻亮点，不能不说是企业文化培育的经典案例。一名学生，自入学到毕业，从原材料到成品，从产品继而变为员工，经历过这间公司完整的生产线。你以学费为投资，试图换取一个未来，终于——恭喜你，你毕业了。

四、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泛滥成灾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变本加厉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全盘西化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他们大搞挂羊头、卖狗肉，偷梁换柱、红皮白心的鬼把戏。一是歪曲党的经济学教学方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长期以来坚持搞中西并重的“双轨制”。近来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将“双轨制”改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迫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边缘化。二是教学内容西化。胆敢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偷换成西方经济学，不开《资本论》课，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大肆吹捧反马克思主义的“诺奖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责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

材，并作为考试依据。四是教师队伍西化。大批引进经济学“海归派”，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教士”，占领大学讲台和经济研究机构。五是研究生考试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生考试中，所出试题在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招魂，用西方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西方计量经济学取代马克思《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类学科考试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西化倾向愈来愈严重，西化愈来愈彻底。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跟着美国走”，贩卖美国货，照搬美国主流经济学模式，推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经济学精英们，不仅充当“美国鸚鵡”学舌，而且充当旨在使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科斯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掮客，大肆贩卖、强行推销。他们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买办，正在步步紧迫地加速推进打着所谓“经济学现代化”招牌的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领域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公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高呼：“我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资本主义好！”他们在公众场合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仇恨情绪，气焰十分嚣张，为资本主义、为行将毁灭的新自由主义招魂。

五、中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仰危机

多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仰危机，许多官员经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过不了金钱、美色、权力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一大批掌权者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腐化堕落，甚至泯灭人性。放眼今日之中国，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军队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体育腐败……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之前。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8 年报告，过去五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受贿 10 万元以上、挪用公款 100 万元以上案件 35255 件。涉嫌犯罪的县处以上国

家工作人员 13929 人，其中厅局级 930 人、省部级以上 35 人。五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犯罪案件 12 万件，同比上升 12.15%。据媒体最新披露，山西某县一个小贪官，在几年时间内，凭借职权，非法敛财 3 亿多元，在北京购买豪宅 30 多处。类似这样的贪官污吏，在全国各地可谓比比皆是。老百姓说，真正被抓住的贪官比汽车撞死人的机率还要小！

2011 年 3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九七六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产业化，社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兴起来，工农大众弱势化。

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一阶级，从 1995 年到 2005 年这十年间，户数从 66 万户增至 430 万户，增长 5.5 倍；雇工从 822 万人增至 4715 万人，增长 4.7 倍，资本从 2262 亿元增至 61331 亿元，增长 26 倍。

2005 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 16 万人的 26.8 倍，雇工数相当那时 250 万人的 18.8 倍；资本额相当那时 24 亿元的 639 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如果说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承认现在存在一个新资产阶级呢？

工人阶级（包括劳动知识份子）和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了“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分散化”的现象。广大农民除了极少数村庄（如南街村、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外，绝大多数农户分散经营小块土地，处于无法规模化经营和采用先进技术的困境。进城务工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相当恶劣。过去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就业制度瓦解之后，住房难、上学难、医疗难、就业难成为困扰许多居民的突出难题。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工人、农民包括失业工人和下岗失地农民，处于最底层。据上海对 4000 户就业意愿的入户调查，只有 1% 的人愿意做工人。这一数据结合有关大量资料，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由国家的领导阶级、主人翁地位跌落到社会结构“金字塔”最底层的惊人落差。

一、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及基变化

(一) 民间资产阶级 (或视为私营企业主新阶层) 的再生

1990 年——2005 年私营企业主及其投资、雇工情况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户数 (万户)	9.8	65.5	176.2	202.85	243.5	300.6	365.1	430.1
投资者 (万人)	22.4	134.0	395.4	460.83	622.8	772.8	948.6	1109.3
雇工 (万人)	147.8	822.0	2011.2	2253.03	2786.4	3526.3	4068.7	4714.7
注册资本 (亿元)	95.0	2262.0	13306.9	18212.24	24756.2	35304.8	47936.0	61331.1
增长速度 (%)								
户数	—	568.3	169.0	15.14	20.0	28.2	21.5	17.8
投资者	——	498.2	195.1	15.56	35.1	24.1	22.7	16.9
雇工	——	456.1	144.7	12.03	23.7	26.5	15.4	13.4
资本	—	2281.1	488.3	36.86	35.9	42.6	35.7	27.9

注：①增长速度：1995 年 2000 年栏内是 5 年的增长幅度，其余各栏是年度的增长速度。②资料来源：1990-2003 年数字，摘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编《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3）》第 89 页；2004 年和 2005 年数字摘自全国工商联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第 15 页、第 85 页。

从表 2 可以看出：从 1990 年到 2005 年这 15 年中，私营企业从不足 10 万户增加到 430 万户；雇工人数从不足 150 万人增加到 4700 多万人；注册资本从不足 100 亿元增加到 6.1 万多亿元。其增长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见的。

拿 2005 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 1956 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的 16 万人的 26.8 倍；现在的雇工人数为当时的 250 万的 18.8 倍；现在的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的 24 亿元的 639 倍（紧缩指数：2005 年的 4 元等于 1956 年的 1 元）。私营企业主就是资本家，私营企业主群体（或集团）就是资产阶级。大家都承认 1956 年在改造之前存在过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这个比 1956 年私营工商业者

在户数、雇工数和资本额方面都大过许多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为什么不能说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呢？

（二）国企资产阶级（国有、国有控股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三）买办资产阶级（外资企业中方高层管理人员）

（四）外方资产阶级（外资企业所有者）

（五）官僚资产阶级（党群、行政、军事、司法、文化、教育、卫生、新闻等等县团级以上官员）

（六）黑恶资产阶级（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从事非法活动的企业、团体的高层管理人员）

二、工人阶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据统计，我国 2005 年职工 10850 万人，其中企业事业单位 9777 万人，机关 1073 万人（《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第 134 页）。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雇佣化

——目前约有一亿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党的十三大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中劳动是雇佣性质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了“小卖大股”。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卖给私营企业主，变为私有企业；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经营者持大股，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一夜暴富”，成为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社会群体，职工也成为雇佣劳动者或者实质上具有雇佣性质。许多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营企业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十几倍、几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工人的劳动也带有雇佣性质。

（二）贫困化

——比之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份子上层，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2001 年私营企业主注册资本 1.8 万亿元，其来源正是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外国资本家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取大量超额利润。据《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供的材

料，1995—1999 年的制造业，在中国对每个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做出推算。全国享受低保的有 2053 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和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了卖血、自杀等事件。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条件为特征的。有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有企业下岗的 2700 万人。

（三）弱势化

——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经济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弱势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社会政治活动状况而言。职工群众每日每时能感受到的权力就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但总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有的是严重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开了。特别是企业如何改制、企业要职工买断工龄这样影响到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很少让职工讨论。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中，工人、农民代表是 511 名，仅占代表总数 2984 人的 18.46%。现在有一种说法：工人、农民没有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代表。现在党和政府召开各种征求意见会、座谈会、茶话会，参加的各界人士都有，唯独不见职工界。在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的同时，职工群众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在下降，这是职工政治地位降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分散化

——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厂为家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现在，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纸合同。职工对于用工者来说，总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就是“白领”职工也不例外。老板欠发工资，多数白领职工不敢讨要。只有在离职后才敢讨要。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有个体化的现象。在全国职工中，工会会员只占 37%。许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工会组织。现有的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往往软弱无力，患了软骨病。职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

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今天的职工对于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有反感。许多下岗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关系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也买断了。”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工人阶级。针对这些问题，刘文建议：重申并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制定并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措施；治愈中国工会当前存在的软骨病；等等。

与上述工人阶级的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相联系，当前我国众多的工人受到异常残酷的剥削。我国近年来迅速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有的野蛮性质和残酷性。许多私营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许多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被称之为“带血的煤炭”。2007年5-6月间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经过暗访，揭发了山西洪洞等地黑砖窑的内幕。社会上一些黑中介，在各地拐骗或绑架少年、老人和智障者，贩卖到多处黑砖窑作苦力。其中年龄最小者仅八岁。黑窑主雇用打手用棍棒监管，工人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稍有怠慢，即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打致残、致死。新砖窑出窑，往往尚未冷却就强令工人背出，烫得红肿溃烂。饭食只有馒头、凉水，还限15分钟吃完。晚上挤在黑屋里，睡地铺，冬天不生火，终年不刷牙、不洗澡，完全像牲口一样。数年来，当地党、政、公安机关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其中有些黑窑就是地方党政干部的儿子或亲友开的。这些事件被媒体揭发后，中央、国务院指令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认真清查、解救工人，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严惩。现已在山西运城、晋城、临汾解救出374人（其中有少数童工）。但河南400位失去孩子的父亲仍联名发出“泣血呼救书”，声称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尚未找到，可能已被黑窑主转移；而已被解救出来的工奴，今后如何求得生计，尚无着落。

类似上述黑窑工的事件，近年来早有多次报导。例如：

——2004年8月1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题为“4名矿工被骗身陷魔窟惨遭剝指烙脸非人虐待”的文章，河南荥阳市崔庙镇曹坡村惊现奴隶煤矿。

——2005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题为“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的报道，30多位离家打工的农民成为芦苇场的奴隶。

——2004年4月19日的《四川日报》发表题为“民工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的报道，揭露了奴隶砖厂的真相。

——云南《生活新报》发表过题为“揭昆明黑心砖厂：老板暴力奴役，工人像畜牲”的报道。

2007 年的 1 月 9 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关于出租汽车司机现实生存状况的报道。标题为：《北京十万的哥为份儿钱奔命，自称是公司赚钱机器》。报道说：“每天的清晨、正午、夜晚，行驶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近十万‘的哥’们，大多被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掌控，无法挣脱。8 小时、12 小时，甚至 16 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多数‘的哥’换来的却是远低于应当所得的收入，大部分的血汗钱，也就是行业内所谓的‘份儿钱’，都上交给了出租车公司。”“滴着血汗的‘份儿钱’！”“本市一家体检机构曾对北京 1 万名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堪忧：半数以上的哥患有职业病。”“每天十几个小时蜷缩在狭小的空间内，患上了胃病、腰椎病、前列腺炎、痔疮等多种疾病。生病一般扛一扛，吃点药，自己去医院检查还要排长队，嫌麻烦。一年到头，每天就像绷紧的发条，根本想不起来对身体做系统检查。”的哥刘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在记者采访的十几位出租车司机中，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上了不同症状、不同程度的职业病。有的因不能定时用餐，患上了消化道疾病；有的长期保持开车坐姿，造成颈椎患病、腰肌劳损；有的因长期入厕不及时出现肾病；还有的因工作压力大，出现心理疾病，经常莫名地烦躁、失眠；另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的比例也很高。”

2005 年 10 月新华社也曾发出过：《出租车司机生存状况调查——挣钱何时不再“玩命”》的专题报道：“2004 年 2 月，北京朝阳区出租司机王某在驾车行驶途中突然感觉胸闷、憋气，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5 月，北京顺义区出租车司机李某，在驾车时突发心肌梗，被乘客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10 月，一辆出租车行至北京东三环农展桥附近时，司机赵某突然猝死，乘客跳车逃走。2005 年 2 月，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桥西北侧的一片荒地里，一名北京银建出租公司的司机被发现猝死在了自己的红色富康出租车中。”

据媒体于 2007 年 4 月报道：“根据一项上海 4000 户入户调查，仅有 1% 的人愿意做工人；人们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该报导还评论说：“工人，越来越不被人看好，究其实质，还是与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认同有关。如果说既得利益的多少

还只是外在的物质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更深层次的身份差异则是影响着公众不愿意做工人的内在主要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出了那个年代的工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威风’的工人身份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失去了力量。”“当工人缺乏参与改革的话语权时，当工人在利益博弈中力量被边缘化时，人们不愿意做工人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广州日报》2007年4月9日，原文标题《咱们工人还有力量？》）

（五）半无产阶级化 与发达国家的无产者相比，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更高比例的半无产者。可以说，如果无产阶级化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变化的主要特征，那么，发展中国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改革期间，在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中国制造”的“工业化”浪潮中，中国的劳动力具有这一特征。 一般认为，工业化伴随着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即小生产者被剥夺，使之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或者通常所说的工资，必须足以维持劳动力基本生存和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但是，综观全球，基本实现了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能够完全依靠工资所得和基本福利来供养家庭，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一部分完全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家庭，但大量劳动群体却生活在半无产者家庭中。他们除工资之外，还需要而且必须从各种兼职中获得收入，包括小农生产，因为他们的工资通常低于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的水平。这种状况是世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本全球扩张的目的不在于把劳动力变成无产阶级，而在于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半无产阶级化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维持半无产阶级化的条件。 与无产阶级化相比，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更加深重。他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大，劳动条件更恶劣，更缺乏生活和权利保障。他们在低于劳动力价格的工资水平上之所以还能生存，完全是由于他们和/或家庭在这份工作之外，还通过其他劳作获得收入，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就业工人的家庭及其子女供养本来应该计入劳动力成本，但他们得到的低工资不足以支付这一部分费用，因此，半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及其家庭子女通常不得不参加劳动，全部或部分地自食其力。

发展中国家以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为特色，这些劳动力大量表现为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人、兼职工人等。1949 年之后，中国迅速消灭了血汗工厂，加速进行的工业化把大量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国家建立的劳动保护体系很快覆盖了各类企业的工人，实行 8 小时工作日制度，劳动条件显著改善。保障就业的政策使所有工人都捧上了“铁饭碗”，劳动者没有失业之忧，享有与就业相联系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在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下，工人获得了与西方现代工厂不相上下的劳保条件，在有些方面，例如工人的劳保医疗，甚至比有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当年的一些工厂更优越。产业工人能够完全依靠本职工作所得，保证家庭和子女的生存。可以说，在获得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和其他报酬这一点上，当年中国工人阶级更接近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状况，劳动力朝无产阶级化的方向演进。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完全农民身份的劳动力。改革中断了中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过程，使之转上了半无产阶级化的轨道。改革以来，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劳动者身份地位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职工的“铁饭碗”被砸碎了，劳动力的就业取决于资本需求，工资随行就市。中国不但产生了固定的失业大军，而且，随着劳保福利的基本消失，相当多就业人员的工资越来越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口。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兼职工等越来越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形式。正如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劳动力进入半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国半无产阶级大军的主体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他们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农民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典型的半无产者。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家里有地，本人在城镇和/或工矿务工，部分家庭成员还留在农村务农，他们的流动性强，工作和生活极不稳定。中国的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后劳动力变化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首先，农民工在数量上举足轻重，目前规模估计为 1.3 亿左右。按 2005 年中国 2.7 亿城镇就业人口计算，几乎占了半壁江山，29 他们大约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 58%，加工制造业的 68%，在服务行业也超过一半。其次，他们的工资水平低，处于非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底层。有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年薪大约是国有企业职工的 53-55%，而在传统服务业中工作的大多农村妇女的年收入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还低很多。这种工资水平实际

上低于劳动力成本，远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工的报酬水平大大低于劳动力价格，使他们难以在就业的城镇地区养育家庭。因此，长期的城乡分居就成了农民工的主要生存方式，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农村收入的补贴，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据统计，目前农民纯收入中 40%来自农民工从事非农劳动获得的工资。

第三，他们是改革后大量涌现、遍及全国的血汗工厂劳动力的主力军，是城镇建筑业以及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其他工作的主要力量。他们通常不享有任何劳动保障，不享有任何医疗、教育等福利，也没有工伤、养老保障。他们在缺乏基本生产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工作环境最恶劣，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劳动法》的规定，是工伤、职业病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工作不稳定，流动性最强，很多人不停地在不同地区、行业、城乡之间流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带有季节性特征，因为他们需要兼顾留在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第四，由于工作分散和不稳定、工作技术含量低等原因，他们比城市产业工人更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几乎完全不具有与雇主/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是遭受资本无情驱使和最大限度压榨的劳动力群体。对很多人来说，能够按时拿到微薄的报酬已属幸运，因为工钱被克扣的现象长期、大面积发生，很多人甚至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直到今天，农民工仍然不得不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追讨工钱，甚至反遭迫害。第五，他们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难和压力。家庭成员长期离分给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身心伤害。被迫留在农村的家人成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各自承受着残缺家庭、留守状态带来的额外生活压力和痛苦。有资料显示，2006 年在外出务工的 1.3 亿人中，已婚者有 1.06 亿人。除去举家迁移的大约 3900 万人，只有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 6700 万人，以 70%男性计算，农村仅“留守妇女”就有 4700 万人左右。有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留守儿童”大约为 5800 万，平均每 4 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他们没有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起码条件。正如其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也成为了一种统计常态。西方一些组织以及政府热衷于批评中国的血汗工厂，批评中国劳工遭受不公正待遇，似乎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必然后果，也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产物。不过，血汗工厂在中国重新出现并迅速扩散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虽然在 1995 年颁布实施了《劳动法》，但《劳动法》迄

今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障，致使大量劳动力的工资所得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除了政府执法不力外，一个深层原因是，没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本国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今天的中国并不例外。

三、劳动农民的情况与发展趋势

据统计，我国 2005 年乡村人口 7.45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57%；农林牧渔劳动者 3.35 亿人，占就业总人口的 44.8%（《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 99、125 页）。

一九八四年以后，分户经营的弱点日益凸现，农业生产呈徘徊、停滞或低速增长的态势，城乡差距转为扩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1978 年为 2.5：1；1985 年缩小为 1.85：1；1990 年扩大为 2.8：1，2005 年进一步扩大为 3.2：1（《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1978—2006）》第 46 页）。

解散人民公社以来，农业长期的分户经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少数十万、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财富的富翁（不限于经营农业）；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 年为 2365 万人）。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户经营，不仅妨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科学技术的采用，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原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医疗、教育、社保等项制度也随之解体了。原来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村、乡、县农村医疗体系垮台，使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经济支持的对老弱残疾者的“五保户”制度消失，使农村社保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收入开支的农村教育和公益事业费用，都改由农户缴纳，使农民负担问题凸现出来。尽管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但在医疗、教育、社保以及公益事业方面的开支增加了。特别是由于行政权力下放，乡、村行政机构和“七站八所”等基层事业机构人员急剧膨胀（如湖北省洪湖县棋盘乡，1990 年吃税费的干部不过 120 人，2000 年超过 340 人，群众说“干部如蝗虫”）等原因，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活和政民关系。

2006 年国务院宣布“全免农业税”，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把原来依靠农业税费维持的乡村各种机构和冗员精简掉，而这些冗员大部分是县、乡、村三

级干部安插的子女和亲友，工作难度相当大。一些地区出现“免了税长了费”的现象。据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到农村调查，下边存在“税内损失税外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在征收内容上，由农业税费转向行政性专项收费；(2)在收费方式上，由乡村集中收费转向各有关机关、单位分散收费；(3)在收费的对象上，由面向全体农户转向要求办事或提供服务的部分特定农户，把本该免费提供的服务，分别改由中介组织、协会等服务机关收费，甚至以不为农户办事相威胁，强制收费（《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3月7日）。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加强了农业支持补贴制度，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问题。例如，新华社记者到河南省中牟县调查时，大王村的农民说：“这几年，只要农民用的东西没有不涨价的。就说这复合肥，去年一袋不到70元，今年就85元。一亩地要两三袋，就多花三四十块，把国家的补贴全吃掉了。还有农药、农膜，价格一个劲儿往上涨。那么多部门，咋就管不住呢？”（《新华社每日电讯》2007年4月16日）

“只为老板铺路，不为农民服务。”“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眼是工业厂房；虽有路可走，但无地生存。”这是农民对乱占农民耕地发出的抗议。《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篇题为《“圈地热”惊人的背后——关于地方政府土地违法案件的调查与思考》的报导中，详述了政府圈地、农民失地过程中的四个特点：一是乱设园区：“规划跟着项目走”、“规划跟着领导走”。二是违法圈地：虚假指标，暗箱操作，乱批乱占，低价出让。三是补偿欠缺：“地方政府请客，老百姓买单”，出现“三无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四是腐败温床：利益诱惑，权力寻租，执法不力，“尚方宝剑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人民日报》2004年4月23日）。

解散人民公社以来，农业长期的分户经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少数十万、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财富的富翁（不限于经营农业）；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为2365万人）。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较多的财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2004年初，《重庆日报》记者写道：“‘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到来。”该记者报导了重庆市北碚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

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 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 6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 65%。（见《商界》2004 年第 1 期）。又据中央电视台在一个以《村官的价格》为题的节目中报导，河津市下化乡老窖头村村民王玉峰为拉选票，发给选民共计 223 万元现金。后被人揭发，才被依法没收。还有一篇题为《600 万元选出高价村官》的电视报导。村官本来是基层的小小“芝麻官”，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价贿选？主要是可以从征地和乱收费中捞取钱财（见《中国电视报》2002 年 2 月 2 日）。

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村，多年来一直坚持集体经济，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没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卖淫嫖娼，基本上没有刑事犯罪；而且群众的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干群团结，党群关系紧密。据估计，这样的村在全国约有 6000 个。它们的存在与广大农村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方科研机构也不能不承认：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金字塔”——“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

该《报告》说：“本报告的图 1 在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已依据各阶层拥有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提出一个等级位序。”在图示的社会等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下一层五个等级中，当代中国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上属于第四层（中下层）和第五层（下一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则全部属于第五层（下一层），而这部分人实际是工人、农民中的一部分。总之，工人和农民由于“拥有资源”少、“重要程度”低，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

该《报告》还指出：处于“金字塔”顶部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受益者之一。”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中积累资金成长发育起来的。他们不仅经济上受益最多，而且政治地位显著提高。调查材料显示：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该《报告》指出：“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在下降”，“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工人与党组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在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

该《报告》还指出：“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化的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较大比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 37—38 页）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量调查资料说明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情况：一是工人农民的地位降到“金字塔”的最底层，成为“老八”、“老九”、“老十”；二是执政党的基础向“拥有经济文化资源的阶层”倾斜，与工农群众逐渐疏远。

2011 年 4 月 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一节 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关系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一节 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关系

一、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早已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消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搞垮以后，正在逐步恢复。

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它们曾经预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很快就暴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

当前的世界形势仍然是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的两霸在苏联瓦解之后，只剩下美国一家独霸世界；第二世界增加了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巴西；第三世界仍然处在分裂混乱状态，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廉价高质劳动力的“世界工厂”，中国富了起来，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并且还能向欧洲一些国家施行“中国式马歇尔计划”，被西方政要称誉“挽救了资本主义”。胡锦涛 2011 年访美，拿出了 450 亿美元的大买单，使为国内高失业率惶惶不安的美国舒了一口气。中国先是被拉进了“G8”，再是被列入了“G20”，现今则已被公认为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的“事实上的 G2”了。

商务部统计显示，截至 2010 年 7 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9.8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达 1.05 万亿美元。2010 年前 7 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583.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5%，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4459 家，同比增长 17.9%。2010 年全年利用外资 900 亿美元……

有统计显示，近 10 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在 30%以上；在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前 5 名全部是外资企业。外资以并购的形式对我国实施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内很多矿产、粮油加工等诸多上下游企业，外资其实已涉足控制很深，但名义上仍是中资控股。此外，部分产业、行业正在遭受着通过并购形式的外资渗透，这种渗透正在呈几何级数蔓延。

中国的经济增长 74% 依赖出口。

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但大量的海外投资已经涌现，甚至有赶上外商对中国投资水平的趋势。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9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 54%。200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565.3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1%，截至 2009 年底，我国共对 177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投资覆盖率达 72.8%。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领域几乎覆盖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各个领域，并呈现出分布更为广泛的特点。投资范围也从以亚洲国家为主扩大到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同时投资额均显著上升。截止到 2009 年底，中国 1.2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 17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1.3 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超过 2457 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1 万亿美元。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海外投资额定为 120 亿美元左右，5 年海外投资总计 600 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 年一年的海外投资额即有望在 600 亿美元左右。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 年 1-7 月，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 61 亿美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22.8%，其中仅仅民营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 100% 股权 17.88 亿美元等，就占到金额的近 30%。

同时,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快速增加。1-6 月,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 3.6 倍, 达到 6.05 亿美元; 对欧盟直接投资 4.06 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7.2%。此外, 过去近八成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格局, 已经被打破。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春永估计,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1:2 的比重, 可望在 2015 年前后升至 1:1。由于目前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新的投资动力, 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中国未来的投资数量和质量有望上新的台阶。受此影响, 2013 年海外投资将过千亿美元, 存量可望达 5000 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估算, 从 1999 年到 2008 年这 10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了 80.43%。他说: “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 高于我们 GDP 的增长速度, 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 他表示, 如果按 30% 的增速测算, 到 2015 年, 我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 3000 多亿美元, 到 2018 年, 将达到 7000 多亿美元。即使按 10% 的增速测算, 到 2015 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够达到 1089 亿美元, 到 2018 年, 每年可以达到 1450 亿美元。卢进勇说: “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据他介绍, 截止到 2009 年底, 我国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 2460 亿美元;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底,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 1 万亿美元, 两者之比是 1:4, 这说明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同时, 从人均对外投资数额看, 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为 50 多美元, 北京为 17.4 美元, 从人均来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投资分别所处阶段, 据卢进勇分析, 处在人均 GDP400~2500 美元第二阶段的有 6 个, 占 19.4%; 处在 2500~4000 美元第三阶段的有 15 个, 占 48.4%; 处在 4000 美元以上第四阶段的有 10 个, 占 32.3%, 即我国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已经达到了 80% 左右。他说: “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 GDP 过了 3000 美元, 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 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 他认为, 以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0-2012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认为, 中国是 2010

年至 2012 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位居美国之后，超过德国、英国、法国。

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向外扩张。

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已经脱离了第三世界，进入了第二世界。

二、当前中国的外部矛盾

当前的中国在外存在着复杂的的矛盾，包括与美国的矛盾、与第二世界各国的矛盾、与第三世界各国的矛盾、与周边各国的矛盾，等等。

其中主要矛盾是中国与美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要溶于以美国为霸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它必须处处与国际接轨，听从美国的摆布；但它由于经济力量不断上升，对外投资、抢占资源不断扩张，必将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要霸占中国的各种资源，它支持中国政府实行的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认为还不够，但不满意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快速上升，对外扩张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它在全球的未来的主要对手。它们既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

另一方面是中国各族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民族矛盾。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是美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的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中国的一部分剥削阶级站在美国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共同压迫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

三、当前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的人民革命来说，头号的敌人无疑是美国帝国主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它支持各国的反动派，镇压一切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一切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

从一国人民的革命来说，头号的敌人无疑是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除非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侵占本国的领土，支持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本国的人民，镇压人民革命，促使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使它们自己成为被侵略国家的头号敌人。

一国人民的革命与世界人民革命是相互联系的。

各国人民革命是相互支援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正在恢复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正在逐步向上发展时期。

2011 年 4 月 1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二节 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二节 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个体劳动生产关系组成。

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一种是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民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二种是外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是指那些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演变而来，挂着“国有经济”招牌，具有垄断性、收益特大的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这些国企实际掌握在官僚、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中，他们不仅享受高薪、股权，而且可以运用这些资本谋取私利。这种经济既为其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服务，又与其他经济成分争利。在现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二）民企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是由民间人士举办的中小型企业。在现阶段，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它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三）外来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外来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的“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机构。

第二，外国垄断资本实体经济企业，以各种形式大批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特有的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和中国政府给予外资的特别优惠条件，以及它们本身具有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不断进行参股控股，由产业并

购而产业替代，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优势地位。

第三，中国工业产品销售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66.9%，超过那些国民经济立足于外贸的国家和地区。

外来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就业的好处，但是也挤占、甚至在某些行业垄断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四）农村和城市的小私有经济

这种个体小私有经济正在日益分化，其中大多数日趋贫困破产，极少数成为新富农或煤窑砖窑烟花爆竹等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二、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组成。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现时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已经掌握了当代许多领域里的先进技术，它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第二位。但按人平均计算，它的许多经济指标仍然处在世界的中下水平。

三、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一）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中包括：

1，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党政军的官员）。

他们是由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和美帝从内部摧毁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演变而成的。所以，它的行动多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手法进行。

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

他们具有极大的买办性，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2, 国企资产阶级

国企资产阶级是管理“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实际所有权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3, 民企资产阶级

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是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国退民进”、“招商引资”、“能人创业”等政策，官商勾结，扶助起来的，和官僚资产阶级一起摧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生俱来就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也十分突出，臭名昭著的“黑”字号煤窑砖窑和包身工，都出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里。现中国民企资产阶级无论人数和经济实力都远远大于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其中很多人都已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不少人已经开始以专家身份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权机构。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权益上，官僚资产阶级对民间资产阶级主要是扶助，利用，勾结，但也有限制侵害的一面。民间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依赖，利用和勾结，但也有抵制争夺的一面。

4, 外来资产阶级

外来资产阶级包括港澳台来大陆投资的资本家以及其它国家来华投资的资本家。

5, 买办资产阶级

他们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6, 黑恶资产阶级

他们打着合法企业的幌子，实际干着非法的活动——贩卖毒品、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赌博、走私、欺行霸市、打家劫舍，等等。

(二) 工人阶级

- 1, 现代产业工人
- 2, 公司职员
- 3, 农民工

(三) 农民及个体劳动者阶级

- 1, 农村个体劳动者
- 2, 城市个体劳动者

(四) 知识分子阶层

- 1, 官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2,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3,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4, 劳动知识分子
- 5,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四、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地区矛盾、民族矛盾、生产矛盾、需要矛盾、阶级矛盾等等。其中主要的是阶级矛盾。

在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其中包括：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矛盾；

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个体劳动者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等等。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2011 年 4 月 1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一、国体——国家的统治阶级

(一) 统治阶级

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都成了被统治阶级。

(二) 统治集团

掌握国家政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 政治路线

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二、政体——政权的组织形式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称没有改变，但代表主要由官僚、资本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人组成，选出的领导机构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二)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名称没有改变，委员主要由官僚、资本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人组成，选出的领导机构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三) 政党制度

执政党——名称没有改变，党员成分增加了资产阶级分子，选出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参政党——名称没有改变，党员成分也没有变，政治功能变了：由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党派，变成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党派

（四）行政机关制度——形式没有变，人员构成、政治功能变了：由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办事的机关。

（五）司法机关制度——形式没有变，人员构成、政治功能变了：由保护人民的机关，变成了保护资产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关。

（六）军事机关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担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但也担负着对内镇压、向外扩张的任务。

三、统治思想

现今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开，这是十七大的一大贡献。让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清醒过来。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

这三个部分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领导集团通过“拨乱反正”的首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领导集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而又把它向右发展的结晶。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领导集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又把它们加以改良的观点。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具特色。

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 1978 年至 1992 年，邓小平领导集团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展私有制，改造公有制，溶于世

界资本主义体系。

一个基本点就是“四个坚持”：坚持特色社会制度、坚持对革命派专政、坚持邓小平集团的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

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 1992 年至 2002 年，江泽民领导集团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的思想指导、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各社会阶层。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去改造一切。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经济：不加限制地发展壮大私有经济，不加限制地改造公有经济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文化：在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等部门推行产业化，搞利润挂帅。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政权机关：把大批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纳入各级政权机关，用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硬指标，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党组织：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人民的先锋队、民族的先锋队，吸收资本家入党、让先富起来的“能人”担任基层组织的领导人。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实质涵义就是：

代表先进生产力：谁拥有先进生产力？中外资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精英。

代表先进的文化：谁掌握着先进文化？为中外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人！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谁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外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客！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精英。

这些说明，江泽民领导集团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它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确确实实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又把邓小平理论向右发展了。搞得社会矛盾日益紧张，民怨沸腾。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 2003 年至今，胡锦涛领导集团推行的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维持现状，有所改良。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发展要科学、社会要和谐。

这两点都是针对江泽民执政时期造成的问题提出来的。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比作一个三段论，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正（肯定），江泽民思想就是反（否定），胡锦涛观点就是合（否定之否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继承又有扬弃。

邓小平试探着要在中国走一条搞私有化的道路。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这条路子，但又搞得太猛、过头了，搞得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胡锦涛要继续沿着邓小平的路子走下去，不后退、不回头。但是他又看到江泽民的搞法太狠了，必须对老百姓作出一些让步。这样才能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使贫富两极相安无事，也就达到了社会和谐。

2011 年 4 月 25 日初稿

第六篇第三章第四节 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四节 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一、革命性质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性质，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和国企资产阶级，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早已彻底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没有复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国企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没有联系，推翻它的统治和消灭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二）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既有勾结又有争夺。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既有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面，又有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面。对民营企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三）现中国的外来资产阶级是以帝国主义、经济霸权主义为后盾的。他们控制了相当大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与国企资产阶级、民企资产阶级既相勾结又相争夺。外来资本主义企业残酷地剥削工人，侵占国内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它又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就业。外来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服从中国政府的管理，并缴纳规定的税金。对外来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同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四）在现中国，无论是当前反腐败、反卖国、反复辟的斗争或是即将到来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都是基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社会矛盾的革命，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二、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因为它们掌握着国家政权。

其它的国企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黑恶资产阶级当然也是革命的对象。但它们的问题，将会在工人阶级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及以后逐步解决。

民企资产阶级同样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未来的革命浪潮中会不会转化，将由那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它的态度决定，现在难以推测。

三、革命的动力

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新梯队。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他们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

个体劳动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可以争取的同盟军。

四、革命的任务

第一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第二步，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五、革命的形式

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迎接政治斗争的新高潮

（一）经济斗争

近年来为争取生活保障待遇同地方政府发生对峙和新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罢工斗争来看，他们均缺乏有形的组织而表现为自发运动。这一方面因为专制政权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工人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恰恰因为不存在有形的组织才使得斗争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通常都局限在一厂一事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很难使他们跨越这一范围进行更广泛的动员。然而，无论是有组织的抗争，还是群众运动，都是斗争的外在形式，真正推动运动前进的是斗争的实际内容。对于老工人而言，他们的斗争内容是分层次的，既有最低要求也有最高目标。

最低要求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表现为经济的内容，反映的是个体生活的要求。诸如“要吃饭，要生存”的口号便是这一目标的表述。这一要求能最广泛地动员群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免遭政权的打击。

其次是保护或夺回工厂的斗争，具有反私有化的性质，表达的是一个单位工人集体的共同利益。这一斗争反映的是工人这样的理念：工厂企业是工人劳动积累而不是资本家的，是政府做嫁通过官商勾结私分了工人的财产，打碎了工人的饭碗。

再次，工人斗争矛头直指当地政府，“保护国有资产”、“惩治腐败分子”等口号便是表达这一层次斗争内容的。如果需要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概念来表述，那么，这一阶段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过渡。

（二）文化斗争

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宣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揭露复辟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揭露投降帝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批判修正主义的特色资本主义错误理论

（三）政治斗争

最高要求便是政治的并涉及社会制度的要求，2002 年东北一个地级城市辽阳发生的工潮，是在同一个城市由多家工厂联合并有数万工人参加的持续数日

的群众运动，他们打出的主标语“罢免 XXX，解放辽阳市”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斗争取向。这说明，工人的斗争一旦超出工厂范围并表现为阶级的行动，便可能向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不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要求阶段。

革命的政策

- (1) 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 (2) 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 (3) 全国人民要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2011 年 5 月 3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五节 问题讨论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五节 问题讨论

一、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应该定义为是社会主义已经变质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有人说“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是因为“已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中国社会“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什么封建主义社会。并非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因为：第一，“如果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不需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了”。第二，“今天的社会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

这些人说西方帝国主义“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因此就证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似乎理由不充分。第一，国际上普遍认为，一九七六年以来，中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持上述观点的人也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第二，西方帝国主义对目前的中国社会制度不满的是他们所谓的“一党专制”、“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并不能因为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反对的就能证明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

关于目前中国的“四个仍然存在”就非常值得研究了。第一，它们与主张者的“已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大前提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承认剥削阶级已经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剥削阶级的这种统治地位体现在哪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执政的共产党仍然是原来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然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呢？第二，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所有制。目前中国的社

会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归根结底是由这个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中国目前占主体地位的的生产关系是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第三，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的国有经济，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首先可以肯定：国有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国外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那种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其次，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如果说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证明它与国外的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有什么区别。一个剥削阶级已经重新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国有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这能说得通吗？第四，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早已经瓦解，仅仅剩下的一点残余——所谓土地仍然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还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吗？

目前的中国社会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而来的，还仍然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痕迹：第一，这个社会虽然是剥削阶级已经重新占统治地位，但是这个国家政权仍然自称是人民政权。第二，这个政权的组织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全国官员代表大会，抽掉了由人民决策把关的功能”，但仍然保留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名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变成了明星俱乐部，抽掉了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的功能”，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第三，“党官一体化抽掉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但仍然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

有人说：“正是由于这套基本制度丧失了原有功能，社会权力出现了约束真空，才使权力和资本双双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登峰造极地步，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全面崩溃，整个社会变成了动物世界。”这些话，如“登峰造极”、“全面崩溃”、“动物世界”等等，是言重了、过头了，但也多少揭露了“这套基本制度”的本质。只是叫人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又要坚持说“这套基本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主张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很清楚：“这套基本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是人民拥护、坚持的。一九七六年以后的，“这套基本制度”逐渐变质，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官僚资产阶级把持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也是人民坚决反对

的。主张者采取偷换概念的方法，抛弃“这套基本制度”的性质、内容，而要人们去维护“这套基本制度”的抽象形式。然而，“这套基本制度”的抽象形式只存在于人们的概念中，并不存在于客观实际中。一些思想不清醒的人，被他这么一绕，就认为：目前的“这套基本制度”是应该拥护的，谁反对它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二、目前中国社会究竟是附庸资本主义，还是二流帝国主义？

当前，在左派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属于资本主义形态的共同前提下，具体的分析又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是最坏的附庸半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

另一种认为，是二流帝国主义。

在前一种意见看来，所谓“最坏的附庸半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从他们关于主要矛盾、革命性质的意见来看，似乎中国社会又回到了建国前的社会。

商务部统计显示，截至 2010 年 7 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9.8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达 1.05 万亿美元。2010 年前 7 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83.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5%，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4459 家，同比增长 17.9%。2010 年全年利用外资 900 亿美元……

有统计显示，近 10 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在 30%以上；在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前 5 名全部是外资企业。外资以并购的形式对我国实施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内很多矿产、粮油加工等诸多上下游企业，外资其实已涉足控制很深，但名义上仍是中资控股。此外，部分产业、行业正在遭受着通过并购形式的外资渗透，这种渗透正在呈几何级数蔓延。

中国的经济增长 74% 依赖出口。

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但是不能过分夸大目前中国社会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世界上难道说有一个能参加“G20”、“G8”、“G2”等等会议

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吗?

在后一种意见看来, 所谓“二流帝国主义”, 也就是新帝国主义。似乎中国社会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过分夸大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向外扩张性。中国向外扩张, 认真说来是从二十一世纪才开始的。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 2009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 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 年均增长速度达 54%。2009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565.3 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 1.1%, 截至 2009 年底, 我国共对 177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 投资覆盖率达 72.8%。

目前,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领域几乎覆盖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各个领域, 并呈现出分布更为广泛的特点。投资范围也从以亚洲国家为主扩大到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 同时投资额均显著上升。截止到 2009 年底, 中国 1.2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 17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1.3 万家, 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超过 2457 亿美元,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1 万亿美元。

在“十一五”规划中, 中国每年的海外投资额定为 120 亿美元左右, 5 年海外投资总计 600 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 2010 年一年的海外投资额即有望在 600 亿美元左右。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0 年 1-7 月, 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 61 亿美元, 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22.8%, 其中仅仅民营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 100% 股权 17.88 亿美元等, 就占到金额的近 30%。同时,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快速增加。1-6 月,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 3.6 倍, 达到 6.05 亿美元; 对欧盟直接投资 4.06 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7.2%。此外, 过去近八成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格局, 已经被打破。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春永估计,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1:2 的比重, 可望在 2015 年前后升至 1:1。由于目前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新的投资动力, 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中国未来的投资数量和质量有望上新的台阶。受此影响, 2013 年海外投资将过千亿美元, 存量可望达 5000 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估算，从 1999 年到 2008 年这 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80.43%。他说：“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高于我们 GDP 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他表示，如果按 30% 的增速测算，到 2015 年，我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 3000 多亿美元，到 2018 年，将达到 7000 多亿美元。即使按 10% 的增速测算，到 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够达到 1089 亿美元，到 2018 年，每年可以达到 1450 亿美元。卢进勇说：“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据他介绍，截止到 2009 年底，我国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 2460 亿美元；截止到 2010 年 6 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 1 万亿美元，两者之比是 1:4，这说明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同时，从人均对外投资数额看，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为 50 多美元，北京为 17.4 美元，从人均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投资分别所处阶段，据卢进勇分析，处在人均 GDP400~2500 美元第二阶段的有 6 个，占 19.4%；处在 2500~4000 美元第三阶段的有 15 个，占 48.4%；处在 4000 美元以上第四阶段的有 10 个，占 32.3%，即我国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已经达到了 80% 左右。他说：“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 GDP 过了 3000 美元，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他认为，以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0-2012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是 2010 年至 2012 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位居美国之后，超过德国、英国、法国。

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主要是防御性的，还不足以成为向外经济扩张的有力后盾。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

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社会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社会，而

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目前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

有人说：

彻底否定就表现在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基本性质的判断上，坚持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

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战干什么？

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中国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但仍然是共产党。

主张者总算承认：目前，“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但是他坚持认为：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还没有完全变。为什么呢？他没有对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作具体分析，而是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如“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战干什么？”

“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

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是由哪些重要因素组成决定的？

第一，党的指导思想。它的指导思想变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制造了一个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为内容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党的政治路线。它的基本政治路线变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不搞

阶级斗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建立和谐社会。

第三，党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变了：清除了革命派，招纳的是修正主义分子。

第四，党的组成人员。它的党员成分变了：资产阶级分子、思想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大量招纳入党，工人、农民占的比例不断减少。

由此，原来的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真共产党，就变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假共产党。当然，这决不说现在的假共产党内的“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具有近六十年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修正主义集团想在三十年中把它斩尽杀绝，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有点类似：成了个大杂烩，党内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还有国民党右派，还有官僚政客，还有贪官污吏，还有汉奸买办。因此，对这样一个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这种意见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现在的这个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执政党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至于他说什么“这个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有点类似”、“对这样一个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无非是要说这个党内还有人是要革命的，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点：第一，革命派从来不反对这种看法；第二，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否定对这个党的性质的认定；第三，对具体人的评价，革命派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反对给现职的中央一级的某些领导人带上“社会主义改革派”的帽子。

四、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矛盾、还是两条道路矛盾？

这个问题初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难道说两个阶级的矛盾与两条道路的矛盾能够割裂开来吗？

但是，确实有一种意见认为：从主要矛盾的角度说，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一，这种意见的大前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呢？它的理由无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社会主义，何来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但是，请不要忽略：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追求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势力，它们实实在在地不断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着不懈地斗争，并不断地取得了成果。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呢？它的理由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何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实践的经验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不发达阶段，只是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仍然存在。

1957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选》第五卷 第475页）这里说得很清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并不是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么它们的区别何在呢？就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就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资产阶级实现了复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又重新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的性质就又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毛主席教导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

性质。

第三，这种意见的小前提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中国社会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再重复。现在执政的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即假社会主义社会。

五、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

有种观点：美国的侵略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

他们说：现在的社会性质是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完全的资本主义，因此，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既是阶级矛盾，又是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

分析一下这种观点：

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第二，无论是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还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在其社会内部，主要矛盾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三，在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者成为了社会的直接统治者；在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者成为了社会的间接统治者（通过代理人），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才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大众与官僚军阀买办阶级的矛盾。

第四，目前，外国帝国主义者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统治者了吗？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直接入侵到了中国吗？现在的执政党已经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了吗？如果没有，怎么能得出：“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样的结论呢？

第五，说这个矛盾既是阶级矛盾，又是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或者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是主要矛盾，两者已经合二为一。这

些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

其一，对中国人民来说，对广大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来说，外国的侵略是否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是否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如果外国的侵略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党人看不见，结果脱离了广大劳动人民，也不能联合一部分与外国侵略者有矛盾的剥削阶级；如果祖国沦陷，劳动人民会更加重一层民族压迫。问题在于：现在的形势，民族矛盾是否上升为主要矛盾？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各自支持一派军阀势力进行混战，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将主要的斗争矛头对准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方军阀，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人，发动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作为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代理人统治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是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等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占我国的东北、华北大片国土，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判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号召开展全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

当然，在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许多新的形式——新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实现，不一定要侵占殖民国家的领土，也不一定要推翻该国的不愿完全合作的合法政府，而是更多地采取经济形式，更多地依赖被殖民国家的政府的合作。帝国主义侵略危险的程度，主要表现在本国政府卖国的程度。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反对本国的卖国政府和卖国势力。

其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天然代理人，它是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虽然与帝国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它们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又依附于帝国主义，带有极大的买办性。现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有一部分势力带有更加直接的买办性，更多地依附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中国的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目前这种依附于帝国主义、出卖劳动人民的利益的状况，决不是由某个人或某几个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由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造成的。

其三，无论是反帝也好，还是锄奸也好，如果不铲除官僚资产阶级，都只

能是停留在空话上。现在是谁在勾结、投降美国帝国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是谁在保护汉奸买办集团？是官僚资产阶级。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人们成天担心的种植转基因主粮、外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房贷、外资控制我国金融及其他行业等等问题，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些汉奸卖国集团终将被人民审判，得到可耻下场。如果不然，今天反这个、明天反那个，除了造点舆论，一个也反不了。今天锄这个，明天锄那个，一个也锄不掉。尤其可笑的是，有些人居然要联合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他们说的修正主义）一起反帝锄奸，还说是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其四，所谓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融合为一的论调也是站不住的。

说民族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这是就阶级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政治意义来说的。并不能因此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划等号，也不能把两者融合为一。这里说的民族矛盾特指的是中国与外国的矛盾、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中国外部的矛盾。阶级矛盾是特指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民间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等等。这是中国内部的矛盾。解决民族矛盾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了阶级矛盾。如果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就必然要求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放弃对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把斗争的矛头只对准一部分所谓的“汉奸”、“奸相”、“代理人”即“官僚集团”或“买办集团”。

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一方面极力限制、镇压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利用人民群众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视线，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民间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也有联系，又有较多的矛盾。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不对形势作阶级分析，只是抽象地宣扬爱国主义。一方面可以引起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警惕，加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削弱劳动人民对本国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警惕，放松对国内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

六、当前的革命的性质究竟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有人提出“二次革命”论：第一次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或权贵资产阶级，任务是夺取政权；第二次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当前进行的革命，究竟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根本政治立场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

第一，一个革命的性质是由要解决的生产关系问题、所有制问题决定的。如果一个革命所要消灭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革命的性质就是民主主义的；如果这个革命所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革命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的。

第二，一部分代表民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他们也打着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的旗帜，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反对“一党专政”，企图建立不带社会主义、共产党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但这只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幻想，如果他们“革命”取得成功，也不过是建立一个更加依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

第三，一部分代表外来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他们也打着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的旗帜，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反对“一党专政”，其实质是建立另一种更加彻底的依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发展更加附属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经济，更加彻底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余。

如果革命的人们也把自己的革命规定为民主革命，不仅在政治上与这些右派划不清界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尾巴。

有的人认为：今天的共产党人，还要为党的最低纲领的完全实现而奋斗，这个奋斗仍然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一个是人民民主。这种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目前的中国是完全错误的，它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不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它只反对买办资产阶级，不反对官僚资产阶级。

对于那些站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的立场上的人来说，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需要的只是“民族崛起”、“社会复兴”。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不变，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不变，坚持五星红旗的政治格局不变。”

这种政治立场确实不同于革命派，也不同于反革命派，姑且叫它做中间派或者附属派（因为它是附属于执政党的）吧。

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锄奸，还是铲除官僚资产阶级？

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锄奸的人，不仅假设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命题，而且假设在执政党内单独存在一个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政治派别——西化派或西化卖国集团。

中国执政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中央，不允许成立政治派别。人大、政协、国务院、检察院、军队武警等等各方面的重大工作，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但是，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中确实存在不同政治色彩的政治人物，实际上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有人说：现在出卖国家利益的事都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西化派或西化卖国集团干的。

请问：这些重大问题是谁决策的？难道说仅仅是国务院或国务院的某一个领导人、某一个派别、某一个利益集团决定的？

如果说承认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那么，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恰好就是中国现在的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而不是执政党中的某一个派别或集团。

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当然有区别。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官僚，它们相互交错。但是，这终究是资产阶级中的两个不同阶层。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而买办资产阶级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现在人们说的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即汉奸，通常是指的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完全投靠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政治上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又与帝国主义相争夺。这种争夺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民族性进步性”，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

级可以利用这种争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锄奸，而是要铲除整个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有些人那里，甚至“反帝锄奸”都成了一句空话，剩下的只有“扩大百姓民权，加强中央集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这大概就是智囊们为执政党提供的政治改革路线图吧？

八，是保国，还是重新建国？

国家有两种涵义：一是从政治地理学或抽象的意义来说，国家是具有国际公认而又有相对明确政治边界的某一国土区域，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二是从政治学来说，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也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

有些人经常把两种意义不同的国家混淆在一起。用前一种意义的国家来掩盖、代替后一种意义的国家。

在历史的现阶段，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卫前一种意义的国家，不许外国侵犯。至于后一种意义的国家，就要加以分析。如果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我们当然要捍卫，如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我们就要反对。

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国家基本制度再好也改变不了这个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体问题而不是政体问题，国家的基本制度可以继续保留，以后逐步改革。

我们提出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这就是要人民群众能真正行使管理权、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要缩小工资级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九，是拚命挽救假共产党，还是重新建立真共产党？

有人提出来：不能对毛主席缔造、历经磨难、多次在九死一生险境中转危

为安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信心。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不应当退党、弃党、打倒党，而应当拚命挽救党。

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这是由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执行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在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中，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派”。过去的陈云算不上，现在的薄希来更算不上。

这个党的党员中有不少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党员，这也改变不了这个党的资产阶级本质。

把真假共产党分开，把真共产党假共产党这个口号喊出来：我们要代表劳苦大众的真共产党，不要代表贪官污吏资产阶级的假共产党！

所谓拚命挽救党，无非是在假共产党内，期望当权者左转。幻想有一天，经过左派的斗争，召开一个新时期的遵义会议，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就会转变政治立场，重新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实践证明：八九政治风波以后，新的领导人上台，并且喊出了要搞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善良的人们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路线。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完完全全地改变了中国，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十六大以后，又一个新的领导人上台，一开始就去西北坡朝拜，喊出了“两个务必”、“世世代代高举”的口号，善良的人们又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路线。善良的左派名人还提出要用“胡温新政”来划分左派与右派。八年又过去了，他们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路线，维持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用“关注民生”勾引起劳动者改善处境的新希望。人们又失望了，通钢工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富士康的工人用十 N 跳表达了他们的反抗。在这种形势下，“重庆模式”出来了，十八大即将召开，善良的人们又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善良的左派名人又提出种种左转的预言。只恐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既然假共产党不可能转变为真共产党，那就只能重新建立一个真共产党，要建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的斗争的共产党。

现在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能急于求成。

现在的左派思想上不统一，要求革命的少，期望改良的多；组织上涣散无力，缺少大批骨干。

要做扎实的群众工作，各地方建立各种学习小组，研讨会等，提高群众的觉悟。

有朝一日条件成熟，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党。

十，如何对待执政党内的干部、党员？

对于那些已经转变政治立场，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拥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高级干部，应该把他们看作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而不应该把他们看作是“三中全会派”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左翼”。

对于执政党内的广大干部，只要他清正廉洁、肯为人民办实事的，应该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只要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汉奸卖国行为，应该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只要他反对错误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

对执政党内的党员，应该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广大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中的党员，比一般群众受到的修正主义毒害较多一些，但不应该歧视他们，而要更多的争取他们。对于一九七六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受到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比较多，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亲身经历，更应该争取他们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列中来。

对于执政党内的“毛派共产党人”应该一分为二。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愿意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剥削阶级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的人民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但是这套基本制度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阶级性，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领导作用没有变；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主要

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样就可以复兴社会主义、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东方文化；如果说革命，也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不是民间资产阶级，也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左翼具有民族性进步性，共产党的上层和主流有许多人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维护国家统一的领导力量，仍然是现在的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帝锄奸，救党保国”，支持“胡温新政”，要反也只能反温，不能反胡；要充分支持共产党上层的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如重庆模式，这些都是共产党左转能力的证明、向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这些观点与革命派的立场存在根本分歧，是革命派决不能赞成的。对于他们积极的一面，革命派将继续支持；对于他们消极的一面，将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减少它对群众的消极影响。

革命派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但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我们的口号是：

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要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十一，如何对待民间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

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

前面说过：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组成。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现时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已经掌握了当代许多领域里的先进技术，它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第二位。但按人平均计算，它的许多经济指标仍然处在世界的中下水平。”

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

前面说过：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性质，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

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认为当前的革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就完全忽视了现今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演变成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认为当前的革命应该是回到过去已经完成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也是忽视了：现今社会是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演变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过去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三）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

前面说过：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如果不牢牢把握住“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往往就容易搞错革命的性质，迷失革命的大方向。

如果不牢牢把握住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往往就容易在革命的某一阶段，搞错打击的重点对象，忽略可以争取的对象。

（四）要正确认识民企生产关系、民间资产阶级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第一，民企生产关系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民间资产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搞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民企生产关系中，资本无偿占有了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力，在民企的社会关系中，工人与资本家处于对立的地位，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两大对抗的阶级。

第三，当前的中国民企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是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它们有极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中国民企又受到国家垄断

企业、外资企业的压制、排挤，以及腐败官吏的种种压榨，民间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又有矛盾，有争夺。

第四，民企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农民及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是重要原料来源，又是它的产品销售对象。同时，它又经过市场竞争，不平等的交易，实现对农民及其他独立劳动者的剥削。

第五，民企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差别，民间资产阶级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大的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的资产阶级。有的民企资本家与外商勾结比较紧密，有的不那么紧密。有的民企资本家与国企勾结比较紧密，有的不那么紧密。有的民企资本家在略夺了劳动人民的财富以后，早已转移到国外或作好了外逃的准备，有的企图在中国发展，成就一番事业。

要正确估计民间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民间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当然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革命阶段、革命时期，它都将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或重点打击对象。

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阶段或时期，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国土的阶段或时期，民间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有可能作为某种中间势力而存在。其右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其中间部分可能成为革命的争取的对象。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对社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或时期，民间企业将成为改造的重点对象，这种改造仍然可以吸取过去实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的有益经验，把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绝大多数民间资本家，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权力和利益。

关键是要对民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作出正确的阶级分析。

对社会上活动的各个政治代表人物，要对他们的阶级属性作出正确的分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只会标榜自己是代表“公众”、“人民”、“社会”，而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更绝少有人承认是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人。

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根据某个人的一贯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光是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不等于就是作出了正确的阶级分析。判定某一个人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还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或是代表民间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亦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需要根据系统的资料，作出全面的分析。

判定了民间资产阶级的某一个政治人物、团体、派别的基本阶级属性以后，还要对他或他们的政治倾向（左的、右的、中间的）及不同时期的变化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样才能决定对他或他们是采取反对、争取或联合的政策。

2011 年 4 月 1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2012 年 8 月 11 日再修改